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下)

水陆洲 编辑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二〇一二年九月制作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 第三篇(下) 目 录

第六章 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活动	4
第一节 林彪叛逃	4
第二节 揭批林彪罪行	200
第七章 开展外交新局面	248
第一节 毛泽东决定开展中美谈判	248
第二节 基辛格访华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257
第三节 尼克松访华	274
第四节 中日恢复邦交	289
第八章 批林整风	312
第一节 一九七二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312
第二节 开展批林整风	342

第三节	批判极左思潮问题	617
第四节	江青接受美国学者采访	657
第九章	召开十大	694
第一节	一九七三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694
第二节	继续批林整风	717
第三节	邓小平复出	785
第四节	继续搞好文艺革命	800
第五节	批判教育领域的复辟回潮	833
第六节	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	856
第七节	批评外交工作	884
第八节	批林批孔	920
第九节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954
第十章	批林批孔	959
第一节	新阶段新任务	959
第二节	发动批林批孔	1006
第三节	各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1241
第四节	批判各领域的复辟回潮	1324
第五节	各大军区负责人到北京检查文革中的错误	1404
第六节	筹备四届人大	1429
第六节	毛泽东论三个世界	1463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六册（1）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六章 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活动

##### 第一节 林彪叛逃

###### 本节资料

###### 研究资料

###### 《汪东兴回忆录》摘录

离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树丛中，有一栋两层的小楼，这就是林彪、叶群住的中央疗养院62号楼(原为96号楼)。1971年9月12日，天色渐黑时分，林彪、叶群正在这里忙着调兵遣将。可是从表面看来，62号楼却是十分平静，在这里服务的工作人员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果马上要飞来北戴河的电话后，耍了一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他们的女儿林立衡要与其恋爱对象张清霖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酒、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这样做，是要转移工作人员的注意力，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

晚间，叶群还与林立衡一起看电影，电影的名字叫《甜甜蜜蜜》。8点多钟，林立果乘专机飞到山海关机场，9点钟到了林彪住地。林立果送了一束鲜花给林立衡，表示祝贺。林彪、叶群他们搞阴谋的事，林立衡当时不知道。林立衡与叶群平时关系不好，叶群有事总是背着她。林立衡是个很聪明的人，她看出林立果回来后，家里好像有事不让她知道。叶群一退场，随即和林立果去了林彪的房间。林立衡也没有心思看电影了，就从电影室出来，到林彪的房间外边去听。她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林立衡听到这些话，心里很紧张。她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 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

晚上 9点 20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

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

我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后，周总理问我：“报告可靠吗？”

我回答说：“可靠。”

周总理对我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

我和张耀祠都守在我的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由于林立衡的报告，我们掌握了林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我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

这时，周总理听了这些情况后，已经不能继续主持开会了，他也紧张起来。他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他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我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周总理接着打电话把在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法宪从会场上找出来，问他知道不知道有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回答说不知道，并说他要问一问空军调度室。周总理要求吴法宪立即去问。吴法宪就到另一个房间去打电话了。周总理这时又打电话给我，让我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

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晚上11点半钟，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

周总理问叶群说：“林副主席好不好呀？”

叶群说：“林副主席很好。”

周总理问叶群知道不知道北戴河有专机。叶群说她不知道。

叶群稍微顿了一下后，又改口对周总理说：“有，有一架专机，是我儿子坐着来的。是他父亲说，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他要上天转一转。”

周总理在电话里又问叶群：“是不是要去别的地方？”

叶群回答周总理说：“原来想去大连，这里的天气有些冷了。”

周总理说：“晚上飞行不安全。”

叶群说：“我们晚上不飞，等明天早上或上午天气好了，再飞。”

周总理又说：“别飞了，不安全。一定要把气象情况掌握好。”

接着，周总理还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

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子叶群警觉了，她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这些情况、对话，是周总理后来告诉我的。周总理后来对我说，他确实打算去北戴河，已经让杨德中准备飞机了，

这时，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里，我在中南海的南楼。他和我都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周总理派李德生到空军司令部作战值班室去协助他临时负责指挥，还派杨德中陪吴法宪去了西郊机场。

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此时，叶群更加惊慌，她也说：“越快越好。”

林彪要走的命令一下，62号楼的人忙开了，慌了，都不知为什么要走得这样快。林彪的汽车马上调到了他的住房门口。林彪快要上车时，叶群派人找过林立衡。林立衡自从报告了林彪要去外地的情况后，已经不敢再回去了。这时，二大队执勤的哨兵也报告，说林彪住地很乱，搬东西的人来来往往。

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先后上了汽车。

林彪问林立果和警卫秘书：“去伊尔库茨克要飞多少时间？”

林立果说：“很快就到。”

林彪问完后，汽车就开动了。林彪的警卫秘书坐在前座上，后边是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哨兵拦阻，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警卫秘书这时突然改变主意，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警卫秘书就打开车门跳下车。汽车里有人向他开了枪。

张宏、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坐车跟上去。

林彪的红旗牌轿车时速开到 100 公里左右，张宏他们乘坐的吉普车根本追不上。

等张宏他们追到山海关机场的时候，林彪已经上了飞机。由于紧张和慌乱，林彪的帽子和叶群的围巾都掉在了地上。飞机那时还未加完油，就起飞了。专机的两个驾驶员，只上去一个，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有来得及登上飞机。

张宏他们在机场上把林立果找对象选来的几个“美女”拘留了。这些“美女”当时都发了枪，她们拿着枪不让我们的警卫战士进屋。张宏对她们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我们是保卫林副主席的，你们怎么这个样子？”警卫战士一进去，就把她们的枪缴了。

13日零点 32分，我接到张宏从山海关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飞机已经起飞了。

与此同时，林立衡也打电话来对我说：“听到飞机响了，好像是上天了。”

我对她说：“你报告得迟了一点。”

她对我说：“刚听到飞机声。”

我对她说：“我现在没有时间接你的电话。”就把电话挂了，

我立即打电话给周总理，说：“毛主席还不知道这件事。您从人民大会堂到毛主席那里，我也从中南海南楼到主席那里，我们在主席那里碰头。”

我叫张耀祠同我一起去，我说，你要去主席那里接电话。我们和周总理几乎是同时到了毛主席那里。

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30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当时，毛主席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我没有告诉他。

这时时针指向 13日凌晨 1点 12分。飞机从起飞时算起，已经飞了 40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飞机放过去，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对的。要是把这架飞机拦截下来。那可不得了！会在全中国造成不好的影响。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拦截专机，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林彪、叶群经过长期策划，林

彪认为，只要毛主席健在。无论是威望还是文的、武的。他都不是对手，所以他想出了三个计策，即上策是谋害毛主席。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中策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下策是往北叛逃国外。最后关头，他选择了下策。

13日凌晨 3点多，我们还没有离开毛主席住地，空军司令部又打来了电话，说调度室报告，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直升机飞走，机号是 3685，机上有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和正副驾驶员共5人，直升机正向北飞行。我马上将这个情况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和周总理异口同声地说：“下命令，要空军派飞机拦截。”空军的歼击机升空以后，由于天空很黑，直升机又没有开航行灯，所以经过一番搜索没有找到目标。

驾驶直升机的飞行员陈修文，是个很好的同志，后来被追认为烈士。他当时装着很焦急的样子，喊叫说没有油了，要降落下去加油。其实油是足够的。周宇驰说不能降落。降落下去，大家就都别想活了。周宇驰还谎称，林副主席已经坐三叉戟专机在乌兰巴托降落了。说你们不要害怕，出了国境就行。

陈修文听周宇驰这样一讲，操纵飞机摇晃了一下，然后利用飞机晃动的机会改变了航向。这时，天已经发亮，陈修文看到头顶上的歼击机了。周宇驰他们也看到了，很紧张。飞机开始往回飞，陈修文并将罗盘破坏了。周宇驰发现后，问陈修文为什么改变飞机的航向。

陈修文说，头上有歼击机，如果不机动飞行的话，可能要被打下来。

周宇驰又问陈修文，罗盘怎么不对。陈修文说罗盘早就出了故障。这样一来，周宇驰感觉到飞机的航向有问题。不知道飞机往哪里飞。陈修文知道方向，他驾驶飞机经张家口、宣化等地又飞回北京。直升机在怀柔沙峪的一个空地上空盘旋了5圈后，开始降落。当直升机降落到离地还有 20米时，周宇驰开了两枪，把陈修文打死了。陈修文旁边的副驾驶员叫陈士印。他将陈修文身上流出的血抹在自己的脸上，躺在地上装死。

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从直升机上爬下来后，就往山上跑，一直到累得跑不动时才停下来。周宇驰说：“这样不行，早晚都是死，跑是跑不了的，咱们今天就死在这里吧。”他还说：“有两种死法。第一种是如果你们怕死，我就先把你们打死。然后我再自杀；第二种是如果你们不怕死，那就自己死。”说完这些话，周宇驰就把带在他身上的林彪的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撕碎。这两个被撕碎



的罪证，后来都找到了。

于新野对周宇驰说：“我们还是自己死，不用你打。你喊‘一、二、三’，我们同时开枪。”当周宇驰喊过“一、二、三”后，“砰！砰！砰！”三声枪响，可是倒下的只有两个人，原来是李伟信怕死，他把枪弹射向了天空。看到周宇驰和于新野两个人都躺在地上死了，李伟信爬起来就跑。这时民兵已经赶到，就地把李伟信抓起来了。抓李伟信的时候，他还喊叫，说要找卫戍司令。

14日上午 8时 30分，在乌兰巴托，蒙古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打电话通知中国大使馆，说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中国驻蒙古大使，要向大使通报一架中国喷气式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

9月 14日中午 12时 20分，中国驻蒙古大使将一架中国飞机在蒙古失事的情况报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在代外长姬鹏飞主持下召开了党组会，并将这个情况很快抄报了党中央。

当时，我们都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开会，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的报告。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

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

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

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

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

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

这个消息虽然很不具体，但它却使毛主席、周总理和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我国驻蒙古大使后来到飞机失事的现场去了解情况，弄清飞机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 10公里处，是中国民航 256号三叉戟飞机，机上8男 1女，全部死亡。关于飞机坠毁的情况和我国外交部交涉的情况，大使和经办

的外交官都已经有了文章发表，是可靠的，不久，我们把从直升机上和周宇驰等人的自杀现场缴获的林彪的一些文件，如林彪的手令、给黄永胜的信等调出来看时。在场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都惊呆了。

林彪叛逃后，关于如何处理同林彪有密切关系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毛主席对周总理说：“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但是，黄永胜这些人，在十天中既不揭发林彪的罪行，又不交代自己的问题，什么都不坦白。十天后，毛主席把我找到他的住处说：“黄永胜他们怎么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于是，我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总理汇报，说毛主席催问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

周总理让我等一下，等他接见完外宾后，同他一起乘车去见毛主席。

当我同周总理到达中南海毛主席住所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黄永胜他们在拼命烧材料。

毛主席说：“是啊，那是在毁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

周总理对毛主席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

周总理和我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周总理说：“你不能离开中南海了。

要严加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们有事时可以找张耀祠、杨德中，必要时找你。”

我当时向周总理建议不要在集体开会时解决，要分开来。一个人、一个人地办。

后来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宣布的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决定。当时，怕他们反抗，把福建厅的烟缸、茶杯等都端走了。周总理对他们宣布说：“限你们十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

#### 佚名《林彪叛逃前夜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家领袖们》

1971年9月12日深夜，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灯火通明，政治局的常委们正在这里召开会议。按照惯例，政治局每星期要在这里开两三次会。会议进行到10点半，有人进来和周恩来耳语几句。周恩来警觉地直立起身子，似乎很吃惊。他立即宣布会议暂时中止。顿时，与会的首长们轻轻骚动起来，用不解的眼光相互询问。看来事情发生得很紧急，也很严重，不然总理的神情不会这般紧张！

当时江青也在会场，她没有像平时那样大惊小怪的，而是站起来早早离开了会场。等在门外的警卫们，看见大会堂的服务员开始忙进忙出，收拾茶具、毛巾等开会用的东西，知道散会了。不过都觉得奇怪，今天的会议怎么这么早就散了？搁在以往，不到半夜三更是散不了会的。这样的例会，开会的首长一般不带秘书，除周恩来带医生，江青带护士外，其他人只带警卫。警卫员看见散了会，就起身去照顾自己的首长。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张佐良没有警卫任务，一散会，他就可以离开大会堂回去。他提起氧气箱正准备走，突然听见身后有人叫他不要走。本来他对提前散会就觉得奇怪，现在又要他留下，更觉得纳闷。一向对环境淡漠的大夫，这时也嗅出这里的气氛不对。不对在哪里，他也说不清。直觉告诉他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在中南海工作的人，必须严守一条纪律：不该问的坚决不问，不该说的坚决不说。当时被通知留下来的几个人，相互也不敢随便打听，默默地集中在福建厅的外面，等候上面的安排。一会儿，办公厅的领导向他们宣布了几条纪律：不要走，住哪儿，等会儿听通知，不要往家里打电话！

一听这没头没尾的纪律，张大夫心里直嘀咕，1965年就跟总理了，前后也七八年的时间，跟总理住过钓鱼台、玉泉山，就是没有住过大会堂。主席倒是常住大会堂118房间。总理今天怎么也要住大会堂呢？我们住哪里还要等会儿再通知，又不让给家里打电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越想越乱，越理不出个头绪。后来干脆就不想了，还是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服从命令总没错！

周恩来有个奇特的生活习惯，他外出都是用自己的被褥，哪怕是出国，他的被褥都要带着，尽管这套被褥已经跟他很久，也非常陈旧，可是总理睡觉就是离不开它们。他已经习惯了它的气味，好像盖上它们，才会有睡意似的。这次他住在大会堂，会议厅里也没有现成的被褥，即使有，总理未必还有时间睡觉。但是总理的卫士长还是叫西花厅的警卫员将总理用的被褥抱到大会堂来。

等张大夫回到福建厅，却见总理急促地走出来，往东大厅方向走去，他提上药箱赶紧跟上。总理进东大厅就将门关上，张大夫也不敢贸然进去，就在门外找了个地方坐下。心想，如果总理需要用药，他进去也方便。

已快午夜，东大厅外的走廊里，仍然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穿梭不停。不一会儿见叶剑英快步走来，闪身进了东大厅。接着，警卫局局长杨德中也来了，张

大夫觉得有些困倦，这时，周恩来的卫士长跑出来叫道：“张大夫，进来，把药箱带进来。快呀，这是杨局长的命令。”张大夫还以为是总理身体不舒服了，赶紧进东大厅，扭头朝北小厅一望，门开着，总理坐在桌边，全神贯注地抓着电话，高声问：“现在在什么位置？赶快查清楚……赶快汇报。”不像是要用药嘛，张大夫想。他再回头一看，叶剑英勾着头，反背双手在东大厅里来回踱步，不停地一圈又一圈地踱步，好像满腹心思。张春桥阴沉着脸，坐在靠角落的沙发里，一口接着一口吸烟……看见这番情景，张大夫刚刚松动的心又紧了起来。特别是总理直呼黄永胜的名字，叫他立即来见他。这越让人觉得气氛不正常，总理平时从不这样叫人，不是名字后面带上同志，就是称职务。听见总理这样直呼黄总长的名字还是第一次。

黄永胜神色紧张地走了进来，一动也不动站在总理旁边。总理也不叫他坐下，仍然对着电话焦急询问：“在什么位置？喂……现在究竟在什么方位？什么方向？怎么会没有呢？赶快寻找！”张大夫暗暗猜测：是不是导弹基地出了毛病，把导弹的弹头给打丢了，没准儿会落在北京的头上，那就糟糕了！……不然总理怎么会这样着急问位置在哪里。这时已经是 13 日的凌晨。

离北京不远的山海关机场，一架三叉戟飞机正带着巨大气流，强行滑出跑道，载着副统帅夫妇和他们“超天才”的儿子林立果，朝着黑暗的夜空逃窜而去。“大红旗”专车被孤单地遗丢在机场的跑道上，车子后玻璃上，留着三个还微微发热的子弹痕迹。坚硬的防弹玻璃有效地阻止了警卫连长追逐的子弹，使得林彪多活了几个时辰。直到今天还能看见当年林彪乘坐专车上那三个白色弹着点，这恐怕是中央警卫局多次执行秘密任务中，惟一能听见枪声的行动。

9 月 13 日凌晨 2 点 30 分左右，林彪乘坐的 256 号飞机，坠落在蒙古温都尔汗。剧烈的爆炸声震碎了沙漠的宁静，冲天的大火映红了漆黑的天空。

山海关到飞机坠毁现场只要一个小时的航程，而不知为什么，三叉戟却在天空上兜了一个多小时的圈子，飞机燃料已经无法支撑他们到达目的地了。后来对于失事现场的调查也说明飞机是因为迫降失败，才造成机毁人亡的结局。

回顾这段历史，众所周知，毛泽东在视察南方的途中，及时预感到林彪反党集团要对他下毒手的阴谋，提前回到北京，使得林彪集团妄图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阴谋败露，不得不仓皇逃窜。

周恩来在大会堂关注飞机出逃动向时，毛泽东已经神秘地从南方回到了北京，陈锡联到丰台站秘密地将毛泽东接到人民大会堂，住进了 1 1 8 房间。大约在午夜一点左右，卫士长走到周恩来身边，轻声说：“总理，主席来了。”总理一听，连忙放下电话，起身往门外走去。从东大厅到主席住的 1 1 8 房间，要经过大舞台的后面，总理才走到大舞台北面 2 0 米远，就看见主席穿着睡衣朝这个方向走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见总理和主席停下来，握上了手，都自觉地向后撤了几步，让他们俩人单独谈话。张大夫更自觉，站得最远。那时主席口齿还非常清楚，不需人在旁边翻译。他们低声谈了一会儿，听见总理提高嗓门儿，说：“主席，放心，你去休息吧。”主席挥挥手，就转身往回走。事后才听有人说，主席那次说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也有人说：“主席还说了，林彪还是党的副主席嘛，打下来，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

灯光，投在毛泽东憔悴的脸上。无法接受的事实强烈地震撼着毛泽东，他沉默苦思一个多月，终于，病倒了！从得知林彪外逃到证实林彪被摔死的十多个小时里，中南海经历了建国以来最紧张的时刻。林彪飞机起飞，中南海立即进入了甲级战备。谁也不能预测林彪投靠苏联后的结果，更没有人抱侥幸飞机会中途突然坠落下去的幻想。

负责外事警卫的副团长邬吉成，半夜被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上级的指示足以叫这位“侍卫长官”睡意全无，再不敢合上眼睛。“中南海进入紧急战备！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甲级。部队拉出去，布岗，设置障碍，挖工事。”老天，这不是要打仗了吗？如此严重！邬吉成不敢半点耽搁，保卫党中央是他的天职，他马上执行命令，到钓鱼台布岗，设置障碍，一直忙到天色微微发亮。而汪东兴比他更忙，竟然忘记了给部下才下达的战备命令，电话里怒气冲天地质问邬吉成：“到处找你，你到哪里去了？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到处乱跑！”邬吉成困惑不解，这一顿批评是哪儿跟哪儿啊？汪主任可不是个好忘事的人，前脚交代的事情，后脚就忘了？什么事使他大动肝火？“不是你通知要进入紧急战备吗？我去布岗才回来。”“噢噢，……我忘了。对不起，对不起。”汪东兴这才想起来。

几天后，邬吉成才知道中南海发生了如此惊心动魄的事件！别说汪东兴紧张，谁听了不是一头冷汗？副统帅叛逃，他的几大金刚都重兵在握：黄永胜总参谋长，

吴法宪空军司令，李作鹏海军政委，邱会作总后勤部长。陆海空三军都抓在他们手里。如果敌人从内部捣乱，内乱往往比外患难提防。

就在中南海处于高度紧张的日日夜夜里，红墙外的天地却是一派宁静的景象，依然花红柳绿，车水马龙，一派迎国庆的热闹气氛。高高的红墙阻隔了人们的视线，风景如画的中南海已经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进入了严阵以待的战前状态。四处可见设置的障碍物，大板子上钉满了钉子，铁丝网密布……

被留在大会堂陪同总理的工作人员，在林彪逃离十多个小时后，才慢慢得知事情的真相。好比大梦初醒，竟然惊呆得半晌无语。

13日晚，夜色降临，阵阵微风已经带着秋季切肤的凉意。大会堂东面的天安门广场却是另外一种情形，首都各界和以往一样，在国庆节的那一天，要列队通过天安门，接受伟大领袖的检阅。因为白天广场上人多，无法排练，只好等到晚上九十点以后，将两头卡死，让车辆绕道驶过长安街，腾出大块地方，供人们加紧排练。

沉浸在迎节日操劳而忙碌之中的人们，怎能相信近在咫尺的人民大会堂已在高度紧张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这两个世界反差实在太。可是，这面鼓必须这样敲下去。否则，中国人民的心理承受能力何以能接受这么意外且沉重的压力！

灯光，在周恩来的书房里彻夜通明。灯光，投在毛泽东苍白、憔悴的脸上。灯光，在中南海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里像星星一样闪烁。

毛泽东历经沧桑，临大事波澜不惊，“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然而，林彪的叛党叛国毕竟震惊中外，党史里史无前例的接班人也是党史里史无前例的驾机叛逃者。毛泽东的心理承受力无法安然接受这枚不是落在他的掩体前而是落在他心灵上的重磅炸弹。这无疑也是对他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无言宣判。

他沉默苦思一个多月，终于，病倒了！

1971年初冬。中南海。

曾郁郁葱葱的苍翠在寒风中迅速地枯黄、凋谢、飘零……

毛泽东在游泳池住宅里突然晕倒。巨大的身躯像一堵坚固的墙倏忽轰然倒塌……砸蒙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

毛泽东病了。充满生动诙谐和思辨色彩的书房里，开始飘散着刺鼻的药味，尽管毛泽东最不喜欢和药打交道，这次由不得他了。

患病后的毛泽东坐在凹陷的沙发里，闪动着忧郁的目光，缄默着……他的病一直对外界保密，大家也无从知道主席究竟生了什么病。但他迟缓的动作和痛苦的神情描绘出他重负之下没有轻松自在的生活内容。

从一开始杜修贤就疑惑主席的病态模样不仅仅是“自然规律”的结果，会不会还因为其他什么原因，一种科学仪器和听诊筒所不能探及的更深层的原因？

当杜修贤第一次见到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立即被一种从未有过的惊恐骇住了。毛泽东忧伤而暗淡的目光里丝毫看不见病人渴望康复渴望健壮的意念，仿佛陷入失望、苦恼的境地，让精力、生命在苦斗中慢慢地消耗……杜修贤手微微地颤抖，不敢按下快门，总觉得调不准焦距，过去的形象现在的形象，在取景框里重叠交融，最后慢慢融化，成为一种困惑，涂抹了他的视线。

红润、健壮、目光敏锐、谈笑风生的毛泽东几个月前还在他的镜头里熠熠生辉，怎么就迅速消失了，一下子转换成苍白、臃肿、神情滞缓、沉默寡言的毛泽东呢？他无法接受这个突变的严酷现实。就像看着一座巍峨的山在眼前塌方、崩落、流失，而自己却无能为力。还有什么比突然失去眼前最完好的形象更令人痛苦和焦虑呢？

毛泽东和外宾缓慢地交谈，口齿也开始不清了，有时翻译要在旁边问好几次才能听清楚。杜修贤当时想，主席身体这样差，就应该少接见些外宾，让主席多休息，或许能早些恢复健康。殊不知，这只是外宾蜂拥而至游泳池要求拜会毛泽东的开端。

毛泽东迅速衰老的真正原因在以后才被人们所发现所认识。

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

•王 海•

离开空五军到空军司令部军训部任职，对我来说，在一定意义上是脱离“苦

海

”。在空五军，陈励耘、王维国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进行没完没了的批斗，虽

然令我精神上很受压抑，但说实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在最困难的时候，我曾和

爱人商量过，就是一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绝不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大不

了最后回家拉排子车去。其实，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种所谓的“政治运动”无

理剥夺了我进行正常工作的权利。应当讲，我正当盛年，党培养了我这么多年，我

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正是我为党的事业工作、为空军部队建设效力的时候，却被无

休止的批判捆住了手脚，不让干工作，真是欲罢不忍，欲干不能，精神上很痛苦。

因此，离开空五军这个是非之地，当时真感觉到是一种解脱。后来我才知道，我得

以离开空五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南京空军司令员刘懋功。刘懋功是一位陕北老

红军。他为人正直，很爱才。“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次他到北京来汇报南空的

运动情况。出于爱护和保护干部的考虑，他在汇报时，向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反

映意见说：得想办法把王海调出空五军，要不然，闹不好，七斗八斗，可能把王海

斗死。由于刘懋功是当面向吴法宪讲的，引起了他的注意，才有了把我调到空军司

令部的安排。

但是，在全国都陷入“文革”狂潮的形势下，空军领导机关也不是世外桃源，



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直接插手，这里甚至可以说是林彪一伙反党篡军活动的“重灾区”。到北京后，我很想扎扎实实做一点儿工作，抓好部队的军事训练，挽回在空军耽误的时间，但实际上却很难摆脱“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干扰。

在“文革”的纷乱中，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1971年的初秋季节。记得是9月上旬，空军召开了一个院校工作会议，研究院校训练工作。会议结束后，9月12日，我按照原定计划带了几个同志去天津杨村机场下部队了解情况。第二天，也就是9月13日，吃完早饭，突然接到空军司令部通知，要我立即赶回北京开会，司令部还派了一辆车来杨村接我。二话没说，我马上往回赶。通知是9时开会。

当时，杨村到北京的路很不好走，匆匆忙忙赶到司令部时会议已经开始。参加会议的都是司令部二级部长以上的干部。司令部的一位副参谋长在会上口头传达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9月13日凌晨，林彪等人乘三叉戟飞机从北戴河叛逃出国到蒙古摔下来了。会议很简短，传达完就散会了。会场里静静的，没有人说话。这有点儿像大暴风雨前短暂的寂静，又有点儿像是一个晴天霹雳，把人震蒙了。但从人们强作平静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每个人心头都掀起了一股冲天巨澜。

我立即联想起，在杨村机场时，部队的一位同志曾告诉我，9月12日夜，他在雷达上观测到，有一架飞机从北戴河起飞，朝蒙古方向飞去，并越过了边境，在蒙古温都尔汗一带从屏幕上消失了。显然，他们看到的就是林彪那架飞机。看来，这件事确凿无疑。

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心中暗暗庆幸。这个革命口号喊得最响、自封为毛主席接班人的林彪，终于露出了篡党夺权、反对毛主席的真面目。我感到高兴，不完全是个人原因，我虽然在空五军被扣上了反对林副主席的帽子，但我与林彪并没有直接接触过，关键是我对“文化大革命”前后的一些现象感到很不理解。现在林彪的问题终于暴露出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文革”中压在我心头的一个大疑问：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的“文革”为什么变成了大动乱，变成了对大批老干部的乱批乱斗？过去我总觉得不对头，私下里认为，党内肯定在一些事情上出了问题，一定有坏人乘机作乱。但到底是怎么回事，总是弄不明白。现在终于清楚了。林彪阴谋败露，折戟沉沙，对我们党是一件大好事，当然，对个人也是一件大好事。听完传达，我顿感心中豁然开朗。

几天后，司令部又就此事组织了一次传达。我记得很清楚，第二次传达是在司令部办公楼的走廊上临时召开的。这次传达的范围比较大一点，二级部副部长以

上  
的干部都参加了。传达完以后，大多数同志都很高兴，也有一些同志表示难以相信  
信  
。我们司令部气象局有一位副局长听完传达后就说：我不相信，林副主席对毛主席  
席  
最忠诚，他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在当时特殊的情境下，听他讲出这一番不合时宜的  
的  
话，我心里又生气又替他担心。气的是，林彪叛党叛国，事实俱在，还有什么不相  
相  
信的？担心的是，有些人中林彪的毒很深，如果现在还执迷不悟，就会成为他的陪  
陪  
葬品。当时，我情绪非常激动，一时控制不住，就走过去，扇了他两个耳光。

因为当时在场的人情绪都比较激动，对我这种冲动的反应，司令部的领导也没  
没  
有当面提出批评。但是散会以后，冷静下来一想，我觉得自己这种举动实在不妥，  
太不冷静，不带劲儿，对不起同志，非常后悔。下班后，我特意在办公大楼下面等  
等  
这位同志，向他当面道歉。这位同志很好，不仅痛快地接受了我的歉意，还真诚地  
地  
说：哎，没关系，你打得好，这个耳光把我打清醒了。这个事情后来一直传到周总  
总  
理那里。周总理批评了我。他说，告诉王海同志不要这样，有的人可能这个弯转不  
不  
过来，不要急，可以等待。总理又说，告诉王海同志，不要打人。周总理这种政治  
治  
家的宏大气度深深地教育了我。这件事我终生难忘。

周总理的批评我是在吴法宪的办公室听到的。吴法宪是林彪反党集团的死党

之

一，他被隔离审查是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十几天以后。在吴法宪被隔离审查前

几天，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见面后他对我说，周总理在人民大

会堂给了他一些照片，叫他在空军组织一些专家，根据这些照片分析一下，林彪的

飞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是被外部炮火击落的呢，还是发生过机内搏斗？究竟是什么

原因坠落的？

照片有好几十张，在他的办公桌上摊了一大堆。我正在看照片，来了一个电

话，电话是周总理打来的。话筒声音很大，吴法宪接电话，我站在旁边也听到了周

总理的声音。周总理问吴法宪空军的情况。吴法宪说，现在文件已经传达了，但是

有的人不相信，我们这儿就有个气象局副局长不相信，王海冲动了，打了人家两个

耳光。接着周总理就讲了上面提到的那番话。

事过很久以后，我见到海军政委李耀文，他曾当过外交部副部长，负责亚洲

事务，交谈起来，才搞清了当年这件事情的原委。李耀文告诉我，当时，周总理在

人民大会堂找吴法宪谈话，他也在场。周总理要吴法宪汇报一下 2 5 6 号三叉戟飞机

失事的情况。吴法宪心中害怕，吞吞吐吐，讲不出个究竟，就推说不知道。周总

理

严厉批评了吴法宪，说，你到现在和党还不是一条心。随后，周总理交给吴法宪一  
些照片，交待他到空军找一些真正懂技术的人，对飞机失事原因进行仔细的研究。  
于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由我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这项任务。这个空  
军专家组的成员还有当时的空司机务部副部长何培元、空政组织部副部长陆德  
荣、  
空司军训部副处长王季南、王涛和空司机务部参谋赵汉立、金华。后来，公安部的  
几位同志也参加了这项工作。

由于 2 5 6 号三叉戟飞机坠毁地点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事发后赴现场  
勘  
查已不可能，因此，专家组的工作主要是在国内对照片和实物反复进行对比辨别、  
分析研究。值得庆幸的是，我们掌握的这一批照片非常逼真地展现了飞机失事现  
场  
的情况。提供这批照片的，是当时我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一位武官，名叫孙一先。  
温  
都尔汗是一片人烟稀少的戈壁。2 5 6 号三叉戟坠落后有一段时间无人知晓，因  
此  
失事现场保存了原样，基本没有受到人为破坏。孙一先在得知消息后较早赶到了  
现  
场，通过他的照相机镜头给历史留下了这批极其重要的资料。

当时，与 2 5 6 号三叉戟飞机同型号的飞机，我们空军还有十几架，在进行  
失  
事原因查勘时，这些飞机成为可资对比鉴别的重要实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  
们  
这个专家组频繁往来于空军司令部与西郊机场之间，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认真

细  
致的比照、核实与分析。我们专家组的每一位同志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心投入到这  
项工作中去。我们知道，此事责任重大。搞清事实真相，不仅是对历史负责任，更  
重要的是还有非常现实的政治意义。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特别是“文革”期间，由  
于个人崇拜盛行，林彪作为“副统帅”在毛主席的光芒下神化自己，欺骗、蒙蔽了  
许多群众。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工作，以严谨的科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把  
林彪一伙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真实情况调查清楚，昭示于天下，这将有助于广大  
人民群众尽快认清林彪一伙的真面目，彻底肃清他们的反动影响。

根据大量有效的证据和各方面情况的综合分析，2 5 6 号三叉戟飞机坠毁的情  
景在我们眼前逐渐变得清晰起来。首先，我们排除了一些外间广为流传的说法。其  
一，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该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我们在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在失事现场，有一道相当长且清晰的轨迹，这显然是飞机在地面高速滑行时留下  
的；飞机的残骸散布呈带状，比较集中，根据测算，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碎  
片抛落地面，其散布面会很广，甚至可以抛落到十几公里乃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  
机上人员的尸体也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而且形状清晰可辨，如果从高空坠落，不  
可能呈现此种状态；另外，飞机若是在空中起火，机上燃料很快会在空中散掉，

不  
会像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那样形成地面大面积燃烧的痕迹。其二，飞机被击落的  
可  
能性可以排除。除上述根据外，大量证据显示，飞机落地时是完整的，机身上引  
起  
种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其三，飞机  
坠  
毁前机内没有发生过搏斗。机上三个机械师没有带枪的可能，他们知道飞机是未  
经  
批准强行起飞，但并不知道飞机要去哪里，不可能知道此行是林彪叛党叛国，因  
此  
不会允许他们携带武器；驾驶员潘景寅当时也不可能进行了搏斗，这一点可从他  
当  
时的政治和现实思想情况及飞机起飞前后的情况判断出来。9月12日深夜，林  
彪  
一伙是仓皇出逃的，登机时没有正常舷梯，是从工作梯爬进机舱的，这些情况驾  
驶  
员当然清楚。林彪一伙登机后，驾驶员没有得到航管部门的指令就匆匆开车，飞  
机  
先滑入草地，以后转入滑行道，然后强行起飞，由于操作慌乱，256号飞机的  
机  
翼航行灯撞到了加油车的加油口上。这有事后在山海关机场捡到的256号飞机  
航  
行灯玻璃碎片为证。这一切都是驾驶员自觉所为，他当然也就不可能随后在飞机  
上  
进行搏斗。

那么，9月13日凌晨256号三叉戟飞机实际上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我们  
根

据大量证据认定：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也就是迫降没有成功，造成粉碎烧  
毁的。作出这种判断的主要依据有这样几点：其一，失事发生的场地是经过有意选  
择的。在温都尔汗附近这片戈壁滩上，这块地点地势是比较平坦的，飞机着陆的方  
向也刻意进行了选择，这些情况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其二，飞行员实施了野外迫  
降动作。他在飞机接地前主动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动作，前开  
缝翼只有人工操纵才有可能打开。其三，起落架轮毂完整，没有撞击和磨损的破坏  
痕迹，主轮胎良好，仍有气压，这说明在迫降时飞行员没有放下起落架。其四，飞  
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接地的。这一切都表明，2 5 6 号飞机当时是在飞行  
员有效控制之下，而且是主动作出了使飞机迫降的选择。

根据各种情况判断，2 5 6 号飞机当时之所以没有成功地实施迫降，主要原因  
有以下几点：其一，飞行员着陆动作不确切，没有做全，着陆速度过大，而减速板  
却未打开；其二，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它的机翼、机腹部有油箱，在高速接地时  
，极易造成油箱破裂、机翼折断，引起燃烧爆炸；其三，当时飞机仓促起飞，机上  
没有副驾驶和领航员，飞机迫降时正是夜间，又处在完全陌生的区域，一个飞行  
员难以应付种种特殊情况。



我们认为，当时 2 5 6 号飞机之所以要在温都尔汗实施野外迫降，主要原因是因为该机油料不够。这架飞机是仓促起飞，准备工作不充份，没有加满油料；在外逃时该机又长期在 2 5 0 0 ~ 6 5 0 0 米高度飞行，低中空飞行耗油量大，到失事地点前后油料已感不足，因此被迫进行野外降落。

另外，因为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又没有导航，当日恰逢暗夜，飞行员在空中不可能掌握精确位置，飞机是在这种情况下盲目降落。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我们终于根据有限的资料，搞清了三叉戟飞机坠毁的真实原因，完成了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1 9 7 2 年 5 月 1 9 日，我们专家组根据查看和分析图片所得出的结论，向中央提交了报告。我们的上述看法都在这个报告中作了充份的阐述。

□ 摘自《我的战斗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 2 0 0 0 年 2 月版

~~~~~  
 ~~~

【身不由己】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 “九一三”事件亲历记

•宋德全•

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经过，中央文件已有明确表述。近年，不少知情官员、亲历者及外国记者也陆续从不同侧面披露了一些情况，进一步廓清了这一事件的

全

过程，有利于消除某些议论和猜测。这里，我则从自身经历作些介绍。

1971年夏，林彪、叶群及随行人员从北京去北戴河，当时我因回东北搬家

没有从行。8月初，我回北京后，将家属稍事安顿，就奉命做去北戴河的准备工

作。几天后，叶群从北戴河回北京“治病”。那几天，毛家湾热闹异常，许多人

前来探望。从后来公布的材料看，那正是叶群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其夫人

们频繁进行密谈之时。我同其他在家工作人员都以为是礼节性的探视。大约8、9

日，我在办公室收拾东西，值班于秘书不在办公室，周恩来打来电话，问“是于秘

书吗？”让代向叶群问候。我顺口回答：于秘书不在办公室，去接待客人了。周紧

接着问：“是哪些客人？她（指叶群）是病人嘛，你们要照顾她少会客，好好休息。”

当时我不知来者为谁，同时也不关心此事，遂答应向叶群报告总理的问候。从周

恩来的问话可以觉察出他当时很关注林叶的活动。

我此次去北戴河后，同平时一样，事情不多。有时听听电话，多数时间用来

看书。

9月上旬，在部份工作人员中传说要换住地。但究竟去哪里，何时动身，在北

戴河的人员是否全部随行？始终没有听到正式安排。这里有个规矩，“不该问的

不

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我来此时间不长，更是严守“三不”原则。

大约 9 月 10 日，八三四一部队警卫副科长刘××把我拉到僻静处，悄悄地

对我说：“豆豆（林立衡）说，主任（叶群）与林立果要挟持首长（林彪）外逃，

怎么办？”我听了之后，大吃一惊。继之又静了下来。我说：“不会吧？这怎么可能

呢？或许是他们家庭内部问题。”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真相，对林彪在 19

70 年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种种情况更缺乏了解，只是以前隐约听说豆豆与叶群关

系不好。可是我又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当即与刘商定：一、此事事关重大，希望并

支持豆豆向中央报告。二、刘注意外边动静，我留意办公室情况，有新情况，随时

交换。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豆豆在什么范围内谈及此事，不敢轻易同其他秘书商量，

豆豆也嘱咐刘千万不要扩散。

9 月 12 日晚上，电影厅里在放映香港电影，我照例是不看的，仍在办公室。刘××告诉我，豆豆说林立果又逼她表态。他已陪豆豆到 58 楼向张副团长、姜

队长报告了这里的情况，并且做了布置，设计了几种应变方案。不大一会儿，林

彪的警卫李文普匆匆回到办公室，一边忙着办别的事情，一边让我立即给大连打电

话，通知做好准备。电话刚接通，站在我旁边的刘××拿起话机刚要讲话，林立果

进  
来，问是哪里电话？并立即将电话按断，说哪里也不要通知。随后，就匆匆出去了  
了  
。

林立果、李文普出去后，我立即到外边告诉八三四一部队姜大队长说，看来  
马  
上要走。姜大队长直奔 5 8 楼。其实当时我们都很盲目，并不知道究竟要去哪里。  
反正要走，必须经过山海关机场。

平时“林办”行动，统由李文普调动，林彪车在前，叶群车紧跟，秘书及其他  
人员殿后。这次则一片混乱，事前无人通知，个人携带的东西都未作准备。听说  
要  
动，我们按惯例注视着叶群的车，不见启动，以为她仍在房间。忽然，林彪内勤  
小  
张气喘吁吁地跑上来说，主任（叶群）、老虎（林立果）他们都坐首长（林彪）  
的  
车跑了。这时我们才真正感到问题的严重。于是急忙唤上一名警卫部队的司机驾  
驶  
伏尔加车飞速紧追。车中有我同刘副科长、李秘书和小张。我忽然想到，四人之中  
中  
仅有刘副科长是警卫人员，配带一支手枪，其余都是赤手空拳，遂在 5 8 楼前，  
拉  
上一名持长枪的战士，直奔山海关机场。虽然司机已开足了马力，我们还不断地  
催  
他加快速度。时间一秒一分地过去，轿车在黑暗中风驰电掣般急驶。途中，司机  
突  
然来个急刹车，由于车速太快，刹车过猛，拐了个“S”形，才在路旁停了下来。

原来前边正有一列长长的货车驶过，我们的车停下来时已接近铁轨。若非司机年轻机敏，我们不是撞到火车上，便是翻到路边。事后很长时间，想起此时便不寒而栗，心有余悸。

我们赶到飞机场时，八三四一部队的警卫战士已稍前到了那里。这时机场一片黑暗，飞机已离开跑道起飞了。我们连喊“快开枪！快开枪！”但已无济于事了。当时我们埋怨警卫部队，为什么先到机场却不能阻止起飞？可是他们在未接到上级正式命令之前，谁敢枪击“副统帅”的座机呀！

至今，我常想，历史的偶然性在一个具体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实在是不可低估的。如果我们在追赶林彪一行的路上，不是遇到那长长的货车，能够提前两三分钟在他们爬上飞机前赶到，凭着我们对毛主席和林的（那时大家深信林彪是被叶群、林立果挟持走的）是不会让飞机顺利起飞的（何况也就是在两三分钟后，山海关机场的海军部队也接到中央阻止起飞的电话命令），那将是另一种局面。再如果北戴河多几位像林豆豆那样知情、无畏者，提早向中央报告，这段历史也许会有不同的写法。然而历史不能假设。当然，有时我也想到自己。如果我们途中撞车或翻车，定死无疑，我们四人的结论将有许多麻烦。如果我们提前几分钟赶到机场，很可能发生冲突，出现差池，那也是谁也说不清楚的。后来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只要回想起来，都不寒而栗。这些年来，当我在生活中遇到荣辱得失，每念及此，也觉泰然了。所谓“曾经沧海难为水”是也。

当从山海关机场乘车回到北戴河住地后，我们的境遇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这里的工作人员变成被软禁的囚徒；警卫人员成了看守。我们在警卫部队的监视下，从办公室中带上毛巾牙具之类，其余一切封存。所有人员分男女集中在两个大房间中。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我们对警卫部队充满牢骚，这倒不是由于地位的变化所致，而是认为早已将情况报告中央和警卫部队，希望采取有效措施。部队办事不力，他们跑了，反而把我们看管起来。后来也想通了，这么重大的事情，没有上级的正式命令，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的。

大约过了十来天，全体工作人员被押解回京，重返毛家湾。这里虽同家属只有一条马路之隔，却不能同他们联系。从此开始了四年软禁审查、三年劳动改造的生活。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向我们宣读了 9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11 月，我们被移交给中央专案组，改由北京卫戍区看管，住地从毛家湾迁到西山亚洲青年学生疗养院（简称“亚疗”）。在“亚疗”初期，要敞着门睡觉，定时放风，不得与外边通信。后来稍有松动，可以给家属写信，但不

能封口，经看守检查后由他们发出，来信也要检查。

在“亚疗”期间的任务是揭发批判林彪罪行，交待检查自己问题，接受中央专案组审查，以及接待外调来访，提供情况等。我所知道的情况一两天即可写完，有的内勤战士只来两三个月，不过是照顾林、叶生活或裱糊书画、图表等，就更没什么可写的了。经过一段揭发交待，大家无事可做，但是不能出去。我们向专案组反映，希望能有书读，这个要求总算得到了批准。一位工人出身的原团中央干部、专案组成员很理解我们，有时从市里给我们背来一些书。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但很爱读书，人也随和，愿同我们聊天，并鼓励大家不要灰心，说将来出去以后，党还会信任你们的，是有前途的。虽然我们并不相信他的话，但还是很感激他的。后来，大约因为他“界限不清”而被调离专案组了。伴随我们到底的则是另外一位朱××。

1972年冬，专案审查告一段落，我们以为可以获释了，不料又从“亚疗”转移到大兴团河劳改农场，改由公安部、中组部及某野战军等部门人员联合组成的领导小组监管。来此的，除“林办”现有工作人员之外，并将调离多年的老秘书一并拘了进来。此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陈伯达等办公室工作人员以及256号专机组和张宁等。我们这里的正式名称叫做“中央专案组团河学习班”。

在此“学习”者，当然该称“学员”了。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学习班”实

在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名词，不可望文生义。我们的任务虽然也有学习马克思列

宁主义一项，但主要还是继续接受审查和接受劳动改造。

团河是个比“亚疗”更负盛名的地方。清朝在那里设有团河行宫。学习班的学

员虽然不多，但成份复杂：有军、有政、有民，而多数是军人。军种齐备，来自海

、陆、空。所有人员一律按部队编制，分成六个班，每天在军管人员带领下出操、劳动、学习。劳动科目有埋翻葡萄藤，为果树剪枝、收获，以及掏厕所、起猪圈等

。

除了参加劳动之外，随着全国“批林整风”、“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等掀起一次次学习批判的高潮。

时间长了，并无什么事情可做，消磨时光而已。其实管理人员也不愿长期耗在

那里，但是上级不说话，谁也不敢说学习班可以解散了。我们曾多次要求学习班领

导小组如实向中央专案组反映这里的情况，尽早结束学习班，但都无结果。

直至1975年8月，学习班负责人向全体学员传达了毛泽东为“林办”一名

工作人员上书的批示：“林办工作人员责任较轻，不宜久在学习班。应尽早分配工

作，以观后效。”此时，中央专案组大有雷厉风行之势，立即要将我们打发走了



事

。说来也怪，关在学习班里，大家盼着快点出去，如今有了毛泽东的批示，许多人

却不像专案组那么急了，纷纷向领导小组提出：你们关了我们好几年，总得有个说

法，下个结论吧！专案组本来似乎没有给每个人做结论的考虑。这个要求反映上去

以后，专案组学习班很快给每个人做了结论。结论分三等：一是犯了政治性错误；二是犯了错误；三是属一般工作关系。其标准大约是工作时间长或牵扯多一点的为

第一类，一般勤杂人员属第三类，其余均为第二类。二、三类占多数。最后都加了

尾巴“以观后效”云云。在个人签字时，多数人对这种宁“左”勿右的结论表示不

理解。经过几年的审查，专案组对每个人的情况了如指掌，绝大多数人属工作关系

，许多人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政治觉悟并不比谁低，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站在党

中央毛主席一边，凭什么在结论上非留个尾巴不可？这样处理，对在位中央首长的

秘书会有什么影响？等等。学习班分管“林办”的朱××威胁说：“你们不签字也

可以。但要考虑出去以后的工作分配问题！何况你们不签字也照样处理，是可以认

定的。”多数人认为反正出去以后不会有什么好出路，便签了字。也有人始终没有

签字。出去以后，方知分配原则早已直插到基层。军龄长者，到边远地区县武装部

；军龄短者，立即转业到地方；均控制使用。

关于“林办”工作人员给毛泽东写信一事，后来获知，其过程大致是这样：  
周  
恩来曾关照此事。向北京医院领导问过，蒋医生（林彪保健医生）怎么还没出来？  
此事应能传到专案组那里，但无结果。后来，汪东兴询及此事。这位医生冒着危  
险  
写信给毛泽东，经汪东兴之手送到。毛泽东接到此信后，很快作了上面的批示。  
遵  
照批示精神，不仅“林办”，其他各“办”，乃至类似的受审人员陆续获释。就“  
团河学习班”的结束这件事来说，如无周恩来、汪东兴的关照，毛泽东的批示，  
还  
不知延续到何年何月。

回过头来，再说获释后的情况。当时我还有幻想，希望留在军队科研部门或  
院  
校，如军事科学院、政治学院、军事学院等，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然而总政  
管  
调配的人说：立即去沈阳军区报到。分配方案是经总政首长张春桥批准的，没有  
商  
量余地。此后，一路上便是连续更换介绍信，一切免谈。从沈阳军区到吉林省军  
区  
，办理转业手续后，到省委组织部，到省重工业厅，到长春拖拉机厂。工厂管人  
事  
的同志说：上边指示，保留干部编制，下放车间劳动。于是，我被安排到总装车  
间  
，成了一名装配工人。轰鸣的车间，繁重的劳动，杂乱无章的集体宿舍，都使我  
感  
到不适应，但我毕竟又是自由人了。从工厂党委书记到车间书记主任、班组工人，  
对我都很同情，并无歧视，没有见过从专案组、总政治部到省委组织部那种冷漠

的  
面孔。厂党委书记在 5 0 年代是省里某地委书记，1 9 5 9 年因犯右倾错误，下  
放  
到这个厂子当党委书记，他几次到我们这个班组参加劳动，曾指着我对一位女青  
工  
说，这个人最倒霉了。这位青工很快把话传给我。这在那个时代已很令我感动了。

1 9 7 7 年冬，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以后，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  
原  
则，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新局面。我也觉得有了一线希望。我  
所  
在车间党支部书记是位转业兵，对我这个穿过军装的人多一份同情，他说，上边  
对  
你的工作安排不合适，我们车间和厂子无能为力，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你应该上  
诉  
。后来，我分别给党中央、总政治部、吉林省委等部门写了报告，要求重新考虑  
对  
我的工作安排。报告寄出以后，很长时间没有下文。

1 9 7 8 年初，工厂中的一位朋友（从前我在东北文史研究所的同事）高兴  
地  
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有希望回研究所了。佟老（佟冬，原东北文史  
研  
究所所长，当时为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以所长）在省里召开的批判林彪‘四  
人  
帮’在吉林省代理人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到了你。他说当初王淮湘（六十军军长、吉  
林省革委会主任）、药天禄（六十军政委、吉林省革委会副主任）把你从文史研  
究

所选送到‘林办’，现在你回来了，他们为了保自己，把你打发到工厂改造，不许回研究所。”我听了之后，自然十分高兴。过了不久，我从长春拖拉机厂调到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今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参加《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的编辑工作。于是我在“林办”及因之而受审、劳改前后达 9 年半的经历至此结束。

中央专案组团河学习班审查结论中的不实之词，一直未予撤销，仍然装在我的档案袋中。直至 1981 年 10 月，收到原单位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临时委员会于 10 月 5 日所做的复查结论，内称：“经复查，宋德全同志在原‘林办’工作期间，主要是为林彪、叶群查书、编资料，属于工作关系。撤销中央专案组团河学习班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关于宋德全同志的审查结论》。”1982 年 6 月，军委办公厅政治部送来公函称：“根据中发〔1982〕9 号文件精神，现将从你档案中清出的检查材料退你，请查收。军委办公厅政治部，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五日”。至此，我这个并不复杂的案子才算最后结束。从“九一三”事件算起，历时近十一年。撤销结论，退回“检查材料”已经表明在实际上纠正了以前对我所做的不当处理，但是没有哪一级组织对此表示道歉。尽管如此，比起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几十年后才得到平反、甚至到死都未予平反者，我还是幸运的。

□ 原载《百年潮》

~~~~~  
~~~

【前朝旧事】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我对林家无怨恨”  
——和林彪前未婚儿媳张宁谈九一三事件

•蔡咏梅•

一九七一年林彪坠毁外蒙古温都尔汗的“九一三事件”对当时中国人精神的极  
大震撼，及整件事的神秘色彩，使我一直对林彪及其死亡之谜感到无穷兴趣。

意想不到的是八月底我竟和九一三事件的一个重要当事人，林彪前未婚儿媳  
张  
宁在香港见了一面。

◇ 林彪案株连三十万人

张宁这位身世传奇的女子现已嫁作商人妇，丈夫林赛圃是美籍华人，在美做  
贸  
易生意。这次张宁在丈夫陪同下带着三岁的儿子经香港回大陆探亲。

大陆公布的资料都说，当初林彪独子林立果选妃，最后相中张宁，不但是她  
人  
美，而且还很有气质风度。见到张宁，我好奇地打量她，已有些发胖，但仍然美  
艳  
，四十七岁的年纪风韵犹存，想像她年轻时一定美得灿然夺目。

据大陆一些资料透露，林彪一案株连之广相当惊人，受牵连者竟多达三十万人，绝大多数相当无辜，张宁是其中之一。张生于一九四九年，中共老红军的遗孤，当时是南京前线歌舞团的舞蹈员，她与林立果的结合，完全是不由自主。张宁说其实林家子女，包括林彪女儿林立衡与她的丈夫张青霖都不能像常人一样谈恋爱结婚，他们的婚姻是政治包办婚姻。

在组织安排下，单纯的张宁一九七一年六月进入林彪家庭时，距九一三事件仅三个月，在这短短三个月中，张宁身不由己地卷进中共权力斗争的风暴眼。她虽然侥倖未上林彪那架三叉戟，留得一条性命，但后来却饱受多年的苦难，先是被关押审查了整整四年，接著又长期受到“内控”。张宁回忆说，七一年十一月她从北戴河回到北京，听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传达关于五十七号文件时，才知林彪全家已坠毁温都尔汗，想到自己竟然和这样一个“罪恶”的家庭联系在一起前途尽毁，痛不欲生下第二天即自杀，但被人救活。

#### ◇ 林彪内外判若两人

她说，她很快明白这是制度问题，林彪父子也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应以公平心来对待他们。

对于被大陆民众视为乱臣贼子的林彪，当年的未婚儿媳显然是很同情的。她说这不是出于一种亲情，而是由于理解和认识。她见过林彪好几次，林彪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她至今记忆犹新。“他人很含蓄，很内向，还很腼腆，是个虚弱的老人，感觉上也很亲切很好脾气，没有大首长的架子。”最使她吃惊的是林彪完全不像外面见到或外面宣传的样子，而是“内外判若两人”。

她认为林彪是位极优秀的军事家，但不是政治家，搞权术搞不过毛泽东，也搞不过周恩来，政治上表现最着力的就是文革，但就是这短短几年，林突然攀升到政治最高峰，但又倏忽间一跌到地，粉身碎骨，令人相当感慨。她说，“林彪对国家、民族确实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他也有身不由己的地方，有时他精神相当无奈相当痛苦，以后真相大白。我们会看到林彪也是个历史大悲剧人物。”

我问她对自己的未婚夫林立果怎样看？她沉思了一下说，林立果是同时代年轻人中的异数，思想超越了时代，在中共高干子弟中还没有一个地位如此高而思想如此反叛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许多批判毛泽东的话确实就是林立果当年对周围人所讲的，但据她所知，所谓的林立果小舰队并没有甚么成型的政治纲领文件。“五七一工程纪要”应是后来拼凑而成的。至于林彪的妻子叶群，坊间不少书都把

她写得相当不堪。比如有本托名叶群一位女服务员王兰多（王的丈夫杨振纲是林彪的司机，与林彪一同摔死在蒙古荒漠）自传《叶群之谜》，大写叶群色诱秘书，与林彪手下大将黄永胜通奸。张宁说她认识王兰多，“小王文化低，人很老实”，这些情节是自传作者虚构编造的。“叶群精神空虚无聊，写几首诗给黄是可能的”，但黄永胜极其崇敬林彪，“他怎么会与他崇敬的首长的夫人上床？相信他也不敢。”

◇ 林豆豆不作母亲誓为父雪冤

在林氏家族中真正与张宁相交很深的是林立衡（小名林豆豆），两名孤女同是林氏灭门惨变的幸存者，感怀身世，同病相怜，相濡以沫，使她与林豆豆结下了深厚的姐妹之情。她一直称林豆豆为“姐姐”，称林豆豆丈夫张青霖为“哥哥”。

据后来逐渐披露的资料，林彪父女感情相当深厚，但林彪爱女林豆豆却举报父亲逃亡，在父母兄弟惨死后，这位大义灭亲的女儿难道不会感到痛悔吗？

深知林豆豆情况的张宁说，林豆豆和同时代年轻人一样，所受的教育使她崇拜毛泽东，相信中央，为了保护和挽救自己的父亲才向中央求助，但没有想到会铸下大错，林豆豆是真正“非常非常”后悔。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林豆豆立下誓愿，要用她后半生的全部生命为父亲雪冤，因此她决定不要孩子不当母亲。张宁说，林豆豆外表文弱，而且身体多病，但意志却相当坚强，绝非一个弱女子。二十五年



来  
她一直未停止过向中央申诉，所拟的申诉提纲共八十三条，由于中央不接受，她  
曾  
通过关系在北京散发。

至于中共官方文件对林豆豆“大义灭亲”的嘉许，林豆豆从来不接受。张宁  
说  
，每次宣读中央文件，念到“大义灭亲”这样的词句，林豆豆就会失去控制，大  
声  
愤怒抗议中央盗用她的名义欺骗世人。

一九八〇年中共公审四人帮和林彪反革集团时，林豆豆多次向中央组织部写  
信  
，反对将四人帮案与林彪拉在一起，并要求出庭为指控林彪的有关每一件历史事  
件  
作出反证。公审前中组部曾派了三个人到郑州（林立衡七五年后和丈夫张青霖下  
放  
该市）听取林豆豆的意见，她谈了很多真相，这三个人大吃一惊，最后说，“如  
果  
你们谈的是事实，我们提著脑袋也要向中央反映。”后来林豆豆又向河南省委书  
记  
、省长、郑州市委书记谈了三天三夜。

张宁所讲的林豆豆一直对林彪案喊冤叫屈，大陆的报章也有同样报导，曾作  
叶  
群文学侍读的傅伟勋在他所写的《我所知道的叶群》即说林豆豆对审查态度相当  
不  
合作，先是拒绝交待问题，受到反复批判后，就大量交代林彪说毛泽东的坏话，  
后

来又不断向中央申诉。

◇ 相信九一三事件是冤案

这一切是否证实一些人（包括笔者）所猜想，林彪九一三事件另有复杂的内幕，林彪根本就是一个冤案？对此张宁不置可否，似有难言之隐。但她强调，官方对九一三事件的说法有破绽漏洞，最近民间提出不少新的资料和看法，官方的态度也是很暧昧的。比如说官方指控林彪搞政变，“他一个国防部长，全党全国的副统帅，有忠于自己的军队，有手下铁杆干将，为甚么却只让他的儿子去搞？这不是很说不通吗？。”

张宁认为“在这一事件中，毛林周三角关系起了关键作用，毛确实想整林彪，但是否会把他逼上绝路，我看未必，不然毛为什么要说‘天要下雨’这样的话？为什么会在事件发生后受到很大的精神刺激？周恩来起了什么作用？大家可以去探究。”

张宁期待有一天真相会大白，这应该是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共同愿望。

~~~~~  
~~~

【抢救文物】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 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

•康松乔•邢邦明•阿勇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山海关某机场。2 5 6 号三叉戟载着仓惶出逃的林彪等 9 人起飞。约两个小时后，飞机坠毁在蒙古国肯特省温都尔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 1 3”事件。二十多年后，内蒙古海拉尔市，“2 5 6”飞机残骸作为重要文物和历史物证被一位有心人悄然收购运到这里，并严密封存和收藏起来。

一九九八年杨柳吐翠季节，笔者专程赶赴海拉尔市，寻访残骸的下落，并了解到其被收藏的详细经过。

### ◇ 众里寻他

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美国《洛杉矶时报》称美国记者汉纳姆于一九九三年开始搜集有关“9 1 3”事件资料，在温都尔汗坠机现场看到：“飞机残骸成了狼窝，老鹰和秃鹫也在此安家落户”，“剩下的仅有一些支离破碎的条条块块了，最长的大约两英尺。”

同年，北京某传媒称林彪座机残骸被“一位不知姓名的港商买走”。一个港商

“出高价买走了残骸的主要部份”。文章又说，“港商到底是谁？飞机残骸现在何处？是谁又倒卖给其他人？这些都已无人知晓、无从查找。”

“2 5 6”飞机残骸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杭州某报发表《林彪座机残骸将与世人见面》一文。石破天惊，多家报纸纷纷转发、转摘。一九九八年初，转发有关“2 5 6”残骸的报导达到顶峰。文中披露，内蒙古某边贸公司的邬经理收藏了包括完整的起落架、轮毂、发动机芯和外壳在内的林彪座机残骸。

不久，笔者来到靠近中蒙、中俄边境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海拉尔市，当时唯一的线索是：收藏者姓邬，呼伦贝尔盟某边贸公司负责人。

寻找从毫无头绪的排查开始。我们几百个电话打出去，十几次出访探寻，仍然毫无进展。就在即将失望准备离开时，海拉尔奋斗乡一位王姓人氏听了原委后，想起曾在一个人手中见过一块“2 5 6”飞机的铭牌！

在王氏的帮助下，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邬经理”。

◇ 温都尔汗：找到残骸

在笔者的再三恳求下，邬经理第一次在家中与笔者见面，此后十几天，邬经理

陆续讲述了残骸的收藏经过。

“一九九一年七、八月份，我代表公司（指他所在的边贸公司）到蒙古肯特省温都尔汗洽谈贸易。一提温都尔汗心里就挺敏感：这不是林彪坠机的地方吗？我和当地政府官员联系，想到林彪出逃坠机的地点看看，结果被当地官员一口回绝。我被告知那里有专人看管，有铁丝网圈围，无法接近。”

邬经理再去温都尔汗已经是一九九三年三月了。当时，蒙古国内政局已经发生变化。邬经理听说“2 5 6”残骸已经没人管了，有人把飞机上的铝都抠下来卖了。邬经理很震惊。“9 1 3”事件是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2 5 6”残骸是一个重要历史物证，怎么能随意毁坏呢？他向蒙方官员达先生再次提出想看一看的要求。恰好一位美国记者（后得知是汉纳姆一行）也计划接触林彪座机残骸，达先生便同意了。

邬经理打出收购废旧钢铁、铝材的旗号，在当地一个朋友家，看到了一块铝制的飞机发动机外壳。朋友说，这是“2 5 6”飞机残骸的一小部份，曾有一港商把这只发动机的内芯买走了。

九三年三月二十日，邬经理来到了“2 5 6”当年的坠机现场。这个地方位于

温都尔汗西北 70 公里，叫苏布拉嘎。“汗”在蒙语里有小山丘的意思，而坠机

现场是一块狭长的相对平坦草地，可以看到不时从小山丘上来下去的成群黄羊。

朋友带领他到这块地上寻找。这里很荒凉，似乎罕有人迹。枯草掩盖着残骸，寒风一吹，枯草尖叫着倒下。他发现还有一些大块残骸，其中起落架和轮毂就约数百公斤重。另外在以坠机中心为圆心差不多五公里的范围内，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碎片。从现场看，确实有一批铝皮被撬走了。

当地根本找不到起重设备，邬经理赶紧雇车找人，把起落架等沉重的大件先搬上车。这些东西很沉，要十几个人才抬得动。后来他干脆又雇请了二十几个当地小孩，把附近所有碎片全部收集起来。孩子们的工作很有成果，他们甚至不放过隐没

在草丛中的螺丝。他又把朋友手中的发动机外壳也收购来了，这些残骸总共有 3 至 4 吨重。

邬经理与蒙方签了一份有关事宜的意向书后，迅速离开了那里。

#### ◇ 大漠孤烟

邬经理选择了最简捷的回归路线。从温都尔汗经布尔根、乔巴山继续向东北，过哈比日戈口岸回国。

车和司机是从当地雇请的，车是一辆老吉尔卡车。为了不让残骸太显眼，他

们

又寻找了一个运废铁板同行伙伴，把残骸分成两部份，装在车上，又把废钢板分盖

在两车残骸之上，算是个掩护。

他们选择的路线没有公路，汽车时而在蒙古大戈壁的砾石上颠簸，时而在半人

深的枯草丛中蹒跚。天公不作美，他们遇上了九三年那场大寒流：暴风雪铺天盖地

，白色的雪烟被风卷着在草地上横扫，白天能见度极差，车前方十几米外什么都看

不见，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二三十度。老吉尔车里没有取暖设备，寒风呼呼地往里钻

，车里车外温度好像差不多，他们冻得直哆嗦。

车顶着厚厚的积雪负重前行。走到半路没有油了，只能等过路车，托人把口信

带出去捎油来，这才度过难关。

他们在经过 1 5 0 公里无人区时，车连续两次烧坏了离合器片，也只能等着过

路车送信，再等另一辆过路车捎回零件来。受困在寒冷的蒙古草原，车上载的又是

这些物品，他们被恐惧、寒冷、危险侵扰着，直到现在，邬经理还是不愿意回想那

一段困苦经历。

从温都尔汗到哈比日戈，直线距离不过 5 0 0 公里，他们却走了整整 7 天。  
邬

经理回想说，“如果载运的是别的什么货，我会把它扔在路上，可是这样重要的历史物证，我就是舍命也得把它弄回来。”

三月三十一日晚上，他们驻在距哈比日戈口岸 5 公里处，等待四月初至中旬口岸开放。临过关时，蒙方不知为什么突然禁止铝材出关，眼看着前面的车辆被扣下，邬经理急得团团转。后来他只好自己先过口岸，让车和残骸等在蒙方境内。

一等就是 15 天，连司机都等焦急了，几次想放弃，邬经理每天把食品送到口岸，叮嘱他不要紧张、不要焦急。其实最紧张、最焦急的还是邬经理。

四月十五日下午 5 时左右，口岸突然出现了松动，他们赶紧办理了手续，开车过关。

车轮行驶在祖国的大地上，大家悬着的心方才落地。

#### ◇ 残骸无价

邬经理把他这三吨多珍贵的残骸放在了距海拉尔不远某旗的一座院落里，残骸上面覆盖着几吨牧草。这些残骸包括：较完整的起落架、发动机部份、飞机外皮碎片、座舱设备碎片、部份机翼、损毁的电子设备、油箱残片、轮毂部份等，有些沾着被烧化的铝块。



不久前，笔者在秦皇岛拿着这些残骸的照片找到了当年曾目睹“256”飞机的几位老人，让他们辨认时，他们都说：无法辨认了，这些残骸都已面目全非了。

当年曾任山海关某机场场站副站长的马先生回忆：“那架三叉戟很大，装着三台发动机，有三四十米长，油箱在飞机翼里。那时候这可是很豪华的专机了。”

曾任机场场站参谋长的佟玉春回忆：“当时（指事件发生时）飞机停在停机坪上，我根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零点多，我看到一辆汽车冲进来，林立果下车大喊大叫，接着林彪一行上了飞机。我看情况实在太反常了，赶紧叫来两台油车，让司机把车开上滑行道阻挡飞机，又命令两个科长每个人上一辆车，监督执行此命令。我回头看见256机组一个人（后葬身温都尔汗）正在打电话，我就大声喊他，告诉他飞机不能飞。他愣怔怔看了我一会儿，没答话。我赶紧跑去调警卫连。此时飞机已发动，情急之下我向值班员借了一支手枪，跑出来连开三枪以集合警卫。我们冲向跑道时，派去执行阻截任务的两辆汽车，一辆没进入滑行道指定地点，另一辆在道上被机翼刮了一下，事后发现机翼上的铝皮、有机玻璃灯罩、石棉绳等物被撞坏，有些碎片掉了下来，飞机冲过去后，在没有任何照明设备的情况下，违反常规强行起飞了。我之所以命令派出油车阻止飞机起飞，是因为我得执行没有周总

理  
等人指示不能放飞的命令，而且当时此机是违规起飞，这种反常现象也使我不得不  
这样做”。佟玉春等人眼看飞机飞走了。约两小时后，温都尔汗便传出了举世震惊  
的爆炸。

在温都尔汗时，邬经理还找到了当年的一位目击者，这位年迈的目击者简略地  
回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他正在值班，忽然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出去  
一看，一架起飞的飞机正往下掉，后来听说上面的人全死了，其中有个中国大官。  
此后残骸就一直留在苏布拉嘎。

这些面目全非的残骸，让它的收藏者邬经理费尽了心思。谈到残骸时，他的话  
语处处显露出他是一个有心人。

“我认为‘9 1 3’事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事件，而‘2 5 6’飞机残骸  
是这个事件中的重要物证，特殊的原因使它始终不能被收藏起来。作为一个中国人  
，把这样一件物证运回国并能收藏起来，不论吃多少苦，付出多少代价，值得。”

九三年将“2 5 6”飞机残骸运回后，邬经理立即严密地封存起来，他不愿意  
为名利而张扬。曾有一个姓黄的台商开出了6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要求收购这些  
残骸，邬经理一口回绝了。他说：“如果是为了钱，我可能不会费这么大的劲舍

着  
命去收藏这些残骸”。

原中国航天航空博物馆馆长薛培森听到消息后曾赴海拉尔进行考察，在仔细  
调  
研后，这位专家确定这就是林彪出逃时所乘坐的三叉戟机残骸。他说，这是非常  
珍  
贵的文物，不能随意处置。

为了研究和更加了解“2 5 6”飞机骸，邬经理投入心血收集了大量有关“9  
1 3”事件的资料，把他们分门别类地整理清楚。为了避开可能出现的购买者们的  
纠缠和不必要的麻烦，一向豪爽而好客的邬经理不得不封锁消息，把这些残骸秘  
密  
地收藏起来。

“2 5 6”残骸作为“9 1 3”事件的物证和重要历史文物，它的意义当然是  
特殊的。新闻界日渐将收藏林彪出逃座机残骸的消息曝光后，邬经理决定不再将  
残  
骸长期冰封。他曾有过一些打算，他想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2 5 6”残骸的  
的  
作用，让残骸在合适时机、合适的地点浮出水面，起到教育后人的作用，同时也  
能  
更妥善地保存起这件文物。

邬经理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在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的金帐汗旅游部落展  
出。  
在旅游部落设一个展厅，把残骸分类摆放，同时配上“2 5 6”三叉戟复原模型，

再把“9 1 3”事件的历史背景等材料制成图文并茂的展牌。这样，一个独具特色  
的展厅将在富有民族气息的金帐汗旅游点里落成。

邬经理还考虑：选择上海作为展出地点，展览的名字就叫“折戟沉沙”，具体  
的安排目前尚未确定。

邬经理曾委托一位密友了解秦皇岛情况。邬经理认为，秦皇岛是个旅游城市，  
每年夏天数百万的旅游人口，在这里办展览，教育面更大，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  
段历史，这样既可以给这个城市旅游增加新项目，又可以使残骸得到更妥善、更科  
学、更安全的管理。同时，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那就是“2 5 6”号三叉戟当年  
就是从这里走上了出逃坠毁之路，选择秦皇岛更深层次的意义亦在于此。邬经理希  
望能够在秦皇岛首展。

究竟林彪出逃座机“2 5 6”三叉戟残骸在哪里展出，至今尚未定论，但关于  
残骸展览的新闻将会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

□ 摘自《紫荆》杂志 1 9 9 8 年 1 1 期



【小心求证】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知情人反复查证林彪死因

•肖思科•

1971年9月13日，发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的一次空难，震惊了中国政坛。不久，以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为首的中央专案组经调查，公布了调查结果：中共党章法定接班人、在中国政坛上位居“二号人物”的林彪元帅，企图篡党夺权，在阴谋政变未遂的情况下，仓惶乘机外逃，不料机毁人亡。

此事在10年之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又组织了庞大机构进行了复查，最后对这个定性为“反革命集团”的案件，进行了历史的审判。两次调查，结果一致。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大约在林彪事件至今的30年里，海内外有以“知情人”、“未亡人”和“研究专家”为名的人，提出了林彪系“导弹击毁说”、“西山镇压说”、“绑架出逃说”、“替身代死说”和“软禁老死说”等种种谬传。无疑，林彪的死因只有一个！笔者追踪和关注此事十余年，提笔回眸，将觅踪30年的一些粗略看法告知读者。

#### ◇ “西山镇压说”

1993年初，号称为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揭开林彪死亡之谜》的专著，作者自称姚明乐。书中将林彪之死归为毛泽东“最后的晚宴”，其核心内容

如  
下：

毛泽东决定与接班人林彪分手，让掌管中共中央警卫局的汪东兴安排二人在“玉泉山”见面。宴罢，林彪座车从玉泉山返回，伏兵出击，林彪呜呼！

大意如此。这大概是关于林彪之死与中共中央公布结果有悖的公开专著最早在国内出现。然而，此说法早在国外流传……

此前 10 年，也即 1983 年初，在美国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一本署名姚明理 (Yao Ming Le)、十多万字的《林彪的阴谋与死亡》。同年 6 月，台湾也出版了由莫绍平、傅依萍译成中文的该书。香港远东出版社将此书改名为《林彪之死》出版。

此书由美国记者、“中国通”史丹利·大诺撰写评论推介。该书引用不少所谓中共高层秘密文件及其一些回忆录，所要揭发的内幕是：林彪试图引发中苏大战，以便夺取政权；林立果承诺袭击毛泽东乘坐的专列，由于举棋不定而失败；林彪是赴毛泽东晚宴之后被击毙；在外蒙古机毁人亡的是林彪“小舰队”等等。全书一个意思，无非是中共中央公布的结果不实。事实果真如此吗？当笔者一经研究，便发现此如泡沫，一点就破。

首先，据笔者对照“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揭开林彪死亡之谜》，与海

外

出的三个版本如出一辙。无非在作者名上的翻译有“姚明理”和“姚明乐”之别。而《揭开林彪死亡之谜》基本上是“移花接木”。该书共计 288 页，而其中 181 页至 262 页系抄袭笔者专著《超级审判——图们将军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的部份章节。此书真伪读者自然明知。

其次是在海外出版该书的作者姚明理通篇除引用中共中央公布的三批林彪专案组材料之外，其异说完全是引用“中共高干”赵研极的回忆录。据笔者调查，中共中央系统，中央公安部门和解放军系统的高级干部中，无一人叫赵研极。而这作者“巧妙”就在于“赵研极开始写回忆录时，健康情况已经很坏，还没写完就死了”。死无对证，这正是作者的用心。

再次就是时间上的矛盾。该书稿称 1971 年 9 月 12 日晚，毛在“玉泉山”与林彪举行“最后的晚宴”。据笔者了解，毛泽东南巡于 1971 年 9 月 12 日到达丰台站，并召集李德生等人作了指示，晚上直接回到中南海。据李德生、陈先瑞将军和中央警卫局邬告成副局长透露，毛泽东当晚根本没有到“玉泉山”。而从另一个方面证实，林彪当晚根本不可能到“玉泉山”，而在北戴河。笔者调查数人，特别是林彪的贴身卫士长李文普证实，林当晚没离北戴河半步。此事单从时间上就不攻自破。

◇ “导弹击落说”

别有用心的姚明理在揭发所谓内幕时，对林彪专机坠毁有一种说法：在外蒙古机毁人亡是林立果“小舰队”成员，而该机是导弹击中后坠毁。

无独有偶，中国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人员在飞机坠毁的现场调查后，带回一张照片，也有飞机翼上有一洞孔之说。这两点不谋而合，曾被人怀疑飞机是用导弹击落。

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在《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一文中已讲得清楚：总理向毛泽东汇报了林彪叛逃之事，毛泽东当时表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是没办法的事，随他去吧！可见老人家并不想置林彪于死地。

前不久，空军司令员王海将军撰写回忆录，其中提到他根据周总理指示，成立了一个专业班子论证林彪专机出事原因。其中提到洞孔问题，他们认为是机翼中电路起火引起爆炸。他们从技术方面得出结论：如果导弹击落，则洞孔应当穿透，而所谓洞孔实际是呈单面炸开，而铝刺外翻，从这一点证实，该洞孔并非导弹所致。

此事除王海将军等提供的结论外，当时从蒙古回国并带回照片的驻蒙使馆人员孙一先也在回忆中证实：当时提供这一洞孔情况，主要是林彪专机坠落地点，离



苏

军驻蒙基地很近，怀疑有苏军发射导弹的可能。而提出此问题后，经周总理指示，与中办负责人之一杨德中、外交部军代表李耀文将军等，在事后很快找了一架与出事专家同样的飞机进行了现场分析。当时就否定了“导弹击毁”的怀疑，因为不仅铝刺外翻，系内部爆炸所为，而他亲眼见了飞机内部结构，证实了电路引起油箱爆炸的使然。

此事笔者在近十年来，反复请教了弹道和导弹专家，他们几乎同一种结论，那就是在当时，中国导弹要把蒙古温都尔汗的飞机打下来几乎不可能，因为当时装备的导弹还到不了 2 0 0 公里的射程，而中国离温都尔汗则有 1 1 0 0 多公里。

本来此事已经清楚，但前不久在台湾的一本专著《谁杀了林彪》（作者王兆军）又重提旧事。而且将这一说法嫁祸当时全权处理林彪事件的周恩来。好在周恩来生前对此已有留言。

当时，周恩来在广州的一个高级干部会议上讲：“我再说一遍，林彪座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一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能命令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写进党章的接班人啊！我

如

果命令打下来，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啊？！”

总理的话说得合情合理，当时在场有数十人作了笔记。

◇ “绑架出逃说”

在林彪出逃死亡的诸多说法中，“绑架出逃说”最有市场。此说甚早，而且是出自林彪的亲人之口。笔者近年对此特别关注，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林彪被绑架的理由。

中央军委法制局前任局长、林彪案审理办公室负责人之一图们将军曾给笔者透露了这样一段往事：

那是 1981 年初，也就是全国人大决定成立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特别审判厅的工作宣告结束时，“两案”办公室收到一份林彪直系亲属的信，声称林彪是被叶群及林彪反革命集团“小舰队”成员骗上飞机外逃的。也就是说，林的叛逃是被绑架的。

为此，原特别检察厅副厅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史进前将军专门指示由当时林彪案件审理部门组织了一个班子，进一步做了调查。

据查，写信的当事人对林彪“被骗上飞机”的说法由来已久。1971年9月12日晚，她在向驻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局部队报告情况时，就说：他们（叶群、林立果等）要把林彪“弄走”。1971年11月，当事人在写给中央的材料中，仍然保持了这种说法。而在中共公布57号文件之后，当事人就一改常态，先后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拥护中央“对林彪等叛国罪行的批判和结论的完全正确”，并声称“几年前就知道林彪要搞阴谋”。

而到了1979年11月初，她给江西省一名前要员写证明材料时，又冒出了林彪是“被骗上飞机”的说法。

无独有偶。与这位当事人的提法同出一辙，一位在海外的“九一三事件”中的“未亡人”也同时呼应，在其《自己写自己》的书中，用更加奇怪的细致的情节和推论，说明林彪是被林立果和叶群劫持而逃。

据笔者反复考证，此说难以成立。首先，林彪在出逃前，也就是在9月初，就在同叶群、林立果密谈并设计下一步的行动。比如内勤就曾听到的一些只言片语：“他们会盲目执行的”；“说我是特务，叫我到农村没有安眠药怎么办”；“各大军区都不会跟你走的，许世友是跟毛主席的，也不会跟你一条心”；“没想到小小林立果活动面那么大”；“黄吴李邱……你都交给我嘛，到香港就好办了”等等。

这些话系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人在密谈中的对话，内勤人员大部份都是在有意（其中包括受当事人安排）中听到的，应有一定的真实性。其次，从林彪下达的“九八手令”上看，林彪是主谋，是知其核心的。

1971年9月8日，林彪反革命集团准备发动政变。林立果赴北戴河之后，拿回了林彪“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命令办”的手令。而林立果正是用这一“手令”布置了“小舰队”政变，同时骗取了空中交通工具。而后，周宇驰也是用这一“手令”骗取直升机外逃。

关于林彪“手令”问题，前一段也有人提出质疑。据笔者了解，在林办确有一个李姓打字员能模仿林彪字体。但此事可能性不大。因为在特别法庭鉴别特征时，有字迹专家已鉴定那张“手令”出自林彪亲笔书写。而笔者也曾将“手令”残片复印件和林彪书法复印件提供给一位字迹鉴定专家朋友，他提出的结论与特别法庭相同。此事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字迹鉴定已成为平常之事，若有疑问恐不难解决。

再次，这几年笔者数次访问了林彪出逃的目击证人李文普等人。李还是那句话：林彪上车后问“到伊尔库什克有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而不少看见林彪出发时的证人也有描述，证明是林彪自己走的：

“……等司机杨振刚把车开上来，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就从屋里走出

来。刘沛丰提三四个皮包先上车。接着是叶群、林立果上车，林彪最后上汽车，林走到门口还问内勤：‘东西都装上没有？’没停步，很高兴的样子，帽子未戴，大衣也未穿……”

从这一情况看，林彪上车并无绑架迹象。

林彪叛逃苏联，李文普的证词无疑是核心。也有人说是孤证。其实这个证据并不孤立。最近笔者找到在“九一三事件”中被周宇驰劫持直升机的机长陈士印，他告知飞机起飞后，周宇驰便拿出画有“北京—乌兰巴托—伊尔库什克”的航线图，而此图几天前就已准备，可见林彪叛逃苏联早有其计划和准备。

那个以“未亡人”名义“自己写自己”时，描绘了飞机在北戴河上空划了一个圈，即飞机有回来之意。或者说林彪要回北戴河，是因禁空不能落地而飞苏联。据笔者同专机师长和林彪专机组幸存人员研究，那么大的飞机，根本不可能在北戴河上空划个圈。而编织这个细节，显然是别有意味的。

至于李文普，至今仍然是活着的证人，对其质疑也有不怀好意者，其中不乏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改变历史。李文普对此回答坚决：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笔者分析，他的证词并没有因此给他带来什么好处，林彪事件后他被下放；假若他同

林彪一伙，他也没必要中途下车，而林立果也不会向他开一枪。笔者同李有许多接触，认为他的话有可信之理。

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林彪是党的副主席，要劫持绑架不是一件易事。除非他自己想走。而笔者对林彪下决心走倒有一些看法，那就是叶群和林立果提供的情况促成了他走了最败的一着棋。而叶群和林立果提供的情况恐怕值得研究。不然，聂荣臻元帅不会说“林彪坏在老婆手里！”

◇ “软禁”和“替身”说

不知从何时何处传出一条“小道消息”不胫而走，那就是“林彪软禁说”。

最早，笔者见到一个从国外回来的学者在饭桌上讲起此事，而且很具有传奇。据这位身份不低的人说：他从公安部的一个人得到印证，林彪谋害毛泽东的事情败露后，“小舰队”乘机逃跑，而林彪被抓起来了，被公安部送到山西侯马一个山沟里关着。传言者说得很玄：林彪的胡子、头发长得一尺多长……

先姑且不论林彪死在何处，单从林彪“头发长得一尺多长”就站不住脚，因为林彪很早就有“林秃子”之称，他脱发已成光头。

再说林彪不可能不在飞机上，也不可能没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据 1 9 9

年 1 月 3 1 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称，该杂志社记者彼德·汉纳姆曾采访了前苏联克格勃特工，他们从温都尔汗取回林彪头骨，并结合林彪在苏联的病历，从枪伤、牙齿和肺上的钙化点印证，摔死在蒙古荒原上的就是林彪。而这一点连美国和前苏联也不怀疑。

听到关于“林彪软禁说”的消息，笔者还真查渊问源，开始这个人讲是公安部的人证实的，后来问起，又说是公安部门证实的，出现一字之差。经再三追问，对方说了一个已退休的派出所民警。据找这个民警查问，他说了一番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过去刘少奇、彭德怀和贺龙都是软禁死的，我们老头儿们议论林彪的死不是也有这个可能，别人侃山时这么分析，我也在想这有没有什么道理？！”

不用多问，谣言就是这样引起的。

还有一则“替身说”也很令人惊诧。

曾有海外小报传闻，林彪乘专机外逃，最后机毁人亡的是他的替身。而且林彪到了苏联秘密军事基地，还在训练雇佣军。也就是说，林彪用“金蝉脱壳”到了国外，人还活着。

此事纯是杜撰之说，关于林彪是否有替身，一调查便知。

据一位曾在四野前身“东总”的老人回忆：在哈尔滨，机关的人真在街上见到一位与林彪长得很相像的人，回来后给林彪讲了，林彪只是一笑，以后再未提过此事，根本没有找过什么替身。用替身是国外的手法，共产党人还没人搞这一套。老人最后说：“准是外国电影看多了！”

这位老人的话在林彪贴身卫士长李文普处得到印证。李跟林彪数载，从未听说过林彪有替身。他否定了“替身代死说”，他的话应具权威性。因为他是最后见到林彪叛逃的目击者之一。

另外，事实证明林彪死在荒原上并非替身。而假若真在苏联秘密军事基地，也随着前苏联解体早已曝光了。而现实已经真相大白，从没人见过林彪还活着。

#### ◇ 历史正论不容置疑

关于林彪之死说法很多，真正的原因肯定只有一个。

早在事件发生不久，中央分三批公布了事件情况，早期报告中有些情况让人质疑是有道理的。例如说林彪与苏联勾结，这是没有依据的。而更重要的是，当时“



四人帮”还在台上，林彪集团与“四人帮”有勾结，也有内讧，人们怀疑材料真实性是有原因的。

正是八十年代到来之际，邓小平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使许多问题得以还历史本来面目。而在这时，中央成立专案组重新复查林彪案件，并对该案进行审判，应当说这时的审查报告和审判判决是公正的。

两次审查，一次审判，结论都是一致的：林彪集团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试图“和平过渡”未果，但阴谋政变又未遂，最后乘机出逃摔死在异国他乡。这个结论则是建立在详尽的事实基础之上。

笔者认为，至少，在目前一些传闻得不到证实，也拿不出证据的情况下，林彪的死因只有一个，就是官方公布的结论。

□ 摘自《北京青年报》2001年09月11日

~~~~~  
~~~

【史实辨析】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周总理处置“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的一些情况

•于 南•

周恩来同志在处理举世震惊的“九·一三”事件中，表现了高度的党性原则和斗争艺术。现在，对周总理处理林彪叛国外逃事件的过程，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在 2 5 6 号专机越出国境，林彪确已叛逃后，周总理才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告的。有的讲周总理在九月十二日以前，已经掌握了林彪的政变阴谋。有的文章对此事交待的也不够清楚。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些重要情节，是应当弄清的。

据我们向有关人员了解，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夜里发生的情况，大体是这样：

那天晚上，周总理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十点半左右，接到 8 3 4 1 部队负责人的电话说，根据林立衡的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坐飞机逃跑，北戴河林彪住处，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总理当即给吴法宪、李作鹏打电话，要他们查明究竟有没有一架三叉戟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

在总理已经掌握了山海关机场确有一架三叉戟飞机的情况以后，十一点半左右又接到叶群电话，她对周总理撒谎说，林彪想动一动，还没有调飞机来。事后，总理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他听到叶群的谎话后，判断出林彪他们有鬼，可能要跑。总理立即给吴法宪、李作鹏下命令，断然采取了一些措施。

十三日零时左右，周总理接到 8 3 4 1 部队电话报告说，林彪一伙不顾警卫部的阻拦，已乘车从北戴河逃往山海关机场，并开枪打伤了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总理感到情况十分严重，立即从大会堂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报告。因为周总理知道，毛主席是十一日下午乘火车离开上海，十二日下午两点到达丰台，找了一些负责人谈话，五点左右从北京站下车后，回到中南海。年近八十的老人，经过二十多个小时的旅途，是很劳累的。在北戴河那边的情况，还没有完全弄清以前，周总理一直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处置，深夜不便去惊动毛主席。在得知林彪已乘车逃往机场，开枪打伤人的情况报告后，就立即去向毛主席报告，下达了全国禁空令。同时派杨德中同志到西郊机场“协助”（实为监视）吴法宪指挥。

十三日凌晨零点三十二分，林彪乘坐的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后，下令开动雷达，追踪这架三叉戟专机。在快要飞越国境时，吴法宪来电话请示总理，打不打？总理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这时已将近凌晨两点。

不久，三点多，又接到吴法宪的报告说，从沙河机场飞跑了一架直升飞机。周总理当即下令，派战斗机拦截，绝不能让它飞出国境。后来直升飞机又飞了回来，怕它到城区闹事，总理又下令迫降，如进城就坚决打掉。

当时，周总理还没掌握林彪一伙的全部阴谋活动，不知他们到底能干出些什么罪恶勾当。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以防万一，总理劝毛主席到人民大会堂暂住。毛主席要总理把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随后，毛主席乘车从中南海出来，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住下。

三点多，政治局委员来到人民大会堂以后，周总理首先告诉他们，毛主席已在十二日傍晚回到北京。接着，向政治局委员讲了夜里发生的一切情况，说林彪坐飞机跑了。作了应付万一出现的各种情况的准备。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政治局会议。

十四日下午，周总理得到我驻蒙使馆的报告，才知道 2 5 6 号专机，已在十三日凌晨二时半，在蒙古境内坠毁，机上人员，八男一女，全部摔死。总理报告了毛主席，并告诉了政治局委员。

九月二十四日清晨，周总理去机场为李先念同志出访送行。回来以后就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向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宣布，中央决定，要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黄、吴、李、邱一个个被押走。

这个过程如有叙述得不够准确之处，欢迎了解情况的同志加以补充、更正。

□ 原载《党史研究》1981年第三期

~~~~~  
~~~

【史实辨析】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是周恩来不让外逃的林彪返回着陆？

•周敬青•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在其发动武装政变的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凌晨强行乘坐256号三叉戟飞机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的草原上。这就是九一三事件。这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九一三事件尤其是飞机坠毁的情况，成为国外新闻媒介议论的一个热点。

近些年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引用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较近的一篇非官方文章认为，三叉戟飞机实际上首先往南飞了约10分钟时间，然后掉头返回山海关，但发现山海关机场已遵照周恩来指示关闭。该文暗示，是周恩来不让林彪着陆，以迫使他飞往苏联，这样他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叛徒。”

无独有偶，国内最近出版的一本畅销书中也写道：“飞机起飞后20多分钟，留在96楼‘林办’人员听到飞机返回的声音，96楼的人都聚集在坡顶向机场方向遥望，只听得飞机在机场上空轰鸣盘旋，大家都认为飞机飞回来了，一定是想降

落。当时‘林办’的人已离开机场，谁都料想不到中央在飞机起飞之后下了封锁机  
机的命令，地面所有灯火熄灭，飞机无法降落。”“飞机向莲花峰飞来，在 9 6 楼  
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大家仰望着它，最后见它在空中划出一个形似问号的线  
路  
，然后向北方飞去，再也没有回来。”

这两段话的用意是说林彪在空中仍不想北去苏联，下令返回山海关机场，是周  
恩来下令关闭机场才无法降落，不得不向北方飞去。其实，只要稍有常识的人都会  
知道，三叉戟客机时速超过 9 0 0 公里，怎么可能像小飞机那样在北戴河的 9 6  
楼  
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呢？飞机起飞的山海关机场距北戴河有百里之遥，肉眼  
根本看不见，又如何“向机场方向遥望”，还能听到“飞机返回的声音”呢？这真  
是太富于想象力了。

在林彪乘机强行起飞后，周恩来曾代表中央政治局下达过禁空令，这是不争的  
事实。问题在于：第一，这个禁空令是何时下达的，当时林彪的飞机在何处？第  
二  
，林彪专机起飞后，党中央的态度是要他回来，还是要赶他走？第三，林彪是否  
要求降落的表示？我们不妨对有关这一事件经过的更多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以  
便  
了解历史的真相。

《周恩来传》的记录如下：“对林彪等突然乘机逃走的意图，当时还不清楚。对他们的全部阴谋计划，一时也并不了解。周恩来命令李德生坐镇空军司令部，监视飞机动向；派杨德中随吴法宪去西郊机场，派纪登奎去北京空军司令部，以便从各方面掌握情况。同时，他向全国发布禁空令：关闭所有机场，停飞所有飞机，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周恩来还请调度员用无线电向这架飞机呼叫，要林彪等飞回来，告诉他们：不论飞机在何处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但飞机上一直没有回答。”

对林彪事件颇有研究的专家于南教授在《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一文中也谈到：“周恩来随后从人民大会堂赶到中南海毛泽东住处，汪东兴、张耀祠也几乎同时到达。周恩来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这架飞机，并与机上通话，告诉飞机可以在任何一个机场降落，但 2 5 6 号飞机不回答。地面雷达不断报告飞机的航向、时速和高度。飞机耍了个花招，开始时航向 2 9 0 度即向北京、大同方向飞，但十几分钟以后，在零点 4 6 分改航向为 3 1 0 度，向蒙古的西部即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偏东一线飞行。”这些都说明，林彪乘机起飞后，中央的态度是要他回来，所以才从地面不断向这架飞机呼叫。而且，周恩来表示愿意亲自

到机场接他，这也算仁至义尽了。

但是，关键的问题还是“禁空令”是何时下达的呢？现在我们有幸找到当时亲自用电话向全国下达这项命令的当事人的准确回忆和电话记录，成为解开这一疑团的最有力的证据。当年军委空军指挥所的值班作战参谋朱秉秀，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曾协助李德生参与处理这一事件。他详细地记录了自己在空军指挥所亲历这一事件的始末：“周恩来指示，要空军指挥所直接用对空台与潘景寅（林彪飞机驾驶员）沟通联络，要他飞回来。北京西郊机场和首都机场都可以降落。此时，吴法宪也在西郊机场指挥所亲自手握话筒不断地呼叫潘景寅，告诉他只要回来，一切都好办。但是，始终没有听到潘的回答。眼看着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1时50分飞出了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空，并在逐渐下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飞机信号于温都尔汗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同时还示意我赶快拿笔作记录，一句一句地复诵着电话里周恩来传达的政治局命令：

‘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吴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记完后我又向李德生复诵了一遍。他说，没有错，这就是净空了，空中发现情况就是敌机（由于林彪出逃当时是绝对机密，



命

令下达后所及的人将很多，所以在命令上不能不出现林)。梁（指梁璞，当时任空

军司令部参谋长）同时对我们两个作战参谋说，赶快向各军区空军、指挥所传达。我与徐心德（当时任作战参谋）分工，由他接通电话，由我传达命令，流水作业。从 1 时 5 6 分到 2 时 2 0 分左右才将周恩来下达的政治局‘禁航令’传达完毕。”

是周恩来直接下达命令给山海关机场，那也只能是在 1 时 5 0 分左右，距林彪

起飞的零点 3 2 分，已经是 1 个多小时之后的事了。把不能降落归于 1 个多小时后

才发布的命令，不是有点荒唐吗？实际上当时林彪的飞机已经在国境线了。而且，这架飞机的航迹有地面雷达航图为证，可以确凿地证明根本没有返回欲降落。

□ 摘自《党的文献》1999年第4期

~~~~~  
~~~

【发微探幽】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 “九一三”事件余波——周恩来嚎啕大哭

•周秉德•

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越来越多在伯伯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已双鬓斑白，也大

多步入古稀之年，住进了干休所，迈入了离休干部的行列。可是，强烈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仍使他们无法忘记过去的日子。他们口头讲，挥笔写，使伯伯许多鲜为人知

的事情公布于世，让我的心灵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震动，使我一步一步进入到伯伯内心世界，使我受到了一次次强烈的震撼！更使我掂量出伯伯苦涩辉煌的份量。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消息一经证实，有人立即提出用导弹打掉。毛泽东主席摇摇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而伯伯曾拿着话筒向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喊话：“林副主席无论在国内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去机场迎接。”接着，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伯伯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这是许多文章都回忆过的。

有一个情节鲜为人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严峻的国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于人民大会堂，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

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爆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

周恩来！

自从调到中央工作，纪登奎看到的周恩来永远是从容、镇定、乐观。是的，如  
果从身材长相上看，周总理只算是中等个，人偏清瘦，典型江南人的脸庞，端庄清  
秀，举止文雅，让人不禁联想起西湖边的杨柳。可是，从跟随他工作中的亲眼目  
睹，不管是外交上的剑拔弩张，还是党内错综复杂的局面，他永远应付自如，有用不  
完的智慧和精力！而且，他仿佛是专为克服困难来到这个世界的，往往越是困难、  
艰险，他越有力量和办法，仿佛世界上没有难得住他的事。又让人不禁想到扎根于  
绝壁陡岩上的黄山奇松——美感与力量最有机的结合。像今天这样的失控，纪登  
奎  
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  
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

“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  
了  
，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  
话  
。

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  
反  
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确实，纪登奎也是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真正想明白周恩来的痛哭失

声

：为着树立和维护林彪副统帅的地位，冲击打倒了党政军那么多老干部，学校停课

、工厂停工，全国从上到下，几乎无一幸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叛徒、内奸、工贼”，煤炭部长张霖之被活活打死，多少老干部被投入监狱，多少群众因之划线

受批判……如今，这个一直是被称为毛主席“最亲密战友”，并作为毛主席当然接

班人写入党章的林彪，竟带着老婆、儿子逃往国外，落得个折戟沉沙，死无完尸！作为一个国家总理，他怎么不为“文革”以来党的一次次错误决策痛心！怎么再说

以打倒刘少奇大树特树林彪为主要成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又怎么

向全国党、政、军、民解释和交代这一切？！

毛泽东主席之气魄够大，他在延安时就笑指拥有原子弹的美国和世界上一切反

动派都是“纸老虎”，但林彪外逃之时，毛主席已是年过古稀老人，林彪外逃之事

，给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致命的。

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伯伯，出去接了一个电

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

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扶着伯伯走进电梯，他明显感到总理的全身在发颤：

“到游泳池。”他的声音也微微发颤。张树迎心里一震，一定是毛主席那里出事了

。果然，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

青  
，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  
漠  
地远旁站着。伯伯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  
了  
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  
间  
，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  
紧  
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  
手  
里！”这句话，站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慨：党内对  
毛  
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至今张树迎还仍常对我感慨：你伯伯一直维  
护  
毛泽东主席的地位，你说他崇拜主席，尊重主席，也是为了党！一个这么大的国  
家  
，总归得有个头儿吧！

□ 摘自周恩来侄女周秉德著《我的伯父周恩来》（铁竹伟执笔，辽宁人民出版  
社  
出版）

关于林彪座机击落问题

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

•王年一•吴润生•

“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至今已经三十多年。

三

十多年来，国内外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这一事件真相的探讨和研究。本文综合各种已

经公开发表的材料，着重对林彪座机坠毁的原因，发表一家之言。

不久前，我国第一次在正式出版的期刊上公布了“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标

明林彪座机在坠毁之前的最后航线是：先向西飞，然后沿着我国的边境线向北飞，飞到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后，又折回向南飞，往我国边境飞来，在返回途中坠毁于温

部尔汗。（见《中华儿女》杂志 2001 年 2 月号）

这一“航线图”虽然在我国是第一次正式的公开披露，但在国外和我国私下里

早已流传。解释其原因有三种不同的说法：

一是“兵不厌诈”说。认为林彪座机兜圈子是为了迷惑我边防部队，顺利逃避

被我击落的危险，达到成功出逃的目的。我国的官方人士基本持此说。

二是“驾驶员潘景寅反抗”说。此次林彪专机机组成员康庭粹在《中华儿女》杂志上披露“航线图”时即坚持此说。

三是“林彪命令返回”说。国内外大多数文革史研究专家都认为林彪只同意出

逃广州，并未打算叛逃苏联，是林彪觉察到飞机出境后命令飞机返回的。但此说

法

不被官方认可。证据是林彪的贴身警卫李文普事件后揭发，在林彪开往山海关机场

的座车上，听见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是惟

一的一人一言的“孤证”，已经有人专门撰文分析这个“孤证”的可信度，本文不

作深究，承认此为一说。

本文对以上三种说法不作是非评判，只探讨林彪座机最后坠毁的原因。

我国官方至今仍坚持认为，林彪座机不是“坠毁”，而是迫降时爆炸。迫降的

原因是燃油不够和没有领航员。

当年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承认飞机残骸上有一个大洞，但认为此洞不是导弹

所击中，而是飞机在地面爆炸时造成的。许大使的推断不过是为表白：我国没有发

射导弹击落林彪座机。因为伟大领袖毛泽东说过：“天要落雨，娘要嫁人，由他去

吧！”毛泽东不让打，谁敢打呢？

但有一个事实难以隐瞒，即林彪座机着陆之前已经起火。王兆军在《谁杀了林

彪》（台湾世界书局出版）一书中披露，温都尔汗莹石矿的一个工人亲眼目睹“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坠地地点离他只有九英里，他看见了全过程。”日本《每日新

闻》记者在蒙古温都尔汗采访时，遇到了当年的目击者，证实林彪座机是先着火

后  
坠落。如果认为国外的报导不可信，我国《人民日报》主办的《环球时报》1997年11月23日头版发表的“本报驻蒙古特派记者敖其尔”的文章中也无意中披露：“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拉哈玛大娘，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仅三公里远。……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拉哈玛大娘看见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大概不到法20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这无意间的披露告诉我们：林彪座机不仅在着陆前已经着火，且着火后还飞行了大约20分钟。我国的权威报纸、我国的著名记者，披露的信息应该比较真实可信吧？

从飞机残骸上留下的大洞和目击者看到的飞机着陆前二十分钟已起火的事实，基本可以否定“飞机迫降时爆炸起火”的结论，应是遭攻击后爆炸坠毁。

既然我国没有打，会不会是别国打的呢？本文列举如下四条事实供诸君推断

—

—

第一、三十多年来，尚没有一点证据说叶群和林立果在出逃之前已经和苏联取得了联系，所以可以肯定地说，苏联对林彪的“叛逃”一点不知情。这是无可置疑



的。

第二、苏联人如何看待林彪座机的航线？若说苏联军队对林彪座机这不速之客到访毫无觉察，那是自欺欺人。前蒙古外交部次长永栋在接受日本记者采访时说：“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蒙古都掌握了林彪座机的飞行轨迹，苏联会不掌握吗？中、苏、蒙三国边境交界处没有民用航线，林彪座机只会被认定为借用民航飞机执行军事任务。进入苏、蒙国境之后又迅速返回，只能认为是侦察任务完成或发觉被跟踪。若是友好邻邦，应在事发后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然而，当时的中苏关系都是视对方为“头号敌人”。苏联面对这一突发事件会采取什么果断措施，应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勃列日涅夫的话中之意。当年“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国就披露了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闻讯后发出了三声“可惜”的事实，不过，我国却认定他是因没有得到“大汉奸”而惋惜。现在从各种渠道证明，勃列日涅夫的“可惜”之言论全属实。但话中之意并不一定是当年中国政府判断的那样。曾两次去调查林彪座机坠毁事件的克格勃成员向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记者提供：“我们花费了一年时间，才查清楚林彪死亡的原因，但我们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一真相：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亚历山德鲁和我”。该讲话

认

定我国政府不知林彪死亡真相，可反证中国没有击落座机。但这很可能是苏军的“

误打”，因完全不知情而导致“失误”，失去了林彪这颗攻击中共的重磅政治炸弹，勃列日涅夫无奈地发出了惋惜之声。而这并没有违背“可惜”这个词的本意。

第四、苏军肯定有“击落一切入侵者”的“条令”。如此断言决非凭空捏造。对于“敌国”的任何飞行器，只要进入苏联领空，都要击毁。哪怕是真正的民航飞

机，他们也视为伪装，视为“军事侵略”，攻击起来不会有丝毫的迟疑。80年代

击落韩国偏离航线的真正的民航机就足以证明。若不是韩国提出强烈抗议，若不是

美国窃听到苏联军机上的对话，苏联绝对不可能承认这架民航机是被他们的导弹击

落的。前苏军的一部份、现乌克兰部队，最近甚至将并未偏离航线并没有进入乌克兰

领空的俄罗斯民航机击碎。若不是在飞机残骸上搜集到弹片，乌克兰政府仍然死

不认帐！

判断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笔者最近得到一条最重要的旁证：2001年第

11期《党史天地》刊载鲁青的文章披露，1971年9月14日，即“九·一三

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蒙古外交部约见我驻蒙大使许文益时，就一口咬定此飞机

是“军用飞机”，且“侵犯了蒙古领空”。9月16日在温都尔汗“验尸”之后，中蒙双方外交谈判时，蒙方不仅坚持是“军用飞机”，还坚持“机上人员全部是

军  
事人员”。中方坚持是“民航飞机”，“机上有军事人员，也有非军事人员”，蒙  
方坚决不予认同，致使谈判破裂。蒙古外交部的坚持己见，显然是为他们的导弹  
击  
落飞机赢得坚实的理由。果然，从这时候开始，蒙古国内，到处流传着“中国军  
用  
飞机入侵蒙古，被导弹击落”的新闻。9月30日，蒙古全国报纸和广播电台以  
新  
闻消息的形式，公开对国内外报导了民众中流传的内容，而中方对此却“采取了  
沉  
默的态度”。为什么蒙方主动承认了我军用飞机被他们的导弹击落（尽管不是官  
方  
正式声明，而是新闻报导），中方却因何不予追究，反而保持沉默呢？直到30  
年  
后的今天，中国也没有就此事向前苏联和蒙古“讨个说法”呢？

依笔者之见，中国确有难言的苦衷和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大致概括为以下四  
点  
：

第一、若提出林彪座机被苏联击落的疑问，必给预先确定的“叛国”性质横  
生  
枝节，无法解释林彪既然叛逃苏联因何又被苏联导弹击落？从大逻辑上很难讲  
通，  
更难以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口服心服地接受“林彪叛国”的结论。而当时，“粉  
碎  
第二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林彪反党集团”是我国的头等大事，和苏联的关系已  
退  
居其次。一切服从大局，一切服从主要矛盾，不抗议不质疑是我国政府的必然选

择  
。

第二、毛泽东时代，我国政府视苏联为国际上的头号敌人，视林彪为国内的头号敌人。不必讳言，那时不见得所有的军事专家都对林彪座机“迫降爆炸”说绝对相信，肯定会有人存有对苏联导弹击落的疑问。只是，既然认定苏联是敌人，林彪也是敌人。敌人之间互相残杀不是绝对有利于我方吗？我们乐得坐山观虎斗，欣赏“狗咬狗”啊！有什么质疑、抗议之必要呢？

第三、若隐瞒林彪事件的真相，就事论事，以苏军击落我民航机为由提出抗议，理由很不充份。那里本来没有民用航线，飞机又闯入人家的领空，特别是最终落在人家的领土上，摔死的人员只有那么几个，庞大的三叉戟飞机上只载了几个旅客，无论如何不符合情理。因为自己“理短”，不如乾脆默认。

第四、我国政府所以至今不要求俄罗斯将尘封 30 年的那一段历史档案解密，这中间恐怕有一个逻辑上的误区，认为若俄罗斯承认当年林彪座机是苏联导弹击落，便要将林彪事件的“叛国”性质彻底翻案了。诚然，若修正了林彪座机系“迫降爆炸”的一贯定论，首先得承认座机向北飞入苏联境内之后又折回向南飞的真实航

线，但这也只能说明座机上“有情况”。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是否一定是林彪命  
令回国，还是驾驶员英勇“反劫机”？苏联击落林彪座机的事实，并不能为某一  
论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据，更不能和林彪事件的翻案等同起来。

所以，中国人民有权要求俄罗斯把林彪座机坠毁的历史档案尽快解密，将只  
勃列日涅夫等四个人知道的林彪死亡真相告白于天下。因为历史总归是历史，要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是每一个在历史长河中生活的普通人的基本权利。我们不甘  
被历史的造假者、伪装者、扭曲者、隐瞒者永远蒙蔽！请还我芸芸众生对历史真  
的知情权！时代已进入了新世纪，这人权中起码的要求应该不难实现！我们期待  
着  
！

□ 寄自中国

~~~~~  
~~~

【小心求证】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质疑林彪出走事件  
——为“九一三”事件三十周年而作

•陈晓宁•

2001年的9月13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林彪913事件

三十

周年，笔者经过长期严肃的分析后认为本案存在多处重大疑点。所以特作此文。

笔

者将本着严肃、认真、研究的态度对 9 1 3 事件进行全新的探讨。

内容提要：在本文中笔者将要对 9 1 3 事件提出以下新的核心结论：

一、林彪在 1 9 7 1 年 9 月 1 2 日夜出走去机场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这是林彪事件关键性证人李文普说的谎话，做的伪证。

二、林彪在 9 月 1 2 日夜乘机要出走的目的地是广州（香港），而不是想叛逃苏联。最终没有去往广州的原因是 2 5 6 飞机燃油不足。而后来飞向蒙古、苏联的行为应由林彪之子林立果负责。

三、2 5 6 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没有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这个举动不是因为燃油不够导致想找机场迫降，而是因为林彪不想叛国，所以强令 2 5 6 飞机返回中国。

四、2 5 6 飞机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着陆前，在空中就已经发生爆炸并起火。

五、2 5 6 飞机在空中爆炸起火是由于在温都尔汗附近被驻蒙古的苏军导弹击

中所致，飞机在受伤后，进行带火迫降时又发生事故，最后迫降失败，机毁人亡。

进入 2 0 0 1 年后笔者见到了两份最新出版的林彪事件亲历者的回忆书刊。一  
份是我国当年驻蒙古的武官孙一先写的《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  
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2 0 0 1）。

另一份是 2 0 0 1 年 2 月号的《中华儿女》杂志上刊登的林彪专机机组成员康  
庭梓的文章《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

康庭梓的文章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新信息，其中最最引人注目的是杂志 P 4 1  
上  
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在外蒙古的一段航线中清楚地标注出：飞机在飞到接  
近苏联与蒙古的边界线后，却突然掉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飞来，并在返回途中坠  
毁  
于温都尔汗。

“2 5 6 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之前是向着返回中国的方向飞行的。而不是向苏  
联方向飞去”。笔者第一次见到这种说法是看王兆军的书《谁杀了林彪》（台湾世  
界书局 1 9 9 7）。王兆军在书中是这样叙述的：

……林彪和他的妻子都死在飞机上，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  
路  
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林的妻、子可能强迫林改变意志逃窜苏联。……苏  
联

官员的证词说：“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彼得（指 Peter Hannam——笔者注）采访了两次去调查林彪之死的克格勃小组。该小组一成员（指托米林——笔者注）说：“我们花费了一年的时间，才查清楚林彪死亡的情况，但我们既不能告诉中国人，也不能告诉蒙古人。只有四个人知道林彪死亡的真相：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亚历山德鲁和我。”……

必须说明的是，王兆军书中的这段叙述是引自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资助的记者彼得·汉纳姆（Peter Hannam）的报导。这位记者于 1993 年亲自跑到苏联和蒙古采访，采访了大量当事人（包括克格勃人员），其中经过他们的采访，由克格勃人员提供的林彪确实死于蒙古的结论，已经成为一项来自第三方的铁证。彻底打破了诸如“林彪死于国内”的传说。我国已公认汉纳姆的采访报导具有很高的可信性。

其中，“飞机先向西飞，后来改向北飞。在飞到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折回来向南飞”，这一说法来自苏联官员，苏联人当年通过雷达是很容易监视 256 飞机的航线的。这一结论是很容易核查、对证的，所以汉纳姆在这一点上的报导应是可信的。最近笔者又看到一则报导，是日本每日新闻系周刊《Sunday 每日》于 2



0 0 0 年独家专访前蒙古外交部次长云登的报导。云登谈到：“……林彪的飞机似乎为了闪躲雷达，因此一直是低空飞行地进入蒙古境内，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因为该机在极低的低空飞行，因此轰隆声响，蒙古系循声而追踪的”。可见，蒙古当时都能掌握该机航线，以苏联的军事技术水平跟踪一架民航飞机就更行了。

笔者在当初从王兆军的书中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感到无比吃惊。因为我们以前听到的 9 1 3 事件的正式的说法中从来就没有这一条。我们一般人接受的信息是：林彪是有意叛逃苏联的，他的座机一直向着苏联飞去——即使不是笔直，大方向也是朝着苏联。在直飞到温都尔汗附近时，由于燃料不足坠毁（这种看法应该是一般老百姓得到的通常信息，在孙一先的书中，也反映了这种大众观点。在 2 0 0 1 年刚刚出版的孙书 P 2 6 3 中，孙一先也给出了一幅林彪飞机的航线图，在这幅图中，就标注出 2 5 6 飞机在外蒙古境内是一直飞向温都尔汗的——没有从苏蒙边境返回的信息。看来这位当年的驻蒙武官，亲自向周恩来汇报林彪坠机情况的“知情人”至今还是与大多数人一样，认为 2 5 6 飞机是直飞温都尔汗坠毁的，不存在回返一事）。谁听说过它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向返回中国的

方向飞来，并在返航途中坠毁于温都尔汗？

不过对于王兆军书中提供的这些海外消息，笔者当初持存疑态度，只看为一家之言（按说王书引用的材料是苏联克格勃的调查，应该有极大的可信性），仅听一方的说辞难免有偏颇。但是，现在我们看一看康庭梓文章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再想一想这篇文章并不是发表在一般的猎奇小报上，而是刊登在非常严肃的，由团中央主办的，声称“不允许有任何虚构”的《中华儿女》杂志上——它的一些文章的发表甚至专门经过中宣部审查。我们还会认为“256飞机在飞到苏联、蒙古边境处调头，向中国方向返回”一事是无端的谣言吗？

为什么我方书刊几乎一概不提256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笔者认为恐怕并不是我方故意隐瞒此事，而是我方当初根本不了解这一情况，因为我方雷达无法监测这一现象，从而做出了错误判断。我来简单分析一下：我方出版的书籍几乎很少介绍256飞机在外蒙古境内的详细飞行轨迹和飞临各处的详细时间。笔者见到的最详细的叙述是当时任军委空军指挥所值班作战参谋的朱秉秀的叙述（见周敬青的文章《是周恩来不让外逃的林彪返回着陆？》，发表在《党的文献》杂志1999年第4期）：

……眼看目标靠近边界线移动，1：50 飞出国境，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并在逐渐下降高度，直到我地面雷达上的信号于温都尔汗以南消失。李德生立即向周恩来报告了雷达信号最后消失的位置。……

请大家注意一下上述引文中的一个细节，即：雷达信号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而 256 飞机实际上却是坠毁于温都尔汗“东北”（不是“以南”）60 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孙一先书 P 278，263）。既然消失于温都尔汗“以南”，而实际坠毁于其“东北”。也就是说在 256 飞机在我方雷达上消失以后，并不代表它坠毁了，256 飞机实际仍在飞行。

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256 飞机于温都尔汗以南，从我方地面雷达上消失并不是由于它坠毁了，而是由于它飞出了我方雷达的监测范围。这以后它虽然还在飞，但其后来的举动我方实际已经无法通过雷达监视了。

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温都尔汗附近离中蒙边界 240 公里以上，加上 256 飞机在外蒙境内“在极低的低空飞行”，这都可能造成飞机脱离我方雷达监视范围。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在康庭梓文中就提到：他自己在山海关机场调度室通过雷达仅监视了 256 飞机 14 分钟，距离 120 公里，256 飞机就从山海关雷达屏消失了。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则当然后来 2 5 6 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一事我方就真  
的无法监视，因而不了解。反而想当然地错误认为：2 5 6 飞机从我方雷达消失就  
意味着它坠毁了；或者是错误地认为：飞机从雷达上消失后直飞温都尔汗附近坠毁  
。

正由于苏联方面的雷达可以全程监视 2 5 6 飞机的行踪，所以笔者认为苏联人  
得出的“2 5 6 飞机从苏蒙边界掉头返回”的结论要比我方结论可信得多。而康庭  
梓给出的令人惊讶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恐怕是他们今天也看到了外方相关  
报导，并赞同了苏联人的说法吧！

以上的叙述无非告诉大家一个我们过去从未听说的结论——“2 5 6 飞机在外  
蒙古境内不是一直飞向苏联，而是在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来”。这样  
就自然引发一个问题：既然早想叛逃，为何往回飞？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2 5 6 飞机从苏蒙边境的掉头回飞是不是仅仅因为飞机燃油不够，所以只是想  
回头找机场迫降？若是这样的话就跟现在的通常说法只有小细节的差别，而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了。

笔者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分两种情况讨论一下：

第一种情况：256 飞机机组成员技术过硬（虽然未带领航员等人），在飞机飞到苏蒙边界附近，发现燃油不够时，仍然能够大致知道自己所处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他们就知道此时已在苏蒙边界附近，则他们一口气飞过边界到苏联机场降落岂不更好？苏联的机场应该比蒙古机场多很多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256 飞机调转回返找机场迫降是不合理的。

第二种情况（也是最可能的情况）：由于 256 飞机起飞时未带领航员等人，所以飞机飞临苏蒙边界时，机组人员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如果是这种情况，当机组人员发现燃油不够时，他们将面临“是向前飞找机场迫降，还是回头飞找机场”的选择。笔者认为，当 256 飞机对准苏联方向飞行后，通过飞行时间和飞行速度，驾驶员还是能大致判断出此时离苏联不会太远了。一口气向前飞，在发达的苏联境内找到机场的可能性当然大于往回返在落后的蒙古境内找到机场的几率。再说，就算驾驶员一点也不了解自己的位置，则往前飞找机场和往后飞找机场的难度不是一样吗？而往前飞还免去了费劲掉转机头的麻烦——何必要转头呢？最要命的是：往回飞找机场，在不知自己确切位置的情况下，他们就不怕一不小心飞回中国？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在搞不清自己精确位置的前提下，如果 256 飞机转头是

为了找机场，则因为它需要边飞边寻觅，它的航迹就应该是曲折的，徘徊的，犹豫的。虽然从康庭梓文中的“林彪出逃航线示意图”中，由于该图比例尺太高，不太精细，我们现在还不易判断它是否是在曲折地寻觅。但是我们可以从苏蒙方面对 2 5 6 飞机采取的举动看出一些端倪：

在汉纳姆的采访中，苏联官员也认为：“三叉戟坠毁的时候，不是在寻求庇护的路上，而是正向中国方向飞行”。从这段字面可以看出：苏方并不认为 2 5 6 飞机是想找机场迫降，而是向中国方向飞。而在后面的详细分析中我们将看到恐怕正是由于苏蒙方面也做出了判断认为：2 5 6 飞机转头是为了返回中国，而不是为了寻找机场迫降，所以才将它击落。（详见后面的论述）

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大致否定“2 5 6 飞机从苏蒙边境掉头回飞是因为缺油而想找机场迫降”的观点。

既然 2 5 6 飞机的掉头回飞不是因为缺油而想找机场迫降，那么，它从苏联、蒙古边界掉头向中国方向飞回来这是干什么？发生了什么事？这是为什么？

要想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整个事件前因后果有个交待。在此笔者通过自己长期的资料积累和思索，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全面谈谈自己对 1 9 7 1 年 9

月 13 日这一天事态的看法。对有兴趣的读者，相信不会浪费你们的时间，还是值得大家一看的：

### 一、林彪出逃是什么性质？

其实，林彪出逃是应该分成两种情况来分别讨论的。因为他们的恶劣程度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种是出逃广州（香港），第二种是出逃苏联。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广州（香港）的话，属于党内矛盾。可以说从千百年的历史角度说，林彪顶多是当时的党的叛徒，却不是民族的、中国的叛徒。对林彪在中国的历史评价没多少影响。这就象历史上的各派党争一样。不论属于哪一派别，只要他不出卖民族利益，他就不是汉奸卖国贼。

如果林彪真的出逃苏联的话，性质就完全不同了：

当时中苏关系严重对立，中苏间矛盾就是民族矛盾、国家矛盾。这个时候出逃（叛逃）苏联，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叛逃者都将是背叛民族、背叛祖国。他都是汉奸、卖国贼、民族的罪人。如果林彪走上了这条道路，那么，不管他过去有多大功勋，他都将和历史上的大汉奸张邦昌、秦桧、汪精卫一个性质（顶多是程度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他将被同样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真是一万年也

翻  
不了身。

二、林彪有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动机与思想基础？

笔者的分析是肯定的：没有！至少是非常不充份！

一个人的行为是受他的思想支配的，我们先来看看林彪的思想基础是什么样的。  
。

以下摘自林彪着《战术思想研究——论一点两面及战术作风》：

林彪说：“……我们是人民起义军，……，是为了广大人民的解放，而不是为  
了自己或哪一个。不是为了吃粮。我们的每一个胜利，都会影响到人民的吃饭、住  
房、种地。我们每一个胜利都与人民利益直接联系着。我们自己吃得坏些，穿得  
坏  
些是没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只是沧海一粟。无数万人的生命，他们后代的生  
命  
，才是宝贵的。……”

林彪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战争年代的林彪无愧于他说的这些话。林  
彪  
平时不讲吃，不讲穿。想的就是部队，就是打胜仗。就是为穷苦人民能过好生活  
打  
江山。



上级发什么衣服他就穿什么衣服，从不计较长短尺寸、合不合身、款式美不美、穿在身上潇不潇洒。周赤萍回忆林彪总是穿一套灰布军衣。1958年他在昆明看到林彪时穿的是很普通的黑色呢子衣服。袖口上还打了补丁。

林彪吃得很简单，两菜一汤，青菜，豆腐，平时唯一的零食是炒黄豆。有一次在法库，林彪到地主家吃饭，桌上有个酸菜炒白肉，他吃了几口。从来没有讨论过吃喝的林彪，回来后不同寻常地连连说好吃，好吃！说过了又说再不能吃了。好吃的东西林彪为什么再也不吃了？为了减肥？不是！是为了怕吃了地主的饭，就不再想为劳动人民打江山了。这可是立场问题。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出林彪并不是不爱吃美食，而是有高尚的理想，并且对自己要求严格。战争年代，他工作起居都是简陋的农舍里。他经常深入火线上，打起仗来一夜一夜不睡觉是家常便饭。（参见韦力编《1965年前的林彪》西藏人民出版社P229）

林彪家的保姆王淑媛在913后“揭发”林彪“艰苦朴素，别看他外表穿得好，里面的衣服都是林立果穿剩下的，他补补再穿”。王老太太还揭发林彪“从来不玩女人！不像那些人喜欢玩女人。”。林彪不玩女人是他从来没这欲望，还是他玩不动？都不是！林彪的前妻张梅号称陕北一枝花，叶群也是延安八美。看来林彪不

是没有好美之心。解放后有一次叶群参加一个老干部的婚礼，那老干部娶的是年轻貌美的文工团员。林彪为此训斥叶群道：“老配少，参加这种婚礼干啥？什么思想作风？我不去是我看不惯，你去你是什么思想作风？”从寻常的夫妻吵架可以看出：林彪并不是没色心，没色劲。而是对自己有高尚的道德要求。看不惯声色小人。

我们从林彪长期的言行中可以看出：他的道德是高尚的，他的言行是一致的。

林彪这样一个道德基础的人，那么聪明，睿智的人，一个对自己有严格要求的人，怎么会分不清好坏，不顾大节，以自己老残的身躯，还贪那么一点苟活，去做遗臭万年的民族败类呢？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有人可能会指责林彪在文革中的言行。我们应该承认他在文革中有所投机（有一部份可能出于无奈），他当然应该为此担负他应负的责任。但是林彪在文革中主动攻击的少（这是和江青集团的巨大差别），在大形势下跟进的多。但也有很多事明明不是他干的，也被推到林彪身上，这从林彪秘书张云生的书《毛家湾纪实》中可以大量看到。

在这里笔者认为：林彪没有叛逃苏联，当汉奸，卖国贼的充份动机与思想基础。

。

三、林彪在直到 9 月 1 2 日晚的心态都表现出他拒绝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 1 9 9 4 年 8 月 1 0 日《中华读书报》的图门的文章（图们是中央军委法制局第一任局长，林彪专案办公室负责人之一，特别法庭公诉人）：

9 月 2 日下午……

林彪说：“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了。”……

9 月 1 1 日 1 2：3 0，内勤听到……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

——转引自《风云 9 1 3》，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 P 3 1 1 — 3 1 2

从以上看出，到 9 月 1 1 日时，林彪有的是“从容就义”的心。连去广州的心都没有，更别说叛逃苏联。

以下选自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P 2 4 3 — 2 4 4：

（9 月 1 2 日晚）十一点多了……

不一会儿，小陈（指林彪内勤陈占照——笔者注）端着茶盘从林彪那边走廊上

的小侧门里冒出来，急步走向林立衡：“我悄悄进去，刚走到沙发后面就被林立果发现了，凶巴巴地推我出来，差点把我推倒，吓坏我了。”立衡和众人急问：“听到什么呀？”小陈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着说‘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听到这句，就被立果发现我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正淌着眼泪。”

.....

由于林彪出走是在 9 月 12 日晚 11:40 左右，而这一段叙述距离林彪上汽车出走只有几十分钟了，对了解林彪出走前的最后心态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先辨析一下它的可靠性：

首先，陈占照本人没有任何理由骗人。林彪的女儿林立衡倒是有可能编造有利于翻案的说辞。但是从上文可以看出：听陈占照叙述的不止有林立衡，还有“众人”，应该不难找到陈占照及其他人对证。另一方面，林彪最后几天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都会倍受林彪专案组的关注。这句话应该有林办工作人员的揭发材料，所以可以查阅当年的揭发材料。由于证人众多，所以林立衡敢于在此说谎的可能性极小。此段材料应该可信。

那么林彪为什么要说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呢？或者是林彪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思呢

？

既然提到所谓“民族主义者”，那一定是涉及了外族，此处肯定指苏联。在这  
种时刻，林立果在与林彪的谈话中谈到苏联，那只能是与林彪讨论逃往苏联的  
一种选择（当然也会讨论去广州的选择）。而林彪又为何流泪呢？很简单，逃往苏  
联就是出卖民族，当卖国贼，想来林彪一世辉煌，而现实却真要逼着他往这条可耻  
的路上走。临老临老却要面对这样尴尬的选择，他怎能不感慨伤怀呢？而林彪说自  
己是“民族主义者”就表明了他要坚守民族气节，不愿意叛逃苏联的态度——真想  
背叛自己民族的人，还谈什么“民族主义者”？而出逃广州（香港）林彪应该是同  
意的。

所以，林彪出走之前几十分钟时，他仍然不同意叛逃苏联（但跑到广州是同  
意的）。

总之，在与毛主席的关系已不可挽回之后，林彪有“坐牢”的心；有“从  
容就义”的心；也有南走广州（香港）的心。但是不同意叛逃苏联（叛逃苏联作为一  
种选择，林立果同林彪讨论过，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被林彪拒绝了）。

四、林彪的行动也表现出他要去的是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我们请看 8 3 4 1 部队大队长姜作寿发表在《中华儿女》上的访谈录：

回到大队值班室不大功夫，刘吉纯副科长带着林立衡来找我，说有要紧事情。…… “叶群、林立果要带着首长逃走。他们先到广州，然后再去香港……你看怎么办？”林立衡急切地问。“你说的这些可靠吗？”我惊异地问。“可靠。这是叶群当面给我布置的，她让我马上回楼准备，让我跟他们一起走……我不能跟他们一起走呀。你看我该怎么办？”在夜暗中，我仍然能感觉到她那真诚期待的目光。她所讲的，使人不能相信。象林彪这样的党的高级领导人，怎么可能跟老婆孩子去香港呢？

这个细节（转引自张聂尔书 P 3 1 5）发生在 9 月 1 2 日晚 9：20 左右，而林彪踏上出走的汽车是在 9 月 1 2 日晚 1 1：40 左右。也就是说：在林彪出走前 2 小时的时候，叶群、林立果对林立衡交待的仍是逃往广州（根本不是苏联！）。

再请看张聂尔书 P 3 1 3：

大约（9 月 1 2 日）晚上 1 0 时，林、叶和林立果又进行密谈。密谈中，林办工作人员听到林立果好像对林彪说：“黄吴李邱……你都交给我了嘛！到了香港就好办了。”

这是引自图门的文章。这一段话是工作人员听到的“密谈”，既然是“密谈”就不会是掩人耳目的假话，它真实反映了林立果当时的打算——是要去香港。而晚上 10 点——这已经离林彪出走只有 1 个多小时了。

正如张聂尔分析的“……至少在 9 月 12 日晚 10 时左右，林彪还是准备去南方……更能证明林彪原来去广州的打算”。（还有许多细节分析，请参见《风云 9 13》P 314，张聂尔，解放军出版社）。

总之，林彪在 9 月 12 日晚 11：40 左右踏上出走的汽车的时刻，他的目标是去广州（香港），而决非苏联。

五、到底是什么证据证明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呢（请注意“主动”两字及含义）？

笔者不否认林彪想主动出走广州（香港），而前面笔者提过，这“南逃广州”和“叛逃苏联”性质可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前者是党内矛盾，后者可是出卖民族和祖国。那么究竟是什么证据可以证明林彪是想主动叛逃苏联从而遗臭万年呢？

找来找去笔者惊讶地发现：只有唯一的一个证据！就是林彪说的一句话（即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精确地说是由林彪警卫参谋李文普口中得知的这一句话。

我们不禁要问：这么大个林彪事件凭什么仅靠李文普的一句证词——这是孤

证

嘛！难道就没有什么更多的证据？令人惊讶的是：没有！就是没有！所有论定“林彪是主动逃往苏联”的权威证据唯一就靠李文普这句话。

我们先看党史专家，中央党校教授于南在《说不尽的毛泽东》中的说法：

在审理两案时，曾就林彪是否被劫持作过调查。结果证明被劫持的说法站不住脚。这里的关键人物是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他在车上听到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转引自张聂尔书 P 3 1 0）

——笔者注：这里李文普的话被认为是“关键”。

我们再看林彪事件研究专家肖思科（上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后勤学院政治处主任，调查研究“两案”10年，出书5本：《超级审判》、《林彪元帅叛逃最新报告》……）的说法：

针对“绑架出逃之说”，肖思科找到林彪事件的关键人物，在林彪身边做警卫和生活服务工作的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

笔者注：“关键”还是李文普。

我们再看林立果未婚妻张宁写的《自己写自己》P 2 9 5（作家出版社）：……换取李处长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林彪是自己走的，他说‘到伊尔库茨克’。”……鉴于李处长的特殊身份，他讲的证据，便成了林彪叛逃的权威铁证。

笔者注：李文普的话成了“权威”、“铁证”。



读者诸君不用再看了，再看还是李文普。我们可以说李文普这句话要了林彪的命。真能让林彪一万年也翻不了身。但是由于这是一个人的“孤证”，听到这句话的其他人全死光了。所以，现在全靠李文普一个人的一张嘴，连个旁证都没有。李文普说什么就可以是什么。那么，是不是也给作伪证提供了条件呢？

六、笔者经过份析后得出判断：林彪在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李文普的揭发很可能是迫于某种政治压力说的假话、作的伪证。我将在下面作出分析。

让我们先看一看李文普发表在《中华儿女》杂志 1999 年 2 月号上的文章《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对这一段情况的叙述（这与肖思科所作的采访大同小异）：

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林彪第一个走进，叶群第二个，坐在林彪旁边，第三个是林立果，第四个是刘沛丰，我最后上车（简录）。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 56 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 58 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

叶群说：“8341 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加快速度，过了 58 楼。

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

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 58 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 8341 部队二大队的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骨折。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是自己“枪走火”。

对这一段材料笔者提出几点疑问：

第一点疑问：如果林彪在车上就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

不是明摆着告诉李文普和司机杨振刚：“我要当叛徒，我要叛逃苏联？”，林彪是不是有神经病啊？他就不怕李文普和杨振刚拔枪反抗？或到机场后，趁机场人多反抗或逃走？林彪一点都不怕叛逃苏联的举动在上飞机前就暴露？有哪个劫机犯会傻到在上飞机之前就宣布“我要劫机”？最合理的方式是先把李、杨骗上飞机，再用枪逼着他们服从。比如：同一事件中的周宇驰，李伟信、于新野就给出了好例子。他们骗直升飞机驾驶员陈修文时，也是告诉他去北戴河汇报，等上了飞机，再拔枪威逼去蒙古。哪有一上来就告诉陈修文去苏联的？林彪会如此不谨慎和弱智？李文普此说不合逻辑。

第二点疑问：林彪问“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见到这句话，笔者的问题就来了：林彪指挥对苏战备那么多年，他会不知道离中苏边界不算远的著名大城市伊尔库茨克有多远（后来的苏联远东战区总司令部就设在伊尔库茨克，可见此城的重要意义）？如果连苏联南西伯利亚靠近中国的这么重要的大城市都不了解，那么，从伊尔库茨克飞来的苏军导弹、飞机要多长时间到北京？有多长的预警时间？林彪就都无法判断，那么林彪还搞个什么战备！这明显不符合林彪的作风。林彪当年教杨成武当师长时就告诉他要把地图看熟，最后达到背熟，地图要印在脑子里，做到不看地图也能指挥作战。地理、地图是林彪的强项啊！当年林彪经常

比第一线指挥员还熟悉地形。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作风都变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别只是空头推理。来个有说服力的实际例子让大家看一下。

以下选自林彪秘书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P 3 1 9（春秋出版社）：

林彪煞有介事地发出了“第一号战斗命令”，他本人当时也大概是确估 1 0 月 2 0 日那天会发生苏联对中国的突然袭击。

根据预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率领的代表团从伊尔库茨克（请各位睁大眼看这个地名——笔者注）乘飞机起飞后，定于 2 0 日中午抵达北京东郊机场。林彪平时在中午 1 2 点前开始午休，但这天他却坚持不等苏联代表团从飞机上走下来，决不睡觉。他判断苏联人坐的飞机，很可能不是运来什么谈判代表，而大半可能是携带原子弹的不速之客。因此，从这架飞机起飞开始（应该是从伊尔库茨克起飞的吧！——笔者注），何时经过蒙古的首都，何时进入我领空，何时经过张家口，何时飞近北京上空，何时在东郊机场降落，何时见到苏联人从飞机上走下来，他都不厌其详的听取从北京及时传来的情况报告。直到最后一次报告，才使他放心地去睡午觉了。

张云生的回忆录一向以准确、真实著称。所以，似乎可以这么说：从伊尔库茨克到北京东郊机场的每分每秒林彪都曾关注过。“多远？多长时间？”，这种问题林彪还用问吗？怎么一遇到李文普，林彪就弱智了——不但故意问他早该知道的傻问题，还故意暴露了叛逃的贼心。

第三点疑问：林彪的司机杨振刚的举动也不太合理。林彪汽车上一共 6 个人，他们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司机杨振刚。前 4 位是林彪“阴谋”的核心人物。而李文普和杨振刚是局外人，特别是杨振刚，可以说基本不了解内幕。过去人们从来没有关注过杨振刚的举动。其实很值得研究一下他。如果林彪问了“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而李文普又大喊“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则杨振刚当然应该明白林彪是要叛逃苏联。他应该有什么举动？杨振刚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他一个小破司机又不是死党，犯得着替林彪卖命吗？他应该也象李文普那样逃跑才对呀！即使汽车上怕林立果用枪打他，在下了汽车上飞机这个空当，应该是有机会跑的。受党教育那么多年，组织上层层筛选的人，面对叛国者即使没有抵抗的勇气，跑都不敢吗？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杨振刚反抗，反而从张宁的书中看到正是杨振刚将林彪“扛顶”上飞机的——他不但不反林彪，还帮林彪（张宁书 P 2 5 3，关于这一细节，目睹者人数应该不少，应该能避免“孤证”的弊端。张宁的书应该有所依据，应该不会胡说。）。

另外，据李文普自己的文章谈到：“……这一切，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都亲眼所见。林彪是跟在叶群身后从飞机舷门的软梯子自己爬上飞机的。如果他不  
想走，在登机前说一句话，机场上的工作人员、飞机驾驶员和随机工作人员都会  
上前保护林彪制止飞机起飞……”。从李文普的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机场上的工作人员”就在林彪一行的附近。在山海关机场的许多工作人员众目睽睽之下，杨振  
刚此时想跑是有机会的嘛。但他并没有想反抗的举动，这合理吗？

而反过来，假设林彪没说过那句要命的话，那么，杨振刚就并不知道林彪要  
叛逃。在这种情况下，则杨振刚的一切举动就都是合理的，也不会让人觉得反常。

第四点疑问：9 1 3 以后，专案组在毛家湾多次组织林办全体工作人员开集  
体  
会揭发林彪罪行（即：面对面揭发）。在会上李文普都没有揭发林彪讲过那句话。  
别的林办人员也没在别的场合听李文普说起。（见张宁书 P 2 8 8， 2 9 5， 由  
于  
这个情况当事人众多，所以应当可信。）。

这一情况非常重要。我们不禁要问：林彪如果真说过那句话，则这当然是最  
重  
要的证明“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李文普为什么在大会上不揭发？他没有可  
能  
忘掉这句话。也没必要替林彪隐瞒什么，他只需要实话实说，揭发这句话对他李  
文

普本人没有任何伤害，相反故意隐瞒倒可能给他招灾。但是他为什么当时不当着大家揭发？笔者分析道理很简单：因为林彪根本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所以李文普当时怎能揭发？

只是在后来，专案组对林办人员的交待不满意，将李文普单独关押审讯后，由于某种原因，李文普才揭发林彪说过那句话。

据林立衡和张宁了解的情况：后来，李文普与林办秘书于运深被单独关押审讯。经过专案组多次审讯，李提了 3 个条件后（1.为李保密；2.保留党籍军籍；3.保证全家老少不受政治歧视），李才交待林彪讲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

这当然引发我们猜测是专案组急于找到林彪主动叛逃的证据。但又苦于找不到。于是对李文普进行诱导。李文普原本无材料可揭发，但迫于压力只能“顺杆爬”、作伪证。并趁机向专案组提作伪的条件作交易。大意如此，读者可详看张宁书 P 295。

第五点疑问：李文普会不会撒谎？笔者曾看到林立衡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林晓霖（张梅—刘新民的女儿）的一个说法：“李叔叔是老实人，跟我爸爸十几年，任劳

任怨，忠心耿耿，不会说假话”。真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就重复摘出前面李文普的文章：

后来是 8 3 4 1 部队卢医生给我包扎的……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这是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自己“枪走火”。

前面刚说“林立果向我开枪”，后面就说“自己枪走火”。好一个老实人，这简直是现炒现卖的说谎。李叔叔这“老实人”，“大老粗”脑子反应真是快，“不用教”都说谎如此及时，如果在一些压力下，说谎不更自然了？而且有更充裕的时间润饰。

以上这些疑问如果仅是单个，孤立出现，我们或许还可以用“偶然性”来解释。但是同时出现还“偶然”吗？李文普作伪证是不是昭然若揭！

请大家注意：李文普是 9 1 3 事件的关键性证人，如果关键性证人在关键性证词上说了谎话，那么对本案将造成什么影响？读者可以自己想象。笔者在这里作一小结：林彪在出走的汽车上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话。这是李文普被迫作的伪证。林彪有南下广州（香港）的打算，但不同意叛逃苏联（虽然林立果与他讨论过这种情况）。而林立果的计划中首选去广州，去不成就



叛逃苏联（这小毛孩子心里是没有多少民族大义的，只要能活，去哪都无所谓——

请读者一定将林彪、林立果分开看待。如果想当然地认为父子一定一致，那么林彪

事件永远会是一锅粥）。

七、笔者现在可以想象着勾勒一下 9 月 1 2 日夜林彪出走的梗概：

林彪决定去广州（不是叛逃苏联）

一）登上汽车去机场（这里不存在林彪被绑架的问题，因为一方面，去广州是林彪

本来就考虑过的一种选择，不需要被强迫。另一方面，如果林彪被绑架，那么上车

之前那么多工作人员、警卫战士。他完全可以呼喊和反抗。但他都没做。他的人也

是清醒的，这没问题。所以不存在绑架的可能。林立衡总坚持“绑架说”，虽然父

女情深，急于替父洗冤的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她的说法是错误的。这无助于替父洗

冤）

一）林彪在车上并没有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的话。由于李

文普是了解不少政治内情以及林、毛不和内幕的（比如：9 月 1 2 日下午林立衡就

对李文普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

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引自李文普的文章）。所以当看到路上 8 3 4 1 部队拦截林彪座车。他应该已经完全判明了时局，知道自己该站在什么

立

场上，所以他下车逃走了。（也就是说：李文普的逃走，并不是由于林彪说了那

句

话引起的，是由于李文普本身精明地判断出了时局造成的）

一）林彪一行上了飞机后，起初目标仍然是广州，然而经过一小段飞行后，由于

某

种原因发现广州已经去不成了（为什么如此？笔者推测可能是：潘景寅告知林立

果

：由于没来得及在山海关机场加油，机上的十二吨油飞不到广州）。于是守在驾

驶

舱里的林立果按照另一套方案命令潘景寅飞向苏联。此时的林彪应该坐在飞机机

舱

中，对驾驶舱中的这一变故还不知情。

一）飞机进入蒙古，并一直向苏联飞去。当飞机飞临苏联、蒙古边界时，林彪终

于

被告知这是在飞向背叛民族与祖国的路上，于是强令飞机返回。于是就出现了那

一

幕“飞机飞到了苏联和蒙古的边境却不再跨前一步，而是扭头向返回中国的方向

飞

来”的怪事。

总之，假如笔者这些分析符合实际的话，则如果说林彪在 9 月 13 日这一天的

行为犯了什么罪的话，肯定不是“叛国罪”、“汉奸罪”。

以上这几段是笔者对“256 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的这

一奇怪现象的原因的主观分析，读者诸君自可以有自己的不同分析、观点。

笔者最近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的新发现，这将引发我们得出判断“可能是苏蒙

方

面击落了 2 5 6 飞机”：

我方在谈到 2 5 6 飞机在外蒙古境内坠机原因时，现在都是认为 2 5 6 飞机由  
于燃料不足，又没有领航员等，所以在温都尔汗强行迫降。我方调查组用大量证据  
说明飞机不是导弹打下的，是着陆过程中发生的事故。比如当年我国驻蒙古大使许  
文益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就有这样的观点：“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  
地后爆炸起火”；“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见《世界知识》1 9 8 8  
年 1，2 期，转引自《林彪家族纪事》P 1 9 — 2 1，光明日报出版社）。空军司  
令员王海当年直接组织了这个调查，他在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  
机坠毁原因》中也是此观点。

然而我方似乎没有注意到以下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2 5 6 飞机在着陆前  
就发生了爆炸，并已经起火——读者诸君，你们似乎没听说过这个细节吧。

我们先来看一下王兆军书中的叙述：

一位在当地莹石矿（指贝尔赫莹石矿——笔者注）上工作的蒙古目击者说：  
“  
那天晚上两点半左右，飞机的哀鸣声把他吸引出来。他看见飞机降落时尾巴着火。  
坠落地点离他只有九英里，他看见了全部过程。”

以上是王兆军书中的介绍。这还是引用汉纳姆的报导。如果有人认为这仅是  
一  
家之言，还可能是恶意伪造，不足凭信的话，那么我可以再举出两个我刚刚在不  
经  
意间偶然发现的，在我国正式刊物上刊登的重要证据。

以下是本人收藏的《环球时报》（这是人民日报下属的目前很流行的报纸）  
发  
表于 1 9 9 7 年 1 1 月 2 3 日第一版的报导《今日温都尔汗》。署名“本报驻蒙  
古  
特派记者敖其尔”：

……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是拉哈玛大娘，大娘原来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 3  
公  
里……拉哈玛大娘回忆说，1 9 7 1 年 9 月 1 3 日凌晨 2 时，一阵“嗡嗡”的声  
音  
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  
牛  
羊惊散，马嘶狗叫。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  
相  
当低。

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一圈后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  
声  
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 2 0 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听到大的爆炸声，  
现  
场大火连天……

关于这个证据，有一点值得提一下。笔者刚刚看到在孙一先的书 P 3 5 9 —

3

60 也提到了拉哈玛大娘的回忆。但孙书说：“至于拉哈玛大娘说空中飞来冒着大火  
火的飞机，据空军专家分析，她可能把机上耀眼的着陆灯错当成大火”。笔者当然  
不同意“专家”的高论。

拉哈玛大娘当时就住在离飞机坠毁地点近 3 公里处，在夜晚 2 点没有灯光的空  
旷大草原上，距离短短的 3000 米难道还分不清着陆灯和大火的区别？况且紧接  
而来的“现场大火连天”应该很容易对比什么是灯光，什么是火光。飞机在空中盘  
旋时的火光和坠地后的连天的“大火”难道不是轻易可以对比？拉哈玛当年也就  
4  
0 岁左右，她观察飞机盘旋达 20 分钟以上，在如此近距离难道还会判断错？

如果这么明显的例子还不能说服我们的“专家”，那么再请看下一个证据，  
又  
将如何解释？

这是沈阳军区的李人毅写的《平型关大捷》P 580（春风文艺出版社 19  
9  
6）：

这位商人（指鄂经理——笔者注）同时还找到了 913 事件的目击者——一位  
仓库保管员。保管员告诉他，那天夜里他正在外面巡视，突然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

声之后，看到一架正在燃着熊熊烈火的飞机从天上掉下来。

文中的邬经理是海拉尔的一个农垦公司的经理。他 1993 年到蒙古把 256 飞机的一个发动机买回了国内。这是李人毅引自《北京晚报》大概是 93—94 年的报导，原报导记者是纪从周。

对同一件事的另一个版本的报导是发表在解放军报 1998 年 7 月 24 日上的由康松乔、邢邦明、阿勇采写的《林彪出逃座机残骸收藏始末》，文中有类似的证据：

在温都尔汗时，邬经理还找到了当年的一位目击者，这位年迈的目击者简略地回顾 1971 年 9 月 13 日他正在值班，忽然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他出去一看，一架起飞（可能是“火”吧？——笔者注）的飞机正往下掉。后来听说上面的人全死了，其中有个中国大官。还有一个现象可以作为 256 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火旁证：256 飞机着陆时，由于草原土地松软，所以不能使用起落架着陆（那样的话起落架会插入土中，引起飞机翻滚。参见孙一先书 P 247），只能用机腹擦着地皮降落。由于 256 飞机的主油箱就在机腹处，这样的动作是很容易引起油箱爆炸的。所以“按照航空规程，飞机迫降时如要擦肚皮落地，必须在空中把油

耗尽，避免着陆时起火爆炸”（孙一先书 P 265）。而实际上飞机在迫降的时刻还有约 2.5 吨油，还可以至少飞 20 分钟（孙一先书 P 277）。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驾驶员没等飞机盘旋将油耗尽就迫降了。而这个举动后来也确实引起机腹处的主油箱爆炸和一片大火。我们不禁要问：潘景寅是最优秀的驾驶员，他不可能忘掉这一规程。而别的紧急迫降规程如：摘掉手表，脱掉鞋袜，这些细小的迫降规程机上乘员都做得很完满，为什么唯独耗尽机腹主油箱中的油料这一更重要的，决定生死的步骤却不作？

笔者认为道理很简单：正是因为飞机此前已经中弹爆炸起火，所以已经等不及再在空中飞 20 分钟耗尽油料了。只能在大火中，带着 2.5 吨油料强行迫降。

这就帮助旁证了笔者认为的“256 飞机着陆前就已爆炸起火”的观点。

从上述引文和旁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256 飞机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而且是由爆炸引起。

256 飞机是先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然后在带着大火的情况下迫降的。这和前面许大使及调查组的判断：“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可以肯定，该机不是空中爆炸”差的太远了——在空中真是又爆炸又起火！

海外与国内的不同角度的报导应该能充份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2 5 6 飞机在着陆前就已经起火”，而且此前发生了爆炸。这自然引发一个问题：这着陆前的爆炸起火是怎么来的？

当然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我军导弹打的。但我方以大量分析否认了这一点。到底怎么回事？

笔者在此不妨提出推测：并不是我军发射了导弹，而可能是苏蒙方面发射了导弹将 2 5 6 飞机击中，引起爆炸并着火。下面分析一下：

大家都知道，林彪飞机临出境前，周恩来曾请示毛主席是否击落它。毛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想来周恩来与林彪并无旧仇，即使文革中关系也不错，周没有必要致林彪于死地。况且毛主席都发话了，周恩来绝不可能（也不敢）公开对抗毛的指示。他若动用导弹打 2 5 6 飞机，绝不可能瞒得过毛。（笔者非常不同意王兆军认为的“林彪事件中，是周恩来想主动致林彪于死地”的观点）。

而从现象分析来看，恐怕真如我方所说，我方“并未发射导弹”。

因为：

1、2 5 6 飞机在飞出国境之前，在我国境内上空曾经犹犹豫豫徘徊很长时间（0



：3 2 起飞，1：5 0 出境。在国内绕了 1 个多小时。孙一先书 P 1 6 9 )，只要我方决心将它打下，作为一架民航飞机，它几乎不可能逃过导弹和歼击机的打击——可见我方是有意放走它的。

2、如果认为在 2 5 6 飞机出境前，我军就用导弹将其击中受伤。则恐怕 2 5 6 飞机不可能再在外蒙古境内飞那么长时间——这也很难解释蒙古保管员在温都尔汗听到空中 2 5 6 飞机的爆炸声。

3、如果认为是在 2 5 6 飞机返回中国途中，我方发射导弹，在温都尔汗附近将其击中（王兆军就是此种观点）。则由于温都尔汗距离我国边界至少 3 5 0 公里，恐怕中国防空导弹，大炮都没那么大射程，根本不可能击中它。

既然我方并未发射导弹，而 2 5 6 飞机在没有遭到外界攻击的情况下，在空中，由于自身故障造成爆炸起火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哪有那么巧的事，一叛逃就自爆？）。这样就只可能是苏蒙方面将其击中，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

其实，我们可以从苏联和蒙古的角度审视一下这种推测的可能性：

当 2 5 6 飞机越境进入蒙古领空后，苏蒙方面全程监视它，也能判断出它是民航客机。但开始时苏蒙方面也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或者故意以民

航

飞机身份刺探苏蒙防空系统雷达（类似八十年代大韩航空客机事件）？此时苏蒙方

面还不会下命令击毁它，因为在情况还没判明时，就立刻将越境中国飞机打下。

苏

联岂不是一切中国叛逃的飞机都不要，一切中国迷航的民航飞机都打掉，未免太绝

了吧？苏蒙方面此时只能进行密切监视，看它后面的举动。

在 2 5 6 飞机飞到苏蒙边境转向之前的这一段路程中，苏蒙方面是无法具体判

断 2 5 6 飞机的目的的。只能让它继续飞，进行观察。而当 2 5 6 飞机在蒙古境内

几乎横穿了一遍，却又突然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返回，直接向中国方向目的明确地

返回，并到达温都尔汗附近时，它返回中国的趋势已经明显。苏蒙方面很可能做出

判断认为：既然目的明确地返回中国，这就不是叛逃，也不是迷航，而在当时中苏

关系极度紧张的情况下，这很可能是中方利用民航飞机刺探苏蒙防空雷达，现在目

的达到了就想溜回中国。于是下令将其击落。其实苏联当时的心态和决策完全可以

对比八十年代苏联在库页岛附近击落南朝鲜大韩航空客机时的情形（美军通过此行

动也确实了解了很多诸如苏军防空雷达频率等情报）——而且以当时中苏关系高度

紧张的态势，苏蒙方面的击落决策更具可能性。

补充说明一点：从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256 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寻找机场迫降”的观点提供了又一个旁证。因为，如果 256 飞机返回时显示出徘徊、寻觅、找机场迫降的样子，则苏蒙方面也就判断不清：它是迷航？还是来叛逃？则恐怕苏蒙方面当时还下不了决心将它击落。而恐怕正是由于 256 飞机返回得坚决，且返回了不短的距离，从航迹和飞行趋势上分析，也足以使得苏蒙方面认为它是想飞回中国——而不像是找机场迫降——所以苏蒙方面才下决心将它击落。——从这里也为前面我们认为的“256 飞机返转不是由于缺油在寻找机场”的观点提供了旁证。

苏蒙方面几十年来对这件事进行保密，恐怕是有意不让我方了解苏蒙方面的防空效率，我方在这件事上恐怕真的是不了解情况。

现在如果认为 256 飞机遭到了苏蒙方面导弹的袭击，那么读者还会提出一个问题，这就是：这个结论与我方从技术上分析认为不可能是导弹击落的证据无法协调起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面笔者将给出分析：

首先，我们还是有理怀疑我方调查组的证据本身是否准确。比如前面许大

使  
引用的调查组认为“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的结论，  
在  
蒙古方面众多目击者的证词下，就显然是错误的结论。我们当然也有理由怀疑调查  
查  
组别的结论是否可靠。特别是我方专业技术调查组无法亲临蒙古观察，只能靠我  
国  
驻蒙古大使馆人员孙一先拍摄的相片进行研究（这是空军司令王海的回忆《我负责  
责  
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讲的），难免有不准之处。

其次，我们再从纯技术角度分析一下，反驳一下调查组的部份结论：

我们先看一下调查组的结论，当时由王海牵头组织了一个专家班子，承担调查  
查  
任务。以下选自王海的文章《我的战斗生涯·我负责调查林彪座机坠毁原因》：

……该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我们在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失事现场，  
有一道相当长且清晰的轨迹，这显然是飞机在地面高速滑行时留下的；飞机的残  
骸  
散布呈带状，比较集中，根据测算，如果飞机在空中爆炸，残骸碎片抛落地面，  
其  
散布面会很广，甚至可以抛落到十几公里乃至几十公里的范围内；机上人员的尸  
体  
也散布在一小片面积内，而且形状清晰可辨，如果从高空坠落，不可能呈现此种  
状  
态；另外，飞机若是在空中起火，机上燃料很快会在空中散掉，不会像我们在照  
片  
上看到的那样形成地面大面积燃烧的痕迹。其二，飞机被击落的可能性可以排除。

除上述根据外，大量证据显示，飞机落地时是完整的，机身上引起种种猜测的大洞，是飞机上油箱里的油同时向外燃烧爆炸时形成的。

.....

王海想说的无非两点：1.飞机“不是在空中爆炸的”及其理由。2.飞机不是“空中起火”及其理由。以下笔者进行反驳：

1、以前的分析者总是认为“飞机空中爆炸”，就必然意味着是在空中炸个粉碎——所以就不可能在地面留下着陆滑痕；飞机残骸就不可能集中分布；尸体散布也不可能集中，就不可能是人为操纵的迫降……。其实凭什么一定这样？飞机中导弹后凭什么一定在空中炸个粉碎？为什么就不能是飞机部份受伤受损呢——为什么不考虑这种情况？

2 5 6 飞机在空中机翼中导弹后，完全可能只是部份被炸坏，也就是飞机受伤了——并未被炸得粉碎。所以它还能勉强飞行一段。我想 2 5 6 飞机就是这样。2 5 6 飞机机翼中弹后，引起大火，不过并未“粉碎”，只是不能远飞了，只能带火迫降，并在着陆过程中也不顺利，又发生了新事故——这着陆过程中的新事故的情况倒可能与调查组的分析相似了。

所以假如按照笔者的做出的结论也仍然可以满足王海举出的失事现场情况：  
地  
面有轨迹；飞机残骸集中；尸体散布集中；“飞机接地时是完整的”。

2、“飞机在空中起火”，可能仅是弹片击中位于右侧机翼部位的油箱引起。而 2  
5 6 飞机在机腹也有油箱（这是主油箱）。所以也可以保证：机翼中弹，所以机  
翼  
油箱爆炸起火。迫降时，用机腹着陆，由于此前已没时间进行盘旋耗尽燃油，所  
以  
机腹油箱破裂，燃油导致“地面大面积燃烧”。

这样一分析，王海在上文指出的失事现场的几个问题，笔者的说法也能解释  
得  
通。2 5 6 飞机中弹在空中爆炸（只炸坏一部份）失火，并进行着陆失败是完全  
可  
能的。王海的分析不能否认“导弹击中说”。

另外，还有一个飞机机翼上著名的大洞问题。

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在《黄沙作证》一文中写道：“……右机翼的内展部  
份  
，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 4 0 厘米的大洞”。又写道：“飞  
机右翼根部那个直径约 4 0 厘米的大洞，曾令人怀疑是防空导弹击中的。但机翼  
的  
顶面并未穿透，而且洞孔形状不规则，边缘是向外翻的，说明它是从内部爆炸冲  
击  
形成的”。（《林彪家族纪事》P 8—2 1）

正是由于大洞处的铝刺是“向外翻的”，所以他认为大洞“是从内部爆炸冲击形成的”。是着陆时油箱爆炸引起的，这一证据想必不少读者都听说过。

但是这“外翻”的证据本身就并不一定可靠。

我国驻蒙武官孙一先对大洞的铝刺的情形描述就不同。他在自己的书 P 1 9 5 中描述道：“……我登上去仔细观察，洞在翼根处中央，直径 4 0 厘米。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

可见对同一个洞的铝刺方向的描述，许文益说“外翻”——并把它作为不是弹击中的重要证据。孙一先说：“有的朝里，有的朝外”。我们到底听谁的？

在肖思科参与编写的《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 2 0 0 0 年）一书 P 5 0 、 5 4 中，他显然采用了孙一先的说法。既然林彪问题研究专家采用了此说法，笔者也采用之。即大洞“周围不规则的铝刺尖，有的朝里，有的朝外”。

在孙一先书 P 2 6 0 中有一段李耀文的相关分析：

2 5 6 号右翼根部的洞是油箱着火向下冲炸开的，所以翼面没有穿透，洞口铝刺也不规则。如果是导弹打的，不可能不穿透机翼，而铝刺也都应该通通向里翻。

笔者不同意这段分析！一般来说，机翼内部油箱爆炸，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外翻”的可能性大；若是外部导弹击中，则大洞的铝刺全部“内翻”的可能性大。现在的情况是：铝刺不规则，“有的朝里，有的朝外”，则既有可能内部油箱爆炸，也有可能导弹所致。所以单凭铝刺的状态凭什么肯定不可能是导弹击中？另外，导弹击中机翼也不一定非要穿透机翼的顶面。

对于大洞问题笔者总的观点是：不能排除大洞就是导弹击中造成的。但是，也有可能弹着点在别处，只不过未发现。因为一方面调查组全靠照片进行研究难以精确，另一方面，一些部件已被苏联人拆走，现场已被破坏。

可以这么说：从纯技术的角度，整个调查组就没有认真考虑“256飞机仅只是被导弹击伤，而不是立刻被击落或击碎”这种情况，即使在调查报告中提了一句这种情况，却根本未展开分析，否定这种可能性——而是与分析别的情况混在一起，悄悄滑了过去。（也可参见孙一先书P276—278）。

孙一先书P279中还有如下的说法：

913过后，来自蒙军和驻蒙苏军的一些内部情况表明，他们在纵深没有发现这架中国飞机，因此不可能发射地空导弹，或者起飞战斗机拦截。



苏蒙空军真是如此水平低下？连一架民航飞机的闯入也监视不了？其实，我们只要看一下前面提到的日本刊物 2 0 0 0 年采访前蒙古副外长云登的那篇报导中的话：“当时的说法好像是蒙古完全不知情，其实是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以及汉纳姆采访克格勃的话。就知道：苏蒙方面当时就完全了解 2 5 6 飞机的航迹。苏蒙方面只不过当时佯装防空效率低下，骗中国而已。我们怎能今天还上这个当？

所以笔者认为我方调查组从纯技术角度否定“导弹击中说”的证据靠不住。我们现在甚至可以推测一下是谁打下了 2 5 6 飞机：

请看《林彪元帅叛逃事件最新报告》P 5 1（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 2 0 0 0 年）：在伊白（即孙一先——笔者注）随许大使从乌兰巴托乘飞机赶往温都尔汗时，曾在飞机上看见离现场不远有一个某国空军基地，驻有一个师的航空兵。

笔者推测可能就是这个苏军航空师的导弹将 2 5 6 飞机击落。而笔者研究了前面提到的日本刊物采访蒙古副外长云登的那篇报导（本文中并未引用全），笔者认为：恐怕不是蒙古军队发射的导弹。

这样我们就可以补充前面的“9 月 1 2 日夜林彪出走梗概”：

一〉 2 5 6 飞机从苏蒙边境调转机头，向中国返回  
一〉 向中国方向飞行一段距离后，到达温都尔汗附近  
一〉 苏蒙方面在跟踪了 2 5 6 飞机的航迹后认为：此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  
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刺探完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想逃回中国。于是下令向其开火  
一〉 2 5 6 飞机机翼中弹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飞机仍能飞行一段，只好盘旋寻  
找迫降地点，并带着大火进行迫降。由于火太大，2 5 6 飞机已经没有时间进行盘  
旋以耗尽机腹主油箱的燃油了。所以只能带着 2.5 吨油用机腹着陆。飞机着陆时  
动作有误并且机腹油箱破裂引发大火，大爆炸，导致机毁人亡。

笔者在以上较多运用分析推理的方法探讨了 1 9 7 1 年 9 月 1 3 日林彪出走事  
件。现在笔者发现其实还有另一条道路也可以有力地帮助我们揭开 9 1 3 之谜，那  
就是 2 5 6 飞机上的黑匣子。

2 5 6 飞机上有无黑匣子？很多人认为没有（比如张聂尔书中 P 2 9 3 即这样说）。现在看肯定有黑匣子。

前面提到的我国驻蒙古武官孙一先的书《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有这样的话：

据我国民航专家讲，三叉戟飞机从“1 E 型”开始，已装有 7 0 年代稀有的黑

匣子。它由两部份组成，一部份是飞行数据记录仪，另一部份录制机上相互通话和同地面的通话，名称是“驾驶员座舱语音记录器”，飞机一起飞他们就自动开始工作，……似乎可做出这样的判断：三叉戟 2 5 6 号的黑匣子，连同中间的发动机，都被苏联人拆走了。

——孙书 P 1 9 0

以下是孙一先引用彼得·汉纳姆的采访：

最后，他（指彼得·汉纳姆——笔者注）问了一下这架飞机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孙书 P 3 3 4

显然，2 5 6 飞机中有黑匣子。虽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但驾驶舱中的其他人员的对话应该有吧？对揭开林彪登机以后的迷雾一定大有帮助。我们希望俄罗斯归还原本就属于中国的黑匣子。

最后对全文总结一下。综合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四条新的核心质疑：

一、林彪在去机场的汽车上到底说没说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关键性的话？

二、林彪一行为什么没有按原计划飞往广州(香港)？是不是因为机上燃油不足？

三、关于“256 飞机从苏联，蒙古边境掉头飞回中国方向”：

1. 这是否是事实？

2. 如果是事实，飞机为何不一直飞向苏联？为何又掉头返回中国？飞机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四、关于“256 飞机着陆前曾发生爆炸并起火”：

1. 这是否是事实？

2. 如果是事实，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是被苏蒙方面导弹击中？

~~~~~  
~~~

【史海钩沉】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澳洲记者澄清林彪之死真相

• 孙一先 •

近一两年，国内兴起一阵关于林彪出逃、坠机原因和飞机残骸的报导热。究其原因，可能是“九一三”事件虽经历史判定，但还存在一些未解之谜。众多作者尤其是那些当年曾身历其境的人们，从各自角度描述亲历的过程，寻找最后的答案。本文作者系当年“九一三”事件期间我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官员。

西方世界的新闻媒体，对新中国一直存在着固执的偏见，他们散布大量怀疑

论

调，不相信我国作者揭露的历史真相。

林彪究竟是怎么死的，死在北京还是蒙古的草原上？对于最后澄清这个历史真相做出贡献的，是澳大利亚一位年轻记者彼德·汉纳姆。

在北京出版的《作家文摘》第 80 期 1994 年 7 月 8 日摘登了李安定写的《林彪之死真相查访记》，详细报导了彼德·汉纳姆的整个采访活动。该文称从 1993 年 5 月开始，彼德·汉纳姆用了半年的时间，锲而不舍地奔走于蒙古、俄罗斯、美国及台湾、香港地区，往返数万公里，写出了第一手调查材料，发表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上。此事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许多国家的报刊对他的文章予以转载和评述。

汉纳姆起初是自己出钱进行这次采访旅行的。首先他来到改变了社会制度走向自由化的蒙古，自己雇车到达林彪座机坠毁现场。原来保护现场的铁丝网已被拆除，附近居民哄抢了飞机残骸，一些较大的部件，由贝尔赫矿区派人运走，卖给了中国商人。汉纳姆在现场只拣到 1 2 块飞机残片。现场附近的居民向他讲述了所见飞机坠地燃烧及尸体情况，但许多人不知道林彪是谁，更无法证实林彪在这架飞机上。

汉纳姆找到了当年参与苏联专家检验遇难者尸体工作的蒙古病理专家莫尤按：

此人是中国大使及其随员视察坠机现场时，蒙方随行的卫生组法医。这个人向他描述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情节：

1971年9月13日，中国喷气飞机坠毁的当天，苏联人就赶到现场。这批苏联人是由军人和航空专家组成的调查组，他们负责了解飞机坠毁的原因，但他们对九具尸体不屑一顾，而对这架英国制造的三叉戟飞机更感兴趣，把三台罗尔斯罗伊斯公司制造的斯佩式发动机中尚完好的一台拆运回苏联。

苏联当局根据其驻华使馆的情报，认为应该对这架飞机上乘坐的究竟是什么人弄清楚，于是在飞机坠毁五周之后（按：后来俄罗斯报纸又称为9月下旬），派克格勃的调查组来到坠机现场。他们把墓地的棺材全部挖了出来，逐个检验因天寒地冻而未完全腐烂的尸体，在蒙古专家的帮助下，首先肯定了尸体的所有伤痕都是因飞机坠毁造成的，排除了乘客是在坠机前死亡的可能性，但烧焦的尸体已面目全非，比照资料难以判定。于是，他们割下了那个女人和那个岁数最大的男人的头颅，放在大锅里架起柴火煮，目的是将毛发、皮肉剥离干净。最后，苏联人把两个煮

乾淨的头颅装箱带回苏联。

汉纳姆听了蒙古专家的讲述以后，认为揭开谜底必须到莫斯科去。但是，到那里找谁呢？他在乌兰巴托苦苦追索中，得到一张当时苏联调查组人员和蒙古官员聚餐的照片，有人向他指出其中一位是来自莫斯科第三医院的托米林——调查组的主要病理学家。

汉纳姆用自己的稿费买了机票，想到莫斯科来个顺藤摸瓜，弄清真相。但在一个国际大都市中，凭一张照片、一个名字来寻找一个人，实如大海捞针。当他得知莫斯科第三医院已经撤销的时候，没有死心，拿着照片几乎找遍了莫斯科的大小病理实验室，终于有人认出了托米林，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

托米林友好地接待了汉纳姆，但他拒绝回答有关问题，强调他同克格勃有协议，不得泄露调查结果，尽管克格勃不存在了，仍然要经过克格勃的后继机构的批准，他才能把秘密公开。

汉纳姆费了很大周折，弄清了取代克格勃的新机构，递去了采访申请。当时正值盛夏，俄国官员许多都到郊外度假去了，汉纳姆一趟趟跑，也找不到要找的人。签证眼看到期，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幸好，《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杂志知道了他

的采访计划，愿意给予部份资助。于是，他利用等待莫斯科官方批准的时间，到美国去从另一个角度进行调查。

在美国，汉纳姆访问了外交界、情报界、新闻界许多人士，收获甚微。一个华人餐馆的老板介绍并安排他同在纽约的张宁见了面。张宁向汉纳姆诉说了自己的遭遇，讲了叶群、林立果和林彪出逃的情况，她肯定林彪乘上“三叉戟 2 5 6 号”飞机飞走。

汉纳姆重返莫斯科，惊喜地获悉托米林得到批准向他讲明当年的事实真相。

1

1993年10月，托米林在他的办公室会见了汉纳姆，在座的还有当年飞机坠毁事件调查组的负责人、原克格勃的将军扎格沃兹丁。“林彪和他的夫人叶群在这架飞机上，他们是因为这架飞机坠毁而丧生。”扎格沃兹丁断然地说。“你们如何证实这个结论呢？”汉纳姆问。托米林拿出一包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和资料，其中有一张从正面和左右侧面三个角度拍摄的头骨照片。托米林指着照片说“这正是林彪的头骨”，并解释说林彪的头部在战争中受过伤，其位置正好与头骨伤痕相吻合，而且苏联保有林彪1938年~1941年在莫斯科治病的详细病历，有关林彪牙科记录也与实际情况丝毫不差。



扎格沃兹丁补充说：“我们另一个鉴定方法，是用头骨对照了林彪生前的照片。克格勃的资料里有一张俯拍的免冠照片，清楚显示了林彪头的伤痕。我们还把头骨照片和林彪过去的一些照片叠放，看到两者的轮廓完全重合。”

托米林还说，人们的耳廓如同指纹，一个人一个样，没有重复的，因而是鉴定身份的重要依据。当年从现场割下了那具女尸的一只耳朵，与叶群的有关资料对照，得出了相应的结论。

为了使鉴定头骨和耳廓的结论万无一失，克格勃的这个调查组，根据林彪病历中患过肺结核的记载，重返蒙古检验尸体。托米林记得那天正好是 11 月 7 日十月革命节，北风怒号，天寒地冻，他们挖出了林彪尸体，在其右肺确实发现钙化的硬块，与病历中的 X 光片一致。

托米林回忆说：“当时已是 11 月，天气寒冷，我们每过 5 分钟就得把手伸进温水中暖一暖。结核病灶很快便找到了。临走时，我又收集了那两具尸体的几块骨骼和所有牙齿。回国后，我对那几块骨骼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死者的身高和年龄同林彪及其妻子叶群的身高和年龄完全相符。”托米林怕万一有失，决定用拉特涅基氏液由酒精、醋酸和漂白物质组成的混合物，可以大体恢复半腐败器官的形

状

和大小，甚至恢复肌肉弹性来检验在飞机失事现场割下的林彪和叶群的耳朵。实验

结果再次证实了前面的结论。最后，在向安德罗波夫汇报鉴定结果之前，托米林找

到了能根据人的头骨构造恢复其面貌的专家，复制出林彪的头像，结果同照片分毫

不差。

调查组的工作，使苏联最高领导非常满意，他们得到了嘉奖和晋升，扎格沃兹

丁擢升为将军，托米林则获得领导国防部所有病理实验室的特权。

扎格沃兹丁对汉纳姆说：“22年来，全世界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事件的结果——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当时的克格勃主席、托米林和我。今天，我们把这个调查结果透露给你。”

汉纳姆当然心满意足，他半年来艰苦的奔波采访，终于找到了一个历史悬案的谜底。最后他问了一下这架飞机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

汉纳姆的采访报导，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披露之后，许多国家的报刊予以登载，其影响相当广泛，使得在海外出版的某书所散布“林彪是在北京被毛泽东

搞掉的，没有在那架坠毁的飞机上”的谣言及其造谣者，消弭得无声无息。

□ 摘自《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0年11月出版

阎明复《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

《炎黄春秋》2009年第10期

今年7月，前苏联资深外交官、汉学家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中文名“顾大寿”）托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同志给我带来他新近出版的回忆录《我的

中国生涯》（俄文版）。

顾大寿是我的老朋友。他从上世纪50年代初由苏联铁道部派遣来华，在长春铁路局任翻译，以后又由苏联外交部派遣到驻华使馆工作，历任苏联驻天津总领事馆秘书长、苏联驻华大使馆首席翻译、一秘、政治参赞、党委书记等要职，在华工作长达12年，曾亲历新中国建国初期至“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建设、政治运动以及中苏关系演变的历史风云。

1957年夏天，毛泽东主席在杭州会见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特使、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我和古达舍夫分别作为中方和苏方的翻译出席了那次当时尚未对外公开的会晤。在那次会晤中，毛泽东主席很欣赏这位通晓中文的年青的

苏联人，特意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顾大寿”。我与顾大寿从那时相识后，又多次

在中苏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会谈或外交会晤中相遇，并且相交至深。

顾大寿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难忘的中国生涯，对某些历史事件和政治风波作了

客观真实的描述，并首次披露了前苏联和中国高层领导人中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政治

内幕和名人轶事。其中有一段详细记述了1971年“9·13事件”后苏联驻华

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去实地查看现场的经过。顾大寿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71年，政治气候发生变化。传说中共内部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斗争。几年前，

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毛泽东免去了一切职务，最后死在开封市的一所牢房里。邓

小平和中共其他的高层领导人被放逐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同时，国防部长林彪成为

中国领导层的第二号人物。毛泽东挑选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一点写在中共党章

中。可是，林彪不只一次地向毛泽东建议恢复中国国家主席的职位，对此，领袖的

反应极其否定。

“此时，毛泽东已失去了对林彪的信任。不仅如此，毛泽东已经考虑，如何结

束‘文化革命’。因此，他秘密地离开北京去了南方，以便实地了解情况，在同各

军区领导人吹风时，他强调加强党和军队的统一的必要性，林彪和他的拥护者，包

括当时担任高官的林彪的夫人叶群，他的儿子林立果，力图篡权并分裂中央。

“1971年9月13日，林彪、他的拥护者在篡夺国家权力的阴谋暴露后，企

图逃

跑。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军用飞机急匆匆地从北戴河机场起飞，但是，他们在

飞越中国国境，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были сбиты）。这就是所

谓的‘9·13事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蒙古国的外交部立即给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发出照会并表示抗议。又通过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将这件事

情通知给了苏联方面。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些情报后，委托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弄清楚

所发生的情况。托尔斯基科夫大使派我和使馆两位年轻的工作者去蒙古，实地了解

所有的情况。我问大使，为什么派我去调查这件事情？开始大使说，因为我是参赞

，这件事是属于我的职责范围。后来告诉我，苏联外交部得到林彪出逃的信息，因

为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较长，而且认识林彪本人，我可以在死者中确定有没有林彪

的尸体。为了不引起中国的不满，我们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去蒙古国。我喜

欢乘坐火车，因为从车厢的窗子可以看到许多景色，比坐飞机安全多了。而从飞机的

窗子里只能看见天空。列车先经中国的内蒙古，然后进入蒙古国的领土，在约定的

地方下了火车。迎接我们的是苏联武官巴兰诺夫将军。他把我们送抵温都尔汗，林

彪的飞机就是在那儿坠落的。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把飞机的

残

骸和死者的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边去了。

后

来，为了辨认死者，他们又把大坑挖了开来。

“温都尔汗地区干燥炎热，死者的残骸埋在沙里，所以还没有腐化。我们在飞

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

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至于在飞机坠

毁之前，机舱里面发生过什么事情很难说。但是，可以肯定飞机坠毁不是由于机舱

里的射击所致，因为飞机坠落下来，着起火来，并发生了爆炸。至于那些死者，他

们的遗体已经被烧焦。连一小整块皮肤都没有。脸部损坏得就更厉害，死者的衣服

全都烧毁，他们的样子非常恐怖，以至于多瞧一眼心里都很沉重。死者中有一位

妇女，她可能就是林彪的夫人叶群。至于林彪，哪些残骸是他的，很难辨认。巴兰

诺夫将军给我们看了死者的照片，照片和烧焦的遗体没有什么差别。为了准确地确

定残骸是谁的，当时建议对某处与林彪相似的死者的牙齿进行鉴别。因为林彪当年

曾在伏龙芝学院学习过，后来又随苏联来过，在军队的医院治疗。莫斯科发来电报，

机

的残骸又重新埋起来。苏联驻蒙古大使馆的武官派了专人，把林彪的头颅和部分

飞

机零件运到莫斯科。

完成任务后，我和我的两位同志依旧乘坐莫斯科至北京的火车，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

后来听说，林彪的头颅很快送到莫斯科，苏联有关机构做了牙齿鉴定，很快就得出了结果，证实这些牙齿是属于林彪的。至于说为什么林彪要叛逃以及是什么原因引起了飞机的坠落和爆炸。莫斯科没有给我们任何说明。新华社也没有发表任何材料。

过了一个月，中共中央发了一个内部《通知》，讲述了林彪的叛逃经过，然后

《通知》又作为正式文件在党外、在居民当中进行传达。其中指出，林彪伪装并欺骗了毛泽东，命令自己的儿子林立果成立了一个小‘舰队’，想要实现‘571工程’，策划政变，夺取政权，甚至于想要杀死毛泽东。至于说为什么逃亡国外或叛变，中共中央下达了一个文件，说他企图出卖祖国，并在准备在自己今后的破坏活动中依靠苏联。这加强了人民对自己国家和领袖的热爱，同时也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中国人民被林彪的行为激怒了。

在北京，我不只一次地亲耳听到对林彪反党行为的谴责。

当年林彪曾在苏联学习，并表现出了军事才能。这一点斯大林特别指出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表现出自己是一个能干的军人。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普通的人。林彪不喜欢出头露面，不喜欢讲话。毛

泽

东看中林彪。还在 1955 年授予他元帅军衔。在中国的 10 位元勋中，他是最

轻的。1958 年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统帅三军武装力量。

1959 年，当赫鲁晓夫率领苏联代表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10 周年活动时，在北京机场上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毛泽东、刘少奇、周

恩来、朱德、林彪陪同赫鲁晓夫检阅了仪仗队。当时在中央的领导人当中他排第五

位。‘文化革命’开始后，他接替了刘少奇，成为中国的第二号领导人。当时毛泽

东被称为最高统帅，他被称为副统帅以及毛泽东最可靠的接班人。他如此迅速地高

升引起了普遍的关注。然而，当时在中国没有任何人会想到，林彪会在异国他乡，

在沙漠中如此悲剧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9·13 事件”过去已经近 30 年了，至今似乎还带有一些神秘色彩。这段

来自亲历者的回忆，对当代党史研究应是不可多得资料。

余汝信《林彪座机是被蒙方击落的吗？——对阎明复转述的苏外交官回忆录的质疑》

(2009 年 10 月) (《文革博物馆通讯》第 558 期)

今年第十期《炎黄春秋》，刊载了阎明复《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

》一文，转述了前苏联外交官顾达寿 2008 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生涯》

(



俄文版)中有关“九一三事件”后“苏联驻华使馆派他到温都尔汗去实地查看现场

的经过”。由于阎明复的声望，更由于回忆录声称林彪乘坐的 2 5 6 号飞机是“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以及“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了子弹的弹孔，这说明

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引起了海内外的普遍关注。

阎明复认为，“这段来自亲历者的回忆，对当代党史研究应是不可多得的资料

”。而笔者则认为，顾达寿的多处说法均很有疑问，以至令人怀疑，顾是否真的到

过现场？以下，为笔者对顾所说逐段进行的一些推敲，然否，请识者不吝赐教。

#### 一、顾达寿其人及其信息来源

顾达寿，当时中国官方和新华社公布的姓名全称译法为利萨特·沙拉福吉诺维

奇·顾达寿。不知为什么，曾经长期担任中国官方翻译且应熟知苏方人物译名的阎

明复，要将其另译为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音译古达舍夫亦错，应为库达舍夫），并为其另取了一个“中文名‘顾大寿’”？

按顾达寿自己的说法，1 9 5 1 年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毕业，派赴中长铁路任

翻译，之后调任苏驻华外交机构，前后在中国常驻工作了二十年（期间曾返国工

作），曾任苏驻华使馆首席翻译，多次陪同赫鲁晓夫、柯西金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

会

谈。  
根据中国外交部编印的外交官名册，顾达寿 1 9 5 0 年代中后期为苏驻华使

馆

随员，1 9 6 0 年代为使馆二秘，1 9 7 1 年至 1 9 7 3 年为使馆参赞，1 9 7

年离任。1971年“九一三”前后，苏驻华大使为托尔斯季科夫（同样不知为什么，阎明复要将这一为人熟知的中文译名改为“托尔斯基科夫”），公使衔参赞萨福隆诺夫，与顾达寿同为参赞、任职时间比顾早的有包达宾科、罗加乔夫、伊凡诺夫和邱赫罗夫四人。

笔者之所以要将顾达寿的简历介绍得详尽一些，是为了说明，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尤其是中国有关方面曾经判断，他并没有克格勃的背景），换言之，他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信息渠道。顾达寿并没有披露他的信息来源。根据顾的地位，他要是从官方（无论是苏联官方或是蒙古官方）得到的有关“九一三事件”的一切信息，苏联驻华大使、公使衔参赞以及其他与顾同一级别的参赞、武官同样可以得到。苏联驻蒙古使馆的大使、参赞，驻蒙苏军中高层军官，莫斯科苏联外交部与顾级别不相上下的其他官员，苏联克格勃有关人员，蒙古方面的有关相当级别的官员，亦同样可以知悉256号飞机失事的真正原因。为什么事隔三十八年，苏联早已解体，蒙古早已变色，一切对俄罗斯、蒙古官方已不存在什么保密必要的情况下，这些仅对中国人还算是敏感的信息，只是由当时官阶并不算高、信息来源并不特殊的顾达寿一人以私人回忆录的形式加以披露？而如果这一信息仅是来源于顾自己的推测而非官方渠道，它会有任何史料价值吗？

二、顾称：“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林立果乘坐军用飞

机

急匆匆地从北戴河机场起飞，但是，他们在飞越中国国境（余注：原文如此），

在

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余注：阎文此处有一不可译的俄文单词，疑为转抄错

误）。这就是所谓的‘9·13事件’。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空军在雷达里发现中国一架军用飞机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空，错误地把它当作是侦察机。”

### 1、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力及防空力量

顾以上全句话的语意，明显是指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是蒙古军方雷达所发

现，蒙方将其误判为中国军方侦察机击落。

我们首先要问，当时蒙古的军力特别是防空力量究竟如何？

据孙一先称，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之后，“蒙军扩编已达相当规模

，作战部队有：两个摩托化步兵旅、两个独立团、十一个独立营；防空部队有一个

歼击机团、一个雷达团、一个高炮团、两个防空导弹营。加上一个建筑旅、三个建

筑团，以及军事机关和院校，合计兵力约五万人。”（孙一先：《在大漠那边》，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北京第一版，页91）

孙一先的说法部分准确，部分比实际情况有所夸大。据同一时期的中国官方判

断，蒙军总兵力为三点五万人，与本文有关的防空力量方面，有一个高炮营，一个

火箭营（即孙一先所说的防空导弹营），一个雷达营。同时期蒙军并没有作战飞机

，其航空局仅有三个运输大队，一个通讯大队，人数两千人。

至1970年代中，蒙军在防空力量方面除将雷达营扩充为雷达团外，其余没

有变化（仍然未有作战飞机）。防空兵力部署：高炮营、火箭营配置在首都乌兰巴托周边地区，其他各省并没有防空作战部队部署。雷达团（065部队）团部位于乌兰巴托，该团九个雷达连，一至八连沿中蒙边境纵深布防，一连驻东方省马塔特，二连驻苏赫巴特尔省巴音德勒格尔，三连驻东戈壁省呼布斯格尔，四连驻前杭爱省阿尔拜赫雷，五连驻戈壁阿尔泰省德勒格尔，六连驻南戈壁省朝克图车其，七连驻科布多省阿尔泰，八连驻戈壁阿尔泰省扎呼伊，另九连（直属连）驻首都乌兰巴托。本文假设 1971 年蒙军雷达部队的部署等同于以上部署（按一般规律而言，事实上应弱于以上部署）。

2、蒙军能将 256 号飞机当作是侦察机打下来吗？

256 号飞机 9 月 13 日零时 32 分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经河北迁安、承德，内蒙多伦等地上空进入蒙古（据康庭梓），越过中蒙边界时间为凌晨 1 时 55 分，其飞行航线途经蒙军雷达团一连与二连之间（较接近二连）的苏赫巴特尔省上空，再进入肯特省，2 时 25 分在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东经  $110^{\circ}15'$ ，北纬  $47^{\circ}42'$ ）坠毁。

首先一个问题是，当 256 号飞机低空飞行进入苏赫巴特尔省上空时，一连与二连的对空警戒雷达是否发现了目标？笔者认为，可能性是 50：50。当时，距

中苏边境冲突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中蒙之间并没有军事对峙的态势，此前一个月，中国新任驻蒙古大使已经到任，解决了中国驻蒙古大使长达五年的空缺，标志着中蒙关系已经开始正常化。（《在大漠那边》，页 161）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又是星期天之后的凌晨两点人最困的时候，256号飞机又是避开雷达低空飞行，蒙军的雷达没有发现目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第二个问题是，即使蒙军一连、二连的对空警戒雷达发现了256号飞机，是否会将其误判为中国军方的侦察机？答案是这样的误判机会微乎其微。对于中国来说，这一地区并非对方军事战略要地，并没有什么军事侦察价值，蒙军应很清楚，中国军方从来没有进行过类似的尤其是夜间的侦察行动。而且，中国军方当时的空中侦察手段落后，用作侦察用途的大不了是比三叉戟体量小得多的歼侦6，这一点蒙方应该心知肚明，从雷达图象中就可以判断，这样大型的喷气式飞机，不可能是中国的军用侦察机，中国军方没有这样大型的侦察机。如蒙军雷达真的发现了256号飞机，最大的可能性是感到困惑而不知所措。

第三个问题是，即使蒙军的雷达发现了256号飞机并误判为中方侦察机，蒙军有能力将其击落吗？答案是否定的。蒙军的防空作战力量全部集中于乌兰巴托周边地区，在苏赫巴特尔省、肯特省均无配置高炮或防空导弹，蒙方又无作战飞机，如蒙军发现了256号飞机，充其量只能通报上级雷达团团部以起预警作用，它有什么办法能打下这架飞机？

### 3、256号飞机被驻蒙苏军击落的可能性

那么，256号飞机有没有被驻蒙苏军击落的可能性？因为顾达寿的回忆录没有这样的说法，本文原可不作这一可能性的讨论，但为解部分读者之惑，讨论一下也无妨。

有关驻蒙苏军的空军和防空实力，孙一先称：“驻蒙空军两个歼击轰炸航空兵师、三个直升机团和一个运输机团，共有飞机三百多架。这些空军部队以团为单位分别部署在新修的乌兰巴托、巴彦、乔依尔和乔巴山等四个大型机场上。另有三个野战机场，供现有飞机转场之用。”“防空部队有二至三个防空导弹旅，三个雷达团。”（《在大漠那边》，页91）

孙一先的说法还是有些夸大。据更权威的中国官方掌握的苏军资料显示，同时期苏军在蒙仅驻有一个歼击机师，两个轰炸机大队，飞机230架，归驻苏联境内赤塔的前线航空兵第23集团军司令部指挥。两个轰炸机大队驻纳莱哈，三个歼击机团分别驻巴彦、乔巴山和苏木布尔，一个运输航空兵团驻苏木布尔。主要装备的机型，轰炸机为伊尔-28，歼击机为米格-17、米格-19和少量米格-21，运输机为米-4、米-6和米-8。驻蒙苏军只有一个雷达团（辖七个连），团部在乌兰巴托以北，雷达连部署于蒙古中部腹地，其中一连位于沙音山达，二连位于苏木布尔，三连位于温都尔汗，四连位于曼德勒戈壁，五连位于乔巴山，六连

位

于纳莱哈，七连位于恩格尔山达。中方所掌握的苏军资料中，未有提及驻蒙苏军有防空导弹旅部署。

驻蒙苏军的整体态势，如孙一先所称：“直到 1973 年我离职返国时为止，驻蒙苏军的军事部署，仍将主力留驻在乔依尔以北，即离中蒙边界三百六十多公里

的二线，和乌兰巴托及其以北接近蒙苏边界的三线。”（《在大漠那边》，页 92）笔者认为，驻蒙苏军处在战略防御的二、三线位置，当时的中苏局势又较缓和，部队并不在 24 小时戒备状态。即使蒙方雷达发现了 256 号飞机（这是一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首先要报告雷达团，团部是否能在凌晨 2 时时分即时通知远在赤塔的驻蒙苏军空军指挥中心，苏方又是否能及时反应，命令部署在巴彦、乔巴山、苏木布尔三地歼击机拦截，是大有疑问的。笔者还认为，即使驻蒙苏军有防空导弹部队，亦应部署在铁路沿线各军事要地及机场周边。以“萨姆—3”地空导弹最大射程 30 公里、“萨姆—2”最大射程 54 公里计，远在苏赫巴特尔省、肯特省上空的 256 号飞机，对它们来说也是鞭长莫及。

三、顾称：“蒙古国的外交部立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馆发出照会并表示抗议。又通过苏联驻中国的大使馆，将这件事情通知给了苏联方面。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些情报后，委托苏联驻华使馆立即弄清楚所发生的情况。”

1、蒙古方面并没有“立即”给中国驻蒙大使馆发出照会，后来也没有。据孙一先称，蒙古方面得知 256 号飞机坠毁后，于 9 月 14 日清晨打电话给中国使

馆

，称蒙古副外长上午 8 时 3 0 分要约见中国大使。许文益大使在蒙外交部停留了

4

5 分钟，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只是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了口头抗

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做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在大漠那边》，页 1 6 4 — 1 6 5）在双方人员视察了飞机失事现场之后，9 月

2

9 日，蒙古广播电台播发了中国飞机在肯特省“由于不明原因坠毁”的消息。消息

发布前，蒙方向许文益大使打了招呼，强调：“这不是我国政府的声明，是发个一

般的报纸消息。”（《在大漠那边》，页 2 7 2）

2、苏联在蒙古驻有大使馆，为什么蒙古方面会避近就远，将这件事通过苏联

驻华使馆而不是驻蒙使馆通知苏联方面？

3、同样，“苏联外交部得到这些情报后”，为什么不是委托就近的苏联驻蒙使馆，而是通知远隔千里的苏联驻华使馆“弄清楚所发生的情况”？

四、顾称：“托尔斯基科夫大使派我和使馆两位年轻的工作者去蒙古，实地了

解所有的情况。我问大使，为什么派我去调查这件事情？……后来告诉我，苏联外

交部得到林彪出逃的信息，因为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较长，而且认识林彪本人，我

可以在死者中确定有没有林彪的尸体。”

1、阎明复称，顾“详细记述了 1 9 7 1 年 ‘9•1 3 事件’ 后苏联驻华使馆

派他到温都尔汗去实地查看现场的经过”，很有些言过其实。顾的俄文版原书仅有



160 页，记载了他二十年的经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详细，以上这段话就很不详

细。托尔斯季科夫究竟是什么时候派顾达寿去蒙古的？苏联外交部是什么时候得到

林彪出逃的信息的？在顾的原书中都没有交待。

2、197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以中发[1971]57号文发出林彪

已出逃的通知，通知范围为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军委

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

9

月28日，决定将通知扩大传达到军队军、师（空军到团），地方传达到地、市委

常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传达到处室负责人。10月24日，扩大传达至“全国

广大工农兵群众”。其间，9月23日，中方向蒙方提出运回死者遗体、交还死者

遗物的要求，蒙方采取拖延答复的态度。孙一先称：“后来得知，此时苏联和蒙古

已揣测到这架失事飞机上有个大人物，但是这个大人物是谁还不能确定。苏联克格

勃已准备派专家挖出死者尸体进行检验。”（《在大漠那边》，页271）

笔者认为，苏、蒙方面揣测到失事飞机上的是林彪，应在10月1日中国破天

荒地不像往年般举行庆祝游行，领导人不上天安门之后。顾如真的有蒙古一行，也

应是10月份的事。

3、顾被派去蒙古一行的原因十分牵强。顾并不是什么痕迹专家，以他自己下

文中的说法，“至于林彪，， 哪些残骸是他的， 很难辨认”。他的任务（如果有的话）并没有完成。

五、顾称：“为了不引起中国的不满， 我们乘坐北京到莫斯科的火车去蒙古国。……在约定的地方下了火车。迎接我们的是苏联武官巴兰诺夫将军。他把我们送抵温都尔汗， 林彪的飞机就是在那儿坠落的。”

1、顾说的以上第一句话就很奇怪， 难道外交官不坐火车坐飞机就会引起驻在国的不满？事实上当时中蒙之间的飞机航班早已停航（《在大漠那边》， 页 2 3 7）， 到蒙古就只能坐火车。

2、“在约定的地方下了火车” 难道也可以说是“详细记述”？ 第 3、 4 次国际特快列车， 每周对开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之间。北京至乌兰巴托、莫斯科方向列车在蒙古边境站扎门乌德作一小时停留后， 蒙古境内的首站即为乌兰巴托， 从北京至乌兰巴托之间行驶约三十个小时， 这些在孙一先的书中都有详细记载而顾则欠奉。

3、对“苏联武官巴兰诺夫将军” 笔者甚有疑问。据中国外交部编印的外交官名册， 同时期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为伊凡诺夫上校， 副武官为瓦尔瓦利奇少校。自 1 9 6 7 年后， 苏驻华武官均为上校军衔。1 9 7 0 年代后期苏驻蒙大使馆武官为赫罗莫夫中校， 以此推测， 1 9 7 1 年苏驻蒙大使馆武官应仅为中校至多上校而非一位将军。

4、“他把我们送抵温都尔汗”，“我们”是些什么人？仅仅就是顾达寿等三人？下了火车后用什么交通工具送抵目的地？要知道从乌兰巴托到温都尔汗飞机飞

行时间都要一个小时！林彪坠机的地点中国人才称“温都尔汗地区”，蒙方称为“

肯特省依德尔莫格县苏布拉嘎盆地”，距离温都尔汗（肯特省的省会）还有两小时

的车程（70公里的沙土公路及草原小道），顾达寿到的到底是温都尔汗还是依德

尔莫格县？

六、顾说：“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把飞机的残骸和死者的

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边去了。”“温都尔汗地区干燥炎热，死者的残骸埋在沙里，所以还没有腐化。”

1、“我们什么也没看见”，顾的全文就数这句话最有意思，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顾到底到过现场没有。而据9月15日即到达失事现场的孙一先称：“从这块

盆地中央开始，由北往南长约八百米，宽约三十至二百米的范围内，草地全部烧焦

，呈倒梯形。上面散落着一块块飞机残骸，一眼望去，一片劫余的凄惨景象。”

（

《在大漠那边》，页187）

2、这么多的飞机残骸都能埋在一个大坑里吗？有必要埋在一个大坑里吗？据

当时看着蒙古士兵挖坑、自己也参加填土的孙一先称，大坑中只有九具棺木，而决

没有飞机残骸：“尸体装殓完毕，用汽车拉至昨夜挖好的长十多米、宽三米、深一

点五米的土坑边，双方人员站立四周，默默看着蒙古土后代移棺下葬。……最后，

许大使和高陶布司长、桑加上校分别执锹填土，接着我和小沈、小王也执锹填土。然后，蒙古士兵铲土封埋。”（《在大漠那边》，页 209）

3、10月的蒙古，已是深秋，从照片可以看到，9月中旬到现场的中蒙人员都已穿上了大衣，为什么顾还说天气“炎热”？另死者的尸体是装殓在棺木中下葬的，并不是直接埋在沙里的。顾的所说，句句都使人对其诚实度充满疑惑。

七、顾称：“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

9月15日、16日在飞机失事现场的中蒙人员众多。中方的许文益大使在战争年代是一位军人（曾任丁盛手下一三五师四〇三团副政委），据笔者判断孙一先也是一位军人（后曾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军事参谋团团长，《在大漠那边》第一页就是他的军装照片）。蒙方参加视察现场活动的有外交部、国防部、边防内务军事局的官员，还有法律小组、卫生医务小组、报纸和蒙古通讯社记者。军人中有边防内务军的处长桑加上校、国防部副处长达木丁上校、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肯特省边防和内务军事处处长奥尔陶扎尔嘎勒中校等，此外还有法医莫尤。他们都没有在飞机残骸中发现什么弹孔，也没有在尸体上发现曾遭枪击的痕迹，顾达寿的弹孔说可信吗？

八、顾称：“至于那些死者，他们的遗体已经被烧焦，连一小整块皮肤都没有。脸部损坏得就更厉害，死者的衣服全部烧毁，他们的样子非常恐怖，以至多瞧一眼心里都很沉重。”

1、孙一先称，尸体是编了号按顺序装殓入棺木内下葬的，在九具棺木上横铺整幅红布，上面再覆以稍窄的黑布。（《在大漠那边》，页 209）顾达寿自始至终没有提棺木事，更没有提“每具棺木的头顶竖立高出地面的木牌，上写红色阿拉伯数字编号”。（《在大漠那边》，页 209）

2、关于尸体，孙一先称：“他们不是通常失事飞机那样被摔碎烧焦，只剩下堆堆骨骸，而是有头有脚基本完整的一具具躯体”。死者中有两个剩有上衣，面孔一般都烧黑未焦，皮肤暗红肿胀，第 2 号尸体“皮肤烧灼不重”，第 3 号尸体“皮肤烧灼较轻”，第 5 号尸体“皮肤烧灼不重”，第 4 号尸体“上身穿着皮夹克，只后襟边烧掉”，第 8 号尸体“是惟一的女性，不晓得为什么烧灼最轻”，而并非如顾所说“遗体已经被烧焦，连一小整块皮肤都没有”，“死者的衣服全部烧毁”。

九、顾称：“至于林彪，哪些残骸是他的，很难辨认。”“为了准确地确定残骸是谁的，当时建议对某处与林彪相似的死者的牙齿进行鉴别。因为林彪当年曾在伏龙芝学院学习过，后来又随苏联来过，在军队的医院治疗。”

1、如果顾真的到过现场，他也许就不会说“哪些残骸”而应该说“哪一具棺木里的尸体”是林彪的。而一一开棺之后，以尸体的体态特征——“个子瘦小”、“秃顶”及面部轮廓，并不难判断，第 5 号尸体就是林彪。顾真的到过现场吗？！

2、“当时建议对某处与林彪相似的死者的牙齿进行鉴别”这句话究竟是什么

意思？不解。

3、林彪什么时候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中共高级将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的，有刘伯承、左权、刘亚楼和杨至诚，没有林彪。光凭这一句话，也略可窥见顾达寿这位“汉学家”的中国现代史水平。  
(2009年10月)

丁凯文《从林彪座机被击落所想到的》  
(2009.10.15)（《文革博物馆通讯》第558期）

友人发来了今年第10期《炎黄春秋》上阎明复的文章《前苏联外交官目睹九一三事件现场》。这是阎明复摘译的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顾大寿（古达舍夫·里萨特·萨拉甫京诺维奇）的回忆《我的中国生涯》之一小部分。顾大寿在回忆中讲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其中特别涉及到“九一三事件”，因为顾大寿曾亲赴蒙古温都尔汗实地查看过飞机失事地点，故他的回忆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阎明复的眼光极为敏锐，一下子就发现了该回忆里十分重要的一点——林彪乘坐的256号飞机是如何坠毁的。顾大寿的回忆直指林彪的座机是“在蒙古的温都尔汗地区被击落”，阎明复特别将“击落”一词的俄文标示出来，以示郑重。

林彪的座机之所以失事，到底是因为燃油耗尽而不得不迫降，还是遭遇了外部炮火的攻击而导致最终的坠毁。这是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林彪事件研究者们的一

重要话题。这些年来有不少学者和文革爱好者投入很大的精力予以辨析、研究。有些研究者经过严肃认真的分析，认为林彪座机是被苏蒙方面击落的，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陈晓宁和京城孤魂二位。曾经抵达“九一三事件”失事现场勘察的前中国驻蒙古大使馆二秘孙一先，曾于 2001 年出版了他的回忆《在大漠那边》，孙一先指明，中方通过对飞机失事现场部分照片的分析，得出林彪座机“自行坠毁”的结论。孰是孰非，一时难以定论。顾大寿的文章为我们解开了这一谜底，林彪的座机确实是外部炮火击中而导致最终的坠毁。

顾大寿的回忆虽然为我们解开了一个谜底，但是却使我们产生了其他的疑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 林彪的座机是怎样被击落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炮火击中了林彪的座机？是地面高射炮火，还是导弹、抑或是歼击机炮火所击中？顾大寿的回忆没有回答这一问题。另外，击落林彪座机到底是蒙古方面所为还是前苏联驻蒙古军队所为？顾大寿的回忆亦未曾提及。以常识而论，当时前苏联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蒙古国早已是前苏联的傀儡，其军事防务也由苏联人控制，主要战略性武器也都掌握在苏联人手中。如果说林彪乘坐的 256 号飞机被炮火击中，更大的可能性应是前苏联人所为，这样似乎更合乎情理，更何况苏联军方人员最先抵达出事现场，并拿走了

一

部分物品。若非他们所为，何以行动如此之快呢？

(2) 顾大寿亲临“九一三事件”现场进行了观察，他的回忆是：“到了那里后，我们什么也没看见。蒙古人把飞机的残骸和死者的残骸照了照片，然后挖了一个大坑，把所有的东西都埋到里面去了。后来，为了辨认死者，他们又把大坑挖了开来。”顾大寿的回忆中并未给出他们赶赴出事地点的具体时间，根据中方孙一先的回忆，中方人员是在 9 月 15 日下午和 16 日上午两次抵达出事地点，不仅勘察了出事飞机的残骸，还参与处理了罹难者的遗体，并加以安葬。印证顾大寿的回忆，顾大寿到达失事现场应在中方人员勘察之后，否则就不会“什么也没看见”了。我们可以推测，最先抵达出事现场的前苏联军方人员只对飞机本身和飞机上的相关文件感兴趣，所以他们拆走了一台尚为完好的飞机发动机，也许还有飞机的黑匣子。那么这些苏方人员还做了些什么呢？他们之中有没有留下任何回忆呢？

(3) 根据前苏联方面的报道，苏联人在 9 月某日重返飞机失事现场，重新对罹难者的遗体作了鉴定，原因是他们可能意识到飞机上遇难者中有中国方面的“大官”。据顾大寿回忆，他见到了那些重新被挖掘出来的遗体，但因为难以辨识，只好请示上级机关，在得到答复后，将林彪的头颅带回莫斯科作进一步的鉴定，随后再将死者遗骸重新掩埋起来。最后通过鉴定，在莫斯科得出林彪确实死于飞机坠毁事件



的结论。从顾大寿的回忆来看，顾大寿应属于第二批抵达失事现场的苏方人员，并非在第一时间勘察了该事件，因此无法提供更多的飞机失事现场的真实情况。

(4)另据顾大寿的回忆“我们在飞机的舱壁上发现子弹的弹孔，这些弹孔的边缘全都是向外翻的，可以断定子弹是从飞机里面射击的。这说明机舱内曾经发生了搏斗，还使用了武器。”这一说法十分令人疑惑。首先，孙一先的回忆里未曾提及飞机上发现弹孔。以中方当时与苏蒙关系的状况，中方有理由怀疑有关飞机是被炮火击中而导致坠毁。孙一先在自己的回忆中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他对失事飞机的勘察过程，并注意到机翼某处的大洞，大洞的周围有不规则的铝刺，有向外翻的，有向内翻的。因此，孙一先怀疑此洞很像是地空导弹打的。然而，经过中方如此认真、仔细的勘察，中方人员竟然没有发现机舱舱壁上的弹孔，这点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第二，林彪飞机上只有林立果和刘沛丰二人带枪，其他人员除林彪、叶群外，就是飞机驾驶员潘景寅、三位机械师和林彪坐车司机大杨，他们都不太可能随身佩戴枪支。如果机内真的发生了开枪事件，难道是林立果和刘沛丰二人开的枪吗？三叉戟飞机是全封闭的，林立果和刘沛丰也不可能在飞机内向飞机外开枪，他们要射击什么人或物体吗？虽然也不排除他们开枪威胁、恫吓机组成员。第三，据孙一先回忆，经过认真地勘察，中方人员没有发现任何机内搏斗的迹象。事实上罹难者遗体的

排  
列也不支持机内搏斗的说法。此点可参考袁策祥文章《“9 1 3 事件”中的李文普及其他》（载《百年林彪》）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所有罹难者的遗体上均未发现弹孔，这么狭小的飞机机舱内如果真的发生了搏斗，且使用了武器，难道所有机上人员都可以幸免于难吗？所以，所谓飞机上“发生搏斗，且使用武器”这一说法十分可疑，还有待更可靠的资料问世才能厘清真相，如黑匣子的出现。

(5)据孙一先的回忆，9月16日和17日这短短的两天时间内，中蒙双方进行了5轮会谈，而会谈的焦点是该失事飞机到底是民用还是军用。蒙方认为飞机由于不明原因试图着陆，从而发生爆炸，并强调该机属于军用飞机。中方则强调该机乃中国民航飞机，因迷航而误入蒙古，死难者都是机组人员。实际上中方在谈判时就已经意识到蒙方的意图，即“目的无非是为了在今后两国的交涉中占据有利地位，假如该机是被苏蒙军击伤而坠落，则可借此推卸责任。”现在我们回头再看蒙方在交涉中的态度，他们心里很清楚是他们击落了该架飞机，如果他们承认那是一架民航客机，他们的责任就极为重大了，所以他们采取的那种态度毫不为奇。问题在于中方为何在后来迅速、主动地配合了蒙方，不经过有关专家实地调查就自己宣称该机属“自行坠毁”呢？这就要分析一下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处理林案的态度与方针政策了。

中国官方在“九一三事件”后仅仅 5 天，即 1971 年 9 月 18 日，就发布了 57 号文件，该文件称：“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发布这份文件时中国驻蒙古二秘孙一先等人尚未回国汇报勘察飞机坠毁事件的全过程。这个匆忙发布的文件也丝毫未涉及林彪座机是如何坠毁的。换句话说，中国官方并未了解清楚整个事件的全部过程，但“叛党叛国，自取灭亡”这一结论已经明确宣告了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对林彪事件的真实态度和处理该事件的方针政策。

9 月 21 日孙一先从蒙古赶回北京向中央作汇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亲自接见并听取孙的汇报。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对失事飞机丝毫不感兴趣，竟然“听着听着闭上眼睛打了一个盹”，而听到汇报有关飞机上死难者情况时却表现出“精神异常贯注，已看不到一点疲劳的影子。”这说明周恩来等中共高层最关注的是飞机上有没有留下活口，会否给中方造成什么麻烦。至于飞机为何飞往蒙古以及如何失事的，则根本不是中共高层关注的事情了。无论是自行坠毁还是被炮火击中都无所谓了，反正林彪已死，及早下个“叛国投敌、自取灭亡”的政治结论即可。孙一先汇报中提及的飞机机翼上的大洞也不在考虑之内了。在听取孙一先汇报不久，周恩来迅速得出了林彪座机“自行坠毁”的结论。可以说，周恩来的结论实际上配合了几天

前

中央对林彪事件所制定的方针和政策，虽然日后中央又组织一些空军人士组成调查组，对照失事现场的照片和国内三叉戟飞机的原形作调查，那也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为周恩来的结论作注脚而已。

中共官方这一“自行坠毁”的结论，可以说是全人类空难史上最不严肃的结论，在没有任何飞行专家现场调查、检验的情况下，只凭若干张照片，就由中共最高层拍板定论，实在太过荒唐、荒谬。据孙一先回忆，9月23日中国驻蒙大使许文益向蒙方通报了中方的态度，原本突然强硬起来的蒙方代表听了中方“自行坠毁”的结论后态度明显软化。最后中蒙双方在索还遗体、遗物一事上竟然不了了之。虽然，蒙方知道苏联人第二次到达失事现场取走了某些物品而为此故意设下障碍，阻挠中方索还遗体、遗物的努力，但是，中国方面如果在一开始就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积极设法搞清飞机失事真相，而不是匆匆忙忙下结论在先、敷衍了事的作调查在后，那么蒙方很难隐瞒击落林彪座机的事实。由此可见，毛泽东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更在意的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力的稳固，以及如何让死去的林彪为毛泽东承担文革的罪责。至于孙一先等人日后沾沾自喜地吹嘘周恩来如何将“国际问题”轻易地转化为“国内问题”是多么多么睿智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那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贻笑天下。

(2009. 10. 15)

也谈林彪九·一三事件

——评肖思科《粉碎五大谣言——知情人证明林彪真正死因》

•丁凯文•

2001年9月11日的《北京青年报》发表了中共解放军某部作家肖思科的文章：《粉碎五大谣言——知情人证明林彪真正死因》。（1）

肖先生为文的目的，在于驳斥坊间各种林彪之死的传闻以及不同于中共官方版的林彪为何出走的解释。肖先生文中大力维护了中共多年来对林彪事件的定性，即“林彪集团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林彪反革命集团试图‘和平过渡’未果，但阴谋政变又未遂，最后乘机出逃摔死在异国他乡。”肖先生在国内号称是林彪问题专家，著书立说，成果颇丰，俨然一文革史方面的大家。然而，肖先生在林彪事件研究上得出的结论真的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吗？下面笔者愿针对肖文谈谈个人对林彪事件的看法。

（一）如何看待林立衡与张宁的说法及回忆

引起我对肖文兴趣的并非是肖先生如何考证林彪之死，因为1994年1月

1 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上彼得·汉纳姆的文章《揭开一个中国人之谜》，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确认了林彪的确死于 1971 年 9 月 13 日蒙古温都尔汉的飞机失事。（2）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共官方对林彪一案的解释与结论有着许多令人生疑之处，作为一个史学家应该如何看待这些资料，是故意避而不见、装聋作哑，有选择地使用那些只有利于官方的说辞来解释历史，还是认真思考，在全面收集资料与证据当中找出历史的真相，还其本来面目？也许这就是我与肖思科先生之间的区别所在。

肖先生在其文中特别批驳了林彪是被“绑架出逃”，而且指出这一说法是出自林彪亲人之口。肖先生为何不点明此说就是出自林彪的女儿林立衡之口呢？林立衡是 9 13 事件的直接当事人和证人，作为 9 13 事件的当事人，林立衡亲身经历了整个事件，她的证词应被视为第一手资料。9 13 事件的另一位当事人张宁也在自己的回忆录《尘劫》一书中，描述了 9 13 事件的前后过程以及后来被中共专案组审查的经历。这些无疑都是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其可信性不容轻易予以否认。换句话说，林立衡与张宁的回忆的重要性绝非坊间传闻的“西山镇压说”、“替身代死说”以及“软禁老死说”可比拟，稍有史学知识的人都清楚她们的回忆极具史料价值。然而肖先生在其文中却不屑地将林张的回忆与那些道听途说或胡编乱造相

提

并论，对这两位当事人的说法及回忆尽量予以忽略、贬低乃至否认，这不能不让人

怀疑肖先生的研究动机和研究功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水平。

肖先生指出林立衡在 1971 年 9 月 12 日晚向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局部队报告

情况时，“就说：他们（叶群、林立果等）要把林彪‘弄走’……而在中共公布 5

7 号文件之后，当事人就一改常态，先后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拥护中央‘对林

彪等叛国罪行的批判和结论的完全正确’……而到 1979 年 11 月初，……又冒

出了林彪是被‘骗上飞机’的说法。”（3）肖先生这么写的目的，无非是想证明林立衡在林彪事件上前后的态度出尔反尔，因而其证词也就不可采信。

凡经历过中共文革的人大都不会忘记那是一个怎么样的黑暗时代，林立衡在林

彪出走前后的表现恰恰反映出当事人在中共权力机构巨大压力下，不得不违心认同

中共当局对林彪事件的定性。在那种环境下她只能这么做，别无选择。这有什么可

值得予以质疑与批判的吗？看看当年邓小平在文革中又是如何向毛泽东痛哭流涕写

检查，深刻批判自己的错误路线及向老毛表衷心的。连邓小平都不能免俗，肖先生

又如何可以指责林立衡在 9 1 3 事件前后的态度不一呢？可以想象林立衡面对毛周

等人及专案组的淫威，不得不拥护党中央“对林彪等叛国罪行的批判和结论的完

全  
正确”。但实际上，林立衡并非一贯逆来顺受，她不断要说出历史的真相，在巨大  
大的压力下，她曾在 1974 年不惜以自杀来抗议中共当局对她的非法迫害。如果不  
不是被逼无奈，她又何必出此下策呢？

## （二）中共对林彪事件的审查是公正的吗？

1976 年 10 月毛死江囚后，林立衡的处境才开始有所好转。她又开始了  
一个漫长的路程。虽然毛周等人已死，但中共集权统治依然如故，当年参与大肆迫害  
无辜人们的统治阶层还在当权，他们当然不能容忍在他们手里定的案子有任何松动  
的可能。林立衡的申诉材料虽然递到有关部门，但中共当局又是如何“实事求是”  
地进行审查的呢？1979 年在邓小平批示下，中共成立了“林彪遗留问题审查办  
公室”，专门复审林案中不少当事人的申诉。然而，搞复审的那批人竟然是原来林  
彪专案组的原班人马。可以想见他们是如何对林案进行复审的。肖先生在其文中并  
没有详细说明中共是如何“实事求是”搞审查的，只是依然强调中共当局的审查是  
“公正”的云云。问题是中共搞的专案有过“公正”吗？

中共建国前的历史先且不说，中共的专案是否公正只要看看中共建政以来的劣  
迹即可明悉一二。从三反五反到反右运动、从批判高饶反党联盟到打倒彭德怀军



事

俱乐部、乃至打倒刘少奇反革命集团的文革浩劫，这些运动中哪一次不是大搞冤假

错案，有多少无辜之人家破人亡、含恨而终，难道林彪一案会是这些千万个冤假错

案中的一个例外吗？中共在邓小平治下虽然提出了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平反所有冤假错案”，但一涉及到毛泽东的地方就“宜粗不宜细”，而将一切罪恶都推到林彪和“四人帮”的头上，反正林彪已死，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

具体到林彪一案，中共又是如何“公正”审判的呢？我们还是看看肖思科本人

的大作吧。在《知情者说之三——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一书中，肖先生

向世人披露“1979年9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由华国锋主持，邓小平摆开了

自己的观点：‘有些人罪很大，要判无期徒刑的’”。胡耀邦讲“最重要的是要同毛主席的错误分开”，彭真则说“这几个人（指黄吴李邱）一定要审，判刑可以轻

一点，她们同江青不一样，历史上还作过一点好事”。邓小平特别指示“起诉书的

内容不能涉及毛主席、周总理的错误，这一点要特别慎重”，“黄永胜等人有功，量刑可以轻一些”。（4）

从以上肖先生披露出的资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林彪事件涉案人还未实际

进入法庭审理时，中共最高当局早已为其定下了审判的调子和刑期。不仅如此，当

局还要特别小心地区分毛泽东、周恩来与被告的关系，唯恐被告人一个不小心泄

露

了天机，在审判的关键时刻泄露出自己所犯的“罪行”其实就是执行了伟大领袖的

最高指示。事实上，林彪及“四人帮”集团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罪及所判刑期不是

由法院在审判后根据事实来决定，而是由当权者事先拍板定案，检察官和法官全部

听命于中共当局，尤如傀儡，实际的审判不过是排练好了后走个过场而已。请问肖

先生，这就是你口中的“公正”审判吗？这种审判有可能是“公正”的吗？

1987年当林立衡被当局批准从河南郑州回到北京时，中共当权者曾对她“

约法三章”，诸如“不许接见记者”、“不许对外发表言论”、“不许会见外宾”等等等等。如果当局对林案如此有信心，又何必这么处心积虑地要封住林立衡的口

呢？不仅如此，林案其他涉及者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林办当年一位秘书就向笔者直

言“中央不许我们说话”。显而易见，中共当局在林彪一案的审查方面绝非如肖思

科所言“林案的审查报告和审判判决是公正的”。

### （三）李文普的证词有几分真实性？

肖思科先生在其文中对林彪的内勤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有很正面的评价，认为

其证词“有可信之理”。相反，那些质疑李文普证词的人在肖文中竟然成为“不怀

好意者”。（5）

笔者不否认肖先生在发掘林案真相上作了不少努力，曾走访了不少证人，其中  
以李文普最为关键。可令人起疑的是，林办这么多秘书、内勤，肖先生为何只采  
访  
到李文普一人？李的证词为何没有其他林办秘书、内勤的佐证？笔者也曾见过几  
位  
林办的秘书们，可他们却无一人认可李的证词，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中共在林彪一案上的不公正其实就反映在其审查取证过程的不公正。从张宁  
《  
尘劫》一书中，我们看到的是林彪专案组是如何绞尽脑汁发掘林彪的反党证据。  
在  
关押审查林办有关人员时，由于在林办秘书及内勤身上始终找不出林彪有图谋篡  
党  
夺权、阴谋政变的证据时，专案组是如何想方设法在李文普的身上打开缺口。在  
答  
应了李提出的几项交换条件后，李才说出林彪在去山海关机场的路上曾问“到伊  
尔  
库茨克有多远，要飞多长时间”，以至李发觉林彪要叛逃，李因不愿叛国而跳车。  
（6）问题是李文普既然有如此高的革命觉悟，为何在审查初期不及时向当局汇  
报  
，邀功请赏，而要等过了许多时日当局单独对其进行关押审查后，在与当局达成  
几  
项条件才予以说明呢？

另外一个疑问是李文普为何自伤？据李文普自己讲，当李与林彪同车出发  
向  
山海关机场行驶时，因不愿叛逃而跳车，跳车时林立果在车内开枪击伤李的左臂，

李跳车后向车内也还击了一枪。但前来查验李伤口的医务人员及警卫人员一致认为这是李自己开枪自伤所致，这些人包括外勤警卫处的刘吉纯处长和张青霖等人。后来人们检查林彪那辆红旗防弹车，发现林立果座位下有一弹壳，车的右前门车壁上有一弹孔，显然这是林立果一枪所致。在李文普跳车处也发现一弹壳，但车内却找不到李所说的从车外向车里射击的弹眼，车内的其他人也没受伤。（7）那么李的一枪究竟打到哪里去了呢？李文普不可能在跳车开枪还击时将子弹打到他身体侧后方的汽车右前门内壁上。看来只有一个解释：李自己打了自己一枪。这难道不是一个苦肉计吗？这出苦肉计演给谁看呢？当然是演给党组织和林办其他不在现场的工人看。这就是肖先生口中的“有可信之理”的李文普的所作所为。对照李文普在审查前后的过程来看，李文普显然有作伪证的嫌疑。

肖先生分析说，李的证词“并没有因此给他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如果中共官方因与李达成交换条件，林彪因此被定性为叛国投敌，而李则因交代有功，未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以及本人家属不受歧视等等来看，怎么能说李没有得到好处呢？看看林彪一案涉及那么多人，多少人因此无辜系狱、家破人亡，难道这都与李的成功交代无关吗？李的这一交代为当局定性林彪事件立了大功，但它可以瞒过天

下

耘耘众生，却瞒不过同在一起工作的林办秘书们。去年 10 月初某网上刊物曾刊登

一位林办秘书致张宁女士的信，明确点出“焦点的问题是九一三事件仍然被李文普

的那句话维系着结论。活着的人，他又是关键，这只有从外围突破，他的防线则不

攻自破。”（8）看来，大家都知道问题关键所在，肖先生又何以如此相信李文普的证词呢？说穿了，无非李的证词对中共官方有利，而其他林办证人的嘴又被封住

了，天下众生也就只能听肖先生一个人的解释了。

#### （四）林彪是怎么出走的？

肖思科在其文中特别否定了林彪是被“绑架出逃”，认定林彪是自己主动出逃

。其实，林立衡在向中央申诉时，特别指出林彪是“被骗上飞机的”。肖先生在文

中也承认此说“由来已久”。肖先生在其文中反复证明的是林彪系主动出走，因而

不是被骗，也不是被绑架。

肖先生在其文中编了一个很逼真的情节：“等司机杨振刚把车开上来，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就从屋里走出来。刘沛丰提三四个皮包先上车。接着是叶群

、林立果上车，林彪最后上汽车，林走到门口还问内勤：‘东西都装上没有？’没

停步，很高兴的样子，帽子未戴，大衣也未穿。”可惜，肖先生并未给出这条证据

的来源和出处。

林彪出走的当时到底是处在什么状态，对揭开林彪出走的问题至关重要。根据张宁的回忆，林彪在当晚服下安眠药后很快就睡着了。而周恩来给叶群突如其来的电话以及周下令北戴河机场的飞机不可起飞（必须四首长同时签字），使得叶以为林彪将要大难临头，因而强行叫起早已入眠的林彪，立即出发。当时叶群和林立果冲进林彪卧室，叶群和林立果架起睡眠中的林彪，并给林彪穿上衣服，而两个内勤陈占照和张恒昌则给林穿上裤子、袜子和鞋子。叶群吆喝李文普立即备车，并由小陈和小张架着林彪走出卧室。林彪当时完全处在昏睡状态，迷迷糊糊的被架上了车。

具体情节在专案组面对面排查时曾反复要求所有当事人回忆讲清，甚至要求他们讲清楚林彪何时服的药，多快就可入眠，出走时是否清醒，以及林清醒时是什么状况，不清醒时是什么状况等等。陈占照和张恒昌异口同声说林彪当时完全处于昏睡状态，是他们俩将林架上车的。（9）

显而易见，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林走到门口还问内勤：‘东西都装上没有？’没停步，很高兴的样子”云云。林办的当事人大都还在世，相信不止张宁一人可以

证明此事。

从张宁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林彪在庐山会议之后已知毛泽东迟早要对他下毒手，他采取了完全的不合作态度，不检查、不工作，一付看你老毛如何来对付我的态度。而且林彪已表示自己是个“民族主义者”，意味着林根本不想叛逃苏联。由于周恩来电话的作用使得叶群以为当局的行动即将对林彪不利，因此三十六计走为上，强行架走睡眠中的林彪。笔者想反问一下肖先生，如果林彪知道将要叛逃外国，怎么还会象肖文中所言“林走到门口还问内勤：‘东西都装上没有？’没停步，很高兴的样子……”，林应是慌不择路、心神不定、一脸焦虑才对。更何况根本就不存在肖先生这段离奇的描写。

还有一个情况，即彼得·汉纳姆的文章明确指出，林彪的座机在蒙古境内快飞到苏联的边境时掉头南飞。（10）这一现象又如何解释呢？中共当局迄今为止都不曾公开承认此点，一来可能中方根本就不知道这一情节，二来即使中方知道此事，也不愿多作解释，以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反正林彪已死，心腹大患已去，谁还管飞机是如何飞行的呢。但从这一现象可以推断林彪一行不愿飞往苏联，而宁愿南返。这里就有不为人知的详情，有待我们进一步查证。有人认为这是飞机驾

驶员潘景寅反劫机。笔者认为这个可能性极低。潘是飞行驾驶高手，早知飞机已越  
过中蒙边境，而且是在朝向苏联飞，为何飞机快到苏蒙边境时才反劫机而掉头南  
返  
呢？

显而易见，林彪是在昏睡的状况下被叶群和林立果强行架离，并上了那架在劫  
难逃的飞机。笔者推测，很可能当林彪清醒过来后发觉情况不对，于是命令飞机  
掉  
头南返，而最终飞机不幸失事。看来，肖先生还无法轻易的否认这个“绑架出逃”  
说。

#### （五）林彪有无阴谋准备发动政变？

肖思科在其文中依然重复了中共官方多年来的说词，指证历历地说林彪是因  
“  
政变未遂”而畏罪潜逃。其实，这一弥天大罪早已为许多研究人士所质疑。凡读  
过  
陈晓宁先生《质疑林彪 9 1 3 事件》之文的人，相信都会有这种感觉，即林彪不  
可  
能亲自发起或指使其子林立果图谋政变，杀害毛泽东而黄袍加身。（1 1）

中共当局出示的证据也极其单薄，除了所谓的林彪“九八手令”外，现在连  
当  
初叫响连天的《5 7 1 工程纪要》也鲜有再提了。这份“手令”区区几个字“盼  
照  
立果、宇驰同志转达命令办”。首先，这是不是林彪亲自写的？有无旁人伪造？  
第



二，手令写给谁的？第三，按照什么命令办？这里根本就无交代。这种所谓的证据如何可以将林彪定罪为“要搞政变”呢？根据林办内勤的回忆，林彪在那期间根本不曾写过任何东西，林办的秘书们及林彪心腹大将黄、吴、李、邱对此也一无所知，难道林彪是在空气中搞政变吗？

以笔者的分析，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看到中央文革不得人心，张春桥的地位汲汲可危，党内上下对张等文革派喊打喊杀，包括陈毅等人，甚至连毛的心腹汪东兴都站在反张行列，毛这时下决心坚决站在中央文革一边，保卫文革成果，并坚决打击任何反对势力，扶植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派取得最高权力，而林彪不幸就是文革派掘取最高领导权的主要路障之一。9 1 3 事件前林彪、叶群等人已知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不会放过他们，林彪的秉性倔强，不认为自己有何过错，更不会低三下四地作检讨，央求毛放他一马。而毛的为人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得罪人就得罪到底。毛于是使出对付刘少奇的老办法，南下各省向中国各地头头们打招呼，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先打掉林的外围陈伯达后，再进一步“换沙子”改组北京军区，矛头直指林彪。林跟随毛几十年，深知毛的为人，既然刀子已架在脖子上，反抗也是徒劳，林彪因此乾脆到北戴河休息不问世事。但叶群和林立果却相信林彪也

许  
会步上刘少奇的后尘，很可能会殁死狱中，那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叶群与林立果  
于  
是力劝林彪在非常情况下乘机远走他乡。然而，林彪显然不肯叛逃苏联，直言自  
己  
是“民族主义者”。而在最后关头，林彪于昏睡时被叶群、林立果连拉带骗上了  
飞  
机。结果，人算不如天算，飞机坠毁于蒙古境内。聂荣臻语“林彪坏在老婆手里”  
不正说明了此点？否则聂完全可以说这是林自己咎由自取嘛。

#### （六）林彪的座机何以会坠毁

肖思科先生在文中谈到林彪座机何以会坠毁时，一口咬定飞机是因“电路引  
起  
油箱爆炸”而失事，并引原空军司令王海和原住蒙使馆人员孙一先的回忆，强调  
飞  
机机翼上的一个大洞并非导弹击中，“如果导弹击落，则洞孔应当穿透，而所谓  
洞  
孔实际是呈单面炸开，而铝刺外翻，从这一点证实，该洞孔并非导弹所致。”（1  
2）

然而，查孙一先的回忆原文，孙明明说，“我讲到机翼根部那个大洞，怀疑  
是  
防空导弹打的，但是洞口朝上，下部没有穿透，而且洞口铝刺并不规则，所以难  
下  
结论。”（13）可见，该洞孔的铝刺既有外翻，也有内翻，呈不规则形状。孙为  
飞机失事现场观察的当事人，其说法更加可信。而王海等人并未到失事现场，仅  
凭  
若干幅照片就断定飞机是因油料不够而迫降，在迫降过程中因程序操作失误导致

降

落失败，从而机毁人亡。显然，这种分析是不能完全站住脚的。

如果飞机在飞行中其油箱发生爆炸，则爆炸的威力应足以导致飞机在空中解体

，飞机的残骸应散布在更广泛的地带。而林彪的 2 5 6 号飞机的“油箱爆炸”却只

炸开机翼上的一个圆洞，且“洞口朝上，下部没有穿透”，飞机在迫降时机体却是

完好，这无论如何也说不通。看看 9 6 年美国环球航空 8 0 0 号飞机在纽约外海的

失事，该机空中爆炸解体后残骸散落在一大片广阔的海域，美国的调查人员将飞机

残骸从海底打捞上来，全部拼装完整，证实飞机某处电路故障导致飞机油箱爆炸，

飞机在空中解体。（1 4）对照二者情况，不难发现二者对飞机失事的解释都是“

电路问题导致飞机油箱爆炸”，但飞机失事的实际结果却南辕北辙。

另外，根据彼得·汉纳姆的调查及走访蒙古当地目击证人，证实实际情况是飞

机在降落前飞机尾部起火，并未爆炸，该机在落地时才爆炸燃烧。（1 5）

显然，肖文只采用了有利于官方的说法，而有意忽略了不同于官方的证据。看

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出身的肖先生，在文学创作之余还应于史学方面多下功

夫，而不是只会追随权贵、人云亦云。

按照国际常规，如果一架民航客机失事，当局应立即成立特别调查组，赶赴

失  
事现场调查飞机坠毁真相，尤其是当考虑到有可能的外力介入，如导弹袭击等，  
更  
应注意收集飞机残骸上的有无火药证据，其黑匣子是否完整，有无提供进一步证  
据  
的可能。但令人遗憾的是，因为中苏关系恶化，中方根本没有考虑上述步骤，而  
是  
凭几张照片来分析飞机坠毁原因，从而得出“电路引起油箱爆炸”的结论。设想  
中  
方本应要求苏蒙方面归还飞机残骸及遇难人员遗体，提供飞机在蒙古境内飞行的  
报  
告及飞机失事报告，特别是应将该机的黑匣子归还中方，使人们了解飞机的飞行  
轨  
迹及飞机内部人员有何对话内容等等，以利中方分析飞机飞行的整体过程，这对  
彻  
底揭开 9 1 3 事件之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方当年未采取此类措施还可用中  
苏  
关系恶化来解释，但时隔多年之后，仍然采取鸵鸟政策，对明显的漏洞故意视而  
不  
见，恐怕就不是一句林彪一案的结论“是建立在详尽的事实基础之上”就可以搪  
塞  
的了。

到目前为止，中苏双方都否认动用了导弹击落林彪座机，但该机在降落前就  
已  
起火燃烧却是不争的事实，其机翼上的一个大洞似乎也无法解释清楚。那么，我  
们  
是否还不能最后排除林彪的座机不是导弹击中的观点，而有待苏蒙方面提供更完  
整

可靠的证据？

（七）林彪犯的是“反革命罪”吗？

肖思科先生在其文中一口咬定“两次审查、一次审判，结论都是一致的：林彪集团是一个反革命集团。”也就是说，林彪犯下的罪行是“反革命罪”。凡在中共治下生活过的人们都不会对“反革命罪”感到陌生。举凡党内、党外与中共当政者意见相左之人，都会被戴上这顶帽子。“反革命罪”简直就是一根“东方不败”的金棍子，指南打北，所向披靡。凡被打中者无不陷入万劫不复之地，从此再也回天乏术，轻者由群众监督劳改，重者则被打入监狱，迫害致死。党内有刘少奇、彭德怀、高岗等例，党外则有遇罗克等人，不胜枚举。

中共是如何给自己不喜欢的人定“反革命罪”呢？其标准又何在呢？中共曾规定“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皆属“反革命分子”。但党内的刘少奇、林彪等人从无反对“毛泽东思想”之举，相反，他们无不是坚决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榜样。刘少奇最早发明并提出了“毛泽东思想”，林彪也是高喊“四个伟大”。但当毛泽东想打倒他们时，他们便成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一类骗子”、“打着红旗反红旗”等等。老毛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红口白牙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全无分辨的余地，将“反革命罪”的帽子戴在他们的头上真

是再合适不过了，刘林等人也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因为这种不需明确标准的“罪行”只需当政者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罢了，余下的证据再去收集、制造也为时不晚。

现在的中共也发现“反革命罪”不那么合乎历史潮流了，于是在前次人大修宪时将其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不能不说中共有了一点进步。显然，犯了刑事罪就是刑事罪名，而“反革命罪”则是政治犯、思想犯的同义语，如果还将其当作整人法宝难免会落人以“迫害人权”的口实。然而，人们的思维却未必也与时俱进。肖先生迄今就一再坚持认为林彪犯了“反革命罪”，尽管这一罪名是二三十年以前定的，但现在这个罪名依然有效。肖先生难道真的不觉得你对“反革命罪”的坚持是很可笑、很滑稽的吗？

林彪是中共九大当选的唯一副主席，他在九大前后与毛泽东支持的江青、张春桥文革派产生了某些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林彪有“反革命”的意图。然而，中共当权者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只要他们想致你于死地，有什么借口和罪名比“反革命罪”更适合戴在对方的头上呢？林彪在与毛泽东的争执中败北，“反革命罪”的帽子也就自然而然地落实在林彪的头上，当然，事后也还要再找出其他刑事犯罪

的  
证据。由此可见，“反革命罪”是一件多么荒唐、无稽的罪名。连中共现在都已  
舍  
弃不用此项罪名之时，你肖先生却依然将此奉为圭臬，仍然将此罪名牢牢地套在  
林  
彪的头上，并一味坚持中共对林彪的“审查报告和审判判决是公正的”，难道这就  
就  
是你口口声声的“实事求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吗？

#### （八）我们应如何研究林彪事件？

这个问题似乎问得愚蠢，难道不是尽量发掘历史真相吗？然而，事情并非如此  
简单。中共在 9 1 3 事件后公布了有关林彪事件的 5 7 号文件，后来又在 1 9 8  
1  
1 年对林彪集团和“四人帮”集团进行了审判。此后，林彪事件的相关资料不断被  
发  
掘出来，坊间也出现了不少“戏说”的版本。

国内以肖思科为代表的官方史学家也收集了许多有益的资料，采访了很多证  
人  
，相关的文章也出版了七七八八。然而，所有这些出版物几乎都是在中共官方严  
格  
审查下出版的，与官方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在一篇报导肖思科本人的文章《追  
踪  
林彪“九一三”叛逃真相》中，就指出“肖思科出题目请当事人撰文或代笔。文  
章  
经他审核、上级审查后，发表在《中华儿女》上”。（1 6）请注意，这段话很有  
意思，既然是请当事人写文章，为何不仅要由肖本人审核，还要经什么“上级”

机

关批准呢？肖思科先是总揽对文章的生杀予夺大权，过了他这一关后还要再由

“上

级”领导“把关、批准”，以免引出与中央宣传口径不一致之麻烦。肖先生难道

就

是这样“公正”地研究林彪事件吗？那些不利于中共的文章和回忆就这样被肖先

生

及其“上级”所过滤、删改、乃至扼杀，我们能相信你肖先生的研究就一定是公

正

的吗？

同一篇文章中还说“原空军保卫部部长高德明现已成为研究林彪‘小舰队’

的

文章作者。他忧虑‘目前刑满仍由部队管辖的原小舰队成员，有抛开事实，相互

串

联翻案的迹象。’他特别提醒媒体，历史不容随便涂抹，不要给历史添加澄清的

麻

烦。”（17）高的这段话实在是一天下奇谈。且不说林彪根本就没有什么“小舰

队”，退一万步说，就算当年林立果“小舰队”的人员确实有罪，但他们在刑满

以

后就是普通公民，与高某、肖某一样享有一切公民应有的权力，怎么还能继续由

军

队对他们进行“监管”？这样做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禁止他们开口说话吗？此种

行

为难道不是明目张胆的违反人权、地地道道的人身迫害吗？更何况他们当年有口

也

无法为自己申辩，只能接受“组织”上给他们的“定性”，在后来中共当局专制统

统

治略有松动的情况下，他们互相来往、联络难道也是非法的而要被禁止吗？他们



当然应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详细如实地说出当年林彪事件的真相。但是，中共当局有这个胆量吗？高德明本人就是空军专案组的负责人之一，他心里很清楚当年他们是如何制造冤假错案的，他当然害怕被迫害的当事人说出历史的真相，因此他的这种态度毫不奇怪。肖先生以《中华儿女》常务编委的身份收集、整理以及出版的就是一种人的文章，难道还好意思为自己脸上贴金，自诩“公正”吗？

肖思科先生自己多少也有自知之明，也不否认“所谓的事实也有被颠覆的可能”，但肖先生说“我走的每一步都试图做着向真理靠近的努力”。（18）从上述事实来看，肖先生的确是很努力，但是不是真的走向了真理恐怕还在未定之天吧。

综上所述，1971年的林彪事件是中共历史上与刘少奇一案相媲美的大案，也是一件未被完全揭开真相的大案。现在已有不少人为之努力，不断发掘出新的资料，提出新的论点和论据。笔者希望此文在推动林彪事件研究上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愿更多的有识之士、研究学者和林彪事件当事人写出更多的文章，有助于这一历史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

注：

（1）（3）（5）（12）肖思科《粉碎五大谣言——知情人证明林彪真正死因》

(2)(10)(15) 彼得·汉纳姆《揭开一个中国人之谜——林彪的最后日子及死亡，二十年阴谋之后》 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The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1994年1月31日

(4) 肖思科《知情者说之三——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

(6) 张宁《尘劫》 香港明镜出版社 1997年7月版 第319—320页

(7) 张宁《尘劫》 香港明镜出版社 1997年7月版 第270页 及笔者

对张宁的采访

(8) 《致张宁女士——一封关于林彪事件的信》

(9) 笔者对张宁的采访

(11) 陈晓宁《质疑林彪913事件》见本刊 zk0201c

(13) 孙一先《我向周总理汇报“九一三”飞机失事》

(14) 《“华航”空难与1996环航失事类似?》

(16)(17)(18) 李彦春《追踪林彪“九一三”叛逃真相》见《北京青年报》2000年12月14日

“九一三”事件补白

近些年来，关于林彪叛逃的文章，在海内外报刊上多有登载，已使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的前前后后昭之于世。每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时，不禁心潮起伏，我的思绪总是萦绕于 15 年前 9 月中旬那些不寻常的日子：那十几个日日夜夜大概是自建国后我睡眠最少、工作最紧张的时刻。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对“林彪叛逃，机毁人亡”后的情况可谓略知一二，谨记述如下，或可有助于补阙。

1971年9月13日下午，外交部办公大楼里，人们进进出出，一如往常的工作，没有任何异常现象。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已知道林彪和叶群等人乘一架三叉戟飞机于13日零点32分由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朝西北方向逃跑，目标很可能是某个外国。周恩来总理迅即指示外交部，要密切注意外电报导，并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对方案。

13日上午，又获悉，当日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以东300公里的温都尔汗地区有爆炸声，随之火光冲天的消息。

14日上午，外交部党组在会议室开会，会议是在党组书记、代理部长姬鹏飞

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内容是进一步落实周总理昨天的指示。会议的气氛有一种严峻感，而不像以往我们的会议是在活跃和有点幽默的气氛中进行的，但大家都很镇定，会开得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对林彪出逃作了四种估计。

- 一、由林彪出面公开发表叛国声明；
- 二、由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讲话；
- 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也不直接发表谈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导林彪等已到达某国某地；
- 四、暂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在各种情况下对外交涉以及如何表态的问题。

时间过得真快，中午 1 2 点的钟声已经敲过，但会议还没有散的意思。这时，紧闭的房门被突然推开，值班秘书忘了平时的礼节，快步径直奔向姬鹏飞同志。鹏飞同志以他那特有的沉着和冷静接过一份手抄特急报告。我们的目光注视着 he 脸上的表情，都急于想知道报告的内容。从每个人的脸上都可以看出。这应是一份极不寻常的“特急件。随着他目光离开文件，脸上绽出了笑容，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接着把报告读了一遍。大致内容是：今日上午 8 时半，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约见许文益大使，通知有一架中国喷气式军用飞机于凌晨 2 时 3 0 分左右坠毁在肯特省贝尔赫县境内，机上共有 9 人，全部死亡

，并向我提出抗议，以及许大使已向对方提出要求到现场调查等。顷刻间，会议的气氛活跃了许多。韩念龙同志从姬鹏飞同志手里接过报告，逐字逐句仔细看了一遍，因为对蒙古的事务由他主管。

会议当然不能结束。一个最紧迫的事，就是要把这份报告迅速送给毛主席和周总理看，这也是他们急切等待的消息。姬鹏飞同志立即要王海容同志打电话到主席和总理办公室，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自前天夜里起，一直没有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总理按习惯要 4 个钟头以后才能醒来。主席和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党组决定，要立即派人把报告送给主席和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同时，再一次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电话，强调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要把主席和总理叫醒。

下午两点钟过后，我刚刚回到办公室，从抽屉中找出一包苏打饼乾，权作是午餐。还没吃两口，姬鹏飞同志就叫我去他的办公室。正巧他也在吃饼乾，我也就不客气地不请自拿了。他边吃边告诉我，总理来电话说，他刚从主席住处回来，对交部的同志迅速把报告送到并叫醒他们感到满意。总理特别对我驻蒙古大使馆，在了解实际情况下，为了使国内尽快知道我机在蒙古境内失事，当机立断，启用

已

经封闭两年之久的专用电话线，以最快的速度把情况传回来表示满意。接着讲到

总

理交办的几件事，要我立即去办。

总理的指示有：一、将今天收到的我驻蒙古大使馆的报告用 3 号铅字打印 1

8

份，下午 6 时由符浩亲自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办王良恩副主任；二、从

现

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后送总理亲启；三、

今

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当我站起来准备马上去落实总理的指示时，韩念龙同志又匆匆进来，我知道

姬

鹏飞同志约他来是商量起草给我驻蒙古使馆的指示。约我驻蒙古使馆的指示于下

午

3 时 3 0 分发出。

我把办公室副主任兼机要局长张占武同志找来，和他商量后，指定了机要员

小

王专门译办来往电报，并要王立即搬到离我办公室较近的房间工作。

下午 5 时 5 8 分，我提前两分钟按指定人口处走进大会堂北门，一眼就看见

王

良恩副主任站在偏东一边的走廊等候。我们来不及寒暄，他迎上来便说：“你来得

得

很准时。”我回答说：“你好像已等了一会”他又说：“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已到

齐，董老也来了，就等你送的文件了。”他特别提到董老，我明白他的意思，因

为

董老年事已高，一般不出席会议。

回家吃过晚饭后，因昨夜几乎没有睡觉，便想利用这个时间小憩一会儿，但实

在太兴奋了，怎么可能睡得着。我便信步来到同院乔冠华同志家里。他一看到我就

哈笑着：“说曹操，曹操到。我正要打电话请你来呢。”我也笑着问道：“今晚有什么好节目？”“当然有。”他略有些狡黠地眨了下眼，说道：“我前几天从箱子里翻出一幅章太炎书写的对联，刚刚挂上，特请你来一赏。”进了他的书房后，果

然壁上新换了一幅对子，章太炎篆体书写的有碗口大小的字，盖出自太炎先生晚年

之笔，神完气足，味道淳古隽永，在他的墨迹中应属上品。文曰：“龙惊不敢水中

卧，猿啸时闻岩下音。”这是节录李白《夜泊黄山为殷十四吴会吟》一诗中的两句

。乔冠华听到我连声赞叹，很是得意。他特意指出其中的几个颇为古异于通常小篆

的字说，这几个字选字得体，尤见太炎的功力。他告诉我说他特意请翟荫塘同志查

出这几个字由石鼓和彝器中的出处。赏玩了一会儿，俩人的目光不期而遇，他悠悠

地说道：“该言归正传了。”我们不由得放怀大笑起来。

我们都太兴奋了，这两天也都太紧张了，本应急欲畅谈一下。林彪叛逃事，那

时还不能和家人、朋友谈，只能在“知情者”间谈。从何谈起呢？赏玩太炎这幅字

。好像使我们都松弛了好多。

我们围绕着“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主题谈了起来。他拿出一瓶未启封的茅台，我们边谈边饮，兴致达到了高潮。我又抬头望着那幅对联，突然想起了另一位唐人的诗句，脱口诵出：“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乔冠华听后，沉思了一会，突然将满杯茅台一饮而尽，对我说道：“贾宝玉不是说述旧不如编新吗？我把这首诗略加改动，你看新意如何。”他又斟满一杯，端在手中，站起身，用他那苏北口音吟了起来，吟毕又一饮而尽。真是豪兴冲天。后来郭沫若同志看到了他的这首新“塞下曲”后，曾挥毫将此诗书成条幅并加赞语赠给乔冠华：

“月夜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巧合无间，妙不可言。嘱题小幅一轴，欣然命笔，以示奇文共欣赏，好事相与祝也。冠华同志座右，望常拍案警奇。

乔冠华刚把“改诗”用铅笔誊出，电话铃响了，是部值班室来的，又接到我蒙使馆报告了。我急忙告辞准备直接去办公室，临出门时，乔冠华说：“本应把半瓶茅台给你带去，不过你今晚就要酩酊大醉了。我这里有包速溶咖啡，给你带上，你会发现它的妙用。”



9月15日下午3时30分，我国驻蒙使馆报告：许文益大使及随行人员4人已于下午2时乘蒙方专机前往飞机坠毁现场视察。

9月16日晚11时30分，我批发了一份文件催问视察情况和现场停留一天的原因。

9月17日晚8时30分，我驻蒙使馆报告，大使等4人已于晚7时回到乌兰巴托，并简要报告了现场情况和延长时间的原因。

请示总理后，我用专线和许文益同志通了话，告其速派专人送回有关材料，并面报详细情况。

9月18日凌晨1时，接使馆报告，决定派孙一先二等秘书送现场照片、目测示意图和有关材料回部，并当面汇报。

9月19日晚，驻蒙使馆报告，孙一先于20日乘四次列车离乌兰巴托回国。

9月21日下午3时30分，从乌兰巴托开来的国际列车准时到达北京车站。

我和秘书王万慧同志早已到车站等候。孙一先和中建公司的贺喜同志同车到达，一下车我们就迎了上去。孙、贺两人和我们打过招呼后，就东张西望。显然，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专程来接他们的。王万慧同志把孙一先同志拉到一旁，我低声对他

说

：“我就是来接你的，已安排好你暂住招待所。”随后又告诉贺喜同志，他可以独自回家，关于我国有一架飞机坠毁的事，没有公开之前要保密，不能外泄。

来到外交部招待所早已准备好的房间，孙一先同志便把从使馆带来的文件和现场拍摄的胶卷交给我，我马上要王万慧同志先把这些东西带回部，把文件交给值班室主任徐连儒同志妥为保管，胶卷交给正在待命的孙秀娟同志冲洗。然后，我对孙一先同志说：是周总理要我来车站接他的。并告诉他飞机坠毁，情况很复杂，要绝对保密。并向他交了几条注意事项：第一，暂住招待所，不许外出，也不要招待所内到处走动；第二，不要同外面联系，包括亲属和所属单位；第三，如果在招待所遇到熟人，就说是临时回国送文件，现在正等回件，随时准备返馆，有关飞机的事，一句也不能讲；第四，随时准备汇报，并将一个电话号码和外交部值班室主任徐连儒的名字写给他，如果有事可与他联系。

晚上，11时许，我和姬鹏飞、韩念龙等同志来到大会堂福建厅，总理早已到了，正伏案批阅文件。我们尽量在离他较近的沙发坐下，低声研究有关的问题。大约半个小时后，孙一先同志被领了进来。周总理和他握手后，突然回过头来问我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谁，还没等我讲完有关贺喜同志的情况，他一听说贺已回家，

便  
面色一沉，那双著名的浓眉猛然一蹙，厉声打断我的话：“你当过兵吗？”霎时  
间  
，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总理对外交部的许多干部的经历是十分了解的。他当  
然  
知道我曾在部队里工作过。记得我第一次单独见总理。是在 1950 年的 7 月，  
我  
被任命驻蒙古使馆临时代办，因为是新建馆，临行前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听  
完  
总理的指示起身告别时，总理半开玩笑地指着我说，“已经是外交官了嘛，怎么  
还  
穿军装？”此时此刻，问我这个问题分明是批评我的警惕性跑到那里去了。他严  
肃  
地审视着我，好像真的等我回答是否当过兵。我立即回答：“我马上把贺喜找回  
来  
。”

约一个半小时后，服务员请我到隔壁房间接部值班室的电话，说已按我的交  
代  
把贺喜同志从酣睡中叫醒，并已送进招待所住下，待孙一先同志回去后向他转告  
注  
意事项。这时我真有如释重负之感。每逢我回忆起敬爱的周总理，回忆起他的音  
容  
笑貌，回忆起他对我的工作时的教诲和批评时；这件事的印象总是那么深刻，当  
时  
的情景历历在目，就好像发生在昨天。说来奇怪，在我遇到困难，在感到举棋不  
定  
，犹豫不决时，耳边常想起总理用十分严厉的语调问我：“你当过兵吗？”

孙一先汇报完情况，我看了眼手表，已是 2 2 日凌晨 2 时多。服务员送来了夜餐，每人一碗热汤面，唯独总理外加了一小碟花生米。按经验我知道会还要接着开下去。果然，先是李德生和邝任农同志到了，紧跟着是吴法宪。总理把现场照片交给他们传看，同时把另一套照片交给杨德中同志，并说，由你主持研究一下，飞机究竟是怎样坠毁的。又对我说：“你也参加。”杨德中同志和我来到东大厅，公安部长李震、北京军区空军司令李际泰等已坐在那里等候。等他们仔细看过照片和示意图后，我根据孙一先的汇报和使馆的报告材料，作了必要的说明，大家就分析、讨论了起来。最后一致认为，李际泰同志的分析有道理。李的看法是：飞机因燃料将要耗尽，被迫做紧急着陆的准备，驾驶员不熟悉较大区域的地面情况，最好的选择就是找一块平坦的地方，冒险以飞机机腹擦地降落。看来，飞机着陆后，由于失去平衡，右翼向下倾斜，触及地面，与沙石冲磨，骤然升温引起油箱起火，从而导致全机爆炸。从当时特殊情况来看，驾驶员技术很好，选择了唯一的处理办法，当然，也不排除其它原因，例如，机件失灵，或被地面炮火击伤而坠落，或击伤后被迫着陆，但这些可能性较小。杨德中同志认为，有必要找一架同类型飞机并和驾驶员及有关地勤人员研究一下。大家赞同这个办法。我又建议，最好把孙一先同志也带去。

早晨 4 点多，杨德中同志又去向总理汇报分析结果。我走出大会堂北门，天色微明，回头望去，福建厅的灯光从窗纱中透出，总理仍在工作。

9 月 24 日上午，我驱车驶过天安门广场，看到成群的学生仍在庆祝“十一”排练队列，一切照旧。按照总理的指示，要把事件保密得尽可能长些，要尽可能赢得时间处理“善后事宜”，以防不测。当汽车从东单向北拐去时，我听到有广播车的声音，忙问司机同志：“在干什么？”，他好像明白我的心思，把车子靠在马路旁停下，并摇落车窗，声音十分清楚响亮：“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我拍了拍司机的肩膀，对他说：“我们走吧。”

9 月 26 日晚，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里，仍按原计划出国访问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正在向总理汇报准备情况并听取指示。我作为代表团的成员，离总理坐得很近，灯光下，我发现总理半个月来明显地消瘦了，但清癯的面孔上却有一种喜悦和轻松的表情。我们告别总理快要走出北门时，一位服务员从后面赶上来对我说：“符浩同志，总理请你去西大厅。”我一怔，顾不得多想，便疾步返回。

大厅里只有总理一人，他看我站在那里等他的指示，便摆手示意让我坐下，他好像在思考着什么。这时我猜想，莫非有了什么新的任务要我去做，可又不便主动提问。总理终于开口了：“你明天一早就要动身去巴黎，有关林彪叛逃的事，见

到

黄镇同志时，把情况告诉他。”他顿了一下，语气更加郑重地接着讲到：“中央已决定逮捕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这些也告诉他。”并叮嘱说，

只

告诉他一个人。

27日一早，在机场为代表团送行的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同志告诉我，经请

示总理同志，已允许在招待所住的那二位同志和家里取得联系。

9月29日，我们辗转抵达巴黎。当晚，我就前往我驻法大使官邸。与黄镇大

使说笑一番后，我暗示他，奉总理之命有要事转达。他拿着打开的小半导体收音机

踱到花园的草地上，一边慢步，一边谈了起来。显然，他对我带来的信息，非常兴

奋激动，我们情绪相互感染，长时间沉浸在喜悦之中。

不知不觉夜已深了，他突然一拍我的肩膀，提高嗓子对我说：“走，老符，让

我们喝一杯，庆祝一下！”回到房间里，他打开了所有的灯，找出一瓶茅台，斟满

两个精致的刻花高脚杯，他告诉我，这瓶酒他已珍藏多年，一股清芳的香气迅即在

整个屋子里扩散，我发现这酒已变成一种淡淡的琥珀色。

这是我平生所喝过的最美的酒。

□ 原载《人物春秋》第45期

2009年11月10日初稿

2012年5月7日修改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六册（2）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六章 林彪集团的反革命政变活动

##### 第二节 揭批林彪罪行

###### 本节资料

######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逃出国的通知

1971.09.18； 中发 [1971] 57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一、中共中央正式通知：林彪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

现已查明：林彪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极其秘密地私自调动三叉戟运输机、直升飞机各一架，开枪打伤跟随多年的警卫人员，于九月十三日凌晨爬上三叉戟飞机，向外蒙、苏联方向飞去。同上飞机的，有他的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及驾驶员潘景寅、死党刘沛丰等。在三叉戟飞机越出国境以后，未见敌机阻击，中央政治局遂命令我北京部队立即对直升飞机迫降。从直升飞机上查获林彪投敌时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并有大量外币。在直升飞机迫降后，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打死驾驶员，两人开枪自杀，其余被我活捉。对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正在审查。现有的种种物证人证业已充分证明：林彪出逃的罪恶目的，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根据确实消息，出境的三叉戟飞机已于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林彪叛党叛国，是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林彪这个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阴谋家的总暴露、总破产。九届二中全会上，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敢于那样猖狂进攻，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主要原因就是依仗林彪这个黑后台。陈伯达路线，实际上是林彪、陈伯达路线。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第一个坚持设国家主席、阴谋策划向党进攻的是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第一个站出来“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是林彪。审定那个“欺骗了不少同志”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和《林副主席指示》的八条语录的，也是林彪。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林彪陈伯达分裂我党、我军、篡夺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使绝大多数同志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保证了全会的胜利。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立即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领导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一年来，经过在党内传达、揭露、批判陈伯达，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开始的华北会议，毛主席十二月十六日、十二月十九日关于华北会议的两次批示和北京军区的改组，十二月二十九日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的批示，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关于反对骄傲自满的批示，二月十九日关于批陈整风重点在批陈的批示，四月十五日开始的批陈整风汇报会，全党的思想和路线方面的教育收到显著效果。陈伯达的反革命罪行被大量揭露。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空前加强，革命警惕性大大提高。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新胜利。我国的国际威望日益提高。美帝、苏修内外交困，十分孤立。在这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林彪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阴谋完全破产。这次林彪叛国投敌，正是阶级敌人绝望挣扎的表现。林彪反党到底，跟着他投敌的，只有他的妻子、儿子和死党几个人，而在紧要关头揭发林彪、叶群、林立果私调飞机、阴谋叛国投敌，为党立功的，又正是林、叶的女儿林立衡。这就说明：即使象林彪这样名声很大的资产阶级野心家，一旦背叛革命，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内，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是多么孤立。这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三、我们党是从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半个世纪以来，我

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为代表的六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同以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陈伯达为代表的四次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这十次路线斗争证明，各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和两面作风，是很难改造过来的。陈独秀从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堕落为托派，王明从坚持错误路线而堕落为汉奸卖国贼。林彪也是如此。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耐心的教育。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带头攻击毛主席，要求中央撤换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在是否出兵抗美援朝问题上，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乱军的主张。“九大”前夕，他伙同陈伯达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政治报告的准备工作。鉴于他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并且也为党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几十年来，直到这次叛变投敌以前，毛主席总是对他耐心教育，希望他能够改正错误，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但是，林彪口是心非，耍两面派，终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解放军，自绝于中国人民。

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又证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按照正确路线和政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犯了路线错误的好人，绝大多数是可以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的，阶级敌人分裂我党我军的阴谋总归是失败的。中央相信，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必将使全党全军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跟着林彪走绝路的只能是极个别的。中央号召全党同志首先是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各级党委应当深入揭发和严格批判林彪的错误和罪行，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我们全党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四、当前，全党必须提高革命警惕，防止敌人破坏，必须继续加强战备。中央军委已有部署，必须坚决落实。

五、林彪叛党叛国问题，根据内外有别、有步骤地传达的原则，目前只传达到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以上的党组织。有关林彪的文字、图画、电影等均暂不改动。并望切实注意严格保密。

六、你们讨论本通知的情况和意见，望及时报告，密封专送中央。

-----  
注：本件第一步应先印送和传达到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如无常委，即传达给各单位领导机构正副职人员），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分别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和中央党、政机关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中一道听取传达和讨论。如其中有不适宜听传达和讨论的，可由各单位领导机构决定除外，并报中央备案。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传达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黄永胜等人离职反省的通知

1971.09.29；中发〔1971〕61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绝密）：

中央鉴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同志参加林、陈反党集团的宗派活动，陷入很深，实难继续现任工作，已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军委日常工作，中央已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筹组军委办公会议，进行集体领导。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的通知

1971. 10. 03; 中发 [1971] 62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

中央决定，撤消军委办事组，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主持，并由叶剑英、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榘、张才干、刘贤权十同志组成，即日成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军委日常工作。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专案组的通知

1971. 10. 03; 中发 [1971] 64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大军区党委常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中央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和党的核心小组：

为彻底审查、弄清林——陈反党集团的问题，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专案组，集中处理有关问题。中央专案组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吴德、吴忠十人组成。在专案组领导下，设立工作机构，由纪登奎、汪东兴两同志负责进行日常工作。各地、各单位今后凡向中央上报有关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材料，统请以绝密亲启件送交中央专案组统一处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十月三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扩大传达林彪事件的通知

1971. 10. 06; 中发 [1971] 65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一、当前全国形势很好。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中央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八日发出通知，九月二十八日又发出扩大传达范围的通知。全党全军地、师以上党委进行了认真的讨论，一致拥护中央通知和中央采取的各项措施。全党全军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就是几个被林彪及其死党控制很严的单位，广大党员干部一旦了解事实真相，也同样投入了揭发批判林彪罪行的热潮。中央决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离职反省、彻底交代以后，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组织也开始对黄、吴、李、邱揭发批判。以上事实又一次证明，经过五十年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锻炼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毛主席领导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军队。全党全军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反对分裂我党我军的反革命阴谋的。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叛党叛国，无损于我党我军一根毫毛，反而促进了全党全军在毛主席领导下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二、中央在审查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查出了大量物证人证，进一步说明：林彪叛党叛国是“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两个司令部，即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间斗争的继续。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就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林彪、陈伯达及其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全部活动，完全是有所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背叛“九大”路线，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同时，毛主席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等进行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希望他们能够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但是，林彪及其一伙毫无悔改之意。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拖了七个月，黄、吴、叶、李、邱才

勉强写了“检讨”。

毛主席当时曾明确批示，他们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的问题。林彪则长期称病，对毛主席批示同意的中央文件，林彪看也不看，连“完全同意主席批示”这样几个字，也要秘书摹仿他的字体代写，对毛主席和党的事业充满仇恨，躲在黑暗的角落里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

现已查明：林彪不但另立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通过他的儿子林立果纠合一小撮死党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成立了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制造舆论，训练特务，收买干部，从国外进口大批特务工具，设立地下活动据点，准备反革命叛乱。今年八月，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沿途对各地领导干部继续进行党的路线教育，希望全党干部，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并重申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同时，中央决定在今年国庆节前后召开党的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正当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斗志昂扬，迎接新的战斗任务的时候，林彪及其死党不顾毛主席长时期的教育和二中全会以来的挽救，在反革命道路上越走越远，梦想同无产阶级司令部再一次进行较量。在林彪直接指挥下，他们决定实行两项蓄谋已久的极其恶毒的反革命阴谋：（一）谋害毛主席。他们妄图乘毛主席巡视南方的机会，在上海或上海附近炸掉毛主席乘坐的火车。他们具体策划了炸车的时间、地点、代号、武器、方法，指定了具体执行人员。他们还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下手杀害中央政治局同志，并且察看了中央同志住所的地形，画了地图。林彪妄图在实现这一罪恶计划以后，立即上台，复辟资本主义。林彪这项反革命罪行的确凿证据，包括林彪的手令，林彪死党画的地图，已被中央查获。林彪指定的杀人凶手已向中央交代。（二）另立中央。林彪阴谋携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逃离北京，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内战。林彪策划这一阴谋的手令，外逃人员的编组名单，已被中央查获。参加阴谋策划的有关人员已向中央交代。以上第一项阴谋，由于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他们的部署，未能得逞。林彪遂于九月十二日私调飞机，准备九月十三日晨七时起飞，实行第二项阴谋。但是，毛主席于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他们的阴谋。林彪惊慌失措，加上林立衡向中央作了揭发，他感到阴谋暴露，就提前几小时、带着妻子、儿子及少数死党仓惶逃命，狼狈投敌，自取灭亡。黄、吴、李、邱在林彪叛党叛国以后，

未向中央作任何揭发交代，中央等待十天之久，眼见他们活动频繁，毁灭罪证，遂于九月二十四日命令他们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如果林彪叛党叛国集团的阴谋得逞，中国将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地、富、反、坏、右一起上台，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革命的共产党员，无产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青年，就要受到残酷屠杀，亿万群众就要吃二遍苦。然而，这仅仅是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痴心妄想。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坚强团结和高度警惕，已经粉碎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使全世界的帝、修、反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

三、为了使全党全军全国革命群众早日了解林彪叛党叛国事件，中央决定：在十月中旬将传达范围扩大到地方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军队连级党员干部，空军各机组、空勤地勤成员。传达的文件是：中发[1971]57号、61号、62号、64号文件，和本通知。具体步骤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负责安排。应争取早日传达，再逐步深入地进行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时，应抓住重点，着重揭发“九大”以来林彪陈伯达集团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阴谋活动，特别是林彪及其死党叛党叛国的阴谋活动，以便早日将林彪及其死党的全部罪行彻底查清。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将传达、讨论和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当作当前头一位的大事来抓。中央准备在十月下旬扩大传达到全体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战士、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各单位要预作准备，具体做法中央将另行通知。在传达和讨论中，要加强对重点单位的领导，严格贯彻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作深入细致的工作。随着揭发批判的逐步深入，把批判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中央相信：在一年来批陈整风的基础上，只要各级党委认真领导，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必将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四、目前国内外敌人对我国内形势进行种种猜测，制造许多谣言。全党全军务必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应坚决打击。中央重申：要严格

执行保密规定，不得向没有听传达的传播。

五、各级党委传达讨论情况，逐级密封上报，特别重要紧急情况可以直送中央专案组处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不许翻印，不许传抄，注意保密。）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曾山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一九二九年，林彪是一个对革命没有胜利信心的悲观论者。毛主席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光辉著作，就是毛主席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批评了他的错误思想。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上集中，曾刊印过这封信，后来被人在此书上有意抽掉了，但书上还留有痕迹。

二、叛徒卖国贼林彪打仗时不听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三〇年十月初，我军攻打吉安城时，黄公略同志向我说，总前委作了决定，毛主席指示攻打吉安城，命令红三军从城西南进攻，红四军从城西北进攻，等候两军到齐，同时进攻。但是，林彪违抗毛主席的命令，不等红三军到，即指挥红四军攻城。结果，打了一天多，伤亡不小，攻城没有奏效。幸而守城的狡猾敌人夜晚向赣江逃跑了，但反动派的武器弹药我们无所获。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第六节中指出：“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这就是批评林彪的。

三、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毛主席决定我部主要打正在撤退逃跑的敌军尾部，以迫使敌军快退出苏区，这样有利于苏区的恢复工作。可是，林彪却指挥红四军向高兴圩敌人发起攻击，打得相持不下。当时，毛主席到了前线，林彪才向主席说，原来以为打的是逃跑敌军的尾部，现在证明是蒋蔡主力。部队已伤亡近三千人。这说明林彪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当即命令退出战斗，部队转移到东古附近，在白沙岭打了一仗，把韩德勤一个师全部歼灭，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邓子恢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据我所知，“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就是林彪这个大叛徒提出的。我到中央之后（五三年或五四年），我记得毛选上还刊有林彪的这封信。后林彪曾写信给毛主席，要求把他这封信撤销。

二、反对抗美援朝。大概是五一年，我到中央开会，去见他，他就对我讲，我看现在不要出国作战，因为我们的国家刚刚初定，国内还有些残余匪徒没有肃清，这个时候要顾内、又要顾外，对我们是不利的。我看还是等敌人打到鸭绿江边，那时候我们以自卫的形式抗战，在政治上比较有利。后来，毛主席否定了他这个错误意见。

三、他对高岗非常赏识。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在汉口我同他同事近一年，他经常同我讲，高岗怎么了不起。到中央后，很多事情他袒护高岗。我记得五四年初，高饶事件爆发，我去见毛主席，陈云同志也在座，毛主席对陈云同志说，你去告诉林彪（林那时在西湖），要他对高岗再不要袒护，否则我们同他就要分裂了。

四、一九五〇年或一九五一年时，我任中南局第三书记兼四野第三政委，陶铸是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去广西视察工作，发来电报说张云逸同志在广西剿匪不力。当时我们没有回电，但过几天后，中央来个命令，把张云逸同志调开，指定陶铸兼广西省委书记。那时林彪已到中央军委，此事估计是他的主张。他不向中南局，也不向我征求意见，就把张云逸同志调开了。

五、我在一九五一年以中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出布告宣布四大自由，即买卖自由，借贷自由、租佃自由，房屋租赁自由，犯了路线错误。而林彪于一九五〇年初，在武汉召见工商界首领时，就对那些资本家讲四大自由。

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叶群在中南组讨论设国家主席问题时造谣说，中央政治局意见，应该设国家主席。现在才知道，这是林彪搞的鬼。

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李富春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遵义会议他并没有讲什么话。遵义会议后不久，他就散布攻击毛主席的言论说：“部队这样拖会拖垮，这样领导还行吗？”他伙同彭德怀、张闻天等一起来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领导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会议上，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他。遵义会议刚刚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毛主席

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他就出来反对，这是很恶毒的。

二、一九四六年三月，在东北，我听说中央来电，为着推动马歇尔的调处，同时阻止敌人向北前进，以利于争取时间，创造东北根据地，要林彪指挥部队围攻四平，相机占领四平。但是，林彪却集中山东调来的大部分兵力强攻四平。结果打了二十天左右，部队伤亡很大，打不下来。当时杜聿明的新一军正用飞机向长春运兵。在这个情况下，林彪就仓惶撤退，一直撤到哈尔滨。并准备随时放弃哈尔滨。为此，在哈尔滨铁路桥座上埋了炸药，准备随时炸桥。当时黄克诚到哈尔滨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回来对我讲了两次，说：“齐齐哈尔站不住啦，要向北安撤退。”这是他本身的右倾，同时是林彪的影响所致。

三、他在东北土改中对“左”的政策欣赏。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东北开始搞土改。我是七月由西满调东北局的，八月，新华社把华北地区土改搞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这一套都广播出去了。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把这些也登了东北日报。我亲自到双城请示林彪、罗荣桓。而林彪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几天以后，有的地方发生侵犯中农的现象，我又打电话给前方，由罗荣桓同志回来开了东北局会议，到九月才决定取消了这种“左”的宣传。但真正纠正是到了十月，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和十一月主席对于当前几个政策问题的下达。

四、在东北，林彪同高岗关系密切。

在召开东北局会议前，他往往先同高岗商量，然后由高岗主持东北局会议，而他是不经常参加会议的。高岗在东北想当东北王，到了中央，野心更大了，这是因为有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的支持。

五、他在东北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不主持东北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参加政治局会议，那知他在背后搞鬼。第二，接触中不交心，不谈政治，不暴露思想。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陈毅给毛主席的信

主席：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党中央，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正确措施。林贼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的阴谋未逞。仓惶

出逃，坠机自取灭亡。这是卖国贼的必然下场。这是党的又一次最伟大的胜利。在党的五十年斗争史中，主席总是事先洞察一切，及时抓着阶级斗争的动向，彻底加以揭露，使任何反党野心家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在主席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每一个紧急关头，都能顺利扭转局势转危为安。这次林、陈反党集团的被粉碎，更是履险若夷，迅速平乱，使我党我国我军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今后的胜利会更大。特此祝贺！

我患病将近一年，仍在继续治疗。我感谢主席和党中央对我的关怀。我揭露林贼罪行的录音稿太长，难于看。

兹先整理一份摘要材料，先送呈，请审阅。

敬 祝

主席万寿无疆！

陈 毅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

（下面是陈毅同志对林贼的揭发材料）

揭露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早年的反党错误和罪行

一、大叛徒林彪是一个逃跑分子。我记得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由广东转移到江西大庾时，林贼当时担任第七十三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曾经自由离队开小差向梅关方向逃跑，后来又中途折回，表示愿留在部队不走了。并向我说，沿途老百姓搜腰包、打人，有时候杀人很厉害，不能跑了。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动摇逃跑，但又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去而复返，重新回来。

二、大叛徒林彪一贯利用封建关系，任用私人。林贼早在担任第七连连长时就任用他的表弟担任勤务员，把连队伙食费一百二十元毫洋交其表弟背管，结果该犯背款潜逃投敌。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一九二八年在某次战斗中红军又将其表弟俘虏过来，林贼竟敌我不分，又重用该犯在团部当勤务员，让他背卜壳枪出入团部，被团领导发现赶走。这说明大叛徒林彪任用私人搞死党的行为不是自今日始。

三、林贼口头上拥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际上早年就一贯破坏红军纪律，经常同勤务员等一伙亲信吃吃喝喝，每到一地总是抓老百姓的鸡吃不给钱。经批评后有所收敛，但不久仍然旧病复发。

四、红军第四军由主席率领从井冈山向赣南作战略转移时，占领大庾城后，由二

十八团担任新城、赣州方向的警戒。不料黄昏前遭敌突然袭击，发生战斗。记得当时主席曾去前沿阵地观察作战形势，发现二十八团未组织认真抵抗，边打边退，林斌带着队伍在后跑。主席即指示他一定要组织部队打好这一仗，击退敌人，否则对以后转移很不利。林斌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理，竟从主席身边一冲而过，抢先跑往安全地带，只管自己安全，不顾主席面临敌人追击的危险。我当时在场，叫住林彪无论如何不能走，他也不理。幸得后面有一些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才保证了主席的安全。这是大叛徒林彪临阵退却，不顾主席安危的一桩严重罪行，说明他对主席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

五、大庾战斗后，当晚在距大庾四十里的杨梅整顿队伍时，发现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主席要我去告诉林彪要很好照顾何，设法把何抬走。我找林彪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并说明何是从三十一团调来的好同志，无论如何要照顾好把何挺颖抬走，否则会影响两个部队的关系。林斌当时满口答应，但事后何挺颖竟被抛弃。其实当时把何抬走不是不可能的；何挺颖被抛弃，林斌负有很大责任。这是林斌只顾自己，对阶级弟兄、对战友毫无革命感情的又一表现。

六、寻邬圳下战斗中军部遭敌袭击，毛主席和朱德同志受到极大危险。当时林彪所部担任警卫，军部受袭击，林斌没有掩护军部，自己早就上山去了，因此对军部受袭负有很大责任。事后我批评他，他不承认，反而推卸责任，诡辩说军部要他带队伍早到罗浮嶂，没有给他掩护军部的任务。林斌只顾自己，不顾领导同志的安危早年就已有暴露。

七、在圳下战斗后，我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记得前委曾讨论了敌人可能前堵后追，发生建制被打乱的情况，决定如遇此种严重情况，队伍可以分三路行动，由主席率三纵队为一路，朱德同志率二纵队为一路，我和林彪率一纵队为一路。但当时干部战士都不愿分散。几次决定分散行劫，总是分不散。这体现了干部战士对领袖和领袖对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依存关系和战斗团结。彼时此种情景，非常动人，至今令人难忘。林斌面对此种局势，消极悲观，曾多次鼓动我把队伍拉开，不要走原定路线，而另走一路，把毛、朱撵开，说是和毛、朱在一起目标太大，不利于保存队伍和脱离敌人。当时我没有同意，队伍没有拉开。林斌不顾革命大局，企图摆脱领导，使领导同志陷入困境而自求脱身的阴谋未能得逞。

八、四军七次大会刚刚开过不久，主席提议从红四军每个连拨一个班加强闽西的

地方武装，以便成立第四纵队。林彪竟然当场带头反对主席的提议，以致主席的正确主张未能实现。这是林彪从本位主义出发，反对主席主力和地方兼顾的正确方针的严重罪行。

九、一九二九年彭德怀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在余都同主席会师后，主席仍让彭德怀回井冈山恢复工作。随后四军部队到达瑞金，主席观察全国形势，认为江西的形势最为成熟，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林彪很羡慕彭德怀到处打游击，反对主席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认为不能说全国和江西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到来，说是江西福建的老百姓不愿当兵。林彪消极悲观，很怕敌人尾追，主张分散打游击。主席一直耐心对他进行教育。四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这封信油印后在部队和地方广为散发，对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在一九四八年林彪却抵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封信。主席英明伟大，很早就抓住了他的本质，这封信对他自命一贯正确不利，所以他竭力抵赖。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对主席极不老实，耍两面派，是反对主席的又一次大暴露。

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我从中央回来，首先到林彪所部去，林彪问了我去中央的情况，我讲了中央要我负责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我也问了他部队情况，他说几个纵队司令员团结得很好，那批政治小鬼都被打下去了。林彪把政治工作人员诬蔑为政治小鬼，说明他是一贯反对政治工作的。

十一、红军打梅县失利后，队伍开到上杭、长汀之间的官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来统一全党全军的路线，应付全国大发展的局势，推动全国革命的大发展。林彪却要求前委开会，讨论他的分散打游击的主张。林彪在会上反复强调他在永定、上杭之间分散打游击的经验。前委会上争论很激烈，林彪的主张未被通过，但仍坚持保留意见。林彪一贯主张分散打游击，这是对全国革命悲观失望的表现。

十二、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后，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全军团结，气象一新。毛主席和前委率二纵队在龙岩、大小池、古田一带与闽西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安排地方工作。林彪的一纵队和三纵队在新泉、朋口、长汀一带做群众工作。林彪听说江西敌人要从瑞金方面向闽西进攻，不请示主席和前委，即拉起队伍向江西逃跑。后来，主席率二纵队经清流、宁化、归化、广昌到宁都的东韶才跟上一三纵

队。事后我批评林彪在九次大会后竟然不请示，擅自决定分兵行动是错误的，林贼死不承认。林贼闻风而走，不请示、不报告，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分散逃跑的又一罪行。

十三、一九三二年第四次围剿前，我当时在江西军区工作，听前方来人讲，三军团彭德怀部曾发生第二师师长郭丙生叛变投敌事件，部队情绪不高，在小元会议上林贼和彭德怀都要求脱离主力部队分散打游击。此事我只听说，未亲见，还可以核实。但林贼一遇困难就想离开主力分散打游击，这种主张确是一贯的。

十四、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时，同林贼接触不多，有一次我问他第三国际情况，林贼大肆吹嘘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即意大利的陶里亚蒂）等人，说这些人表面上是老先生，实际上本事很大。林贼这样吹捧这些人，同这次仓惶出逃可能早有历史根源。

十五、还有一次林贼向我大肆攻击延安的抢救运动，认为抢救运动中审查叶群是暗害青年，他大讲叶群的好话。林贼这次叛国投敌，更证明了当时审查叶群是对的，可惜没有审查清楚。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得起来的林贼的一部分罪行。从以上事例中看出，林贼早年就多次反对过毛主席，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对中国革命消极悲观，曾多次动摇逃跑，企图分裂红军。林贼为人阴险，耍两面派，培植死党，专搞阴谋，也是一贯的。此次发展到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不否认林彪在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之下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湘南进军，我是犯了错误的，林贼在桂东一仗还是打得对的；红四军七次大会上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林彪是写信支持毛主席的，这也是历史事实。在揭发林贼罪行时，我不否认我在历史上所犯的这两次大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上揭发的事实，提供参考。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朱德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毛主席，党中央：

当我开始看了主席亲自批发的57号文件时，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叶群叛党卖国的罪恶活动，感到很突然，并且非常气愤。后来又看了主席批发的其他四个文件及有关文件。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

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由于主席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只好仓惶出逃，自取灭亡，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颗埋在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也是一件大好事，它使我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叛党集团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坚决拥护中央撤消军委办事组，并责令林的死党黄、吴、李、邱停职反省的决定；坚决拥护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和中央专案组。我一定要坚决地站在主席一边，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批臭这个无耻叛徒。

近日来，经过反复回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和林彪其人，感到他走上反党反革命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的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剥削阶级烙印，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那时，党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从他所在的连队里调入，调枪枝，就调不出来。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了个人主义。我军从井冈山建军起，就建立了军事人员服从政治委员领导的制度。他不相信政治委员的领导作用，也不接受政治委员的领导。党派去的政治委员，他不与之合作，不服从政治委员的领导，有的甚至被他排挤出来。他只要政治部主任，好便于他独裁。他从来就看不起他的上级。井冈山时期他当连长时，就看不起营长周子昆同志，他想办法反对周子昆。后来他当了营长，便开始反对团长王尔卓同志。联想到遵义会议后他带头攻击毛主席、阴谋夺毛主席的权，和这次妄图谋害毛主席，犯上作乱，图谋篡党，也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在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国内外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在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他们窃机向苏修方向逃窜，看来他与苏修及其豢养的汉奸王明是早有勾结的。抗战时期他在苏修养病多年以后回来（中央应当认真审查他这段历史），便极力吹捧蒋介石有什么“和平诚意”，并积极要求去“说服”蒋介石不要和共产党搞摩擦。在他一再要求下，中央允许他去重庆“说服”蒋。去了一个多月，毫无结果而归。联想到当时王明一伙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看来他们是有国际背景的一路货色。最后，我恳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远健康长寿，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全世

界人民的希望。

专此敬礼

余容后呈

朱 德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向全国群众传达林彪叛党叛国事件的通知

1971. 10. 24；中发 [1971] 67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中央决定：各地、各单位自接到通知之日起，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向全国广大工农兵群众传达。传达的办法如下，

一、传达的文件：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五个重要文件（中发 [1971] 66号文件）和本通知，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

二、传达的范围：全体共产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战士，工厂、矿山、企业、事业位全体职工，农村人民公社全体贫下中农和中农，大学、中学的教职员和学生单，小学教职员和高年级学生，城镇居民中的劳动人民，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

地、富、反、坏、右、资本家，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和正在进行审查的人，都不能听传达。外国人也不能听传达。

传达的范围可以逐步扩大，先党员、工农兵，后其他；也可以同时传达。由各地、各单位自行安排。但最迟应在十一月底以前传达完毕。

爱国人士、外国专家和中国籍外国人如何传达，另行通知。

三、传达的方法。根据若干试点单位的经验，首先应将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向群众宣读。其中，57号、65号和《我的一点意见》要反复宣读、讲解多次。宣读的同志，事先要读懂文件，做好准备。宣读以后，组织群众讨论。群众提出的问题，



属于文件已经讲了的，可以通过讨论、讲解文件解决。庐山会议情况，可以由参加批陈整风的同志进行说明。在宣读、讨论和讲解的过程中，要始终抓住重点，而不要追究枝节问题。要引导群众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多次指示，使广大群众充分认识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妄图改变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鼓舞广大群众同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斗争的决心和信心。一个单位经过十天左右的时间，经过几次宣读、讨论、讲解，大部分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有些问题，需要在今后学习中逐步解决。

四、加强领导。将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在全党、全军、工、农、兵和广大群众中进行传达，是全国政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大事。各级党委务必抓紧，抓细，抓好。要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情况，作出统一规划。在农村，要注意农时，适当安排。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都应当亲自试点，向群众宣读、讲解中央文件，参加群众的学习和讨论，总结群众的经验，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同时，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作出恰当的处置。中央相信：经过传达、讨论，经过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必将进一步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五、在广大群众中传达以后，原来关于林陈反党集团问题的保密规定，应作相应的修改。在工农兵和劳动人民中议论这个问题，是允许的。但是，仍然不登报，不广播，不写大字报，不写标语口号。同时，要教育听传达的群众，提高警惕，不要向阶级敌人泄露。

六、各单位传达讨论情况和揭发材料，逐级上报。重要的可以直送党中央和毛主席。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此件发至农村人民公社党支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支部，机关、连队党支部）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印发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五个重要文件

1971. 10. 24; 中发 [1971] 66号

目 录

一、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57号

二、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1号

三、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2号

四、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4号

五、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5号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五个重要文件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印发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

1971. 10. 24; 中发 [1971] 68号

目 录

一、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7号.....1页

二、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0] 62号.....5页

三、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57号.....13页

四、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1号.....21页

五、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2号.....23页

六、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4号.....25页

## 七、中共中央通知

中发 [1971] 65号……………27页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人员时的讲话我讲了一路，一路都讲，无非是讲了一点材料。陷得比较深的是广州，他们现在搞得比较好。其次是武汉。[周恩来：武汉检讨还没有写出来。]

（此时叶剑英进来了）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师。老师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周恩来：后来杨成武大树特树绝对权威。）那是树他自己的。（周恩来：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更厉害了，简直说得不象话了。）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把污水尽往自己身上刷，我说，你不要讲了。

（周恩来：万人大会斗陈毅，外事口的一些外国专家也参加了，当时搞不清楚。斗完后要把陈毅抓走，大会堂的服务员不让抓走。问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抓？服务员说主席叫保我们就保。）斗他的时候，向前向后三鞠躬，上汽车后又推翻了，又不承认了，说是你们逼我讲的。

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叶剑英答：当时我也不清楚。）廖汉生为什么要抓？（周恩来：廖汉生是与贺龙有关系。就是贺龙，主席当时也不同意这样搞。）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后又不承认。

你们如果有时间，鲁迅的有一本书是值得看看的。《准风月谈》的后记里，有曹聚仁写的一篇《文艺座谈遥领记》。曾今可要开文艺座谈会，请了曹聚仁没去，报上登出来，他成了发起人。曹就问龙榆生，那天的会是怎么开的，龙说：就是吃点点心、喝喝茶。曹聚仁说：“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啦！”这件事，可见那时斗争的复杂。现在，吃了人家的茶，就是人家的人？我看不一定。今天你

们吃了我的茶，就是我的人吗？不一定。总理、康老都喝过他们的茶嘛！吃了他的茶，就是他的人，不要党，不要中央了吗？

《我的一点意见》写好后，第二天早晨总理、康老去找林彪，看了以后，他说同意了。《我的一点意见》当时没有题目，撇开一些问题，中心是个主席问题，我就撇开。那个司令部要我当国家主席是假，林当主席、林接班是真。也有一些人是真心要我当主席，和林彪不一样。有人说，我不当主席，老百姓通不过。我说：我不当主席有十几年了嘛。我这个人，同你们吹一吹是可以的，要我当国家主席，天天去迎接外宾，迎来送往，什么国书啊，那一套，无非是催我见上帝。（叶剑英：主席很忙，还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写出来。）和大家吹一吹就是了。

那些人整叶剑英的黑材料，我都看过，他们是步步升级，先是炮轰，后是打倒。后来他们看形势打不倒了，也就不打了。“红造”并不都是“五·一六”。整理的黑材料，有一条国民党报上的消息，说红军长征了，叶在江西投降敌人。他是跟着长征了嘛，你们这些老同志都是长征的，那有那个事呢？

红军的传统历来不能自己打自己。（指张国华）你就是王佐部队的一个兵。（周恩来：后来是司号长。）王佐这个人无论如何是有功劳的，而且还加入了党。就是舍不得那个山头，吃不了苦。王佐这个人被彭德怀杀了，这就不好了嘛！那有共产党的部队打共产党的部队？五军团的冀登同也不该杀。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你把解方这样的人杀了干什么。（周恩来：那个王实味也可以不杀。）不杀，现在多好。国民党抓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活证据嘛。

（注：此件为中发〔1971〕148号文件）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通知

中央在审查林陈反党集团案件中，从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这个《纪要》证明，林彪一伙发动这次反革命政变是早有预谋的。

这个反革命纲领，颠倒污蔑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斗争历史，把国内

外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捏造事实，制造谣言，挑拨离间，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它的实质，是反对党的“九大”路线，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苏联美反共反华反革命。如果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中国就会象毛主席曾经指出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但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是绝不能得逞的。他们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自己的力量。他们所谓的“基本力量”和“可借力量”，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林彪一伙图谋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颠倒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只能是痴心妄想。他们策划的反革命政变阴谋，终于彻底失败了。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毛主席最近批示的七个重要文件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材料之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被打倒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总是用武装的或者“和平的”手段，力图消灭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毛主席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国内国际的阶级敌人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千方百计地在我们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就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

党内的代理人。这个反党集团的出现，正是国内国际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党，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林陈反党集团的路线，集中反映了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反革命复辟的愿望。

但是，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是绝不能得逞的。他们是反动派，代表没落的腐朽的帝国主义和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他们是没有前途的，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林陈反党集团图谋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反革命复辟，只能是痴心妄想。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继揭露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揭露了阴谋反革命政变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除了一害。这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这对于帝、修、反是最大的一次打击。这是我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下面是中央专案组根据已经查实的物证、人证，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材料之一，主要讲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九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前后的斗争情况。其他材料将陆续整理。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材料之一）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就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九大”前夕，林彪伙同陈伯达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政治报告的准备工作。

“九大”以后，林彪和陈伯达破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在林彪的指使下，吴法宪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任命周宇驰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林彪、陈伯达及其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全部活动，完全是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背叛“九大”路线，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

林陈反党集团策动的反革命政变，是有国际背景的。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七月中旬，陈伯达一反常态，特意穿上军装，窜到中蒙边境活动。他在李雪峰、郑维山的陪同下，到处接见前线驻军，召开群众大会，发表讲话，制造声势。他的这些活动是做给苏修看的。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正当林陈反党集团兴风作浪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遥相策应。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六日，勃列日涅夫偕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率领的武装部队代表团，窜到中苏边界附近的阿拉木图，在那里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动了火箭、炮兵、坦克和空降部队。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到接近我国的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等中亚地区活动，一直呆到九月九日，我党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他才离开中亚。格列奇科还到后贝加尔、蒙古等地活动，视察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部队，叫嚷边防军要“加强战斗准备”，对我施加压力。同时，继续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但却不点林彪的名，集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九七一年六月至九月上旬，苏修反华文章急剧增加，据初步统计，苏修中央一级的报刊、电台发表和广播的反华文章，竟达七百九十六篇。

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

#### （一）

一九七〇年三月八日，毛主席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三月九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主席的指

示，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三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向毛主席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三月十七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到会同志拥护毛主席关于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的意见和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林陈反党集团把四届人大看作是“权力再分配”的会议，阴谋利用修改宪法和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他们反党的政治纲领，是要设国家主席。他们反党的理论纲领，是坚持天才的观点。核心的问题，是要设国家主席，是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

四月十一日，林彪带头反对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提出仍然要设国家主席，并说要毛主席再任国家主席。四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向毛主席作了请示报告。毛主席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但是，林彪始终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林彪对叶群说：“国家还得设主席，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主席。”叶群对吴法宪讲：“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他们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假的，林彪要步刘少奇的后尘想当国家主席是真的，这就暴露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

接着，林彪的同伙陈伯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他把持的政治研究室组织了一个秘密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的宪法修改稿，搞了一个反映他们反革命路线的“宪法修改草案”，伺机向党进攻。

七月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上，陈伯达，叶群一唱一和，对中央政治局起草的、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同意的宪法修改草案，恶意中伤。他们形“左”实右地提出，要在宪法上写上“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还胡说什么宪法修改草案没有写备战，想方设法对修改宪法的工作，进行破坏和捣乱。

六月中旬至七月下旬，陈伯达在林彪的支持下，窜到华北各地乱跑乱说，拉拢和联络李雪峰、郑维山等人，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为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篡党夺权作准备。

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宣读了林彪、叶群亲自指挥炮制的所谓“讲用报告”。林彪听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录音，得意地说：“不仅



思想象我的，语言也象我的”。八月四日，空军常委决定在空军系统“三代会”上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吴法宪等人狂热地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吴法宪还公然宣称：“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这样，吴法宪就在林彪的指使下，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八月十三日，在修改宪法小组会上，吴法宪在陈伯达的怂恿和支持下，违背毛主席在修改党章时圈去三个副词的指示，借口“天才”问题，制造事端，向中央领导同志发动进攻。同时，又秘密地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情况，进行密商。修改宪法小组散会后，陈伯达又要吴法宪到陈的家里，密谈到次日凌晨。陈、吴密商后，黄、吴向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叶群告诉吴法宪：林彪说，你这次干得好。

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多次密商，积极策划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党进攻。他们搜集了关于“天才”的材料，找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林彪布置姜思毅 [1] 等人，给他起草关于宪法问题的讲话提纲，同时又布置林立果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讲话提纲，准备向党进攻的弹药。八月二十日，林彪、陈伯达、叶群等带着他们准备好的反党炮弹上了庐山。

## （二）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召开的，是在党的“九大”路线不断取得胜利，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高潮的情况下召开的，是在国际上反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不断取得巨大成绩的情况下召开的。

这次会议，从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到九月六日结束，共开了十五天。

八月二十二日，即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一天，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作了重要指示，规定了这次会议的方针，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在这次会议上，林彪、陈伯达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和要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再一次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八月二十三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同志

宣布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备问题。康生同志在会上讲了毛主席对修改宪法的历次指示和修改宪法的过 程，说明了对全国人民提出的修改宪法意见采纳的情况。

林陈反党集团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和规定的会议方针。他们认为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和部署，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就迫不及待地动手了。

林彪上了庐山，不去请示毛主席，在八月二十二日下午的常委会上，也没有表示要在大会上讲话。在事先没有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报告的情况下，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会议上，第一个跳出来，发表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讲话。他继八月二十二日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之后，在这次讲话中又打出“天才”的反党纲领，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疯狂叫嚷：我还是坚持天才这个观点。他的讲话，是一个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他向党突然袭击，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林彪讲话后，叶群，吴法宪等人加紧进行秘密活动。叶群特别嘱咐陈、吴、李、邱在小组会上要含着眼泪发言，宣讲语录，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在当晚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上，吴法宪突然提出，要全会学习林彪的讲话，明天听林彪讲话录音，蓄意改变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面连夜加工炮制称天才的材料，私拟了国家主席一节的宪法条文；一面四出活动，多方串连，组织力量，部署进攻。吴法宪接连找王秉璋 [2]、王维国 [3]、陈励耘 [4] 等人谈话，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中央某些负责同志，鼓动他们在小组会上向党发动进攻，要他们讲设国家主席和“天才”两个问题。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联络人，进行了布置。

同时，吴法宪又打电话给当时留守北京的黄永胜，传达了林彪的黑指示。黄永胜按照林彪的讲话口径，授意他的心腹宋城 [5]，替他起草向党进攻的讲话稿。黄讲了起草讲话稿的要点：（1）拥护林彪的讲话；（2）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称天才是“讽刺”，这是反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3）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许多情况不正常，等等。

八月二十四日，在林彪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按照

事先商量好的口径，一齐出动，分别在全会的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同时宣讲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陈伯达在发言时，使出造谣和诡辩的反革命伎俩，大肆鼓吹林彪提出的“天才”的反党纲领，疯狂叫嚣要设国家主席，十分凶狠毒辣地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林彪给叶群定了发言口径，叫叶讲“天才，领袖，指针”，“天才从理论角度讲，领袖从历史角度讲，指针从现实角度讲”。叶群在会上气势汹汹，大讲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问题。她还假惺惺地挤出几滴眼泪，表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感情”。她声嘶力竭地叫喊：关于“天才”的观点，“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当晚，林彪把他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稿送给陈伯达整理和修改。陈伯达在整理时，吹捧“林彪的讲话很好”，“林彪是个天才”。李作鹏写信给叶群，密商向党进攻的反革命策略。

林彪、陈伯达、黄、吴、叶、李、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制造了许多谎言，概括起来说，主要是五大谎言。

(1) 他们造谣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恶毒地说：“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他还站起来手舞足蹈地表演了一番。这完全是造谣中伤。早在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并且发表过声明。从一九七〇年三月到这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先后书面和口头讲了六次不设国家主席和不再重新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第一次，是毛主席三月八日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第二次，是毛主席四月中旬关于“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的批示。第三次，是毛主席四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毛主席用三国历史故事，告诫林彪等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第四次，是在七月中央召开的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期间，毛主席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两次谈过这个问题，对林彪、陈伯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林彪口头上讲，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但他对毛主席的六次指示，半句也不听，顽固地坚持他们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目的就是他自己要当国家主席。

(2) 他们造谣说，有人反对提毛主席是天才，说“天才”是“讽刺”，要翻八届

十一中全会的案。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林彪、陈伯达、黄、吴、叶、李、邱都知道，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时，毛主席两次圈去新党章草案上的三个副词 [6]。当时，中央负责同志根据全会一些同志的意见，向毛主席报告说，这三个副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毛主席指示，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八届十二中全会传达和讨论了毛主席的指示。“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和政治报告都没有写这三个副词，宪法修改草案也没有写这三个副词。林陈反党集团以“天才”问题作借口，大做文章，要翻“九大”的案，目的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3) 他们造谣说，新宪法是他们长期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经过他们长期斗争才写入宪法修改草案的。这是无耻的捏造。事实是，在中央政治局历次讨论修改宪法问题的会议上，在一九七〇年七月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时候，林彪，陈伯达、黄、吴、叶、李、邱都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八月十二日修改宪法小组根据康生同志的意见，综合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建议，将这句话写在草案的序言里。八月十三日，经过修改宪法小组讨论，由序言移至总纲第二条。八月十四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没有任何争论就通过了。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咬一口，陷害中央负责同志，用心何其毒也。

(4) 他们造谣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卑劣的谎言。毛主席的谦虚，决不是“谦谦君子”，而是实事求是。他们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毛主席，说成是“谦谦君子”，不讲毛主席的高度原则性，这种说法的本身，就是贬低毛主席。毛主席批判了他们的这种说法，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5) 他们造谣说，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事实证明，背叛“九大”路线，背叛新党章，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林陈反党集团无中生有，制造谣言，在庐山会议上刮起一阵反革命妖风，恶毒攻击和污蔑中央某些负责同志是什么“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要“揪出来”，“千刀万剐”、“斗倒斗臭”，等等。实质上，他们的矛头是指向伟大领袖毛

主席，妄图分裂党，夺毛主席的权，夺党中央的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八月二十五日，陈伯达通过李雪峰炮制的华北组第六号简报抢先出笼。这号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林彪让秘书把这份简报讲给他听。林彪听后哈哈大笑，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看了华北组第六号简报，兴高采烈，神气十足。李作鹏拿着这号简报，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吴法宪马上找小组会议记录人员说，西南组的简报要参照这号简报改写，要把他的发言要点写进去，要把气氛写得足一些，并亲自规定要用那些词，如“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罪该万死”、“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等等。邱会作提出要把他的发言单独出简报。林彪一伙自以为得计，认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有把握了，好象会成功了。他们反革命气焰嚣张一时，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当林彪一伙在庐山向党猖狂发动进攻的时候，空军“三代会”把那个林彪反革命别动队的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为“超天才”也达到了高潮。老子儿子，一唱一和，山上山下，互相配合。林彪、叶群还私自把林立果带上庐山，通过林立果与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秘密联系，指挥他们向党进攻。林彪、林立果还调了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庐山待命。他们安装了六条电话专线，进行秘密通讯联络。在林彪一伙向党发动进攻的同时，叶群亲自布置：“保卫工作要加强，注意安全”。

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全部活动，完全是一次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政变。但是，无产阶级的天下是乱不了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识破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八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六号简报，刹住了林陈反党集团煽起的反革命妖风，拨正了全会的航向。

一九七〇年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揭露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毛主席指出，

“天才”材料，“没有马克思的话。”指出：“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

“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主席还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主席批判了陈伯达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粉碎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使绝大多数同志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保证了全会的胜利。

九月六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主席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在讲到高级干部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毛主席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 [7] 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那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时，毛主席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毛主席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

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同时，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在庐山会议期间，林陈反党集团的阴谋被揭露以后，林彪竭力掩盖他的反党罪行，并为他的几员黑干将开脱罪责，说什么“我和陈伯达过去没有接触”，“军队的几个同志过去同陈伯达也没共过事”，“他们是炮筒子，说话走火”。八月二十九日，陈伯达给林彪打电话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不过那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的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妄图掩盖林彪一伙分裂党的罪恶阴谋。黄永胜上山后，见势不妙，销毁了他早已准备好了的反党讲话稿。叶群作贼心虚，不交出她从中央会议记录中撕下的她的发言记录。邱会作一再提出要从中央会议记录中剪掉他的发言记录。陈伯达、吴法宪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假检讨。林立果气急败坏地对林彪的秘书说：“翻车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指叶群）搞的，她想抢头功，尽是瞎指挥”。

与此同时，林彪、叶群复制九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录音，吴、叶、李、邱指使秘书抄存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叶群还私自抄存华北组第六号简报。林彪派林立果，找王维国、陈励耘进行安抚、鼓气。林立果对王、陈说：“首长（指林彪）知道你们受损失，很难过”，“看来这个斗争还长”。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要继续同无产阶级司令部斗下去。

### （三）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领导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时，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本着“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采取甩石头（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和对三十八军、济南军区报告等批示）、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掺沙子（派负责同志参加军委办事组）三项办法，对林彪，对黄、

吴、叶、李、邱等进行了严肃耐心的批评教育和仁至义尽的挽救，希望他们能够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毛主席一系列的教导，使全党全军干部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但是，林陈反党集团却不顾毛主席的教育和挽救，在反革命道路上越走越远。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四日，毛主席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批评了吴法宪及其同伙，指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主席还指出：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这里说的个别同志，就是指林彪，就是批评林彪不听招呼。毛主席还驳斥了吴法宪在检讨中提到的“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当吴法宪说到，陈伯达造谣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时，毛主席批示：“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毛主席还批示：“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这里说的其他宣讲员，是指炮制和宣讲“天才”材料而拒不检讨的那几个人。

一九七〇年十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作了重要批示。当叶群虚伪地说她犯了什么“路线性”错误时，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批评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

“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当叶群说到他们搞天才语录问题时，毛主席指出：

“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毛主席驳斥了叶群所说的与陈伯达“斗争不够有力”的谎言，指出：“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毛主席批评叶群及其同伙“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主席针对林彪在建军路线上的错误倾向，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野营拉练的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同时指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在中央联络部的一个请示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在三十八军党委会批陈报告的批示中，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集一次会议，“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黄永胜、李作鹏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批示，他们在接见三十八军领导人时，说什么：“不要只攻北京军区为什么陈伯达成了你的太上皇，那样就把事情搞复杂了。”压制揭露陈伯达，害怕火烧到他们自己身上。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姚文元同志的报告上批示：“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毛主席在济南军区关于反骄破满的报告上批示：“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军委召开座谈会。在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指示，要他们批陈，要他们做检讨。在林彪的支持下，黄、吴、叶、李、邱不仅拒不执行毛主

席的指示，根本不批陈，也不作检讨，而且利用会议简报，大肆吹嘘军委办事组对毛主席“跟得最紧”，“突出政治，狠抓根本”，“谦虚谨慎”，“办事认真”，以此来对抗中央，欺骗同志。

在华北会议期间，毛主席、党中央改组了北京军区。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代表党中央在华北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系统地揭露了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指出了李雪峰、郑维山在政治上所犯的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宣布了中央关于李德生、谢富治、纪登奎等同志在北京军区任职的决定。这就捣烂了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角。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对计划会议的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黄、吴、叶、李、邱，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他们所管辖的部门，拒不传达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军委办事组对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报告。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的，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当他们说到“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时，毛主席批示：“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黄永胜、吴法宪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接连几次给在苏州的林彪、叶群打电话，密谋对策。军委办事组在讨论毛主席批评他们根本不批陈的指示时，黄永胜念了唐朝诗人章碣的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8]无产阶级引用这首诗，是表示要造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黄永胜在讨论毛主席对他们批评的时候念了这首诗，是蓄意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要造无产阶级的反。事实也正是如此，就在这个时候，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窜到杭州和上海，研究和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作了重要批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

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对毛主席关于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指示，林彪怕的要命。他顽固地坚持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

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对黄、吴、叶、李、邱作了多次个别谈话，进行了长期的耐心的教育和挽救。但是，他们拖了七个月才勉强写出的“检讨”，仍然不批陈，同陈伯达划不清界限。毛主席为了帮助他们，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在他们的检讨上加了这样一段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同时，毛主席在他们的检讨上明确批示：“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毛主席在一个同志的检讨上作了批示：“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那里去了。”毛主席这一重要批示，中央给军委直属单位发了六十份。黄永胜竟擅自扣发毛主席的批示，只发出七份，并限定极少数人传阅后立即收回。他们竭力封锁毛主席的指示，紧紧地捂住盖子，就怕揭。

为了打破林彪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一九七一年四月，毛主席、党中央派负责同志参加军委办事组，实行“掺沙子”的办法。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总结讲话。在讲话中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但是，林彪及其一伙毫无悔改之意，就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他们一面作假检讨，应付中央，而背地里却在林彪、叶群、林立果的指挥下，策动他们的死党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等开黑会，要“加快，提前”实行他们于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制定的《“571工程”纪要》[9]反革命纲领，穷凶极恶地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1] 总政治部前宣传部长

[2] 国防科委原代主任

[3] 空四军原政委

[4] 空五军原政委

[5] 军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原第二处长

[6] 指“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

[7] 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写的序言

[8] 见《唐诗选》

[9] 林彪及其死党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肖克对林彪的揭发

本月二日我听了关于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林彪问题的传达，感到极端的痛恨。林彪竟敢对我党我国及全世界人民敬爱的毛主席，多次企图进行谋害，在逆谋不逞，又另图逃到南方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的内战，用心之毒辣、阴险，较之老叛徒陈独秀、张国焘及汉奸卖国贼王明等，大有过之无不及。

我党建立以来十次大的路线斗争，林陈路线是最大的一次。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叛党叛国，其败亡之速，结局之惨，也超过以前任何叛徒和卖国贼。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处理这一反革命事变中，事前观察中央内部和党内阶级斗争的具体动态，察事机于微末，今秋南巡，再一次提出“全党干部，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启发各地同志，提高警惕，所以没有酿成大变。事变发生后，措施得当，使全国秩序如常。这就再一次证明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证明经过五十年锻炼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也再一次证明任何叛徒、汉奸卖国贼，职位越高，名声越大，就垮得越快，垮得越惨。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林彪就是在这历史的审判台前，宣判了死刑——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

(一)

林彪是不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和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中央通知指出了林彪历史上几个大错误“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

主席曾写长信教育他；遵义会议后带头攻击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解放初期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乱军主张等，这就足以说明林彪并不是一贯正确和完全正确的了。除中央已指出的外，就我所知道的揭发于下：

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到湖南起义途中企图逃跑。

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所在的二十五师由三河坝向湘南转移，林彪曾企图逃跑。这是一九二九年夏林彪无意中漏出来的。那时在闽西，有次我和支队党代表高静山（早已去世）到纵队司令部，见到林彪。我们谈到陈毅同志（时陈已由第一纵队党代表调军政治部主任），林对陈有牢骚，气愤的说：陈毅这个人非常专横，爱骂人，我们前年从三河坝退下来，就想跑的，但怕抓住枪毙云云。

二、我军一九二八年秋去湘南回井冈山后，有一天耿凯（长征前牺牲）同我说：“林营长在郴州发了笔洋财，打开郴州，×××（忘记他说的什么人了——肖注）搞到五筒光洋，两百五十块，七个金戒指，正碰上他，就被他拿去了……”我说没有归公？耿说：“归什么公！”这件事在一九二九年得到证明。有一次我们谈到大庾县打败仗，林无意说出，从大庾撤退，挑夫丢了他的小箱子，里面有一百多块钱，七个金戒指都丢了。我以前听耿凯讲过他发洋财的事，他讲的钱数虽然不对（隔了半年用了些），但七个戒指是对的。耿凯的话就证实了。林彪在郴州大发洋财，是在毛主席宣布三大纪律三个月之后。耿凯和我都有同感：你并不那么老实呵！

三、林彪的右倾观点，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前就开始了。部队各级党委讨论下井冈山的时候，林彪多次讲：“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南瓜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去，不然，就没有办法维持”。他在白露的大会上也这样讲过。林思想和毛主席是对立的，毛主席是为了到赣南广大地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林是从“没有办法维持”和不同意吃红米南瓜的右倾思想出发的。这和当时有人说“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观点差不多——词句不同而已。下山之后，林还是悲观失望，甚至反对毛主席在一定时期内夺取江西的方针。

四、林彪的军阀主义。在井冈山和粤、闽、赣边游击的时候，他很强调军官职权，对政治机关、政治干部是不重视的。一九二八年冬初毛主席、前委派何挺颖为二十八团党代表、团委书记。这时林在后方休息，不久回队，召开军官会议，林不

同何商量，也不安排何在会议中的议程，也不向大家介绍（何来不久，没有同全体干部见过面），而由他个人主持讲话，让何坐冷板凳——和我们一般干部坐在下面听训。林讲得长，讲完就散会，林对何的态度，我们有些不满，会后就议论过。何挺颖善于工作，来了不久，二十八团干部对他有好印象，但林对他平淡，或者说不大顺眼，大庾之战，何受重伤没有派人抬，夜间从马上跌下，被马踩死。何之死，和林平常对他的态度很有关系。三十一团的同志知道后很气愤，有人说：何党代表如果在三十一团，就死不了（何原为三十一团党代表）！

林彪既强调军官职权，也就片面的强调行政权力，特别欣赏“层层节制”这句话，并解释说：营长就是管好四个连长，连长就是管好三个排长……。他不接近士兵和下级干部，从来不和下级漫谈，说句笑话。他说“带兵要严，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一九二九年夏在闽西之虎冈，纵队司令部勤务员某（湖南宜章人，我在宜章农民团当连长时的士兵），拿了老百姓一点什么东西，林叫来问了几句，立即拔手抢打死。那年十二月在古田，第一支队部有个炊事员偷了老百姓一双鞋，查获后该支队支队长王良、政委李赐凡向林面报，林立即指示要执行纪律，由支队枪毙了。一九三〇年夏由汀州出发打南昌、长沙，我用旧军队观点向他建议，说我纵队是闽西来的新兵，要实行连坐法，提高战斗力，他说你做做看，我就在三纵队实行。由于我军有党的领导和士兵多数是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农民，有阶级觉悟，经打长沙和吉安诸役，战斗力很快提高。他错误的认为是连坐法效果好，第一次反“围剿”就在红四军推行，并美其名为“革命的连坐法”。一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战斗力普遍有显著提高（其他部队并没有实行连坐法），才不讲了。

五、一九四五年夏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当批评彭德怀在临汾召开的华北局及八路军军委分会传达中央的十二月会议错误时，林说他当时对会议中强调运动战的倾向是不同意的，我回忆林当时并没有这个主张，休息时就询问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说无此印象。过了两天，有人拿出会议的个人记录来，林同样是同意十二月会议，同样是强调了运动战。林彪见到记录，不老实承认，作怀疑状，但也无法辩解，我们很不高兴。

六、一九四九年夏，长沙和平解放后，国民党以桂军为主还有二三十万军队在湘南及广西布防，毛主席两次来电指示对桂系作战要实行战略大包围，以主力由北

向南，主力之一部由黔东南插入广西西北，并令第二野战军陈谢兵团，由广州沿西江入桂配合，这本是战胜最阴险狡猾的军阀白崇禧而战术上也较灵活的桂军的最正确的战略方针。但林彪迟迟不执行。他热衷于在湘南从战术上抓敌人，队伍在热天多方机动，才在衡宝线上抓住敌人三个师一个团。虽然消灭了这个敌人，但敌人主力退到广西，以后找不到从战术上抓敌人的任何机会了，又停了一个时期，林彪才死心，才执行毛主席战略大包围的方针。以三十八和三十九军由黔东南翻过大图山入广西西北部，陈谢兵团沿西江入广西，五个军由湘南入广西，形成战略大包围。白崇禧三面受敌，战略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步调乱了，只五十天，对桂系作战就基本上结束了。我认为林彪对毛主席的湘桂作战的指导方针是没有执行的，至少是大打折扣的。

七、衡宝战役将结束，关于敌军兵力有两个不同的情报，一个是第七军三个师及四十六军之三十八师，一个是第七军全部及三十八师一个团，战斗刚结束，还弄不清楚，林立即上报消灭敌四个师一个军部。后桂军沿湘桂边布防，发现三十八师在全县附近。我曾向林说过，他说不可靠，竟不更正，我不好再说了。我认为大规模的战争，多消灭一个师，少消灭一个师，无关大局，但为什么要作夸大的报告呢？我感到林彪在战果未明之前则要功，既明之后又要面子，这是很不老实。前述诸问题，时间长了，同时林彪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也就不注意或慢慢忘了，直到林彪问题传达后，才慢慢回忆起来。

## （二）

林彪对自己的错误，从来是采取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态度，我同他几次工作，也和他多次一起开会，从没有看到他作过自我批评，也不准别人批评，别人批评就打击报复。土地革命初期，谢唯俊（到陕北牺牲）对他提过意见，林两次在纵队委员会借谢不戴帽子斥之为不讲军风纪，谢那时在第一纵队当政治部主任，林常为难他，他感到不好处，此事当时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一九三〇年夏派到上海中央联络，被捕，脱离关系，解放后才回来）曾问过我。又如一九五〇年邓子恢同志由京回汉口，在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中央意见，认为中南局在一九四九年夏提出中南地区中心工作应放在乡村的口号是错误的，我发表了同意中央的意见，林不说中央不对，而说我是错误的，是否定一切。会开了几天，没有明确结论就结束了。从此，林彪对我很不满。有人说一九五〇年我调军委，是林不满

意的结果，不知确否。但林在一九五一年冬以不满的态度同我说，我在中南局的发言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我感到党员在会议中提意见甚至是错误的意见也是许可的，而林就是不行。这都是打击报复（汉口这件事，我思想上长期没有解决，直到六九年秋才作了检查——见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中旬报中央的《历史思想总结之八——在四野工作中的问题》，是否正确，当再考虑）。土地革命时期向他提意见是不容易的，更不用说批评了。会议时摆出一付主宰者的面孔，令人不安，甚至害怕。他对错误不作自我批评，又不让别人批评，这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权威思想，极端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以后在主席长期耐心的教育下，有所改进，但在社会主义革命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清除一切旧东西的时候，潜伏着的东西又发作了，并恶性发展了——堕落到要篡党篡军，用黑帮特务手段谋害毛主席，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发动反革命的内战，一直去当汉奸卖国贼。不了解他历史情况的，固然会大吃一惊，就是基本了解他或了解他若干情况的，也不能不吃惊。因为在十次大的路线斗争中，林彪是个假话说尽，坏事做绝，是最阴险、最狡猾、最毒辣的——我也送给他几个最字吧！

### （三）

林彪长期以来，以一贯正确、完全正确自居，大造舆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无孔不入。在江西时期，他自吹是最没有封建思想的人。七大时冀察晋代表团有人说他一贯正确，我们有些人虽然知道他在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遵义会议后在渡金沙江及会理会议时期带头反对毛主席等，但没有人讲。七大后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林彪批评彭德怀，但不涉及彭在会理会议时期的错误，也就是为了隐蔽自己这个错误。而在另一场合，却说自己在临汾会议是正确的。尔后直到主持军委工作，尤其文化大革命后，地位更高，名声更大，他还和以前一样，不作自我批评，当然也不准别人批评。加以有些趋炎附势之徒的吹嘘捧场，于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最”……的美名，就在全党全军全国完全合法了，写文章、讲话不按这个框子是不行的，并在全国作了大量宣传，一般干部、党员，群众，只知道他的好处和吹捧骗人的部分，根本不知道他的错误和伪造的历史。去年十、十一月我参加江西省老干部学习班，经南昌、吉安、井冈山，又到宁冈、永新、萍乡、安源、韶山、文家市、高安等地，各地展览馆和宣传材料，有许多是宣传林彪的，而且口径都差不多或一样，内容有不少是伪造、



吹嘘、骗人的。诸如：把林彪列入南昌起义第二号领导人；林彪率领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会师，是林彪首先和毛主席见面的；一九二八年七溪岭之战，林彪召集战地会议，提出三猛战术，消灭杨池生师；一九二八年八月林彪率一营在桂东消灭进攻之敌（我们打得英勇，却是一个败仗）；在井冈山挑谷上山并找到了他的休息地点，其实他没有参加。一个团长身体不大好没有参加，是无可非议的，但不能作假。诸如此类，我只在浏览一下后记到的一点点。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宣传，有些更是笑话，如说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召开军事会议，林彪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斯大林听了林的方案。小学一至十册都有林彪的语录、文章，有些地方还征询林彪的住地、住房及室内陈设，大概准备和毛主席并列。

收集编造前述材料的人，大多数是好人，尤其年轻人，不知道林的黑暗面，形而上学看问题。《林副主席指示》的编者的话，仅末尾一小段，就用了二十个“最”字。只要看到好的，辗转传抄，人云亦云，不加调查，不加分析。也有些人是甘心抬轿子、当吹鼓手，甚至有野心想向上爬的，这两种人必须区别。

林彪虽已败亡，但多年来造舆论很深很广，超过十次错误路线的任何一个头子。又利用中央、毛主席给他的职权，大搞宗派，并成立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妄图控制全党全军。林在北京方面的死党，虽已一网打尽，但百足之虫，虽死不屈。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人民，特别是干部，他的毒放到那里，就要消到那里。建议把他那些伪造、吹嘘及夸大的材料，整理公之于众，彻底肃清他的影响。

时间久了，手头没有一点文字材料，只凭个人记忆，有些细节，可能不够准，谨供参考。

这材料请送毛主席审阅。

肖克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于

农林部永修五七干校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聂荣臻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总理并报主席、中央：

林贼叛国投修，自取灭亡，是我党我军的一次伟大胜利。我完全拥护主席、中央，对林贼及其死党所采取的一系列英明措施。为消除隐患，必须把林贼及其死党的一切罪行追查清楚，并彻底揭穿林贼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肃清其流毒与影响，使我党我军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在老同志座谈会上，对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罪行作了揭发。陈毅同志揭的是前四年，我揭的是后四年。因原记录不便于看，简报又显得简略，所以整理了这样一份揭发材料，呈上，供参阅。

我对林贼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过去在苏区和在长征时的印象，觉得他年青，世故不多，打仗还肯动脑筋，但个人英雄主义突出，从不接受批评，更不肯自我批评；在关键时刻，并不是忠于毛主席的，而是反对毛主席的；教条宗派集团、彭德怀、张国焘等拉他的时候，他是“实用主义”的，想投靠。平型关战役后，就分开了，以后接触不多。全国解放后，他长期养病。第一次庐山会议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打着红旗反红旗，调子越来越高，巧妙地掩盖了他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同时，由于我自己一头扎到科技业务堆里，没有很好学习主席著作，路线觉悟低，看不出问题，因此，还误以为他拥护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所以，在军委工作中，我对他是尊重的，支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他为接班人，自己是拥护的。虽知道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但认为当时他还年青，经过主席长期教育，可能已经改正，同时，历史上他也做过一些工作，因此，对他作为接班人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九届二中全会，从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的罪行中，感到可能与林彪有关，但绝没有想到他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现在真相大白，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愤慨万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自我表演，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作处理。由此，更深切感到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使这场反革命政变彻底破灭，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从五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来看，凡是要分裂党，搞阴谋，反对毛主席的，绝没有好下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主席最近指示，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这是极其重要的指示。我是在历史上和工作中，特别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更应深刻领会和坚决执行主席的这些指示。我决心以主席的教导鞭策自己，不折不扣地按主席的指示办事，紧跟毛

主席，继续革命。

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示。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聂 荣 臻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下面是聂荣臻同志对林彪的揭发材料）

野心家、阴谋家 卖国贼林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部分罪行

自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同大叛徒林彪同在红一军团，他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据我回忆，在这一段期间，特别是在长征中，几个关键时刻，林彪先是伙同教条宗派集团和彭德怀，后是与张国焘默契，反对毛主席。主要事实是：

（一）打漳州后，林彪在筹款中支持过“左”行为。

一九三二年春红一军团成立后，毛主席率一、五军团南下，入闽打漳州，整个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部署指挥的。打下漳州后，在漳州、漳浦、石马一带筹款，执行主席指示的正确的经济政策，商店没有关门的。比如，对陈嘉庚派款，他不愿交，我们只没收了相当于派他款项的货物，公平合理，丝毫不加，陈嘉庚事后还说了我们的好话。但在主席离开之后，林彪就支持红三军高自立等人在漳浦地区搞过“左”的行动，对不愿交款的，拉到大街上非刑拷打，说是给群众作个样子看看。弄得有的铺子关门，小资产阶级不同情，甚至工人、农民也有疑虑，政治影响很坏。我提出要纠正此种做法。林彪却支持高自立的做法，说不这样做就搞不到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置红军的政治影响于不顾。这一争论，一直到开军团政治工作会议，我们从漳州回来才了事。

（二）林彪支持教条宗派集团，鼓吹“短促突击”。

一九三四年，进入第五次反围剿时，教条宗派集团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提倡所谓“短促突击”与敌人拼消耗，这在战略、战术上都是错误的，使我军完全陷于不利地位。那时林彪发表了一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支持李德，深受教条宗派集团的欣赏。这不仅仅是军事路线上的问题，也是林彪向教条宗派集团的一次政治表态。

（三）长征途经广东乐昌、九峰山地区时，林彪不顾大局，不执行军委命令，只想自己跑掉。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彭德怀走右翼，我们走左翼。我军先后从信丰、安远间突破蒋匪第一道封锁线，从城口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此时，广东军阀部队开赴乐昌一线阻截我们。当时一军团的任务是，经乐昌北面的九峰山突围，并派一部兵力控制该山要点，以掩护后续的九军团和中央纵队。林彪此时却不顾大局，只图自己跑掉，主张不占九峰山，从山下大道经乐昌率部队逃出去。我不同意林彪的意见。那时，粤军坐火车，我军走路，怎能跑得过人家？如走乐昌，必然会碰上，我们是先头部队，负有掩护任务，不应只顾自己走平原，跑掉就算数，如不控制九峰山，敌人把后续部队截住，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破坏长征的计划。后左权提了个方案，派一连人先去侦察。部队继续沿九峰山前进，控制了要点，掩护了后续部队，胜利进到宜章。后据侦察，敌人当时已进乐昌，如按林彪那种跑法，将使我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林彪只想跑掉，置后续部队的安危于不顾，其恶劣品质令人愤慨。

（四）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中，林彪态度暧昧。

在毛主席领导下，一、二、三次反围剿获得了伟大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因主席军事思想深入红军中，教条宗派集团的瞎指挥也还没有能够彻底贯彻，也取得了胜利。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教条宗派集团的错误指挥，我军处处被动，招致失利。部队干部对教条宗派主义的危害逐步认识了，要求主席重新出来领导。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军进入遵义城，一月八日就开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从此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是我党历史的伟大转折。记得在进军遵义途中，我因脚坏了，坐担架，王稼祥那时也坐担架，我们两人就经常一起谈，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要毛主席出来领导。而林彪无论在遵义会议前和在遵义会议上，都没有讲什么话，他的态度是暧昧的。现在听说有人为林彪鼓吹，说他在遵义会议上作了什么重要讲话，还到处设法搜集他那个所谓“重要讲话”，这完全是伪造历史。从以后一系列事情来看，林彪这个两面派，当时的真实思想是反对毛主席的。

（五）过金沙江后，林彪公开写信，要求撤换毛主席。

遵义会议后，本拟过长江到四川。后来，打土城，彭德怀在前面指挥，没有打好，部队伤亡较大。蒋介石调集他的嫡系部队及川、黔、滇、湘几省军阀部队拼命堵截。当时我军作战疲劳，如果一直往西渡长江，敌人追过来，没有船，我们就要

被消灭在江边。主席料敌如神，英明地改变了原定渡江计划，折向滇东北扎西（威信），各省军阀部队及蒋匪嫡系拼命尾追，敌人后面空虚，主席就指挥我们转过头来二渡赤水河，乘虚占领桐梓，再次进入遵义，又转向仁怀，三渡赤水，佯攻贵阳。主席的英明指挥，使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处处听我们的调动，蒋介石慌忙亲自到贵阳督战。可是我军突然调转向黔南前进，在贵阳、龙里（龙云的部队驻在这里）之间直插云南，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于五月初巧渡金沙江。这是长征中的决定性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和主席英明指挥的伟大胜利。

正是我们在贵州一带兜圈子的时候，林彪、彭德怀把主席这一英明的战略指挥诬蔑为会拖垮部队，他们互相呼应，反对毛主席的领导。那时以三军团为大本营，博古、张闻天经常去；李卓然因五军团担任长征后卫，对主席不满；这帮教条宗派集团的家伙们纠合在一起，煽风点火，刮出一股要撤换毛主席的领导，把彭德怀捧上台的妖风。一军团的朱瑞（当时是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也是教条宗派集团的成员。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林彪就吵吵嚷嚷了，说这样下去不成，他一到宿营地就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我当即批评他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林彪打完电话，即写信给主席，狂妄地要求主席下台，并要我签名。我拒绝签名，和他吵起来了。我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你跟主席那么久，在主席领导下，前几次围剿都粉碎了，你应该相信主席，只有主席领导才能挽救危局。我们两人争吵时，左权、朱瑞、李卓然、罗瑞卿在场，他们都没有说话。林彪不听劝告批评，自己个人在信上签字就送走了。后来，主席在会理会议上严厉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林彪在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消极动摇，想投靠张国焘。在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翻夹金山，到懋功地区，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我怀疑，当时是李卓然把遵义会议前后情况告诉了张国焘。从张国焘那边就传出消息，说一方面军也不团结，他抓住了林彪、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的空子，想拉拢一、三军团，阴谋吃掉中央红军。在两河口会议以后，次日晨，张国焘请我同彭德怀到他那里吃早饭，饭后就说要拨两三个团（实际是两个营的样子，不到一千人）给我们。当

时就感到张国焘在拉拢了，出来后我还问彭德怀，张国焘此意何在？彭德怀说，拨兵你还不要，他没有正面回答。后头，我们到了毛尔盖，到巴西、阿西，在主席那里开会，成立总指挥部，右翼总指挥是徐向前同志，我们都归右翼指挥。一天我同林彪到右翼指挥部去接受命令，吃晚饭后，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回去，聂荣臻同志留下来，要谈一谈。”我留下后，陈就问我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看法，还要我表态。我说，这两个会议我都参加了，我都拥护，都赞成，早已表过态。后来，没有谈出什么，我就回来了。我晓得，陈昌浩的意思是要威胁我表态反对这两次会议，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陈昌浩要我留下表态，而不要林彪表态呢？因为他们知道林彪和彭德怀反对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是不成问题的了。

后来，在阿西、巴西地区时，张国焘从阿坝来电，要我们过阿坝西进。事后才知道，张国焘那时还密令陈昌浩，如一方面军不从，可相机处理，危害中央。叶剑英同志当时在四方面军任参谋长，把密电内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毅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队立即出发，向甘肃前进，脱离险境。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有一天，我对林彪说：“我们不能走阿坝，部队再也不能在草地拖了，还是主席讲的，要快出草地，去陕甘。”当时听说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把林彪调××军，把我调三十一军任政委，命令尚未发出。我说，我们要注意，张国焘存心要把我们吃掉。当时林贼对我说：“你就是宗派主义。”我说：“什么是宗派主义啊？这个问题要警惕，张国焘是一贯和主席、中央思想是不一致的，这是路线问题啊！”林贼说：“什么路线问题？他路线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几个人哪。”我说：“蒋介石人更多，那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我始终怀疑，那时林彪是被张国焘挖了墙脚的，他是想投靠张国焘那边的。当然，由于主席断然处理，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

（七）林贼到陕北之初，想离开毛主席，到陕南打游击。

毛主席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林彪仍心怀不满，悲观失望的情绪有时流露出来。一九三五年冬在宜川，林贼多次表示要带一部分部队离开陕北，到陕南去打游击。这说明林贼离心离德，想离开毛主席，另创一个天下。

（八）大相寺会议上，林彪不检查自己的错误。

红军东征时，主席来电要我们拨些新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接电报后，说：“有×

的几个兵”，当场把电报一摔，态度很不好。我拿过电报一看，即问彭雪峰等的意见。彭雪峰当时正在做恢复三军团的梦，不同意拨。问下面，下面叫困难。我自己的思想也是本位主义的，想少拨或不拨。因此，我们回了电报，要求不拨。大相寺会议上，主席批评我不顾大局，本位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对我教育很深，同时教育了全军。我是政委，在这个问题上要负主要责任。但林贼在会上却一言不发，不作自我批评。

（九）大相寺会议后，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林彪调红大工作，临走前与我谈：“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分手了。过去我们的分歧，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我说：“我们争论的是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以后再谈吧！”没有谈下去。可见林贼对会理会议的批评，一直是心怀不满的。

从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几次反对毛主席。一直到这次，发展到妄图谋害毛主席，投敌叛变，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大叛徒、大卖国贼，这不是偶然的。这颗定时炸弹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我处理，死有余辜。这是一切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的必然下场。

2009年10月某日初稿

2012年5月8日修改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七册（1）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七章 开展外交新局面

##### 第一节 毛泽东决定开展中美谈判

###### 本节资料

######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

1971.05.29；中发〔1971〕40号

主席、林副主席：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台湾的主权已经由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在日军受降中接管过来，实施了行政统治。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白皮书和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声明，均先后承认台湾业已归还中国，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属于中国内政，美国不予干涉。

只在一九五〇年朝鲜战争起后，美国为了扩大侵略范围，才同时以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接着以美国武装力量侵占台湾。后来，又在一九五四年与蒋介石集团缔结所谓共同防御台澎条约。我国政府曾一再声明反对。

朝鲜停战后，我国政府在一九五五年即公开声明：中美两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政府愿意通过谈判解决中美关系问题。但解放台湾属于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起，中美两国大使级代表开始进行谈判，先在日内瓦，后移至华沙，经过十五年，谈判一百三十六次，一直没有结果。中国政府所坚持的就是美国政府必须将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解放台湾，属于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亦决不承认“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出现。在民主党执政期间，侵越战争一再扩大、升级。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后，企图以从越南撤军和走向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这两张牌来和缓国内外的反对，并为他连



任总统作文章。

时间过了两年半了。侵越美军已从五十五万减到二十六万，但战争“越南化”无把握，战场且有扩大趋势，不继续撤军，又易引起国内外极大不满。这就使美国在谈判桌上更加被动，只得以战俘问题为借口，来拖延撤军，摆脱困境。我们认为，印支三国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各方再予大力支援，必能获得最后胜利。

中美谈判在约翰逊、尼克松交替前后已中断近两年，中苏在边境冲突后忽有两国总理的会谈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这不能不使尼克松政府急起采取主动。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美驻波大使亲自在华沙的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上找我翻译约我代办会晤，表示愿恢复中美会谈。一九七〇年一二两月进行两次会谈，美大使表示：美国政府愿意改善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对中苏分歧，它无意站在那一方，无意参加反对中国的联盟，也不支持勃列日涅夫主义。美国 and 台北政府的关系，有协助保卫台澎的义务，但并不妨碍你们双方达成任何和平解决。随着亚洲和平和稳定的增长，美国将能削减现在台湾的所有军事设施。美国愿讨论不仅台湾问题，而且在中美之间的全部双边问题，并愿讨论一项联合宣言，肯定两国政府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美国政府还准备派代表到北京直接商谈，也愿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代表。

我代办在两次会谈中表示：只有严格遵守五项原则，才能实现和平共处。我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容外人侵占，因此必须商定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中美关系，并推动其他问题的解决。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预，更绝对不能允许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为解决这个主要矛盾，需要“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我方提出如果美方愿意派部长级的代表或美国总统的特使到北京商讨，中国政府愿予接待。

接着，从一九七〇年三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金边支持朗诺、施里玛达集团，颠覆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的统治。西哈努克亲王在北京于三月二十三日发布五点声明，号召柬埔寨人民为保卫祖国而参加民族统一阵线的抗美斗争。四月，印度支那三国人民举行最高级会议，发布抗美斗争的联合宣言。五月，美国政府悍然出兵侵入柬埔寨，扩大在印度支那的侵略战争。我方认为，在当时继续中美会谈是不适宜的，于是会谈又告中断。

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庄严声明，指出：“新的世

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根据战后二十多年国际形势的发展，毛主席提出了这一高度概括的科学论断。声明发表后，世界形势更是大好。联合国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开得毫无生气，但在表决两阿（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十八国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驱逐蒋介石集团出联合国的提案时；却第一次得到了多数票通过。在此前后到现在，宣布与中国建交的已达到十个国家。

在上述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政府通过各条内线急于向我们进行接触。一九七〇年十一月某国元首来访，转达了尼克松的口信，他准备派出高级人员甚至是基辛格在第三国与中国高级人员对话，希望中国领导人了解美国是要走向同中国和好的，并准备同中国签订某种贸易协定。我们通过某国元首，给尼克松传话的回答是：如果尼克松总统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派特使来北京商谈。经过某国元首的传话，尼克松总统的回答口信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五日收到。美国认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它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而应包括解决其他问题的步骤，美国建议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议，作出各种安排。这一时期，由于美国公开宣布配合西贡傀儡部队侵犯老挝九号公路，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我们的答复因而推迟。四月初，毛主席指示为满足美国乒乓球队的要求，邀请他们同其他四国乒乓球队一起访问中国，这就重新开始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往来。这一乒乓小球的转动推动了世界形势的连锁反应。尤其是在美国，尼克松迫不及待地作了多次表示。我们抓住这一时机，在四月二十一日给他回了一个口信，指出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两国高级负责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进行直接晤谈。很快得到了尼克松的回话，表示诚挚谢意，愿在两星期内给予答复。五月十七日口信于十九日转到，尼克松表示为解决两国之间那些分歧问题，并由于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重视，他准备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双方都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尼克松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议，基辛格准备在六月十五日以后到中国来。接着，尼克松于五月二十二日又补来一个口信，说明美国总统在五月二十

日发表的关于美苏两国政府同意在今年内制订出一个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部署的协定，决不会影响美国总统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不签订任何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基辛格也准备把这个问题列入他将参加的预备会议的议程之中。

面对这三个口信，我们在五月底作出回答，欢迎基辛格博士来京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为尼克松总统访问北京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复信稿附后，已经主席批准，并发出）

现在，我们应对基辛格的预备会议和尼克松的访问，作出各种可能的估计，预拟出各种对策，以便根据实际发展和变化，随时提出审查和讨论，必要时可加以补充和修改。

一、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期限从中国的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这是恢复中美两国关系的关键问题。这一条如不能事先有原则商定，尼克松的访问就有可能推迟。

二、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外人不容干预。要严防日本军国主义在台湾的活动。

三、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对台工作要认真进行。

四、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如美利坚合众国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五、如因前三条尚未完全实现，中美不便建交，可在双方首都建立联络机构。

六、我不主动提联合国问题，如美方提到联合国问题，我可明确告以我绝不能接受“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安排。

七、我不主动提中美贸易问题，如美方提及此事，在美军从台湾撤走的原则确定后，可进行商谈。

八、中国政府主张美国武装力量应从印度支那三国、朝鲜、日本和东南亚有关各国撤走，以保证远东和平。

上述各项，可能在基辛格到来后谈出一点眉目，以便为尼克松的访问开辟道路，也有可能完全谈不拢，使尼克松的访问成为不可能，这对我们并无损害。因我们这些主张正好为尼克松的竞选对手准备条件。那么，为什么要先与尼克松商谈呢？因为他是当权派，如能得到他的赞同，这些主张在大选前实现的可能性就大些。如先与其反对派谈，即使得到赞同，成为竞选纲领，当选后亦未必兑现。不

如先当权派，后反对派，这样我们就更加主动。并且基辛格来谈招致失败，对尼克松竞选大不利，这也可对基辛格增加压力，或者也可使反对派振振有词。

有人问，中美会谈不同一般，会影响美国人民的斗志。美国群众运动，在尼克松上台后，确是高涨，重点在反战和反种族歧视。有人说，运动处于抛弃改良走向革命的过渡之中。我们正好以从越南撤军和从台湾撤军、走向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这两张牌动员美国群众，影响当权派中反对派的政策，增长群众的斗志。目前美国真正左派朋友都承认，美国正处在革命大风暴的前夕，群众思潮动荡起伏，需要正确领导，也正在开始锻炼和考验领导。几年内，还不能预言美国有爆发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可能，而印支抗美战争，中美人民来往和两国会谈，正是动员美国群众、考验群众领导的好机会。当年中国大革命（1924-27）前夕，苏俄一方面派代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另一方面派大使驻北京与北洋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列宁当时采取这样的外交路线，是起了动员中国人民群众的作用的。这段历史可供参考。

又有人问，中美会谈会不会有碍印度支那抗美战争和巴黎谈判？这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中美会谈如有进展，必将有助于印支撤军和巴黎谈判。即使步骤有先后，也更利于支援印支抗战。

又有人问，尼克松、基辛格这一手是否有诈？表面谈和，实质不变，以涣散我备战士气，小则放蒋出笼，大则引苏东向。今天的形势是我们不断同帝、修、反斗争胜利的结果，也是美帝内外交困和美苏争霸世界的必然趋势，姑不论美帝有无欺诈的可能，我现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斗、批、改阶段，战备不懈是我经常任务，若有风吹草动，正好锻炼我动员和作战能力，也正好更加暴露其反动面目，提高人民觉悟。反之，如能谈好，至少可使两霸相争加剧，我可增强战备力量。敢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需备战。这是我党同帝、修、反斗争的多次经验，应当永志不忘！

为准备六月中的预备会议，政治局根据五月二十六日会议的讨论，写成报告，并于五月二十九日宣读、修改如上，请予审批。

中央政治局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

附：

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

周恩来总理向叶海亚总统表示诚挚的谢意，感谢总统阁下极其迅速地转来了尼克松总统的三次口信。

周恩来总理认真研究了尼克松总统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五月十七日和五月二十二日的三次口信，并且十分高兴地将尼克松总统准备接受他的建议访问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诸位领导人进行直接交谈一事报告了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并且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好与总统阁下进行直接交谈，自由地提出各自关心的主要问题。不言而喻，首先要解决中美之间的关键问题，也就是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的具体办法问题。周恩来总理欢迎基辛格博士作为与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议的美方代表，提前来华为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北京作准备工作并进行必要的安排。

周恩来总理建议，基辛格博士最好将来华时间定在六月十五日至二十日之间，地点可在北京，由伊斯兰堡可直飞北京不公开的机场。乘机可用巴航波音机，如需中国专机，亦可派往接送。会谈连同空航来往，约需三至四天。通讯如需架设自带的无线电机，可于抵离北京期间临时启用。

鉴于基辛格博士行动难于严格保密，也可以考虑以公开身份来谈。如仍需保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当严格保证。在会谈有成效后，如需会后公布，当由双方商定。

其他细节，可通过叶海亚总统和中国大使直接磋商和安排。

周恩来总理热烈期待基辛格博士不久前来北京的会晤。

（完）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的通知

1971.05.31；中发[1971]39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或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

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毛主席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谈话纪要》发给你们。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至全体党员，并认真组织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谈话精神。

斯诺访华后，陆续在外国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谈及毛主席同他谈话的情况。新华社编印的《参考消息》将陆续转载斯诺的文章。请在阅读斯诺的文章时注意，以毛主席的谈话为准。如非党员干部和群众据此提出问题时，亦请以毛主席的谈话为准予以回答和解释。

党内外的反映，请汇集后报告中央。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一年八月七日，周恩来会见缅甸总理奈温时的谈话

周恩来：

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1967年的事情，这件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很遗憾的。……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你们新大使来后可能知道一些。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甸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当时我国政府想尽量把这件事约束在政府交涉的范围之内。开始我国使馆有一份抗议照会送给了贵国外交部，我记得照会中提出了五点要求。接着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支持抗议照会的要求。《人民日报》就这件事刊登了一些文章和消息。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担心会发生像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住了，没有发生像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七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被我挡住了。运动发展到八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

另外，那时我们驻外使馆也出现过一种情况，就是对重大政治问题直接对外发照会。我们使馆给你们外交部发抗议照会不经过我国外交部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查清到底有几个照会是未经外交部批准就送到你们外交部的，可能从你们的档案中可以找到。大概从1967年7月起，有些重要照会就由大使馆直接送出，当然上面一定是盖了大使馆印的。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的大使回来了，原来还要回去，6月底发生事情以后，我们才决定不要他回去了。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但我国政府还是要控制这个局势，特别是同缅甸的关系。……

我所以要说这一段情况，是想说明我们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在1967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发现以后，坏作用就起不了了。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仅同缅甸、英国有，同其他国家也有，我就不详细说了。如果有功夫，另找机会谈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我们可以多说一点。

对于我们两国的关系，我们一直采取控制的措施，后来阁下也采取了控制的措施，所以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没有走得很远。这对于在近两年促进和逐步恢复两国关系有好处，比较有利。

1967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年轻人、侨民有爱国心，他们学我们国内的样子去做，当然就不合适了。……

奈温：关于1967年在你们这里发生的事，我表示我的谅解。我得到了有关这里发生的情况的报告，但消息很少。我记得你们外交部受到两次冲击，所以我感到当时你们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

周恩来：基本上能够控制，主要依靠解放军和绝大部分好的群众。

奈温：不管他们对我们说了什么话，我们想这不是你们领导人的观点。有一段时间，甚至我也受到了压力，要我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我拒绝了。

周恩来：我们这里的坏人也是这样主张的。

奈温：关于这个问题，据外国报纸报道说，不知是不是真的，有人问总理关于中缅两国外交关系有什么看法，总理回答说，中国的做法取决于缅甸的行动。缅甸走到什么程度，中国也走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出了总理还是想继续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我们不愿意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因为要断绝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难了。

周恩来：对。

奈温：我记得1959年到1962年之间有一个时候，印度使馆要撤退，总理请他们留下。这个记忆对于我处理这件事有影响。

## 二、研究资料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摘录

1970年11月至1971年5月

2009年11月2日初稿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七册（2）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七章 开展外交新局面

##### 第二节 基辛格访华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 第三部分 本节资料

#### 一、 文献资料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与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的谈话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五日刊载了周恩来总理十一月二十日同英国作家兼记者马克斯韦尔的谈话，标题是“周总理在午夜的想法”；副题是：“为什么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尼克松的北京之行怎样使他在联合国失去票数”、“为什么总统可能在中国浪费时间”、“什么东西使日本处于战争或和平的十字路口”、“为什么印度将对同巴基斯坦进行战争感到后悔”、“英国和中国为什么不能互派大使”，并加了如下的编者按语：“以下是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向‘向星期日泰晤士报’单独提供的中国总理从晚上十一时半到至晨四时半对他发表的谈话。中国总理在这篇谈话中探讨了不断变化的世界。”现将“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的周总理同马克斯韦尔的谈话转载如下。〕

马克斯韦尔：总理，我能否请你首先谈谈你对战后历史趋势的看法？

总理：第二次大战刚结束后不久，邱吉尔在富尔顿发表了一篇反共反苏的演讲，想把西方以至整个世界动员起来一齐反苏，以此来维持大英帝国的统治。这篇演说在美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美国就利用这篇演说的调子，大搞反苏反共的宣传。当时就有一种论调，认为反苏战争很快就会爆发。毛主席看出了其中有问题，就写了一篇文章，以别人的名义发表，表示不同意说这场反苏运动就会导致反苏战争的爆发，指出了实际上美国是想拿反共反苏的宣传作烟幕，把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统统霸占起来。

战后二十六年来，并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但是在亚非拉这个第一中间地带，

小的战争一直不断，其中首先发生的一个比较大的战争就是中国的内战。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曾不可一世地称霸世界。那儿人民要解放，它就派军队去镇压，它建立了很多的军事基地，派出了很多军队。那儿经济很困难，要钱，它就给钱。它采用了两种方法：一个是马歇尔计划；另一个就是投资。马歇尔计划的总数约三百亿美元，而投资的总数更超过这个数目。

结果怎么样呢？美国不仅把第一中间地带即亚、非、拉侵占不少，对美苏以外的西方国家（即第二中间地带），它也伸手进去了。

今天的世界形势又是怎样的呢？今年七月六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作了一篇演讲，十月十六日英国首相希思在保守党年会上也作了结论性的讲话。这两篇讲话互相呼应。希思讲话的大概意思是：战后二十多年来，英国跟在美国后面跑，抛弃了欧洲，大英帝国终于解体了，成为第二等的国家；现在英国应该回到欧洲，参加共同市场。

结果，英国国会通过了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决议。在这以后，英法两国外长在伦敦会面，宣布英法合作，把西欧形成一个力量。这种力量尼克松总统也不得不承认的。

“是美国把日本养肥的”

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讲话中说，战后二十六年来，美国地位这样地下降，在战后初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苏联在战后也逐渐变成了超级大国，同美争霸。在第二中间地带的西欧，又出现了一个共同市场，使欧洲工业发达的国家联合起来，同美争霸。这是第三种力量。

第四种力量是日本。我对许多美国朋友说过，是美国把日本养肥了。日本的钢产量今年或到明年有可能接近或超过美国。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一棒打中了中间地带，首先是打了日本，然后是西欧国家，同时也使整个西方世界受到影响。

尼克松总统还说，还有第五种力量，这就是中国，但他说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力量。希思也说了同样的话。我们承认，我们可以在几十年后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但我们声明，我们无论如何不做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不做。

从整个世界来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的趋势。这就是战后二十六年来世界局势的变化。

马克斯韦耳：那么，实际上在你看来，作为超级大国的决定因素，或者说作为超级大国的标志，不是它的物质力量，而是它在国际关系中的态度，对不对？

总理：指的是政策。超级大国就是要侵略人家，越南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就是如此嘛。还要颠覆人家，像玻利维亚、危地马拉，例子很多了。第三是控制人家，控制拉丁美洲，现在人家不干了。再有是干涉人家，干涉人家的内政。还有欺负人家欺负弱小的国家。这些我们都应该反对。所以，我们的总原则是：世界国家不论大小都应一律平等，不能强加于人。

马克斯韦耳：是的，但我感到在这点上你有点理想主义，譬如说，有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小国，它怎么可能真正跟中国这样的国家或其他大国处在平等地位呢？

总理：我们讲的平等，是指政治上的平等。尽管国家小，你应该尊重人家的主权嘛。它不同意的事，你不能强加于它。如果它需要经济合作，你帮助它，甚至可以无息贷款，乃至至于赠送，但你不能要求特权。帮助它的经济，你得使它的经济独立起来，而不是使它的经济附属于你。任何一个国家，如要独立，首先要在农业上能够自给，有吃的，这是能够生存下去的第一个条件。第二，帮助它的工业，可以帮助搞一些轻工业，它本地有原料，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力，积累一些资金。如果它那里还有矿产的话，可以帮助它开采，给他先进技术和设备，开采出来的东西首先让它自己用，而不应该首先是为提供援助的国家用。我举个例子，过去这一百年中，中东石油浪费多大！再过几个世纪就用完了。不是说要为人类的进步事业服务吗？那么，大国就应该尽更大的力量，帮助这些国家发展起来。现在第三世界开会责备大国，是有道理的。现在中东的广大人民还是那么穷困，只有少数贵族、资产阶级获得生产利润，那里的国家不能强盛起来。从军事上来说，如果那个国家抵抗外来侵略，那么有军火的国家就应该免费送给它；但对进行侵略的国家，如南非、南罗得西亚，就不应该帮助。

你说我们这个原则是理想主义，也可以这样说，但这个理想是可以实现的，而且不往这个方向走是不行的，不然就是战争。我们现在正开始努力这样做，做得很不够，还没有完全做好。但是我们想走这个方向。

对我们中国这么一个七亿人口的国家，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的干部，要经常进行教育，稍不谨慎就会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我们现在还有这种事情。因此，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防止这样的错误，要批判这样的错误，要改正这样的错误。

马克斯韦尔：但是，美国的目前的政策不是有一个深刻的矛盾吗？尼克松总统即将访问中国是很难同他在联合国采取“两个中国”的政策协调起来的。

总理：但是他一提他要来，很多国家都跟着来了，这就影响到联合国表决的结果。你想过没有？

马克斯韦尔：没有。但我是这样想的，自从你们说他可以来访之后，就美国国内政治而言，尼克松先生博得人心的程度似乎骤然增加了——另一方面的后果，美国的和平运动似乎就因此睡觉了，当然，从中国的观点看来，这两个后果总是不利的罗？

总理：不见得。我举一个眼前的例子来说明：联合国表决的结果，我们就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恐怕美国也没有想到它的“两个中国”的方案会失败得这么惨。结果呢，这门就打开了。人们说：尼克松可以到中国，为什么我们不能去？

联合国以五十九票对五十五票否决了美国的提案，在反对美国提案的五十九票里，其中有十个没有跟中国建交的国家。它们后来也投了支持阿尔巴尼亚、阿韦及利亚提案的票。如果这十票不是反对，而是弃权，那就变成五十五对四十九，美国程序性提案就会通过。这件事就表明了尼克松表示要到中国来以后发生的变动。这是第一。

第二，一部份刚跟中国建交的国家还受到美。它们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没有办法才投弃权票的。国的压力。在程序性提案表决时投弃权票的十五个国家中，多数是跟中国刚建交的

它们投弃权票也等于是支持我们，因为弃权票多了，其他票的总数就减少。结果就出现了刚才说的情况：美国的提案被否决。这马上就引出一个什么结果呢？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不仅超过三分之二票数，而且是压倒多数的国家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的提案。反对的只有三十五票。

那七十六票怎么得来的呢？反对美国提案的五十九票没有变化。原来对美国提案弃权的十五票当中，有十二票转过来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的提案，这里大多数是跟我们建交的，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些原来支持美国提案的国家，现在转过来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的提案。

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如墨西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一通过，它就宣布跟蒋介石断交。这就说明它支持的是美国的程序性提案，并不支持美国的

意见，也不支持蒋介石。这一点，它的总统在联合国的演说中就说明了。另一种情况的国家，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葡萄牙。它们这样做是什么原因，你是清楚的。这样就增加了十七票，变成了七十六票。而弃权的也增加了，原来十五票弃权，现在十七票弃权。反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的票数，仅仅只有三十五票，一下子就把联合国的形势变了，当然这里有偶然性，但是必然的趋势往往通过偶然的现象表现出来。这说明一种趋势：中国不能再被封锁了。

原来我们不打算马上去联合国。但是我们一听到有七十六票支持我们去，我们就不能不去了。否则绝大多数支持我们的国家会失望的。

七十六票不仅反映了全世界人民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二年来被剥夺的权利和驱逐蒋介石集团的正义要求，而且也说明了二十二年来美国的主张是错误的，在十一月十五日联合国大会的欢迎会上，有五十七个国家踊跃发言。

美国是东道主，也抢先发了言，逼得苏联也不能不讲话了。接着蒙古也讲话了，日本也讲话了。五十七个发言的国家中，有八个国家跟中国还没有建交。还有加纳，它同我们还未复交。有些建交的国家因为会议时间拖得太长，来不及讲了。

“问题只能同尼克松解决”

可能你已经读过我们代表团在联合国的第一次发言。据说有些人对这个讲话感到意外，说没想到我们一出场就把原则性的问题明确地摆出来了。

为什么跟尼克松总统谈？毛主席公开地跟斯诺（美国研究共产党中国的权威）讲了：因为他是美国总统。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就要跟他打交道才有可能解决。既然他要来，我们就跟他谈。因为你不跟头子谈，跟谁谈？头子不谈，反而跟第二级、第三级的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譬如说，过去解决中国抗日的问题，我们就跟蒋介石谈。开始跟他派出的那些代表谈，谈不清楚，他们不敢负责。二、三级可以谈，头子就不可以谈？没有这样的逻辑嘛！

又譬如说，在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不结盟国家举行一系列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我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但是美国占领了我们的台湾和台湾海峡，我们愿意同它通过谈判来解决。美国政府当时表示同意。于是，从五五年八月一日起，在日内瓦开始谈判。

当时英国进行了斡旋，哈马舍尔德也起了作用。结果谈是谈了，但是大使级的谈

判不能解决问题，谈了十六年，又碰上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和侵略柬埔寨，我们就把谈判停下来了。

最后，尼克松自己找上门来，说他愿意到北京来谈判，那好吧，我们就请他来谈。现在谈判还没有开始，可是联合国我们已经进去了，这就是胜利，我们并没有出卖任何原则。

马克斯韦尔：在我看来，如果尼克松先生目前在亚洲的政策像它看起来那样僵硬，那他到这里来结果很可能是浪费时间。

总理：我也是这样看的。但也不能希望过大。以为一下子都可以谈成，才没有这么一回事。不过如果他什么问题都不解决，那么美国人民能够同意吗？

马克斯韦尔：但是他可能会试图把责任推给你。

总理：那未必办得到；我们已经把问题摆在联合国面前了。我们提出了我们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包括台湾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讲了。就是这个原则，我们要为之而奋斗。

我们不像苏联那样，公开不敢谈，背后作买卖，这对小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一到联合国，就把我们的主张拿出来。

马克斯韦尔：我在北京期间，了解到日本的政策——她的经济政策和军事潜力——已成为使你们政府关切的事情。

总理：最近我跟日本的一些企业家谈话。他们提出“修正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口号，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从这里也了解到日本的企业家面临着一个困难。它的经济发展到现在阶段，从生产数字来说，在西方国家几乎占第二位，美国以下就是它，从整个世界来说，美国、苏联以下就是它。

但它的经济是畸形发展，首先是资源缺乏，绝大多数靠进口。经济自由膨胀，造成公害，把日本本土和西周的淡水鱼和海水鱼都搞坏了，要到远处去打鱼。公害最厉害的，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这是第一。

第二、为要大量吞吐，就需要很大的运输量，所以造船事业最发达的是日本，当然这些船不全是自己用。日本的运油船大到载重三十五万吨，现在甚至计划搞五十万吨的油船。

在这样的情况下，运油只能通过管子装卸，靠岸很困难，所以日本的炼油化工厂多设在沿海，这样海水也污染得很厉害。美国也是这样。

日本的市场大部份是在海外。但海外市场有限，他们就要争夺。日本本身农业却破产了。本来日本农业还能够自给，大米还能够出口。城市大部份人过去都是吃大米的。现在改吃面包了，要进口美国的面粉。现在为了发展工业的需要，把农村的土地和劳动力集中，所以粮食的总产量比过去低。工业发展到现在，日本纯粹的农业区域少起来了。

这种畸形发展，照原样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势必要跟人家争夺殖民地。譬如，它要向南亚次大陆、非洲、拉美和远东国家投资。

这个投资带有新殖民主义的性质。经济扩张必然带来军事扩张。譬如它从中东运石油到本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油船在这里通过过多，会把那里的海水弄脏。日本军国主义份子说，马六甲海峡是它的生命线。

这引起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国家的不满，他们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它们带来的祸害。美国人民也不会忘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给他们造成的灾难。日本军国主义者现在想重新唤起日本武士道精神。这，你看一个电影就懂得了。

但日本军国主义也不是那么容易复活的。因为七十年代的亚洲，人民已经觉悟起来了。照刚才讲的，一旦战争起来，日本这个岛国怎么作战？

日本现在面临着的矛盾是走战争的道路，还是走和平的道路。走这样经济扩张的道路，必然要带来军事扩张，必然要引起战争。

另一条道路是建立一个独立、和平、中立、民主的日本。这样的日本是受欢迎的。现在日本人正走在岔路口上。日本的企业家都要考虑这个问题，不然为什么提出修正资本主义呢？我们说：修正社会主义，就变成复辟资本主义；可是你修正资本主义，是无法进入社会主义的。那就可能采用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但是日本虽然是战败国，战后二十六年的日本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被凡尔赛条约所束缚，没有凡尔赛条约造成的那种政治和经济条件。所以我们说日本正处在岔路口上。当然大多数人民总想得到一个和平的环境。

“要维持老朋友是美国的政策”

日本应该跟中国友好，我们并不需要向外扩张。所以昨天我跟日本企业家们说，你们的政府太不讲现实了，对有七亿多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而把台湾蒋介石看作代表中国，这真是荒谬。这次在联合国都改变了局面，日本不改变能

行嘛！尽管这里存在着矛盾，这矛盾总要解决啊。

你不是问我如何看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矛盾吗？我想这个问题应由尼克松总统来回答。不然他跑到中国来，台湾问题又不能解决，回去后如何交代？

所以这是一个中心问题。然而这还是第二位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解放台湾已经等了二十二年，相比之下结束印支战争将显得更加迫切。因为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要求美国军队撤回去，要求结束战争。

马克斯韦尔：但是尼克松不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吗？他说的“撤退”而意思是“减少”——减少到还能够支撑阮文绍政权的最低水平？

总理：要维持它的那些“老朋友”是美国政策的核心。尼克松总统已承认，美国遭到失败，不能再独霸世界了，这是他在堪萨斯城演说中说的。

既然你承认这个前提，那么那些腐朽的将垮台的“老朋友”为什么一定要照顾呢？照顾这些“老朋友”，势必使你自己脱不了身。这样美国人民、世界人民都不赞成，因为大家都担心这个战争还会再起，或者搞得更大。

如果要讲面子、荣誉、那么立即、彻底、全部地从印度支那撤退，不再支持那里的“老朋友”，这才是光荣的。拖泥带水会两面不讨好，被双方所反对。当然一些美国的追随者的军队，如南朝鲜、泰国军队等，也要统统撤走。只有这样作，也许还能同那些地方的人民和政府保持一定的关系。

这样的事也不是没有人做过。戴高乐从阿尔及利亚撤退就是这样做的。既然明知是好事，但又不做，僵在那里，你要那个地方的人民不反对你，反而跟你友好，这是不可能的嘛！

尼克松总统喜欢搞什么“化”——“越南化”，“高棉化”（即“柬埔寨化”），“老挝化”。我曾提醒许多美国人说，你搞这“化”那“化”，还能比“中国化”更大吗？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提供了全部武器装备、财政援助，从四六年到四九年这四年工夫，前后连补充共武装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但最后蒋介石带到台湾去的还不到一百万，其余都被消灭了。

那时我们解放军部队绝大多数都用的是美国装备。有一张毛主席进北京城时检阅部队的照片，照片上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车和检阅的大炮。坦克都是美国造的。美国搞“中国化”四年就损失那么多。而现在美国在印支还要搞什么“化”，这说明美国完全没有接受教训。



美国为什么不能解决这矛盾？我看主要还是受它国内经济危机的牵扯。战争中又死了那么多人，美国人民不干了，他们要求回去，那么多人吸毒，使军队堕落了。当然如果人撤回去了，战争停了，许多军火没有地方用了，就要减少生产，经济危机就更不能解决。

美国垄断资本直接或间接跟军火工业有联系的占相当大的数目。如果继续出口，就需要贷款。因为这些卫星国没有钱买这些货。那么美国的预算支出就大。但定货还是要定货的，以便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大家都可以分到一点。

可是垄断资本家分赃不匀，就要争吵。而且有的国家自己能够造，它不买你的。现在共同市场扩大了，日本的市场也扩大了，互相争市场，矛盾很多。这是一个难题，现在美国不知怎么解决。

对越南来说，如果美国不撤走，它就要打到底，印度支那三国人民都有这样的决心。我们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支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当然，解决印支问题是属于印支三国人民的主权，别人无权干预，而越南问题就须由越南的代表跟美国直接谈。但我们有权支持他们。

马克斯韦尔：“我们能否从东南亚转到南亚最近形势的发展？你对这些发展怎么看？”

总理：关于印巴问题，我们姬代部长在十一月七日（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前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访问北京时）的讲话中已讲了我们的原则。印苏条约已经摆在苏联外交部的抽屉中两年了，尼克松访华公告发表后，苏联急急忙忙同印度缔结了这个条约。它想实现勃列日涅夫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是针对它所敌视的国家的。但这个目的恐怕难以实现。没有那一个国家响应。虽然它提出可以跟别的国家签订同样的条约，别的国家拒绝了。

如果印度悍然挑起战争，那它就能得到好处，解决问题？战争一起来，双方都要受损失，不会只是一方面受损失，如果印巴发生战争，我们的态度你是知道的。我们坚决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颠覆和侵略活动。印度最终将自食其果。次大陆从此将不安宁了。

马克斯韦尔：有些迹象表明，印度人从很早就支持孟加拉国运动。但目前的形势还有另一个方面。一方面孟加拉国运动现在当然得到印度的全力支持；但另一方面，东巴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运动。而且巴基斯坦本身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就是大英帝国从次大陆撤退的产物。

总理：根子在英国那儿，特别是蒙巴顿政策。蒙巴顿执行了大英帝国“分而治之”的政策，留下了很多祸根，很多定时炸弹。

可以说这是殖民主义发展的规律。殖民主义统治一个地方后，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把一些地方统一起来，便于它的剥削。当它离开这地方时，就留下一些祸根，以便于它遥控。

帝国主义总要培养一批奴才，控制殖民地区。尽管印度原来是分裂的，经过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灌输了婆罗门的上层思想，企图建立一个印度帝国。尼赫鲁就有这样的思想。他的实际政策也是如此。譬如中国的阿克赛钦（在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地区），英国的地图上本来没有把它划在大英帝国的范围内，我们根本不会想到阿克赛钦会有问题。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我曾给亚非国家领导人写过一封信，说到这个问题，信上提到了西部的由来。

一九五七年新年前后我到了德里。我们谈到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尼赫鲁只是闪闪烁烁地提到同新疆的边界。他把巴基斯坦管理下的克什米尔都算成印度的了，并说据他看那个地方我们双方的地图上的边界走向有出入。

后来我们跟巴基斯坦签订边界条约时，双方都作了调整。尼赫鲁当时只知道我们有连结新疆和阿里的通道（通过阿克赛钦），但不知道我们修路。其实公路我们早就在修了。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的、怎么修的。以后，他只是看到我们的书报才发现。

【注：“星期日泰晤士报”刊载的原文在此处删掉了如下一大段谈话：

马克斯韦尔：在我看来，使中印边界冲突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由于事实上边界问题并不复杂，本来应该是容易解决的。

总理：但印度不想解决。

马克斯韦尔：是的，确实是如此，不管怎样在一九五九年以后总是这样的。但你认为印度为什么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呢？在我看来好像心理因素与政治因素混杂在一起。

总理：特别是政治方面。印度对中国的西藏有野心。它认为可以把西藏从中国分

出来，跟印度搞在一起。所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它重点搞西藏。他不仅要我们承认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而且把两个喇嘛请去做客。我们当时对他很友好，让他们去了。后来我也去了。那时他已在两个喇嘛中做了很多挑拨工作。他还找各种理由，使两个喇嘛不能回去，留下来。班禅喇嘛还是坐飞机回来了，达赖喇嘛坐牲口回来了。走得迟。他重达赖轻班禅，进行挑拨。一九五九年的西藏暴乱暴露了尼赫鲁的野心。我在德里时就把毛主席的政策都告诉了两个喇嘛。我说，我们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要得到你们两位喇嘛的同意才做。我们非常尊重他们，但达赖喇嘛不相信。他回到拉萨后，组织农奴主和贵族暴乱。我们还是对他进行说服，没有马上动武。如果我们早动作，他是跑不了的。因为我们宁可争取他，结果他跑走了。后来班禅就没逃走，我们有了经验。所以，如果没有印度的颠覆和勾结，是不会出现叛乱事件的。当然还有大国在后面支持他。同样，如果不是印度颠覆东巴，东巴不会逃走这么多人。

马克斯韦尔：噢，我懂得了你的意思。

总理：我们在西藏解放农奴，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农奴剥削得很厉害，残酷得很，现在还有从西藏逃走的三万人在印度。

印度到现在还欠我们的账，把我们三万人颠覆出去了，他说我们颠覆他，我们要先对他指出这件事。达赖是一九五九年上半年跑出去的。

从那以后，西部边界问题也闹起来了，一直到发生空喀山口的冲突。这时赫鲁晓夫支持尼赫鲁，为的是要同艾森豪威尔创造戴维营精神。现在戴维营精神没有了，这两个头子也都不在了。

马克斯韦尔：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样一件事。在一九六〇年你同尼赫鲁会谈了边境问题以后你在新德里举行的那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个美国女记者提了一个我当时认为实在傻的问题——我想你当时恐怕也是这样想的。她问你，“如果并不意味着美国承认中国的话”，你能否考虑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北京。我记得你回答说，如果没有承认的问题，也就不能有邀请的问题，或者大体是这么个意思。但现在看来，那位女士不过是早说了十年！

总理：但十二年来情况变了。

马克斯韦尔：差不多在同时，又有人问你中苏边界问题。我记得你回答说，只是在双方的地图上有些小矛盾，不难解决。你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出了什么毛病了？

总理：关于中苏边界，那时我们还想同苏联的关系搞得好一些，虽然当时我们的关系已经开始不很好了，主要的是他们修正主义的发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了一股反动思潮。当时我们想能否挽救他，但是他在布加勒斯特搞突然袭击，以后我们还打算挽救他。我们在一九六〇年七、八月份，又去直接找苏联谈。但是它们反而撤退了一切在华专家，撤毁了中苏一切经济合同。当时，我们又作了一次努力，签署了一个八十一国共产党声明。但那时有一个弱点，那次是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去的。在八十一国共产党声明上签字后，刘少奇又作为国家主席访问苏联。那时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正是勃列日涅夫。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味道，被勃列日涅夫嗅出来了。所以到一九六一年，赫鲁晓夫敢于在二十二大上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去，撤回了在阿的一切专家，停止了一切援助。那次会议我去参加了。我按党中央的决定提出了抗议。同现在比，这个抗议，温和很多了。但他不能接受。所以我没有等会闭幕，中途就回来了。他在一九六二年，又搞了我们。这是第二个颠覆活动。从新疆搞出去了不少人。跟印度一样，印度承袭了大英帝国的传统，苏修承袭了沙皇的传统。一个是在一九五九年，一个是在一九六二年。苏联这样一搞，一九六二年中的中印边界冲突就来了。苏修告诉印度说，中国不会打你们的。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不是正开着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吗！苏联为什么说这样话呢？他不是从新疆把我们的人搞出去了吗？我们还是按老规矩，维持原状，我们的人没有打出去。但如果印度要超过所谓麦克马洪线，那我们还不打吗？这你清楚。有一个材料可以告诉你。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三日我国大使向尼赫鲁辞行拜会时，尼赫鲁对我大使说：双方可以以双方官员会晤的报告为基础进行讨论。当时正在日内瓦会议开会的陈毅同志在七月二十三日向梅农提出，双方部长是否在日内瓦搞个公报，表明双方将防止边境冲突问题进行谈判。梅农表示在日内瓦搞来不及了，他要马上回德里去。待他向政府报告后，要以由双方政府发表这样一个公报。但梅农回德里后再也没有下文了。这里总有外因，不是梅农本身的原因。”】

马克思韦尔：再回到目前的形势上来，看来现在印度又在遵循着一种几乎无情地走向战争的政策了。

总理：战争一打起来，往往不是以人们主观意愿为转移的，这个动乱就制止不下来了。

马克斯韦尔：最后，由于时间已经很晚了，你能不能简短地谈一下中英关系的问题。

总理：英国承认中国。在西方国家中是较早的，但到现在还未能交换大使，原因是英国政府坚持那个站不住脚的逻辑。

它公开可以同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即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照理这不是很清楚了吗？但它又说，如果有人问起，英国政府将说，英国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立场没有变化。简直莫名其妙。我和麦克唐纳先生（前英国驻东南亚高级专员，他不久前到过北京）谈过，我说这些是你们文官制度搞出来的。他说，在工党内阁和保守党内阁中，有那么一些学法律的人搞出来的。他们说，过去说过“台湾地位未定”。由于说了这样的话，现在不能改了。这不是荒唐吗？

我说你们英国政策改变了多少次，为什么这个政策不能改呢？张伯伦的政策不是邱吉尔把它改了吗？它就是要保留这一点。这次在联大表决的时候，英国投票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反对美国提案，算是实现了它的诺言。但这个保留毫无道理吧！是否等将来如果台湾有别的大国搞“独立国家”的阴谋，你要承认它？他不敢回答。你这样搞，我们不干。因为你们留一个尾巴，而且很长。

马克斯韦尔：如果英国采取中加建交公报的措词，是不是够了呢？我想，那个公报中说，加拿大“注意到”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总理：英国同加拿大不一样，英国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对台湾归还中国承担了义务，我们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而且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这是英国发明的。

因为美国丢了中国以后，美国难过得很，互相推卸责任，发表了艾奇逊的白皮书，一方面骂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责备蒋介石，好像美国政府总是做得对的。杜鲁门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声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美国对台湾和中国其他地方没有领土野心。开罗宣言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嘛，台湾又已经归还祖国，现在联合国也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但英国为了帮美国造一个籍口，一九五一年开始在法律上做文章，旧金山和约故意只说日本已放弃了那些领土。《注：此处删去了“包括台湾和其他地方”几个字》，但不说这些地方究竟归于谁，这是伏笔。还制造舆论说，等太平洋地区局

势和缓后再说。苏联也没有在旧金山条约上签字，这个条约也未说南库页岛（在北太平洋上的一个有争议的岛屿）应交谁，为什么不说南库页岛也是地位未定？这个岛的南半部是一九〇四至〇五年的日俄战争后割让给日本的，这比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晚十年就是了。

日本投降以后，中国的行政长官接受了日本的投降，台湾地位问题早已解决了，所以英国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当时的英国工党政府挖空心思出来的。当时美国占领了台湾海峡。英国是要帮美国忙的。

马克斯韦尔：我想这一切现在对中国实际上不产生什么问题。但是看来交换大使是不能早日实现了，而我想这将是伦敦的损失。

总理：我们没有什么，对英国不利。它已承认了我们二十二年，而其他承认我们比它晚的国家都交换了大使。

马克斯韦尔：我想，为英国目前立场所作的解释是，英国政府不能违背其过去政府说过的话。

总理：这是表面的话。实质上是要留一点尾巴，将来如果台湾宣布独立，它好承认。尽管英国是你的祖国，但我要批评英国的传统政策。它在任何一个地方总要留一个尾巴，你是研究南亚次大陆的，非常清楚。譬如查谟、克什米尔、东西孟加拉、东西旁遮普等，它任何地方总要留一点麻烦。

现在英国首相说，英国回到欧洲去，你既然要回到欧洲去，就该让亚洲人和缓一点嘛！应该把事情弄得更好些。谭森先生（前英国驻北京代办，他已在上月离任）可能有一个误会。以为我们老实，好说话。我们不隐蔽我们的观点，敢于承认错误。

你知道，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坏人搞的，完全违反了毛主席的政策，那时候有一个阴谋的反动组织，叫做“五一六”，煽动一批群众去包围英国代办处，我们通过广播车，要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冲进去，英国代办也听到了，他懂得了我们的政策。事后我们为它把房子修复了，表示了歉意。

我看英国有点误解，觉得中国人好说话。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对原则是一定坚持的。

马克斯韦尔：三个星期以前，这里有一位外交官——不是英国的外交官——告诉我，中英谈判已经突破，即将互派大使。看来他的消息不正确。

总理：中英如要互派大使，他们就必须割掉那个尾巴。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评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

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开了三个多月，已经结束了它的工作。这是联合国成立以来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届大会。在这届大会上，许多中小国家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反对种族歧视和经济掠夺，反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和核威胁政策。特别是，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决议和要求印巴双方停火、撤军的决议。这显示了中小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的坚强意志，显示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日益增强的作用。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于孤立和狼狈的境地。本届联大出现的这些情况，反映了当前大好的国际形势。

围绕着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问题而进行的激烈斗争，是本届联大最令人注目的一件大事。二十多年来，美国政府无理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遭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反对。在这届大会上，它被迫变换手法进行捣乱，苦心炮制了驱逐蒋介石集团是一个所谓“重要问题”的提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蒋介石集团都应占有席位的所谓“双重代表权”的提案，妄图在联合国中制造“两个中国”。但是，同美国政府的预料相反，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一付诸表决就被打掉。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蒋介石集团代表驱逐出联合国的提案，则以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的压倒多数，在热烈的欢呼声中获得通过。美国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自然报废。它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宣告破产。这是全世界人民的重大胜利，是美帝国主义的惨重失败，也是对某些假意支持而实际反对中国的势力的一个沉重打击。

在这次联大开会期间，印度政府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悍然发动了对巴基斯坦的武装侵略，侵占巴基斯坦的领土，严重威胁国际和平和安全，激起了大多数会员国的愤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明目张胆地宣扬“侵略有理”的强盗逻辑，遭到了许多国家代表的痛斥，陷于空前孤立。在安理会上，苏

修一再企图把所谓“孟加拉国”的代表塞进会议，没有得逞。它提出的旨在庇护印度侵略、分裂巴基斯坦的提案，只有孤零零一票的支持。在联合国大会上，以一百零四票对十一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实际上是被苏联在安理会否决的、要求印巴双方停火、撤军的提案，而反对的实际上只不过是苏联和印度两家。还应该指出，就是这个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支持侵略、破坏和平的同时，却又在本届联大兜售“裁减军备”，侈谈“国际安全”，这是一个绝大的讽刺。苏修这种丑恶的表演，不仅暴露了社会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而且进一步证明它的“召开世界裁军会议”提案只不过是扩军和发动侵略战争打掩护的一个骗局。

这届联大以两个压倒多数通过上述两项决议，一个是矛头针对美帝国主义，一个是矛头针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两个压倒多数，突出地反映了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的正义呼声在大会上占了优势，它长了中小国家的志气，灭了超级大国的威风。这届大会是一个重要征兆，表明两个超级大国要象过去那样控制和垄断联合国事务，是越来越困难了。

但是，两个超级大国并不甘心它们的失败，还是要用各种手法推行霸权政策。它们为了各自的利益，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加紧争夺的同时，只要有可能，仍然要进行幕后交易。凡是对它们不利的事情，它们就千方百计地加以阻挠和破坏，即使联合国通过了合理的提案，作出了决议，它们也拒不执行。例如，这届联大通过了亚非国家要求谴责美国从罗得西亚进口铬的提案，可是美国政府却不予理会，公然批准恢复从罗得西亚进口铬的法案。又如，尽管许多国家要求以色列归还它侵占的领土，主张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但美国却支持和纵容以色列继续霸占大片阿拉伯土地。至于印巴问题，更是一个典型例子。明明印度是赤裸裸的侵略者，明明绝大多数会员国要求印巴停火、撤军，而苏修竟然在安理会接二连三地滥用否决权，纵容和包庇印度侵略者，使得联合国在侵略者面前无所作为。鉴于这种情况，中小国家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就有必要不断加强团结，坚持斗争，进一步打破两个超级大国对联合国的控制。只有这样，联合国才能避免重走国际联盟的老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恢复，是全世界人民和主持正义的国家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我国出席本届联大的代表团第一次参加联合国的工作，受到许多友好国家的热烈欢迎，得到它们各方面的热情帮助。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



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的讲坛上，阐明了我国政府对于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同广大的中小国家一起战斗。尽管我们在联合国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愿意尽我们的力量，履行我们的责任，不辜负各国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和期望。中国永远不做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别人的超级大国。我们坚决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同一切爱好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国际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而共同奋斗。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社论）

2900年11月9日初稿

2012年5月10日修改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七册（3）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七章 开展外交新局面

##### 第三节 尼克松访华

######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中美联合公报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自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总统的有尼克松夫人、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其他美国官员。尼克松总统于二月二十一日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两位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访问中，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了广泛、认真和坦率的讨论。此外，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和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同样精神进行了会谈。

尼克松总统及其一行访问了北京，参观了文化、工业和农业项目，还访问了杭州和上海，在那里继续同中国领导人进行讨论，并参观了类似的项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领导人经过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接触之后，现在有机会坦率地互相介绍彼此对各种问题的观点，对此，双方认为是有益的。他们回顾了经历着重大变化和巨大动荡的国际形势，阐明了各自的立场和态度。

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国家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大国不应欺负小国，强国不应欺负弱国。中国决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任何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各国人民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本国的社会制度，有权维护本国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来侵略、干涉、控制和颠覆。一切外国军队都应撤回本国去。中国方面表示：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

目标所作的努力，坚决支持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七点建议以及在今年二月对其中两个关键问题的说明和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联合声明；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坚决支持日本人民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和中立的日本的愿望；坚决主张印度和巴基斯坦按照联合国关于印巴问题的决议，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全部撤回到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坚决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

美国方面声明：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需要对缓和当前的紧张局势和消除冲突的基本原因作出努力。美国将致力于建立公正而稳定的和平。这种和平是公正的，因为它满足各国人民和各国争取自由和进步的愿望。这种和平是稳定的，因为它消除外来侵略的危险。美国支持全世界各国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预的情况下取得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美国相信，改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以便减少由于事故、错误估计或误会而引起的对峙的危险，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任何国家都不应自称一贯正确，各国都要准备为了共同的利益重新检查自己的态度。美国强调：应该允许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的命运；美国一贯的首要目标是谈判解决；越南共和国和美国在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七日提出的八点建议提供了实现这个目标的基础；在谈判得不到解决时，美国预计在符合印度支那每个国家自决这一目标的情况下从这个地区最终撤出所有美国军队。美国将保持其与大韩民国的密切联系和对它的支持；美国将支持大韩民国为谋求在朝鲜半岛缓和紧张局势和增加联系的努力。美国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并将继续发展现存的紧密纽带。按照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美国赞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停火继续下去，并把全部军事力量撤至本国境内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停火线的各自一方；美国支持南亚各国人民和平地、不受军事威胁地建设自己的未来的权利，而不使这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的目标。

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

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国际争端应在此基础上予以解决，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准备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中实行这些原则。

考虑到国际关系的上述这些原则，双方声明：

——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或谅解。

双方都认为，任何大国与另一大国进行勾结反对其他国家，或者大国在世界上划分利益范围，那都是违背世界各国人民利益的。

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双方同意，扩大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是可取的。为此目的，他们就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新闻等方面的具体领域进行了讨论，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人民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将会是互相有利的。双方各自承诺对进一步发展这种联系和交流提供便利。

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

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双方同意，他们将通过不同渠道保持接触，包括不定期地派遣美国高级代表前来北京，就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具体磋商并继续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希望，这次访问的成果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新的前景。双方相信，两国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缓和亚洲及世界紧张局势作出贡献。

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夫人及美方一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给予他们有礼貌的款待，表示感谢。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72年2月28日

一九七二年三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通知

《通知》指出：尼克松的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在国际上震动也很大。总的说来，对公报的反应是积极的，大都认为这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一个新的开始，国际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这表明，毛主席邀请尼克松访华的英明决策，在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这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转折，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通知》说：在联合公报中，我方旗帜鲜明，坚持了一贯原则立场，戳穿了苏修的诽谤，鼓舞了世界人民。“但同时也必须看到，这些协议还是纸面上的，能否实现还要看美国今后的切实行动。”尼克松通过访华，虽已提高其在国内外影响，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内外交困的处境，因而国内外各方对他的牵制仍然很大，反对势力拼命攻击尼克松此行是对我投降，所以，今后事态发展还会有曲折反复，我方必须有所准备。据此，《通知》要求：一、无论从策略上讲，还是认协议仍有待实践这一点讲，我对外表态时要谨慎从事，要照顾到四面八方，不给敌人以破坏中美会谈成果的借口，说话不要过头，特别是不宜由我正面宣传联合公报是我们的胜利、美国的失败。二、公报中有一些细微的问题，望在阅读时注意。如，有关双方共同点，在文字表达上，大都采用了“应该”、“准备”、“希望”这类字眼，这是我方坚持的，其目的就是为表明双方根本立场有原则区别。又如，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声明部分说到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撤军，这里“地区”不是仅指台湾，

而是指整个远东地区。三、公报关于两国人员来往、贸易等，只是从原则上作了规定。今后民间人员来往会逐步增加，不仅美国人来，我们的人员也要去美。四、我方同美方的会谈除联合公报外，没有任何秘密协议或谅解。我内部学习或对外交谈时，应一律以联合公报的内容为准，并不得任意加以发挥。五、在宣传报道和官方表态方面，中美会谈时，美方希望双方有所克制，以保持有利气氛。现在，有了一个联合公报，形势同过去总有所不同。今后一段时间，除非有新的情况，我方将基本维持目前作法。六、我对美和对苏、对日所持的原则立场是一致的，我并不反对美苏会谈，希望其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不作出不利于世界人民的事。

## 二、研究资料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这是中美两国非正常化情况下的第一次元首级访问。当天下午，毛主席在寓所会见了尼克松。按照双方事前约定，此次会谈内容禁止外泄。会谈结束后，中方将会谈记录作为绝密文件，美方也将其列为白宫绝密，保存在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知之者甚少。1990年代美国解密了这次中美元首会谈的内容。

白宫 1972年2月21日

绝密/高度敏感件/仅限目视

会谈备忘录

参加者：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王海蓉，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唐闻生，翻译

尼克松总统；亨利·A·基辛格，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温斯顿·洛德，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记录员）

日期与时间：1972年2月21日，星期一，下午2：50—3：55

地点：北京，毛泽东寓所

尼克松 主席的著作改变了这个世界

（会谈在宾主互致问候中开始，毛泽东主席欢迎尼克松总统的到来，尼克松总统表示他非常高兴与主席会晤。）

尼克松总统：你读过很多书。总理说你读的书比他多。

毛主席：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说是我们几个要吹的问题，限于哲学方面。（中国人笑）

尼克松总统：我之所以那么说，是因为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我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毛主席：（手指基辛格博士）他是个哲学博士？

尼克松总统：他是一位思想博士。

毛主席：今天请他做主讲人如何？

尼克松总统：他是一位哲学专家。

基辛格：我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指定我的学生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毛主席：我的那些东西没什么。我写的东西里面没什么教育意义。（望着摄

影师们) 现在他们想干扰我们的会谈，我们这儿的秩序。

尼克松总统：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毛主席：我没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我们共同的老朋友，就是说蒋介石委员长，他不赞成。他说我们是共匪。他最近还发表了一篇讲话。你见到啦？

尼克松总统：蒋介石把主席称为共匪。主席怎么称呼蒋介石？

周总理：我们一般称他们为蒋介石集团。在报纸上有时也称他为匪。他们也回敬我们为匪。不管如何，我们是互相对骂罢了。

毛主席：其实，我们跟他做朋友的历史比你跟他做朋友的历史长得多。

尼克松总统：是的，我知道。

毛主席 我和你只讨论哲学问题

毛主席：我们两个不要垄断整个谈话。不让基辛格博士说说不行。你跑中国已经跑出了名嘛。

基辛格：是总统确定方向，决定方案。

尼克松总统：他这么讲，说明他是个绝顶聪明的助手。（毛和周笑）

毛主席：他在夸你，说你这样做很聪明。



尼克松总统:他看起来不像一个特工人员。他是唯一有本事在不自由的情况下去巴黎十二次，来北京一次，却没人知道的人，可能有两三个漂亮姑娘除外。  
(周大笑)

基辛格:她们可不知道。我是用来做掩护的。

毛主席:在巴黎?

尼克松总统:利用漂亮姑娘做掩护的人，一定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外交家。

毛主席:所以，你们的姑娘常常被用来做掩护喽?

尼克松总统:他的姑娘，不是我的。如果我用姑娘做掩护，我可就有大麻烦啦。

周总理:(大笑)特别是大选的时候。(基辛格大笑)基辛格博士不竞选总统，因为他不是美国出生的公民。

基辛格:唐小姐有资格当美国总统。

尼克松总统:那她将是第一位女总统。我们有了候选人了。

毛主席:如果有这样的候选人，可就很危险了。讲老实话，这个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他们打交道。

尼克松总统:我们理解。我们希望我们不使你们面对那样的问题。

毛主席:这些问题不是在我这里讨论，而是应该和总理讨论。我和你只讨论哲学问题。就是说，你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这里有个美国人叫弗兰柯，在贵国

尚处混战，就是你上次竞选的时候，他写了篇文章，说你会当选。我很欣赏那篇文章。但现在他反对你的访问。

尼克松总统：主席投我一票，是投给了两个坏人里面好一点的一个。

毛主席：我喜欢右派。人家说你是右派，说你们共和党是右派，那位首相（爱德华）希思也是右派。

尼克松总统：戴高乐将军也是。

毛主席：戴高乐是另一回事。他们还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我比较喜欢这些右派当政。

尼克松总统：我想重要的是，在美国，至少现在，那些右派能做那些左派只在嘴上说说的事情。

基辛格：那些左派是亲苏的，不鼓励向人民共和国靠拢，实际上正是基于这些立场他们才批评你。

毛主席：就是嘛。有些人在反对你。我们国内也有个反动集团反对我们跟你们来往。结果坐一架飞机跑到国外去了。

周总理：也许你们知道这件事。

毛主席：全世界就美国的情报比较准确，其次是日本。至于苏联，他们就在那里挖尸，但什么都不说。

周总理：在外蒙古。

尼克松总统：最近在印度—巴基斯坦危机中，我们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美国的左派非常严厉地批评我不站在印度一边。这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亲印度，另一个他们亲苏联。我认为，着眼于更大情势是重要的。不能让一个国家，无论它多么强大，去吞并邻国。这让我付出了政治代价——我并不后悔，因为我做得对——历史会证明我这样做是对的。

毛主席 提个建议，你少发点简报好不好？

毛主席：提个建议，只是建议，你少发点简报好不好？（总统指着基辛格博士和周大笑）如果你把我们谈的这些，我们讨论的哲学，向其他人通报，你认为好吗？

尼克松总统：主席可以放心，我们所讨论的一切，或者我与总理所讨论的一切，统统不会泄露。这是进行最高层会谈的唯一办法。

毛主席：那就好。

尼克松总统：我希望同总理，稍后也和主席讨论台湾、越南和朝鲜问题。我还希望讨论关于日本的未来，次大陆的未来，印度将起到什么作用；还有，讨论美苏关系的未来。因为只有放眼全世界，我们才能对近在眼前和迫切的问题做出正确的决策。

毛主席：所有那些麻烦的问题我不想再深谈。我看你的题目更好——哲学问题。

尼克松总统：有意思的是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赞成我们此次会晤，但苏联、印度不赞成，日本表示有疑虑。我们必须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同时决定我们应如何发展我们应对世界的政策，而不是诸如朝鲜、越南、台湾这样眼前的问题。

毛主席：对，我赞成。

尼克松总统：比如说，我们必须问自己，苏联为什么向贵国边界部署的兵力比向西欧边界部署的兵力多？日本的未来是什么？我们对此存在分歧，那么，是让日本中立和全无防卫更好？还是让它在一定时期内同美国具有一些关系更好？我现在讲的属于哲学范畴，问题在于，在国际关系领域没有好的选择。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们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会被填补。例如，总理指出，美国在伸手，苏联在伸手。问题是你们面临何种危险，是美国侵略还是苏联侵略的危险？有困难，但必须讨论。

毛主席：来自美国侵略的问题，或者来自中国侵略的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个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国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些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因此，我们两国间的状态很奇怪，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现在从我们开始打乒乓球不到十个月。如果从你们在华沙提出建议时算起，也不到两年。我们这边办事也有官僚主义。比如，你们想搞人员往来、贸易。我们就是死不肯，坚持解决不了大问题，小问题就不干。我自己也这么坚持过。后来我看还是你们对，我们就打起了乒乓球。总理说这也是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的事。

巴基斯坦前总统把尼克松总统介绍给我们。那时，我们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同意我们同你们交往。他说要比较一下约翰逊总统或尼克松总统哪个更好。但是叶海亚说这两个人没法比。他说一个像土匪——指约翰逊总统。我不知他从哪儿得到那么个印象。我们也不太喜欢他。我们不太喜欢你们前几任总统，从杜鲁门到约翰逊。

这中间有八年是共和党当总统。那时，你们可能也没想通。

周总理：主要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政策。

毛主席：之前他（周）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事。

尼克松总统：但是他们（朝着周总理和基辛格博士）握了手。（周笑）

尼克松 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

毛主席：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博士？

基辛格：主席先生，世界形势在那个时期也已发生急剧变化。我们学到了很多。我们原以为所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都千篇一律。直到总统当政，我们才理解中国革命的不同性质，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革命道路。

尼克松总统：主席先生，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所持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完全不同意的。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是我们对世界新的形势有了一个认识，而我方认识到，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我们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这一点我认为可以实话实说——我们存在分歧的原因。总理和基辛格博士讨论过这些分歧。

我还想说的是——审视两个大国，美国与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并不威胁美国的领土。我想你们也知道，美国对中国的领土没有企图。我们知道中国不想统治美国。我们相信你们也认识到美国不想统治世界。另外——也许你们不相信，但我相信——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这两个伟大的国家都不想主宰世界。因为我们就这两个问题上持相同态度，我们不威胁彼此的领土。

因此，尽管存在分歧，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共同的立场，来建立一个双方都可以在自己的道路上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安全发展的世界构架。对世界上另外一些国家而言，则谈不到这一点。

毛主席：我们也不威胁日本和南朝鲜。

尼克松总统：我们不威胁任何国家。

毛主席 就你个人来说，可能不在打倒之列

毛主席：（向周核对时间）你看今天我们吹到这里差不多了吧？

尼克松总统：是的。我想在结束时说，主席先生，我们知道你和总理冒了很大风险邀请我们到这里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但是，我读了主席的一些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个一旦机会来临就能看到的人，也知道你一定要“只争朝夕”。

就个人而论，我还想说——这也是对你，总理先生你说的——你们并不了解我，因此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将会发现，我从来不说我不能做到的事情。我总是做的比说的多。在此基础上，我希望同主席，当然还有总理，做坦率地谈话。

毛主席：（指着基辛格博士）“只争朝夕”的是他。我想，大概我像这种人放大炮的时候多。（周笑）无非是“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到帝、修、反，建立社会主义”这些话。

尼克松总统：就是像我这样的人，还有匪徒。

毛主席：但就你个人来说，可能你不在打倒之列。他（基辛格博士）也不在。如果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尼克松总统：主席先生，主席的一生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你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登上了世界上人口最多、一个伟大的国家的顶峰。

我的背景，不那么为人所知。我也出身于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并登上了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的顶峰。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问题是，我们的哲学不同，但我

们都脚踏实地，都来自人民，我们可以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不仅有益于中美两国，也在今后的岁月中有益于全世界。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

毛主席：你的书，《六次危机》写得不错。

尼克松总统：他（毛）读的书太多。

毛主席：太少。我对美国了解不多。我要请你派一些老师来，主要是历史和地理老师。

尼克松总统：好哇，太好了。

毛主席：我对埃德加·斯诺先生就是这么说的，这位记者在几天前去世了。

尼克松总统：真是令人遗憾。

毛主席：是啊，非常遗憾。

我们谈得成也行，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人们会说话的。如果我们第一次没谈成，那么人们就会议论，为什么我们第一次没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如果第二次我们谈成了，他们怎么说呀？

（根据中方的记录，当双方起身结束谈话的时候，尼克松握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在一起可以改变世界。”毛泽东没有回应，只是说：“我就不送你了。”）

□摘自《中国人》 2008年第1期

2009年11月16日初稿

2012年5月11日修改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七册（4）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七章 开展外交新局面

##### 第四节 中日恢复邦交

###### 本节资料

######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周恩来与英国作家马克斯韦尔的谈话

〔英国“星期泰晤士报”五日刊载了周恩来总理十一月二十日同英国作家兼记者马克斯韦尔的谈话，标题是“周总理在午夜的想法”；副题是：“为什么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尼克松的北京之行怎样使他在联合国失去票数”、“为什么总统可能在中国浪费时间”、“什么东西使日本处于战争或和平的十字路口”、“为什么印度将对同巴基斯坦进行战争感到后悔”、“英国和中国为什么不能互派大使”，并加了如下的编者按语：“以下是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向‘向星期日泰晤士报’单独提供的中国总理从晚上十一时半到至晨四时半对他发表的谈话。中国总理在这篇谈话中探讨了不断变化的世界。”现将“星期日泰晤士报”发表的周总理同马克斯韦尔的谈话转载如下。〕

马克斯韦尔：总理，我能否请你首先谈谈你对战后历史趋势的看法？

总理：第二次大战刚结束后不久，邱吉尔在富尔顿发表了一篇反共反苏的演讲，想把西方以至整个世界动员起来一齐反苏，以此来维持大英帝国的统治。这篇演说在美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美国就利用这篇演说的调子，大搞反苏反共的宣传。当时就有一种论调，认为反苏战争很快就会爆发。毛主席看出了其中有问题，就写了一篇文章，以别人的名义发表，表示不同意说这场反苏运动就会导致反苏战争的爆发，指出了实际上美国是想拿反共反苏的宣传作烟幕，把美苏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统统霸占起来。

战后二十六年来，并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但是在亚非拉这个第一中间地带，

小的战争一直不断，其中首先发生的一个比较大的战争就是中国的内战。

二次大战结束后，美国曾不可一世地称霸世界。那儿人民要解放，它就派军队去镇压，它建立了很多的军事基地，派出了很多军队。那儿经济很困难，要钱，它就给钱。它采用了两种方法：一个是马歇尔计划；另一个就是投资。马歇尔计划的总数约三百亿美元，而投资的总数更超过这个数目。

结果怎么样呢？美国不仅把第一中间地带即亚、非、拉侵占不少，对美苏以外的西方国家（即第二中间地带），它也伸手进去了。

今天的世界形势又是怎样的呢？今年七月六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作了一篇演讲，十月十六日英国首相希思在保守党年会上也作了结论性的讲话。这两篇讲话互相呼应。希思讲话的大概意思是：战后二十多年来，英国跟在美国后面跑，抛弃了欧洲，大英帝国终于解体了，成为第二等的国家；现在英国应该回到欧洲，参加共同市场。

结果，英国国会通过了英国参加共同市场的决议。在这以后，英法两国外长在伦敦会面，宣布英法合作，把西欧形成一个力量。这种力量尼克松总统也不得不承认的。

“是美国把日本养肥的”

尼克松在堪萨斯城的讲话中说，战后二十六年来，美国地位这样地下降，在战后初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苏联在战后也逐渐变成了超级大国，同美争霸。在第二中间地带的西欧，又出现了一个共同市场，使欧洲工业发达的国家联合起来，同美争霸。这是第三种力量。

第四种力量是日本。我对许多美国朋友说过，是美国把日本养肥了。日本的钢产量今年或到明年有可能接近或超过美国。尼克松的“新经济政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一棒打中了中间地带，首先是打了日本，然后是西欧国家，同时也使整个西方世界受到影响。

尼克松总统还说，还有第五种力量，这就是中国，但他说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力量。希思也说了同样的话。我们承认，我们可以在几十年后发展成为一个强盛的国家。但我们声明，我们无论如何不做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不做。

从整个世界来看，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的趋势。这就是战后二十六年来世界局势的变化。

马克斯韦尔：那么，实际上在你看来，作为超级大国的决定因素，或者说作为超级大国的标志，不是它的物质力量，而是它在国际关系中的态度，对不对？

总理：指的是政策。超级大国就是要侵略人家，越南战争、印度支那战争就是如此嘛。还要颠覆人家，像玻利维亚、危地马拉，例子很多了。第三是控制人家，控制拉丁美洲，现在人家不干了。再有是干涉人家，干涉人家的内政。还有欺负人家欺负弱小的国家。这些我们都应该反对。所以，我们的总原则是：世界国家不论大小都应一律平等，不能强加于人。

马克斯韦尔：是的，但我感到在这点上你有点理想主义，譬如说，有一个五十万人口的小国，它怎么可能真正跟中国这样的国家或其他大国处在平等地位呢？

总理：我们讲的平等，是指政治上的平等。尽管国家小，你应该尊重人家的主权嘛。它不同意的事，你不能强加于它。如果它需要经济合作，你帮助它，甚至可以无息贷款，乃至至于赠送，但你不能要求特权。帮助它的经济，你得使它的经济独立起来，而不是使它的经济附属于你。任何一个国家，如要独立，首先要在农业上能够自给，有吃的，这是能够生存下去的第一个条件。第二，帮助它的工业，可以帮助搞一些轻工业，它本地有原料，这样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力，积累一些资金。如果它那里还有矿产的话，可以帮助它开采，给他先进技术和设备，开采出来的东西首先让它自己用，而不应该首先是为提供援助的国家用。我举个例子，过去这一百年中，中东石油浪费多大！再过几个世纪就用完了。不是说要为人类的进步事业服务吗？那么，大国就应该尽更大的力量，帮助这些国家发展起来。现在第三世界开会责备大国，是有道理的。现在中东的广大人民还是那么穷困，只有少数贵族、资产阶级获得生产利润，那里的国家不能强盛起来。从军事上来说，如果那个国家抵抗外来侵略，那么有军火的国家就应该免费送给它；但对进行侵略的国家，如南非、南罗得西亚，就不应该帮助。

你说我们这个原则是理想主义，也可以这样说，但这个理想是可以实现的，而且不往这个方向走是不行的，不然就是战争。我们现在正开始努力这样做，做得很不够，还没有完全做好。但是我们想走这个方向。

对我们中国这么一个七亿人口的国家，对我们的人民，对我们的干部，要经常进行教育，稍不谨慎就会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我们现在还有这种事情。因此，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防止这样的错误，要批判这样的错误，要改正这样的错误。

马克斯韦尔：但是，美国的目前的政策不是有一个深刻的矛盾吗？尼克松总统即将访问中国是很难同他在联合国采取“两个中国”的政策协调起来的。

总理：但是他一提他要来，很多国家都跟着来了，这就影响到联合国表决的结果。你想过没有？

马克斯韦尔：没有。但我是这样想的，自从你们说他可以来访之后，就美国国内政治而言，尼克松先生博得人心的程度似乎骤然增加了——另一方面的后果，美国的和平运动似乎就因此睡觉了，当然，从中国的观点看来，这两个后果总是不利的罗？

总理：不见得。我举一个眼前的例子来说明：联合国表决的结果，我们就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恐怕美国也没有想到它的“两个中国”的方案会失败得这么惨。结果呢，这门就打开了。人们说：尼克松可以到中国，为什么我们不能去？

联合国以五十九票对五十五票否决了美国的提案，在反对美国提案的五十九票里，其中有十个没有跟中国建交的国家。它们后来也投了支持阿尔巴尼亚、阿韦及利亚提案的票。如果这十票不是反对，而是弃权，那就变成五十五对四十九，美国程序性提案就会通过。这件事就表明了尼克松表示要到中国来以后发生的变动。这是第一。

第二，一部份刚跟中国建交的国家还受到美。它们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没有办法才投弃权票的。国的压力。在程序性提案表决时投弃权票的十五个国家中，多数是跟中国刚建交的

它们投弃权票也等于是支持我们，因为弃权票多了，其他票的总数就减少。结果就出现了刚才说的情况：美国的提案被否决。这马上就引出一个什么结果呢？七十六票对三十五票。不仅超过三分之二票数，而且是压倒多数的国家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二十三国的提案。反对的只有三十五票。

那七十六票怎么得来的呢？反对美国提案的五十九票没有变化。原来对美国提案弃权的十五票当中，有十二票转过来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的提案，这里大多数是跟我们建交的，这是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些原来支持美国提案的国家，现在转过来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的提案。

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如墨西哥、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一通过，它就宣布跟蒋介石断交。这就说明它支持的是美国的程序性提案，并不支持美国的

意见，也不支持蒋介石。这一点，它的总统在联合国的演说中就说明了。另一种情况的国家，一个是以色列，一个是葡萄牙。它们这样做是什么原因，你是清楚的。这样就增加了十七票，变成了七十六票。而弃权的也增加了，原来十五票弃权，现在十七票弃权。反对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的票数，仅仅只有三十五票，一下子就把联合国的形势变了，当然这里有偶然性，但是必然的趋势往往通过偶然的现象表现出来。这说明一种趋势：中国不能再被封锁了。

原来我们不打算马上去联合国。但是我们一听到有七十六票支持我们去，我们就不能不去了。否则绝大多数支持我们的国家会失望的。

七十六票不仅反映了全世界人民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二年来被剥夺的权利和驱逐蒋介石集团的正义要求，而且也说明了二十二年来美国的主张是错误的，在十一月十五日联合国大会的欢迎会上，有五十七个国家踊跃发言。

美国是东道主，也抢先发了言，逼得苏联也不能不讲话了。接着蒙古也讲话了，日本也讲话了。五十七个发言的国家中，有八个国家跟中国还没有建交。还有加纳，它同我们还未复交。有些建交的国家因为会议时间拖得太长，来不及讲了。

“问题只能同尼克松解决”

可能你已经读过我们代表团在联合国的第一次发言。据说有些人对这个讲话感到意外，说没想到我们一出场就把原则性的问题明确地摆出来了。

为什么跟尼克松总统谈？毛主席公开地跟斯诺（美国研究共产党中国的权威）讲了：因为他是美国总统。当前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就要跟他打交道才有可能解决。既然他要来，我们就跟他谈。因为你不跟头子谈，跟谁谈？头子不谈，反而跟第二级、第三级的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譬如说，过去解决中国抗日的问题，我们就跟蒋介石谈。开始跟他派出的那些代表谈，谈不清楚，他们不敢负责。二、三级可以谈，头子就不可以谈？没有这样的逻辑嘛！

又譬如说，在一九五五年万隆会议（不结盟国家举行一系列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我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友好的，但是美国占领了我们的台湾和台湾海峡，我们愿意同它通过谈判来解决。美国政府当时表示同意。于是，从五五年八月一日起，在日内瓦开始谈判。

当时英国进行了斡旋，哈马舍尔德也起了作用。结果谈是谈了，但是大使级的谈

判不能解决问题，谈了十六年，又碰上美国扩大越南战争和侵略柬埔寨，我们就把谈判停下来了。

最后，尼克松自己找上门来，说他愿意到北京来谈判，那好吧，我们就请他来谈。现在谈判还没有开始，可是联合国我们已经进去了，这就是胜利，我们并没有出卖任何原则。

马克斯韦尔：在我看来，如果尼克松先生目前在亚洲的政策像它看起来那样僵硬，那他到这里来结果很可能是浪费时间。

总理：我也是这样看的。但也不能希望过大。以为一下子都可以谈成，才没有这么一回事。不过如果他什么问题都不解决，那么美国人民能够同意吗？

马克斯韦尔：但是他可能会试图把责任推给你。

总理：那未必办得到；我们已经把问题摆在联合国面前了。我们提出了我们对重大国际问题的立场，包括台湾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讲了。就是这个原则，我们要为之而奋斗。

我们不像苏联那样，公开不敢谈，背后作买卖，这对小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一到联合国，就把我们的主张拿出来。

马克斯韦尔：我在北京期间，了解到日本的政策——她的经济政策和军事潜力——已成为使你们政府关切的事情。

总理：最近我跟日本的一些企业家谈话。他们提出“修正资本主义”这样一个口号，当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从这里也了解到日本的企业家面临着一个困难。它的经济发展到现在阶段，从生产数字来说，在西方国家几乎占第二位，美国以下就是它，从整个世界来说，美国、苏联以下就是它。

但它的经济是畸形发展，首先是资源缺乏，绝大多数靠进口。经济自由膨胀，造成公害，把日本本土和西周的淡水鱼和海水鱼都搞坏了，要到远处去打鱼。公害最厉害的，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这是第一。

第二、为要大量吞吐，就需要很大的运输量，所以造船事业最发达的是日本，当然这些船不全是自己用。日本的运油船大到载重三十五万吨，现在甚至计划搞五十万吨的油船。

在这样的情况下，运油只能通过管子装卸，靠岸很困难，所以日本的炼油化工厂多设在沿海，这样海水也污染得很厉害。美国也是这样。

日本的市场大部份是在海外。但海外市场有限，他们就要争夺。日本本身农业却破产了。本来日本农业还能够自给，大米还能够出口。城市大部份人过去都是吃大米的。现在改吃面包了，要进口美国的面粉。现在为了发展工业的需要，把农村的土地和劳动力集中，所以粮食的总产量比过去低。工业发展到现在，日本纯粹的农业区域少起来了。

这种畸形发展，照原样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势必要跟人家争夺殖民地。譬如，它要向南亚次大陆、非洲、拉美和远东国家投资。

这个投资带有新殖民主义的性质。经济扩张必然带来军事扩张。譬如它从中东运石油到本国要经过马六甲海峡，油船在这里通过过多，会把那里的海水弄脏。日本军国主义份子说，马六甲海峡是它的生命线。

这引起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两个国家的不满，他们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它们带来的祸害。美国人民也不会忘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给他们造成的灾难。日本军国主义者现在想重新唤起日本武士道精神。这，你看一个电影就懂得了。

但日本军国主义也不是那么容易复活的。因为七十年代的亚洲，人民已经觉悟起来了。照刚才讲的，一旦战争起来，日本这个岛国怎么作战？

日本现在面临着的矛盾是走战争的道路，还是走和平的道路。走这样经济扩张的道路，必然要带来军事扩张，必然要引起战争。

另一条道路是建立一个独立、和平、中立、民主的日本。这样的日本是受欢迎的。现在日本人正走在岔路口上。日本的企业家都要考虑这个问题，不然为什么提出修正资本主义呢？我们说：修正社会主义，就变成复辟资本主义；可是你修正资本主义，是无法进入社会主义的。那就可能采用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但是日本虽然是战败国，战后二十六年的日本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被凡尔赛条约所束缚，没有凡尔赛条约造成的那种政治和经济条件。所以我们说日本正处在岔路口上。当然大多数人民总想得到一个和平的环境。

“要维持老朋友是美国的政策”

日本应该跟中国友好，我们并不需要向外扩张。所以昨天我跟日本企业家们说，你们的政府太不讲现实了，对有七亿多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而把台湾蒋介石看作代表中国，这真是荒谬。这次在联合国都改变了局面，日本不改变能

行嘛！尽管这里存在着矛盾，这矛盾总要解决啊。

你不是问我如何看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矛盾吗？我想这个问题应由尼克松总统来回答。不然他跑到中国来，台湾问题又不能解决，回去后如何交代？

所以这是一个中心问题。然而这还是第二位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解放台湾已经等了二十二年，相比之下结束印支战争将显得更加迫切。因为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在内，都要求美国军队撤回去，要求结束战争。

马克斯韦尔：但是尼克松不是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吗？他说的“撤退”而意思是“减少”——减少到还能够支撑阮文绍政权的最低水平？

总理：要维持它的那些“老朋友”是美国政策的核心。尼克松总统已承认，美国遭到失败，不能再独霸世界了，这是他在堪萨斯城演说中说的。

既然你承认这个前提，那么那些腐朽的将垮台的“老朋友”为什么一定要照顾呢？照顾这些“老朋友”，势必使你自己脱不了身。这样美国人民、世界人民都不赞成，因为大家都担心这个战争还会再起，或者搞得更大。

如果要讲面子、荣誉、那么立即、彻底、全部地从印度支那撤退，不再支持那里的“老朋友”，这才是光荣的。拖泥带水会两面不讨好，被双方所反对。当然一些美国的追随者的军队，如南朝鲜、泰国军队等，也要统统撤走。只有这样作，也许还能同那些地方的人民和政府保持一定的关系。

这样的事也不是没有人做过。戴高乐从阿尔及利亚撤退就是这样做的。既然明知是好事，但又不做，僵在那里，你要那个地方的人民不反对你，反而跟你友好，这是不可能的嘛！

尼克松总统喜欢搞什么“化”——“越南化”，“高棉化”（即“柬埔寨化”），“老挝化”。我曾提醒许多美国人说，你搞这“化”那“化”，还能比“中国化”更大吗？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提供了全部武器装备、财政援助，从四六年到四九年这四年工夫，前后连补充共武装了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但最后蒋介石带到台湾去的还不到一百万，其余都被消灭了。

那时我们解放军部队绝大多数都用的是美国装备。有一张毛主席进北京城时检阅部队的照片，照片上毛主席乘坐的吉普车和检阅的大炮。坦克都是美国造的。美国搞“中国化”四年就损失那么多。而现在美国在印支还要搞什么“化”，这说明美国完全没有接受教训。



美国为什么不能解决这矛盾？我看主要还是受它国内经济危机的牵扯。战争中又死了那么多人，美国人民不干了，他们要求回去，那么多人吸毒，使军队堕落了。当然如果人撤回去了，战争停了，许多军火没有地方用了，就要减少生产，经济危机就更不能解决。

美国垄断资本直接或间接跟军火工业有联系的占相当大的数目。如果继续出口，就需要贷款。因为这些卫星国没有钱买这些货。那么美国的预算支出就大。但定货还是要定货的，以便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大家都可以分到一点。

可是垄断资本家分赃不匀，就要争吵。而且有的国家自己能够造，它不买你的。现在共同市场扩大了，日本的市场也扩大了，互相争市场，矛盾很多。这是一个难题，现在美国不知怎么解决。

对越南来说，如果美国不撤走，它就要打到底，印度支那三国人民都有这样的决心。我们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印支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当然，解决印支问题是属于印支三国人民的主权，别人无权干预，而越南问题就须由越南的代表跟美国直接谈。但我们有权支持他们。

马克斯韦尔：“我们能否从东南亚转到南亚最近形势的发展？你对这些发展怎么看？”

总理：关于印巴问题，我们姬代部长在十一月七日（巴基斯坦人民党主席、前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访问北京时）的讲话中已讲了我们的原则。印苏条约已经摆在苏联外交部的抽屉中两年了，尼克松访华公告发表后，苏联急急忙忙同印度缔结了这个条约。它想实现勃列日涅夫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是针对它所敌视的国家的。但这个目的恐怕难以实现。没有那一个国家响应。虽然它提出可以跟别的国家签订同样的条约，别的国家拒绝了。

如果印度悍然挑起战争，那它就能得到好处，解决问题？战争一起来，双方都要受损失，不会只是一方面受损失，如果印巴发生战争，我们的态度你是知道的。我们坚决支持巴基斯坦反对印度的颠覆和侵略活动。印度最终将自食其果。次大陆从此将不安宁了。

马克斯韦尔：有些迹象表明，印度人从很早就支持孟加拉国运动。但目前的形势还有另一个方面。一方面孟加拉国运动现在当然得到印度的全力支持；但另一方面，东巴存在着一个真正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运动。而且巴基斯坦本身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就是大英帝国从次大陆撤退的产物。

总理：根子在英国那儿，特别是蒙巴顿政策。蒙巴顿执行了大英帝国“分而治之”的政策，留下了很多祸根，很多定时炸弹。

可以说这是殖民主义发展的规律。殖民主义统治一个地方后，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把一些地方统一起来，便于它的剥削。当它离开这地方时，就留下一些祸根，以便于它遥控。

帝国主义总要培养一批奴才，控制殖民地区。尽管印度原来是分裂的，经过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灌输了婆罗门的上层思想，企图建立一个印度帝国。尼赫鲁就有这样的思想。他的实际政策也是如此。譬如中国的阿克赛钦（在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地区），英国的地图上本来没有把它划在大英帝国的范围内，我们根本不会想到阿克赛钦会有问题。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我曾给亚非国家领导人写过一封信，说到这个问题，信上提到了西部的由来。

一九五七年新年前后我到了德里。我们谈到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尼赫鲁只是闪闪烁烁地提到同新疆的边界。他把巴基斯坦管理下的克什米尔都算成印度的了，并说据他看那个地方我们双方的地图上的边界走向有出入。

后来我们跟巴基斯坦签订边界条约时，双方都作了调整。尼赫鲁当时只知道我们有连结新疆和阿里的通道（通过阿克赛钦），但不知道我们修路。其实公路我们早就在修了。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修的、怎么修的。以后，他只是看到我们的书报才发现。

【注：“星期日泰晤士报”刊载的原文在此处删掉了如下一大段谈话：

马克斯韦尔：在我看来，使中印边界冲突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是，由于事实上边界问题并不复杂，本来应该是容易解决的。

总理：但印度不想解决。

马克斯韦尔：是的，确实是如此，不管怎样在一九五九年以后总是这样的。但你认为印度为什么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呢？在我看来好像心理因素与政治因素混杂在一起。

总理：特别是政治方面。印度对中国的西藏有野心。它认为可以把西藏从中国分出来，跟印度搞在一起。所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它重点搞西藏。

他不仅要我们承认所谓的麦克马洪线，而且把两个喇嘛请去做客。我们当时对他很友好，让他们去了。后来我也去了。那时他已在两个喇嘛中做了很多挑拨工作。他还找各种理由，使两个喇嘛不能回去，留下来。班禅喇嘛还是坐飞机回来了，达赖喇嘛坐牲口回来了。走得迟。他重达赖轻班禅，进行挑拨。一九五九年的西藏暴乱暴露了尼赫鲁的野心。我在德里时就把毛主席的政策都告诉了两个喇嘛。我说，我们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要得到你们两位喇嘛的同意才做。我们非常尊重他们，但达赖喇嘛不相信。他回到拉萨后，组织农奴主和贵族暴乱。我们还是对他进行说服，没有马上动武。如果我们早动作，他是跑不了的。因为我们宁可争取他，结果他跑走了。后来班禅就没逃走，我们有了经验。所以，如果没有印度的颠覆和勾结，是不会出现叛乱事件的。当然还有大国在后面支持他。同样，如果不是印度颠覆东巴，东巴不会逃走这么多人。

马克斯韦尔：噢，我懂得了你的意思。

总理：我们在西藏解放农奴，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农奴剥削得很厉害，残酷得很，现在还有从西藏逃走的三万人在印度。

印度到现在还欠我们的账，把我们三万人颠覆出去了，他说我们颠覆他，我们要先对他指出这件事。达赖是一九五九年上半年跑出去的。

从那以后，西部边界问题也闹起来了，一直到发生空喀山口的冲突。这时赫鲁晓夫支持尼赫鲁，为的是要同艾森豪威尔创造戴维营精神。现在戴维营精神没有了，这两个头子也都不在了。

马克斯韦尔：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这样一件事。在一九六〇年你同尼赫鲁会谈了边境问题以后你在新德里举行的那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个美国女记者提了一个我当时认为实在傻的问题——我想你当时恐怕也是这样想的。她问你，“如果并不意味着美国承认中国的话”，你能否考虑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北京。我记得你回答说，如果没有承认的问题，也就不能有邀请的问题，或者大体是这么个意思。但现在看来，那位女士不过是早说了十年！

总理：但十二年来情况变了。

马克斯韦尔：差不多在同时，又有人问你中苏边界问题。我记得你回答说，只是在双方的地图上有些小矛盾，不难解决。你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出了什么毛病了？

总理：关于中苏边界，那时我们还想同苏联的关系搞得更好一些，虽然当时我们的

关系已经开始不很好了，主要的是他们修正主义的发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了一股反动思潮。当时我们想能否挽救他，但是他在布加勒斯特搞突然袭击，以后我们还打算挽救他。我们在一九六〇年七、八月份，又去直接找苏联谈。但是它们反而撤退了一切在华专家，撤毁了中苏一切经济合同。当时，我们又作了一次努力，签署了一个八十一国共产党声明。但那时有一个弱点，那次是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去的。在八十一国共产党声明上签字后，刘少奇又作为国家主席访问苏联。那时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正是勃列日涅夫。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味道，被勃列日涅夫嗅出来了。所以到一九六一年，赫鲁晓夫敢于在二十二大上把阿尔巴尼亚开除出去，撤回了在阿的一切专家，停止了一切援助。那次会议我去参加了。我按党中央的决定提出了抗议。同现在比，这个抗议，温和很多了。但他不能接受。所以我没有等会闭幕，中途就回来了。他在一九六二年，又搞了我们。这是第二个颠覆活动。从新疆搞出去了不少人。跟印度一样，印度承袭了大英帝国的传统，苏修承袭了沙皇的传统。一个是在一九五九年，一个是在一九六二年。苏联这样一搞，一九六二年中的中印边界冲突就来了。苏修告诉印度说，中国不会打你们的。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不是正开着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吗！苏联为什么说这样话呢？他不是从新疆把我们的人搞出去了吗？我们还是按老规矩，维持原状，我们的人没有打出去。但如果印度要超过所谓麦克马洪线，那我们还不打吗？这你清楚。有一个材料可以告诉你。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三日我国大使向尼赫鲁辞行拜会时，尼赫鲁对我大使说：双方可以以双方官员会晤的报告为基础进行讨论。当时正在日内瓦会议开会的陈毅同志在七月二十三日向梅农提出，双方部长是否在日内瓦搞个公报，表明双方将防止边境冲突问题进行谈判。梅农表示在日内瓦搞来不及了，他要马上回德里去。待他向政府报告后，要以由双方政府发表这样一个公报。但梅农回德里后再也没有下文了。这里总有外因，不是梅农本身的原因。”】

马克斯韦尔：再回到目前的形势上来，看来现在印度又在遵循着一种几乎无情地走向战争的政策了。

总理：战争一打起来，往往不是以人们主观意愿为转移的，这个动乱就制止不下来了。

马克斯韦尔：最后，由于时间已经很晚了，你能不能简短地谈一下中英关系的问

题。

总理：英国承认中国。在西方国家中是较早的，但到现在还未能交换大使，原因是英国政府坚持那个站不住脚的逻辑。

它公开可以同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即台湾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照理这不是很清楚了吗？但它又说，如果有人问起，英国政府将说，英国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立场没有变化。简直莫名其妙。我和麦克唐纳先生（前英国驻东南亚高级专员，他不久前到过北京）谈过，我说这些是你们文官制度搞出来的。他说，在工党内阁和保守党内阁中，有那么一些学法律的人搞出来的。他们说，过去说过“台湾地位未定”。由于说了这样的话，现在不能改了。这不是荒唐吗？

我说你们英国政策改变了多少次，为什么这个政策不能改呢？张伯伦的政策不是邱吉尔把它改了吗？它就是要保留这一点。这次在联大表决的时候，英国投票支持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反对美国提案，算是实现了它的诺言。但这个保留毫无道理吧！是否等将来如果台湾有别的大国搞“独立国家”的阴谋，你要承认它？他不敢回答。你这样搞，我们不干。因为你们留一个尾巴，而且很长。马克斯韦尔：如果英国采取中加建交公报的措词，是不是够了呢？我想，那个公报中说，加拿大“注意到”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

总理：英国同加拿大不一样，英国是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对台湾归还中国承担了义务，我们坚决反对“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而且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这是英国发明的。

因为美国丢了中国以后，美国难过得很，互相推卸责任，发表了艾奇逊的白皮书，一方面骂中国共产党，一方面责备蒋介石，好像美国政府总是做得对的。杜鲁门在一九五〇年一月声明，台湾已经归还中国，美国对台湾和中国其他地方没有领土野心。开罗宣言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嘛，台湾又已经归还祖国，现在联合国也承认只有一个中国。

但英国为了帮美国造一个籍口，一九五一年开始在法律上做文章，旧金山和约故意只说日本已放弃了那些领土。《注：此处删去了“包括台湾和其他地方”几个字》，但不说这些地方究竟归于谁，这是伏笔。还制造舆论说，等太平洋地区局势和缓后再说。苏联也没有在旧金山条约上签字，这个条约也未说南库页岛（在

北太平洋上的一个有争议的岛屿) 应交谁, 为什么不说南库页岛也是地位未定? 这个岛的南半部是一九〇四至〇五年的日俄战争后割让给日本的, 这比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把台湾割让给日本——晚十年就是了。

日本投降以后, 中国的行政长官接受了日本的投降, 台湾地位问题早已解决了, 所以英国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当时的英国工党政府挖空心思想出来的。当时美国占领了台湾海峡。英国是要帮美国忙的。

马克斯韦尔: 我想这一切现在对中国实际上不产生什么问题。但是看来交换大使是不能早日实现了, 而我想这将是伦敦的损失。

总理: 我们没有什么, 对英国不利。它已承认了我们二十二年, 而其他承认我们比它晚的国家都交换了大使。

马克斯韦尔: 我想, 为英国目前立场所作的解释是, 英国政府不能违背其过去政府说过的话。

总理: 这是表面的话。实质上是要留一点尾巴, 将来如果台湾宣布独立, 它好承认。尽管英国是你的祖国, 但我要批评英国的传统政策。它在任何一个地方总要留一个尾巴, 你是研究南亚次大陆的, 非常清楚。譬如查谟、克什米尔、东西孟加拉、东西旁遮普等, 它任何地方总要留一点麻烦。

现在英国首相说, 英国回到欧洲去, 你既然要回到欧洲去, 就该让亚洲人和缓一点嘛! 应该把事情弄得更好些。谭森先生(前英国驻北京代办, 他已在上月离任) 可能有一个误会。以为我们老实, 好说话。我们不隐蔽我们的观点, 敢于承认错误。

你知道, 火烧英国代办处, 是坏人搞的, 完全违反了毛主席的政策, 那时候有一个阴谋的反动组织, 叫做“五一六”, 煽动一批群众去包围英国代办处, 我们通过广播车, 要他们无论如何不能冲进去, 英国代办也听到了, 他懂得了我们的政策。事后我们为它把房子修复了, 表示了歉意。

我看英国有点误解, 觉得中国人好说话。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对原则是一定坚持的。

马克斯韦尔: 三个星期以前, 这里有一位外交官——不是英国的外交官——告诉我, 中英谈判已经突破, 即将互派大使。看来他的消息不正确。

总理: 中英如要互派大使, 他们就必须割掉那个尾巴。

一九七二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转发外交部“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

宣传提纲指出，日本内阁首相田中角荣即将来华访问，与我国领导人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这是当前我国外交战线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田中首相访华，一是当前国际大好形势的反映，二是中国国际威望不断提高的标志，三是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共同斗争的结果，四是日美、日苏矛盾进一步发展的表现。

邀请田中首相访华，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利于反对美苏两霸特别是反对苏修的斗争，有利于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有利于我国解放台湾的斗争，有利于缓和亚洲紧张局势。

毛泽东批示：同意。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316页）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欢迎田中首相宴会上周恩来总理的祝酒词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讯 周恩来总理在欢迎田中首相宴会上的祝酒词

尊敬的田中角荣首相阁下，各位日本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阁下应邀来我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我们感到高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对田中首相以及其他日本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两国间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和贸易关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

不断发展。最近几年来，每年来中国访问的日本朋友超过其他国家朋友，中国同日本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贸易额也高过其他国家。这就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前，世界形势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首相阁下，你来华前说，两国会谈能够达成协议；也必须达成协议。我深信，经过我们双方的努力，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中日邦交正常化一定能够实现。中日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但这不应该成为我们两国平等友好相处的障碍。恢复中日邦交，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将为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扩大两国经济和文化交流，开辟广阔的前景。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它将为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中国和日本都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都是勤劳勇敢的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人民向日本人民致意，并衷心祝愿日本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

今天，中日两国领导人已开始就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谈。我们期望，我们的会谈将取得圆满的成功。

最后，我提议：

为田中首相阁下的健康，

为大平外相阁下、二阶堂官房长官阁下的健康，

为其他日本贵宾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所有朋友们、同志们的健康，

为中日友好，

干杯！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周恩来总理欢迎宴会上田中首相的祝酒词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讯 田中首相在周恩来总理欢迎宴会上的祝酒



词

尊敬的周恩来总理阁下以及在座的各位先生：

这次，我能够应周恩来总理阁下的邀请，以日本国总理大臣的身份，踏上我国邻邦中国的国土，感到非常高兴。今天又举行如此盛大的晚宴欢迎我们，我心中感到非常温暖，对于有关方面各位先生的关照，谨表示深切的谢意。

这次访问，我是由东京直飞北京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不仅在地理上如此相近，而且有着长达两千年丰富多采的交往的历史。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第二次大战后，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这个历史事实。但是，我们不能永远沉沦在过去的暗淡的死胡同里。我认为，现在日中两国的领导人为了明天进行会谈是重要的。为了明天进行会谈，也就是为了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和繁荣这一共同的目标，进行坦率而有诚意的会谈。我这次前来此地，正是为了这一目的。我们愿望，同伟大的中国及其国民之间能够建立起友好睦邻关系，两国能够一面互相尊重对方同其友好国家的关系，一面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和繁荣作出贡献。

不言而喻，日中之间政治信仰和社会制度是不同的。但是，我认为，尽管如此，日中双方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交流，尊重相互的立场，进行合作，是可能的。

为要把日中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上，实现邦交正常化是绝对必要的。当然，双方有各自的基本立场和特殊情况。但是我相信，哪怕双方的立场和意见存在着一些小异，日中双方根据求大同和互谅互让的精神，克服意见分歧，达成协议是可能的。我愿意完成这一重任，在悠久的日中友好的道路上迈出新的第一步。

最后，我借主人的酒提议：同周恩来总理阁下以及各位先生一起举杯，

为毛泽东主席阁下的幸福健康，

为周恩来总理阁下的身体健康和工作顺利，

为日中两国国民的永久的友好和亚洲的和平、繁荣，

干杯！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答谢宴会上田中首相的祝酒词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讯 田中首相在答谢宴会上的祝酒词，全文如下：

周恩来总理阁下以及在座的各位先生：

今天晚上，我有机会举行这个表达我们感谢心情的宴会，承蒙周恩来总理阁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人以及有关方面各位先生出席，感到十分高兴。

我对周恩来总理阁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以及有关方面各位先生对我和大平外务大臣、二阶堂官房长官以及全体随行人员、新闻界人员所给予的热情款待和充满诚意的关照，再一次表示深切的谢意。

而且，昨天我有机会同毛泽东主席阁下会见，就日中两国关系的未来以及各项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这次会谈使我深受感动。

我是为了完成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严肃的任务前来访问中国的。来到贵国以后，同周恩来总理阁下以及贵国有关方面各位先生亲切会见，并在始终友好的气氛中多次极其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其结果，我深信邦交正常化这一大事业，现在是能够实现的。

日中两国领导人象这次这样友好地促膝会谈，是经过长久的岁月和艰苦的道路才实现的。我对为了打开日中两国进行对话的道路作出贡献的两国各方面人士，表示谢意。邦交正常化是走向明天的第一步，我愿意在巨大的历史潮流中朝着新的前景前进。今后日中之间还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是我相信只要两国本着互让和相互信赖的精神予以处理，这些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的。

我深信，两国间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两国国民多年来所期望的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不仅会在两国历史上掀开新的篇章，而且也是对亚洲以至世界和平的贡献。我深切希望，以这一次我们访问中国为开端，更加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使友好的纽带把我们两国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最后，我提议，同在座的各位先生一起举杯，

为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阁下和周恩来总理阁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为日中两国国民的永久友好，为亚洲和世界和平，  
干杯！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田中首相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周恩来总理的祝酒词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讯 周恩来总理在田中首相举行的答谢宴会上的祝酒词，全文如下：

尊敬的田中角荣首相阁下，各位日本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

今天晚上，田中首相阁下举行宴会，盛情款待我们。请允许我代表在座的中国同事们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首相阁下和各位日本贵宾，表示深切的谢意。

田中首相这次来我国访问，时间很短，但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田中首相会见了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一小时认真、友好的谈话。

我们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就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坦率和友好的讨论。本着互相谅解和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我们在有关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

我们即将结束两国间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日两国人民这一长期愿望的实现，将打开两国关系中的新篇章，并将对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热烈祝贺我们会谈的圆满成功，并高度评价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为建立中日邦交作出的重要贡献。

我们取得的成就应当归功于我们两国人民。我相信，他们会一定为我们的成就而感到非常高兴。

在这一历史性时刻，我愿代表中国人民，对那些长期以来为促进中日友好和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贡献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日本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

中日两国是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双方富有成果的会谈证明，只要双方都具有信心，两国间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得到解决的。

我相信，只要我们双方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定能不断得到发展，我们两国伟大的人民定能世代友好下去。

现在，我提议：

为田中首相阁下的健康，

为大平外相阁下、二阶堂官房长官阁下的健康，

为全体日本贵宾们的健康，  
为在座的朋友们和同志们的健康，  
为中日两国人民的伟大友谊，  
干杯！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于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陪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有大平正芳外务大臣、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以及其他政府官员。

毛泽东主席于九月二十七日会见了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双方进行了认真、友好的谈话。

周恩来总理、姬鹏飞外交部长和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始终在友好气氛中，以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为中心，就两国间的各项问题，以及双方关心的其他问题，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同意发表两国政府的下述联合声明：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

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两国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也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一）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

（二）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决定，按照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在各自的首都为对方大使馆的建立和履行职务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并尽快互换大使。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同意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

根据上述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两国政府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为目的的谈判。

（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为进一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和扩大人员往来，根据需要并考虑到已有的民间协定，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签字）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姬鹏飞（签字）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 田中角荣（签字）

日本国外务大臣 大平正芳（签字）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于北京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

指出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宣告结束

新华社北京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讯 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今天在这里指出，由于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发表，悬而未决的日中邦

交正常化问题终于获得解决，日中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从今天起宣告结束，从今天开始两国间建立外交关系，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宣告结束。大平正芳外务大臣是今天上午在联合声明签署之后，在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讲这些话的。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主持了有中外记者参加的这次记者招待会。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说：“经过历时四天的日中两国首脑富有成果的会谈，今天发表了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联合声明，悬而未决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终于获得解决。”

他说：“日中双方对邦交正常化的基本认识和态度，已经在联合声明前言中表明了。我们相信，结束不幸地长期存在于日中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在两国间建立和平友好关系，是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在谈到联合声明本文时说：“正如第一条所表明的，日中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从今天起宣告结束。作为其具体表现，从今天开始两国间建立外交关系。关于这一点，请参照第四条。

“其次，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当然前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一点，日本政府的意思已在第二条作了表述。

“另外，日本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已经在第三条表明了。开罗宣言规定台湾归还中国，而日本接受了承继上述宣言的波茨坦公告，其中有第八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鉴于这一原委，日本政府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说：“关于在第五条中表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弃赔偿问题，如果想到过去日中之间不幸的战争的结果，中国人民所受损害之巨大，我们认为对此应予坦率而正当的评价。”

他说：“邦交正常化的意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制度不同的日中两国，互相尊重彼此的立场，建立起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这种日中关系应遵循的原则列入了第六条，第八条所述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也同样反映了两国政府向前看的态度。”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最后说：“在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和平条约（编者注：即日蒋条约）已失去了存

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在记者招待会上还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

## 二、研究资料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  
（一九七一年六月至一九七二年十月部分）

2009年11月23日初稿

2012年5月15日修改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八册（1）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八章 批林整风

##### 第一节 一九七二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 本节资料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胜利的一九七一年过去了。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的我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地跨进了战斗的一九七二年。

当世界进入七十年代的时候，毛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的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一年来国际形式的发展，进一步证实了毛主席的这个科学论断。

过去的一年，整个世界激烈动荡。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都在激化，特别是美帝、苏修同包括它们本国人民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矛盾，以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划分势力范围的矛盾，更尖锐了，更扩大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激起亚非拉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群起而攻之。侵略和反侵略、革命和反革命的局部战争连绵不绝。帝国主义阵营四分五裂。修正主义集团日趋瓦解。各国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各种政治力量进一步分化改组。今日世界形势的特点，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乱”，或者叫“天下大乱”。在这种局面下，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的觉悟迅速提高，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在斗争中得到锻炼，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运动更加深入。从帝国主义的战略后方到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带，革命斗争蓬勃高涨。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个伟大的历史潮流猛烈地冲击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腐朽统治。

美帝国主义的处境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困难。它推行的反革命全球战略不断遭到挫败。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巴勒斯坦人民和



阿拉伯人民反对美、以侵略的斗争的发展，美国人民革命群众运动的兴起，全世界人民反美斗争的高涨，大大地削弱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力量。由于美国同日本、西欧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化，它们之间转嫁危机、争夺市场和原料基地的搏斗愈演愈烈，美国遇到了战后二十六年来最严重的挑战。这些情况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正在步美帝国主义的后尘，打着种种骗人的幌子到处伸手。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压迫苏联各族人民的同时，竭力控制和剥削所谓“大家庭”中其他国家的人民，并且拚命向世界各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它正在把越来越多的绞索套到自己脖子上。过去一年中，苏修勾结美帝搞核交易，签订出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主权的关于西柏林问题的协定，在许多国家搞颠覆活动，威胁巴尔干，破坏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反对美、以侵略者的武装斗争，特别是悍然支持印度反动派武装侵略巴基斯坦的可耻行径，使它的社会帝国主义面目进一步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痛斥，陷于越来越孤立的境地。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国内的事就要国内人民自己解决，国际间的事就要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两个超级大国的代表坐在一起，进行幕后交易，就可以任意摆布别国命运的那种时代，已经过去了。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联合起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日益加强，一切受到两个超级大国侵略、颠覆、控制、干涉和欺负的国家和人民正在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是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在联合国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上，既突破了美国政府的阻挠，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决议，又违背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意志，以一百零四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要求印巴双方停火、撤军的决议。中小国家在联合国里能够联合起来发挥这样令人鼓舞的作用，正义的呼声能够这样占上风，美苏两霸陷于这样孤立，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联合国发生的变化，是国际形势大好的一个生动反映。

但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不甘心于它们的失败，总是要拚命挣扎、继续捣乱。一年来活生生的事实再一次证明，它们的日子越是不好过，就越要进行疯狂的侵略、干涉和颠覆，甚至不择手段地挑起新的侵略战争。因此，

各国人民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断地总结经验，加强团结，增强自己的力量，坚持斗争，争取新的胜利。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人民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取得了重大胜利。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们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革命友谊进一步发展，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组织，在反对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并肩前进。我们同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反对美帝侵略的战斗团结更加巩固，同朝鲜人民、日本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中紧密配合，同阿拉伯人民、非洲人民、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斗争中互相支持。一年来，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不断发展，同许多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更加增进，我国又同十五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特别是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得到恢复，充分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祖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所有这一切，鼓舞着我们信心百倍地为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而努力奋斗。

过去的一年，是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全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通过看书学习、反骄破满、批修整风，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推向深入，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广大干部，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逐步形成了风气，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里通外国，妄图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这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社会帝国主义，对于全世界的帝、修、反，是一次十分沉重的打击。这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发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深入进行，激发了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不断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一九七一年，我们胜利完成了发展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头一年的战斗任务。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

七〇年增长百分之十左右。农业连续十年丰收，粮食生产在受灾比较重的情况下，比大丰收的一九七〇年又有增长，达到四千九百二十亿斤。毛主席提出的扭转南粮北调的任务开始实现。工业生产持续上升，质量提高，品种增加。钢产量比一九七〇年增长百分之十八，达到两千一百万吨，标志着整个工业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基本建设进展较快，全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国家和人民的储备进一步增加。人民生活有所改善。文化教育战线的革命，也有不少新的发展和创造。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又有某些提高。人民解放军建设得更加强大，我国国防空前巩固。

毛主席指出：“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一年来的工作，充分证明了这个论断的正确性。在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继续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加强党的领导，把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深入下去，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发展，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执行党的“九大”提出的路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开展批修整风，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把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作为重要内容。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这历来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要继续深入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搞好革命大批判，清除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要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把历史的斗争和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进一步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什么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什么是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什么是摆脱或削弱党的领导。毛主席历来主张光明正大。刘少奇一类骗子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活动，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间是极端孤立的，是见不得人的，他们只能靠玩弄阴谋诡计，造谣诬蔑。我们坚持光明正大，就能识别和抵制那种反党反人民的阴风，不断增强党的团结。毛主席指出：“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我们要遵照毛主席这一教导，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必将提

高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推动各项工作前进。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要和斗、批、改任务结合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的目标，是要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抓住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才有正确的方向，才能深入下去。斗、批、改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还有许多没有做完的工作，还存在薄弱的环节和单位，还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需要解决。要分析情况，总结经验，研究政策，全面规划，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好地符合客观实际。

要继续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委会和党支部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按照党的原则做好吐故纳新的工作，并做好工、农、青、妇、知识分子等各个方面的群众工作。党组织要坚持群众路线，善于集中集体智慧，加强调查研究，抓好典型，经常注意毛主席关于“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教导。要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制度，反对资产阶级的腐蚀。共产党员要坚持原则，敢于同一切违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作斗争。毛主席说：“我们党历来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同志以教育为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们要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毛主席号召：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我们要遵照毛主席这一教导，促进各条战线革命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工业、农业、商业、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广大革命群众，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军队建设，抓紧军政训练，进一步提高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要加强民兵建设。要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要坚决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全国军民要认真学习国际形势和党的对外路线和政策，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坚决粉碎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一切侵略、颠覆的阴谋。

在新的一年里到来的时候，我们对台湾同胞表示深切的关怀。台湾省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制造所谓“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

“台湾地位未定”、“台湾独立”或类似的阴谋。美国的一切武装力量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相信，这一天终究是要到来的。我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经济还比较落后，革命和建设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的成就是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我们要继续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坚决支持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面对着国际国内新的战斗任务，我们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更加刻苦地学习，更加努力地工作，用新的胜利，争取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元旦社论）

一九七二年三月九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抓路线教育 促春耕生产》  
春耕生产活动正在我国广大农村从南到北展开。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注意季节”，“不违农时”。各级党委对于春耕生产，一定要十分重视。我们决不能满足于过去十年连续丰收的成就，要继续争取更大的胜利。要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失时机地抓好当前春耕生产，争取今年成为连续第十一个丰收年。

发动广大群众搞好春耕生产，必须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发扬党的传统的优良作风。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当前，全国各地正在进一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这是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要抓深抓细。要使广大群众和干部在革命大批判中激发起来的革命热情，成为推进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强大力量。要充分发挥这个力量，推进春耕生产。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在春耕生产中，要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纲，继续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农村各级党组织都要象大寨党支部那

样，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进一步全面发展农业生产，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推动春耕生产。社会主义现阶段党在农村的重要政策，毛主席、党中央早有明确指示，各级领导干部要继续总结经验，坚决贯彻执行。要通过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进一步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什么是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和政策，排除右的和形“左”实右的干扰，划清政策界限，提高执行政策的自觉性，纠正把路线和政策割裂开来的错误思想。要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对那种不按党的路线和政策办事的错误倾向进行必要的斗争。落实党的政策关系到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务必采取严肃负责态度，万万不可粗心大意。

当前，要抓紧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各项政策进一步落实下去。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断提高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为革命种田的社会主义觉悟，充分发挥他们的革命干劲和革命智慧。要发动群众总结当地按劳分配的好经验，改掉那些限制群众积极性的、烦琐的、不合理的东西，坚持那些为多数群众所欢迎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并不断加以改进提高。

省、市、自治区负责领导农业的同志，地、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要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到春耕生产的现场去，注意调查研究，抓先进典型，抓薄弱环节，推动全局。各级干部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要同群众一起，总结和推广农业学大寨的经验，坚持以政治统帅业务，为革命狠抓生产。“各级党政军机关学校一切领导人员都须学会领导群众生产的一全套本领。凡不注重研究生产的人，不算好的领导者。”要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凡事和群众商量。生产队的种植计划、产量指标、增产措施，都要根据国家计划和本队实际情况，经过社员群众充分讨论决定。各级干部要更加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春耕大忙期间应当特别珍惜群众的时间，少开会，开短会。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发现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地方，必须发动群众，坚决地、及时地予以正确处理。

春耕生产的高潮正在到来。一定要抓紧大好时机，以路线教育为动力，进一步推

动春耕生产，为今年的丰收打下更坚实的基础，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支援世界革命作出更大贡献。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二年三月九日，社论）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

1972. 03. 17；中发 [1972] 12 号

毛主席批示： 同意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进行了多次重要谈话。许多单位要求将毛主席的谈话整理印发。中央根据毛主席在各地谈话纪要，综合整理了一个纪要，现印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 [1972] 3号文件规定的范围，即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传达。

毛主席的谈话，以路线斗争为纲，总结了我党五十年来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问题，明确指出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反复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毛主席的谈话，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有力武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

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

毛主席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



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斗争。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 [1]。“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 [2]，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 [3]。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4]，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5]，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

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毛主席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

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6]，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毛主席说，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7]，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

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毛主席说，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 [8] 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1] 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

[2] 指林彪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3] 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4] 指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

[5] 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

[6] 指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

[7] 即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

[8] 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以粮为纲 全面发展》

毛主席提出的“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业生产方针，反映了社会主义农业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农业生产领域里的具体体现。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多年来，我国的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对支援世界革命人民，都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革命在前进，生产在发展。全国人民的需要，整个国民经济和农业生产本身的进一步高涨，都要求农业战线在继续增产粮食的同时进一步开展多种经营，进一步实行全面发展。

能不能在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多种经营，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的指导思想如何。必须把这个重大的方针，提到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必须狠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斗争，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干扰和破坏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罪行。

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就指明了，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相信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只要坚定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办事，坚定地

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地依靠广大群众，就一定能够在不断提高粮食产量的同时扩大多种经营。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过去狠抓粮食生产是正确的，今后也必须把粮食生产抓紧，决不可稍微放松。没有粮食生产的发展，就说不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也说不上多种经营的发展。对于进一步发展粮食生产，必须继续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同时，也必须注意，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决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相促进的。既要增产粮食，又要多种经营，全面发展，在劳动力、土地、资金等方面确有一定的矛盾。这些矛盾都是可以解决的。而且，也只有很好地安排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才更有利于使全劳力、半劳力、辅助劳力和有各种专长的社员各尽其能，而且在各个季节都有活可干。发展多种经营，可以为集体经济积累更多资金，加快农业机械化，这就又可以腾出更多劳力全面发展农业生产。至于土地，在多种经营的条件下，比单一经营更便于合理安排、充分利用。荒山、水面、河滩、“四旁”等等，单一生产粮食不便利用的，实行多种经营就都能排上用场。肥料不足，从发展牧业、林业、油料、养蚕等等方面，正好可以开辟更多的肥源。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地力、物力的潜力是可以一挖再挖的。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综合利用，正是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的一条广阔的道路。这样做，才符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有的同志划不清正当的多种经营和资本主义倾向的界限，不敢抓多种经营，忽视抓多种经营。对此，应当加强路线和政策教育，予以澄清。有资本主义的多种经营，有社会主义的多种经营，决不可把两者混为一谈。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决定于执行什么路线，决定于指导思想是什么。如果是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只顾赚钱，不顾国家计划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那样搞多种经营当然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那是必须批判、必须制止的。但是，决不可把党的方针、政策所提倡和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来批判。正是为了进一步壮大社会主义经济，进一步战胜资本主义势力，才更要下气力领导群众搞好多种经营。这个重要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去占领。我们不去有领导有计划地发展多种经营，那就等于在这个阵地上给资本主义让路，那才是错误的事情。在积极办好集体经济、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应该允许和指导社员

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从事适当的家庭副业。“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要教育社员先公后私，反对弃农经商。

以粮为纲，是就全局而言。就各个不同地区来说，要注意因地制宜。一般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应该以发展粮食生产为主，把粮食生产抓紧抓好，同时根据当地条件，积极发展其他经济作物和牧业、林业、渔业、副业生产。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应该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牧区、林区、渔区，应分别以经营牧业、林业、渔业为主。这些地区，当然也要在可能条件下积极地生产粮食和其他作物，也不要搞单一经营；但是，应当集中主要力量完成主要任务。对于这些地区的粮食供应或留粮标准，要保证每人平均口粮不低于附近粮食产区的一般水平。

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并不是不看实际情况，不分主次缓急，一涌而上。多种经营的项目很多，必须根据各地的条件和国家的计划，适应集体经济和社员群众的需要，统筹安排。要从实际出发，避免主观主义。

国营经济应当尽力促进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工业部门要提供多种经营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商业部门要加强多种经营的产品的收购工作，正确执行党的价格政策和奖售政策。同时，加强市场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巩固社会主义阵地。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加强党的领导，实行全面规划，落实党的政策，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我们的社会主义农业一定能在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轨道上更快更好地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二年四月十六日，社论）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坚持毛主席革命线就是胜利——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今天，我们满怀革命豪情，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

毛主席的这部光辉著作，是在三十年前两条路线的大论战中产生的。这部著作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彻底批判了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左”右倾机会主义文艺路线，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文艺理论，系统地、深刻地总结

了“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党制订了一条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这部著作是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文艺、改造世界观的战斗纲领，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在三十年来的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今天仍然是我们党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武器，是一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必读的经典文献。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讲话》发表以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在日益广大的范围内掌握了群众，革命文艺运动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在武装夺取政权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斗争的风雨中不断前进。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文化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革命样板戏空前普及，群众性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运动正在兴起，戏剧（包括地方戏曲）、电影、音乐、舞蹈、美术、文学以及其他艺术领域，正在涌现出一批好的或较好的作品。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队伍在同工农兵结合的过程中，正在逐渐成长和壮大。

“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政治路线的斗争，总是首先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反映出来。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从延安时代对以《文学与生活漫谈》、《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为代表的反党逆流的批判，全国解放后对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批判，对胡适派主观唯心论的批判，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直到对反动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推动了政治战线的革命步步深入。在这个过程中，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分子周扬等“四条汉子”之流，追随他们的总头目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先后登台表演，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疯狂反扑，他们利用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抵制和破坏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对无产阶级和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所有这些斗争，无一不是尖锐地反映着每个历史时期政治路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搏斗。三十年惊心动魄的路线斗争告诉我们：这种斗争今后还要长期地继续下去，对路线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经常地开展“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才能不断地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正遵循毛主席



的指示，“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深入开展对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和斗争。这场斗争，是党内五十年路线斗争的继续。刘少奇一类骗子及其代理人周扬一伙，都是善于伪装的反革命两面派。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三十年斗争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自觉地跟党的正确路线，就能逐渐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揭露一切假马克思主义骗子手的真面目。今天，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首先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以《讲话》为武器，进一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各种反动思想。

要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讲话》精辟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观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刘少奇一类骗子否认认识来源于实践，宣扬什么“超天才”、“先知先觉”，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主观世界。一切革命知识分子、革命文艺工作者，要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中去，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改造世界观，转移立足点，学习和总结亿万工农兵所创造的宝贵经验，努力反映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

要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刘少奇一类骗子从剥削阶级的精神武库中，拣起破烂的人性论，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毛主席在《讲话》中，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人性论的种种表现，早已作过彻底的批判。我们要按照《讲话》的要求，努力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共产党员要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对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对一切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言行，要以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大无畏精神，坚决斗争到底。要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反对剥削阶级的唯心史观。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少数“英雄”创造历史，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历史观的斗争。《讲话》深刻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的光辉思想。

刘少奇一类骗子却颠倒历史，否定工农兵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作反革命的舆论准备。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和掌握唯物史观，联系当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不断增强路线斗争观念。

无产阶级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各级党的组织，要从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重视并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认真总结经验，加速文艺战线斗、批、改的步伐。一是抓路线，抓方向，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排除形形色色来自右的和“左”的方面的干扰和破坏，经常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断肃清刘少奇一类骗子在思想文化战线的种种流毒。二是抓党的政策的落实，切实搞好文艺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特别是要切实抓好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认真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正确地发挥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逐步提高他们的路线斗争觉悟和思想、业务水平，在斗争实践中发展和壮大无产阶级文艺队伍。三是抓发展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坚决贯彻毛主席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学习革命样板戏的经验，勇于实践，敢于创社会主义之新，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积极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努力适应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适应广大工农兵日益增长的需要。

历史在前进，革命在深入，批修整风运动正在推动我国各条战线事业的发展。无数事实反复证明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会不断夺取新的胜利。让我们更高地举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三日，社论）

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坚持数年 必有好处》

“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党的历次路线斗争

经验提出来的极为重要的指示。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广大干部特别是县、团党委以上领导干部，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认真读马列的书，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初步形成了风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在前一阶段学习中，许多单位的领导同志，把看书学习同批修整风结合起来，学习中央规定的六本马列著作和五本毛主席的哲学著作，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它的理论基础——唯心论和形而上学。许多同志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和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提高，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空气更加浓厚。不少同志在实际工作中比较自觉地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推动了各条战线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使革命和建设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认真总结这些学得好的单位的经验，继续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反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罪行，对于进一步提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自觉性，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是很有必要的。我们要在前一阶段学习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使全体干部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坚持数年，必有好处”的亲切教导，鼓励学得好的学得更好，帮助学得差的好好学起来，把学习坚持下去，取得更大的成效。

革命导师列宁曾经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毛主席在我们党历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都特别强调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曾经强调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的、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正是在这一伟大的学习运动中，广大干部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深入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而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顺利执行，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现在，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比较过去要深刻得多，复杂得多，我们党担负的革命和建设任务，也比过去繁重得多。全党干部特别是担负重要领导责任的高中级干部，更需要系统地、实际地、努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批修整风运动中，毛主席指示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思想和政

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并且谆谆教导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识别和抵制刘少奇一类骗子，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才能保证我们党和国家“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我们县、团以上党委的领导干部，大多数经过比较长期的革命斗争锻炼，具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这是很可宝贵的。但是，他们自己的知识还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因而也是比较地不完全的。如果满足于已有的局部经验，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就很容易犯错误，受假马克思主义者的骗。因此，认真看书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和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把实践经验提高到理论程度，进而指导当前的工作和斗争，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任务。毛主席说过：“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如果我们县、团党委以上领导干部，都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并且长期坚持下去，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就会大大提高，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政策，就会更好地贯彻执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上，刘少奇一类骗子搞了不少阴谋诡计。他们破坏理论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否定认真读书的重要性，也否认参加革命实践进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们反对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妄图从根本上削弱我们党的理论基础，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以便欺骗广大干部和工农兵群众，推销他们的一套修正主义货色，从而达到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罪恶目的。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结论和一般原理，而且应当着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努力学会运用这种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无产阶级的立场、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是要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经过长期看书学习，经过不断批判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逐步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结论和一般原理，也要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反复学习，才能学懂弄

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不断提高的过程，是一个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需要付出艰苦劳动的艰巨任务。

有的同志刚刚开始读马列的书，就希望从中找到解决工作中一些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如果找不到，看书学习的热情就低落下来。这些同志学习理论注意应用的态度是好的，但是，他们对于理论联系实际方针的理解却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是我们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我们在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中，才能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我们才能够深刻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而坚决贯彻执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端正了，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正确的、有效的解决。要达到这个目标，需要长期坚持看书学习。一些同志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急于求成的看法，反映了刘少奇一类骗子在学习问题上散布的流毒还没有很好肃清。正是这种错误的理解，影响了他们在理论学习上的长期坚持和深入钻研。

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成效如何，要看我们能不能够和在多大程度上善于识别和抵制反马克思主义的歪风邪气。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二十二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告诉我们：这种斗争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为了更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战胜那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倾向和路线，不管是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现。革命的同志们必须努力锻炼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的能力，锻炼自己的识别能力，在批修整风的斗争实践中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武器。

要想真正学到一点东西，就得舍得下功夫，用气力。列宁说得好：“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在学习的问题上，偷不得懒，装不得假，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那种在学习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碰到一点困难就打退堂鼓的人，永远也不可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只有认真读书，努力实践，坚持不懈，积以时日，才能从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才能真正取得成效。当然，我们说学习马克思主

义要长期坚持，刻苦努力，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多么神秘，多么高不可攀。许多工人在批修整风中学习马列著作，越学越进步，就是最好的证明。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入门既不难，深造也是办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于学习罢了。”县、团党委以上领导干部，尽管理论基础和文化水平不同，但是，只要认真努力，长期坚持，就一定能够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由理论水平不高到理论水平较高，“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们应当相信这一条真理。

要把学习坚持下去，必须加强领导。县、团党委以上的负责同志，特别是第一、二把手，应当在学习上以身作则，起带头作用，模范作用。领导干部坚持学习，就能带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推动学习深入发展。这是领导好学习最有成效的方法。理论学习应该以在职学习为主，以自学为主，以学习原著为主。读马、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可以根据批修整风的需要，再增加几篇。有些领导干部阅读马列的书有困难，怎么办呢？可以请先生帮，找一些同志作辅导。但是，辅导只能帮助自己看书，不能代替自己学习。

我们反对学习中的形式主义，但是，必要的学习制度和时间保证，还是应该有的。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不断提高学习的质量，使学习真正收到实效。

当前，随着批修整风运动继续深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也在继续开展。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应该对前一阶段的学习认真加以总结，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学习作出全面计划，有计划、有步骤地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推向新的高潮。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二年七月六日，社论）

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发扬光荣传统——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四十五周年》

今天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四十五周年的光辉节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共产党缔造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了光荣的道路。

“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秋收起义建立的工农武装走上井冈山，开辟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一个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

出现在祖国的大地上，点燃起革命武装斗争的烈火。这个军队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英勇战斗，前仆后继，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军队保持和发扬战争年代的革命精神，胜利地进行了保卫祖国、抗美援朝、粉碎帝、修、反的侵略和颠覆的斗争，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军队作为一个工作队，担负支援工业、支援农业、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执行军事管制、执行军政训练的光荣任务，为人民立了新功。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人民解放军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广大指战员以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为武器，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提高了人民军队的政治觉悟。干部战士认真看书学习形成风气。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更加亲密。一个群众性的练兵热潮正在兴起。我们的部队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了新的加强。全军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朝气蓬勃，奋发前进。

四十五年的历史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忠于党，忠于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任何凶恶的敌人都不能压倒它，而只能被它所压倒。任何野心家阴谋家企图破坏它，都只能是痴心妄想。撼山易，撼解放军难。我们的军队不愧为伟大的人民军队。

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我们的军队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成长的。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毛主席写的古田会议决议，使我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真正的人民军队，成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的工具。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应该继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路线，切实搞好当前的批修整风，更加自觉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一个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是我们这个军队的显著特征。我军历来执行对敌狠、对己和这两条方针，在军民关系、军政关系、官兵关系、军事工作和政治工

作关系、干部相互关系上都遵守正确的原则，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依靠这些获得光荣的胜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发扬这个传统。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拥政爱民，拥军爱民。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要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主席说：“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经济还比较落后，要使我国进一步繁荣昌盛起来，还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我们还要继续承担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争取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全体干部和全体人民要经常想到这些。我们的军队一向是做得好的，今后还要做艰苦奋斗的模范。

在纪念我军创建四十五周年的时候，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在大好形势下，人民解放军绝不能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要按照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军队建设，搞好军政训练。全国人民和全军指战员要认清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决不允许任何人侵犯。我们一定要解放自己的神圣领土台湾省。让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社论）

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三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二十三年了。二十三年来，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革命大道上，进行了胜利的战斗。今天，我国各族人民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庆祝祖国的光辉节日，感到欢欣鼓舞。

一年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新的发展。在印度支那，在中东，在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维护



民族独立的斗争，更加深入，更加高涨。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已成为各国人民共同要求。不仅在第一中间地带，而且在第二中间地带，越来越多的国家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范围内联合起来，进行着反对一两个超级大国的斗争。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一些受苏修或美帝控制较严的国家，也力图改变受摆布的地位。埃及宣布苏联军事专家和一部分苏联官兵的被送走，西欧共同市场的扩大和十七国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在外交上的新动向，都表明国际关系正在进行着新的调整和变动。

一年来，我国继续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我们进一步发展了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我们坚决支持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我们坚持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对亚非拉国家，我们是这样做的；对第二中间地带的国家，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即使过去采取敌视我国政策的国家，当它表示愿意改变这种政策，我们也同它谈判改善国家关系的问题。我们坚持了原则性，也为实现这种原则性而采取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我国的外交政策，在世界上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广泛。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在被剥夺了二十多年之后终于得到了恢复，蒋介石集团被驱逐出联合国。一年来，又有二十个国家同我国建立和恢复了外交关系，许多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以及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在中美两国关系中断了二十多年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今年二月访问中国，中美两国领导人就中美关系和国际事务进行了认真、坦率和有益的会谈。中美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打开了。最近，日本田中总理大臣应邀访华，中日两国领导人进行了友好的会谈，达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协议。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中日两国人民这一长期愿望的实现，揭开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新篇章。这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将发生积极的影响。毛主席的外交路线的这些伟大成就，使那种梦想孤立中国的政策完全破产，也使那种仍然妄图包围中国的反革命计划正在瓦解。

今天的世界还很不安宁。在越南和整个印度支那，美帝仍在进行流血战争，至今没有全部撤出它和它的仆从国的侵略军队，并且还在加强轰炸和封锁越南的海空

力量。南亚次大陆、中东和其他地区，由于苏修和美帝的争夺，仍然保持着紧张局势。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尽管进行了谈判并达成了某些协议，但这种表面的妥协和缓和，只是为了准备进行新的争夺。苏美在莫斯科签订所谓限制战略核武器的协议墨迹未干，一个就加紧试制新式核武器，另一个也立即大量增加军费开支，它们就这样地又开始了核军备竞赛的新阶级。它们在中东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加紧明争暗斗，力图进一步控制阿拉伯国家和镇压巴勒斯坦革命运动。苏修在所谓欧洲安全问题上大做文章，恰恰表明这个地区正是它同美帝争夺的重点。

苏修叛徒集团在同美帝国主义争夺的过程中，进一步暴露了它的社会帝国主义面目。它胃口越来越大，到处伸手。它比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具有更大的危险性。正象列宁所说：“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明明是推行武力扩张政策，却高唱“和平”与“安全”；明明是在亚非拉大搞新殖民主义，却标榜“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明明是加强扩军备战，却大肆鼓吹“裁军”。最近苏修在本届联大吹嘘所谓“永远禁止使用核武器”，完全是欺人之谈，其目的无非是企图逃避承担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责任，维持其核垄断的地位。但是，假的终究是假的，可以骗人一时，不能骗人永远。苏修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占领至今受人谴责；它策动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侵略战争，再次暴露了它的扩张野心；它妄图控制阿拉伯国家的阴谋进一步败露；它在许多国家的颠覆活动接连遭到挫败。这些丑恶的事实，大大地打开了人们的眼界。苏修的侵略扩张，不仅在国外激起各国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而且也加剧了它国内各种危机的发展，使它处于日益严重的内外交困的境地。

毛主席教导我们：“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世界人民革命运动的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主要依靠他们自己在斗争中逐步地提高觉悟性和组织性，逐步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我们从来是支持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我们寄希望于人民。我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的关系，扩大同各国人民友好往来，不仅有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而且也有利于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因为

这样，我国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越来越深入人心。

在这样大好的国际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我们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同一切爱好和平、反对强权政治的国家和人民，联合起来，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特别要揭露苏修假缓和、真扩张的阴谋，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我们这样做，是符合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真正维护世界和平。

我国国内形势也很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以更大的规模展开，批修整风更加深入。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罪行和他们的反动谬论，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提高了路线斗争的觉悟。正因为这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更加巩固和发展了。

随着批修整风的深入，党的一元化领导进一步加强。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进一步的落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新的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更加强大。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都取得了新的成果，其他经济战线和文教战线也都有了新的进展。我们伟大的祖国生气勃勃，蒸蒸日上。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发展，外交战线上的新成就，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党的“九大”路线的胜利。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反复证明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真理。

十年前，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我们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斗争，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还是改变毛主席这条基本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把这些隐藏得很深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揭露出来，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清算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还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应当记住这十年来阶级斗争的丰富经验，牢牢地掌握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放在我们面前的头等大事，仍然是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认真搞好批修整风。要充分利用刘少奇一类骗子这样的反面教员，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批判修正主义。批修整风要深入下去，就要认真看书学习，善于结合实际，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我们要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使自己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有一个新的提高。要遵循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抓紧革命大批判，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线，以推动各个领域的斗、批、改继续健康地发展。

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要求我们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各条战线的同志都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努力做好各项工作。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和它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全面完成国民经济计划。要搞好教育、文艺和其他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要继续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的建设，增强军政、军民团结，保持常备不懈的思想，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兄弟，我们对台湾同胞表示深切的关怀。我们一定要解放祖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

在胜利的形势下，我们务必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把发扬无产阶级正气，纠正不正之风，作为批修整风的一项重要内容。毛主席说：“人贵有自知之明。”各级领导同志都要注意，“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群众路线。要模范地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关心群众生活，与群众同甘苦，反对特殊化。我们要实现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我们的革命前程光辉灿烂。

我国人民胜利前进的步伐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兴旺，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二年十月一日，社论）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指示

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2009年10月12日初稿

2012年4月23日修改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八册（2）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八章 批林整风

##### 第二节 开展批林整风

###### 本节资料

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

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的通知》。《通知》指出，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发出的“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指示，对于提高全军指战员的觉悟，增进军政、军民之间的团结，使人民解放军更好地肩负起保卫祖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必将发挥巨大作用。《通知》要求，全军指战员要深刻认识“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重大意义，积极开展“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活动，提高向全国人民学习的自觉性，利用一切机会，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虚心地向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地方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学习，经常征求人民群众的意见，听取批评，接受监督。要抓紧新年、春节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及冬季野营训练等机会，掀起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热潮。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把向全国人民学习的活动抓紧抓好，长期坚持下去，务必取得切实的效果。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致悼词，全文如下：

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陈毅同志。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毅同志在病假期中，因患肠癌，治疗无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二十三时五十五分不幸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陈毅同志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时期，历任师长、军长、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理军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全国解放后，曾兼任上海市市长。

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陈毅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

陈毅同志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我们沉痛地悼念陈毅同志，要学习陈毅同志的革命精神，化悲痛为力量，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为完成国际国内新的战斗任务，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而奋斗。

陈毅同志安息吧！

来源：197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新华社报道：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 毛主席向陈毅同志的家属张茜同志及其子女亲切慰问，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 参加追悼会的有：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我党和国家领导人等 周恩来同志致悼词

新华社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讯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陈毅同志，因患肠癌，治疗无效，于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七十一岁。

追悼陈毅同志的大会，今天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陈毅同志的家属张茜同志及其子女亲切慰问，勉励他们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受到特别邀请，在国家元首办公厅代理主任凯密陪同下，参加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政治局委员江青、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聂荣臻；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傅作义、帕巴拉·格列朗杰。

追悼会会场中央，悬挂着陈毅同志的遗像，安放着陈毅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会场里摆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献的花圈，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康生、朱德、何香凝等献的花圈。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也献了花圈。

会场里还摆着国务院、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以及党、政、军一些领导机关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献的花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追悼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致悼词（全文另发）。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在北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王震、王宏坤、王树声、王辉球、王新亭、邓颖超、刘伟、刘贤权、华国锋、陈士榘、李强、李震、李富春、吴德、张才千、张云逸、张达志、张池明、张鼎丞、张翼翔、苏静、肖劲光、余秋里、耿飏、曹里怀、曾山、彭绍辉、粟裕、蔡畅、滕海清、方毅、吴忠、张令彬、杨俊生、赵启民、唐亮、郭玉峰、黄文明、黄作珍、黄志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北京军区和北京卫戍区等方面的负责人陈继德、田维新、张贤约、封永顺、周希汉、吴信泉、姚国民、李家益、李真、胡奇才、宋维 s h i@①、罗华生、周世忠、栗在山、阎揆要、贺光华、宋时轮、刘忠、董超、张云龙、郭鹏、陈正湘、王诤；

((1)(2))

中共中央和政府各部门、对外友协等方面的负责人王良恩、张耀祠、杨德中、任允中、申健、冯铨、杨玉衡、刘宏贤、张香山、姬鹏飞、李耀文、乔冠华、韩念龙、马文波、王海容、陈德和、白相国、吴德峰、肖友明、彭林、史子才、谷广善、潘友宏、孙晓风、刘洪章、谢北一、刘湘屏、吴庆彤、刘建功、郑屏年、武



葆华、王俊卿、刘同新、解力夫、王国权、丁西林、李梦华、康克清、林佳楣、于立群；

人大常委会委员史良、朱良才、吴有训、季方、胡愈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张奚若、周培源、楚图南；

国防委员会委员刘斐、李明扬。

陈毅同志的生前友好也参加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中共中央机关、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共一千五百多人。

陈毅同志逝世以后，宋庆龄、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朱德、刘伯承、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郭沫若、华国锋、吴德，以及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前往医院向陈毅同志的遗体告别。向陈毅同志遗体告别的还有廖承志、华罗庚、罗叔章、荣毅仁、王冶秋、赵朴初等。

陈毅同志病重住院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前往医院看望。\*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木加式

（附图 [略]

追悼陈毅同志的大会，一月十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

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受到特别邀请，参加了追悼会。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宋庆龄、周恩来、江青、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徐向前、聂荣臻、郭沫若、阿沛·阿旺晋美、傅作义、帕巴拉·格列朗杰等。

周恩来同志在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上致悼词。（新华社记者摄）

（附图 [略]）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一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扩大《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发放范围的通知

1972.01.13； 中发 [1972] 3 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为了加深对粉碎林陈反党集团重大意义的理解，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中央决定：

一、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扩大发放范围。工、矿、企业发至班组，二十人以下的发一份，二十人至四十人的发两份，四十人以上的发三份；农村发至生产队，三十户以下的发两份，三十户至五十户的发三份，五十户以上的适当增发，居住过分分散的酌情增发，大队发二至三份；军队发至排，每排发两份；大、专院校和中学，每个教学班发两份，小学五、六年级，每个教学班发两份，教职员工平均每十五人左右发一份；商业部门发至班组和营业点，二十人以下的发一份，二十人以上的发两份；机关发至科、室，大体按每十人左右一份；街道发至居民委员会，大体上按有阅读能力的每二十人左右发一份。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外，均可阅读。

二、各省、市、自治区和地、县都应认真办好学习班，培养训练宣讲队伍。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好，亲自宣讲，和群众一起阅读学习，开讲用会、座谈会，并根据文件的精神解答群众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加深对文件的理解。好的发言稿，请选送中央。

三、文件发至基层后，要指定双人妥善保管，不许传抄，不许个人携带外出。如有遗失要追究责任，酌予处分。

四、中央将陆续发表这类材料，均照此办理。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的通知

1972. 01. 13；中发 [1972] 5 号

在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上的讲话（节录）

林彪

1970. 08. 23

昨天下午, 主席召集了常委会, 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我完全拥护主席的指示。这几个月来, 主席对于这个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这个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 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必要, 很合时宜。在这次国内外大好的形势下开这个人代会和提出修改宪法, 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对反帝反修斗争,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都会有深远的影响。

这次全会的三个题目, 即宪法问题, 计划问题, 战备问题, 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间的三件大事。我同意恩来同志刚才所讲的关于这次会议的议程的安排。

这次宪法修改草案, 表现出这样的特点: 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 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 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一点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用宪法的形式把这些固定下来非常好, 非常好! 可以说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中间在我看来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条反映出我国革命经验中间最根本的经验。

毛主席, 大家所知道的, 是我们党、军队、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毛主席的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因素总是多种的, 不会是平均的, 必然有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客观的条件当然很重要, 但是很多国家也有很好的革命形势, 但无很好的领导, 就不能成功。我们是既有这种客观条件, 又有这种正确的领导。这种正确领导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使得我们成为胜利的国家, 成为胜利以后继续前进的国家, 继续革命的国家, 而不是中途停顿的国家。没有被世界上修正主义的逆流所同流合污, 成为中流砥柱, 这是很不容易的。挡住这一个逆流, 很不容易。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地位是斗争中间形成的, 是几十年的斗争中间形成的, 是在党内两条路线的较量中间比较出来的。所以, 这个领导地位, 在国内、国外除少数极端反动分子以外也都承认。中国革命半个世纪的历史都证明, 只有毛主席代表了最正确的方向, 代表历史发展的要求, 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什么陈独秀哪, 什么李立三哪, 瞿秋白哪, 王明哪, 刘少奇哪, 中间还有个张国焘, 还有什么张闻天这些, 照着他们的领导走下去就只会把革命引向失败, 就会要造成革命的重大损失。我们是很幸运的, 在各个严重的历史关头, 靠

着毛主席扭转了这种形势，使它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这是大量的、长时期的、重大的、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的。差不多可以这样说：我们的工作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在过去，有的时候是巩固的，但有的时候是不巩固的，有些时候很不巩固，而有些时候是被排斥的。凡是碰到毛主席的思想不能贯彻的时候，就使革命受到挫折、失败；得到贯彻的时候，就蓬勃地发展。可以说，这已是我们看惯了的事情，例子是不胜列举的。而这些经验，我们同志们必须记住，必须把关于这方面的迷迷糊糊的思想变成自觉的思想。特别是年老同志，必须把这些思想向下传播，传下去，讲清楚。使年青的同志们知道来之不易。就是：胜利绝非偶然。不是那么简单的、自流的，就可以成功的；这个问题解决不好，革命也可以失败的。很多国家，象欧洲那些国家，都进行过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但没有成功，损失很大。力量很大的，都失败了嘛，有很好的客观形势，也都失败了。很好的形势没有搞起来，或者搞起来失败了。

我们革命胜利以后的二十年，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时期以来，继续和更加证明毛主席思想的伟大作用。我的看法是这样子，老实讲，不管什么地方，不管什么部门，什么单位，毛主席的威信高的地方，对毛主席著作肯学、肯用的地方，人的精神面貌就改变。跟之而来的，就是物质的这种力量发生巨大的变化。不是小小的变化，而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原来认为做不到的事情，能做到了。这就是毛主席的革命的精神和实际的精神，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毛主席的具体政策，具体指示，具体做法，一旦深入群众的时候，一旦群众领会的时候，那就是以排山倒海的力量，发生变化。主观世界的变化引起客观世界的变化。各个地方，各个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认识是可能不太一样的，这也是很自然的，一切事物总是不平衡的，总是有差别的。敌人当然是反对了，不消说的了，就是党内也是不平还衡的。我虽然不能经常到基层去跑，但是我也有我的办法，就是派些人下去问，下去调查研究。所碰见都是这么一种情况，凡是工作搞得好的，不是别的原因，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群众，运用毛主席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斗私批修，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同时开展阶级斗争，狠批资产阶级思想，走资派的思想，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思想，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和他在各个领域里面的思

想, 以及各种具体政策, 这一切对动员群众, 都起极其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老三篇”还是很起作用的。

毛主席领导我们革命几十年了, 他对各种问题都接触了, 都做了深刻的调查研究, 都有重要指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 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几十年前写的东西, 我们都觉得是比我们现在的水平高。世界上是有创造的, 不但是社会科学的发展方面, 是有创造的, 自然科学方面, 你看那个时期没有创造? 毛主席的学说就是科学, 解放人类的科学, 解放无产阶级的科学。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是有创造的。他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当然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新的发展。怎么能够说没有发展?

没有发展的观点, 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说事物是不发展的, 思想也是不发展的, 只要旧的就行了, 这是过去古老的思想, 是不正确的思想。在历史上有很多人常常有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看法, 想把思想的发展停下来, 认为是已经完成。在自然研究方面, 社会历史研究方面, 都有这种人不承认发展。可是事物总是在发展。这个地球原来就是一团火, 然后慢慢地又有空气又有水, 然后慢慢地有低级的生物, 然后慢慢地有动物和高级动物, 进入人类社会有低级的社会, 高级的社会。现在我们是处在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的时代, 帝国主义全面崩溃的时代。同一百年前的马克思时代相比, 我们这个时代是前进了很多。比列宁所处的时代也前进很多了。我们所遇到的重大事变跟当时他们所遇到的重大事变相比也多得多, 大得多, 快得多。如何能说是没有发展呢? 毛主席不是都是回答了这些问题吗? 不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回答了这些问题吗? 毛主席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现在的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相合。毛主席的天才, 他的学问, 他的实际经验, 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毛主席的著作中间所发挥的, 所具体化的, 所增加的新的东西, 你们翻开马克思、列宁的著作, 他们没有, 而且是不可能有的。这也是很自然的, 因为他们那时候没有那个客观条件, 不能对于现在的新问题做出预先的答复和解决。所以, 不能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

形而上学的观点, 认为事物是凝固的, 僵死的, 而不是活生生的, 可变化的, 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 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的。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需要慎重。因为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共产党当权的国家。上层一些同志的一股风吹下

去，就可能把下面的事情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敢于这样勇敢地向敌人进攻，发动革命，狠狠地打击那些叛徒、反革命分子、走资派和各种阶级敌人，很广泛地动员工农兵群众，同毛主席的高瞻远瞩和革命魄力，他的马列主义的最高水平，历史的广阔眼界，是分不开的。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这个党、国家、军队，今天能够在国内取得这种地位，在国际上取得这样崇高的威望，同毛主席领导几十年来的斗争，是分不开的。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第二点，就是宪法里面突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和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也是体现了毛主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的通知及附件

1972.01.13；中发 [1972] 4 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 [1972] 3 号文件的精神，立即组织传达和讨论。传达讨论的重点是批判林彪一伙炮制的《“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传达的步骤应分两步，第一步在干部中传达，第二步向群众传达。各级党委首先是党的负责干部，要认真阅读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逐条逐段地批判林彪的这个反革命纲领。只有这样，才能做好组织传达讨论的工作，领导广大群众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大批判。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主要内容是讲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中央专案组调查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出笼经过和林彪一伙根据这个纲领进行反革命政变的准备情况。现报告如下：

（一）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全党开展批陈整风，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同时，毛主席、党中央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召开了华北会议，一九七一年一月底改组了北京军区。毛主席、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挖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墙角，使他们在首都和华北地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

林彪一伙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死不悔改。他们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

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林立果在苏州继续策划反革命政变。二月下旬，林彪、叶群派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接着又从上海去杭州，找他们的同伙研究和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带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即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下同）原副处长〕从杭州回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已在上海的李伟信〔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林立果要立即把周宇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从北京叫来商量，并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荫蔽、安全。”

三月二十日，周宇驰到上海。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开会，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林立果按“武装起义”一词的谐音，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代号定名为《“571 工程”纪要》。

三月底，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原副司令员〕，开了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所谓“三国”，是指王，陈，周；“四方”，指江，王，陈、周。〕，开了一整夜。据陈励耘交代，这次会议，讨论了政变问题。

根据缴获的于新野的工作日记记载，一九七一年四月，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彪一伙策动他们的死党周宇驰、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于新野等，在四月二十三日晚开了一个黑会，讨论了中央会议的形势，讨论了林彪黑司令部“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的问题。据李伟信交代：于新野对他说，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时候，林彪、叶群要搞“571”，黄永胜他们也同意。

林彪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已从林立果在北京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查获。经参与政变的李伟信、刘世英〔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程洪珍〔空军党委办公室一处原秘书〕等人证实，并经与于新野的其他记录本的笔迹核对，证明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是林彪死党于新野手记的。原文见影印件。

## （二）

根据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等各地方、各部队、各单位的揭发及案犯的交代，林彪一伙按照《“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从多方面进行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

### 一、建立反革命政变的组织和据点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就指挥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采取种种恶劣手段，拉山头，搞宗派，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对抗。林彪、叶群继续大量搜集古今中外政变的材料，挖空心思地研究反革命政变的伎俩。在林彪一伙的操纵下，建立了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别动队“联合舰队”，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按照《“571工程”纪要》的计划，一九七一年三月底在上海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对执行反革命政变计划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据缴获的程洪珍的工作日记记载：这次会议，“组织上明确了三点，每点的头：上海——王（维



国），杭州——陈（励耘），南京——周（建平），互相配合。江（腾蛟）进行三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

林彪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和北戴河等地，设立了十多处反革命秘密据点。从这些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量的通信、电台、窃听、录相、录音、照相、警报器等进行特务活动的器材装备，大量的枪支弹药，窃取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文件。他们在这些秘密据点里，召开黑会，秘密串连，收集情报，训练骨干，策划各种阴谋活动。

## 二、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林彪一伙根据《“571 工程”纪要》拟定的“掌握舆论工具，开展政治攻势”的反革命计划，四出活动，为林彪发动政变，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林彪一伙到处进行反革命宣传，挑动干部，分裂军队，欺骗群众。他们说：“现在形势很紧张”，“路线斗争尖锐复杂”，“现在的斗争是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是有人要夺林副主席的权”，“林彪不当国防部长，就完全架空了”。他们说：“要特别注意九、十两个月。九月开三中全会，十月开四届人大，这是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保卫接班人的问题，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反革命谬论，是林彪提出的“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的继续和发展，更加露骨地暴露了林彪篡党夺权的野心。

他们狂热地吹捧林彪，到处散布黄永胜、李作鹏、刘锦平〔民航总局原政委〕等人炮制的恩格斯、斯大林、林彪“三大助手”中，“林彪是最好的助手”、“最光辉的助手”的谬论。黄、吴、李、邱等人在北京、河北、山西、湖北等地建造林彪纪念馆，为林彪树碑立传。周赤萍〔福州军区原政委〕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吹捧林彪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在政变前的几个月内再版三百万册，向军内外广为散发。他们叫嚣《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没有突出林彪的“功绩”，他们炮制了歪曲党的历史的党史材料和所谓“两条路线教育材料”，大肆吹捧林彪。林彪一九六九年写了一首反动诗词《重上井冈山》，词中说，“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要翻历史的案。叶群、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把林彪的这首反动诗词谱成歌曲，一九七一年五月再次秘密录音。同时，林彪一伙利用一九七一年七月召开的空军某部现场会议，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

反革命妖风。林彪一伙胡吹林立果是“群众的最好领袖”，是“第三代的接班人”，林立果那个所谓“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继续反对“九大”路线，反对毛主席圈去三个副词的指示，攻击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抗拒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批判。林彪一伙坚持“天才”的反党纲领，顽固地认为，人的才能是先天就有的，否定人们的社会实践。林彪一伙到处大讲“天才”，胡说什么“天才论不等于先验论”，不承认天才，“是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与唯物主义的可知论的混合”，“极左派把天才加以唯心主义的虚无主义的解释，然后大加批判，这是诡辩论”。他们鼓吹“应是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反动观点，继续吹捧林彪、林立果是天才，叫嚣“我们要承认天才，学习天才，宣传天才，保护天才”，为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上台作舆论准备。

### 三、妄图拉拢某些部门、某些部队的一些人，为林贼篡党夺权服务

林彪、叶群、黄、吴、李、邱一伙，采用封官许愿，请客送礼，接见照像，参观游览等种种手段，搞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妄图分裂党、分裂军队，欺骗和拉拢某些部门、某些部队的一些人。从一九七一年三月到九月初，林彪一伙派出了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江腾蛟、刘锦平、王维国、陈励耘、王飞〔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胡萍〔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鲁珉〔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原部长〕、李伟信等，先后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成都等地，进行反革命游说和反革命阴谋活动。

### 四、秘密建立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专案”

在林彪的指使下，林彪一伙秘密地组织亲信，收集和复制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甚至私设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密的“专案组”。这些黑“专案组”，由黄、吴、叶、李、邱直接控制，亲自出面布置任务，批阅和修改黑“材料”。他们采取捏造事实、制造谣言、肆意中伤等反革命手段，阴谋陷害中央政治局同志，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在林彪的支持下，黄、吴、叶、李、邱对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私立专案，私设监狱，违法乱纪，草菅人命，实行法西斯专政。

### 五、秘密组织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

林彪一伙根据《“571 工程”纪要》拟定的反革命计划，在上海由王维国组织了名为教导队、实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这个教导队规定在政治上，要培养对林彪、林立果的“感情”，欺骗和蒙蔽战士要“自觉”做到在林立果的指挥下，“誓死捍卫”林彪和林立果，“狂风恶浪不动摇，海枯石烂不变心”。在军事上，进行“步兵动作、打靶、刺杀、捕俘、格斗”等训练，并配备了最好的武器。

林彪一伙根据《“571 工程”纪要》提出的“领”和“自造”武器的两项办法，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形式，搞到了一批武器装备，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林彪一伙丧心病狂地准备使用火焰喷射器、炸药、爆破器材、毒气航弹等，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

## 六、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

林彪一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秘密地组织了所谓“调查小组”、“技术小组”、“战斗小分队”等反革命特务组织。林立果通过米家农[广州民航局原政委]组织的“战斗小分队”，就是这种性质的组织之一。这个组织成立后，曾强迫队员集体向林彪、林立果多次宣誓效忠。林彪一伙规定的誓词说：“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听从副部长的调动，一切听从副部长的指挥，我们要做副部长的宣传员、保卫员、通讯员、战斗员”，“我们要成为宣传副部长的先锋，捍卫副部长的尖刀，紧跟副部长的闯将”。这个“战斗小分队”有自己的反动“队歌”，有多种联络密语和暗号。还规定了法西斯纪律：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单独活动，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谈话，谈话者必须三人以上，不准随便打电话，通信要经过审查，不准泄露“林副部长”的秘密活动，等等，违者要受到批判或处分。这种“战斗小分队”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青年，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

## 七、秘密组织情报网，进行特务情报活动

林彪一伙根据《“571 工程”纪要》拟定的“情报保障，掌握三个环节：搜集、分析、上报”的反革命计划，在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组织了情报网。他们使用打进去拉出来、安钉子、搞窃听、暗中监视等特务手段，搜集情报，掌握动态，上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林彪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想方设法探听毛主席的行动路线。

林彪一伙千方百计窃取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一九七一年九月上旬，刘丰〔武汉军区原政委〕、王璞〔广州军区空军原司令员〕、顾同舟〔广州军区空军原参谋长〕、陈励耘、王维国等人，把毛主席同一些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报告了林彪，为林贼发动反革命政变选择时机，提供了线索。他们还在中央某些要害部门安插亲信，为他们“站岗放哨”，探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动向。

他们还大量地搜集许多地方和军区负责人的动态情报，从北京、广州等地的秘密据点里查获了大批手抄的这种情报。

#### 八、为反革命政变建立通信网

林彪一伙按照《“571 工程”纪要》拟定的准备“通讯器材，包括 01 工程”的反革命计划，在上海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研制电信通信装备。林彪一伙大量盗用通信装备器材，私调几十对专线，以北京为基点，组织秘密通信网。他们还试制了代号为“01 工程”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林立果要求这种收发报机，通信速度快，保密性能好，体积小，便于伪装，要求能在市内进行无线电通信联络，在发动反革命政变时使用。

#### 九、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坦克、水陆两用汽车训练

林彪为了进行反革命政变，指使其死党林立果、周宇驰，秘密进行飞行训练和驾驶坦克、水陆两用汽车的训练。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先后十次去某坦克部队秘密学习驾驶坦克。从一九七一年五月份起，周宇驰开始秘密学习驾驶直升飞机。七月，周宇驰以练习直升飞机的飞行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等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八月至九月初，周宇驰从北京多次飞往北戴河，给林彪、叶群递送情报，密谋发动政变。在北戴河据点，秘密建立了一个直升飞机机场。他们还私调和仿造水陆两用汽车，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 十、盗窃航行资料，为叛国投敌作准备

林彪、叶群指使周宇驰，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我国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作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频率和时间表，港澳航线图以及乌兰巴托、伊尔库茨克航线图、机场位置、呼号、频率表，华东、中南几个省一、二、三级机场资料等。林立果、刘沛丰等还窜到广东深圳、沙头角，拍摄了大量地形照片。他

他们还乘坐飞机，越过规定的航线，察看了九龙的地形。林立果说：“万一情况紧急了，可以让首长（指林彪）到香港指挥、遥控”。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一伙按照蓄谋已久的《“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破釜沉舟”，发动政变。林彪如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是注定要灭亡的。他们的反革命“联合舰队”迅速地沉没在中国人民的汪洋大海里了，而毛主席率领的伟大中国人民的革命舰队，正在乘风破浪地胜利前进。他们鼓吹的“江田岛精神”，不但仓惶逃命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不实行，一小撮死党中的大多数人也是不实行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下，受林彪一伙欺骗和蒙蔽的人们，绝大多数都在觉醒起来，反戈一击，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参与反革命政变的分子，大多数正在向党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取得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 （三）

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将《“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全文印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好处极大。林彪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同它的作者们一道，已经被人民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它如同一切反革命文件一样，并不是成功的纪录，而只是失败的纪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林彪及其一伙怎样耍两面派呢？他们怎样以假象欺骗我们，而在暗地里却干着我们意料不到的事情呢？这一切，广大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是不知道的。这个反革命纲领，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彻底地揭露了林彪及其一伙的伪装，使我们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林彪这个口口声声喊着“高举”、“紧跟”、“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家伙，原来是一个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实际上极端仇视毛主席、极端仇视共产党、极端仇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极端仇视中国人民、极端仇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叛徒、卖国贼！

《“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纲领，是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多年来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大杂烩。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肆

意污蔑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一笔抹煞全国人民长时期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把国内外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它捏造事实，制造谣言，挑拨离间，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为了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总是用“独裁者”、“暴君”这种胡言乱语，诽谤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第一国际时代的阴谋家巴枯宁，曾经咒骂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独裁者”[恩格斯致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八七页。]。第二国际时代的叛徒考茨基，也曾经咒骂列宁是“独裁者”[考茨基，《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第三十四页]。第三国际时代的叛徒托洛茨基，曾经咒骂斯大林是“专制君王”[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第五四〇页]。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又疯狂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赫鲁晓夫：在苏修二十大的秘密报告]、“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赫鲁晓夫：一九六二年在苏联政府“五一”招待会上的讲话]。林彪和林彪一伙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攻击，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的阴谋家、叛徒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攻击，一模一样。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由于他们共同的反动阶级本性，由于他们共同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思想体系所决定的。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这种攻击和谩骂，毛主席早就痛斥过。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主席发表了《破除迷信》的重要讲话。当毛主席讲到“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时，林彪插话指责“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当场驳斥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得比他多。我们在镇反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林彪的这个反革命纲领，这样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恶毒攻击我们的党，恶毒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恶毒攻击我国工人、农

民、革命干部、红卫兵、知识青年和其他革命人民，它的实质，是反对党的“九大”路线，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如果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中国就会象毛主席曾经指出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但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是绝不能得逞的。他们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他们是极端狂妄，又极端虚弱的。他们所谓的“基本力量”和“可借力量”，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林彪一伙图谋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只能是痴心妄想。

毛主席指出：“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这将是一切反动政策的发展规律。”林彪一伙正是按照这条规律办事的。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林彪一伙要搞修正主义；我们要团结，林彪一伙要分裂；我们要光明正大，林彪一伙要搞阴谋诡计。总之，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林彪一伙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倒行逆施，根本违背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违抗我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妄图把已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扭转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前进的巨轮。其结果，就只能叛党叛国，身败名裂，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一九六六年七月，毛主席曾经指出过：“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林彪及其一伙是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的代言人。他们在《“571 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反革命策略，必将激起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也必将引起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共鸣。这是可以预料到的。我们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国广大共产党员

和革命人民；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能够认真地研究这个反革命文件。通过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这个反革命纲领的逐条逐段的批判，通过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揭发和批判，并且同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结合起来，必将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大大激发我国人民战斗的意志，坚决地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一切阴谋诡计，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地巩固起来。

附件一：反革命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影印件）

附件二：反革命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原文印件）

附件三：李伟信的笔供

附件二：

“571 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三月二十二——二十四）

[\*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用铅笔编了页码。原本页码编到第二十四页，但缺第八页。从原本记载的情况看，第七页已记完一个问题，第九页是另起一个问题，文意是连贯的。文中划【】者，是原本中删去的句、段。明显的错别字，改在（）内。]

（一）可能性

（二）必要性

（三）基本条件

（四）时机

（五）力量

（六）口号和纲领

（七）实施要点

（八）政策和策略

（九）保密和纪律



可能性

# 9•2 后 [据李伟信交代，是指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

军队受压

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

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

众叛亲离

(1) 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 [酝] 酿，

(2) 夺权正在进行。

(3) 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

(4) 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

(5) 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

(6) 他们“故计 [伎] 重演”。

(7) 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

(8) 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

(9) 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

我方力量

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蓬勃。

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

在中国未来这场政治革命中，我们“舰队” [舰队]、“联合舰队”是林彪一伙组织的

反革命别动队的代号] 采取什么态度？

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分得多、成功的把握性大得多。

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

地理回旋余地大

空军机动能力强。

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必要性、必然性

B——52 [据参与反革命政变的案犯交代，是林彪一伙反革命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代称。] 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

对我们不放心。

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

在政治上后发制人，

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

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

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

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

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

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

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

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

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 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

国内政治矛盾激化

危机四伏

——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

——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

——军队受压【军心不】【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

——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

——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

——农民〔生活〕缺吃少穿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国外矛盾激化

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

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威〕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

从自然条件上讲

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 困难

# 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

# 群众对 B——52 的个人迷信很深

# 由于 B——52 分而治之，军 [队] 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

# B—52 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 [诡] 窄 [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

#### 时 机

##### 敌我双方骑虎难下

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

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

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

#B—52 在我手中，敌主力舰 [指我党中央负责同志] 均在我手心之中。

属于自投罗网式

#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

#先斩 [局部] 爪牙， [先和 B—52] 既成事实， [逼] 迫 B—52 就范，

#### 逼宫形式

# 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 [一种武器的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

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

# 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

# 王、陈、江 [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下同。] 掌握的四、五军 [骨干力量]

# 九师，十八师

# 二十一坦克团

# 民航

# 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

国内：

# 二十军

# 三十八军

# [黄] 军委办事组

# 国防科委

# 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福州、新江、西安

# 【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 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

国外：

苏联（秘密谈判）

【美国（中美谈判）】

借苏力量柑（箝）制国内外【其它】各种力量。

暂时核保护伞 [林彪一伙要把我国置于苏修核武器的“保护伞”之下，也就是要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

全党团结起来！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

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

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对外：

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全军指战员团结起，全党团结起来】**

用民富国强代替他“国富”民穷

使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得到真正解放

用真正的马列主义作为我们指导思想，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代替 B52 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主义，即】**社会封建主义。

全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各行各业要坚守岗位，努力生产，保护国家财富和档案，遵守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之间，不准串联。

全国武装力量要服从统率部的集中统一指挥，**【坚决】**严厉镇压反革命叛乱和一切反革命破坏活动！

## 实施要点

### 三个阶段

#### 第一、准备阶段

(1) 计划

(2) 力量

#### # 指挥班子

江、王、陈

#### # 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 [王维国安插的上海市警卫处处长]

秘密的

上海小组 [林彪一伙通过王维国建立的反革命特务组织] 负责

新华一村

教导队 [林彪一伙通过王维国组织的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其中绝大多数是

受欺骗和蒙蔽的战士。新华一邮是教导队的驻地。]

#### #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

#### # 南空直属师工作

（十师）

周建平负责

争取二十军

（江、王、陈）

——【扩大舰队】

——【加速根据地建设】

【京 沪 杭 蜀 穗】

(3) 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

通讯器材【（包括 01 工程）〔指林立果为搞反革命政变专门设计制造的一种收发报机车辆〕

掌握他们仓库地点、主要军械库

（4）情报保障

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

【奇袭式】

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

一个先斩后联。

一个上下同时进行。

一定要把张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这是林彪一伙对张春桥同志的造谣污蔑和陷害〕。

总的两条：

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夺取全部政权】

（1）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



# 尽力坚守上海

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

把上海与外界联系卡断。

# 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

# 固守浙江、江西

# 掌握空降、空运

(2) 政治上【采取】进攻

# 上面摊牌

# 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

(3) 组织上扩大

# 迅速扩军

# 四方串联

政策和策略

打着 B — 52 旗号打击 B — 52 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

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解放大多数

集中打击 B — 52 及其一小撮独裁者

【打着 B — 52 旗号来打击 B — 52 力量】

【我们的政策：】

解放一大片（大多数）

保护（团结）一大片

【打击一小撮独裁者及其身边的】

他们所谓打击一小撮 [保护] 不过是每次集中火力打击一【派】批，各个击破。

【他们一批】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利用那个打击这个。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他们这样做，不】【他用封建帝王的统治权术】不仅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而且挑动军队斗军队、党员斗党员，是中国武斗的最大倡导者

他们制造矛盾，制造分裂，以达到他们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巩固】维持他们的统治地位的目的。

他知道同时向所有人进攻，那就等于自取灭亡，所以他【今天拉】每个时期都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

今天拉那个打这个，明天拉这个打那个；

今天甜言蜜语那些拉的人，明天就加以莫须有的罪名置于死地；今天是【他的】座上宾，明天就成了【他】阶下囚；

从几十年的历史看，[究竟]有哪一个人开始被他捧起来的人，[不被]到后来不曾被判处政治上死刑？！

有哪一股政治力量能与他共事始终。他过去的秘书，自杀的自杀、关压[押)的关压(押)，他为数不多的亲密战友和身边亲信也被他送进大牢，甚至连他的亲身儿子也被他逼疯。

他是一个怀疑狂、虐(虐)待狂，他整人哲学是一不做、二不休。他每整一个人都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而方休，一旦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且把全部坏事嫁祸于别人。

戳穿了说，在他手下一个个象走马灯式垮台的人物，其实都是他的替罪羊！

过去，对 B 一 52 宣传，有的是出于历史需要；有的出于顾全民族统一、团结大局；有的出于抵御外【来侵】敌；有的出于他的法西斯的压力之下；【对广大群众来说，主要是】有的是不了解他的内情。

对于这些同志，我们都给予[予]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予以谅解和保护。

对过去 B 一 52 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予[予]政治上的解放。

保 密、纪 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江田岛是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这个学校以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训练学生。所谓“江田岛”精神，就是法西斯武士道精神。]

【不成功便成仁】蒋介石对他的部属进行法西斯教育的反革命训词。]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附件三：

李伟信笔供

（注：李伟信，林彪死党，直接参与研究制定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的成员之一。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同周宇驰、于新野一道乘直升飞机外逃，叛国投敌。被迫降落时，驾驶员中队长陈修文烈士与叛徒周宇驰夺枪搏斗，被杀害。迫降后，周、于自杀，李伟信被我俘获）

一九七一年二月份，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跟野心家林彪、反革命分子叶群一起到苏州，以后，林立果又到杭州。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和于新野从杭州到上海。当天晚上，林立果在他卧室里对于新野和我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他要立即把周宇驰从北京叫来商量，同时叫于新野暂不回北京，主要处理这件事。林立果接着说：“刚才已经把我们在杭州研究的情况，给‘子爵号’

（是英国飞机名称，反革命分子林立果等人称呼反革命分子叶群的代号）说了一下，她说在上海要注意荫蔽、安全”。

反革命分子周宇驰三月二十日到上海。当天晚上，林立果、周宇驰两人密谈，后把于新野叫去。第二天，开始他们三人商量，后来叫我也去了。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指野心家林彪）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林彪）谈过，‘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

这次主要谈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研究了形势。

主要谈了三方面：

(1) 在全国范围内，“首长”（指野心家林彪）的权力势力，目前是占绝对优势，是一边倒的，是最好的时机，但是可能逐渐削弱。(2) 张春桥（他们指所谓文人力量）正在发展。因为九大以后，全国局势基本稳定，在和平时期，文人方面的工作和力量，势必要发展。(3) 从事物发展规律来说，好到一定程度，就要向相反方向转化，交叉发展规律，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还恶毒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主席一贯是这样，一会儿用这边力量，一会儿用那边力量，用这样的办法玩弄平衡。目前的发展趋势是用张春桥”。

(二) 研究了野心家林彪的接班问题，说有三种情况：

(1) “首长”（指野心家林彪）和平过渡的接班。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说，五、六年就差不多了，甚至可能更短。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说，五、六年还接不了班，即使五、六年，其中变化就很大，很难说“首长”（林彪）的地位还一定能保得住。当然和平过渡的办法最好。

(2) “首长”（指野心家林彪）被人抢班（被赶下台）。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认为一下不可能，最起码三年以后。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认为，很难说，主席威信高，他要叫谁倒还不是一句话。反革命分子于新野说：那“首长”（林彪）是主席自己树起来的。反革命分子林立果恶毒的说：刘少奇不也是他立的。反革命分子林立果觉得野心家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因此，他积极疯狂的策划反革命政变。接着谈了上海文汇报三月十六日发表的文章，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

(3) “首长”（指野心家林彪）提前抢班，可有两个办法：1、把张春桥等这一伙搞掉，保持“首长”（指野心家林彪）地位不变，再和平过渡。（认为张春桥同志要代替林彪的可能最大）。2、直接陷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是他们又考虑主席影响威信这样大，以后政治上不好收拾，尽可能不这样干。反革命分子周宇驰还非常险恶地说，当然一定要这样做也可以想办法，如：把主席软禁起来谈判；也可以把主席害了，再嫁祸于人，把汪东兴、张春桥叫去，把他们搞掉，就说他们与王、关、戚有关系，谋害主席，或者找几个犯人替死。到那个时候，反正“首

长”（林彪）掌权，事后处理，“首长”（林彪）是可以出来说话的。但是这样干，“首长”（林彪）在政治上要付出很大代价。

（三）研究了办法：

争取和平过渡，但是作好武装起义准备。目前先做两件事，（1）写个计划：（2）让空四军组建一个教导队。

计划：一开始研究代号，想了好久，最后林立果自己定，就叫“571”工程计划，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计划目的和内容，林立果说，让上海小组带着教导队先把张、姚干掉，可由王维国请张、姚来，或叫警卫处处长李松亭带领去张春桥家（那时林立果问我张家是否是你们警卫处管，我说不知道。林立果叫我打听一下，我记得好象问过警卫处处长李松亭，李说张家是我们管，我们派人警卫和送日常用品，我将情况告诉了林立果。我为他们反革命计划进行了反革命活动）。林立果又说，干掉张、姚后，让王维国、陈励耘，必要时抽南京空军一部分力量，控制上海局势，然后串连全国力量，发表支持声明，逼中央表态支持。假如许世友出兵干涉，由王维国他们保卫上海，形成对峙的局面，再和平谈判。最坏的打算，是上山打游击，先往浙江方向。林立果还说，这些问题，这次去杭州与陈励耘商量了一下。我看这个计划，就按在杭州商量的框框，由于新野来写。计划分几个部分我记不清，好象有实施准备、方案，以后打算等。

教导队：以培养基层干部为名，建立教导队。要精干、保密。一百人左右，住在上海新华一村。教导队的干部很重要，要选好。光靠教导队的干部还不行，上海小组要去抓。小组里以裘著显、蒋国璋为主，小组每一至二人还要抓空四军所属的一个部队，每个人在他抓的那个部队，都要挂个职务。另外要给教导队多配些汽车和枪，增加机动能力。可以叫王维国自己造枪。军事上要多学几手，政治上培养对“首长”（林彪）“副部长”（林立果）的感情。

林立果还说，“571计划和教导队的事，目前只限“舰队”、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知道，有些情况可以告诉上海小组。

以上是林立果三月份在上海的反革命活动。现在另外交待和揭发几个问题。

一、“571 计划写成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曾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还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

二、于新野一九七一年七、八月在广州时对我说：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立果当时比较紧张，对会议估计三种可能：（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林彪）。后来估计（1）、（2）可能大。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邱、李、叶都检讨了，而且是主席批准要他们检讨，“主任”（叶群）非常紧张，当时要搞“571”，并和黄永胜也商量了，黄永胜他们也同意。

三、刘沛丰一九七一年八月在北戴河，有次对我说，前几天，天天四、五点钟睡觉，吃不消。我问干什么，刘说：叶群天天找林立果，研究“571”，把舰队一些人员的代号也全部要去了。

李 伟 信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三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二年二月六日，王必成在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干部学习班上的讲话同志们：

我们省委和军区党委举办的干部学习班，从一月二十八日开始，学习了十天，今天就要结束了。参加学习的，军队系统有八百四十一人，地方系统有一千零一十人，共计一千八百五十一人。这次学习班，认真传达讨论了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四号文件，对林彪一伙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开展了大批判。学习开始时，周兴同志代表省委和军区党委宣读了中央四号文件，批判了林彪的反革命纲领，给我们这次学习带了头引了路，学习期间，大家反复认真地讨论了中央四号文件，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林彪的反革命纲领进行了逐条逐段的批判和大会声讨。参加学习的同志，态度严肃，精力集中，认真钻研文件，积极投入大批判的战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通过学习、批判，使到会同志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并研究了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具体部署，摸索了开展大批判的一些经验，为在全区部

队和全省传达中央四号文件，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培训了骨干，打下了良好基础。下面，我讲三个问题：

（一）对这次学习班的基本估价

大家反映，这次学习班办的好，时间不长，收获很大，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1. 进一步激发了对林彪一伙的阶级仇恨，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通过学习和批判，大家更加看清了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大家说：“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是一个杀气腾腾、血淋淋的法西斯纲领，是一本地富反坏在的大变天账，是他们里通外国、卖国求荣的铁证。”林彪一伙恶毒地攻击，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使用灭绝人性的法西斯特务手段，图谋暗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真是罪恶滔天，死有余辜。大家通过对我党五十年来革命斗争历史的回顾，通过解放前后新旧社会的对比，通过大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的领导，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最大的幸福。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是我们各项事业向前发展，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林彪一伙疯狂诽谤、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我们一定要更加热爱毛主席，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斗争到底。

2. 进一步认识到同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实质和重大意义，更加坚定了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大家通过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纲领和他们实施这个纲领的十大罪证，认识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的大事，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正如同志们说的，林彪一伙是腐朽没落的反动派。他们妄图倒转历史的车轮，结果只能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大家表示，一定要把中央四号文件传达贯彻好，充分发动群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决心打好这一战役，把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批深批透。

3. 进一步增强了识别反革命两面派的能力。同志们在批判中，把林彪过去公开的言行和他们的反革命政变纲领相对照，更加看清了林彪的反革命两面派嘴脸。林彪这个口口声声喊着“高举”、“紧跟”、“最忠”的家伙，原来是一个口蜜腹剑的伪君子，笑里藏刀的野心家，是一个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实际上极端仇视毛主席，极端仇视共产党，极端仇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叛徒、卖国贼。大家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警惕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识别反革命两面派，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断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一定要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三要三不要”的重要指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光明正大，反对搞阴谋诡计，坚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狠抓阶级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4. 进一步增强了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通过学习和批判，大家认识到，一切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总是妄图用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代替党的正确路线。林彪一伙更是这样。我们通过批判林彪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批判他们在形势、路线、政策等三个方面对我们的污蔑和攻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斗争的中心问题是路线问题。大家体会到，革命的大好形势是执行正确路线的结果，党的政策是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党半个世纪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生命线。大家表示，要通过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努力提高自己的“三个觉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这次学习班，虽然有了这些收获，但由于时间短，对中央四号文件的学习，对林贼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批判，还仅仅是开始。学习班结束后，我们要同广大群众一道继续学习，继续批判，一定要把这次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工作搞好，在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

（二）深刻认识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重大意义，坚决把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批深批透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央四号文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件。这个文件，以大量的事实，充分揭露了林彪一伙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滔天罪行；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刻批判了林彪一伙炮制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对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如何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大批判，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认真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彻底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是学习中央六十八号、七十七号文件的继续和深入，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又一重大战役。认真搞好这次传达讨论，对于彻底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高全区部队指战员和全省各族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从我们这次学习班的情况看来，要搞好中央四号文件的传达讨论，把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批深批透，必须继续狠抓认识问题。要充分认识毛主席发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对广大工农兵群众的信任和关怀，充分说明了我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反面教材的作用。马、恩、列、斯在同马列主义的敌人作斗争中，总是运用对反面教材的公开批判，来教育党，教育无产阶级，教育广大劳动群众，提高广大党员和群众的马列主义觉悟水平。马克思、恩格斯在同蒲鲁东、拉萨尔、杜林、巴枯宁等假社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作斗争中是这样；列宁、斯大林在同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等老修正主义者、无产阶级的叛徒作斗争中，也是这样。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时，听到有人说在柏林几乎没有人知道考茨基写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小册子，就说过：“我倒想建议我国驻德国和瑞士的大使不惜重金把他的钱收购来，赠给觉悟的工人，以便声讨这个早已成了“臭尸”的“欧洲的”（应读作：帝国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同国内外的阶级来揭露敌人，教育群众。一九五五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时，曾发表了大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毛主席亲自写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主要按语，为这次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伟大群众运动指引了前进的航向，是我们辨别揭露一切反革命两面派的锐利武器。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也是将反面材料先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把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嘴脸暴露在光天

化日之下，然后发动群众进行反击，使群众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在反对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现代修正主义叛徒集团的伟大斗争中，也是多次公开发表反面材料，然后进行彻底批判，有力地教育了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我们还专门出版了“赫鲁晓夫言论”集，毛主席亲自写了出版说明，深刻指出：“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毛主席经常教育我们说，日本帝国主义，美国帝国主义，蒋介石，赫鲁晓夫，以及党内各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很好的反面教员。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这一次，毛主席又抓住林彪这个大反面教员，不仅把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在群众中公布，而且把他们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咒骂革命、诽谤领袖的反革命材料全文印发，除地、富、反、坏、右和反动资本家以外，全国人民都来批判。这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伟大气魄。林彪的反革命纲领，必将进一步从反面教育广大群众，激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林陈反党集团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大大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敏感，以更加高昂的战斗意志，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有少数同志对广大党员和工农兵群众的觉悟和智慧估计不足，对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流露出某些畏难情绪。一是担心“水平低”，有些问题“讲不清”、“批不了”；二是担心群众“觉悟低”，有些问题“划不清界限”，甚至会“起副作用”。这些担心和顾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林陈反党集团代表的是腐朽没落的帝、修、反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他们倒行逆施，根本违背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违抗我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林彪这个反革命纲领如此反动而虚弱，通篇都是造谣和污蔑，有什么批不了的呢？！我们还要特别充分认识到：林彪这个反革命的纲领，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它剥掉了林彪的一切画皮，把他的叛徒、卖国贼的凶恶面目赤裸裸地露了出来。他们的这个反革命纲领，一经交给群众必将立即受到广大群众的愤怒声讨和彻底批判。前一段学习中央六十八号，七十七号文件，和这次学习中央四号文件先行试点单位的情况都证明了这一点，广大工农兵群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丰富的智慧，他们批判的很好，很有水平。只要我们充分相信群

众，放手发动群众，大打人民战争，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就一定把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批深批透，就一定能够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鉴别能力，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

也有少数同志对把林彪这个反革命纲领批深批透的艰苦性认识不足，流露出某些简单化的情绪。在批判中，下功夫用气力不够，认为这也不值一驳，那也不值一驳，满足于就事论事，批判一般化。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要把这次大批判的战斗打好，必须满怀胜利信心，集中全力作战，防止简单从事。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是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多年来反华反共反人民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大杂烩。只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对它进行彻底的批判，同他们划清界限，肃清其流毒，提高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才能化毒草为肥料，才能真正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同志们在讨论中说得好：“对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既要看到它的虚弱性，也要看到它的煽动性，如果不认真严肃地进行批判，那在客观上就等于扩散毒素。”我看这个话说得是深刻的。我们一定要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积极勇敢地投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的战斗。应当认识到，是不是严肃认真地批判这个反革命纲领，这是对待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态度和感情问题，是对待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态度和感情问题，是对待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和感情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这次大批判抓紧抓好，绝不能批得不疼不痒。还有少数同志，对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认为林彪父子已经粉身碎骨，林彪死党纷纷落网，就觉得这场斗争似乎可以结束了，大批判没有多大搞头了。我们前段传达讨论中央六十八号，七十七号文件时，有些单位就有这个经验教训。在传达六十八号文件时，普遍抓得很紧，效果也好。但传达七十七号文件时，少数单位产生松劲情绪。学习效果就差一些。应该看到，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指引下，我们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要彻底批判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从各个领域里清除它们的流毒，还是长期的战斗任务，对于这场斗争，任何时候都不能有松劲情绪。在当前，就是要通过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在全区部队和全省人民中掀起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新高潮。

总之，要把这次传达讨论和大批判搞好，必须进一步认识同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实质。要充分看到，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是党的“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他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继续。通过这次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林彪一伙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实质，是改变党的“九大”路线，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林陈反党集团就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一句话，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两条路线的根本分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生命线。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地代表了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反革命复辟的愿望。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变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专政，我国就要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这只不过是他们的痴心妄想。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一定要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深刻理解同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重大意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路线斗争为纲，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彻底肃清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各个领域的流毒。坚决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捍卫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三）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领导，一定要把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抓紧，抓细，抓好

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部署，省委和军区党委已分别作了具体安排，我就不详细讲了。这里主要对如何组织领导好这次传达讨论和大批判，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 各级党委要把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当作头一位的大事来抓。毛主席教导我们：“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抓路线这个纲，当前就是要抓好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要把这个纲抓好。关键又在于领导干部带头学习好。各级领导干部都必须认真钻研中央四号文件，领会精神实质，要认真学

习马列的有关教导，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把传达讨论工作搞好，才能领导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好、批判好。各级党委，特别是县、团以上党委的领导同志，在批判林彪反革命纲领的战斗中，要带头揭发批判，成为冲锋陷阵的战斗员；同时要亲临前线，具体组织群众战斗，当好指挥员。

2. 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纲领，一定要抓住中心，突出重点。中心是路线问题。重点是要批判林彪一伙在形势、路线、政策问题上对我们的污蔑和攻击。

关于形势问题：要狠批林彪一伙污蔑国内大好形势的所谓“政局不稳”、“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生活水平下降”等反动谬论；通过批判，认清林彪一伙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就是为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妄图一笔抹煞全国人民长期英勇奋斗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妄图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大家认清当前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认清这个大好形势的出现，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进一步鼓舞胜利信心，增强革命斗志，更加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展大好形势，争取更大胜利。至于有的同志反映，我们在前进过程中，还有一些缺点，有的地方少数群众生活上还有些实际困难。这当然应该进行具体分析，切实加以解决。但是，这同林彪一伙的恶毒攻击是有根本区别的。他们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所以把我们说得一无是处，把形势说成漆黑一团。我们必须看到，我们正在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困难，是不足为怪的，决不能以此来否定大好形势。我们应当引导群众分清主流和支流，充分认识大好形势，彻底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谬论。

关于路线问题：

(1) 要狠批林彪一伙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恶毒污蔑攻击。这是林彪的反革命纲领的核心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马列主义的伟大旗手，是我们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一切机会主义者，为了改变党的正确路线，总是集中攻击我们的伟大领袖。我们要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必须彻底批判林彪一伙对毛主席的污蔑和攻击。

(2) 要狠批林彪一伙颠倒、污蔑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半个世纪的革命历史，特别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妄图为一小撮牛鬼蛇神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翻

案的罪行。他们胡说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封建主义”，这岂不是完全颠倒了我党五十年来的革命历史吗？这岂不是说我们不仅没有搞社会主义革命，甚至连民主革命也没有搞吗？这岂不是完全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其实，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建立林家父子封建王朝的，正是林彪及其一伙。他们还胡说党内斗争是“拉一股力量，打另一股力量”，是“今天一小撮，明天一小撮，加起来就是一大批”，叫嚣要对所谓受“迫害”的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等等。这完全是对我们党内路线斗争历史的污蔑，充分暴露了他们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极端仇恨，说明他们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是一丘之貉。

(3) 要狠批林彪一伙对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基本路线的污蔑和攻击。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这条基本路线的核心，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林彪一伙污蔑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是“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是社会法西斯主义”。这充分反映了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刻骨仇恨，暴露了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林彪一伙污蔑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这完全是无耻的诽谤，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从根本上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林彪一伙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攻击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目的还是妄图否定党的基本路线。

(4) 要狠批林彪一伙反对党的“九大”路线，妄图分裂党、分裂军队的罪行。林彪是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他一贯的拉山头，搞宗派，搞惩办主义，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有时也用“团结”这类话骗人，但根本不讲原则，不讲斗争，目的还是为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我们部队的同志，特别要彻底批判林彪一伙所散布的“军队受压”、“笔杆子压枪杆子”等无耻滥言。他们所说的“军队受压”，就是指他们那几员大将和一小撮死党，受到了揭露和批判。他们所说的“笔杆子”，就是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要揭穿他们妄图蛊惑军心，挑拨军队和党的关系的罪恶阴谋，使我们进一步增强党的观念，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军内外团结，更加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

(5) 要狠批林彪一伙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资产阶级唯心论，是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要继续批判林彪一伙的唯心论的天才论，认清他们

到处大讲“天才”，极力吹捧林彪、林立果是天才，其目的就是为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上台作反革命舆论准备。我们要进一步分清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总之，通过对以上五个方面的批判，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什么是林陈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认清林彪的反革命纲领的实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领导，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生命线。

关于政策问题：要狠批林彪一伙所谓的“民富国强”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口号，批判他们散布的“国富民穷”、农民“缺吃少穿”、工人“变相受剥削”等反革命谬论。要充分运用“回忆对比”的办法，联系实际，大谈毛主席领导下的幸福，大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大家认清林彪一伙进行煽动挑拨的罪恶目的，要狠批他们攻击党的干部政策，污蔑干部“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妄图挑拨干部同党的关系的罪行。要狠批他们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污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妄图挑拨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的罪行。使广大青年进一步坚定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更加认识到党和毛主席最关心和爱护青年一代；而林彪一伙的恶毒挑拨，目的是要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把青年引向邪路。要狠批他们所谓“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后期被压制成了替罪羔羊”的反动谬论。使大家认清林彪才是破坏红卫兵运动的罪魁祸首，他们倒打一耙，妄图挑拨红卫兵同党的关系，这是绝对不能得逞的。通过批判，认清林彪一伙恶毒攻击党的各项政策，就是妄图改变党的政策，改变党的路线；认清他们的所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是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就是要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3. 要注意运用传达学习中央六十八号、七十七号文件的经验，结合当前实际情况，加强对传达讨论中央四号文件的具体组织领导工作。要抓好培养骨干（干部、宣讲员、翻译人员等），搞好先行试点，做好传达讨论的准备工作。在传达讨论中，要把搞好干部的学习作为重点，充分发挥干部在大批判中的带头作用和骨干作用。在广大工农兵群众中传达讨论时，要加强具体指导，每一步学习和批判，都要明确的要求，突出重点。要及时掌握群众思想动态，反复做好思想动员工作，保证大批判既有战斗气氛，又搞得扎扎实实。

4. 切实掌握斗争大方向，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林陈反党集团。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开展大批判中，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的一些错误认识和言论，同林彪一伙的反革命谬论混同起来，防止伤害群众和干部。对于少数干部和群众在思想认识上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应当通过对林陈反党集团的大批判，启发他们的觉悟，通过座谈心得体会，联系实际，接受经验教训，用自我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重点单位和问题多的单位，要密切联系实际，深入揭发批判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把本单位与林陈反党集团有牵连的坏事，有牵连的人和问题查清楚。
5. 认真掌握阶级斗争动向。要充分预计到，林彪反革命纲领中咒骂革命的话和他们的反革命策略，必将激起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也必将引起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共鸣。各级党组织，要密切注视敌情动向，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保卫工作，加强对地、富、反、坏、右的监督改造。对边疆地区，山区和内地工作薄弱的地区，要派得力干部去帮助他们做好传达讨论工作。对于敌人的现行破坏活动，特别是利用林陈叛党叛国事件进行反革命活动分子，要坚决打击。

全区部队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在春节期间和尼克松访华前后，各部队特别是边防部队严密注视境内外敌情，严防敌人破坏和袭击。

不论部队或地方，都要继续认真做好保密工作。最近，美蒋匪特把搜集我们关于林陈反党集团的文件作为最重要的目标，限令特务匪徒想方设法窃取这些文件，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这次文件发的面很大，发到了农村生产队和厂矿的班、组。各单位一定要切实执行文件保管规定，指定双人妥善保管，不许传抄，不许个人携带外出，防止被窃和丢失。

6. 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各级党委一定要搞好路线斗争这个纲，把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同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结合起来，要使大批判成为强大的动力，进一步激发斗志，增强革命团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促进斗、批、改的深入发展，促进工农业的大跃进，促进部队的建设，把各项工作搞得更好。

我省和全国一样，形势大好。省革委会成立以来，我省的国民经济确实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和兄弟省市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大鼓革命



干劲，力争上游，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使我省的国民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努力为国家作出更多的贡献。

我们云南是边疆省，一定要落实毛主席对新疆反修斗争的指示，生产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要批判林彪一伙对我省边疆工作的捣乱和破坏。他们大讲什么“政治边防”，实际上是贩卖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治，他们破坏党的民族政策，破坏边疆经济建设，妄图把边疆搞乱，破坏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继续揭发批判，肃清他们的流毒。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从边疆的实际出发，结合边疆的特点，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把我们的边疆工作搞得更好。

根据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要搞好经济工作，首先是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央领导同志强调指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毛主席对加强党委一元化领导问题作了指示，批发了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主席说，这个报告提出了问题，但解决不彻底，所以主席批了“认真研究”，以引起各地注意。主席讲，如果地方党委决定了的事，还要拿到军队党委去讨论，那不是搞颠倒了吗？中央领导同志说，三支两军是有很大成绩的。但地方党委成立了，应该实行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应团结起来，要发挥军队干部的作用，也要发挥地方干部的作用，切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把我们的经济工作和各项工作搞上去。

要遵照毛主席关于农轻重的光辉思想，认真研究农轻重的比例关系问题，要保证农业、轻工业有更快的发展，进而推动重工业的更快发展。从我们省来说，特别是要把农业搞上去，农业上去了，就主动了。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正确处理好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染十二个字的布局 and 农、林、牧、副、渔的关系。只有拼命把农业搞上去，轻工业才有原料；只有把农业和轻工业搞上去，市场才能活跃，才能发展重工业累积更多的资金和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所以我们要狠搞农业，力争今年要比去年有一个更大幅度的增产。在抓紧粮食生产的同时，还要搞好经济作物。国家要求我省在烟、糖上要多作贡献，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当前，要抓紧农田的水利基本建设，加强小春的加工管理，适时完成早稻栽插任务，切实做好大春备耕工作，为夺取今年的农业全面丰收打好基础。要把农业抓上去，关键问

题，一个是抓路线、一个是抓农业学大寨，主要是把农村的基层领导班子搞好。同时还要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使工业部门的工作真正转到以农业基础的轨道上来。

工业上，要进一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加强综合平衡、抓好薄弱环节，改善企业管理，厉行增产节约，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第一季度“开门红”，坚决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同时，财贸、文教、卫生等各条战线也要有新的

发展。要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根据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特别是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老工人政策和农村分配政策。前一段贯彻中央八十二号文件（关于农村分配问题），凡是把中央政策和群众见了面的，反映都很好，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推动了生产的发展。许多贫下中农说，就像毛主席亲自到了我们这里作了调查研究一样，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政策问题，当前主要还是提高认识，狠抓落实的问题。要通过批判林陈反党集团，进一步提高对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政策观念。对于落实情况，要进行检查，对违反政策的现象，要坚决纠正。

同志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经济工作搞上去，这不单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项政治任务。林彪一伙和苏修叛徒集团对我们进行恶毒污蔑和攻击，妄图否定我们的的大好形势，完全是徒劳的，这只能更加激起我们的无比义愤。我们一定要树雄心，立壮志，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用搞好革命和生产的实际行动，用加强战备工作和加强部队建设的实际行动，给林陈反党集团和帝修反以有力的回击。我们全省各族人民和全区部队指战员，一定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夺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的通知

1972. 03. 17；中发 [1972] 12 号

毛主席批示： 同意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进行了多次重要谈话。许多单位要求将毛主席的谈话整理印发。中央根据毛主席在各地谈话纪要，综合整理了一个纪要，现印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规定的范围，即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传达。

毛主席的谈话，以路线斗争为纲，总结了我党五十年来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问题，明确指出一九七零年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反复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

毛主席的谈话，是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件，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有力武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进一步展开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

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一九七一年八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

毛主席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接着是瞿秋白犯路线错误。他们在湖南弄到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我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样的话，他们就大为恼火，说枪杆子里面怎么能出政权呢？于是把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撤了。后来瞿秋白被国民党捉住了，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一年，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搞分裂，也没有成功。

王明路线的寿命最长。他在莫斯科就搞宗派，组织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全国胜利以后，高岗饶漱石结成反党联盟，想夺权，没有成功。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里通外国，想夺权。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跳出来反党。他们搞军事俱乐部，又不讲军事，讲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得不偿失”，等等。彭德怀还写了一封信，公开下战书，想夺权，没有搞成。

刘少奇那一伙人，也是分裂党的，他们也没有得逞。

再就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斗争。

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还有李雪峰、郑维山。他们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他们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八月二十三、二十四到二十五中午，共两天半。他们这样搞，总有个目的嘛！彭德怀搞军事俱乐部，还下一道战书，他们连彭德怀还不如，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的先验论。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又读了七年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马列主义，怎么是天才？那几个副词，是我圈过几次的嘛 [1]。“九大”党章已经定了，为什么不翻开看看？《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是专批天才论的。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

林彪同志那个讲话 [2]，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他们的话，事先不拿出来，大概总认为有什么把握了，好像会成功了。可是一说不行，就又慌了手脚。起先那么大的勇气，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是，过了几天之后，又赶快收回记录 [3]。既然有理，为什么收回呢？说明他们空虚恐慌。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跟彭德怀的斗争，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跟刘少奇的斗争，也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次庐山会议，又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

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土太板结了就不透气，掺一点沙子就透气了。军委办事组掺的人还不够，还要增加一些人，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

你们对庐山会议怎么看法？比如华北组六号简报，究竟是革命的，半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九十九人的会议 [4]，你们都到了，总理也作了总结讲话，发了五个大将的检讨 [5]，还发了李雪峰，郑维山两个大将的检讨，都认为问题解决了。其实，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他们要捂住，连总参二部部长一级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怎么行呢？

我说的这些，是当作个人意见提出来，同你们吹吹风的，现在不要作结论，结论要由中央来作。

毛主席说，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抓军队工作，无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广州军区写的那个三支两军的文件 [6]，我批了同意，在中央批语上，我添了“认真研究”四个字，就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么？

过去我们部队里在军事训练中有制式教练的科目。从单兵教练，到营教练，大约搞五六个月的时间。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

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有些是开得好的，也有好多是开得不好的，主要是路线问题。路线不对，那积极分子代表会就开不好。

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这不完全，还要加上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毛主席说，要学列宁纪念欧仁·鲍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学唱《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按照去做。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那里边讲的是，奴隶们起来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在庐山会议时，我写了一个七百字的文件 [7]，就提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问题。国际歌就是要团结起来到明天，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学马克思主义就讲团结，没有讲分裂嘛！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这几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胜利。再就是八项注

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对人民，对战士，对下级要和气，不要耍骄傲，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这是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希望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战士，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

毛主席说，庐山会议上讲了要读马、列的书。我希望你们今后多读点书。高级干部连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都不懂，怎么行呢？读马、列的书，不好懂，怎么办？可以请先生帮。你们都是书记，你们还要当学生。我现在天天当学生，每天看两本参考资料，所以懂得点国际知识。

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他们四个人 [8] 向林彪请示问题都要经过她。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有些好干部还站不出来。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不好的总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不好的要给以适当的批评，好的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这次庐山会议，有些同志是受骗的，受蒙蔽的。问题不在你们，问题在北京。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

要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1] 指“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三个副词

[2] 指林彪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3] 指叶群私自收回她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

[4] 指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

[5] 指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的检讨

[6] 指中共中央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

[7] 即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一文

[8] 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关于继续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

1972. 03. 23；中发 [1972] 14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示

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刘兴元、李大章等七同志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领导全省广大军民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中共中央一系列有关文件。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进一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

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你们在斗争中，要特别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要认真地区别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九日，刘兴元、李大章等七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中央指示，我们从去年十一月十七日起，分期分批地在全省和军区部队县、团以上干部中，传达学习了毛主席接见成都地区领导同志时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并联系四川实际，对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耐心诚恳的帮助。今年一月底以来，在全省军民中，传达贯彻中央

(1972) 4 号文件，逐步开展了对林贼的《“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的大批判。使全省军民受到了一次生动而又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进一步看清了林贼一伙叛党卖国、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对社会主义更加热爱；进一步提高了落实政策、增强革命团结的自觉性，促进了各项工作。总的形势是好的。

四个月来揭露的大量材料，进一步表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这场斗争，在四川反映得很突出、很尖锐。林贼及其死党的流毒很深。当前，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数单位对这场斗争的意义认识不足，对运动领导还很不得力；有的领导核心不团结，个别犯错误的同志姿态不高；有的单位政策不够落实，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其原因主要在于我们省委和军区的领导。毛主席指出：“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去年九·一三以前，我们没有把“批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而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一批、两清”（批判极“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会”）运动上，有些地方，把斗争矛头指向了持有不同意见的群众和干部，混淆了阶级阵线，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重点在批陈的指示，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过去，我们对此认识不足，没有及时纠正这个错误。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现在，毛主席、党中央再一次把我们几个同志叫到北京来，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同志对我们的重要指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形势，检查了工作，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了觉悟、统一了思想。为了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经我们研究，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认真抓好路线教育，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进一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各级党委一定要抓紧、抓好、抓到底。夺取这场斗争的彻底胜利，对于坚持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最有力的武器。各级党委首先是我们省委和军区党委，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一系列指示，并带动和领导全省军民学习和领会好这些指示的精神。要坚持放手发动群众，

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坚决纠正一切转移斗争大方向的错误倾向。县团以上党委都要对前段运动情况普遍检查一次，借以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继续前进。

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教育干部增强党领导一切的观念。几年来，驻川部队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现在，“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如果地方党委已经决定了的事，还拿到部队党委去讨论，这不是搞颠倒了吗？”因此，为了加强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要按照中央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切实改进三支两军工作。凡成立了地方党委的单位，除特殊情况可保留军管会名义外，其余应一律撤销。三支两军办公室，应划归各部队政治部领导，并协助地方党委管理好支左人员的思想和政治工作。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和驻川各部队在四川工矿、企业的支左人员，建议一律归地方党委统一领导。撤销各部队分片包干的“支左片”。省军区、军分区、县、社、厂矿、学校的武装部，是各级党委的一个军事部门，凡涉及全局的一切重大问题，如贯彻执行备战、民兵、征兵、退伍等工作，均应向地方党委请示报告，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统一部署和实施。

三、有步骤地向军区部队指战员和全省广大革命群众传达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在成都地区斗争的有关情况。这样做，对于防止敌人造谣挑拨，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团结广大群众，深入开展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必要的。着重讲明三点：

（1）四川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贼及其死党所谓的“根据地”和“借用力”，只不过是这伙反革命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成都地区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只是个别人。

（2）现已查明，林贼一伙在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中，对成都地区在思想上、组织上是下了很大功夫的。林贼一伙把温玉成派来成都军区，又先后派出死党刘沛丰、于新野、刘锦平、王飞、鲁珉等人来川进行反革命串连，同丁钊（空军“成指”原政委）等人策划过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3) 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中, 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 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军区党委和省委遵照中央的指示, 召开了几次会议, 在狠批林陈反党集团的同时, 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 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 对梁兴初等同志所犯的 error, 进行了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耐心诚恳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在会上作了检讨和交代, 表示愿意改正错误, 同林贼一伙划清界限, 彻底决裂。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有错误不要紧, 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 错了就检讨, 允许改正错误”的教导, 对他们的这种态度, 应当欢迎。

四、处理好“批清”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落实党的政策。我们四川在清查“五·一六”和“三老会”时, 犯了严重的错误, 干扰了批陈整风的大方向。在运动中, 梁兴初、谢家祥同志又大搞“以我划线”, 把“打谢反梁”作为“反军乱军”, 列入“批清”的重要内容之一, 办了许多“批清”学习班, 扩大了打击面, 搞乱了阶级阵线。上述错误要坚决纠正。在纠正错误时, 步子要稳, 工作要细。要向干部和群众讲明, 清查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 中央早有指示, 并已开始进行。四川的“三老会”也应清理, 把问题弄清楚。去年以来, 在“批清”中发生的错误, 责任在省委和军区, 不能责备下面。纠正“批清”中的错误, 要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 有步骤地进行。已经办起来的“学习班”, 要有始有终, 不要草率解散, 要引导大家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确实搞错了的, 要作好耐心细致的工作, 妥善处理, 被审查的同志, 要相信党, 相信群众, 正确对待自己。对于确有罪证的“五·一六”骨干分子以及策划、炮制“三老会”反动纲领并有破坏活动的人, 要继续审查, 弄清问题, 按照党的政策进行处理。“扩大教育面, 缩小打击面”。

同时, 要进一步落实党对干部、群众、少数民族和知识分子的各项政策。

五、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和纠正我们工作上的某些错误时, 一小撮阶级敌人必然要乘机捣乱破坏; 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 也可能借机挑起事端, 制造混乱, 甚至被阶级敌人利用。各级党委必须密切注视阶级斗争的动向, 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必须坚决打击。对个别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子, 必须严肃批判, 以利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保证把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六、军区和省革委机关的全体党员干部，要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批判林贼一伙的反革命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的基础上，划出一定时间，传达贯彻军区党委、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深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揭发批判军区、省委个别领导人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通过这场斗争，对军区、省委领导机关的广大干部，再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并针对机关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整改。

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增强革命团结。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全省军民特别是各级党、政、军的领导班子，必须牢记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时刻注意党的团结。对于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受骗上当，沾了边的，甚至陷得比较深，上了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团结他们，信任他们。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八、以路线为纲，统一部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把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要进一步开展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加强专案清查工作，依靠群众彻底弄清林陈反党集团在成都地区所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按照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把四川的工农业生产和三线建设搞好。要遵照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提高革命警惕，加强战备工作。

九、我们准备在三月底联合召开一次省委、成都军区党委的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政治局同志最近对我们来京同志所做的指示，检查总结前段运动情况，讨论部署下一段的工作。

可否，望指示。

刘兴元 李大章 严政 陈仁麒 谢家祥 何云峰 孙洪道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九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1972.04.25；中发 [1972] 16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语

中共浙江省委：

中央同意浙江省委和驻浙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浙江实际，认真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有步骤地进一步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

中央认为，驻浙部队、浙江省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参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的，只是陈励耘等一小撮。在这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认真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党还是予以信任的。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浙江地处海防斗争前线。你们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防止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克服无政府主义。要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从三月二十一日起，先后来到毛主席、党中央身边开会。一个月来，我们首先学习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学习了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还听取和学习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指示。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许世友同志的主持和帮助下，我们联系浙江省的实际，愤怒地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初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这使我们每一个同志，都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四月十五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重要指示，这是对浙江广大军民政治上的最大关怀，并进一步为我们指明了解决浙江问题的方向。我们表示热烈拥护，坚决贯彻执行。现将有关情况和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浙江表现得十分尖锐。林陈反党集团在《“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对浙江十分重视。林贼死党叶群、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维国、王飞、胡萍、鲁珉、李伟信、刘锦平、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杭州是林彪、陈励耘一伙进行反革命政变准备的重点地区之一。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搞他们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并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粉碎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这场斗争中，浙江省广大军民，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一系列文件精神，逐步深入地开展了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总的形势是好的。通过这场斗争，使全省军民进一步认清了林彪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真面目，激起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促进了战备，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在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浙江省出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南萍、熊应堂两同志。自批陈整风以来，特别是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以后，他们以种种手法，错误地打保票、捂盖子，对抗中央指示，压制群众揭发问题，严重地阻碍了运动的深入发展。这主要是因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在检查交代中初步认识到，上了

贼船，陷得很深，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一个月来，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耐心启发教育和与会同志的热情帮助下，态度逐渐好转，认识逐步提高。他们已检查交代的主要问题是：早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中央召开解决浙江问题会议期间，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就秉承黄永胜、吴法宪背着中央向他们下达的黑“指示”，不顾大局，以“胜利者”自居，破坏“一月会议”精神的贯彻。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南萍同志支持了林彪一伙“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配合林陈反党集团向党进攻。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同志继续充当林陈反党集团的吹鼓手，吹捧林贼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激动人心”。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在引用党章原文时竟又加上“三个副词”，篡改了党章。并在许多文章、讲话中，宣扬了“天才论”。尤为严重的是，直到去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还公然刊登了林贼的画像。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王维国、江腾蛟等人，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他们同陈励耘一起，根据黄永胜、吴法宪的决定，花二千余万元在杭州为林贼修建了“行宫”。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毛主席、党中央的多次指示听不进去，而接受了黄永胜、吴法宪、陈励耘等人的挑动，反对南京军区领导，阻挠舟山问题解决，分裂军队，破坏团结。我们认为，南萍、熊应堂两同志的这些检查，同刚来京时比较，是有进步的。但是，检查还不够深刻。他们表示，回浙江后要放手发动群众，在彻底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同时，把自己摆进去，接受群众的教育帮助，并作进一步检查。对此，我们表示欢迎。

为了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解决浙江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认真抓好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把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搞深搞透。各级党委一定要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抓紧抓细抓到底。通过这场斗争，提高“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彻底揭发林彪一伙的罪行。

首先召开包括省军区、二十军、空五军、海军、舟嵎要塞区等主要负责同志在内的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第二步，扩大到地委常委和部队师以上干部，传达学习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并联系浙江实际，进一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



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南萍、熊应堂两同志对自己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要向会议进行检查交代，并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第三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扩大到县、团一级。关于如何向全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部队指战员传达的问题，将另行请示。

在传达过程中，必须强调：浙江省广大军民，包括空五军、二十军指战员在内，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林贼及其死党的所谓“根据地”、“固守浙江”、“基本力量”和“可借力量”，只不过是他们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陈励耘那么一小撮。在浙江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也只是个别人。在揭发批判个别领导同志所犯的错误时，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只要犯错误的同志认真检讨和交代问题，愿意改正错误，同林彪、陈励耘一伙划清界限，彻底决裂，就应当欢迎。要严格地区别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要搞人人过关。对于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应和同志们一道，起来揭发批判，吸取教训。同时，要特别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和破坏。要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以大局为重，防止反复。

二、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增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革命团结。几年以来驻浙部队，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现在，“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切实改进三支两军工作，军队支左人员一律归地方党委统一领导。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是各级党委的军事部门，凡涉及全局的一切重大问题，如战备、民兵、征兵、复员退伍安置等工作，均应向地方党委请示报告。在地方党委领导下，统一部署和实施。地方党委要关心部队和民兵工作，“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要经常地扎扎实实地开展拥政爱民、拥军爱民活动。地方党委应把地区性的工作，通知所在地的驻军；军队应主动配合，大力协助，经常主动征求地方的意见，听取对部队的批评。

毛主席缔造和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整体。林陈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破坏军队的团结，妄图分裂驻浙部队。我们要遵照毛主席“不要搞山头主

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的指示，使陆海空三军各部队亲密团结，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密切配合，共同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的战斗任务。驻浙各部队都要尊重南京军区党委的领导。

遵照毛主席关于“要谨慎。第一军队要谨慎，第二地方也要谨慎。不能骄傲，一骄傲就犯错误”的教导，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政、军民、军队之间，有问题要主动商量，有意见要及时交换，有困难要互相帮助，有缺点要各自多作自我批评。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受骗上当，沾了边的，甚至陷得比较深，上了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团结他们、相信他们。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三、以路线为纲，统一部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要把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在省委领导下，建立专案清查小组，依靠群众彻底查清林陈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在浙江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按照全国计划会议的精神，扎扎实实地把浙江的工农业生产搞好。现在春耕大忙季节已经到来，各级党组织切记勿违农时。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做好民兵工作“三落实”，随时准备歼灭敢于来犯之敌。

由于浙江情况比较复杂，为把这场斗争进行得更好，必须加强领导，除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外，建议中央派人指导帮助。

以上报告，请批示。

南萍 熊应堂 铁瑛

王子达 白宗善 马龙

张孝烈 万振西 夏琦

侯建新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原题为：中共中央批语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对《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语

1972. 04. 27；中发 [1972]17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江西省委：

中央同意江西省委和驻赣部队来京开会的十一位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有关指示，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江西的实际，认真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和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

在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本着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在斗争中，要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利于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坚决纠正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认真调查研究，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希望你们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以路线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江西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韩先楚同志和我们十一个同志，从三月二十七日起，先后到达北京。二十多天来，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党中央的

有关文件，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重要指示，联系江西的实际，揭发批判了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初步揭开了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大家都受到极其深刻的教育。毛主席四月十五日的重要指示更进一步给我们指出了解决江西问题的方向，大家表示坚决拥护，并就贯彻执行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进行了研究。现将我们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全省范围内，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开展了对林陈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全省军民进一步看清了林贼一伙的反革命真面目，进一步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了党、政、军、民的革命团结。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江西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许多成绩。总的说来，形势是好的。

但是，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江西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程世清同志。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特别是林贼叛国投敌、自取灭亡以后，程世清同志采取了各种办法，对抗中央，压制群众，不准联系江西的实际，不认真进行揭发批判，竭力捂住盖子。事实上，第十次路线斗争在江西反映得很尖锐、很突出。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程世清同志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交代，早在“九大”以前，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谎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反动言论。一九六九年九月，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林立果等人，窜到井冈山，阴谋策划在江西建立反革命“根据地”，林贼还就国际、国内形势和党内路线斗争等问题，同程世清同志进行了广泛深谈。林贼同苏修一唱一和，胡说什么“在中国，小资产阶级可能把权抢走”，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程世清同志积极执行了林贼的黑“指示”，为林贼的反革命阴谋效劳。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期间，程世清同志与林贼及其死党叶群、吴法宪等多次密谋，向党进攻。庐山会议以后，程世清同志为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制造水陆两用汽车，特别是一九七一年六、七、八、九月间，林贼的死党周宇驰、刘锦平、查全伦、程洪珍、王佐、顾同舟、解耀宗等人，纷纷

窜到江西，紧锣密鼓，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程世清同志先后同周宇驰、查全伦、顾同舟、解耀宗见面谈话，相互送礼，行动很不正常。

几年来，江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受到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根据揭发和程世清同志自己的交代，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程世清同志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了形“左”实右的错误。例如：在农村中，不区别具体情况，违反多数群众的意愿，全面实行扩社并队；不根据当前农村经济的实际可能，不考虑群众生产、生活的方便，拆掉一批民房盖新村。在城市中，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商店全部解散；不区别一般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动资本家的界限，均按地、富、反、坏对待；要南昌市拆掉大批房屋，另建新城镇。在工农业生产和文教卫生工作中，存在有乱出主意，乱提口号，强迫命令，瞎指挥的错误。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在作风上，骄横跋扈，家长制，一言堂。尤其严重的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许多重要指示，有的严加封锁，有的肆意歪曲，有的弄虚作假，欺骗干部和群众。

程世清同志的严重错误，阻碍了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给江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二十多天来，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中央政治局的直接领导下，在韩先楚同志主持和帮助下，通过严肃的揭发、批判和耐心的教育帮助，程世清同志对自己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逐步有所认识，作了初步检查，并且表示愿意改正错误，回去接受群众揭发批判，继续向党作彻底的检查，坚决同林陈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大家表示欢迎。杨栋梁、文道宏、李登云三同志，也初步检查了自己所犯的严重政治错误。于德馨同志检查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全体与会同志，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路线觉悟，增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这对于推动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深入发展，促进江西各项工作的胜利前进，必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 (二)

为了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林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我们研究了如下几项措施。

一、继续深入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彻底揭发和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是当前的头等大事。全省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抓细、抓好。要认真学

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一系列指示。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联系江西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深入揭发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开展革命大批判，提高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要认真总结前段运动的经验教训，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将运动继续推向前进。

二、进一步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决纠正损害党的领导的各种错误倾向。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每个党委成员都应当把自己置于党委之中，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正确处理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相互关系。要建立和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必须及时请示中央。

三、人民解放军驻省部队广大指战员，在保卫国防和三支两军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立下了不朽功勋。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进一步做好拥军爱民工作，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要按照中央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精神，认真总结经验，切实改进三支两军工作。省军区、军分区和各级武装部，都是同级党委的军事部门，应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省军区要尊重福州军区的领导。

四、有计划、有步骤地传达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在江西的斗争情况。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谈话纪要》和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揭发、批判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在进行这项工作时，要从有利于增强革命团结、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的原则出发，工作要细，步子要稳。

在传达过程中，必须着重说明：（一）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江西全省军民，是热爱毛主席，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林贼及其死党的所谓“借用力量”、“固守江西”，正如中央所指出的：“只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江西，犯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只是个别人。（二）党对犯了错误的同志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包括犯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内，只要他们彻底交代，认真检查，坚决改正错误，并取得群众的谅解，我们就应当欢迎，准许人家革命。

五、在发动群众，揭批林陈反党集团罪行的同时，在省委常委领导下，组织一个清查小组，彻底清查林陈反党集团的死党分子在江西的阴谋活动的罪行。

六、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正确处理革命和生产中所存在的问题。对程世清同志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必须彻底批判，坚决纠正，以利于深入开展斗、批、改和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要向干部和群众讲明，产生这些错误的责任在省委，主要在程世清同志，不能责备下面。在纠正错误的时候，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经过调查研究，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目前，春耕大忙已经到来，各级党委切记不违农时，把农村工作安排好。

七、在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和纠正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时，一小撮阶级敌人必然要乘机捣乱和破坏；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的人，也可能借机制造混乱，甚至为阶级敌人所利用。各级党委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正确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排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防止反复，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把粉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八、全省各级干部，全体共产党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首先是各级党委，必须牢记“九大”团结胜利路线，以大局为重，时刻注意党的团结。对于犯过错误，甚至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就应当团结他们，信任他们，帮助他们做好工作。犯了错误的同志，也要放下包袱，积极工作，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

我们一定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把深入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以路线斗争为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三)

我们打算，第一步，召开省委常委和省军区党委常委会议，第二步，召开省委全体(扩大)会议，吸收地、师、军分区负责同志参加，第三步，再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和贯彻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指示，彻底揭发批判林陈反党集团的罪行，有步骤地揭发批判程世清同志的错误，检查总结前段运动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段的工作。会议以后的安排，另行报告中央。可否，请指示。

程世清 杨栋梁 文道宏

白栋材 李登云 于德馨

黄知真 陈昌奉 熊振武

张志勇 邹文泗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发出

沈阳军区党委办公室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翻印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文件原题为：中共中央批语)

一九七二年五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

1972年5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通知》回顾了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出逃事件发生以来到现在8个月中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的5项措施。指出：“为了总结和交流这一时期的经验，以利于进一步揭发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和反革命罪行，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使全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中央决定从5月20日起，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批林整风汇报会议。”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参阅文件之一——揭发林彪在历史上反毛主席、反党的罪行

## 目 录

- 一、朱德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1)
- 二、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摘要)…………… (4)
- 三、李富春同志揭发林贼的罪行…………… (8)
- 四、陈毅同志给毛主席的信和揭发林彪早年的反党罪行…………… (11)
- 五、聂荣臻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和揭发林彪的反党罪行…………… (21)
- 六、肖克同志对林彪的揭发…………… (34)
- 七、曾山同志揭发林彪的罪行…………… (46)
- 八、邓子恢同志揭发林彪的罪行…………… (48)
- 九、蔡畅同志提出的林、叶二贼有里通外国嫌疑的几个线索…………… (50)



## 朱德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毛主席，党中央：

当我开始看了主席亲自批发的 57 号文件时，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叶群叛党卖国的罪恶活动，感到很突然，并且非常气愤。后来又看了主席批发的其他四个文件及有关文件。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由于主席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只好仓惶出逃，自取灭亡，罪有应得，死有余辜。这颗埋在主席身边的最危险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也是一件大好事，它使我党更加纯洁，更加伟大，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中央对林彪叛党集团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措施；坚决拥护中央撤消军委办事组，并责令林的死党黄、吴、李、邱停职反省的决定；坚决拥护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和中央专案组。我一定要坚决地站在主席一边，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批臭这个无耻叛徒。

近日来，经过反复回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史和林彪其人，感到他走上反党反革命的道路，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他的个人英雄主义、野心家的剥削阶级烙印，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那时，党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从他所在的连队里调入，调枪枝，就调不出来。他不顾党和革命的大局，死守着小团体不放，实际上是扩大了个人主义。我军从井冈山建军起，就建立了军事人员服从政治委员领导的制度。他不相信政治委员的领导作用，也不接受政治委员的领导。党派去的政治委员，他不与之合作，不服从政治委员的领导，有的甚至被他排挤出来。他只要政治部主任，好便于他独裁。他从来就看不起他的上级。井冈山时期他当连长时，就看不起营长周子昆同志，他想办法反对周子昆。后来他当了营长，便开始反对团长王尔卓同志。联想到遵义会议后他带头攻击毛主席、阴谋夺毛主席的权，和这次妄图谋害毛主席，犯上作乱，图谋篡党，也是有他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在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国内外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在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他们窃机向苏修方向逃窜，看来他与苏修及其豢

养的汉奸王明是早有勾结的。抗战时期他在苏修养病多年以后回来（中央应当认真审查他这段历史），便极力吹捧蒋介石有什么“和平诚意”，并积极要求去“说服”蒋介石不要和共产党搞摩擦。在他一再要求下，中央允许他去重庆“说服”蒋。去了一个多月，毫无结果而归。联想到当时王明一伙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看来他们是有国际背景的一路货色。

最后，我恳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远健康长寿，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专此敬礼

余容后呈

朱 德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刘伯承同志揭发林贼罪行谈话记录（摘要）

一九七二年三月二日上午

一，红军过了金沙江后，林贼就反对毛主席，他伙同彭德怀要毛主席放弃指挥，在会理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批评。我当时参加了会议，毛主席批评他说，你是个小孩子，你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顶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还是有好处的。

二、解放战争时期，林贼在东北，我们正进行淮海战役第三个阶段。后到西柏坡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时候，就听说，毛主席叫林彪打锦州，而林彪不听，却要打吉林（长春），结果贻误了战机，推迟了时间，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但林贼置之不理。据说，当时罗荣桓给毛主席打了电报，承认了错误。林彪知道后，却讽刺、挖苦地对罗说，你的电报写的好，将来你有前途。

三、进关后渡江南下，当时我们并没有请求增援，但我们的部队到了那里，林贼也派部队到那里。我们占领了广州，他就跟到了广州，我们到了雷州半岛，林彪部队就占领了海南岛，我们到了广西，林部也随着到了广西。后我们又转战西南，琼州一仗把胡宗南的主力和川军大部解决了，共九十万人。当时，林彪要了二十

五万，三野是我们主动给的，也给了二十五万。现在看来，林要这二十五万，就是为扩大自己的实力。后来林彪派五十军去成都，派五十七军去重庆，但是他们去，不是为作战，而是为了占地盘、收武器。在云南也是如此，陈赓部队占领云南，林彪跟着也派了部队，在敌人的退路上截击，也是为的收缴武器。所以，现在看来，林彪搞政变是有根子的，在解放战争时，他就是抓权，就是积蓄力量、占地盘、扩充自己的势力。

四，记得是在杨成武当代总长的时候，林彪曾和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谈过一次话，在谈到军队的重要性时，林彪说，要学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以后黄永胜把林讲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示”又抄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彪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掉了。林彪不学毛主席，却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五、有一次，我到南京空军俱乐部，里面没有毛主席的像，只是挂了刘亚楼的像，说他是空军的创始人。我联想到在东北时，刘亚楼曾把打烂了的日本飞机、国民党飞机拣起来拍成电影，说是空军来了。这样就是空军的创始人？刘亚楼死后，林彪就叫吴法宪当空军司令，当时就有不少人反对。可见林彪很早就抓空军了。后来他又叫李作鹏抓海军。李作鹏在江西苏区时是个译电员，那时他年纪很小，但鬼头鬼脑的不老实。陈光是一一五师副师长，后代师长，他有错误，骄傲，但属内部矛盾。李作鹏假装好友去套他，说他香港有关系，又推断出与蒋介石有关系，因而弄得陈光自己烧死。李作鹏完全是特务手段，林彪却为此事器重他。

六、毛主席教我们看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林彪却对政变很有研究，专门搜集政变事例。可见他搞政变是存心已久的。

刘伯承同志最后说，林彪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几十年，他没说过什么真话。这次同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不是个简单问题，要心中有数，注意政策。建国以来，高饶、彭黄、刘少奇、林陈四次反党事件，主要背景都是苏修，所以要特别警惕苏修的颠覆活动，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李富春同志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八日

一，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遵义会议他并没有讲什么话。遵义会议后不久，他就散布攻击毛主席的言论说：“部队这样拖会拖垮，这样领导还行吗？”他伙同彭德怀、张闻天等一起来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领导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会议上，毛主席严厉地批评了他。遵义会议刚刚纠正了错误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他就出来反对，这是很恶毒的。

二、一九四六年三月，在东北，我听说中央来电，为着推动马歇尔的调处，同时阻止敌人向北前进，以利于争取时间，创造东北根据地，要林彪指挥部队围攻四平，相机占领四平。但是，林彪却集中山东调来的大部分兵力强攻四平。结果打了二十天左右，部队伤亡很大，打不下来。当时杜聿明的新一军正用飞机向长春运兵。在这个情况下，林彪就仓惶撤退，一直撤到哈尔滨。并准备随时放弃哈尔滨。为此，在哈尔滨铁路桥座上埋了炸药，准备随时炸桥。当时黄克诚到哈尔滨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回来对我讲了两次，说：“齐齐哈尔站不住啦，要向北安撤退。”这是他本身的右倾，同时是林彪的影响所致。

三、他在东北土改中对“左”的政策欣赏。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东北开始搞土改。我是七月由西满调东北局的，八月，新华社把华北地区土改搞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这一套都广播出去了。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把这些也登了东北日报。我亲自到双城请示林彪、罗荣桓。而林彪说：“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坐天下，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几天以后，有的地方发生侵犯中农的现象，我又打电话给前方，由罗荣桓同志回来开了东北局会议，到九月才决定取消了这种“左”的宣传。但真正纠正是到了十月，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和十一月主席对于当前几个政策问题的下达。

四、在东北，林彪同高岗关系密切。

在召开东北局会议前，他往往先同高岗商量，然后由高岗主持东北局会议，而他是不经常参加会议的。高岗在东北想当东北王，到了中央，野心更大了，这是因为有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的支持。

五、他在东北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一，不主持东北局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参加政治局会议，那知他在背后搞鬼。第二，接触中不交心，不谈政治，不暴露思想。

## 陈毅同志给毛主席的信

主席：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党中央，对大叛徒、大卖国贼、大汉奸，大野心家林彪及其死党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正确措施。林贼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的阴谋未逞。仓惶出逃，坠机自取灭亡。这是卖国贼的必然下场。这是党的又一次最伟大的胜利。在党的五十年斗争史中，主席总是事先洞察一切，及时抓着阶级斗争的动向，彻底加以揭露，使任何反党野心家都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在主席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每一个紧急关头，都能顺利扭转局势转危为安。这次林、陈反党集团的被粉碎，更是履险若夷，迅速平乱，使我党我国我军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今后的胜利会更大。特此祝贺！

我患病将近一年，仍在继续治疗。我感谢主席和党中央对我的关怀。我揭露林贼罪行的录音稿太长，难于看。

兹先整理一份摘要材料，先送呈，请审阅。

敬 祝

主席万寿无疆！

陈 毅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

（下面是陈毅同志对林贼的揭发材料）

### 揭露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早年的反党错误和罪行

一、大叛徒林彪是一个逃跑分子。我记得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部队由广东转移到江西大庾时，林贼当时担任第七十三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曾经自由离开小差向梅关方向逃跑，后来又中途折回，表示愿留在部队不走了。并向我说，沿途老

百姓搜腰包、打人，有时候杀人很厉害，不能跑了。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动摇逃跑，但又走投无路，才不得不去而复返，重新回来。

二、大叛徒林彪一贯利用封建关系，任用私人。林贼早在担任第七连连长时就任用他的表弟担任勤务员，把连队伙食费一百二十元毫洋交其表弟背管，结果该犯背款潜逃投敌。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后，一九二八年在某次战斗中红军又将其表弟俘虏过来，林贼竟敌我不分，又重用该犯在团部当勤务员，让他背卜壳枪出入团部，被团领导发现赶走。这说明大叛徒林彪任用私人搞死党的行为不是自今日始。

三、林贼口头上拥护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实际上早年就一贯破坏红军纪律，经常同勤务员等一伙亲信吃吃喝喝，每到一地总是抓老百姓的鸡吃不给钱。经批评后有所收敛，但不久仍然旧病复发。

四、红军第四军由主席率领从井冈山向赣南作战略转移时，占领大庾城后，由二十八团担任新城、赣州方向的警戒。不料黄昏前遭敌突然袭击，发生战斗。记得当时主席曾去前沿阵地观察作战形势，发现二十八团未组织认真抵抗，边打边退，林贼带着队伍在后跑。主席即指示他一定要组织部队打好这一仗，击退敌人，否则对以后转移很不利。林贼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理，竟从主席身边一冲而过，抢先跑往安全地带，只管自己安全，不顾主席面临敌人追击的危险。我当时在场，叫住林彪无论如何不能走，他也不理。幸得后面有一些部队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才保证了主席的安全。这是大叛徒林彪临阵退却，不顾主席安危的一桩严重罪行，说明他对主席没有任何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

五、大庾战斗后，当晚在距大庾四十里的杨梅整顿队伍时，发现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在战斗中负伤。主席要我去告诉林彪要很好照顾何，设法把何抬走。我找林彪传达了主席的指示，并说明何是从三十一团调来的好同志，无论如何要照顾好把何挺颖抬走，否则会影响两个部队的关系。林贼当时满口答应，但事后何挺颖竟被抛弃。其实当时把何抬走不是不可能的；何挺颖被抛弃，林贼负有很大责任。这是林贼只顾自己，对阶级弟兄、对战友毫无革命感情的又一表现。

六、寻邬圳下战斗中军部遭敌袭击，毛主席和朱德同志受到极大危险。当时林彪所部担任警卫，军部受袭击，林贼没有掩护军部，自己早就上山去了，因此对军部受袭负有很大责任。事后我批评他，他不承认，反而推卸责任，诡辩说军部要

他带队伍早到罗浮嶂，没有给他掩护军部的任务。林彪只顾自己，不顾领导同志的安危早年就已有暴露。

七、在圳下战斗后，我军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我记得前委曾讨论了敌人可能前堵后追，发生建制被打乱的情况，决定如遇此种严重情况，队伍可以分三路行动，由主席率三纵队为一路，朱德同志率二纵队为一路，我和林彪率一纵队为一路。但当时干部战士都不愿分散。几次决定分散行劫，总是分不散。这体现了干部战士对领袖和领袖对于部战士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依存关系和战斗团结。彼时此种情景，非常动人，至今令人难忘。林彪面对此种局势，消极悲观，曾多次鼓动我把队伍拉开，不要走原定路线，而另走一路，把毛、朱撵开，说是和毛、朱在一起目标太大，不利于保存队伍和脱离敌人。当时我没有同意，队伍没有拉开。林彪不顾革命大局，企图摆脱领导，使领导同志陷入困境而自求脱身的阴谋未能得逞。

八、四军七次大会刚刚开过不久，主席提议从红四军每个连拨一个班加强闽西的地方武装，以便成立第四纵队。林彪竟然当场带头反对主席的提议，以致主席的正确主张未能实现。这是林彪从本位主义出发，反对主席主力和地方兼顾的正确方针的严重罪行。

九、一九二九年彭德怀从井冈山突围出来在余都同主席会师后，主席仍让彭德怀回井冈山恢复工作。随后四军部队到达瑞金，主席观察全国形势，认为江西的形势最为成熟，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林彪很羡慕彭德怀到处打游击，反对主席提出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认为不能说全国和江西革命形势很快就会到来，说是江西福建的老百姓不愿当兵。林彪消极悲观，很怕敌人尾追，主张分散打游击。主席一直耐心对他进行教育。四军九次大会后，主席给他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一封长信，批评了他的消极悲观，对革命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这封信油印后在部队和地方广为散发，对指导当时的革命斗争起了极大的作用。可是在一九四八年林彪却抵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封信。主席英明伟大，很早就抓住了他的本质，这封信对他自命一贯正确不利，所以他竭力抵赖。这说明大叛徒林彪对主席极不老实，耍两面派，是反对主席的又一次大暴露。

十、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我从中央回来，首先到林彪所部去，林彪问了我去中央的情况，我讲了中央要我负责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我也问了他部队情况，他说几个

纵队司令员团结得很好，那批政治小鬼都被打下去了。林贼把政治工作人员诬蔑为政治小鬼，说明他是一贯反对政治工作的。

十一、红军打梅县失利后，队伍开到上杭、长汀之间的官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欢迎毛主席回部队，来统一全党全军的路线，应付全国大发展的局势，推动全国革命的大发展。林贼却要求前委开会，讨论他的分散打游击的主张。林贼在会上反复强调他在永定、上杭之间分散打游击的经验。前委会上争论很激烈，林贼的主张未被通过，但仍坚持保留意见。林贼一贯主张分散打游击，这是对全国革命悲观失望的表现。

十二、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后，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导下，全军团结，气象一新。毛主席和前委率二纵队在龙岩、大小池、古田一带与闽西地方负责同志讨论安排地方工作。林彪的一纵队和三纵队在新泉、朋口、长汀一带做群众工作。林贼听说江西敌人要从瑞金方面向闽西进攻，不请示主席和前委，即拉起队伍向江西逃跑。后来，主席率二纵队经清流、宁化、归化、广昌到宁都的东韶才跟上一三纵队。事后我批评林彪在九次大会后竟然不请示，擅自决定分兵行动是错误的，林贼死不承认。林贼闻风而走，不请示、不报告，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分散逃跑的又一罪行。

十三、一九三二年第四次围剿前，我当时在江西军区工作，听前方来人讲，三军团彭德怀部曾发生第二师师长郭丙生叛变投敌事件，部队情绪不高，在小元会议上林贼和彭德怀都要求脱离主力部队分散打游击。此事我只听说，未亲见，还可以核实。但林贼一遇困难就想离开主力分散打游击，这种主张确是一贯的。

十四、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时，同林贼接触不多，有一次我问他第三国际情况，林贼大肆吹嘘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即意大利的陶里亚蒂）等人，说这些人表面上是老先生，实际上本事很大。林贼这样吹捧这些人，同这次仓惶出逃可能早有历史根源。

十五、还有一次林贼向我大肆攻击延安的抢救运动，认为抢救运动中审查叶群是暗害青年，他大讲叶群的好话。林贼这次叛国投敌，更证明了当时审查叶群是对的，可惜没有审查清楚。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得起来的林贼的一部分罪行。从以上事例中看出，林贼早年就多次反对过毛主席，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对中国革命消极悲观，曾多次动摇



逃跑，企图分裂红军。林斌为人阴险，耍两面派，培植死党，专搞阴谋，也是一贯的。此次发展到妄图谋害主席，叛党叛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不否认林彪在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之下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一九二八年湘南进军，我是犯了错误的，林斌在桂东一仗还是打得对的；红四军七次大会上我是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林彪是写信支持毛主席的，这也是历史事实。在揭发林斌罪行时，我不否认我在历史上所犯的这两次大错误，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以上揭发的事实，提供参考。

聂荣臻同志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信

总理并报主席、中央：

林斌叛国投修，自取灭亡，是我党我军的一次伟大胜利。我完全拥护主席、中央，对林斌及其死党所采取的一系列英明措施。为消除隐患，必须把林斌及其死党的一切罪行追查清楚，并彻底揭穿林斌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肃清其流毒与影响，使我党我军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我在老同志座谈会上，对林斌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罪行作了揭发。陈毅同志揭的是前四年，我揭的是后四年。因原记录不便于看，简报又显得简略，所以整理了这样一份揭发材料，呈上，供参阅。

我对林斌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过去在苏区和在长征时的印象，觉得他年青，世故不多，打仗还肯动脑筋，但个人英雄主义突出，从不接受批评，更不肯自我批评；在关键时刻，并不是忠于毛主席的，而是反对毛主席的；教条宗派集团、彭德怀、张国焘等拉他的时候，他是“实用主义”的，想投靠。平型关战役后，就分开了，以后接触不多。全国解放后，他长期养病。第一次庐山会议后，他主持军委工作，打着红旗反红旗，调子越来越高，巧妙地掩盖了他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同时，由于我自己一头扎到科技业务堆里，没有很好学习主席著作，路线觉悟低，看不出问题，因此，还误以为他拥护毛主席，宣传毛泽东思想。所以，在军委工作中，我对他是尊重的，支持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他为接班人，自己是拥护的。虽知道他在历史上犯过错误，但认为当时他还年青，经过主席长期教育，可能已经改正，同时，历史上他也做过一些工作，因此，

对他作为接班人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九届二中全会，从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的罪行中，感到可能与林彪有关，但绝没有想到他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现在真相大白，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愤慨万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自我表演，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作处理。由此，更深切感到主席英明伟大，洞察一切，使这场反革命政变彻底破灭，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从五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来看，凡是要分裂党，搞阴谋，反对毛主席的，绝没有好下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主席最近指示，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这是极其重要的指示。我是在历史上和工作中，特别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都犯有严重错误的人，更应深刻领会和坚决执行主席的这些指示。我决心以主席的教导鞭策自己，不折不扣地按主席的指示办事，紧跟毛主席，继续革命。

错误的地方，请批评指示。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聂 荣 臻

十一月二十八日

（下面是聂荣臻同志对林彪的揭发材料）

野心家、阴谋家 卖国贼林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部分罪行

自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同大叛徒林彪同在红一军团，他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据我回忆，在这一段期间，特别是在长征中，几个关键时刻，林彪先是伙同教条宗派集团和彭德怀，后是与张国焘默契，反对毛主席。主要事实是：

（一）打漳州后，林彪在筹款中支持过“左”行为。

一九三二年春红一军团成立后，毛主席率一、五军团南下，入闽打漳州，整个战役都是毛主席亲自部署指挥的。打下漳州后，在漳州、漳浦、石马一带筹款，执行主席指示的正确的经济政策，商店没有关门的。比如，对陈嘉庚派款，他不愿交，我们只没收了相当于派他款项的货物，公平合理，丝毫不加，陈嘉庚事后还

说了我们的好话。但在主席离开之后，林彪就支持红三军高自立等人在漳浦地区搞过“左”的行动，对不愿交款的，拉到大街上非刑拷打，说是给群众作个样子看看。弄得有的铺子关门，小资产阶级不同情，甚至工人、农民也有疑虑，政治影响很坏。我提出要纠正此种做法。林彪却支持高自立的做法，说不这样做就搞不到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置红军的政治影响于不顾。这一争论，一直到开军团政治工作会议，我们从漳州回来才了事。

（二）林彪支持教条宗派集团，鼓吹“短促突击”。

一九三四年，进入第五次反围剿时，教条宗派集团反对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提倡所谓“短促突击”与敌人拼消耗，这在战略、战术上都是错误的，使我军完全陷于不利地位。那时林彪发表了一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支持李德，深受教条宗派集团的欣赏。这不仅仅是军事路线上的问题，也是林彪向教条宗派集团的一次政治表态。

（三）长征途经广东乐昌、九峰山地区时，林彪不顾大局，不执行军委命令，只想自己跑掉。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彭德怀走右翼，我们走左翼。我军先后从信丰、安远间突破蒋匪第一道封锁线，从城口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此时，广东军阀部队开赴乐昌一线阻截我们。当时一军团的任务是，经乐昌北面的九峰山突围，并派一部兵力控制该山要点，以掩护后续的九军团和中央纵队。林彪此时却不顾大局，只图自己跑掉，主张不占九峰山，从山下大道经乐昌率部队逃出去。我不同意林彪的意见。那时，粤军坐火车，我军走路，怎能跑得过人家？如走乐昌，必然会碰上，我们是先头部队，负有掩护任务，不应只顾自己走平原，跑掉就算数，如不控制九峰山，敌人把后续部队截住，会造成很大的损失，破坏长征的计划。后左权提了个方案，派一连人先去侦察。部队继续沿九峰山前进，控制了要点，掩护了后续部队，胜利进到宜章。后据侦察，敌人当时已进乐昌，如按林彪那种跑法，将使我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陷于极端危险的境地。林彪只想跑掉，置后续部队的安危于不顾，其恶劣品质令人愤慨。

（四）遵义会议前和遵义会议中，林彪态度暧昧。

在毛主席领导下，一、二、三次反围剿获得了伟大胜利；第四次反围剿因主席军事思想深入红军中，教条宗派集团的瞎指挥也还没有能够彻底贯彻，也取得了胜

利。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教条宗派集团的错误指挥，我军处处被动，招致失利。部队干部对教条宗派主义的危害逐步认识了，要求主席重新出来领导。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军进入遵义城，一月八日就开了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主席的领导，从此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是我党历史的伟大转折。记得在进军遵义途中，我因脚坏了，坐担架，王稼祥那时也坐担架，我们两人就经常一起谈，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要毛主席出来领导。而林彪无论在遵义会议前和在遵义会议上，都没有讲什么话，他的态度是暧昧的。现在听说有人为林贼鼓吹，说他在遵义会议上作了什么重要讲话，还到处设法搜集他那个所谓“重要讲话”，这完全是伪造历史。从以后一系列事情来看，林贼这个两面派，当时的真实思想是反对毛主席的。

（五）过金沙江后，林贼公开写信，要求撤换毛主席。

遵义会议后，本拟过长江到四川。后来，打土城，彭德怀在前面指挥，没有打好，部队伤亡较大。蒋介石调集他的嫡系部队及川、黔、滇、湘几省军阀部队拼命堵截。当时我军作战疲劳，如果一直往西渡长江，敌人追过来，没有船，我们就要被消灭在江边。主席料敌如神，英明地改变了原定渡江计划，折向滇东北扎西（威信），各省军阀部队及蒋匪嫡系拼命尾追，敌人后面空虚，主席就指挥我们转过头来二渡赤水河，乘虚占领桐梓，再次进入遵义，又转向仁怀，三渡赤水，佯攻贵阳。主席的英明指挥，使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处处听我们的调动，蒋介石慌忙亲自到贵阳督战。可是我军突然调转向黔南前进，在贵阳、龙里（龙云的部队驻在这里）之间直插云南，把敌人远远甩在后面，于五月初巧渡金沙江。这是长征中的决定性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和主席英明指挥的伟大胜利。

正是我们在贵州一带兜圈子的时候，林彪、彭德怀把主席这一英明的战略指挥诬蔑为会拖垮部队，他们互相呼应，反对毛主席的领导。那时以三军团为大本营，博古、张闻天经常去；李卓然因五军团担任长征后卫，对主席不满；这帮教条宗派集团的家伙们纠合在一起，煽风点火，刮出一股要撤换毛主席的领导，把彭德怀捧上台的妖风。一军团的朱瑞（当时是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也是教条宗派集团的成员。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林彪就吵吵嚷嚷了，说这样下去不成，他一到宿营地就给彭德怀打电话，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我当即批评他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林彪打完电

话，即写信给主席，狂妄地要求主席下台，并要我签名。我拒绝签名，和他吵起来了。我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的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遵义会议，现在又反对遵义会议。你跟主席那么久，在主席领导下，前几次围剿都粉碎了，你应该相信主席，只有主席领导才能挽救危局。我们两人争吵时，左权、朱瑞、李卓然、罗瑞卿在场，他们都没有说话。林彪不听劝告批评，自己个人在信上签字就送走了。后来，主席在会理会议上严厉批评林彪，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六）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林彪在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消极动摇，想投靠张国焘。在主席英明领导下，我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通过彝族区，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翻夹金山，到懋功地区，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我怀疑，当时是李卓然把遵义会议前后情况告诉了张国焘。从张国焘那边就传出消息，说一方面军也不团结，他抓住了林彪、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反对毛主席的空子，想拉拢一、三军团，阴谋吃掉中央红军。在两河口会议以后，次日晨，张国焘请我同彭德怀到他那里吃早饭，饭后就说要拨两三个团（实际是两个营的样子，不到一千人）给我们。当时就感到张国焘在拉拢了，出来后我还问彭德怀，张国焘此意何在？彭德怀说，拨兵你还不要，他没有正面回答。后头，我们到了毛尔盖，到巴西、阿西，在主席那里开会，成立总指挥部，右翼总指挥是徐向前同志，我们都归右翼指挥。一天我同林彪到右翼指挥部去接受命令，吃晚饭后，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回去，聂荣臻同志留下来，要谈一谈。”我留下后，陈就问我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的看法，还要我表态。我说，这两个会议我都参加了，我都拥护，都赞成，早已表过态。后来，没有谈出什么，我就回来了。我晓得，陈昌浩的意思是要威胁我表态反对这两次会议，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陈昌浩要我留下表态，而不要林彪表态呢？因为他们知道林彪和彭德怀反对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是不成问题的了。

后来，在阿西、巴西地区时，张国焘从阿坝来电，要我们过阿坝西进。事后才知道，张国焘那时还密令陈昌浩，如一方面军不从，可相机处理，危害中央。叶剑英同志当时在四方面军任参谋长，把密电内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毅然决定一、三军团和中央直属队立即出发，向甘肃前进，脱离险境。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惊心动魄的斗争。有一天，我对林彪说：“我们不能走阿坝，部队再也不能在草

地拖了，还是主席讲的，要快出草地，去陕甘。”当时听说张国焘还有一个方案，把林彪调××军，把我调三十一军任政委，命令尚未发出。我说，我们要注意，张国焘存心要把我们吃掉。当时林贼对我说：“你就是宗派主义。”我说：“什么是宗派主义啊？这个问题要警惕，张国焘是一贯和主席、中央思想是不一致的，这是路线问题啊！”林贼说：“什么路线问题？他路线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几个人哪。”我说：“蒋介石人更多，那蒋介石的路线更正确？！”我始终怀疑，那时林彪是被张国焘挖了墙脚的，他是想投靠张国焘那边的。当然，由于主席断然处理，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没有得逞。

（七）林贼到陕北之初，想离开毛主席，到陕南打游击。

毛主席领导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林彪仍心怀不满，悲观失望的情绪有时流露出来。一九三五年冬在宜川，林贼多次表示要带一部分部队离开陕北，到陕南去打游击。这说明林贼离心离德，想离开毛主席，另创一个天下。

（八）大相寺会议上，林彪不检查自己的错误。

红军东征时，主席来电要我们拨些新兵给十五军团。林彪接电报后，说：“有×的几个兵”，当场把电报一摔，态度很不好。我拿过电报一看，即问彭雪峰等的意见。彭雪峰当时正在做恢复三军团的梦，不同意拨。问下面，下面叫困难。我自己的思想也是本位主义的，想少拨或不拨。因此，我们回了电报，要求不拨。大相寺会议上，主席批评我不顾大局，本位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批评，对我教育很深，同时教育了全军。我是政委，在这个问题上要负主要责任。但林贼在会上却一言不发，不作自我批评。

（九）大相寺会议后，一九三六年五、六月间，林彪调红大工作，临走前与我谈：“我们在一起搞了好几年，现在分手了。过去我们的分歧，你是从组织上考虑的，我是从政治上考虑的。”我说：“我们争论的是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扯几天也扯不清，以后再谈吧！”没有谈下去。可见林贼对会理会议的批评，一直是心怀不满的。

从以上事实，足以说明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就几次反对毛主席。一直到这次，发展到妄图谋害毛主席，投敌叛变，成为我党历史上最大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大叛徒、大卖国贼，这不是偶然的。这颗定时炸弹自我爆炸，自

作结论，自我处理，死有余辜。这是一切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的必然下场。

### 肖克同志对林彪的揭发

本月二日我听了关于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林彪问题的传达，感到极端的痛恨。林彪竟敢对我党我国及全世界人民敬爱的毛主席，多次企图进行谋害，在逆谋不逞，又另图逃到南方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的内战，用心之毒辣、阴险，较之老叛徒陈独秀、张国焘及汉奸卖国贼王明等，大有过之无不及。

我党建立以来十次大的路线斗争，林陈路线是最大的一次。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叛党叛国，其败亡之速，结局之惨，也超过以前任何叛徒和卖国贼。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处理这一反革命事变中，事前观察中央内部和党内阶级斗争的具体动态，察事机于微末，今秋南巡，再一次提出“全党干部，要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启发各地同志，提高警惕，所以没有酿成大变。事变发生后，措施得当，使全国秩序如常。这就再一次证明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证明经过五十年锻炼的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也再一次证明任何叛徒、汉奸卖国贼，职位越高，名声越大，就垮得越快，垮得越惨。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林彪就是在这历史的审判台前，宣判了死刑——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的。

#### （一）

林彪是不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和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

中央通知指出了林彪历史上几个大错误“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曾写长信教育他；遵义会议后带头攻击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解放初期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乱军主张等，这就足以说明林彪并不是一贯正确和完全正确的了。除中央已指出的外，就我所知道的揭发于下：

一、南昌起义失败后到湖南起义途中企图逃跑。

南昌起义失败后，林彪所在的二十五师由三河坝向湘南转移，林彪曾企图逃跑。这是一九二九年夏林彪无意中漏出来的。那时在闽西，有次我和支队党代表高静山（早已去世）到纵队司令部，见到林彪。我们谈到陈毅同志（时陈已由第一纵队党代表调军政治部主任），林对陈有牢骚，气愤的说：陈毅这个人非常专横，爱骂人，我们前年从三河坝退下来，就想跑的，但怕抓住枪毙云云。

二、我军一九二八年秋去湘南回井冈山后，有一天耿凯（长征前牺牲）同我说：“林营长在郴州发了笔洋财，打开郴州，×××（忘记他说的什么人了——肖注）搞到五筒光洋，两百五十块，七个金戒指，正碰上他，就被他拿去了……”我说没有归公？耿说：“归什么公！”这件事在一九二九年得到证明。有一次我们谈到大庾县打败仗，林无意说出，从大庾撤退，挑夫丢了他的箱子，里面有一百多块钱，七个金戒指都丢了。我以前听耿凯讲过他发洋财的事，他讲的钱数虽然不对（隔了半年用了些），但七个戒指是对的。耿凯的话就证实了。林彪在郴州大发洋财，是在毛主席宣布三大纪律三个月之后。耿凯和我都有同感：你并不那么老实呵！

三、林彪的右倾观点，在红四军下井冈山前就开始了。部队各级党委讨论下井冈山的时候，林彪多次讲：“现在边界很困难，只有红米南瓜是不行的，一定要打出去，不然，就没有办法维持”。他在白露的大会上也这样讲过。林的思想 and 毛主席是对立的，毛主席是为了到赣南广大地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林是从“没有办法维持”和不同意吃红米南瓜的右倾思想出发的。这和当时有人说“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观点差不多——词句不同而已。下山之后，林还是悲观失望，甚至反对毛主席在一定时期内夺取江西的方针。

四、林彪的军阀主义。在井冈山和粤、闽、赣边游击的时候，他很强调军官职权，对政治机关、政治干部是不重视的。一九二八年冬初毛主席、前委派何挺颖为二十八团党代表、团委书记。这时林在后方休息，不久回队，召开军官会议，林不同何商量，也不安排何在会议中的议程，也不向大家介绍（何来不久，没有同全体干部见过面），而由他个人主持讲话，让何坐冷板凳——和我们一般干部坐在下面听训。林讲得长，讲完就散会，林对何的态度，我们有些不满，会后就议论过。何挺颖善于工作，来了不久，二十八团干部对他有好印象，但林对他平淡，



或者说不大顺眼，大庾之战，何受重伤没有派人抬，夜间从马上跌下，被马踩死。何之死，和林平常对他的态度很有关系。三十一团的同志知道后很气愤，有人说：何党代表如果在三十一团，就死不了（何原为三十一团党代表）！

林彪既强调军官职权，也就片面的强调行政权力，特别欣赏“层层节制”这句话，并解释说：营长就是管好四个连长，连长就是管好三个排长……。他不接近士兵和下级干部，从来不和下级漫谈，说句笑话。他说“带兵要严，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一九二九年夏在闽西之虎冈，纵队司令部勤务员某（湖南宜章人，我在宜章农民团当连长时的士兵），拿了老百姓一点什么东西，林叫来问了几句，立即拔手抢打死。那年十二月在古田，第一支队部有个炊事员偷了老百姓一双鞋，查获后该支队支队长王良、政委李赐凡向林面报，林立即指示要执行纪律，由支队枪毙了。一九三〇年夏由汀州出发打南昌、长沙，我用旧军队观点向他建议，说我纵队是闽西来的新兵，要实行连坐法，提高战斗力，他说你做做看，我就在三纵队实行。由于我军有党的领导和士兵多数是得到土地革命利益的农民，有阶级觉悟，经打长沙和吉安诸役，战斗力很快提高。他错误的认为是连坐法效果好，第一次反“围剿”就在红四军推行，并美其名为“革命的连坐法”。一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战斗力普遍有显著提高（其他部队并没有实行连坐法），才不讲了。

五、一九四五年夏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当批评彭德怀在临汾召开的华北局及八路军军委分会传达中央的十二月会议错误时，林说他当时对会议中强调运动战的倾向是不同意的，我回忆林当时并没有这个主张，休息时就询问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都说无此印象。过了两天，有人拿出会议的个人记录来，林同样是同意十二月会议，同样是强调了运动战。林彪见到记录，不老实承认，作怀疑状，但也无法辩解，我们很不高兴。

六、一九四九年夏，长沙和平解放后，国民党以桂军为主还有二三十万军队在湘南及广西布防，毛主席两次来电指示对桂系作战要实行战略大包围，以主力由北向南，主力之一部由黔东南插入广西西北，并令第二野战军陈谢兵团，由广州沿西江入桂配合，这本是战胜最阴险狡猾的军阀白崇禧而战术上也较灵活的桂军的最正确的战略方针。但林彪迟迟不执行。他热衷于在湘南从战术上抓敌人，队伍在热天多方机动，才在衡宝线上抓住敌人三个师一个团。虽然消灭了这个敌人，

但敌人主力退到广西，以后找不到从战术上抓敌人的任何机会了，又停了一个时期，林彪才死心，才执行毛主席战略大包围的方针。以三十八和三十九军由黔东南翻过大图山入广西西北部，陈谢兵团沿西江入广西，五个军由湘南入广西，形成战略大包围。白崇禧三面受敌，战略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步调乱了，只五十天，对桂系作战就基本上结束了。我认为林彪对毛主席的湘桂作战的指导方针是没有执行的，至少是大打折扣的。

七、衡宝战役将结束，关于敌军兵力有两个不同的情报，一个是第七军三个师及四十六军之三十八师，一个是第七军全部及三十八师一个团，战斗刚结束，还弄不清楚，林立即上报消灭敌四个师一个军部。后桂军沿湘桂边布防，发现三十八师在全县附近。我曾向林说过，他说不可靠，竟不更正，我不好再说了。我认为大规模的战争，多消灭一个师，少消灭一个师，无关大局，但为什么要作夸大的报告呢？我感到林彪在战果未明之前则要功，既明之后又要面子，这是很不老实。前述诸问题，时间长了，同时林彪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也就不注意或慢慢忘了，直到林彪问题传达后，才慢慢回忆起来。

## （二）

林彪对自己的错误，从来是采取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态度，我同他几次工作，也和他多次一起开会，从没有看到他作过自我批评，也不准别人批评，别人批评就打击报复。土地革命初期，谢唯俊（到陕北牺牲）对他提过意见，林两次在纵队委员会借谢不戴帽子斥之为不讲军风纪，谢那时在第一纵队当政治部主任，林常为难他，他感到不好处，此事当时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一九三〇年夏派到上海中央联络，被捕，脱离关系，解放后才回来）曾问过我。又如一九五〇年邓子恢同志由京回汉口，在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中央意见，认为中南局在一九四九年夏提出中南地区中心工作应放在乡村的口号是错误的，我发表了同意中央的意见，林不说中央不对，而说我是错误的，是否定一切。会开了几天，没有明确结论就结束了。从此，林彪对我很不满。有人说一九五〇年我调军委，是林不满意的结果，不知确否。但林在一九五一年冬以不满的态度同我说，我在中南局的发言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我感到党员在会议中提意见甚至是错误的意见

也是许可的，而林就是不行。这都是打击报复（汉口这件事，我思想上长期没有解决，直到六九年秋才作了检查——见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中旬报中央的《历史思想总结之八——在四野工作中的问题》，是否正确，当再考虑）。土地革命时期向他提意见是不容易的，更不用说批评了。会议时摆出一付主宰者的面孔，令人不安，甚至害怕。他对错误不作自我批评，又不让别人批评，这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权威思想，极端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以后在主席长期耐心的教育下，有所改进，但在社会主义革命最后消灭剥削制度和清除一切旧东西的时候，潜伏着的东西又发作了，并恶性发展了——堕落到要篡党篡军，用黑帮特务手段谋害毛主席，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发动反革命的内战，一直去当汉奸卖国贼。不了解他历史情况的，固然会大吃一惊，就是基本了解他或了解他若干情况的，也不能不吃惊。因为在十次大的路线斗争中，林彪是个假话说尽，坏事做绝，是最阴险、最狡猾、最毒辣的——我也送给他几个最字吧！

### （三）

林彪长期以来，以一贯正确、完全正确自居，大造舆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无孔不入。在江西时期，他自吹是最没有封建思想的人。七大时冀察晋代表团有人说他一贯正确，我们有些人虽然知道他在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遵义会议后在渡金沙江及会理会议时期带头反对毛主席等，但没有人讲。七大后在延安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林彪批评彭德怀，但不涉及彭在会理会议时期的错误，也就是为了隐蔽自己这个错误。而在另一场合，却说自己在临汾会议是正确的。尔后直到主持军委工作，尤其文化大革命后，地位更高，名声更大，他还和以前一样，不作自我批评，当然也不准别人批评。加以有些趋炎附势之徒的吹嘘捧场，于是“一贯正确”、“完全正确”、“最”……的美名，就在全党全军全国完全合法了，写文章、讲话不按这个框子是不行的，并在全国作了大量宣传，一般干部、党员，群众，只知道他的好处和吹捧骗人的部分，根本不知道他的错误和伪造的历史。去年十、十一月我参加江西省老干部学习班，经南昌、吉安、井冈山，又到宁冈，永新、萍乡、安源、韶山、文家市、高安等地，各地展览馆和宣传材料，有许多是宣传林彪的，而且口径都差不多或一样，内容有不少是伪

造、吹嘘、骗人的。诸如：把林彪列入南昌起义第二号领导人；林彪率领南昌起义剩余部队到井冈山与毛主席会师；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会师，是林彪首先和毛主席见面的；一九二八年七溪岭之战，林彪召集战地会议，提出三猛战术，消灭杨池生师；一九二八年八月林彪率一营在桂东消灭进攻之敌（我们打得英勇，却是一个败仗）；在井冈山挑谷上山并找到了他的休息地点，其实他没有参加。一个团长身体不大好没有参加，是无可非议的，但不能作假。诸如此类，我只在浏览一下后记到的一点点。至于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宣传，有些更是笑话，如说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召开军事会议，林彪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斯大林听了林的方案。小学一至十册都有林彪的语录、文章，有些地方还征询林彪的住地、住房及室内陈设，大概准备和毛主席并列。

收集编造前述材料的人，大多数是好人，尤其年轻人，不知道林的黑暗面，形而上学看问题。《林副主席指示》的编者的话，仅末尾一小段，就用了二十个“最”字。只要看到好的，辗转传抄，人云亦云，不加调查，不加分析。也有些人是甘心抬轿子、当吹鼓手，甚至有野心想向上爬的，这两种人必须区别。

林彪虽已败亡，但多年来造舆论很深很广，超过十次错误路线的任何一个头子。又利用中央、毛主席给他的职权，大搞宗派，并成立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妄图控制全党全军。林在北京方面的死党，虽已一网打尽，但百足之虫，虽死不僵。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人民，特别是干部，他的毒放到那里，就要消到那里。建议把他那些伪造、吹嘘及夸大的材料，整理公之于众，彻底肃清他的影响。

时间久了，手头没有一点文字材料，只凭个人记忆，有些细节，可能不够准，谨供参考。

这材料请送毛主席审阅。

肖克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于

农林部永修五七干校

曾山同志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一、一九二九年，林彪是一个对革命没有胜利信心的悲观论者。毛主席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光辉著作，就是毛主席写给林彪的一封信，批评了他的错误思想。在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上集中，曾刊印过这封信，后来被人在此书上有意抽掉了，但书上还留有痕迹。

二、叛徒卖国贼林彪打仗时不听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三〇年十月初，我军攻打吉安城时，黄公略同志向我说，总前委作了决定，毛主席指示攻打吉安城，命令红三军从城西南进攻，红四军从城西北进攻，等候两军到齐，同时进攻。但是，林彪违抗毛主席的命令，不等红三军到，即指挥红四军攻城。结果，打了一天多，伤亡不小，攻城没有奏效。幸而守城的狡猾敌人夜晚向赣江逃跑了，但反动派的武器弹药我们无所获。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第六节中指出：“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实行开进和攻击，幸而敌人（邓英师）自己逃走了，我们的攻击本身并没有奏效。”这就是批评林彪的。

三、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毛主席决定我部主要打正在撤退逃跑的敌军尾部，以迫使敌军快退出苏区，这样有利于苏区的恢复工作。可是，林彪却指挥红四军向高兴圩敌人发起攻击，打得相持不下。当时，毛主席到了前线，林彪才向主席说，原来以为打的是逃跑敌军的尾部，现在证明是蒋蔡主力。部队已伤亡近三千人。这说明林彪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当即命令退出战斗，部队转移到东古附近，在白沙岭打了一仗，把韩德勤一个师全部歼灭，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邓子恢同志揭发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一、据我所知，“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就是林彪这个大叛徒提出的。我到中央之后（五三年或五四年），我记得毛选上还刊有林彪的这封信。后林彪曾写信给毛主席，要求把他这封信撤销。

二、反对抗美援朝。大概是五一年，我到中央开会，去见他，他就对我讲，我看现在不要出国作战，因为我们的国家刚刚初定，国内还有些残余匪徒没有肃清，

这个时候要顾内、又要顾外，对我们是不利的。我看还是等敌人打到鸭绿江边，那时候我们以自卫的形式抗战，在政治上比较有利。后来，毛主席否定了他这个错误意见。

三、他对高岗非常赏识。一九四九至一九五〇年在汉口我同他同事近一年，他经常同我讲，高岗怎么了不起。到中央后，很多事情他袒护高岗。我记得五四年初，高饶事件爆发，我去见毛主席，陈云同志也在座，毛主席对陈云同志说，你去告诉林彪（林那时在西湖），要他对高岗再不要袒护，否则我们同他就要分裂了。

四、一九五〇年或一九五一年时，我任中南局第三书记兼四野第三政委，陶铸是四野政治部副主任，陶去广西视察工作，发来电报说张云逸同志在广西剿匪不力。当时我们没有回电，但过几天后，中央来个命令，把张云逸同志调开，指定陶铸兼广西省委书记。那时林彪已到中央军委，此事估计是他的主张。他不向中南局，也不向我征求意见，就把张云逸同志调开了。

五、我在一九五一年以中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出布告宣布四大自由，即买卖自由，借贷自由、租佃自由，房屋租赁自由，犯了路线错误。而林彪于一九五〇年初，在武汉召见工商界首领时，就对那些资本家讲四大自由。

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叶群在中南组讨论设国家主席问题时造谣说，中央政治局意见，应该设国家主席。现在才知道，这是林彪搞的鬼。

蔡畅同志提出的林、叶二贼有里通外国嫌疑的几个线索

一九七二年五月十六日

一、一九三九年，林贼和张梅同去苏联治病，住在莫斯科近郊。当时同我们住在一个院内，但没有什么接触，只有散步时碰到。我们于一九四〇年回国，林贼回来比我们晚。一九六六年，我在三〇一医院治病，遇到钟赤兵同志，钟告我，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发生后，林贼和刘亚楼，芦东生，钟赤兵、杨志成、谭家述等人编到军事学习班学习，后又编到苏军里去。那时，苏军注意林彪了，并找林谈了几次话。这是林贼和苏方有联系的一个线索。详情可问钟赤兵和谭家述。

二，一九四七年，我去东北哈尔滨，因东北局没有房子，叶贼说可以住到她家去。那时，我在她家住了一、两个星期，见到叶贼拼命学俄文。当时，苏联派了一个

长期做特务工作的马里洛夫斯基在哈尔滨领事馆。我怀疑此人通过高岗的翻译卢竞如（吴克坚的老婆）与林贼有联系。

三、叶贼在延安女大学习（或当干部处长）的时候，同叛徒王明和孟庆树的关系特别好，来往很密切。王明许愿叶贼等将来当中央委员，叶贼称王明、孟庆树为慈父、慈母。这也是林、叶二贼里通外国的一个重要线索。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印发）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续一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批林整风会议文件：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速记草稿，未经本人审阅）

我们这次会议人数是三百一十二人，比去年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九十九人扩大了。鉴于去年那个会议的人数比较少了一些，因此传达也就不很广。地方还好，中央的比如军事系统，中央文件发了六十多份，可是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就扣住了，只发了七份。所以当时批陈整风的传达，在军事系统，军委直属的，就非常窄狭。去年七月被主席发现了，说要继续跟各地方打招呼。犯错误就是要自己引以为戒，就要逢人便讲嘛，这才能够自己得到教训，得到警惕，人家可以监督，人家也可以引以为训嘛。这是主席对于历来犯路线错误的教导嘛。但是，当时黄永胜他们就不是这个态度。

这一次我们这个会议的名字改成批林整风了。九后二中全会以后，主席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教育一批干部，还要保林，使他自己知道那个错误的严重，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也是如此。《我的一点意见》，把打击的矛头对准了陈伯达这个骗子，

由于主席的教导使相信他的人、上当的人觉悟了，警惕起来了。使跟他搞阴谋的人就不要搞了嘛。所以，从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九月十三日事件以前，一直提的是批陈整风。整个精神，从文件上你们可以看出，也是如此。但九月十三把这个问题真相揭穿了，头子就是林彪，而不是林、陈，不象高饶联盟那样。林彪搞的是阴谋活动，他反党、反主席的思想是长期存在的。刘少奇以后就是他挂帅来反对主席了。他是搞阴谋的，但是阴谋逐步要暴露，最后灭亡。这次第十次路线斗争，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所以，这次开的会议就定名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也不要再说林陈反党集团了，就是林彪反党集团。

这场斗争，从二中全会以来分成两个段落，是贯串主席一条红线来指导这个运动的。因此人数我们就提议扩大，主席批准了。

这一次批林整风会议，首先要学文件。文件相当多，要把它归一下类。政治局原来讨论了，昨天又请示了主席，刚才政治局又开会讨论，大概初步定为这样的一些文件，正式的会议文件，有六种。

文件之一，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和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的文章、批示和重要谈话》，一共十二件。《我的一点意见》，主席和斯诺的谈话，以及主席去年八、九月巡视南方各地，跟各地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这三个是全文，其他是批件。比如说主席对中联部关于跟荷兰党内的人谈话的批示；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对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的批示；对华北会议的批示；对去年计划会议的批示等等，这些都可以在会议文件之二本里找到。这个只印批示，不印原来的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去查就行了。但是为的要贯串起来学习主席思想，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主席如何教育大家，对林彪这些人如何教育，都可以从文件之一中看出来。

文件之二，就是刚才说的，从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有主席批示的、中央发的有关文件都印在一起了。这里头有的是要查的了，比如刚才说的主席的八个批示，从文件之二里头就可以找到报告的原文。同时，也有跟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联系起来学的，如材料之一，材料之二，在那个大本子里也有。从九届二中全会到九月十三日编为第一本；九月十三日以后到现在编为第二本，分为两个段落。



另外有一个单页电报，是批评新疆关于新疆日报擅自登出林彪大福照片等严重错误的。这样性质的错误，不仅新疆有，浙江也有，比如这回安徽报告上检查也有。恐怕别的省这回讨论，你们回去自己检查也可能有。在去年九月十三日以后，我们只说以前已经发表过的文章，有林彪的话就不要勾掉了。但是还继续登林彪的照片，还不断地引林彪的语录，一直到十月、十一月，吹捧林彪的话在报告上还有，这就是错误的了。因为有这种情况，所以把这件也印出来，大家再看一看。这都是发过了的，但是不见得到会同志都看过。这是文件之二。

文件之三，这是这回学习的重点之一，就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原来已经发了材料之一、材料之二；现在发材料之三。这个作为送审稿，还不作最后稿。主席在上面批了：“同意印发，征求意见。”就是到会的三百一十二位同志都可以直接提意见，同时也可以拿这些材料深入地批判，深入地揭发。如果在批判和揭发当中，还有新的、好的材料，更有分量的材料，还可以补充进来。会后我们再进一步修改，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各地去，层层下达。

文件之四，就是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罪行的审查报告以及陈伯达反革命历史的罪证。这个里头，也比过去的东西多了一些。就是他的国民党老反共分子证据确凿，托派证据确凿，被捕叛变自首成了特务，这也是证据确凿。他整个思想是从国民党右派一直到托派、修正主义分子。主席昨天还说了一件事，就是文字上我们应该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他说这个形容词，修正主义还有革命修正主义吗？当然只指反革命了，你要写反革命修正主义，好象对立面还有革命修正主义了，说笑话的。那么文字上应该是反革命的，就是他这个性质是反革命又是修正主义，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中国这个文字修辞若不都么严格，常言可以引起误解，主席昨天举了这个例子。

当然，现在大家主要的火力是对付林彪反党集团了，但是陈伯达也是主要成员，大家有什么知道的事情，或者跟他共事的时候知道一些什么事，还可以揭发，还可以批判嘛，这样来充实这个部分。因为陈伯达里通外国的材料还不完全，如果还有更有分量的材料就更好，这个我们还在继续审查。

至于材料之三那个前言，主席昨天也说了，“继续审查”那句话可以不写。主席说，大的罪状已经足够了，再多就是补充就是了。这个文件现在都已经印了，主席批评的意见，我们把它说出来，大家知道就是了。当然，也不是说没有材料了，不审查了，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再揭发也就是这类性质的问题了，还有比这个更凶的吗？要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个谋害罪状千真万确的证据，那么多嘛，人人愤慨的嘛。这个性质是不变的了，顶多就是补充材料，不是继续审查的问题，而是揭发的问题。我们的措辞上是有点毛病。这好在是征求意见了，大家有更尖锐的意见，还可以提给我们，我们是欢迎的。因为专案组抓这个工作越看多了，有时候明摆着措辞不当，有时就疏忽过去了。

现在确定的文件之五，是最重要的一篇，就是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这个信只有政治局一部分同志看过，在座的你们各省市的，还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没看过。就是在“九·一三”以后，今年印的吧？这封信是什么时候写的呢？就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林彪在河北厅讲话以后，林彪讲话经过多次改动，送到主席那里，主席总是有点不安，里头有些话过头，叙述政变那种写法也不当。但是当时是为的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鼓革命群众之气，要打击、扫除那种修正主义的风，所以说话有些过。但是当时的中央修改以后，还是请主席批。主席觉得不批，这篇东西不能发表，不是等于给群众泼冷水了吗？因为大家希望看到这篇东西嘛。实际上这里头有毛病，有些极“左”的话，有些不恰当的。现在大家回想回想恐怕就会看出来。林彪那篇东西是不是可以作为参阅文件印给大家？刚才政治局会议没有讨论，再看一看。毛主席这封信一针见血。主席写这封信是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武汉写的，我是七月十一日到武汉。那时见了个外宾，我跟主席报告我到国外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以后，主席要我留一天。第二天上午见主席，主席就把给江青同志的那封信的抄件给我看。是一个底子，那个字是徐业夫同志抄的，有些字还抄错，主席还改了的。那个信可写的深刻，现在大家想想看，那简直是完全看到了这些问题。当然了，当时不是说林彪这个人了，也可能想着利用右派来搞。那封信指林彪那些极“左”的话，这个极“左”，就形“左”实右，就落在林彪身上，是个右派。主席说七、八年后，结果六年就出现这个事了。只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预见到这么清楚。这封信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大家可以看一看。当然了，那封信可能有些事情

大家不大懂的了，将来我们参加政治局的作日常工作的九个同志分到各组里，还可以加以解释。这个大概明天可以印给大家。非常深刻的一封信。前天，我们政治局决定要请示主席，我昨天去请示主席，原来主席还说等一等，昨天一请示说可以。这个我们当然先印给到会同志看了，先不外传了。这是会议文件之五。以上这些文件现在有的已经发了，有的明天要印发。

我们的会议除正式文件外，还有参阅的文件，我们也是不多选，选那些重要的。参阅文件之一，就是军委办公会议收集的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军事路线的罪行，有两本，我们现在选他第一本。就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一直到解放战争，也挂了一点抗美援朝。重点是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有人把他说成好象是了不起的。现在陈毅同志故去了，他生前揭发了一件事，这个文件上面也选了。就是说，从三河坝离开，朱德同志拍胸脯，要大家跟他走。因为他是在旧军队呆过，懂得怎么样能够避开敌人，还能把自己的革命同志团结在一起，来继续打仗。三河坝的时候，林彪仅仅是个连长吧？（聂荣臻同志：连长）连长。他也离开队伍。当时离队之风那就是很盛了。比如那个时候师长周士第就离队了，还有李硕新也离队。李硕新后来做白区工作牺牲了。林彪也带着钱，带着枪离队，走不出去了，才折回来。上井冈山，他仅仅是一个营长吧？（朱德同志：连长。）还是连长。那怎么能把朱、毛会师说成了毛主席跟林彪会师呢？这是歪曲历史嘛。井冈山被林彪去逛了一下子，程世清同志他们就这样子写，这是错的。所以，从军事路线的斗争上看出，林彪的“左”倾路线是一系列的。我也犯了“左”倾路线错误，那应该承认嘛，检讨自己嘛。那么林彪一点份没有吗？就那么正确吗？现在把他《论短促突击》印出来给大家看，他那篇文章最后一段是支持李德的，这也是关键性的文件了。长征的时候，在遵义会议上，他并没有发言。遵义会议以后，他不断地反对主席。给他的命令，他就反抗回去，不执行。到会理会议就更厉害了。军事科学院编写的那个军事文件上，对会理会议这部分，语言不详细，只有一两句。会理会议，他反对毛主席，要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我都下野，他推彭德怀挂帅。这一段，文件上没说几句。剑英同志，恐怕那要请你补充几句。主席现在在看，他对这个有兴趣，我们还可以补充几句。因为那一段会理会议只有几行，这是大事情。这个事情，荣臻同志也清楚。红军不少干部知道会理会议这个事情，但是不晓得内容。（聂荣臻同志：没

有传达。)没有传达,照顾了当时那个困难的环境,应该这样子。他到张国焘那里,他也动摇;到陕北,他两次写信给主席要到陕南打游击;东渡黄河,他也动摇。大相寺会议,批一军团的本位主义,批判了聂荣臻同志,他也有份嘛,他一句话不吭。一直到抗日战争的平型关战斗等等。他后期在苏联,回来崇拜国民党。现在还查出来,他就在莫斯科的时候,大概是共产国际动员他写了一篇文章,大捧蒋介石、陈诚,还把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的话引了一段,但是只字没提毛主席。这是在一九四〇年七月写的,我们都回来了,我们是三,四月回来的。就是说,他的一些文章不亚于王明。他回来以后,解放战争,主席昨天说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他大概觉得他占了一个半。今天剑英同志说,恐怕他不止只认为一个半,是两个。因为主席说,辽沈战役是他指挥的了,平津战役有晋察冀;有华北的部队了,他算一半吧,所以一个半。实际上这一个半战役,主席说,最麻烦就是他了,不断地跟他商量,不同意又改,改了还不同意。总是主席的命令下去,三番五次地商量他才同意,有时硬不执行,几乎让东北的敌人跑掉,几乎让平津的敌人跑掉一部分。这个大家看文件就晓得。所以这本东西主席要去看,看了以后我们再印。

参阅文件之二就是在学习批林整风的一些文件时,在京的中央委员的一些老同志,有九位同志写了书面意见,我们也把它印出来了。老同志中有朱德同志、陈毅同志、富春同志,聂荣臻同志、还有曾山同志、邓子恢同志(邓子恢同志现在病着,请假)等一共九篇。此外,还有一些老同志,如果还有揭发材料,我们还可以续印。

参阅文件之三,就是李力群同志对林彪罪行的揭发。……

参阅文件之四,就是刚说的《论短促突击》这篇全文找到了。这个事情也说明,尽管林彪死党那么精,到处都控制,就在军事博物馆的军事文献里,就有林彪的《论短促突击》。我看军博的那个管事的人大概也没去看,被我们耿飚同志派人去发现了,抄给我,是全文。军博已经被军委办事组黄永胜、吴法宪控制了嘛,他应该去过过目嘛,他也顾不了这么多。所以,做坏事的人,心测不轨的人,怎么掩盖也掩盖不了的。国家这么大,能盖得住?现在就证明了,就从军事博物馆抄来的,是吧,耿飚同志,没错吧?(耿飚同志:没错。)他最后一段就是引用华夫的文章。华夫是谁呢?就是四中全会“左”倾机会主义王明路线统治的时

期，当时，共产国际派来一个军事顾问，这个人是个德国人，中国名字叫李德。这个人的军事思想完全是不对头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克劳塞维茨军事思想，也不是那样的，他就是拼了，分兵把口。那个时期有个杂志，叫《革命与战争》，林彪写了一篇文章登在那个杂志上，他特别称赞支持李德的观点。所以，他也有份的。彭德怀有份。当时李德很欣赏第三军团的两个头子，先欣赏彭德怀，后欣赏林彪，这不是偶然的。当然了，我们当时也是犯错误了。林彪也不是正确的，他同样也是犯错误。你犯错误就得承认，这个事，他从来没有自我批评过。

参阅文件之五，是中央联络部搞的，就是中苏关系里头有十一个问题，它不是编年的，是按问题的性质分的。这个文件里头是讲些事实了，说明中苏关系是怎么造成的，都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搞我们的了，从海军基地、两国联合舰队这些引起的了。也作参阅文件。

今天政治局讨论，打算在会议文件里加一个之六。就是在二年半之中，前年九届二中全会到去年批陈整风，吴法宪、叶群先作了检讨，这个检讨都是前年写的，吴法宪检讨是九月二十九，叶群检讨是十月十二，这个检讨当然不深刻，但是先给主席看了，主席批得很尖锐。这两个批件很值得学习。所以，我们打算把他们这两个检讨印出来，印小一点，把主席批示印大一点，使大家可以学习。主席是批得很尖锐，但是总是教育他们，希望他们改。

然后就是去年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的时候，黄、吴、叶、李、邱五大将的检讨了，那个检讨他们都是对了口径的。我们有时候帮他改，说那些东西应该说的更深刻一点，因为他给我们看过嘛。主席还是启发他们，先得到的是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主席还提议帮他们加一段，说，你们如果同意，你们把这段加进去。后来就是吴法宪、叶群的，主席也批了，这些在批陈整风会议上是发给大家的，我们这回打算跟前面两个批件摆在一起也把它再印出来。他们的检讨现在看许多是假话了，但是主席根据他们的书面的话，还是尖锐的批了，还寄予希望，要他们改的，我们可以对照来学。我们今天商量这作为文件之六，大概这个报告主席，主席会同意的，因为这样更有利嘛。

从前年庐山会议起，到去年“九·一三”，把这一段主席的这些文件汇集起来，这样就更看得完全一些了。所以我们这样学习就会更深入。这一次是我们党内第十次的路线斗争，也是最尖锐、最严重、最复杂的一次阶级斗争。

注：这是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批林整风会议文件。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五日，江青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

江青同志于五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会议上，与华东组、中南组的同志一起学习《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并作了三次发言。现将江青同志的这三次发言，综合整理如下：

毛主席的这封信，我有这样的看法，和同志们交换意见，共同学习。只是我个人的领会，不一定那么深，不一定那么准确。

一九六六年，中央在杭州开四月会议，当时我在上海，不知道会议情况。五月初，中央在北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我还在上海，也不知道会议情况。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收到了主席给我的信，当我读到：“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虽然不知道主席指的是谁，但是我感觉到事关重大；心情沉重。当时和现在，我始终认为，这封信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是写给全党、全国人民的。信中讲了世界革命问题，所以，也是写给全世界人民的。不过在当时，主席不好写给别人，只能写给象我这样的人。

听说主席写了这封信后，要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亲笔修改。在主席那里（即白云黄鹤之处）首先看到这封信的抄件的，是总理、王任重。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提出他去大连说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总理劝告林彪不要再作那种提法，据说当时林彪表面上是答应了。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现在事实证明，他实际上是耍了两面派。最近查了一下过去的批件，主席把林彪这个讲话，一直压到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几号才批发。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十五年后才发表。毛主席的这封信，在六年后同志们就看到了。我们现在能看到这封信，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的毛主席健在，我们的党非常好，是团结的。

毛主席的著作，我没有全部读完，而且读的不好，时常是读一次领会一点。主席写的这封信共两千字左右，我觉得是我读过的短篇中很少见的重要著作。信的文

字结构严谨，一气呵成，非常幽默，很有层次，通篇是说理，绝无剑拔弩张之处。这封信使人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感到意义深远，涉及中国、外国、政治、历史、哲学，高度概括了国内外阶级斗争必然的发展规律，总结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宝贵经验，贯串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宝库里的光辉文献，对于指导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直至建设共产主义，都有着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对于社会主义，我们经过实践是比较清楚的。我坐在飞机上看到社会主义祖国的锦绣山河，心情是非常激动的。但是，对于共产主义，我没有看到。不过，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到了共产主义，还存在着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所以说，这封信的根本思想，对共产主义也还是适用的。

从林彪叛党叛国以后揭发的大量事实来看，林彪是历来反对毛主席的。我们这儿的老同志们是否知道林彪的底细呢？我就不知道。可能有的老同志知道，但顾全大局，不说。毛主席是深知其人的，但是在同志们面前，在我面前，从来没有讲过。毛主席背后很少说人家的坏话，总是说人家的功劳。我是在同林彪的接触中，并同他进行斗争中，逐步地了解林彪并非一贯正确，更不是象黄永胜、李作鹏他们“颂扬”的那个样子。这几年来，他采取种种阴险毒辣的手段，想把我干掉，更加深了我对林彪这伙的认识。毛主席在写这封信时，已经看出林彪不讲马列主义，不讲阶级，不讲党的领导，不讲人民群众，专讲个人，讲宫廷政变，看出了林彪在思想上、理论上不是一个马列主义者。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说，主席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看穿了林彪搞的全部阴谋诡计，那怎么解释“九大”呢？直到林彪叛党叛国之前，主席和你们谈话时，还是要保林嘛，这怎么解释呢？毛主席对他一直是采取了团结、教育、保护的方针，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这说明毛主席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伟大气魄。林彪干坏事，有一个暴露的过程，我们对他也会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主席是很尊重历史的。《我的一点意见》原件上有：找到林彪的几条，如获至宝。原件上陈伯达的名字后面也没有“同志”两个字。原件是我们回到北京后，我向主席做了请求，主席批准之后，才看到的。林彪叛党叛国事件发生后，中央印发这个文件时，我们想恢复原件那样子，主席不同意，说这是历史，不要再恢复原件了。

林彪把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奉为钟馗，名义是打鬼，实际是为着实现他的个人野心。毛主席的信中说：“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这段话，我个人现在看，是活龙活现地揭露了林彪的反动面目。林贼从当抗大校长到当国防部长，拉山头，结死党，“打着 B——52 旗号，打击 D——52 力量”，这不是同蒋介石如出一辙吗？

在国际上，苏联的党变修了。这同南斯拉夫不一样，因为苏联是个大国，是列宁的故乡。它的变修，影响是大的。现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要知道苏修是怎么整我们的，可以看会议发的参阅文件之五。

毛主席虽然看到了国际国内这些阴暗面，但对革命的前途，充满着革命胜利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有人问，虎气和猴气怎么理解？我是这样理解，虎气和猴气是对立的统一，主席讲虎气为主，这就是说不能搞折衷主义。

毛主席解剖了自己，也解剖了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毛主席说：“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不到六年，林贼一伙就自己跳出来。现在全国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林彪反党集团进行着斗争。斗争并不是就此完结了，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七、八年横扫一次牛鬼蛇神，以后还要搞好多次。我们决不能搞阶级斗争熄灭论。

国内外阶级敌人，企图通过混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们的阴谋是决不会得逞的。毛主席说：“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政变，迅速地被粉碎了，这一事实，证明主席这段话是多么英明的预见啊！我们要很好学习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决不能让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这次学习有点象延安整风，延安整风是最大的学习。我在延安整风学习的过程中，不仅学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开始学到了认识自己的困难性和重要性。主席不知给我说了多少次，要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我自



己并不比同志们高明多少，主要是有毛主席这样的严师，不然尾巴也可能翘到天上去了。如“天才”、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在庐山会议上，我能坚持原则，是因为主席讲过多次，我对主席的指示是坚信不疑。因为我和主席共同生活，一起工作，已经几十年了，看到主席是说了就算数的。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信不疑，要坚决贯彻执行。

江青同志对《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中的典故作了解释：

“武林”，指杭州。

“西方的一个山洞”，指湖南省韶山的滴水洞。

“白云黄鹤”，是指武昌。唐朝诗人崔颢曾写过一首黄鹤楼的诗，其中两句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阮籍是晋朝“竹林七贤”之一，晋书上说，他有“济世之志”，能诗善文，为人放荡无羁，非常傲慢。魏晋之交，乃是乱世，有识之士，多难自保，他却常以醉酒的办法，在政治上避开一些难处的事件，保全了自己。但是，他又能在酒醉的时间，为司马昭加九锡书写了《劝进辞》。他曾登广武山（在河南荥阳东北），看楚汉相争时刘邦和项羽打仗的地方，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成皋，即现在河南省荥阳县的泛水镇。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这是主席青年时代写的一首长诗中的两句，可惜那首长诗现在找不到了。对这两句诗，主席曾作过解释，我记得有这样两个典故：一是说，在民国初期有个人叫因是子（蒋维乔），他写了一本书，叫《废止朝食论》，说每天吃两顿饭，这样能活得长久一些。二是《庄子·逍遥游》一篇中，有一种叫鲲的鱼，化为鸟，其名为大鹏。这大鹏展翅击水，便飞越三千里，扶摇而上高飞九万里。毛主席的这两句诗，表达了主席当时意气风发和革命的凌云壮志。

后汉李固给黄琼的信很长，主席引用了其中一段。《阳春白雪》是一种高雅的曲子，唱起来和的人少；《下里巴人》是一种民歌，唱起来和的人多。重点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两句，意思是，名声很大，而名不副实。这里是指林贼讲了“顶峰”、“一句顶一万句”等不符合马列主义的吹捧话。

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中央印发林彪一九四零年七月在苏联发表的一篇反党文章  
1972. 06. 05；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参阅文件之六

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

林 彪

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为了中国的自由和民族独立，已经进行了三年英勇的卫国战争。

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正义的、进步的战争也具有国际意义。中国人民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欧洲帝国主义战争的扩大。目前，由于战争使日本帝国主义受到了削弱，因此，它也制止了远东和太平洋区域大战的扩大。中国人民的战争加速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并且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面前展示了伟大的前景。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当日本军阀开始在中国作战时，曾指望实现“闪电战和闪电式的胜利”。它们曾经狂叫：“为了征服全中国，只要派出二十万到三十万的部队，二至三个月内问题就可解决。”

中国三年的战争说明了什么呢？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闪电战的计划已经垮台。中国尽管经济落后，尽管政治与军事虚弱，但能联合国内的一切进步力量，不仅坚决抵抗敌人，而且迫使日本接受旨在消耗其经济和人力资源的持久战的战略和战术。

为了夺取中国的首都，日本人用了二、三个月的时间，为了夺取汉口、广州和其它中心城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日本人征服了中国没有？没有！

如果看一看中国的地图，那么，骤然看起来，好象日本占领了大部分国土。但在实际上，在所谓占领区的九百个县中，事实上只有近一百个县在日本人手中，而且包括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在这次战争开始前已侵占的河北省的四十二个县。日本人仅在大城市以及铁路和交通线沿线胡作非为，按中国人的说法，就是仅仅占领了点和线，而其余部分的领土或是完全掌握在中国人的手中；或者是游击队活动的场所，游击队在那里阻止日本人开发和掠夺占领区。

日本司令部被迫年年增加在中国的部队数量，但是日本部队在中国国内的推进速度逐年降低。在战争的第一年，日本人在中国的推进纵深达一千八百公里，在第二年是三百一十公里，而在战争的第三年，尽管他们，不惜一切力量，也只推进

了不超过三百公里。日军在中国的一个严重弱点是部队分散在广阔的战线上，战线总长度超过四千公里，交通线特长。

在战争的第一年，日本曾向中国派出了二十五个师，总人数达六十至七十万人。

目前，日本在中国保持三十三个师，人数超过一百万人。

如果说在战争的第一年，日本人使用了三分之一的在华军队来围剿游击队，那么在战争的第二年 and 第三年，他们就被迫投入了几乎在华日军的一半，对付占领区日益发展的游击运动，主要是对付在华北作战的八路军。

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长何应钦在一次报告中引用的材料，日本人在三年战争中的总损失达到一百六十万人。尽管战役规模减小，但日本人的损失却年年增加。这里需要考虑到日本可动员的人力资源不超过六百万人。中国在战争中的损失约为二百万人，而它的可动员的人力资源是四千到四千五百万人。

中国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不久前宣称，在今年四月三十日前击毁日本飞机八百四十八架，其中二百五十六架飞机由中国飞行员击落，二百五十三架飞机在地面摧毁，而其余的由高射炮击毁。在中国共击毙一千零五十五名日本飞行员，有五十一名飞行员被俘，四十二名飞行员失踪。

日本在华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年年降低。在战争的第一年，日本士兵作战很顽强，通常是不投降的，但在第二年，尤其是在战争的第三年，中国军队的各个部队不止一次地缴了日本兵的械，俘虏他们，还发生了日本士兵携械投奔到中国国民军方面来的情况。

至于傀儡政府目前拥有的总数达五十万人的部队，他们往往一有机会就自动起义反对他们的指挥部，并且携带武器投奔到中国军队方面来。在今年三月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华北每日新闻》上曾写道，投奔到中国军队方面来的伪军不少于十五万人。

这样，同日本统治者的预想相反，日本陷入了同联合成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国人民的大战之中。日本首相近卫文吕于一九三八年秋就被迫承认：“应当抛掉快速和轻易战胜中国的幻想，要准备应付极端的困难，并动员日本民族的一切力量。”

日本陆军部长板垣征四郎将军当时也说：“在中国的战争还将延续十年。”今年五月，前首相米内在东京的警察首脑会议上讲话时也承认：“达到在中国取得最后胜利还非常远。”

日本当权集团尽管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仍被迫改变军事计划，开始寻求战争的出路。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近卫文吕首相才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发表了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和平”宣言，企图使中国政府接受投降的和平。日本人的方针是，“用中国人自己的手征服中国。”

在近卫文吕宣言发表以后，日本对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与政治攻势，虽然，众所周知，它也并没有停止军事行动。但日本人不再采用象战争第一年那样的在所有战线上进行广泛的进攻。

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前线的形势明显地证明，日军的进攻力量在进一步削弱，即使下述事实也可说明这点：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日本人在南线占领了南宁，而在一九四〇年元月，日军的主要部队沿宾阳方向移动，二月二日宾阳被日本人占领。但是，在中国部队的进攻下，日军损失二万人，被迫由宾阳撤退，而中国军队二月十七日就逼近南宁城下了。

在一九四〇年的最近几个月（四月至六月），在华中战场上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日本司令部向那里调去了大的兵团。按照中国军队的军政委员会长官陈诚将军的意见，在湖北和河南省的战斗中，日本人伤亡达五万五千人，中国人缴获二千六百匹马，八十辆坦克和两千辆汽车。陈诚说：“中国部队的成绩证明日本人不能进行大的战役。”

为了“用中国人自己的手征服中国”，日本着手建立傀儡政府。这些努力的结果是建立了汪精卫的“中央政府”。应当说，甚至在日本国内，一些政治集团也不相信汪精卫能够解决摆在他面前的问题。例如，一九三九年秋，著名的日本活动家阿布信行（后来日本政府首相），在他的一次讲演中说：“即使日本同各第三国家的关系得到调整，即使汪精卫能够完全地在中国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中国事变的原则基础仍将不会消除。”日本占领者企图通过培植各种不同的“群众组织”，来为自己的傀儡政府和汪精卫建立群众基础。他们力图在政治、科学、艺术、宗教、道德等方面，用传播亲日观点的方法，来影响中国的舆论。同时，加强了日本代理人在民族统一战线阵营中的破坏活动，力图从内部破坏民族战线。他们组织反对中国爱国人士的破坏活动和恐怖活动。日本为力求使中国投降，利用欧洲战争产生的形势，极力设法使中国与外界完全隔绝。

对中国也展开了经济攻势。日本帝国主义者竭力使自己的“军事企业”即在中国的战争转向独特的经济核算制。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区的经济政策，是要在这里寻找到和动员到尽可能多的战争物质资源和资本。为了实现日本经济“复兴”的计划，日本康采恩需要在当地“寻求到”大量的资本。

采用威胁和许诺取得高额利润的办法，汪精卫企图使中国的资本家与日本的康采恩合作。不久前，日军在华总司令西尾寿造将军曾发布命令，把曾由日本人夺取的部分中国企业交回愿与日本经济合作、准备参加“联合公司”的原主。这里应该指出，某些中国资本家，特别是买办资产阶级中间的某些资本家，立即作出响应，并与日本康采恩合作。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措施的目的是，借助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的敌占区加紧抢劫性的剥削，把战争的全部重担移到中国人民的肩上，并以此实现其“以战养战”的口号。

但是，中国人民愈来愈坚决地、勇敢地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政策，极力反抗掠夺中国的物质资源。在这方面，占领区的工人表现得特别积极，他们往往离开企业到游击队中去。他们违抗一切禁令，组织罢工，使日本帝国主义者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在日本人占领的城市——上海和天津，去年曾举行了一些大的罢工。仅在一九三九年的十二月，在上海就发生了二十次罢工。在上海和天津，召开了工人大会，大会坚决抗议汪精卫的“中央政府”，并且在通过的号召书中号召所有工人不服从新“政府”。

日本占领了中国所有最重要的城市，经济和政治中心，大的港口，主要的铁路、运河和内河干线，并封锁了中国的全部沿海地带。

那么，如何解释不是中国、而是日本要极力设法实现“和平”和尽快停止战争呢？

当然，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是中国人民，它的政府希望取得能够保证国家自由和民族独立的真正的和平。但是，中国人民和它的政府知道，他们不是用投降和平妥协，而是经过顽强的斗争才能够取得这样的和平。他们知道，为此需要持久战，只有这样的战争能够彻底消耗敌人的经济和军事资源，最终把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中国的战争拖延得愈久，日本内部的经济和政治困难就愈加尖锐，它的胜利就愈加变成得不偿失的胜利。

三年的战争强烈地动摇了日本的经济，从战争一开始，日本的军费已用去一百八十八亿五千五百万日元。日本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的军事预算与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二年比较，从四亿五千四百万日元增至七十一亿二千四百万日元即增加十四倍。军费开支占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整个国家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三。战争期间，国债由一百亿日元增至二百四十亿日元，即增加一倍半。

同时，日本的黄金储备消耗殆尽。日本大量需要战略原料（日本由国外输入的铁占总消耗量的百分之七十六，石油占百分之九十二，有色金属占百分之七十，棉花占百分之九十八，羊毛占百分之九十五，橡胶占百分之百，等等），经过三年战争，几乎消耗了战前和战争期间的黄金储备以及从人民中没收来的相当数量的黄金，计二十亿金日元以上。从战争开始到一九三九年底，日本对外贸易的入超达二十一亿六千九百万日元。

日本的战争经费从哪里来？在中国进行战争的经费，目前是依靠发行新的公债、税收和发行货币。货币发行额由一九三七年的十五亿日元增加到一九四〇年初的三十五亿日元。

日本国内公债，一九三七年发行十四亿八千五百万日元，一九三八年为四十三亿五千六百万日元，一九三九年是五十二亿八千万日元，而在一九四〇年为六十亿日元。在一九四〇年中，按人口计算每人平均担负了八十五点六日元公债，同时，纺织工人的年平均工资约二百至二百五十日元，由此清楚地说明，强力推行的公债压在日本人民群众肩上的担子是多么沉重。在战争期间，日本的直接和间接税，从一九三七年的十六亿八千万日元增到一九四〇年的三十九亿一千万日元，仅直接税就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

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增加到空前的程度，日本大多数工人的工作日劳动时间延长到十一至十二小时，四分之一以上的工人每天工作十四小时。

劳动人民由于国家粮食的极端困难，生活状况恶化。特别是感觉到农产品的不足。这是由于农业劳动力的不足，牲畜总头数的急剧减少，农具的不足，耕地面积的减少等等引起的。所有商品，特别是日用品的价格增涨。

所有这一切，引起了反战和革命情绪的高涨。当权阶级用残酷的迫害，试图镇压这种情绪。例如，仅在东京，根据官方的材料，在一九三八年被指控为反战活动而被捕的就达一万三千人。日本军队中的反战情绪也在增涨。在好些情况下，军队中的不满，表现为拒不接受司令部命令，甚至发生士兵骚动。

很清楚，日本的国内情况迫使它要尽快地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当前整个国际形势也迫使日本帝国主义采取这样的政策。日本力图从欧洲战争中得到好处，它不仅力图在中国巩固下来，而且要夺取印度支那，暹罗、印度尼西亚，或者至少要在这些地区站住脚。如果形势有利，甚至在菲律宾、香港和缅甸也这样干。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者想迫使中国投降，使自己尽快解脱在中国的双手。这也较好地说明了日本内阁发生变动（米内辞职，近卫内阁接任）的原因。

中国人民及其政府不顾一切困难，不投降，继续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者。

用什么来说明，装备不好并且由于多年内战而削弱了的中国人民，能够顽强地抗击装备好得多的敌人，并有成效地进行着民族解放战争呢？首先，这是由于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联合成民族统一战线。应当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在被内部矛盾而分裂着的中国，不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那么中国就不可能在三年过程中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

民族统一战线是根据共产党的倡议建立的。早在一九三一年，当日本人占领了满州时，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停止内战，联合中国一切武装力量驱逐日本侵略者出满州。一九三五年八月，当日本企图夺取河北省时，共产党号召人民及所有中国军队，联合民族的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此后，共产党又不止一次地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在西安事变时（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防止了新的大规模内战爆发，并且奠定了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最后，一九三七年九月，在日本人侵入华北和华中、夺取了北平和天津两个月以后，国民党采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为了抗日，相互合作的建议。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先生说：“在民族生存的危急关头，只有本民族联合起来的力量，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两大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建立合作以后，中国其它的政党和派别参加了民族统一战线。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以最高统帅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周围。

中国开始作战时，没有统一的军队和统一的司令部。除南京政府控制的中央军外，还有红军和许多地方部队，这些部队多年来互相敌视。中央军，尤其是地方部队训练和装备均不好。中国的军队那时总共约有六百架过时的飞机，枪支、炮弹、子弹不够用。

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初几个月，一切中国军队服从统一的司令部。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在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和军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仅广西一省就动员三百万人参加军训，四川省有五百万人。云南省派到前线的有二十多万经过训练的战士。在湖南省，从十八岁到三十六岁的男子均经过军训。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陕西、甘肃、河南省动员和训练了四百万人。游击区人民的军训工作成绩特别大。

在驻有八路军（其前身为红军）的游击区，甚至儿童也帮助军队做工作，当交通员和侦察兵。妇女们从事卫生方面的工作，不少妇女在经过军事训练后，与男子一样，自愿奔赴前线，仅在晋察冀边区就有三百万人经过军事训练。

在组织游击斗争和建立游击区方面，八路军起了特别大的作用。

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在聂荣臻指挥下，在晋察冀边区开展了游击战争。在一年过程中，这支部队参加了八十次大小战斗，打退了日本人的多次进攻，并钳制了华北的大部日军。现在晋察冀地区成为最大的游击根据地，控制着七十多个县，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一千二百万左右的人口。

八路军的另一支部队在贺龙指挥下，在山西省的西北地区作战，在那里也建立了游击根据地，根据地控制三十个县，有约二百万人口。

由朱德直接领导的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在山西、河南地区作战。这里游击队控制了六十至七十个县。八路军的这些部队给予另外在徐州、武汉地区作战的中国军队以大力支援。他们与日本人作战一百多次，并且不只一次地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在一九三八年四月，这部分八路军打退了日本军队大兵团在九个不同地点同时发动的进攻。

此外，八路军司令部还建立了一些武装的队伍，派到敌后进行游击战。

在一九三九年一年内，八路军进行了一千八百多次大的战斗，抗击了集结在它的活动地区的五万日本军队。日本第一一〇师指挥官桑木在一次向日本最高司令部



呈报的秘密报告中被迫承认。“用巧妙的组织的办法，他们（指八路军——林彪）赢得了很多人。他们的基础很深，这使镇压与绥靖的工作非常困难。

在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建立了新四军。这支军队的游击队甚至对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进行了袭击。他们破坏最重要的铁路和电报线路，使日本驻军处于经常的威胁之中。

所有这些事实说明，八路军、新四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中国民族统一战线最忠实、最可靠的支柱。

由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础上，中国在国家建设上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中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国民参政会和省、县参政会的建立，以及村长制度的民主化。一九三八年七月建立的全国国民参政会有各抗日政党和组织的代表。

在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召开国民大会以通过中国宪法的决议。这个决议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得到全体人民的拥护，已被国民政府批准。国民大会预计在一九四〇年底召开，而目前全国已广泛展开了准备大会的运动。

实现国民政府的下述措施，对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化有巨大的意义。这些措施是发表抗战任务和建国纲领，颁布反对贪污犯和反对胡作非为的官吏的法律，枪决某些特别可恶的贪污犯以及腐化的官吏、县长、省长以至于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这些措施有助于健全行政机构，减少贪污、非法征税、官吏专横等现象。

尤其是在十年的禁止和迫害之后，头一次在中国的许多城市，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举行了纪念“五一”的活动。政治制度的进一步民主化将导致工人阶级积极性的提高，吸引中国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中去。

游击区的政治制度民主化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例如山西省的县长由人民选举，安徽省的县长同时是游击队和自卫队的领导。

在八路军驻地的陕甘宁边区，一切行政人员由人民选举，并且必须经常在选民面前报告自己的工作，如果他辜负了信任，人民在任何时候有权撤销任何官员。一切县长，一切政府机关的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作战时他们在第一线，而在“和平”时期则进行大量的建设工作。

在战争过程中，中国政府在经济建设上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从现在的敌占区及时地撤退了最重要的兵工厂及一些大的国防企业。在中国西南及西北的一部分地区建立了新的工业区。这些地区的工业生产可以保证军队最低程度的需要，其中包括供应它最必须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枪支，子弹、炮弹、榴弹等等。目前，由政府领袖蒋介石领导的国家资源委员会拥有四十五个具有国防意义的企业。还建立了三万个小型的工艺合作社，为军队从事必须的日用品的生产，制造装备和军服。但是在中国人民面前，国家经济发展方面以及动员一切经济资源满足战争需要方面，还有巨大的任务。

在中国，也采取了某些改善农民和工人群众状况的措施。在重庆地区，目前集中了十万工业工人，工人们提出了建立统一工会的要求，已经建立了统一的重庆市印刷工会，纺织工会（包括大型工厂“益丰”的工人）正在发挥其作用。工会正在为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而斗争。在许多省份，不顾地主和部分官吏的反对，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的地租。在八路军的地区，处处减少地租。山西省在“公平分担战争负担”的口号下，进行了土地改革，地租减少一半。把荒地，甚至是私人所有的荒地，交给农民协会和由敌占区来的难民耕种，是政府的重要措施。在陕甘宁边区和受八路军支配的地区，都提高了工人的工资。

旨在提高部队战斗能力和改善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一切措施，由于存在民族统一战线，并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拥护，是可以作得到的。但是，这些措施远远没有到处实行，而实行这些措施是中国人民胜利所迫切需要的。

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证明，中国人民不顾一切困难，要求继续与侵略者斗争，并且能够与侵略者继续进行斗争。中国也有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客观条件。日本军阀被迫进行持久战。而在这样的战争中，谁支持得久，谁就胜利。中国失去了相当大的领土，但是中国未被占领的领土还很大，给中国人民提供了继续进行战争的很大可能性。在中国未被占领的土地上约有三亿人民，中国具有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它能够克服一切困难和危险，赢得对敌斗争的最后胜利。中国的主要危险过去、现在都是民族统一战线分裂的危险，投降的危险。虽然民族统一战线在三年战争中克服了相当大的困难并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就，尽管中国人民继续顽强抗击着敌人，但是分裂的危险还远远没有消除。而且，在整个战争年代，投降的危险从来没有象目前这样现实地显现在全国的面前。

这个危险的来源和原因何在？首先，在于中国内部的局面。问题是中国的部分地主资产阶级，尤其是买办阶层，害怕中国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害怕威胁到自己的阶级私利，他们把这种私利放在民族利益之上。为了作为日本股份公司的伙计参加对中国的掠夺，这些人准备投降日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背叛，自然使民族统一战线的困难加重，它使国内的叛徒和投降分子活跃起来，使那些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的拥护者们积极起来。

公开投靠日本的汪精卫式的叛徒、投降分子，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鄙视和憎恨，所以他们的危险要比在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中的叛徒和投降分子，即妥协的拥护者小。

某些在投降分子影响下动摇的政治活动家，力图加强对劳动群众的剥削，并阻碍动员国家的民族资源；他们企图镇压在中国许多地区存在的民主制度，消灭民主的成果。这些人从内部破坏民族统一战线并削弱中国人民的抵抗力。他们中的一些人指望英美的援助，明显地忽略中国本身的人力和物力。这些人断言，没有英美的援助，就不可能继续抗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把希望寄托在外国，首先是美国的调停上，打算借助这些国家准备与日本妥协。这样的妥协，与直接投降实质上并没有任何区别。

当然，不是任何叛徒、投降分子都将公开地号召投降。在大多数人民主张继续斗争的情况下，隐蔽的投降分子通常说：“共产党在战争过程中发展了。影响大大扩大了，因此需要禁止或限制共产党的活动”。他们声称：“我们拥护抗日战争，拥护国民政府，但我们反对共产党人”等等。这种挑拨离间的谈话，不仅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它们旨在反对民族统一战线和中国一切进步力量。

一些放肆的叛徒，正在进行消灭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的公开活动。发生不少这样的情况，即地方政权的代表迎合叛徒和投降分子的要求，没收和烧毁由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抗日报纸和书籍，而允许扩散亲日的报纸和书籍。发生了逮捕、杀害、枪决共产党人的情况。出现了武装进攻八路军部队的情况，例如张荫梧将军用自己的部队公开进攻八路军部队；在山东省，秦启荣的部队进攻共产党员领导的游击队。中国西北的反动将领们曾侵占了陕甘宁边区的县城宁县和镇原。

大家知道, 中国共产党及其建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始终是中国人民抗日斗争中的先进部队, 因此投降分子反对共产党。众所周知, 八路军是真正的人民的抗日军队, 所以投降分子反对八路军。众所周知, 边区是抗日的可靠的根据地, 所以投降分子要消灭这些区域。八路军在敌后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所以投降分子要消灭这些根据地。政府领袖蒋介石曾公开承认, 敌占区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军队的成就, 而隐蔽的投降分子口头上主张继续抗日, 实际上竭力把这些根据地送到敌人手中。

中国共产党用行动证明, 它把中国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共产党真诚地一贯地维护民族统一战线, 它忘我地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斗争, 而隐蔽的投降分子千方百计地竭力分裂民族团结, 破坏国共两党的合作。在许多情况下, 为了维护民族统一战线, 共产党作了让步。

中国共产党知道, 在投降分子中间, 在所有那些反对共产党人的人们中间, 不少是属于误入歧途和动摇的, 必须使他们认识到立场上的错误并吸收他们参加到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来。共产党努力处理好与那些部队, 甚至过去反对过八路军而现在放弃敌对行动的中国各部队的友好关系。但是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 常常被迫给予叛徒和投降分子以坚决的回击, 不这样做是不行的, 因为不反对叛徒和投降分子, 就意味着堕入机会主义的泥坑, 意味着不保护人民的利益。真正的中国爱国者赞同共产党和八路军的行动, 因为他们斗争在中国人民的前列, 并且清楚地看到国内分裂和投降的危险。

投降的危险也是由于当前国际形势的某些特点造成的。在欧洲战争开始前, 英国、法国和美帝国主义者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过中国的抵抗。他们想用中国人的手削弱日本的力量, 用日本人的手, 使中国虚弱, 然后充当调停者。但是, 随着欧洲帝国主义战争的发展, 英国和法国开始主张停止中国的战争, 因为想拉日本参加英法集团。此外, 他们想把中国巨大的原料资源用于自己的军事目的。但是现在, 在法国失败以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英国和法国无法保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 于是对日本作出实质上的让步。法国封锁了印支边境。英国同意在三个月时间中禁止由缅甸运送货物到中国。

中国政府公正地认为, 法国和英国政府的行为是直接帮助了中国的敌人。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说, 英国政府的行动是不友好的, 不合法的。这些行动直接破坏了

英国和中国还在十九世纪签订的条约，按照这个条约，任何一方无论在平时或战时都没有权利封锁缅甸和中国之间的道路。

日本利用英国、法国的让步，取得了从南部和东部加强封锁中国的可能性。这无疑增加了中国经济与军事上的困难。但是，同时也擦亮了許多中国政治家的眼睛，这些人对于英法存在着很大的幻想，指望借助这些国家的援助，而低估中国人民本身在抗日斗争中的力量。

中国的投降分子想把事情描绘成这样：好象由于英国与日本的协议，中国已陷入绝境，仿佛现在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已被切断。

但是应该说，国际形势不是已经如此对中国不利。英国的行动无疑使对外贸易更加困难，因此，运送装备到中国是困难了。但是，日美商约的废除以及美国对出口石油、铁和其它废金属采用许可证的制度，这些事实说明了美国与日本间的矛盾加剧，削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

中国有取得胜利的一切可能性。但是，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需要坚决克服投降的危险。现在，每一个希望看到自己祖国独立的正直的中国政治家，将更勇敢地、坚决地依靠中国人民及其无穷尽的内部力量，进一步巩固民族统一战线，这是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的优越性。

如何克服投降危险呢？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切正直的中国爱国者认为，首先，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须加强对公开的和隐蔽的投降分子和汉奸的斗争，坚定地继续民族解放战争，还要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已有的游击战争的根据地。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正直的中国爱国者认为，必须巩固民族的统一，特别是加强和巩固所有抗日党派、团体和组织的行动的统一。首先必须巩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同分裂民族统一战线的阴险计划进行无情的斗争。必须同那些在“反共”的幌子下推行投降政策和分裂、破坏活动的人进行无情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起，就是为中国人民的民族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斗争中是民族统一战线的骨干，因此，每一个正直的中国爱国者把同诬蔑共产党的行为进行斗争当作自己的任务。

第三，中国共产党人以及一切正直的爱国者认为，为了克服投降的危险，必须更广泛地吸引人民群众参加到国家和军事建设的事业中去。不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就不可能英勇地、忘我地进行反对严重的敌人的战争。

站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前线，并且为建立独立民主的共和国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是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真正拥护者。

共产党员尽一切努力，争取最近的时间内召开国民大会，这个大会能够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并通过符合人民利益的宪法。

因此，继续抗战，巩固民族的统一和进一步使制度民主化，这就是一些条件，这些条件能够保证克服困难，克服中国的主要危险——分裂和投降。实现这些条件，就能保证中国人民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

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中国所有的政党为今后中华民族的命运担负的责任无限地增加了，对中国人民的命运，共产党人肩负着巨大的责任。

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继续抗战的坚定决心，以及今年七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又一次表明的国民政府武装抗日的政策，说明中国人民能够克服投降的主要危险，把日本帝国主义者从中国的土地上驱逐出去。

[注：下面是这篇反党文章的原文影印件（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的谈

毛：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

周恩来：头子在班房里。

毛：那些年轻人是受骗的。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你还不知道呢。

班：我听说了一点。

毛：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就是 ALL-ROUND CIVIL WAR。现在好多了。

班：就是自己人之间打内战吗？

毛：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

周：名义上是抢枪，实际上是送枪。

毛：他们外交部，她们（指王海容、唐闻生）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班：为什么？

毛：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

（班夫人点头）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

班：见上帝？

毛：是啊，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

班：噢，我明白了。（众笑）后来飞机怎么样了？我不大清楚。飞机掉下来了，还是过到苏联去了？

毛：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要摔。

（外交部绝密文件，文特 69）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共浙江省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关于南萍，熊应堂问题的总结提纲

1972.06.28；省委 [1972] 9 号

省委扩大会议，从六月七日开始，到今天结束，历时二十二天。参加会议的共三千零三十八人。会议传达和学习了毛主席四月十五日、二十五日两次重要讲话精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多次指示和中央 [1972] 4 号、12 号、16 号文件。许世友同志和王洪文同志到会多次作了指示。到会同志深深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决策，英明正确，非常适时，完全表达了全省军民的热烈愿望和迫切要求，一致表示衷心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 （一）会议收获

这次会议，认真贯彻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和中央 16 号文件。到会同志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以《“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为背景，群情激愤，斗志昂扬，狠揭狠批了林彪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狠揭狠批了南萍、熊应堂两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通过揭发批判，到会同志划清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界限，受到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大家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始终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会议开得是好的，发展是健康的。

第一，进一步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贼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浙江表现得十分尖锐。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在浙江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拼凑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借用力量”，妄图“固守浙江”，把浙江变成反革命“根据地”。他们在杭州策划了《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的框框，为林贼建造了指挥反革命政变的“行宫”，干了一系列反革命阴谋勾当。更为严重的是，他们还妄图在江浙一带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到会同志以极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对林贼及其死党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深入的揭发批判。越揭，对林贼及其死党越恨；越揭，越感到这场斗争非搞不可。通过揭发批判，大大增强了把对林彪反党集团斗争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第二，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深入揭发批判了南、熊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

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南、熊多次拒绝、对抗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批评教育，以种种恶劣手段，打保票，定调子，捂盖子，压制群众，阻挠和破坏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会议的基础上，根据中央 16 号文件的精神，经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和省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开了浙江省阶级斗争的盖子。事实证明，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南、熊同林贼死党陈励耘一伙，完全站在一个立场上，走在一条黑线上，坐在一条贼船上，陷得很深。正如同志们所说：问题越揭越深，南、熊的面目也越看越清。过去南、熊把自己打扮成“浙江正确路线的代表”，现在看穿了他们推行的是一条林彪反党路线，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过去南、熊宣扬同陈励耘是有“斗争”的，现在看穿了他们是互相勾结，



疯狂向党进攻；过去南、熊伪装“老实”，现在看穿了他们欺上骗下，搞阴谋诡计，是典型的两面派。

第三，进一步提高了到会同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使我们受到了一次生动具体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经过这场斗争，大家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基本路线和“九大”团结，胜利路线的理解，提高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同志们说，过去南、熊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欺骗了不少同志，现在认清了他们的丑恶本质，决心从政治上，思想上同他们划清界限，积极投入斗争。所有这些都为彻底揭开我省阶级斗争盖子，解决好浙江问题，肃清林彪反党路线的流毒，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第四，开始造成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风气，增强了革命团结。

到会同志认真学习了中央文件，掌握思想武器，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什么是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政策；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道路。在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大家以大局为重，搞党性，不搞派性，着重从路线上分清大是大非。对跟着南、熊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不打横炮，不搞人人过关，不搞个人恩怨，鼓励他们积极投入到斗争中来，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

会议的主流是好的。但是，发展不够平衡。有的同志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态度不够端正，个别同志也出现过一些急躁、抵触情绪。这主要是由于省委常委思想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引导不够。

## （二）南萍、熊应堂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会议揭发和初步查证的大量事实证明，南、熊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不仅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而且积极投靠林彪反党集团，参与了他们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又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在浙江的黑后台，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第一，在“九大”期间，南萍伙同陈励耘，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有计划地进行了一系列反党阴谋活动。

“九大”前，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的一月会议期间，南、熊就同黄永胜、吴法宪秘密勾结，黄、吴背着中央向他们作了黑指示，进行反党分裂活动。

“九大”开幕前，南萍就在我省“九大”代表中灌输分裂主义思想。会议开始后，他们利用各种机会，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四月十二日，南萍抓住许世友同志在毛主席接见部分同志时的一句插话，恶意歪曲，攻击许世友同志的话“是放毒，要批判”，要每个代表表态。大会进入酝酿候选人时，南萍竭力污蔑、诽谤中央某些老同志，煽动代表反对这些老同志为候选人。毛主席指示要把这些老同志选进中央委员会，南萍却根据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规定对这些老同志“得票只能半数多一点”，并在浙江代表中具体布置谁投反对票，谁投赞成票。在华东大组进行预选时，有人对叶群投了反对票，南萍，陈励耘暴跳如雷，盗用浙江小组名义，向中央写信，说什么“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华东地区不是偶然现象，这反映了有反对毛主席、林×××的暗流”，“尽管我们通过了党章，但举起来的手中有的一两只是假的，黑的，这一两只黑手是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并借此大肆煽动代表反对南京军区。“九大”以后，南、熊利用传达“九大”精神的机会，继续恶毒攻击某些中央领导同志是“老右”、“老机”，破坏“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大搞分裂活动。

第二，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发动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准备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猖狂向党进攻。

关于不设国家主席和毛主席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毛主席作过多次明确的指示，南萍是很清楚的。但是，他对毛主席的指示根本不听，却完全按照林贼的旨意，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为林贼抢班夺权大卖力气。

早在二中全会前夕，江腾蛟就叫陈励耘“做南萍的工作”，要在二中全会上坚持设国家主席。八月十一日，黄永胜跟周总理陪外宾来杭时，背着总理，深夜找南萍和陈励耘密谈，说设国家主席是“群众的愿望”，向他们交了“底”。八月二十三日，林贼抛出了他的反党动员令，南萍和陈励耘都说这是“有所指”的。同时，他们和王维国两次秘密开会，进行阴谋活动。二十四日，江青同志在华东大组会上对不设国家主席问题又一次作了明确解释，并当面批评了陈励耘。但是，

二十五日华北组的反革命简报一出笼，南萍就同陈励耘密商赶写反党发言稿。陈励耘根据吴法宪的黑指示，进一步向他交“底”说：“国家总得有个主席，毛主席不当，还有接班人嘛！”南萍心领神会：“只要设了国家主席，毛主席不当，肯定是林彪当，林当了，于自己有利。”所以，在这天下午的大组会上，当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狂叫要设国家主席，疯狂向党进攻时，南萍当即表示陈励耘的发言“是代表浙江小组的”，紧接着抛出了自己的反党发言。直到毛主席戳穿了林贼的阴谋后，八月二十六日，他们还盗用浙江小组名义，由陈励耘口述，南萍执笔，再次写信向中央“表态”，顽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说这“是完全表达浙江全体军民的感情和心愿”的，继续向党进攻。

第三，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南萍、熊应堂积极参与了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

(1)加紧推行对林贼“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黑方针，大造反革命舆论，狂热吹捧林贼。

南、熊多次鼓吹要突出宣传“接班人”的问题。早在一九七〇年六月八日，南萍在各地区和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就布置“要深入宣传接班人”，说：“现在是不是人家都那么服气了？不见得，所以我们要突出宣传这个问题。”九届二中全会前后，熊应堂也胡说什么对林贼的“宣传少了”，“党章上规定了，不一定都拥护”。

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南萍违背中央规定，私自复写和带回了林贼的“八·二三”反党讲话，在省核心小组和驻杭部队军党委常委的会议上全文传达。九月十一日，南萍和陈励耘盗用省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报告，说什么听了林贼的讲话，“心情异常兴奋”，“表示热烈拥护”。以后南萍还把这个讲话成段地塞进省党代大会工作报告和一些会议的讲话中。直到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南萍在向省委常委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时，继续鼓吹林贼的讲话“很重要”，“林×××讲的三个副词还是完全对的”，顽固坚持林贼的反党纲领。

南、熊伙同陈励耘利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大会，进行了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全面部署。从工作报告到会场布置，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会场门口挂的林贼和毛主席并立的巨幅画像，是南萍亲自选定的。南萍在会议上的报告，是他亲自交待按照吴法宪、李作鹏在空、海军“积代会”上报告的调子起草，并逐稿审阅，反

复修改的。省党代大会后，南、熊利用会议、文件、报刊、书籍、广播、戏剧，展览等各种形式，吹捧林贼达到了高潮，直到一九七一年十月一日，《浙江日报》还公然刊登了林贼的画像。

(2) 南萍，熊应堂同林贼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江腾蛟、周赤萍、王维国、于新野等早有勾结，随着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加紧实施，他们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勾结更加紧密。

近几年来，南、熊到上海，总是住空四军巨鹿路招待所（南住过八次，熊住过六次），大搞政治交易。一九七〇年六月十七日，王维国在宴请南萍夫妇和林贼死党 xxx 等人时说：“我们是一个观点，一家人。”南萍说：“我们是一家人。”时过不久，王维国带口信给南萍说：“要注意身体，不要人家打不倒自倒，人家没夺权就让权了。”一九七〇年国庆节，王维国夫妇为鲁珉一家、熊应堂一家举行“家宴”。鲁珉老婆敬酒时说，“为林 xxx 找到了好的接班人干杯。”熊应堂同她碰杯，互相吹捧。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林立果来杭以前，陈励耘给南萍写了一封亲笔信，“一切正在准备中，据说需亲开嘎斯-69，我这里没有这种新车，请速从省战备车中调拨一辆。”南萍在信上批示：“速予调拨。”同年七月，陈励耘还把林贼送给他的芒果转送南、熊，“分享幸福”。

特别是当林贼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 工程”纪要》，加紧实施武装政变的时候，南、熊同林贼的一些死党分子打得更加火热，出现了许多异常现象。一九七一年二月南萍到北京开会时，特地找江腾蛟密谈数小时。三月，周赤萍以“养病”为名来杭，南、熊热情接待，周还送了三本吹捧林贼的黑书给南萍。七月中旬，南萍到上海，王维国派×××、×××等到上海郊外十多里处迎候。七月三十一日，王维国等同南萍在空四军指挥员值班室密谈两小时，然后大加宴请。宴会上，王维国对南萍说：“记得你过去说过一句很好的话，不管出现什么风浪，我们要战斗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南萍说：“向空四军学习。”在此前后，南、熊频繁活动，从七月六日到八月七日，他们亲自指名，分别召开了多次很不正常的会议，分析形势，布置任务。南萍说，“现在出现一股风，要注意，要顶住。部队要稳定，机关要稳定。大家要承担很重的担子，遇到困难不要后退，越是困难越要去斗争，遇到困难要看到胜利。”熊应堂说：“我们现在

都在经受考验,经受复杂斗争的考验,准备迎接困难”。这同林贼死党的黑话“要准备迎接重大的政治风暴”,如出一辙。

(3) 在军事上,有许多行动是同林贼的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相一致的。

南萍过去很少过问军事工作,但一九七一年八月初从王维国处回来后,却突然察看了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坑道和二十军指挥所坑道。

一九七〇年二月,熊应堂和陈励耘密谋后,把省军区基本指挥所变成“合成指挥所”,把封闭的坑道三、四口扩大幅员,作为空五军指挥所。接着,周建平来杭,进行了具体勘察,并提出要在指挥所附近修建一个直升飞机场。吴法宪专为此事向南、熊表示“感谢”。这一工程南京军区和总参均不同意,而熊应堂却欺骗南京军区,调动两个营的兵力,强令加速施工,限期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底完工,但林贼自我爆炸后,南、熊却撒手不管了。南、熊和陈励耘为林贼修建的“704工程”,设有作战室、地堡和直升飞机场,是林贼搞反革命政变的指挥所。现已查明,这个工程完全是按照林贼黑司令部的旨意,由南、熊和陈励耘三人共同策划的。他们一起看了地形,审阅了图纸和模型,批了建设经费。南萍在布置这个工程设计任务时说:完成这个工程“是个政治任务”,“是对世界人民作出贡献”,“房子本身就是战备工程”,“工程本身就是为了打仗”,“要保一辈子密”。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他们两次开会,限定八月底完工。

《“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提出:“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南、熊积极配合,派人为空五军进行捕俘、格斗、步兵战术、步兵打坦克骨干训练。

一九七一年九月六日,周建平以研究浙东南空军协同作战为名,窜到杭州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南、熊与周建平多次接触。在协同会议上,周建平提出“浙江陆、海、空三军要归南政委、熊司令统一指挥”,南萍提出要建立“联合指挥部”,熊应堂还叫省军区、二十军向周建平汇报了作战方案。他们决定把“联合指挥部”放在省军区前指。这是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控制驻浙陆、海、空三军,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一个大阴谋。

一九七〇年,南、熊根据林贼“六大块四小块”的黑指示,擅自将中央定的建设多年的××小三线向××转移。同时他们与陈励耘密谋把二十军、空五军、省革委会的后方基地放在××山区,与空四军后方基地紧靠一起。

(4) “九·一三”前夕,南萍、熊应堂的一些活动,有参与林贼妄图谋害毛主席罪恶阴谋的重大嫌疑。

早在一九七〇年,南、熊和陈励耘密谋策划,由南、熊具名写报告,经黄永胜、吴法宪批准,将警卫大权交给了陈励耘,使××处成了他们进行阴谋活动的重要据点。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一年九月初来杭,×日中午中央直接通知了南萍,但南萍延至下午五时许才布置警卫,致使许多地方的警卫人员不能及时到达岗位。特别严重的是,南、熊明知陈励耘在庐山会议上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政变阴谋活动,中央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点了他的名,但仍把主席的警卫工作交给陈励耘控制。九月×日下午,于新野窜到杭州向陈励耘下达了林贼谋害毛主席的黑手令。当晚,南、熊同陈励耘三人借机在××室密谈了一个多小时。

九日下午,南、熊一反常例,提前于一时开省常委会,到三时一刻结束,会后不带秘书,不告诉任何人,也不坐自己的车子,匆忙而去,形迹可疑。南萍在检查中谎称是向×××同志汇报警卫工作,但据揭发,南、熊是和陈励耘一起在××处进行长时间密谈。十一日上午,他们三人又进行了一次密谈,至今拒不交代。毛主席离杭时,明确告诉南、熊和陈励耘不要去送,但陈励耘坚持要送,南、熊不加制止。据几方面揭发,陈励耘是带着两支手枪去“迎”“送”主席的。这一严重问题,正在进一步审查。

第四,同“五·一六”分子勾结一起,密谋策划,进行反党乱军活动。

一九六七年,“五·一六”分子林岗等人领受王、关、戚的黑指示,三次窜到浙江。南萍和陈励耘多次接见他们,让他们参加军管会的重要会议,安排他们住到公安机关,听凭他们在专政机构内部盗窃机密,收集、整理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经过南萍和陈励耘审阅后交给了关锋、戚本禹。

南萍和陈励耘与林岗等人共同策划,大刮揪军内一小撮的妖风,要在浙江搞出一个“揪军内一小撮的样板”。他们勾结南京军区下放干部组织的“批资总部”,对抗毛主席指示,反对南京军区领导和许世友同志。他们对抗中央关于军以下机关不开展“四大”的指示,插手驻浙部队,煽动军内起来“造反”。在他们的策划下,省军区部队从上到下,纷纷建立“批资”组织,非法开展“四大”,揪斗

各级干部。他们公然支持舟嵎部队中少数不守纪律的分子搞“四大”，造舟嵎要塞区党委的反，南萍说“革命那有经过批准的”，“你们的大方向完全正确”。南、熊伙同林岗等人，策划和挑起了一系列武斗事件，甚至发放武器，动用部队，开枪镇压群众，以致全省武斗不断升级，造成了严重恶果。

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中，南、熊极力抵制，定了许多框框，束缚群众手脚，千方百计阻挠和破坏，使我省清查“五·一六”的运动始终开展不起来。

第五，反对“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制造分裂，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南萍、熊应堂秉承黄永胜、吴法宪黑旨意，破坏一月会议精神的贯彻，分裂军队。他们大反南京军区领导，长期阻挠舟山问题的解决。他们不但破坏部队与部队之间的团结，而且在部队内部挑拨离间，制造分裂。对省军区，他们建立了“党办”、“学办”，凌驾于党委和司、政、后之上，搞单线领导，严密控制。他们妄图通过搞驻浙陆、海、空三军“团结”决议，统帅驻浙部队，夺南京军区的权，为林彪“一块一块拿到手”效劳。

南萍、熊应堂极力阻挠和破坏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落实，分裂干部、群众。他们对抗毛主席关于干部问题的多次指示，对有些已经审查清楚的干部迟迟不予解放，解放了的也不妥善安排使用。一九七一年一月省党代会上，他们还提出批判所谓“黑三论”（主要矛盾转化论，依靠对象变化论、三气有理论），公开对抗批陈整风，破坏一打三反运动，把有些已经站出来的干部重又打下去。他们违背党对群众组织的政策，支一派压一派，打击不同观点的群众。

南、熊否定十七年来公安工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硬说浙江的公检法是“特情专政”，把全部特情名单公布于众，进行批斗，同时大砍劳改单位，严重地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把对敌斗争的一些必要手段作为通敌的罪证，伪造证据，欺骗中央。去年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以后，他们对抗毛主席指示，封锁总理的批评，一意孤行，不思悔改。

几年来，南萍、熊应堂封锁，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极力推行林彪的反党路线，在全省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破坏了军队之间、军民之间、军政之间的革命团结；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的正常生活；在农村大搞形“左”实右，破坏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和经济政策，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

极性；破坏了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有些地方坏人当道，好人受气，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社会主义建设受到严重损失。

在林彪自我爆炸以后，毛主席、党中央等待了南萍，熊应堂半年之久，他们不但不觉悟，反而千方百计定调子，捂盖子，对抗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多次批评。中央调他们到北京解决浙江问题，他们却收集黑材料，准备“打官司”；讲假话，欺骗中央。回来后，经过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省委扩大会议，在同志们的揭发批判和帮助教育下，南、熊虽然被迫承认了一些事实，但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没有向党交心，态度很不老实。

### （三）必须进一步统一的几个认识问题

第一，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性质。第十次路线斗争，是我党历史上一次最严重、最深刻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党，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改变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反党集团的路线，集中反映了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反革命复辟的愿望。如果让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得逞，中国将沦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地、富、反、坏、右一起上台，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在这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南、熊积极投靠林彪，参与了一系列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生死大搏斗，是政变反政变，复辟反复辟的严重斗争。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关系到浙江三千三百万军民的根本利益的一场斗争。我们要站在党性立场上，从路线斗争高度来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质和意义，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划清界限，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到底，同南、熊的严重错误和罪行作坚决的斗争。如果站在派性立场上，从个人得失来看问题，那就会模糊这场斗争的性质，走到邪路上去，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期望。

南、熊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是敌我性质的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下贼船。只要他们向党和群众交心，彻底交代问题，坚决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我们还是欢迎的。至于能不能把他们拉过来，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



第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彭、罗、陆、杨揪出来了，这是很大的收获。损失是有一些。”同全国各地一样，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浙江省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结果，是全省广大军民坚决响应毛主席号召，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过去，南、熊贪天之功为己功，把浙江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事实恰恰相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南、熊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有许多干扰和破坏的。他们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决不是偶然的，不但有阶级根源，而且有历史根源。大量事实证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南、熊就逐步投靠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推行他们的反党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到一九六九年的一月会议，他们就上了贼船，在反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决不能割断历史看问题。我们揭发南、熊的错误和罪行，必须以第十次路线斗争为纲，但也必然要联系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办事，揭发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和罪行，决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相反，它只会促使我们进一步落实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真正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促进大好形势的发展。

第三，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进一步增强革命团结。

毛主席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驻浙部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成绩是很大的。浙江广大军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是要团结不要分裂的。过去有些群众组织之间，存在一些隔阂和对立，有些群众过去受了压，肚里有点气，有些群众还有派性，这是林贼死党陈励耘一伙的破坏和南、熊推行林彪反党路线的结果。要把这笔账记在林贼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身上，记在南、熊身上。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如果我们不团结，阶级敌人

就会乘机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大好形势。我们必须百倍提高警惕，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有些同志过去在南，熊的影响下，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执行了错误路线，这是受骗上当的问题。对这些同志，既要坚持原则，又要热情帮助，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转好弯子，也应当允许他们有个认识过程。这些同志自己应当端正态度，站稳立场，和群众站在一起，积极揭发批判，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划清界限，接受教训，改正错误。这样，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取得主动权。有些同志过去受了压，挨了整，应当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恩怨；要集中目标，重点解决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

我们相信，通过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全省广大军民必将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大激发战斗意志，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四）今后意见

扩大传达中央〔1972〕16号文件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大体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县为单位，召开县委扩大会议，传达到大队党支部书记以上干部，充分发动群众，组织揭发批判，时间十天左右。第二步，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工人、社员，主要是正面教育，也要进行揭发批判。

省级机关和杭州市先传达到党员、干部，然后传达到工人、社员。

驻浙部队，第一步，以团为单位，传达到排以上党员干部；第二步，传达到全体指战员。具体安排，由军以上单位自定。各军分区、县人武部分别由地、县委统一组织贯彻。

在传达贯彻中，要坚决按照16号文件和许世友同志、王洪文同志的指示去办，切实掌握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把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的反革命罪行，揭发批判南、熊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和罪行，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抓紧、抓细、抓好。要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联系实际，大揭大批，不能捂盖子。通过这场斗争，提高“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自觉性，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

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军队之间的革命团结，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把各项工作促上去。

第二，认真学习中央 [1972] 16 号文件，弄通精神实质，坚决贯彻执行。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不搞人人过关，不搞个人恩怨，始终把矛头指向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陈励耘一伙，揭发批判南、熊的问题，养成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好风气。对贯彻中暴露出来的政策问题，要从全局出发，加强调查研究，弄清情况，经过请示批准，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第三，以路线为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在传达贯彻期间，各级党委要分成两套班子，科学分工，既要贯彻好中央 16 号文件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又要扎扎实实把当前工农业生产搞好，把群众生活安排好。夏收夏种大忙季节即将到来，各地一定要不违农时，集中力量把这一仗打好。

第四，要保持军队和社会的稳定，防止反复。浙江地处海防前线，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排除“左”右干扰，反对资产阶级派性和无政府主义。各级领导要转变作风，深入实际，经常分析党内外思想情况，注意阶级斗争动向，发现问题，抓紧解决。要加强组织纪律性，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要贴大字报。重要揭发材料可直送省委专案组。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报告。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的通知及材料

1972. 07. 02；中发 [1972] 24 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即中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发给你们，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精神，立即组织传达、阅读和讨论。

各地在传达讨论“材料之三”时，要以《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为武器，深入进行批林整风运动，进一步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展开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

各地在向群众传达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毛主席重要讲话、批示和中央文件时，采取了总结试点经验，开办学习班，重点培养骨干，然后向群众普遍展开传达宣讲的办法。这些办法是行之有效的。“材料之三”的传达方法，各地可以按照自己的经验，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关于向群众传达的中央文件的蒙、藏、维、哈、朝少数民族文字的翻译问题，由民族出版机构负责解决。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日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

一九七二年七月

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

目 录

前 言

第一部份 林彪反党集团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证

一、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和他提出的反党纲领

1. 林彪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反党讲话录音记录稿
2. 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和他妄图实现这个反党纲领进行的阴谋活动

二、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

1. 陈伯达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华北组制造的五大谎言
2. 叶群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煽风点火
3. 吴法宪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南组散布的谎言
4. 李作鹏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散布的谎言

5. 邱会作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北组散布的谎言

6. 黄永胜炮制向党进攻的发言稿的罪行

三、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地下阴谋活动

1. 李作鹏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晚给叶群的亲笔信

2. 叶群私自收回的她在中南组的发言记录和叶群、黄永胜炮制的假证明

3. 陈伯达给林彪出谋献策的电话记录稿

4. 林立果亲笔写的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的密谈要点

5. 吴法宪的亲笔交代

6. 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林立果在庐山一次密谋后的合影

7. 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失败后，在九江机场飞机上的合影

第二部份 林彪反党集团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证

一、林彪擅自发布的所谓“第一个号令”

二、林彪、黄、吴、叶、李、邱的结盟反党活动

三、林彪给周宇驰、刘沛丰的亲笔信

四、吴法宪对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任职命令

五、林彪的反动词《重上井冈山》及其谱曲

六、林彪、叶群耍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记录

七、林彪打着“备战”的幌子，为篡党夺权进行的“七·二三视察”

八、林彪反党集团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编造的陷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和收集的情报

九、林彪、叶群为研究反革命政变伎俩搜集的资料

十、周宇驰在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一次会上的发言记录（节录）

十一、“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原稿

十二、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特务情报活动

十三、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

十四、于新野关于“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的记载（节录）

十五、周赤萍对林彪的吹捧

- 十六、林彪反党集团为篡党夺权制造的反革命舆论
  - 十七、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一次黑会的记录原件（节录）
  - 十八、林彪死党林立果等建立的反革命秘密据点
  - 十九、从秘密据点缴获的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活动的大批器材
  - 二十、周宇驰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的飞行训练
  - 二十一、林立果秘密进行驾驶水路两用汽车的训练
- 第三部份 林彪反党集团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失败后叛国投敌的罪证
- 一、林彪反革命政变手令
  - 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 三、王飞的亲笔供词
  - 四、在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前夕，叶、黄、吴、李、邱进行频繁的电话联系
  - 五、叶群亲笔写的几个反革命政变骨干分子的代号
  - 六、黄、吴、李、邱等人向林彪、叶群报送的情报
  - 七、程洪珍关于林彪反党集团谋害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阴谋活动的记载
  - 八、林彪反党集团为谋害毛主席准备使用的伊尔—10 强击机
  - 九、鲁珉的亲笔供词
  - 十、江腾蛟的亲笔供词
  - 十一、林彪反党集团为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秘密描绘的钓鱼台地形图
  - 十二、王飞的亲笔供词
  - 十三、王飞等七人黑会拟定的随从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人员名单
  - 十四、刘世英的亲笔供词
  - 十五、林彪等南逃广州准备乘坐的飞机起飞时间表
  - 十六、李伟信关于南逃广州飞机途经上海给王维国的电话通知
  - 十七、胡萍的亲笔供词
  - 十八、李作鹏篡改中央命令的阴谋和山海关机场值班记录、值班员的说明
  - 十九、林彪、叶群仓惶逃命时丢下的准备带走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
  - 二十、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叛国投敌时的狼狈相

二十一、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目击记

二十二、林彪、叶群所乘 256 号三叉戟飞机仓惶起飞时碰坏的加油车顶部和飞机右翼碰下的碎片

二十三、林彪、叶群等叛国投敌所乘三叉戟飞机坠毁的现场

二十四、周宇驰等所乘外逃被我迫降的直升飞机

二十五、从被我迫降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林彪叛党叛国罪证的一部份

二十六、李伟信的亲笔供词

## 前 言

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党，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林彪反党集团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们的路线集中反映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在我国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愿望。

但是，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是绝不能得逞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取得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伟大胜利。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我们遵照毛主席“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和“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的教导，对于大量的罪证反复进行了调查核实。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三日已影印发出《“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现再将一部份经过核实的罪证，予以公布。

中 央 专 案 组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 第一部分

### 林彪反党集团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证

在一九七零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地下活动，大搞阴谋诡计，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向党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他们的反党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他们的罪恶目的，是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

#### 一、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和他提出的反党纲领

##### 1. 林彪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反党讲话录音记录稿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会议上，发表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讲话。他在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政治纲领的同时，又打出“天才”的反党理论纲领，疯狂叫嚣坚持“个人天赋”这种“天才”观点。林彪的这个讲话，是他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他妄图使我们党和国家整个地改变颜色，但是，他在讲话中却反咬一口，污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胡说什么“他那个中央不同”，“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

这个讲话稿，林彪在八月二十四日晚送给了陈伯达，经过陈伯达、叶群的策划，由陈伯达做了精心的修改。林彪讲话中一些最露骨的反党、反毛主席的语言，都被陈伯达改得隐晦了。例如，“个人的这种天赋”被陈改为“天才”，“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被陈删去，“最高的一声号令”被陈改为“上层一些同志的一声号令”，等等。这是林彪、陈伯达勾结，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铁证。下面的罪证影印件（甲），是林彪反党讲话录音记录稿全文，共二十四页。（乙）、（丙）是林彪讲话稿中的两段节录。

（甲）

（乙）

（丙）

##### 2. 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和他妄图实现这个反党纲领进行的阴谋活动



一九七零年三月八日，毛主席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不设国家主席。四月十一日，林彪带头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仍然要设国家主席，并说要毛主席再任国家主席，“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制造什么不当国家主席就不能代表人民的谬论。毛主席驳斥了林彪的意见，在批示中指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在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不设国家主席的情况下，林彪却虚伪的提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林彪口头上说“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心里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急于夺权。叶群向吴法宪和其他人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这就清楚地说明，林彪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假的，他自己要当国家主席是真的，暴露了他篡党夺权的野心。

从一九七零年三月到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先后讲了六次不设国家主席和不再重新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半句也不听。在八月二十二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林彪、陈伯达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但是，他们竟然在八月二十三日私拟了一节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他们为实现“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下面是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电话稿节录、前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史敬棠的亲笔交代和吴法宪的亲笔交代的影印件。

一九七零年四月十一日林彪提出“设国家主席”的电话稿节录（林彪秘书于运深手记）

影印件原文

（1970.4.11 日晚 11：30）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前中央政治研究室秘书史敬棠的亲笔交代

影印件原文

伟大领袖毛主席明确指示修改宪法不设国家主席，但是陈伯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拟国家主席条文。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午，陈伯达叫我们替他搞一节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我们根据他的黑旨意写了国家主席的产生和国家主席的职权等内容。大约过了一小时，陈伯达看了这个稿子，他在上面作了一些删改，就拿走了。

史敬棠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九日

吴法宪的亲笔交代影印件原文

(一)一九七零年四月中旬和下旬，主席两次告诫林彪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之后，五月中旬有一次我见林彪时，我问他对宪法修改有什么意见，他说：他主张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我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

(二)七零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

(三)七零年八月初叶群打电话对我说：林彪的意见还是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你们应在宪法工作小组提议写上这一章。

(四)七零年八月廿一日在庐山，黄昏前叶群邀吴、李、邱去游仙人洞。叶群说：设国家主席还要坚持。我根据林彪、叶群的交代，八月廿三、廿四、廿五日先后同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讲过坚持设国家主席问题，对其中有些人还讲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

吴法宪

一九七一年十月廿一日

二、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林彪指挥下，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径，一齐出动，分别在全会的华北组、中南组、西

南组、西北组，同时宣讲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制造和散布大量谎言，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一、他们造谣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完全是造谣中伤。事实是，他们反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决定，顽固地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政治纲领，目的是林彪自己要当国家主席。

二、他们造谣说，有人反对提毛主席是天才，说“天才”是“讽刺”，要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事实是，他们对抗毛主席两次圈去新党章草案上三个副词的指示，要翻“九大”的案。他们顽固地坚持“天才”的反党理论纲领，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三、他们造谣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经过他们长期斗争才写入宪法修改草案的。这是无耻的捏造。事实是，这个指导方针，是修改宪法小组写在修改宪法草案上的，林彪、陈、黄、吴、叶、李、邱从来没有提出要写这个问题。政治局会议讨论时，也没有发生争论。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陷害中央负责同志，用心极其恶毒。

四、他们造谣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严厉批判了他们这种卑劣的谎言，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五、他们造谣说，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事实是，背叛“九大”路线，背叛新党章，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下面的罪证影印件，是陈、叶、吴、李、邱在全会的小组会上反党发言稿的节录和黄永胜炮制的反党讲话稿的要点。

#### 1. 陈伯达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华北组制造的五大谎言

（陈伯达亲笔修改过的他的发言原稿节录）

影印件原文

但是，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林彪同志说，这次修改的宪法里面规定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是宪法的灵魂，是三十条里最重要的一条，这反映了我国革命中最根本的经验。我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这个根本的观点。但是，同志们要懂得，加进这一条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注：据记录，陈伯达在发言中还说过：“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吴法宪同志说得很对；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但是这种妄图，是绝对办不到的。在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经觉悟起来、已经站起来的伟大中国人民，很能够识破他们，揭穿他们的各种虚伪。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

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象跳舞一样高兴。（注：这一段话，是陈伯达在会上的插话）

## 2. 叶群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煽风点火

（叶群的发言记录节录，这是中南组的记录员记的）

影印件原文

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引林副主席在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 3. 吴法宪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南组散布的谎言

（吴法宪的发言记录节录，这是西南组的记录员记的）

影印件原文

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一种是迷迷糊糊，是认识问题。但是也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 4. 李作鹏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散布的谎言

（李作鹏的发言记录节录，这是中南组的两个记录员记的）

林彪反党集团不准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直接指挥的，只准说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中，驳斥了这种说法，指出：“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影印件原文

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 5. 邱会作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西北组散布的谎言

（邱会作的发言记录节录，这是西北组的两个记录员记的）

影印件原文

一、对毛泽东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这次说仍然坚持这样观点。为什么在文化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现在也要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九大后二中全会后（上）又提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有人不同意，不然为什么又提这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动摇的，不能形形色色的谬论，不能利用主席的谦虚来反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关系到建设一个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

#### 6. 黄永胜炮制向党进攻的发言稿的罪行

（军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原第二处长宋城的亲笔交代）

影印件原文

1970 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叛徒林彪 8 月 23 日在全会上作了向党进攻的讲话之后，反革命分子吴法宪打长途电话给在北京的反革命分子黄永胜，传达林彪的黑指示，叫黄永胜写一个发言稿，对林彪在全会上的讲话表态。黄永胜于 8 月 24 日或 25 日下午从北京打电话给我，叫我组织人写。黄永胜并向我交代了起草发言稿的内容，其要点是：（1）拥护林彪的讲话；（2）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讽刺”，指出这是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3）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许多情况不正常等。并交代写好以后，用电话传回北京。我照黄永胜的授意，起草了发言稿，并将发言稿用电话报给了黄永胜。所以，黄永胜虽还未上山，但他已作了发言准备。后来，因为揪出了大坏蛋陈伯达，黄永胜原准备的发言，才没有拿出去。黄永胜这个发言稿，电话传到北京的一份，我听黄永胜的秘书吴玉琪讲，黄永胜已烧掉。在庐山的一份草稿，我烧了。

宋 城

一九七一年十月六日

### 三、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的地下阴谋活动

林彪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地下阴谋活动。在林彪发表反党讲话前后，他们四出活动，多方串连，组织力量，部署进攻。在毛主席刹住了林彪反党集团煽起的反革命妖风，拨正了全会的航向以后，他们密谋策划，订立攻守同盟，竭力掩盖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同时，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向党反扑。下面是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地下阴谋活动的部份罪证。

#### 1. 李作鹏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晚给叶群的亲笔信

叶群同志

今天简报看了一下，是比较抽象的接触了问题，没有更多实质性问题。似可以发请您再过目。至于我们两人发言的书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你意如何？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叶群、李作鹏在中南组作了煽风点火，向党进攻的发言。当晚，李作鹏写了这封信给叶群，密商向党进攻的反革命策略。信中所谓他们两人的发言“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就是因为他们搞阴谋诡计，心里有鬼，要躲在幕后看一看形势，等待时机，以求一逞。这是林彪反党集团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党进攻的一个铁证。

李作鹏的这封信，是从林彪住地查获的。

## 2. 叶群私自收回的她在中南组的发言记录和叶群、黄永胜炮制的假证明

假证明原件影印件原文

叶主任：

您好。

您派人问到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您在九届二中全会中南组会上发言记录稿的事，现将当时情况汇报如下：当天是我和曾江同志（曾思玉同志的秘书）担任记录，因您的发言讲得快，我们记不下，记了一些也不全、不准确。为了整理简报，我们即将您的发言记录（两分），从记录本上取下来，面呈您审阅。

中南组记录 郭士兴

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日

军委办公厅原秘书郭士兴的揭发交代影印件原文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叶群于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向党猖狂进攻。以后，叶群指使宋城要我和另一个记录员从记录本上撕下她的发言记录，由宋城交给叶群，一直未退回。

一九七一年一月卅一日晚上，黄永胜的秘书通知我到京西宾馆，我去后，叶群也在那里，叶说：“总理查问我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记录稿在那里。”接着她要我为她收回记录写个假证明。明明是她私自收回去的记录，却要我写成是我们为整简报“当场”送给她的。这次明明是黄、叶当面要我写的，却要我写成是叶群“打电话问到的”。我写后，落款时间是“一九七一年一月卅一日”。黄永胜看后，说“要用当时的时间、口气、纸、铅笔写”。叶群马上说：“还是总长想得周到。”

并要我把从她带来的记录原稿上裁下半页纸，重写，落款时间改成“一九七零年八月廿四日下午”。

第二天，叶群又电话告我，说“我想了想，证明记录的事还是要用现在的时间好。”并说：“不要在证明里写是我给你打的电话，就写是我派人问你的。”接着，黄永胜的秘书又通知我到京西宾馆去，黄说：“你按叶主任讲的再改写。”我又改写一遍，落款时间改为“一九七一年二月一日”。黄看后，亲自封好送给叶群。

在他们的指使下，我为他们写了假证明，丧失了党的原则，犯了严重的错误。

郭士兴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二日

注：假证明原件，是从林彪、叶群外逃时准备带走的文件中缴获的。

### 3. 陈伯达给林彪出谋献策的电话记录稿

一九七零年八月二十九日，正当九届二中全会揭发和批判陈伯达的时候，陈伯达打电话给林彪，要林彪私自修补林彪的反党讲话录音，把毛主席讲的会议方针，“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借以掩盖林彪分裂党的罪行。林彪电话答复：“谢谢伯达同志的关心”。

下面的电话记录稿，是林彪的秘书于运深手记的，是从林彪驻地查获的。缪秘书，即陈伯达的秘书缪俊胜。

影印件原文

伯达同志处缪秘书电话

1970. 8. 29 日晚 8: 05

伯达同志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表达了主席思想。不过，那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我记不清楚了。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不晓得这个意见对不对。”

### 4. 林立果亲笔写的与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的密谈要点



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林彪派林立果同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进行密谈。从林立果亲笔写的这个密谈要点中，可以看出林彪反党集团对庐山会议这一场斗争的估计和他们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狼子野心。

林立果写的这个密谈要点，是从林立果的住房中查获的。文中的“陈”，是指陈伯达。“吴”，是指吴法宪。“老总们”，是指黄、吴、李、邱。“歼7”是江腾蛟的代号。“W”是王维国的代号。“C”是陈励耘的代号。

影印件原文

与歼7、W、C讲

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的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还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 5. 吴法宪的亲笔交代

吴法宪的亲笔交代影印件原文

（一）七零年八月十三日下午，我在宪法工作小组会议上诬蔑“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等等以后，在会议中间我打电话报告了黄永胜，黄即打电话报告了林彪、叶群。散会后陈伯达约我同去他家里，陈伯达鼓吹我今天的话讲得好“敢于斗争”并要我把情况报告林彪。我回到家里又打电话报告了林彪，过了一回叶群回电话说：林彪很高兴，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二）八月十三日晚和十四日下午，叶群分别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关于天才方面和四个伟大方面的语录，准备在八月十四日晚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定稿时，支持吴法宪向党发动进攻。八月十四日黄永胜给李作鹏打电话说：吴法宪现在很孤立，要李作鹏回来参加宪法小组工作会议，支持吴法宪。叶群在北戴河也准备了大批天才语录卡片带上庐山。庐山会议初期，中央决定黄永胜在北京看家，黄永胜在政治局会议上几次提出，要上庐山参加会议，坚持不愿留在北京看家，并且违抗中央规定，擅自在军委办事组会上提出要邱会作、阎仲川留在北京看家。以后总理对黄永胜进行了严肃批评，黄永胜才勉强同意留在北京

（注：此事总理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指示要黄永胜留在北京）。黄还布置办事组秘书宋城把准备好的天才语录带上庐山。

（三）林彪八月二十三日下午讲话后，晚上叶群要我告诉李作鹏、邱会作：要我们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彪讲话就没有根据了；林彪讲话也没有点名，因此发言不要指名；布置我们串连空军、海军、总后一些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在会上发言等等。

（四）八月二十三日晚政治局会议上，我提出改变会议的两项议程，先讨论林彪的讲话。散会后林彪派他的儿子林立果同我讲：林彪表扬你，林彪说：你又“立了一功”。

（五）总理、康生同志于八月二十六、二十七两日连续同吴、李、邱谈话，要我作检讨，我于二十八日晚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林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六）八月二十六日以后，叶群不断打电话安慰我：你犯错误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七）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六日晚以黄永胜宿舍为活动中心，每天晚上和中午叶群、吴、李、邱都到黄永胜那里去开黑会，交换各组的会议情报。

（八）八月三十一日，叶群和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布置统一口径，强调山下山上没有联系，原来准备上庐山开神仙会，来庐山游玩照相的。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要牵涉林彪、黄永胜，吴、李、邱之间只讲自己，也互不涉及。

（九）九月七日黄、吴、李、邱同乘一个飞机回北京，在飞机上开黑会议论，①黄永胜说：坚持山下山上没有联系，原来没有想到，这是突然出现的情况。②强调八月十三日吴法宪电话报告引起来的问题。③黄永胜不准备作什么检讨。李、邱是否作检讨要看情况发展。吴作检讨只讲自己不涉及别人，主动承担责任，李、邱也不抱怨。④无论如何都不要涉及林彪、叶群、黄永胜，这是大前提。⑤回京以后总理、康生同志和政治局找我们谈话时事先要统一口径。⑥黄、李、邱都警告安慰我不要多说话，“言多必失”，要沉住气。

（十）七零年国庆节后大约十月六日或七日下午，林彪找我去谈过一次话，主要内容如下：①要我去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作所谓检讨，（这是第一次叫我作检讨），要说明庐山犯错误是出于突然的，在山下事先没有任何准备和联系，就是我八月

十三日反映的情况没有核实，林彪听了之后有气，所以在庐山就讲了话。我当时领会他这段话的意思无论如何不要牵涉到林彪、叶群、黄永胜，要说明山下山上无联系，会前无准备，来欺骗毛主席。②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受骗。③这次庐山犯错误第一是陈伯达，其次是你，如果因为你这次犯错误把你撤下来，暂时靠边站，也不能乱说乱道，以后会有机会替你说话，不要因为你一个人犯错误就倒一大片。

吴法宪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

6. 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林立果在庐山一次密谋后的合影

叶、吴、李、邱等在庐山接触十分频繁，经常在一起秘密策划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这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八月二十一日的一次密谋后，在庐山仙人洞合影留念。

注：右起：林立果、叶群、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

7. 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失败后，在九江机场飞机上的合影

一九七零年九月七日，林彪、黄、吴、李、邱下山到九江机场，由叶群导演，在飞机上合影留念，表示他们要进一步加强反革命勾结，伺机反扑。

注：右起：邱会作、黄永胜、林彪、吴法宪、李作鹏

## 第二部分

林彪反党集团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证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反党集团就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反党集团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拒绝毛主席、党中央的教育和挽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炮制了《“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他们成立了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制造舆论，训练特务，收买干部，从国外进口大批特务工具，设立地下活动据点，从各方面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 一、林彪擅自发布的所谓“第一个号令”

一九六九年十月七日，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十月十八日，由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正式下达。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采取“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主席报告。毛主席当即指示：烧掉。林彪、黄永胜等慌了手脚，为了掩盖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同时，又扣发和删改某些军区关于执行这个“号令”的报告，对毛主席、党中央封锁消息。这是林彪篡党夺权的一次预演。

注：林彪口授的“紧急指示”，是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李根清誊抄的，是从林彪住地查获的。

## 二、林彪、黄、吴、叶、李、邱的结盟反党活动

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背叛毛主席，背叛党，效忠林彪、叶群，结成死党。他们把五月十三日看作是林彪、叶群保他们“过关”的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他们都要举行向林、叶“效忠心”的活动。一九七零年五月，黄、吴、叶、李、邱同游长城，赠诗题词，摄影留念。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还向叶群写了一封效忠信，再次表示他们要“永远牢记”叶群的“教育深恩”。这是他们结盟反党的铁证。

吴、李、邱的“效忠信”原件（节录）

影印件原文

叶群同志：

今天是“五·一三”三周年，这是我们难忘的日子。

我们记忆犹新的是您——我们敬爱的叶群同志，对我们直接的指导帮助和支持，您日夜操劳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带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英明指示，一次又一次地亲临斗争第一线，同三军广大革命群众并肩战斗。所以，当“五·一三”事件三周年的时候，永远牢记您对我们的教育深恩，请接受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敬礼！

吴法宪

李作鹏

邱会作

一九七零年五月十三日

这是黄、吴、叶、邱、李（右起）同游长城，结盟反党的照片。

三、林彪给周宇驰、刘沛丰的亲笔信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林彪亲自写信给他的死党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反革命的“独立工作能力”。

影印件原文

周宇驰刘沛丰同志：

这两年老虎在你们帮助下能力上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

林彪

二月十六日

注：林彪的这封亲笔信，是从空军司令部查出的。“老虎”，是林立果的小名。

周宇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

四、吴法宪对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任职命令

在林彪口授“紧急指示”（即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的同一天，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旨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一九七零年八月，吴法宪又宣称：“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这样，吴法宪就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同时，吴法宪还狂热地吹捧林立果的所谓“讲用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

（69）政干任 字第 94 号 秘密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命令

——刘世英等任职——

任命刘世英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免去其空军第十五师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任命周宇驰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

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此 令

司 令 员：吴法宪

政治委员：王辉球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

#### 五、林彪的反动词《重上井冈山》及其谱曲

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长信，对林彪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林彪一直心怀不满。一九六九年九月，林彪授意别人代他作了《重上井冈山》这首反动词。他将别人代拟稿中的“坚信英明领袖”一笔勾掉，改为“志壮坚信马列”，将“何疑星火燎原”，改为“岂疑星火燎原”，明目张胆地抗拒毛主席的批评，要翻历史的案。他还歪曲历史，自我吹嘘。三湾改编，是毛主席一九二七年九月领导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的途中进行的，林彪根本没有参与。但他在词中却说什么“繁茂三湾竹树”，移花接木，贪天之功以为己功。

叶群、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把林彪的这首反动词谱成歌曲，一九七一年五月再次秘密录音。

影印件原文（注：为便于阅读批判，中央专案组加了标点）

西江月（重上井冈山）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录育容同志六九年词一首赠作鹏同志

叶群学字 一九七零年元旦抄

注：育容是林彪的原名。影印件的左上角是谱成的歌曲，左下角是秘密录制的演唱《重上井冈山》的录音带。

#### 六、林彪、叶群耍反革命两面派的一个记录

下面这个记录，是叶群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口授，由林彪秘书于运深手记的。林彪口口声声喊着“高举”、“紧跟”，但是“选文件”、“打电话”、

“参加外事活动”，却都要别人“提醒”“言不离主席”。这充份说明，林彪是一个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反革命两面派。

影印件原文

主任指示

1970. 4. 25 日下午

一、选文件、打电话时都要提醒，言不离主席。

二、首长参加外事活动时，也要提醒。

※三、你们要注意礼貌。如，接送主席他们虽然告诉我们不要去，只去一部车到车站，我和首长还是要去。不能只想一面。他们叫我和首长先走，我们不能走，要等主席的车走了以后，我们才能离开。

注：这个记录稿是从林彪住地查获的。

七、林彪打着“备战”的幌子，为篡党夺权进行的“七·二三视察”

一九七零年七月二十三日，林彪窜到国防科委所属某厂进行所谓“视察”。这次“视察”是异乎寻常的。事前，王秉璋背着党中央，同林立果、周宇驰、梁军等人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密谋策划。“七·二三视察”的当天，王秉璋组织了一万多人夹道欢迎，并带头大呼“忠于林副主席”的口号。自称有病怕风怕光怕出汗的林彪，竟在盛暑炎热的太阳地里走了两华里，接受欢呼。事后，王秉璋等人以国防科委党委的名义，为宣扬林彪的“视察”作出专门决定。决定中引用了林彪的十七句话，把它捧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行动指南”、“战斗号令”，要“坚信不疑”，“坚决照办”，并规定每年七月二十三日都要“进行一次认真的全面的检查”。这个决定，印了五万一千多份，发到国防科委所属系统的党支部学习、讨论、表态。这是林彪打着“备战”的幌子进行的一次反革命阴谋活动，是为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造舆论，做准备的。

林彪“七·二三视察”的两张照片

右起：第一人梁军（国防科委原参谋长）、第三人叶群、第四人胡敏（邱会作的老婆）、第六人邱会作、第七人林彪、第八人吴法宪、第九人李作鹏、第十人林立果。

右起：王秉璋、林立果、李作鹏、林彪、黄永胜。

八、林彪反党集团为发动反革命政变编造的陷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和收集的情报

在林彪指挥下，黄、吴、叶、李、邱秘密编造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甚至私设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密的“专案组”。林彪反党集团还大量搜集地方和部队负责人的动态情报。下面是从北京、广州等地查获的这种黑“材料”和情报的一部份。

九、林彪、叶群为研究反革命政变伎俩搜集的资料

两年、叶群为炮制和实行《“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大量搜集古今中外政变的资料，挖空心思地研究反革命政变和反革命谋杀的伎俩。

这是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处长）搜集和摘录的关于政变和谋杀事例的草稿，共二十八例，一百二十六页。抄正本已送林彪、叶群。这个草稿本是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

政变事例部份标题影印件原文

△ 拿破仑的两次成功的政变 △ 林肯被一演员暗杀

“雾月十八日政变” 纳赛尔由住室上车时遭卫士枪击

△ 戊戌变法与八月政变 △ 本·贝拉险遭“舞蹈演员”暗杀

△ 奥国皇储被刺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线。 △ 哈桑在外出途中被人用冲锋枪袭击。

△ 罗马古国的英雄恺撒被刺死

十、周宇驰在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一次会上的发言记录（节录）

一九七零年五月二日晚，林彪、叶群“接见”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五月三日晚，王飞、周宇驰召集会议，向林彪表“忠心”，无耻吹捧林彪是“革命导师和领袖”，吹捧林立果是“全才”，并提出由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要以林立果“为头”、“为核心”。

影印件原文



绝密

座谈会记录

一九七零年五月三日晚上八时至十二时

周宇驰同志：

我们要永远坚信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主席也就是忠于毛主席。

要知道，林副主席也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恩、列、斯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

我们要一辈子永远同立果同志战斗在一起。立果同志也是一个天才，一个全才，我们没有那个人能够和他比得上。他对我们的关心爱护也是没人能比得上的。他在各方面都是把着手教我们，在政治上工作上直接领导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考虑过很久，觉得到提出来的时候了。就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总要有一个头。在我们这个战斗集体中，应该以立果同志为头，为核心。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认识，这样的觉悟。实际上，也只有他才能当得起这个头和核心。这是客观的需要，斗争的需要。这不是“多中心论”，而正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领导核心。

注：这个记录，是周宇驰亲自修改的，是从空军党委办公室查出的。

十一、“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原稿

“上海小组”，是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建立的法西斯特务组织。这个小组由蒋国璋、裘著显等八人组成，受林立果直接领导。

影印件原文

入组须知

本小组的任务，是为完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交待的各项任务。因此，每个成员必须具有无限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于敬爱的林副主席、忠于叶主任、忠于林副部长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为完成这些光荣任务和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安全过程中，应不惜牺牲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还必须做到：

一、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林副主席的指示；

二、坚决执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各项命令。尤其是小组的最高领导——林副部长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

三、经常如实地汇报情况。应根据任务的性质向有关领导勤汇报多请示。在必要时，小组成员可以直接向林副部长报告情况；

四、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要注意自我革命，处理好“跟上、靠下、正确对待自己”的关系；

五、严守机密。小组的一切活动均是绝对秘密，未经请示和未得指示时，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和了解情况。

注：“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原稿，是从林立果在广州的秘密据点缴获的。

## 十二、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特务情报活动

一九七一年二月八日，周宇驰在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布置收集情报。下面是他在这次黑会上的讲话记录，是程洪珍手记的。

程洪珍，空军党委办公室一处原秘书。程洪珍的亲笔记录，是从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中缴获的。

影印件原文

8 / 2 下午

舰队会议。

周：

一、讲报情况、掌握情况的问题：

1. 情报的重要性
2. 重要情况与非重要情报上边与下边比，上边重要
3. 死情况与和（活）情况，要活情况重要
4. 等情况与主动搜集情况不满足于等情况，应主动挖掘新情况
5. 每个人每个时期都连续不断地掌握一两个问题

二、报情况：

简明、扼要，一语道破

## 十三、林立果在上海秘密召开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

一九七一年二月，林彪、叶群、林立果在苏州继续策划反革命政变。二月下旬，林彪、叶群派林立果去上海、杭州找他们的同夥研究制定反革命政变纲领。三月下旬，按照林彪的旨意炮制了《“571 工程”纪要》。三月底，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开了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这次会议，对执行《“571 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计划，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对这次会议，程洪珍在日记上作了记载。江指江腾蛟，王指王维国，陈指陈励耘，周指周建平。

影印件原文

会谈是成功的，达到预期效果。

团结的气氛比较好，介决了对当前东南形势的看法、认识。

(1) 主要矛盾在上海、在张、姚，统一了认识，

(2) 加速我们的准备

(3) 组织上明确了：

三点，每点的头都

上海——王

杭州——陈

南京——周

互相配合，江进行定点联系，配合、协同作战，没授于指挥权

注：程洪珍的亲笔日记，是从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中缴获的。

十四、于新野关于“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的记载（节录）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彪黑司令部策动他们的死党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于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三日晚召开反革命黑会，讨论了中央会议的形势，讨论了林彪黑司令部“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

影印件原文

1971. 4. 23 日晚

周、刘、于（注：指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

形势：

◎会议 15 日夜开（注：指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

周讲了目的（注：指周总理四月十五日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

——批陈整风，达到团结胜利

编组和庐山一样。

——算旧帐姿态。

黄、吴、李、邱、叶会前写了书面检讨。

△上海王洪文、徐景贤冲锋陷阵除攻打军委办事组外，把王维国、陈励耘点名了。

◎根据斗争形势，准备加快、提前。

保密。

——微冲图纸（注：指微型冲锋枪的图纸）

——枪不搞仪式

防止出内奸、叛徒。

注：于新野的这个记载，是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

#### 十五、周赤萍对林彪的吹捧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周赤萍（福州军区原政委）再版抛出《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一书。书中吹捧林彪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他们在九月反革命政变前的几个月内，将这本书再版三百多万册，向军内外广为散发。下面是这本书的节录。

林总是最了解他的部队的，他熟悉干部的音容笑貌，熟悉部队的军事、政治动态，清楚部队的长处短处，知道他们挑得起多重的担子。他信任部队，部队也信任自己的统帅。

林总的非凡的天才，最丰富的革命斗争的实践，渊博的学识，以及他的谦虚、平易、简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和巨海般的胸怀，使得林总在部队中，在东北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

林总不仅是我们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我常常怀着激动的心情，怀念着四十年代那四年不寻常的日子。

## 十六、林彪反党集团为篡党夺权

制造的反革命舆论（刘锦平反党讲话记录的节录）

林彪反党集团按照《“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提出“当前的斗争就是保卫接班人的斗争”的反动口号，到处进行所谓“路线交底”的反革命活动，为林彪发动政变，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下面是刘锦平（民航总局原政委）秉承林彪的旨意，一九七一年六月在上海进行所谓“路线交底”时散布的反革命言论，是林立果秘密建立的“上海小组”成员郭永诚记录的。

影印件原文

批陈没结束，新的斗争苗头已经看到很明显，有那么几个人做文章，矛头对着林副主席，一时很嚣张。新的条件下，X（注：指两条路线斗争）越来越成为阶级斗争的新形势，X（注：指两条路线斗争）越来越敏感、明显、复杂，焦点就是接毛主席的班。是承认林副主席，还是另外选一个什么人。

历史证明，没有那一个能与林副主席相比，不能有另外的接班人，要警惕，防止另外的人抢班。写上了是一回事，是否所有人都承认，能否实现，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可能要斗争，并可能产生严重的斗争，思想上、组织上要做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当前的斗争就是保卫接班人的斗争。

## 十七、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一次黑会的记录原件（节录）

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六日，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开了一次所谓“整风”会议。这次黑会，是在林彪反党集团发动九月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前夕召开的。他们从反革命的立场出发，估计了形势。他们所谓的“酝酿新‘战争’”、“‘战争’的突然性”、“加强‘战备’”，就是指林彪反党集团要突然发动袭击的反革命武装政变。

影印件原文

会议 1971. 8. 26

成绩很大。

要看到不足，与形势不适应的东西

由明争转入暗斗

相持、相对和平友好，酝酿新“战争”

不要麻痹，要有思想准备。

由对外斗争转为巩固阵地

“战争”的突然性很强，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也一样。

思想、组织、行动上加强“战备”

过双重组织生活

学习问题，搞政治的要学一点技术，搞技术的也要学政治

不能搞私心杂念，不能搞个人主义。要有共产主义思想、精神、风格，“舰队”是战无不胜的，但“舰队”成员是不是能一直跟着前进。不能吃老本，不断立新功。

要有“欠帐感”。

要很严肃、很朴实、

注：这次黑会的记录，是于新野手记的，是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

十八、林彪死党林立果等建立的反革命秘密据点

林彪指使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设立了十多处反革命秘密据点。他们在这些秘密据点里，召开黑会，秘密串连，收集情报，训练骨干，策划各种阴谋活动。下面是一部份秘密据点的照片。

十九、从秘密据点缴获的林彪反党集团进行反革命政变活动的大批器材

在北京、上海、广州的秘密据点中缴获器材的一部份

各种收发报机

窃听器、微型录音机

特制自编密码电话设备

二十、周宇驰秘密进行驾驶直升飞机的飞行训练

在林彪的指使下，一九七一年五月，林彪死党周宇驰开始进行秘密飞行训练。七月至九月初，周宇驰以练习直升飞机的飞行作掩护，先后飞到南昌、庐山、广州、郑州、北戴河等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

注：上面的照片，是从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中缴获的。左上角是林彪死党周宇驰。

#### 二十一、林立果秘密进行驾驶水陆两用汽车的训练

林彪死党林立果，私调和仿造水陆两用汽车，在北戴河海面进行驾驶训练。

林立果驾驶水陆两用汽车的照片，是从林立果在北京的秘密据点缴获的。下图左下角是林彪死党林立果。

### 第三部份

林彪反党集团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失败后叛国投敌的罪证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反党集团按照《“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破釜沉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在林彪直接指挥下，他们妄图乘毛主席巡视南方的机会，谋害毛主席，并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当这一反革命计划破产后，林彪又阴谋携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部署，他们蓄谋已久的极其恶毒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林彪感到阴谋败露，末日来临，带着老婆、儿子和几个死党仓惶逃命，狼狈投敌，叛党叛国。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时半，林彪所乘外逃的 256 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黄、吴、李、邱在林彪叛国投敌以后，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毁灭了大量罪证。

#### 一、林彪反革命政变手令

林彪这个反革命政变手令和下页的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都是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乘直升飞机外逃时随身携带的。直升飞机被我迫降后，周宇驰为毁灭罪证，将这两个反革命文件撕碎，后由我有关部门将在现场搜集到的碎片拼对复原。据参与反革命政变并亲自看过这个“手令”的江腾蛟、胡萍、李伟信等十几人交代，反革命政变手令原文是：

“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 九月八日”

## 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林彪给黄永胜的这封亲笔信，是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由刘沛丰从北戴河带回北京的。九月十一日傍晚，林立果将这封亲笔信交给王飞，要王飞和黄永胜取得联系，充当林立果、黄永胜之间的联系人（参看下页王飞的亲笔供词）。

影印件原文

永胜同志：

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

林彪

## 三、王飞的亲笔供词

注：王飞，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

王飞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林立果、周宇驰要我给黄永胜送东西，并把“带交黄总长亲收”的大信袋装的东西交给我。十日，我把它送给了黄永胜，向黄说明是“晋草”（叶群代号）和林立果两人送的，黄说，“噢，是叶主任送的。”我向黄转达了叶群、林立果向黄问候的话。我向黄转达了周宇驰告诉我的他得到的关于毛主席同某地负责同志的谈话内容的情报。黄表示对叶群、林立果感谢。

十一日下午，林立果在西郊机场召开的黑会上，确定在南方动手谋害毛主席，钓鱼台留给黄永胜他们去搞。会后，林立果、周宇驰提出要我当林立果和黄永胜之间的联系人，并交给我一封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信的大意是：“我很惦念你，



望你保重身体，现在形势紧张，有事找王飞同志洽商。”要我必要时给黄永胜送去。林立果、周宇驰的意思是由黄永胜负责统一指挥。十一日夜，叶群、周宇驰打电话告诉我，毛主席已离开上海，“解除任务”。十二日上午，刘沛丰把这封黑信拿回去。十二日晚，林立果、周宇驰向我谈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反革命计划之后，我召集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等研究执行这一反革命计划时，于新野在黑会的中间，把这封黑信又交给了我。十一点多，周宇驰电话告诉我“暴露了，不搞了。”我把这封黑信还给了于新野。

王 飞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四、在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前夕，叶、黄、吴、李、邱进行频繁的电话联系

军委总机通话记录单

军委总机话务员马建英等六同志的揭发

影印件原文

在林贼叛国投敌前，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反革命串连的电话频繁。根据我们的通话记录单记载，仅九月六日到十二日通过军委电话总机接转的电话有 51 次（不包括自动电话）。其中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机与黄永胜通话 16 次，与吴法宪通话 5 次，与邱会作通话 10 次，共 31 次 948 分钟。他们通话在五十分钟以上的有 8 次。七、八、九、十二日四天，叶、黄通话前后，黄又与李作鹏通话 7 次。九月十日黄给叶打电话 3 次，叶给黄打电话 2 次，在这五次电话中，一次长达 90 分钟，一次长达 135 分钟。

九月九日半夜，在叶群与邱会作的老婆胡敏通话时，黄永胜、吴法宪同时争着要与叶群通话，在叶与胡说完之后，黄永胜与叶群通话 90 分钟，吴法宪几次催促要与叶群通话。

通话登记表中的代号：300 号是林彪、叶群；1③、1⑤号是黄永胜；730③、4 号是吴法宪；70、8②号是李作鹏；905③、905④、3 号是邱会作。

军委电话总机话务员：

马建英 张秀芳 董祥茹

吴伟志 安俊改 刘春梅

1971 年 10 月 3 日

五、叶群亲笔写的几个反革命政变骨干分子的代号

（影印件原文见下页）

注：叶群亲笔写的几个反革命政变骨干分子的代号，是从林彪、叶群外逃时准备带走的一个本子中查获的。金钟、铜铃是周宇驰的代号。黄翔、阿飞，是王飞的代号。催子、榑子，是刘沛丰的代号。代号后的数目字，是他们的电话号码。

叶群亲笔写的几个反革命政变骨干分子的代号

影印件原文

金 钟

铜铃 5. 2565

黄 翔

阿飞 5. 2561

催 子

榑子 家 5. 2571

李 民 （鲁明）

原林彪办公室工作人员写的证明影印件原文

经我们识别，这个本子第 27 页上的铅笔字“金钟 黄翔 催子”和红油笔字“铜铃 5. 2565 阿飞 5. 2561 榑子 家 5. 2571 李民（鲁明）”都是叛徒、卖国贼叶群的亲笔字。

李春生 于运深

李文普 李根清

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五日

李伟信的笔供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阴谋政变期间，反革命分子周宇驰对我说：要更改三个人的代号，以后我叫‘金钟’，刘沛丰原叫‘榑子’，现改‘崔子’，王飞原叫‘阿飞’，现改‘黄翔’。而且要我把这三个人更改的代号，告诉‘舰队’的其他成

员。其他‘舰队’成员也都有代号。刘沛丰说过，这些代号都报给了林彪、叶群。这些代号是反革命武装政变时联络用的。

李伟信

一九七二年.三.十七.

六、黄、吴、李、邱等人向林彪、叶群报送的情报

顾同舟的信（节录） 叶群手记的黄永胜等九月上旬密报的情报

注：林彪为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千方百计探听毛主席的行动，窃取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的谈话内容。黄、吴、李、邱等人，经常向林彪密报毛主席的动向，这是他们向林贼密报的情报的一部份。

叶群手记的情报，是从林彪、叶群外逃时准备带走的文件中缴获的。广州军区空军原参谋长顾同舟的信，是从周宇驰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

七、程洪珍关于林彪反党集团谋害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阴谋活动的记载

程洪珍的笔记影印件原文

钓鱼台地图

孙水森 化学武器

炸药、刘世英

9/9 后天早晨

十次特快，接关政委

四号门

明早十六次特快

长沙——北京

程洪珍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这是我的笔记本，上面是我七一年九月九日记的要办的事。

1. “钓鱼台地图”。九月九日早晨，在空军学院黑据点，周宇驰要我把办公室墙上挂的北京市地图（地图有墙的三分之一那么大）有钓鱼台的地方描下来，上午交给他。我描好后，下午四、五点钟交给了周宇驰。周宇驰用铅笔标了方位，然后又说我描得不行，要我到办公室取原来的地图。（此事办完后划了杠）

2. “孙水森化学武器、炸药、刘世英”。九月九日晨七点左右，在西郊机场黑据点，周宇驰对我说：“国防科委和空司科研部研制了一种关于化学武器或炸药的东西，有个文件。你告诉刘世英，叫他向科研部要来。或者你向孙水森（王飞的秘书）要，要来后交给我。”上午我向孙水森讲了周宇驰说的话，孙水森把这个文件交给了我。下午四、五点钟，我交给了周宇驰。（此事办完后划了杠）

3. “9/9 后天早晨，十次特快，接关政委、四号门”。这是周宇驰在电话里告诉我的，要我到火车站接关光烈，住在四号门（反帝路招待所）。后来又来电话，说由他亲自去接。（我把此事划了杠）。

4. “明早十六次特快，长沙——北京”。广州的顾同舟来电话讲：“总管（广州空军司令部管理处长陈伯羽的外号）从长沙坐火车到北京。”我查了火车时刻表，是十六次特快。我报告了周宇驰，周宇驰讲是陈伯羽来了。

程洪珍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

注：程洪珍的亲笔供词中提到的关光烈，是驻河南某师原政委。关光烈来京，是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活动的。

程洪珍的笔记，是从程洪珍随身携带的手提包中缴获的。

#### 八、林彪反党集团为谋害毛主席准备使用的伊尔—10 强击机

下面是空军某部队一九七零年冬改装的伊尔—10 飞机。改装后的这架飞机，可以超低空飞行，具有很强的摧毁力。

陈励耘供认，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到现场看了这架飞机的飞行和火箭打靶。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反党集团派于新野到杭州同陈励耘密商了用这架飞机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恶计划，于新野并说，准备于九月十日从北京派驾驶员去。

注：机身下面挂的是炸弹，机翼下面是火箭发射架。

#### 九、鲁珉的亲笔供词

鲁珉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晚约八点半钟，我被江腾蛟用汽车拉到西郊机场的平房里，林立果看到我就说：现在要进攻啦，付统帅有命令，拿出来给他们看看，周宇驰就拿来一张硬白纸林立果递给了我，我看到是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的命令办 林彪 月 日。林立果说：现在情况很紧张，马上要召开三中全会，会一开林副主席就不占优势了，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江腾蛟你这个歼一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指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成就看鲁部长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依尔—10 轰炸。九月十二日晚我参加了王飞召集的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七人黑会。

林彪一夥要我去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不肯去干，我就有意把眼睛搞红肿了，第二天住进了医院。九月十四日我主动向党中央投案，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并揭发了林彪一夥的阴谋。

鲁珉

1971 年 9 月 18 日

注：鲁珉，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原部长。

## 十、江腾蛟的亲笔供词

### 江腾蛟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深夜，林立果、周宇驰把我叫到西郊机场平房子，要我看了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命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的命令办。林彪，九月八日”。林立果说，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地区动手（指谋害毛主席）。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第一线指挥员。北京由王飞负责指挥攻打钓鱼台。你到上海去，办法有三条：一、用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打火车；二，调几门 100 高射炮平射打火车，并要空四军教导队以抢救主席为名往上冲；三、实在不行，就要王维国乘主席接见时动手。我和周宇驰又补充了两条：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把□□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我画了油库和停车站的位置图。林立果说，首长（指林彪）讲，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九月十一日晚，林立果、周宇驰、鲁珉和我，在西郊机场继续策划在上海地区谋害毛主席。林立果对鲁珉说，你到上海去是他（指我）点的将。我们决定派你到

上海去，先和王维国政委研究一下，你就到□□去组织指挥炸铁路。把火车炸坏了以后，就带着部队冲上去动手。鲁珉说，用轰炸机炸更励（厉）害。

江腾蛟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注：江腾蛟亲笔供词中的军用机场地名，是中央专案组影印时略去的。

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前政委。

#### 十一、林彪反党集团为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秘密描绘的钓鱼台地形图

林彪反党集团密谋策划武装攻打钓鱼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林立果、王飞、江腾蛟、关光烈、于新野五人，偷偷地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这张钓鱼台地形图，是周宇驰指使程洪珍描绘的，方位是周宇驰写的（参看 60 页程洪珍的亲笔供词）。

注：这张钓鱼台地形图，是从于新野的保险柜中查获的。

#### 十二、王飞的亲笔供词

王飞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晚，林立果、周宇驰要我去空军学院，林立果说，现在情况紧张，有人要害林副主席，火药味已经很浓了。我说，我们坚决保卫林副主席，然后林立果拿出一张纸给我看，上面写着：“希望按照立果、周宇驰传达的命令办事。林彪九月 X 日”（具体话记不准了）。林立果说，要坚决把反林副主席的人除掉。有一坨在南方，有一坨在北京，要同时干掉。南边的由江腾蛟负责，北京的由你和周宇驰负责。他们都在钓鱼台，好搞。估计南边江腾蛟那里没有什么问题，就看你们这里了。机不可失，一定抢在他们动手之前。我说林副主席叫干就一定干。

十一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找到江腾蛟和我，中间又加关光烈，在西郊机场进一步策划谋害毛主席和中央首长。林立果说，林副主席的决心已定，提出“南线”先搞，北京接着搞，并提出了通信联络的方法和密语。

策划攻打钓鱼台，林立果提出用空司警卫营坐上卡车硬冲，并看了钓鱼台的地形。还提出用坦克冲、用火箭炮轰，用轰炸机炸，还要借接待外宾时在机场动手，认

为都不行。我提出要林副主席召集会议会上搞，也不行。最后林立果说，钓鱼台留给黄永胜他们去搞。

王飞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十三、王飞等七人黑会拟定的随从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人员名单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毛主席离开了上海。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部署，他们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林彪阴谋携带黄、吴、叶、李、邱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九月十二日晚九时许，由王飞、于新野召集刘世英、鲁珉、贺德泉（即贺德全，空军司令部某部原部长）、朱铁铮（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处长）、郑兴和（空军司令部某部原处长）等开“七人黑会”，拟定了随从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的行动计划和人员名单。

这个名单是从周宇驰、于新野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名单上的大部份人名是刘世英写的，一部份人名是于新野写的。

十四、刘世英的亲笔供词

刘世英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凌晨一时左右，林立果在空军学院向我、刘沛丰、程洪珍和李伟信讲：“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个人用”！接着，他就拿出林彪用红铅笔写的：“盼照立果、宇驰同志的命令办”的密令，给我们传阅以后，他又讲：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即“武装起义”！

九月十二日晚九点多钟，王飞和于新野在空司大楼又召集我、鲁珉、贺德泉、朱铁铮和郑兴和等人，参加了关于组织政变人员随林彪去广州阴谋另立中央的黑会。王飞向我们讲：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我们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明晨（十三日）由西郊机场乘飞机去广州，到广州后另立中央，并与苏联搞联合等。

在这次黑会上，王飞和于新野组织我们拟定了去广州的人员名单，我记得有二十三人，编为六个小组，并研究了行动时的有关具体问题。如出发时间、车辆安排、如何分工串联，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和配发枪支等等。

刘世英

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注：刘世英，空军党委办公室原副主任。

#### 十五、林彪等南逃广州准备乘坐的飞机起飞时间表

下面是林彪、叶群和黄、吴、李、邱等南逃广州准备乘坐的三架主机的起飞时间表，是周宇驰亲笔写的。这张起飞时间表，是从周宇驰等外逃乘坐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直升飞机被我迫降后，周宇驰为毁灭罪证，将这张单子撕碎，后由我有关部门将在现场搜集到的碎片拼对复原。

#### 十六、李伟信关于南逃广州飞机途经上海给王维国的电话通知（李伟信的日记）

影印件原文

立即告 W

（1）明日有一架依尔—18，下列人员随机出发：小组全体，教导队全体，全部武装，除个别有问题，多少人，120，卢、张，所有能来的种子，如刘、刘、戚、曹、卢、林。

（2）告 W 明日上机场，有话告他。

（3）准备 80—90 人住宿，……人员隐蔽。80—90 人撤后上机就走。

（4）带一套军装（过把款今晚送家）带些钱、粮票、布票。

（5）保密！！！全局告蒋请蒋告 W

“对这种行动意味什么，电话不好讲，请他自己考虑。”

李伟信的亲笔供词

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六时多，周宇驰告诉我，明日有架大飞机去上海，另外还有两架大飞机直飞广州，一架林彪他们坐，另一架黄、吴、邱、李和其他人坐。你们乘‘依尔—18’去上海，到了上海再去广州，设法请飞机上 80—90 个



穿黄裤子的井卫部队下来，给他们找好住的地方，换上上海小组、教导队等人一起去广州。周宇驰要我把‘依尔—18’这架飞机要去上海的情况，通知上海小组蒋国璋，并要蒋立即报告 W（王维国代号）。还叫过全准备粮票和钱。要他们一定要保密，这是全局的事。周宇驰后来还补充说了一句，叫蒋国璋再转告王维国一句话“对这种行动意味什么，电话不好讲，请他自己考虑”。

以上这些事，我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简要的记录在我的小红皮日记本上。

李 伟 信

一九七一、十、十一、

注：过全，空四军管理处原副处长，“上海小组”成员。

十七、胡萍的亲笔供词

胡萍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九日晚七、八点钟，反革命分子吴法宪给我打电话说：“叶主任（叶群）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飞机一定好好检查，另外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

九月十日晚十一时以后，反革命分子叶群给我打电话说：“那位小将（指林立果）都给你谈了吧，谈的好吧？”我说：“谈的很好。”叶说：“要你准备飞机是不是还有难处？”叶接着又说：“这件事我和胖司令（吴法宪）都说好了，用不着想的太多。”叶还说：“再说立果和胖司令也都作了安排的，你要抓紧准备。”

九月十二日下午四时以后，周宇驰和我安排十三日反革命政变飞机。周说：“主席最近找了很多军区的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林彪）看这形势很不好，就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三叉飞机 256 号今天送林立果回山海关，首长走时就就用这架飞机。准备一架依尔—18，十三日七时起飞，我们俩坐上去山海关，然后和首长坐 256 号飞机一起飞广州。依尔—18 拉上部队到上海落个地，再飞去广州。再准备一架多坐三叉飞机，拉上黄、吴、李、邱和机关的人，十三日八时直飞广州。由王副参谋长（王飞）指挥。还调一架安—24. 一架安—12 飞机运上两架直升机，都飞去广州。吴法宪还交代把大飞机也都准备好，随后调去广州。”十二日晚十时以后，吴法宪打电话告诉我说总理追查 256 号飞机的事，我知道一定是中央查（察）觉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于是我就一面找人造假说谎应付

追查，一面给周宇驰通风报信，要他打电话告林立果早打主意，同时又给已去山海关的潘景寅打电话，假借发动机有故障，飞机不能回来，好留下林彪使用。在林彪坐 256 号飞机叛逃以后，十三日中午十二时在西郊候机室，吴法宪怕我暴露事情真象，就拍着我的肩膀说：“没有你的事，你回医院休息去。”于是就叫秘书用他的汽车把我送去医院。

胡 萍

一九七一年十月四日

注：胡萍，空军司令部原副参谋长。

十八、李作鹏篡改中央命令的阴谋和山海关机场值班记录、值班员的说明  
毛主席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当晚十时半左右，中央根据林立衡向八三四一部队的报告，立即追查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并由中央下达命令，必须有周总理以及当时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联名指示，256 号飞机才许起飞。但是，李作鹏在向驻山海关机场某部下达命令时，竟两次篡改中央命令，将四人联名指示放飞才放飞，篡改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林彪乘飞机逃跑时，李作鹏没有采取任何阻止飞机起飞的措施。林彪叛国投敌后，李作鹏打电话要山海关机场值班员修改值班记录，值班员坚持不修改值班记录。李作鹏又将山海关电话报来的值班日记，亲笔加以篡改，另行誊抄后，报送中央，掩盖他篡改中央命令的罪行。

#### 1、李作鹏亲笔篡改的山海关机场电话报告的值班日记原稿

影印件原文

海航 师调度室（山海关）值班主任李万香

值班日记

九月十三日

〇点〇六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联合命令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

（这时，场站潘站长、史政委、赵副站长、佟参谋长均到调度室，李万香向他们传达了李政委的指示）

注：上面影印件中的修改处，是李作鹏的亲笔字（影印件原文中，划——处是李作鹏增加的，划□□处是李作鹏删去的）。部队番号，是中央专案组影印时略去的。

## 2、山海关机场值班记录原件的影印件（节录）

注：林彪一夥将 256 号三叉戟的呼号改为 252，借以掩盖林彪为发动反革命政变调用飞机的阴谋。

部队番号，是中央专案组影印时略去的。871，是值班员李万香同志的值班代号。

## 3、山海关机场值班员李万香同志的说明

值班员李万香同志的说明影印件原文

1、9 月 12 日 18 点 22 分，我接李海滨（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当时在山海关机场）电话：19 点来一架 252 号三叉戟。但 20 点 15 分降落山海关的却是 256 号飞机。李海滨告诉我，对外只讲 252，不准讲 256。23 点 44 分，李作鹏来电话查问飞机号码，我回答是 256。而后请示李海滨，李说还是讲 252。我于 23 点 50 分打电话给李作鹏将机号改为 252。

2、23 点 35 分李作鹏来电话：告诉你，它（指飞机）的行动听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我的指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李作鹏又于零时零 6 分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来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责任。”可是事件发生后，13 日下午李的秘书刘继祥来电话找我更正李的电话内容。他说：李政委说的是四个首长联名指示放飞才放飞，不是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要我好好想一想。我即回答：李的两次电话从未说到联名指示的问题，我是这样听的，也是这样记录的。李作鹏要修改他在电话下达的命令，显然是有阴谋的。

3、山海关机场站长潘浩同志怕飞机强行起飞，即于 13 日零时 20 分电话请示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答：“可直接报告请示总理。”但是李作鹏并没有采取任何阻止飞机起飞的措施。在飞机强行滑出时，场站副站长赵雅辉同

志向李作鹏作了报告。李答：“好吧！就这样吧！”（这一情况是事后赵对我们说的）零时 45 分，李作鹏又来电话向场站史政委问了飞机飞行的方位、距离。关于飞机强行起飞的一切情况，我们没有向总理报告过。

山海关机场航行调度室主任 李万春

值班代号 871

1972 年 4 月 7 日

#### 十九、林彪、叶群仓惶逃命时丢下的准备带走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

林彪、叶群从他们的死党那里，得知中央追查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感到阴谋败露，末日来临，立即仓惶逃命，狼狈投敌。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二日晚十二时左右，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几个死党，钻进林彪的汽车，以很快的速度向山海关机场逃跑。他们外逃准备带走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外逃前已装进叶群专用汽车的后备箱里。但是，他们急于逃命投敌，叶群的汽车没有来得及开动，这些文件他们也顾不上拿了。

#### 二十、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叛国投敌时的狼狈相

林彪、叶群急于逃命投敌，他们从北京运到北戴河准备带走的珠宝等大批珍贵物品都顾不上带了（见甲图）。林彪的帽子掉了，大衣扔了，叶群的头巾丢了，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和日用品也来不及拿了（见乙图）。在逃跑的途中，林彪等所乘汽车的右前灯也撞坏了（见丙图）。这说明，林彪、叶群等几个叛徒卖国贼逃命时，是多么惊慌，多么狼狈。

#### 二十一、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目击记

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目击记影印件原文

我们在机场亲眼看到叛党叛国分子林彪、叶群、林立果及其死党刘沛丰等人仓惶逃命，狼狈投敌的情形。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点二十二分，林彪一夥乘坐红旗轿车，极高的速度开到停在机场的三叉戟飞机附近。车还未停稳，林彪一夥就急忙下车。叶群、林立果、刘沛丰等拿着手枪，乱喊乱叫：快！快！快！快！快！快！快！飞机快起动！飞机快起动！叶群披头散发，林彪光着秃头，慌慌张张地跑到

飞机驾驶舱门底下，在没有客机梯子的情况下，这伙叛徒卖国贼慌忙顺着驾驶舱的小梯子，一个一个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叶群往上爬的时候，林彪紧跟着往上爬，林彪的秃头都顶着了叶群脚。他们没等机组人员上齐，连付驾驶员、领航员、通讯报务员都没有上机，飞机滑行灯也没敢开，机舱门还未关上，飞机就急促起动，强行滑出。在滑行中，右机翼撞坏停在滑行道旁的加油车罐口盖，刮掉了机翼上的铝皮，撞碎了机翼上的绿色玻璃灯罩和有机玻璃等。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情况下，便在一片漆黑中，于零点三十二分，强行起飞，仓惶逃命。

赵雅辉 佟玉春 王学高

周振山 刘三儿

一九七二年四月七日

注：赵雅辉等五位同志，都是林彪等所乘 256 号三叉戟飞机仓惶逃命时的现场目击者。

赵雅辉同志，山海关机场场站副站长。佟玉春同志，场站参谋长。王学高同志，场站油料科科长。周振山同志，场站机械师。刘三儿同志，场站油车司机。

二十二、林彪、叶群所乘 256 号三叉戟飞机仓惶起飞时碰坏的加油车顶部和飞机右翼碰下的碎片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点三十二分，林彪、叶群等所乘 256 号三叉戟飞机，仓惶逃命，投奔苏修，叛党叛国。飞机在强行滑行中，右翼碰坏了机场加油车的顶部。

下图：经过鉴定，是林彪、叶群等仓惶逃命时所乘三叉戟飞机的右翼航行灯与加油车顶部相碰时掉下的碎片。

二十三、林彪、叶群等叛国投敌所乘三叉戟飞机坠毁的现场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二时半，林彪等叛国投敌所乘的 256 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林立果等全部烧死，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下面两张照片，是我驻蒙使馆人员在现场拍摄的。照片上有蒙方人员和我驻蒙使馆人员。下图箭头指示处，是三叉戟飞机的机号 256。

#### 二十四、周宇驰等所乘外逃被我迫降的直升飞机

林彪死党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在得到林立果的电话通知以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三点多钟，乘直升飞机向蒙古乌兰巴托逃跑，投奔苏修。这架直升飞机被我迫降在怀柔县境内。被骗去驾驶直升飞机的陈修文同志，在机上与叛徒搏斗，光荣牺牲。直升飞机迫降后，周、于二贼自杀，李伟信和另一驾驶员陈士印被我活捉。从直升飞机上缴获了林彪叛国投敌的大量罪证。

注：右下角是林彪死党李伟信。

#### 二十五、从被我迫降的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林彪叛党叛国罪证的一部份

1、北京——蒙古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次克航行图

2、苏联伊尔库次克机场和恰克图导航台资料

伊尔库次克机场

位置：在伊尔库次克城东南 8 公里。标高：500m.

跑道：116—296 2750x60 (m) 水泥

导航台：116 方向 远台. 1R/514 3681m (距跑道端)

近台. 1/250 900m (距跑道端)

296 方向 远台 CN/514 3660m (距跑道端)

近台 C/250 960m (距跑道端)

恰克图导航台

位置：在恰克图城.

呼号：RT 频率：695

3、从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林彪一夥盗窃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的一部份

4、从直升飞机上缴获的林彪一夥盗窃的大量美元

#### 二十六、李伟信的亲笔供词

李伟信的亲笔供词影印件原文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晨一时多，反革命分子周宇驰来到空军学院，对我和于新野说：“明日去广州的计划不行了，肯定没有飞机了，‘立果’已给我打过电话，他们争取走，叫我们能走都争取走，咱们只能用直升飞机跑。”到机场又找了一名飞行员，加满油，三时多起飞。上飞机时，周宇驰对我说：“你在后舱，我与于新野和两个飞行员在前舱（前后舱不通的）冲锋枪给你，在后边以应付万一情况。”因前舱坐不下四个人，于新野又来后舱。在飞行中，我问于新野：“我们今日将会是怎样的结果。”他反动的说：“不成功便成仁。”飞机飞了二个多小时，被迫降落在荒地里，一下飞机，我见前舱一个飞行员的头已倒在玻璃上，于新野下飞机又向座舱打了一枪，一会周宇驰浑身是血走下飞机，骂于新野为什么乱开枪，这一枪正好打在他手腕上，他还狠毒地说：“那个飞行员故意制造罗盘故障，实际离北京没多远，我把他打死了！”周宇驰提着枪，叫我在前面开路，叫于新野扶着他，走了一段坐下休息，周宇驰又绝望的说：“看样子走不了，今天我们要死在这里了”，过一会又说：“有两个死法，你们怕的话，我先把你们打死，我再自己死，你们不怕，都自己死！”沉默一会于新野对周宇驰说：“还是自己死，你喊一、二、三，咱们同时开枪！”我表示同意自己打。反革命分子周宇驰有气无力地喊：“一、二、三！”周、于自杀，我放了空枪，向当地驻军和民兵投降自首！

李 伟 信

一九七一年十月十一日

中 共 中 央 办 公 厅

一九七二年七月三日印发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北京军区等单位关于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的报告

1972年7月27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北京军区、陆军六十六军、天津警备区3个单位党委的报告。

同意北京军区提出的对部队进行政策纪律教育，坚决退还占用地方的房屋、土地、生产资料和纠正不正之风所采取的措施。

中央在批示中指出：占用学校、医院和工矿企业的房屋、无偿占有地方的车辆和物资等情况，“不仅天津一地有，全国许多地方也有；不仅军队有，党政机关也有；这种不正之风，必须引起各级地方和部队党委的严重注意，并且采取坚决的措施予以克服”。

截止 1973 年底，人民解放军坚决贯彻中央文件精神，认真清退“文化大革命”初期占有地方的房舍、土地和财物，已清退房舍 705 万多平方米、土地 77 万亩，退还机械车辆 1.7 万台及其物资 16.9 万多件。对损害的作了赔偿。

续二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以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仗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为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恒、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恒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恒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恒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是要搞托拉斯，一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

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象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伟大的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应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零、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其他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象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一九七二年八月九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

1972年3月11日、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两次接见了刘兴元、李大章等四川省负责人，宣布刘兴元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

197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四川省委关于解决四川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联系四川实际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请示意见。

1972年7月中旬，中共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召开常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

1972年8月9日，中央召集四川省负责人刘兴元、李大章等10人到北京，讨论制定了《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总结提纲》。

1972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提纲》。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1972 年 8 月 21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

《通知》后附有《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通知》说，三支两军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在一个地区，应当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 3 级军事机构，除了保持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和隶属关系外，同时是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驻各地的野战军，除了接受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外，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上，也必须接受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凡是实行军管的地方和单位，在党委建立后，军管即可撤销”。军管人员除少数需要留下担任地方工作的以外，其余调回部队。少数有某种特殊需要的地方和单位，对外可保留军管名义，对内不再行使职权。“已经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军宣队应即撤回部队”。“地方各级党委建立后，各级支左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应即撤销”。以后属于部队支援地方的各项工作，由部队政治机关负责；调整地方党委成员，更多地挑选一些熟悉全面工作的比较有经验的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继续留在地方工作的军队干部，除主管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工作的军政主要负责干部外，原则上不再兼任军职。文件发出后，自 1967 年 1 月派出的军队三支两军人员陆续撤回部队。

一九七二年九月，毛泽东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如何开展批林整风的意见（下半年）

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

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的通知

1972. 09. 15； 中发 [1972] 38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央批语

贵州省党委，省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望你们抓紧批林整风，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军政、军民、军队内部和各族人民之间的团结，搞好生产救灾，加强三线建设，努力完成党和国家规定的各项任务。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五日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蓝亦农等呈中央和毛主席的信  
主席、中央：

我们贵州十三个同志于九月三日来京，在春桥、登奎，德生，洪文、周兴同志帮助教育下，对我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进行了总结，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现将会议总结提纲（修改稿）送上，请审批。

蓝亦农 张荣森 贾庭三 李立

石新安 马扶增 张琦 李庭桂

陈行庚 张心田 薛光 吴荣正

吴向必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

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二日，贵州省地、师级干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总结提纲（修改稿）

（一）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切关怀下，我们在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会议结束后，召开了地、师级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在京召开的贵州工作会议精神，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反复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开展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会议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和“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教导，揭发批判了蓝亦农、张荣森同志的错误。蓝、张

作了检查和补充交代。到会同志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会议开的是好的，方向是正确的。

但是，由于蓝、张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对抗同志们对他们的帮助，再加上我们领导思想上的不一致，会议也曾一度发生了偏向，出现了起哄现象。有的同志没有从思想上同李再含的错误划清界限，不是站在党性立场上批判蓝、张的错误，而是从个人恩怨和资产阶级派性出发；有的同志缺乏自知之明，自以为“一贯正确”，借批判蓝、张表白自己；有的同志跟着蓝、张犯了错误，不积极揭发、批判，而是节外生枝，转移目标。我们一些领导同志不是努力把会议引向正轨，而是助长了不正之风。对于会议发生的问题及其严重后果，我们原来是认识不足的。经过中央负责同志的启发教育，认真总结前段的经验教训，大家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排除了干扰，保证了会议的顺利进行。

我们深深体会到，要牢牢掌握批林整风的大方向，一定要正确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要有一个好的作风。要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条原则，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正确的话，错误的话，在党的会议上都可以讲，但绝对不能起哄，决不容许在背后搞非组织活动。只有这样，才能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批林整风的正确方向。

这次会议为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发展贵州大好形势，奠定了基础，是一次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 （二）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

一、蓝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积极配合林彪一伙向党进攻，为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效劳。在庐山上，他同林彪死党邱会作、李作鹏和上了贼船的梁兴初、谢家祥等同志，背着党中央，进行秘密串连。他提出在宪法上加上“三个副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吴法宪在西南组一煽动，他跟着起哄，提出要“揪人”。会议期间，韦祖珍向他“交底”，造谣说反对毛主席的就是中央某负责同志。

二、蓝、张极力转移批陈大方向，大肆吹捧林彪。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张不认真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批陈整风的一系列指示，批陈不痛不痒，反而为林彪及其死党涂脂抹粉。蓝亦农同志说，“黄永胜前段没上庐山，他的检查是为了给其他同志承担责任。”“吴法宪解决贵州问题作了一些工作，有功。”他们不抓批陈，用反资产阶级派性、反无政府主义、整顿军队、整顿机关为借口，转移批陈整风的大方向。他们擅自提出在全省开展“让毛主席满意，让林副主席放心”的群众运动。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张同林彪死党提出的“人家不宣传我们宣传”的反革命口号相呼应，更加起劲地吹捧林彪，调子越来越高。他们在遵义为林彪修纪念馆，并组织参观；利用遵义会议解说词，篡改历史，宣扬林彪。蓝从庐山上私自抄回了林彪的反党讲话。张从广州抄回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又从梁兴初那里抄回了林彪在庐山上的反党讲话。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广为传播。蓝在去年八月省积代会的报告中，大肆贩卖林彪是“三大助手”中最光辉的助手的谬论，要“保卫接班人”，胡说什么这“是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迎头痛击”。蓝、张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还在贵州私自印发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反党讲话，并大量印发《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学习资料》、《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和周赤萍吹捧林彪的小册子，为林彪反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三、“九一三”事件后，蓝、张不但不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不向毛主席、党中央检查交代自己的问题，而且封锁中央。他们多次表白自己，谎称同黄、吴、李、邱没有打过一次电话，没有写过一封信，没有任何不正常的往来。并以各种借口，采取各种手段，压制干部和群众对林彪反党集团和他们自己的揭发，大捂盖子，千方百计转移斗争大方向。蓝、张还对抗毛主席关于云贵部队由周兴、王必成同志统一指挥的命令，擅自调动部队。

四、蓝、张同林彪死党和梁兴初等上了贼船的人拉山头，搞宗派。九届二中全会后，蓝同黄永胜、邱会作、黄志勇以及梁兴初、谢家祥、韦统泰等来往频繁，极不正常。他同梁、谢、韦等从一九七〇年以来传递材料达一百四十多件。张同温玉成、梁兴初有电话和信件往来。“九一三”事件前，关光烈给张荣森同志写了一封信，并送了皮包等礼物。蓝、张同林彪死党早就有不正常的关系。蓝在昆明时，就曾陪同邱会作的老婆胡敏，借选“外事人员”为名，搞阴谋活动。一九六九年十月，蓝、张到中央接受任务时，蓝事先去见了邱会作。在中央政治局同志



接见他们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又单独接见蓝、张。蓝还向邱会作要求把云南的雷远高调到贵州工作，邱不同意，说：“昆明有个通风报信的也好嘛。”蓝将邱的这一黑旨意告诉了雷远高。蓝、张来贵州后，许多问题不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示报告，而向黄、吴、邱等人写私人信件和打电话，对林彪死党的黑指示坚决执行。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蓝亦农和梁兴初、任荣三人串连，由蓝执笔，联名告张国华同志的状，为吴法宪开脱。

蓝、张到贵州后，积极垒自己的山头，搞宗派主义，影响了毛主席干部政策的落实。

中央为了挽救蓝亦农同志，曾多次对他进行耐心教育，但蓝顽固地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态度很不老实。从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在一九七一年二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四月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上，六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直到今年五月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和贵州工作会议上，中央都给了他交代自己问题的机会，但他始终耍阴谋，搞两面派，对抗中央。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当中央负责同志指出蓝的问题后，他无动于衷，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后，当张荣森同志揭发、交代问题的时候，蓝对张说，我不会“卖友求荣”。他要他的秘书给谢家祥、韦统泰、雷远高等人的秘书写信，统一传递材料的口径，订立攻守同盟。蓝亦农同志经过中央负责同志的耐心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交代了一些问题，有所进步，但立场还没有完全转过来，对一些重大问题还没有交代清楚。这一次到北京，当中央负责同志拿出证据，他才交出传递材料的目录，接着又交代他在目录中隐瞒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避重就轻，吞吞吐吐。张荣森同志的错误程度与蓝亦农同志有所不同，态度比较好一些。

我们希望他们转变立场，与林彪及其死党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交代，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 （三）

正当我们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时候，社会上刮起了一小股邪风。有人秘密串连，制造舆论，全盘否定贵州自贯彻中央（1969）71号文件以来所取得的各项工作成就。

我省贯彻中央 [1969] 71 号文件，制止了武斗，收交了武器，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对各级革命委员会进行了补台，恢复和发展了生产，迅速扭转了李再含造成的混乱局面，成绩是很大的。经毛主席批准的中央（1970）7 号文件，反映了贵州当时的实际情况，蓝亦农、张荣森同志在这个时期也有许多缺点错误，但他们主要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转移革命斗争的大方向，不批陈，不批林，严重地破坏了贵州大好形势的发展。

“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我省根据中央的指示，开展“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成绩是主要的。由于林彪及其死党的干扰破坏和蓝、张错误的影响，某些地方和单位也发生了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教导，既要纠正扩大化，又要防止“一风吹”。

对李再含的错误，中央早从政治上和组织上作了结论，他的案是翻不了的。中央（1969）71 号文件指出，李再含“在夺权以后，大权在手，头脑膨胀，逐步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搞两面派，闹‘独立王国’，对抗中央，镇压群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九七一年五月经毛主席批准的贵州省关于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的请示报告，也指出了李再含曾经同陈伯达、王、关、戚勾结在一起，进行了反党、乱军、篡权的阴谋活动。毛主席批准了撤销李再含在贵州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李再含执行的那一条路线，就是林彪、陈伯达的路线。不论是跟着李再含还是跟着蓝、张犯了错误的同志，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在批林整风中提高觉悟，划清界限，改了就好。对他们不应揪住不放，更不能搞层层检查，人人过关。

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和中央两次贵州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逐步揭开了全省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盖子，调动了全省军民和广大干部的积极性，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全省形势必将越来越好。

#### （四）

对今后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 一、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搞好批林整风，是全党的头等大事，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各级党委一定要抓紧、抓细、抓好。我省前段批林整风运动搞得不深不透，要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认真学习中央规定的文件，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狠批林彪的滔天罪行，狠批林彪死党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的罪行。要加强专案清查小组的工作，彻底查清林彪及其死党在贵州的阴谋活动。联系贵州实际，主要是揭发批判蓝、张的错误。为了消除他们的错误影响，决定将他们的检查传达到县团级。

要把批林整风运动和认真看书学习结合起来，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

批林整风中，重点在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整风的重点要紧紧围绕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不正之风，以达到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增强团结的目的。

## 二、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各级党委要首先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贵州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进一步提高了政治觉悟。李再含掌权时期，不少干部受到打击迫害。中央〔1969〕71号文件下达后，解放和使用了一批干部，但由于蓝、张实行宗派主义干部路线，还有一些应该解放使用的干部没有及时解放使用。要结合批林整风，认真抓好干部政策的落实，该解放的及时解放。即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作了检查，取得群众谅解，也要尽快解放，安排适当工作。对有历史问题的干部，要抓紧审查，作出结论。

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干部，包括少数民族干部。要加强对新干部的教育。新老干部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共同提高。

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民族政策、经济政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要作调查研究，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加以解决。

## 三、进一步搞好三支两军工作

从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军区调来的支左干部和支左部队，都是中央决定调到贵州的。我省驻军和广大支左人员，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积极参加三支两

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人民立了新功。三支两军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主要由蓝、张负责。张荣森同志长期把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和支左办公室凌驾于党委之上，不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发的《广州军区三支两军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纪要》，在地方各级党委成立之后，仍坚持保留各单位军代表党委和支部，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对于这些问题，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支左部队和支左人员要自觉地遵照毛主席关于“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教导，虚心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进一步发扬谦虚谨慎、艰苦朴素的作风。全体三支两军人员要顾全大局，坚守岗位，安心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搞好各项工作。

#### 四、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这三级地方军事机关，除了接受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外，同时是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应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广大的三支两军人员，要自觉地维护和服从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加强工、农、青、妇等群众工作。各级党委必须保证上级党、政府和军队的指示和命令的贯彻执行，切实防止与克服地方分散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

蓝、张过去把个人凌驾于党委之上，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削弱了党的领导。党委成员都要增强党的观念，把自己置于党委之中。主要负责同志要充分发扬党的民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一切重大问题必须集体讨论决定。要建立和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要及时请示中央。

#### 五、增强革命团结

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是革命的大局，一切革命同志都要从这个大局出发，增强党内、军内、军政之间、军民之间和各民族的革命团结。有问题要摆到桌面上来，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对人对己都要一分为二。要严于解剖自己，多做自我批评，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和行动。要坚决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为了加强革命团结，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 六、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对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的人，要批评教育，作好思想工作。对秘密串连，重拉山头，煽动无政府主义的极少数资产阶级派性头头，要严肃处理。

对阶级敌人的造谣惑众，行凶杀人，放火投毒，破坏生产，破坏交通运输，盗窃国家资财等现行反革命活动，要坚决打击。

#### 七、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由于林彪反党集团的干扰破坏，由于蓝、张错误的影响，加上我省今年遭到几十年未有的严重旱灾，粮食大幅度减产。工业生产问题也不少。要以批林整风为纲，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切实搞好生产救灾，安排好社员群众的生活，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加强三线建设，更好地完成国家规定的各项任务。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原题为：中央批语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1972. 11. 04；中发 [1972] 42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中共中央批示

中共河南省委：

中央同意《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河南省委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全省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沿着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前进，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总的形势是好的。中央希望你们领导全省军民，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

王新同志在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贼船，陷得很深，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河南省的贯彻

执行。中央耐心等待他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他至今交代问题的态度不好。中央同意你们的建议，决定令其离职反省，彻底交代。

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时，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联系河南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继续揭发批判王新的错误。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在河南顽固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罪责，只能由王新来负。跟着王新犯了某些错误的同志，只要同王新的错误划清界限，彻底揭发批判，认真作自我批评，改了就好。不要搞人人过关，层层检查，不要揪住不放。对由于王新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恶果，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解决。

要增强党的观念，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切实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广大指战员，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为人民立于新功，要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执行中央有关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继续开展拥政爱民、拥军爱民活动，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四日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刘建勋等关于河南问题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于十月十八日来到北京开会，向中央汇报和解决王新同志的问题。江青、先念、登奎、德生、洪文同志参加了我们的会议。武汉军区曾思玉、王六生、张体学同志参加会议，并讲了话。

在汇报会议上，刘建勋同志汇报了王新问题和河南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到会的同志都发了言，进行揭发批判，严肃认真地帮助王新认识错误，希望他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但是，王新的态度很坏，至今有些重大问题仍然没有老实交代。

现将我们经过集体讨论和一致同意的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送上，请批示。

刘建勋 耿起昌 张树芝

东传钧 杜河堤 李中顺

张耀东 王 辉 戴苏理

申茂功 唐岐山 文香兰

孙冠生 朱启祥 刘玉年

王文德 赵玉轩 韩怀智

支万鉴 杨 贵 张钦礼

王秉章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从十月十八日到十一月一日，我们河南省委常委、省军区和驻豫部队三个军的负责同志，到北京向中央政治局汇报了王新同志的问题和河南省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讨论了进一步深入开展这一运动的意见，现报告如下：

（一）

一九七二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十五日，我们召开了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召开的。中央针对我省上次批林整风会议，批评我们省委领导上没有联系河南实际，捂了王新的盖子。这个批评非常及时，完全正确，省委衷心拥护，并作了认真检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指示，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使大家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振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

这次会议，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会议以毛主席教导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为武器，深入揭

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联系河南实际，会议集中揭了王新问题的盖子，对王新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揭发批判。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到会同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同志们一致认为，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河南省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三支两军人员，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各项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九届二中全会以前，党、政、军、民沿着“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奋勇前进，斗、批、改深入发展，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以路线斗争为纲，逐步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全省军民进一步看清了林贼一伙叛党叛国、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党更加热爱，提高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增强了革命团结，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了战备。总的形势大好。

但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河南反映得很尖锐、很突出。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在河南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王新。王新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对抗中央指示，不批陈，不批林，保自己，捂盖子，矛头向下，批干部，批群众，竭力扭转批林斗争的大方向，继续进行了大量的反党阴谋活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终于粉碎了王新的阴谋，揭开了他的盖子。经过对王新的揭发批判，省委、省军区党委和驻豫部队，进一步增强了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我们决心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 （二）

大量事实证明，王新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顽固地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进行了反党乱军、妄图篡权的阴谋活动。

### 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配合林贼一伙向党猖狂进攻

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庐山上第一个跳出来，煽风点火，突然袭击，发出了策动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南组会议上，王新积极追随叶群、李作鹏，把矛头直接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作了向党猖狂进攻的恶毒发言。他说：“有的人利用修改宪法，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想刮



这股风，我们很气愤。这是一股子反革命妖风”，“要把这些人、危险分子的丑恶面目揭出来，把他斗倒”，“这些人是阴谋家、野心家。要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林彪点火，叶、李煽风，王新呼应，配合得可好了。就在当天，二十四日晚，吴法宪把王新找到他的住处，策划于密室，进行了反革命串连。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之后，王新还和林贼死党宋城等人同游庐山，照相留念。

## 二、积极投靠林贼及其死党，竭力为林贼一伙效忠卖力

王新在庐山参与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决不是偶然的。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王新就竭力投靠林贼一伙，被他们封为“头号的大好”的人，得到了他们的赏识。一个拉，一个靠，相互勾结，由来已久。

从党的“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贼摔死，王新同北京来往电话一百四十五次，其中同党中央联系只有三次，大都是同林贼死党来往。“林办”、“吴办”到河南活动的人，都与王新单线联系，行动诡秘。林贼指派亲信，三下河南，王新亲自迎送，设宴招待。多次密谈。死党胡萍等人到河南看工事，进行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来往，当时就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背着正在郑州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至今还不作彻底交代。于新野、何汝珍等人到郑州，以挑选“女护士”、“男内勤”为名，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王新与他们秘密勾结，使尽了种种卑劣的手段。王新奉“吴办”之命，为林贼挑选了两名历史教员，编写“文艺复兴”等历史资料，制造向党进攻的“炮弹”。王新为林贼、叶贼窃取古字画，派人专程送给“林办”，而他竟然栽赃诬陷，造谣诬蔑中央负责同志。王新为调动工作问题，不顾中央已与省委商量决定了的指示，直接打电话给“林办”，要叶群为他说话。更不能容忍的是，王新两次派专人到武汉，通过刘丰看林贼住房，了解林贼是怎样生活的，回来后便在他的亲自指挥下，按照林贼在阴暗角落里过惯了的那种生活需要，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郑州住过的房子，改为林贼的住处。

林彪反党集团炮制的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出笼后，林贼死党刘锦平、王维国、周宇驰、王飞、解长林、王洪智等纷纷窜到郑州，王新和他们究竟搞了些什么阴谋活动，至今未做彻底交代。

王新还和林贼死党相勾结，擅自扣压了向中央报告的重要专案材料。

### 三、同刘丰秘密勾结，阴谋篡权

王新同刘丰的勾结也是由来已久的。他们经常单线联系，秘密串连，互通情报。从“九大”以后，到一九七一年九月，王新与刘丰来往电话达二百九十四次之多。他同刘丰一唱一和，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坏事。他们反对“党指挥枪”的原则，严重地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王新曾同刘丰私下议论，说什么二中全会上“把叶群也牵进去了，很被动。”他们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林贼、叶贼鸣冤叫屈。在刘丰的盖子被揭开之后，王新还千方百计阻挠、破坏对刘丰的揭发和批判，竭力为刘丰给林贼送情报的反革命罪行开脱罪责。

王新伙同刘丰，攻击和陷害省委几位负责同志，阴谋篡权。他背着党中央和河南省党的核心小组、省军区党委，两次向刘丰等人送了陷害刘建勋同志的黑材料。第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正在筹备召开“九大”的时候，王新把一份写有同名刘建勋名字的敌伪档案材料交给了刘丰和黄永胜、吴法宪。第二次是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王新将刘建勋同志的所谓“五·一六”问题的两份材料，带上庐山，送给了刘丰。

### 四、忠实推行林贼的反革命路线，在河南大搞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

党的“九大”以后，林贼配合苏修，提出了“防止小资产阶级抢权”的黑纲领，制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王新从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直到一九七一年七月，不断传播：“林副主席有指示，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被小资产阶级抢走的危险”。他甚至到了林贼叛党叛国的“九·一三”前夕，还猖狂叫嚣：“现在是小资产阶级的干扰，争夺领导权”，“这个命不革不行”，如此等等，为林彪反党集团大造反革命舆论。

王新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肆意挑拨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关系。他曾背着省党的核心小组和省军区党委，通过省军区个别人，指令军分区党委考核、建立地、县委，胡说什么要把地方党委“‘军’起来”，“要占领阵地”。广大指战员遵照“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坚决抵制和揭露了王新的反党罪行，而王新则对抵制他错误的同志，制造种种借口，进行打击报复。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王新紧密配合林贼一伙所谓“军队受压”的反革命叫嚣，一面攻击广大干部和群众“刮起了一股‘反

军’风”，同时又攻击军政关系搞得好的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合穿一条裤子”，恶毒诬蔑人民解放军，在河南妄图反党乱军的正是王新。

河南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多一些，毛主席曾多次鼓励过，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王新却极力反对，诬蔑“地方干部十几年来受刘少奇修正主义的影响很深，形成了习惯，不左就右，不右就左。”还胡说什么“和地方干部打交道要小心，今天在一块共事是朋友，说不定明天一翻脸就把你当敌人了。”九届二中全会后，他竭力扭转批陈整风、批林整风的大方向，硬说“河南的主要矛盾是派性”，大批所谓“派党论”。他乘“整风”、“整顿机关”和清查“五·一六”之机，把“派性”与资产阶级专政、资本主义复辟混为一谈，把造反派与极“左”思潮、与“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同起来，蓄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许多地方新老干部和军队干部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 五、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大砍林县、兰考两面红旗

林县、兰考是毛主席、党中央表彰过的两面红旗。林县、兰考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王新怀着刻骨的仇恨，以“派性”、“反军”、“资产阶级专政”、“独立王国”这四条罪名，打击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硬是要砍掉这两面红旗。他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林县人民战天斗地取得的辉煌成就不是歌颂，而是恶毒咒骂，把林县的红旗渠、储备粮、粮食上纲要三大成就，诬蔑为闹派性的，“三大件”，“是说假话，欺骗中国人民，欺骗世界人民，是一种犯罪行为”。这完全是反革命分子和右派的言论。

#### 六、对抗中央，压制群众，继续施展阴谋诡计

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毛主席、党中央耐心等待王新同志两年之久，给了他多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中央、武汉区党委甚至把揭发他的材料转给他，希望他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而他却对抗中央指示，长期不向党说真话。在去年的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和武汉地区座谈会上，他隐瞒罪行，不作检查交代。今年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期间，中央领导同志一再耐心教育，他继续顽抗，不向党交心。中央批林整风会议以后，他变本加厉，搞阴谋诡计，欺上瞒下，制造混乱，妄图蒙混过关。他写信给毛主席、党中央，隐瞒真相，编造谎言；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他自立专案，找人为他对口径，写假证明材

料。他搞假检讨，在省委和军区党委批林整风会议期间，一手炮制了一个所谓《王新同志七月三十日、八月五日在大会和商丘地区小组会上的发言》的简报，其实他根本没有在大会和小会上作过检讨。他背着省委、省军区党委，召开分裂会，大肆挑拨军政、军民关系。他恶毒攻击“省委常委是联络站”，挑拨省委常委的关系，破坏党的团结。

“九·一三”事件后，王新竟然背着省委，将他的办公室改为省委办公室，并擅自通知各地、市，要把所有关于批林整风的材料上报他所控制的这个由“王办”改成的所谓“党办”，妄图控制对林彪及其死党的揭发斗争。“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王新不但对林彪及其死党不作揭发，对自己的罪行不作彻底交代，而且用流氓手段对付党，狡猾抵赖，栽赃诬陷，威胁起来揭他盖子的同志。直到最近召开的省委常委、省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以及这次中央召开的河南省来京负责同志汇报会议，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批判，王新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已检查交代了一些问题，但在重大的关键问题上，仍然不作彻底交代，继续顽抗，态度很坏，引起了同志们的莫大愤慨。

我们建议，中央责令王新离职反省，彻底交代。我们仍然希望，王新同志能够揭发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 （三）

为了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肃清林彪反革命路线的流毒，巩固和发展河南的大好形势，我们提出以下意见：

#### 一、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搞好批林整风，继续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是当前全党的头等大事。要遵照毛主席关于“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教导，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要在省委领导下，加强专案清查小组的工作，依靠群众，彻底查清林彪死党在河南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要联系河南实际，继续深入揭发批判王新从党的“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反党阴谋活动。

要把批林整风同认真看书学习紧密结合起来。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攻读毛主席著作，继续深入学习毛主席、党中央有关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路线觉悟。

河南广大军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河南阴谋反党，忠实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的是王新，三支两军人员和革命干部是没有责任的。由于路线觉悟不高，没有识破王新的阴谋，上当受骗，跟着王新犯了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要同王新划清界限，揭发、批判，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集中批林，集中揭发批判王新，不要搞人人过关，层层检查。各级党委要放手发动群众，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坚决防止和纠正一切扭转斗争大方向的错误倾向。我们打算，下一步把王新的问题先传达到县、团级，然后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传达到基层，发动广大群众，深入揭发批判，肃清其流毒。

## 二、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

在批林整风斗争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认真落实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由于王新的错误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恶果，要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坚决纠正。要正确对待群众。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凡是合理的，要弄清情况，逐步加以解决。既不能置之不理，也不能忙于处理某些具体问题，干扰批林整风的大方向。对由于王新推行林彪反革命路线而遭受打击的同志，要按照党的政策，妥善加以处理，本人要正确地对待自己，服从党的分配。

河南各级干部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下放插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大方向是正确的。要继续办好“五·七”干校，坚持走“五·七”指示的道路。各级干部要服从党的组织分配。城市知识青年，要有领导地继续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

有关肃清反革命的各项专案审查工作，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绝对领导之下。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认真搞好清查“五·一六”的落实定案工作，按照党的政策进行处理。毛主席指出：“反革命‘516’阴谋集团是一个秘密组织，数量很少，很快就发现了，揭发的早，头子关起来了。不要乱挖，面不要太宽了。批判还是要批的，但不要搞逼、供、信，逼、供、信靠不住。”对确属搞错了的，要坚决纠正。被审查的同志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 三、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

对搞资产阶级派性活动的人，要严肃批评，耐心教育，过细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革命的组织纪律性，坚守工作岗位，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于秘密串连，重拉山头，煽动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的极少数资产阶级派性头头，经过教育坚持不改的，要严肃处理。

#### 四、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批林整风中，要提高革命警惕，密切注意阶级敌人的动向，严防他们破坏捣乱。对于造谣惑众，乘机翻案，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一小撮阶级敌人，要彻底揭露，坚决打击。

#### 五、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团结

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和驻豫部队广大指战员，遵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积极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在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中，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伟大斗争中，为人民立了新功。决不能因为批判王新罪行，否定三支两军工作的伟大成绩。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有关三支两军工作的指示。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做好拥军爱民、拥政爱民工作，进一步密切党、政、军、民的关系，增强军政、军民和军队之间的团结。

#### 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

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每个党委成员，都要把自己置于党委之中。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委讨论决定；要正确处理好集中领导和分工负责的关系。要建立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必须请示中央。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是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门，在接受上级军事系统领导的同时，应接受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

#### 七、以路线斗争为纲，统一部署，全面安排好各项工作

要把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同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同深入搞好斗、批、改结合起来，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搞好工农业生产，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以上报告，请指示。

中共河南省委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

附：王新的三次检查交代（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三届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纪要，

1972. 12. 30；北京军区党委文件 [1972] 党字 58 号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到十二月三十日，北京军区党委召开第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根据毛主席最近关于“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集中讨论了如何进一步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问题。

这次会议，是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大批判，是一场政治上、思想上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的中心问题是，当前国际、国内、党内、军内的形势好不好，是大好形势，还是漆黑一团？林彪的路线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左”的，还是右的？以及其它一些在深入批林整风中需要加以解决的问题。这场大辩论，是由董立芳（二十八军政委）、汪易（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照远（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同志挑起的。这场大辩论是有益的。大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指示，深入开展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揭发和批判了董立芳、汪易、张照远同志的严重错误。军区和军级单位的一些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思想上交了锋，对问题的认识才可能有明确性和彻底性。

毛主席说：“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我们这次会议是遵照毛主席这个指示的精神做的。这个办法，首先一个好处是帮助大多数同志把问题弄清楚，再一个好处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认识，分清了是非，增强了团结。这是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

#### 一、形势问题

国际、国内、党内、军内的形势怎么样？是大好形势，还是漆黑一团？应当肯定，不论国际、国内、党内、军内，都是大好形势。但是，董立芳同我们的看法相反。他说，他有“三个不满”，对党不满，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对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不满，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他对前途悲观失望，恶毒地攻击我们党“正在变”，“将来还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甚至胡说什么“最多中国变修”。他顽固地站在林彪路线一边，公开跳出来为林彪鸣冤叫屈。他的言论和行动，证明他是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我们说国际、国内、党内、军内形势大好，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

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毛主席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一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巩固。全国各条战线朝气蓬勃，欣欣向荣，形势大好。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我国的国际威望越来越高，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是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叛党叛国，丝毫无损于我党我军的一根毫毛。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伟大军队。

在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我们军区和全国全军一样，形势也是很好的。

（一）毛主席指示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华北会议，改组了北京军区，捣烂了林彪反党集团在北京军区经营多年的山头主义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角，使他们在首都和华北地区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经过这次会议，端正了军区的方向、路线，全区指战员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更好地团结起来了。

（二）全区部队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开展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广大指战员激发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刻骨仇恨，更加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三）认真清查了林彪及其死党在我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一部分主要问题初步查清，进一步纯洁了部队。

（四）执行了毛主席“军队要谨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的指示，纠正不正之风，发扬光荣传统。特别是中央批转我区关于整顿纪律，纠正不正之风的三个报告之后，各级党委认真执行中央指示，深入进行反骄破满，艰苦奋斗，



遵守政策纪律和拥政爱民的教育，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进一步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

（五）认真落实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贯彻执行毛主席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战备工作进一步加强。

（六）各级都抓紧军事训练，那种“只搞文不搞武”的局面已基本上扭转过来，掀起了练兵的热潮。

（七）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发扬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加强了基层建设。

（八）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参加三支两军的广大指战员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为人民立了新功。

（九）广大指战员结合批林整风，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开始改变了“多年来不读马、列”的状况。

（十）增强了党的观念，抓紧了党的建设，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

所有这一切，说明了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批林整风运动，是完全正确的。也说明了，董立芳这样的人，对形势，对批林整风运动，对前途悲观失望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董立芳站在林彪一边，跟着已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走，那他有什么光明呢，有什么前途呢？他当然要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

形势大好，是深入批林整风，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但是，批林整风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它也不可能不遇到某些阻力。有的上了贼船不下船，捂盖子，保自己，坚持错误；有的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干扰批林斗争的大方向；有的不批林，整群众，转移斗争目标。甚至还有象董立芳这样的个别人，公开跳出来为林彪辩护，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破坏批林整风。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同志是不是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呢？还不是。有一些同志认为，批林整风搞了一年多，现在是“该揭的都揭了，该批的都批了，该清理的都清理了”，运动已经搞得“差不多了”。这种看法，反映了有些同志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尖锐性、复杂性认识不足。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为了纠正和清算王明路线，从遵义会议到“七大”，中间经过延安整风，经历了十年的时间。我们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集中揭露和批判刘少奇叛徒集团算起，到现在已经六、七年了，

至今这场斗争还在继续。而我们批林才一年多，怎么能够说“差不多了”呢？我们必须进一步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坚决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 二、林彪路线的实质是什么？

在批林整风中，有人错误地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或者说是“左”倾机会主义。他们提出了批判林彪路线主要地就是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张照远同志在他所主管的部门，竟然把批判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和“中心任务”，违背了中央关于批林整风是全党头等大事的指示。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林彪推行的究竟是一条什么路线？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个基本原则，是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的。林彪的路线，就是搞修正主义，分裂党，搞阴谋诡计。正如中央文件所指出的：

“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党，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林彪反党集团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他们的路线集中反映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在我国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愿望。”

这就是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这哪里是什么极“左”！右得无可再右了。必须先指出林彪路线的这个实质，尔后再说它同极“左”思潮的关系。

林彪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目的，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采取形“左”实右的手法，煽动极“左”思潮，利用极“左”思潮。他伙同陈伯达，支持和操纵一小撮“516”分子干了许多坏事，是人所共知的。林彪的路线，有时以极“左”面目出现，但它的实质是极右的。王明路线，先是“左”，后是右。刘少奇搞右倾机会主义，但是，在一九五八年刮“共产风”和一九六四年的“四清”等问题上，也是形“左”实右的。所以，王明、刘少奇、林彪、陈伯达是一类政治骗子。

这不是说，没有极“左”思潮，也不是说，对极“左”思潮不要批判。问题是决不能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不能以批判极“左”思潮代替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不能把人民内部的某些缺点错误都统统挂到林彪路线上去加以批判，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搅乱我们自己的阵线。有的同志把群众中少数人的某些落后现象搜集起来，列举了所谓“十大表现”，把诸如迟到早退，小病大养，小偷小摸，学习不认真，开会不发言，开口骂人，打架斗殴等等之类，都说成是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统统都和林彪路线挂在一起加以批判。这不是批林，是整群众。这就严重地违背了毛主席指示的“首先是批林”的大方向。

三、林彪有没有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这个问题，也是董立芳提出来向党挑战的。他在批林整风中向党进攻，多次声称“林彪没有形成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与毛主席相对抗”，公开为林彪辩护。有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必定有一条与之相适应的军事路线。林彪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阴谋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地步，怎么能够说他没有形成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呢？林彪一伙炮制《“571工程”纪要》，秘密组织反革命的武装力量，建立“联合舰队”、“战斗小分队”、“技术小组”等等之类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大搞秘密的通信网、情报网，用“江田岛精神”和蒋介石“不成功便成仁”的反革命训词培训其党羽，用“步兵动作、打靶、刺杀、捕俘、格斗”等等训练其法西斯别动队，丧心病狂地准备用火焰喷射器、炸药、爆破器材、毒气航弹等等来谋害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试问，这一切究竟是什么路线？他们搞的这一套军事，究竟是什么军事？这充分说明了林彪不仅长期以来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即修正主义的军事路线，而且他已经由修正主义发展到了法西斯主义。这是蒋介石的路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路线，法西斯的路线。

林彪把持军委工作以后，直到他叛国投敌、自我爆炸，竭力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他炮制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军队的谬论，叫嚷要由他亲自指挥军队，妄图篡夺毛主席的统帅地位；他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党指挥枪”和“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根本原则；他反对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部队，妄图抽掉我军建设的灵魂；他抛出所谓“一整套方针原则”，搞资产阶级政治，

制造军政对立，破坏我军的光荣传统；他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结党营私，妄图分裂我军，破坏我军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他搞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反对毛主席积极防御和人民战争的伟大战略思想。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要害，就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妄图篡夺无产阶级的兵权，从根本上改变我军的性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人民解放军变成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董立芳胡说林彪没有形成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一条主要“理由”，就是所谓“四好的四个方面是体现了毛主席建军思想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是对毛主席建军思想的恶意歪曲，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毛主席指出：“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主要是路线问题”。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的，林彪搞的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林彪所说的“政治思想好”，“路线觉悟高”，就是妄图使人们“忠于林彪”，要按照他的反革命路线来改造我们的军队。当然，林彪妄图篡改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完全是痴心妄想。毛主席在“九·一三”事件之前就指出：“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我们是毛主席缔造、领导和指挥的军队，我军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我军广大指战员在毛主席的建军路线指引下，努力提高政治觉悟，认真执行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的三大任务，发扬传统作风，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涌现了大量的先进集体和英雄模范人物，这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如果看不到甚至否定了这个主流，那是完全错误的。至于象董立芳那样的人，把我军执行毛主席建军路线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说成林彪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那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蓄意为林彪辩护。

董立芳为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辩护的另一条“理由”，就是把林彪的“六个战术”奉为打胜仗的“法宝”，胡说什么“过去仗就是这样打的，今后还要这样打”。这是对人民战争历史的歪曲，也是为林彪扬幡招魂。毛主席指出：“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而林彪却鼓吹什么“一点两面”，那不是把敌人放跑了，打击溃战？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而林彪搞的就是机械论。他不是主张按照情况灵活运用原则，而是要人们刻板地抄用他搞的那一套，说

什么打仗时只能采取“三三制”的战斗队形，只能搞“四组一队”的战斗编组，只能有“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只能不顾情况地搞“四快一慢”。他把敌我双方不断变化着的、活着的人的战争，归结成为他那一套死公式。试问，当战斗进行到两军肉搏的时候，你还能保持那个不变的队形吗？林彪的所谓“六个战术”，其本质就是打击溃战，是战争问题上的唯心论和机械论，是反对人民战争的，是反对毛主席的十大军事原则的。

大量事实证明，在我国各个革命历史时期的关键时刻，林彪都坚持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林彪极力追随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宣扬“短促突击”，推行消极防御的方针，反对毛主席的积极防御，集中兵力和打运动战的战略方针。

遵义会议以后，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带头攻击毛主席，要求中央撤换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遵义会议前后，在重大的战略行动上，他不听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调度和指挥。

抗日战争初期，林彪反对毛主席制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反对毛主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主张配合国民党打大仗。他一九四〇年在莫斯科发表的反党文章《中国人民的三年民族解放战争》，无耻地吹捧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充分反映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右倾投降主义。

在辽沈战役中，林彪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反对毛主席将东北主力置于北宁线、关闭东北大门，对东北之敌就地歼灭的战略方针，抗拒毛主席关于先切断北宁线，打下锦州，歼灭范汉杰的指示和必须全力打下锦州，迅速抢占营口，切断敌人退路的指示。在这个期间，毛主席先后给林彪发了七十七份电报，一再纠正了他的错误。辽沈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军事思想克服了林彪错误思想的结果。在平津战役中，林彪对抗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拖延入关时间，不按毛主席指定的入关路线行动，不执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由于毛主席在战役开始时就为我军制定了完全正确的战役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纠正了林彪的右倾错误，才取得了歼敌五十二万余人的伟大胜利。

在广东战役中，林彪右倾保守，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不停留地跟踪追击敌人的命令。

解放初期，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伟大决策。

我们过去打仗，是靠毛主席的伟大的军事思想。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次又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在抗日战争中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解放战争中消灭了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在朝鲜战场上战胜了美帝及其仆从军，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指挥下取得的，都是毛主席的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我们今后打仗，靠的还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董立芳不顾历史事实，颠倒黑白，公开向党挑战，也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在深入批林整风中，必须进一步地深刻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更加自觉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 四、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

正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入批判林彪那个“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的时候，董立芳却胡说什么“地主生活好，他的儿子就比一般人聪明”，攻击我们党对林彪“天才论”的批判是“形而上学”。汪易在九届二中全会后多次开会传达所谓“超天才”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同林彪死党吴法宪唱一个调子，吹捧林立果“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张照远同志在“九·一三”以后，还说什么“不承认‘天才’就会造成思想混乱”。他们死抱住林彪的“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不放，坚持同林彪、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

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在这个认识论的根本问题上，董立芳、汪易等人坚持反动的唯心主义观点，竭力为林彪的反党理论纲领辩护，受到了到会同志的严肃批判。在批判林彪的“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的问题上，二十七军的到会同志，集体写了一篇比较好的发言，代表他们发言的是八〇师侦察连指导员杨泽民同志。这个发言，根据毛主席关于“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的光辉论述，具体地说明了天才和实践的关系，天才和群众的关系，天才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说明了两种认识论的根本界限。

第一、聪明和才能，只能来自社会实践，来自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不是来自什么天生的“好脑袋”。人脑的原始差别是微不足道

的。鲁迅说得好：“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见《鲁迅全集》第一卷：《未有天才之前》）第二、聪明和才能，是亿万群众实践活动和集体智慧的结晶。离开了群众的实践和智慧，就不能正确认识无限发展着的客观世界。无产阶级领袖的聪明和才能，正是因为他们和广大人民群众一道，参加了伟大的革命实践，集中了群众、阶级和政党的集体智慧。林彪鼓吹的“天才论”，割裂了领袖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既否定了群众，又贬低了无产阶级领袖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作用。

第三、聪明和才能，是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世界观，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靠党的正确路线，我们就能够比较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头脑就会比较聪明一点。

在“天才”问题上的两种认识论的论战，使到会同志深刻地认识到，在深入批林整风中，我们只有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武装自己，提倡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提倡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才能够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林彪路线批深批透，彻底粉碎林彪、陈伯达一类政治骗子散布的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谣言和诡辩。

#### 五、要团结，不要分裂

“要团结，不要分裂”。这是毛主席提出的三个基本原则之一。在九届二中全会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以后，经过华北会议，北京军区党委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原则基础上，达到了新的团结。汪易积极投靠林彪反党集团，早就上了贼船，陷得很深。华北会议后，他又第一个跳出来，搞阴谋诡计，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挖无产阶级的墙角。他在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给军区领导写的两封信，把军区常委分裂为“老常委”、“新常委”，造谣说“军区常委仍然是几个老常委左右一切”。他明明知道军区有的领导同志是由中央决定调动工作的，却捏造说是被排挤走的，进行挑拨离间。他过去为了爬上林彪的贼船，亲笔给林彪写信，说什么气要为忠于林彪而呼吸，血要为忠于林彪而奔流，不管遇到什么惊涛骇浪，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永远“保卫林副主席”。林彪倒台了，他不批林，却诬蔑坚持批林的同志是“野心家、阴谋家”，进行政治陷害。他一贯制造谣言，

拨弄是非，唯恐天下不乱；他拉拢一部分人，排斥一部分人，封官许愿，进行非组织活动；他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纠缠历史旧账，有意把水搅浑，大耍两面派，手段十分恶劣。

象汪易这样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在军区是个别的。但是，不团结的现象，在某些单位是存在的，有的问题还比较严重。譬如，有的骄傲自满，自以为“一贯正确”，搞一言堂，听不得不同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有的不搞“五湖四海”，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在党内、军内进行派别活动；有的资产阶级派性作怪，算旧账，争高低，打内战，不按党的原则办事；有的有问题不摆到桌面上来，当面不说，背后乱说，搞非组织活动，等等。这类现象同汪易的问题，在程度上和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但也必须以汪易为戒，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否则，发展下去是危险的。通过对汪易的批判，到会同志也从中受到了教育，吸取了教训。团结起来，共同对敌，这是革命的大局。我们一定要反汪易之道而行之，顾大局，识大体，出以公心，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维护和加强革命团结。在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 六、尊重和维护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

在批林整风中，经过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破坏党的领导的罪行，纠正不正之风，全区部队在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方面，比过去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和问题。董立芳就是一个例子。他身为军党委书记，军里担负着一个地区的三支两军任务，他自己也在一个工厂负责过支左工作，但他竟公然拒绝向当地省委汇报工作，甚至狂妄地说：“他（指省委和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算什么？他干他的，我干我的！”抗拒党的领导。另一个例子，是张照远同志。他分工主管山西省国防工办的工作，本应无条件地接受省委和省军区党委的领导，而他却到处伸手抓权，向省委、省军区党委闹独立性，搞独立王国，严重地违反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这个根本原则。象他们这样的人，在我区是个别的，但违背党的一元化领导的现象却不是个别的。有的部队不尊重地方党委，在与地方有关的工作上不主动向地方党委请示报告，有些三支两军人员骄傲自满，背上了两个包袱，把个人凌驾于地方党委之上，搞特殊化，个别的人甚至严重地违犯党的政策纪律，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些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必须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坚决加以纠正。



会议重新学习了毛主席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致表示坚决拥护。这个文件正式下达后，要认真贯彻执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地方的广大革命领导干部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并且涌现了一批优秀的新干部。我们一定要在党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积极主动地做好三支两军人员的调整工作，让更多的比较熟悉全面工作的有经验的地方同志，担负地方的党政领导职务，并且努力支持他们做好工作。

“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该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指示，肃清林彪一伙破坏党的领导的流毒，增强党性，继承和发扬党的传统。省军区、军分区和县（市）武装部，要坚决服从同级地方党委的领导；驻各地的野战军，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上，必须接受所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所有的三支两军人员，都必须做尊重、维护和服从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的模范。

#### 七、批林整风仍然是当前的头等大事

一年多来，我区的批林整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们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还很不够，有些问题还没有真正划清界限；对林彪及其死党在我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虽已作了初步清查，但还需要继续彻底清查；受林彪路线的影响而滋长的某些不正之风有所纠正，但距离党的要求还很远。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继续把批林整风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抓紧抓细抓到底。

毛主席指出，开展批林整风运动，“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毛主席又指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我们一定要认真落实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牢牢掌握批林斗争的大方向。

批林是解决敌我问题，整风是解决人民内部问题。首先要分清敌我，其次才是分清是非问题。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然而和人民内部问题不同性质的另一类是非问题，不能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同起来。首先批林，比较容易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把绝大多数人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批林批得深，分清了大是大非，提高了路线觉悟，整风就有了基础，思想就容易统一，内部问题就比较好解决。整风时，也要坚持首先批林。团以上党委，重点是军以上党委，要在批林的基础上认真搞好整风。

要紧紧抓住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着重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从党的“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的反革命罪行。决不能够把批林放在一边，而在那里纠缠历史问题，算老账。纠缠历史，纠缠内部问题，纠缠非原则性的问题，是不利于团结起来、共同对敌的。

#### 八、批林整风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深入批林整风，必须联系实际。不这样做，就不可能肃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首先要敢于联系实际，善于联系实际。要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革命大批判。对个别上了贼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领导人，要进行严肃认真的揭发批判，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对在批林整风中跳出来向党进攻的，要坚决给予揭露和回击。要继续纠正由于林彪路线的影响而滋长的某些不正之风，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

同时，也要防止乱联系的倾向，任何时候都不允许把矛头指向群众。不要乱用“上挂下联”和“时时、事事、处处有路线”之类的口号，切实防止把干部、战士中的某些思想认识问题都挂到林彪路线上去，无限上纲。对工作中发生的偏差和某些缺点错误，不能不加分析地都说成是执行林彪路线的结果，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要充分肯定全区部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各项成绩，注意保护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性。

（二）对于干部、战士在批林整风中反映出来的一些带原则性的思想认识问题，要积极地给予解决，不能听任消极情绪泛滥。比如，有的同志提出，既然林彪那样坏，怎么还选他当“接班人”呢，感到不好理解。对这个问题，江青同志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华东组和中南组会上的讲话，已经作了明确的回答。江青同志说：“林彪干坏事，有一个暴露的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大家应当回顾一下党的第九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回顾一下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曲折性和复杂性，回想一下召开党的“九大”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如果不讲路线，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背景，孤立地提问题，那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问题当然也就得不到解决。各级领导要认真组织大家学习江青同志这个讲话的精神，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问题。至于象董立芳那样的人，老是在这个问题上同我们纠缠，站在叛徒、卖国贼林彪的立场上向党挑

战，咒骂我们党，他不是认识问题，而是别有用心的。对他的恶毒攻击，必须戳穿其反动本质，严加驳斥。

（三）在批林中要注意一些提法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例如，有的人提出了所谓批个性的问题，说什么个性批不倒，共性就立不牢，批林整风就不能深入。批判个性的提法，在政治上必然导致搞人人过关，把矛头指向广大干部和群众，敌我不分。在理论上，它抛弃了辩证法，抛弃了矛盾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关于共性与个性的关系，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论述。毛主席说：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个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

批林整风中，还有一些提法，也是不准确的。比如说，批林彪的什么“空头政治”，怎么能说林彪是脱离实际的“空头政治”呢？林彪的《“571工程”纪要》不是反革命政治吗？还有把林彪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说成是“罢官”论，把林彪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说成是“唯意志论”，也是不确切的。苏修天天骂我们“唯意志论”，我们用词不能和敌人的造谣诬蔑混在一起。诸如此类的不准确、不科学提法还有不少，希望大家举一反三。各级党委特别是军以上党委要注意这个问题，避免由于提法的不准确、不科学，而引起一些思想上的混乱，造成许多糊涂观念。

#### 九、把批林整风与看书学习结合起来

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关键在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用假象迷惑我们，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上当受骗。要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就必须刻苦攻读马列的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有的同志说得好：“理论上的盲人，识别不了政治上的骗子，不认真读书，真假马克思主义就辨别不了，错误路线就抵制不了。”这次会议上，八〇师侦察连指导员杨泽民同

志代表二十七军同志作的一篇发言，批判了在“天才”问题上的错误观点，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较好地讲清了问题，到会的许多老同志都很有感触。毛主席曾经讲过：“小将们向我们这一大批老将挑战了”，“如果我们不向小将们学习，我们就要完蛋了。”同志们重新温习了毛主席的这段话，感到非常亲切，表示一定下决心看书学习。

结合批林整风看书学习，要肃清林彪搞的那一套形式主义、实用主义的流毒，认真贯彻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分清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各级党委成员，要带头读书。我们的同志要争口气，下苦功夫，用战斗的行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决心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

#### 十、清理工作的政策问题

清查林彪及其死党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工作，必须继续，抓深抓细抓彻底。清理工作的情况，在全区是不平衡的，还有个别单位对这项工作做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必须迅速改变这种状况。军级以上单位，要在党委领导下，切实加强清理小组的工作。要把清理的情况告诉广大干部、战士，交给群众去加以鉴别。采取这种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有利于提高大家的路线觉悟，有利于肃清流毒，有利于更好地团结广大指战员。

在清理工作中，我们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跟着林彪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他们同我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在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我们要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

对于受了林彪反党集团影响而在不同程度上犯了错误的同志，要认真落实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要把参加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同上当受骗犯错误区别开来，把与林彪一伙有组织上的联系同过去与他们有过工作关系区别开来，把参加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的个别人同他所在单位的指战员区别开来。除林彪死党外，对于上了贼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即使其错误严重，也要既严肃揭发批判，又给予热情帮助。只

要他们真正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作了认真的检查，就要继续信用他们。至于与林彪反党集团有一般牵连，属于上当受骗的同志，主要是向党把问题讲清楚，勇于作自我批评，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当前国际、国内、党内、军内和我区的形势大好，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要谦虚谨慎，不要因为胜利就忘乎所以，“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我区处于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斗争的前线，担负着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和祖国首都的光荣任务，我们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最近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认真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发：团以上党委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共印 2500 份）

来源：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对山东省来京参加汇报会议的同志《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1973.01.07；中发 [1973]4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批示

中央同意山东省、青岛市来京参加汇报会议的二十四位同志《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一系列重要文件，遵照毛主席“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等三项基本原则以及“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等重要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地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彻底揭发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散布的谬论和谣言，联系山东实际，查清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希望你们加强党的一元化的领导，牢牢掌握批林这个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努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要支持和发扬无产阶级正气，克服歪风邪气。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加强军民、军政和军队内部的团结，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要以批林整风为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把山东地区的生产和战备切实搞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三年一月七日

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杨得志等人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从去年十一月十七日起分批来到北京。一个多月来，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教导和有关文件，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重要指示，讨论研究了中央专案组印发的林彪反党集团在山东地区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有关材料。在中央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先是汇报分析了青岛市的批林整风会议情况，后又汇报分析了全省的批林整风运动情况，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山东省汇报会议，是对山东广大军民政治上的最大关怀。我们决心以实际行动，落实好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整风运动的指示，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并以此为动力，推动各项工作，努力发展山东的大好形势。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我省表现得十分尖锐。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山东。他们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把“济南”列为“借用力量”。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王飞、程洪珍以及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北海舰队原政委)、辛国治(北海舰队原副政委)、吴宗先(济南军区空军原司令员)、包玉清(十三航校原副校长)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大量秘密印发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林彪死党李作鹏还窜到青岛等地作反革命讲演，恶毒

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积极建立秘密的反革命组织，发展反革命势力，进行所谓“路线交底”，组织“左派骨干”，成立“战备机组”，收集情报，安设反革命黑据点、联络点，极力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粉碎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取得了伟大胜利。在这场斗争中，山东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军民，以捍卫毛主席、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决心，逐步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自上而下普遍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文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谬论及其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一些重点单位，初步清查了林彪死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通过这场斗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想 and 政治路线教育，全省军民极大地激发了对林彪一伙的刻骨仇恨，更加增强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了读马列的书和读毛主席的书的自觉性，促进了革命团结，加强了战备，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省形势是好的。但是，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站错了立场，支持了华北组反革命简报，而且迟迟不觉悟，对自己的错误和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存在的一些问题捂了盖子。省委、军区党委对批林整风运动的领导也是有错误的。对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地区反映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抓纲不突出，对批林整风运动未能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贯彻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致使我们省的批林整风运动，发展很不深入。对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的阴谋活动从组织上清查不力，没有成立清查小组，有些重要线索，没有发动群众，深挖细找，穷追到底，彻底查清。对林彪死党在山东地区散布的种种反革命谬论，批得不深不透，有的没有广泛发动群众痛加批判。对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等，没有发动全省军民彻底揭发批判。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反动的政治谣言，没有严肃对待，认真批驳和追查处理。对青岛批林整风会议的领导上，没有抓住第十次路线斗争这个纲，没有正确贯彻批林整风的方针，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这次会议期间，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教育，省委、军区党委主要负责

同志对所犯错误作了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错误。省委、军区党委在京其他常委也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认真接受经验教训。

为进一步把批林整风运动引向深入，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遵照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结合山东的实际情况，研究了如下的意见：一、紧紧抓住第十次路线斗争这个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要牢牢记住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科学分析。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你死我活的大搏斗。深入开展批林整风，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头等重要的大事，是我们当前一切工作的总纲。紧紧抓住了这个纲，就抓住了方向，抓住了主要矛盾，就能把各项工作带动起来。对于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政策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但是如果忽视或者放松了抓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这个总纲，“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因此，党政军各级领导，都必须反复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不断加深对批林整风重大意义认识，真正把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动手，切实抓紧、抓细、抓好。

二、全面贯彻批林整风的正确方针。毛主席指出：“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林彪及其死党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死敌，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这是最大的危险。只有坚持首先批林，把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及其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揭深批透，才能确保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贯彻执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这个关系在任何地区和单位都要摆正。要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林彪反党集团，牢牢掌握这个斗争大方向。林彪一伙搞修正主义，不搞马克思主义；搞分裂，不搞团结；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叛党叛国，成了叛徒卖国贼。我们一定要抓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深入的揭发批判。要把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的反革命罪行和谬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揭深批透，肃清流毒。要紧密联系山东的实际，彻底清查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



区搞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坚决从组织上拔掉他们设立的反革命黑据点、联络点，清除隐患；要狠批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放的毒，对他们的反革命报告、小册子，以及吹捧林彪及其死党的剧本、歌词等，要组织干部、群众深入批判，彻底批臭；要狠批反革命谣言，对于阶级敌人制造的政治谣言和散布的反革命谬论，要及时批驳，彻底追查，严肃处理，树立无产阶级正气，反对歪风邪气。通过清查和批判，把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建立的反革命组织、搞的政治阴谋和散布的反动谬论，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充分利用这些反面教材，教育广大军民，准确地划清革命与反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在深入批林的基础上，要认真进行整风。人贵有自知之明。每一个领导同志，都要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严于解剖自己，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认真汲取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严格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不准以任何借口打击报复。反对骄傲自满，坚决纠正不正之风，进一步发扬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批林整风要防止纠缠历史旧账。毛主席最近指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当前，集中力量抓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着重揭发批判“九大”以来，林彪反党集团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阴谋活动，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林彪及其死党叛党叛国妄图搞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凡是符合这个大方向的，就是正确的，凡是背离这个大方向的，就是错误的。在山东，王效禹的错误和罪行，已基本得到清算，不要再去纠缠。在批判王效禹过程中，个别搞错了的，要落实政策，加以改正，但决不容许为王效禹翻案。不要搞以我划“线”站队，不准以任何借口去整群众，否则势必转移斗争方向，妨碍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一定要把我们的一切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方面来，搞好批林整风。

四、认真注意党的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必须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山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军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

路线的。林彪及其死党的所谓“借用力”，正如中央所指出的：“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确定批斗对象和建立专案，要按规定经上级党委批准。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对于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应启发他们和同志们一道，起来揭发批判，接受教训。无论是受骗上当，沾了边的同志，还是陷得比较深，上了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团结他们，信任他们。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要把个别人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同所在地区和单位党委的集体领导，同广大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就，同广大三支两军人员的工作成绩，严格区别开来。要牢记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要顾大局，努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警惕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我们一定要把党内党外、军政军民的团结搞好，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把山东的批林整风运动搞深搞透，把革命和建设事业搞得更好。

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毛主席指出：“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一个地区，应当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除了保持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和隶属关系外，同时是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济南军区和驻山东地区的野战军，除了接受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外，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上，必须接受省委的领导。凡参加地方工作的军队同志，都要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不能另搞领导系统。地方党委要关心部队工作，党委负责同志“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清查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党政军民互相配合，一致行动，才能搞好。因此，我们打算成立一个在省委领导下的清查领导小组，把全省党政军民各方面对林彪反党集团

阴谋活动的清查工作统一抓起来。军区党委要切实对山东地区海、空军部队的作战行动和批林整风运动，实施统一指挥和领导。对批林整风运动，要根据各地区、各系统、各单位的不同情况，实行分类指导。各级党委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好“一班人”的团结。要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必须及时请示中央。

六、以批林整风为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要把批林整风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同认真搞好斗、批、改，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各级领导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带头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搞好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运动。遵照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扎扎实实地把山东的工农业生产搞好，加强战备，加强部队建设，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次会后，我们打算，第一步召开省委、军区党委常委联席会议，第二步，召开省委、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地、师以上主要负责干部参加，传达贯彻这次汇报会议精神，彻底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检查分析前一段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领导上要严格进行自我检查，虚心听取大家的批评，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制定措施。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省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在传达贯彻中，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相信和依靠群众，彻底纠正错误，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坚决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以上当否，请批示。

杨得志、袁升平、张铨秀、白如冰、  
秦和珍、张富贵、鹿田计、张延成、  
赵峰、马忠全、邓龙翔、张子石、  
范朝利、鲍先志、方正、王金泉、  
王庆三、史秉廉、刘众前、朱本正、  
吴怀才、吴德纲、郑干、高启云

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一月八日发出

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室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九日翻印

(共印二五、〇〇〇份)

(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文件原题为：中共中央批示)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严防坏人进行诈骗活动的通知

1973. 01. 24；中发[1973]8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

根据有关部门反映，最近一个时期，各地不断发生诈骗案件。有的私刻公章，伪造函件，冒充党、政、军干部或高干子弟，到处招摇撞骗；有的伪造中央文件，蒙骗群众，煽动一些人上访闹事；甚至有的模仿中央领导同志的声音、笔迹，冒充中央领导同志的秘书，用打电话、造假信、说假话等手法，进行诈骗活动。由于我们有的同志思想麻痹，敌情观念薄弱，有的单位办事制度不严，存在某些不正之风，使坏人钻了空子，在政治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这类案件的发生，是当前阶级斗争的反映，林彪反党集团搞的那种歪风邪气，助长了这些招摇撞骗等不良行为的滋生和发展，对我高尚的社会风气和良好的革命秩序是一个严重的危害，必须引起各级党委的注意。现遵照中央的指示，特作如下通知：

一、各级党委要以批林整风为纲，抓住典型事例，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坏人进行诈骗活动。在党委的领导下，公安部门要与群众相结合，抓紧对各种诈骗案件的侦破工作。对于查有实据的案犯，要依法惩处。

二、一切人事调动，财物发放，器材设备调拨，招收职工和征集新兵等，都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坚决纠正私人介绍工作、“走后门”“拉关系”等不正之风。如有违犯要严肃处理。

三、中央领导同志和各地负责同志交办的事项，应按规定手续下达。电话传达时，要说明自己的单位、姓名、职务。有保密电话的，要用保密电话传达。各级领导机关的印章和介绍信，要严格执行使用制度，妥善保管。

四、对于上级机关打来的电话，或发来的信件等，如发现疑点，应该向有关部门进行核对。

五、严禁私自翻印、传抄中央文件。如发现伪造、传抄文件，要一面追查，一面上报。

以上各项，请研究执行。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中央军委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出

共印四五、三三二份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1973.02.20; 中发 [1973] 10 号

一九七二年七月，为了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四·五会议）。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中，在历史问题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中央政治局约肖、苏、王、吴同志开个会，解决一下。”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起，这个开了几个月的会议转向批海军司令肖劲光上了林彪“贼船”。后肖劲光写了几次检查。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中央批转了这个“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说肖劲光上了“贼船”的罪证，大约有如下一些：

- 1) 1967, 1968 年肖给林彪写信, 检讨自己, 表示效忠;
- 2) 九大前林彪找肖等海军五人谈话, 肖同意全力支持林彪死党李作鹏在海军的领导;
- 3) 在九大选举政治局委员时, 肖没有选江青等人;
- 4) 九届二中全会上在华北组的发言支持设国家主席和林彪;
- 5) 利用准备与台湾海军作战的“七九方案”搞“北兵南调”, 准备策应林彪的在南方另立中央等等。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 中共中央对《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  
批示

1973. 06. 16; 中发 [1973]22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批示

空军党委并各大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中央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 弄清了路线, 改组了空军领导班子, 它对深入批林整风, 加强空军建设将起重大作用。

空军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 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搞反革命阴谋的只是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把空军作为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完全是痴心妄想。“九·一三”后空军广大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指示, 积极投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 批林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 形势很好。希望你们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 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 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 继续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放手发动群众, 彻底揭发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谣言, 查清林彪及其大小“舰队”在空军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批林整风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汲取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领导，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纠正不正之风。要以批林整风为纲，搞好战备、训练和各项工作，消除林彪反党集团破坏空军建设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团结起来，为“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而奋斗！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空军党委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十八日召开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到会共三百六十三人，各大军区（除新疆外）派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在毛主席、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的罪行，着重解决空军党委主要领导人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五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了到会全体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大家深受鼓舞。

（一）会议的主要收获

在中央直接领导下，会议开得很好，弄清了路线，改组了空军领导班子。大家反映，这是一次鼓舞斗志的会议，团结、胜利的会议，对深入批林整风和加强空军建设将起重大作用。

一、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深入揭发批判了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和林立果为头目的“小舰队”的反革命罪行。特别是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重点批判了林彪反党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571”反革命政变纲领，以及“两个一切”、黑“讲用报告”。大家对批林整风的伟大意义和方针政策进一步加深了理解，更加激发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阶级仇恨，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二、会议集中揭发批判了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梁璞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王、曹、邝、梁四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林彪贼船，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九·一三”以后，他们仍然不向党交心，捂盖子，保自己。通过揭发批判，进一步揭开了盖子，基本弄清了空军党委的问题。

三、认真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教育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会议期间，中央负责同志反复强调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揭发、批判，不是为了打倒，而是教育、挽救、争取。会议对王、曹、邝、梁四同志，既严肃批判，又热情帮助。他们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进一步检查交代，讲了一些真心话，认识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大家对他们的进步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在今后实践中进一步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会议还吸收了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检查交代较好的几个同志参加，充分体现了党的政策。

四、分析了形势，鼓舞了斗志。大家认为，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揪出了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无损于空军的光荣。空军建立二十多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空军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三支两军中，为人民立了新功。空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搞反革命的只是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是背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背着广大指战员的。对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广大指战员是有抵制的。陈修文烈士在林彪死党逃跑的直升飞机上，勇敢地同叛徒搏斗，就是一个范例。“九·一三”事件后，空军广大指战员积极投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清算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分析形势，大家振奋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更加坚定了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搞好空军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五、遵照中央的指示，经过会议充分酝酿和民主协商，改组了空军的领导班子。对于原班子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主要领导干部作了必要调整，吸收了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表现较好和比较年青优秀的同志到空军的领导岗位上来。这个新班子体现了“五湖四海”和老中青三结合的精神，是朝气蓬勃的，有战斗力的。

(二)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的罪行



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其罪恶目的，就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分裂我们党，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这场斗争，在空军表现得非常尖锐、非常严重。林彪抓军队，首先抓空军，下了很大功夫。林彪和他的大小“舰队”进行了猖狂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把空军变成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可靠基地”，利用空军所谓“机动能力强”，“夺取全国政权”。

### 一、大树特树林彪一家的“绝对权威”

早在“九大”以前，吴法宪就在空军提出“忠于”林彪的口号，吹捧林彪“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亲自给林彪写誓言，要“永生永世、世世代代”忠于林彪及其一家。吴法宪一伙利用一切机会，鼓吹林家父子是“天才”，叫嚷：“无产阶级三个伟大领袖的三个助手”，林彪“最光辉”，“比恩格斯、斯大林高的多”等等。林立果是什么“群众最好的领袖”。“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他们还制造林彪同毛主席“不可分”的谬论，胡说：没有林彪的“捍卫”，“就没有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就是忠于毛主席”；“紧跟林立果，就是紧跟毛主席”。他们鼓吹“选择政治领导”，向林家“集中投资”，把“政治生命依附于林副主席一家”，要“一辈子都紧跟首长(林彪)、林副部长(林立果)”。为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大造反革命舆论。

### 二、拉山头，结死党，秘密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

长期以来，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空军搞阴谋，搞什么“打内堂”(即到林彪那里“摸底”、“咬耳朵”)、立“标兵”，安插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派子女来空军“保权”。他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篡夺空军党委领导权，八个常委中有吴法宪、王秉璋、刘锦平三个死党。曾国华问题严重，正在隔离审查。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三同志上了贼船。他们私设常委办公会，把不是党委常委的江腾蛟、王飞、陈绥圻等塞进去，控制了空军领导核心。“小舰队”的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刘世英、朱铁铮、程洪珍等人把持空军党委办公室，直接发号施令，使“党办”成了林彪直接指挥的“特殊权力机构”和“小舰队”

的“大本营”。林彪、吴法宪一伙控制一些机关和单位，发展法西斯特务组织，建立“安全的基地，可靠的基地，信任的基地，放心的基地”，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组织准备。

### 三、“九大”期间，大搞反党分裂活动

“九大”期间，在林彪策划下，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窜到空军组搞阴谋活动。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吴法宪亲自向空军组布置对黄、吴、叶、李、邱等人投全票；对一些中央同志投半票；对另一些中央同志不投票。妄图排挤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篡夺中央领导大权。“九大”闭幕后，吴法宪召集王秉璋、曾国华以及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同志开黑会，说他们当上中央委员是林彪的“最大关怀”和“信任”，曹里怀同志当上中央委员是叶群“讲了话的”。他们都感恩戴德，表示要忠于林彪，支持吴法宪。

### 四、抛出“两个一切”，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

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经过林彪、吴法宪等人的策划，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上，抛出了“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到会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成员一致拥护，并分别在司、政、后、民航、三机部、六院积极推行。王辉球同志主持政治部党委制定了反动的“五条措施”，提出：“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及时地主动向立果同志请示报告”；要“时时想到他，事事请教他，处处保卫他”；“老老实实地服从他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的指挥”；要把“服从他的领导，执行他的指示，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按照“两个一切”，林立果成了空军的太上皇。

### 五、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山上山下紧密配合，猖狂向党进攻

山上，吴法宪在林彪的指挥下，找空军与会的某些中央委员“交底”，策动他们向党进攻，要他们“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观点，并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林彪抛出反革命政变动员令后，吴法宪上窜下跳，煽风点火，充当反党的急先锋。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曾国华等纷纷出动，紧密配合。王辉球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攻击中央负责同志，叫嚷：要“揪出来示众，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支持反革命的六号简报。邝任农同志在华北组用流氓语言叫嚷：“一定要揪出来斗倒斗臭，千刀万剐。”曹里怀同志在西北组发言拥护林

彪的反党讲话，说什么“会议的方向、指导思想”，反对毛主席规定的会议方针。阴谋败露后，吴法宪又找王秉璋、曾国华及王辉球、邝任农、曹里怀同志订攻守同盟，对抗毛主席、党中央。

山下，在空军“三代会”上把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为“超天才”也达到了高潮。经过精心策划，抛出了由林彪、叶群亲自指挥炮制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讲用报告”。这个黑“报告”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鼓吹“唯生产力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空军制胜”的唯武器论，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借着所谓“要强盛”的幌子，鼓吹大国霸权主义，卖国主义。黑“报告”出笼后，林彪死党鼓噪而起，吴法宪立即大叫“放了一颗政治卫星”。王、曹、邝、梁四同志也带头吹捧。在会内会外刮起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大吹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是什么“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什么“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第三代接班人”、“无产阶级之首”、“七十年代红太阳”、“黑夜的明灯”、“宇宙的巨星”。

在此期间，江腾蛟组织炮制四篇反党文章，狂热吹捧林彪，叫嚣：“林副主席，决定了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命运，决定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决定了人类的彻底解放”，“必须忠于林副主席”，要把“保卫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作为高于一切的革命大节，毕生的战斗使命”。紧密配合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

六、炮制《“571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九届二中全会后，吴法宪一伙极力封锁毛主席的指示，蒙蔽群众，欺骗中央，对抗和破坏批陈整风。

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前夕，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陈励耘等，炮制了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林立果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开所谓“三国四方”会议，进一步策划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和分工。林彪死党按照《“571工程”纪要》，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大造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舆论，利用推广所谓“安全经验”，发动“夏季攻势”，再次刮起吹捧林立果的妖风。他们大搞“路线交底”，疯狂叫嚣：当前“是决战的形势，摊牌的形势”，要“采取一种非常的手段”，“文斗不能解决问题，武

斗才能解决问题”，给林彪“制造一个上台的条件”，“先下手为强”，“强行接班！”

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小“联合舰队”、“分舰队”，建立反革命秘密据点和通信网，秘密组织反革命政变的武装力量“教导队”，研制和进口大批特工器材，窃取重要情报和核心机密。大搞到各地的反革命串连，网罗党羽，扩充反革命势力。

策动“北兵南调”。一九七一年八月，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指使梁璞同志，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东南沿海战备之名，炮制“八·二六”作战预案。他们还指使一些单位造枪改炮，改装飞机。大搞空军“陆战”训练。掌握空运、空降。阴谋加强其反革命“根据地”建设。

林彪死党策划召开的“安全经验”现场会、策动“北兵南调”、大搞空军“陆战”训练、窃取器材经费等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有许多是王辉球、邝任农、梁璞、曹里怀等同志积极参与的，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经过一系列反革命准备，林彪直接指挥他的死党，在空军具体策划两项反革命阴谋，“破釜沉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攻打钓鱼台，谋害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私调飞机，南逃另立中央。阴谋破产后，林彪仓惶逃命，狼狈投敌，自取灭亡，成了可耻的叛徒、卖国贼。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胜利地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摧毁了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倒行逆施，嚣张一时。他们极端狂妄，但又极端虚弱。他们要“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其结果是走向反面，一切破产。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可谓“根深蒂固，一朝覆亡”，“盘根错节，顷刻瓦解。”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是他们妄图把空军变成反革命工具的彻底失败，也是他们长期以来在空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

### (三) 主要经验教训

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条基本原则，总结了空军在第十次路线斗争

中的经验教训。空军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严重？经验教训很多，最根本的要坚持三条基本原则，防止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军队的领导权，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 一、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也是决定军队阶级性质的根本问题。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为了达到把空军变成他们篡党夺权工具的罪恶目的，通过空军党委常委，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竭力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们竭力鼓吹和推行林彪“直接指挥”和林立果“调动一切、指挥一切”。散布林彪对空军有“特殊的感情”、“特殊的关系”，没有林彪，没有林立果“就没有空军”。妄图把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军队变成林家父子的军队，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党指挥枪”、反对“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这个马克思主义原则。

他们大肆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把林彪和林立果都吹成是“天才”、“超天才”，是什么“高于认识，高于实践，高于群众，高于历史”的“圣者”。这是他们搞“两个一切”，篡党夺权的反动的理论基础。

他们以林彪、林立果的修正主义黑货冒充马列主义，鼓吹学习他们的东西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读林副主席的书，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捷径”。把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吹成是“指导思想”，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他们以林彪的所谓建军“一整套”方针原则和林立果的“空军制胜”的唯武器论，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妄图把空军建设引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在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中，空军党委的某些同志为什么对修正主义的东西不抵制，不反对，不向中央报告，反而同流合污，推波助澜呢？不是他们不了解情况，也不是识别不了。象“两个一切”这样露骨的反革命货色，象把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作为“指导思想”，象没有任何职务的江腾蛟却当了空军党委委员、常委办公会议成员和政治部党委书记，这样一些显然违反党的原则和纪

律的东西，连一个普通战士都可以看出问题来，为什么身为高级干部的王辉球等同志却“服服贴贴”地去积极推行呢？根本原因是他们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完全站在林彪一边，政治上、思想上完全听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的话，出卖原则，出卖灵魂。他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的指示，格格不入，或阳奉阴违，或歪曲篡改，甚至封锁对抗；而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对林彪的黑指示，他们却“闻风而动”，“快办，办好”，又是作贯彻“两个一切”的决议，又是疯狂吹捧黑“报告”，唯恐跟得不紧。他们立场站错了，路线走错了，必然离毛主席的路线越来越远，一步一步走向反党反马列主义的危险道路。

这一沉痛教训告诉我们，党委要保持无产阶级本质不变，就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坚决执行党的马列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二、要团结，不要分裂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阴谋篡党夺权，在空军竭力推行一条分裂主义的路线。他们一方面公开打出分裂的口号，鼓吹“亲不亲，线上分”，以对林家的态度、感情为标准，大搞“划线站队”。一方面打着“不可分”的幌子，把他们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拥护他们就是“拥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他们就是“反党”。不管是“不可分”还是“线上分”，要害就是搞分裂，就是向毛主席、党中央闹分裂，分裂党、分裂军队。他们拼命鼓吹要跟他们走，“选择”他们作“政治领导”，胡说：“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认准门，跟准人”，“跟对了飞黄腾达，跟错了彻底完蛋”。只要跟他们的就是“感情深”，“大节好”，“自己人”，极力拉拢重用；反之就排斥打击。他们采取种种阴谋手段，拉山头，结死党，组织地下黑班子，控制党委，直至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为他们搞反革命阴谋夺权服务。

“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搞几个人在一起”。为什么空军党委中有的同志被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拉过去？有的是宗派观念浓厚、宗派关系超过了党的关系，以“林家观念”代替党的观念，从山头宗派发展到反党勾结。有的是作风严重不正，对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不仅不抵制，反而臭味相投，一吹就上劲，一拉就过去，和他们打得火热。有的把革命作为“入股”、“投资”，认为林家“树大根深”，就去投机钻营，卖身投靠。这些倾向

都是极其反动落后的。毛主席早就告诫我们：“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个距离。如果你不保持一个距离，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挡回去，不划清界线，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

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区别马列主义党同修正主义党的根本标志。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为全中国全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林彪、吴法宪一伙结党营私，是为地主、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立党为公，为全中国全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必须坚持党的团结和统一；立党为私，为少数人谋私利，就必然制造分裂。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证明，向党闹分裂的人，到头来总是被分裂出去，为人民所唾弃。我们要搞“五湖四海”，决不能拉山头，搞宗派，背着党搞秘密派别活动，要不为名、不为利，决不能从个人的私利出发，投机钻营找靠山；要一切行动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坚决同任何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作斗争。提倡学国际歌，提倡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加强革命团结。

### 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林彪反党集团“如一切反革命集团一样，他们的破坏活动总是采取隐蔽的或者两面派的方式进行”。其特征就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流眼泪，背后下毒手”。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搞修正主义、搞分裂，在空军广大指战员中是极端孤立的，是见不得人的，他们只能靠阴谋诡计。或者以“合法掩护非法”，以搞路线教育为名，大搞篡党夺权的“路线交底”；以调查研究为名，搞反革命特务活动；以加强战备为名，策动“北兵南调”，大搞空军“陆战”训练。或者以“技术掩盖政治”，以讨论垂直起落战斗机问题掩盖搞“两个一切”；以推广“飞行安全经验”掩盖反革命串连，加强“根据地”建设。他们为了掩盖阴谋活动，提出要“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内紧外松”。他们还通过“送礼送政治”，表面上装着“关心”干部，实际上阴谋拉人下水。公开一套，秘密一套，不断变换反革命策略。

对于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大搞阴谋诡计，空军党委内部，王、曹、邝、梁四同志为他们大开“绿灯”，使一些阴谋活动不仅不能得到揭露，甚至公开化、“合法化”。有的人看出些问题，但“私心重，骨头软”，逆来顺受，不敢斗争。

有的丧失阶级警惕，麻木不仁，对打着红旗反红旗不辨真伪，打着白旗反红旗也盲目轻信。完全解除了思想武装。

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必须光明磊落，对重大的原则问题应当明确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对的要坚持，错的就反对。对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看人看事一定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不要只看到说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要看是否阉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不要只看到当面说得好听，而要看是否背后又在捣鬼；不要只看到形式是合法的，而要看它是否符合党的路线和政策。总之，不要被他们的假象蒙住眼睛，“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

#### (四)深入批林整风，加强空军建设

一年多来，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空军的批林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林彪一伙在空军的罪行被充分揭露，问题彻底暴露出来，“‘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深入批林整风，发奋工作，把空军建设好。

##### 一、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和“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的指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切实把批林整风这一头等大事抓紧抓好，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要继续搞好清查工作，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林彪大小“舰队”在空军搞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以及同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批林整风最根本的是解决路线问题。要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紧密联系空军实际，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流毒，使大家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批林的基础上，严格解剖自己，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不正之风。

要把批林整风同认真看书学习结合起来。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要努力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

##### 二、认真执行党的政策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对林彪死党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于上了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严肃揭发批判，热情教育帮助，尽最大努力，把他们挽救过来。只要他们能够向党交心，愿意改正错误，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欢迎和团结他们，继续信用他们。对于某些因一时上当受骗而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主要是启发他们提高觉悟，把问题讲清楚，汲取经验教训。不搞层层检查，人人过关。

要注意掌握政策界限。一定要把和林彪死党有过正常工作来往的同志同参与他们搞反革命阴谋的人严格加以区别；要把盲目地跟着吹捧或干了一些坏事的同志同林彪死党造反革命舆论、干坏事严格加以区别；要把“九·一三”以前犯错误同“九·一三”以后听了中央 57 号文件的传达仍然坚持错误的人，严格加以区别；要把个别领导干部犯错误同所在单位党委和广大指战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所取得的成绩严格加以区别；要把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本人同其家属子女严格加以区别，要按照毛主席关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加强教育，使其划清界限，不要歧视他们。

对被林彪、吴法宪一伙打击迫害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干部，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处理，但也不能搞一风吹。

### 三、搞好领导班子建设

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和老中青结合的原则，要搞“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特别对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问题较多的领导班子和某些机关部门，要尽快加以充实和调整。在调整的时候，要注意保留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同志。

在空军二十多年建设中，涌现出大批优秀干部，他们是党的宝贵财产，是空军建设的骨干。要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大胆提拔优秀的中年、青年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

### 四、加强党的领导，发扬我军优良传统

遵照毛主席“军队要整顿”的指示，要通过批林整风，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观念，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委集体领导，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反对称王称霸。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加强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建设，大力抓好基层，特别是党的支部建设。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军政、军民和军队内部的团结。

五、加强训练，搞好战备

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军队要加强训练的指示，大力加强军事政治训练。要办好学校和教导队，特别要抓紧干部的培养提高。认真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提高训练质量，严格规章制度，搞好武器装备的维修，保证安全，防止事故。遵照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的伟大号召而努力奋斗！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领导小组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八日发出

共印六、〇〇〇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三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死党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汇集（民航系统揭发的材料，初稿）

反革命分子刘锦平，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

刘锦平早就投靠林彪。一九六五年秋，刘锦平在江苏省太仓县搞“四清”期间，就与叶群、吴法宪、王飞、周宇驰、刘世英等勾结在一起。当时叶群是队长，刘锦平是副队长。他们在林彪的指使下，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破坏伟大的“四清”运动。

一九六七年八月至十月，刘锦平在南京调查处理江苏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期间，秉承林彪“抓军内一小撮”的旨意，勾结江腾蛟等人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破坏江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刘锦平在任军委政工组副组长期间，与林彪、叶群进一步勾结。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他主持炮制了一个所谓《关于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对政治工作指示的报告》，大肆吹捧林彪。他与杨成武勾结，推销林彪“大树特树”的黑货，责令福州军区“严加处理”写信批判杨成武那篇“大树特树”黑文章的战士。一九六八年三月，杨、余、傅被揪出后，林彪唯恐揭露了刘锦平的问题，指使黄永胜召开大会讲话，保刘过关。刘回民航之前，叶群又代表林贼找刘谈话，说刘“老实本份”，“是个好同志”。刘锦平回民航后，林贼还多次“接见”他，并经常派林立果到刘家进行阴谋活动。刘锦平为了进一步投靠林贼，经常利用班机从全国各地买来土特产奉送林家，逢年过节还要向林贼一家“问候”，表示效忠。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后，林彪贼心不死，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政变。刘锦平和林立果、吴法宪、江腾蛟一伙结成死党，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建立反革命政变据点，极力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力量。

### 一、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刘锦平按照林彪反党集团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进一步用谣言和诡辩挑动干部，分裂军队，欺骗群众，为林彪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疯狂宣扬林彪“一贯正确”和“不可分论”。

刘锦平根据林立果所谓进行“路线教育”的黑指示，伙同张国民①、董崎②等人，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和一九七一年一月廿一日，两次召开有部分管理局领导干部参加的所谓“路线教育座谈会”。刘锦平亲自抓点，精心炮制了“试点方案”、“试点经验”和“讲话提纲”，送林立果、周宇驰审定后，作为基层“路线教育”的“样板”和“教材”，流毒甚广。

刘锦平一伙打着“路线教育”的幌子，歪曲党的历史，大肆吹捧林彪“一贯正确”，“一贯高举”，“一贯紧跟”，散布“林副主席和毛主席是分不开的”，“若没有林副主席的捍卫，也就没有中国的历史”，“也就没有我们的一切”。

还胡说什么：“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跟谁走，听谁的话，拥护谁作领袖的问题”，“任何时候都要保证跟林副主席走”，等等。

刘锦平还借各种机会，采取种种形式突出林彪。他多次指使董崎收集林彪的文章，准备编一本书和“林彪语录”。一九七一年六月，刘锦平在上海鼓动周赤萍再版吹捧林彪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的黑书《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该书出笼三百万册，刘锦平买了五万册，发给民航人手一册。并给空军其他单位订购了近二十万册。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中央两报一刊《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发表后，刘锦平及其一伙攻击这篇文章“没有突出林副主席的丰功伟绩”，说什么“他们不宣传，我们宣传”。刘锦平指定董崎牵头，组织了一个黑班子，并亲自定题目、出观点，炮制出一本五万多字的所谓“两条路线教育材料”。这个材料歪曲党的历史，以大量篇幅为林彪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其中提到林彪有八十二处，引用林彪的话二十一段，专门吹捧林彪的文字有十六大段，吹捧林彪是南昌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的“光荣代表”，是什么“光辉的榜样”、“最高的典范”。黑材料写成后，刘锦平还嫌对林彪从建国到一九六〇年前这段时间的“功绩”吹捧的不够，指使董崎“再好好地找一找，把这一段再充实一下。”一九七一年八月，刘锦平在首都机场看到一张合影照片，认为林彪的位置不够突出，便大发雷霆地说：“该突出的不突出”，妄图在候机室专门增挂一张林彪的单人画像，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并列。刘锦平一伙还请人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全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大幅油画中，特意添上林彪的像。

## （二）制造谣言，分裂中央，为林彪抢班夺权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刘锦平及其一伙反对党的“九大”路线，提出要批判所谓“团结至上论”，到处造谣惑众，进行分裂活动。

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刘锦平“接见”来京搞地下串连的空四军、空五军×××、×××时，对上海市委和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诬蔑上海市委“压空四军”，谩骂南京军区“在空军头上拉屎拉尿”，煽动“四、五军要沉住气，不要怕”，“骨头压断也要顶住”，“这个账总有一天会清算的”，“你们将来也会和三十八军一样揪出陈伯达式的人物，甚至比陈伯达还重要的人物”。刘的谈话被连夜整理成记录稿，在所谓“左派骨干”中广为传播。

一九七一年四月，江腾蛟在上海密谋开完“三国四方会议”回到北京后，与刘锦平进行了密谈，刘锦平等人便到处造谣惑众，煽动说：现在是“四方面军的压一方面军的”，“笔杆子压枪杆子”，“要警惕秀才造反”。刘锦平亲自向十四航校谢立岑（原政委）等人说：“党内将有一场大的斗争，思想上要有一个准备”，“我们是拿枪杆子的，要以枪杆子来保卫林副主席”等等。

一九七一年六月，刘锦平在上海、杭州召见了空四军、空五军和民航上海管理局部分团以上“左派骨干”，并作了“讲话”。说什么几十年来的路线斗争，都是“解决中央常委中的问题”，“批陈没结束，新的斗争苗头已经看的很明显，矛头对着林副主席”，“当前的斗争就是保卫接班人的斗争”，“是承认林副主席，还是另外选一个什么人”，“要警惕、防止另外的人抢班”，“思想上、组织上要做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刘锦平在成都指使他的亲信向所谓“左派骨干”传播林立果、周宇驰制造的反动谬论。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内部的斗争比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还要残酷”。他们要所谓“左派”队伍“特别注意九、十两个月。九月开三中全会，十月开四届人大，主要是权力再分配问题”，“会上……要有一场激烈的斗争”，“林副主席通过选举的办法就把政权掌握起来了”，“就当主席了。新的领导班子登上天安门，又是新的祖国山河一片红，是震动世界的大事。”如果不成，“黄、李、邱就发动军事政变，号召军队起来保卫接班人。”

（三）鼓吹“天才论”，把林立果捧为“天才的第三代接班人”

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宣读了林彪、叶群亲自指挥炮制的所谓“讲用报告”后，在空军系统“三代会”上，刘锦平利用会议秘书长的合法身份，与吴法宪等人密谋策划，反复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并发表讲话，无耻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向全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对空军的重要指示”，“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光辉”，“体现了他的天才和超群的智慧”，林立果“高瞻远瞩”，“思想很成熟”，“成就惊人”，等等。鼓动各个代表团讨论表态，开展向林立果学习的活动，掀起了吹捧林立果的狂热，把林彪反革命别动队的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成“超天才”，与林彪、陈伯达一伙在庐山会议上向党猖狂进攻遥相呼应，紧密配合。

与此同时，刘锦平指使张国民、董崎等人，在民航驻京单位多次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把空军几个卖力吹捧林立果的人拉到民航大吹特吹林立果的“天才”“事迹”，策动总局指挥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党委分别作出向林立果学习的决定，提出“认识（林立果的）天才，拥护天才，学习天才，保卫天才”，要求大家“恭恭敬敬地向立果同志学习，老老实实在地听从立果同志的指挥”。刘锦平、米家农等还要机关、部队抄写和印发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提出“要带着感情抄，抄出感情来”。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日，刘锦平和张国民等人秘密策划，召开了一个所谓“党委联席会”。会上，刘锦平极其肉麻地吹捧林立果“是个伟大的天才”，说什么“林立果这个天才的成长是符合领袖发展事实的”，“发现林立果这样好的接班人，是我们党兴旺的标志”，“是推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程的伟大力量”，他的“讲用报告”“阐明了当代世界上的重大问题，是理论和实践完全统一”等等。要求在民航掀起“学习，研究、运用”林立果的黑报告的“高潮”，并要求向总局政治部写出学习情况的报告。这次会议之后，他们大肆油印了会议的发言，把吹捧林立果的妖风刮到了全民航。他们广泛散发林立果的黑报告，并规定为“路线教育”的“必读文件”和政治学习的重要内容。他们胡说林立果是“我们党和国家天才的第三代接班人”，他那个所谓“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米家农<sup>③</sup>等人还把林立果在广州管理局用过的杯子、椅子等物都标明“×年×月林副部长用过”的字样保存起来，准备“将来”作为“历史文物”送进博物馆。他们一伙还说什么林立果“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天才的领袖”，“对林副部长的评价再高也不过份”，“等林副部长当了主席，才够我们吹哩！”一九七一年七月，所谓“空九师经验”出笼后，刘锦平等人极力推销，并指使铅印了三千多册。与此同时有组织地搞林立果黑报告出笼“一周年纪念”活动，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热潮。

刘锦平一伙制造的反革命舆论，欺骗毒害了不少人。有的把林立果当作“救世主”，发誓对林立果“认定了，选定了，跟定了”，“子子孙孙要紧跟”，“剥皮、抽筋、挖眼、砍头也要跟到底”。

## 二、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

一九七〇年九月，刘锦平根据林彪一伙的旨意，纠合张国民、赵庆生④、董崎、陈庆军⑤、程兆贤⑥等人组成了民航“左派队伍”的领导核心，逐步发展“左派骨干”，策划和指挥各项阴谋活动。他们以刘锦平、张国民的家作为活动据点，经常开黑会，传达林立果的黑指示，交换情报，分析形势，制定反革命活动的方针和策略。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一年春，他们主要在总局机关和广州、上海、北京管理局的领导层中发展“骨干成员”。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出笼和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召开之后，林立果、江腾蛟先后和刘锦平进行了密谈。刘锦平一伙便加紧发展“左派队伍”，计划对每个飞行大队、省（区）局、重要航站的两个一把手，起码拉过去一个，起“种子”，作用。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份，总局党委召开五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刘锦平对张国民、董崎、赵庆生、陈庆军、程兆贤等人说：“这次省局、大队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来了，要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工作”，“重点应放在北京、广州、上海三个管理局。重点做好飞行部队的工作，掌握几个机组，在关键的时候，能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能过得硬。一总队的工作要好好地做”。根据这个黑旨意，他们一伙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部分团以上干部进行了所谓的“路线交底”，并在五、六月份举办的“批陈整风”学习班上也进行了同样的活动，使大部分管理局和一些省（区）局、航校、飞行大队的领导干部中都有了他们的“骨干”，并由他们回各单位继续发展。刘锦平一伙发展“左派队伍”的主要手段之一是通过个别谈话，制造谣言，欺骗同志，进行所谓“路线交底”。他们首先散布“当前路线斗争复杂”，“任何事情都有两条路线斗争，任何单位都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代表”，“要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要走错门，跟错人”等等，以此制造思想混乱。然后向谈话对象不同程度地交所谓民航、空军和全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底”，把林彪、林立果、刘锦平等人分别打扮成全党、空军和民航的“正确路线代表”，欺骗一些人跟着他们走。另一个主要手段是用提职提级、请客送礼、介绍对象等方法网罗党羽，收买干部，培植亲信。刘锦平把紧跟他的一批老同事、老部下拉进民航，安插在重要岗位上。还从空军选来一些“路线斗争骨干”。刘锦平对紧跟他的人十分器重，如刘的前两任秘书赵庆生、陈庆军，家庭和社会关系很复杂，作事阴险，是刘的“老紧跟”，刘锦平便视为心腹，对他们的职务一提再提，还准备把赵庆生

提为总局指挥部副参谋长。有的“左派骨干”原来是一般干部，只因对林彪、刘锦平跟得紧，都被破格提拔到总局机关处、局领导岗位。反之，对不跟他们一伙走的，则进行排挤打击，叫嚷要“咬紧牙关，三年换完”。

通过以上种种手段，刘锦平一伙很快在民航建立了一个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左派队伍”。刘锦平派人把民航团以上干部中的“左派骨干”名单送给林立果，林立果看了得意地说：“民航的‘左派’骨干力量按比例比空军还要强，今后要考虑支援空军一些！”

一九七一年七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后，林立果、刘锦平一伙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针。根据林立果提出的“左派内部要整风”，“要当战斗队，不要当仪仗队”等七条黑指示和所谓“立场要坚定，思想要解放，行动要谨慎”的行动纲领，刘锦平亲自布置，对“左派队伍”进行整顿，要求他们“要顺流而下，不要逆流而上”，“现在要装孙子，将来当爷爷”。并提出“要防止出叛徒”，“谁泄露了情况就牺牲谁”。鼓吹“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准备随时被捕坐牢”的反革命思想。刘锦平还声嘶力竭地叫喊：“就是杀头也要跟着林立果干”。

同时，刘锦平还“接受了‘林办’的特殊任务”，于一九七一年五月至八月，先后窜到中南、华东和西南地区军内外一些单位进行反革命游说和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拉拢某些部门、某些人，为林贼篡党夺权服务。五月中旬，刘到洛阳××军找该军的军、师干部谈了话。在同关光烈等人密谈时说：“有人反对林副主席”，“中央发下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材料，不要急于表态，要看一看。”刘还了解了该军实力情况，索取了该军的干部名单。五月下旬，刘锦平到武汉与王维国密谈，然后到广州和林立果密谈，并亲自将××军的干部名单交给林立果。六月中旬，刘锦平在杭州、上海与陈励耘等人密谈，并召见空四军、空五军团以上“左派骨干”进行“谈话”，空五军的一些人，还依次列队在刘锦平面前宣誓似的表态，“要永远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部长”。

刘锦平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深受林彪、林立果的赞赏。一九七一年五月，林立果在广州对刘锦平说，民航“搞得不错，广州搞得更好，超过了四军、五军，要向民航学习。”一九七一年七月，林立果在广州又对董崎说：“刘政委这次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工作很有成绩”。



### 三、建立反革命政变据点和特务组织

#### （一）建立反革命政变据点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五日，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窜驻广州白云机场宾馆后，刘锦平立即派程兆贤将亲笔信送给林立果，又给米家农、王斌⑦打电话，要米、王“亲自负责”，为林立果“开展工作提供方便”，要“当成政治任务”，要向林立果“请示报告工作”，私自将广州管理局的领导权交给了林立果。林立果对米家农等人说：“广州管理局是我的家”，“要把我们管理局和各省（区）局建设成路线斗争的坚强堡垒和坚强根据地”。

林立果一伙首先用“接见”、送礼、看电影、封官许愿等手段收买领导干部，控制了广州管理局的领导班子。从一九七〇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管理局党委常委开会四十六次，其中有三十四次是研究贯彻林立果的黑指示。林立果、米家农一伙还把各省（区）局、飞行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召到广州，由林立果多次“接见”，给他们封官许愿，灌输反革命思想。米家农、王斌带着他们逐个向林立果表态：“永远听从林副部长指挥和调动”，“为捍卫林副部长站岗、放哨”，“打头阵”，“不会当叛徒”，“紧跟副部长干革命干到底”。林立果、刘锦平、王维国、江腾蛟、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王飞、关光烈、陈玺等一群死党经常出没于广州，奔走于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地，策划各种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免费乘坐飞机，为所欲为，并自称河南省局是“解放区”，湖北省局是“春来茶馆”，广州管理局是“红色根据地”。林立果前后四次窜入广州，在白云机场宾馆共住了一百二十一天。林立果一伙一到广州，米家农按刘锦平的旨意立即封闭机场的宾馆，指派“对副部长感情最深的人”白天黑夜地站岗放哨，专门侍候。在其黑据点里，藏有大量黑书、黑文件，以及武器、弹药和各种特务工具。林立果一伙神出鬼没，召开黑会，策划反革命阴谋。刘锦平、米家农等大肆挥霍国家钱财，极力为林立果一伙的反革命活动提供经费和物资，米、王提出：“林立果想吃什么买什么，什么有营养吃什么”。林立果一人的伙食费平均每天三、四十元。广州市的鲍鱼罐头没有了，米家农、王斌就要机组到北京买，并打电话或派人到外地买鸡、鸽子、鲜虾，以及沙田柚子、衡阳蜜桔、河南西瓜、成都水蜜桃等等。刘锦平、米家农等人为林立果买了一辆伏尔加小汽车，还改装了一辆小救护车，安上收发报机，专供林立果搞特务

活动用。在白云山新建了一幢专供林立果搞特务活动和吃喝玩乐的秘密据点；又从广州市把过去陶铸在白云山上的别墅要来，加以扩建，准备供林彪、林立果一伙使用。林立果一伙在广州搞反革命活动期间，挥霍的国家经费仅广州管理局有据可查的就达二十八万七千多元。

林立果对刘锦平一伙说：“民航要在白云机场放一个伊尔十八飞行中队”，“在白云山打洞库，藏几架大飞机”，“中央一旦有事就方便了”。刘锦平心领神会，亲自到白云山察看了地形，收集了挖洞库的有关资料送给林立果，并提出要在一九七一年内完成广州大型机中队的组建。

一九七一年四月底，经刘锦平安排，林贼死党刘沛丰、于新野在北京与成都管理局原政委郑剑和十四航校的原政委谢立岑等人见面，策划了林立果到西南建立反革命据点的准备工作。刘锦平、张国民也亲自找谢立岑等人布置，要他们储备粮食、油、盐、干菜，准备应付“路线斗争最复杂最困难”“甚至打内战”的局面。指使他们“一是作舆论准备”，“二是力量准备”，“部队要掌握在你们手里”，“一旦路线斗争激化，打起仗来就可以调动”。根据刘锦平、张国民的黑指示，谢立岑等人进行了具体策划，制定了所谓“防暴乱”的三套行动预案，组织了六次所谓“值班分队演习”。五月中旬，于新野、刘沛丰到成都管理局、十四航校进行反革命游说。七、八月份，刘锦平到西南地区进行反革命游说时，对空军成都指挥所原政委丁钊说：“打起仗来首长（指林彪）要到这里来”。刘到十四航校检查了他们的准备情况，再次对谢立岑说：“尽可能储备些余粮”，“分裂时准备上山打游击。”刘到成都管理局为林立果在西南建立反革命黑据点选定了地点，策划了成都管理局领导班子的改组方案。

## （二）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

林立果、周宇驰对米家农一伙说：光靠“我们这些人还不够”，“将来客观形势一旦来临，要人无人，要干部无干部，不能象过去一样，日本投降都没有人接收”，因此，要“培训路线斗争的骨干，做培种育苗的工作”。广州管理局原“宣传队”，即“战斗小分队”，就是在林立果、周宇驰这种反动思想指导下，通过刘锦平、米家农秘密建立的一个反革命特务组织。这个“战斗小分队”，在林立果的直接控制下，对其成员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和各种特务训练。刘锦平、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亲自对“战斗小分队”训过话，说“小分队要出干部，培

养种子”，“一批一批地培养，一批一批地出去”。他们强迫队员白天黑夜“读、抄、背、讲”林立果的黑报告，说什么“要加深对林副部长的感情”，“感情是根本，……有了对林副部长的感情，一切都有了”。为了培养“感情”，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林立果“接见”队员时，米家农的老婆吕国贤（“小分队”指导员）故意不开电扇，亲自给林立果扇扇子，被树立为“对副部长感情最深”的“学习榜样”。林立果同吕国贤握了手，她竟恬不知耻地大叫她的手是“幸福的手”，逢人便握手，说是“分享幸福”。他们还多次强迫队员集体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要队员“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服从林副部长，一切为着林副部长，一切想着林副部长，一切紧跟林副部长”，“做林副部长的宣传员、保卫员、通信员、战斗员”，“成为宣传副部长的先锋，捍卫副部长的尖刀，紧跟副部长的闯将”。这个“战斗小分队”有自己的反动“队歌”，有多种联络密语和暗号。他们给队员规定了十分森严的法西斯纪律：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单独活动，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谈话，不准随便打电话，不准泄露“林副部长”的秘密活动，等等，甚至女队员剪头发也要经过吕国贤批准，违者要受到批判或处分。

刘锦平、米家农一伙公然篡改党的“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另立“党（团）员标准”，妄图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为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上台作组织准备。他们搞的“党（团）员标准”是：承认林立果是“天才”，“是党的优秀接班人”；“对林副部长有深厚的感情”；“紧跟林副部长”。胡说这些东西“是入党（团）志愿书的新内容”。他们对“战斗小分队”发展的第一批党（团）员说：“是副部长给了你们第二次政治生命”，要求他们“做副部长的好党员、好团员”。并说什么“在我们‘战斗小分队’里入党入团，意义深远，……副部长当了领袖，……我们小分队里还会出中央委员哩！”妄图把他们变成林贼反革命政变的驯服工具。

林立果、米家农一伙操纵“战斗小分队”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他们打着排演样板戏的幌子，把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报幕词全部篡改成他们的反革命语言，如第一场“常青指路，奔向红区”被改为：“副部长指引着奔向路线斗争的战场”，等等。他们公开说：“我们不是为了演戏而演戏，而是用演戏来掩盖我们的政治斗争”。在林立果、刘锦平的指使下，这个“战斗小分队”由吕国贤带

着，于一九七一年八、九月份窜到南阳、郑州、洛阳、武汉、沙市等地，进行所谓“传思想、传感情、传革命精神”的反革命串连活动，配合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大造反革命舆论。林彪、林立果自取灭亡后，米家农一伙还组织队员排演了最后一场剧，宣读了林立果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接见”“战斗小分队”时的黑指示，高呼“打倒路线斗争中的敌人”等反动口号，并在队员笔记本上作反动题词：“不当叛徒”，“宁死不屈”，妄图要队员做林彪、林立果的殉葬品。

### （三）进行特务活动

刘锦平一伙在林立果的旨意下，采取打进来、拉出去、安钉子、搞窃听、跟踪盯梢等特务手段，收集和传递情报，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服务。在上海管理局，刘锦平通过王维国选调人员组建了一个“保卫队”，配发了枪枝，只受刘的亲信张海山<sup>⑧</sup>调动，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出入虹桥机场的行动，他们都一一记在小本上。在广州管理局，除指挥“战斗小分队”进行特务活动外，还要乘务员做“交通员、通信员、联络员”；要候机室服务员“察颜观色，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仅一九七一年一月至九月，他们就指使某些人为林彪黑司令部传递秘密信件、材料四十多件。在总局机关，刘锦平指使其秘书和“左派骨干”学照相，学开汽车、摩托车，刘与林彪一伙的联系，都由程兆贤驾车联络；同时指使其亲信在首都机场的专机活动中，窥探中央首长的情况，偷听总理的谈话。刘锦平还利用黑关系，探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动向，窃取党中央的核心机密。

伟大领袖毛主席巡视南方时，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在南昌接见了军队和地方负责同志，民航江西省局原政委王起元立即秘密函告上海管理局原政委辛国良，辛又马上报告了刘锦平一伙，九月七日陈庆军等人去上海、杭州、南昌将探听到毛主席的情况当面报告了于新野、李伟信、王维国等人。于新野对陈庆军说：“象这样一类事情，你们以后要及时向上反映。”

刘锦平等人为林家从香港购买一部照相机及全套放大、冲洗设备，两部手提式摄影机；又布置民航某单位给“林办”研制保密电话机，为林彪、林立果一伙的特务活动提供工具。

### （四）对抗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指示，破坏飞行安全工作

毛主席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关于对外宣传问题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反复强调“不要强加于人”。刘锦平一伙竭力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刘锦平在广州亲自主持召开的民航宣传服务工作会议上,提出“宣传统帅服务,”“宣传就是最大的服务,最好的服务”,要“地面红一片,空中红一线”等等。并擅自把随机乘务员的职称改为“空中宣传服务员”,把候机室服务员的职称改为“宣传服务员”,规定“服务员的首要任务是宣传”,“要大喊大叫,大蹦大跳”。如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不及时给旅客办理手续,却关上候机室、餐厅、厕所的门,把旅客都赶到大厅去看宣传队表演节目。有的乘务员在飞机上朝着苏联旅客的鼻子挥舞拳头,高呼“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口号。有的乘务员在飞机上戴着红卫兵的袖章,拿着喇叭筒,对着蒙古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耳朵读毛主席语录,事后蒙古向我提出抗议,对外造成极坏影响。对此,周总理进行了批评,并指示在对外宣传中要区别对待,要讲究方式,要注意效果,不要强加于人。可是刘锦平等人拒不执行,公开对抗。

一九七〇年五月,王洪文同志率领我国工人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回国路经广州时,发现广州管理局在对外宣传中严重地强加于人,报告了康生同志。康生同志五月十三日批示:“派人对民航系统和广州、上海、北京、南宁等机场的对外宣传工作彻底检查一次”,“在民航一切工作人员中进行教育,改进对外对内的宣传工作”。刘锦平对中央首长的批评极为不满,攻击王洪文同志是故意“找别扭”,并跑到广州,多次召开座谈会,大讲对外宣传“成绩是主要的”,“可以演嘛!”“不要怕”。八月份,在总局召开的运输服务工作会议上,刘锦平等人只字不提中央首长的指示,却大肆宣扬广州管理局的宣传“搞得好”。在会上,刘锦平嚣张地说:“不要人家一讲,你们就不敢宣传了。”还说什么这“是一个方向问题,原则问题,必须坚持始终,坚定不移。”他们还利用总局政治部印发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情况介绍》指使人写文章诬蔑中央首长的批评是什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实行‘关’、‘卡’、‘压’”,是“妄图扼杀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新生事物”,“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扬言“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不管这股邪风是从那里吹来的,我们要坚决把它顶回去”。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刘锦平等人还破坏党的统一纪律和毛主席“抓革命,

促生产”的方针，非法招收了二百多名文艺兵，并抽调了大量在职人员，在各管理局擅自成立了庞大的专业宣传队。刘锦平竟扬言“就是丢掉乌纱帽，也要继续搞”。明目张胆地公开对抗中央首长的批评。

一九七一年六月，总理在首都机场欢送外宾时，又对民航的宣传服务工作，特别是对广州管理局的宣传服务工作作了指示和批评。刘锦平非常不满，当他听了总理指示的传达后，很不耐烦地说：“哎一呀！不要乱传，不要乱传！”当听到总理对首都机场候机室布置问题的指示时，刘锦平竟说：“怎么样布置，让总理的秘书来说一说嘛！”空军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刘锦平打电话“请示”周宇驰后，装“病”不参加会议，拒不写检讨，却派人到首都机场非法调查总理对民航的批评。七月六日，林立果在广州对米家农说：“他们对你们的批评，我第二天就知道了，听了以后很气愤，……你们要坚定，不动摇”，“广州管理局的成绩，任何人是抹杀不了的。”米家农向林立果表示：“有副部长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挥，我们一定能经得起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严峻考验”，“一定能把这块阵地巩固住，建设好。”刘锦平还派董崎赴广州向林立果汇报情况，请示对策。林立果一面指使他们不要硬顶，要“顺流而下”；一面叫嚷对外宣传“不能降到资产阶级水平”，恶毒地攻击说：“现在真有点怕外国人了，外国人说话比打雷还响”，“宣传不如不宣传，不宣传不如反宣传”等等。董崎有恃无恐，猖狂叫嚣：“要是候机室唱唱跳跳就是强加于人，那让外宾到剧院看样板戏不也是强加于人吗？”刘锦平等人还派了三个工作组到上海、广州、成都收集反证材料，大耍两面派，写假“检讨”，顽固对抗党中央、国务院。

刘锦平一伙在民航飞行工作方面，也极力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九六九年，刘锦平等人给专业飞行部队每个机组发一套红旗、锣鼓，要求机组出发前大练文艺节目，到达专业基地后先演节目。他们不仅对飞行安全工作不闻不问，相反还疯狂反对周总理对民航工作“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的指示，并煽动一些人对“保证安全第一”进行所谓“批判”。只要谁一提保证飞行安全，就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说什么“你们不要拿安全来压政治、压路线”，批评政工干部参加飞行值班是“不务正业”，甚至骂参加飞行值班的政工干部“是国民党的政委，还是共产党的政委？！”以致造成很多人不敢抓业务工作，不敢抓飞行安全，使飞行事故不断发生，给党和人民在政治上、

生命财产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一九七〇年，广州管理局发生伊尔十四 616 号飞机一等事故，刘锦平一伙在林立果的旨意下，不但不认真检查事故原因吸取教训，反而大肆表扬广州管理局，胡说什么从这次事故“看到民航突出政治热情高”，“在严重的事故面前经得起考验”，“摔了飞机没有摔掉士气，反而摔出了模范”等等。并把这个“模范”事迹编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情况介绍》专辑，铅印二千五百余本散发全局，号召大家学习。一九七一年九月，他们又积极推销林立果的所谓“九师经验”，妄图把广州管理局树立为“民航的空九师”。

#### （五）林贼自取灭亡后，刘锦平一伙的罪恶活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后，刘锦平一伙十分惊慌，预感末日来临，急忙布置他们的骨干毁灭罪证，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十五日早上，赵庆生、董崎、陈庆军、程兆贤等秘密开会，研究对策。会后即分头掩埋和烧毁材料，与骨干通报情况，并用暗语打电话和派人向林彪死党江腾蛟、王维国、米家农以及辛国良等人通风报信。九月十七日，刘锦平又亲自召集张国民、赵庆生、陈庆军、程兆贤等开会，统一口径。刘锦平一伙还暗中布置“战略性退却”，要一些人“不再暴露”，“打进去”，“万不得已时，也只交代孤立性的问题，不交代有组织的活动”。有的竟散布“二十年以后再看”等等反革命言论。

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正在深入清查中，这里所整理的仅是一部分。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批林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发展。遵照毛主席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指示，希望大家进一步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查清与其有牵连的人和事，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坚决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 ①民航总局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 ②民航总局政治部宣传部原部长
- ③民航广州管理局原政委
- ④民航总局指挥部办公室原主任，刘锦平的第一任秘书
- ⑤民航总局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刘锦平的第二任秘书
- ⑥民航总局指挥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刘锦平的第三任秘书
- ⑦民航广州管理局原局长
- ⑧民航上海管理局政治部保卫处原处长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主要罪行材料汇集（初稿）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于一九六七年四月，来到空军，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跟着林彪、叶群，仓惶出逃，自取灭亡。在这四年半的时间里，林立果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伙同吴法宪以及周宇驰、江腾蛟、刘锦平、王飞等一小撮死党，大造反革命舆论，秘密建立和发展反革命特务组织，炮制《“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策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罪大恶极。现根据揭发材料，将其主要罪行汇集如下：

#### 一、建立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

一九六七年四月，林彪、叶群出于反革命目的，把林立果送到空军。这个连党员也不是的林立果，一来就当了空军党委办公室的秘书。同年七月，按林彪旨意，经吴法宪批准，在党办成立了以林立果为组长的“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组员有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这个“调研小组”就是法西斯组织小“联合舰队”的前身。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林彪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老虎（林立果的小名）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反革命的“独立工作能力”。同年十月，正当林彪擅自发布“第一个号令”，进行篡党夺权预演之时，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旨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一九七〇年五月以前，林立果与周宇驰、王飞一伙进一步勾结，以原来的“调研小组”为基础，建立了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法西斯别动队——小“联合舰队”。“舰队”的头目是林立果，内部称他“司令”、“旗舰”。成员有王飞、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刘世英、程洪珍、李伟信、吴达云（空司办公室一处原秘书）、陈伦和（空司办公室外事处原翻译）、王永奎（空司情报部原副处长）、许秀绪（空司雷达兵部原副处长）、王琢（空司汽车队原队长）等十几个人。“舰队”内部建立了政治、技术、理论资料等几套班子，周宇驰是“总管”。他们的



反革命誓言是：“一辈子都紧跟首长（指林彪）、林副部长（即林立果）”，“准备坐牢，流血牺牲”，要“独立自主，自成体系，发展独立的政治力量”。

一九七〇年七月，在林彪指使下，吴法宪一伙经过密谋策划，在常委办公会议抛出“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把这个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为空军的“太上皇”，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林立果按照林彪的旨意，在空军和民航的一些单位中，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策动反革命政变。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 二、炮制黑“报告”，刮起吹“天才”的反革命妖风

在林彪一伙策动庐山反革命政变的前夕，林立果带着周宇驰、刘沛丰、程洪珍、刘世英、许秀绪等一小撮死党，钻进反帝路招待所的黑据点，炮制所谓的“讲用报告”。这个紧密配合林彪反党夺权阴谋的赫鲁晓夫式的报告，完全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大杂烩。

这个“讲用报告”的出笼，是林彪、叶群直接策划和指使的。“讲用报告”的主要部分，就是林彪准备在“九大”抛出的反革命讲话稿，加上一些剽窃、抄袭来的资料，拼凑而成的。报告出笼前，叶群在毛家湾黑窝亲自组织了试讲。林彪听了录音，说：“不仅思想象我的，语言也象我的”。

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经吴法宪等批准，在空直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林立果抛出了这个“讲用报告”。以后这个“讲用报告”录音又在空军第三次“三代会”上连放两次。一群死党鼓噪而起，大肆吹捧。吴法宪说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周宇驰说，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无师自通，不思而得”，是“第三代接班人”。王辉球同志也大吹林立果是“天才”，说“讲用报告”是“对空军建设的指示”。林立果也得意忘形，今天“接见”这个，明天与那个“合影”，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大家日夜想念我，我也想念大家”。空军“三代会”上这股吹捧“超天才”的反革命妖风，与林彪一伙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遥相呼应。老子儿子，一唱一和，山上山下，密切配合。

林立果、周宇驰还以对“讲用报告”的态度为标准划线排队。他们秘密布置把“三代会”上“表现好”的和“表现差”的干部列个名单，“记下一笔帐”。刘

世英专门组织一帮人四处探听，发现“感情深”“跟得紧”的就立即拉拢，又送东西，又请吃饭；对不赞成他们的做法，或吹捧不积极的，轻者扣上“路线觉悟低”、“政治不敏感”、“糊涂蛋”等帽子，重者列为“右派”、“反动势力”，进行迫害打击。

### 三、私上庐山，直接参与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叶群私自把林立果带上庐山，大搞阴谋活动。林立果充当了林彪、叶群的秘密联络员，与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秘密联系，向他们传达林彪的黑旨意，指挥他们向党进攻。在林彪指使下，吴法宪、林立果私调了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庐山待命。他们还安装了六条电话专线，进行秘密通讯联络，反革命活动频繁，气焰极为嚣张。

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即指使林立果找王维国、陈励耘进行安抚、鼓气。林立果秘密地开出一辆汽车拉上陈、王两人，在车上边走边谈，说：“首长（指林彪）、主任（指叶群）对你们暴露受损失很心疼”，“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指使他们按照林彪“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的黑旨意，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 四、炮制“571”反革命纲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立果随林彪、叶群窜到苏州，继续策划反革命政变。二月二十日，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二十一日又从上海到杭州。在杭州，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与陈励耘进行了十多次密谈，研究反革命政变计划。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带于新野从杭州回到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这个反革命政变计划的代号是林立果定的，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取名为“571工程”。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与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即《“571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底，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开了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对执行反革命政变计划作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林立果在会上宣布：上海由王维国负责，杭州由陈励耘负责，南京由周建平负责，

三个地方的协调和拉总由江腾蛟负责。这个黑会从晚上十点多钟一直开到次日晨六点多，整整开了一夜。林立果临走时对王、陈、周等招手说：“再见，祝胜利会师！”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 五、大造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舆论

林立果、周宇驰等大肆散布“当前路线斗争就是围绕着对林彪的态度展开的，斗争的焦点是对接班人的认识问题”，“是捍卫林彪副统帅的地位问题”。他们竭力鼓吹“进行路线教育，就是解决一个站队问题”，“说穿了就是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鼓吹“选择政治领导”，胡说什么“政治斗争很复杂，每个人都得找个靠山和后台”，“要解决政治生命依附谁的问题”，要“把政治生命依附于林副主席一家”。一伙死党公开叫嚣：“当前就是要突出宣传林副主席”，捍卫林彪的“最高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捍卫林立果在空军的“最高领导地位”。在林立果指使下，由刘锦平具体掌握，在一些单位进行了所谓“路线教育试点”，还总结了题为“学习林副部长，捍卫林副部长在空军的领导地位”的所谓“经验”，广为传播。林立果十分得意说：“这样搞正面教育，抓部队，建立了感情，到时候就听指挥了。”

他们还造谣说，“有人想抢班，想夺接班人的权”，“秀才要造反”，“笔杆子压枪杆子”，为反革命武装政变作舆论准备。林立果说：“从现在起，一个月到半年之内，可能出现大的反复、大的风暴。”叫嚷要“积聚力量”，“迎接未来的政治大风浪”，要准备“掉脑袋”，“上山打游击”，“同舟共济，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

#### 六、发展法西斯特务组织，建立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

为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需要，小“联合舰队”在林立果的指挥下，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制订了行动计划、组织方针，规定了联络暗语和代号。他们研究了“技术掩盖政治”、“严格保密，不让人摸到规律”等反革命策略。他们规定发展党羽的原则是“步子稳妥，多做个别工作，看准了才打招呼”，“要经过请示报告”，“先过渡到舰队外围，后再进入舰队”。他们按照“北京是中心，兼顾沪、穗”的反革命原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秘密地成立了“调查小组”、“技术小组”、“战斗小分队”等反革命组织。

林立果给“舰队”规定了一套法西斯纪律,一再强调“舰队”要培养“江田岛”精神,要“舰队”成员绝对服从,“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林彪、林立果。规定“舰队”研究的问题、布置的任务“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叛变者,严厉制裁”,要“掉脑袋”,“杀子断根”。

他们进行了特务训练,学会了使用各种轻武器和特工设备,驾驶各种汽车以及掌握照相、窃听、盯梢等技术。林立果、周宇驰秘密地进行了驾驶坦克、水陆两用汽车的训练。周宇驰还秘密地学会了驾驶直升飞机。他们有陆、海、空军三种服装和陆、海、空三军及地方汽车的车牌,有的车牌正反两面喷有两种车号,可以随意调换。

他们大量搜集古今中外政变的资料,挖空心思地研究反革命政变的伎俩。一九七一年八月,林立果指使于新野搜集和摘录了政变和谋杀的二十八个事例。

林立果通过王维国在空四军建立“教导队”,秘密组织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林立果指派“上海小组”(即“分舰队”)组长裘著显,副组长蒋国璋亲自掌管,并派小“舰队”成员吴达云去协助。一九七一年八月,林立果还专门查问“教导队”的情况,并交代“要保密”,“要一期一期办下去”,“毕业时走一部分,留一部分”。他们规定“教导队”在政治上要培养对“首长”(指林彪)、“副部长”(指林立果)的感情,要“一辈子紧跟林立果”,“甘愿做一颗螺丝钉,林立果拧在那里,就在那里发光”。军事上“要多学几手,多配些汽车、摩托车和枪,增加机动能力”,秘密地进行擒敌拳廿套和步兵动作、打靶、刺杀等训练,掌握各种轻武器的射击技术,并配备了最好的武器。他们对“教导队”严加控制,隔绝队员与外界的联系。

#### 七、设立反革命据点,大搞特务活动

法西斯分子林立果伙同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和北戴河等地,设立了十多处反革命秘密据点。仅在北京一地,他们先后在空军反帝路招待所、幸福村招待所、原空军学院、西郊机场、原空军二高专设立了五个秘密据点。这些据点非常隐蔽,汽车可以开到房子里。有的房间安了两、三道门,只许几个人出入。窗户上安有铁栏杆,两层玻璃,三层窗帘。在白云山的据点还设有岗楼、了望台、警铃踏板。他们在这些秘密据点里,召开黑会,秘密串连,收集情报,训练特务,策划反革命阴谋。特别是原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的

两个秘密据点，成了他们具体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指挥所，事后从这些据点里，搜出了大量的轻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匕首等杀人凶器，录相机、照相机、录音机、窃听器、警报器、各种收发报机等特工器材以及窃取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文件。

林立果还盗用了大量通讯器材，在黑据点架设专用线路，建立秘密通信网。仅在北京的黑据点以及死党的宿舍，就拉了七十对专线，安装了六十四部电话。他们还盗用了电话保密机十八部，航空救生电台十三部，进行秘密联络。

在这些黑据点里，林立果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黑据点内部陈设极其豪华，多是派专人到各地购买的高级物品，也有不少是从外国进口的生活奢侈品，如：尼龙蚊帐、鸭绒被、地毯、沙发、沙发床、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高级轿车、电气暖具、吸尘器、吸潮器、高级药品、电动牙刷等等。据反帝路招待所、西郊机场、原空军学院、原空军二高专四个黑据点统计，修缮、扩建、增添设备和购买高级消费品，就花了十五万八千二百多元。

#### 八、窃取重要情报，盗窃核心机密

以林立果为头目的小“舰队”曾多次开会布置收集情报，着重收集和窃取有关毛主席、中央负责同志以及许多地方和军区负责同志的情报，给林彪、叶群通风报信。一九七一年八月，江青同志去青岛，于新野探听到这一情报后，马上通报给正在青岛空军疗养院为林立果开辟黑据点、找济空原司令员吴宗先串连的江腾蛟，并把他召回北京。八月以后，林立果派于新野等人窥测、跟踪毛主席的行动，窃取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内容。

林立果指使死党、亲信，盗窃了大量的核心机密。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林立果随林彪去国防科委，借看尖端绝密产品的机会，用录相机把介绍的所有实物和战斗性能、技术数据等资料全部录走。他们在空军窃取了全空军作战实力，组织序列表，全空军团以上干部名册，我国发射导弹、卫星的雷达观测资料等核心机密。一九七一年九月，周宇驰等人还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供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的频率和时间表，北京至蒙古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和沿航线的机场位置、导航台呼号、频率，我国华东、中南几个省的一、二、三级机场资料，以及全国的飞行资料等等。

林立果一伙还有计划地侦察了不少地区的重要目标和地形。一九七一年五月，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程洪珍，在顾同舟等人的陪同下，到深圳、沙头角一带侦察地形。七月十四日，林立果乘安—24 飞机从汕头返回广州，故意偏离规定航线，对香港、九龙一带沿海地区进行了窥测拍摄。与此同时，还指使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到了良乡、郑州、南昌、长沙、新城、韶关等一百一十九个地点，特别对北京近郊地区的重要目标，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射台、重要通信枢纽、军事阵地等，反复进行空中侦察和照相。

#### 九、以搞“科研”为名，研制特务工具

林立果、周宇驰指使李伟信、王永奎、贺德全等人，研制了十多种特工器材。其中有电压高达几千伏的手握麻电器、汽车麻电器，有搞特务窃听的自动电话盲音消除装置，有能自动报警的电子警戒装置，有进行秘密联络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有特制的电话保密机，有互相拍发暗号进行联络的汽车自动喇叭，以及消灭罪证的快速碎纸机等。为了加快试制和购买新的特务工具，林立果动用了外汇十万三千四百八十三美元，从国外进口了微型照相机、微型窃听器、警报器、录相机等大量特工器材。林立果一伙还盗用了各种战备器材，仅在北京几个单位的初步统计，被他们盗用的望远镜、录音机、收发报机、光电自动发报机、频谱分析仪等贵重器材和精密仪表就有一百五十五部，各种电子元件九千一百余件，各型钢材近百吨。

林立果、周宇驰还组织四十多名翻译，用了近一年时间，翻译进口的特务工具技术资料及说明书。

#### 十、抓部队，搞武器，大搞“陆战”训练

小“舰队”确定“基本方向是抓部队，抓军、师两级，抓关键部队”，“建立根据地”。林立果说：“解决问题还是靠部队”，“这是基础工作，不要天天在机关里窜来窜去”。他一再要求“舰队”成员“眼向下，二、三人一组在外面跑，名义是下部队调查研究，实质上多开辟象空九师那样的部队。”

林立果早就通过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等人，控制空四军、空五军，妄图把这两个部队变为他们“安全的基地，可靠的基地，信任的基地，放心的基地”。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一伙一面秘密策划，从驻京院校内抽调了一批所谓“左派”，去空四军加强“基地建设”，一面又通过王璞、顾同舟、解耀宗等人，把

黑手伸进广空的一些单位。一年之内，林立果曾在空十二军搞了十五次所谓“接见”，要解耀宗等人把“根据地”“巩固好”，准备“在更大范围内起作用”。为了拼凑反革命政变力量，林立果一伙采用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的手法，以小恩小惠、封官许愿、请客送礼，腐蚀干部，拉人下水。林立果说：“送东西，主要是送政治，面要宽一些。”在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会期间，林立果派周宇驰、刘沛丰等人大搞反革命串连，找一些单位来开会的领导干部谈话、送礼，进行“路线交底”，把有的人引上贼船。

一九七一年三月以后，林立果以及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刘锦平、王维国、陈励耘、胡萍、鲁珉、曾国华、何振亚、郁文等四处奔走，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长沙、武汉、西安、兰州、南昌、成都、昆明、郑州、洛阳、济南、青岛、大连、天津、保定、新疆等地，进行反革命串连。

与此同时，林立果多次向王维国、陈励耘、王璞、顾同舟、解耀宗等人交待：要加强空军的“陆战能力”，“做到空中能打，地面能战”，“对付路线上的敌人过得硬”。王维国、陈励耘组织了“武装营”，装备了“火力车”（把枪炮安装在汽车上），大搞“陆战”训练，还搞了歼击机超低空训练，高炮打坦克的实弹射击。王璞、顾同舟、解耀宗等人利用广空参谋工作会议、后勤场站工作会议，公开下达了“陆战训练”的任务，提出“机场要人人皆兵”，“把场站变成陆战团”，要军、师、团组织“陆战领导小组”，制定“陆战行动预案”。

林立果一伙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搞到了大批武器。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给王维国弄去新式微型冲锋枪样枪和图纸，进行仿制。林立果还指使王维国制造步枪、冲锋枪和穿甲弹（要求能穿透九十至一百毫米厚的钢板），又要王璞、顾同舟等人秘密试制半自动步枪和手榴弹，成立“造枪改炮小组”，用废旧航空火箭、火炮，安上支架、轮子，用于地面作战。

十一、导演“安全现场会”，发动所谓的“夏季攻势”

一九七一年七月，经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策划，在空九师召开了所谓“安全现场会”，借着推广“安全飞行经验”，大造反革命舆论，进行反革命串连。林立果一伙采取内部串连的办法，拉了四个军区空军和五个军、十四个师、三个独立团，共一百四十三人参加。会议前夕，林立果与顾同舟进行了密谋。林立果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争版权，要防止别人摘桃子”。并对死党和亲信说：“你们都去，

要上主席台，亮亮相，告诉他们，你们都是我林副部长身边的人”，“这次打个大胜仗，你们都是有功之巨”。会议期间，林立果在白云山黑据点遥控指挥，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死党在现场策划。会议文件和讲话材料都经过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等修改定稿。他们规定会议要“敞开思想谈认识，满腔热情抒感情”，说什么“抓安全要感情第一”，继续吹捧“讲用报告”和“两个一切”，狂热地吹捧林立果。在会议过程中，他们还逐个摸底排队，搞“路线交底”，进行拉拢。整个会议搞的乌烟瘴气。会后，林立果又“接见”一些人，说他们“路线觉悟高”，要“多保重身体”，“将来要从大家这里出干部。”经过这次会议，再次刮起了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胡说什么林立果搞的这个“典型”，是“空军的大寨，空军的大庆，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设军队的样板”，“对空军建设又一重大贡献”，“放了第二颗政治卫星”。吹捧林立果是“群众的最好领袖”，是“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接班人”，表示“认准了，跟定了”。林彪死党叫嚣“不怕风紧浪急”，“就是戴着钢盔也要跟林副部长干到底！”接着，他们又搞纪念“讲用报告”一周年，大量印发“讲用报告”，召开纪念会、“感情讲用会”，大搞表“决心”，献“忠心”，使这股反革命妖风越刮越烈。林立果、周宇驰把这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称之为“夏季攻势”。

## 十二、阴谋“加快、提前”实行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林彪、林立果一伙十分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刺探和窃取会议的情况。林立果对会议作了三种估计：“（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指林彪）。”他们准备如果中央的会议点林彪的名，就“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四月二十三日晚，林立果指使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开了一个黑会，具体研究反革命政变的部署。林立果在死党内部宣布，将这次行动的具体指挥权交给王维国，到时候“四、五军的部队向上海靠拢，接管上海市”，林彪“就宣布接班，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如不能到北京就准备去广州，以西南山区为依托，以广州为根据地，进行北伐，重新打出一个统一的局面，最少打出个长江为界来”。后来他们看到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并没有点林彪的名，才把反革命政变计划推后，继续加紧准备，待机而动。

## 十三、策划和实施两项反革命阴谋



一九七一年八月，正当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林立果、周宇驰窜到北戴河，并乘坐直升飞机往返于北京、北戴河之间，传送情报，受领林彪的反革命旨意，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林立果对其同伙说：“十月要召开四届人大，在此之前要召开三中全会，开会就有斗争，斗争的问题还是个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我们只能上，不能让”，“不能等着让他们杀我们的脑袋，要先下手为强！”他们叫嚣：“现在就是要考虑选一个适当的机会，甚至采取一种非常手段，给林彪制造一个上台的条件。”

九月八日，林彪向他的死党下达了反革命政变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当晚十时半，林立果从北戴河拿着这个“手令”回到北京，从八日午夜到九日凌晨，召开了一系列黑会，按照林彪的旨意，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时谋害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首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林立果、周宇驰找江腾蛟密谋。林立果在出示了林彪的手令以后，布置江腾蛟去上海地区“动手”，提出了三条办法：一是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打火车；二是调几门一〇〇高射炮平射打火车；三是实在不行，就要王维国乘接见时动手。林立果还说：“首长（指林彪）讲，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江腾蛟、周宇驰又补充了两条办法：“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把××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林立果布置“舰队”成员王永奎找人研究把油库烧着而又不致被人发现的办法。

接着林立果、周宇驰找王飞密谋，布置王飞攻打钓鱼台，谋害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随后林立果、周宇驰又召集“舰队”成员刘世英、刘沛丰、李伟信、程洪珍等四人在原空军学院黑据点开会。林立果凶相毕露地说：“现在决定进行武装起义”，“这里（指空军学院据点）就是指挥部。你们都是指挥部的成员。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准备争取国庆节前后解决问题，胜败在此一举。”还说：“本来想多抓一些部队，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个人用，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你们要好好干，干好了当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再好的可以当常委。总政拿过来，北京军区拿过来，你们想干什么还不行！”“这次可要论功行赏。”林立果还狂叫：要“进攻钓鱼台！”

与此同时，派于新野到上海向王维国下达了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任务，又到杭州同陈励耘密商用伊尔—10 飞机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恶计划。

九月十日，林立果调关光烈来京。当晚，林立果、周宇驰与关光烈在反帝路招待所据点密谈。九月十一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又找关光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开黑会，研究攻打钓鱼台的方案。林立果对关说：“把你找来，是调你的部队解决钓鱼台问题。”拿出预先绘制的钓鱼台地图给关看。并具体询问了关光烈所属部队有几个团？多少火焰喷射器、火箭筒？部队能否调出来？多长时间可以调出来？等等。林立果怕火车调部队慢，容易泄露，打算用安—12 飞机运。林立果、江腾蛟、王飞、关光烈、于新野还偷偷地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他们还策划过“用空司警卫营冲”，“用飞机轰炸”，“调一个坦克团”等手段攻打钓鱼台。

九月十一日晚，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与鲁珉等人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开会，再次具体策划行凶的方案。会上，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人脱掉上衣，提着手枪，杀气腾腾。林立果说：“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不成就看鲁部长（指鲁珉）在硕放第二次攻击。”还说：“事情成功之后，你们就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

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九月十一日提前离开上海回京，从而打乱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部署。他们第一项反革命阴谋破产了，又慌忙决定实行第二项反革命阴谋，妄图携带黄、吴、李、邱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内战。

九月十二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根据林彪旨意，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研究南逃计划。接着周宇驰又找江腾蛟、王飞进行密谋。周宇驰说：“情况紧张，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到广州后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把中央和军委都搬到广州，另立中央。”疯狂叫嚣：“到那时，广州电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个中央，两个司令部，只有通过全面内战或谈判来解决矛盾”。

十九时四十分，林立果通过死党，私调 256 号三叉戟飞机一架，潜往山海关待命，准备次日供林彪、叶群、林立果南逃时使用。在山海关机场，林立果对机组人员说：“明天首长（指林彪）要坐这个飞机”，你们“要听林副主席的指挥，关键时刻要起作用”。他们又安排依尔—18 一架准备十三日晨送周宇驰、胡萍去山

海关，然后随林彪去广州，该机则经上海拉“上海小组”、“空四军教导队”的人员去广州。还安排三叉戟、安—24 各一架，供黄、吴、李、邱和由北京去广州的人使用，并计划用安—12 一架运走两架云雀直升飞机。他们预谋于九月十三日晨七时起飞，南逃广州，并通知了王维国、陈励耘、顾同舟等人负责接应。晚上二十一时许，王飞按照林彪、林立果旨意，在空司办公楼内秘密召集于新野、刘世英、鲁珉、贺德全、朱铁铮、郑兴和等开“七人黑会”，策划“南下”行动方案，拟定了第一批随从南逃的名单，确定了编组方案。王飞还宣布江腾蛟是这次行动总指挥，鲁珉、贺德全是副总指挥。于是林彪死党慌忙收拾行李，整装待命。

但是，由于毛主席于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计划。晚二十二时半左右，中央追查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并决定必须有周总理的指示，256 号飞机才许起飞。他们的第二项反革命阴谋又破产了。

#### 十四、狼狈投敌，自取灭亡

林彪感到阴谋败露，末日来临，立即仓惶逃命，决心叛国投修。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林立果气急败坏，慌忙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下达了停止南逃行动的“命令”，并告周“要北上”（即叛国投靠苏修）。周宇驰、于新野同时布置小“联合舰队”成员王永奎、陈伦和、许秀绪、王琢等人集中到原空军二高专秘密据点待命。

九月十三日凌晨零时三十分，林立果、刘沛丰等少数死党，跟着林彪、叶群，爬上三叉戟飞机，仓惶逃命，狼狈投敌。二时三十分，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机上林彪等人全部丧身火海。狂妄不可一世的林彪反革命别动队的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和他的老子一样，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于十三日凌晨三时十五分，私调“直五”型直升飞机一架，企图外逃未遂，周、于畏罪自杀，李伟信被我生俘。

这样，继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林彪反党集团又一次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政变被彻底粉碎了。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死党江腾蛟的反革命罪行材料汇集（初稿）

林彪死党江腾蛟，是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凶手，是一个极端仇视毛主席、极端仇视共产党、极端仇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极端仇视中国人民、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分子。现根据空直机关的揭发和有的人的交代材料，将其主要的反革命罪行汇集如下：

#### 一、林彪的忠实走狗

江腾蛟极力追随林彪，得到林彪赏识。一九六五年秋，叶群、吴法宪带了一帮人到江苏太仓洪泾大队，以搞“四清”为名，组成了效忠林家的黑班底，江腾蛟积极入了伙。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把林立果、林立衡送到上海，交给江腾蛟保护起来。叶群亲自给江腾蛟打电话：“这两个孩子可是林副主席的两只眼睛，你要好好照顾。”江含着眼泪回答：“请放心，有我江腾蛟在，就有他们两人在。”他先把林立果、林立衡藏在南京，向亲信交代：“要绝对保密，绝对保证安全。使用的车辆要严格消毒。”后来，他又把林立果、林立衡伪装成记者、秘书，带在身边，专门调派一架飞机，窜到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进行阴谋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抛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反动口号，反党乱军。江忠实执行林彪的黑指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破坏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蒙蔽群众，把矛头指向南京军区领导。秘密收集整理军区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送给林彪。他得意洋洋地对党羽说：“老实说，我在南京的做法，没有上面的指示，我能随便干吗？”“我的后台在北京，又粗又硬。”正当南京地区的部队、群众要清算江腾蛟罪行的时候，林彪、吴法宪一伙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三日，派他到西南地区，参加航空兵三师击落美帝入侵飞机的庆功会，给他加上“空军部队负责人”的头衔，代表空军领导机关宣读中央军委嘉奖令。使他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

一九六八年四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将江腾蛟调离南京。林彪通过吴法宪，事先把决定告诉了江腾蛟，并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保护起来，要他“深居简出”，“避一避风头”。江经常出入林家，成为林家的座上客。林、叶还把发给政治局委员的文件和揭发江的材料，送给江看。叶群吩咐张发云（跟随江腾蛟的空政秘

书处原处长)：“江腾蛟是好同志，要好好照顾。”林彪对江腾蛟的女儿说：“以后有谁迫害你爸爸，就来找我。”还亲自对江说：“没有职务照样干‘革命’。”当年“五一”，林彪一伙安排江上了天安门，名字还登了报，公然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

林彪、吴法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把江腾蛟安插在空军领导机关。林彪对吴法宪说：“江腾蛟这个人要用。不但要用，还要重用。象江腾蛟这样的好干部要是不用的话，再就没有干部可用了。”吴秉承林彪的意图，一九六九年初，要江作为王辉球同志的“助手”抓空军政治工作，并让他继续抓南京空军的所谓“重要专案”。同年五月，在空军第四次党代大会上，不顾代表们的反对，硬把江塞进空军党委，并安排为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成员。同年十月，又让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江腾蛟担任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

江腾蛟是林家最忠实的鹰犬。他经常无耻地说：“是‘首长’（指林彪）和‘副部长’（指林立果）救了我，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江腾蛟，就没有我的一家。我一家要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感激林副主席一家。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死，也要跟着林副主席干。”

## 二、党和人民的死敌

江腾蛟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恶狠狠地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都专到我姓江的头上来了。”他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胡说：“建国二十多年了，生产还是那个样子，停滞不前，工人农民收入很少，现在是群众敢怒不敢言”，“你们不要把世道看得这样公平，这样合理！真正公平合理的世道是有的，那是将来的事，等‘首长’和‘战友’（指林立果）掌握了党和国家领导权才能实现。”他疯狂地说：“我有林副部长领导，有‘首长’和‘战友’做后台，有人反我十年，也没关系。”“我就不相信我姓江的就没有出头之日！”

江腾蛟出于反革命本性，早有叛国外逃的企图。一九七〇年十月间，江对他老婆李燕平讲：“现在不光全国各地，就连国外，我江腾蛟也还是有点名的。我要真到外国去，还真错待不了我呢！像这么个对中国军事情况了如指掌的将军，他们还不当宝贝供养起来？！我这样的人在他们那里可是有大用场啊！”李伟信为林

立果购买特务器材，从香港回来，江腾蛟向李了解香港的情况。据江的女儿揭发，江曾去过深圳活动。

一九六八年一月，叶群要吴法宪把江腾蛟叫到北京来，当面交代要江腾蛟整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江写好后交吴法宪，吴亲自修改后送给叶群。一九七一年四月中旬，在林彪一伙加紧实行《“571 工程”纪要》的时候，江腾蛟要王维国抓紧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说什么：“要敢于上纲，敢于加工整理”，“要懂得这是斗争的最好炮弹”，把矛头直接指向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 三、积极配合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

江腾蛟狂热吹捧林彪、林立果，为他们篡党夺权作准备。一九七〇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江秘密指使李同云（空军报社原副总编），同陈励耘、王维国、查全伦、王宝功（沈阳空政主任）等人，组织力量，炮制了《伟大的战略措施》、《四个第一好》、《四好连队运动万岁》、《三八作风是传家宝》四篇反党黑文章，鼓吹“不可分割论”和“天才论”，为林彪树碑立传。叫嚣：“自觉地把保卫林副主席接班人的地位作为高于一切的革命大节，毕生的战斗使命”。这些反党黑文章，经过江修改定稿，密谋先在《空军报》发表，再送《解放军报》，后来因为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未敢拿出来。江腾蛟极力推行反革命的“两个一切”，搜集、掌握贯彻的情况和反映，并催促政治部要很快传达。他积极参与炮制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事先周宇驰到他家里同他商量过“讲用报告”的内容，“讲用报告”出笼前，江腾蛟看了稿子，表示完全同意。空军“三代会”期间，江在幕后进行秘密活动，策动在会上放“讲用报告”录音，操纵一些人大肆吹捧林立果，与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密切配合。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江腾蛟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光辉文献《我的一点意见》，对抗批陈整风运动，顽固坚持林彪“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他狂叫：“不承认‘天才’，就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去了‘天才地’那三个副词，根本目的是为了反对‘首长’。”同时，他狂热地吹捧林彪“一贯正确”，“比恩格斯、斯大林高得多”。吹捧林立果“是新发现的领袖人物”，“是接班人的接班人”。他还炮制了歪曲党的历史、吹捧林彪的所谓“路线教育材料”，并且指使亲信大量印发林立果反革命的“讲用报告”。他为了炮制林立果的所谓飞行安全经验，

事先，亲自窜到空九师活动，并对王璞、顾同舟、查全伦等人说：“这是在林副主席那里挂了号的，林副部长亲自抓的，一定要抓好。”还规定他们每半个月向他汇报一次情况。开现场会时，他还指使亲信秘密串连一些单位的人参加会议，再一次刮起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

#### 四、拉拢干部，安插亲信，妄图控制部队

江腾蛟极力鼓吹“亲不亲，线上分”。胡说：“只要对林副主席一家感情深，其它方面有毛病也要大胆使用”，“不要老啃着死东西不放”。他要李瑞昌（空政干部部原部长）等人为林家“把好关”，“掌好用人权”。并且规定：“空军师以上干部和南京空军团以上干部提升调整都要先告诉我。”江腾蛟等人还策划通过“调整”、“更新”干部，提拔重用亲信。通过控制“专案”，残酷迫害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

江腾蛟四出活动，进行反革命游说，拉拢干部。他带着亲信，曾先后窜到济南、青岛、上海、广州、桂林、长沙、武汉、孝感、西安、成都等地，了解干部对林家的感情态度，推行反革命的“两个一切”。他还根据林立果的交代，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带着亲信窜到空降兵十五军“摸军、师两级班子的情况”，做“工作”。江腾蛟一伙采用“路线交底”、封官许愿、请客送礼、参观游览等种种手段，拉山头，搞宗派，欺骗和拉拢某些单位的一些人。

江腾蛟按照林立果“派人下去抓好部队”的黑指示，加紧策划把他们在机关的一些“骨干”派到部队去。一九七一年初，他与林立果、周宇驰、王维国密谋，以支左为名，从驻京院校挑选了一些他们认为靠得住的人，到空四军“加强根据地建设”。江还策划从空直机关调出“三分之一的‘骨干’下去抓部队”。指名要安插一些党羽到军、师去担任领导职务，妄图控制某些单位。

#### 五、参与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策划召开反革命的“三国四方”会议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四日，江腾蛟化名“何坚”，假造病历，以检查“有无癌变”为名，乘夜航专机秘密窜到上海，潜藏在一幢小楼里四十多天。在这期间，他与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多次密谋，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三月底，江腾蛟参加了由林立果召集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与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一起，策划了执行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组织准备和分工问题。会上，

他接受了林立果的旨意，负责上海、杭州、南京三个点反革命活动的协调和拉总。会后，江得意忘形地对李燕平等人说：“现在把方案定了，就好办了。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哈哈！我这几年也总算没有白斗，只要方案一完成，我们的愿望也就实现了！”完全是一副法西斯匪徒的凶相。

一九七一年四月，江腾蛟坐镇上海，一面指挥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按照所谓“三国四方”会议的分工，加紧建立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和其他各项反革命政变的准备；一面窥测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动向，待机而动。伙同王维国、陈励耘在上海组织了“教导队”，在硕放和笕桥组织了“武装营”。四月中旬，江派林彪死党朱铁笙（空政秘书处原副处长）去杭州向陈励耘了解政变准备情况。江腾蛟还指使周建平窜到一些部队去做“工作”，妄图把部队抓到手里。王、陈、周分别制定了上海、杭州、南京地区的“行动计划”、“应变方案”。江还要上海、广州地区的一些航空兵部队抓紧进行歼五飞机攻击地面目标的训练。四月下旬，江窜回北京后，又亲自跑到天津、保定，还有计划地察看了北京周围顺义、通县、南苑、黄村、门头沟、石景山、南口等地的地形，进行阴谋活动。

#### 六、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制造反革命舆论

《“571工程”纪要》出笼后，江腾蛟加紧为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制造舆论，他造谣污蔑，疯狂叫嚣：“现在斗争形势很复杂”，“军队不行啦，笔杆子起来啦！”“当前斗争的焦点是保卫接班人的问题”，要“准备迎接新的反复，更大的风暴”。他穷凶极恶地说：“只有拿起枪杆子，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要搞武装起义。”“只要看准时机，先下手为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首长’、‘战友’往党和国家的位置上一站，把所有的大权都接过来，报纸、广播一控制，不就成功啦！”“当然，也要准备失败。失败也没有关系”，“‘首长’和‘战友’带上同路人到广州或其他地方再成立一个党，起码打出个以长江为界来，然后再打几年，慢慢统一。”他还嚎叫：要“改朝换代”，建立“人人自由、平等、民富国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江还向他的党羽宣布反革命纪律，说：“我们是不成功则成仁，破釜沉舟，拚上老命！”“要绝对保密，不能当叛徒。”“如果泄漏一句，不要怪我江腾蛟翻脸不认人！”

#### 七、发展反革命组织，培植反革命势力



江腾蛟秉承林彪的旨意，积极参与、策划建立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及设立反革命秘密据点。他还窜到桂林、青岛等地，部署建立反革命据点。他要米家农抓好反革命特务组织“战斗小分队”。

江腾蛟在空军政治部，秘密组织了一个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地下黑班子。成员有部、处干部十二人，由李同云、李瑞昌牵头，张发云为联络员，江腾蛟直接指挥。江给黑班子规定任务：“要把政治部办成林副部长放心的政治部”，要求其成员“把心思放到林副部长那里交下来的任务上”，对于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刘世英等人的所谓“指示”，都要“紧跟、照办、认真执行”。他们在各部门发展“骨干”，开什么“骨干碰头会”、“形势分析会”，进行非法活动。他们自成系统，部里有“部”，处里有“处”，制造分裂，控制政治机关。他们用欺骗组织、煽动群众、暗中操纵等手段，秘密控制组织、干部工作和舆论工具，搞了许多阴谋活动。

江腾蛟还组织了一个秘密“接待委员会”，张发云担任主任，负责接待和联络在空军内的林彪黑线人物。政治部地下黑班子的成员也经常参加这种活动。

江腾蛟在林彪、林立果的指使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培植反革命势力。他除了把黑手直接伸进空四军、空五军以外，还通过周建平、王璞、顾同舟、解长林等人，在一些单位做“工作”，拉拢人。他要查全伦在福州军区空军“想办法站住脚跟”。他还两次派陈玺（南京空司气象处原副处长）去找王绍渊（兰州军区空军原副政委）进行反革命串连。

江腾蛟亲自向其同党、亲信传授反革命策略，加强内部控制，捏拢反革命力量。说：“我们的斗争是大兵舰作战，不是小木船，是联合舰队，是林副部长给我们掌舵。我们都是兵舰上的战斗员，不要互相在舰上拳打脚踢的把舰弄翻了。”一九七一年二月上旬，他在广州对顾同舟、查全伦说：“你们关系搞不好，广空机关就不能团结起来，副部长就不放心。只要对副部长态度一致，不管个人之间过去有多大意见和恩怨，也要消除、谅解。”他还举行“熊掌宴”，把顾同舟、查全伦、米家农等人找去参加。江说：“副部长送给的珍贵礼物熊掌，请大家来分享幸福”。查全伦等人在宴会上举杯狂叫：“为在林副部长的领导下，在江政委

的具体领导下，搞好‘工作’而干杯！”一九七一年七月，江腾蛟派人去上海、杭州，要王维国、陈励耘“搞好团结”，“抓好骨干队伍”。

#### 八、充当反革命凶手和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南线总指挥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江腾蛟秉承林彪旨意，为了“加快、提前”实行《“571 工程”纪要》，在上海的秘密住所里，多次和李燕平及他身边的死党，密谋采取“设伏突袭”、“炸火车”等罪恶手段，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毛主席巡视南方期间，他要张发云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林彪死党：“不要乱跑，要随叫随到，要严守岗位，各就各位。”九月八日深夜，林立果、周宇驰把江腾蛟叫到西郊机场黑据点里，让江看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手令。林立果对江说：“我们已经决定在上海地区动手。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第一线指挥员。”江和周宇驰向林立果献策：“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把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江还画了油库和停车站的位置图。九月十一日，江腾蛟、林立果和王飞、关光烈、于新野等人偷偷地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准备攻打钓鱼台，妄图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

十一日晚，江按照同林立果、王飞、周宇驰的预先密谋，带鲁珉到西郊机场黑据点，进一步具体策划行动方案。并且规定了时间、地点、代号，指定了具体执行人。林立果对鲁珉说：“派你去上海组织指挥炸火车，是江腾蛟点的将。”并确定：“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江接受了林立果的指使后，连夜收拾东西，准备动身去上海。由于毛主席离开了上海，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

九月十二日，周宇驰召集江腾蛟、王飞下达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反革命计划，策划了南逃行动方案。当天晚上，江匆匆忙忙跑回家里，准备携带张发云、朱铁笙和江的老婆孩子，与林彪同坐一架飞机南逃。

九月十三日，林彪自我爆炸，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江腾蛟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受到人民的审判。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秘书处

一九七三年五月印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死党王飞主要罪行材料汇集（初稿）

林彪死党王飞是林彪反党集团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急先锋，是策划攻打钓鱼台、妄图谋害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的凶手，是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北线总指挥”。王飞一贯顽固地坚持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对党对人民怀有刻骨仇恨，是个阴险毒辣的反革命两面派，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现根据空直机关的揭发和一些人的交代材料，将其主要的反革命罪行汇集如下：

#### 一、死心塌地投靠林彪

一九六四年初，林彪派秘书关光烈，身着便服，窜到空军党办同王飞密谈。随后，王飞打着向“林办”学习的幌子，钻进林家，秘密勾结。一九六五年九月，林彪指使叶群，纠集吴法宪、王飞一伙，到江苏太仓洪泾大队，以搞“四清”为名，拉山头，结死党。在此期间，王飞为林家百般效劳，得到林彪、叶群赏识。叶群还亲自向王飞传授反革命两面派权术。一九六八年三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在林彪指使下，吴法宪、王飞抄了杨成武的家，搜走了林彪、叶群与杨勾结的罪证，交给了林、叶。在林彪、吴法宪授意下，王飞指挥一帮亲信，为叶群伪造历史，扣压揭发叶群罪恶历史的检举材料，并制造假案，迫害群众。

一九六七年四月，林彪为了搞反革命阴谋，派遣他的儿子林立果到空军党办当秘书。吴法宪、王飞马上派周宇驰、刘沛丰伴随左右，充当其反革命帮凶。一九六八年七月，吴法宪、王飞伙同周宇驰，违抗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大”单位暂不发展党员的决定，不履行正式手续，非法把林立果拉入党内。一九六九年二月，在党的“九大”召开前，林彪亲笔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林立果“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反革命的“独立工作能力”。同年十月十七日，在林彪擅自发布所谓“第一个号令”，进行篡党夺权预演的同时，吴法宪在林彪的指使下，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任职之前，王飞就把这个头衔，写信向林彪、叶群汇报，甚至连林立果的升调报告表也都一并奉上。一九七一年八月，王飞又亲自炮制了一份要林立果当空

司办公室主任的报告。他甚至在空军司令部党委会上，公然提出要林立果当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还向在空政干部部的亲信何汝珍布置：把林立果作为提升空司副参谋长的第一个对象。

林彪、叶群多次把王飞一家召去“接见”、看电影、照相、吃饭，进行反革命拉拢。林彪、吴法宪一伙还把王飞“推选”为“九大”代表，后又提拔为空司副参谋长兼空司办公室第一主任。

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失败后，王飞一伙加紧勾结。一九七一年春节，他专门把周宇驰、刘世英等人及其家属找到家里吃熊掌。王飞说：“要不是林副主席一家，我们（指几个男的）这几个人早就被打成反革命了，你们（指几个女的）这些人也都成了反革命家属了。”周宇驰也说：“我们要感谢林副主席一家。”共同表达要继续为林家卖命的反革命“决心”。

## 二、策划和经营法西斯特务组织——小“联合舰队”

林彪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网罗死党，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在空军拉山头、搞宗派，秘密成立了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这个反革命小“联合舰队”，是在林彪、吴法宪直接指挥下，由王飞具体策划建立起来的。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吴法宪伙同王飞在空军党办内策划搞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组员是王飞、周宇驰和刘沛丰。这就是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雏型。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王飞又把“调研小组”列为空军党办的一个小单位，“定编”六个人。后经王飞等人精心挑选、“考验”，又拉进一些人，使这个组织进一步扩大。一九七〇年五月前，发展成为反革命小“联合舰队”。到“九·一三”前夕，这个反革命别动队的成员发展到十几个人，有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刘世英、程洪珍、陈伦和、王永奎、许秀绪、吴达云、王琢等，头目是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王飞充当了参谋长的角色。这一小撮死党绝大多数是王飞招降纳叛收罗而来的。周宇驰是个对我有杀父之仇的家伙，曾因犯错误调离机关。一九六六年上半年，王飞把他调回党办当科长，后又提为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刘沛丰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本人收过租，讨过债，政治机关曾数次提出要处理，王飞一直进行庇护。于新野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其父为右派分子，本人屡犯错误，王飞对他极力包庇重用。刘世英的社会关系非常复

杂，道德败坏，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调离机关，王飞一手策划给他取消了处分，弄回机关。王飞自己出身恶霸地主，是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这一帮家伙，在林彪的指挥下，秘密策划和组织实施反革命政变阴谋，从舆论、组织、物质等各个方面，干尽了反革命勾当，犯下了滔天罪行。

### 三、配合林彪在庐山的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〇年夏，林彪、叶群伙同陈伯达、黄、吴、李、邱等，秘密串连，加紧准备，阴谋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王飞一伙紧密配合，制造反革命舆论，大搞阴谋活动。

林彪窜上庐山之前，布置林立果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讲话提纲，作为向党进攻的炮弹。王飞为之积极筹划。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吴法宪在林彪指使下宣称：“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空军的指挥大权。“两个一切”出笼前，王飞参与了密谋策划，出笼之后，他又竭力兜售。一九七〇年七月六日，他们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上抛出了“两个一切”。七月九日和十六日，王飞紧接着在空司部党委学习会上作了“传达”，后又专门在空司办公室全体人员会上散布。随后，他又策划召开空司机关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让刘沛丰贩卖“两个一切”。王飞一伙胡说什么：“吴司令员的指示（指‘两个一切’）反映了空军广大指战员的心情和愿望”，“要坚决拥护立果同志对我们的领导”，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等等，并很快把“两个一切”传到空司机关和直属部队。

与此同时，在林彪、叶群的亲自指挥下，王飞、周宇驰等人加紧炮制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王飞亲自出马策划召开林立果的“讲用”会。一九七〇年三月，王飞就放出空气，制造林立果要作“讲用”的舆论。六月，他在司令部党委学习会上，一面胡吹林立果“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很出色，很突出”，说什么“早想请他讲讲”，一面又吹嘘林立果“很谦虚”。鲁珉、贺德全等人跟着帮腔，要求林立果“讲用”。在其他一些人也表示同意后，王飞就说：“既然大家要求立果同志讲，我就把部党委的意见向他转达。”随后，经吴法宪、王飞一伙策划，在王辉球同志主持的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王飞提出空军党委常委参加林立果的“讲用”会。会议确定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成员和司、政、后二级部副部长以

上干部都参加。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用了九个小时，宣读了极其反动的“讲用报告”。这个会由王飞主持。林立果话音一落，王飞马上站起来大肆吹捧“讲用报告”“观点很新，思想很深，境界很高，视野很广，对军队、国家的大事说得很透，抓得很准”，“解决了很多重大问题”，并再次兜售“两个一切”。第二天，王飞又组织空司干部听了录音，还要求座谈、表态。以后，这个录音又在空司多次播放。王飞还组织一些人整理“讲用报告”录音稿，打印散发，又伙同刘锦平、江腾蛟等人策划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塞进空军“三代会”。八月四日，吴法宪主持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决定在“三代会”上放“讲用报告”的录音。录音一放，王飞就指使一帮亲信，狂热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继承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表现了他的天才”。在王飞的指使下，“三代会”的空直代表团作了向林立果学习的“决议”；组织了四个所谓“在林立果身边工作过的人”，到各代表团巡回“讲用”，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生活作风等方面，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八月下旬，当林彪一伙在庐山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空军的“三代会”吹捧林立果“超天才”的反革命妖风达到高潮，与林彪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遥相呼应。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王飞、周宇驰一伙密切窥探会议动向，盗窃全会情报。当林彪向党发动突然袭击后，周宇驰立即密告王飞：“吴司令他们早就串连好了”，“把矛头指向×××。这一下不把他压垮，也得把他吹歪了。”王飞听后，得意忘形，立即叫他老婆写信告诉她妹夫（上海港务局的一个被审查对象）向上告状，指控上海市委负责同志。

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周宇驰又慌忙把情况密告了王飞。

#### 四、破坏批陈整风运动，加紧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林彪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以后，贼心不死，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王飞也肆无忌惮地破坏批陈整风，极力掩盖林彪的反党罪行，包庇陈伯达，继续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变本加厉地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一九七一年初，在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会期间，吴法宪、王飞扣压空司航行局和北京军区空军揭发陈伯达利用专机在华北地区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的材料。

王飞猖狂反对学习马列主义，胡说：“马克思的书是一百年前写的，列宁的书也有四、五十年了，都是些外国地名、人名，不好学，学了也记不住”，“学马列主要指的是高级干部，候补中央委员以上，我们有谁够条件！？”他对空军通信团的干部叫嚣：“你们不要学，连队干部更不要学”。

与此同时，王飞在幕后指挥贺德全、刘世英、戴忠笠等人兴风作浪，大吹“天才论”。他们挥舞着林彪的语录叫嚷：“林副主席讲天才，我们为什么不讲！”“不讲天才是别有用心！”还恶狠狠地说：“真有人敢批天才，胆子不小啊！”“你们批天才，批吧，将来总有一天反过来挨批。”甚至散布：“大赞就是大批”，利用空司批陈大会的讲台，歇斯底里地大讲“天才”，吹捧林家父子。

王飞恶毒攻击毛主席对济南军区关于反骄破满报告的批示，污蔑反骄破满是“整人”，是“右倾翻案风”，散布“骄傲自满不是路线问题”。还别有用心地说：“空军现在不是解决骄傲自满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拥护谁、跟谁走的问题。”鼓吹跟林彪、林立果。

王飞在空司机关大搞以对林家父子的“态度”、“感情”为标准的所谓“路线分析”。胡说：“路线教育问题，说到底就是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是拥护谁反对谁的问题”。王飞一伙叫嚷：“合乎林立果这条线的就拼命干，不合乎林立果这条线的就猛批判”。

王飞还歪曲历史事实，胡说：不管是前二十八年还是后二十二年，都要突出林彪。并策划炮制了篡改党的历史、宣扬林彪“丰功伟绩”的所谓“两个决议的宣讲材料”，毒害广大群众。

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召开的全军外事工作会议上，王飞明目张胆地提出要开放林彪的家乡林家大湾，供外宾参观访问，还要在各革命圣地陈列馆的解说词中增加吹捧林彪的内容，逼中央表态。七月，王飞亲自组织翻印周赤萍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黑书一万多册，广为散发，并规定作为党课教育内容。

一九七一年七月，林彪一伙在广州策划召开了“安会现场会”，进行反革命串连，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妖风，向党发动了反革命的“夏季攻势”。会前，王飞窜到部队进行反革命游说、串连。七月下旬，在吴法宪主持下，王飞专门安排其亲信向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汇报了“安全现场会”情况。王飞在会上说：“推广‘安全经验’是个大事，对推动空军建设很重要”，并提出：飞机的预警装置先

改装一个团，要求各部门全力支持。接着，他又选择在林立果“讲用”一周年的前夕（七月三十日），主持召开了有五百多人参加的空司部党委扩大会，指使亲信宣讲“安全经验”，狂热吹捧林立果“不断发现和解决了空军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胡说“安全经验”是林立果放的“第二颗政治卫星”，鼓吹“从林立果身上看到了林副主席带兵打仗的优良作风的巨大威力”，等等。同时，王飞还秘密布置空司各部、局搞什么纪念林立果“讲用”一周年活动。一九七一年八、九月，他又把“安全经验”塞进航校工作会议；亲自和指使一些人，到部队兜售“安全经验”，吹捧林家父子。

#### 五、参与“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二、三月间，正当林彪及其死党加紧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的时候，王飞躲进医院同一些死党秘密串连，搞阴谋活动。以后，王飞指使一个秘书到上海“注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动向。王飞还恶毒攻击毛主席与斯诺谈话纪要。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彪黑司令部策动其死党“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王飞同周宇驰密谈了妄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下毒手的罪恶阴谋。周宇驰叫嚷：“这次（指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吴司令他们在庐山的活动都给端出来了，搞得黄、吴、李、邱很被动”，“情况越来越紧张，林立果天天在研究这个问题，林副主席很着急。”他杀气腾腾地叫嚣：“这都是最高的地方搞的，不行就来个干脆的”。五月一日晚上，王飞在收听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五一”节天安门庆祝活动的实况广播时，咬牙切齿地说：“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狰狞面目。

#### 六、抓部队，搞武器，阴谋扩大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

林彪及其死党王飞等拼命抓部队，为反革命政变服务。在空军司令部，王飞特别“关注”空司警卫营，他说：“空直机关就是警卫营这样一点掌握枪杆子的部队。”为了控制这个部队，他经常抓警卫营的“路线教育”，散布：“林立果对你们很关心，对警卫营感情很深。”他指使亲信制造舆论，要警卫营“一切听王副参谋长指挥。”王飞还亲自选定“挂钩”连队，把警卫营紧紧抓在手里。

一九七一年八月，王飞策划空司警卫营抽调连排骨干八十八人，进行骨干“集训”。王飞叫嚣：“不训练不行”，“要苦练”。指使这个“训练班”，集中时



间学习林彪的所谓“八·一六”指示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在实兵训练中，宣扬“江田岛”精神。在训练期间，王飞派一帮亲信进行慰问，“鼓舞士气”。到九月八日，“训练班”只完成了单兵动作，王飞叫喊：“这样不行！战术一定要搞，至少要搞班进攻”，要“训练班”继续加紧训练。

王飞利用职权，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提供了大批武器。他们经常通过警卫营给林彪死党搞枪支弹药，先后从警卫营盗走了各种枪七十六支，枪榴弹筒一具，各种子弹一万二千八百余发。一九七一年四月，王维国派亲信来京要轻武器。这个人郑兴和说：“斗争形势愈来愈复杂，这方面（指武器装备）又是我们的薄弱环节，所以要做这方面的准备。”四月十二日，在王飞的指使下，郑兴和从已经批准发给兰空和昆指等单位的轻武器计划中，扣下一千支发给了空四军。一九七一年七月，在制订空军轻武器分配计划时，王飞策划削减“三北”，给“三南”某些单位多发武器。计划调整后，给“三南”某些单位多发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六千六百支。

为了实行《“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王飞根据林立果“解决问题还是靠部队”，“这是基础工作，不要天天在机关窜来窜去”的黑旨意，不断派人到全国各地空军部队搞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七月至九月初，他还亲自出马，先后窜到鲁山、当阳、郑州、成都和天津、唐山、遵化等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串连，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七月，王飞在鲁山、当阳、郑州、成都期间，分别同刘锦平、周宇驰、解长林等秘密串连，搞阴谋活动。

八月，王飞窜到天津、唐山，了解空军部队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能力等情况，并要某部提前改装兵器。王飞对某团说：“你们这个团，是林副主席警卫二团的两个连组建起来的，你们要听林副主席的话。”在另一个部队，王飞索取了保卫首都的防空作战预案、应急行动预案、各种战术技术演练等重要资料。九月初，王飞在遵化详细观察了某师驻地周围的地形，了解了雷达探测性能，远程情报的保证情况，夜间低空作战的能力，及所用机种、活动范围和飞行员对战区的熟悉程度，等等。

王飞还竭力拉拢部队的一些领导干部，妄图扩大其反革命势力。

七、妄图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策划南逃，另立中央

一九七一年八月，正当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外地巡视期间，林彪一伙按照蓄谋已久的《“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破釜沉舟”，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九月六日下午，王飞按照林立果的密令，匆忙从遵化赶回北京，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政变。

九月八日中午，周宇驰同王飞密谈了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阴谋计划。晚上，林立果、周宇驰、王飞等，在空军学院黑据点，秘密策划谋害毛主席、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反革命阴谋。林立果给王飞传达了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并叫嚣：“现在情况紧张”，“火药味已经很浓了”，“要坚决把反对林副主席的人除掉。有一坨在南方，有一坨在北京，要同时干掉，南边由江腾蛟负责，北京由王飞和周宇驰负责”，“现在决定武装起义”，“从现在起王飞就是空军司令”。王飞立即表示：“坚决保卫林副主席！”“林副主席叫干，就一定干！”

在这次黑会上，林立果、周宇驰将叶群写的“带交黄总长亲收”的一大信袋东西叫王飞转送给黄永胜。

九月九日上午，王飞同鲁珉密谈了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阴谋。晚上，林立果、周宇驰、王飞再次策划攻打钓鱼台。

当天下午，空司航行局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给周送苏联伊尔库次克机场和恰克图导航资料等材料时，王飞说：“要满足他（周宇驰）的需要。”

九月十日上午，王飞秘密通知正在青岛“疗养”的王洪智（空十三师原师长），赶紧回去抓部队，并让十三师次日安排飞机接王回部队。

接着，王飞将叶群带给黄永胜的东西送去，并转达了叶群、林立果的“问候”，向黄密报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

九、十日两天，王飞还查问了空司警卫营的实力和骨干“训练班”的训练情况等。

九月十一日中午，叶群亲自打电话告诉王飞：“林副主席决心已定，要坚决搞，不能坐失良机”，“身家性命全都托给你们了”。叶群还要王飞“帮助给照管孩子（指林立果）”，并许诺王飞“将来是‘常’字号的”。

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关光烈在西郊机场黑据点，进一步策划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林立果嚎叫：“林副主席的决心已定，南线先搞，北线接着搞”。他们还规定了通信联络的密语和方法。

会后，林立果将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交给了王飞。林彪在信中要黄“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当天，林立果、王飞、江腾蛟、关光烈、于新野五人，偷偷地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林立果恶毒地提出了用空司警卫营卡车冲，用坦克冲，用火箭炮轰，用轰炸机炸，借接待外宾的时机在机场动手的办法。王飞则献计，要林彪召集会议搞。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部署。十一日夜，叶群、周宇驰打电话告诉王飞：“毛主席已离开上海，‘解除任务’”。他们妄图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

九月十二日晚，林立果、周宇驰向王飞下达了林彪关于十三日乘飞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反革命计划，由胡萍准备飞机，王飞组织指挥。

王飞随即秘密同于新野召集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郑兴和共七人开黑会，策划随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的行动计划。王飞说：“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十三日由西郊乘飞机去广州，另立中央，与苏联搞联合”。王飞在会上宣布江腾蛟为“总指挥”，鲁珉、贺德全为“副总指挥”。“七人黑会”拟定了南逃的人员名单，密谋了出发时间、车辆安排、人员分工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配发枪枝等事项。王飞布置郑兴和从空司警卫营取走五九式手枪三十支，冲锋枪两支，子弹二千三百六十发。王飞还叮嘱他的亲信，明天走的事“不要告诉别人，告诉别人是要杀头的。”

毛主席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计划。林立果于十二日晚十一时半，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命令停止“南下”，要“北上”（指叛国投修）。周宇驰急忙告诉王飞：“暴露了，不搞了”。王飞惊恐万状，在会上宣布去广州计划作废，当场销毁了一些罪证，订立攻守同盟。并告诉他的亲信：明天不走了，“就当没有这回事”，“有人问今晚我们干什么，你就说是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分工问题”。王飞气急败坏地对他老婆说：“暴露了！”狂叫：“抓起来我什么也不讲”。

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仓惶逃命，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林彪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极其恶毒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王飞负隅顽抗，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与死党刘世英等秘密串连，通风报信，布置退却。十四日

中午，王飞在电话上与江腾蛟搞攻守同盟：“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江腾蛟叫他老婆用暗语告诉王飞：“你要江政委买的药，统统统统被人卖光了”。十五日，王飞同他老婆在家销毁罪证，转移赃物，还准备了一个假检讨，说他是什么“好心为坏人办坏事”。但是，在铁的证据面前，这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罪犯，终于难逃法网。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秘书处  
一九七三年五月印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1973. 08. 20；中发 [1973] 34 号

中共中央决议

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败露后，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和几个死党，私乘飞机，叛党叛国，仓惶逃命，投奔苏修。他们所乘外逃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等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声讨了林彪，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开展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批林整风运动。经过广大群众的揭发和中央专案组的调整研究，查获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大量罪证。中央专案组编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说明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

令部的斗争经过。这些材料揭穿了林彪的伪装和欺骗，彻底揭露了林彪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事实真相。这些材料提供了林彪反党集团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确凿证据。它足以证明，林彪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

中央专案组根据调查核实的物证、人证，现已查明：

（一）早在“九大”前后，林彪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他的老婆叶群，勾结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还通过他的儿子林立果，秘密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小“联合舰队”。林彪反党集团是内地、富、反、坏、右和国际帝、修、反的代理人。它的骨干分子，是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托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新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他们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二）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发动的突然袭击，是有预谋的。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会前和会中多次秘密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地向党进攻。从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发表反党讲话，到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林彪、陈伯达指使李雪峰炮制的反革命六号简报出笼，他们专了两天半的政。他们的反党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它的性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

（三）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反党集团立即秘密进行反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他们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并从政治、军事、组织、情报等各方面加紧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下达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九月十日，林彪给黄永胜一封亲笔密信。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林彪死党用穷凶极恶的手段，妄图乘毛主席外出巡视的机会，在外地谋害毛主席，并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谋害中央领导同志。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林彪又通过吴法宪私调飞机，要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

鹏、邱会作等人一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妄想造成所谓“南北朝”的局面。林彪还企图勾结苏修，对我实行南北夹击。他们的种种阴谋，都遭到彻底的破产。

（四）林彪叛党叛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林彪出身于大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入党以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林彪追随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竭力宣扬“短促突击”。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伙同彭德怀要夺毛主席的权。红军到达陕北之初，林彪蛮横地一再坚持要脱离红军主力部队，独自到陕南去“打游击”，向党闹独立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发表反党文章，无耻吹捧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林彪一再抗拒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林彪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幕后策划者。在六十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掀起反华逆流的时候，林彪反对党的总路线，要搞“包产到户”，反对我党揭露和批判苏修，要跟苏修妥协。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培植亲信，打击陷害革命干部，竭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提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等反党乱军的口号，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妄图篡夺毛主席的统帅地位，炮制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军队的谬论，狂妄地提出军队要由他“直接指挥”。他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要从根本上篡改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毛主席、党中央对林彪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一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仍然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教育和挽救，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但是，林彪对党一直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欺骗党，欺骗人民，最后终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 二

林彪反党集团的出现，是国内外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首先取得了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伟大胜利。但是，阶级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时时刻刻都在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样的形势下，林彪反党集

团作为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代表，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但是，这不过是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痴心妄想。他们表面上极端狂妄，本质上极端虚弱。他们的阴谋，是见不得人的。因而成不了什么气候，无碍大局。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取得了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最沉重的打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 三

鉴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

（二）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

（四）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

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五）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中央专案组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

附件：（1）中央专案组编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2）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决议）

2009 年 10 月 19 日初稿

2012 年 4 月 23 日修改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八册（3）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八章 批林整风

##### 第三节 批判极左思潮问题

###### 本节资料

######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中央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上说：为什么合理的规章制度没有恢复？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批判无政府主义，批判极左思潮。

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周恩来在广州讲话。他在讲话中着重批判了极左思潮对企业管理、产品质量带来的恶劣影响，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一九六七年是极左思潮上升的时候，讲话没有人听。从那时起至今五年了，情况变了。他在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要求肃清文艺工作中的极左思潮。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的谈 毛：我们这个国家也有人家骂我们，说是整了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什么一些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周恩来：头子在班房里。毛：那些年轻人是受骗的。我们这里早几年天下大乱，你还不知道呢。班：我听了一点。毛：全国各地都打，全面，内战，就是 ALL-ROUND CIVIL WAR。现在好多了。班：就是自己人之间打内战吗？毛：两边都发枪，一共发了一百万支枪吧。这一派军队支持这一派，那一派军队支持那一派，打。周：名义上是抢枪，实际上是送枪。毛：他们外交部，她们（指王海容、唐闻生）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班：为什么？毛：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没有多少问题，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总后台的人现在也过去了，叫林彪。（班夫人点头）坐一架飞机往苏联去，其目的是想见上帝。班：见上帝？毛：是啊，摔下来了，见上帝去了。班：噢，

我明白了。（众笑）后来飞机怎么样了？我不大清楚。飞机掉下来了，还是过到苏联去了？毛：我也不知道。他自己要摔。 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二日，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有几年，他利用二月逆流要把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政治局的老同志都搞掉，都换上他的死党。他们打倒一切，破坏毛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极左的方法破坏毛主席的威信，把毛主席说过了头，什么“顶峰”呀，“一句顶一万句”呀，“第三个里程碑”呀，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结果是要谋害主席。这样的人暴露出来是大好事。他说：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工作，还要犯错误。 一九七二年八月八日，张春桥、姚文元与人民日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及有关人员的谈话中强调批林“不要过头”。 一九七二年九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先后两次在社论稿中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姚文元在审稿中均删去。九月三十日，周恩来约有关人员谈国庆社论。经周恩来审定，社论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调”，“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 一九七二年十月六日，《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所写《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可偏废；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硬，就是要批。 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文章。无政府主义，是一个以极“左”面目出现的机会主义派别。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一百多年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它进行了无情的、激烈的斗争，宣告了它的破产。然而，由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一小撮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为了反对革命，往往还要利用无政府主义的幽灵兴风作浪，毒害群众。当前，在深入进行批修整风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中，认真学习革命导师对于无政府主义的剖析和批判，清除刘少奇一类骗子煽动无政府

主义的流毒，是很有必要的。无政府主义的谬论很多，但它的基本观点可以用蒲鲁东的一句“名言”来概括：“不要政党，不要权力，一切人和公民的绝对自由，这三句话，就是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的忠实誓愿。”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介绍克鲁泡特金的理想时说得更明白：“他的理想是无命令、无权利、无服从、无制裁、绝对自由的社会”。无政府主义者的这种“理论”，首先是一种根本不能实现的幻想。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的一切活动从来都是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行的。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离开社会而单独存在，因此，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的“绝对自由”。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里曾经深刻地批驳过无政府主义者主张个人绝对自由，不服从任何权威的谬论。他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的发展趋势，就是“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所谓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要是没有权威，没有对权威的服从，组织起来就是不可能的。恩格斯特别指出：就是在社会革命推翻了资产阶级，土地和工厂公有化以后，权威也还是需要的。恩格斯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拿纺纱厂来说，棉花至少要经过六道工序才成为棉纱，另外，蒸汽机要工程师来照管，要技师来进行日常检修。因此，就需要有统一管理和指挥。“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商定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个车间里，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局部问题，要求马上解决，否则整个生产就会立刻停顿下来。”当然，解决这些问题，也可以用民主讨论的方法，但是一经决定以后，就具有权威性，大家都要服从。再拿铁路、海轮做例子，也是这样，如果乘客不服从铁路员工的指挥，全船的人不服从船长的指挥，那就要出事故。所以，不管在什么社会制度下，总是要有权威，要有对权威的服从。恩格斯说，“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没有绝对的权威，也没有绝对的自治。“一个哪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又怎么可能存在”。所以，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是违反基本常识的。无政府主义者这种“绝对自由”、“反对任何权威”的主张，不仅在生产领域里行不通，在政治领域里也是反动的。无政府主义者从追求“绝对自由”出发，把任何国家、任何政党都当作应该打倒的权威。他们鼓吹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这就完全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完全抹煞了无产阶级专政的

国家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革命的权威和反动的权威之间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革命是要打倒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但这并不是反对一切权威。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革命本身就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无产阶级不是立即废除国家，而是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靠自发的活动，而“不应该承认任何权威的领导机关”。他们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自己政党的领导，才能把他们反对压迫者的自发斗争变成整个阶级对阶级的政治斗争，变成自觉的革命斗争。当地主、资产阶级联合国内外一切反动派结成反革命的“神圣同盟”，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却鼓吹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取消党对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的领导作用，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为资产阶级效劳。无政府主义鼓吹不要国家，不要政党，不要纪律，集中到一点，就是要无产阶级放弃一切政治斗争，不要革命，不要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从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出发，脱离阶级的解放而侈谈个人的解放，反对政治斗争而推崇自发性，这实际上就是反对和阻挠无产阶级觉悟起来，组织起来，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去完成推翻和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无政府主义者对历史唯物主义一窍不通。他们根本不懂得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阶级社会的一切现象，不懂得个人的命运取决于阶级的命运。在他们看来，群众并不是划分为阶级，只不过是一个个的人的简单的总和。

“一切为了个人”，就是他们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列宁曾经尖锐而深刻地指出：“无政府主义往往是对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罪过的一种惩罚。这两种畸形东西是互相补充的。”假马克思主义骗子在上面搞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路线，下面的无政府主义的歪风邪气就会泛滥成灾，无政府主义的表现是在下面，根子却在上。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做官当老爷，大搞特殊化，反对干部和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反对思想政治工作，鼓吹“规章制度万能论”，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的“管、卡、压”，妄图使群众成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恰恰为无政府主义的滋长准备了肥沃土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一类骗子又狡猾地利用群众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满，大肆煽动极“左”思潮，

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鼓吹“群众说了算”，鼓吹“规章制度无用论”，叫嚷要“砸烂一切”。他们这样作，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引向邪路，彻底破坏社会主义的劳动纪律，瓦解社会主义生产，从根本上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刘少奇一类骗子的手法，揭穿了说，就是用极“左”的形式，来掩盖他们的右的反革命实质。他们口头上“发表一些最左、最最革命的言论”，招摇撞骗，实际上“进行着简直是流氓式的煽动，即利用劣根性、利用小私有者‘捞一把’的欲望来进行煽动”。他们叫嚷“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刘少奇一类骗子极力煽动无政府主义，并不是真的不要任何政府。他们只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而使他们所代表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上台。他们只不过是把无政府主义思潮当作他们实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的工具而已。所以，他们一面煽动无政府主义思潮，一面又拉山头，结死党，挖空心思地“大树特树”他们一小撮的“绝对权威”，并利用窃取的权力，大搞“以我划线”，妄图对干部和群众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法西斯统治。他们这种滔天罪行，流毒所及，歪曲和破坏了党的一元化领导，腐蚀了党的优良传统，在干部和群众中制造了思想混乱，为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准备了条件。由此可见，刘少奇一类骗子，正是煽动和利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今天，要肃清无政府主义思潮，首先就要深入批判他们这些反革命罪行，彻底肃清它的流毒。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尽管刘少奇一类骗子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学会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剖析和批判无政府主义，并揭破刘少奇一类骗子是怎样不断变换反革命的策略，处心积虑地煽动无政府主义的。各级领导干部，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彻底肃清刘少奇一类骗子对自己的腐蚀和影响，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亲自培育的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进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自觉地消灭自己身上的某些不正之风，并在此基础上和群众一起肃清无政府主义的余毒。应该肯定，群众中那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人，绝大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用学习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

法，加强思想政治路线教育，帮助他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他们就会自觉地清除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无政府主义的余毒。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纪众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文章。五十二年前列宁写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这部光辉著作中，列宁反复论证了加强无产阶级“极严格的纪律”的必要性，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实质和危害，指明了建立无产阶级纪律的前提条件。我们重温列宁的这些教导，有助于进一步增强无产阶级的纪律观念，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无政府主义的极“左”思潮，更自觉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纪律对无产阶级说来，是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列宁把加强无产阶级纪律问题，始终看作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强化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手段。列宁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实行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它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没有革命纪律，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就是一盘散沙，不能组织起一支思想统一、步调整齐的战斗队，也不能把一切力量集中在同一攻击点上，团结对敌，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掌权以后，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实行革命纪律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就一再强调说：“现在，政权已经牢牢地掌握在工人手里，一切事情都决定于无产阶级的纪律和组织性。”谁如果否认和削弱无产阶级纪律，那事实上就是为资产阶级效劳，使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能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正确地、有效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和领导作用。列宁甚至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资产阶级曾经利用精打细算、节约开支、不偷懒、不盗公肥私和遵守最严格的劳动纪律等口号，来掩饰自己的剥削阶级统治地位，当时革命的无产者讥笑这些口号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无产阶级则应该把这些口号变成迫切的行动口号。道理很简单，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广大工人和劳动农民已摆脱了被压迫被剥削的地位，变成了社会的主人，因而他们从事劳动的性质、目的和结果都随之起了根本变化。工农群众只有树立起为共同的革命利益而忘我劳动的严密纪律，才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列宁还总结了布尔什维克的历史经验，指出维持、检验和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所必须依靠的基本条件：“第一、是依靠无产阶级先

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它的英勇精神；第二、是依靠它善于与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与无产者劳动群众，但同样也与非无产者劳动群众密切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依靠这个先锋队的政治领导正确，它的战略与策略正确，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列宁认为，没有这三个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而只能变成空谈和矫揉造作。列宁的上述教导，为加强党的和非党群众的革命纪律指明了根本方向。根据列宁的指示精神，加强无产阶级纪律，必须首先提高广大党员特别是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的思想觉悟。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纪律都是有阶级性的，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目的和经济基础服务的。无产阶级纪律鲜明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党性，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它完全能够依靠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来维持。尽管无产阶级纪律本身是带有强制性的，但它主要不是靠强制，而是靠每个有觉悟的无产阶级战士自觉地用革命纪律约束自己。因此，无产阶级纪律是一种“自觉的纪律”。与此相反，地主资产阶级的纪律是建筑在剥削和奴役工农群众的基础之上的，是同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根本对立的，因此他们的纪律“完全是靠棍棒或饥饿来维持的”。无产阶级纪律的阶级性及其特点，要求各级领导在提高自己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觉悟的同时，还必须把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作为保证执行革命纪律的中心环节去抓。正如毛主席经常教导的，要“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党员和人民”。而每一个革命者则要认真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提高思想觉悟，树立坚强的纪律观念，抵制和反对无政府主义，做到自觉地遵守和维护革命纪律。根据列宁的指示精神，加强无产阶级纪律，必须密切领导和群众的联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要做到这一点，各级领导就需要同群众建立起鱼水关系，真正打成一片，杜绝和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为此，领导干部要事事以身作则，模范地贯彻执行党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自觉地抵制和反对各种脱离群众的不正之风。同时，要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把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意见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对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提高认识，加以改正。对于群众中遵守革命纪律的模范事迹要给以鼓励和表扬。对

个别屡教不改和严重破坏纪律的，要依靠群众进行批评教育，并采取恰当的纪律措施，不能姑息迁就，放任不管。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和革命纪律，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根据列宁的指示精神，加强无产阶级纪律，必须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左”右干扰和破坏，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毛主席教导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群众只有从切身经验中深信党的路线正确，才能够自觉地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而斗争，并自觉地遵守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所必需的纪律。因此，无产阶级的纪律教育必须同生动的深入的路线教育结合起来，使群众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及各项政策的无比英明正确，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群众的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就能够自觉地做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在毛主席亲自培育下，长期以来，我们党具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各级领导班子要在批修整风的基础上，更加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路线和纪律的完全统一，团结广大群众，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文章 巴枯宁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早出现的反革命两面派和大阴谋家。他打着极“左”的旗号，干着反革命勾当，比公开的敌人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因而也有更大的危险性。了解他一生中的罪恶活动和马克思、恩格斯怎样对他进行原则斗争，可以吸取不少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识别假马克思主义骗子，是很有教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最近，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的通俗小册子《巴枯宁》（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值得向大家介绍的。小册子告诉我们：巴枯宁出身俄国贵族，年青时曾当沙皇军队的军官，后来被卷入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激流，抱着个人野心投机革命。不久被捕，在狱中向沙皇写了悔过书，成了革命的叛徒。以后隐瞒了自己叛徒的历史，混入了第一国际。巴枯宁很早就认识了马克思。由于巴枯宁的反革命面貌当时没有暴露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耐心帮助他和教育他。但是，



巴枯宁根本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反而逐渐形成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他认为，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种“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每个人都有“最充分的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他还认为，什么地方存在权威，什么地方就没有自由。因此，他反对一切权威。由此出发，他更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祸根不是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国家本身。因此，他反对一切国家。他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否认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最后才能彻底消灭阶级，使国家逐渐消亡，而主张立即“废除”国家。他这种超革命的极“左”观点，曾经在一个时期里蒙蔽了不少工人运动中的不坚定分子，给国际工人运动带来了很大的危害。巴枯宁看到马克思在工人运动中的崇高威望，便想利用马克思达到自己篡权的目的。他向马克思写信假惺惺地说什么“我现在比以前更加理解你是正确的。……现在国际就是我的祖国，而你是国际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你看，我是你的学生，而且我是以此自豪的。”但就在他写这封信前不久，他却又搞了一个半秘密、半公开的组织——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并以它为外围，组织暗藏的以巴枯宁为首的地下司令部。这个同盟中最内层的秘密组织叫做“国际兄弟会”，人数以一百人为限，规定“只有身有魔胆的人”才能加入。这样，巴枯宁一面假装拥护马克思，一面又结死党，在第一国际的各个支部里搞自己的秘密小支部，把这两手配合起来，软硬兼施，一心要篡夺第一国际的领导权。但当他们这一手失败后，就又大搞分裂活动，力图削弱第一国际。他们并在许多问题上继续贩卖无政府主义黑货，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第一国际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下，不断粉碎了巴枯宁的阴谋，并从理论上反复批判了他的反动谬论。与此同时，革命实践也不断宣判了无政府主义的破产。巴枯宁一伙在遭到一连串的失败以后，并没有洗手不干，相反，他们恶毒攻击马克思、恩格斯是“独裁者”、“权威主义”者，要求“支部自治”。当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进一步调查巴枯宁的阴谋活动时，巴枯宁就狗急跳墙，指使死党暗杀总委员会派出的代表。正象马克思说的：“这个团体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任何手段，不顾任何信义；造谣、诬蔑、恫吓、暗杀——所有这一切同样都是它惯用的伎俩。”一八七二年，巴枯宁及其死党终于被开除出了第一国际。为了彻底清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工人运动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写了《论权威》、《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等光辉著作，

彻底揭露了巴枯宁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深刻地粉碎了巴枯宁的反动学说，从而使巴枯宁一伙受到整个工人阶级的唾弃。这本小册子的材料丰富，叙述简明，讲的虽然是历史，却紧密联系着现实，是一本较好的学习参考读物。针对人民日报发表的这三篇文章，一些领导人提出了不同意见。姚文元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能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说：这版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八日，周恩约见公安部负责人。周恩来说：干部下放是你们带的头，统统下放，等于靠边站。底下跟着你们学，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政治性错误。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出事，把耳目、有经验的干部都不要了，这还不是政治性错误？这是肯定的。我还不给你们加方向、路线错误的帽子。难怪公安会议开了，我说了话，底下也不执行。你们给底下一个机会，搞极左思潮，否定一切，统统搞掉。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 总理并中央：在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指引下和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对外工作发展很快。但是，外事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一些单位和地方还没有得到彻底批判和肃清，中央的方针政策在一些环节上还没有得到认真贯彻落实。外事工作体制，外事工作队伍的状况和一些规章制度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工作需要。在接待工作、口岸工作、归侨和外国人的管理工作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少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拟于近期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现将关于会议的几个设想报告如下：一、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中 联 部 外 交 部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八 日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周恩来的批语 拟同意，请送耿飏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 周 恩 来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一 月 三 十 日 一 九 七 二 年 十 二 月 一 日，张春桥的批语 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 总理：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

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妥否，供参考。

春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一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日，江青的批语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藏下来，那对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的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日 供总理参考。

又及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 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六日，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六日，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 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周恩来对江青所送批件的批示，手稿，。） 当天，张春桥、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 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日，周恩来和江青谈话。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十六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 讨论王若水十二月五日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 毛泽东在会上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约人民日报社鲁瑛、吴冷西、崔金耀、王若水谈话。 传达毛泽东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的指示。 江青在讲话中指出：王若水十二月五日信客观上对中央起挑拨作用。提出要批一篇文章（指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文），批一个版面（指十月十四日人

民日报刊登龙岩文章的第二版），批一个部门（指人民日报理论部）。周恩来在讲话中提出：我们内部极左思潮要批透，但不是讲林彪整个路线。并表示：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工作的同志。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意见——中共北京军区委员会三届二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纪要，二、林彪路线的实质是什么？在批林整风中，有人错误地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或者说是“左”倾机会主义。他们提出了批判林彪路线主要地就是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张照远同志在他所主管的部门，竟然把批判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和“中心任务”，违背了中央关于批林整风是全党头等大事的指示。这种看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林彪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目的，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采取形“左”实右的手法，煽动极“左”思潮，利用极“左”思潮。他伙同陈伯达，支持和操纵一小撮“516”分子干了许多坏事，是人所共知的。林彪的路线，有时以极“左”面目出现，但它的实质是极右的。这不是说，没有极“左”思潮，也不是说，对极“左”思潮不要批判。问题是决不能把林彪路线的实质归结为极“左”，不能以批判极“左”思潮代替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不能把人民内部的某些缺点错误都统统挂到林彪路线上去加以批判，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搅乱我们自己的阵线。有的同志把群众中少数人的某些落后现象搜集起来，列举了所谓“十大表现”，把诸如迟到早退，小病大养，小偷小摸，学习不认真，开会不发言，开口骂人，打架斗殴等等之类，都说成是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统统都和林彪路线挂在一起加以批判。这不是批林，是整群众。这就严重地违背了毛主席指示的“首先是批林”的大方向。

二、研究资料 中共中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摘录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 周恩来纠正“左”斗争的失败——回忆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

•王若水• ◇ 周恩来大力纠

“左” 本文叙述 1972 年末我在担任《人民日报》临时业务领导班子成员期间的一段经历，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当时的努力和困难处境。对一些青年读者来说，在回忆这一段历史之前，也许有必要把当时的政治背景交代一下。

1970 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被清除后，周恩来排名第三了。9·13 事件以后，第二号人物林彪的名字消失了，周恩来上升到第二位。毛泽东

会感到他过去 认错了人，转而让周恩来作他的接班人吗？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过去的一些做法似乎有悔悟之意。1971年11月14日，他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流”平了反。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追悼会，并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同志。6月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语，说邓小平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为邓小平的复出开了绿灯。年底，毛泽东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的来信作了批示，要求“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毛泽东也显得很信任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转机。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一直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对极左的；现在，以陈伯达和林彪集团的垮台为契机，他加大了纠左的力度。9·13事件后不久，周恩来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对看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毋右思想提出严肃的批评。他抓住毛泽东作了批示的机会，采取有力措施，使相当一批老同志恢复了自由，得到医疗照顾和妥善安置。71年底到1972年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个会议的《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其中提出要整顿企业管理，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接着，中央又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农村存在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要求各地不要照搬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强调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做资本主义去批判，等等。71年12月26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问题的汇报，明确提出质量问题的重要性，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并指出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4、5月间，周恩来又批评出口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质量问题，指出：“现在是 不敢管，无政府主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针对高等教育中的左的倾向，周恩来批评说：“否定一切，不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周恩来还把纠左的精神贯彻到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指出过去林彪只搞“突出政治”，不搞业务和训练是错的。他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文艺质量的提高。”“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72年7月14日，周

周恩来接受扬振宁的建议，当面叮嘱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把综合大学理科办好。他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这一系列的措施和讲话，显示了周恩来的决心。

◇ 争夺《人民日报》的阵地 林彪集团的覆灭使周恩来的工作负担大大加重了，可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代管《人民日报》。这些繁重的工作，是足以把一个最强壮的人压垮的。本来，《人民日报》是由姚文元管的。我对毛泽东为甚么要这样做没有想过，不过我是很高兴的。那时《人民日报》面临两个问题：一个组织问题，一个宣传问题。先谈组织问题。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正式的领导班子，只有一个管业务的“宣传小组”，召集人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鲁英。他原是“文革”初期中央派到《人民日报》的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成员，排名最后。但他前面的成员都一个一个倒台了，或回原单位了。鲁英的上海原单位群众组织也曾一度要“揪”他回去，但张春桥不同意。这样，只留下他一个，于是他就自然地成了报社第一号人物。现在看来，张春桥留下鲁英显然是有打算的。最初报社的人员对他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偏见。可他成了负责人以后，就要上台讲话；一讲话，就闹笑话，大家这才看出他的水平之低。张春桥姚文元却把他当做报社的唯一依靠对象，只跟他一个人联系。对于张姚来说，能力弱并不重要；他们重视的是他们的政治标准。这种做法，引起了报社相当多的同志的不满。周恩来从72年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以后，姚文元虽然还继续管一些报社的事情，但上面不能不受周恩来的牵制，这肯定是江青集团不高兴的。他们不能容忍周恩来做接班人，当然也不能容忍《人民日报》这样一个重要宣传阵地落到周恩来手里。那个时期，周恩来就象一架超负荷运转的机器，担子不能再重了，可是张姚毫无协助之意，反而事无巨细都往周恩来身上推——那意思好像是：不是你领导吗？那你就来管吧！我们下面的人都为周恩来的身体担忧。有些文理不通的社论稿子，也直接送到周恩来那里去了。周恩来一面改稿子，一面摇头，叹息地对鲁英说：“你们以后不要我当小学教员好不好？”周恩来决心改变报社领导的现状。1972年夏，周恩来提出，《人民日报》在正式建立领导班子之前，“要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统管全局”。周恩来还说：“干部还

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要鲁英提出一个名单。几天之后，未见动静，周恩来来电话催询。鲁英回答说因病未办。周恩来斥责说：“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一向温和的周恩来，在这里显出了他的严厉的一面。显然，他对鲁英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他不喜欢这样的人来担任《人民日报》的领导。他是不是要把鲁英当做一个钉子而拔掉呢？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报社成立了临时“看大样小组”，成员有七人；除鲁英外，还有新“解放”的前总编辑吴冷西和一些老干部；我的名字也在其中，算是中年干部。显然，这是未来《人民日报》领导班子的基础。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其他人，都要比鲁英强。根据预定计划，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要在年内成立。鲁英的地位摇摇欲坠了。

◇ 批“左”还是批右？

另一个问题是宣传问题。“批林整风”开始时，最初是批判“571工程”。这属于林彪的阴谋，主要是声讨揭发，理论上没有什么好批的。接着中央发下来文件，批林彪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辽沈战役”的军事路线。那属于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联系，很快就结束了。下一步批什么，不清楚了。我们本想好好批判一下林彪，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什么指示。批林显得冷冷清清，和“文革”初期批刘少奇的那种雷霆万钧之势相比，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那一年，少数报刊批极“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毛有过“深挖516反革命集团，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而现在说林彪是516的总后台，那么批林当然要批极左了。

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人大大会堂对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讲话，再次强调批左。他批评了外交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这几个单位都是周恩来主管的）。他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的还会抬头。”

这个精神传达到报社以后，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应该很好地讨论和贯彻。然而奇怪的是，在宣传问题上具体管事的姚文元，却没有做出任何部署。我感到纳闷：当年他们批判刘少奇的那股劲头到哪里去了呢？

8月8日，在周恩来提出批左一个星期后，张春桥、姚文元来到报社，同报社军宣队和看大样小组的几个人谈话（那次我因病未参加）。在谈到领导班子的时候，张春桥装模作样地说：“鲁英同志作为报社的

领导，我说他弱得很！在《解放日报》，他也不是最强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调来北京，不是要他来当领导的。”接着话锋一转：“现在成了这个局面，目前只能如此。”“在目前情况下，对鲁英要支持。”接着他向大家拱拱手，表示拜托之意。

谈到批林问题，张春桥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他又说：现在有些地方批“精神万能论”，可是毛主席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人说林彪是“唯意志论”，不对，他是“唯武器论”。

“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都是左的东西，是林彪大肆宣扬过的。批林刚开始，还没有怎么批起来，张姚就说批左不要过头，这不能批，那不能批，这当然是给批极左思潮浇了一盆冷水，和周恩来的观点形成对立。这种不一致，编辑部的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了，并对张姚的说法很不满意。9月，周恩来再次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时快到国庆节了。报社准备了一篇社论，吴冷西根据周恩来的精神，在其中加了一句话：“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评极左思潮。”送审时，姚文元把这句话删去了，说，全国形势如何，还要再看一看。

#### ◇ 一块版引起的风波

1972年3月21日，国务院业务组的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接见黑龙江的同志，听取他们汇报哈尔滨三个“老大难”工厂的问题。那时，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生产没有人管，工厂没有纪律，工人不上班。因此，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省委写作组写了这篇文章，署名龙岩，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理论部认为可用，又送给我。我做了很大修改，改题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又加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篇是书评，介绍一本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书。这三篇文章组成了一个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这个机会，就在10月14日把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发出去了。

这块版马上受到各方面的注意。法新社记者当天就发了一条电讯，说这篇文章是为老干部讲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与此同时，上海方面来了电话，是市委常委，张姚的红人朱永嘉打给鲁英的，询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谁组织的，是否送给什么人看过，等等；还说了一句：



“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 不久，《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3 1 2 期（1 1 月 4 日）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这篇文章的报导。的确是“反应强烈”，说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判到了群众头上，等等，一大堆罪名。奇怪的是，《文汇报》过去也曾大力批判过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这次却来个转变，而所有发言人的观点都是一面倒的。姚文元从上海叫新华社把法新社的电讯稿送来，叫我们看一看；接着又把 1 1 月 4 日的《文汇情况》转给我们，要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他自己却不表态，推说对那篇文章还没有看。玩这种拙劣的把戏，是没有几个人愿意上当的。理论部首先拒绝讨论，说要讨论也要由看大样小组先讨论。当时胡绩伟是理论部党支部书记，他私下对我说：“怎么讨论啊？你说同意吧，它是错的；你说不同意吧，它又是工人意见。对工人意见，我们怎么好去反驳？”确实如此。那时是工人阶级领导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局面。姚文元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其实是同意不同意都不可以。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四次，也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开会就讨论不起来。多数同志心里不服，嘴上不敢说，怕又是“引蛇出洞”。姚文元看到我们讨论不积极，又要我们好好学习中央文件。这一次我倒是认真学了。不学也罢，越学越觉得自己有理。毛泽东批发的关于批林整风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反对无政府主义。7 2 年以前的且不说，单是 7 2 年当年就有 2 6 号文件、3 1 号文件、3 8 号文件、4 2 号文件，都提到反无政府主义。最后这个文件是 1 1 月 1 日印发的，时间还在 1 0 月 1 4 日我编发那块版之后。即使是姚文元主持的《红旗》第 1 1 期（1 1 月出版），也还有批无政府主义的内容。其中说：刘少奇一类骗子（指林彪，当时还没有在报刊上点林彪的名字）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此外，1 0 月 1 4 日那篇反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曾经列入理论部拟定的“批林整风选题计划”，并送姚文元审阅过的。姚文元没有表示不同意。为甚么出尔反尔呢？事情的变化，看来是发生在张春桥姚文元去上海前夕。我知道，张姚每次去上海，下车伊始，就要找《文汇报》《解放日报》的负责人去，滔滔不绝地讲一通。不久，“新精神”就从这两家报纸上透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去注意《文汇报》。“新精神”果然出来了。1 1 月 6 日，《文汇报》的一篇评

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这种提法在报社编辑部一些同志中引起议论纷纷，因为中央文件上不曾有过。

11月24日，《文汇报》第335期再次批评《人民日报》。这一期的内容是《人民日报》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文章对各地报纸的影响，说全国有九个省市的报纸转载了，有八家报纸“虽未转载，但也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报导、文章或评论文章”。意思就是流毒全国。它还举出了报纸上的若干论点，包括“刘少奇一类骗子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反对无政府主义是批修整风的一项内容”（当时报纸上只提“批修”而没有公开提“批林”）。虽然《文汇报》并没有对这些论点加以评论，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是把这些作为反面观点拿出来加以示众。我看了很激动，心想：难道这也错了？难道林彪没有煽动无政府主义？难道批林整风不能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这不是一篇文章或几篇文章的问题，是批林整风的方针问题，是要不要和能不能反“左”的问题。

◇ 我的一封信

当时批林方针上的混乱情况还可以从下面几件事看出：

（一）11月份刚发下的中央关于河南省批林整风问题的文件，还在提要反对无政府主义。

（二）12月1日出版的《红旗》的提法变了，说“刘少奇一类骗子象游蛇一样，时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左’的方面，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这和第11期只提“左”不同，但也不完全和《文汇报》一致。看来，它既想要转弯，又要照顾和上一期提法的衔接。

（三）12月1日《安徽日报》登了头版头条消息，报导安徽省农业学大寨会议，李德生出席并讲了话。消息说：要排除“左”右干扰，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同时注意和防止右的倾向。

（四）北京军区党委举行第23次全体扩大会议，会上批评了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国防工办党委书记张照远，认为他在所在的单位“不是把批林当做头等大事，而是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当做头等大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当时纪登奎是政委，他在12月11日的讲话中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林彪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叛国投修，这是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他还说：“有一些提法值得考虑，如空头政治、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

姚文元得知我思想有抵触，就派我去旁听

这个会议，让我体会一下“新精神”。但我当时听到纪登奎的讲话时，却禁不住想：真有意思，司令员（李德生）在安徽强调反“左”，政委在北京强调反右……这种方针上的分歧，外国记者也注意到了，并且作出了自己的判断。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从北京发了一条消息，题为《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其中说：“《人民日报》是攻击下层的党员，并且要严厉镇压；《红旗》是提倡下层抵制。按照中国的习惯，在清一色的内部，正在进行着争权斗争。”

当时已经有些报社的同志上书中央，反映鲁英的无能，表示他们不赞成鲁英当总编辑。理论部的同志也在酝酿写这样的信。我却想，最重要的是解决对反“左”的干扰。问题还不仅是谁人来当总编辑，问题是张姚两人在推行一条什么样的方针。“左”的根子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写信给政治局或周恩来是没有用的，于是，我索性直接给毛泽东写信。我的信是12月5日发出的。信的底稿我后来烧掉了，因为追查得紧。但信的主要内容，我曾多次交代。现在复述如下：

开始我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8月1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8月8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周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我报告了《文汇报》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说这种情况有些象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汇报》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但如果是，《人民日报》为甚么不知道？我说，我不相信《文汇报》的提法是中央精神，因为如果是中央精神，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能这样快。我在信里表示我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我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

我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我想，在写给党中央主席的信中，我用不着隐瞒自己的观点）。姚文元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

是右。我说，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57年右派进攻是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从“左”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我还摘引《红旗》杂志第11期上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说姚文元的话和《红旗》杂志上的话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说：我不懂为甚么因为毛主席讲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这两种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以上是我写给毛泽东的信的主要内容。我估计，我这样一封信，由于涉及高层领导人，毛泽东不大可能会有直接的反应。我想，他知道就行了。不过，这是重要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即使不批示，也会放在心上的。我也考虑到，这封信是冒风险的，为了避免连累别人，我没有给任何人看，写好后就发出了。信刚发出两天，就听到一个不利的消息：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在教育问题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了不起。……停止党的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生产搞不好，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这些话应当说已经很明确了，但在当时，我仍然不为所动。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毛泽东会在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点。1959年的庐山会议把纠“左”变为反右，给当时“左”的作法火上加油，接着而来的是三年灾难。这个教训太惨重了，毛泽东怎么能不接受呢？！

◇ 周恩来的讲话 12月19日晚，我还在北京军区开会，一个电话把我叫回报社。随后，鲁英、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吴冷西和我坐着一辆小轿车，直奔人民大会堂。谁也不知道有什么事。就身份说，四个人之中，唯有我的被召有些特殊。鲁英也许作了某种猜想，在车上拍

拍我的肩膀说：“若水同志呀，以后报纸的工作你要多发挥作用啊！”到了人民大会堂，汪东兴先招呼我们在江西厅坐下等待。原定八点开会，推迟了。到八点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隔壁房间走出来了。看样子他们是刚刚商量完毕。握手时，周恩来是很亲切从容的样子，江、张、姚三人却面带愠色。但此刻我还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汪东兴虽然也是政治局委员，却不时跑进跑出，做些照料，自始至终很少讲话。沙发摆成一圈。坐在周恩来左边是江、张、姚三人，我坐在周恩来右侧。当时我没有想这种坐法有什么意义；后来才悟到，这三个“左派”永远是要坐在周恩来左边的，而这意味着坐在周右边的人是右派。正式开会前，周恩来和我交谈了几句。他问我是从哪个大学出来的，什么时候参加革命，有没有去解放区，去哪个解放区，等等。我虽然是第一次和这个我所敬仰的伟人谈话，却毫无紧张之感。周面色红润，看上去很健康——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时他已身患癌症了。会议开始。周恩来作为主持人，第一个讲话。他说：“收到了你的信，主席批给我们办。”还有理论部和其他人的，“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的问题”。这时我才注意到，江青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迭信。我仿佛看到我的信就摊开在那里。张春桥、姚文元也拿着几封信翻来翻去。糟糕！我的信怎么落到了他们手里！接着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是：王若水同志听到8月1日我的讲话。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11期也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定性为“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当然群众有极“左”思潮，他来利用，到后期就右得很。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否则敌人就利用，把党报和党刊，《人民日报》和《红旗》对立起来。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马上抓住。这次是美国记者，说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指的是《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一遍，从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也是不对的；林彪也是有他自己的政府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个别的。当然在有些文章中有这样的提

法，我们没有注意，中央有一定的责任。如有些地方说批林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我们批判的主要矛头。当然我们个别文章也有毛病，各省的更多。中央对这方面的理论工作，没有好好研究，务虚不够，这是有缺点的。《红旗》和《人民日报》相互之间，交换意见，互相切磋勉励，只有好处。现在《人民日报》好像有几个对垒似的。国际部、理论部，都给我写信，又不是原则争论，都集中力量攻鲁英同志，我们觉得不妥当。鲁英同志是上海《解放日报》来的，当时唐平铸倒了，他在困难条件下主持报纸，上面还有陈伯达干涉。如说鲁英同志弱一些，可以这样说，但还是好同志嘛。《人民日报》遭遇也复杂。现在要建立一个领导小组，议论很多，表现有些争权。兄弟报纸要互相帮助。《文汇报》提点意见，是在内部情况嘛！《文汇报》反映情况是应该的。彼此应该互相切磋，双方可以交换意见。以上是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我摘的都是他的原话，只是略去了不重要的或没有直接关系的部份。在五十年代，我曾有机会直接听到周恩来作报告，当时他的讲话的逻辑力量和有魅力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在十个月以前，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和周恩来作了长时间的会谈。后来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对周恩来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讲话逻辑性很强，并且热切和具有说服力。”然而，这一次我对周恩来的讲话却没有这种印象。他讲得很长，至少一个钟头，内容有些散乱。我想，他可能是有意铺得很开，冲淡主题。我还感到有时句子不完整，有时语气不连贯。刚刚批评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接下去又说“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系实际也不恰当”，这又似乎说这篇文章只是有缺点而不是有错误。为甚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可以理解，总理是在说违心的话。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意思。他不能不批评，但他仍想保护我。他说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这是主动承担了责任。其实，他本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是正确的；如果有责任的话，也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毛泽东说过要反“左”，中央文件说过要反“左”。即使张春桥姚文元在8月8日的讲话中也说：不能“把批林、批陈同批极‘左’思潮和抓‘五·一六’对立起来”，“批林批够了，极‘左’思潮也解决了”。然而江、张、姚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自我批评的话，反而装出一副

“一贯正确”的样子。周恩来讲完，说“我开了个头，你们三位讲吧”。江、张、姚三人都不讲，张春桥要报社的人讲。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先汇报。接着鲁英汇报，他的话几次被周恩来打断。当鲁英说到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遇到“左”的字样就删时，周恩来打断说：“那也不是办法，如果实际上是极‘左’也不能删。”

轮到我讲了。我说，今天中央首长的讲话明确了要反右，这一点是我过去不明确的。林彪叛国投敌，实质是右的，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龙岩文章上也有这样的话。但林彪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极“左”，也就是形“左”实右。这个“左”的表现形式欺骗性很大，流毒很广。从实际工作来说，“左”右两方面的干扰都有，这是大家承认的，问题是哪个方面是主要的。我想“左”是主要的，所以总理在“八·一讲话”中讲到要批“左”，我就按自己的意思理解了。总理本来是讲几个单位的内部问题，还有外交方面的问题，我却认为，这个精神也应该适用于批林整风的宣传。实际上，我的想法并不是在听到总理讲话以后才产生的。早在1967年，王力、关锋垮台和清查“五·一六”时，就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口号，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毛主席也作过这样的指示。一直到这次批林整风的文件中，也多次强调这一点。

我翻开了笔记本，念了1972年第31号中央文件（关于四川的批林整风问题）上的一句话：“‘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我说，就实质说，“五·一六”反革命团体和林彪没有区别，都是极右，但他们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既然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我就以为这样批是可以的。我还再次提到《红旗》第11期上说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从“左”的方面否定党的路线的话。最后我说，对于这些问题，我还要好好想通。

◇ 江青放炮

接着江青讲话。她一开口，就放炮了：“你组织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群众。《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了。我也勉强看完了。（下面她提高了嗓门）这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我对《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话来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在某一时间，某一事情上，利用极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好像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过份了。全篇不是很讲

理的。都在中央工作，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对立起来呢？还提到现在形势好像《海瑞罢官》，会是《海瑞罢官》那种形势吗？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是理论部部份同志写的。我还突然收到几个口袋，都是对鲁英进行人身攻击。我当然不是说你这个同志（指鲁英）没有缺点。我也有官僚主义，没有看。”

姚文元插话：“有些信那样写，把一个人的缺点收罗在一起，简直少有，只有黄色小报才那样写。我有次在主席面前说过，论战可以，但这种手法我不欣赏。”

这时，周恩来也作了插话。由于我再次提到《红旗》11期的文章，他叫秘书把这一期《红旗》拿来翻阅了一下，说：“无政府主义那篇文章，矛头不是对着林彪的本质问题。《红旗》11期有篇文章，提到刘少奇提倡奴隶主义，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那样说可以。当然不一定这样分类，好像一个代表‘左’，一个代表右，但总的观点是对的。”

这里周恩来作了一点巧妙的反击。他引用了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说的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的话，说这是可以的。这是肯定了《红旗》，但在肯定《红旗》的同时实际上也肯定了《人民日报》（《红旗》可以这样说，别人就不行吗？）。周恩来接着说，不一定要把林彪作为“左”的代表；这又是对《红旗》的纠正。但这里周恩来是用姚文元批评《人民日报》的标准，转过来用到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就算江张姚对别人的批评是正确的吧，难道他们自己就是“一贯正确”吗？周恩来这样说，叫姚文元哑口无言。

然而，周恩来所能做的也仅此而已。在毛泽东表态以后，他已经是输定了。

江青的讲话突然提高了调子，这显然使周恩来感到意外。周恩来讲调子是温和的，江青却提高了嗓门。周恩来说我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江青却断定我心怀叵测。江青说那篇文章是矛头对着群众，说我挑拨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的关系，说理论部同志的信是对鲁英进行人身攻击，这些都是周恩来没有提到的。本来，这次接见怎样对我们谈，在接见我们的小会上应该是商量好的，统一了口径的；江青这样一讲，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了。她批评我把中央领导人对立起来，可是她又用自己的发言显示了和周恩来的不一致。这显然出乎周恩来的意料。在以后的发言中，周恩来为了掩盖这种分歧，不得不用插话来弥补这一点，把调子提上去了。

然而如果加以注意，就会发现其间仍有微妙的区别。

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在我写信的第二天（12月6日），毛泽东就约见江青，要她将王若水的



信转给周、张、姚等，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当日，江青就将我的信转交了。关于找王若水谈话的事，江青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12月15日、1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12月5日的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12月17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参看《周恩来年谱》）这样看来，“统一口径”的会，不但开过，而且不止一次。可是江青还是蓄意在会上造成“各说各的”局面，陷周恩来于被动。

◇ 张姚的表演

江青讲完，张春桥、姚文元就好办了。他们都表示：“同意总理意见，同意江青同志意见。”好像周恩来和江青的意见是相同的，实际上他们只是同意江青的意见。

姚文元讲了一些话，都是即兴式的插话。他把身子埋在沙发里，一条腿跷得高高的，搁在沙发扶手上，一副得意忘形的神情，好像说：“你们拥护周恩来，告我的状啊！好吧，看谁胜利了？”

张春桥则接过江青的话加以发挥。他的语调很严厉：“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了，觉得受了侮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

张春桥试图对我的两个论据加以反驳，一是林彪路线的表现形式，一是中央文件的提法。关于前一个文章，张春桥说：“林彪的反党叛国不仅是实质，而且表现形式也是如此。他的极右有行动……。我认为只是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上表现为极左，但主要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右的。”

张春桥以为，既然有行动，那就是表现在外面的形式了。殊不知行动也有公开的行动和秘密的行动。林彪的阴谋行动是见不得人的，和他公开宣传的一套是完全相反的。只是到最后无可奈何之时才投奔“苏修”，这当然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但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叛国，不是通常的党内路线斗争了。而且，如果成功地逃到了苏联，他还会宣称这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结束“文革”，用这些好听的词句来掩盖他的权力斗争的实质。

关于我提到的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文件，张春桥这样回答：“四川文件主要是纠正梁兴初批极左，转移大方向。为了照顾批极左的同志，才说了那样几句。如同你在总理和文元同志之间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样，在中央文件中找

也是不行的。你这个人真有意思，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从总理找根据。” 在周恩来讲时，我已意识到，我在信中引用周恩来的话，是捅了漏子了。因此，我在汇报时，就多次援引中央文件。我没有想到，张春桥会说出这样的话。从总理找根据不行；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也不行吗？批“左”还是批右既然是大方向问题，当然也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能够“照顾”吗？中央文件能够为了“照顾”一些人而牺牲原则吗？况且，我怎么知道那几句话是“照顾”性的呢？既然可以照顾别人，那么为甚么对我又如此不能容忍呢？ 后来我才悟到，张春桥是有一个最高权威做根据的，和这个最高权威相比，周恩来和中央文件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我跟冷西、鲁英有次交换意见，说批‘精神万能论’值得研究。我是当做一个问题提出来的。还有‘唯意志论’，是苏联骂我们的，我们为甚么用这个词？‘空头政治’也值得研究；‘五七一工程’是反革命政治嘛！用什么概括，值得研究。我在政治局也提过。……。”张春桥的这些论点，正是我在信中批评的，但张春桥下面的话使我的心打鼓了：“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话，好像我反对批极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全是我的意思。” 那么，这些话还能是谁的意思呢？糟糕！我批到谁头上了！？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说，旧的心理学分知、情、意，其实是一个东西。我觉得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苏修骂我们唯意志论，为何要用敌人的语言？主席还说，坐在这里讲话，难道我们只有思想，没有意志感情？” 从张姚的这个话里，我推测，毛泽东有一次谈话，时间应该在8月8日张姚在《人民日报》社谈话之前，内容涉及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还可以推测，张姚是在获知毛泽东表示要批林彪的极右路线之后，才赶到上海去作布置的。用在“文革”中流行的语言来说，这叫做“抢旗帜”。这个精神并非中央讨论后做出的正式决定，它只是江张姚的“独家新闻”，不但《人民日报》不知道，也没有向周恩来透露。这一点可以解释为甚么11月初发出的中央文件还在提反对无政府主义，而11月份的《红旗》杂志也保留了同样的内容。张姚12月6日的那次谈话，其实就是对我的信的答复。江青说要先统一一下认识再找我谈，不要“各说各的”，但张姚已经知道了毛泽东的看法，所以就抢先说出来了，以表示他们的高明。

下面的谈话比较零碎和重复，我只得概括地转

述一下。江青（看出我对这次批评有保留，就穷追不舍）：“王若水同志，你要在中央面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你还有什么话，都讲完，不要把时间浪费了。”“这个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批林。”“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人民日报》一潭死水，搞活一些。我看王若水同志起个好作用。你敢不敢引火烧身？”

张春桥：“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问题，需要研究。”“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一股势力，容不得外面的人。”“他们报社不但利用总理和我们之间，而且还利用中央、国务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见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这种挑拨，你们各位要注意。”

姚文元：“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这句话意味深长，使我一惊。）“还有一种讲法，说鲁英是上海来的。不应该这么讲。这种说法是没有原则性的。这是林彪的宗派主义的说法。”“理论部来了两次信没署名，不署名不好。国际部还署了名。理论部的支部书记是胡绩伟。”“理论部我提了好几次，叫他们讨论，为甚么不讨论？”

周恩来：“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主席认为你这封信是不好的。这篇文章不对，这封信超过了这篇文章。当然你写过《桌子的哲学》，学了一点马列主义，你是不是都读进去了？”“王若水同志这封信，一个是把报社形势看得漆黑一团，象《海瑞罢官》那时的形势一样；一个是从中央找空子。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对上海的好事不赞成。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在宣传上，王若水同志是研究哲学的，应当在这方面表现出来。”

批“左”还是批右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至于《人民日报》正式领导班子问题，会上是这样决定的：暂缓成立。鲁英也诉说了一番他的苦衷，说他实在干不下去了，建议让吴冷西来干。张春桥批评了他，说：“现在叫吴冷西同志出来主管，这是不切实际的。他身体不好，又脱离了一段，这样子叫他去，非犯错误不行。总理和我们都是支持你的，你为甚么打退堂鼓？”我提出我不适宜继续担任看大样工作，也没有得到同意。会上还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多让青年人出来工作。江青说：“要发现新的力量，要让他们讲话，不要怕。”张春桥说：“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是非。通过这一场，领导班子可能出来。”还说到《人民日报》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要

解决。江青说：“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块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 会议足足开了五个半钟头。从 19 日晚八点半开始，到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二时了。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 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绝不会、也不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但是，向来是表情丰富的他的脸变成这样没有表情，也传达出某种信息。 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够从近距离观察这几个高层领导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是把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分开的，只是觉得张、姚不好，而江青大概是受他们包围。我还以为，毛泽东是信任周恩来的，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从这次会后，我才知道我过去错了。 这次会议“端正”了《人民日报》社的斗争大方向：不批林了；批“一股邪气，一股势力”。首当其冲的是我和胡绩伟，还有理论部。一场暴风雨到来了…… 后来外面传说，毛泽东对我的信有一段批示，大意说，《桌子的哲学》的作者并不高明。据我所知，这就是毛泽东 17 日讲话的内容，并不是批示。毛泽东在我的信上大概只批了“请政治局办”几个字，这就是周恩来说的“收到你的一封信，主席批给我们办”。毛泽东已经肯定了要批右这条原则，但“并不高明”这个批评，并不是那么严厉的。政治局如何办，是有颇大机动余地的。周恩来显然是想严格按照“并不高明”四个字的字面意义，说我是认识问题。然而江、张、姚却想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们这样做也不是毫无根据。我在信中批极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周总理的指示。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是我，间接批评的谁呢？ ◇ 毛泽东讲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 从这次事件后，周恩来就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接着，1973 年，《人民日报》社展开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和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运动，其声势之大，时间之长，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即使在“文革”初期也不曾有过。我想，区区我这样的干部，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吗？他们明地是批我，暗地是批谁呢？ 从那时开始，我已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毛泽东在听取姚文元汇报《人民日报》情况时，追述了他在 1957 年对《人民日报》编委会的一次谈话，说他当时讲过汉宣帝批评太子刘是（大两边+百）的故事。毛泽东说：看来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把毛

泽东 1957 年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给他。当年聆听过那次谈话并仍然健在的人有四个：胡绩伟、王揖、袁水拍、王若水。我们在一起回忆谈话的内容。那是在 1957 年 4 月 10 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当时我不是编委，因毛泽东点名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当众批评邓拓。那是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宣传的事。毛泽东在那次接见中发了很大的脾气，批评邓拓“专唱反调”，“死人办报”。在狠狠批评了一通邓拓以后。他又对着几个副总编辑说：“难道你们都同意他（指邓拓）吗？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象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甚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写信给中央报告情况？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大概邓拓有德，你们不忍心反对他。……”毛泽东说到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说到这里，他转过脸对邓拓说：“我看你很像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当时我们都很惊讶，不知毛怎么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看他满屋都是线装书，床上也是一大堆，大概是读得入迷了，看到邓拓有君子作风，就想起刘是（大两边十百）。虽然时隔十五年，但因为是毛泽东的谈话，印象还很深。毛在这次确实讲到了汉元帝（即刘是）；但我们四人都不记得毛泽东当年讲过汉宣帝批评他的故事。看来是毛泽东自己记错了。近日看到有的出版物引用了据说是毛泽东在 1957 年 4 月 10 日对《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说：“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他说他父亲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平（帝），更是腐败。”我要说明的是，这个讲话记录是我在 1973 年根据在场的人的回忆整理的。整理稿上本来没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是后来有的同志建议：索性顺着毛主席的意思，把这个故事加上去。这才在定稿时添上。稿子的另一处修改是删去了毛泽东当时表扬我的话。汉元帝即刘是，史称他“柔仁好儒”。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见之于《汉书·元帝纪》。刘是作太子时，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

恽、盖宽饶等坐刺叽辞语为罪而诛”，有一次吃饭时说他父亲“持刑太深”，建议宣帝用儒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宣帝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妄托！”。说完叹了口气：“乱我家者，太子也！”

毛泽东有没有在 1957 年讲过这个故事，并不重要，反正他两次提到了汉元帝；重要的是他自己从这个故事中悟到了什么，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

刘是的立场是儒家，而宣帝对他的批评是法家观点。刑名之学属于法家。刘是认为他父亲“持刑太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的“以刑名绳下”的办法，所以建议他用儒生。在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是争论很激烈的。他们之间的一个重要争论点是：儒家讲“王道”，强调仁义教化，而法家讲“霸道”，认为“仁义不足以治天下”，主张用严刑重罚治国。

据史书载，汉宣帝对太子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于从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刘钦为太子。毛泽东讲这个故事，是意味深长的。

然而太子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建议的呢？

宣帝在晚期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话，就惨遭杀身之祸；其中震动最大的杀大臣盖宽饶和杨恽。

盖宽饶是司隶校尉，此人是清官，生活朴素，只因性情耿直，得罪了許多人，又多次冒犯皇帝。当时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官。盖宽饶上书反对，讲了一套儒家的道理。宣帝恼火了，下令逮捕。盖宽饶用佩刀自刎。百姓无不痛惜。

杨恽的父亲当过宰相，他本人是个廉洁无私的人，但也结了不少怨仇。有人向皇帝打小报告，说杨曾经说过“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场”等对皇帝不敬的话。杨恽被贬为平民。杨恽回到家乡后，没有闭门思过，做出一副惶恐可怜的样子，反而大兴土木，广交宾客，毫不收敛。这就犯了忌。朋友写信劝他，杨恽回信说：“我自问罪过很大，行为也有欠缺，决心当一辈子农夫，所以带着妻子儿女种田。现在我受到惩罚满三年了，自己过过快活日子，也不图富贵了，不知道有何不可？”有人上书，说杨恽不知悔改。宣帝交廷尉查办。搜家时，查到了这封信稿。于是杨恽被判大逆不道，腰斩。

这两件事，前一件事发生在公元前 60 年，刘是十八岁；后一件事发生在公元前 54 年，刘是二十四岁：显然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刘是在杨恽被杀的第二年对宣帝

提意见的，这就是他说话的背景。盖宽饶、杨恽都是有德的人，不过是小小地冒犯了皇帝的尊严，宣帝就容纳不下，非要置于死地，也难怪刘是要说一句“持刑太深”了。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是宣帝告诉儿子的统治秘诀。其实，这不仅是“汉家制度”，以后各个朝代，莫不如此；口头上是尊儒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实际上使用严刑峻法，所谓“阳儒阴法”是也。专制君主并不在乎哪一家，他拣其中对他有用和他所喜欢的来实行。平心而论，法家并不是只要刑罚，而是要只有赏有罚；刑罚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要公平。所谓刑名，就是循名责实，而定赏罚。刑罚的目的是消灭犯罪，“以刑去刑”，而不是“残民以逞”。所以，不当罪而诛，是违反法家精神的。儒家希望君主行仁义，法家希望君主依法办事，都是不那么容易的。在专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实现的，只不过成了王朝统治的两种互相补充的工具而已。

毛泽东对宣帝批评太子的话很欣赏，可是对汉宣帝的枉杀忠臣，他却没有任何批评的表示。在他眼中，谁不满意“文化大革命”，谁就是“是古非今”；谁不赞成“阶级斗争为纲”，谁就是纯粹讲“王道”。1972年批评我的信，矛头直指周恩来；这和1957年骂邓拓，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欣赏法家，只是因为他认为法家讲专政，他自己却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不但不从秦始皇的暴政接受教训，反而自夸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如他。1972年的这件事，可以说是1974年“评法批儒”的先声。周恩来不是儒家，他也不是象汉元帝那样无决断力的人，但他内心深处倾向温和路线，这样，他就不为毛泽东所喜欢了。毛泽东不让周恩来作继承人，固然可以说是因为周恩来已患恶疾，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担心周恩来将会纠正“文革”的错误。□ 原载《人民日报回忆录》，作者于一九九八年四月修改补充。

周恩来“文革”中是怎样批极“左”的 王永钦 2000年第11期 炎黄春秋杂志 批判“政治上的”极左思潮，着手解决“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一批老干部问题。 林彪、陈伯达垮台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康生三个人了。周恩来仍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过去的一些“左”的做法也似有悔悟之意。他在一次谈话中宣布，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时说，我们的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这年年底，毛泽东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的来信作了批

示：应一律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 “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中央下达了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在揭批林彪一伙的反革命罪行的同时，“文革”中一直想方设法保护干部的周恩来，便有了较多机会和可能，批判极左思潮，着手解决“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一批老干部问题。不久，李富春受中央委托，连续主持在京老同志座谈会，揭发林彪历史上的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为老同志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错误打击作了平反。9月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成立由叶剑英负责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10月初，报经毛泽东同意后，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通知。同时，军委三总部机关也分别由李德生、张才千、金秋里主持工作。10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接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毛泽东在接见时说：“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师，是林彪、陈伯达他们搞的。又说：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军队，军委“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周恩来十分关心仍被监管的许多老干部的情况。11月12日，他在公安部检查监狱情况的报告上，一连写下十几条批语：报告中反映监管人员中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常以威吓和惩罚代替教育的内容旁，周恩来批道：“不合毛主席的思想和政策！”在反映炊事人员认为“给‘犯人’做饭不光荣、工作好了是立场不稳”旁批道：“错误认识。”在反映有的医务人员觉得“反正是‘犯人’、病治不好死了也没啥”，旁批：“极其有害的思想！”他要求提高在押人员的伙食标准，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医疗条件，以防止发生意外事故。此时关在监狱里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九一三’事件以来，我们的待遇和处境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我们营养不良、体质下降的问题，看来引起了注意。1972年初，卫戍区指定了两名战士专门给我们这批特别‘犯人’做饭，伙食标准也提高到每天六角钱。虽然比原来只多了一角五分，可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无异是一个福音。同前几年的粗劣伙食相比，饭菜开始好一点了。医疗条件也同时有了改善，专门派来医生给我们看病，也肯开药给我们，晚上睡不着觉还给一点安眠药吃。这不仅诊治了我们身体上的病，更给了我们精神上很大的安慰。” 周恩来对各地被打倒的干部，同样十分关心。作为第一步，就是采取一切措施，先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为他们治病，检查身体，改善住宿条件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得到周恩来关照的有江华、王恩茂、谭启龙、冯白驹、贺诚、廖汉生、林枫、朱穆之、张化东、刘建章等，还有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和文艺界的人士。 最



让周恩来牵挂的是那些被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老干部。他想方设法，查明有关情况，准备为死者恢复名誉或解决其他遗留问题。解决贺龙同志问题便是其中一例。据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回忆：自从贺龙 1969 年 6 月被迫害致死后，她本人也被押往贵州一个山沟里监管劳动。1971 年 10 月，周恩来派人到处寻找她的下落，终于在贵阳磊庄空军某部干校找到她。来人对她说：“周总理要你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报告中央。”薛明回到北京后，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写明了有关情况。1974 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推倒了林彪一伙强加在贺龙同志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1975 年 6 月 9 日，在贺龙逝世 6 周年之际，中央举行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周恩来也抱病去参加了。当薛明的女儿说“周伯伯你也要保重身体”时，周恩来抬起头，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在“文革”中，周恩来对陈毅的保护是人所共知的。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一样，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打击，历经磨难。1967 年 2 月，陈毅和谭震林、聂荣臻等几位老同志“大闹怀仁堂”，在会上激烈抨击“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错误做法，向中央文革的几位主要成员提出质问。在 1968 年中共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毅和其他几位老同志被指责为搞“二月逆流”的成员再次受到批判，并被剥夺继续工作的权利。林彪垮台不久，陈毅于 1972 年 1 月初不幸因患癌症去世。1972 年 1 月 6 日，毛泽东在同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表示：现已证明根本不存在“二月逆流”，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叶剑英立刻赶到医院向已病危的陈毅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几小时后，陈毅便与世长辞了。1 月 8 日晚，周恩来赶到医院，向陈毅的遗体深深鞠躬，又轻轻掀起覆盖的白布单的一角，抚摸陈毅的手背，向他作最后告别。1 月 10 日下午，陈毅追悼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按事前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方案，追悼会由中央军委出面组织，只请内宾，不请外宾。但追悼会开始前一刻，毛泽东决定出席。工作人员马上把这个情况告诉周恩来。周恩来立即作出决断：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通知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全国人大、政协的负责人参加追悼会；并邀请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出席。追悼仪式前，毛泽东接见陈毅夫人张茜及其子女，对他们说：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

毛泽东穿着睡衣急忙赶到八宝山，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周恩来在会上致悼词，这种最高规格的追悼仪式，暗示着在“文

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的老干部是应该平反的。无疑，这对“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老干部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慰藉和鼓舞。半年后，周恩来还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周恩来并没有停留在感动上，他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各种场合扩大其影响，抓紧解决干部问题。1月下旬，他在一次会上提到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讲的。林彪一伙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又说：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在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为什么不批驳？不久，周恩来得知因“杨、余、傅事件”受到株连的杨成武大女儿杨毅在河南关押处突然身亡，他立刻采取措施，派出两支小部队分赴河南开封和滑县，悄悄地将杨成武全家人实行保护性转移。

同年4月，陈正人、曾山、李德全等一批老干部相继病逝。周恩来不失时机地指示有关部门，要对疏散到各地的副部长以上的领导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查，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同时指示政协机关也应对上层爱国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掌握情况，改进工作。

为了推动全国的落实干部政策工作，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周恩来审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以教育为主的方针。”“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这以后，全国各地报刊相继发表论述落实党的干部政策问题的文章，有力地推动了干部工作的进展。

70岁高龄的周恩来一桩桩一件件地落实着党的干部政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心和保护着每一个在“文革”中受到错误打击和迫害的老干部，而他自己，却在1972年5月，确诊为患有膀胱癌。医生建议他注意休息，增加睡眠，减轻工作负担。毛泽东在医生的检查报告上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然而，周恩来并没有顾及这些，依然担负着连健康的人都难以承受的极端繁重的工作，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全身心地继续工作着。

纠正农业和工业中的极左思潮批判林彪一伙散布的空头政治，全面落

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农村问题，始终是一个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在周恩来心中，一直把农业和农村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1970 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根据周恩来多次讲话的精神，国务院先后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和全国林业会议，决定适当放宽农村经济政策，在保证集体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许农民个人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允许生产队拥有因地制宜种植的灵活性。此外，国家还通过调高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支农产品的出厂价和销售价以及实行粮食征购一定五年不变等政策，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做法和口号，总是加以纠正。他指出：在农村中，平调劳动力不给报酬，社员负担很重。所以，农业政策要讨论。他在许多场合说过：学习大寨的经验有三条，一是实事求是，二是自力更生，三是先公后私。目前还是提“先公后私”，不宜提“大公无私”，因为“发展生产的结果是要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都有好处”；如果只讲“公”，不讲“私”就不符合实际，也不科学。“我们希望每个省、县都有自己的‘大寨’，不要认为非到千里之外才能求得‘仙方’。”他还针对“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的口号指出：“这样提不好。现在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应当提‘社会主义大协作’。讲‘共产主义风格’还可以，共产主义什么样子我们还都未经过嘛！”。1971 年 12 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分配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经验，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样，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农村中存在的“一平二调”、“割资本主义尾巴”等“左”的做法。 “文革”期间，工业生产遭到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由于“停产闹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工业产品的产量和质量严重下降，工伤事故却大幅度增加。 周恩来首先做的是抓企业管理，要求恢复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强调全面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批判长期以来林彪一伙散布的空头政治，要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学业务、钻技术。1971 年底到第二年 2 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是联系经济工作实际、揭批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干扰破坏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前，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

提出“整顿”的主张。会后，国务院有关部门起草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明确规定企业应该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考勤、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设备管理和维修、安全生产、经济核算等七项制度，提出必须抓好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七项指标。这个文件贯彻了周恩来提出的整顿企业的方针，强调恢复和发展生产、反对经济工作中的无政府主义的精神，成为工矿企业落实党的各项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其次，周恩来十分注意提高产品的质量，他多次对飞机和汽车生产质量问题作出批示，一再告诫对产品质量需要“提高警惕”，“放在议事日程来解决”。1972年春天，周恩来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等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的质量问题。对国内企业屡次出现不合格产品，他感到极为不安。他认为“产品质量不稳定，就是规章制度执行不好，要遵守好的规章制度，好的工艺流程”。周恩来认为，现在主要是领导机关不敢讲话，不敢管，致使无政府主义泛滥。所以，他特别强调各单位的主要领导人要亲自抓产品质量，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极左思潮，把生产搞上去。除科教领域的极左干扰强调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提出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1972年下半年，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他敢于碰硬，从“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教育界、科技界入手，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争取尽快恢复正常工作。1972年6月，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第二次回国探亲。7月2日凌晨，周恩来会见杨振宁。一见面，周恩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杨先生说我们基础科学理论太贫乏了，而且也不同国外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是看到我们的毛病了。他还说，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不要还是自高自大，听不进你提的意见，或者听了当耳边风更危险。7月14日，周恩来叮嘱北京大学负责人周培源：“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sup>2</sup>请他提倡一下理论。7月20日，周培源致信周恩来，说在北大传达周总理的讲话后，广大教师心情激动，深切感谢党中央的关怀。信里也反映了许多教师仍然存在顾虑，主要是觉得搞“科研工作反复性很大，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来一次运动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7月23日，周恩来就周培源来信事批告国务院科教组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要求他们以这封信“作依据”，将这个

问题“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9月5日，周恩来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时，再次谈到加强科学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他说：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9月11日，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将理论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在教育上，周恩来勇敢地向“文革”中提出的“左”的教育制度进行挑战。1972年10月，他向美籍学者李政道表示：“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可以边学习，边劳动。”李政道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同周恩来长谈。看得出，周恩来当时对基础科学(包括基础理论和基础实验)非常重视，并且十分注意国内外这方面的动态和进展，对我所提的有关建议也很关心。”人们都知道，“文革”中批判所谓“17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推行了一套“左”倾的教育政策。1971年发布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规定大学招生的对象是具有2至3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的工农兵，年龄在20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应有相当于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入学，可以根据情况放宽年龄和文化程度的限制。这种招生办法，不仅严重堵塞了一大批优秀青年的升学之路，而且为“走后门”上大学敞开了方便之门。学员的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周恩来在这个被视为“文革”重要成果的“规定”刚刚公布一年之际，就提出“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的论点，这不能说不是对“左”倾教育制度的一次勇敢的挑战。10月6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写的文章：《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能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周恩来指出“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要批透极左思潮”。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连续两天在人民大会堂向回

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宣传单位负责人作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这个报告，全篇渗透着“要批透极左思潮”的精神，用以指导对内、对外的各项工作。他强调指出：“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极左思潮“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工作，还要犯错误。”“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

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应该继续“批判极左思潮”。但是，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却两次勾去社论稿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字样。十月初，《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的一篇报道中，再次出现“肃清极左思潮影响”的提法，江青一伙立即追查“稿子是怎么来的”。10月14日，根据周恩来有关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人民日报》发表了一整版反“左”的文章：一篇是《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一篇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尖锐地批驳“文化大革命”以来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和“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等谬论。它提醒人们注意：尽管林彪一伙“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他们煽起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还会‘采取稍微新一点的形式，披上前所未见的外衣，或作前所未见的装扮，重新表现出来’”。文章发表后，江青一伙人立即紧张起来。他们马上追查组织这批文章的“背景”。姚文元看了后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指责说：这些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经张春桥、姚文元授意，《文汇报》以及它的内参《文汇情况》连续登载批驳文章或相关报道。江青一伙的追随者在《人民日报》社内也大搞“反右倾思潮”。

11月28日，中联部、外交部在写给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30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遭到江青一伙的竭力反对。12月1日，张春桥便在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

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在报告上批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鉴于党内高层对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主题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12月3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件事进行讨论。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交部在修改时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词句。但是，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8月1日、2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谈话(纪要)”。12月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修改后的报告。

不久，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尽管避开使用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提法，但依然是按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反对强加于人和大国主义的指示精神，清理和批判了近几年来在归侨、侨眷、口岸、接待、宣传工作中的种种错误认识和极端做法，并提出今后继续清除极左影响的各项规定。

72至73年间以含蓄的方式继续反左

1972年下半年至1973年间，周恩来以更加含蓄的方式，继续反左，并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解放一批老干部，使他们参加领导工作，发挥应有的作用。特别是促成了邓小平的复出，对挽救党和国家，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1972年12月18日，周恩来致信负责干部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指出：当年“大闹怀仁堂”一事，“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谭震林曾被诬为“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而受到压制和打击。周恩来称他为“好同志”，并安排他从外地回北京治病。在同一封信上，周恩来还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表示了他对邓的不同寻常的关注。

1973年2月，邓小平根据中央通知，全家登上回京的火车，离开劳动三年多的江西南昌郊外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周恩来正式通知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安排好邓回京后的住所。

2月下旬至3月初，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邓小平的问题。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至此，曾被“文革”中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得以复出，恢复了领导工作。3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关于落实干部政策和干部处理问题。会后，根据周恩来的意图，由纪登奎、

李德生、汪东兴等会同有关部门提出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经政治局讨论并报毛泽东批准。<sup>1</sup> 这是在解决干部问题上的重大突破，可以避免因为少数争议较大的“疑难”案件而把许多“查无实据”、仍迟迟得不到“解放”的干部一起拖住，实际上是一次有步骤地“解放”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打击迫害的老干部的开始。

在经济工作方面，周恩来也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步骤，清除林彪一伙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2月26日，周恩来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关于本年度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起草情况的汇报。在汇报会上，周恩来历数几年来无政府主义在企业中的种种表现，尖锐地批评它给国民经济带来的严重后果。他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同时还强调，要把“整顿的方针”写清楚，要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倾向，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sup>1</sup>

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国家计委重新修改后的《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sup>2</sup>，以纠正生产管理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作为指导思想，明确地提出加强统一计划和整顿企业管理的十条规定，重申政治挂帅要挂到业务上。规定特别强调：要反对各行其是，要严格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劳动纪律，遵守党纪国法，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这个规定，在计划会议上讨论时，除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下的上海代表反对外。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都赞成这个《规定》。

但是，以后接踵而来的“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却使周恩来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

2009年10月26日初稿 2012年4月23日修改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八册（4）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八章 批林整风

#### 第四节 江青接受美国学者采访

##### 本节资料

美国学者罗姗·维特克著《江青同志》（香港 2006 年版）序言

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毛泽东《实践论》

1976 年 9 月 9 日毛泽东逝世。一个月后，他的遗孀江青和其它 3 位因倡导毛的文化大革命方针而提升上来的高级领导人：姚文元、王洪文和张春桥，被自称为毛主席的继承人逮捕，并被定性为党和国家的敌人。此后几周内，在北京、上海和其它城市，上百万民众涌上街头，声讨『四人帮』企图谋害毛的继承人华国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上海的游行队伍抬着江青的漫画像，在她的颈部画上了一串绞索和一块牌子，上面用巨大的美术字写着她的名字，画像看上去就像几根骨头。早在 10 月，华国锋就向中央政治局报告说，江青企图通过一系列非法活动扩大权力，其中包括 1972 年夏与一位美国女学者之间不同寻常的会晤，指责她要用这次长达一星期的会晤来『建立自己的帮派体系』，并向外国人出卖个人隐私和党的机密。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政治漫画墙报咒骂她是『女皇』、『叛徒』。一些墙报展出江青和『美国女学者』——我，进行会晤的照片。曾经拥有的特权变成了对她的惩罚。

江青是现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最长寿的革命领导人毛泽东的第四位、也是最后一位妻子。在我们的会晤和我写作本书期间，无论中国政府如何限制她的公开活动，她也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女人。在我们的对话中，她更多地谈到在这 30 年来，她怎样通过自身努力，而不是作为毛泽东的妻子，成为一位领导人的。

甚至在 1960 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后来处于政治巅峰的日子里，她的地位也并不稳定。这些不稳定的因素，通过她对过去的叙述被巧妙而着重地描述出来。在那 30 年的首 10 年里，几乎没人注意到她，在第二个和第三个 10 年中，在这个家长制社会里，无论是过去，还是比较宽松的现在，她都一直被自己作为革命领袖妻子的角色所局限。直到第四个 10 年，当毛的生命力日渐衰竭，更多地作为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领袖时，她才得以大步走向权力。

尽管是高层团队中的一员，她发觉自己并不为世界所了解。自古以来，中国任何有才学的人都希望永垂史册。江青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几个有着同样抱负的女人之一。本书是她渴求历史承认的见证，记载着只有她自己知道的过去，并希望后人记住她的信仰和成就。

当然，寻求这样的个人宣传，江青冒了很大的风险。因为书写个人历史这样的追求，是在公然对抗共产党时代的个人定位。从 1930 年代晚期到 1940 年代中期，在西北根据地延安，中国共产党给人的印象是一群年轻、充满热情的农村革命者，没有什么名气，或者说名声不太好，当时的统治者国民党企图隔绝他们与外界的接触，以压制来自共产党的挑战。共产党通过信任那些铤而走险进入根据地的记者，向他们展示个人历史，成功地突破了国民党的包围。这些外国记者中，最值得纪念的是埃德加·斯诺，他向中国以外的世界表达了他对这些努力奋斗的革命者的同情。

20 世纪中期，随着共产党巩固了统治中国的政权后，个人传记的年代结束了。他们开始了对土地和人民的完全改造，并与外国缔结了正式的外交关系。1970 年代，中国还控制在那些曾经统治延安的同一群人手中，他们更加积极地倡导马克思主义信条：是人民创造了历史。中国的领导人此时已经积累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统治自信。他们邀请了成百上千的外国人访问中国，希望外国人对这些改革感到惊讶，并向全世界正面和大量地报导被解放的人民。

江青，这个严格的中国共产党员，并不会公然对抗这样一个公理，即人民创造了历史，因此历史必须记录人民。但她不能忘记，当她在延安依然生活在毛的阴影中时，她错过了将自己的名字和成就晓喻海外的机会。因此，1972 年的夏天，当她驾驭着由她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时，她抓住机会说服我（我的任务只是报导中国女性群众），因此有了她为当领袖而独自奋斗以及与其它人在毛去世后争

夺权力的经历。为了表达她的意思，她通常用间接的方法。她的政治天才，如同过去中国的统治者一样，要用艺术和文学手段来完善。在她给我的一幅艺术照『庐山汉阳峰』（见卷首插图）的背面，她抄了一首诗，肯定是毛未发表的诗（风格和内容与他 1960 年早期的诗词一样。）在中国诗歌传统中，看似写景，实则议政。他将她比作神奇的山峰，经常掩映在江霭中（江青的江字是『河流』之意）。只是偶尔显露峥嵘，这里可能指她的动机。

1

『让我在你面前剖析一下我自己吧，』江青建议道。她以充满感情的坦率和独到的艺术眼光，讲述着她生活中的每件事。『剖析』这个隐喻是她思维中的永恒，也是她自述的主旨，这是她从鲁迅那里借来的词汇。鲁迅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批判作家，是一位让她崇拜的偶像。她的剖析，如同鲁迅的一样，永远是一把双刃剑：剖析自己的同时也剖析别人。在不太严格的解释中，这些词汇变成了自我批评与批评，革命生活中每天的祷告。

江青在我们会晤中的剖析暴露了过多的矛盾和冲突。最引人注目的是：她一方面被个人的不安全感困扰，另一方面在公众场合还要保持坚定自信的姿态；她在同志团体中始终采取挑战者的姿态，无情地奉行极端的革命道德标准。毛对马克思的认同——辩证法是『革命的逻辑』——掌控着江青的感情生活和观念世界。从孩童时代开始，她就在冲突中成长。她在青年时代所汲取的马克思辩证法强化了她的任性和好斗的性情。这些性情在作为激进的鼓动者反抗蒋介石专制政府的经历中被加强了。与土匪王子的婚姻给了她革命先锋的地位。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她的心灵和头脑。然而，毛在重大事件过程中对重大问题的独立思考，以及江青个人的野心决定了她仍不会满足。

江青的生活、革命以及由此而来的这本书因而也充斥着矛盾，一些让人费解，一些又让人柳暗花明。马克思理论变成的毛语录集中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上（地主对农民、资本家对工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大部份外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以观察这种宏观的两极对立为满足，但其它更为人熟知和更容易理解的冲突也体现出革命觉悟，例如，领导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不同性别之间、不同辈份

之间、公开和私下之间、知识自由和政治教条之间、人性的『强』与『弱』之间的紧张。尽管江青的正式声明都是在马克思主义范畴内，但她的生活故事则表明其它冲突同样有意义，更能直接反映她的心理。

总而言之，她所描述的生活，除了稍有一丝的家庭和同志式的联系外，几乎是寂寞而艰难，缺乏信任和温情。在她与毛的孩子被抚养成人之后，毛在他激进的政治事业上蹒跚前行，显著的标志就是引退和思考。因此，江青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在她的中年时代面临着选择，要么默默地老去，要么在领导团体中争得一席之地，在竞争中她只有依靠个人的智能才能生存。因此，从 1960 年代起，她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之中。在此期间，她形成了自己的政治风格，即深思熟虑的辩证思维和权宜之计的友善，但本质上是对抗性的。她逐渐完善了从心腹和顾问中获取绝对忠诚的艺术。他们反过来可以通过政治系统协调下面的人。但是她对他们忠实的陶醉总是伴随着遭到背叛的恐惧。在抛弃甚至公开诬蔑那些政治过气的同志方面，没有谁比得上毛泽东更令她疑虑重重。在一个以为为人民服务至上，而不是为个人服务为信条的世界里，没有哪种友谊不受到『阶级立场』的影响。由于她所崇尚的政治标准，她所谈及的『剖析』更多的是剖析敌人而不是朋友

早在 1934 年，当她还是一个有抱负的年轻女演员时，她对群众的态度就是矛盾的。即使在那时，群众也是所有激进政治所追求的终极主题和目标。他们会冲向她用鲜花将她挤压吗？他们会谋害她吗？或者他们会羞辱她，逼着她自杀吗？我发现，她的个人困扰几乎永远与政治密切相关。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她被文化界代表人物周扬及其智囊团迫害的故事。那是一些她内心排斥了 30 年的男人。这个长长的故事一半出于想象，一半出自真实，直到她掌握了足够的权力毁灭他们。个人的复仇被融合到了为毛的政治服务的方针中，驱使着她要来一场文化大革命，反对他们顽固的『修正主义』思想。在我们看来，这种思想比她和毛的思想有着更多的自由主义。在她的意识中，她不能肯定毛对她的巨大工程是否支持，特别是当他成为退休的哲学家而不是一位执政国王的时候。焦虑贯穿着她的整个叙述，这种焦虑更像是对毛冲动的合理反应而不是妄想。在否定了他与第一任夫人（一位父母强加给他的农民媳妇）的关系后，他和第二任夫人结婚并放弃了她。她是一位知识分子，为他生下了 3 个儿子。她是作为国民党对毛煽动共产主义的报复对象被杀害的。第三任妻子在可怕的长征中发疯了。她在苏联长期的流放后

被送进了中国的疯人院。至于他的两位指定继承人——刘少奇和林彪，毛突然改变了主意，在他们事业的顶峰毁掉了他们。面对如此的行为，如何能让作为妻子和政治助手的江青有一点点的安全感呢？

2

如果不是处在江青复杂的个人环境中，而仅仅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去认识江青，可能会不理解她生活的合理性。如此简单轻易的卷标，像『激进份子』、『极左』、甚至『妄想狂』，根本不可能全面体现她的个性，反映她和成千上万人一样所投身的革命。当一个社会更倾向于宣扬它必须是什么，而不是展示它本身是什么的时候，重塑现实的任务实在非同小可。

传统的拖累与革命的推动，同样让当代中国发生着惊天动地的变化。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在任何地方都是以政治动力为核心的。思想家孔子，一位人们信奉了二千多年的伦理和政治法则的导师，将统治者对于人民的作用比作风之于草的压力。通过内在的德行和外在的行动、言语和行事，统治者为人民树立了榜样，人民大多服从于他们的道德力量。

共产党的领导们从他们的运动开始之初，就有意无意地利用了这个观念。然后将其发扬光大，影响着所有的支持者。『领导同志』（最高团队的领导者自称）要给人民树立道德和行为的榜样。为了鼓励群众广泛响应，其中的个别人因服从中央的道德力量而得到嘉奖。群众中最杰出的人被树立为当地的榜样。这个竞争的进程一直延伸到统治的最基本的竞技场——家庭、学校和工作单位中。在整个政治结构中，在最底层实施的政策源于最高层。

是谁掌握着历史？是谁创造了历史？是早就处于高层的领导人和新从群众中选拔的领导人，如儒家传统早已暗示过的？抑或主要是人民大众，如马克思教导的，并为中国共产党所确认的？江青，如同她所代表的政权，所有言行都要符合这两种传统的范畴。而且，如果哪一边都不适合她的话，她就要生活在两个社会范畴的边缘。

作为一名女性，她经常陷入两难境地。作为群众的孩子，她背弃了家庭，学会了通过表演艺术赢得人们的欣赏，并通过奋斗达到革命权力的顶峰。她和毛的

婚姻一方面确认了她的成就，同时使她看起来被置于一个所谓男女平等的新社会的顶端。但实际上，她被迫呆在一个伟人的阴影里，排除在领导们的讨论会之外，并脱离了正在开始改变历史的群众。在她的中年，她通过利用其它有权力的男人和表演艺术摆脱了主席的控制，恢复了她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只有他们才能给予她政治合法性和一生永远革命的安全感。

对江青来说，执政的国民政府 1930 年代镇压不满者的决定，特别是镇压像她这样的激进份子，强化了她在群众中生活的艰难。此外，性别也是对她不利的一面，即传统对女孩子的蔑视和对女影星的诋毁。在西北解放区与毛泽东的命运相连，激起了另外的偏见：一是反对更年轻的女性取代上年纪的妻子；一是反对领导人的妻子寻求与众不同的地位和与人民的直接关系。江青，作为 1960 年代自我提拔的领导，还卷入了与另一个传统的冲突，并且这几乎是普世性的传统，即艺术权威是男人的天然权力。在文革中，她主导了极其重要的文化领域。在当代中国，这是传达政治思想，决定人民觉悟的领域。比起同时代的任何女人，她更多地使尼采哲学凌驾于她那一代人之上，并越来越以福斯坦信条生活：没有她不能掌握的艺术，不能了解的科学和不能攻克的领域。

从儿时自发的叛逆者，江青演变成了一个极端的女人。由于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觉悟，她痛恨中间地位。在她周围的世界，她憎恨中产阶级。在她控制下发展的戏剧中，她从舞台上扫除了『中间人物』（那些不代表阶级极端性的人）。所有她的项目都会不计后果地进行到底。一些事情对她来讲是不真实的，除非伤害了她或另一个人、或一个社会阶层。她不断冒险，通过自己的勤奋工作，改变着过往形成的观念。文革的即兴风格，显示她有意识背叛共产主义政治中某些令人厌倦的虔诚和老式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坚持从权力和责任中驱除女人和年轻人。

尽管在男性统治社会中，她有各种理由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但她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当她偶尔提及中国女人面临的困难以及她们变化的地位时（她没有评价西方女性的情况），她几乎从不抱怨。尽管这经常是真实的，即男人们特别地针对她，或普遍地阻碍她发表意见的权利和权力上升。她沉默的理由主要来自于意识形态。对于中国的过去，用马克思的观点来看，女权主义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因此，中国共产党解释这一教条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女人必须放弃性别斗争，加入阶级斗争，与她们的无产阶级兄弟一道反对共同的压迫者——地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每当江青在我们的会晤中发泄对男人的不满时，她攻击他们的『修正主义』和『反革命』企图，但只是偶尔攻击其『大男子主义』。大声宣称共产党领导层被男性爱国主义者盘踞可能引发这样的问题：当前的政权是否成功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是否违反了传统和革命的观念，即领导是人民效仿的道德楷模。出于大部份的政治和个人原因，她不能挑剔丈夫。毕竟，毛主席在女性群众面前是以她们的支持者形象出现的。这位领袖给她们灌输了这样的骄傲：『妇女能顶半边天』。

江青应该作为一位具有超凡勇气的人、转折时代的女领袖以及革命先锋派领袖被人们记住。她是封建时代的残余，当统治者娶了无权无势但美貌的才女时，她们中的一些人最终得以在君主背后弄权。前仆后继的民族解放运动很少将女人送上最高领导层，但文化大革命使穷人、年轻人和女性达到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高的社会地位。尽管江青到达权力顶峰道路的第一步与婚姻有关，她最终达到的权力，召唤其它女性无视与丈夫或家人的关系而走向政治权力。

如果江青的政治生涯基于革命（农业、工业或科学进步）的物质层面——我的历史重塑工作也会容易得多。很少有人会反对这个观点：增加食品生产和均衡食品分配，必定是一个经常闹饥荒的大国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但江青爬上革命控制塔的时候，经济在长期掌权的男人监管之下。其它人被确立为政治真理——意识形态的卫士。不过，非物质的一面在马克思语言中构成的『上层建筑』——更吸引江青。毛自始至终都知道，对于革命领导权最大的挑战是能否控制人的思想，以无产阶级利益的新名义，鼓动那些没有知识和受过教育的人抛弃若干世纪的旧价值观。正如江青的叙述中所表露的，中国的领导人和观察者一直思考着道德以及革命手段的问题，包括宣传的使用和滥用问题。总而言之，我们关于领袖们做出选择的私下思考了解很少，远不如对他们公开决策的了解。

意识形态经常被说成是孤立的。外国记者和政治分析家将『理论家』或『激进份子』当作同一个阵营的人。然而，在中国，意识形态还是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密切相关的。思想和行动的关联困扰着江青，她的主要工作是管理人们的思想动机。例如，如何能激发工农通过推翻社会监管者（地主、资本家等）去打破世世代代的习俗。实际上，这些监管者在他们的眼里更多的是家长作风而

并不是残暴。如何能调动起上百万年轻人反抗孔子之道，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师道尊严那一套？如何让女人学会勇敢地 and 男人分庭抗礼，尽管她们在习惯上对男人五体投地比向男人叫嚷更舒服。如何能让多少个世纪都遵循古老生产方式的人有创造性，以便达到前所未有的生产目标？如何让新生产首在精神上更有效地被激励，而不是靠物质刺激？

对于这类问题的回答，依靠史无前例的极端执着去改革激励语言和奖惩系统。在那个无情推行上层建筑产业的 1960 年代，江青以总工程师的形象出现，挥舞着毛主席设计的蓝图。在他们的吐界里，在规范公众对现在和过去的观念时，她，毛以及他们的支持者都不能容忍任何对抗性权威或权力。

『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可以说是国家的第二个政府，』索忍尼辛在《第一圈》中这样写道，那是他在被迫害前几年写的。因为沙皇传统被西方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概念极大地修正了，苏维埃被迫容忍一个或多或少的、永久的反对派。但中国的独裁帝王传统基本上在毛泽东的政府继承以前没有被这样的思想触及过。上百万支持者的赞同淹没了异议的声音。这种声音首先出现在向同样独裁的蒋介石政府发起自由挑战的转折时期。不支持毛政府的作家要被镇压、被迫害或接受思想改造的『拯救』。

在毛的统治下，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些在我们文化中必需的，被谴责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的和反革命的。当江青从对抗一个中央政府(1930 年代的国民政府)转变为维护另一个(毛泽东的)时，她变成了精神王国的灵魂，上层建筑的女长老、全国无产阶级文化阵线的女领袖。假设中央政府是真正的『人民政府』，一个『第二个政府』，不论是左还是右，绝对是不需要的。

江青和毛，一个被免职，一个去世，将不可避免地被作为凡人和领袖来比较。尽管他们在才能和谋略方面的差距是明显的，但追求的事业却是共同的。江青的谈话和陈述，缺乏意识形态的精彩和对历史的充分把握，缺乏内涵、锋芒和诗那样的节奏。她的不公正和荒谬的暗示不时削弱了毛泽东被粉饰过的形象。江青学会远离公众领域而生活，并将她的政治生涯交付实践的检验。更重要的，与评价她以及她通过本书给予中国人的贡献相比，她的生活故事和对她影响的评价可能对历史更重要。江青同志有着特殊的魅力，这在中国尽人皆知。我在近距离内能感受得到，但在远处这种魅力便消散了，在她的写作中已经彻底失去了。不管她



年龄的话，你会发现，她展示出一种来自巨大权力的特殊吸引力，或被称为魅力。她令人惊叹的独白被戏剧性的情绪左右，从暴怒到温柔，再从温柔到兴奋，就像她所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大众面孔一样善变。她在政治领导上的『明星气质』，不是过去演艺生涯的简单残留，而是产生于她对历史地位的自我意识。无论是在公众还是私人场合，她同样表现出能言善辩。她个人的活跃，解释和反映了人民对自己国家出色的京剧的欣赏力。

## 3

本书是在江青表达了出版愿望的情况下得到『授权』的。在公开发行前，她从未要求审阅手稿。我们第一次在北京的会面，我没有准备，虽然带了一个笔记本，但听得太入神了，没想起用它。她涉及的话题很广泛，有些轻轻带过，有些谈得兴致勃勃。会晤记录的副本在两周后才给我，她解释说，为了『准确和谨慎』起见，会晤记录经过周恩来总理、姚文元(江青的笔杆子)及其它一些领导同志(其中没有包括毛)编辑过。如我所料，一些诋毁林彪的惊人话语及其对于她身心健康的伤害，从官方记录中删掉了，但没有从我的记忆中消失。应她的要求，这些细节也没有出现在本书中。

接下来的会晤中，我不断作笔记，尽管江青保证我会像第一次那样拿到一份记录副本。她说，这些记录是根据录音带事后整理，由一个或多个书记员抄写，包含了我们边走边谈的大部份内容，这部份内容只记录在书记员的笔记中。尽管书记员们很有效率，而且我对江青说到做到的能力深信不疑，但我还是准备了自己的记录，包括她说的大部份话以及我对她的观察，她的言谈举止，行坐起卧，以及其它人的参与。如果需要，我的笔记完全可以与官方许诺的记录相比。官方记录一旦经过周和其它领导人的政治编辑，难免会有其内在的利害关系。

在我 1972 年返回美国后的一年多，通过中国驻联合国大使黄华及其夫人何理良提供的外交渠道，江青和我互相交换了很多书籍和照片、两部纪录片以及各种信息。不过，那些余下的谈话记录有几个月的时间杳无音信。我不时收到传来的消息，说他们用两种文字(中英文，就像第一次一样)准备文稿的工作非常繁重，但他们最终会提供的。1973 年 5 月，我终于得到何理良的正式通知，说我和江

青的谈话记录『太长太繁杂』，不适宜作为党和政府的正式报告发表。她向我承诺(她和大使在其它场合多次重复了这个承诺)，我可以自由发表第一份记录(这部份资料与江青后来告诉我的完整经历密切相关)，并以我自己的记录发表，但我最好不要写成本『传记』(这会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即是人民而不是领袖创造了历史。而且中国共产党认为，毛才是真理与智能的唯一体现)，要『以毛主席的观点』书写革命历史，其中有一章或两章写江青。

『但我没有见过毛主席，因此不了解他的观点。』我回答道。

『你可以阅读他的著作。』何理良说。

其实很多外国人已经读过了，我告诉她，但对于主席的个人观点，我没有新的内容可以增加，那都来自江青的叙述。我当时明白他们已接到命令，取消先前江青要我完全按照她的『角度』来发表的委托。

除了第一份以外，后来的记录都没有给我，这在一开始确实令人沮丧，不过后来这件事反而变得饶有趣味，因为我发现面对的是中国领导人之间明显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从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人对我不太自然的热情中，我察觉到了细微的焦虑。我知道这只是复杂、深刻的分歧和裂痕的外在表现。仅仅看毛主席的总结和指示，那些内幕不可能为中国公众所知。但从长远来看，他们不交出江青谈话官方版本的决定，使我有出版这本书的自由。我可以写下她说的话，外界有关的评价，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解读，而不仅仅作为江青的传声筒。中国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中一部份。例如，江青一直答应会把记录交给我，而且我在中国时，她从未食言。难道是她自己突然改变决定不再授权了吗?也许那个决定是毛做出的，或者毛是受人教唆，那些人不满意江青喋喋不休为自己树碑立传、泄露领导人之间残酷争斗内幕，以及轻率地发表与毛或集体意见截然不同的论调。

这些不可猜测的事情反而坚定了我的决心：采用江青提供的大量口述资料。这本书的编撰工作并没有对联合国的中方代表隐瞒，而他们对此的焦虑与日俱增，他们显然已从北京得知了一些江青与我谈话的内容(和来自高层的异议)。最后，1974年1月，何理良(她刚在北京逗留了3个月)再次强烈要求我不要出版完整的传记内容，或我所谓的『江青同志眼中的革命历史』。何问我是否记得『五月通知』(1973年5月她和黄华警告我不要写传记)，并提出给我钱换取我照他

们指令办的承诺。我自然拒绝了。出于对江青最初意愿和对历史的尊重，我感到不能将那唯一的记录隐藏起来，我要继续这项工程。

某些中国高级官员想要禁止的，正是他们的美国对手渴望知道的。国务卿基辛格办公室秘书、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都派了代表，通过朋友和合作伙伴直接或间接地向我索取那些会谈记录和我的个人笔记复印件。我以两个理由回绝了他们。第一，没有中国政府的代表尝试利用我作为美国政府的政治信息管道，谈话没有涉及任何国家安全问题。第二，作为一个到过中国的历史学家，我所代表的只是我自己，我认为在检验这些材料的准确性和判断性以及编撰此书之前，我没有义务将我的原材料交给其它人，该书将向一般公众讲述江青不平凡的生活及其与革命历史的联系。

从中国回来后，我在史丹福大学花了一年时间，在哈佛花了 2 年时间研究。我对江青进行访谈的情况，尽管只是一些片断，但在学术界及一些公开场合广为传播。在那些场合，我只讲述了她的生平，她的同志和整个中国。从 1975 年深秋开始，在老年、将死去以及新上来的领导人中间进行着更多司空见惯的内部斗争，比起平时造成更多的公共影响，而我私下或公开谈到的关于那次会晤的只言词组，被《中国观察》记者捕捉到了，他们的任务就是关注中国领导集团的起伏。在这些零星报导中，有一篇说到江青与一个外国人的谈话太轻率，透露了毛主席的『秘密战略』，因此导致了她的衰落和倒台，这显然是夸大其词，因为随后江青及其信徒频频亮相，地位依然如旧。第二年春天，在公开批判周恩来的接班人邓小平期间，路过广州的游客可以看到抨击江青的大字报(认为她是反右倾运动的主使者)，指责她教唆出版了一本传记，泄露党的内部文件，还讲述了一些让毛主席蒙羞的私事。1976 年春，同样的猜测，包括一些不负责任的报导，在国际上传得沸沸扬扬。例如，说我的哈佛办公室部份手稿失窃，并被交给当政的邓小平总理，而邓又将其转给毛。

这些有关中国统治者的推测及他们私人外交活动的危险，也是江青故事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在她的回忆中，一条永恒的主线，就是她一生中不断被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中伤。这也是女性为争取政治影响而付出努力时不可避免的。有一次，她曾关心地对我说，希望我与她亲密的私人交往以及关于她的写作不会使我成为谣言的靶子。

江青的情绪多变，她的谈话游走于私人 and 公众话题之间，一会儿直率，一会儿又很注意分寸；有时是她的个人意见，有时是毛的正统思想，使解读她的个人和历史意义显得尤为困难。本书除了直接和间接引用了她的原话外，还加入了我把她当作一个人和一个健谈的人的观察。必要的时候，我也在她的回忆里加入了一些历史文献资料。她没有必要的奉承和恭维——也是她政治风格的一部份——在书中被删去了。把她的过去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她作为一个主角、讲述者和为她的人民树立榜样的任务不可能由她自己去完成，这个难题对于我们这些中国文化的门外汉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在性别禁忌方面，在那里甚至一位最革命的女人也没有获得完全解放。此外，翻译也是一个问题（把汉语逐字逐句地译成英语并不是很清晰顺畅）。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具有的僵化刻板，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他们的世界观。

如果主席或中央委员会需要一份纯粹赞美江青的作品，他们自己会编撰一份，并用他们自己选择的语言传播。经过我稍稍编辑修改过的采访报导，同时又带有自述回忆录的特征，从长远看不是为任何人服务，尤其不是为江青——她对世界的看法需要一些解释。就我们之间的文化和阶级碰撞和冲突来说，如果仅仅从一个记者角度，对这些耸人听闻的故事，凭着感觉匆匆做出评判，就会辜负了她冒险披露个人和历史见证的本意，扭曲迷茫的事实得不到探索。我没有这样做，我宁愿选择用这样的风格来表现她：用和她在一起的经历来完善她的叙述和我对她本人、她的世界仔细的冷眼旁观。正如她曾好几次自信地对我说的那样，因为我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不是一个记者。

美国学者罗珊·维特克著《江青同志》（香港 2006 年版）目录

中文版说明

序言

I 成长

一、邂逅

二、逃离童年

三、从党到监狱

四、从左翼到舞台中心

## 五、上海电影圈留痕

### II 在边区

#### 六、毛泽东的延安道路

#### 七、延安的大众文化

#### 八、走向北京

### III 幕后

#### 九、五十年代的隐名埋姓

#### 十、北京与莫斯科

#### 十一、梦回红楼

### IV 文革

#### 十二、搭台唱戏

#### 十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

#### 十四、反潮流

#### 十五、林彪弄巧成拙

### V 女主人

#### 十六、戏剧革命

#### 十七、歌舞中的豪情壮志

#### 十八、如释重负

#### 十九、第 11 个小时

张颖

## 旧事重提

1992年，我去美国探亲访友。从美国回来后，我忽然接到美国友人陈香梅女士寄来的一篇文章，登载于美国中文版《时报周刊》，读了以后真是令我万分惊讶。原来20年前江青与维特克谈话这一事件，至今还被人利用来造谣。这篇文章开头说：“在大陆，凡稍微了解一点‘文革’中期历史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红都女皇》事件的。宦国苍先生通过访问当年肇事的维特克教授，揭示了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内幕’。”然后接着写道：“按照维特克的假设，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刻意安排了维特克教授采访江青，并且让自己的亲信张颖陪同在侧，了解全部情况。随后周恩来以审查为名，扣留录音带并指示张颖，据此写成《红都女皇》一书，并且匿名在香港出版，然后周恩来将此书作为重大事件的物证转呈毛泽东，激怒他，从而使毛、江疏远……”

我看到这篇文字以后，真是哭笑不得。维特克教授的这番假设，奇妙之极。我觉得她好像不是一位历史学教授，倒像是一位幻想小说家。

事情已过去20年了，居然有人有兴趣把旧事重提，而且编造谎言，真是荒唐至极。

“文化大革命”中期，也就是1972年，曾发生过一件事，这件事在北京可以说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在全国甚至国外也有传闻，那就是江青与《红都女皇》事件。当时的传说是，毛泽东看了由香港出版的一本《红都女皇》，大发脾气，批评了江青，而且江青也就从此“失宠”了。在国内，我们许多人都曾听说过，“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江青和“四人帮”，但那是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四人帮”违背了原则，而绝不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这些情况到现在当然都已真相大白。当时在香港确实出版过一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文革”以后我阅读过。书中极力吹捧江青，而许多事实都子虚乌有。稍微知道江青的人都会认为那不过是胡吹乱捧，不是事实。

无独有偶，在与此差不多时间里，美国有一位女副教授，名洛克珊·维特克（以下简称维特克），她于1972年夏季访问中国，访问期间曾采访过江青，谈话时间先后长达60多个小时。她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于

1977 年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江青同志》。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

维特克来中国访问期间，特别是与江青的所有接触，我作为主要陪见人（另外还有 6 人）都是参加了的。当时我的职务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是由外交部领导决定派去工作的。本来，外交部干部被指派去陪见外宾是很普通的事情，而这次陪见却不那样寻常，直至如今还闹出些是是非非来。既然如此，我深感有必要就我所知道的情况，把这段历史事实清理一番，记录下来，以便留给有兴趣的后人们查证或研究。

### 江青初见维特克

1972 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到中晚期，林彪一伙已经完蛋了，江青一伙还在兴风作浪，他们不断给外交部制造麻烦。但在外交部内，形势较好，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日常工作比较忙碌，这和社会上仍然是乱哄哄的情况有所不同。不过内部的不同派别、不同思想的斗争在暗中仍是很激烈的。我们这些已恢复工作的干部，仍像过去一样，按时上班，忙自己的工作。

8 月 12 日上午，在新闻司办公室，大家像往日一样工作，只听见翻阅文件材料的微小声音。突然电话铃响了，把大家吓了一跳，跟着是司秘书的声音：“老张，乔副部长请你立刻到他办公室去。”我起身点了点头就出门去了。我进去时，乔冠华副部长正站着和王副部长讲话，我站在他办公桌的两三米外，他们抬头见到是我，很随便地说：“今天下午 3 时，在人民大会堂，江青同志要见一个外宾，派你去陪见。”我呆立着，脑子还没有转过来，只是感到奇怪，江青见外宾怎么找我陪见呢，我只好问：“见哪国新闻记者？”因为只有见记者才和我有点关系。“不是记者，是位副教授，友协的客人，让你临时去帮忙的。”乔副部长说。“我不去，既是友协的客人，我什么情况都不了解，那不合适吧。”那时江青已经“声威大震”，随便说一句什么话就可置人于死地，谁都不愿意和她的事沾上边，我也不例外。“和你的工作无关，这是临时任务，原本是周大使去陪见的，但他已经安排别的陪见了。外交部总得去个人呀。”乔很耐心地解释。“另找别人吧，干吗要我去呢，

反正是临时任务。”我坚持。“我和几位副部长已经商量过了,你去比较合适,一则是江青认识你,我们就不用先去请示;二来呢,你搞过文艺,万一她问起什么,你还可以说得上来。就这一次,你还是去吧。”我只好退出来,知道这是命令,不能违抗,心里却老大不痛快。

我回到办公室,赶紧找《友协简报》,我总得先了解一下,这位副教授——即洛克珊·维特克女士,是何许人,为何来中国,来了多久?……

维特克原是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经她本人要求,经我驻联合国代表团推荐,友协邀请她于 1972 年 7 月 19 日至 9 月 1 日在我国访问。她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贡献,邓颖超、康克清等老同志已接见了她,并对她谈了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在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见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一般都不安排江青单独接见外宾,因她的工作与外事无关。维特克一再要求,友协送上一份请示给周恩来总理,看是否要见。周总理 8 月 10 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便立刻决定于 8 月 12 日下午 3 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

8 月 12 日下午两点一刻,外交部按照规格,派出的一个主陪见,主翻译小沈,礼宾司一副科长,一个速记员,都已到达接见厅,主管礼宾司的王副部长也来了。按常规她是可以不来的,因为是江青接见,不敢出漏子,所以也来了。这时友协负责人老丁和友协的陪同老陈也都进来了。我立刻走过去和老丁她们打招呼,说明派我来的原因,并询问了一些客人的情况。两点三刻,王副部长一边急匆匆跑进来,一边告诉着大家:“来了,来了。”不久,在前呼后拥下,江青和姚文元轻松入场。王副部长立刻把我拉到江青面前说:“今天外交部由她来陪见,首长认识她吗,”江青把金丝眼镜一扶,睁眼一瞧,放大嗓门叫了一声,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原来是你呀,小鬼,去年范文同来访问的时候,我还见到你。是啊,嫁鸡随鸡,你就去了外交部。”然后挥了挥手,哈哈大笑起来。

江青忽然想起随同进来的姚文元,面向大家说:“姚文元同志你们大家都熟悉吧?他是当今最杰出的理论家、批评家。”



江青和姚文元坐到当中主人的位置上，其他人也默默坐下。江青又一挥手：“你们写的情况，我全看过了，不用再说了，时间也差不多了，请客人来吧。”

过了不一会儿，友协的小俞陪伴着维特克女士走进接见厅。江青立刻站起来，以惊人的速度走到门口，异乎寻常地张开双臂，准备拥抱，也许感到这种动作过分了，便停了一秒钟，改用双手握着维特克的手，非常热情地说：“哎呀，你真年轻，真漂亮，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吗，我非常非常高兴会见你，你从老远跑到中国来，我不见，就有人说我骄傲了，是不是，”

维特克睁着美丽的眼睛，带着微笑，受宠若惊得不知所措。但她迅速镇定自己，用天真的语调、轻微而有点颤抖的声音回答：“见到你，江青夫人，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感动，到中国来而不见你，那么我还算采中国吗？今天是我最高兴的日子。”在场的记者，咔嚓咔嚓按快门，一阵耀眼的闪光灯过去了，谈话牙始。

江青：“你不是想了解我吗？关于我个人的历史，我的革命斗争史；我都可以对你谈。唔，还有不少罗曼蒂克舶意思哩。今天我就可以给你谈一些，你在中国还要住些天吧，以后有机会还可以谈，很有意思，你会有兴趣扩”

江青一面哈哈笑，一面愉快地滔滔不绝。她的声音本来有些沙哑，但拿着腔说起话来，使人觉得甜蜜蜜的。我来人民大会堂前，根本不知道她们要谈什么内容，只说是礼节性会见。我望望友协老丁她们，只见她们面目发呆，直直地坐在沙发上，坐姿像是很不舒服，但又不敢挪动。

姚文元坐在江青身旁，脸向江青那边歪着，时时微笑，泰然自若。

维特克立刻把握住时机，微笑着，也用娇滴滴的声音说：“我太高兴了，我太感激了。我非常愿意知道你个人的历史，因为你个人的历史，和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分不开的。我这样说不会错吧。”

江青微微颌首，表示赞许。她已经感到面前这个美国人很聪明，说话很讨人喜欢，或者真是个可用之材。

维特克接着说：“前两天我听了邓颖超、康克清等前辈的讲话，深受教益。与你的谈话，一定更有意义。”

江青：“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江青已经耐不住要吐露自己的心思了。

“我听说，你回去以后准备写一本书，那么你到中国来必须了解全面情况，才能写一本有关中国的书，是吗？”维特克一时不知所措，因为她从未对一个中国人说过要写书，只是想搜集点材料而已。友协的丁、陈两位，也显出十分惊讶的神色。她们从未向任何领导人汇报过维特克要写书。

听江青这么一问，维特克还猜不透她的用意，迟疑了片刻，接着说：“如果我有足够的材料，能够写一本书，对我是最高的向往，我将会尽力去做的。”

江青：“很好啊，我们也希望有一本由美国人写的书，使中国的事情让更多的美国人知道，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江青虽是嘻哈笑着，却是十分认真地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 30 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我坐在一旁，直到此时，才如梦初醒：江青之所以一定要见维特克，原来如此。我看看周围的人，个个目瞪口呆。只有姚文元藏而不露，像是早已知道。

维特克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冲击，很难立刻作出合适的反应，讷讷地说：“江青夫人，那我请求，你所谈的，我都记录（其实她一直在记），因为太重要了。我不可能全部记在心里。”

江青：“当然可以记，什么都可以记，但也可以不记，你看我这里有翻译，还有速记，我让她们把我们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然后一起送给你，供你使用。”

维特克：“那太好了，江青夫人，我应该如何感谢你才好呢，”

江青：“不用感谢，只要你把书写好就行了。好，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一言为定啦。”谈话迅速、愉快地进行着。江青好像回到数十年前一样，非常亲热地对维特克说：“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云鹤，我很喜欢这个名字，是我以前的一个老师给取的，蓝色的云彩，鹤是轻盈的鸟。你知道中国有句成语吗，鹤立鸡群。这就是出众呀，飞翔在天空真是美极了。”江青边说边加有一点演员的表演味道，对此她自己十分得意。“后来为什么要改名字呢？那时我到了上海，找职业。组织上让我去电影厂，有一个导演给我取名蓝平，别人写错了字，才变成蓝苹。哈哈，蓝色的苹果，有新意。我用这个名字当演员，在舞台上也在银幕中……”江青微微仰起头，像是回忆什么，又像是在寻找最恰当的词句。

江青：“我是有艺术经验的。我很下功夫，背台词可不容易了。如果我没有经验；我能把样板戏排得那么好吗，我一样一样地教他们呀。怎么念，怎么做，我都教，我在这方面花了多少心血！唔，对了，今晚我要陪你去看样板戏《红灯记》，我们要到剧场去看。在剧场你会看到观众的情绪，也可以看到普通的中国人民是怎样对待我的，那么多人欢迎呀，真使人感动。”

姚文元坐在近旁，显得沉稳，其实他是在寻找讨好江青的适当时机，这时他插话：“江青同志既是艺术家，又是政治家，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样板戏都是她亲自创作出来的，她的贡献很大，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

江青又挥了挥手，接着说下去：“后来我要革命，要到延安去，我自己取了这个名字。江水也是蓝的，清清的江水。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呀，所以叫江青。哈哈哈哈哈。我最喜欢蓝色，以前我最喜欢穿蓝色的衣服，从月白到藏青，我都爱穿，蓝布旗袍，既朴素又大方……有意思吧，是不是，”

维特克：“江青夫人，非常有趣，我相信这是所有美国人都不知道而又非常愿意知道的。你真是当代中国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可说一窍不通。我真纳闷，这就是中国问题专家吗，当然一两次接触对一个人是难以全面了解的。

大概周总理与江青几天不断的电话商讨没有结果，8月24日半夜，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他的办公室，又召开了一次小型会议。只有接待过维特克的6个人参加。这时维特克已经由江青办公室安排去上海参观样板团，看样板戏，并有专人向她介绍上海“一月风暴”和“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经过。

周总理经过一天忙碌，已显得很疲劳了。他从办公桌边站起来走到我们身旁，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来回踱步，然后停下来对我们说：“对不起，这么晚还把你们叫来，有点急事。刚才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是江青在广州一定要见维特克，明天就把维特克接到广州，陪见翻译还是你们原班人员吧。今晚再商量一下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几个人都认为其实可以不见，我们都和维特克谈过话，她对中国虽有兴趣，但谈不上懂。鼓励她写书，看来行不通。江青让陪同带去了5部有关战争的电影，老陈从上海来电话，说维特克一部都没有看。据说维特克除了对江青个人的历史以外，她表示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周总理此时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不要谈什么战争。你到达广州以后把我的意见立刻转告江青同志，只谈文艺。再见一次就够了。”这是对我说的。然后对

礼宾司的同志说：“维特克女士的签证是 28 日到期。她不是说非要赶回美国开课吗？不要再延期了。”

载着维特克一行人的专机于 8 月 25 日上午 11 点半降落在广州白云机场。

25 日下午 6 时 30 分至 26 日凌晨 3 时 40 分，江青和维特克又进行了一次详谈。

江青：“你好吗，听说你急着要走。”

维特克：“我将 30 日离开中国，自从两星期前见到你以后，对时间的概念已不清楚了，不知今天是星期几，是几号。自从上次谈话以后，我看了一些你亲自培育的戏，也读了剧本又加以研究，我感到好像进入了不同的世界。”

江青：“你只知道一个方面，你总想和我谈文艺，这只是整体的一个方面。你同样板团谈就行了。”

维特克：“有机会同样板团谈谈很重要。他们十分具体地告诉我，在江青同志的领导下如何创造新的英雄人物，这一切具体例子非常重要，可以帮助我了解政治和文艺革命是如何实现的。这对我有很大帮助，是你给我的机会，因此我十分感激你。”

江青：“你是个聪明的人，会了解我在这方面付出了什么劳动，所以这方面不再同你谈了。还是谈谈计划吧。我不了解你，但对你的印象是好的。我读了一个材料，说邓大姐已经见了你。我的飞机已准备起航，但我留下来了。如不见你，显得我骄傲、自满。所以临时组织了戏请你看。晚上回家，我想应该对你尽点义务。我还是起航，在这里休息了三五天，是绝对休息，记忆力有了很大恢复。这以后知道你要写一本斯诺那样的书，我就有点担忧，有点替你着想了。当然也是为了对中国人民负责。你到底想写一本什么书，是本浮光掠影的书还是有分量的书，”

维特克：“我确实希望写本书，描写文化和政治，文化和文化大革命的关系的书。如可能，想写本关于江青同志个人在改造文艺方面所起领导作用的书。过去外界对文化大革命有很大歪曲，他们在各方面都有误解，全然忽视文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也不了解文化大革命在文化方面意味着什么。”

江青：“不仅是文化革命，是一场伟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大革命，总之是一场全面内战。我不是对你说了吗，我为你着想。斯诺比你优越的条件，因为他与毛主席进行了长谈。此外还与周恩来和其他老革命者谈了话。而你呢，最老的是邓颖超同志。邓大姐工作历史长，但工作角度我比她宽。我为你这本书在做钢筋水泥

的基本建设。这段历史可以生动地告诉你,可以使你了解长征和现在。但我不强加于人,你如不喜欢军事,我们就不谈,你愿谈什么就谈什么,你问的其他问题我没有准备,但我们可以漫谈。”

维特克:“你刚才谈的都很重要,至于谈什么和怎么谈,可以让你来决定,军事也好,其他也好。你可以谈延安或上海时期,革命怎么进展的,还有你一生的情况。”

江青:“如果你了解我的历史,那谈起来就长了。我建议先不写我,而写中国革命的书。如有时间再写我。当然你也应该对革命过程中个人所起的作用有所了解,不然我们怎么能保持革命青春,但必须加上革命。”

维特克:“自从来华后,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特别是文艺方面了解得很充分。江青同志的作用在国外受到很大误解,对此我感到很难过,我想在今后的作品中予以纠正。我不是指外国人反对你,而是不了解你,他们不能正确地理解你。因为在国外材料很少。我认为我了解中国,我十分尊重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我感到你个人这方面的情况,应向外国人作出澄清。我愿做些事情,对此予以纠正,我对在外国介绍你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很感兴趣。我把自己当做一张白纸,在这张白纸上可以写任何东西。”

江青:“我在过去起的作用也是很微小的。我是解决了公与私问题的人。我 21 岁就一举成名,但我不要,我要找党。我受到政治迫害,外面受国民党的公开迫害,党内受坏人迫害。我是无名英雄,我甘心做无名英雄。”

维特克:“我相信,江青夫人,你长期参加了中国革命的斗争,你也为此作出过很大的贡献,这些都是我非常想了解的内容,我相信这都是非常有趣的。”

江青:“今晚能否谈解放战争时期,因为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我好长时间想谈,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从此后,江青又陆陆续续与维特克谈了数次,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如不顾事实吹嘘她与毛泽东一起指挥西北战场;大讲她在上海的演员史;批判《武训传》;闲话《红楼梦》等等。

29 日下午 4 时,江青陪伴维特克游兰圃。江青这天穿着乳白色连衣裙,戴着金丝眼镜。随侍她的一群女服务员,一律穿上藏青色裙子,白色上衣。她们手上拿着许多厚纸板,还有各种植物标本,全部高级专业照相器材已摆在一个亭子正中。兰圃里绿树葱郁,一进入这园林就使人有清新舒适的感觉。整个园林布置得很有序,

各色品种的兰花,大大增加,除了全国各地的名贵品种都有外,还引进了欧美国家的兰花。弯弯曲曲的小径错落有致,各色品种的兰花、盆景摆在路的两旁,芳香袭人。

这天整个下午在兰圃,江青完全是个演员了。她走来走去,有的是一路小跑,或者可以说是跳来跳去。总之非常活跃,简直像只蝴蝶。维特克女士举着照相机,为江青拍了各种姿势的照片。我们几个人,跟在后边观察,江青今天是要让维特克看到她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是军事家、政治家,又是艺术家、摄影家,甚至是植物学家。生活多姿多彩。概而言之,一个杰出人物身上应有的全部特长,她一样也不缺少,甚至更多。这些都是江青要对世界宣扬的她的生活。

8月30日晚饭后,江青又一次接见维特克,是维特克听了江青数十小时谈话以后,又提出一些问题,希望江青补充或解答。

在第二天上午,江青为了还要说一些她认为重要的问题,最后一次接见维特克,这是惟一的一次安排在白天的接见,时间是上午10时。

最后维特克说:“在我这一生中,从未在六个星期中学习、了解到这么多东西。对一般文化知识、政治知识和个人了解到这么多。我把你当做老师,在帮助我了解中国方面,江青夫人起了很大作用。我为表示感谢,一定要告诉外界你的领导作用和伟大贡献。”

江青:“我想应该说,你是听得最多的,我从未同外国朋友谈这么多话。”

终于,维特克女士飞回美国去了。

## 周总理与《谈话记录》

周总理的秘书让我去西花厅。

我一直在考虑如何用最短的时间,又要抓住最重要的事情,向周总理汇报得全面些。我知道这样的时间是周总理挤出来的,不可能长。当我走进西花厅时,周总理正在他的办公室批阅文件,见我进来才把花镜拿

下来。他先问我:“你们回来好多天了吧,我没时间找你问问情况。你有什么重要的情况,就先说说吧。”

这一来我倒抓瞎了，什么是最重要的呢，我说：“如果要简单，那还真说不清楚。我们去广州前，总理的交代，我都转达了。但江青同志没有那样做。她和维特克谈了 60 多个小时，什么内容都有。现在还要整理成记录稿，翻成英文，寄给维特克。我们都感到这样做不妥当。所以要向您汇报请示……”我上气不接下气，一连串说下来，倒惹得总理笑起来：“我看你要说的话恐怕不少，别那么急。今天我确实时间不多。今天你先向邓大姐说说吧，江青同志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以后找时间再谈。”他说完朝客厅那边喊邓大姐，我随即走进客厅。

邓大姐见是我，就问道：“你们从广州回来了，想必又是那位维特克女士的事吧。你慢慢说，我来听，恩来太忙了，但江青的事，他还得管。没办法啊。”我和邓大姐很熟，所以谈起话来，也没有什么顾虑，那天下午我和邓大姐谈了整整 3 个小时。因为她也接见过维特克，所以一些情况她是了解的，但她也没有想到江青会这样做。

我说江青见维特克的最主要动机，是为她自己树碑立传，而许多话没有事实根据，胡乱吹牛。比如说到西北战场，她说是她和毛主席共同指挥的，这些传到外国去，不成了大笑话吗，……邓大姐听得比较仔细，不时还问几句。我又告诉邓大姐：“现在江青又要我们整理记录，准备送给维特克。她自己列了 10 个大题目。而在谈话中还常常说，她的谈话记录将来都要经过周总理审查，因为这些都是中央的重大事情。……这些情况我都向外交部领导汇报过了，他们都说他们也管不了。所以这几天我想来想去，还是应该来向周总理汇报。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觉得这些记录稿不能送给维特克女士，这影响确实太坏了。”邓大姐听完后，也表示不能如此，她说将会把这些情况告诉给周总理。目前我们只能照江青说的去做了。过了几天的一个下午，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一个专题性会议。外交部不少同志参加了，我也在座。那天我坐在最后一排一个角落里。会议倒也开得简单，很快结束了。周总理的目光却远远朝着我，并向我招手。我赶过去随周总理进了一间办公室，这就是他在国务院的办公室了。我轻轻坐在周总理对面的小椅子上。周总理说：“那天我实在忙，没有听你的汇报。不过小超同志已经告诉我一些情况，现在你和徐尔维是否还在整理记录呢，”我点点头。

当时我最关心的是那份记录，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

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法影响也不好。”“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周总理在说这些话时，态度凝重，他一直在思考着什么。

“维特克女士当场作了笔记的，而且有关江青同志个人历史部分，我们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她要写文章，材料是足够的。”我见周总理在默默深思，说完后就悄悄地退了出来。

又是一个夜晚，在 10 号楼，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当年 11 月间，维特克女士从美国寄来数幅已经放大的江青彩色生活照片。维特克说她已经写好了一篇报道江青的文章，准备登载在美国《时代》杂志上，封面就用江青的彩色照片。由江青选择其中的一张，并盼赶快把所有记录稿寄去，以便她着手写书。对此，江青兴奋了好一阵子，但以后谁也没有看到《时代》杂志用江青的照片来作封面。

一本又一本的记录整理稿送到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

某日下午，周总理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维特克女士与江青的谈话记录如何处理的问题，把所有参加过接待维特克女士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会议。周总理征求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同志表示，这份记录无需送给维特克女士，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的。而维特克女士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后边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倘若逐一核实，得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而且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周总理当时一言未发。对任何一件事的决定，他都要作仔细思考，并广泛听取意见，尽可能做得完善些。

会议结束前他说：“对这件事情，你们每个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很好。但今天还是决定不了，还需要商量和请示。”又一天晚上，我和徐来到 10 号楼，继续修改记录稿。12 点已过，已经接近完成了。我们到大食堂吃过夜宵后回到江青办公



室,她正在打电话,声音还挺大的:“我的那些个记录,一本一本都给你送去了,怎么不快替我看呀,”

“.....”

江青:“这怎么可以,要讲个国际信誉嘛。我答应过人家,就得给。”她想做什么像是谁也阻止不了似的。

江青又立刻换了腔调:“总理呀,你就替我审查吧,不给维特克,那可不行,唉呀,我看到你桌上堆的那些个文件,我真替你累得慌。不过那些个记录,你还是得替我审查。”

“.....”

“一定要给,我不能失信于人,就得这么办。”江青又变了调,横不讲理。

江青把电话放下,一脸怒色,眼睛都不往我们这边瞧,我们都默默地坐着。

1972年的岁末,周恩来总理又召集了接待维特克女士访问中国的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单的会。周总理只简单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人档案。于是第二天,我和小徐、小俞把所有的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交给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全部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

附注:张颖,1922年生,1937年奔赴延安。1949年后在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工作,1955年调任北京中国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剧本》主编、党组书记。1964年调外交部,1970年后曾任外交部新闻司、西欧司副司长等,1983年以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夫人身份随丈夫章文晋出使美国。

(刘述礼摘自《文史博览》2005年第12期)

“红都女皇”事件的来龙去脉

(转自“红色论坛”)

作者:张颖

来源:《党史博览》2009年第6期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贬低主席,内容下流”?

张颖女士曾先后著有两本回忆录：《风雨往事：维特克采访江青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沧桑文丛”之一，1979 年版）、《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年版），以及在香港凤凰电视台的《口述历史》节目中作了一场关于“《红都女皇》事件”的采访谈话。

由于张颖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如战争年代的中共南方局以及新中国的外交部。在外交部时，她一曾任外交部新闻司、西欧司副司长，她还是周恩来手下著名外交人士章文晋的夫人，并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随同章文晋赴美履新），遂能够以事件见证人的身份披露和辨析一些历史疑案，例如当年曾闹得沸沸扬扬的所谓“《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

据张颖在两本书中叙述，她记忆中的“《红都女皇》事件”和“维特克事件”跟一些相关的传闻可以说是大相径庭。她的这些回忆，可以有助于我们澄清一些相关的历史疑惑。

《红都女皇》一书与维特克夫人所著《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传闻中的“《红都女皇》事件”，起始于 1972 年 8 月。当时有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中国，成员中有一位在纽约州立宾翰顿大学教授中国现代史的副教授，名叫洛克珊·维特克，要求在中国会见江青。江青闻讯后很感兴趣，随即会见了她，并在会见中希望维特克夫人能写一本关于自己的书，以便把自己介绍给美国人民，维特克夫人欣然应允。此后，江青还带着许多助手，先是在北京，后来又来到广州，与维特克夫人多次长谈，谈话的时间累计长达 60 多个小时。

维特克夫人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了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但因等待中方交给自己谈话的英译稿，所以并没有立即动笔写书。1976 年 10 月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维特克夫人估计这份英译稿不会再给她了，于是找出当年自己的速记稿，整理成一本书。这本书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一说是 1977 年）才用英文在美国出版，名为《江青同志》。

据笔者所知，这本书的中译本直到 2006 年才由一个叫范思的人翻译过来，并由香港星克尔出版社出版。另据看到过此书的人说，此书的书名是《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书中的标题和内容则是：江青“早期生活的开始”、“从上海到延

安”、“五十年代北京与莫斯科”、“登上政治舞台——文化大革命”、“成为中国艺坛的霸主”，以及江青的“生活年表”。

在“文革”尘埃落定之后，如今人们已对过往的历史烟云失去了好奇心，何况有关江青的书籍也早已数不胜数，已经不能再吊起读者的胃口，所以，这本《红都女皇——江青同志》似乎就冷清了许多。

1975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被提起，并且越闹越离奇。其实，《红都女皇》与《江青同志》或《红都女皇——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很多人错把两本书误认为是一本书。张颖说：“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事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

由于维特克夫人的汉语听写水平不高，当时江青的讲话主要靠王海容和唐闻生来翻译，并且只能拣重要的同步译出，维特克夫人用英文记录下来的则只是一个大概。谈话结束之后，维特克夫人要求江青让有关人员按全部录音整理出一份全稿，并译成英文，交给她。江青爽快地答应了。

结束了在广州的谈话返回北京之后，当时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全体人员分工整理了几个月，终于完成了中文整理稿，并打印了10份。随后不知什么原因，上级突然决定不再将之译成英文，并将10份中文打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

到了1975年，当时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盛传有所谓《红都女皇》一书，闹到后来，甚至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传说毛泽东看了这本书后大发脾气，严厉批评了江青，江青也就因而“失宠”，等等。

当年，由于持续时间长和破坏性大的“文革”已经造成了共和国历史上最为激烈的动荡，人们普遍对一些“文革”人物产生了厌恶和憎恨。恰好这期间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江青等人，乃至出现了一个专用名词——“四人帮”，而《红都女皇》一书是吹捧江青的，人们获知毛泽东讨厌这本书，正好可以利用此事来宣泄不满。其实，毛泽东当时厌恶、反感江青，是出于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违背了原则和自己的意愿，以及江青身上的某种“资产阶级作风”，而绝不会仅仅是因为一本《红都女皇》。

江青曾请伊文思、韩素音或拍或写关于自己的传记，但都遭到了婉拒，见到维特克夫人后，立传的想法油然而生

再回过头来说当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会谈的经过。据张颖回忆，经过是这样的：1972 年中美关系发生转折后，维特克夫人提出访华要求。由于她曾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因而被认为是对中国友好、也对中国革命有所了解的人士。于是，经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推荐，中国对外友协邀请她于 1972 年 7 月 19 日至 9 月 1 日赴中国访问，目的是满足她“了解中国妇女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她们的贡献”。当时，中国驻外机构还建议她采访一些“最近被提拔到中央的妇女同志”。

维特克夫人到北京之后，邓颖超、康克清等接见了她，并对她谈了有关中国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等问题。当时在中国对外友协的接待计划中，本来没有安排她会见江青。按照当时的惯例，江青的工作与外事无关，一般不安排她单独接见外宾。不过，经维特克夫人的一再要求，中国对外友协请示周恩来，让他决定是否同意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

对此，周恩来于 8 月 10 日批示说：“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江青见到周恩来的批示后，便立刻决定于 8 月 12 日下午 3 点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接见维特克夫人，陪同人员有姚文元（主管意识形态方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海容（外交部部长助理）、张颖（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以及丁雪松。当时，本来是由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周秋野出面接待，但因周秋野有事，遂由张颖替代，恰好张颖与江青在延安时都在鲁艺，彼此认识。

就在这次谈话中，江青强烈地流露出要让对方为自己写传的愿望。显然，她是把对方视为当年在延安时的美国记者斯诺。斯诺当年采访了毛泽东等一批中国革命的领导人，撰写了一部风靡一时的《西行漫记》，在历史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江青当年谈话的若干内容被保留了下来，如江青说：“邓颖超、康克清都是老革命了，但她们都是搞妇女工作的，只能对你谈妇女运动。我可是不一样，我的面要宽得多。我可以给你谈战争，谈军事，谈政治，谈经济、艺术，还有文化大革命。”以及她自己的“不少的罗漫蒂克”的故事。关于这一切，江青又说：“我们合作吧。我提供材料，我给你说，你来写。我想你一定知道，美国以前有一位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他在 30 年代写过毛泽东，写中国共产党，在西方一举成

名。你很年轻，很有才华。你写我，写现代的中国，那就是第二个斯诺，你将举世闻名。”

据张颖回忆：此前江青曾请伊文思、韩素音或拍或写关于自己的传记，但都遭到了婉拒，此时她见到了维特克夫人，立传的想法油然而生。

江青在谈话中还说：“我跟随毛主席在西北战场作过战，我可以生动地介绍这段历史，不会枯燥的。不仅为你的书，也是为中国党、中国军队、中国人民。我好长时间想谈，你来了成了一个动力。”谈话完毕，江青邀请维特克夫人在北京人民剧场观看了《红灯记》。之后，江青又陆陆续续与维特克夫人谈了几次，并约定在广州继续谈。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是否有不妥的内容，抑或是否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呢在“文革”后期，有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即所谓“政治谣言”往往不胫而走。具体到“《红都女皇》事件”，很多人借它来表示对江青等人的不满，并由此揣测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内部分歧与斗争，以至于有追查“政治谣言”的举动。至于说当时有人据此指责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夫人合作，让这本书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如今看来，却并非事实，真的不过是谣言而已。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要说有不妥的内容可以，但说她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则言过其实。其实，当初一些参加谈话的中方接待人员(如张颖等)，之所以很快就对江青谈话的内容表示出惊讶和不满，甚至马上反映给周恩来，主要是因为江青在谈话中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婚姻和家庭，这些也可以称为是领袖的隐私。张颖回忆，那时她“深感惊讶，本能地感到不妥”，“至于对其他内容并没有在意，更没有什么觉察到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一说”。

“文革”结束后，1976年10月12日，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历数江青的罪状，也提到了她与维特克夫人的讲话，说江青“贬低主席，内容下流”。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

为了挽回影响，当时有关方面的措施，主要就是索回记录稿。华国锋在那次讲话中回忆说：记录稿，“‘四人帮’逼着外交部交出，特别是王洪文主持工作，他亲自写信，找乔冠华把材料要回来。后来中央决定，我们花多少钱也要把这本书的版权买回来”。

这又涉及到了那本名为《红都女皇》的书了。张颖则回忆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虽然很不得体，影响很坏，不过，因为记录稿没有流传出去，并未立即产生风波。只是后来《红都女皇》的出版，这才成为导火线，讲话和书被联系起来，以至让毛泽东震怒”，等等。此后，“可能在很小的范围，比如毛、周、江之间，有过内部处理”。

这就是“《红都女皇》事件”发生后，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当时中央处理这一事件的过程，至于更加具体的所谓“内部处理”的内容，我们现在依然所知甚微。

至于江青谈话中的不妥方面，甚至是机密的内容，大概就是江青还讲了贺子珍的一些话，如说毛泽东同她的分离是“她要求离婚的”，“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贺“非常固执，她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等等。关于她自己，江青也说了一些自己从前的绯闻。此外，就是说了关于批判《武训传》，乃至闲话《红楼梦》等。上述内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然是不妥的，至于是否构成了机密，恐怕还谈不到。

后来在追查谣言中，曾问那位香港女作家写《红都女皇》的资料是从何而来。从张颖提供的情况看，可以排除掉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工作人员泄露的可能性。现在有人联想：这或许是当时江青的对手所为，即他们借此向江青发难，以及借毛泽东之威打压江青的嚣张气焰。

那么，对手会是谁呢？有人认为是周恩来，以及因“九一三”事件受到重挫的“军人派”。如黄永胜在 1980 年庭审后还咒骂江青是“大流氓”。或许因此会有人向香港有关人士透露江青在 1969 年 5 月 17 日一次讲话的内容，并指使人写下这本《红都女皇》。

“九一三”事件后，在吴法宪的交代材料中记录了江青在 1969 年 5 月 17 日晚的谈话，那是江青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钓鱼台江青住处的一次谈话。当时江青从自己的出身谈起，说自己从延安时代就一直是毛泽东的革命助手，并且“肆无忌惮披露了毛泽东延安时期和解放后婚姻家庭方面的隐私”。其中的细节，大大超过了后来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内容。

当然，以上皆是揣测，或许也不妨被认为是当年追查“政治谣言”的一个背景说明，至于它与历史事实相去的远近，则非笔者所能判定，故存而不论。

说到当年相关的追查谣言，其背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有关方面的指示，从 1972 年开始重新印刷和发行了一批古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等，一时在社会上掀起了热读“四大名著”的高潮。同时，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的讲话等也在广泛流传。据张颖回忆：到 1974 年，因江青在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中提到过《红楼梦》的内容，于是，被人从秘档中抄写了出来(后来还被人印成油印稿扩散)。恰好这时正是“《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江青得知后，立刻要人收回有关《红楼梦》的讲话，怕将两码事搞混了，授人以柄。于是，遂有在社会上追查的举措。

正当周恩来受到批判时，“维特克事件”发生了

1972 年 8 月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以及 1975 年发生“《红都女皇》事件”，正是“文革”后期中央两种势力激烈角逐的关键时刻，其中周恩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在受到极大震惊和挫折之余，在内外方针政策方面开始有所调整，如对“二月逆流”有了重新评判，出席陈毅遗体告别仪式，认为邓小平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以及推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外交实践中实施“拉美打苏”，等等。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开始布置“批林整风”。与此同时，中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两件事，周恩来皆倾全力为之。

由于周恩来试图在“九一三”事件之后纠“左”，因而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和警觉，使其批判极左思潮的努力受到限制和压制。1973 年 7 月，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提出严厉的批评。11 月，在毛泽东指示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犯有错误的意见。

随即，江青等人开始猛烈抨击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开始围攻周恩来、叶剑英，并别有用心地称这是所谓中共历史上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被迫违心地作了检查，而此前那桩所谓“伍豪事件”也又一次被人别有用心地提了出来。就在这中间，发生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的事件(即“维特克事件”)。

那么，主持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当时是如何处理这一事件的呢?或者，是否有所谓“周恩来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的内幕”呢?

众所周知，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很不平常，尤其到了毛泽东的晚年，他对江青十分不满，甚至是讨厌。就在“维特克事件”之前的1972年1月，毛泽东一度病危，江青则干预治疗，动辄以吵闹相要挟，引起毛泽东的愤怒，甚至愤而拒药。周恩来则竭尽全力，在中间做说服工作。此后，江青在“护士事件”（是她自己服用安眠药过量）中又拼命撒泼，周恩来为之疏通、抚平，后又亲自安排了江青会见维特克夫人，但江青却对周恩来安排中的限制（“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谈其他”）表示极为不满。

此后，由于江青在谈话内容中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与会的张颖等私底下认为：江青的谈话有问题，所谈内容严重出格。如不顾事实吹嘘她与毛泽东一起指挥西北战场，大讲她在上海的演员史，谈话时间过长。随即，她们立即汇报给了外交部领导，但外交部领导对此无能为力，最后只能由周恩来出面来解决。

8月17日、19日、24日，周恩来连续三次召集陪同人员开会，但最终也没有找到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周恩来只是要张颖等人让江青约束话题（限于文艺，如说到20世纪30年代，多谈鲁迅。周恩来还让张颖带去一本线装本的《鲁迅诗集》作为参考），按期结束，谈一次等。但当时江青正在兴头上，没有听周恩来的，相反还对周恩来的掣肘深感不悦。当张颖将周恩来捎来的《鲁迅诗集》交给江青时，她竟愤然将之摔到地上。随后，江青派专机接维特克夫人到了广州，两人继续交谈，两地的谈话总计达6次，60余小时，话题仍然改变。最后，江青还要求翻译、接待人员把全部录音整理成文字送给对方，为其写作提供材料。

周恩来处理“维特克事件”是谨慎和克制的，也是经过毛泽东授意的。据张颖回忆，她当时曾将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面呈周恩来。张颖说：当时，我最关心的是那份记录，便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周总理，我认为这些谈话记录，最好不要送给维特克。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参加会见的几个同志都这样认为。江青同志的谈话，内容很庞杂，且有许多不恰当之处，有些谈话影响也不好。”周恩来则问：“你们大家都这样认为吗？可是江青同志亲口答应维特克女士了，不给不好吧？”

张颖回忆：“周总理在说这些话时，态度凝重，一直在思考着什么。在十号楼，送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那两份铅印的记录稿，一字未改退了回来，只在第一页上各写了‘已阅’两个字。周总理那一份也退回来了，上面写了一行字，大意是，



与事实不符之处作了些补充，错字都已经改过。我心想，周总理看过的，连错字都改了，而张春桥和姚文元则无一字修改，这两人是既不愿意得罪江青，又不愿负责，把责任都推给周总理一个人了。”

此后，周恩来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处理维特克夫人与江青的谈话记录的问题。他把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都请来参加会议，并征求了每个人的意见。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份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夫人，因为她本人当场作了记录，而维特克夫人只表示要给江青个人写传记。有关江青个人的家庭情况、经历，事先已经给维特克提供过一份详细材料，而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涉及到各方面的情况利问题，倘若逐一核实，要耗费许多时间和人力，况且在江青谈话的内容中，有许多是不宜公开发表的。对此，周恩来又表示出了与此前相同的沉默。

张颖回忆说：为此，周恩来与江青通电话，周恩来说：“关于你个人历史部分，已经送给维特克女士了。最近送来这些，过于庞杂，涉及面很广，一时也难于核对，是否可以不给或少给呢？”江青说：“这怎么可以，这里要讲个国际信誉嘛。”总之，维特克夫人离开中国时，她没有能得到江青曾许诺过的那份讲话记录。她只是带着江青赠给她的“江上有奇峰”的诗句，以及几大箱礼品——包括清版的《二十四史》，满载而归了。

到 1972 年岁末，周恩来再次召集参与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开会。他在会上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第二天，张颖等将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记录，交给了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则全部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并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收藏。

此后，在追查“政治谣言”的风波中，江青把这一记录稿在钓鱼台进行了销毁。好在当时广州方面还保留有一份，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记录遂得以保存下来。

由此可见，周恩来处理“维特克事件”是谨慎和克制的，也是经过毛泽东授意的，他不可能会借此去“策划离间毛泽东与江青”，熟知周恩来的人都不可能会相信这种猜测。

当然，后来的“《红都女皇》事件”之所以会发生，是江青自我膨胀、飞扬跋扈的结果，正如周恩来在 1973 年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江青等诬蔑是要“迫不及待”取代毛泽东，毛泽东对她的批评：不是周恩来“迫不及待”，而是你江青“迫不及待”。香港出版的《红都女皇》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青的野心，于是人们借此抨击、搞臭江青，也就可以理解了。

毛泽东对江青有过“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样的批示吗

《红都女皇》出版后，据说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就报告给了中央，中央有关领导在审读后认为此书的内容与江青 1972 年 8 月同维特克夫人的谈话内容一致，于是断定此书即维特克夫人著作的中文版，随即呈报给毛泽东（一说是经由邓小平，一说是经由汪东兴）。毛泽东阅后批示道：“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这件事，在 1975 年流传甚广，当然，更是大快人心。

又据范硕著《叶剑英在非常时期》一书记载：《红都女皇》出版后，中央命令我外交人员不惜重金，买下版权，并将书火速送回国内，上呈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大怒，遂写下那条批示。至于后来为什么没有照此处理江青，是周恩来认为毛泽东不过是在气头上，其实并不是真心要处理江青，于是对毛泽东的批示予以“暂缓执行”，最后不了了之。

这件事的真伪，在没有相关的档案可以证明的前提下，至今难以有定论，而许多严肃的史学家对此也都存有疑问。许多“文革”史书都没有记载 1975 年的“《红都女皇》事件”。《建国以来毛泽东重要文稿》的最后一册即第 13 册则根本没有收录这一“批示”；由权威方面编撰的《毛泽东年谱》至今还没有出版 1949 年至 1976 年的部分，遂也无从核实；而在《周恩来年谱》中，则根本没有提及此事。因此，有人以为当年毛泽东对《红都女皇》的批评，其实并不存在，认为那不过是善良的人们编造出来的美丽的谎言而已。

其实，毛泽东和江青这一对夫妻，也未必如许多文章所说的到了后来几乎形如陌路。据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一文中所述，虽然毛泽东和江青从 1966 年 9 月始就分开居住（毛住中南海游泳池，江住钓鱼台），但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后来毛泽东虽然对江青越来越不满，“但由于种种原因，毛

泽东不可能同江青决裂”。或者说，毛泽东日益增长的对江青的反感，也仅仅是表现在尽可能不见或少见她而已。

张玉凤回忆：毛泽东与江青相见的次数，1970年、1971年这两年还很多；1972年开始减少，即在毛泽东因江青而多次发过脾气之后，规定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到了1973年，江青只得“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

《建国以来毛泽东重要文稿》收录了一些1973年、1974年毛泽东晚年写给江青的信，将之与那一相传的“批示”对照，应该可以显示出所谓的“批示”是可疑的，或者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1973年11月25日，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周恩来之后不久，毛泽东在一封署名为“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的来信上作了批示。来信中认为“一切为样板戏让路”的口号以及吹捧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等是不恰当的，并且批评江青民主作风差，把文艺强调得过分，以及在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等。对此，毛泽东批示道：“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1974年2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2月6日来信的信封上作了一个批示。当时江青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给她的一封信以及反映“批林批孔”问题的材料转送给毛泽东，请求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批示道：“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从话中可知，当时毛泽东不愿见江青。

3月20日，毛泽东写给江青一封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3月27日，毛泽东又给江青一封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当时，经毛泽东提议，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将率中国代表团去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对此，江青提出了反对意见，甚至大闹政治局。毛泽东嘱咐江青不要反对他的提议，抑制了她的过分举动。

4月1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了两封回信。信中分别说：

“江青：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江青：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

显然，毛泽东对江青仍然是关怀的，在江青有落魄之感后，教诲她“风物长宜(放)眼量”、“无限风光在险峰”，而且情见乎词，大不似一棍子打死。

6月24日，毛泽东在江青23日给自己的信上批示道：“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江青则在信中汇报了她自6月17日到天津之后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和访问宝坻县小靳庄大队的一些情况，信中还说：“我看了胜利油田后即回北京”，“如果能多给我些天当然更好”等。此后，江青又在10月19日给毛泽东写信。翌日，毛泽东在回信中说：“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当时，围绕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周恩来与“四人帮”有一场较量，毛泽东则在提出“四人帮”这一称谓之后，多次批评了江青。

11月19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

11月20日，毛泽东回信说：“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就在“《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周恩来阅读了《旧唐书》、《新唐书》中的武则天传

毛泽东晚年对江青，就是这样有抑有扬，有时是先抑后扬，有时则是先扬后抑。1974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与周恩来等谈话，其中说到江青“有野心”，并劝其“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但同时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这就是毛泽东对待江青的主要态度。显然，尽管毛泽东和江青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毛泽东也看不惯江青的许多做法，但他们毕竟是夫妻，毛泽东给江青信中的话语是温存的，也是与人为善的。因而，

如果依此来揣度那一“批示”，要么是没有的事，要么真的如传说中的周恩来所料，“不过是在气头上”，说说而已。

1975年，当“《红都女皇》事件”发生时，周恩来已沉疴难起。“四人帮”借毛泽东过去所讲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来对付周恩来和邓小平，终于引发了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等对他们的反击，最终江青被迫作出检讨。会后，王洪文向毛泽东诬告：这是叶、邓说出了“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其目的则是当时毛泽东最为警觉的“翻案”。不过，毛泽东在随后的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最后一次出席)对江青等继续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著名的“三要三不要”(“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6月，江青再度被迫作出检讨，周恩来对此则表示欢迎。此后“《红都女皇》事件”闹得沸沸扬扬。7月，周恩来阅读了《旧唐书》、《新唐书》中的武则天传。随即，又发生了电影《创业》、毛泽东批评清华大学刘冰等联名上书揭发迟群和谢静宜、批《水浒》等一连串不平常的事件。

周恩来临终前，显然已经觉察到：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所谓“矛头所指，是很清楚的”。在弥留之际，他向邓颖超表示：“心里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出来。”最后一个问题是，《红都女皇》究竟是哪位女华人写的，笔者至今茫然，希望知情者不吝告知。

2012年4月23日修改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九册（1）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九章 召开十大

##### 第一节 一九七三年的新形势新任务

###### 本节资料

###### 文献资料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  
《新年献词》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满怀革命豪情，跨进了一九七三年。  
在新年到来的时候，我们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贡献的广大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致以革命的敬礼！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亲切的问候！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和各国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人民在政治思想战线、经济战线和外交战线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

批修整风运动在全国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保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广大干部和群众攻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开展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革命大批判，进一步清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戳穿了他们的谣言和诡辩，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新的成果。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进一步发扬。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了新的提高。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锻炼，更加发展壮大。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更加坚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在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推动下,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新的成就。亿万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依靠集体力量,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以顽强的斗志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夺得了好收成。工业生产继续上升,质量提高,品种增加,钢、煤、原油、化肥、电力、交通运输等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财政贸易情况良好,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改善。教育革命继续发展。科学技术、医药卫生取得了新的成就。群众性的文艺创作和体育活动广泛开展。无产阶级的新生事物在各条战线蓬勃兴起,茁壮成长。(1)(2)

我国政府和人民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我国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革命友谊继续增进,同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广泛,我们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促进世界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那些千方百计破坏这场大革命的牛鬼蛇神,那些做梦也想着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已经遭到了历史的无情嘲笑。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胜利了,不要忘乎所以。过去军队打仗,打了胜仗就要总结经验,提出新的任务,继续前进。毛主席还指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搞好批修整风,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沿着党的“九大”路线继续前进。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把批修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批修整风,首先是批修,其次才是整风。各级党委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刘少奇一类骗子,牢牢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搞修正主义,不搞马克思主义;搞分裂,不搞团结;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他们叛党叛国,成了叛徒卖国贼。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

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反革命。这就是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实质，进行深入的批判。全党同志，要坚持不懈地认真看书学习。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下苦功夫学好中央规定的几本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只有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才能识破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伪装，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那些修正主义谬论批深批透，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在批修整风中，要认真汲取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纠正不正之风。要警惕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修整风搞好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必将进一步加强，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会继续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我们要充分看到广大群众在批修整风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制订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要充分发动群众。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只要我们真正地依靠群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我们就一定能够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较快地前进。为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要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要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搞好农业，加强农业。农业战线要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做到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业战线要抓紧基础工业，加快原料、材料、燃料、电力工业的步伐，促进钢铁和整个工业的发展。要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依靠工人群众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坚定地把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继续进行下去，使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更加繁荣，更好地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人民解放军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努力提高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各条战线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在执行各项具体工



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牢牢记住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科学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主要矛盾，才不至于迷失方向，才能做好工作。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各条战线夺取新胜利的重要保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一个地区，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这是我们党的传统。各级党委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党委内部，要搞“群言堂”，反对“一言堂”，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好“一班人”的团结。基层党组织要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工会、共青团、红卫兵、红小兵、贫下中农组织、妇女组织，应当经过整顿逐步健全起来。各级领导机构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注意发挥老干部的作用，注意培养新干部，特别是要注意从工人中、从妇女中、从少数民族中培养干部，并努力帮助在职干部更快地提高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不管老干部、新干部，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都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当前国际形势一片大好。整个世界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中改变着面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深入发展。中、小国家更广泛地联合起来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苏修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进一步暴露出它的社会帝国主义面目。不论苏修、美帝玩弄多少阴谋诡计，都不能阻止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进一步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最近，美帝国主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袭击。对帝国主义的这一侵略行径，中国人民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谴责。如果美国政府不立即停止轰炸，不签署“关于结束战争、恢复越南和平的协定”，坚持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

争。中国人民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援老挝人民和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我们深信，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印度支那三国人民。

在欢度新年的时候，我们对台湾省的骨肉同胞表示深切的关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对港澳同胞表示怀念。我们对海外侨胞致以问候，祝愿他们为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更多的贡献。

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元旦社论）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一定要把“五·七”干校办好》

“五·七”干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革命新生事物。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茁壮成长，日益完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干部学校。

中央机关最近召开“五·七”干校工作会议，总结交流了经验，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办好干校的问题。各地党委也应当关心“五·七”干校，加强对“五·七”干校的领导。

伟大领袖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马列主义的党要注意抓上层建筑，注意抓路线。对干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搞好干部思想革命化和机关革命化，是贯彻执行毛主席这个教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干部教育工作做好了，才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才能使上层建筑的这一个方面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各级党委务必十分重视。如何培养教育干部，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一类骗子在干部教育方面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曾经毒害了一部分干部，使他们在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这一教训，应当永远记取。要做好干部教育工作，必须清除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教育路线。

“五·七”干校是在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基础上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教育路线培养教育干部的一种好形式。在“五·七”干校里，既能结合现实斗争认真看书学习，又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集

体生产劳动，还可以插队锻炼，做社会调查，从事群众工作，向工农兵学习。这样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比较全面地落实了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有关干部教育的指示，比较全面地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党在干部教育方面的革命传统。四年多的实践表明，通过“五·七”干校教育干部，可以使干部受到生动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受到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等革命传统教育，有利于把广大干部培养成有路线斗争觉悟的，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

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了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好干部教育工作，我们一定要把“五·七”干校长期办下去，切实把它办好。

在当前的批修整风运动中，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应当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等有关指示，结合狠批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批判他们在干部教育方面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深入批判他们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反对干部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反对干部与工农相结合的种种谬论，以及他们攻击和破坏“五·七”干校的罪行。通过革命大批判，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更加坚决地办好“五·七”干校，更加坚定地走“五·七”道路。

“五·七”干校要坚持正确的办校方向，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干校工作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紧密为现实斗争服务。要把“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放在首位，组织学员围绕批修整风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还可以学习一点历史。要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实行开门办校和勤俭办校，把参加生产劳动和插队锻炼作为重要课程。遵照毛主席关于“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教导，干校各项活动都要着眼于改造世界观，提高学员的路线斗争觉悟。干校工作人员都要热爱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带头搞好思想革命化，自觉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干校。

各级党委要把办好“五·七”干校，作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应当把“五·七”干校的工作经常列入党委议事日程，首先从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加强领导。要组织好干部轮训工作，做好规划，形成制度，由领导干部带头，轮流进“五·七”干校学习、锻炼。应

当为干校配备坚强的领导班子。对于干校的工作人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关心他们，为他们完成教学任务创造必要的条件。要教育各行各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支持和爱护“五·七”干校，做“五·七”干校的促进派。还要为长期办好干校采取必要的实际措施，切实解决有关干校体制、配备理论干部，以及物资供应和图书供应等问题。这样做，“五·七”干校就会越办越好，就能在培养无产阶级干部队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一日，社论）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办好民兵》毛主席在十五年前指出：“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又说，民兵“是军事组织，又是劳动组织，又是教育组织，又是体育组织”。毛主席这一教导，指明了办好民兵对于保卫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大意义，指引我国民兵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大办民兵，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战争年代里，广大民兵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巩固后方，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功勋。全国胜利以来，民兵在保卫海边防的斗争和粉碎帝修反武装侵犯的作战中，又立下了新功。今后，不管武器和技术怎样发展，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还是人。民兵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只要我们实行全民皆兵，进行人民战争，就可以使敢于来犯的敌人寸步难行。这正是帝国主义所最害怕的。

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民兵队伍，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支重要力量。实践证明，民兵在进行思想、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在镇压国内反动阶级、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等方面，都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他们在劳动生产中是一支突击队，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当前，国内外形势大好。党的十大号召我们，要遵循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坚持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

侵略战争，特别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为了更好地实现十大提出的战斗任务，加强战备，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应当共同努力，进一步把民兵办好。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民兵建设上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办好民兵，关键是要把路线搞对。我们必须继续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民兵制度、破坏民兵建设的罪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路线为纲，搞好民兵工作的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和军事落实。

要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特别是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锻炼、改造和建设民兵。只有这样，才能使民兵成为一支有高度政治觉悟、有战斗力、有生命力的队伍。当前，要继续发动民兵参加批林整风，在斗争中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要有计划地让民兵参加社会上的各种阶级斗争，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在内。要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民兵执行巡逻站岗、战备值勤等任务。民兵要按照劳武结合的原则，加强军政训练，提高战斗力。在平时经常得到锻炼，战时就能显示出强大威力。

全党抓军事，党管武装，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民兵工作只有更好地置于党的一元化领导之下，才能使民兵组织保持无产阶级的性质，使各项任务和民兵活动得到妥善安排，使民兵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对民兵的领导。省军区、军分区和各级人民武装部门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民兵工作上。陆、海、空军各部队要积极做好民兵工作。工、农、妇、青等革命群众组织都要关心和支持民兵建设。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是全国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办好城市民兵，武装工人阶级，对于建设和保卫城市有重要意义，应当十分重视。城市民兵要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要适应城市特点把民兵更好地组织起来。要根据未来城市作战的要求落实各项战备措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城市民兵建设有许多新鲜经验，是很宝贵的，需要好好学习和总结。

我们还要加强海边防地区的民兵建设。要重视发挥妇女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民兵中的作用。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我国民兵战线呈现出一片崭新的面貌。我们相信，在十大精神鼓舞下，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的指示，民兵建设一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社论）

一九七三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  
《认真学习继续前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周年》

在团结胜利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鼓舞下，我国各族人民满怀革命豪情，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四周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全国各族人民热烈欢呼十大召开，认真学习十大文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愤怒声讨林彪反党集团，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我们伟大的祖国，到处呈现着团结战斗、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

十大通过的各项文件，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战斗纲领。学好十大文件，并结合学习马、列和毛主席有关著作，才能充分认识国内外大好形势，深刻领会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明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任务。我们要继续抓紧干部和群众的学习，为完成十大提出的各项任务而奋斗。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十大强调要特别重视九大再次肯定的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强调要继续执行九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号召。毛主席制订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九大号召团结起来，就是为了实现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团结全国

广大人民群众，争取更大胜利。十大充分肯定九大路线是正确的，并着重总结了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号召我们坚持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因此，十大路线是九大路线的继续。学习十大文件，要抓住路线这个纲。讲路线，要讲基本路线。我们同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叛徒集团和林彪反党集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围绕着坚持或者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的斗争，并不因此结束，以后还会长期进行下去。我们对党的基本路线，要经常学，反复学，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1)(2)）

学习十大文件，要抓住重点。我们要学习十大对时代和形势的分析，充分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伟大胜利，弄清列宁分析过的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在今天的表现，看到当前国际形势特点是天下大乱，进一步理解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采取的措施，增强战备观念，警惕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是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的教导，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积极地正确地进行斗争。要学习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领会培养千百万革命接班人这一战略措施的深远意义，为革命新生力量的成长创造条件。要学习加强党的建设的问题，认识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提高党委抓大事的自觉性；必须重视上层建筑，热情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认识依靠群众是我们的一条基本经验，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爱护群众的积极性。所有这些，都是十大文件中反复论述的路线斗争中的重大问题，是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弄清楚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要学深学透。

我们要以十大文件为武器，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批判他的反革命罪行，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向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要掌握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动员广大群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用新的胜利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

十大文件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我们党丰富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九大以来的经验，提到理论的高度，深刻地阐明了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任务和组织原则。我们要开动脑筋，刻苦钻研，全面地、正确地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各级领导班子要带头学好。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指出：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最近，毛主席又再一次指出：要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每期三个月，一年办四期，一面读书，一面参加工作。我们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办好学习十大文件、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的学习班，使学习十大文件成为我们更自觉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推动各条战线斗、批、改的强大动力。

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办好，十分重要。我们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让我们在十大精神指引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鼓足干劲，继续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十月一日，社论）

一九七三年十月五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准备人大，主要贯彻十大精神，十大精神落实，具体化。文件登就是了，没有准备组织学习文章的任务。面广，各方面人都来。

社论强调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各方面爱国人士革命统一战线。政协不同时开。

组织讲成绩的稿子。宪法，71年通过的，删掉些可以了，不象党章重搞，后发下草案，删去讲林彪的话。

组织讲路线、成就、经验的文章。著名人士的文章，有可以，没有也可以，主要把上层建筑抓紧。这次留下中华书局的文章，不是不可以用，听说他们紧张，何必那么紧张，可以评论。

上层建筑方面讲了，要个卫生的，不管那个国家参观，对我们医疗卫生工作为人民服务都赞成。美国人士讲，不管美国有多少技术，我们为人民服务比他们先进。当然如针麻，也有技术，讲成绩，讲路线。

教育文章，请辽宁写也可以。从教改说，还是清华北大可以写一点，他们搞得最早，经验完整，是否可以找他们写一篇总结经验文章的。

北大清华联合批判组谈秦始皇的文章，你们看能否改出？



工农业要搞点应景文章，今年农业丰收，可能超过历史上最高水平，去年（4800 亿斤）比前年（5000 亿斤）减产 4%，今年可能 5150 亿斤，公布 5100 亿斤。基本是增产，四、五个地方减产，超历史水平，是好事，总的是抓批林整风，路线教育，华北主要抓抗旱，抓了路线教育，陈永贵鼓吹农业学大寨，东北气温高了三度，老天帮忙，促进丰收，工农联盟巩固，这是基本因素。

钢，2300 万吨行不行？石油化工快，落后的是煤，不是没有，一个是挖不出，二是还有些问题。公布粮、钢、棉、石油，不公布所有指标，这方面问题不大。人大时间未定，准备着，重点是上层建筑。

赵纪彬写的“孔子诛少正卯”出版，可看一看。赵的问题未作结论，是特邀代表，还是……

文艺，较好剧本发表不少了，不止十个，综合看，已经反映了中国革命各阶段的革命斗争。杜鹃山是写 28 年，红色娘子军写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红灯记、白毛女写抗日战争，智取威虎山、沂蒙颂（比红嫂好，比京剧缩短，还加上美工，写军民关系交错好些）写解放战争，奇袭白虎团是讲抗美援朝，龙江颂、海港是写社会主义时期，一幅中国革命图画，不容易了。打下了基础，能更好前进。最好有人能联系起来，综合写一篇，讲成就、意义，不要长，刻画各个阶级人物，工农兵英雄人物，汉奸卖国贼，武装斗争，沙家浜，还有不拿枪的敌人，联系起来作分析，说明主席路线正确，有历史意义。

学马列，参加学习班只是一段，长远的，还是坚持自学，根本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基本路线，继续革命。广义讲，凡是主张专政的都是法家、主席讲我们也是法家，我们主张专政，不是地主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主席给沙菲谈话，讲林彪骂秦始皇，就是骂专政，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我们要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领导。专政不只是靠自己，有同盟军，农民，知识分子，90%以上的革命人民，对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一分为二，我们反对的是坚持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党内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正确处理内部矛盾，团结大多数是一致的，这次上海一文还是要写上正确处理内部矛盾，团结大多数。马克思讲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主席的人民民主专政，都讲专政，讲如何实行专政，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消灭阶级差别，消灭剥削阶级，最后自己也消灭。学人民民主专政广西写过。有这么

一个思想，可以考虑写，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问题，马列的论述，毛主席继承发展。批判尊儒反法，也是这个问题，看出几千年的基本道理。专政是从反动派学来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积累的稿子可以用，上山下乡一文，分析好，有篇幅可以上去。

（谈到这期亏本问题）。赢余不要上交那么多。

（和曲弦谈）若干地方两派又在出现（如动态清样反映内蒙情况）。搞成一个团结的又是革命的班子不容易。

走后门，人大要整一下。没有接到告红旗的信，人民日报多，一面自己写文章反对，一面犯。你们孩子小。

上期杂志出版时改几处，广东发行部门万分紧张，报告省委，报告丁盛。我们发行部门，总有什么人神经过敏，他猜到什么地方去了，在总理和洪文报告中去猜。有的可以进行歪曲。江西一个省委书记把小道消息当正道，说主席讲四句话“扫清庙宇，请进尊神，老师归位，小兵回营”，召开一个会议，干部通通换了一批。改文章经常有的，新华社每天都有，人民日报印好了，漏了吴岱，重印，工作辛苦。对广东出版单位，说一下，改是为了和国庆社论一致。

评中华书局那本书的一篇，我想，要他们也写一个东西，作为作者之一，也有他们，自己写自己好些，你还可以补充一点，这个主意行不行？（胡：中华那本书中讲孟子的地方也有问题）他们是不严肃的，他们为什么不改就出版？他们有牢骚，说先整出版部门，整不到领导头上。说郭老“十批判书”不批，我们搞一本资料就批，公道不公道？我们和他们合作写行不行？我们提问题、出观点，他们参加的。人家不过是思潮之末，不是始作俑者。批一下说明眼前就有这样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把握不定。主席说办事要谨慎，所以我留下这篇文章。主席看“十批”五遍。人家说“十批”不批，还有冯友兰也不好批。不只是讲孔子，从编哲学史资料问题考虑也可以。

林彪未垮台时，主席讲孔子学术虚伪，孔是私生子，讲非礼勿动，非礼勿言。林彪说孟子和孔子不同，孟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好处，主席摇头。说刘少奇黑修养越养越修。

张世英提出的问题，争论很多。（余：针对任继愈）任坚持老子是唯物论，据说最近有所改变。

书出得多，缺少评论。各方面都有，肯定有值得评论的题目。中华这个题目不放弃，你们想个什么办法。

有人说红旗一登文章，象判刑一样，其实也可以反驳的，我也可以再反驳。马克思著作每出一版都写序言，加注。

（流言）揪出什么人，没有这个事。

（下一段如何结合实际）批孔子是五四时代就搞的问题，开倒车就要抬孔子。

李贽《藏书》讲到秦始皇，他是被整的。

苏星的书，下册题目预告了，用红旗文章的题目。写资本主义部分，没有用最近材料，新华社内部参考反映的，仍讲泰罗制等等。垄断金融资本混合之后，对农业渗透等等，没有多少秘密，他们可能不知道。

评中华那本书的文章，想个办法，他们愿写，也不反对，自己出的书，自己批判可以。和他们谈谈，不要紧张。

“十批”中，主要是资产阶级观点束缚，不但有“人民本位”，也有阶级调和的。剥削阶级代表全民利益，得出这些结论，是资产阶级观点影响。在座的谁看过“十批”？研究方法受资产阶级观点影响，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书应该出，不出不行，二十四史都出，但旧观点不扫清不行，应搞清楚。“十批”说孔子把人当作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阶级上台，都是对另一个阶级推翻，打倒，讲专政，不是当作人。最文明的无产阶级把剥削者改造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劳动者，死不悔改的关起来，杀，多数改造为新人，把资产阶级的人改造为劳动的人。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抽象的人是不存在的，没有什么把人当人的事，这是受资产阶级观点影响。

上海文章对原文（十批中的观点）批了一些，可以这样讲，我们转载时都去掉了，不是说原来讲的不对。关于“仁”字，乌龟壳的材料没有用，其他材料足以说明问题。

书出得多，没有评论，很担心，要破除一下不敢评论的风气。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过去就写过不少书评。

上海出了《王荆公年谱考略》，辩明伪“辩奸论”。上海重写前言。这个可写一篇短评，介绍一下，要同批尊儒反法结合起来，搞一组书评。写二十四史序言，每篇痛骂一通，然后讲资料可用，这种方式不一定好。历史教训，世界观可以分

析，梁书范缜传，摘神灭论，反映唯物唯心，神灭不灭的斗争，梁武帝亲自组织围剿范缜。但序言未作分析。尚有歌谣。这种（写序言的）的办法不一定好。各国历史有没有？

每本书内容可以作分析。

书评可以组织，北京也出不少书。《王荆公年谱考略》可叫上海写一篇。

《十万个为什么》，讲自然辩证法，可以具体评，有影响的。书评搞一组，不一定下期。科教片，“半蓝花生”可以评。打破一下不敢评的空气。

电影，主席讲，为什么不演，可以演，可以批判。

有的开放 18 世纪小说，学生如饥似渴地看，老师又怕了。有的说离开大学看不到了，作笔记。不要抢，也不要骂，也有机会，不是千载难逢。无产阶级不看资产阶级的东西，如何批判它？

上海评《红楼梦》的文章自己发表可以，我未看，他们自定。

上海讲秦王朝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文章，未讲到奴隶的作用，要补充。

《红楼梦》要好好研究一下，好好想想，下决心看一遍。俞平伯作批判资料。

评四本古典小说，李希凡有一篇文章。特别看看评《西游记》一篇如何？你们看看研究一下，下次开会交换意见。

经济抓什么题目？人大讲实的。

（林兆木汇报：讲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可以的。不要写得太实。

讲进化论的文章，可不叫他们再改，我仔细看看，把达尔文原文引上他一两处，苏修很可能歪曲达尔文的东西，我也留心国外，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到北大图书馆去问问。

（科学史）这个栏目不断，地球史，物质史……抓住不放。

清华北大（关于秦始皇），资料未注出处。秦始皇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结会，是大的土地改革，从奴隶制土地制到封建私有。是否秦始皇本纪内的？只讲了几句，应展开。提出意见，请作者改。第二部分，前面的，人家说得多了，统一中国是重要的。

主席在庐山上说，什么几千年一个，中国有秦始皇统一中国，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一直到民主革命鲁迅，这么多。驳斥林彪。

人家文章讲得多的，简单一点，土地制一段少的，可多讲。车同轨，书同文，也可讲，最后一部分改一下。

历代统治者沿用秦制，一面又骂秦始皇，为什么，未进一步讲清楚。（余征：讲了革新）林彪骂秦始皇，不是因为革新。被打倒的阶级，反对打倒他的新的阶级，就要骂秦始皇。中国历史没有资产阶级专政一段。搞革新的人曹操、王安石都肯定秦始皇。主席过去讲，斯大林三七开，秦始皇也三七开，功是主要的。尊儒反法，主要是反对专政这一点。狄更斯是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双城记》，写法国革命仍骂一通，说残酷残酷。马克思说狄更斯超过许多作家。中国历代反动统治比残杀巴黎工人不知残酷多少倍。这不讲残酷。打倒封建阶级，打倒皇帝就不得了了。对巴黎公社就是血洗，资产阶级可以不管。秦始皇只不过坑四百多人，算什么？文章改出来，不马上用也没有关系。

美展可以看看。

样板戏提个题目，想一想。人家攻作品太少。慢慢会多起来，搞一个戏不容易。国庆社论把十大路线、九大路线、基本路线的关系，解决了。

反潮流一文的针对性写得深刻一点，不要浮泛。中央办第二期学习班，主席讲，选一些在庐山会议上敢于批错误东西、敢于顶的工农同志，五号报到。我们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要经过斗争考验，否则锻炼不出人。要求增加工资也算是“反潮流”？首先是阶级路线问题，不是个人问题，主席讲，个别事错了，在正确路线下也有，区别在能平反。讲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革命者要在阶级斗争中锻炼，反潮流指反修正主义潮流，不是反马克思主义潮流。要求写得深刻，当前问题要回答，为什么是马列主义的一条原则，不是马列主义者搞不成的，不讲马列主义不行、马列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总理报告引恩格斯的话，主席也讲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反马克思斗争中发展起来，作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这样，工人农民成长，和此有关系，讲马列主义一条原则。原来说可写，不易写好，深刻讲道理，不是表态文章。

找李庆霖写一篇，表现团结。他作了好事。主席讲，他的信可收进（中）小学教材。他不是党员。学习没有。

（机关房子等）和文化组分开，协作，整个一套分开，可以协作，不重复过去矛盾。

来信，条件成熟时可编材料，叫思想动态，送政治局，每月一两期。怕力量不够，看条件。编一期送我们看看。有用，肯定人家要看。来信组，加图书馆的人，看条件成熟可以搞。我们专门讲思想动向。

来稿一分为二。如不登文艺作品，这是肯定的。分析一下，通盘研究，分成几类。我们处理不能全同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一样来信提出问题，来稿有时也提出问题。我们不登文艺作品。我曾经想转载一篇作品，后来考虑一登了，都寄来作品也不得了。对某一本书，作品，有议论的来信来稿，要注意。

给郭老的信（历史分期问题），不处理了。郭老是对的。

大家抱热情态度给红旗写信，信任你，我们对群众要关心，但增加负担。通盘考虑一下，不被次要纠缠，主要的又不会漏掉。登记手续可以简化。当场看了就退掉一批，然后再分分。给人家一个原则，退的手续也一样，一分为二。马上有个力量的问题，增加人是可以的。这是消极的，积极的希望搞个内部情况，先只发编辑人员，出四、五期，才往外送。内部出，试办半年。这叫试刊，内部出五期，选一期往外发。他们（中办）信多，主席有时要选来信看。这是吃力的事，研究一下，消极、积极的都兼顾。把一把关，搞几个人，把初步的工作先做掉，同时兼将来搞情况的事。

批评监督一文未看，意见提了，带回去征求意见，再改。

安徽《评红楼梦》文章，请作者回去开座谈会，找知识分子、工农兵，征求意见，记录告诉我们。讲人命数字抽象一点，几十条。

来稿问题解决一下。

房子问题，防患未然，事先解决它。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的通知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关于“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总结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城市民兵建设的新经验，现转发你们，望结合当地实际情况进行研究，因地制宜地加强城市民兵建设。

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战时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战争打起来，城市不能轻易放弃，有些城市要学斯大林格勒长期坚守。从上海的

经验看，平时管理和改造城市，战时保卫和坚守城市，都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因此进一步加强城市民兵建设，着重武装工人阶级，建设一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城市民兵队伍，加强城市的防卫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应当十分重视。要积极组织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维护城市的革命秩序，充分发挥民兵的作用，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同时要在阶级斗争中锻炼民兵，加强民兵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不断提高民兵的战斗能力。要在普遍搞好民兵三落实的基础上，按现有的武器装备条件，大力组训民兵武装基干营、团，民兵高炮营、团，和其他必要的专业分队，并随着民兵武器的增加不断扩大和加强。战争打起来，依靠这一批民兵的战斗骨干队伍，带动广大民兵和群众配合部队保卫城市，坚守城市。

各级党委要发扬全党抓军事，党管武装的优良传统，仿效上海的办法，对民兵工作进行认真研究和落实，切实把城市民兵建设抓紧。

国务院

中央军委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九日

附：

上海城市民兵情况调查

一、上海城市民兵，是在一九六七年七月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阅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武装工人，改造城市民兵的请示报告”建立起来的。当时叫“文攻武卫”，人数不多，没有发枪，每人手拿一根棍子或长矛。到今年三月，已发展到八十多万人，（其中专业复员军人七万八千多人，有一万四千多人是打过仗的），拥有各种武器二万三千七百余件，高炮三百二十四门，建立了十个武装基干团，十八个高炮团，五个独立高炮营，三个高射机炮连，一个摩托团，此外还有工兵，防化、通讯、运输等一批专门兵种队伍。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在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上海民兵工作脱离现实阶级斗争，不少民兵组织有名无实，工人当时批评民兵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民兵干部的名单在墙头上公布一下，民兵的名单写入花名册塞进抽屉里）。由于民兵在群众中缺乏威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一来，就上了文化大

革命的急风暴雨教育，和破坏了上海工人阶级。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派，在积极参加本单位三大革命斗争的同时组织起来，在市革委会的统一领导下冲向社会。同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展开了斗争。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革命行动中，他们头戴藤帽，手持钢矛，狠狠打击了上海柴油机厂联司一小撮坏头头，粉碎了阶级敌人妄图制造上海第二次大乱的阴谋，控制和稳定了上海局势，保卫了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在这个基础上重建起来的上海民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制止武斗，解决老大难，坚持打击阶级敌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人民赞扬民兵是群众专政的铁拳头。

二、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锻炼和建设上海民兵的一个重要途经。近年来，上海民兵勇敢地承担了各项战斗任务，成为群众专政的一支重要力量。被群众誉为红色台风的政治大扫除，是对阶级敌人进行袭击的一种革命行动，按照市委统一部署，协同公安部门集中行动互相出击，全市先后组织了卅多次。每次参加的民兵少则几千，多则几万、十几万，对全市各个角落，特别是坏人容易躲藏和避风的地方，依靠群众大检查，大清理，破获了一批大案、要案和多年的悬案，挖出了一批隐藏得比较深的阶级敌人，其中有血债累累，潜伏了十八年的特务，有逃避群众批斗的叛徒，还有占地七千亩的逃亡地主，同时还搜出电台收发报机廿多台、大量的武器弹药和数以万计的凶器。一次江腾蛟借养病为名，在上海某黑据点搞阴谋活动，正碰上上海民兵刮红色台风，江腾蛟、王维国一伙做贼心虚，生怕暴露目标，吓得赶忙加强警卫，一夜未睡，随时准备转移。

群众反映“好人爱民兵，坏人怕民兵”，夜间巡逻和日常值勤是上海民兵一种比较广泛经常的活动，全市有不少要害单位和重要目标，包括水厂、电厂、粮库、油库、煤栈、铁路、桥梁等由民兵分工负责守卫。许多基层单位的民兵还结合本职工作，战斗在岗位上，做到那里有斗争，那里有民兵。西郊公园的工人民兵，通过观察分析，从一清早来公园睡觉、洗衣服，到餐厅乱花钱，大吃大喝，躲在角落数钱等一类反常的迹象中，发现线索，追根究底，三年多来破获了各种案件两千多起，破获了一批逃窜的凶杀犯、盗窃犯、和现行的扒窃、流氓阿飞分子。东海化工厂民兵四年如一日，坚持夜间巡逻，处理了一千多起案件，打击了一批



犯罪分子，维护了这个地区的社会治安，深受周围群众的爱戴和赞扬，称他们是不挂牌子的派出所。

坚持以业务为主，分批轮流的方式派出小分队进驻工厂附近里弄，是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管理城市的一种新形式。上海有一千多条里弄，一小撮阶级敌人和流氓、阿飞，经常利用里弄人口密集管理不严的弱点，兴风作浪，破坏治安。上海民兵派出一千一百七十多支分队进入里弄，在街道党委统一指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既打击了敌人的罪恶活动，又在阶级斗争中锻炼了民兵。民兵小分队人数虽少，但有强大的工人武装作后盾，特别是小分队成员以身作则，把工人阶级的好思想、好作风带进了里弄。有些居民原来怕揭发了流氓、阿飞的犯罪活动，会被踢翻煤球炉子，捣碎玻璃窗子得到报复，在民兵小分队的支持下，也打消了顾虑，积极起来揭发斗争。两年多时间，全市民兵小分队共破获了各种案件二千余起，挖出了一批隐藏在幕后的教唆犯、流氓、阿飞头子，维护了城市的社会主义新秩序。通过这些活动，民兵熟悉了这些街道里弄的阶级关系和地形环境，打起战来，有利于坚守城市。

上海民兵在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中，还把和阶级敌人争夺青少年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任务，他们会同学校里弄采取各种形式，对一些违法青少年，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使其中大多数人得到了挽救。卢湾区丽园街道一个犯有偷窃行为绰号叫扫荡大队长的学生，经过教育，痛改前非，转变显著，参加了红卫兵，还出席红代会。对于一些违法严重民愤较大的但还不能判刑的犯罪青少年，则采取办劳动教育学习班的形式，把他们放到工厂去，夹在工人和民兵中间，边参加生产劳动，边进行教育改造。有个对象，一次提前两小时完成了生产定额就闲荡起来，民兵班长、老工人就教育他，你生产定额是完成了，但思想改造任务还差得远呢。这个对象触动很大，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好逸恶劳的根子很深，从此认真参加劳动，决心要以劳动的汗水来冲洗身上的污浊。目前这种集中管教的学习班有九个，一年来有一千三百五十九名对象进学习班，经劳动教育后返回学习和工作岗位的有一千一百零六名，达到了治病救人的目的。

上海城市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是在同林彪死党王维国一伙进行斗争中坚持下来的，王维国一伙慑于民兵的威力和作用，竭力阻挠和破坏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他们利用当时在市公检法所把持的一部分权力，散布了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

争是别出心裁，是搞专政的多中心，还布置派出所对进驻里弄的民兵小分队不支持，不表态，不提供材料，在工作上百般刁难污蔑，攻击上海民兵，妄图迫使民兵停止参加社会活动，退出群众专政的各个阵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民兵同王维国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这伙野心家在上海搞反革命阴谋活动困难很大，就是民兵也很难对付。一个新生事物的成长总要经历长期的曲折斗争；上海民兵通过批林整风，清算了王维国一伙破坏民兵工作的罪行，同时也教育了原来对民兵这个新生事物认识不够的同志，广大民兵战士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三、上海城市民兵遵照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政治、军事三落实”的指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中，坚持“劳武结合、以劳为主”的原则，积极抓好军事训练，两年多来，全市有四十多万民兵参加了野营训练。今年上半年，参加武装训练的民兵有一万多人，根据沿海城市的特点，重点操作高炮射击，和防化学、防原子、防细菌的三防教育，并加强了射击、刺杀、和投弹等训练。以一九七二年为例，参加军训民兵达卅四万七千余人次，其中有七万三千参加了各种轻武器射击，和手榴弹实弹投掷，有二百零五个高炮连一万五千余人次参加了火炮连的实弹射击，成绩良好。另外还有对排以上干部分别进行了集训，提高了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今年还办了两期反坦克训练。

在加强民兵军事训练中，怎样做到“劳武结合、以劳为主”，是一个重要问题，许多基层单位在实战中不断摸索总结经验，采用小型局部分散的办法，尽量利用业余时间按班、组展开活动。许多工厂还动员民兵，提前加班努力干，又发动全厂齐支援，既保证了集训，生产完成得很好。

城市民兵实行平战结合的一个重要点，便是有计划自己动手制造一些正规武器以改善装备，提高实战能力。上海有的工厂，主动要求在完成生产计划同时，挤出力量来为民兵造枪、造炮。一九七二年，上海电缆厂党委从各车间抽调了卅多名工人，在兄弟单位协助下自制了一些设备，开始试制半自动步枪，一九七一年生产了一百支，一九七二年又生产了二千五百支，基本上做到了全厂每个基干民兵都有一支枪，还装备了兄弟厂一个武装基干团，今年造枪的工人增加到八十多名，占全厂职工的百分之十二，预计可生产三千支枪。这些武器质量符合要求，成本

较低，由于生产时间没有框框，敢于革新，武器性能有改善，有的还减了零件，减轻了重量。

遵照毛主席关于“要准备打仗”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广大民兵积极参加了本单位和街道里弄的防空工程的建设，仅全市性的两项大的战备施工，民兵就参加了一百六十万人次，构筑人防工事长八公里，地下建筑面积三万平方米。江湾地区有一条日寇侵占时留下的地下道，日寇撤退时已遭受破坏，解放初花了三个月时间只挖了一百米，这次组织民兵突击，经过九天日夜奋战，全长一千多米的隧道都挖通了。总之，这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上海民兵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充分发挥了生产队、宣传队、战斗队的作用。

四、我们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城市民兵同样必须严格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林彪死党王维国一伙极端害怕上海工人武装，千方百计要篡夺民兵领导权，他们指使市公检法同上海民兵指挥部成立联合办公室。受到抵制后，又借口成立“维护社会革命新秩序办公室”，妄图把上海民兵领导权控制在他们手里。市委支持了工人阶级的革命行动，同王维国等人的破坏活动进行了斗争，其罪恶阴谋才没有得逞。在斗争中，上海民兵进一步看清了王维国一伙拼命夺民兵领导权，妄图搞掉这支工人武装是为反革命政变准备条件，这深刻的教育了广大民兵，工人阶级的武装，决不是为那个人服务的，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此各级民兵组织，把增强党的观念接受党的领导，作为对民兵进行经常性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在斗争中形成和建立起来的上海民兵指挥部（各区人武部）是全市民兵的领导机构，由军队同志和地方同志共同组织，也是经过试验，采取了把民兵同治安、保卫、消防等组织统一起来合并建立一个机构。群众称赞武装保卫工作的一元化领导，便于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有利于精兵简政减少层次，提高效率，有利于平战结合，促进战备工作的落实，同时也充分体现出这是群众的专政，真正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基层。

随着国内外斗争形势的发展，上海民兵在管理城市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越来越显出它的巨大作用。现在上海民兵正在回顾历史，认真总结，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进一步把这支队伍建设好，配合人民解放军，在对外反侵略对内反复辟的斗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调查组

一九七三年九月

来源：根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2009 年 11 月 30 日初稿

2012 年 5 月 22 日修改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九册（2）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九章 召开十大

##### 第二节 继续批林整风

###### 本节资料

######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三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对山东省来京参加汇报会议的同志《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1973. 01. 07；中发 [1973]4 号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批示

中央同意山东省、青岛市来京参加汇报会议的二十四位同志《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希望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一系列重要文件，遵照毛主席“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等三项基本原则以及“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等重要指示，放手发动群众，有步骤地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彻底揭发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散布的谬论和谣言，联系山东实际，查清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进行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希望你们加强党的一元化的领导，牢牢掌握批林这个斗争大方向，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努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要支持和发扬无产阶级正气，克服歪风邪气。要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加强军民、军政和军队内部的团结，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要以批林整风为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把山东地区的生产和战备切实搞好，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三年一月七日

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杨得志等人关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的请示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我们从去年十一月十七日起分批来到北京。一个多月来，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教导和有关文件，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重要指示，讨论研究了中央专案组印发的林彪反党集团在山东地区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有关材料。在中央的直接领导和帮助下，先是汇报分析了青岛市的批林整风会议情况，后又汇报分析了全省的批林整风运动情况，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教育。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山东省汇报会议，是对山东广大军民政治上的最大关怀。我们决心以实际行动，落实好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整风运动的指示，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并以此为动力，推动各项工作，努力发展山东的大好形势。

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在我省表现得十分尖锐。林彪反党集团的黑手伸向了山东。他们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中，把“济南”列为“借用力量”。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王飞、程洪珍以及林彪操纵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其他一些骨干分子，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北海舰队原政委)、辛国治(北海舰队原副政委)、吴宗先(济南军区空军原司令员)、包玉清(十三航校原副校长)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大量秘密印发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林彪死党李作鹏还窜到青岛等地作反革命讲演，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积极建立秘密的反革命组织，发展反革命势力，进行所谓“路线交底”，组织“左派骨干”，成立“战备机组”，收集情报，安设反革命黑据点、联络点，极力为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粉碎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取得了伟大胜利。在这场斗争中，山东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军民，以

捍卫毛主席、捍卫党中央、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决心，逐步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自上而下普遍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文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和谬论及其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一些重点单位，初步清查了林彪死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通过这场斗争，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思想 and 政治路线教育，全省军民极大地激发了对林彪一伙的刻骨仇恨，更加增强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了读马列的书和读毛主席的书的自觉性，促进了革命团结，加强了战备，推动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全省形势是好的。但是，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站错了立场，支持了华北组反革命简报，而且迟迟不觉悟，对自己的错误和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存在的一些问题捂了盖子。省委、军区党委对批林整风运动的领导也是有错误的。对第十次路线斗争在山东地区反映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抓纲不突出，对批林整风运动未能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对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贯彻得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致使我们省的批林整风运动，发展很不深入。对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的阴谋活动从组织上清查不力，没有成立清查小组，有些重要线索，没有发动群众，深挖细找，穷追到底，彻底查清。对林彪死党在山东地区散布的种种反革命谬论，批得不深不透，有的没有广泛发动群众痛加批判。对积极参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等，没有发动全省军民彻底揭发批判。对一些地方出现的反动的政治谣言，没有严肃对待，认真批驳和追查处理。对青岛批林整风会议的领导上，没有抓住第十次路线斗争这个纲，没有正确贯彻批林整风的方针，转移了斗争大方向。这次会议期间，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通过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教育，省委、军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对所犯错误作了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错误。省委、军区党委在京其他常委也作了自我批评，表示要认真接受经验教训。

为进一步把批林整风运动引向深入，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遵照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结合山东的实际情况，研究了如下的意见：

一、紧紧抓住第十次路线斗争这个纲。“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要牢牢记住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科学分析。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你死我活的大搏斗。深入开展批林整风，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头等重要的大事，是我们当前一切工作的总纲。紧紧抓住了这个纲，就抓住了方向，抓住了主要矛盾，就能把各项工作带动起来。对于各项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政策一定要认真贯彻落实，但是如果忽视或者放松了抓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这个总纲，“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因此，党政军各级领导，都必须反复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不断加深对批林整风重大意义的认识，真正把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作为当前的头等大事，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动手，切实抓紧、抓细、抓好。

二、全面贯彻批林整风的正确方针。毛主席指出：“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林彪及其死党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死敌，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这是最大的危险。只有坚持首先批林，把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阴谋及其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揭深批透，才能确保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贯彻执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这个关系在任何地区和单位都要摆正。要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林彪反党集团，牢牢掌握这个斗争大方向。林彪一伙搞修正主义，不搞马克思主义；搞分裂，不搞团结；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叛党叛国，成了叛徒卖国贼。我们一定要抓住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深入的揭发批判。要把林彪及其死党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的反革命罪行和谬论，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揭深批透，肃清流毒。要紧密联系山东的实际，彻底清查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搞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坚决从组织上拔掉他们设立的反革命黑据点、联络点，清除隐患；要狠批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放的毒，对他们的反革命报告、小册子，以及吹捧林彪及其死党的剧本、歌词等，要组织干部、群众深入批判，彻底批臭；要狠批反革命谣言，对于阶级敌人制造的政治谣言和散布的反革命谬论，



要及时批驳，彻底追查，严肃处理，树立无产阶级正气，反对歪风邪气。通过清查和批判，把林彪及其死党在山东地区建立的反革命组织、搞的政治阴谋和散布的反动谬论，统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充分利用这些反面教材，教育广大军民，准确地划清革命与反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在深入批林的基础上，要认真进行整风。人贵有自知之明。每一个领导同志，都要遵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个基本原则，严于解剖自己，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认真汲取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严格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不准以任何借口打击报复。反对骄傲自满，坚决纠正不正之风，进一步发扬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

三、批林整风要防止纠缠历史旧账。毛主席最近指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当前，集中力量抓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问题，着重揭发批判“九大”以来，林彪反党集团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阴谋活动，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林彪及其死党叛党叛国妄图搞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这是斗争的大方向。凡是符合这个大方向的，就是正确的，凡是背离这个大方向的，就是错误的。在山东，王效禹的错误和罪行，已基本得到清算，不要再去纠缠。在批判王效禹过程中，个别搞错了的，要落实政策，加以改正，但决不容许为王效禹翻案。不要搞以我划“线”站队，不准以任何借口去整群众，否则势必转移斗争方向，妨碍批林整风运动的开展。一定要把我们的一切力量集中在同一个攻击点上，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注意力引导到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方面来，搞好批林整风。

四、认真注意党的政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必须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山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军民，是热爱毛主席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林彪及其死党的所谓“借用力量”，正如中央所指出的：“不过是这伙反革命自己的如意算盘，真正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政变的，只是一小撮”。在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确定批斗对象和建立专案，要按规定经上级党委批准。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

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对于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应启发他们和同志们一道，起来揭发批判，接受教训。无论是受骗上当，沾了边的同志，还是陷得比较深，上了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团结他们，信任他们。犯了错误的同志，要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在新的斗争中为人民立新功。要把个别人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同所在地区和单位党委的集体领导，同广大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所取得的革命和建设成就，同广大三支两军人员的工作成绩，严格区别开来。要牢记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加强组织纪律性。要顾大局，努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警惕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我们一定要把党内党外、军政军民的团结搞好，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把山东的批林整风运动搞深搞透，把革命和建设事业搞得更好。

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毛主席指出：“地方党委已经成立了，应当由地方党委实行一元化领导。”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一个地区，应当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除了保持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和隶属关系外，同时是同级地方党委的军事工作部，受同级地方党委领导。济南军区和驻山东地区的野战军，除了接受军事系统的垂直领导外，在与地方有关的各项工作上，必须接受省委的领导。凡参加地方工作的军队同志，都要在地方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工作，不能另搞领导系统。地方党委要关心部队工作，党委负责同志“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清查林彪及其死党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党政军民互相配合，一致行动，才能搞好。因此，我们打算成立一个在省委领导下的清查领导小组，把全省党政军民各方面对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的清查工作统一抓起来。军区党委要切实对山东地区海、空军部队的作战行动和批林整风运动，实施统一指挥和领导。对批林整风运动，要根据各地区、各系统、各单位的不同情况，实行分类指导。各级党委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在毛

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好“一班人”的团结。要健全请示报告制度，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必须及时请示中央。

六、以批林整风为纲，全面安排各项工作。要把批林整风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同认真搞好斗、批、改，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结合起来。各级领导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带头攻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继续搞好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运动。遵照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扎扎实实地把山东的工农业生产搞好，加强战备，加强部队建设，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次会后，我们打算，第一步召开省委、军区党委常委联席会议，第二步，召开省委、军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吸收地、师以上主要负责干部参加，传达贯彻这次汇报会议精神，彻底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检查分析前一段批林整风运动的情况，领导上要严格进行自我检查，虚心听取大家的批评，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制定措施。然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省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在传达贯彻中，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相信和依靠群众，彻底纠正错误，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坚决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以上当否，请批示。

杨得志、袁升平、张铨秀、白如冰、  
秦和珍、张富贵、鹿田计、张延成、  
赵峰、马忠全、邓龙翔、张子石、  
范朝利、鲍先志、方正、王金泉、  
王庆三、史秉廉、刘众前、朱本正、  
吴怀才、吴德纲、郑干、高启云

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一月八日发出

中共山东省委办公室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九日翻印

(共印二五、〇〇〇份)

(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文件原题为：中共中央批示)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严防坏人进行诈骗活动的通知

1973.01.24；中发[1973]8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革命委员会，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

根据有关部门反映，最近一个时期，各地不断发生诈骗案件。有的私刻公章，伪造函件，冒充党、政、军干部或高干子弟，到处招摇撞骗；有的伪造中央文件，蒙骗群众，煽动一些人上访闹事；甚至有的模仿中央领导同志的声音、笔迹，冒充中央领导同志的秘书，用打电话、造假信、说假话等手法，进行诈骗活动。由于我们有的同志思想麻痹，敌情观念薄弱，有的单位办事制度不严，存在某些不正之风，使坏人钻了空子，在政治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这类案件的发生，是当前阶级斗争的反映，林彪反党集团搞的那种歪风邪气，助长了这些招摇撞骗等不良行为的滋生和发展，对我高尚的社会风气和良好的革命秩序是一个严重的危害，必须引起各级党委的注意。现遵照中央的指示，特作如下通知：

一、各级党委要以批林整风为纲，抓住典型事例，教育干部和群众，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坏人进行诈骗活动。在党委的领导下，公安部门要与群众相结合，抓紧对各种诈骗案件的侦破工作。对于查有实据的案犯，要依法惩处。

二、一切人事调动，财物发放，器材设备调拨，招收职工和征集新兵等，都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坚决纠正私人介绍工作、“走后门”“拉关系”等不正之风。如有违犯要严肃处理。

三、中央领导同志和各地负责同志交办的事项，应按规定手续下达。电话传达时，要说明自己的单位、姓名、职务。有保密电话的，要用保密电话传达。各级领导机关的印章和介绍信，要严格执行使用制度，妥善保管。

四、对于上级机关打来的电话，或发来的信件等，如发现疑点，应该向有关部门进行核对。

五、严禁私自翻印、传抄中央文件。如发现伪造、传抄文件，要一面追查，一面上报。

以上各项，请研究执行。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中央军委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发出

共印四五、三三二份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1973.02.20；中发 [1973] 10 号

一九七二年七月，为了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四·五会议）。

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在批林整风中，在历史问题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中央政治局约肖、苏、王、吴同志开个会，解决一下。”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起，这个开了几个月的会议转向批海军司令肖劲光上了林彪“贼船”。后肖劲光写了几次检查。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中央批转了这个“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

说肖劲光上了“贼船”的罪证，大约有如下一些：

- 1) 1967，1968 年肖给林彪写信，检讨自己，表示效忠；
- 2) 九大前林彪找肖等海军五人谈话，肖同意全力支持林彪死党李作鹏在海军的领导；
- 3) 在九大选举政治局委员时，肖没有选江青等人；
- 4) 九届二中全会上在华北组的发言支持设国家主席和林彪；

5) 利用准备与台湾海军作战的“七九方案”搞“北兵南调”，准备策应林彪的在南方另立中央等等。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对《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批示

1973. 06. 16；中发 [1973]22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批示

空军党委并各大军区党委：

中央同意《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中央认为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弄清了路线，改组了空军领导班子，它对深入批林整风，加强空军建设将起重大作用。

空军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搞反革命阴谋的只是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把空军作为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完全是痴心妄想。“九·一三”后空军广大指战员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指示，积极投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批林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形势很好。希望你们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继续把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抓紧抓好。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揭发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散布的种种谬论和谣言，查清林彪及其大小“舰队”在空军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批林整风中，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积极帮助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目的。

中央希望你们认真汲取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增强党的观念，加强党的领导，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纠正不正之风。要以批林整风为纲，搞好战备、

训练和各项工作，消除林彪反党集团破坏空军建设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团结起来，为“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而奋斗！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六日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情况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

空军党委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十八日至五月十八日召开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到会共三百六十三人，各大军区（除新疆外）派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在毛主席、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的指示，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的罪行，着重解决空军党委主要领导人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问题。五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了到会全体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大家深受鼓舞。

#### （一）会议的主要收获

在中央直接领导下，会议开得很好，弄清了路线，改组了空军领导班子。大家反映，这是一次鼓舞斗志的会议，团结、胜利的会议，对深入批林整风和加强空军建设将起重大作用。

一、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中央有关文件，深入揭发批判了林彪及其死党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和林立果为头目的“小舰队”的反革命罪行。特别是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重点批判了林彪反党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571”反革命政变纲领，以及“两个一切”、黑“讲用报告”。大家对批林整风的伟大意义和方针政策进一步加深了理解，更加激发了对林彪反党集团的阶级仇恨，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

二、会议集中揭发批判了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梁璞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王、曹、邝、梁四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上了林彪贼船，积极参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九·一三”以后，他们仍然不向党交心，捂盖子，保自己。通过揭发批判，进一步揭开了盖子，基本弄清了空军党委的问题。

三、认真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教育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会议期间，中央负责同志反复强调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揭发、批判，不是为了打倒，而是教育、挽救、争取。会议对王、曹、邝、梁四同志，既严肃批判，又热情帮助。他们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进一步检查交代，讲了一些真心话，认识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大家对他们的进步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在今后实践中进一步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会议还吸收了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严重错误，检查交代较好的几个同志参加，充分体现了党的政策。

四、分析了形势，鼓舞了斗志。大家认为，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揪出了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无损于空军的光荣。空军建立二十多年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占主导地位的，空军的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三支两军中，为人民立了新功。空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搞反革命的只是吴法宪等一小撮死党。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是背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背着广大指战员的。对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广大指战员是有抵制的。陈修文烈士在林彪死党逃跑的直升飞机上，勇敢地同叛徒搏斗，就是一个范例。“九·一三”事件后，空军广大指战员积极投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清算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团结，部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通过分析形势，大家振奋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更加坚定了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搞好空军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五、遵照中央的指示，经过会议充分酝酿和民主协商，改组了空军的领导班子。对于原班子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主要领导干部作了必要调整，吸收了在两条路线斗争中表现较好和比较年青优秀的同志到空军的领导岗位上来。这个新班子体现了“五湖四海”和老中青三结合的精神，是朝气蓬勃的，有战斗力的。

## (二) 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的罪行

第十次路线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其罪恶目的，就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分裂我们党，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这场斗争，在空军表现得非常尖锐、非常严重。林彪抓军队，首先抓空军，下了很大功夫。林彪和他的大小“舰队”进行了猖狂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把空军变成他们发动反革命政变的“基本力量”和“可靠基地”，利用空军所谓“机动能力强”，“夺取全国政权”。

### 一、大树特树林彪一家的“绝对权威”

早在“九大”以前，吴法宪就在空军提出“忠于”林彪的口号，吹捧林彪“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亲自给林彪写誓言，要“永生永世、世世代代”忠于林彪及其一家。吴法宪一伙利用一切机会，鼓吹林家父子是“天才”，叫嚷：“无产阶级三个伟大领袖的三个助手”，林彪“最光辉”，“比恩格斯、斯大林高的多”等等。林立果是什么“群众最好的领袖”。“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卓越的思想家”、“天才的理论家”、“出色的科学家”。他们还制造林彪同毛主席“不可分”的谬论，胡说：没有林彪的“捍卫”，“就没有毛主席”；“忠于林副主席，就是忠于毛主席”；“紧跟林立果，就是紧跟毛主席”。他们鼓吹“选择政治领导”，向林家“集中投资”，把“政治生命依附于林副主席一家”，要“一辈子都紧跟首长(林彪)、林副部长(林立果)”。为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王朝大造反革命舆论。

### 二、拉山头，结死党，秘密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

长期以来，林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空军搞阴谋，搞什么“打内堂”(即到林彪那里“摸底”、“咬耳朵”)、立“标兵”，安插吴法宪当空军司令，派子女来空军“保权”。他采取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篡夺空军党委领导权，八个常委中有吴法宪、王秉璋、刘锦平三个死党。曾国华问题严重，正在隔离审查。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三同志上了贼船。他们私设常委办公会，把不是党委常委的江腾蛟、王飞、陈绥圻等塞进去，控制了空军领导核心。“小舰队”的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刘世英、朱铁铮、程洪珍等人把持空军党委办公室，直接发号施令，使“党办”成了林彪直接指挥的“特殊权力机构”和“小舰队”的“大本营”。林彪、吴法宪一伙控制一些机关和单位，发展法西斯特务组织，建立“安全的基地，可靠的基地，信任的基地，放心的基地”，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组织准备。

### 三、“九大”期间，大搞反党分裂活动

“九大”期间，在林彪策划下，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窜到空军组搞阴谋活动。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时，吴法宪亲自向空军组布置对黄、吴、叶、李、邱等人投全票；对一些中央同志投半票；对另一些中央同志不投票。妄图排挤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篡夺中央领导大权。“九大”闭幕后，吴法宪召集王秉璋、曾国华以及王辉球、曹里怀、邝任农同志开黑会，说他们当上中央委员是林彪的“最大关怀”和“信任”，曹里怀同志当上中央委员是叶群“讲了话的”。他们都感恩戴德，表示要忠于林彪，支持吴法宪。

#### 四、抛出“两个一切”，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

九届二中全会前夕，经过林彪、吴法宪等人的策划，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上，抛出了“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到会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成员一致拥护，并分别在司、政、后、民航、三机部、六院积极推行。王辉球同志主持政治部党委制定了反动的“五条措施”，提出：“一切重大问题”，“都要及时地主动向立果同志请示报告”；要“时时想到他，事事请教他，处处保卫他”；“老老实实地服从他的调动，服服贴贴地听从他的指挥”；要把“服从他的领导，执行他的指示，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按照“两个一切”，林立果成了空军的太上皇。

#### 五、九届二中全会期间，山上山下紧密配合，猖狂向党进攻

山上，吴法宪在林彪的指挥下，找空军与会的某些中央委员“交底”，策动他们向党进攻，要他们“坚持设国家主席”，坚持“天才”观点，并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中央负责同志。林彪抛出反革命政变动员令后，吴法宪上窜下跳，煽风点火，充当反党的急先锋。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曾国华等纷纷出动，紧密配合。王辉球同志在东北组发言，攻击中央负责同志，叫嚷：要“揪出来示众，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支持反革命的六号简报。邝任农同志在华北组用流氓语言叫嚷：“一定要揪出来斗倒斗臭，千刀万剐。”曹里怀同志在西北组发言拥护林彪的反党讲话，说什么“是会议的方向、指导思想”，反对毛主席规定的会议方针。阴谋败露后，吴法宪又找王秉璋、曾国华及王辉球、邝任农、曹里怀同志订攻守同盟，对抗毛主席、党中央。

山下，在空军“三代会”上把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为“超天才”也达到了高潮。经过精心策划，抛出了由林彪、叶群亲自指挥炮制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讲用报告”。这个黑“报告”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鼓吹“唯生产力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鼓吹“空军制胜”的唯武器论，反对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借着所谓“要强盛”的幌子，鼓吹大国霸权主义，卖国主义。黑“报告”出笼后，林彪死党鼓噪而起，吴法宪立即大叫“放了一颗政治卫星”。王、曹、邝、梁四同志也带头吹捧。在会内会外刮起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大吹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是什么“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什么“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第三代接班人”、“无产阶级之首”、“七十年代红太阳”、“黑夜的明灯”、“宇宙的巨星”。

在此期间，江腾蛟组织炮制四篇反党文章，狂热吹捧林彪，叫嚣：“林副主席，决定了我们党的性质，决定了无产阶级的命运，决定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决定了人类的彻底解放”，“必须忠于林副主席”，要把“保卫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作为高于一切的革命大节，毕生的战斗使命”。紧密配合林彪的反革命政变阴谋。

六、炮制《“571工程”纪要》，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九届二中全会后，吴法宪一伙极力封锁毛主席的指示，蒙蔽群众，欺骗中央，对抗和破坏批陈整风。在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前夕，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陈励耘等，炮制了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林立果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开所谓“三国四方”会议，进一步策划了反革命政变的准备和分工。林彪死党按照《“571工程”纪要》，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大造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舆论，利用推广所谓“安全经验”，发动“夏季攻势”，再次刮起吹捧林立果的妖风。他们大搞“路线交底”，疯狂叫嚣：当前“是决战的形势，摊牌的形势”，要“采取一种非常的手段”，“文斗不能解决问题，武斗才能解决问题”，给林彪“制造一个上台的条件”，“先下手为强”，“强行接班！”

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小“联合舰队”、“分舰队”，建立反革命秘密据点和通信网，秘密组织反革命政变的武装力量“教导队”，研制和进口大批特工器材，窃取重要情报和核心机密。大搞到各地的反革命串连，网罗党羽，扩充反革命势力。

策动“北兵南调”。一九七一年八月，黄永胜、吴法宪、阎仲川指使梁璞同志，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借东南沿海战备之名，炮制“八·二六”作战预案。他们还指使一些单位造枪改炮，改装飞机。大搞空军“陆战”训练。掌握空运、空降。阴谋加强其反革命“根据地”建设。

林彪死党策划召开的“安全经验”现场会、策动“北兵南调”、大搞空军“陆战”训练、窃取器材经费等反革命阴谋活动中，有许多是王辉球、邝任农、梁璞、曹里怀等同志积极参与的，是负有严重责任的。

经过一系列反革命准备，林彪直接指挥他的死党，在空军具体策划两项反革命阴谋，“破釜沉舟”，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攻打钓鱼台，谋害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私调飞机，南逃另立中央。阴谋破产后，林彪仓惶逃命，狼狈投敌，自取灭亡，成了可耻的叛徒、卖国贼。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胜利地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摧毁了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林彪反党集团在空军倒行逆施，嚣张一时。他们极端狂妄，但又极端虚弱。他们要“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其结果是走向反面，一切破产。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可谓“根深蒂固，一朝覆亡”，“盘根错节，顷刻瓦解。”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是他们妄图把空军变成反革命工具的彻底失败，也是他们长期以来在空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彻底破产！

### (三) 主要经验教训

会议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条基本原则，总结了空军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空军的问题为什么这样严重？经验教训很多，最根本的要坚持三

条基本原则，防止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军队的领导权，变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 一、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也是决定军队阶级性质的根本问题。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为了达到把空军变成他们篡党夺权工具的罪恶目的，通过空军党委常委，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竭力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们竭力鼓吹和推行林彪“直接指挥”和林立果“调动一切、指挥一切”。散布林彪对空军有“特殊的感情”、“特殊的关系”，没有林彪，没有林立果“就没有空军”。妄图把党领导的无产阶级的军队变成林家父子的军队，反对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党指挥枪”、反对“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这个马克思主义原则。

他们大肆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把林彪和林立果都吹成是“天才”、“超天才”，是什么“高于认识，高于实践，高于群众，高于历史”的“圣者”。这是他们搞“两个一切”，篡党夺权的反动的理论基础。

他们以林彪、林立果的修正主义黑货冒充马列主义，鼓吹学习他们的东西就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读林副主席的书，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捷径”。把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吹成是“指导思想”，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他们以林彪的所谓建军“一整套”方针原则和林立果的“空军制胜”的唯武器论，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妄图把空军建设引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

在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中，空军党委的某些同志为什么对修正主义的东西不抵制，不反对，不向中央报告，反而同流合污，推波助澜呢？不是他们不了解情况，也不是识别不了。象“两个一切”这样露骨的反革命货色，象把林立果的黑“讲用报告”作为“指导思想”，象没有任何职务的江腾蛟却当了空军党委委员、常委办公会议成员和政治部党委书记，这样一些显然违反党的原则和纪律的东西，连一个普通战士都可以看出问题来，为什么身为高级干部的王辉球等

同志却“服服贴贴”地去积极推行呢？根本原因是他们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他们完全站在林彪一边，政治上、思想上完全听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的话，出卖原则，出卖灵魂。他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毛主席的指示，格格不入，或阳奉阴违，或歪曲篡改，甚至封锁对抗；而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对林彪的黑指示，他们却“闻风而动”，“快办，办好”，又是作贯彻“两个一切”的决议，又是疯狂吹捧黑“报告”，唯恐跟得不紧。他们立场站错了，路线走错了，必然离毛主席的路线越来越远，一步一步走向反党反马列主义的危险道路。

这一沉痛教训告诉我们，党委要保持无产阶级本质不变，就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坚决执行党的马列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二、要团结，不要分裂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阴谋篡党夺权，在空军竭力推行一条分裂主义的路线。他们一方面公开打出分裂的口号，鼓吹“亲不亲，线上分”，以对林家的态度、感情为标准，大搞“划线站队”。一方面打着“不可分”的幌子，把他们自己打扮成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拥护他们就是“拥护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他们就是“反党”。不管是“不可分”还是“线上分”，要害就是搞分裂，就是向毛主席、党中央闹分裂，分裂党、分裂军队。他们拼命鼓吹要跟他们走，“选择”他们作“政治领导”，胡说：“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认准门，跟准人”，“跟对了飞黄腾达，跟错了彻底完蛋”。只要跟他们的就是“感情深”，“大节好”，“自己人”，极力拉拢重用；反之就排斥打击。他们采取种种阴谋手段，拉山头，结死党，组织地下黑班子，控制党委，直至建立法西斯特务组织，为他们搞反革命阴谋夺权服务。

“凡是要搞阴谋的人，他总是搞几个人在一起”。为什么空军党委中有的同志被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拉过去？有的是宗派观念浓厚、宗派关系超过了党的关系，以“林家观念”代替党的观念，从山头宗派发展到反党勾结。有的是作风严重不正，对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不仅不抵制，反而臭味相投，一吹就上劲，一拉就过去，和他们打得火热。有的把革命作为“入股”、“投资”，认为林家“树大根深”，就去投机钻营，卖身投靠。这些倾向都是极其反动落后的。毛主席早就告诫我们：“不符合党的原则的就应当保持一

个距离。如果你不保持一个距离，以为关系太老了，太深了，不好讲，不挡回去，不划清界线，你就越陷越深，他们那个‘鬼’就要缠住你。”

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区别马列主义党同修正主义党的根本标志。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为全中国全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林彪、吴法宪一伙结党营私，是为地主、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立党为公，为全中国全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必须坚持党的团结和统一；立党为私，为少数人谋私利，就必然制造分裂。历次路线斗争的经验证明，向党闹分裂的人，到头来总是被分裂出去，为人民所唾弃。我们要搞“五湖四海”，决不能拉山头，搞宗派，背着党搞秘密派别活动，要不为名、不为利，决不能从个人的私利出发，投机钻营找靠山；要一切行动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坚决同任何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作斗争。提倡学国际歌，提倡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加强革命团结。

### 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林彪反党集团“如一切反革命集团一样，他们的破坏活动总是采取隐蔽的或者两面派的方式进行”。其特征就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流眼泪，背后下毒手”。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搞修正主义、搞分裂，在空军广大指战员中是极端孤立的，是见不得人的，他们只能靠阴谋诡计。或者以“合法掩护非法”，以搞路线教育为名，大搞篡党夺权的“路线交底”；以调查研究为名，搞反革命特务活动；以加强战备为名，策动“北兵南调”，大搞空军“陆战”训练。或者以“技术掩盖政治”，以讨论垂直起落战斗机问题掩盖搞“两个一切”；以推广“飞行安全经验”掩盖反革命串连，加强“根据地”建设。他们为了掩盖阴谋活动，提出要“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内紧外松”。他们还通过“送礼送政治”，表面上装着“关心”干部，实际上阴谋拉人下水。公开一套，秘密一套，不断变换反革命策略。

对于林彪、黄永胜、吴法宪一伙大搞阴谋诡计，空军党委内部，王、曹、邝、梁四同志为他们大开“绿灯”，使一些阴谋活动不仅不能得到揭露，甚至公开化、“合法化”。有的人看出些问题，但“私心重，骨头软”，逆来顺受，不敢斗争。

有的丧失阶级警惕，麻木不仁，对打着红旗反红旗不辨真伪，打着白旗反红旗也盲目轻信。完全解除了思想武装。

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必须光明磊落，对重大的原则问题应当明确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对的要坚持，错的就反对。对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看人看事一定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不要只看到说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而要看是否阉割。篡改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不要只看到当面说得好听，而要看是否背后又在捣鬼；不要只看到形式是合法的，而要看它是否符合党的路线和政策。总之，不要被他们的假象蒙住眼睛，“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

#### (四)深入批林整风，加强空军建设

一年多来，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空军的批林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林彪一伙在空军的罪行被充分揭露，问题彻底暴露出来，“‘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深入批林整风，发奋工作，把空军建设好。

##### 一、继续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遵照毛主席“首先是批林，其次才是整风”和“在历史的旧账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的指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切实把批林整风这一头等大事抓紧抓好，把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

要继续搞好清查工作，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林彪大小“舰队”在空军搞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以及同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批林整风最根本的是解决路线问题。要抓住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紧密联系空军实际，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肃清流毒，使大家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批林的基础上，严格解剖自己，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不正之风。

要把批林整风同认真看书学习结合起来。特别是中、高级干部要努力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

##### 二、认真执行党的政策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对林彪死党实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给出路”的政策。“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于上了贼船、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同志，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严肃揭发批判，热情教育帮助，尽最大努力，把他们挽救过来。只要他们能够向党交心，愿意改正错误，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要欢迎和团结他们，继续信用他们。对于某些因一时上当受骗而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的同志，主要是启发他们提高觉悟，把问题讲清楚，汲取经验教训。不搞层层检查，人人过关。

要注意掌握政策界限。一定要把和林彪死党有过正常工作来往的同志同参与他们搞反革命阴谋的人严格加以区别；要把盲目地跟着吹捧或干了一些坏事的同志同林彪死党造反革命舆论、干坏事严格加以区别；要把“九·一三”以前犯错误同“九·一三”以后听了中央 57 号文件的传达仍然坚持错误的人，严格加以区别；要把个别领导干部犯错误同所在单位党委和广大指战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所取得的成绩严格加以区别；要把参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本人同其家属子女严格加以区别，要按照毛主席关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加强教育，使其划清界限，不要歧视他们。

对被林彪、吴法宪一伙打击迫害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干部，要按照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处理，但也不能搞一风吹。

### 三、搞好领导班子建设

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和老中青结合的原则，要搞“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特别对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问题较多的领导班子和某些机关部门，要尽快加以充实和调整。在调整的时候，要注意保留一部分犯了严重错误，作了检讨，愿意改正，并取得群众谅解的同志。

在空军二十多年建设中，涌现出大批优秀干部，他们是党的宝贵财产，是空军建设的骨干。要发挥老干部的作用，大胆提拔优秀的中年、青年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

### 四、加强党的领导，发扬我军优良传统

遵照毛主席“军队要整顿”的指示，要通过批林整风，大力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观念，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委集体领导，要搞群言堂，不搞“一言堂”，反对称王称霸。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加强政治工作和政治机关建设，大力抓好基层，特别是党的支部建设。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搞好军政、军民和军队内部的团结。

五、加强训练，搞好战备

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军队要加强训练的指示，大力加强军事政治训练。要办好学校和教导队，特别要抓紧干部的培养提高。认真贯彻“严格训练，严格要求”、“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提高训练质量，严格规章制度，搞好武器装备的维修，保证安全，防止事故。遵照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加强战备，随时准备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为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的伟大号召而努力奋斗！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领导小组

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八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八日发出

共印六、〇〇〇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三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死党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汇集（民航系统揭发的材料，初稿）

反革命分子刘锦平，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是林彪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

刘锦平早就投靠林彪。一九六五年秋，刘锦平在江苏省太仓县搞“四清”期间，就与叶群、吴法宪、王飞、周宇驰、刘世英等勾结在一起。当时叶群是队长，刘锦平是副队长。他们在林彪的指使下，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破坏伟大的“四清”运动。

一九六七年八月至十月，刘锦平在南京调查处理江苏地区文化大革命问题期间，秉承林彪“抓军内一小撮”的旨意，勾结江腾蛟等人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破坏江苏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刘锦平在任军委政工组副组长期间，与林彪、叶群进一步勾结。一九六八年一月三日，他主持炮制了一个所谓《关于贯彻执行林副主席对政治工作指示的报告》，大肆吹捧林彪。他与杨成武勾结，推销林彪“大树特树”的黑货，责令福州军区“严加处理”写信批判杨成武那篇“大树特树”黑文章的战士。一九六八年三月，杨、余、傅被揪出后，林彪唯恐揭露了刘锦平的问题，指使黄永胜召开大会讲话，保刘过关。刘回民航之前，叶群又代表林贼找刘谈话，说刘“老实本份”，“是个好同志”。刘锦平回民航后，林贼还多次“接见”他，并经常派林立果到刘家进行阴谋活动。刘锦平为了进一步投靠林贼，经常利用班机从全国各地买来土特产奉送林家，逢年过节还要向林贼一家“问候”，表示效忠。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后，林彪贼心不死，加紧策划新的反革命政变。刘锦平和林立果、吴法宪、江腾蛟一伙结成死党，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建立反革命政变据点，极力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准备力量。

### 一、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刘锦平按照林彪反党集团的政治纲领和理论纲领，进一步用谣言和诡辩挑动干部，分裂军队，欺骗群众，为林彪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疯狂宣扬林彪“一贯正确”和“不可分论”。

刘锦平根据林立果所谓进行“路线教育”的黑指示，伙同张国民①、董崎②等人，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一日和一九七一年一月廿一日，两次召开有部分管理局领导干部参加的所谓“路线教育座谈会”。刘锦平亲自抓点，精心炮制了“试点方案”、“试点经验”和“讲话提纲”，送林立果、周宇驰审定后，作为基层“路线教育”的“样板”和“教材”，流毒甚广。

刘锦平一伙打着“路线教育”的幌子，歪曲党的历史，大肆吹捧林彪“一贯正确”，“一贯高举”，“一贯紧跟”，散布“林副主席和毛主席是分不开的”，“若没有林副主席的捍卫，也就没有中国的历史”，“也就没有我们的一切”。

还胡说什么：“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跟谁走，听谁的话，拥护谁作领袖的问题”，“任何时候都要保证跟林副主席走”，等等。

刘锦平还借各种机会，采取种种形式突出林彪。他多次指使董崎收集林彪的文章，准备编一本书和“林彪语录”。一九七一年六月，刘锦平在上海鼓动周赤萍再版吹捧林彪是部队的“统帅”、“非凡的天才”、“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的黑书《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该书出笼三百万册，刘锦平买了五万册，发给民航人手一册。并给空军其他单位订购了近二十万册。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中央两报一刊《纪念中国共产党五十周年》一文发表后，刘锦平及其一伙攻击这篇文章“没有突出林副主席的丰功伟绩”，说什么“他们不宣传，我们宣传”。刘锦平指定董崎牵头，组织了一个黑班子，并亲自定题目、出观点，炮制出一本五万多字的所谓“两条路线教育材料”。这个材料歪曲党的历史，以大量篇幅为林彪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其中提到林彪有八十二处，引用林彪的话二十一段，专门吹捧林彪的文字有十六大段，吹捧林彪是南昌起义部队走上井冈山的“光荣代表”，是什么“光辉的榜样”、“最高的典范”。黑材料写成后，刘锦平还嫌对林彪从建国到一九六〇年前这段时间的“功绩”吹捧的不够，指使董崎“再好好地找一找，把这一段再充实一下。”一九七一年八月，刘锦平在首都机场看到一张合影照片，认为林彪的位置不够突出，便大发雷霆地说：“该突出的不突出”，妄图在候机室专门增挂一张林彪的单人画像，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并列。刘锦平一伙还请人在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全国人民热爱毛主席》的大幅油画中，特意添上林彪的像。

## （二）制造谣言，分裂中央，为林彪抢班夺权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刘锦平及其一伙反对党的“九大”路线，提出要批判所谓“团结至上论”，到处造谣惑众，进行分裂活动。

一九七一年四月五日，刘锦平“接见”来京搞地下串连的空四军、空五军×××、×××时，对上海市委和南京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诬蔑上海市委“压空四军”，谩骂南京军区“在空军头上拉屎拉尿”，煽动“四、五军要沉住气，不要怕”，“骨头压断也要顶住”，“这个账总有一天会清算的”，“你们将来也会和三十八军一样揪出陈伯达式的人物，甚至比陈伯达还重要的人物”。刘的谈话被连夜整理成记录稿，在所谓“左派骨干”中广为传播。

一九七一年四月，江腾蛟在上海密谋开完“三国四方会议”回到北京后，与刘锦平进行了密谈，刘锦平等人便到处造谣惑众，煽动说：现在是“四方面军的压一方面军的”，“笔杆子压枪杆子”，“要警惕秀才造反”。刘锦平亲自向十四航校谢立岑（原政委）等人说：“党内将有一场大的斗争，思想上要有一个准备”，“我们是拿枪杆子的，要以枪杆子来保卫林副主席”等等。

一九七一年六月，刘锦平在上海、杭州召见了空四军、空五军和民航上海管理局部分团以上“左派骨干”，并作了“讲话”。说什么几十年来的路线斗争，都是“解决中央常委中的问题”，“批陈没结束，新的斗争苗头已经看的很明显，矛头对着林副主席”，“当前的斗争就是保卫接班人的斗争”，“是承认林副主席，还是另外选一个什么人”，“要警惕、防止另外的人抢班”，“思想上、组织上要做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一九七一年七、八月间，刘锦平在成都指使他的亲信向所谓“左派骨干”传播林立果、周宇驰制造的反动谬论。胡说什么“无产阶级内部的斗争比资产阶级内部的斗争还要残酷”。他们要所谓“左派”队伍“特别注意九、十两个月。九月开三中全会，十月开四届人大，主要是权力再分配问题”，“会上……要有一场激烈的斗争”，“林副主席通过选举的办法就把政权掌握起来了”，“就当主席了。新的领导班子登上天安门，又是新的祖国山河一片红，是震动世界的大事。”如果不成，“黄、李、邱就发动军事政变，号召军队起来保卫接班人。”

（三）鼓吹“天才论”，把林立果捧为“天才的第三代接班人”

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宣读了林彪、叶群亲自指挥炮制的所谓“讲用报告”后，在空军系统“三代会”上，刘锦平利用会议秘书长的合法身份，与吴法宪等人密谋策划，反复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并发表讲话，无耻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向全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是对空军的重要指示”，“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光辉”，“体现了他的天才和超群的智慧”，林立果“高瞻远瞩”，“思想很成熟”，“成就惊人”，等等。鼓动各个代表团讨论表态，开展向林立果学习的活动，掀起了吹捧林立果的狂热，把林彪反革命别动队的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成“超天才”，与林彪、陈伯达一伙在庐山会议上向党猖狂进攻遥相呼应，紧密配合。

与此同时，刘锦平指使张国民、董崎等人，在民航驻京单位多次播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把空军几个卖力吹捧林立果的人拉到民航大吹特吹林立果的“天才”“事迹”，策动总局指挥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党委分别作出向林立果学习的决定，提出“认识（林立果的）天才，拥护天才，学习天才，保卫天才”，要求大家“恭恭敬敬地向立果同志学习，老老实实在地听从立果同志的指挥”。刘锦平、米家农等还要机关、部队抄写和印发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提出“要带着感情抄，抄出感情来”。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日，刘锦平和张国民等人秘密策划，召开了一个所谓“党委联席会”。会上，刘锦平极其肉麻地吹捧林立果“是个伟大的天才”，说什么“林立果这个天才的成长是符合领袖发展事实的”，“发现林立果这样好的接班人，是我们党兴旺的标志”，“是推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进程的伟大力量”，他的“讲用报告”“阐明了当代世界上的重大问题，是理论和实践完全统一”等等。要求在民航掀起“学习，研究、运用”林立果的黑报告的“高潮”，并要求向总局政治部写出学习情况的报告。这次会议之后，他们大肆油印了会议的发言，把吹捧林立果的妖风刮到了全民航。他们广泛散发林立果的黑报告，并规定为“路线教育”的“必读文件”和政治学习的重要内容。他们胡说林立果是“我们党和国家天才的第三代接班人”，他那个所谓“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米家农<sup>③</sup>等人还把林立果在广州管理局用过的杯子、椅子等物都标明“×年×月林副部长用过”的字样保存起来，准备“将来”作为“历史文物”送进博物馆。他们一伙还说什么林立果“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天才的领袖”，“对林副部长的评价再高也不过份”，“等林副部长当了主席，才够我们吹哩！”一九七一年七月，所谓“空九师经验”出笼后，刘锦平等人极力推销，并指使铅印了三千多册。与此同时有组织地搞林立果黑报告出笼“一周年纪念”活动，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热潮。

刘锦平一伙制造的反革命舆论，欺骗毒害了不少人。有的把林立果当作“救世主”，发誓对林立果“认定了，选定了，跟定了”，“子子孙孙要紧跟”，“剥皮、抽筋、挖眼、砍头也要跟到底”。

## 二、发展反革命政变组织

一九七〇年九月，刘锦平根据林彪一伙的旨意，纠合张国民、赵庆生④、董崎、陈庆军⑤、程兆贤⑥等人组成了民航“左派队伍”的领导核心，逐步发展“左派骨干”，策划和指挥各项阴谋活动。他们以刘锦平、张国民的家作为活动据点，经常开黑会，传达林立果的黑指示，交换情报，分析形势，制定反革命活动的方针和策略。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至一九七一年春，他们主要在总局机关和广州、上海、北京管理局的领导层中发展“骨干成员”。林彪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出笼和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召开之后，林立果、江腾蛟先后和刘锦平进行了密谈。刘锦平一伙便加紧发展“左派队伍”，计划对每个飞行大队、省（区）局、重要航站的两个一把手，起码拉过去一个，起“种子”，作用。一九七一年三、四月份，总局党委召开五届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刘锦平对张国民、董崎、赵庆生、陈庆军、程兆贤等人说：“这次省局、大队以上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来了，要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工作”，“重点应放在北京、广州、上海三个管理局。重点做好飞行部队的工作，掌握几个机组，在关键的时候，能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能过得硬。一总队的工作要好好地做”。根据这个黑旨意，他们一伙有组织有计划地向部分团以上干部进行了所谓的“路线交底”，并在五、六月份举办的“批陈整风”学习班上也进行了同样的活动，使大部分管理局和一些省（区）局、航校、飞行大队的领导干部中都有了他们的“骨干”，并由他们回各单位继续发展。刘锦平一伙发展“左派队伍”的主要手段之一是通过个别谈话，制造谣言，欺骗同志，进行所谓“路线交底”。他们首先散布“当前路线斗争复杂”，“任何事情都有两条路线斗争，任何单位都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代表”，“要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要走错门，跟错人”等等，以此制造思想混乱。然后向谈话对象不同程度地交所谓民航、空军和全党两条路线斗争的“底”，把林彪、林立果、刘锦平等人分别打扮成全党、空军和民航的“正确路线代表”，欺骗一些人跟着他们走。另一个主要手段是用提职提级、请客送礼、介绍对象等方法网罗党羽，收买干部，培植亲信。刘锦平把紧跟他的一批老同事、老部下拉进民航，安插在重要岗位上。还从空军选来一些“路线斗争骨干”。刘锦平对紧跟他的人十分器重，如刘的前两任秘书赵庆生、陈庆军，家庭和社会关系很复杂，作事阴险，是刘的“老紧跟”，刘锦平便视为心腹，对他们的职务一提再提，还准备把赵庆生

提为总局指挥部副参谋长。有的“左派骨干”原来是一般干部，只因对林彪、刘锦平跟得紧，都被破格提拔到总局机关处、局领导岗位。反之，对不跟他们一伙走的，则进行排挤打击，叫嚷要“咬紧牙关，三年换完”。

通过以上种种手段，刘锦平一伙很快在民航建立了一个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左派队伍”。刘锦平派人把民航团以上干部中的“左派骨干”名单送给林立果，林立果看了得意地说：“民航的‘左派’骨干力量按比例比空军还要强，今后要考虑支援空军一些！”

一九七一年七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传达后，林立果、刘锦平一伙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利，于是采取“以退为进”的方针。根据林立果提出的“左派内部要整风”，“要当战斗队，不要当仪仗队”等七条黑指示和所谓“立场要坚定，思想要解放，行动要谨慎”的行动纲领，刘锦平亲自布置，对“左派队伍”进行整顿，要求他们“要顺流而下，不要逆流而上”，“现在要装孙子，将来当爷爷”。并提出“要防止出叛徒”，“谁泄露了情况就牺牲谁”。鼓吹“准备干一番大事业，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准备随时被捕坐牢”的反革命思想。刘锦平还声嘶力竭地叫喊：“就是杀头也要跟着林立果干”。

同时，刘锦平还“接受了‘林办’的特殊任务”，于一九七一年五月至八月，先后窜到中南、华东和西南地区军内外一些单位进行反革命游说和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拉拢某些部门、某些人，为林贼篡党夺权服务。五月中旬，刘到洛阳××军找该军的军、师干部谈了话。在同关光烈等人密谈时说：“有人反对林副主席”，“中央发下黄、吴、叶、李、邱的检讨材料，不要急于表态，要看一看。”刘还了解了该军实力情况，索取了该军的干部名单。五月下旬，刘锦平到武汉与王维国密谈，然后到广州和林立果密谈，并亲自将××军的干部名单交给林立果。六月中旬，刘锦平在杭州、上海与陈励耘等人密谈，并召见空四军、空五军团以上“左派骨干”进行“谈话”，空五军的一些人，还依次列队在刘锦平面前宣誓似的表态，“要永远忠于林副主席，忠于林副部长”。

刘锦平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深受林彪、林立果的赞赏。一九七一年五月，林立果在广州对刘锦平说，民航“搞得不错，广州搞得更好，超过了四军、五军，要向民航学习。”一九七一年七月，林立果在广州又对董崎说：“刘政委这次出去，任务完成得很好，工作很有成绩”。



### 三、建立反革命政变据点和特务组织

#### （一）建立反革命政变据点

一九七〇年九月十五日，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窜驻广州白云机场宾馆后，刘锦平立即派程兆贤将亲笔信送给林立果，又给米家农、王斌⑦打电话，要米、王“亲自负责”，为林立果“开展工作提供方便”，要“当成政治任务”，要向林立果“请示报告工作”，私自将广州管理局的领导权交给了林立果。林立果对米家农等人说：“广州管理局是我的家”，“要把我们管理局和各省（区）局建设成路线斗争的坚强堡垒和坚强根据地”。

林立果一伙首先用“接见”、送礼、看电影、封官许愿等手段收买领导干部，控制了广州管理局的领导班子。从一九七〇年九月至一九七一年九月，管理局党委常委开会四十六次，其中有三十四次是研究贯彻林立果的黑指示。林立果、米家农一伙还把各省（区）局、飞行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召到广州，由林立果多次“接见”，给他们封官许愿，灌输反革命思想。米家农、王斌带着他们逐个向林立果表态：“永远听从林副部长指挥和调动”，“为捍卫林副部长站岗、放哨”，“打头阵”，“不会当叛徒”，“紧跟副部长干革命干到底”。林立果、刘锦平、王维国、江腾蛟、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王飞、关光烈、陈玺等一群死党经常出没于广州，奔走于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等地，策划各种反革命阴谋活动。他们“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免费乘坐飞机，为所欲为，并自称河南省局是“解放区”，湖北省局是“春来茶馆”，广州管理局是“红色根据地”。林立果前后四次窜入广州，在白云机场宾馆共住了一百二十一天。林立果一伙一到广州，米家农按刘锦平的旨意立即封闭机场的宾馆，指派“对副部长感情最深的人”白天黑夜地站岗放哨，专门侍候。在其黑据点里，藏有大量黑书、黑文件，以及武器、弹药和各种特务工具。林立果一伙神出鬼没，召开黑会，策划反革命阴谋。刘锦平、米家农等大肆挥霍国家钱财，极力为林立果一伙的反革命活动提供经费和物资，米、王提出：“林立果想吃什么买什么，什么有营养吃什么”。林立果一人的伙食费平均每天三、四十元。广州市的鲍鱼罐头没有了，米家农、王斌就要机组到北京买，并打电话或派人到外地买鸡、鸽子、鲜虾，以及沙田柚子、衡阳蜜桔、河南西瓜、成都水蜜桃等等。刘锦平、米家农等人为林立果买了一辆伏尔加小汽车，还改装了一辆小救护车，安上收发报机，专供林立果搞特务

活动用。在白云山新建了一幢专供林立果搞特务活动和吃喝玩乐的秘密据点；又从广州市把过去陶铸在白云山上的别墅要来，加以扩建，准备供林彪、林立果一伙使用。林立果一伙在广州搞反革命活动期间，挥霍的国家经费仅广州管理局有据可查的就达二十八万七千多元。

林立果对刘锦平一伙说：“民航要在白云机场放一个伊尔十八飞行中队”，“在白云山打洞库，藏几架大飞机”，“中央一旦有事就方便了”。刘锦平心领神会，亲自到白云山察看了地形，收集了挖洞库的有关资料送给林立果，并提出要在一九七一年内完成广州大型机中队的组建。

一九七一年四月底，经刘锦平安排，林贼死党刘沛丰、于新野在北京与成都管理局原政委郑剑和十四航校的原政委谢立岑等人见面，策划了林立果到西南建立反革命据点的准备工作。刘锦平、张国民也亲自找谢立岑等人布置，要他们储备粮食、油、盐、干菜，准备应付“路线斗争最复杂最困难”“甚至打内战”的局面。指使他们“一是作舆论准备”，“二是力量准备”，“部队要掌握在你们手里”，“一旦路线斗争激化，打起仗来就可以调动”。根据刘锦平、张国民的黑指示，谢立岑等人进行了具体策划，制定了所谓“防暴乱”的三套行动预案，组织了六次所谓“值班分队演习”。五月中旬，于新野、刘沛丰到成都管理局、十四航校进行反革命游说。七、八月份，刘锦平到西南地区进行反革命游说时，对空军成都指挥所原政委丁钊说：“打起仗来首长（指林彪）要到这里来”。刘到十四航校检查了他们的准备情况，再次对谢立岑说：“尽可能储备些余粮”，“分裂时准备上山打游击。”刘到成都管理局为林立果在西南建立反革命黑据点选定了地点，策划了成都管理局领导班子的改组方案。

## （二）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

林立果、周宇驰对米家农一伙说：光靠“我们这些人还不够”，“将来客观形势一旦来临，要人无人，要干部无干部，不能象过去一样，日本投降都没有人接收”，因此，要“培训路线斗争的骨干，做培种育苗的工作”。广州管理局原“宣传队”，即“战斗小分队”，就是在林立果、周宇驰这种反动思想指导下，通过刘锦平、米家农秘密建立的一个反革命特务组织。这个“战斗小分队”，在林立果的直接控制下，对其成员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和各种特务训练。刘锦平、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亲自对“战斗小分队”训过话，说“小分队要出干部，培

养种子”，“一批一批地培养，一批一批地出去”。他们强迫队员白天黑夜“读、抄、背、讲”林立果的黑报告，说什么“要加深对林副部长的感情”，“感情是根本，……有了对林副部长的感情，一切都有了”。为了培养“感情”，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林立果“接见”队员时，米家农的老婆吕国贤（“小分队”指导员）故意不开电扇，亲自给林立果扇扇子，被树立为“对副部长感情最深”的“学习榜样”。林立果同吕国贤握了手，她竟恬不知耻地大叫她的手是“幸福的手”，逢人便握手，说是“分享幸福”。他们还多次强迫队员集体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要队员“永远忠于林副主席”，“一切服从林副部长，一切为着林副部长，一切想着林副部长，一切紧跟林副部长”，“做林副部长的宣传员、保卫员、通信员、战斗员”，“成为宣传副部长的先锋，捍卫副部长的尖刀，紧跟副部长的闯将”。这个“战斗小分队”有自己的反动“队歌”，有多种联络密语和暗号。他们给队员规定了十分森严的法西斯纪律：不准探亲，不准亲友来队，不准单独活动，不准恋爱结婚，不准单独谈话，不准随便打电话，不准泄露“林副部长”的秘密活动，等等，甚至女队员剪头发也要经过吕国贤批准，违者要受到批判或处分。

刘锦平、米家农一伙公然篡改党的“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另立“党（团）员标准”，妄图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为林家父子封建法西斯王朝上台作组织准备。他们搞的“党（团）员标准”是：承认林立果是“天才”，“是党的优秀接班人”；“对林副部长有深厚的感情”；“紧跟林副部长”。胡说这些东西“是入党（团）志愿书的新内容”。他们对“战斗小分队”发展的第一批党（团）员说：“是副部长给了你们第二次政治生命”，要求他们“做副部长的好党员、好团员”。并说什么“在我们‘战斗小分队’里入党入团，意义深远，……副部长当了领袖，……我们小分队里还会出中央委员哩！”妄图把他们变成林贼反革命政变的驯服工具。

林立果、米家农一伙操纵“战斗小分队”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他们打着排演样板戏的幌子，把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的报幕词全部篡改成他们的反革命语言，如第一场“常青指路，奔向红区”被改为：“副部长指引着奔向路线斗争的战场”，等等。他们公开说：“我们不是为了演戏而演戏，而是用演戏来掩盖我们的政治斗争”。在林立果、刘锦平的指使下，这个“战斗小分队”由吕国贤带

着，于一九七一年八、九月份窜到南阳、郑州、洛阳、武汉、沙市等地，进行所谓“传思想、传感情、传革命精神”的反革命串连活动，配合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大造反革命舆论。林彪、林立果自取灭亡后，米家农一伙还组织队员排演了最后一场剧，宣读了林立果一九七一年五月二十一日“接见”“战斗小分队”时的黑指示，高呼“打倒路线斗争中的敌人”等反动口号，并在队员笔记本上作反动题词：“不当叛徒”，“宁死不屈”，妄图要队员做林彪、林立果的殉葬品。

### （三）进行特务活动

刘锦平一伙在林立果的旨意下，采取打进来、拉出去、安钉子、搞窃听、跟踪盯梢等特务手段，收集和传递情报，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服务。在上海管理局，刘锦平通过王维国选调人员组建了一个“保卫队”，配发了枪枝，只受刘的亲信张海山<sup>⑧</sup>调动，上海市委负责同志出入虹桥机场的行动，他们都一一记在小本上。在广州管理局，除指挥“战斗小分队”进行特务活动外，还要乘务员做“交通员、通信员、联络员”；要候机室服务员“察颜观色，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仅一九七一年一月至九月，他们就指使某些人为林彪黑司令部传递秘密信件、材料四十多件。在总局机关，刘锦平指使其秘书和“左派骨干”学照相，学开汽车、摩托车，刘与林彪一伙的联系，都由程兆贤驾车联络；同时指使其亲信在首都机场的专机活动中，窥探中央首长的情况，偷听总理的谈话。刘锦平还利用黑关系，探听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动向，窃取党中央的核心机密。

伟大领袖毛主席巡视南方时，一九七一年九月二日，在南昌接见了军队和地方负责同志，民航江西省局原政委王起元立即秘密函告上海管理局原政委辛国良，辛又马上报告了刘锦平一伙，九月七日陈庆军等人去上海、杭州、南昌将探听到毛主席的情况当面报告了于新野、李伟信、王维国等人。于新野对陈庆军说：“象这样一类事情，你们以后要及时向上反映。”

刘锦平等人为林家从香港购买一部照相机及全套放大、冲洗设备，两部手提式摄影机；又布置民航某单位给“林办”研制保密电话机，为林彪、林立果一伙的特务活动提供工具。

### （四）对抗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指示，破坏飞行安全工作

毛主席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关于对外宣传问题作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反复强调“不要强加于人”。刘锦平一伙竭力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指示。

一九六七年七月,刘锦平在广州亲自主持召开的民航宣传服务工作会议上,提出“宣传统帅服务,”“宣传就是最大的服务,最好的服务”,要“地面红一片,空中红一线”等等。并擅自把随机乘务员的职称改为“空中宣传服务员”,把候机室服务员的职称改为“宣传服务员”,规定“服务员的首要任务是宣传”,“要大喊大叫,大蹦大跳”。如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不及时给旅客办理手续,却关上候机室、餐厅、厕所的门,把旅客都赶到大厅去看宣传队表演节目。有的乘务员在飞机上朝着苏联旅客的鼻子挥舞拳头,高呼“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口号。有的乘务员在飞机上戴着红卫兵的袖章,拿着喇叭筒,对着蒙古部长会议副主席的耳朵读毛主席语录,事后蒙古向我提出抗议,对外造成极坏影响。对此,周总理进行了批评,并指示在对外宣传中要区别对待,要讲究方式,要注意效果,不要强加于人。可是刘锦平等人拒不执行,公开对抗。

一九七〇年五月,王洪文同志率领我国工人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回国路经广州时,发现广州管理局在对外宣传中严重地强加于人,报告了康生同志。康生同志五月十三日批示:“派人对民航系统和广州、上海、北京、南宁等机场的对外宣传工作彻底检查一次”,“在民航一切工作人员中进行教育,改进对外对内的宣传工作”。刘锦平对中央首长的批评极为不满,攻击王洪文同志是故意“找别扭”,并跑到广州,多次召开座谈会,大讲对外宣传“成绩是主要的”,“可以演嘛!”“不要怕”。八月份,在总局召开的运输服务工作会议上,刘锦平等人只字不提中央首长的指示,却大肆宣扬广州管理局的宣传“搞得好”。在会上,刘锦平嚣张地说:“不要人家一讲,你们就不敢宣传了。”还说什么这“是一个方向问题,原则问题,必须坚持始终,坚定不移。”他们还利用总局政治部印发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情况介绍》指使人写文章诬蔑中央首长的批评是什么“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实行‘关’、‘卡’、‘压’”,是“妄图扼杀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新生事物”,“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扬言“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不管这股邪风是从那里吹来的,我们要坚决把它顶回去”。在林立果的指使下,刘锦平等人还破坏党的统一纪律和毛主席“抓革命,

促生产”的方针，非法招收了二百多名文艺兵，并抽调了大量在职人员，在各管理局擅自成立了庞大的专业宣传队。刘锦平竟扬言“就是丢掉乌纱帽，也要继续搞”。明目张胆地公开对抗中央首长的批评。

一九七一年六月，总理在首都机场欢送外宾时，又对民航的宣传服务工作，特别是对广州管理局的宣传服务工作作了指示和批评。刘锦平非常不满，当他听了总理指示的传达后，很不耐烦地说：“哎一呀！不要乱传，不要乱传！”当听到总理对首都机场候机室布置问题的指示时，刘锦平竟说：“怎么样布置，让总理的秘书来说一说嘛！”空军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时，刘锦平打电话“请示”周宇驰后，装“病”不参加会议，拒不写检讨，却派人到首都机场非法调查总理对民航的批评。七月六日，林立果在广州对米家农说：“他们对你们的批评，我第二天就知道了，听了以后很气愤，……你们要坚定，不动摇”，“广州管理局的成绩，任何人是抹杀不了的。”米家农向林立果表示：“有副部长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挥，我们一定能经得起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严峻考验”，“一定能把这块阵地巩固住，建设好。”刘锦平还派董崎赴广州向林立果汇报情况，请示对策。林立果一面指使他们不要硬顶，要“顺流而下”；一面叫嚷对外宣传“不能降到资产阶级水平”，恶毒地攻击说：“现在真有点怕外国人了，外国人说话比打雷还响”，“宣传不如不宣传，不宣传不如反宣传”等等。董崎有恃无恐，猖狂叫嚣：“要是候机室唱唱跳跳就是强加于人，那让外宾到剧院看样板戏不也是强加于人吗？”刘锦平等人还派了三个工作组到上海、广州、成都收集反证材料，大耍两面派，写假“检讨”，顽固对抗党中央、国务院。

刘锦平一伙在民航飞行工作方面，也极力推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九六九年，刘锦平等人给专业飞行部队每个机组发一套红旗、锣鼓，要求机组出发前大练文艺节目，到达专业基地后先演节目。他们不仅对飞行安全工作不闻不问，相反还疯狂反对周总理对民航工作“保证安全第一，改善服务工作，争取飞行正常”的指示，并煽动一些人对“保证安全第一”进行所谓“批判”。只要谁一提保证飞行安全，就扣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说什么“你们不要拿安全来压政治、压路线”，批评政工干部参加飞行值班是“不务正业”，甚至骂参加飞行值班的政工干部“是国民党的政委，还是共产党的政委？！”以致造成很多人不敢抓业务工作，不敢抓飞行安全，使飞行事故不断发生，给党和人民在政治上、

生命财产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一九七〇年，广州管理局发生伊尔十四 616 号飞机一等事故，刘锦平一伙在林立果的旨意下，不但不认真检查事故原因吸取教训，反而大肆表扬广州管理局，胡说什么从这次事故“看到民航突出政治热情高”，“在严重的事故面前经得起考验”，“摔了飞机没有摔掉士气，反而摔出了模范”等等。并把这个“模范”事迹编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情况介绍》专辑，铅印二千五百余本散发全局，号召大家学习。一九七一年九月，他们又积极推销林立果的所谓“九师经验”，妄图把广州管理局树立为“民航的空九师”。

#### （五）林贼自取灭亡后，刘锦平一伙的罪恶活动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后，刘锦平一伙十分惊慌，预感末日来临，急忙布置他们的骨干毁灭罪证，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十五日早上，赵庆生、董崎、陈庆军、程兆贤等秘密开会，研究对策。会后即分头掩埋和烧毁材料，与骨干通报情况，并用暗语打电话和派人向林彪死党江腾蛟、王维国、米家农以及辛国良等人通风报信。九月十七日，刘锦平又亲自召集张国民、赵庆生、陈庆军、程兆贤等开会，统一口径。刘锦平一伙还暗中布置“战略性退却”，要一些人“不再暴露”，“打进去”，“万不得已时，也只交代孤立性的问题，不交代有组织的活动”。有的竟散布“二十年以后再看”等等反革命言论。

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正在深入清查中，这里所整理的仅是一部分。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批林整风运动正在深入发展。遵照毛主席关于批林整风的一系列指示，希望大家进一步深入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刘锦平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查清与其有牵连的人和事，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坚决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 ①民航总局原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 ②民航总局政治部宣传部原部长
- ③民航广州管理局原政委
- ④民航总局指挥部办公室原主任，刘锦平的第一任秘书
- ⑤民航总局政治部秘书处原副处长，刘锦平的第二任秘书
- ⑥民航总局指挥部办公室原副主任，刘锦平的第三任秘书
- ⑦民航广州管理局原局长
- ⑧民航上海管理局政治部保卫处原处长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来源：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主要罪行材料汇集（初稿）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反革命别动队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于一九六七年四月，来到空军，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跟着林彪、叶群，仓惶出逃，自取灭亡。在这四年半的时间里，林立果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伙同吴法宪以及周宇驰、江腾蛟、刘锦平、王飞等一小撮死党，大造反革命舆论，秘密建立和发展反革命特务组织，炮制《“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策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罪大恶极。现根据揭发材料，将其主要罪行汇集如下：

#### 一、建立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

一九六七年四月，林彪、叶群出于反革命目的，把林立果送到空军。这个连党员也不是的林立果，一来就当了空军党委办公室的秘书。同年七月，按林彪旨意，经吴法宪批准，在党办成立了以林立果为组长的“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组员有王飞、周宇驰、刘沛丰等人。这个“调研小组”就是法西斯组织小“联合舰队”的前身。

一九六九年二月十六日，林彪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老虎（林立果的小名）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反革命的“独立工作能力”。同年十月，正当林彪擅自发布“第一个号令”，进行篡党夺权预演之时，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旨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一九七〇年五月以前，林立果与周宇驰、王飞一伙进一步勾结，以原来的“调研小组”为基础，建立了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法西斯别动队——小“联合舰队”。“舰队”的头目是林立果，内部称他“司令”、“旗舰”。成员有王飞、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刘世英、程洪珍、李伟信、吴达云（空司办公室一处原秘书）、陈伦和（空司办公室外事处原翻译）、王永奎（空司情报部原副处长）、许秀绪（空司雷达兵部原副处长）、王琢（空司汽车队原队长）等十几个人。“舰队”内部建立了政治、技术、理论资料等几套班子，周宇驰是“总管”。他们的



反革命誓言是：“一辈子都紧跟首长（指林彪）、林副部长（即林立果）”，“准备坐牢，流血牺牲”，要“独立自主，自成体系，发展独立的政治力量”。

一九七〇年七月，在林彪指使下，吴法宪一伙经过密谋策划，在常委办公会议抛出“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把这个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为空军的“太上皇”，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林立果按照林彪的旨意，在空军和民航的一些单位中，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策动反革命政变。林彪说：“林立果不但要指挥空军的小联合舰队，全军的大联合舰队也要归他指挥。”

## 二、炮制黑“报告”，刮起吹“天才”的反革命妖风

在林彪一伙策动庐山反革命政变的前夕，林立果带着周宇驰、刘沛丰、程洪珍、刘世英、许秀绪等一小撮死党，钻进反帝路招待所的黑据点，炮制所谓的“讲用报告”。这个紧密配合林彪反党夺权阴谋的赫鲁晓夫式的报告，完全是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各种反动观点的大杂烩。

这个“讲用报告”的出笼，是林彪、叶群直接策划和指使的。“讲用报告”的主要部分，就是林彪准备在“九大”抛出的反革命讲话稿，加上一些剽窃、抄袭来的资料，拼凑而成的。报告出笼前，叶群在毛家湾黑窝亲自组织了试讲。林彪听了录音，说：“不仅思想象我的，语言也象我的”。

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经吴法宪等批准，在空直机关二级部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林立果抛出了这个“讲用报告”。以后这个“讲用报告”录音又在空军第三次“三代会”上连放两次。一群死党鼓噪而起，大肆吹捧。吴法宪说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放了一颗政治卫星”。周宇驰说，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林立果是“无师自通，不思而得”，是“第三代接班人”。王辉球同志也大吹林立果是“天才”，说“讲用报告”是“对空军建设的指示”。林立果也得意忘形，今天“接见”这个，明天与那个“合影”，恬不知耻地说什么“大家日夜想念我，我也想念大家”。空军“三代会”上这股吹捧“超天才”的反革命妖风，与林彪一伙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遥相呼应。老子儿子，一唱一和，山上山下，密切配合。

林立果、周宇驰还以对“讲用报告”的态度为标准划线排队。他们秘密布置把“三代会”上“表现好”的和“表现差”的干部列个名单，“记下一笔帐”。刘

世英专门组织一帮人四处探听，发现“感情深”“跟得紧”的就立即拉拢，又送东西，又请吃饭；对不赞成他们的做法，或吹捧不积极的，轻者扣上“路线觉悟低”、“政治不敏感”、“糊涂蛋”等帽子，重者列为“右派”、“反动势力”，进行迫害打击。

### 三、私上庐山，直接参与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林彪、叶群私自把林立果带上庐山，大搞阴谋活动。林立果充当了林彪、叶群的秘密联络员，与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秘密联系，向他们传达林彪的黑旨意，指挥他们向党进攻。在林彪指使下，吴法宪、林立果私调了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庐山待命。他们还安装了六条电话专线，进行秘密通讯联络，反革命活动频繁，气焰极为嚣张。

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被粉碎后，即指使林立果找王维国、陈励耘进行安抚、鼓气。林立果秘密地开出一辆汽车拉上陈、王两人，在车上边走边谈，说：“首长（指林彪）、主任（指叶群）对你们暴露受损失很心疼”，“看来这个斗争还长”。指使他们按照林彪“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的黑旨意，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

### 四、炮制“571”反革命纲领，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二日，林立果随林彪、叶群窜到苏州，继续策划反革命政变。二月二十日，林立果从苏州去上海，二十一日又从上海到杭州。在杭州，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与陈励耘进行了十多次密谈，研究反革命政变计划。三月十八日林立果带于新野从杭州回到上海。当晚，林立果对于新野和李伟信说：“根据目前局势，要设想一个政变计划。”三月二十日，林立果召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研究制定政变计划。林立果说：“这件事与首长（指林彪）谈过，首长叫先搞个计划。”这个反革命政变计划的代号是林立果定的，按照“武装起义”的谐音，取名为“571工程”。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与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即《“571工程”纪要》。

一九七一年三月底，林立果在上海召集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开了一个所谓“三国四方会议”，对执行反革命政变计划作组织上的准备和分工。林立果在会上宣布：上海由王维国负责，杭州由陈励耘负责，南京由周建平负责，

三个地方的协调和拉总由江腾蛟负责。这个黑会从晚上十点多钟一直开到次日晨六点多，整整开了一夜。林立果临走时对王、陈、周等招手说：“再见，祝胜利会师！”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 五、大造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舆论

林立果、周宇驰等大肆散布“当前路线斗争就是围绕着对林彪的态度展开的，斗争的焦点是对接班人的认识问题”，“是捍卫林彪副统帅的地位问题”。他们竭力鼓吹“进行路线教育，就是解决一个站队问题”，“说穿了就是跟什么人走的问题”。鼓吹“选择政治领导”，胡说什么“政治斗争很复杂，每个人都得找个靠山和后台”，“要解决政治生命依附谁的问题”，要“把政治生命依附于林副主席一家”。一伙死党公开叫嚣：“当前就是要突出宣传林副主席”，捍卫林彪的“最高副统帅”和“接班人”的地位，捍卫林立果在空军的“最高领导地位”。在林立果指使下，由刘锦平具体掌握，在一些单位进行了所谓“路线教育试点”，还总结了题为“学习林副部长，捍卫林副部长在空军的领导地位”的所谓“经验”，广为传播。林立果十分得意说：“这样搞正面教育，抓部队，建立了感情，到时候就听指挥了。”

他们还造谣说，“有人想抢班，想夺接班人的权”，“秀才要造反”，“笔杆子压枪杆子”，为反革命武装政变作舆论准备。林立果说：“从现在起，一个月到半年之内，可能出现大的反复、大的风暴。”叫嚷要“积聚力量”，“迎接未来的政治大风浪”，要准备“掉脑袋”，“上山打游击”，“同舟共济，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

#### 六、发展法西斯特务组织，建立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

为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需要，小“联合舰队”在林立果的指挥下，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制订了行动计划、组织方针，规定了联络暗语和代号。他们研究了“技术掩盖政治”、“严格保密，不让人摸到规律”等反革命策略。他们规定发展党羽的原则是“步子稳妥，多做个别工作，看准了才打招呼”，“要经过请示报告”，“先过渡到舰队外围，后再进入舰队”。他们按照“北京是中心，兼顾沪、穗”的反革命原则，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秘密地成立了“调查小组”、“技术小组”、“战斗小分队”等反革命组织。

林立果给“舰队”规定了一套法西斯纪律,一再强调“舰队”要培养“江田岛”精神,要“舰队”成员绝对服从,“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林彪、林立果。规定“舰队”研究的问题、布置的任务“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叛变者,严厉制裁”,要“掉脑袋”,“杀子断根”。

他们进行了特务训练,学会了使用各种轻武器和特工设备,驾驶各种汽车以及掌握照相、窃听、盯梢等技术。林立果、周宇驰秘密地进行了驾驶坦克、水陆两用汽车的训练。周宇驰还秘密地学会了驾驶直升飞机。他们有陆、海、空军三种服装和陆、海、空三军及地方汽车的车牌,有的车牌正反两面喷有两种车号,可以随意调换。

他们大量搜集古今中外政变的资料,挖空心思地研究反革命政变的伎俩。一九七一年八月,林立果指使于新野搜集和摘录了政变和谋杀的二十八个事例。

林立果通过王维国在空四军建立“教导队”,秘密组织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林立果指派“上海小组”(即“分舰队”)组长裘著显,副组长蒋国璋亲自掌管,并派小“舰队”成员吴达云去协助。一九七一年八月,林立果还专门查问“教导队”的情况,并交代“要保密”,“要一期一期办下去”,“毕业时走一部分,留一部分”。他们规定“教导队”在政治上要培养对“首长”(指林彪)、“副部长”(指林立果)的感情,要“一辈子紧跟林立果”,“甘愿做一颗螺丝钉,林立果拧在那里,就在那里发光”。军事上“要多学几手,多配些汽车、摩托车和枪,增加机动能力”,秘密地进行擒敌拳廿套和步兵动作、打靶、刺杀等训练,掌握各种轻武器的射击技术,并配备了最好的武器。他们对“教导队”严加控制,隔绝队员与外界的联系。

#### 七、设立反革命据点,大搞特务活动

法西斯分子林立果伙同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人,在北京、上海、广州、汕头和北戴河等地,设立了十多处反革命秘密据点。仅在北京一地,他们先后在空军反帝路招待所、幸福村招待所、原空军学院、西郊机场、原空军二高专设立了五个秘密据点。这些据点非常隐蔽,汽车可以开到房子里。有的房间安了两、三道门,只许几个人出入。窗户上安有铁栏杆,两层玻璃,三层窗帘。在白云山的据点还设有岗楼、了望台、警铃踏板。他们在这些秘密据点里,召开黑会,秘密串连,收集情报,训练特务,策划反革命阴谋。特别是原空军学院和西郊机场的

两个秘密据点，成了他们具体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指挥所，事后从这些据点里，搜出了大量的轻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匕首等杀人凶器，录相机、照相机、录音机、窃听器、警报器、各种收发报机等特工器材以及窃取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文件。

林立果还盗用了大量通讯器材，在黑据点架设专用线路，建立秘密通信网。仅在北京的黑据点以及死党的宿舍，就拉了七十对专线，安装了六十四部电话。他们还盗用了电话保密机十八部，航空救生电台十三部，进行秘密联络。

在这些黑据点里，林立果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黑据点内部陈设极其豪华，多是派专人到各地购买的高级物品，也有不少是从外国进口的生活奢侈品，如：尼龙蚊帐、鸭绒被、地毯、沙发、沙发床、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高级轿车、电气暖具、吸尘器、吸潮器、高级药品、电动牙刷等等。据反帝路招待所、西郊机场、原空军学院、原空军二高专四个黑据点统计，修缮、扩建、增添设备和购买高级消费品，就花了十五万八千二百多元。

#### 八、窃取重要情报，盗窃核心机密

以林立果为头目的小“舰队”曾多次开会布置收集情报，着重收集和窃取有关毛主席、中央负责同志以及许多地方和军区负责同志的情报，给林彪、叶群通风报信。一九七一年八月，江青同志去青岛，于新野探听到这一情报后，马上通报给正在青岛空军疗养院为林立果开辟黑据点、找济空原司令员吴宗先串连的江腾蛟，并把他召回北京。八月以后，林立果派于新野等人窥测、跟踪毛主席的行动，窃取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内容。

林立果指使死党、亲信，盗窃了大量的核心机密。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林立果随林彪去国防科委，借看尖端绝密产品的机会，用录相机把介绍的所有实物和战斗性能、技术数据等资料全部录走。他们在空军窃取了全空军作战实力，组织序列表，全空军团以上干部名册，我国发射导弹、卫星的雷达观测资料等核心机密。一九七一年九月，周宇驰等人还从空军司令部窃取了“三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可供导航用的我国周围各国广播电台的频率和时间表，北京至蒙古乌兰巴托、苏联伊尔库茨克的航线图和沿航线的机场位置、导航台呼号、频率，我国华东、中南几个省的一、二、三级机场资料，以及全国的飞行资料等等。

林立果一伙还有计划地侦察了不少地区的重要目标和地形。一九七一年五月，林立果、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程洪珍，在顾同舟等人的陪同下，到深圳、沙头角一带侦察地形。七月十四日，林立果乘安—24 飞机从汕头返回广州，故意偏离规定航线，对香港、九龙一带沿海地区进行了窥测拍摄。与此同时，还指使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到了良乡、郑州、南昌、长沙、新城、韶关等一百一十九个地点，特别对北京近郊地区的重要目标，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射台、重要通信枢纽、军事阵地等，反复进行空中侦察和照相。

#### 九、以搞“科研”为名，研制特务工具

林立果、周宇驰指使李伟信、王永奎、贺德全等人，研制了十多种特工器材。其中有电压高达几千伏的手握麻电器、汽车麻电器，有搞特务窃听的自动电话盲音消除装置，有能自动报警的电子警戒装置，有进行秘密联络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有特制的电话保密机，有互相拍发暗号进行联络的汽车自动喇叭，以及消灭罪证的快速碎纸机等。为了加快试制和购买新的特务工具，林立果动用了外汇十万三千四百八十三美元，从国外进口了微型照相机、微型窃听器、警报器、录相机等大量特工器材。林立果一伙还盗用了各种战备器材，仅在北京几个单位的初步统计，被他们盗用的望远镜、录音机、收发报机、光电自动发报机、频谱分析仪等贵重器材和精密仪表就有一百五十五部，各种电子元件九千一百余件，各型钢材近百吨。

林立果、周宇驰还组织四十多名翻译，用了近一年时间，翻译进口的特务工具技术资料及说明书。

#### 十、抓部队，搞武器，大搞“陆战”训练

小“舰队”确定“基本方向是抓部队，抓军、师两级，抓关键部队”，“建立根据地”。林立果说：“解决问题还是靠部队”，“这是基础工作，不要天天在机关里窜来窜去”。他一再要求“舰队”成员“眼向下，二、三人一组在外面跑，名义是下部队调查研究，实质上多开辟象空九师那样的部队。”

林立果早就通过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等人，控制空四军、空五军，妄图把这两个部队变为他们“安全的基地，可靠的基地，信任的基地，放心的基地”。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立果一伙一面秘密策划，从驻京院校内抽调了一批所谓“左派”，去空四军加强“基地建设”，一面又通过王璞、顾同舟、解耀宗等人，把

黑手伸进广空的一些单位。一年之内，林立果曾在空十二军搞了十五次所谓“接见”，要解耀宗等人把“根据地”“巩固好”，准备“在更大范围内起作用”。为了拼凑反革命政变力量，林立果一伙采用吹吹拍拍、拉拉扯扯的手法，以小恩小惠、封官许愿、请客送礼，腐蚀干部，拉人下水。林立果说：“送东西，主要是送政治，面要宽一些。”在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会期间，林立果派周宇驰、刘沛丰等人大搞反革命串连，找一些单位来开会的领导干部谈话、送礼，进行“路线交底”，把有的人引上贼船。

一九七一年三月以后，林立果以及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刘锦平、王维国、陈励耘、胡萍、鲁珉、曾国华、何振亚、郁文等四处奔走，分别窜到北京、上海、杭州、广州、长沙、武汉、西安、兰州、南昌、成都、昆明、郑州、洛阳、济南、青岛、大连、天津、保定、新疆等地，进行反革命串连。

与此同时，林立果多次向王维国、陈励耘、王璞、顾同舟、解耀宗等人交待：要加强空军的“陆战能力”，“做到空中能打，地面能战”，“对付路线上的敌人过得硬”。王维国、陈励耘组织了“武装营”，装备了“火力车”（把枪炮安装在汽车上），大搞“陆战”训练，还搞了歼击机超低空训练，高炮打坦克的实弹射击。王璞、顾同舟、解耀宗等人利用广空参谋工作会议、后勤场站工作会议，公开下达了“陆战训练”的任务，提出“机场要人人皆兵”，“把场站变成陆战团”，要军、师、团组织“陆战领导小组”，制定“陆战行动预案”。

林立果一伙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搞到了大批武器。一九七一年三月，林立果给王维国弄去新式微型冲锋枪样枪和图纸，进行仿制。林立果还指使王维国制造步枪、冲锋枪和穿甲弹（要求能穿透九十至一百毫米厚的钢板），又要王璞、顾同舟等人秘密试制半自动步枪和手榴弹，成立“造枪改炮小组”，用废旧航空火箭、火炮，安上支架、轮子，用于地面作战。

十一、导演“安全现场会”，发动所谓的“夏季攻势”

一九七一年七月，经林立果、周宇驰一伙策划，在空九师召开了所谓“安全现场会”，借着推广“安全飞行经验”，大造反革命舆论，进行反革命串连。林立果一伙采取内部串连的办法，拉了四个军区空军和五个军、十四个师、三个独立团，共一百四十三人参加。会议前夕，林立果与顾同舟进行了密谋。林立果说：这次会议“主要是争版权，要防止别人摘桃子”。并对死党和亲信说：“你们都去，

要上主席台，亮亮相，告诉他们，你们都是我林副部长身边的人”，“这次打个大胜仗，你们都是有功之巨”。会议期间，林立果在白云山黑据点遥控指挥，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等死党在现场策划。会议文件和讲话材料都经过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等修改定稿。他们规定会议要“敞开心扉谈认识，满腔热情抒感情”，说什么“抓安全要感情第一”，继续吹捧“讲用报告”和“两个一切”，狂热地吹捧林立果。在会议过程中，他们还逐个摸底排队，搞“路线交底”，进行拉拢。整个会议搞的乌烟瘴气。会后，林立果又“接见”一些人，说他们“路线觉悟高”，要“多保重身体”，“将来要从大家这里出干部。”经过这次会议，再次刮起了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胡说什么林立果搞的这个“典型”，是“空军的大寨，空军的大庆，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设军队的样板”，“对空军建设又一重大贡献”，“放了第二颗政治卫星”。吹捧林立果是“群众的最好领袖”，是“非常优秀、非常成熟的接班人”，表示“认准了，跟定了”。林彪死党叫嚣“不怕风紧浪急”，“就是戴着钢盔也要跟林副部长干到底！”接着，他们又搞纪念“讲用报告”一周年，大量印发“讲用报告”，召开纪念会、“感情讲用会”，大搞表“决心”，献“忠心”，使这股反革命妖风越刮越烈。林立果、周宇驰把这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称之为“夏季攻势”。

## 十二、阴谋“加快、提前”实行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林彪、林立果一伙十分恐慌，他们千方百计刺探和窃取会议的情况。林立果对会议作了三种估计：“（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指林彪）。”他们准备如果中央的会议点林彪的名，就“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四月二十三日晚，林立果指使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开了一个黑会，具体研究反革命政变的部署。林立果在死党内部宣布，将这次行动的具体指挥权交给王维国，到时候“四、五军的部队向上海靠拢，接管上海市”，林彪“就宣布接班，全国实行军事管制”。“如不能到北京就准备去广州，以西南山区为依托，以广州为根据地，进行北伐，重新打出一个统一的局面，最少打出个长江为界来”。后来他们看到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并没有点林彪的名，才把反革命政变计划推后，继续加紧准备，待机而动。

## 十三、策划和实施两项反革命阴谋



一九七一年八月，正当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林立果、周宇驰窜到北戴河，并乘坐直升飞机往返于北京、北戴河之间，传送情报，受领林彪的反革命旨意，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林立果对其同伙说：“十月要召开四届人大，在此之前要召开三中全会，开会就有斗争，斗争的问题还是个权力重新分配的问题”，“我们只能上，不能让”，“不能等着让他们杀我们的脑袋，要先下手为强！”他们叫嚣：“现在就是要考虑选一个适当的机会，甚至采取一种非常手段，给林彪制造一个上台的条件。”

九月八日，林彪向他的死党下达了反革命政变的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当晚十时半，林立果从北戴河拿着这个“手令”回到北京，从八日午夜到九日凌晨，召开了一系列黑会，按照林彪的旨意，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时谋害中央政治局负责同志，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首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林立果、周宇驰找江腾蛟密谋。林立果在出示了林彪的手令以后，布置江腾蛟去上海地区“动手”，提出了三条办法：一是火焰喷射器、四〇火箭筒打火车；二是调几门一〇〇高射炮平射打火车；三是实在不行，就要王维国乘接见时动手。林立果还说：“首长（指林彪）讲，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江腾蛟、周宇驰又补充了两条办法：“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把××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林立果布置“舰队”成员王永奎找人研究把油库烧着而又不致被人发现的办法。

接着林立果、周宇驰找王飞密谋，布置王飞攻打钓鱼台，谋害中央政治局的同志。随后林立果、周宇驰又召集“舰队”成员刘世英、刘沛丰、李伟信、程洪珍等四人在原空军学院黑据点开会。林立果凶相毕露地说：“现在决定进行武装起义”，“这里（指空军学院据点）就是指挥部。你们都是指挥部的成员。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准备争取国庆节前后解决问题，胜败在此一举。”还说：“本来想多抓一些部队，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个人用，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你们要好好干，干好了当中央委员，甚至政治局委员，再好的可以当常委。总政拿过来，北京军区拿过来，你们想干什么还不行！”“这次可要论功行赏。”林立果还狂叫：要“进攻钓鱼台！”

与此同时，派于新野到上海向王维国下达了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任务，又到杭州同陈励耘密商用伊尔—10 飞机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恶计划。

九月十日，林立果调关光烈来京。当晚，林立果、周宇驰与关光烈在反帝路招待所据点密谈。九月十一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又找关光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开黑会，研究攻打钓鱼台的方案。林立果对关说：“把你找来，是调你的部队解决钓鱼台问题。”拿出预先绘制的钓鱼台地图给关看。并具体询问了关光烈所属部队有几个团？多少火焰喷射器、火箭筒？部队能否调出来？多长时间可以调出来？等等。林立果怕火车调部队慢，容易泄露，打算用安—12 飞机运。林立果、江腾蛟、王飞、关光烈、于新野还偷偷地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他们还策划过“用空司警卫营冲”，“用飞机轰炸”，“调一个坦克团”等手段攻打钓鱼台。

九月十一日晚，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与鲁珉等人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开会，再次具体策划行凶的方案。会上，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人脱掉上衣，提着手枪，杀气腾腾。林立果说：“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不成就看鲁部长（指鲁珉）在硕放第二次攻击。”还说：“事情成功之后，你们就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

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九月十一日提前离开上海回京，从而打乱了林彪一伙的反革命部署。他们第一项反革命阴谋破产了，又慌忙决定实行第二项反革命阴谋，妄图携带黄、吴、李、邱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内战。

九月十二日下午，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根据林彪旨意，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研究南逃计划。接着周宇驰又找江腾蛟、王飞进行密谋。周宇驰说：“情况紧张，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到广州后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把中央和军委都搬到广州，另立中央。”疯狂叫嚣：“到那时，广州电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两个中央，两个司令部，只有通过全面内战或谈判来解决矛盾”。

十九时四十分，林立果通过死党，私调 256 号三叉戟飞机一架，潜往山海关待命，准备次日供林彪、叶群、林立果南逃时使用。在山海关机场，林立果对机组人员说：“明天首长（指林彪）要坐这个飞机”，你们“要听林副主席的指挥，关键时刻要起作用”。他们又安排依尔—18 一架准备十三日晨送周宇驰、胡萍去山

海关, 然后随林彪去广州, 该机则经上海拉“上海小组”、“空四军教导队”的人员去广州。还安排三叉戟、安—24 各一架, 供黄、吴、李、邱和由北京去广州的人使用, 并计划用安—12 一架运走两架云雀直升飞机。他们预谋于九月十三日晨七时起飞, 南逃广州, 并通知了王维国、陈励耘、顾同舟等人负责接应。晚上二十一时许, 王飞按照林彪、林立果旨意, 在空司办公楼内秘密召集于新野、刘世英、鲁珉、贺德全、朱铁铮、郑兴和等开“七人黑会”, 策划“南下”行动方案, 拟定了第一批随从南逃的名单, 确定了编组方案。王飞还宣布江腾蛟是这次行动总指挥, 鲁珉、贺德全是副总指挥。于是林彪死党慌忙收拾行李, 整装待命。

但是, 由于毛主席于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 又一次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计划。晚二十二时半左右, 中央追查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 并决定必须有周总理的指示, 256 号飞机才许起飞。他们的第二项反革命阴谋又破产了。

#### 十四、狼狈投敌, 自取灭亡

林彪感到阴谋败露, 末日来临, 立即仓惶逃命, 决心叛国投修。九月十二日二十三时半, 林立果气急败坏, 慌忙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 下达了停止南逃行动的“命令”, 并告周“要北上”(即叛国投靠苏修)。周宇驰、于新野同时布置小“联合舰队”成员王永奎、陈伦和、许秀绪、王琢等人集中到原空军二高专秘密据点待命。

九月十三日凌晨零时三十分, 林立果、刘沛丰等少数死党, 跟着林彪、叶群, 爬上三叉戟飞机, 仓惶逃命, 狼狈投敌。二时三十分, 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 机上林彪等人全部丧身火海。狂妄不可一世的林彪反革命别动队的头目, 法西斯分子林立果和他的老子一样, 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于十三日凌晨三时十五分, 私调“直五”型直升飞机一架, 企图外逃未遂, 周、于畏罪自杀, 李伟信被我生俘。

这样, 继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 林彪反党集团又一次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政变被彻底粉碎了。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四月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死党江腾蛟的反革命罪行材料汇集（初稿）

林彪死党江腾蛟，是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凶手，是一个极端仇视毛主席、极端仇视共产党、极端仇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极端仇视中国人民、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分子。现根据空直机关的揭发和有的人的交代材料，将其主要的反革命罪行汇集如下：

#### 一、林彪的忠实走狗

江腾蛟极力追随林彪，得到林彪赏识。一九六五年秋，叶群、吴法宪带了一帮人到江苏太仓洪泾大队，以搞“四清”为名，组成了效忠林家的黑班底，江腾蛟积极入了伙。

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把林立果、林立衡送到上海，交给江腾蛟保护起来。叶群亲自给江腾蛟打电话：“这两个孩子可是林副主席的两只眼睛，你要好好照顾。”江含着眼泪回答：“请放心，有我江腾蛟在，就有他们两人在。”他先把林立果、林立衡藏在南京，向亲信交代：“要绝对保密，绝对保证安全。使用的车辆要严格消毒。”后来，他又把林立果、林立衡伪装成记者、秘书，带在身边，专门调派一架飞机，窜到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进行阴谋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抛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的反动口号，反党乱军。江忠实执行林彪的黑指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破坏南京、上海、杭州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煽风点火，蒙蔽群众，把矛头指向南京军区领导。秘密收集整理军区领导同志的黑材料，送给林彪。他得意洋洋地对党羽说：“老实说，我在南京的做法，没有上面的指示，我能随便干吗？”“我的后台在北京，又粗又硬。”正当南京地区的部队、群众要清算江腾蛟罪行的时候，林彪、吴法宪一伙于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三日，派他到西南地区，参加航空兵三师击落美帝入侵飞机的庆功会，给他加上“空军部队负责人”的头衔，代表空军领导机关宣读中央军委嘉奖令。使他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

一九六八年四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将江腾蛟调离南京。林彪通过吴法宪，事先把决定告诉了江腾蛟，并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保护起来，要他“深居简出”，“避一避风头”。江经常出入林家，成为林家的座上客。林、叶还把发给政治局委员的文件和揭发江的材料，送给江看。叶群吩咐张发云（跟随江腾蛟的空政秘

书处原处长)：“江腾蛟是好同志，要好好照顾。”林彪对江腾蛟的女儿说：“以后有谁迫害你爸爸，就来找我。”还亲自对江说：“没有职务照样干‘革命’。”当年“五一”，林彪一伙安排江上了天安门，名字还登了报，公然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

林彪、吴法宪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把江腾蛟安插在空军领导机关。林彪对吴法宪说：“江腾蛟这个人要用。不但要用，还要重用。象江腾蛟这样的好干部要是不用的话，再就没有干部可用了。”吴秉承林彪的意图，一九六九年初，要江作为王辉球同志的“助手”抓空军政治工作，并让他继续抓南京空军的所谓“重要专案”。同年五月，在空军第四次党代大会上，不顾代表们的反对，硬把江塞进空军党委，并安排为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成员。同年十月，又让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江腾蛟担任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

江腾蛟是林家最忠实的鹰犬。他经常无耻地说：“是‘首长’（指林彪）和‘副部长’（指林立果）救了我，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江腾蛟，就没有我的一家。我一家要永远忠于林副主席，永远感激林副主席一家。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死，也要跟着林副主席干。”

## 二、党和人民的死敌

江腾蛟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他恶狠狠地说：“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都专到我姓江的头上来了。”他污蔑社会主义制度，胡说：“建国二十多年了，生产还是那个样子，停滞不前，工人农民收入很少，现在是群众敢怒不敢言”，“你们不要把世道看得这样公平，这样合理！真正公平合理的世道是有的，那是将来的事，等‘首长’和‘战友’（指林立果）掌握了党和国家领导权才能实现。”他疯狂地说：“我有林副部长领导，有‘首长’和‘战友’做后台，有人反我十年，也没关系。”“我就不相信我姓江的就没有出头之日！”

江腾蛟出于反革命本性，早有叛国外逃的企图。一九七〇年十月间，江对他老婆李燕平讲：“现在不光全国各地，就连国外，我江腾蛟也还是有点名的。我要真到外国去，还真错待不了我呢！像这么个对中国军事情况了如指掌的将军，他们还不当宝贝供养起来？！我这样的人在他们那里可是有大用场啊！”李伟信为林

立果购买特务器材，从香港回来，江腾蛟向李了解香港的情况。据江的女儿揭发，江曾去过深圳活动。

一九六八年一月，叶群要吴法宪把江腾蛟叫到北京来，当面交代要江腾蛟整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江写好后交吴法宪，吴亲自修改后送给叶群。一九七一年四月中旬，在林彪一伙加紧实行《“571 工程”纪要》的时候，江腾蛟要王维国抓紧搞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说什么：“要敢于上纲，敢于加工整理”，“要懂得这是斗争的最好炮弹”，把矛头直接指向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 三、积极配合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

江腾蛟狂热吹捧林彪、林立果，为他们篡党夺权作准备。一九七〇年，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发动反革命政变前夕，江秘密指使李同云（空军报社原副总编），同陈励耘、王维国、查全伦、王宝功（沈阳空政主任）等人，组织力量，炮制了《伟大的战略措施》、《四个第一好》、《四好连队运动万岁》、《三八作风是传家宝》四篇反党黑文章，鼓吹“不可分割论”和“天才论”，为林彪树碑立传。叫嚣：“自觉地把保卫林副主席接班人的地位作为高于一切的革命大节，毕生的战斗使命”。这些反党黑文章，经过江修改定稿，密谋先在《空军报》发表，再送《解放军报》，后来因为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未敢拿出来。江腾蛟极力推行反革命的“两个一切”，搜集、掌握贯彻的情况和反映，并催促政治部要很快传达。他积极参与炮制林立果的反革命“讲用报告”，事先周宇驰到他家里同他商量过“讲用报告”的内容，“讲用报告”出笼前，江腾蛟看了稿子，表示完全同意。空军“三代会”期间，江在幕后进行秘密活动，策动在会上放“讲用报告”录音，操纵一些人大肆吹捧林立果，与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密切配合。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江腾蛟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光辉文献《我的一点意见》，对抗批陈整风运动，顽固坚持林彪“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他狂叫：“不承认‘天才’，就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去了‘天才地’那三个副词，根本目的是为了反对‘首长’。”同时，他狂热地吹捧林彪“一贯正确”，“比恩格斯、斯大林高得多”。吹捧林立果“是新发现的领袖人物”，“是接班人的接班人”。他还炮制了歪曲党的历史、吹捧林彪的所谓“路线教育材料”，并且指使亲信大量印发林立果反革命的“讲用报告”。他为了炮制林立果的所谓飞行安全经验，

事先，亲自窜到空九师活动，并对王璞、顾同舟、查全伦等人说：“这是在林副主席那里挂了号的，林副部长亲自抓的，一定要抓好。”还规定他们每半个月向他汇报一次情况。开现场会时，他还指使亲信秘密串连一些单位的人参加会议，再一次刮起吹捧林立果的反革命妖风。

#### 四、拉拢干部，安插亲信，妄图控制部队

江腾蛟极力鼓吹“亲不亲，线上分”。胡说：“只要对林副主席一家感情深，其它方面有毛病也要大胆使用”，“不要老啃着死东西不放”。他要李瑞昌（空政干部部原部长）等人为林家“把好关”，“掌好用人权”。并且规定：“空军师以上干部和南京空军团以上干部提升调整都要先告诉我。”江腾蛟等人还策划通过“调整”、“更新”干部，提拔重用亲信。通过控制“专案”，残酷迫害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

江腾蛟四出活动，进行反革命游说，拉拢干部。他带着亲信，曾先后窜到济南、青岛、上海、广州、桂林、长沙、武汉、孝感、西安、成都等地，了解干部对林家的感情态度，推行反革命的“两个一切”。他还根据林立果的交代，于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带着亲信窜到空降兵十五军“摸军、师两级班子的情况”，做“工作”。江腾蛟一伙采用“路线交底”、封官许愿、请客送礼、参观游览等种种手段，拉山头，搞宗派，欺骗和拉拢某些单位的一些人。

江腾蛟按照林立果“派人下去抓好部队”的黑指示，加紧策划把他们在机关的一些“骨干”派到部队去。一九七一年初，他与林立果、周宇驰、王维国密谋，以支左为名，从驻京院校挑选了一些他们认为靠得住的人，到空四军“加强根据地建设”。江还策划从空直机关调出“三分之一的‘骨干’下去抓部队”。指名要安插一些党羽到军、师去担任领导职务，妄图控制某些单位。

#### 五、参与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策划召开反革命的“三国四方”会议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四日，江腾蛟化名“何坚”，假造病历，以检查“有无癌变”为名，乘夜航专机秘密窜到上海，潜藏在一幢小楼里四十多天。在这期间，他与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等多次密谋，炮制反革命政变纲领《“571工程”纪要》。三月底，江腾蛟参加了由林立果召集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与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一起，策划了执行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的组织准备和分工问题。会上，

他接受了林立果的旨意，负责上海、杭州、南京三个点反革命活动的协调和拉总。会后，江得意忘形地对李燕平等人说：“现在把方案定了，就好办了。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了！哈哈！我这几年也总算没有白斗，只要方案一完成，我们的愿望也就实现了！”完全是一副法西斯匪徒的凶相。

一九七一年四月，江腾蛟坐镇上海，一面指挥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按照所谓“三国四方”会议的分工，加紧建立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和其他各项反革命政变的准备；一面窥测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动向，待机而动。伙同王维国、陈励耘在上海组织了“教导队”，在硕放和笕桥组织了“武装营”。四月中旬，江派林彪死党朱铁笙（空政秘书处原副处长）去杭州向陈励耘了解政变准备情况。江腾蛟还指使周建平窜到一些部队去做“工作”，妄图把部队抓到手里。王、陈、周分别制定了上海、杭州、南京地区的“行动计划”、“应变方案”。江还要上海、广州地区的一些航空兵部队抓紧进行歼五飞机攻击地面目标的训练。四月下旬，江窜回北京后，又亲自跑到天津、保定，还有计划地察看了北京周围顺义、通县、南苑、黄村、门头沟、石景山、南口等地的地形，进行阴谋活动。

#### 六、为林彪发动武装政变制造反革命舆论

《“571工程”纪要》出笼后，江腾蛟加紧为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制造舆论，他造谣污蔑，疯狂叫嚣：“现在斗争形势很复杂”，“军队不行啦，笔杆子起来啦！”“当前斗争的焦点是保卫接班人的问题”，要“准备迎接新的反复，更大的风暴”。他穷凶极恶地说：“只有拿起枪杆子，没有第二条路可走。”“要搞武装起义。”“只要看准时机，先下手为强，该杀的杀，该关的关，‘首长’、‘战友’往党和国家的位置上一站，把所有的大权都接过来，报纸、广播一控制，不就成功啦！”“当然，也要准备失败。失败也没有关系”，“‘首长’和‘战友’带上同路人到广州或其他地方再成立一个党，起码打出个以长江为界来，然后再打几年，慢慢统一。”他还嚎叫：要“改朝换代”，建立“人人自由、平等、民富国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江还向他的党羽宣布反革命纪律，说：“我们是不成功则成仁，破釜沉舟，拚上老命！”“要绝对保密，不能当叛徒。”“如果泄漏一句，不要怪我江腾蛟翻脸不认人！”

#### 七、发展反革命组织，培植反革命势力



江腾蛟秉承林彪的旨意，积极参与、策划建立以林立果为头子的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分舰队”和所谓“左派组织”，及设立反革命秘密据点。他还窜到桂林、青岛等地，部署建立反革命据点。他要米家农抓好反革命特务组织“战斗小分队”。

江腾蛟在空军政治部，秘密组织了一个为林彪反革命政变服务的地下黑班子。成员有部、处干部十二人，由李同云、李瑞昌牵头，张发云为联络员，江腾蛟直接指挥。江给黑班子规定任务：“要把政治部办成林副部长放心的政治部”，要求其成员“把心思放到林副部长那里交下来的任务上”，对于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刘沛丰、刘世英等人的所谓“指示”，都要“紧跟、照办、认真执行”。他们在各部门发展“骨干”，开什么“骨干碰头会”、“形势分析会”，进行非法活动。他们自成系统，部里有“部”，处里有“处”，制造分裂，控制政治机关。他们用欺骗组织、煽动群众、暗中操纵等手段，秘密控制组织、干部工作和舆论工具，搞了许多阴谋活动。

江腾蛟还组织了一个秘密“接待委员会”，张发云担任主任，负责接待和联络在空军内的林彪黑线人物。政治部地下黑班子的成员也经常参加这种活动。

江腾蛟在林彪、林立果的指使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展、培植反革命势力。他除了把黑手直接伸进空四军、空五军以外，还通过周建平、王璞、顾同舟、解长林等人，在一些单位做“工作”，拉拢人。他要查全伦在福州军区空军“想办法站住脚跟”。他还两次派陈玺（南京空司气象处原副处长）去找王绍渊（兰州军区空军原副政委）进行反革命串连。

江腾蛟亲自向其同党、亲信传授反革命策略，加强内部控制，捏拢反革命力量。说：“我们的斗争是大兵舰作战，不是小木船，是联合舰队，是林副部长给我们掌舵。我们都是兵舰上的战斗员，不要互相在舰上拳打脚踢的把舰弄翻了。”一九七一年二月上旬，他在广州对顾同舟、查全伦说：“你们关系搞不好，广空机关就不能团结起来，副部长就不放心。只要对副部长态度一致，不管个人之间过去有多大意见和恩怨，也要消除、谅解。”他还举行“熊掌宴”，把顾同舟、查全伦、米家农等人找去参加。江说：“副部长送给的珍贵礼物熊掌，请大家来分享幸福”。查全伦等人在宴会上举杯狂叫：“为在林副部长的领导下，在江政委

的具体领导下，搞好‘工作’而干杯！”一九七一年七月，江腾蛟派人去上海、杭州，要王维国、陈励耘“搞好团结”，“抓好骨干队伍”。

#### 八、充当反革命凶手和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南线总指挥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江腾蛟秉承林彪旨意，为了“加快、提前”实行《“571工程”纪要》，在上海的秘密住所里，多次和李燕平及他身边的死党，密谋采取“设伏突袭”、“炸火车”等罪恶手段，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毛主席巡视南方期间，他要张发云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林彪死党：“不要乱跑，要随叫随到，要严守岗位，各就各位。”九月八日深夜，林立果、周宇驰把江腾蛟叫到西郊机场黑据点里，让江看了林彪的反革命政变手令。林立果对江说：“我们已经决定在上海地区动手。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第一线指挥员。”江和周宇驰向林立果献策：“用日本人搞皇姑屯事件的办法；把机场的油库烧着，然后带着部队去救火，乘混乱之际动手。”江还画了油库和停车站的位置图。九月十一日，江腾蛟、林立果和王飞、关光烈、于新野等人偷偷地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准备攻打钓鱼台，妄图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

十一日晚，江按照同林立果、王飞、周宇驰的预先密谋，带鲁珉到西郊机场黑据点，进一步具体策划行动方案。并且规定了时间、地点、代号，指定了具体执行人。林立果对鲁珉说：“派你去上海组织指挥炸火车，是江腾蛟点的将。”并确定：“江腾蛟在上海打头阵。”江接受了林立果的指使后，连夜收拾东西，准备动身去上海。由于毛主席离开了上海，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

九月十二日，周宇驰召集江腾蛟、王飞下达了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反革命计划，策划了南逃行动方案。当天晚上，江匆匆忙忙跑回家里，准备携带张发云、朱铁笙和江的老婆孩子，与林彪同坐一架飞机南逃。

九月十三日，林彪自我爆炸，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江腾蛟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受到人民的审判。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秘书处

一九七三年五月印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四月十七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届五次扩大会议绝密材料——林彪死党王飞主要罪行材料汇集（初稿）

林彪死党王飞是林彪反党集团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急先锋，是策划攻打钓鱼台、妄图谋害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的凶手，是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北线总指挥”。王飞一贯顽固地坚持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对党对人民怀有刻骨仇恨，是个阴险毒辣的反革命两面派，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现根据空直机关的揭发和一些人的交代材料，将其主要的反革命罪行汇集如下：

#### 一、死心塌地投靠林彪

一九六四年初，林彪派秘书关光烈，身着便服，窜到空军党办同王飞密谈。随后，王飞打着向“林办”学习的幌子，钻进林家，秘密勾结。一九六五年九月，林彪指使叶群，纠集吴法宪、王飞一伙，到江苏太仓洪泾大队，以搞“四清”为名，拉山头，结死党。在此期间，王飞为林家百般效劳，得到林彪、叶群赏识。叶群还亲自向王飞传授反革命两面派权术。一九六八年三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在林彪指使下，吴法宪、王飞抄了杨成武的家，搜走了林彪、叶群与杨勾结的罪证，交给了林、叶。在林彪、吴法宪授意下，王飞指挥一帮亲信，为叶群伪造历史，扣压揭发叶群罪恶历史的检举材料，并制造假案，迫害群众。

一九六七年四月，林彪为了搞反革命阴谋，派遣他的儿子林立果到空军党办当秘书。吴法宪、王飞马上派周宇驰、刘沛丰伴随左右，充当其反革命帮凶。一九六八年七月，吴法宪、王飞伙同周宇驰，违抗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四大”单位暂不发展党员的决定，不履行正式手续，非法把林立果拉入党内。一九六九年二月，在党的“九大”召开前，林彪亲笔写信给周宇驰、刘沛丰，要他们让林立果“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反革命的“独立工作能力”。同年十月十七日，在林彪擅自发布所谓“第一个号令”，进行篡党夺权预演的同时，吴法宪在林彪的指使下，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任职之前，王飞就把这个头衔，写信向林彪、叶群汇报，甚至连林立果的升调报告表也都一并奉上。一九七一年八月，王飞又亲自炮制了一份要林立果当空

司办公室主任的报告。他甚至在空军司令部党委会上，公然提出要林立果当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还向在空政干部部的亲信何汝珍布置：把林立果作为提升空司副参谋长的第一个对象。

林彪、叶群多次把王飞一家召去“接见”、看电影、照相、吃饭，进行反革命拉拢。林彪、吴法宪一伙还把王飞“推选”为“九大”代表，后又提拔为空司副参谋长兼空司办公室第一主任。

林彪在庐山发动反革命政变失败后，王飞一伙加紧勾结。一九七一年春节，他专门把周宇驰、刘世英等人及其家属找到家里吃熊掌。王飞说：“要不是林副主席一家，我们（指几个男的）这几个人早就被打成反革命了，你们（指几个女的）这些人也都成了反革命家属了。”周宇驰也说：“我们要感谢林副主席一家。”共同表达要继续为林家卖命的反革命“决心”。

## 二、策划和经营法西斯特务组织——小“联合舰队”

林彪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网罗死党，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在空军拉山头、搞宗派，秘密成立了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这个反革命小“联合舰队”，是在林彪、吴法宪直接指挥下，由王飞具体策划建立起来的。

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吴法宪伙同王飞在空军党办内策划搞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空军党委调查研究小组”，组员是王飞、周宇驰和刘沛丰。这就是反革命别动队——小“联合舰队”的雏型。一九六九年下半年，王飞又把“调研小组”列为空军党办的一个小单位，“定编”六个人。后经王飞等人精心挑选、“考验”，又拉进一些人，使这个组织进一步扩大。一九七〇年五月前，发展成为反革命小“联合舰队”。到“九·一三”前夕，这个反革命别动队的成员发展到十几个人，有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刘世英、程洪珍、陈伦和、王永奎、许秀绪、吴达云、王琢等，头目是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王飞充当了参谋长的角色。这一小撮死党绝大多数是王飞招降纳叛收罗而来的。周宇驰是个对我有杀父之仇的家伙，曾因犯错误调离机关。一九六六年上半年，王飞把他调回党办当科长，后又提为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刘沛丰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本人收过租，讨过债，政治机关曾数次提出要处理，王飞一直进行庇护。于新野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其父为右派分子，本人屡犯错误，王飞对他极力包庇重用。刘世英的社会关系非常复

杂，道德败坏，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调离机关，王飞一手策划给他取消了处分，弄回机关。王飞自己出身恶霸地主，是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这一帮家伙，在林彪的指挥下，秘密策划和组织实施反革命政变阴谋，从舆论、组织、物质等各个方面，干尽了反革命勾当，犯下了滔天罪行。

### 三、配合林彪在庐山的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〇年夏，林彪、叶群伙同陈伯达、黄、吴、李、邱等，秘密串连，加紧准备，阴谋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王飞一伙紧密配合，制造反革命舆论，大搞阴谋活动。

林彪窜上庐山之前，布置林立果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讲话提纲，作为向党进攻的炮弹。王飞为之积极筹划。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吴法宪在林彪指使下宣称：“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公然向毛主席、党中央夺空军的指挥大权。“两个一切”出笼前，王飞参与了密谋策划，出笼之后，他又竭力兜售。一九七〇年七月六日，他们在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上抛出了“两个一切”。七月九日和十六日，王飞紧接着在空司部党委学习会上作了“传达”，后又专门在空司办公室全体人员会上散布。随后，他又策划召开空司机关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让刘沛丰贩卖“两个一切”。王飞一伙胡说什么：“吴司令员的指示（指‘两个一切’）反映了空军广大指战员的心情和愿望”，“要坚决拥护立果同志对我们的领导”，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等等，并很快把“两个一切”传到空司机关和直属部队。

与此同时，在林彪、叶群的亲自指挥下，王飞、周宇驰等人加紧炮制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王飞亲自出马策划召开林立果的“讲用”会。一九七〇年三月，王飞就放出空气，制造林立果要作“讲用”的舆论。六月，他在司令部党委学习会上，一面胡吹林立果“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很出色，很突出”，说什么“早想请他讲讲”，一面又吹嘘林立果“很谦虚”。鲁珉、贺德全等人跟着帮腔，要求林立果“讲用”。在其他一些人也表示同意后，王飞就说：“既然大家要求立果同志讲，我就把部党委的意见向他转达。”随后，经吴法宪、王飞一伙策划，在王辉球同志主持的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上，王飞提出空军党委常委参加林立果的“讲用”会。会议确定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成员和司、政、后二级部副部长以

上干部都参加。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用了九个小时，宣读了极其反动的“讲用报告”。这个会由王飞主持。林立果话音一落，王飞马上站起来大肆吹捧“讲用报告”“观点很新，思想很深，境界很高，视野很广，对军队、国家的大事说得很透，抓得很准”，“解决了很多重大问题”，并再次兜售“两个一切”。第二天，王飞又组织空司干部听了录音，还要求座谈、表态。以后，这个录音又在空司多次播放。王飞还组织一些人整理“讲用报告”录音稿，打印散发，又伙同刘锦平、江腾蛟等人策划把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塞进空军“三代会”。八月四日，吴法宪主持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决定在“三代会”上放“讲用报告”的录音。录音一放，王飞就指使一帮亲信，狂热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继承又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表现了他的天才”。在王飞的指使下，“三代会”的空直代表团作了向林立果学习的“决议”；组织了四个所谓“在林立果身边工作过的人”，到各代表团巡回“讲用”，从政治、军事、科学技术、生活作风等方面，把林立果捧为“超天才”。八月下旬，当林彪一伙在庐山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空军的“三代会”吹捧林立果“超天才”的反革命妖风达到高潮，与林彪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遥相呼应。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王飞、周宇驰一伙密切窥探会议动向，盗窃全会情报。当林彪向党发动突然袭击后，周宇驰立即密告王飞：“吴司令他们早就串连好了”，“把矛头指向×××。这一下不把他压垮，也得把他吹歪了。”王飞听后，得意忘形，立即叫他老婆写信告诉她妹夫（上海港务局的一个被审查对象）向上告状，指控上海市委负责同志。

林彪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后，周宇驰又慌忙把情况密告了王飞。

#### 四、破坏批陈整风运动，加紧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林彪在庐山发动的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以后，贼心不死，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王飞也肆无忌惮地破坏批陈整风，极力掩盖林彪的反党罪行，包庇陈伯达，继续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变本加厉地制造反革命政变舆论。

一九七一年初，在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会期间，吴法宪、王飞扣压空司航行局和北京军区空军揭发陈伯达利用专机在华北地区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的材料。

王飞猖狂反对学习马列主义，胡说：“马克思的书是一百年前写的，列宁的书也有四、五十年了，都是些外国地名、人名，不好学，学了也记不住”，“学马列主要指的是高级干部，候补中央委员以上，我们有谁够条件！？”他对空军通信团的干部叫嚣：“你们不要学，连队干部更不要学”。

与此同时，王飞在幕后指挥贺德全、刘世英、戴忠笠等人兴风作浪，大吹“天才论”。他们挥舞着林彪的语录叫嚷：“林副主席讲天才，我们为什么不讲！”“不讲天才是别有用心！”还恶狠狠地说：“真有人敢批天才，胆子不小啊！”“你们批天才，批吧，将来总有一天反过来挨批。”甚至散布：“大赞就是大批”，利用空司批陈大会的讲台，歇斯底里地大讲“天才”，吹捧林家父子。

王飞恶毒攻击毛主席对济南军区关于反骄破满报告的批示，污蔑反骄破满是“整人”，是“右倾翻案风”，散布“骄傲自满不是路线问题”。还别有用心地说：“空军现在不是解决骄傲自满的问题，而是要解决拥护谁、跟谁走的问题。”鼓吹跟林彪、林立果。

王飞在空司机关大搞以对林家父子的“态度”、“感情”为标准的所谓“路线分析”。胡说：“路线教育问题，说到底就是听谁的话、跟谁走的问题，是拥护谁反对谁的问题”。王飞一伙叫嚷：“合乎林立果这条线的就拼命干，不合乎林立果这条线的就猛批判”。

王飞还歪曲历史事实，胡说：不管是前二十八年还是后二十二年，都要突出林彪。并策划炮制了篡改党的历史、宣扬林彪“丰功伟绩”的所谓“两个决议的宣讲材料”，毒害广大群众。

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召开的全军外事工作会议上，王飞明目张胆地提出要开放林彪的家乡林家大湾，供外宾参观访问，还要在各革命圣地陈列馆的解说词中增加吹捧林彪的内容，逼中央表态。七月，王飞亲自组织翻印周赤萍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黑书一万多册，广为散发，并规定作为党课教育内容。

一九七一年七月，林彪一伙在广州策划召开了“安会现场会”，进行反革命串连，再次掀起吹捧林立果的妖风，向党发动了反革命的“夏季攻势”。会前，王飞窜到部队进行反革命游说、串连。七月下旬，在吴法宪主持下，王飞专门安排其亲信向空军党委常委办公会议汇报了“安全现场会”情况。王飞在会上说：“推广‘安全经验’是个大事，对推动空军建设很重要”，并提出：飞机的预警装置先

改装一个团，要求各部门全力支持。接着，他又选择在林立果“讲用”一周年的前夕（七月三十日），主持召开了有五百多人参加的空司部党委扩大会，指使亲信宣讲“安全经验”，狂热吹捧林立果“不断发现和解决了空军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胡说“安全经验”是林立果放的“第二颗政治卫星”，鼓吹“从林立果身上看到了林副主席带兵打仗的优良作风的巨大威力”，等等。同时，王飞还秘密布置空司各部、局搞什么纪念林立果“讲用”一周年活动。一九七一年八、九月，他又把“安全经验”塞进航校工作会议；亲自和指使一些人，到部队兜售“安全经验”，吹捧林家父子。

#### 五、参与“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二、三月间，正当林彪及其死党加紧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炮制《“571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的时候，王飞躲进医院同一些死党秘密串连，搞阴谋活动。以后，王飞指使一个秘书到上海“注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动向。王飞还恶毒攻击毛主席与斯诺谈话纪要。四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林彪黑司令部策动其死党“准备加快、提前”实行“571”反革命政变计划，王飞同周宇驰密谈了妄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下毒手的罪恶阴谋。周宇驰叫嚷：“这次（指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吴司令他们在庐山的活动都给端出来了，搞得黄、吴、李、邱很被动”，“情况越来越紧张，林立果天天在研究这个问题，林副主席很着急。”他杀气腾腾地叫嚣：“这都是最高的地方搞的，不行就来个干脆的”。五月一日晚上，王飞在收听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五一”节天安门庆祝活动的实况广播时，咬牙切齿地说：“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狰狞面目。

#### 六、抓部队，搞武器，阴谋扩大为反革命政变服务的武装力量

林彪及其死党王飞等拼命抓部队，为反革命政变服务。在空军司令部，王飞特别“关注”空司警卫营，他说：“空直机关就是警卫营这样一点掌握枪杆子的部队。”为了控制这个部队，他经常抓警卫营的“路线教育”，散布：“林立果对你们很关心，对警卫营感情很深。”他指使亲信制造舆论，要警卫营“一切听王副参谋长指挥。”王飞还亲自选定“挂钩”连队，把警卫营紧紧抓在手里。一九七一年八月，王飞策划空司警卫营抽调连排骨干八十八人，进行骨干“集训”。王飞叫嚣：“不训练不行”，“要苦练”。指使这个“训练班”，集中时



间学习林彪的所谓“八·一六”指示和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在实兵训练中，宣扬“江田岛”精神。在训练期间，王飞派一帮亲信进行慰问，“鼓舞士气”。到九月八日，“训练班”只完成了单兵动作，王飞叫喊：“这样不行！战术一定要搞，至少要搞班进攻”，要“训练班”继续加紧训练。

王飞利用职权，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提供了大批武器。他们经常通过警卫营给林彪死党搞枪支弹药，先后从警卫营盗走了各种枪七十六支，枪榴弹筒一具，各种子弹一万二千八百余发。一九七一年四月，王维国派亲信来京要轻武器。这个人郑兴和说：“斗争形势愈来愈复杂，这方面（指武器装备）又是我们的薄弱环节，所以要做这方面的准备。”四月十二日，在王飞的指使下，郑兴和从已经批准发给兰空和昆指等单位的轻武器计划中，扣下一千支发给了空四军。一九七一年七月，在制订空军轻武器分配计划时，王飞策划削减“三北”，给“三南”某些单位多发武器。计划调整后，给“三南”某些单位多发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六千六百支。

为了实行《“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王飞根据林立果“解决问题还是靠部队”，“这是基础工作，不要天天在机关窜来窜去”的黑旨意，不断派人到全国各地空军部队搞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七月至九月初，他还亲自出马，先后窜到鲁山、当阳、郑州、成都和天津、唐山、遵化等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串连，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

七月，王飞在鲁山、当阳、郑州、成都期间，分别同刘锦平、周宇驰、解长林等秘密串连，搞阴谋活动。

八月，王飞窜到天津、唐山，了解空军部队的兵力部署和作战能力等情况，并要某部提前改装兵器。王飞对某团说：“你们这个团，是林副主席警卫二团的两个连组建起来的，你们要听林副主席的话。”在另一个部队，王飞索取了保卫首都的防空作战预案、应急行动预案、各种战术技术演练等重要资料。九月初，王飞在遵化详细观察了某师驻地周围的地形，了解了雷达探测性能，远程情报的保证情况，夜间低空作战的能力，及所用机种、活动范围和飞行员对战区的熟悉程度，等等。

王飞还竭力拉拢部队的一些领导干部，妄图扩大其反革命势力。

七、妄图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策划南逃，另立中央

一九七一年八月，正当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外地巡视期间，林彪一伙按照蓄谋已久的《“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纲领，“破釜沉舟”，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九月六日下午，王飞按照林立果的密令，匆忙从遵化赶回北京，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政变。

九月八日中午，周宇驰同王飞密谈了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阴谋计划。晚上，林立果、周宇驰、王飞等，在空军学院黑据点，秘密策划谋害毛主席、谋害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反革命阴谋。林立果给王飞传达了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并叫嚣：“现在情况紧张”，“火药味已经很浓了”，“要坚决把反对林副主席的人除掉。有一坨在南方，有一坨在北京，要同时干掉，南边由江腾蛟负责，北京由王飞和周宇驰负责”，“现在决定武装起义”，“从现在起王飞就是空军司令”。王飞立即表示：“坚决保卫林副主席！”“林副主席叫干，就一定干！”

在这次黑会上，林立果、周宇驰将叶群写的“带交黄总长亲收”的一大信袋东西叫王飞转送给黄永胜。

九月九日上午，王飞同鲁珉密谈了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阴谋。晚上，林立果、周宇驰、王飞再次策划攻打钓鱼台。

当天下午，空司航行局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给周送苏联伊尔库次克机场和恰克图导航资料等材料时，王飞说：“要满足他（周宇驰）的需要。”

九月十日上午，王飞秘密通知正在青岛“疗养”的王洪智（空十三师原师长），赶紧回去抓部队，并让十三师次日安排飞机接王回部队。

接着，王飞将叶群带给黄永胜的东西送去，并转达了叶群、林立果的“问候”，向黄密报了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

九、十日两天，王飞还查问了空司警卫营的实力和骨干“训练班”的训练情况等。

九月十一日中午，叶群亲自打电话告诉王飞：“林副主席决心已定，要坚决搞，不能坐失良机”，“身家性命全都托给你们了”。叶群还要王飞“帮助给照管孩子（指林立果）”，并许诺王飞“将来是‘常’字号的”。

下午，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王飞、关光烈在西郊机场黑据点，进一步策划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林立果嚎叫：“林副主席的决心已定，南线先搞，北线接着搞”。他们还规定了通信联络的密语和方法。

会后，林立果将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交给了王飞。林彪在信中要黄“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当天，林立果、王飞、江腾蛟、关光烈、于新野五人，偷偷地到钓鱼台周围看了地形。林立果恶毒地提出了用空司警卫营卡车冲，用坦克冲，用火箭炮轰，用轰炸机炸，借接待外宾的时机在机场动手的办法。王飞则献计，要林彪召集会议搞。毛主席的行动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部署。十一日夜，叶群、周宇驰打电话告诉王飞：“毛主席已离开上海，‘解除任务’”。他们妄图谋害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了。

九月十二日晚，林立果、周宇驰向王飞下达了林彪关于十三日乘飞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反革命计划，由胡萍准备飞机，王飞组织指挥。

王飞随即秘密同于新野召集鲁珉、贺德全、刘世英、朱铁铮、郑兴和共七人开黑会，策划随林彪、黄、吴、叶、李、邱南逃广州的行动计划。王飞说：“林立果已经回北戴河了，要立即组织一批可靠人员，护送黄、吴、李、邱于十三日由西郊乘飞机去广州，另立中央，与苏联搞联合”。王飞在会上宣布江腾蛟为“总指挥”，鲁珉、贺德全为“副总指挥”。“七人黑会”拟定了南逃的人员名单，密谋了出发时间、车辆安排、人员分工以及到机场后进行动员、配发枪枝等事项。王飞布置郑兴和从空司警卫营取走五九式手枪三十支，冲锋枪两支，子弹二千三百六十发。王飞还叮嘱他的亲信，明天走的事“不要告诉别人，告诉别人是要杀头的。”

毛主席九月十二日下午回到北京，又一次打乱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计划。林立果于十二日晚十一时半，从北戴河给周宇驰打电话，命令停止“南下”，要“北上”（指叛国投修）。周宇驰急忙告诉王飞：“暴露了，不搞了”。王飞惊恐万状，在会上宣布去广州计划作废，当场销毁了一些罪证，订立攻守同盟。并告诉他的亲信：明天不走了，“就当没有这回事”，“有人问今晚我们干什么，你就说是研究办公室副主任分工问题”。王飞气急败坏地对他老婆说：“暴露了！”狂叫：“抓起来我什么也不讲”。

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仓惶逃命，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林彪反党集团蓄谋已久的极其恶毒的反革命阴谋彻底破产。王飞负隅顽抗，拒不交代自己的罪行，与死党刘世英等秘密串连，通风报信，布置退却。十四日

中午，王飞在电话上与江腾蛟搞攻守同盟：“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江腾蛟叫他老婆用暗语告诉王飞：“你要江政委买的药，统统统统被人卖光了”。十五日，王飞同他老婆在家销毁罪证，转移赃物，还准备了一个假检讨，说他是什么“好心为坏人办坏事”。但是，在铁的证据面前，这个十恶不赦的反革命罪犯，终于难逃法网。

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秘书处  
一九七三年五月印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1973. 08. 20；中发 [1973] 34 号

中共中央决议

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败露后，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和几个死党，私乘飞机，叛党叛国，仓惶逃命，投奔苏修。他们所乘外逃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等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声讨了林彪，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开展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批林整风运动。经过广大群众的揭发和中央专案组的调整研究，查获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大量罪证。中央专案组编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说明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

令部的斗争经过。这些材料揭穿了林彪的伪装和欺骗，彻底揭露了林彪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事实真相。这些材料提供了林彪反党集团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确凿证据。它足以证明，林彪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

中央专案组根据调查核实的物证、人证，现已查明：

（一）早在“九大”前后，林彪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他的老婆叶群，勾结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还通过他的儿子林立果，秘密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小“联合舰队”。林彪反党集团是内地、富、反、坏、右和国际帝、修、反的代理人。它的骨干分子，是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托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新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他们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二）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发动的突然袭击，是有预谋的。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会前和会中多次秘密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地向党进攻。从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发表反党讲话，到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林彪、陈伯达指使李雪峰炮制的反革命六号简报出笼，他们专了两天半的政。他们的反党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它的性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

（三）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反党集团立即秘密进行反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他们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并从政治、军事、组织、情报等各方面加紧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下达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九月十日，林彪给黄永胜一封亲笔密信。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林彪死党用穷凶极恶的手段，妄图乘毛主席外出巡视的机会，在外地谋害毛主席，并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谋害中央领导同志。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林彪又通过吴法宪私调飞机，要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

鹏、邱会作等人一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妄想造成所谓“南北朝”的局面。林彪还企图勾结苏修，对我实行南北夹击。他们的种种阴谋，都遭到彻底的破产。

（四）林彪叛党叛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林彪出身于大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入党以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林彪追随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竭力宣扬“短促突击”。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伙同彭德怀要夺毛主席的权。红军到达陕北之初，林彪蛮横地一再坚持要脱离红军主力部队，独自到陕南去“打游击”，向党闹独立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发表反党文章，无耻吹捧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林彪一再抗拒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林彪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幕后策划者。在六十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掀起反华逆流的时候，林彪反对党的总路线，要搞“包产到户”，反对我党揭露和批判苏修，要跟苏修妥协。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培植亲信，打击陷害革命干部，竭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提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等反党乱军的口号，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妄图篡夺毛主席的统帅地位，炮制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军队的谬论，狂妄地提出军队要由他“直接指挥”。他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要从根本上篡改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毛主席、党中央对林彪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一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仍然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教育和挽救，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但是，林彪对党一直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欺骗党，欺骗人民，最后终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 二

林彪反党集团的出现，是国内外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首先取得了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伟大胜利。但是，阶级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时时刻刻都在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样的形势下，林彪反党集

团作为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代表，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但是，这不过是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痴心妄想。他们表面上极端狂妄，本质上极端虚弱。他们的阴谋，是见不得人的。因而成不了什么气候，无碍大局。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取得了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最沉重的打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 三

鉴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

（二）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

（四）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

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五）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中央专案组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

附件：（1）中央专案组编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2）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决议）

## 二、研究资料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

2009 年 12 月 7 日初稿

2012 年 5 月 23 日修改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九册（3）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九章 召开十大

#### 第三节 邓小平复出

##### 一、文献资料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錯誤，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

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 error，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消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 error，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 error，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反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

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后，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 error，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知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

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

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向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至七月五日，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全文约三万言。他在这个材料中，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他的政治历史和工作经历，检查了他的错误：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人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文件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参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文件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着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每年征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参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文件的时候，我是参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文件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着，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



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着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一九六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报告的批示中指出：“《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九大和整党问题时指出：“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

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仍继续主持极为繁重的中央日常工作，但他的健康状况已趋恶化。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摘录）：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

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〇、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

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周恩来致信中央政治局分管干部审查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邓小平同志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同一天，周恩来又约纪、汪两人谈话。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纪登奎、汪东兴就安排邓小平、谭震林工作问题向周恩来报告，建议邓小平回京后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周恩来看后表示：谭震林安排工作的事可先办，邓小平的工作待请示主席后再定。

一九七三年二月，在江西居住了三年多的邓小平接到中央要他回京的通知。

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明自己大量便血情况，已经毛泽东同意，请假两周，到玉泉山检查身体。

这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军委事情由叶剑英处理。

一九七三年三月九日，周恩来将草拟的《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送给毛泽东，并在送审稿上写道：“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问题，政治局会议几次讨论过，并在主席处开会时报告过。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为在全国树立这样一位高级标兵，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⑩”

这样做，是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恢复邓小平的声誉，便于他复出后重新工作。

同日，毛泽东阅后批示：“同意。”

周恩来立刻将批件和附件送给邓小平，征求他本人意见。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及附件 [1. 邓小平同志的信；2. 邓小平同志的《我的自述》(摘录) ]

1973. 03. 10； 中发 [1973] 14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多次指出，邓小平同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见附件一）上，毛主席又作了如下的重要批示：“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注）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毛主席的批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总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全面地、历史地评价他们的功过，认真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邓小平同志从全国解放以来，特别是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职务期间，所犯的错误的严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邓小平同志的揭发批判是正确的，必要的。经过毛主席、党中央的耐心教育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对自己的错误作了认真的检查。有了悔改的表现（见附件二）。我们对他的进步应当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希望他在实践中继续改正自己的错误。遵照毛主席批示的精神，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在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中，各级党组织要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的一系列指示，对犯错误的同志实事求是地做出结论，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同志，要相信党，相信群众，严于解剖自己，认真作自我批评。全党同志都要从邓小平同志所犯的错误的教训中吸取教训，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提高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这个决定连同两个附件，印发到县、团级。

中 共 中 央

一九七三年三月十日

-----

（注）即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同志。

附：（一）邓小平同志的信（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二）邓小平同志的《我的自述》（摘录）（一九六八年六、七月）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商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一九七三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关于中发〔1973〕14号文件传达范围的通知

1973.04.03； 中发〔1973〕16号

一，中发〔1973〕14号文件是按县团级文件发的，可以口头传达全文到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进行讨论。

二、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不包括邓小平同志的信和《我的自述》（摘录）两个附件〕，可以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并加解释。

三，对爱国人士，由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负责人，按照本通知第二条规定，向他们作传达、解释。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

## 二、研究资料

《张玉凤揭毛泽东晚年秘密材料》 （阿波罗新闻网 2007-03-04 ）

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主席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主席定论」。

主席就召见江青、张春桥、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说：「总理病不轻，我很着急，他催得我好紧。我不至立即去见马克思，谅他（指邓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论：请第二号走资派出来，不要太固执。春桥出来主持工作，老师、将军不会服，今天在座的也不会服，你（指江青）也不会真服。」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二日修改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 9 册（4）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九章 召开十大

#### 第四节 继续搞好文艺革命

##### 文献资料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中央首长在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出席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座谈会的成员

时间：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晚十时三十分至二日一时三十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

江青：我请同志们看这个电影，内容就不说了，你们都是名家、专家、行家，人家那些技巧我们可以借鉴嘛！这个电影就是《冷酷的心》的摄影在一九五三年自编自导自拍的，原名叫《网》。现在总理他们还没有来，我们就座谈座谈，现在大家发言。我请你们看电影，要大家讲一讲有那些可以借鉴的，有什么技巧可以学。今天先请你们讲，因为我陪你们看片子看了很多了，你们老说我给你们看黑白脸，你们还不服气。谁先讲？我点名了。谢铁骊先讲！有什么，讲什么，讲错了不要紧，没有抓你们的小辫子。

视觉形象，只有十句话左右。不用话也看得懂。象你们这样的看一遍，就应该有意见，有感触了。钱江，你讲！你也应该有感触了，不要怕讲错嘛！

成本非常低，老板一定欢迎。他等得时间不少，等云，等潮水，各种各样的潮。刻划人物，你们讲究七个色阶，这部电影有没有七个色阶？都用了眼神光。近景多，但不使人感觉跳。只有两堂景，两个小景。调子还是比较偏高的。一堂景是街上……。（钱江：街口也好像是自然景。）

是那个商店，偷枪的。

表现人的心理。这部电影二十年了，这个人很成熟，成家了，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了。哪位同志拍的《奇袭白虎团》？你也讲一讲。



有好几处加了辅助光。成本很低，几个演员嘛。表现海浪，不全给你看白浪，也有黑浪，有时用黑浪衬托白浪。沙滩也有各式各样的变化，我们看得都是一面水的，也有两面水的，各式各样。看得很清楚，连胡子都看得很清楚。给人印象深，使人不容易忘记。老是那几棵树那一条路嘛。成荫，你讲！你们搞得那个分镜头，净是蹦来蹦去的。这个片子的编剧、导演也是不错的。整个画面构图都很讲究。这个李文化躲在哪儿去了？一定是躲我。小桥流水人家嘛！张冬凉躲到哪儿去了？这回看得过瘾了，摄影的没有看了不过瘾的，钱江你看了也过瘾吧！不过没有他的魄力大。没有那样耐心，不敢闯。怕失败，怕丢了名啊、家啊，怕丢了资产阶级的臭名，今天是批评啊，等会儿我还要作自我批评。

还有一部叫《白鬃野马》的片子，吴德同志，我陪他们看过的，可能还有的同志没有看过，可以看看。五本，基本高色调，是很难得的，也没有什么对话。有很多特写，眼睛的特写，手的特写，还有半个眼睛的特写，都用了，你讲（指张冬凉）。

我老说要给你们付学费，春桥同志也说，给你们付学费，你们还是缩手缩脚。该打屁股！是什么原因，灵魂深处的东西要挖出来，不然将来搞创作还是不行的。成荫同志，你把李奶奶凌驾于李玉和之上，就是个大问题。（此时总理到会）

我刚才请他们看了一部电影，现在在座谈。

比如用手的特写，是表现两种爱。那个男的并不真正爱她，没有精神上的爱。这个从精神到肉体都很崇拜她。没有接吻，这在欧洲是很少的。它用两只手就表现了。

还有那位同志自告奋勇地讲，不要怕讲错了，又不抓辫子。（对总理）刚才看了一个片子，剧团的同志没有看。（对大家）总理来了，现在请总理讲一讲。

当总理指示，电影不只是故事片，还有科教片。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的要求来说，太少了，这是我们的大缺陷时，江青插话说：我们还没有用在教学上的片子。

当总理指示：青年人喜欢新的东西，我们要拿革命的新东西给他们。总结七年来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薄弱的，文化组要把电影工作大抓一下时，江青插话说：不是七年，是解放以来，二十几年电影的成绩很少，放毒很多，取得经验太少，很糟。

当总理指示说：教学片也要搞一点，推动教育革命。这时，江青又打断说：刚才这个电影，整个一个半小时，只有十句话左右。不用讲话，劳动人民也看得懂，达到这个水平就了不起。

当总理要江青讲话时，江青说：先请先念同志讲，你抓电影工业吆。

当李先念同志讲话时，江青却打断说：北京洗印厂搞染印法的不要散了。过关了没有？千万不要拆掉。

当李先念同志讲到：电影工业会议正在开，我听了一次汇报，有了几期简报时，江青说：这种简报要给我看，政治局的同志都要给。

当李先念同志讲到：保定厂的生产形势还好，质量不稳定，还有些问题，比以前听到的消息好些时，张春桥插话说：不一定。我了解了一下，好多单位一块搞，比较复杂，电影工业包括化工等等，好多单位现在没有人统一管。邱会作插手了，破坏得相当厉害。单打一，把这门搞得水平很高，很困难。

李先念同志：其它上不去，它也上不去。

江青：你去抓一下就好了。过去没有人抓，我去抓了一下，坏人就冲我来了。

江青：我抛砖引玉，你们思考。我应作自我批评，整了你们多少年了。批评也可以说是爱护。每一次批得时候多，批得有的人混身疼。我可能有说过的，说错的，请同志们原谅，当然也要指出：批评对的，你们就要照着做。我还有一点要自我批评的，就是很久不见你们了，当然我也可以推卸，很忙，可是总理比我忙得多。我好久不见你们，该作自我批评。我觉得电影工业是很重要的，是综合的工业，应该很好抓上去。电影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前途。因为我们的电视不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修字号国家电视很多。电影才有五十年的历史，有的国家已经开始衰亡了。美国的好莱坞已经成了游览的地方。我们上山下乡的十六毫米影片还很少，八·七五还没过关，彩色印染法还没有过关。我们黑白底片原来过关了，但遭到了破坏。我们应该攻坚。今年如果印染法能够拿下来，就可以大批生产出口，就很了不起。你们现在用的胶片，是伊斯曼，是先进的，这几个样板戏，光、色、构图有缺点错误的话，同志们要负责。当然我也有责任，批你们批得不够。有几个厂分散在各地。我不可能到各厂去，大家聚拢来谈一谈，我抓了一下北京的。我还抓了电视，用电视促你们的。我是不看电视的，偶尔看了一次，还不错。电视我是批过的，后来上去了，我们又表扬了他们一下。我就请了些同志看电视，

看了不少次。为什么《智取威虎山》影片那么久不出来？那么为难，拍不出来。学费交得太多了。

当然总的说，六四年会演以来，工农兵在我们国家是占领了舞台、银幕，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去了。但是太少了，同志们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有几个现成的，因为没有精力抓，也走了弯路。

你们批林整风学习也不够，批林整风要掌握武器，你们第一是受刘少奇的毒害，接着又是林彪。他们可不得了，要整死人的，为了一个八一厂，今天欢迎我们了，明天又赶我们走，叫演员吃冷饭，把嗓子都搞坏了。查查军委办事组的材料有一口袋。这几条汉子真可恶啊！现成的不给用。棚也不借给，搞得我们只好借地方。搞得我们好苦噢。我要问一下北影的新建厂建成了没有？（狄答：主要工程都完了。）

在我们这条战线上斗争是很激烈的，要揭要批。他们要破坏一个戏，使用种种手段。六九年冬天他们千方百计整我们，我被他们整得什么也吃不下去，突然耳朵都聋了。差点把我整疯了。没有被他们整疯就了不起。十次路线斗争很尖锐，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取得这成绩，还能站住，还能前进，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七三年怎么上阵呢？首先是洗脸、洗澡。洗脸洗澡的先决条件是剥画皮，批判揭发林彪反党集团在各条战线上的罪行。我建议你们不要散，用一个星期到十天，首先是批林，其次是整风，不要搞倒了，先不要联系自己。现在拍了十部（革命样板戏等十部），这也是很大成绩。你们作了一些自我批评，但我们不太满意。原因是什么呢？你们这会是我们的倡议召开的，我问了吴德同志怎么样，吴德说开了，可你们这个会是关着门开的，一点消息也不透，简报也不给看，后来说有简报，找来两三份，根本不涉及创作思想，不涉及批林整风，好的坏的都看不出问题来。空的。我建议你们拿出十天时间批林整风，然后每一部戏都做总结。我是把一些片子可借鉴的地方，都拣出来给你们看。这只是北京的两个厂有条件，甚至把钱江、李文化、张冬凉带到颐和园去。但同样是伊斯曼，为什么红的红，绿的不绿，这是怎么搞的？！有的有安排，导演不拍。总的说工农兵占领银幕是突出的，但是大而化之，小手小脚。比如《红灯记》我千方百计在门帘上给你们安排一点绿，你们就是不搞上。要千方百计地突出李玉和，你们就是突出坐机关的老太太。把李奶奶凌驾于李玉和之上，李奶奶要突出，但主

要是突出李玉和。懂戏的人一看就是李奶奶是主角，导演太掉以轻心了！配色上，我在破门帘上配了一块黄一块绿的，但是整个不出绿。《红色娘子军》舞台上用闪电，到电影上就没有了，全是黑的。我讲了用闪电，闪电，为什么不用闪电？一用闪电就可以使叶子的绿色有层次。《红色娘子军》是哪个厂拍的？（舞剧是李文化）他们还自我陶醉，“我们还拍得不错嘛！”《白毛女》听说我批评了，就出了绿，出得太特别了，没有层次。《奇袭白虎团》拍得相当有特色。拍得不够的就是第二场，火光不够，烘托敌人的残暴不够。应该是火光冲天，用火光映照到人物的脸上不够。后面有点特色，充分利用了闪电。绿相当有层次。山很险峻。严伟才唱“英雄何惧走天险”雨珠往前跑，就把英雄人物在暴风雨中行进气氛显示出来了。这样就把人民军队烘托了，还有那个崔大嫂。

对敌人你们用了脸谱化，银灰色，怎么批你们也不听，《智取》我就批了，脸谱化不可取。干什么要搞脸谱化呢？要刻划内心。采光上可以有区别，但也别太明（原稿少一页）“失败是成功之母”。胆子要大一些，学费给你们付着，要大胆！这个人可能是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同情强盗，不同情警察。他最近拍得《冷酷的心》看着舒服。

希望在七三年电影、戏剧、音乐，还有一个死了的话剧，要想法救活它。现在小节目蓬蓬勃勃。出版有了偏向了，你们搞京剧改革，我一再说要搞简谱，我最近收到一大打子歌曲，全是五线谱，用非常好的纸。活该！不让更多的人唱。简谱我们也有许多人不认识，不能拿起来就唱，狄福才你能唱吗？（狄：不能！）（于会泳：印了两种，一种是五线谱，一种是简谱。）也不能用那么讲究的纸啊！应大量地印简谱，普通的一个宣传队，不认识五线谱。只有大的团认识。有那么些东西，要抓一抓，究竟是怎么回事？人家说我不认识豆芽菜，我确实不认识，我过去还认识一点，我现在不认识了。（对于会泳讲）你的那个总谱我是要批评的，那么厚，那么大，搬都搬不动，这不是普及方向嘛！小学、中学都用的简谱。总谱还是要用五线谱的。样板戏我们采取种种方法普及，电影、电视、折子戏、教唱。现在那些学校的学生们张不开口，青年演员一开口听不得，吐字不清。老师有责任，你们要教好学生嘛。袁世海来了吗？我就要批评你，袁世海、高玉倩你们要教好学生，你们要教字嘛，要讲究吐字。我对庆棠、浩亮他们就批评得厉害，亲者严、疏者宽嘛！

我发现搞电影的都躲着我，钱江、李文化刚才都躲得那么远。我们六八年按照主席思想把你们从文艺黑线下拉出来，保出来，党的政策嘛！给你们付了不少学费，你们自己不象样子，总是蹦。今天看的片子，那么多近景，却都感到很舒服。对你们想拍电影的计划，没很好研究，提不出什么意见。就是对《南征北战》，我觉得不宜改动太大。内部矛盾抹平了，原来人家就磨掉了棱角。就是把张灵甫打死就行了。帽徽上的红星又恢复了“八一”，黄边还加“八一”两字，红星就不红了。为了拍《南征北战》，我到总参谋部去过。就用原红军的就行了。你看斯诺拍的主席的照片，红星多红啊。军旗上可以有“八一”，这个电影军旗也用不上，要尊重历史的真实。不要用“八一”了，总理，是不是就这样定下来？用草绿的和灰的都可以（指军装）。我就怕你们再拍出一个《红日》来。要注意，不然就糟了。不要把已经少得不得了的矛盾抹掉。一个戏没有矛盾就糟了。按原来的基本不动，只能进行艺术加工。没有一个逃兵？后来写了一个，他们也抹了，陈老总只好拿去改。这个戏是陈老总改的，现在搞，也是为了纪念他。当时分歧是很严重得嘛，七战七捷后，主席让后撤，部队就是不愿意后撤，战士们不愿意后撤，不光是为了留恋家，要写战士们是因为打了胜仗不愿意撤。这个要写出来，这是历史。你们还要搞成秋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历史怎么能够改呢？二月到五月，五月就有绿了，怕什么？二月没有还可以在老百姓家布置点绿色，挂点辣椒、大葱、萝卜。你们想要秋天，为了颜色丰富点。你那创作思想是倒着呢。这个我是想了一想，别的我没有怎么考虑。听说《海港》拍了几场了，我们最近很忙。总理和我们见一见你们，就是鼓励大家。我这个批评，还是鼓励。我还是肯定成绩的。不能对成绩自满，也不能对成绩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

现在校长实际上是老吴吧（指吴印咸同志），你要负责任，要选好教员，要教育好孩子们刻苦为革命练功。五点钟就叫孩子们起床，练基本功，练嗓子。我十几岁时，在北京天不亮就爬起来，到西城根喊嗓子，咿咿呀呀的。那时是爱好，人家叫我标准钟，到时候敲敲人家的窗子。要教育孩子们为革命刻苦，怎么开口，怎么踢腿，怎么歌，怎么舞，怎么把电影拍得不用语言就可以叫人看懂。因为，我们还有文盲嘛！今天可惜没有科教片的来。科教片是有成绩的。但我们下的功夫少。

你们有的电影厂搞封建把头式的行会。你们这一行保守，照明不搞照明系，摄影不搞摄影系，现在所有有成绩的摄影的、照明的，都要带徒弟，也要去教学生，不要象行会似的。那怕自己搞不好，也要把徒弟带出来。要真正把心里的东西教给他们，要把窍门给他。

现在处在青黄不接的时候，要大胆，黑白片也要大胆。舞台的戏、京剧、舞剧、音乐也要从生活里来。过去的程式也是从生活里来的。要创作，一招一式都要从生活里来。你们搞的那两个戏看得我晕头转向。不刻苦不行，要在资本主义国家你们还有饭吃呀！早就失业了！你们不知道旧社会的苦。这个片子的摄影师是很刻苦的，钻研，大胆，同时很谨慎。线条严谨而粗犷。直到现在他还是世界上著名的摄影师。我建议你再看一次，我就是记不住他的名字……

我没有准备，错了的你们不要听，就当我没讲。以后隔几个月不见你们，你们就叫唤叫唤吧！搞戏是个细致的功夫，我们哪有那么多细的功夫啊。你们是专业，要组织起来，靠集体的力量。

当周总理指示：文化组要把一些项目接过去，出版、图博你们还得接受呀，要拖到七五年吗？一年接一点嘛。

江青：你们要体谅于会泳、浩亮、庆棠，他们很辛苦，我是培养他们抓创作的。过去我苦了好多年，现在要让他们接上。你们要帮忙，不要帮倒忙。你们有权力帮助，没有权力破坏。

你们是有成绩的，不要翘尾巴。才作了一点成绩，人民给我们的荣誉太高了，不要把尾巴翘上天。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小心谨慎地为人民服务，要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真正向工农兵学习。

《沂蒙颂》挖苦菜，一蹲下去就挖。杀小鸡也没有造型。因为没有生活，不能出新，象煮鸡、剥葱、甩甩泥呀……满台都是人，没有个性，哪有共性。《矛盾论》最重要的就是讲特殊性。我们在座的，就有男的、有女的、有老中青、有地方的、有军队的。总理本来就是军人嘛，我也保留了军籍。

还要鼓鼓气，大有潜力，我们已经走出一条路了，要继续干。现在我们的党和人民支持我们嘛，就靠我们干。怎么干？要揭林、批林，然后每一个戏，每一个团搞一点总结。你们去生活，滑稽得很，叫“下生活”，要深入生活。大兴县的那

个舞，扬簸箕的，就是从生活里来的，加加工，就可以放到你们舞剧里去。《草原女民兵》骑马动作也是从生活里来的。

我们的演员连脚踏车都不会骑，太可怜了。解放后我看了一部电影，连骑脚踏车也要找个替身。电影演员要什么都会，骑马、游泳、开车、打枪，都要会。没有实践的机会，我也替他们说点话。可以和体委联系一下，搞点马让他们骑骑。象浩亮、庆棠他们，连马都没有摸过。演员要会骑马、打枪、游泳、开车，多一门技术总是好的。要打枪就找叶帅，要搞降落伞就找李德生同志。

资本主义国家的电影演员会的东西很多。都要替身是不行的。只有危险的，怕伤害他那个演员，才用替身。我解放初期看了一个片子，连骑脚踏车都要替身，真可笑。

张春桥：上海有的演员搞骑马舞，他们连马也没见过，在城市里长大的嘛。后来把他们搞到警备区去了。

江青：现在请叶帅讲话。

当叶剑英同志指出：我们不要延续人家的东西，要创新。现在供不应求，要质量，也要数量时，江青插话：难度大呀！

江青：要让被赶下台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也承认我们在艺术上是打不倒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现在站在舞台上、银幕上不要被人家一棍子打倒，思想上、艺术上要统一。

当剑英同志说：我们的片子不够，就要增加生产时，江青：我插一句，《平原游击队》在改吗？谁在改？后边打阵地战是不合理的，我们的人物也相对地低了一点。要改一下。这部戏不错，底子很好，可以重拍。先不谈这个了，以后再说。

剑英同志：你们是：“八一”厂的吧，要配合军队搞一些教学片，什么地道战、地雷战、打坦克的、防原子的。

江青：要搞普及教学片，要不然打起仗来，飞机一来了，就乱跑。其实飞机来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有掩体的进掩体，没有掩体的就趴下，离房子远一点，不要乱跑，是不是啊，叶帅？现在请春桥同志讲话。

张春桥：七三年的第一天，政治局的头一个会，就是讨论电影。

江青：还有戏剧、音乐。

张春桥：从接见到交流，这说明我们党根据毛主席一贯的教导，对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文艺是很重视的。你看大年初一就开这么个会，用不着多说，这个行动本身就说明问题。

现在全国形势很好。各方面对文艺的要求很迫切，要求多搞一些。说少的绝大多数都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希望多搞一些。当然也不排除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要分清两类矛盾。广大人民的要求，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要求，要我们多搞一些。能不能改变这个状况？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

江青：阻力少一些。

张春桥：建国以前就不说了，新中国二十几年来，文艺战线斗争是很尖锐的。许多大的斗争都是从文艺领域开始的。

江青：太尖锐了。延安整风也是从文艺开始的。

张春桥：那就不用说了，我是说建国以来的，从《武训传》到《清宫秘史》都是毛主席提出来要批判的。《武训传》是批了，《清宫秘史》没有批起来。刘少奇在阻挠，因为他认为是爱国主义的。

江青：我组织了一篇文章嘛。

张春桥：后来林彪集团又破坏，斗争很尖锐。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斗争，现在领导机关发生了变化，阻力小了。积累了一些干部，有了一个队伍，没有这个队伍是不行的。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根据主席讲话进行实践的经验，也有受到刘少奇错误路线破坏的经验。尽管这个队伍内部还有一些问题，但总是有些经验的吧。只是正面经验少了些。问题是我们现在的队伍还不那么大，正在滚雪球。刚才叶帅说过去有几万人，过去不是有几万，是有几十万。现在有些人还在下边，下乡下厂，和工农结合，将来他们还是能搞出一些东西来。

你们现在搞了一个综合性的总结，我看粗了一些。还是一部戏一部戏的总结，不但要总结成功的，也要总结失败的。因为是付了学费的，如不好好总结，学费就白花了。刚才讲了批林问题，练功问题，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对总结经验，我们重视还不够。包括戏剧团体。

江青：他们不善于总结经验。

张春桥：过去一提就是洋人，什么斯坦尼体系。

江青：什么车尔尼雪夫斯基啦，这个斯基，那个斯基啦。



张春桥：连梅兰芳还写了几本书。资产阶级还是总结了一些经验的。所谓体系，就是他们经验的总结。但是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跟我们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不能照搬，照搬就会犯错误。我们不善于总结经验。我希望从领导也好，从创作同志也好，每一个人都要用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好好总结，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不善于总结经验，提高得就慢，要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总结经验当作一件重要问题来抓。你们总结了一下，还不够，还可以继续总结。

江青：十天不够半个月，半个月不够一个月。

张春桥：有的厂不在北京，回去也要向省委汇报，告诉他们七三年元旦中央政治局开了这样一个会，希望各省委、自治区党委也要重视。有的也重视，但不经常，不知道怎么抓。抓也不一定抓得很对。他们也要好好总结领导的经验。

江青：请文元同志讲话。

姚文元：首先祝贺同志们已在已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总结经验，继续前进，争取更大的胜利。刚才几位中央领导同志谈得很多了，我补充一点，就是学习。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地学习，读马列主义的书，读毛主席的书，还要深入生活，向工农兵学习。还有文艺工作者本身的专业知识也要学习。基本功要好好磨练，尽可能把武器磨得更好一些，毛主席说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我们要把这个武器搞得更精一些。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许多关于文艺方面的指示、批示，我们应该好好学，要反复看，反复学。在批林整风中，要着重批林，包括批刘少奇，要批得好，批得深，批得透，要掌握好毛主席的文艺思想、革命路线。刘少奇、林彪都是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今后创作更繁荣，就是要学习毛主席的思想、革命路线。关键在于实践，江青同志不是说嘛，我们现在的这些成绩都是实践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结果。总结经验要总结得好，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把感性的上升到理性，也要学习，学习主席文艺理论，这样才能总结得好，总结出比较符合客观实际，水平比较高的，指导意义比较大的经验来。在新年的时候，我愿意和同志们一起学习，继续改造自己世界观，改造旧思想，彻底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思想决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现有基础上争取更大的胜利。

江青：总而言之，要总结，要学习，不要做思想懒汉。

姚文元：我们彩色胶片不过关，不仅是技术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前些时候我看了《捕象》，还有个什么纪录片，颜色不能看，尽管捕象很有趣，但天是灰的，树偏红，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面貌。所以我就不愿意推荐给其他领导同志看了，这个问题要解决，否则不能反映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面貌。

江青：这是“四条汉子”的破坏，他们说搞片子就要偏红。现实生活怎么能偏红呢？采光技巧也有问题。

姚文元：今天有没有“新影”的来？我作为个党员，作为个干部，我有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在拍毛主席接见的时候，就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要把毛主席的形象拍好。

江青：要先去占领阵地。

姚文元：机器也响得厉害。

当总理指示：要迎头赶上。进口以后再学嘛。

江青：我到北影看排戏，钱江用的机器笨死了，我都能坐上去。要迎头赶上，不要跟着人家屁股后边走。

当剑英同志指示：搞个考察团出去时，江青：要派几个新闻摄影出去，他们(指钱江等)出不去。

我们设备还有三十年代的，要迫不及待派个小班子出去。

吴德同志，要落实一下，一个是工业，要配备一个懂摄影、洗印的班子出去。要一些先进的东西，各厂配备一套。

一百度的曝光，要用六十四度，这我就没有把握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成荫：可能是洗印配方不成套，他们保密。)

江青：这些问题要解决，不然责怪他们就太多了。还有百分之几十要靠马克思的在天之灵，两个脚不在地上不行，要脚踏实地。他们确实有许多困难，你们有什么苦处都说出来吧，可以解决嘛。(钱江：我们看的电影太少了。)你们看的电影还少啊！凡是借鉴的地方，都让你们看了。昨天有个南斯拉夫片子，叫什么狼，可以看看，还有一个《铁道儿童》。

南斯拉夫的两个片子，一个雪景拍得好，一个出绿出得好。《孤独的狼》儿童拍得好。你们要为孩子们着想，为孩子们服务，给孩子们搞个戏吧！(张冬凉：和观众见面的拷贝，一翻底，用代代红胶片印的质量太差。)

姚文元：彩色，我们看的还是好的呢，群众看的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江青：先念同志，要赶快过关哟。可以组织小班子去串门。

姚文元：科教片的有没有来呀？科教片还是大有可为的。

江青：下次开会，你们叫科教片的也来呀。还有《水面庄稼》、《蹲苗》也不错嘛。

姚文元：科教片除了普及科学知识外，还有精神鼓舞作用，如登珠穆朗玛峰……

江青：有个出土文物的片子，不讲究配色。是哪个厂拍的？

姚文元：新影。

江青：太不讲究了。比如那个金鼎，铺上绿丝绒或是玫瑰红色的，背景再搞一搞，就非常好。现在不好看，还出国呢！外国很重视我们的文物，再拍一部吧！要讲究一点。

姚文元：工艺美术要拍好，也很好看，我去看了两个馆。

江青：我还没有去看过呢。

灯具要改革，拍一个近景要几万灯，还受得了啊！我拍的时候，是一个两千加一个五百。

我在外景拍，总带上个碘钨灯。不管怎么样，打上一点，不然太暗了。你们在自然光条件下，不给点辅助光不行。要讲究光源。我的经验拉线的五百瓦特的强光灯，在阳光下效果比碘钨灯好。

要改革灯具，不是有个蔡祖泉吗？现在在哪？

王洪文：原来在国防科委，现在回复旦大学去了。

江青：还要提倡他创呀！我用几百就可以拍一张，他们用几万，这个问题可大了。北京有几个大学研究光的，要他们创嘛。吴德同志，你们要让制片厂和搞光的挂起钩来。

我想今天还有个事，一是工业技术上要落实，各种关口加工艺，组织一个小班子，到水平高的国家去，到能去的国家去。另一个是抓创作的班子要建立起来，浩亮、庆棠和老于一起，结合起来。你们两人不要上舞台了，必要的时候可以演一演李玉和，《平原作战》你就让给李光吧！浩亮演别的，观众也把你当作李玉和，庆棠演别的也以为你是洪常青。摆脱一些行政事物，学习学习，把创作抓起来，这要和你们商量，这关系到一个演员的舞台生活（浩亮、刘庆棠表示同意）。

一个抓电影工业技术，搞上一个班子。一个是要安排抓创作的班子，搞上一两个搞电影的，我看谢铁骊也参加吧，音乐也得有个人。

工业技术班子可以早点出去。创作班子多酝酿一下。

外行可以提意见，但是不要粗暴，甚至弄成对立面，那就不好了。

现在你们的革命精神面貌没有前几年好了。刚才春桥同志说，七三年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就是这个会。你们革命的精神面貌要振奋起来。这就要批林，把批林整风搞起来，然后很好总结。

总理指示：把十个文件发给他们看。

江青：刚才总理批准了，吴德同志，你去办。

姚文元：苏修的电影太堕落了。所谓六十年代的三部曲《记者》、《湖畔》、《人与兽》，都是格拉西莫夫搞的。

江青：那天要看美国的《战争与和平》，转口转错了，把苏修的弄来了。头一本就把我的头搞晕了，它的镜头转来转去，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完全歪曲现实，无可借鉴，要批判。今天这个值得多看几遍，我看了三遍。

(北京电影洗印厂提供)

一九七三年一月一日，周恩来的讲话

群众提意见，说电影太少，这是对的。这是我们的大缺陷。

(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二年七年内没有拍摄一部故事片，希望三年内填补空白。)

你们有什么要求，通过文化组提出，中央批准，党和国家就帮助。

一九七三年一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一切参观场所不要要求观众题词、留言和提赞扬意见的通知

1973.01.04；中发 [1973]2 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毛主席最近指示，所有各地参观场所，不要请中外参观者题词、留言和提赞扬的意见。毛主席这个指示非常重要，各地方、各部队、各部门在国内外举办的纪念馆、博物馆、展览会以及一切参观场所，都要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毛主席指示的主要精神，就是要我们努力做到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不要把自己意见强加于人。这些参观场所都不要请人题词，一般都不设留言簿，以免强人所难地写些奉承的话，甚至是违心的话。在参观时，更不要当场请人家提意见，使人家不好不说几句赞扬的话。如果参观者当场或事后对展览的内容、方式和人员服务的态度，主动地向我们提意见，甚至是批评的意见，除非是恶意攻击必须予以回驳者外，一般应表示欢迎。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一月四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一月五日发出

共印四五、〇五二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四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文艺工作者的讲话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同志接见电影工业会议、电影座谈会、部分戏剧、音乐工作者的讲话

时间：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四二十二时至十五日三时半。

地点：人民大会堂。

江青：今天开这么大的会，电影工业会议、电影创作会议、有关的几个团、几个厂。总理有外事活动，一会儿来。

昨晚我们三个(春桥、文元)看了《海港》样片。对不起，谢铁骊、钱江打了报告，我没时间看，又来了电话，才看了样片。越看越糟糕，我坐卧不安。今天千方百计抽了点时间，选了两部影片(《午宫莺燕》《冷酷的心》)，今天演的是部分，要看全的，你们回去看，可以向发行公司借。这两部影片值得借鉴，不只技术，在技巧上也就是艺术上也值得借鉴。推陈出新。你们都是专家，编剧、导演、摄影师、演员、电影工业科学家。我是个二半吊子，什么也不懂，只会找岔子，放炮。这是开场白。有请老师给我们带路开炮。

(拿起一条毛巾)这就是浅米色，你们可以试试看，还很调和。刚才看电影时，我的意见谢铁骊记了，你说说。

谢铁骊同志：第一场云大假，没有构思。方海珍没有眼神光。

江青：方海珍坐哪里去了？头发真是岂有此理。眼睛象个棋子。头发可以留长一些，去薄一些。眉毛要向上挑一点。

谢铁骊同志：清晰度差。高志扬也看不出眼神光。腰带要换皮的。

江青：要窄的，象小强的一样。

张春桥：现在的绿带子太难看了。

谢铁骊同志：原来是搭肩布系在腰上的。

江青：你们不是说还原舞台、高于舞台吗？现在恰恰是低于舞台，舞台上不那么难看。当然舞台上颜色也可以考虑改变，舞台也是有问题，舞台配色我也是一直与你们作斗争的。

谢铁骊同志：方海珍眼眉应往上挑一点。

江青：高志扬的眼眉都是这样的(向下搭拉)。围巾可以改成浅米色，你们都是白的。现在锚是红的，海水是蓝的，没有中间过渡色，调和不了。

谢铁骊同志：台词不清楚，“政治任务”说得不清楚。有的台词重音不对。

江青：“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啦”重音在“我们”。

谢铁骊同志：唱词听得清，说白听不清。以上是第一场。第三场，方海珍眼睛难看。云虚假、零碎。唱词还听得清，说白不清楚。花坛的花都是白的，不好。

江青：白花上面再有一层黄的，波斯菊，就象你们现在给方海珍换的那件衣服的米黄色。

谢铁骊同志：上海港该有风的，现在没有风。

江青：整个的说，你们没有风的观念。

张春桥：钱江，你在上海住过，晚上有风。黄浦江两岸天天有风，海风不断。

江青：到晚上都有风，很凉快。

张春桥：现在影片上没有风的感觉。

江青：你们给方海珍穿粉红格子的衣服，你们看怯气不怯气？

谢铁骊同志：方海珍的服装哪个好？是不是第一个？

江青：第一个，第一个。那是带格子的，不要通场都用格子的。

谢铁骊同志：前边几场方海珍没有单独穿衬衣，只有翻仓那一场才穿。“安全生产”几个字可用玫瑰红的。

江青：这就是玫瑰红的(指着胸前挂表的带子)。(总理到场)

江青：总理，我请你来的，你坐在这儿，我就高兴。

谢铁骊同志：高志扬与方海珍的围巾是否都用米黄色？

江青：你们考虑吧。

谢铁骊同志：高志扬唱到“黄浦江”时，要出现水的空镜头。

江青：空镜头要适合他的唱词，水要有闪光，要有涌，要歌颂它。

谢铁骊同志：法国梧桐不好看。

江青：不好看，都是矮墩墩的，弯弯曲曲，象长了大瘤子，难看得很呀！

张春桥：我都看不出是什么树。

谢铁骊同志：有一个镜头是实景拍的(指下雨的镜头)。

江青：景与真景不调和，这一点技巧你们都没有。怯，这是北京土话，翻成普通话就是俗气。

姚文元：高志扬的衣服是红的，腰带是绿的，大红大绿不好。

江青：红的不红，绿的不绿。

谢铁骊同志：那不是带子，是披肩，后边要有披肩的动作。

江青：观众不会质问你，那个动作你们隔过去就是了。我对这个戏那么熟，我都没有注意。

姚文元：配色要专门研究一下。

谢铁骊同志：方海珍的手比脑袋还大。方海珍上衣太深了。

江青：现在太深了，稍微浅一些，也不能成银灰。

谢铁骊同志：要先有闪，再有雷声。

江青：要先有风，你们没有风。

张春桥：风是雨的头嘛。

江青：先有风，后有闪，再有雷声。在一个画面上，这一棵树有风，那棵树就不动了。人家说微风吹动着头发，所以我说，你们象在宴会厅梳好了头会外宾，不象在工作。

谢铁骊同志：四场的窗子，颜色太深了。

江青：要淡绿，浅一点。你们看这里的多淡，多调和。多朴实呀！(指会场四周)

谢铁骊同志：风什么时候大，什么时候小，要有安排。

江青：云也要有安排。

姚文元：云是不动的。

张春桥：白云能不能动？现在是台风来临以前嘛。

江青：云虚假。上海的云是这样动的，海南的云是这样动的(用手比画)。

谢铁骊同志：我们回去研究一下，幻灯有困难。

江青：不论怎么动，怎么构图，都要突出人物。你看人家拚命要出绿，但出得不那么亮。

谢铁骊同志：赵振山在前，方海珍在后，焦点不在方海珍身上，焦点不对。四场只挂了世界地图。

江青：大国沙文主义嘛！张××来了吗？我请你来，是要帮他们个忙，画个地图。现在的太淡了，拍不出来了。你要根据摄影的要求，红的怎么红，黄的怎么黄，绿的怎么绿，画一张世界地图，还有中国地图，上海地图。窗子那么多干什么？

江青：主席像搞得那么难看。

谢铁骊同志：是根据新华社的翻的。

江青：挂歪了。头小，不能平挂，要这样，一平挂，头就小了。

谢铁骊同志：这张可以吗？

江青：可以，这是我们选的嘛。颜色太暗，(对石少华同志)重搞一张吧。但还是这一张，这一张是那个年代的。

谢铁骊同志：方海珍头发要吹动一点，头发再薄一点。

江青：方海珍在劳动嘛，在生活里，否则象在真空中。头发后边象个包似的，要在原基础上加加工，你们就是不研究，你头发那么短干嘛？(李丽芳同志：前边加了假发。)

江青：把眼睛搞得象棋子一样。头发后边一定要贴，不然象老母鸡。你看，今天师傅给我吹的鼓了一点(指自己的发形)。

我今天请了画地图的专家。主要问题，所有在座的人都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这个戏是写码头工人的，是写国际主义的，不能蹦一个世界地图，蹦一个世界地图，不称霸嘛，这是主席的教导，不是有三句话吗。

你们这样本身就强加于人了。

所有的人都看不见眼神光。



谢铁骊同志：眼神光比较难，它跟角度有关系，稍一动就没有了。

江青：别说那么难，那么玄乎了。

钱江同志：眼神光在一定的反射角才能看得出来。

江青：我不听你的，不听你的。人家两部片子怎么解释呀？人家有的是四十年代的。在玻璃上跳舞，难度多大呀！

钱江同志：《龙江颂》我们对眼神光还比较注意。眼睛也有关系。

江青：是嘛，《龙江颂》绿也有层次嘛。你们现在是粗制滥造嘛！你讲吧。

谢铁骊同志：方海珍和马洪亮拿的杠棒位置太中心了。女工的上衣也不好，象蛇皮一样。

江青：配色不好。注意冷暖，特别要注意中间色调。

谢铁骊同志：仓库钥匙要有特写。

江青：要有特写，钥匙上要涂上一层光亮。我给战士拍照，刺刀上包上锡纸，打上个灯，就亮了。

谢铁骊同志：镜头处理上，二半吊子镜头太多了。船大假。

江青：船是在水上、冰上、还是在棉花上？奇怪。

谢铁骊同志：水位太高了。画得不好。

江青：钥匙拿起来好些，一把钥匙可以单独放下。窗子太多了，不要那么多，可以挂中国地图、上海地图。韩小强的台词应该是“干不好，我还不想干呢！”应该是这样念，现在平的，意思表达不好。整个片子的基调是这样了。我们上次讲，你们不善于总结经验，老要党和国家给你们交学费，现在四、五本片子又要给你们交学费了。你们现在不仅在技巧上不钻研，技术上也不过关。当然你们也有苦处。现在搞工业的也在，同志们，要攻坚呀！《龙江颂》我称赞了一番，现在后退了嘛，红的不红，绿的不绿，又出来了。清晰度差，模模糊糊，乱七八糟。脸平平的，象个饼。这怎么解释呢？配色不好，这不能说电影工业没过关吧？片子是伊斯曼的。现在灯没有过关，现在一百度片子，他们用六十四度，光他们没有办法，本来拍一个近景用三千支光，你们要用多少万？用了多少万，还灰不溜秋的。不象人家亮是亮的，暗是暗的，人家脸上的光有明有暗，很有层次，你们的脸都象铁饼，没有层次，缺少隔离光。你看人家在大榕树下，胡安的脸还衬着白的衬衫。所以我们要千方百计。现在我们没有过关，你们要克服技术上的问题，

现在用伊斯曼嘛。用光就是技巧，技巧就是艺术嘛，采光技巧、构图嘛，电影语言嘛。

钱江同志：方海珍的脸型适合于平光，不适合打侧光。

江青：不见得！你们照得太胖了，大亮了，你试试看，用各种光试试看，我是说要用电影的各种手段来把英雄人物塑造出来。从头到尾贯串风，从头到尾设计云。自然环境都要真实一些，不然结合不了，远景要画好一些。构图非常不讲究。演员表上要写上扮演者谁，歌唱者谁。基本上采光二半吊子。导演镜头二半吊子。革命精神不旺盛，又把《千万不要忘记》搬出来了，总而言之走了回头路。也许我说了过头话，但是是后退了。刚拍了《龙江颂》我称赞过，相对地好。《奇袭白虎团》也相对地好，就是火光不好，脸谱不好。《奇袭白虎团》摄影来了吗？你讲讲！

你们革命意志衰退，骄傲使人落后嘛！（对总理）他们革命意志衰退，你不给他们敲警钟那还了得。你给他们鼓鼓劲吧！

总理作了重要指示。其中说到：现在开计划会议，计划会议给电影工业要加劲。进点口，作参考，但自力更生为主。进点口作参考，这才能超过。但不要寄希望于进口，要自力更生。上海、北京电影工业要协作，参考外国的东西，以便超过，一年不行，三年嘛，到一九七五年超过嘛。这时，江青打断说：还有个事情。狄福才写了个报告给我，报告基本上是好的，有的提法不妥。印染法……我们完全可以分工合作嘛，迎头赶上，上海、北京、辽宁哪个出来用哪个。要迎头赶上，不能爬行主义，总是爬不完。这全在于先念同志的工业了。弄虚作假欺骗我们不对。北京洗印厂有个事我生气了。林彪专我们政的时候，海军派了个人，叫丁翰，是什么人？我去过。工人很好。上海工人送来染料，积压了两个月不用。又说要偏红，生活当中哪有这样的，刘贤权同志，你解释解释！因为我批了个件，丁翰就写了信给我，说他有活思想，怕洗印厂成了北影的一个车间。好象洗印厂是海军的似的。他到哪儿去了？这家伙破坏活动大了。我建议把他调回来，调到洗印厂去交待清楚他和李作鹏是什么关系。总理在这儿，请总理批吧！

江青：我建议，你们是分别来开会的，可以交流一下，一块谈谈，什么东西要过关。灯具问题就要解决嘛，灯具是可以过关的。你们到北影去看看，那么大的灯，那么高，一层一层的，灯光工人很危险。有搞光学的吗？你们能不能帮他们个忙

啊？你们可要帮他们个忙啊！有没有志气？他们用的四十年代的，甚至是三十年代的，还有老修的。你们到北影去看看，就知道了，惨得很。钱江用的摄影机，那个笨哪，我都可以坐上去推磨。你们可以帮忙吗？先念同志，你带他们去北影看看，一排排那么高，用很多灯，也不清楚。技术上没有过关，因此技巧也把握不住了。

不过你的采光技巧也不过硬，红不红，绿不绿。我们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不搞大国沙文主义，不称霸，但是在电影工业上，我们要迎头赶上，不做爬行的奴隶。我向你们呼吁，要彻底批林，彻底揭发大汉奸、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的罪行。只有把林彪的罪行批深批透批臭，你们才能提高觉悟，擦亮眼睛，攻克科学尖端。不知我谈的对不对，我讲错了，你们攻我。先念同志讲几句吧，我错了你攻我吧。

先念同志：电影工业很复杂，是综合性的，是个重要部门。现在开了会，希望同志们搞上去，要有个志气，要迎头赶上。卫星都上天了，三座大山都打倒了。

江青：林贼破坏，四条汉子破坏，叶群破坏，加上你们又不努力，不成材。我觉得是有这么点门户之见呀，先念同志。

先念同志：钢都超过两千万吨，主席讲了，我们还不是搞上去了。这个我们为什么上不去？

江青：我们在世界上不称霸，但你们电影工业上就一个个称霸。

张春桥：上海工人同志日夜赶，染料试验出来了，运到北京，就是不试。

江青：就是那个丁翰不用，洗印厂来了没有？技术人员来了没有？“八·一”厂来了没有？我怕忘了你们。

保定厂要打倒我，我直接派人去军管就要打我。

军代表：现在好了。

江青：现在不喊着我的名字打倒我啦？你是三十八军的？（答：防化兵的。）你是什么时候来的？（答：六九年。）那你来的晚了。

保定过去黑白片已经过关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加、减法彩色片也不错了，一军管就完蛋了。记者都怕用保定片，清晰度差，齿孔不好。

先念同志：现在好一些了。我们要很好做工作，还有派性。

江青：派性，只有批林才能团结起来。首先批林。

这是用艺术手段宣传毛泽东思想，不然就是强加于人。

用艺术手段宣传毛泽东思想，干巴巴地老是万岁万岁，人家最讨厌。

张春桥：电影工业不仅是电影工业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人造卫星上天了，全国都欢呼。如果我们再往前想一想，在卫星上拍照，那个照相机要求就得高了，胶片也就要求更高了。我举这两个例子就说明问题，不仅地面上的要求，也是天上的要求。我们要赶超，要有远大目标，要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都赶超过去。

轻工业部的对照相机、灯具不重视。

江青：钱江用的摄影机笨得很，我都可以坐上去。

张春桥：轻工业部门有多少万钟，头发夹子、钮扣、牙刷，这些东西也要搞，搞不好，群众也不满意。

江青：我的表带坏了，也买不到(指一指胸前用玫瑰色带子挂的表)。

张春桥：也应该重视，不过这些还有人抓。比较起来电影机、照相机更重要一些，也要有人抓。可我们真要立大志，就要把这些高水平的东西搞上去，这些过了关才行。不然我们的卫星打上去了，拍的照，发不回来，有什么用呢？所以只有这些过了关，我们的人造卫星打上去，才有更大的成果。大家不要只看成电影方面的需要，当然电影也是很重要的。这个过了关，整个化学、机器制造水平都会提高。抓住这事，促进整个工业发展。阻力是有的，困难是有的，主要是林贼一伙破坏，比如洗印厂，上海搞出染料，就是不试验，一等就是两个月。群众是关心工业发展的。要依靠群众，依靠革命技术人员，在党领导下是能够促上去的，是可以突破的。

我们那天看的那个电影，你还不知道呢，人家就劈里啪啦照完了。我们的摄影机笨得要死。主席接见外宾，群众希望看主席的镜头，机器笨，照不好，要搞上去。

姚文元：电视在努力，他们有雄心壮志。昨晚我看了他们一个计划，彩色电视也有决心赶上去。

昨晚看了《海港》部分样片，召集这个会很及时。江青同志已讲了详细的意见。第一就是要把《海港》拍好，第二要促进整个电影工业的发展，也要把其他电影拍好。要批林，要鼓足干劲，要振奋革命精神，扎扎实实，百折不挠，坚韧不拔，一丝不苟地解决一系列具体问题。在文艺革命中，我参加了许多会，我体会到都是这个精神，这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态度，要继续下去。革命精神要和科学态度相

结合，舞台戏就是这样搞出来的。《海港》是表现工人阶级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是表现中国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应该把社会主义时代中国工人阶级英雄形象，崇高的国际主义思想表现出来，用光、配色、构图、造型、电影语言，用种种手段去表现。

江青：一条腰带都斗争好多年，够难斗的。包括那些团，刚取得一点经验，就回潮。你又是《千万不要忘记》（指谢铁骊）。

姚文元：希望大家认真讨论，把取得的成绩巩固下来，不满足，继续前进。不仅电影摄制组，还有其他各团，要总结，要前进再前进。今天我们看了两部片子，用光、配色、技术、艺术技巧有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借鉴。这不是今天看了，从拍样板戏以来就看了不少了，如《智取威虎山》一个骑马动作，就请上海演员们看了许多骑马的片子。艺术创作就是要有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态度。这样才能把工人阶级的形象搞丰满，表现出革命的新中国的面貌。既要重拍，就要拍好。于会泳、浩亮、庆棠回来了，可以参加，帮一帮。

江青：他们有许多缺点啦，我批评他们很厉害，党要培养他们抓创作的。谢铁骊、钱江，我也带了你们好多年了，六八年把你们从黑线保出来，失败了多少次，这次几本又是付学费。要拿出刻苦精神，才对得起主席，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

姚文元：我们现在报纸上还是黑白照片。外国能很快印出彩色照片，今天拍的，明天就登。外国能做的，中国也一定能做到，只要经过努力。就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电视还有点雄心壮志，希望你们互相竞赛。

江青：黄永胜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拍一张出来嘛。我就让你们看了电视。主要是不善于总结经验，好的要发挥，不好的要克服，在座的，包括我本人。

姚文元：江青同志还是鼓励你们的。《龙江颂》是肯定的嘛，《奇袭白虎团》也表扬了嘛，就是今天《海港》有几个镜头江青同志也肯定了。希望你们搞好。

江青：电影工业要为电影艺术工作者打下很好的技术基础。

应该说你那个工业跟艺术比起来要容易得多。我的外科医生说：我的外科手术比你的艺术粗得多。他说了一句公道话。

我们试种的二分地，皮棉亩产二百多斤，稻子一千多斤。

批得不深不透也不臭（指批林），所以眼睛不亮，团结不起来，干劲不十足。

要有一丝不苟的、严谨的、严肃认真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们吃的穿的都是工农兵的嘛，兵也是穿着军装的工农。

(北京电影洗印厂提供)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江青观看歌舞演出的讲话记录稿

〔晚，于会泳传达：首长看了这台歌舞节目很高兴，对大家很关心，希望继续加工提高。首长对剧场卫生很注意，不要一抹到处是灰。《阳春白雪》、《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都是（首长）点的，整个晚会首长都是兴致勃勃，只是时间紧。〕

#### ① 箏

弹箏的女同志不敢穿裙子，可以穿褶裙，设计几种，淡绿、淡蓝、银灰色的。

听工艺展览会的同志讲，东北营口可以造箏、琵琶，你们可去买一点。

②看女声弹唱时说：这衣服还不错，可设计几套不同的式样，在不同的季节穿。

给她们买一双白色塑料鞋也不算多嘛！

化妆太难看。眉毛那么短，眼睛像个窟窿。

#### ③ 舞蹈

怎么一看都是少数民族的东西，汉族的为什么不搞？

汉族的歌舞也很丰富多彩，应该很好发展，要攻汉族舞，要搞些短小的汉族歌舞。

《霸王别姬》就可搞成一个很好的剑舞。京剧可说是集汉族歌舞精华之大成。

《击鼓骂曹》可以搞成一个很好的器乐曲。

#### ④ 舞蹈：送粮

这个舞蹈整个色彩没绿，很单调。椰子树也太小，也不给点光，像个瘪三。

司机上来穿的裤子绿也不绿，蓝也不蓝，很难看。

要很好发展汉族舞蹈，不要都搞少数民族的。

#### ⑤ 二胡

你看又不敢穿裙子。你们不敢穿我就带头穿。不要把女同志打扮得灰溜溜的。墨绿的、玫瑰红的都可以。褶子可以打在两边，可搞飘带，袖口、领边，可绣些小花。京剧的大包袱，中国不穿，朝鲜还穿。

《二泉映月》曲子还是好的。但可以动一动，出些新，有些地方云彩遮住月亮，有的地方月亮透过云彩，突出月亮，明亮点。哀怨情绪要表现出来。

③朱××的裙子很难看，又短，至少可加长二寸，设计白色的，你们不敢穿，我带头穿。

（第二首歌时）你看，又是少数民族的。男子服装，领口不一定都扣得那么紧。可以设计开领的。

《杜》、《平》两个戏已成熟了，可以拍片子了，但要先看一个月的戏。八一厂要出个导演。

唢呐《百鸟朝凤》可以演奏，老百姓喜欢的东西不要轻易丢掉，传统的东西不要随便去动它。

晚会很好，搞个录音给我。

舞蹈可拍电影。《练兵场》海洋搞成红的，没道理，怎么搞红海洋？

（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江青看《杜泉山》剧后的讲话

一九七三年六月二十五日夜至二十六日凌晨

《杜》、《平》要赶快改出来，“七·一”“八·一”分别发表，“七·一”来不及可不演出。

《杜》剧布景，杜鹃花不红，可以去湖南看看。

闪电老是在一个地方，一个样子。

柯湘的衣服，要改为暖色的。

（姚文元：唱词改改，太文了。）

艺校搞点小孩舞蹈，红绸舞、剑舞、青蛙舞、京剧的对舞。

箏不叫古筝，就叫箏。许多乐器都是古代传下来的。把人调到中央乐团去。

剑舞还是用《夜深沉》曲牌。

舞蹈通知总政，除了红海洋外，还要搞帮助民兵训练，要有男民兵、女民兵，体现军民联防，要有个女民兵连长。可以长一些。

我们抓中小型抓晚了。要集中力量抓一下小歌、小舞、小戏，人们说我们贪大求全。

北京京剧团《草原烽火》要离开原作，原作者很坏，奴隶写成奴才。

《白毛女》我没有说过让大春、喜儿相会，不要离开阶级斗争。大春也不要一个人去参军，可带几个人。也不一定在根据地，可以打游击。

有人说杨白劳改得反抗太多了，杨白劳反抗要有，但不要过分。原来喜儿哭爹一场很动人，现在比较平。

一台音乐舞蹈节目很精彩，但化妆太难看，眉毛短，眼睛象个窟窿。

署名，《平原》好办，《杜》大部分是于会泳搞的，都有王××参加，署王××等集体创作吧。还要搞个话剧。

柯湘主调音乐要京剧化一点。现在我跟你们说，京剧还是要姓京。

(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江青在中央乐团音乐会中间及演出后的讲话记录稿

(看男声小合唱)伴奏的女同志还是穿裤子，不敢穿裙子。女同志“夏穿裙，冬穿裤。”设法把裙子设计出来。

(看木琴演出。演奏者站着演奏)可以坐着弹，也可以站着弹。

(看木琴演出的第三个节目《公社姑娘》)曲子怎么有苏修调子?(李德伦同志:是新疆的。)变奏一下，也还可以。(于会泳:赶快改吧!)

(看胡松华独唱)眉毛都是短的。(唱《献上心中最美的歌》)是抒情还是进行?嗓子不如过去好了。像章太太。女同志穿裙子，还要解决袜子问题。舞台上，生活中都要注意。出国要穿连衣裙，四幅，拼起来，直着垂下来。像章出国二百不够，多带一点。(听胡一松华加演的《今日同饮庆功酒》后)顿挫不错。(对浩亮、庆棠说)《平原游击队》和《杜鹃山》也要写些这样漂亮、短小、易普及的唱段。

(听孙家馨唱花腔女高音)出国尽唱毛主席的歌不行。(于会泳:要注意这个问题。国内是群众要求。)

《敬爱的毛主席》太长了。《千年铁树开了花》不精练，要把它磨好。在花腔之前，再发挥一些，可以看看《翠堤春晓》，要超过他们。

样板团的女同志要穿裙子。但不要穿超短裙。出国时，男女独唱演员可以从《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和样板戏中选些唱段去唱，不要老唱少数民族的。我不



是说少数民族的不能唱、不唱，而是比例太大。南方的越剧正在改革，有人说改得好，有人说改得不好。我说改好，不改不适合时代的要求，不改怎么行？声部要改，搞音乐的要帮助他们去改。

（看《草原红卫兵》）钢琴伴奏应弹出马蹄声。（李德伦同志：有，但听不出来。）西哈努克的歌有没有？

《春香闹学》要突出笛子。《水调歌头》、《浪淘沙》、弹词、要录音。出国要带《百鸟朝凤》。

总政出了两期简报，题目是“落实江青同志等中央首长关于音乐舞蹈的指示”——（指六月二十四日）里面说“尽量少安排少数民族歌舞”。不要片面性、绝对化。我不是说不让演少数民族歌舞，是比例太大，要提倡搞汉族舞。我一说剑舞，都去搞剑舞，也可以搞棍舞、刀舞，要举一反三。要有辩证法。剑舞可以穿古装，也可以穿现代服装。千万注意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穿裙子也不要那么死，也可以穿裤子。一不能辩证，二不能举一反三。

（向李德生同志）军队女同志服装也要设计得好看些，也可以穿裙子，还有衬衫。头发谁都不敢烫，我带头烫。不能都弄成三毛流浪记。总不该让四十岁以上的女同志梳两个小髻。该烫的还是可以烫。一当然也不能搞成奇装异服。上海出现过这类现象，要煞一煞。但也不能乱蓬蓬。有的女同志，年岁大了，可以梳抓髻，结彩带。长发也可以，把长发盘起来。

（看《练兵场上》）可以暂时这一样练，也可以换个景，在他们回来的路上，帮助民兵一起练。

样板团的剧场已搞了卫生，北京市的剧场也要搞卫生，不然传染病不得了。

乐团的服装暖冷颜色要通盘考虑。

（看《战台风》）可以站得住。出国要有独奏。新影乐团有个拉板胡的搞得不错，出国的时候可以借来。

唱主席诗词，出国要有字幕。

明天把三台节目的节目单送给我。

（演唱主席诗词时）《忆秦娥》情绪不对，要雄伟、壮烈、苍凉。当时在历史的转折关头。

军队的节目也好，地方的也好，不管哪单位的节目和人，都可以选，演出后可以再回去。来了可以向他们学。民族乐只带独奏。

《霓裳羽衣曲》搞个录音给我。（后失传，民间有《月儿高》，代替《霓裳曲》）。毛主席指示，将《杜泉山》仍改为《杜鹃山》。

（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看《半篮花生》等样片时的讲话记录稿

《半篮花生》：光讲矛盾的普遍性，不讲矛盾的特殊性。主席在《矛盾论》中讲的大部分是矛盾的特殊性。戏中既然提了《矛盾论》，也讲了矛盾，但只讲普遍性，把马克思主义重要问题阉割了。现在苏修就讲普遍性。《大家庭》贩卖无冲突论。

看到了你们送来的材料了（指创办的“内刊”），你们也发现不敢写冲突，写阶级斗争的问题。

建议再学习《矛盾论》。

创办应设评论组。要写一篇文章，写这个问题（指矛盾）。

《半篮花生》很新鲜，并不难改。里面富裕中农可改为摘帽地主，性质仍是内部矛盾。要把矛盾搞得更激烈些。一家人都有共性，但每个人应有个性。女孩子讲的“飞跃”看不出来。

戏不错，要改好。

矛盾问题，现在全国都不敢写。

《送货路上》：很活泼，内容不错，表演形式有好有坏。拍摄太粗糙。桔子像柿子。台步没有出新。“莫怕别人指背脊”，这话不对。演得不错，题材不错。挑杠用的扁担上的双彩球，在《龙江》中已提过，怎么还搞？

《半篮花生》、《送货路上》要改，改完再看。

《两张图纸》：把新干部说得一无是处。当前主席提倡提拔新干部，唱了反调。

《园丁之歌》：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师、知识分子呢？男教师是二流子。

（张春桥：教育路线也有问题，学生受教员摆布，女教师是热爱工农的，但最后给小孩子出了难题。）

教室看不出典型环境。女教师还给男教师说好话，男教师转变也不合理。”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这句话问题大了，应是“有文化能更好革命”。这句话简直是反攻倒算。女的表演简直是青衣花旦，化妆像少奶奶。矛盾也没有很好解决。

音乐创作：

黄河协奏曲，有人说是俄罗斯作品。今后不要让我们上当了。

《水调歌头》完全可以出新。《浪淘沙》有困难。昆曲太纤细了，非出新不可。刚进城的时候，跟金紫光说过，昆曲可以搞一搞，但他搞的是复古。

把《梅花三弄》原曲拿来听一听。

《二泉映月》比较哀怨、压抑。《江河水》比较悲愤，用中西合璧，突出二部。《江河水》要用管子演奏。

《战台风》是个创作，应该提倡。中国音乐是个宝库，应有人搞。要推陈出新，不要搞白手起家。各种地方戏改革动起来了，很可喜，应关心一下。

评剧团的《向阳商店》如何了？据他们说越来越坏了？

（张春桥：评剧很有观众。）

评剧很轻佻，过去家长都不让去看。

可以调一些戏给我们看，也可以在北京公演。全国创作蓬勃开展，要抓一下评论队伍。创作组要组织一个小的评论组，鼓励创作，指出方向。

（文化部办公厅供稿）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批判《园丁之歌》稿件上的批示  
江青：

《园丁之歌》，剧名就不合适，园丁应是共产党，怎么是教师、知识分子呢？教育路线也有问题。学生受教师摆布。（剧中的）女教师热爱工农，最后又给小孩子出了难题。还是让孩子成为火车司机好。

（剧中的）教室看不出典型环境来。女教师还给男教师说好话。男教师转变也不合理。“没有文化怎能担起革命重担”，这句话问题大了。什么没文化就不能干革命。简直是反攻倒算。应是有文化更好革命。女的表演简直是青衣花旦，化妆象少奶奶。矛盾也没有很好解决。

附件：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批判《园丁之歌》稿件上的批示  
请春桥、文元同志先阅，并请提出意见。

江青 七月二十八日

看了一遍，觉得有两个问题需要研究：

一、是否要肯定教师的大多数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有进步，坏人是极少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是长期的，此剧的路线，及其歌颂的人物，都是错误的。  
二、关于学文化的问题，在批判这个电影的修正主义观点同时，是否要肯定学生学社会主义文化及学马列、毛主席著作也是必要的。以全面说明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妥否，请斟酌批示。

（建议改后我们不再看了）

文元 七月二十八日

同意文元同志意见，可以考虑先发两篇，看看反映再发别篇文章。文章不多，在质量。批周赤萍小册子，一篇文章就收效。

春桥 七月二十八日

同意春桥、文元同志意见，请照办。

江青 七月二十八日

（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一九七三年八月五日，江青接见刘诗昆等人时的讲话

刘诗昆在运动中被捕，关了六年，放出来了。过去主席问过他，是新四条汉子（黄、吴、李、邱）不放，是想搞叶帅。刘还是有错误的，抓彭、罗、陆、杨，还有“一·一九”夺权。最近主席又问了。这次接见是传达了主席对他的关心，希望他搞点名著的东西。“战台风”改为钢琴、乐队。要刘恢复基本功，给他一个钢琴，让他跟乐团去日本。

（关于殷诚忠入党，乐团通过，报文化组，文化组又向首长报告，首长让文化组研究。五日晚首长同意乐团支部意见，让殷入党。）让吴德作他介绍人，殷跟我们走了多少年，一直要求入党（殷诚忠很感动）。

赵燕侠可以去艺校工作。开始她是跟我们搞革命样板戏的，记一功。还可以回团演阿庆嫂，同时在艺校教书。

白淑湘是第一个演吴清华的，最近写了个检查，还不错，应该记一功的。去全团作检查，取得群众的谅解，还可以回团演吴清华。

（创办领导同志说：首长提出一个原则，只要承认错误，愿意改，就可以了。）崔嵬，让他拍《平原作战》。崔检讨不错，我们欢迎，完全可以让他工作了。

音乐部分：

要把各个历史时期好的音乐作品，很好加工排列，弄一套节目（指出国），应该是一条历史的长河，包括各个朝代的好作品，从最古的到革命歌曲，到现在的革命作品。

（《梅花三弄》我们报材料说是明朝的。）不对，要查《二十四史》、《艺文志》。在晋书《艺文志》中就有记载。

《广陵散》也有一段故事，嵇康，在杀他的时候，他还弹了《广陵散》，连反对他的人都痛心。

刘邦的《大风歌》还有没有？（李德伦同志答：没有了，配曲吧！）还是要原来的。那么古的从李白的《菩萨蛮》开始吧。唐明皇早几十年还好，后来就糟了，弄一套从古到今的音乐作品，要有一套音乐资料。

《凤阳歌》不要改编过的（安娥三十年代改过）。

要搞西洋音乐史，不抓不行了。

《战台风》很值得提倡，可以改编成钢琴，刘诗昆参加创作。

（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九日，江青听取上海乐团音乐会时的讲话演唱所选的段落很好，可去广交会演出。（看的过程中，江青一直带头鼓掌。）这就是我们的作品，作品好得很。

这个作品有中国声乐的特点，我们的东西就是好。我们最重要的，要创造自己的文化艺术。

（于会泳传达时说：通过这些指示，我们要领会一个精神，首长要我们重视自己的东西。）

要教育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要重视自己的文化艺术，不要轻视，不要盲目崇拜。毛主席对刘诗昆说：“要写自己民族的东西。”外国的东西，有的是吹出来的，其实思想上、艺术上都不行。有人却把它们当作楷模，认为不可变。费城交响乐团来中国，听了我们的音乐，认为很好，而我们自己却不以为然。外贸部反映，外国人对《杜泉山》的反映很强烈，而我们有些人却不愿去看。

上海最近又有一些人反对现代革命作品，这些人中，有的是资产阶级权威，有的是旧上海乐团培养出来的观众。创办的创作评论小组，要对外国音乐进行评论，如对“无标题音乐”。最近，土耳其有音乐家要来，要搞清他们演的节目内容，不要再象费城乐团那样。“无标题”音乐是否没有内容，仅表示某种情绪，要研究。

要提倡和重视创作，可以把京剧的片段写成钢琴曲或管弦乐曲。“穿林海”（乐队演奏）一段就很好。还有一些唱段。如“狱警传”都可以搞成钢琴曲，突出人的作用。搞古代的要慎重，要推陈出新。有的可以不动，有的要出新，出新是很重要的创作。

（于会泳：“可以不动”如《水调歌头》、《十面埋伏》、《大起板》，可按原来的演。）

有些曲子要选比较开朗的，不要选哀怨的，如《二泉映月》要演出，要改，要跳出来。要演激奋、反抗的曲子。象《三十里坡》（陕北民歌）可以改编。

（江青听了《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后说）这个曲子好。（听了《三六》后说）《三六》可以改成管弦乐。《夜深沉》可以改编，以京胡、板胡三大件为主，我们不要老是捆住自己。

（于会泳：这段指示的中心意见，是对古代的选择要慎重，要提倡重视创作。）

以下有关电影问题：

江青：上海三个小戏电影，倾向是好的，但不敢接触矛盾（指《颂银针》）一接触就缩回去了。有的片子讲生产术语，看不懂（指《一寸之间》）。化妆搞假的眼睫毛。

《半蓝花生》是越剧，我们要提倡搞小戏。北京的河北梆子《云岭春燕》要赶快搞。

近来有些人又借故事片少，向我进攻，这些话是放屁。我们自始至终在抓。有些原因，电影工业跟不上，“八·七五”放映机过不了关，林贼捣乱等等。

（于会泳：这方面例子很多（指林贼捣乱）如《智取威虎山》在北京拍电影时斗争很激烈。）

以下有关出国节目的准备：

江青：要有历史长河，要有古代的，也要有现代革命的，但要以现代革命为主。

《剑舞》要搞一个小会演看看。

五七艺校

江青：招生要贯彻阶级路线，但不能搞关门主义。要讲成份，但不能唯成份，不要查三代，要重表现。要坚持以工农兵子弟为主，但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把一些有条件的学生弄掉。

（于会泳：五七艺校要搞一个学习汇报，包括音乐、舞蹈、电影拍摄片断，给中央首长汇报）

江青：旧中宣部房子怎样了，搬过去没有，够不够用？

（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批评江青的一封信的批语  
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有些意见是好的，要容许批评。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关于禁止私自放映封存影片的通知

1973. 11. 26；国发 [1973] 165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国务院各部委：

近来，有些地区和部门未经中央批准私自放映封存影片而且看的范围很广，这是违反中央规定的。中央有些部门，在京召开的专业会议，看内部参考影片，范围过火，看后也不组织批判消毒。这个问题，各地区，各部门，应当引起重视，严肃处理。今后，对封存的影片，必须严格管理，对经批准放映的内部参考影片，必须严格控制放映范围。为此，特作如下通知：

一、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一九六八年六十号文件的规定。凡封存的影片，未经中央批准，一律不得动用。

二、看内部参考影片按下列规定办理：

1、凡是国务院已批准放映的内部参考影片，可组织内部放映。放映范围，应按国务院一九七一年十四号文件的规定严格执行。

中央各部门看上述影片，可持部委领导同志签署的函件，到“中影公司”租、借影片。

2、中宣部、外交部、总参二部以及新闻文艺、科研等单位组织观看内部参考影片，需列出片名，报请中央领导同意后，持批件到“中影公司”租借影片。

3、外宾看内部参考影片，由有关外事部门报请中央领导同志批准后，持批件到“中影公司”租、借影片。

4、各地区、各部门看了内部参考影片，必须组织批判。毒草经过锄掉，才能化为肥料。

以上希遵照执行。

（此件可发至县，由省、市，自治区革委会自行印发）

来源：原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办公厅《文化工作文件资料汇编（三）》，北京：[内部出版]，1988年12月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对电影《园丁之歌》的评价  
我看是出好戏。

2009年12月21日初稿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九册（5）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九章 召开十大

##### 第五节 批判教育领域的复辟回潮

###### 文献资料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新华社通讯员《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

###### “五·七”道路育新人

甘肃省兰州市“五·七”干校从一九六八年创办以来，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已经先后轮训了几千名在职干部。这些干部在“五·七”干校经过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兰州市给排水公司党委副书记傅月华来干校以前，思想上有不少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想不通象他这样一个从小参加革命，受过党多年教育的干部，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会犯错误。他把犯错误的原因归咎于自己过去说多了，做多了，因而下决心今后再不“多事”。在这种错误思想支配下，他虽然发现本单位在落实党的政策上存在一些问题，但却采取了回避态度。

来到“五·七”干校以后，傅月华和其他学员到兰州市红古区平安公社河湾大队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老贫农鲁志新以革命为怀，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迹，深深地触动了他的灵魂。

一九六二年，河湾大队一小撮阶级敌人闹“分田到户”，拉走大队的牲畜，抢种集体耕地，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老贫农鲁志新挺身而出，气壮山河地宣布：“走公社化的路是毛主席定的，我们贫下中农说啥也不能再往回走！”他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针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上级党组织的支持下，终于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捍卫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对照老贫农的英雄行动，傅月华很惭愧。他认识到，自己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正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表现。干革命，就是要象贫农鲁志新那样，不怕担风险，对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就是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回干校后，他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干校学习期满，傅月华回到给排水公司。他带领群众狠抓阶级斗争，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坚决落实党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给排水公司的斗、批、改。现在群众都称赞他是“为革命拉车不怕爬大坡”的好带头人。

### 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翁

吉林柴油机厂广大职工在斗、批、改运动中，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加企业管理，工厂面貌日新月异，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这里向大家介绍这个厂齿轮车间的一件事。齿轮车间广大职工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建立了一个“首件送检制”。实行这项制度后，检验人员严格检查产品的“首件”（即每批产品的第一件），发现问题，就与工人一起，调整机床，校对量具，把废品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可是，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新工人加工一批产品时，看错了千分尺，又没有及时找检验人员检查首件，结果出了一批废品。事情发生后，这个新工人和大多数检验人员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心情很沉重。但是，也有个别检验人员认为这件事与自己关系不大，他们说，制度规定“首件送检”，他没有送首件来检查，我们怎么知道产品废不废？这种思想，引起了检验科长刘殿福的深思。他感到眼前发生的这件事，说明“首件送检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问题就出在这个“送”字上。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在检验科的一次会议上提了出来。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得很热烈。有的同志认为，“首件送检制”群众欢迎，领导同意，没啥好改的。另外一些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说，现在检验人员大都深入车间进行工作，因此保留这个“送”字，不符合检验科的实际情况；同时，要等工人送产品上门检验，这就保留了旧检验制度的残痕。我们要改掉这个“送”字，彻底转变工作作风，全心全意为生产服务。刘殿福支持后一种意见。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首件送检制”改为“首件检查制”。

这以后，检验科人员主动到生产第一线去，配合工人，加强质量检查，堵塞质量事故，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工人群众称赞说：“这个‘送’字改得好！”

北京来的好“摩雅”

在澜沧江畔的密林深处，活跃着一支从北京来的医疗队。他们怀着满腔热忱，进竹楼，登山寨，全心全意地为各族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并为许多社队培训了一大批卫生员，深受各族群众的欢迎，亲切地称他们是“北京来的好‘摩雅’”。

一天清晨，瓢泼大雨下个不停。屋里，三名医疗队员正在聚精会神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纪念白求恩》。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了，他们得知有的地方发生了疫情，于是背起医疗箱就出发了。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茫茫的雨雾之中。虽然山高路滑，他们一口气赶了二十几里路，来到路南山区拉祜族社员聚居的曼迈寨子。

这里正在流行着疟疾病。贫下中农听说来了医疗队，纷纷跑到村口迎接。医疗队员们一进寨子，就投入了紧张的诊治工作。他们挨家挨户地问寒问暖，送医送药，一直忙到天黑，直到把寨子里得病的社员诊治完毕。

就这样，分布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各地的医疗队的同志们，在半年的时间里，共治疗了二万五千多人次，做了各种手术两百多例，使二十七例双目失明的患者重见光明。

教育革命开新路

去年“五一”节前夕，一批来自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的工农兵学员，来到厦门大学数学系新创办的“计算技术与自动控制”专业学习。

过去的数学专业，上不着天，下不落地，与生产实践很少沾边。人们形容它是“一张纸，一枝笔加一个脑袋”。新学员入学后，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数学系的三脱离现象。在学校党委和革委会的领导下，他们学习清华、北大等学校的先进经验，先后派出十几支教育革命实践队，到全省几十个厂矿企业，作广泛的社会调查，决心彻底改变旧数学系的面貌。

系党总支委员、青年教师黄国柱、何宗炯带领的一支实践队，来到了厦门卷烟厂，一边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一边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劳动过程中，他们见烟丝加料工序的劳动强度比较大，决心改变这样笨重的劳动条件。在工厂党组织的支持下，经过同工人们一起反复研究，最后，确定采用射流技术配合光电转换来实现烟丝加料自动化。

射流技术是六十年代出现的一种先进技术，它具有效率高、节省劳动力、实现自动控制等优点。当时，他们既缺乏材料、元件，又对射流技术懂得很少。黄国柱

他们在工人阶级大闹技术革新的革命精神鼓舞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持自力更生，土法上马，说干就干，边干边学。其中有一种紊流元件，要求在仅有一张邮票大小的有机玻璃上雕刻出好几条细小的槽道，又要保持槽道垂直。尽管困难不少，他们硬是用锉刀锯片一刀一刀地锉、锯成功。整个射流技术所需的其他元件，也都用土办法一件件地制作出来了。他们和工人们团结一心，终于用土材料、土设备攻下了现代化的自动控制与射流技术，实现了烟丝加料自动化。

在社会调查和参加实践的基础上，数学系的青年教师们进一步体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并逐步摸索出了一条使数学理论应用于计算技术与自动控制领域的道路，编写出了新的教材。在党的关怀和广大工农兵的支持下，厦门大学数学系计算技术与自动控制专业也就从此正式诞生了。（本栏均据新华社）

（原载《解放军报》1973年1月24日）

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四日，新华社通讯员《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

#### “五·七”道路育新人

甘肃省兰州市“五·七”干校从一九六八年创办以来，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已经先后轮训了几千名在职干部。这些干部在“五·七”干校经过三大革命运动的锻炼，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兰州市给排水公司党委副书记傅月华来干校以前，思想上有不少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他想不通象他这样一个从小参加革命，受过党多年教育的干部，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会犯错误。他把犯错误的原因归咎于自己过去说多了，做多了，因而下决心今后再不“多事”。在这种错误思想支配下，他虽然发现本单位在落实党的政策上存在一些问题，但却采取了回避态度。

来到“五·七”干校以后，傅月华和其他学员到兰州市红古区平安公社河湾大队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老贫农鲁志新以革命为怀，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迹，深深地触动了他的灵魂。

一九六二年，河湾大队一小撮阶级敌人闹“分田到户”，拉走大队的牲畜，抢种集体耕地，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老贫农鲁志新挺身而出，气壮山河地宣布：“走公社化的路是毛主席定的，我们贫下中农说啥也不能再往回走！”他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针对阶级敌人的

破坏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上级党组织的支持下，终于粉碎了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捍卫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对照老贫农的英雄行动，傅月华很惭愧。他认识到，自己那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正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的表现。干革命，就是要象贫农鲁志新那样，不怕担风险，对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事，就是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回干校后，他联系实际认真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干校学习期满，傅月华回到给排水公司。他带领群众狠抓阶级斗争，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货，坚决落实党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给排水公司的斗、批、改。现在群众都称赞他是“为革命拉车不怕爬大坡”的好带头人。

### 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翁

吉林柴油机厂广大职工在斗、批、改运动中，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加企业管理，工厂面貌日新月异，好人好事层出不穷。这里向大家介绍这个厂齿轮车间的一件事。齿轮车间广大职工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建立了一个“首件送检制”。实行这项制度后，检验人员严格检查产品的“首件”（即每批产品的第一件），发现问题，就与工人一起，调整机床，校对量具，把废品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

可是，有一天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个新工人加工一批产品时，看错了千分尺，又没有及时找检验人员检查首件，结果出了一批废品。事情发生后，这个新工人和大多数检验人员感到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心情很沉重。但是，也有个别检验人员认为这件事与自己关系不大，他们说，制度规定“首件送检”，他没有送首件来检查，我们怎么知道产品废不废？这种思想，引起了检验科长刘殿福的深思。他感到眼前发生的这件事，说明“首件送检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问题就出在这个“送”字上。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在检验科的一次会议上提了出来。会上两种意见争论得很热烈。有的同志认为，“首件送检制”群众欢迎，领导同意，没啥好改的。另外一些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说，现在检验人员大都深入车间进行工作，因此保留这个“送”字，不符合检验科的实际情况；同时，要等工人送产品上门检验，这就保留了旧检验制度的残痕。我们要改掉这个“送”字，彻底转变工作作风，全心全意为生产服务。刘殿福支持后一种意见。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将“首件送检制”改为“首件检查制”。

这以后，检验科人员主动到生产第一线去，配合工人，加强质量检查，堵塞质量事故，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工人群众称赞说：“这个‘送’字改得好！”

北京来的好“摩雅”

在澜沧江畔的密林深处，活跃着一支从北京来的医疗队。他们怀着满腔热忱，进竹楼，登山寨，全心全意地为各族贫下中农防病治病，并为许多社队培训了一大批卫生员，深受各族群众的欢迎，亲切地称他们是“北京来的好‘摩雅’”。

一天清晨，瓢泼大雨下个不停。屋里，三名医疗队员正在聚精会神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纪念白求恩》。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了，他们得知有的地方发生了疫情，于是背起医疗箱就出发了。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茫茫的雨雾之中。虽然山高路滑，他们一口气赶了二十几里路，来到路南山区拉祜族社员聚居的曼迈寨子。

这里正在流行着疟疾病。贫下中农听说来了医疗队，纷纷跑到村口迎接。医疗队员们一进寨子，就投入了紧张的诊治工作。他们挨家挨户地问寒问暖，送医送药，一直忙到天黑，直到把寨子里得病的社员诊治完毕。

就这样，分布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各地的医疗队的同志们，在半年的时间里，共治疗了二万五千多人次，做了各种手术两百多例，使二十七例双目失明的患者重见光明。

教育革命开新路

去年“五一”节前夕，一批来自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的工农兵学员，来到厦门大学数学系新创办的“计算技术与自动控制”专业学习。

过去的数学专业，上不着天，下不落地，与生产实践很少沾边。人们形容它是“一张纸，一枝笔加一个脑袋”。新学员入学后，首先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数学系的三脱离现象。在学校党委和革委会的领导下，他们学习清华、北大等学校的先进经验，先后派出十几支教育革命实践队，到全省几十个厂矿企业，作广泛的社会调查，决心彻底改变旧数学系的面貌。

系党总支委员、青年教师黄国柱、何宗炯带领的一支实践队，来到了厦门卷烟厂，一边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一边进行教育革命实践。劳动过程中，他们见烟丝加料工序的劳动强度比较大，决心改变这样笨重的劳动条件。在工厂党组织的支持下，经过同工人们一起反复研究，最后，确定采用射流技术配合光电转换来实现烟丝加料自动化。

射流技术是六十年代出现的一种先进技术，它具有效率高、节省劳动力、实现自动控制等优点。当时，他们既缺乏材料、元件，又对射流技术懂得很少。黄国柱他们在工人阶级大闹技术革新的革命精神鼓舞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坚持自力更生，土法上马，说干就干，边干边学。其中有一种紊流元件，要求在仅有一张邮票大小的有机玻璃上雕刻出好几条细小的槽道，又要保持槽道垂直。尽管困难不少，他们硬是用锉刀锯片一刀一刀地锉、锯成功。整个射流技术所需的其他元件，也都用土办法一件件地制作出来了。他们和工人们团结一心，终于用土材料、土设备攻下了现代化的自动控制与射流技术，实现了烟丝加料自动化。

在社会调查和参加实践的基础上，数学系的青年教师们进一步体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并逐步摸索出了一条使数学理论应用于计算技术与自动控制领域的道路，编写出了新的教材。在党的关怀和广大工农兵的支持下，厦门大学数学系计算技术与自动控制专业也就从此正式诞生了。（本栏均据新华社）

（原载《解放军报》1973年1月24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编者按：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发表已经五年了。教育战线的斗、批、改，正在继续深入。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 \* \*

《辽宁日报》编者按：这里刊载的是张铁生同志在今年大学招生考核试卷背面写的一封信。

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选送大学，这是我国教育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它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必然会遇到各种旧的思想、旧的习惯势力的阻力。大学招生，在群众评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是，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今天，我们发表张铁生同志的信，目的就在于请大家讨论、研究这些问题，欢迎关心教育革命的同志发表自己的看法。

\* \* \*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原载《辽宁日报》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九日；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新华社报道：在伟大的批修整风运动推动下 北京大学教育革命深入发展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九日讯，在伟大的批修整风运动推动下，北京大学里到处呈现着热气腾腾的新景象。

理科、文科和外语科一些系的师生，在深入工厂、农村和部队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批修整风和教育革命实践之后，已经陆续返回学校，正在认真总结经验。

今年各系的应届毕业生纷纷打起背包，在教师们的带领下，意气风发地开赴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到那里去开展毕业前的综合训练。

整个学校的教育革命，正在加快步伐地向前进。

批修整风这个纲，带动了教育革命这个目，促使北京大学的教育革命不断深入发展。现在，北京大学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已经深入到学科领域。经济系在学习《反杜林论》时，重点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等谬论。一位从事经济学说史研究几十年的老教授也积极投入战斗，一边参加批判，一边亲自讲课。文科各系师生，今年春天深入到北京郊区二十九个公社、二百六十多个大队，同贫下中农一起，联系农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活生生事实，批判了刘少奇

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很好地检验和锻炼了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发挥了文科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战斗作用。哲学系一些师生到工厂、农村、商店进行社会调查，写出一批调查报告，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文科各系这样结合现实斗争组织教学，有利于从根本上改造旧北大文科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的恶劣学风。现在，各系都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出发确定专业方向，把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作为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中心，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列为主要课程，并增设了研究现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课程。有关“史”的课程也努力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在斗争中逐步得到改造。

理科各系也深入开展学科领域的革命大批判。数学系党总支组织教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批判微积分教材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对微积分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材编写等方面进行认真的改革。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写出论文《微积分的理论是怎么来的？》研究数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从中考察理论与实际、科学与生产的关系，深入批判自然科学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潮，批判把数学看作与生产实践无关的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这样深入学科领域的革命大批判，搞得生动活泼，深刻有力，既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又推动了学科的改造。

在批修整风中，北京大学针对旧教育制度的“三脱离”的要害，不断开展革命大批判，更加坚定了开门办学的方向。中文系新闻专业师生到天津市北郊区岔房子公社，结合调查养猪事业进行教学时，抓住刘少奇一类骗子窜到这里所散布的谬论及其影响，深入调查，认真研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写出了《关键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调查报告和《为革命大养其猪》的评论，配合了当地的批修整风运动和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工作。两年多来，北京大学文科各系师生每年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下厂下乡参加现实斗争，先后写出几千份调查报告，在报刊上发表了八百多篇文章。他们还协助工矿企业、机关、农村举办各种类型的读书班、学习班、政治夜校六百多个，参加学习的有四万多人，在社会上辅导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二百多次，听众六万人次，深受群众的欢迎。理科各系在认真巩固和发展校办工厂的同时，和校外六十多个工厂建立了厂校挂钩关系，逐步建立起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新体制，把课堂教学、实验

室教学和参加校内外工厂生产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他们在校内外举办气象、地震、可控硅、生物电子学、数理统计、超导材料等短期训练班二十八期，共有一千八百多名工人、技术人员等参加学习，对发展生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起了良好的作用。校办工厂几年来由三所发展到十所，产品由几种发展到几十种，既为现场教学和科学实验提供了有利条件，又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

北京大学以批修整风为纲，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科学研究方面也作出可喜的成绩。理科各系从我国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与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出发，并考虑到专业培养目标和发展方向，近两年来进行了一百多项科学研究，其中有四十多项进展较大，有些项目已经取得一定成果。文科一些教师经过大量的研究，写出了《资本主义世界货币金融危机的新风暴》等论文。理科各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积极参加了科学研究。许多工农兵大学生在科学实验中显示出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不久前，农业微生物专业四名学生由教师带领，到北京市清河粉丝厂研究酸浆为什么能沉淀淀粉的原理。他们跟班参加劳动，了解生产过程，虚心向工人学习，查阅和分析有关文献，设计出实验方案，并且和这个厂的工人、技术人员共同实验，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取得了初步成果。粉丝厂的工人兴奋地说：“几百年来用酸浆沉淀淀粉的谜解开了。”有机化学专业参加科学研究训练的五十多名学生，已经有四十多人取得了初步成果。农药组一名学生同北京市农药二厂工人、技术员一起合成一种新杀菌剂，提出了一条用多磷酸作失水剂的工艺路线，使最后一步的缩合反应收率在实验室里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心血管药物小组和麻醉药物小组的师生合作，试制出抗心绞痛和强效安定剂两种新药，现已送有关单位进行药理试验。参加这项科学研究训练的一位学生，入学前在一个制药厂工作十多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尽管她文化基础低些，但在科研训练中严格要求，认真操作，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多年实践经验，打破框框，大胆试验，取得了良好的实验效果。

两年来，北京大学文科、理科和外语科各系还先后组织八百多名教师，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批判旧教材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编写出五百多种新教材，初步满足了目前教学的需要。历史系一些教师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批判唯心史观，仅用半年多时间，编写出一套《简明世界史》教材，内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是历史教材改革中的一次比较成功

的尝试。化学系物理化学和化工原理教学小组一位教授和几位青年教师，先后到北京几个化工厂参加生产劳动，广泛进行现场调查，虚心向工人学习，认真总结生产实践的经验，突破了旧教材从概念到概念的封闭体系，编写出了理论与实际结合较好的新教材《化学动力学和反应器原理》，在改革物理化学教材中取得了新的成果。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刊登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

《北京日报》编者按：我们热情地向读者推荐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红小兵黄帅同学（女）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这个十二岁的小学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

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

“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作战。在这一场战斗中，革命的教师和学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团结起来，共同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我们希望大家都要当教育革命的促进派，而反对那种促退派；要当动力，而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在运动的对立面。毛主席教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了许许多多象黄帅这样的积极分子，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就大有希望。学校的领导和革命的教师、包括在教育革命中有一些缺点或者犯有一些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都应当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坚决支持教育革命中出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热情地欢迎和支持这些可爱的革命小将，帮助他们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我们要认真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头脑，深入批林整风，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提高路线斗争觉

悟的基础上，总结工作，搞好教育战线的斗、批、改。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在斗争中，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正确与错误。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教育革命中，还要注意维护按照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教学制度、纪律和秩序。希望大、中、小学的干部、教师和同学们把在这一斗争中的经验、体会，以及对于各种错误观点、错误倾向的批判文章写给我们，以便在报纸上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从而推动教育革命的发展。

来信

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九月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我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我“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我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这星期班上可热闹了，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同学训斥我，我去上课就是准备挨整。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平时每日换一期，这篇板报老师宣布登一星期，并对板报组表示“感谢”。最近，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我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

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嚎声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

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

（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 黄帅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日记摘抄

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

今天，我班的×××同学犯了错误，当老师问他情况时，他带理不理，不象承认错误的样子。我看他那样，无意识的笑了一笑。老师把我叫起来，批评我不该笑。这点我虚心接受，一定改正。但是老师说：“有同学反映你和×××……，你内心非常爱听×××骂”。这句话我不能接受。我敢发誓：除了他骂我，我跟他顶嘴以外，我再也没有和他瞎逗过。今天的日记如果错了，请批评指正。

九月七日

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九月二十八日

今天，老师批评我不该给他提意见。对不起，以后我有意见，还是要提的。象今天老师骂我装病，这就是唯心主义。×××的椅子丢了，站着上课。算术老师把老师上课时坐的椅子借给×××坐，这种关心同学的精神值得我学习。第三堂课时，你不应该把椅子夺回来自己坐。

十月十三日

今天，××在课上向老师提了意见，老师说是我起的头，说我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同学应该正确接受老师批评，老师应该冷静考虑同学的意见。

十月十八日

今天，老师在全班又批判我。我对老师的意见有些是能够接受的，但不能接受的很多。如“黄帅你也真表帅，从小就表帅，太帅了”，这不是讽刺是什么？你还说：“黄帅从现在起不许打篮球”，……我感到这更是报复行为。

十月十九日

最近我是天天受老师和同学的训，以下就是老师对我批评中的语言：“听校外群众说：中关村一小出了一个反潮流者，好家伙，这事儿都传到社会中去了”；“你在这次斗争中，当不了张铁生那样的人物”；“直到现在我还是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限”；“黄帅你这样折腾，也是没有好结果的”。

（原载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北京日报》发表后中关村第一小学教育革命形势大好》

本报讯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发表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后，黄帅所在的学校——北京市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师生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学校党支部以黄帅的来信、日记和《北京日报》编者按为教材，组织全校师生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和热情支持黄帅反潮流的革命行动，并以此来推动教育革命向前发展。

中关村一小师生的思想十分活跃。在课堂上，走廊里，操场边，热烈讨论“向黄帅学习什么？”“怎样做一个无产阶级的好学生？”“怎样认识师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等问题。四、五、六年级各班还办了专栏，谈学习心得，批判修正主义。同学们在决心书中表示，要学习黄帅敢于反错误倾向的革命精神，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做“小闯将”，不做“小绵羊”。要在思想上、学习上、纪律上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有的同学说，老师和学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战友，要共同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课外，同学和老师在一起亲切谈心，共同写批判稿，全校呈现出一派师生团结闹革命的生动景象。

中关村一小还召开了学生家长座谈会，主动征求家长们对学校工作的意见。许多家长都表示要向黄帅学习，并指出，黄帅的信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旧的传统观念还很顽强。“师道尊严”必须破。有的家长

说，教师有“师道尊严”，我们也有“父道尊严”，这些旧的传统观念都要破。会上，家长们对学校工作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既肯定成绩，也指出缺点，表示要和全校师生一起投入这场运动。家长们的发言，给学校干部和教师很大的鼓舞和启发。他们认识到：“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要看到资产阶级右倾复辟势力的危险性，要向他们应战。同时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在上级党组织的热情帮助下，中关村一小的教师们路线觉悟有很大的提高，增强了师生间的团结，积极努力工作。教师们纷纷到同学中间听取意见和进行家访。黄帅的班主任主动到黄帅农里找家长谈心，还帮黄帅贴大字报；黄帅和同学们一起，主动把班主任的宿舍打扫干净。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新华社记者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就新型大学生 全国近三万名工农兵大学生陆续毕业，朝气蓬勃地回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

据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讯在批林整风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工农业战线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下，我国教育战线上又传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各高等学校一九七〇年招收的第一批工农兵学生陆续毕业了。今年先后有二万九千多名工农兵大学生，满怀思想和业务学习双丰收的喜悦，朝气蓬勃地回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之花开始结出了丰硕之果，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我国工人阶级于一九六八年浩浩荡荡开进高等学校，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学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改革旧的招生制度，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教导，开始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大学生，实现了我国亿万工农兵的愿望。



工农兵上大学,使我国高等学校的面貌为之一新。第一批工农兵大学生一踏进学校的大门,就响亮地提出“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战斗口号。三年来,他们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积极参加批林整风,向林彪反党集团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猛烈开火,在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提高了觉悟。这批工农兵大学生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以生力军的姿态,同革命的教师和职工一起投入教育革命,坚决走毛主席《五·七指示》指引的道路,冲破旧教育制度“三脱离”的恶劣影响,把教育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实行多种形式的开门办学,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新体制,改造和提高教师队伍,改革旧的教材和教学方法,使学校的面貌发生了越来越深刻的变化。

党的十大以来,这些工农兵大学生和广大师生一起,进一步提高了搞好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自觉性,更加焕发了革命精神,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不少学校的第一届工农兵学生,在积极参加教育革命的实践过程中,不断运用“四大”武器,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剥削阶级旧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许多学校的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以教育革命为己任,在毕业前夕还认真地回顾总结了参加学校教育革命的实践经验。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刘丽华,根据自己几年来上大学的体会,临别给母校留下了很好的意见。她列举事实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流毒在学校的若干表现,表示决心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继续关心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关心教育战线的斗争。她的意见受到学校党委和上海市委的重视,在上海高等学校师生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推动了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

今年毕业的这批工农兵大学生,在校的几年里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课。他们保持艰苦奋斗的工农本色,注意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努力改造世界观,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觉悟不断提高。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在校学习期间和在毕业以后,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沈阳医学院今年有四百多名工农兵学生毕业。这批学生在学习期间坚持为工农兵服务,不仅为病人治病,而且经常给病人梳头洗脸,端屎倒尿,不怕脏,不怕累。为了探索新的治疗方法,他们在自己身上扎针试药。为了抢救阶级兄弟的生命,

他们献出自己的鲜血。假期，他们大都回到农村，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走家串户，送医上门，为贫下中农服务。安徽农学院大学生曹术生，原来就是优秀的女社员。大学毕业后，她回乡担任了公社农业技术员，和贫下中农一起劳动，一起搞科学实验，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贫下中农高兴地说：“她还和俺社员一个样！”这些工农兵大学生牢记自己是靠阶级的培养，受阶级的委托来上大学的。他们为革命而学的目的明确，作风刻苦，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因此学得生动活泼，运用基本的理论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很快，几年来他们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参加群众性的看书学习活动，参加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在实践中提高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复旦大学哲学系工农兵学生协助工厂、公社等基层单位举办了多期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习班，作了一百四十多次辅导，写了十多篇用哲学观点总结三大革命运动经验的文章。这个学校的新闻系工农兵学生把社会调查作为一项基本功，结合战斗任务进行学习，既提高了自己，又对现实斗争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理工科及其它专业的毕业生，特别是一些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工人，掌握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以后，在生产和科研斗争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首届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经过三年的培养，大多数能够完成具有一定难度的中小型水利工程设计任务，有的并有所创见。同济大学水泥专业三十多名毕业生，毕业前接受了江西省上饶一个水泥厂两个主要车间的工艺设计任务。他们怀着高度的革命责任心提出：“我们宁愿修改一千遍，也绝不在图纸上留下一条工人师傅不欢迎的线。”他们在教师的指导下，依靠工人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胜利完成任务，并在技术上作了不少改革，节省了投资。昆明工学院机械制造工艺及设备专业和有用矿物精选专业的第一批四十九名毕业生，都是白、苗、彝、汉等民族的老工人。他们毕业回厂后，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新华社记者报道：一代新人在战斗中成长——记北京大学首届毕业的工农兵学生

三年前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选择上了北京大学的第一批二千三百多名学生，已经完成了毕业前的实习，即将返回各个战斗岗位。

在这不平凡的三年里，一代新人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又红又专道路成长起来了。

广大工农兵群众看到他们成长，欢欣鼓舞。

老工人说：“咱们送去的这批青年人，上了几年大学，根更红，苗更壮了。这样的知识分子，咱工人打心眼里欢迎！”

贫下中农说：“这样的大学生好，和咱们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欢迎这样的大学生！”

为革命而学，在战斗中学

的确，大学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为哪个阶级服务，这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现在，让我们看看在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里，这些工农兵学生是怎样在战斗中成长的事实吧。

有天晚上，在北京郊区大兴县一个公社干部学习班上，一位工人打扮的人，目光炯炯有神，正在滔滔不绝地作学习《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的辅导报告。他联系农村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力地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恶毒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听课的人们赞不绝口地说：“这节课讲得通俗易懂，有理论，有实际，战斗性真强！”

这位讲课人是谁？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郭光新。入学前，他是一位有十八年工龄的翻砂工。

这位老工人在大学三年期间，和同学们一起坚持“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道路，每年都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下厂下乡，把参加现实斗争和理论学习结合起来，从根本上废除了旧大学文科关在高楼深院里钻故纸堆的那一套，使自己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激动地说：“旧大学把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列入选读课，当作业务知识学。今天我们工农兵上大学，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战斗的武器来掌握，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发挥战斗作用。”

郭光新原来文化水平比较低，在革命大批判中，满肚子的话要说，可是写不出来，急得攥着笔杆直出汗。他深深感到，光有朴素的阶级感情还不行，要揭穿阶级敌人的谣言和诡辩，还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武器。学习中，他冲破“拿榔头的手握不起笔杆”的思想束缚，立志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猛攻文化关，攀登

理论山。他发扬“钉子”精神，经常钻研到深夜，批判稿写了一遍又一遍。三年来，他在战斗中学理论，精读了马列和毛主席有关哲学等著作十多部，写出了一百多万字的读书笔记、批判文章、调查报告等。他右手中指上握笔磨出的硬茧，成了他刻苦学习的见证。他写的《关于哲学的党性》一文，被选登在校刊上，人们赞扬它是一篇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文章。

为革命而学，在战斗中增长才干，这是北京大学首届工农兵学生的共同特点。他们方向对头，明确为那个阶级服务，战斗更加勇往直前。

富有战斗性的《论语批注》，就是这样诞生的。

在一次学习党的十大文件的会上，哲学系一些首届工农兵学生和教师正在热烈讨论关于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一个学生提出说：“《论语》是孔子言论集，也是儒家的代表作。为了配合当前广大群众的批判需要，我们把这个反面教材来个注释怎么样？”有的学生接上去说：“过去没人对《论语》全书批判过，我们现在不但要写注释，还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批判它，把千百年来鼓吹孔孟之道的旧案翻过来。”大家一致同意这个意见，便决定在毕业前投入这场战斗。

正当紧张战斗的时候，忽然吹来一股冷风。有个资产阶级教授，说什么“《论语》只能注，不能批。”学生们回答说：“今天我们工农兵大学生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为那些反动的、倒退的东西，前人不注的我们要注，前人不批的我们要批！”

他们迎着风浪上，战斗意志越发坚强。在教师的指导下，他们翻阅大量史料，明确批判重点，分成六个小组，边议论，边批注，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论语批注》初稿。为了广泛征求群众意见，二十几个学生奋战七天七夜，自己刻印出上下两册，拿着这些初稿，分别到几个工厂和一些单位边办批孔学习班，边征求意见，受到工人们的热情支持。工人说：“我们自己的大学生，为了给工农兵服务，费了这么多心血，我们一定要帮助把好关。”在工人的帮助和激励下，学生们加速进行修改，使它更通俗、准确、战斗力强。目前，这部有注、有译、有批判的《论语批注》已经基本脱稿。

一位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老教授看了也说：“《论语》是儒家的经典，历史上只给它作过注和疏，那无疑都是为孔孟之道鼓吹的。现在工农兵学生虽没有

读过很多古书，但是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对《论语》作了批注，是了不起的事情，这是旧大学所不可比拟的。”

既有理论，又能实践

是的，现在的工农兵大学生在战斗中学到的知识和能力，是旧教育制度下所不可比拟的。

最近，在燃化部召开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报告会上，一个身穿解放军服装的青年人登上讲坛作学术报告。他一边指着挂图，一边熟练地讲述着他们从渣油中直接制取“的确良”原料——苯酐的科研成果。

这位二十三岁的青年人，是北京大学学生姚金华。他应邀代表本校化学系石油化学专业应届毕业生中的十二名同学，来参加报告会，介绍他们毕业前完成的这项科学研究成果。来自二十一个省市有关生产、科研和学校的代表，听了姚金华的学术报告都感到欢欣鼓舞。有的说，工农兵学生只学三年，比起过去六年制大学毕业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强得多了。有的说，工农兵学生能做出这样的科研成果，这是教育战线贯彻执行毛主席“七·二一”光辉指示的胜利。

在四个月前，姚金华等十二个学生接受一个炼油厂提出的这项科研任务。工厂的同志说，在热裂解过程中每天产生大量渣油，都白白烧掉了。可是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又急需化工原料苯酐。学生们听了，急国家所急，决心尽快把这个科研项目攻下来。他们在短短三年里，已经学过了化学系的基础课和《有关催化反应原理》、《催化剂及催化作用基本原理》、《催化反应实验》、《催化动力学》等课程，而且又是在开门办学，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新体制的过程中联系实际学的，学得深，学得活，记得牢，用得上，为他们攻克这个科研项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要从渣油中直接制取苯酐，必须找出最好的催化剂来。为此，他们组成了三个实验小组。教师要求每组作出五、六个催化剂实验，可是他们准确、细致地操作，互相密切配合，每组都完成了七、八个实验，共找出三种较好的催化剂。接着，又从中选出了苯酐产率最高的一种催化剂。

在实验过程中，他们看到有关文献中记载着某种助剂的加入适宜量，如果超过百分之十，就会减少催化作用。学生姚金华说：“别迷信书本，让我们自己实验实

验再看。”实验的结果，与文献记载的恰恰相反，加入这种助剂超过百分之十以上反而是最适宜的。

他们就是这样创造性地把这项科研任务按时完成了。但是，学生们并不因此满足。他们处处为生产着想，又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日夜奋战，对这种催化剂进行了寿命试验，给工业生产提供了更完整的数据。一位教研室负责人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说：“这是北大化学系催化教研室建立以来从没有做过的，是过去在‘三脱离’的情况下不可想象的。”

化学系石油化学专业十二名学生完成的这个科研项目，只是理科学生在毕业实习中取得的几百项科研成果之一。近三、四个月来，他们根据各自所学专业的特点，分别到厂矿、农村、科研单位进行了毕业前的实习。他们的选题，有的是国家有关部门下达的科研任务，有的是校办工厂提出的研究课题或调查研究中发现的急需解决的课题。生物系农业生物专业赖地福等四名学生的毕业实习选题，就是在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了解到这个产棉区近年来出现棉蚜危害严重情况后选定的。

二十九岁的赖地福，原是江西革命老根据地于都县罗①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入学前就有丰富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公社党委和贫下中农为了培养他，决定送他上大学，临行时还送他红井水和长冈乡的斗笠，嘱咐他饮水不忘掘井人，要发扬老区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努力学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他是罗①第一代工农兵大学生，学习十分刻苦，而且能理论联系实际。第一年学《土壤学》，就结合家乡的土壤情况，提出了改良土壤的见解，得到教师的好评。这次，他接受防治棉蚜的科研任务，正是盛夏季节，他和另一个同学不顾骄阳似火，不顾倾盆大雨，一连四、五十天坚持田间调查。为了弄清一片棉叶下面密密麻麻数百个棉蚜的增殖情况，他经常整天钻进闷热的棉田里，仰卧在棉叶下细心观察。每次从棉田出来，都是一身汗，一身虫。他和同学运用所学的理论知识，不仅找出了棉蚜在伏天消长的规律，而且发现了在温度超过摄氏二十五度、空气湿度超过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条件下棉蚜仍有增殖的趋势，这是前人在书本上没有记载过的。这就为预测预报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为了除治棉蚜，他们又从四十多种农药中筛选出了一种高效低毒的新农药——辛硫磷。这一科研成果，为棉花增产作出了贡献，深受当地贫下中农的称赞。

赖地福经过三年学习，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都大大提高了。

“上、管、改”中的一支生力军

这批工农兵学生肩负阶级重托，从昂首阔步进入北京大学的那天起，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就投入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战斗，在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斗争中，发挥了朝气蓬勃的生力军作用。

三年来，他们积极参加教育革命的实践，不断荡涤封、资、修长期统治教育阵地留下的恶劣影响，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大学“三脱离”的现象。文科、理科这样，外语科系也这样。外语科系首届毕业的七百多名学生，三年来积极参加现实斗争，用十二国文字翻译了一百六十多万字，并且在战斗中攻克了旧北大外语教学上多年存在的“聋哑病”，能够同外国朋友亲切交谈了。全校第一届工农兵学生，还经常分析教育阵地上，教学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斗争的问题，不断向阻碍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修正主义路线流毒和旧的传统观念作斗争。学校党委也鼓励他们要敢于管路线，敢于管方向，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正是在这样不平凡的战斗中，他们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成长起来，谱写了教育革命的新凯歌，在北京大学的校史上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土加凹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2009年12月28日初稿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九册（6）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九章 召开十大

##### 第六节 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

#### 文献资料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一百四十八名）

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 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 李德生

秘书长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伯承 江青（女） 朱德 许世友 陈锡联 李先念 姚文元

董必武 纪登奎 汪东兴 华国锋 吴德

丁盛 马天水 马宁 马金花（女） 于会泳 邓小平 邓颖超（女）

王体 王震 王六生 王必成 王永楨 王秀珍（女） 王淮湘 王德山

巴桑（女） 尤太忠 毛远新 韦国清 韦彩猷 文香兰（女） 瓦力斯江·吐尔地

白如冰 皮定均 玄顺姬（女） 任荣 刘子厚 刘兴元 刘庆棠 刘建勋

刘春樵 乌兰夫 孙玉国 江礼银 朱兴亚 朱克家 朱秀峰（女） 朱明仓

华林森 年继荣 邢燕子（女） 陈云 陈永贵 陈先瑞 孜牙 杜平 杨勇

杨得志 李大章 李志民 李秀兰（女） 李素文（女） 李瑞山 张凤英（女）

张平化 张世忠 张达志 张江霖 张延成 张秀芝（女） 张体学 张恒云

张宗逊 张洪池 吕玉兰（女） 吕存姐（女） 吴向必 吴桂贤（女）

时克启 宋佩璋 余秋里 佟纯良 汪家道 余积德 苏振华 周兴 周一良

周建人 周丽琴（女） 宝日勒岱（女） 冼恒汉 林丽韞（女） 金祖敏



赵紫阳 郝建秀（女） 浩亮 耿飏 徐向前 徐景贤 郭宏杰 郭沫若 倪志福

唐岐山 唐忠富 唐闻生（女） 海呷子 钱学森 聂荣臻 秦基伟 诸惠芬（女）

梅小丫（女） 尉凤英（女） 黄林英（女） 盘美英（女） 曹轶欧（女）

曹莲凤（女） 康健民 梁锦棠 姬鹏飞 彭冲 韩英 韩先楚 粟裕

解学恭 曾绍山 曾思玉 谢振华 谢静宜（女） 董明会 雷桂梅（女）

谭启龙 赛福鼎 蔡畅（女） 蔡协斌 蔡树梅（女） 潘世告 鲁瑞林 樊德玲

魏秉奎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73年8月25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中共十大上的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报告。主要内容是：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

关于九大路线

党的九大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举行的。

九大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鲜经验，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再次肯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同志们记得，毛主席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开幕的时候，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在同年四月二十八日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又一次明确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毛主席并且预言：“过

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毛主席的讲话和大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为我们党规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1)(2)）但是，九大期间和大会以后，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一九七〇年八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九月八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九月十三日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九·一三事件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亿万各族人民进行了认真讨论，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对林彪一类骗子的革命大批判，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清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事实证明，林彪反党集团不过是一小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极为孤立，无碍大局。林彪反党集团，不但没有也不可能挡住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奔腾前进，反而进一步激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九大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九大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新的成果。被林彪破坏了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得到发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了新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加强战备、参加人

民的革命和建设方面作出了新贡献。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更加坚强。我们的党，经过吐故纳新，现在已经是由二千八百万党员组成的更加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我国人民战胜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破坏，克服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夺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财政贸易情况良好。我们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文化教育卫生科学技术事业，也有许多新成就。

在国际方面，我们党和我国政府，坚决地贯彻执行了九大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的革命友谊，同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到恢复。孤立中国的政策宣告破产，中美关系有所改进。中日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广泛，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推动着世界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九大以来的革命实践，主要是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践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过，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因此，在这里就不需要多讲。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党内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刘少奇叛徒集团垮台，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

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刻，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在高尔基州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就疯狂地反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真理报》）一九六七年三月，苏修另一个头目在莫斯科的群众大会上，更露骨地说什么“代

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迟早还会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自己伟大的国家获得胜利。”（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三月十日《真理报》）他们所说的“健康力量”就是代表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力量，他们所说的“决定性的话”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所说的“思想胜利”就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修正主义在中国上台，他们所说的“国际主义道路”就是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路。勃列日涅夫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主席把“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主要条件之一，并且写进了我们的党章。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正在古田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事实证明，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要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当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逐步深入，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时候，林彪这一类只为

少数人谋利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位越高，野心越大，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就再也隐藏不住，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宣告了他的总暴露，总破产。

恩格斯说得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

“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五卷 380 页）

同志们！

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国内外敌人都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由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地主、资本家亲自出马要好得多，特别是地主、资本家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就是将来阶级消灭了，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会存在。何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不正确，即使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地方的领导权、军队的领导权，也要跨台。路线正确，没有一个兵也会有兵，没有政权也会有政权。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都是如此。林彪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问题决定于路线。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并且为各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具体路线和政策。我们在工作中，不但要重视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而且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这是我们党取得更大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主席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我们指出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指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我们每个同志都要牢记这三项原则，坚持这三项原则，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对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掩盖着“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纠正王明的“左”倾，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掩盖着林彪的修正主义。这种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种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个别人顶住的事，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出现。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而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毛主席就是在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中敢于反潮流，敢于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我们每一个同志应当向毛主席好好学习，坚持这个原则。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同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武装的、非武装的、公开的、隐蔽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较量。我们党没有被分裂，没有被打垮。相反，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更加发展，我们党更加壮大。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深信：“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正象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所预言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只要我们全党牢记历史经验，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资产阶级的一切复辟阴谋总是要失败的。不管再发生多少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也改变不了历史的规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

## 关于形势和任务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并且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正是列宁分析过的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在今天的表现。缓和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大乱还将继续下去。这种大乱，对人民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它乱了敌人，分化了敌人，唤醒了人民，锻炼了人民，推动国际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人民，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方向发展。

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鼓舞着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非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坚持二百海里领海和经济区的斗争，都在继续前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和捍卫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资源的斗争，有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发展。第三世界同欧洲、北美、大洋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列宁说：“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核大国争霸。它们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目的就是争霸世界。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宣布欧洲年，召开欧安会，表明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在

欧洲。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西方无战事就好。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超级间谍”林彪垮台了，更难下手。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紧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方向扩张。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这是它们制造的各种假象掩盖不住的。这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民和国家所识破，受到第三世界的强烈抵抗，引起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不满。美苏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今年六月美苏会谈及其以后的形势，更加证明这一点。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美苏两霸的野心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想吞掉中国，咬不动；对欧洲、日本，也咬不动，更不要说广大的第三世界了。美帝国主义从侵朝战争失败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它公开承认自己日益衰落，不得不从越南撤退。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二十年来已经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奴役各民族人民，使政治、经济、民族矛盾日益深化；它对外，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陈兵中国边境，出兵蒙古，支持朗诺卖国集团，镇压波兰工人造反，干涉埃及、专家被赶，肢解巴基斯坦，在许多亚非国家进行颠覆活动。这一系列的事实，深刻地暴露出它新沙皇的丑恶面目，它“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它做的坏事、丑事越多，被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馆去的日子来得越快。

最近，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对中苏关系问题讲了许多废话。说什么中国反对缓和世界局势，中国不想改善中苏关系，等等。这些话，是说给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听的，妄图挑拨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掩盖新沙皇的真面目。更主要地是说给垄断资本家听的，希望仗着反华反共有功，得到更多的赏钱。这是希特勒的老把戏，只是勃列日涅夫表演得更加拙劣罢了。你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为什么不做一两件事情，比如从捷克斯洛伐克或者蒙古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的诚意呢？中国没有侵占别国的领土，难道要中国把长城以北统统让给苏修，才算表示我们赞成缓和世界局势，愿意改善中苏关系吗？中国人民是骗不了、吓不倒的。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中苏边界问题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人



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我们的一贯原则。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的妥协区别开来。列宁说得好，“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同德帝国主义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属于前一种；列宁的叛徒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干的是后一种。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毛主席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二十日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战争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只要日益觉醒的各国人民，认清方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就有可能制止战争。如果帝国主义硬要发动战争，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更大的革命，加速它们的灭亡。

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办好，十分重要。因此，在国际，我们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的一贯政策，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国内，我们要遵循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台湾省是祖国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对台湾同胞寄予无限的关怀。台湾同胞热爱祖国，向往祖国。台湾同胞只有回到祖国的怀抱，才有光

明的前途。台湾一定要解放。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志愿和神圣义务。让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同志们！

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总是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还很繁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务，各条战线都需要继续深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某些不正之风，还有待努力克服。我们全党要抓紧当前的有利时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各项工作做好。

首先，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使广大群众从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中吸取历史经验，进一步认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改造世界观。特别是高级干部，更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力求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了解马克思主义同新老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了解毛主席怎样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希望，经过持久的努力，“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继续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要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抓革命、促生产。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二十多年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依靠群众。工业学大

庆，农业学大寨，就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在这个基础上，加强计划，加强协作，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党组织要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关心群众生活，做好调查研究，切实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各级党委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总结经验，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同时要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群众组织的作用。要加强对基层组织的领导，使那里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贫下中农、其他劳动群众手里，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各级党委要健全民主集中制，提高领导水平。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警惕这种倾向，认真地改变这种作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创造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经验，为我们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这项百年大计经常列入议程。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要经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锻炼，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因此，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能上能下，经得起几上几下的考验。不论新老干部，都要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到党和人民需要的任何岗位上去，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同志们！党的十大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上将有深远的影响。最近，我们还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寄托着很大的希望。我们相信，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全党一定能够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不要辜负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让我们全党团结起来，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一日讯）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同志们！

现在，我受党中央的委托，就我们党的章程的修改问题，作一个扼要的说明。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修改党章的指示，今年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九大党章的修改问题。会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和中央直属单位的党组织，都成立了党章修改小组，广泛征求了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正式向中央报来了四十一份修改稿。在这同时，各地党内外群众还直接寄来了许多修改意见。现在提请大会讨论的修改草案，就是根据毛主席关于修改党章的具体建议，在认真研究了各地修改稿和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的。

在讨论修改党章的过程中，全党同志一致认为，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深入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在国内和国际斗争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这也是各地送来的修改稿的共同特点。

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十次大的路线斗争的胜利，积累了战胜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全党是十分宝贵的。毛主席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我们全党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线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实现。

在这个方面，修改草案增写了哪些内容呢？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整党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对国际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这次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重大意义，并且明确写上了：“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国内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国际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对我们进行侵略和颠覆，也必然会到我们党内来找代理人。一九六六年，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阶级斗争的现实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主席揭示的这个客观规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深入进行思想、政治、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还要进行多次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第二，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最基本的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一定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搞修正主义，专为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效劳，就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帝、修、反采用打进来或拉出去的手法，安在我们党内的代

理人。刘少奇、林彪这类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尽管表现有所不同，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搞修正主义的头子，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这是千真万确的。修改草案根据各地的建议，把“三要三不要”写进了总纲。在党员必须做到的第一条、基层党组织任务的第一条中，还吸收了北京市修改党章座谈会上工农兵同志的意见和有些省、市的建议，增写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我们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长期任务。

第三，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当然，对错误潮流，不仅有个敢不敢的问题，还有个能不能识别的问题。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当一种倾向被另一种倾向掩盖着的时候，许多同志往往不予注意，而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又故意制造假象，更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困难。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认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可知的。“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只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斗争实践，努力改造世界观，就能够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区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正确观点与错误观点。

在开展斗争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有坚定的原则性，而且实行正确的政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团结大多数，遵守党的纪律。

第四，要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里所说的要培养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百万。这样的任务，只有全党重视才能完成。在讨论修改党章过程中，许多老同志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求进一步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许多年轻同志也热烈地表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有丰富的经验，要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干部都表示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草案在总纲部分加了要培养接班人的内容，条文部分加了各级领导机关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我们要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还要注意培养妇女和少数民族干部。

第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扬党的传统作风。无产阶级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必须领导一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修改草案吸收了各单位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议，在条文部分规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组织上应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第二，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们党历来的规矩，必须坚持下去。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用几个方面的“联席会议”来代替党委会的领导，同时也要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方面、各级组织的作用。党委会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搞“群言堂”，不要搞“一言堂”。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各级党委都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修正草案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写进了总纲。毛主席倡导的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熟知的，但也有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发扬的问题；许多新入党的同志，更有一个学习、继承和发扬的问题。毛主席经常拿党在艰苦斗争年代的事例来教育我们，要与广大群

众同甘苦，共命运。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袭击，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决反对特殊化，认真纠正“走后门”之类的一切不正之风。这里，着重讲一下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有权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这个观念，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党是加强了。但是，目前仍有少数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个别的还相当严重。对人民内部问题，采取“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错误做法，是党的纪律绝对不允许的。修改草案在条文部分增加了一句话：“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我们应当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同这类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第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这次修改草案，又写上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永远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当前，特别要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务必做好一切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防止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

毛主席说：“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我们一定要使国家富强起来，也完全能够富强起来。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不称霸”的原则，不做超级大国。全党同志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百年也不要骄傲，二十一世纪以后也不能翘尾巴。同时在国内，也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进一步增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完成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志们！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相信，全党按照十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和通过的新党章去做，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九月一日讯）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章程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 第一章 总纲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了五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来解决。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党要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农联盟，领导全国各民族人民，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备战、备荒、为人民。

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为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为打倒帝国主义、现代

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是在反对右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要善于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以保证党的事业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前进。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 第二章 党员

第一条：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交纳党费，都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第二条：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有党员二人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第三条：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做到：

- （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
- （二）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
- （三）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
- （四）有事同群众商量；
- （五）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四条：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由党的各级组织，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按照具体情况，分别给以警告、严重警告、撤消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党员留党察看最长不超过两年。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党员革命意志衰退，经多次教育仍无转变，可劝其退党。

党员要求退党，由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备案。

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应清除出党，并不准重新入党。

### 第三章 党的组织原则

第五条：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根据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

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定期向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报告工作，经常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接受监督。党员有权向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有不同的意见，允许保留，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主席报告。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第六条：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军队和各部门党的领导机关，是同级的党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和它产生的党的委员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由各级党的委员会召开。地方、军队和各部门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党委员会的人选，都必须经上级组织批准。

党的各级委员会，根据密切联系群众和精简的原则，设立办事机构，或者派出自己的代表机关。

第七条：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工会、贫下中农协会、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红卫兵、红小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可设立党的委员会或党组。

### 第四章 党的中央组织

第八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第九条：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产生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 第五章 党的地方和军队中的组织

第十条：党的地方县以上、人民解放军团以上的代表大会，每三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地方和军队各级党的委员会，产生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

#### 第六章 党的基层组织

第十一条：厂矿企业、人民公社、机关、学校、商店、街道、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根据革命斗争需要和党员多少，设立支部、总支部、基层委员会。党的支部、总支部每年改选一次，基层委员会每两年改选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第十二条：党的基层组织的主要任务是：

（一）领导党员和非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

（二）对党员和非党员经常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领导他们向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三）宣传和落实党的政策，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

（四）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党的生活朝气蓬勃；

（五）发展新党员，执行党的纪律，经常整顿党的组织，吐故纳新，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73年8月30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朝气蓬勃的大会。

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次大会。

大会的议程是：一、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八月二十四日，大会正式开幕。

当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代表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长时间地热烈鼓掌，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亲切地向代表们挥手致意。

大会选举了由一百四十八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

大会一致通过毛主席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同志为主席团副主席，张春桥同志为主席团秘书长。

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还有：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董必武、纪登奎、汪东兴、华国锋、吴德同志。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路线取得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同志为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经过广泛发扬民主，反复酝酿协商代表候选人，征求代表候选人所在地区或单位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最后选出了一千二百四十九名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前，全体代表认真地讨论了大会的全部文件的草稿和草案。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纷纷以实际行动迎接十大的召开。

大会正式开幕这一天，来自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五湖四海的大会代表，通过高悬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巨幅画像的大厅，进入了庄严的会场。他们之中，有的是产业工人党员代表，有的是贫下中农党员代表，有的是来自祖国边疆、警惕地守卫在国防前哨的人民解放军党员代表，还有的是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党员代表。工农兵党员代表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妇女党员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以上。汉族以外各兄弟民族党员代表，也占有一定比例。有待解放的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省在全国各地的党员所选出的代表，是第一次

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带着全国二千八百万党员的委托，各族亿万人民的心愿，同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地进行了工作。八月二十八日，大会经过认真、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报告和王洪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代表们高兴地说，这几个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内外大好形势，充分肯定了在九大路线指引下各条战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总结了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任务，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战斗纲领。

大会经过反复酝酿、讨论，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当宣布选举结果的时候，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热烈鼓掌声和口号声。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他们有的是建党初期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的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炮火考验的各条战线的领导干部，有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三大革命运动和反对帝、修、反斗争中的优秀战士，还有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新入党的青年同志。老、中、青济济一堂，共同学习，相互激励。代表们兴奋地说，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充分说明了我们党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和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坚强团结。

大会愤怒地声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体代表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委员会对林彪反党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和所采取的全部措施。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大会的各项文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大会指出：当前，我们要继续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马

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要继续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斗、批、改，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按照十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和通过的新党章，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大会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这种乱，是好事，不是坏事，它正在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而不利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方向发展。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的一贯政策，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大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各族人民，务必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警惕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警惕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团结胜利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73年8月30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三百一十九人名单

中央委员一百九十五人

毛泽东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盛 丁可则 丁国钰 马宁 马天水 于桑 于会泳 于洪亮 王诤

王震 王必成 王宏坤 王秀珍（女） 王国藩 王洪文 王树声 王首道

王淑珍（女） 王淮湘 王超柱 王稼祥 天宝 巴桑（女） 方毅 邓小平

邓颖超（女） 尤太忠 孔石泉 孔照年 乌兰夫 韦国清 冯铨 司马义·艾买提

白如冰 田华贵 田维新 皮定均 叶剑英 刘伟 刘子厚 刘兴元 刘伯承  
刘均益 刘贤权 刘建勋 刘盛田 刘湘屏（女） 刘锡昌 江青（女）

江礼银 江拥辉 江燮元 朱德 朱穆之 许世友 吕玉兰（女） 安平生  
庄则栋 华国锋 华林森 乔冠华 任思忠 年继荣 纪登奎 邢燕子（女）  
陈云

陈郁 陈康 陈士榘 陈永贵 陈先瑞 陈奇涵 陈锡联 陈慕华（女）

杜平 李达 李强 李震 李大章 李井泉 李水清 李任之 李先念 李志民

李顺达 李素文（女） 李葆华 李富春 李瑞山 李德生 谷牧 杨勇

杨春甫 杨得志 吴涛 吴德 吴大胜 吴桂贤（女） 苏静 苏振华 张才千  
张云逸 张平化 张达志 张池明 张延成 张体学 张宗逊 张恒云 张洪池

张树芝 张春桥 张维民 张富贵 张福恒 张鼎丞 张翼翔 汪东兴 肖劲光

岑国荣 宋佩璋 余秋里 周兴 周宏宝 周丽琴（女） 周纯麟 周建人

周恩来 宝日勒岱（女） 宗希云 林丽韞（女） 罗青长 罗锡康 冼恒汉  
金祖敏 姚文元 饶兴礼 段君毅 祝家耀 胡继宗 赵紫阳 耿飚 耿起昌

钱之光 钱正英（女） 郭玉峰 郭宏杰 郭沫若 徐向前 徐景贤 夏邦银  
唐岐山 唐忠富 倪志福 聂荣臻 莫显耀 秦基伟 陶鲁笱 姬鹏飞 康生

黄华 黄镇 尉凤英（女） 鹿田计 曹里怀 曹轶欧（女） 崔海龙 梁锦棠  
韩英 韩先楚 粟裕 董必武 董明会 傅传作 焦林义 曾绍山 曾思玉

彭绍辉 谢家祥 谢静宜（女） 鲁瑞林 解学恭 蔡畅（女） 蔡啸 蔡协斌  
蔡树海（女） 滕代远 谭启龙 谭震林 廖承志 赛福鼎 潘世告 樊德玲

魏秉奎

候补中央委员一百二十四人

卜谷香 七林旺丹 马明 马小六 马立新 马金花（女） 邓华 王体

王谦 王六生 王光临 王百得 王志强 王美季（女） 王景升 王德山



文香兰（女） 叶飞 央宗（女） 石少华 厉日耐 冯占武 冯品德 申茂功  
卢忠阳 白栋材 江华 江渭清 吕和 吕存姐（女） 任荣 达洛 孙健  
孙玉国 刘西尧 刘光涛 刘春樵 刘振华 向仲华 朱光亚 朱克家  
肉孜·吐尔迪 阮泊生 肖克 吴忠 吴从树 吴玉德 吴向必 吴金全 杨贵  
杨大易 杨坡兰（女） 杨俊生 杨富珍（女） 陈玉宝 陈代富 陈和发 陈  
佳忠  
陈佩珍（女） 李化民 李守林 李定山 李祖根 李跃松 张令彬 张怀连  
张世忠 张江霖 张英才 张林池 张国权 张泗洲 张积慧 宋双来 宋庆  
友  
宋时轮 陆金龙 汪家道 王湘君（女） 余积德 郑三生 林李明 罗春@①  
（女）  
胡炜 胡良才 胡金娣（女） 赵峰 赵兴元 赵辛初 姚连蔚 姚依林 徐驰  
唐亮 唐克碧（女） 唐闻生（女） 铁瑛 贾那布尔 钱学森 高淑兰（女）  
诸惠芬（女） 郭耀卿 康林 康健民 黄文明 黄成连 黄作珍 黄知真  
黄炳秀（女） 黄荣海 隆光前 崔修范 盘美英（女） 彭冲  
彭贵和 鲁大东 蒋宝娣（女） 谢家塘 谢振华 谢望春（女） 廖志高  
裴周玉 黎原 樊孝菊（女） 薛金莲（女）

（新华社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讯）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召开十届一中全会。

鉴于身体情况，毛泽东事先声明他将不出席三十日举行的十届一中全会。

在周恩来主持下，十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

毛泽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是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四名，政治局常委除主席、副主席外，还有朱德、董必武、张春桥三人。

这个选举结果，和会前酝酿、协商的情况是一致的，符合毛泽东对党中央人事安排的考虑。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于八月三十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生 叶剑英 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女） 朱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生 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生 董必武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1973年8月31日

一九七三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十大文件的通知

1973.09.07；中发 [1973]36 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伟大领袖毛主席主持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朝气蓬勃的大会。这次大会通过的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报告、王洪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内外大好形势，总结了党内十次重大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新鲜经验，充分肯定了九大路线的正确，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任务，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战斗纲领。各级党委要响应大会的号召，组织党内外群众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大会的三个文件和两个公报。并可结合学习十大文件，选学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学习的步骤和方法，尽可能由参加党的十大的代表，同省、地、县委负责同志一起集中学习

几天，作些准备，然后由十大代表和各方面的领导干部直接同群众见面，结合实际情况分地区、分单位进行传达。

在学习十大文件的同时，各级党委应按照中发[1972]3号文件的规定，立即向党内外群众广泛传达中共中央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的决议和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发[1973]34号）。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发动群众对林彪反党集团继续展开革命大批判。中央专案组的报告上所列的附件（中发[1971]77号、中发[1972]4号、中发[1972]24号中发[1972]25号），前已印发，不再补印。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三年九月七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三年九月八日发出

共印四五、三九四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2009年12月14日初稿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九册（7）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九章 召开十大

#### 第七节 批评外交工作

#####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时的谈话（节录）（未经本人审阅）

毛：以前的仇人，现在我们的关系说是叫做什么 FRIENDSHIP（友谊）。

基：我们方面的感情是这样。我告诉过总理，我们同别的国家从未象同你们这样开诚布公和诚实地谈话。

毛：不要讲假话，不要搞鬼。你的文件我们是不偷的。你故意放到那里试试看嘛。我们也不搞窃听器那一套，搞那些小动作没用，有些大动作也没用。我跟你们的一个记者 EDGAR SNOW（埃德迦·斯诺）谈过，我说你们的中央情报局大事也不行，不管用。

毛：你的事情干得好，到处飞。你是燕子，还是鸽子？越南问题可以算是基本解决了。

基：我们感觉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一个走向平静的过渡时期。

毛：对。

基：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

毛：我们也需要嘛。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讲的（手指基的座位），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把两只手握在一起）HAND—IN—HAND（手携手）。

基：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毛：这就好。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实际上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你们也要批我们一回。你们总统说是叫“思想力量”的“影响”。就是说，“共产党去你的吧！共产主

义去你的吧！”我们就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有时我们也要讲点呢，不讲不行呢。

基：我认为我们双方应该忠于各自的基本原则，实际上如果双方讲同样一个调子，只会使局势混乱。我对总理说过，在欧洲，你们出于自己的原则，可以讲得比我们更坚定。

毛：我们希望你们跟欧洲、跟日本合作。有些事情吵吵闹闹可以，但是根本上要合作啊。

基：主席先生，从我们这方面说，你们和我们之间虽然有时要进行批评，但我们仍要同你们协调行动。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参与企图孤立你们的行动。至于日本和欧洲，我们同意在一切实质问题上要同他们合作，但目前欧洲的领导很弱。

毛：他们不团结。

基：不团结，而且不象你们那样有远见。当他们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们总想不费力气就使危险消失。

周恩来（对毛）：帮助蓬皮杜，他（指基）同意。

基：我们正在尽量这样做，回去后我们要争取做得更多。

毛：现在蓬皮杜受到威胁，就是那个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起来顶他。

基：两家联合。

毛：两家联合，苏联想要共产党登台。那个共产党我不喜欢，就象你们的共产党我也不喜欢一样。我喜欢你们，不喜欢你们的共产党。（基笑）

你们西方历来有条政策，两次世界大战开始都是推动德国打俄国。

基：但是，推动俄国打中国不是我们的政策。因为如果在中国爆发战争，对我们来说，其危险性和在欧洲爆发战争一样。

毛：我正是想讲这句话：是不是你们现在是推动西德跟俄国讲和，然后又推俄国向东进。我怀疑整个西方有这么一条路线。向东，主要向我们，而且向日本，也有一部分向你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

基：我们并不赞成德国的政策。我们宁愿德国的反对党上台，德国的反对党不奉行这个政策。

毛：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

基：我曾告诉过总理，你们的行动方式要比我们直截了当和英勇一些。我们有时要采用复杂的方法，这是由于国内的形势所造成的。

毛：英文什么叫做行动方式啊？

译员：MODE OF ACTION（行动方式）。

基：不管公众舆论如何，我们对基本目标会有决断的。如果称霸的意图活跃起来，那末真正的危险会发展。不管哪里有这种意图，我们肯定都将予以抗衡。总统曾对主席说过，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对别的任何人表示善意。

毛：你说的这个是老实话。

基：这是我们的立场。

毛：中国人排外得很。你们可以容纳很多民族。我们中国没有几个外国人。你们不同的民族有多少，你们美国有六十万中国人，而我们恐怕连六十个美国人也没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道理，你们研究一下吧。从来就不喜欢外国人。包括日本人也很少。印度人一个都没有。

基：这是因为历史上你们同外国人打交道不幸运。

毛：有这么点理由。恐怕过去一百年，主要是八国联军，后来日本人占领中国十三年，占领大部分领土。他们过去占领中国领土不算，占领了北京还要赔偿。

基：还有治外法权。

毛：治外法权，多哩！现在我们对日本，不要它赔偿。没法算，谁也算不清。赔不起。

周恩来：一赔就要增加人民负担。

（注：此件节自外交部绝密文件（[73] 办文特 1 号。）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七日，基辛格访华，毛泽东会见了她，双方就世界局势以及中美、中苏关系等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我们两家出于需要，所以就这样（他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引者注）Hand in Hand。”

基辛格说：“我们双方都面临同样的危险，我们可能有时不得不运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相同。”

毛泽东说：“这就好。”

他又说：“如果有什么俄国人打中国，我今天对你讲，我们的打法是打游击，打持久战。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让他去。”

基辛格说：“如果进攻中国，出于我们自己的原因，我们也肯定会反对他们的。”

（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一九七三年六月五日，毛泽东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范文同

毛泽东说：“我们外交部发过通报，说是美国的战略中心是在亚洲、太平洋。后来我得到这个消息，我说不一定。它在欧洲、中东、还有美国本土，问题不少。它总要抽一部分兵力走，不能老在亚洲、太平洋。它管的地方太多，要收缩一点。而且在你们那里，吃了亏了。”

（毛泽东会见越南黎笋、范文同时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纪要

你们两位是负责搞报告和党章的，今天找你们来谈几件事。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大概你们也知道吧？

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驻法、驻瑞士、乃至驻叙利亚，其他还有许多，都比外交部的意见高明。外交部有一个什么《新情况》，先说大事不好，一说欺骗性更大，又说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大概是铀——235，浓缩铀吧。大家都说好，都说此文写得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的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比如说，中央总是说国内外形势大好。一个大好，也不是中好，也不是小好，更不是不好。而外交部说大事不好，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样浓下去，浓到明年，欺骗性变为更大，要升级了。这个欺骗性的问题闹了一年多了。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对于越南问题，美国战略重点东移，我就提出重点西移。欧洲年嘛！人家自己讲的嘛！人家自己要撤兵，有一个国家死也不让撤，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

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咱们就是那号人物了。我是讲我，我这几年名声不好。世界上唯一的马克思、一盏明灯是在欧洲。那个地方放一个屁也是香的！奉为圣旨啊！我就不理！你奈何得了我吗？鄙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明灯”是用我的名义写的。我就没有看。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究竟重点东移，还是西移，你们讨论一下。我看多少西移一点吧。人家要走路，死也要拖住。“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我们跟蒋介石妥协了两次。贵国的总统要来，请。坐在这里吹了一个钟头。

又是外交部一个什么屁司（亚洲司），说是田中不能上台，上台也不能改善中日关系。（插话：二部认为田中上不了台，外交部认为田中要上台，但中日关系不会很快改变。）以五十步笑百步。弃甲曳兵而走，逃到五十步的笑一百步的。这是以数量而论。如果拿性质论，都是逃兵。你去翻那个《孟子》。

所以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现在又说孔子是奴隶主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是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他乱得很。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就是李白讲秦始皇，开头一大段也是讲他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一大篇。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走到白帝城，普赦令来了。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其实他（指李白）尽想做官，《梁父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齐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

又说是美国不行了，腰杆子硬不起来了。她们两个从联合国回来都说美国的肉、蔬菜都不好吃呢。尼克松本人也承认中间有夹肉面包，有三块肉咬不动，中国、欧洲、日本。这还不讲其他，第三世界。



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总而言之，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

历来我们党，一股风一来，就是……。比如王明路线吧，各根据地、各白区，主要领导权都拿走。不到四整年，呜呼哀哉！自称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中央苏区的领导，就是指鄙人，丝毫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一股风一来，随风转。多啊，不是个别人。硬着头皮顶的是少数。幸得滕代远还没有死。他可以证明那个立三路线怎么个斗争法，剩下鄙人一票。就是怕孤立，为什么随尽转呢？日本人最好挡住在石家庄、太原以北。可是日本人不听话。你怎么办？一直打到广西、贵州。我的意思是最好打到重庆、西安去，他也不听我的呢。我这个思想，跟列宁接近，叫作半败北论。公开拥护蒋介石抗日，反对顽固派，实际希望最好把蒋委员长也打死。现在此人还没有落气，但是不能见人了。

我见了一个驻西德记者，叫王殊。被新华社整得要死啊！见了我就哭。这个外交是委托他去办才办成功的。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是我。关于革命不能有妥协这个学说，不是马克思主义。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嘛就被杀死，要嘛就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伙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

你们搞的托洛斯基文件，我还没有看完，看了一部分。他就是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列宁就是主张割地赔款，签和约。这个和约是闭着眼睛签字的。第一写上割地、第二是赔款。德国帝国主义跑了，对付西方，他也不能两面作战。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地也没有割，款也没有赔，条约一张废纸，就象尼克松讲的。我是半败北论。列宁是主张完全败北，主张政府军完全被打败。那时俄国和日本的军队在旅顺、大连、辽阳一带打仗。越彻底越好，革命就会起来了，俄皇的威信就会完蛋了。我们打日本，不能学他的全部，实际上要用他的。蒋介石王八蛋，你干什么？！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几百万军队都是反革命的军队，跟我们打了十年，又有三次反共高潮。我是希望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地方越占得多越好。第二次王明路线的潮流就不同了，结果还是照我同一些要革命、有马克思主义的同志的意见。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论持久战》，批那个速胜论。名为批党外的，实际上批党内的。又批亡国论。

这类例子多得很，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威廉几世，（插话：二世）姑且说是威廉 X 吧，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东西进攻，结果皇帝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杀掉了，死掉了，跑掉了，我没有查清楚。军队全部覆没。

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位希特勒更凶。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杀出一个十月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杀出一个中国革命。其办法很简单。你杀得人，我就不能杀人？鲁迅在《阿 Q 正传》上写的，“和尚动得，我动不得？”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插话：有些人盼十大，开过十大，开人大，人大一开就要解决工资问题。）各有各的心事。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一个共性，至于个人想的，伤心之处不同，那是个性。我劝人们去看柳嫂子同秦显家的争夺厨房那几回。

（外交部 [73] 办文特 17 号）

（注：文中省略号是原有的。此件是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上写有：“记录：王海容、唐闻生”）

一九七三年七月五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批示  
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 356 页）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基辛格。  
会谈时，基辛格说：“对于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危险是谁，我们并无怀疑。”“我们同苏联的交道中，没有什么你们不知道的东西。你们可以指望将来也会如此。”  
毛泽东说：“你们跟我们观点差不多一样，就是苏联要打中国，有这个可能。”  
基辛格说：“我原来认为，这在理论是可能的。现在我认为，有更大的现实可能性。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正如我多次讲过，上次也向主席先生讲过的，我们认为，如果出现这种

事情，将会对我们大家都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决心加以反对。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泽东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

基辛格说：“可能是这样。”

接着，毛泽东又谈到台湾问题。他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我们两国就可能解决外交关系问题，就是说，像日本那样。”

基辛格说：“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这同我们国内形势有部分关系。”“或者我们还是等待一下，因为从技术角度来看，联络处的工作是管用的。”

毛泽东说：“可以嘛，就是这样下去也可以嘛。你们现在还需要台湾。”

基辛格说：“不是需要的问题，是现实可能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哎，一样。”

（毛泽东同基辛格谈话记录，1947年11月12日。）

## 二、研究资料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

批周会议

作者不详

文革到了末期，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一直让人捉摸不透，总的而言，可以用“既离不开又总不满意”来形容。到了1973年底，因为周恩来与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关于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的谈判让毛泽东感到不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要求周恩来批判自己，导致一向沉稳的周恩来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当众拍桌子，差点引来大祸。

## 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判

正当周恩来紧张筹备四届人大的召开时，1973年11月10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来中国访问。这是基辛格一年之内的第二次访华。其目的是打算在上次访华的基础上，再就中美双方的战略意图、军事合作技术合作等具体问题同中方达成一致意见。

毛泽东在同基辛格的会谈中，要求美国“跟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实现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但基辛格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暧昧，强调有困难，还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毛泽东对此多少有点不满。

接下来，周恩来同叶剑英一起，与基辛格就中美共同关心的双边问题举行多次会谈。关于战争问题，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对基辛格说：我们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好了。

基辛格还提出在中美之间建立热线联系问题。他说：以美国的卫星系统向中国提供早期预警，以便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中国的防空、防御系统（轰炸机、导弹等），或者在中美之间签订一个有关意外的核战争的协议（美国已草拟了文本）。对于基辛格提出的建议，周恩来表示：“有些东西可能对我们会有所帮助。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到了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中美双方同意的基辛格访华公报。这份公报的草稿，事先已经毛泽东及在北京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圈阅。

## 周恩来挨批大发雷霆

就是基辛格提出的关于中美之间建立热线的问题，毛泽东听取了中共中央官员的汇报后，认为周恩来态度软弱了，说了错话，犯了错误。从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也就是说，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批判自己。

会前，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讲话，为会议定了调子：“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他还说：“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合称“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于是，与会人员按照这个调子火力齐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会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一会又逼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

周恩来开始时并没有预料到火力如此猛烈，还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期待检讨完事。为了保险，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然而，会议不但没有降温，上纲反而越来越高，江青的指责不断升级，什么“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根本不由周恩来分辩。在忍无可忍之际，周恩来当场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毛泽东对周恩来上纲上线

周恩来的这一怒惹了大祸。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从11月25日起，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全部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飚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会议主持人也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扩大会议一开始，就由唐闻生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上纲非常之高，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入”，等于文革前的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

这些用语相当多的是毛当年打倒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林彪集团时所用过的。毛泽东还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等等。如此火药味十足的指示足足传达了八个小时，刚参加会议的许多人都非常震惊，有不寒而栗之感。

在当时的政治高压下，人人都必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划清界限，人人要表示态度，人人要过关。于是，会场上出现了对周恩来围攻批斗的场面。什么“卖国”、

“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一时间拳脚棍棒齐下，墙倒众人推。江青更是高声叫骂，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弄得举座哗然。

这次扩大会议的形式也很特别，会议开始就成立了一个对周恩来的“帮助小组”，由“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以及毛泽东的亲信汪东兴、华国锋等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批判周恩来。

要是以往政治局开会，周恩来都是提前到场，但这次他只能在家等待会议通知。散会时，周就要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而帮助小组一千人又要继续开会，商量如何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的处境是极为险恶的，会议气氛已完全呈现出了要将他彻底打倒的趋势。因此，周恩来内心的沉重和苦闷是外人很难体会到的。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后来回忆说：“当时被批准进入现场的服务人员、个别首长的随员对会议表现出极度不满。”“这哪是什么帮助总理啊？他们明明是整总理嘛！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

张佐良在形容当时的周恩来的情况时说：“我见他整日紧绷着脸，沉默少语，郁郁寡欢地思考问题。在那些日子里，他很少到户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身边人员常提醒他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活动身子，他均未予理睬。一向很注意修饰的周恩来，这期间，不理发，也不刮胡子。往日，周恩来起床后必定要正规地穿上中山装，不单要扣好每一个扣子，连领口也扣紧。即使不外出，在家里办公也如此。可是，他在这段日子里，成天穿着那种淡蓝色条子的睡袍坐在办公室里，这种不修边幅的样子是我来到西花厅后没有见过的。他不再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步履矫健，而是失去了往日周恩来特有的风范。”

毛泽东“恩威并施”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江青还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但毛泽东很快就发觉了江青等人在政治局会议上搞得太过。

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毛泽东一方面肯定这次政治局会议开得很好，但同时又批评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

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于江青提出的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同一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接见尼泊尔国王和王后艾什瓦尔亚。毛泽东像是有意趁此机会表示对周恩来的信任和支持。根据会谈记录，毛泽东同周恩来“长时间热烈握手”，并指着在座的曾向他汇报周恩来同基辛格会谈情况的几个人说：“总理啊，现在的小将不好惹呢。把他们提起来，整了你自己，也整了我。”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批评，制止了江青借机打倒周恩来的企图，政治局会议对周恩来的批评戛然而止。

批周会议

作者不详

1973年11月，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件大事：从11月17日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连串的会议，政治局委员全部出席，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这次会议的气氛极为紧张，可以用如临大敌来形容。令人奇怪的是，这次会议的议题竟是：批判周恩来。也就是说，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批判自己。

会前，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讲话，为会议定了调子：“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是错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小土围子，不打它就不投降。”

“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也可以来，在后面排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提出，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会谈时的“右倾软弱”，合称“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于是，与会人员按照这个调子火力齐下。江青更是咄咄逼人，一会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主义，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好好执行毛泽东的联美整苏方针；一会又逼问周恩来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指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

会议之始，周恩来并没有预料到火力如此猛烈，还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期待检讨完事。为了保险，周恩来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犯了“修正主义”的错误，并完全接受对他的批评。然而，会议不但没有降温，上纲反而越来越高，江青的指责不断升级，什么“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等等，根本不由周恩来分辩。在忍无可忍可际，周恩来当场拍了桌子：“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这下惹了大祸。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从 11 月 25 日起，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外，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全部参加，再加上中联部长耿飏和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了人民大会堂。会议主持人也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指定王海容、唐闻生两位小姐为联络员，随时向他报告会议情况。

扩大会议一开始，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在最近一个时期对周恩来及外交工作的批评，上纲非常之高，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入”，等于文革前的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毛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这些用语相当多的是毛当年打倒刘少奇、林彪集团时所用过的。更有甚者，毛泽东还说“有人对苏联怕得不得了，一旦打进来，他就要当儿皇帝呢！”等等。如此火药味十足的指示足足传达了八个小时，刚参加会议的许多人都非常震惊，有不寒而栗之感。

然而，在政治高压下，人人都必须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划清界限，人人要表示态度，人人要过关。于是，会场上出现了对周恩来围攻批斗的场面。什么“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一时间拳脚棍棒齐下，墙倒众人推。江青更是高声叫骂，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危言耸听地说周恩来“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主席”，弄得举座哗然。

这次扩大会议的形式也很特别，会议开始就成立了一个对周恩来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帮助小组连同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如何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批判周恩来。以往政治局开会时周恩来都是提前到场，这次周只能在家等



待会议通知。散会时，周就要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而帮助小组一千人又要继续开会，商量如何向毛泽东汇报。

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的处境是极为险恶的，会议气氛已完全呈现出了要将他彻底打倒的趋势。因此，周恩来内心的沉重和苦闷是前所未有的。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后来回忆了当时的情况：“。。。。。。我见他整日紧绷着脸，沉默少语，郁郁寡欢地思考问题。在那些日子里，他很少到户外散步，乒乓球也不打了。身边人员常提醒他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活动身子，他均未予理睬。一向很注意修饰的周恩来，这期间，不理发，也不刮胡子。往日，周恩来起床后必定要正规地穿上中山装，不单要扣好每一个扣子，连领口也扣紧。即使不外出，在家里办公也如此。可是，他在这段日子里，成天穿着那种淡蓝色条子的睡袍坐在办公室里，这种不修边幅的样子是我来到西花厅后没有见过的。他不再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步履矫健，而是失去了往日周恩来特有的风范。。。。。。”

这场大批判的起因到底是为什么呢？说起来并不复杂。1973年11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第六次访华，周恩来和叶剑英受命出面接待。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11月4日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然而，在11月3日的告别晚宴结束时，基辛格突然提议，希望再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按照以往的惯例，周恩来都会先向毛泽东作请示。可偏巧这次周被告知“主席正在睡觉”。因时间紧急，在思来想去后，周恩来拍板答复基辛格：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应该说，周恩来的话说得很活，并没有做出什么具体的承诺。然而，这件事随后就经外交部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反映到了毛泽东那里。于是，一场扑天盖地的风暴呼啸而来。

毛泽东为什么对这件事看得如此严重？周恩来的错误又到底在哪里呢？一切说来话长。

林彪事件之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实质上已经破产，毛泽东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受到了重创，不得不退居幕后。周恩来基本主持了国家日常事务。他利用批林整风之机，在全国发起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并积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各行各业进行了政策调整，同时解放了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然而，毛泽东可以容忍周恩来对现行政策做一些有限度的调整，也可以为收拢人心而解放一批

人，但毛泽东不能容忍对文革本身的质疑和改弦更张。在观察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确信周恩来就是要系统地纠正文革，最后将毛本人架空。于是，毛开始反击。

1972年12月，毛泽东借批王若水来信之机，发出了批极右的指示，并借助他的权威一举扭转了形势。1973年元旦，中央“两报一刊”发出社论，强调批林整风的重点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此后，批左成了政治上的禁区，而反右则成了宣传的主流。

与此同时，毛又授命成立了中央宣传小组，组长是康生，组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主管中共的宣传、组织、政法大权。这等于是将九大后解散的中央文革小组又立了起来，成为了另一个“政治局”。周恩来的一大部分权力被分走，实际上成为了一个会议召集人。毛又看中了上海的王洪文，调到北京，委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之职，当作接班人培养。毛还任命张春桥为中央常委、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从而限制了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属于周恩来阵营的叶剑英的权力。

1972年对于周恩来是很重要的一年。他不仅在这一年进行了批极左的文革抗争，成功主持了中美接触，还在这一年查出了身患癌症。

中美接触是周恩来晚年的一件大事，周恩来为此殚精竭虑，费尽了心血。而中美的成功和解也使周恩来成为西方各国交口称赞的人物，中国外交也被说成了“周恩来外交”。然而，在此期间毛泽东对他并不满意，归根结底在于认为周恩来始终不是真心拥护文革，而是存有异心。加上毛泽东晚年对于功高震主者极为敏感，无论是刘少奇还是林彪都在这上面摔了跤，如今轮到了周恩来。

1973年6月，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限制进攻性武器等协定，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面见周恩来，向中国通报了有关情况。外交部据此起草了周恩来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报请毛泽东审阅时，毛认为周恩来在会谈时口气太软，是右倾表现，批示道：“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这是毛对周的第一次敲打。

不久，外交部在内部刊物《新情况》上登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但趋势是联合起来企图主宰世界。应该说，这种分析只是一种内部参考，也不违反外交纪律。然而毛泽东得知后大为光火。他认为该文观点与他常说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不合，根本不提他的“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论断，因此是在和他唱对台戏。而外交部的后台

就是周恩来，这事绝脱不了干系。毛当即召王海容、唐闻生来，严厉批评了《新情况》的这篇文章，指责为“放屁一通”。随即，又召见张春桥和王洪文谈话，再次严厉批评了周恩来主抓的外交工作：“都说此文不错（《新情况》的文章），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欺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

“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

“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这是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第二次敲打，如此露骨的讽刺和挖苦，充分显示出了毛泽东的极度不满和不耐烦。

这次对于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的自行其是，毛更是怒火中烧，认为周已发展到了公然不听招呼，遂决定新账老账一块算，狠狠地打掉他的威风。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开到 12 月 5 号，会议火力空前猛烈，周恩来被烧得焦头烂额。连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也不得不讲了话。邓的发言较为委婉，指出周的问题的严重性，但却不是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最后忠告周：“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已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会上会下，以往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的打招呼，而这时人们都尽力回避他，即使迎面相遇也表现冷淡，以示划清界限。会议后期，周恩来的膀胱癌已很严重，常常在厕所里半天不出来。会议只好暂时休会等待。江青和张春桥不但不予以谅解，反而斥责周是故意耽误时间，对抗会议批判。

按照会上的调子，周恩来已必然要被打倒，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毛泽东此举只是为了重挫一下周恩来，并不是真的想打倒他。那样的话政治上的代价未免太大，刚刚安定下来的局面恐怕又要反复。于是，毛又发出指示，提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给会议降了温。他又针对江青的讲话，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

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毛一石二鸟，既给周定了性，又敲打了江青：不要自行其是铲除异己，只能在毛划定的圈子内行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议最后责成周恩来做检讨。周恩来起初想求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被毛一口回绝：要检讨就在会上做。江青更是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要周必须自己动手写检讨，其他任何人不能插手。周恩来只好自己关起门来写检讨，对照着毛泽东定的调子和会上的批判发言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此时周老病交加，眼睛也花了，写字手发抖，记不全会上对他的批判发言。他想请唐闻生和王海容帮助一下，却遭到了训斥，说他想企图通过她们摸毛泽东的底。最后，周恩来照单全收，承认了会议强加的所有罪名，总算完成了检讨。毛泽东阅后，觉得差不多了，便批示道：“可以了。”一场滔天风波总算过去了。事后，毛泽东下令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了这次会议的内容，彻底批判了周恩来所谓的“错误外交路线。”12月9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故意用说反话的方式，将这一情况透露给外界。毛谈笑风声地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

12月9日，毛泽东在讨论关于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旁敲侧击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要打就打嘛，天下大乱，包括中国嘛！我能吃饭，也能睡觉，所以要打，我最欢迎了。”“一打下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对周恩来的耿耿于怀，由此可见。

周恩来虽然最终逃过了这场劫难，但却极为严重的损害了他的精神和肉体。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周恩来的癌症病情加重，身体迅速垮了下来。

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

第八章 中美和解与“周恩来外交”风波（摘录）

功高盖主

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好评如潮，把中国外交说成走“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由此萌生了要整治周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周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周由此大祸临头。

尽管周恩来行事如此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处处把自己隐匿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中，但到头来还是犯了中国政治上的大忌，因声名震主而在劫难逃。在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在外交上打了大胜仗，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稳住了文革败局的阵脚，在政治上帮了毛的大忙。然而，为此出了大力的周氏非但没有受到奖励，反而因为在海内外声誉鹊起而招致毛的猜忌，大祸临头。

可以说，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由来已久，想整周的念头也不是一朝一夕了，但事到临头都被周氏一一化解。这与其说是由于周为人处世圆滑，善于自保，逢凶化吉，不如说他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对毛构成过真正的威胁的缘故。本书在前面对此已经有所叙述。

长期以来，周恩来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一直是第三号人物，这使得他能够在中共建国后频繁的党内斗争中相对超脱，避开了与毛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然而，林彪事件后，周却被历史推上了党内的第二把交椅，虽然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也绝没有任何越位非分之想，不过这让嗜权如命的毛放心不下，必欲整治而后才能心安。

毛泽东本来就生性猜忌，林彪事件对他心理上的重创，使得毛更是变本加厉，疑心大起。他看到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在内政外交上连连得分，在政治上越来越得人心，而他本人却受林彪事件所累，威望大为跌落，心里很不是滋味。

尽管毛泽东很清楚周恩来在政治上并无二心，但早已习惯于唯我独尊的毛决不允许任何人的威望超过他本人，哪怕是有这种可能也不行。尼克松访华时，毛非常注意西方舆论界对这件事的反应，不断让王海容、唐闻生等人收集翻译西方主要报刊有关这方面的评论。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有些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让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很狠

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益发强烈起来。

更让毛泽东感到事不宜迟的是，中共十大召开在即，在政治上面临着重新选择接班人的问题。党内外多对毛抬出王洪文这样的“儿童团”来作接班人感到接受不了。相反，主张由周恩来顺理成章接班的呼声却很高。这成了毛的一大块心病。他好不容易才把自己在病重期间向周交权的事抹掉，又怎么可能再把权交给他呢？

为此，毛泽东决定选择在十大召开之前，以“敲山震虎”的方式，狠狠敲打周恩来一下，拿他掌管的外交部开刀。这样，既可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风，又可借机在政治上给他脸上抹黑，为抬出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作为接班人铺平道路。

一九七二年六月，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等协定。这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件大事。为此，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求见周恩来，面交尼克松致周氏的信件，并通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外交部为此起草了周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经周恩来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

一直想找题目做文章的毛泽东阅后，将周恩来所修改之处统统勾去，认为口气太软，腰杆不硬，并传话给外交部，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这在中共党内斗争术语中意味着犯了右的错误。在文革那种凡事左三分的年代，这是分量很重的批评。

周恩来见状，知道这是毛泽东在有意敲打他。为了不使事情闹大，他遂立即采取顺守之道，表示接受毛的批评，改正错误。随后，他在与布鲁斯的谈话中，按照毛的口径，“采取了蔑视和批评的态度”，抨击了美苏在全球争霸，企图主宰世界的想法。不仅如此，他还在事后向毛补报了检讨，并送上他与布鲁斯的谈话手稿笔录，说“真口仍有错误，请即指正”，尽量以低首下心的姿态，化解毛来者不善的批评。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恰好就在这时，外交师主管对美关系的美大司就美国和苏联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后的世界形势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刊登在外交部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上。文章在分析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的关系时，更多地强调了美、苏两国正在企图勾结起来主宰世界的一面。

其实，这并不代表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观点，更准确地说，美、苏之间同床异梦，钩心斗角，在争夺世界霸权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周氏看后认为其中有些分析写得不错，值得一看，便向外交部打了招呼，要他们参考这篇文章，重新修改一下关于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内诸口通报。

当时担任“主席联络员”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获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正在处心积虑敲打周恩来的毛这下抓到了继续往下做文章的题目，而且火气很大。平心而论，毛在实施“联美整苏”策略时，并不真正相信美国方面对中美和解的诚意，一直怀疑美国借此打“中国牌”，“踏在中国的肩膀上向苏联跳”。这次美、苏签订核协议，彼此之间打得火热，令毛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更令毛泽东大为光火的是，这次外交部搞出来的“屁文件”居然跟著西方的舆论跑，渲染什么“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根本不提他关于“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论断。在毛看来，外交部的这种做法，完全是周恩来在暗中与他唱对台戏，企图在外交上搞自己的一套。毛本来就因西方新闻界大加渲染的“周恩来外交”一直耿耿于怀，这样一来，更是火上浇油，非要大大发作一番不可。

于是，毛泽东决心施以重手，彻底打掉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威风。他在接获王海容、唐闻生报告的第二天，严厉地批评了《新情况》简报和外交部的通报，甚至使用了“放屁一通！”之类的粗话，以表达他的强烈不满。毛在大发一通火之后，仍觉得意犹未尽。七月四日，他又亲自召见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张齐悟和准备作为接班人培养的王洪文，在谈话中继续发挥，又把外交部狠批了一顿，虽然没有直接点名批周，但矛头所指已经呼之欲出。这里，不妨照录几段：

“都说此文不错(指《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作者注)。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指外交部——作者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了他们的贼船。凡是这类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冲动，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毛泽东这篇谈话，表面上虽是即兴漫谈，海阔天空，通篇重点却是冲着周恩来的。不过故意藏头露尾，指桑骂槐，要害的地方用语很重，露出杀气，已经大大超出了对一般工作中错误的批评，像“贼船”、“搞修正主义”的提法，都足以在政治上致人于死地。

其中有关“贼船”那段话，毛原话是这样说的：不要上乔老爷（指乔冠华——作者注）、姬老爷（指姬鹏飞——作者注）的贼船。谈话记录后经毛的修改，删去了“乔老爷、姬老爷”的字样，改为现在这样。关于这一点，王海容、唐闻生后来在十一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时，特别向与会者作了说明，解释了“上贼船”这句话的来龙去脉，说主席当时用“乔老爷、姬老爷”的说法，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乔、姬两人当时连中央委员都不是，根本没有资格当贼船的老板，能够当得上贼船老板的只有林彪那号人物。

毛泽东在放出“上贼船”这番话来时候，周恩来本人正在玉泉山接受治疗。一九七二年发现周患有膀胱癌后，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病情发展得很快。一九七三年二月初开始出现了肉眼血尿，整个事情已经无法再瞒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得不对周本人讲出实情，并批准医疗组的治疗方案。为此，周在三月十日住进玉泉山，接受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

尽管汪东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命令医疗组只准做检查，不准电烧，但是医疗组的专家们在这次检查中还是悄悄地给周恩来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之后，根据专家们的意见，定期对周进行膀胱镜检查、电灼术和灌药治疗。

这次，毛泽东在“七四谈话”中对周恩来的敲打，周因当时正在玉泉山接受检查治疗而一无所知。不过他已经从在此之前毛泽东对外交部《新情况》简报“放屁一通”的批评中预感到某种不祥之兆。在这种小题大做的背后，一场政治风暴正在冲着他而来。于是，他立即采取主动，抢先作自我检查，以求能够多少缓和一下气势汹汹的事态。

七月三日，周恩来在准备到玉泉山接受治疗之前，写信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和美大组各同志，根据毛泽东对《新情况》第一五三期简报所作的批评，承认他自己“在对美关系上没有能认真研究”，“更没有找你们务虚，讲些实质问题”，



表示他应对此事负主要责任，并建议外交部“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小极性”。

在周恩来的带动下，外交部长姬鹏飞也以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承认外交部对整个国际形势的看这是“右的”，表示：“我们在工作中没有很好领会和认真执行王南的指示，没有做好总理的助手，干扰了主席和总理，使我们深感沉痛(重)和不安。对于这一严重的错误，我们负完全的责任。”

七月四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七四谈话”的内容。毛措辞严厉的批评，让不知内情的政治局委员们十分紧张，不知道出厂什么事。周恩来当时刚刚做完治疗，见毛对自己主管的外交工作进行这样严厉的批评，不敢有丝毫耽搁，连夜给毛写检讨，并把他此前写给外交部的信和外交部的检讨报告找出来一并报送给毛。周在信中检讨说：

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我在七月二日晚得到海容同志通知后，就于三日晨写了一封检讨信给外交部同志。现因不及再写，特将给外交部同志信要回附上，作为初步认识。待主席阅后，拟再向政治局报告。

为了化解毛泽东来势汹汹的批评，周恩来随后又放下手头上其它工作，全力应付这件事，设法消解毛的火气。周恩来这种主动请罪的姿态，弄得原本还想进一步大做文章的毛泽东一时不好再搞下去了，只好暂时住手，表示：“检讨不要写了”。不过，毛还是存心给周审牵地抹了一笔。他对周的信作了批示，说：“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应研究改正办法。”并下令在政治局会议上传阅。

接下来，毛泽东似乎还嫌这样做得不够，又授意负责起草中共十大政治报告的张春桥把他在“七四谈话”中批周的点睛之笔——“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出修正”的意思，写入十大报告之中。通过此举，毛泽东不仅给周恩来的脸上刻上了“右倾顽症”的标记，并且在十大政治报告中立此存照，为其后继续做文章留下了伏笔。

果然，批周这场戏并没有结束，更确切地说，才刚刚拉开序幕。四个月后，在毛泽东的一手策划下，已经在劫难逃的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严厉的批判斗争，经历了其晚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场劫难。

顺便一提的是，有关这次会议的原始记录，已经全部销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周恩来临终前，曾向邓颖超谈了对身后最不放心的两件事，一件是伍豪启事，另一件就是七三年批他的政治局扩人会议，讲了这次会议给他加的种种罪名，要她留心。文革结束后，邓颖超和叶剑英联名向中央写信，要求给这件事平反，经由华国峰批准，胡耀邦出面查找到后全部销毁。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作者是根据对有关当事人的采访，参考一些当事人事后的回忆或揭发材料以及相关档案综合而成的。

### 政治局批周会议

事情的起因还是出在中美关系上。毛泽东抓住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中的“纰漏”，亲自出马，为蓄意已久的批周敲响了开台锣鼓，指周对苏联怕得不得了，擅自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如果苏联人打进来了，他要当儿皇帝！随后下令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周的“右倾投降主义”。周由此经历了晚年最大的一场劫难。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中旬，基辛格第六次访华，而且是首次以美国国务卿的身份前来的。按照以往的惯例，周恩来总是先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由毛定下调子，然后再同美方举行正式会谈。这一次多少有些不同。十一月十一日，周先与基辛格举行了第一轮会谈。由于不久前刚刚挨过毛的敲打，周在会谈中表现得十分谨慎，主要是听取美方通报情况，自己不轻易开口表态，只是在基辛格恭维他时，周才打断了基辛格的话，表示：“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的不够。”

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了基辛格，谈话的主题是“联美整苏”。作为精明而有眼光的政治观察家，基辛格已经觉察出这次会见时的气氛异常，他在日后写的回忆录中，对毛刻意要让外界了解他才是中国外交真正的主角这种心态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这为周恩来遭受随之而来的横祸，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注脚。基氏这样写道：

1973年11月12日，星期一，我们开始明白在这次访问中为中国外交政策规定官方路线的并不是周恩来。新奇的是，毛泽东用明确的语言代替了他通常使用的、富有特点的隐——虽然他的谈话和我前两次同他会见时一样是简短的、苏格拉底式的。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

周恩来当然更会注意到这一点，知道毛泽东近来对外交工作的敲打，火气是来自嫌他在外交上喧宾夺主，抢了锋头，要向外界显示毛本人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这才是毛接连批评外交部的真正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周在随后同基辛格的会谈中，更加谨言慎行，处处把毛放在前面，同时严格按照毛谈话的口径，表态回答问题，并没有失当之处。

会谈中，基辛格按照以往惯例向中方通报苏联军事动向，对外传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报导，采询中美军事合作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互通情报、向中国出售武器以及建立防止核战争的“热线”等内容。为人一向谨慎的周恩来当然知道兹事体大，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答以：此事现在不谈，等打起仗来再说。双方谈得既坦率，也还融洽。按照预定日程，基辛格将于十一月十四日晨结束访问，启程回国。

然而，就在这次访问的最后一刻，突然横生枝节。十一月十三日在告别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提议，希望再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继续讨论一下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正是这次临时会谈，触发了一场对周恩来酝酿已久的批判斗争，演成中国政坛上的一场轩然大波。

对此，中国大陆官方的出版物一直讳莫如深，或者故意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把一切责任通通推到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身上，而为真正的幕后主使毛泽东遮掩开脱。这是因为在政治上有难言之隐的缘故，因为它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毛、周关系中令大陆官方极为尴尬的一幕，以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批周时所扮演的角色和其后获得重用的原因。

现在该是还其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如果说毛泽东在此之前，一直想整周恩来，但苦于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借口而屡屡搞不下去的话，那么这次他确实抓住了周的“辫子”，显得“师出有名”。事情

的经过是这样的：十一月十三日晚，当基辛格提出临时动议后，周因事起仓促，来不及请示毛，而作为东道主也不便回绝客人的提议，便连夜与基辛格就中美双方军事合作的问题又举行了一轮会谈。当时只有中方的翻译唐闻生和美方的温斯顿·洛德在场。会谈结束后，周当场并没有表态，只是表示要请示报告中央，在基辛格早晨登机前再给予答复。

然而，令人感到蹊跷的是，事后证明，周恩来并没有请示毛泽东，便在第二天早晨答复了基辛格，表态说：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这就是后来指周在对美外交中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事先不向毛泽东请示，就擅自接受了美国核保护伞的由来。于是，根据毛的提议，在政治同内部展开了对周的批判斗争。

这里让人有些不可思议的是，一向奉命唯谨的周恩来办事竟会如此疏忽。这实在是与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判若两人。周氏办外交的一大特点，就是历来谨慎小心，总是强调“授权有限”，反复以“外交无小事”来提醒外事部门，而他本人又怎么会在事关中美军事合作这样敏感的问题上擅作主张呢？况且他刚刚挨过毛泽东的批评。

如果说毛泽东对周恩来“大事下讨论，小事天天送”的批评有几分道理的话，那么他只有“小事天天送”的问题，而绝无“大事不讨论”的可能。实际上，长期以来，周总是有意无意地让人感觉到他只是一个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借以避开揽权独断的嫌疑。这正是周能够与毛共事多年而始终安然无恙的要诀之一。

因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都没有理由不先请示毛泽东就自己擅作主张，其中显然另有隐情。虽然后来周氏在接受批判时，吞下了这颗苦果，但内心有难言之隐却是让人可以看得出来的。据当时担任周处理对美事务主要助手的乔冠华回忆，十三日夜与基辛格的单独会谈刚一结束，周就挟着皮包匆匆离去。一直在外面等候的助手们都以为他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去请示毛泽东。可是，从专门记载他每日活动的《工作日志》来看，周却在这之后莫名其妙地审查起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电视记录片来。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周恩来做出这种鬼使神差、不合情理的事情来呢？倒是负责照料他日常生活的警卫秘书在《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一书中，道出了其中的隐情——原来周当时曾打过电话向毛泽东请示，但被告以“主席正在睡觉”。由于

警卫工作的性质，不可能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主脉，因而他们在书中谈到批周这件事时，把时间和地点弄得有些张冠李戴，不过他们回忆当时周恩来在打完电话后的情形还是可信的。

记得周恩来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生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恢复。周恩来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正是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周恩来下决心承担责任，拍板作了决定。

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外人看来，周恩来表面上好像是在深夜审查基辛格访华的电视纪录片，其实是在得知毛泽东已经睡下后，正着急地等候消息，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在战争年代养成的生活习惯是夜间工作，白天睡觉。由于他经常失眠，所以睡觉对毛来说是件头等大事，常常因为睡不好觉而大发脾气。因此当毛睡下以后，周一向不去打扰。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十三日深夜和基辛格谈完后，为是否为这件事叫醒毛心里很踌躇。但事情又很急，不能等，所以才急得“团团转”。

当然，这里也不排除毛泽东以睡觉为借口来挡驾周恩来，就像当年用同样的借口来挡驾即将大难临头的彭德怀、刘少奇一样。不过，周当时似乎并没有从这一点出发来考虑问题，思量再三之后，最后还是按照在工作中一直恪守的规矩：当毛睡觉时，除非万不得已，决不惊动他。同时在情急之下，他采取了某种临时变通的作法，由他自己拍板作了决定。

当然，周恩来还是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所以，第二天在给基辛格的答复中，说的是活话，避免做出任何具体的承诺，只是表示中美双方指定专人对此继续交换意见。应该说，这样做并没有越出作为一国总理的职权范围。

毛泽东似乎正在等待着周恩来迈出这一步。他虽然深居简出，各种消息却很灵通。在十一月十四日基辛格离京的当天晚上，他就把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谈话”，并让她们立即整理出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从中找出了整周的把柄。为了不让周这回轻易滑过去，老于权谋的毛还授意王、唐二人不露声色地找周本人“核实”谈话记录。周当时完全被蒙在鼓里，还以为只是技术性的问题，并没有在意。

随后，根据毛泽东的旨意，王海容、唐闻生二人四处散风，说总理在这次会谈中闯了乱子，被苏联的原子弹吓破了胆，没有请示报告主席，就向美国承担了搞军事合作的义务，接受了美国的核保护伞。

十一月十七日，毛泽东亲自出马，为蓄意已久的批周恩来敲响了开台锣鼓。他在召集周恩来以及外交部有关人员的谈话中，严厉批评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说：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毛并放出狠话：“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

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随后连续召开会议，“批判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其中主要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参加会谈的叶剑英也成了陪绑，被指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右倾软弱”。这是毛泽东亲自为会议定下的调子。

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张挞伐，周恩来虽在党内斗争中久经沙场，似一开始还是措手不及，缺少足够的精神准备，弄不清楚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大动干戈。更令周氏难堪的是，毛竟让他本人来主持批判自己的会议。不过，善于采行顺守之道的周恩来马上采取主动，一面向毛作出检讨，一面又在政治局会议上以介绍这次中美会谈情况的方式，解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试图化解来势汹汹的批判势头。

十一月十八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对中美会谈的批评和进行讨论的情况，并尽量根据自己的认识作了检讨，说：“美国以苏向东吓唬我们，要我们当心，想套住我们，便于美苏争夺或暂时勾结中做筹码，我们不能受骗上当”，检讨承认他自己“在这次会谈中做得不够”。

信发出后，周恩来担心这样说的分量不够，又赶紧补送一信，按照毛泽东的调子，给自己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说：“应指出，目前的危险是防右，要号召和提倡从中央起，中、青干部敢于斗争老干部的修正主义思想和右倾错误，并养成一种好的风气；要防止和批判国内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对我们的侵蚀。”周恩来的这种检讨，当然被毛泽东认为是没有触到疼处，企图敷衍过关，他需要的是彻底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风，同时让他领教一下在政治上打出批极左的旗

号,另搞一套是决然没有好结果的。早在一旁蠢蠢欲动的江青对毛的这一意图心领神会,率先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周恩来开炮,想趁机在政治上把他搞臭。

江青在会上胡搅蛮缠,一会儿说周“左”,“是霍查”,“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一会儿又逼周交待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并按毛定下的调子,给周恩来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弄得周连话都讲不下去。

事情搞到这一步,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之外。他一时难从接受上纲如此之高的批判,不大相信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还以为又是江青在无理取闹,所以开始时还尽量忍耐克制,希望毛能出来制止她的这种搞法。

后来江青上纲越来越高,指责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逼迫他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根本不由分说。周对这种在政治上对他的栽赃污辱,实在忍无可忍,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周恩来的顶牛,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口实。毛随即下令扩大批斗会议的规模,并亲自拟订了列席会让的人员名单,除了让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以及中联部部长耿飚参加以外,还饶行深意地提议让邓小平出席会议。

这样,批周的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会议的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并指定由王海容、唐闻生担任他的联络员,通过他们进行遥控,直接掌握会议的进展。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为了给会议加温,扩大会议一开场,就由唐闻生介绍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批周的最新指示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足足讲了八个钟头,调门非常之高,许多用语与毛对刘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样。诸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等于文革前的旧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甩石头”一语,是毛在对付林彪时所采用的策略之一,意为发出警告——作者注),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危言耸

听地宣称：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毛泽东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提法，大有把周恩来从政治上彻底打倒的架势，使整个会议处于非常紧张的气氛之中。同时也使得周恩来猛醒过来，知道这并不是江青个人在和他过不去，而是毛本人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赶紧低头认罪的话，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只会越闹越大，到头来咎由自取，落得和刘少奇、林彪一样晚节不保的下场。于是，周恩来只好强忍满腹的委屈，不再为自己作任何辩解，而是按照毛定下的调子，开始给自己戴帽子，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接受会议的批判。

应该说，与会的多数人并非全都真心拥护毛泽东的批周指示，而是却对周恩来心存同情。会上对周氏无限上纲、围攻批斗的场面，特别是江青指着周的鼻子大骂的阵势，更是让一些刚刚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工农代表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但是，多数与会者慑于毛泽东的威严，在政治压力下，为了自保而赶紧和周恩来划清界限，表态拥护毛的决定，跟着往自己身上泼污水，上纲上线，痛加批判。在会议的发言中，“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等一类提法，比比皆是。此外，还有人乘机泄私愤，翻历史老账，借批周来洗刷自己，狠狠踹周一脚。

这种墙倒众人推的场面，周恩来虽然久经党内斗争的风雨，但还是有些吃不消，为此精神压力很大，心情沉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过，他理解会上多数人的苦衷，是在奉旨行事，所以并不计较，因为他本人就曾不止一次地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两年后，当时参加批判会的乔冠华向已经病重的周氏当面检讨这件事，请求他原谅时，周表示：“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

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千人在会议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会议开始时，江青提议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批周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江青等六人连同毛的两位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都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在会上如何贯彻毛的意图，引导会议批周。会后，他们又在一起凑着，研究怎样向毛汇报。开过几次会议后，华、



汪两人便退出，剩下清一色的文革派一千人，这便是“四人帮”正式形成的开始，钓鱼台也由此成为他们的代称。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周恩来挨批判期间，当然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周恩来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再提前到达会场。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这本没有什么不正常，问题是，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如今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现冷淡。

会上，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已经不满足于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只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右倾投降主义”，而是要抢到在政治上整倒周氏的头功，就像毛曾一再表扬过的她在反对刘少奇、林彪的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为此，江青仿效毛斗倒刘少奇的手法，把批周的调子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同时又把毛在一九七二年初病重时向周恩来交权的事情翻腾出来，反指周“迫下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江青此举，果然语惊四座，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与会者听说周恩来竟然逼毛泽东交权，虽不大相信，但因江青是会上“帮助小组”的主角，而周本人又缄口不语，于是不得不跟着批，纷纷升高了批斗的调门。这样一来，会上的气氛更加紧张，给周加的罪名越加越大。按当时的情形来看，加给周恩来的这两条罪名坐实的话，已非被打倒不可了。这给批周这出戏的幕后导演毛泽东出了一道今后如何收场的难题。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一直作为自己在政治上“炮手”的江青心情很矛盾，既欣赏她敢打敢冲的性格，也十分了解她为人的弱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毛虽决意要狠整一下周恩来，但只是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打掉他的威风，并无意彻底打倒他。

毛泽东这样做并非想对周恩来手下留情，而是在政治上的代价太大，得不偿失，不只会给林彪事件后已经风雨飘摇的政局造成重大的冲击，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把周恩来一脚踢开之后，由谁来取代他的角色来管理这个庞大国家的日常事务。这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对周戒心大起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可以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才决心把邓小平解放出来，让他重返政坛。

## 邓小平在会上的角色

邓小平揣摩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批周会议的用心。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邓在发言中对周做了违心之论，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邓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

在说明邓小平在批周会议上所扮演的角色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毛很看重这一点，不但在文革之初，就是在后来批邓时，始终都对邓留有余地，提议“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而邓小平在后来否定文革时，压制党内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的主张，仅从个人原因上来说，固然有充当“中国的赫鲁晓夫”之虞，恐怕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毕竟太深了，一损俱损，邓不愿背负弃主忘恩的骂名。

至于周、邓两人的关系，虽说从历史渊源上来说，他们很早就相识，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密切，原因在于他们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经历大不一样，在以毛划线的站队中立场完全不同。按照延安整风时的划分，周恩来是党内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而邓小平则是毛派的头面人物。不仅如此，在建国以后的权力格局中，邓更成为毛泽东手中挟制周的一张王牌。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周、邓两人在政治上和而不同、同而不党的复杂关系非常重要。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同是出身于中共党内的旅欧派，不过当时邓的年龄尚小，还是个玩心未泯的少年；而周则在五四运动中已经崭露头角，一到欧洲便很快成为中共党团组织的领袖人物。两人在年龄、气质和兴趣上有不小的差距，明显不是在同一层次上。回国后，周长期在上海中央工作，而邓则在下面闯荡磨练。在中央苏区时，两人又碰到一起，不过周是临时中央派之牵制毛泽东的钦差大臣。而邓则跟毛很紧，成为苏区毛派的头子，眼着毛一道挨整。

毛泽东格外看重这一点，对邓小平精心扶植，由此奠定了邓一生的际遇。在延安整风时，周恩来作为“教条统治的帮凶”，遭到整治；而邓则是党内著名的毛

派人物，受到重用，一路扶摇直上。尽管邓本人是政工出身，对军事工作不大在行，却被委任为统帅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锋头甚至超过林彪。

建国后，毛泽东顾忌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同时又兼政府总党组书记的权力太大，很快便调“五马进京”，邓小平是其中之一，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分周的权。八大后，毛更是安排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全局，在政治上牵制刘少奇和周恩来。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经历和在权力格局中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两人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虽说不是对头，老死不相往来，但也难以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更多的是井水不犯河水，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的背后，彼此都心照不宣。毛很清楚周、邓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眼下想利用的正是这一点。

在毛泽东看来，在林彪事件以后，党内只有邓小平才真正具有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的实力，就像当年中共八大以后，指派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挟制周一样的。不过让毛踌躇的是，邓在文革中曾被打入冷宫多年，他能否不记旧账，甘心为自己听用，成为对付周的一张王牌，还有待观察。这就是毛之所以点名让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的原因所在。此外，老于权谋的毛还有更深一层用意，那就是有意借此在周、邓两人的关系中打入一个楔子。

为了不让江青打乱自己的部署，同时也看到周恩来已经被整服，毛泽东遂又换了一副面孔，出来纠“偏”，给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降温。其实，工于心计的毛早就为此预留了转圆的余地。就在他对周大兴问罪之师的同时，又故作姿态，让王海容、唐闻生传话，提出“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这次，毛一方面对这次会议表示满意，认为开得很好，讲清了问题；另一方面，又不指名地批评了江青，说：“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对总理可以批评，林彪就不行。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作者注）才是迫下及待。”

毛泽东还针对江青准备将会议的内容捅向社会的作法，通过王海容、唐闻生二人传话说：不能搞红卫兵上街贴大字报，打倒总理、叶帅的那一套，要内部开会解决。又要批评，又要工作，几个老同志和他自己，都是不久于人世的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在会上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尽管他这时还只是一个列席会议的普通中央委员。为人精明的邓当然看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这次会

议的用心，是对他的一次观察和考验，期待他在批周的会上作出有分量的发言，讲出毛想要说的话来。只有这样，才能戴罪立功，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就像只有当他表示“永不翻案”之后，毛才会高抬贵手，把他从江西的流放之地召回北京一样。

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邓小平对他在会上批周的调子颇费了一番心思，用心揣摩毛泽东的心事，而且一直按兵不动，直到会议快要结束时才作了发言。他的发言简明扼要，切中要害，既讲清了周恩来问题的性质，并不是像江青所说的“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又对周提出了“忠告”，道出了毛对周的疑虑和担心，说：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已能够十分警惕这一点。

应该说，邓小平的这番话虽然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深感委屈的地方。而且因为这是违心之论，比江青加的罪名，更让周有口难辩。邓本人并非不知道周对毛一贯尽忠守分的为人，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当然，邓小平是个聪明人，这番话点到即止，随即转移话题，着重谈了他对国际战略形势的看法。

毛泽东非常注意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而且有意在会前不点明邓是否应作批周的发言，借以观察他的态度。会议进行中间，他专门向王海容、唐闻生了解邓的表现，一再追问他发言了没有。后来，当毛得知邓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会议末尾出来批周，作了有分量的发言，正好说出了他想说而又不便说的意思后，大为赞赏，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不用交待也会发言的。”不仅如此，毛还一时兴起，想马上把邓找来彻夜长谈，只是因为当时已是深更半夜，一时找不到人，只好作罢。

经过这番观察和考验，毛泽东决定对邓小平委以更重要的职务，以便在政治上挟制乃至取代周恩来。半个月后，他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会上，毛再度点了批周的问题，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这回不敢了吧？

不仅如此，在有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参加的会议上，毛泽东当众又放出文革发动前夕屡屡说过的话来：“如果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呀。”还话里有

话地说：“我还可以打一仗呢”，“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毛泽东并在会上宣布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

“他做脸，我们做屁股”

批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以周恩来俯首认罪，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而收场。一直在幕后指挥的毛泽东见周已被整服，又转而出来做好人，让会议期间传达他旨意的两位小姐背黑锅。两位小姐当然不服，遂在私下里说出这番话来。

这场轩然大波，最后以周恩来俯首认罪，强迫自己喝下种种难以下咽的污水后而收场。十二月四日，他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在此之前，周曾要求见毛泽东，当面做检讨，却被毛一口回绝，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江青则以“帮助小组”的名义，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出检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插手。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只好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里，枯坐终日，对照毛泽东定下的调子和会上的批判发言，给自己上纲上线，进行自我批判。当年周在为“反冒进”问题写检讨时身边还有秘书帮忙，现在则连个帮手也没有。他曾向担任毛联络员的两位小姐表示，自己年纪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来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她们帮他一下。结果遭到训斥，说他是企图通过她们摸毛的底。周只好作罢。

更让周恩来作难的是，现在别人对他避之惟恐不及，没有人敢给他通气，心里茫然无底，不知道究竟检讨到哪一步才算了结，只好一个人冥思苦想，最后索性照单全收，把会上安在他头上的种种罪名硬加给自己，才总算交出了书面检讨。为了打消毛对他的疑心，周在检讨的末尾明白提出他本人只能作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

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唾面自干的姿态，终于使得毛泽东高抬贵手，又像当年延安整风一样，对他网开一面。毛对周的检讨作了批示：可以了。不过，毛仍

下令要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把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错误批透，改变“跟人不跟线”的状况，意在外交系统中把周彻底搞臭。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不甘心就此罢休，执意要把周扳倒，四处放风，交底下招呼，为倒周制造舆论。

这样一来，周恩来犯错误挨批的消息便在京城的政治圈中不胫而走，弄得沸沸扬扬。可是，毛泽东似乎仍觉意犹未尽。十二月九日，他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特意用说反话的方式，将这一情况透露给外界。毛当着外宾的面，谈笑风生地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等等。

然而，毛泽东毕竟对他本人在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心里有鬼。为了开脱自己，毛又在这次会见时的谈话中嫁祸于人，让他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背黑锅。他指着王、唐二人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对此，王、唐二人当然不服，在私下里发牢骚说：这是毛的一贯作法。“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去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

周恩来最后总算是逃过了这场劫难，但在精神和肉体上所遭受的折磨和打击，却是十分沉重和难以愈合的。在这段挨整的日子里，已经年逾古稀并且身患癌症的周氏，面对种种横加的上纲高得可怕的罪名，而且明明是欲加之罪，却无处申说，只好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吞咽，满肚子的委屈和苦水，甚至连对自己的妻子邓颖超也不能吐露一点，只能全部憋在心里。为此精神上非常痛苦，心情极度抑郁。这期间，他几乎变了一个人，脸色很难看，一天到晚呆坐在屋子里，不说一句话，甚至连胡子也不刮了，人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周恩来的保健医牛张佐良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这期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极少，其它的会议也不多。他的心绪不会好是很自然的，一天到晚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什么表情，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呆在办公室里，进餐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搞得整个西花厅的气氛很沉闷。

跟随周恩来多年的卫士长张树迎回忆道：

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时间神情忧郁，落落寡欢。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开会（应为人民大会堂一—作者注），每次开会回来总理面色都很不好，但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想心事。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批判期间，周恩来在遭受精神折磨的同时，他的病情也明显加重，饱受病痛的煎熬。本来，在这次基辛格访华前，就已经发现他的膀胱癌复发，小便的颜色变深，接下来又出现了血尿。但相应的治疗工作却因这场平地风波而延宕下来。

会议期间，周恩来因无端蒙冤受辱，心情郁结而使得病情加速发展，体内的肿瘤细胞长得很快，侵犯了周围的血管，造成溃烂出血，膀胱里积存了大量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口。他每次上厕所都很痛苦，要化很长时间，用力晃动身子才能排出。扩大会议后期，周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常常在厕所里半天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只好暂时休会等待。为此，江青、张春桥还斥责周故意耽误时间，对抗会议的批判，又给他增加了一条新的罪名。毛泽东在下令政治局扩大会议停开以后，心里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头，而是在考虑另外做文章的题目。江青一干人更是不肯善罢甘休，打定主意要扳倒周恩来，为政治上全面接班扫清道路。因此，一九七三年岁末的中国政局依然是暗潮汹涌，山雨欲来。

仅仅一个月后，毛泽东就在幕后发动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由江青在前台唱主角。这场来势汹汹、令大多数人当时迷惑不解的政治批判运动，很快便在表面文章之下显露出了本来面目：名为“批林批孔”，实则批“党内大儒”周恩来，而周这时已是重病缠身，来日无多了。

2010年1月11日初稿

2012年5月5日修改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九册（8）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九章 召开十大

#### 第八节 批林批孔

##### 本节资料

#####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杨荣国《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二千多年来，一直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尊为“圣人”的孔子，究竟是个什么人？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论民族自决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孔子，就一定要根据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看一看孔子是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他的思想是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 孔子的政治立场

孔子（公元前五五一年到前四七九年），鲁国人，是一个已经没落的殷氏族奴隶主贵族的后代。他所处的时代，正是春秋（公元前七七〇年到前四七六年）晚期。由于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奴隶不断起来反抗。如公元前五五〇年，陈国筑城的奴隶暴动；公元前五二〇年，周王室的“百工”（大部分是手工业奴隶）起来造反；公元前四七八年，卫国的手工业奴隶围攻卫庄公，过了八年，他们又起来赶走了卫侯 z h é@①。奴隶们用逃亡和武装起义来反抗，从根本上震撼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奴隶制度摇摇欲坠，新兴的封建势力已经起来。所以，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新兴的地主阶级和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是当时主要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孔子站在那一边？可用下列几件事情来说明：



当时，在奴隶和人民群众阶级斗争力量的推动下，土地所有制开始发生变化。原来殷、周奴隶制国家中，土地全属最大的奴隶主贵族头子——天子（王室）所有，诸侯（公室）、卿、大夫等各级奴隶主被分封和赏赐的土地，只有享有权，没有私有权。所以这样的土地叫“公田”。到春秋中期，有些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力量起来，他们开垦私田，数量越来越大，而且可以买卖。最初，王室和公室不承认私田，后来为了摆脱财政困境，被迫向私田征税，承认封建的土地私有制。孔子所在的鲁国，于公元前五九四年实行“初税亩”。这标志着由奴隶制的土地所有制向封建制的土地所有制的转化，由此出现地主和佃农，以及由贫民转化的自耕农等新的生产关系，个体经济得到发展。

当时鲁国有季孙、孟孙和叔孙三家，就是新兴力量的代表。公元前五六二年，他们“三分公室”，季孙氏采取征税的新制度；过了二十五年，又“四分公室”，这一次，孟孙、叔孙也和季孙一样，都采取征税制度，改变了生产关系。这是发展着的封建制向正在崩溃中的奴隶制的进攻，是进步的行为。

对于这件事情，孔子采取什么态度呢？

他认为，季孙、孟孙和叔孙，本来也是奴隶主，是大夫，却这样不守本分（“过其所爱”），破坏了从殷商以来传统的奴隶制度，这还得了吗！因此，他想尽办法要削弱这三家的势力，以维护鲁国公室的奴隶主统治。

当时，孔子的学生冉求，是帮助季孙氏实行改革的。孔子气愤得很，说冉求背叛了“周公之典”，即背叛了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左传》哀公十一年）。孔子宣布不承认冉求是他的学生，还要他的学生们“鸣鼓而攻之”，对冉求实行围攻（《论语·先进》）。

孔子维护什么制度，反对什么制度？这还不是清清楚楚的吗！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齐国。齐国新兴力量的代表是田成子（古代“田”和“陈”是同一个姓，所以又叫陈成子），他为了反对当时统治齐国的腐朽的奴隶主贵族势力，采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的办法争取了群众，终于在公元前四八五年，杀掉了齐国奴隶主贵族头子齐简公。孔子对这件事很是反对，力劝鲁哀公出兵去讨伐，鲁哀公知道自己的力量弱，打不过齐国，才没有敢去。

第三件事情：孔子反对铸刑鼎。

当时，由于奴隶不断反抗和封建力量的兴起，原来奴隶制的“礼治”维持不下去了，不得不用“法治”来代替。奴隶制的“礼治”，其实就是规定奴隶主和奴隶的“尊卑”上下关系。奴隶主是统治奴隶的，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但是这时，奴隶很不听话，已经到处起来反抗了。有些倾向进步的人，看到这种趋势，认识到必须改变旧的统治办法，对贵族和奴隶的关系，要规定一些法律条文，对奴隶主有些限制，叫作“刑书”；那时是铸在鼎上的，让大家可以看到，这就叫“铸刑鼎”。它后来就发展成为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法律；后来主张“法治”的，就是代表新兴封建力量的法家。

孔子对于这件事，也是坚决反对的。公元前五一三年，晋国人铸刑鼎，他听到以后，很不以为然地说：将贵族和奴隶混在一起，怎么显示贵族的尊严伟大呢？这么一来，贵贱之间一点区别都没有了，还成个什么奴隶制国家呢（《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第四件事情：孔子杀少正卯。

孔子一生都想做官，以实现他那套反动的政治理想。但直到公元前四九七年，他才当了三个月鲁国的司寇，并代行宰相的职务。他上台才七天，就把当时鲁国一位著名的革新派人士叫做少正卯的捉来杀了。

原来，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的时代，代表各个阶级的思想家，都创立学派，互相辩论。少正卯和孔子一样，当时都在鲁国招收门徒讲学。他们是意见根本对立的两派。孔子杀少正卯，实际上正是当时阶级斗争的表现。请看孔子是怎样宣布少正卯的罪状的（见《荀子·坐宥》）。

孔子说：下面五条，只要犯有其中一条的人，就应该处死。

一、通达古今之变，了解事物变化的人，是容易铤而走险的（“心达而险”）；

二、不以奴隶制的正道而行，固执地走所谓革新之路的（“行辟而坚”）；

三、把他的所谓革新道理说得头头是道的（“言伪而辨”）；

四、对奴隶制统治中所产生的一些腐朽不稳的现象，知道得非常之多的（“记丑而博”）；

五、把反奴隶制的道理说得义正辞严似的（“顺非而泽”）。

孔子说：现在少正卯对这五条都犯了，所以非杀不可。他根据这五条定少正卯的罪案，那就是：

- 一、聚众结社（“居处足以聚徒成群”）；
- 二、鼓吹邪说（“言谈足以饰邪营众”）；
- 三、淆乱是非（“强足以反是独立”）。

少正卯倡导革新，是适应当时历史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愿望的。孔子杀了少正卯，连他的学生子贡也怀疑是错误的（《孔子家语》）。当时人民群众都爱戴少正卯，颂扬他是杰出的人物。

够了，这几件事情足以说明，孔子是顽固地站在日趋崩溃的奴隶制一边，坚决反对新兴的封建制改革的。

春秋时代，奴隶制国家先后灭亡的有五十二国，奴隶制度日趋崩溃，这时候，孔子提出来的政治口号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就是要复兴被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权力，让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出来当政。这是彻头彻尾的复旧反动的政治口号。孔子却要以此为“己任”，下决心要做到“死而后已”。当时人民群众非常讨厌他，有一位守门人骂他是不识时务（“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是逆时代而行的反动人物。孔子和他的学生到处游说，有些地方的群众就围攻他们，他们吓得跑了，“若丧家之犬”。这就是站在反动立场的孔子应得的惩罚。

### 孔子的思想——“仁”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个“仁”字。这个“仁”，原来就是殷周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

殷周奴隶主统治者，为了巩固奴隶主阶级的团结，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就提倡“仁”。现在考古发现的甲骨文卜辞上就已经有“仁”字。奴隶主提倡“仁”，就是要奴隶主阶级内部的成员之间亲爱团结；同时还要欺骗被奴役的劳动人民，让他们服从统治者，不要反抗（“怀于有仁”。《商书·太甲下》）。孔子最崇拜的“圣人”周公，不是就自称他是仁爱又顺从祖先的吗（“予仁若考”。《周书·金縢》）！他们看来，在奴隶主阶级中，只要人人相亲相爱，又能顺从氏族祖先，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就可以巩固下去。所以，他们的结论是：“仁亲”就是“宝”（《礼记·檀公》）。可见奴隶主把“仁”看得非常重要。

孔子对“仁”作了系统的归纳与发挥。他给“仁”规定了许多内容：孝悌、忠恕、正名、德、智等等，都包括在内。我们分析这些内容，就可以看出孔子的思想是为那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孔子归纳得出：“孝”和“悌”是“仁”的根本。

为什么呢？因为古代奴隶制社会是氏族贵族的统治。作为统治阶级的奴隶主，属于同一个氏族，有共同的祖先。孔子感到：当时奴隶主内部矛盾很尖锐，你争我夺，这样就会导致奴隶主统治的崩溃。所以他提出：只要奴隶主内部，人人都能对祖先、对父母尽孝道，就可以从纵的方面将奴隶主团结起来。“悌”就是平辈的兄弟之间，彼此都能相亲相爱，就可以从横的方面将奴隶主团结起来。奴隶主阶级在纵横两方面都团结一致了，就不会发生犯上作乱的事情，就可以达到巩固氏族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目的。同时，奴隶主内部实行“孝”“悌”，就能够影响奴隶们也趋于厚道（“民德归厚”。《论语·学而》），规规矩矩地服从奴隶主的统治。

所谓“忠”、“恕”，也完全是为奴隶主的利益服务的。孔子提倡“忠”，就是要奴隶忠于奴隶主，大夫、陪臣忠于诸侯，诸侯忠于周天子，目的就是要巩固各级奴隶主的统治。他提倡“恕”，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但他决不是要对奴隶实行宽恕，而只是对那些已经沦落的奴隶主实行恕道。孔子自己就是一个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后代，小时候做过许多被认为卑贱的事，管理过仓库和牧畜的事情。他很能替自己这样的人着想。他要求对没落的奴隶主不要过于求全责备了（“毋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只要他没有大错误，就不要抛弃他，要做到在奴隶主内部“故旧不被遗弃”，大家团结一致，以防止奴隶们起来造反。

上面已经说过：春秋是个大变革的时代，当时新兴的封建力量抬头了，如鲁国的季孙氏、齐国的田氏，他们都向反动的奴隶主贵族统治进攻，改变了原来的生产关系，破坏了奴隶制的“礼治”。孔子认为，这是因为这些新兴力量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和约束自己的行动，就是不仁。他就把殷周以来的“克己复礼”的办法搬了出来。（《左传》：“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这“志”是“记载”的意思。）他对学生颜渊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只要奴隶

主们都能克制自己的欲望和行动，恢复礼治，奴隶们也就会规规矩矩地服从统治。这就叫“天下归仁”。这样，奴隶主的统治就可以巩固下去。

因此，孔子还大声疾呼地说要“正名”（《论语·子路》）。

什么是“正名”？就是要用主观的观念（“名”），去规定和范围客观的存在。

这是因为，在奴隶主的残酷统治下，奴隶的不断起义，新兴封建力量的抬头，生产关系的不断改变，使得奴隶制社会的秩序十分混乱（“礼崩乐坏”）。当时，政令和军令已经不能从奴隶主最高统治者——周天子那里发出来了；各国诸侯的权力也发生了问题，有些落到大夫、陪臣手里；另一方面，象少正卯这样的人又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评当局。已经造成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局面。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于是孔子下了决心，要用殷周以来奴隶主阶级那套主观的观念，去规定和范围正在变革中的社会存在，以恢复固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妄图挽回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颓势。

据说，他还因此写了一部他当时的现代史，叫做《春秋》。后来孟子说：孔子这部历史写出来以后，使得那些“乱臣贼子”都感到害怕。因为它用正定名分的观点去写的，想把变革了的社会现实改正过来，恢复旧秩序。孟子吹捧他，说孔子写《春秋》去改正被紊乱了的名分，这是在代替周天子行使最高权力——去巩固奴隶制的统治。所以，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值得大书特书（《孟子·滕文公下》）。

实际上，这不过是孔子的巩固立场的又一表现罢了。

这也是孔子所说的“仁”的工夫。

孔子所说的“德”——“为政”要“以德”，也并不是要对被奴役的劳动人民行德政，只有在奴隶主阶级内部，才行所谓德政。《荀子·礼论》：“人有是，士君子也，外是，民也”。这个“有”字，古代同“域”字，这是指居住在城市的意思。这句话就是说：当时居住在城市里的，主要是士君子——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而民——奴隶，大都住在城外。当时所说“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这“中国”是指“国中”，即城内。这也就是说：德只能施于住在城内的大小奴隶主；而对住在城外的被奴役的劳动人民，却只能施刑罚。用鞭子去对付劳动人民，这就是奴隶主的“德政”！

孔子认为，“仁”还包括“智”——知识。他竭力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这就是说：奴隶主“圣人”是上等的天才，奴隶们不过是下等的奴才。一个是绝对的智慧，一个是绝对的愚蠢，这两个阶级是无论怎样也不能改变的。所谓天才的知识是从那里来的呢？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论语·季氏》）。认为“圣人”的知识是天生的，不是来自实践。孔子就是这样赤裸裸地主张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的。

所以孔子十分看不起生产劳动。他的学生樊迟要求学习农业劳动知识，孔子很生气，他说：这是奴隶们干的事情，我才不干呢。他骂樊迟是“小人”（《论语·子路》）。劳动人民怎样回答他呢？有位正在耘田的老农看到孔子，说他不过是个“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只会过不劳而获生活的寄生虫（《论语·微子》）。这是对孔子的最正确的评价。

孔子讲了许多“仁”，但是他将奴隶等被奴役的劳动人民排除在“仁”之外。在他看来，奴隶们是只能供驱使、被奴役的，决不能让他们知道任何道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他辱骂他们是“鸟兽”，是那些奴隶主贵族老爷们不屑为伍的（《论语·微子》）。他特别轻视妇女，认为不论男奴隶也好，女奴隶也好，都是很难畜养、很难对付，也是不可以亲近的（《论语·阳货》）。他认为：在奴隶主中间，可以有不仁的人；而在奴隶和被奴役的劳动人民中间，则是根本不可能有仁者的（“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

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说“仁者爱人”，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他并不是要爱一切人（包括奴隶），他所爱的，仅仅只是奴隶主阶级。他也讲“泛爱众”，好象是要普遍地爱大众了，其实，当时的“众”字，因为社会变革，已经不是殷商和西周初期那样，还有奴隶的含义，而只是指“君师”、“群臣”了（《礼记·曲礼》郑玄注）；所以，他所爱的仍旧只是奴隶主阶级。

毛主席指出：“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们千万不要上孔子的当，尽管他说了不少漂亮话，什么“治亲”呀，“报功”呀，“举贤”呀，“使能”

呀，“存爱”呀，这些“仁政”，都只施于奴隶主阶级内部，而“民不与焉”（《礼记·大传》）——奴隶们是不在其内的，他们是只能被奴役、被鞭挞、被屠杀的。

从上面简单的分析，可以看出，尽管孔子满口“仁义道德”，说得天花乱坠，戳穿了看，他的思想，都是为正在崩溃中的奴隶主贵族阶级的利益服务的。

当时，反对孔子的儒家，站在封建阶级的进步立场的是荀子，以及他的学生韩非等法家。先秦儒法两家的斗争，是当时阶级斗争在思想战线上的表现。这方面，我已经专文阐述（《红旗》）一九七二年第十二期），这里就不再多谈了。

孔子在当时，是站在正在崩溃中的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反对新兴的封建势力；他的思想的实质，是要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论证劳动人民只能被剥削、被奴役、被统治。用一句话说，他就是要论证“剥削在理、造反有罪”。因此，后来的剥削阶级，不管是封建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当他们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可以反对孔子，喊“打倒孔家店”；一旦他们取得政权，成为反动的统治阶级之后，却都要利用孔子的思想，来欺骗劳动人民，为他们自己的反动统治服务。所以二千多年来，孔子一直被他们尊为“至圣先师”。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才能揭穿孔子的反动本质。

\* \* \*

毛主席教导我们：“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分析当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看在当时历史发展的条件下，他是站在进步阶级方面，主张革新呢，还是站在反动阶级方面，主张保守。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我们要肯定的，只是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东西，对反动的、保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决否定它，批判它。所以，批判孔子的反动思想，对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抓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会有帮助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车加取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杨荣国的《西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斗争》。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发表施丁的文章：《“焚书坑儒”辨》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治时期的一次重要政治事件。对于这一事件，历来评论的人很多，意见虽然有些出入，但多数意见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是暴虐行为，反动措施，直接导致秦朝覆亡。例如，汉朝人贾谊批评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废除了先王之道，烧毁了诸子百家的书，以欺骗民众（“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烧了书，用残暴的刑法对待人民（“焚文书而酷刑法”），所以它的灭亡必然是很快的（“故其亡可立而待”《过秦论》）。贾谊的这个看法，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唐朝人章碣的《焚书坑》一诗也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意思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得秦朝衰弱了，所以不久就在刘邦、项羽的打击下垮了台。贾谊、章碣等人的看法，是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的错误之见。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我们应当认真辨析一下它的具体内容、性质和效果。

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秦始皇“焚书坑儒”，大致情况是这样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了中国。面对这一新的政治局面，是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还是瓦解统一，取消中央集权，当时秦朝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派人主张分封诸侯。廷尉李斯反对分封，认为推行郡县制，有利于巩固统一。秦始皇毅然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以下凡引此文不另加注），由中央委派地方长官，以便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此后，李斯升为丞相。但是，主张分封的人并不甘心，两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时过八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博士淳于越又把这一斗争挑了起来。当时秦始皇在咸阳宫中召集群臣举行盛大宴会。博士仆射（博士的长官）周青臣在秦始皇面前称颂，说把过去的诸侯国改为郡县，统一了中国，是威德空前的大事业。淳于越听到周青臣的话非常不满，便恶意攻击，说推行郡县制是不遵守古代法制，周青臣的话是“面谀”。秦始皇就把这两种意见交给群



臣议论。丞相李斯当即反驳淳于越。李斯说：时代变了（“时变异”），不能照旧（“不相袭”），古代的规章制度今天不能效法（“三代之事，何足法”）。并指出：现在诸生不学习当代的东西而专门推崇古代的东西，用古道来反对当今的政治，以欺骗民众，扰乱人心（“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因此，他主张禁止私学，建议焚书。凡是敢于在背地里谈论《诗》《书》的处死刑。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知道不检举的同罪。命令下了三十天还不烧的，脸上刺字，罚做筑城四年的劳役。（“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李斯想要通过这种办法，使天下人不能以古非今（“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李斯传》）。秦始皇采纳李斯的意见，批准执行。秦始皇这一措施，给了“以古非今”者以严重打击。

就在秦始皇公布这个法令的次年，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二一二年），“方士”侯生和卢生又发动了一次进攻。他们私下议论秦始皇“刚戾自用”，“贪于权势”，专门重用管刑罚的官吏，虽然设有博士七十人，但不重用（“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这显然是对秦始皇采用李斯的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的诽谤和攻击，为淳于越之流鸣不平，为儒生博士争权夺势造舆论。这两个靠方术行骗的人在这样大肆攻击秦始皇之后偷偷地跑了。秦始皇知道后，联想到诸生在咸阳诽谤朝政，用谣言欺骗群众等情况，便令掌司法的官员审问诸生，严加追究。诸生相互告发。违犯法令的共有四百六十多人，秦始皇就将这些儒生全部在咸阳活埋了，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以警告以后的人。这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秦始皇“焚书”，并不是要毁灭文化，烧光书籍。他“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鲁迅：《准风月谈》）。他只是要烧除秦国史书以外的各国史书和民间私藏的《诗》、《书》、诸子百家等典籍。而对于“博士官所职”的书籍不烧，所有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也明确规定不烧。因此可以肯定，秦始皇焚书是有限的。秦始皇“坑儒”，是为了打击主张复古的反对派，并不是要把所有的儒生都杀掉。对于赞同郡县制的周青臣和一些遵法的儒者是不加害的。汉初著名的儒者伏生、叔孙通、陆贾、酈食其等人在当时都没有遭到什么迫害。而且，就是在“坑儒”事件之后，秦王朝之内仍然有博士儒生，还选取博士。例如，秦二世

得到陈涉起义的消息的时候，便召博士诸生发问。当时就有“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对答，“待诏博士”叔孙通还因对答之词使得二世满意，“拜为博士”（《史记·叔孙通列传》）。这就说明，秦始皇不仅没有杀害无辜的儒者，而且还任用了一些儒者。

“焚书坑儒”就其性质来说，在当时是一个反篡权复辟的“厚今薄古”的进步措施。中国自春秋至战国，是处于由奴隶制转为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奴隶暴动对奴隶制的摧毁性的打击，由于新兴地主势力日益抬头和发展起来，并逐步夺取了政权，进行封建制的社会改革，全国就由几百个小国归并为几个大国，新的郡县制逐渐代替着旧的分封制，进步的封建制代替了腐朽的奴隶制。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反映出奴隶主贵族垂死挣扎、妄图挽回奴隶制的反动性，其结果是一败涂地。而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实行社会变革的进步性，从而获得了胜利。秦始皇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他直接继承了商鞅变法的事业，沿着法家的政治道路，重用法家李斯等人，灭了韩、魏、楚、赵、燕、齐等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他还在统一过程中和统一之后，废除了分封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在全国普遍推行郡县制度，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国家体制等一系列巩固统一、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发展了封建制度。但是，奴隶主贵族并不甘心于失败，梦想从历史垃圾堆里爬出来，篡权复辟。为其代言的一些反动政客、儒生博士王绾、淳于越、侯生和卢生之流，依然继承其祖师爷孔丘、孟轲的衣钵，顽固地坚持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他们在新形势下，称颂《诗》、《书》，以古非今，造谣惑众，主张分封诸侯，反对郡县制度，企图瓦解统一，取消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复辟奴隶制。毫无疑问，他们“以古非今”是反动的。秦始皇和李斯顺应当时“势之所趋”，否定了早已过时的分封制，坚决推行业已发展的郡县制，并揭穿了反动派以古非今的反动面目，给予坚决打击，应该说是做得很对的。因此，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当时新取得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同被赶下政治舞台的奴隶主贵族的一场政治斗争，是统一不久的秦王朝粉碎旧势力复辟阴谋、维护新封建统治的一次果敢行动，是“厚今薄古”的进步措施。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应该历史地去看它。贾谊等人把它说成是反动措施，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效果，也是应该肯定的。从秦始皇统治时期来看，自“焚书坑儒”之后，虽然民间还有人收藏和诵习《诗》、《书》、诸子百家的书，也还有人诅咒秦始皇和封建国家制度，但是秦王朝内部就再没有一个博士儒生敢于明目张胆地“以古非今”，反对郡县制，反对中央集权，从而使郡县制得以较为顺利地发展，日益巩固了地主阶级国家的统一。从秦朝以后的中国历史看，秦朝的封建统治制度，对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自秦朝以后的各个封建朝代，不管其地方建置的名称怎样改变，基本上都只是郡县制的变换和发展；无论其政治制度的组织形式怎样变化，基本上也只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演变和发展。正如清初人王船山所说，郡县制实行了两千年，而不能改了（“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读通鉴论》卷一）。近代人谭嗣同也说，两千年来的政治制度，是秦朝的政治制度（“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仁学》卷上）。因此，我们可以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经对封建国家的巩固统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起到了积极作用。

那么，是否可以因秦朝覆亡于“焚书坑儒”之后不久，而断定这是由“焚书坑儒”所导致的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看。“焚书坑儒”之后的第三年，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年），奴隶主贵族分子陈余和儒生孔鲋之流都乘陈胜、吴广起义的时机而叛秦。再过三年（公元前二〇六年），秦朝就垮了台。如果从表面上观察问题，就会觉得秦朝灭亡同“焚书坑儒”似乎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仔细分析当时的矛盾，就能看到情况并非如此。

国家机器从来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一方面要打击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另一方面又要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焚书坑儒”是秦王朝打击反动派搞复辟活动，而“用苛法峻刑使天下的人不安宁”（“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则是秦王朝对人民的迫害。陈余、孔鲋之流叛秦，同农民起义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秦朝的灭亡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结果。陈胜、吴广起义，是反对封建剥削者的革命斗争，促使了秦王朝的灭亡。因此，秦王朝是被农民革命所推翻的。章碣等人硬是把“焚书坑儒”同陈胜、吴广起义，刘、项亡秦连在一起，断言其因果关系，完全是牵强附会，混淆了历史是非。

我们今天对待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一历史事件，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透过历史的一些表面现象看实质，揭示出历史的本来面目。然而，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诅咒秦始皇“焚书坑儒”，念诵章碣《焚书坑》诗，借以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寄同情于淳于越、侯生和被坑的儒生等历史上的反动势力，否定秦始皇“厚今薄古”的进步措施，歪曲历史，颠倒是非，企图拉社会倒退，也恰恰足以证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唯心主义者。从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叛党叛国的罪恶行动来看，他们以唯心史观颠倒历史，制造反革命舆论，其险恶用心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当年淳于越之流代表历史上腐朽的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反对秦朝统一，反对封建制度，妄图恢复奴隶制；今天林彪反党集团代表资产阶级，代表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天堂”。然而，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都是短命的。淳于越之流的复辟阴谋，在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中早已破灭。林彪反党集团的复辟阴谋，也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砸得粉碎。这就是不以一切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原载《辽宁日报》，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略有删改）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发表罗思鼎的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秦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始皇所建立的封建统一事业，以及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措施，都不能单纯归结于偶然的原因，而是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指出：研究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必须注意“在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中，也有其特点”。秦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开始于秦孝公，完成于秦始皇，其间整整经历了七代国君。在这一百五十年中间，充满着激烈的变法与反变法、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秦始皇由于适应了封建制一

定要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发展趋势，才能“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sup>①</sup>，统一了中国，开创了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汉承秦制”<sup>②</sup>，这说明秦所创立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是逆转不了的。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批判尊儒反法思潮，必须认清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和秦始皇的历史作用。而要正确认识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和秦始皇的历史作用，就必须弄清从秦孝公到秦始皇这一百五十年间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历史及其各个阶段的特点。

—

“秦行商君法而富强”<sup>③</sup>。秦孝公时代的商鞅变法，是秦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转折点。

商鞅变法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早在春秋时期，奴隶们反抗奴隶主奴役压迫的斗争连绵不断，推动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即向私田征税，承认土地的私有，使奴隶制经济打破了一个大缺口。到了战国初期，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中原各诸侯国程度不等地发生了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奴隶的反抗也十分激烈，著名的以跖为首的奴隶大起义就发生在秦国<sup>④</sup>，据《庄子·盗跖》篇记载，跖率领“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沉重地打击了秦国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同时，商鞅变法以前，秦国的大权落在庶长——宗族奴隶主贵族集团的手里。国君的废立全由他们作主，经常发生争夺君位的内乱。国君在与奴隶主贵族的尖锐冲突中，迫切需要寻求一定的政治力量的支持。秦国的地主阶级，正是在奴隶制统治的这个薄弱环节中找到了缺口，逐步地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公元前四〇八年，秦国实行“初租禾”<sup>⑤</sup>。这表明秦国地主阶级的存在得到了合法承认。公元前三八四年，秦献公开始取消残暴的奴隶制的殉葬制度，即所谓“止从死”<sup>⑥</sup>。过了十年，秦献公又采取了“户籍相伍”<sup>⑦</sup>的新制度。新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壮大，要求在政治上得到相应的反映。秦孝公作为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急切地希望“变法以治”<sup>⑧</sup>。他一即位，就颁布命令说：“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sup>⑨</sup>

究竟按照什么政治路线实行变革呢？秦国由于位处偏僻的雍州之地，不得参与中原诸侯国的“会盟”⑩，奴隶主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统治比较薄弱，拿不出什么完整的思想体系。“孔子西行不到秦”⑪①。这说明儒家当时在秦国的影响比较微弱，远不如在中原地区的广泛而强大。因此，秦国的国君直率地认为应当采取同孔子思想相反的政治路线：“当今诸侯力争，所务兵食而已。若用仁义治吾国，是灭亡之道”⑪②。用了孔子的一套就会亡国，这是对于当时历史经验的一种总结。

商鞅，卫国人，原名公孙鞅，是李悝的学生，是个“好刑名之学”⑪③的法家。他从卫国跑到了秦国，虽然受到了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欢迎，但也遭到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对。当时，在秦国朝廷上发生了一场大争论。秦国旧贵族的代表甘龙和杜挚，妄图按照儒家的路线改造秦国，叫嚷“法古无过，循礼无邪”⑪④，竭力主张维护奴隶制的“礼治”局面。商鞅驳斥这种传统的奴隶主思想是“世俗之言”，说是“治事不一道，便国不法古”⑪⑤，竭力提倡变革。在这场地主阶级革新派与奴隶主贵族保守派的激烈争论中，秦孝公坚定地支持了商鞅的主张，确定了变法的路线。从公元前三五六年开始，商鞅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推行了一系列的变法措施：如“开阡陌封疆”⑪⑥，奖励地主垦荒，发展农业生产，废除旧贵族的世袭特权，推广“民为什伍”⑪⑦的连坐法，实行县制，以及统一度量衡制度等等。商鞅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竭力倡导“力本业”⑪⑧，即要求努力从事耕织，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⑪⑨。他在变法中特别规定：凡是“耕织致粟帛多者”可以“复其身”（免除本身的赋役）。相反，如果是“事末利及怠而贫者”⑫①，就要连同他的妻子没为官奴婢。这种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有利于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增长，沉重地打击了工商奴隶主的势力。

商鞅变法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必然要受到旧贵族反动势力的顽抗。商鞅的时候，秦国的京都里“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宗室贵戚多怨望者”⑫①。贵族奴隶主胆战心惊，咬牙切齿，“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⑫②，“畜怨积讎比于丘山”⑫③。他们纷纷聚集在公子虔的旗帜下，唆使太子“犯法”，竭力阻挠变法的实行。商鞅面对着这种“法之不行，自于贵戚”⑫④的局面，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对宗族奴隶主集团进行了沉重的打击。他对公子虔处以

割鼻的重刑，罚峻使太子犯法的公孙贾面上刺字，杀了破坏变法的贵族祝 h u ā n @②。商鞅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在咸阳附近的渭水边上镇压了七百多个旧贵族，维护和巩固了新的封建制度。据记载，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乡邑大治”②⑤，连妇女儿童都能“言商君之法”②⑥。当章太炎早年还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时候，就曾正确地评论了商鞅，说：“世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②⑦

秦国的宗族奴隶主集团在经受了猛烈的打击后，转入地下活动，公子虔八年闭门不出，但背地里却在日夜酝酿阴谋，妄图复辟。商鞅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摆脱不了那个阶级所特有的局限性和软弱性。他虽然意识到斗争的严重性，但他根本不可能依靠人民，就是对于地主阶级的力量也缺少足够的估计和广泛的动员。他走的是一条自上而下的变法路线。因此，当秦孝公一死，商鞅的变法就搞不下去了。特别当那个和旧贵族站在一个阵线上的太子——秦惠王上台以后，以公子虔为首的复辟势力立刻进行反攻倒算，“告商君欲反”②⑧。公元前三三八年，贵族奴隶主用“车裂”的酷刑杀害了商鞅。

商鞅死后，复辟的逆流一度统治了秦国。秦惠王推行了一条与商鞅完全不同的政治路线，排斥法家而信用旧贵族。秦惠王有个舅子名叫魏 r ǎ n @③，后封于穰，称为穰侯。他是惠王、武王、昭王三朝的“元老”，经济上“富于王室”，政治上“威振秦国”②⑨。穰侯竭力迫害法家，把来自韩、赵、魏等国的地主阶级谋士，一律斥之为“徒乱人国”③⑩，充分暴露了贵族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本性。

在这个时候，中原各诸侯国也同时出现了一股反对法家的逆流。商鞅变法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引起了各国奴隶主的惊慌与恐惧。他们把秦国看作是“不识礼义”、“好利而无信”的“虎狼”之国③①。在这场对法家的围剿中充当急先锋的，是儒家的孟轲。儒家在当时是一种极其反动的思潮和学派，它的创始人孔丘就是一个顽固的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言人，终生为维护奴隶制统治而奔走呼号。孟轲继承了孔丘的反动事业，公开反对取消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主张保存“世臣”、“世禄”③②制度，叫嚷“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③③，即不准触犯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他同孔子杀少正卯一样，咒骂法家是“民贼”③④，要求严厉镇压。商鞅“决裂阡陌”③⑤，“隳经界”③⑥，废除奴隶主土地所有制。孟子大讲“仁政，必自经界始”③⑦妄图恢复早已分崩离析

的“井田”制。商鞅提倡“耕战”政策，鼓励新兴地主阶级通过“辟田与胜敌”③⑧的途径而改变社会地位。孟子则抛出“恒产”论，说什么“民之为道也，有恒产都有恒心”③⑨，主张对“辟草莱”者处刑④〇。商鞅主张“法治”；孟子则鼓吹“王道”“仁义”。孟子的政治经济主张是商鞅变法的一种反动，完全适应了贵族奴隶主的复辟需要。

但是，封建制度终究要代替奴隶制，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秦国内外反动派的复辟活动都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大方向。韩非说：“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法未败也”④①。这话说得不错。秦国在废除“井田”制后，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和发展，犹如潮水一样不可阻挡。据记载，“秦惠王并巴中，……其君长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④②这是典型的封建赋税的剥削形式。到了秦昭王时期，秦国不仅关中地区农业发达，就连边远的蜀地也是“沃野千里”，有“天府”④③之称。这一切说明，旧的奴隶主土地所有制的桎梏打碎以后，必然造成了新的地主经济的繁荣。

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后，新兴地主阶级日益不满于自己在政治上的无权地位，力求建立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统治形式。它同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商鞅变法时期的斗争主要围绕着土地所有制问题展开，那末，随着这个问题的基本解决，两个阶级的斗争就逐渐集中到政权问题上去了。秦昭王在位期间，由于魏冉④③等人专权，“私家富重于王室”④④。秦昭王为了夺回丧失掉的权力，和新兴地主阶级有了共同语言，逐渐倾向于法家，认识到“儒无益于人之国”④⑤。有一次，昭王生病，一些奴隶主贵族有意冒犯禁令，买牛肉为他祈祷。昭王毫不踌躇地认为“法不立，乱亡之道也”④⑥，下令每人罚盔甲两副入库。

就在这种情况下，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范雎从魏国来到了秦国。他逃避了穰侯魏冉④③的搜查，在给昭王的“上书”中指出：“臣闻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赏，有能者不得不官，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众者其官大。”④⑦范雎继承和发挥了商鞅的“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④⑧的思想，反对“世臣”、“世禄”制度。同儒家的贵族分权思想根本对立，范雎提出了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法家思想。他告诫昭王说：“天下有明主则诸侯不得擅厚”④⑨。这就是说，只有加强中央集权，才能保证国君的绝对地位。



范雎批判以魏冉③为首的贵族奴隶主集团为了保持自己的世袭特权而搞“远攻近交”的政策，进一步提出了“远交近攻”⑤①的政策，范雎的路线博得了帮昭王的赞同，于是，“拜范雎为客卿，谋兵事”⑤①。

秦昭王任用范雎后，在对外的统一战线中连续不断地取得了胜利，从而加强了昭王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地位。在这个基础上，秦昭王“强公室，杜私门”⑤②，把穰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等一小撮旧贵族驱逐到关外，拜范雎为相。此后，新兴地主阶级在秦国的政权机构中重又占据了优势。

但是，范雎虽然位居相位，实际上却是坐在一个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山口上。在秦国，旧贵族势力当时还是相当强大的。在这种阶级斗争的背景下，范雎动摇了，于公元前二五六年“谢病请归相印”⑤③。他的后任蔡泽也只当了几个月的秦相，就由于惧怕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攻击而主动辞职。范雎、蔡泽的下台，固然说明了他们为了个人的身家性命，不敢将变法事业进行到底；同时，这也深刻地说明，在秦国地主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仍然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的严重斗争。

## 二

在这场地主阶级与贵族奴隶主的长期、曲折、反复的斗争中，秦始皇继承了商鞅、范雎的事业，是在全中国完成了封建统一事业的雄主。

秦始皇执政以后，建立地主阶级专政的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秦始皇曾经采取两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步骤：其一，铲除以吕不韦为首的集团，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和秦王朝的建立；其二，实行“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巩固了地主阶级政权。这两起历史事件，是秦国新兴地主阶级与没落奴隶主贵族长期斗争的继续，也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百五十年间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继续。

吕不韦并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而奴隶主贵族的代表。战国末期，齐、楚等六国所用的宰相，都是宗室贵族，如齐国的田忌、田婴、田文，楚国的令尹子兰、黄歇，赵国的赵胜等。只有秦国却大量任用客卿，任用那些在六国站不住脚而逃亡到秦国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如范雎、蔡泽、李斯等。但是这时在秦国，工商奴隶主力量仍然十分强大，他们成为复辟活动的最主要的社会基础。据《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秦国的乌氏倮、巴寡妇清以及蜀之卓氏等，就都有僮（奴

隶)千人,富“拟于人君”。吕不韦是这股社会势力的最著名的代表。他是个“阳翟大贾”，拥有“家僮”万人，“家累千金”⑤④，是个大奴隶主。他依靠政治投机而当上了秦庄襄王的丞相。吕不韦的上台，得到了秦国华阳夫人等贵族奴隶主集团的支持，是当时奴隶主阶级复辟活动的结果。

吕不韦在秦国执政以后，竭力推行的是一条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的政治路线。他在经济上，激烈反对秦国传统的“强本弱末”政策，胡说“本”不是指“耕耘种植”，而是“孝”与“贤”⑤⑤，妄图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破坏地主阶级的经济基础——封建农业经济。在文化思想上，吕不韦招集了一批对新制度不满的知识分子，编纂了《吕氏春秋》一书，妄图反对与取代在秦国居于传统地位的法家思想。

《吕氏春秋》的出笼，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和儒法论争的一个新动向。战国末年，由于没落奴隶主阶级力量的日益衰落，孔孟儒家的“显学”地位早已发生了动摇，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相反地，法家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日益强大，出现了象荀况、韩非那样杰出的代表人物。因此，这时在秦国要公开亮出儒家的旗帜是不行了，而是只能标榜折衷主义，在“杂家”的招牌下贩卖儒家的黑货。

《吕氏春秋》表面上标榜对各家学说兼收并蓄，实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兼采道家思想。儒家宣扬旧的奴隶制统治秩序动不得，道家则宣扬新的封建统治秩序的建立无必要和不可能。两者形式虽有不同，但实质都是为了维护正在没落中的奴隶主旧贵族的统治。《吕氏春秋》是各种奴隶主阶级思想的大杂烩，它鼓吹儒家的“仁”和“义”⑤⑥，又夹杂进无为而治之类的思想，根本目的是想倒退复古，恢复儒家所主张的奴隶制度。

秦始皇一登位，便面临着一场与以吕不韦为首的贵族奴隶主集团的严重斗争。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很自然地找到了韩非的法家思想作为反复辟的思想武器。韩非、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据记载，当秦始皇读了韩非的著作以后，曾经感叹地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⑤⑦秦始皇在亲政后的第二年，根据韩非“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⑤⑧的原则，实行“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⑤⑨的政策，罢了吕不韦的官。吕不韦罢官后，死不悔改，继续与六国旧贵族秘密串连，阴谋发动叛乱。事发后，于公元前二三年畏罪自杀。吕不韦这股势力的消灭，标志着秦国地主阶级统治得到了进一步

的巩固。此后只过了十几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就统一了全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这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巨大胜利，也是法家的思想的巨大胜利。它标志着中国从此结束了奴隶社会而进入了封建社会。

“焚书坑儒”的起因，是关于究竟坚持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复辟奴隶社会的分封制的论战。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根本问题。在这个事件中，代表贵族奴隶主利益的是那批坚持孔学的儒生。

在秦王朝建立以后，秦国奴隶主贵族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力量已经基本上垮台了。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由于大批儒生混进了政府机关和文化部门，还具有相当大的力量。根据历史记载：在朝廷中的博士七十人中，有不少人是儒者；在地方上的，著名的儒者就有孔鲋、张耳、陈余等人。这些人中的有一部分，对新制度极端不满，挑起了秦朝向何处去的新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首先跳出来的是丞相王绾。他站在贵族奴隶主的立场上，建议恢复分封制。廷尉李斯站在法家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开倒车，指出如果恢复分封制，诸侯“相攻击如仇讎”⑥①，必然会恢复到过去奴隶社会的分裂和混战局面。秦始皇总结了秦国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历史经验，赞同了李斯维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意见，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坚决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⑥②，同中央派出官吏进行统治，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

但是，被推翻的阶级是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贵族奴隶主通过秦王朝政权机构中的代理人，继续制造舆论，攻击郡县制。公元前二一三年，在咸阳宫的一次宴会上，博士淳于越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跳出来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⑥③，明目张胆地鼓吹复辟殷周时代的奴隶制。于是，重又在朝廷上掀起了一场新的大辩论。

在这场论争中，李斯坚决驳斥了儒家“以古非今”的理论，强调“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⑥④，开倒车是没有出路的。他还指出：“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⑥⑤，这是在制造复辟的舆论，应当实行镇压。他指出儒家以“私学”相标榜，“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⑥⑥，这样下去，势必会威胁地主阶级政权的巩固，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实行地主阶级对奴隶主阶级的专政。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下令没收“诗书百家之语”，不

准“道古以害今”，“别黑白而定一尊”⑥⑥，反动的奴隶主贵族在面临即将全部覆灭的情况下，进行了垂死的挣扎活动。以卢生、侯生为代表的儒生，竭力诽谤“法治”是“乐以刑杀为威”，攻击中央集权是秦始皇“刚戾自用”，“贪于权势”⑥⑦，到处煽风点火，造谣惑众。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对这些从事奴隶制复辟活动的反动儒生实行了镇压，在咸阳“坑”了四百六十个儒生。

国家机器从来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焚书坑儒”是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当时新建立的政权所必须采取的专政措施。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早在秦孝公当政的时候，商鞅为了巩固变法的成果，就曾提出过“燔诗书而明法令”⑥⑧的主张。法家韩非在同儒家的辩论中，更提出了“散其党”⑥⑨的主张。但是，秦始皇以前的历代国君，由于当时斗争的重点在于政治、经济领域，思想领域内的矛盾和斗争不如秦始皇时候那样地尖锐、突出，因此，没有对儒家思想从法律上采取坚决镇压的措施。秦始皇的实行“焚书坑儒”政策，是在总结了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多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经验后，才逐步认识到了“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⑦⑩的道理。

由上可知，“焚书坑儒”事件的爆发，并不是由于秦始皇的天性“残暴”，而是当时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秦始皇“好文过于余主”，并不是“必以文学为戮”。在秦朝的七十个博士中，单是在史书上有记载的就有八人未曾被坑，其中有的人虽持有不同的政见，但由于没有在背后搞阴谋活动，照样可以“优游论箸”⑦⑪。

但是，那些顽固坚持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的儒生与一般儒生不同，他们在地下刮阴风、点阴火，对新的封建政权采取了极端敌视的态度，是儒生中的极右分子。如果不对他们实行严厉的镇压，就不能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国家政权，从而引起整个中国向奴隶社会的大倒退。因此，“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在贵族奴隶主进攻面前被迫采取的阶级自卫措施，是历史上一次推护新的生产关系的革命行动。中国历史上的进步思想家大都对这个革命行动采取了欢呼的态度。唐代的大诗人李白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⑦⑫明代的儒家叛逆者李贽歌颂秦始皇是“千古一帝”⑦⑬。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则直率地认为秦

始皇“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腑”，“不妄诛一吏”；如果秦朝继任者得人，“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⑦④。而历代的反动派，直到刘少奇、林彪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代理人，都是咒骂秦始皇和吹捧儒家的。历史的事实说明了如何评价秦始皇、如何评价孔子，始终是思想领域中一场长期的阶级斗争。

### 三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2)(3)）地主阶级统治者从尊法反儒转化为尊儒反法，是同毛主席指出的这个地主阶级从革命者变成反动派，从先进者变成落后者的历史转变过程相适应的。

秦王朝是历史上地主阶级建立的第一个王朝。这个剥削阶级在当时刚取得政权不久，由于缺乏统治的经验，激化了它同农民的阶级矛盾。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最后终于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农民大起义，推动了历史前进，显示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伟大力量。这种情况，正如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所指出的：“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汉王朝在建立的过程中，也曾经继续发生过究竟是坚持前进的封建制还是倒退回落后的奴隶制的争论。儒生酈食其就曾经劝刘邦实行分封制，甚至连分封诸侯的印也都刻好了。但在张良的劝阻下，刘邦终于醒悟过来，认识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气愤地骂酈食其说：“竖儒，几败而公事！”⑦⑤

秦朝的制度为汉朝所继承下来了。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吴楚七国之乱被镇压下去了。奴隶制复辟的严重时刻过去了，一开始就存在的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上升到了主要的地位。这时的地主阶级，逐步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失去了当年作为一个进步阶级的生气勃勃的革命性格。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虚伪的

保守的劝人安分守己的儒家思想，比起直率地宣传地主阶级专政、提倡变革的法家思想来，要更有利于封建统治。于是，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局面。从此，经过改造了的儒家学说转而为地主阶级新主子服务，孔学成了以后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综观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可以看到，一种社会制度代替另一种社会制度，要经过曲折的道路，其间充满着流血和牺牲，还可能出现暂时的倒退和局部的复辟。但是，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要抗拒的，新的社会制度终究要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秦始皇虽然早已死了，但他的制度在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唐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柳宗元说：“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sup>⑦⑥</sup>明代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夫之指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sup>⑦⑦</sup>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历史的前进！今天，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并正在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同样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研究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使我们更加坚信这个真理。秦始皇尽管遭到古今中外反动派包括苏修、林彪之流的谩骂，但自有其历史的功绩。他是厚今薄古的专家，是法家思想的彻底的有成效的实践者，是建立和维护中国统一的地主阶级政治家。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注：

① 贾谊：《过秦论》，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后汉书·班彪列传》

③⑥⑧ 《韩非子·和氏》

④ 《汉书·贾谊传》注：“跖，秦大盗也。”

⑤ 《史记·六国年表》

⑥⑨⑩②④ 《史记·秦本纪》

⑦⑥①⑥②⑥③⑥④⑥⑤⑥⑥⑦ 《史记·秦始皇本纪》

- ⑧ 《商君书·更法》
- ①① 韩愈：《石鼓歌》
- ①② 《列子·说符》
- ①③①④①⑤①⑥①⑦①⑧②①②⑤②⑧④⑧ 《史记·商君列传》
- ①⑨ 《商君书·农战》
- ②② 《盐铁论·非鞅》
- ②③ 刘向：《新序》，见《史记·商君列传》“集解”
- ②⑥ 《战国策·秦策（一）》
- ②⑦ 章太炎：《q i ú④书·商鞅》
- ②⑨ 《史记·穰侯列传》
- ③①③⑤④④④⑦④⑨⑤①⑤③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 ③① 《战国策·魏策（三）》
- ③② 《孟子·梁惠王下》
- ③③④① 《孟子·离娄上》
- ③④ 《孟子·告子下》
- ③⑥ 《通典·食货（一）》
- ③⑦③⑨ 《孟子·滕文公上》
- ③⑧ 《通典·选举（一）》
- ④① 《韩非子·定法》
- ④②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
- ④③ 《华阳国志·蜀志》
- ④⑤ 《荀子·儒效》
- ④⑥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 ⑤② 《史记·李斯列传》
- ⑤④ 《史记·吕不韦列传》
- ⑤⑤ 《吕氏春秋》卷十四
- ⑤⑥ 《史氏春秋》卷二十一、十九
- ⑤⑦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 ⑤⑧ 《韩非子·有度》

- ⑤⑨ 《韩非子·显学》
- ⑥⑨ 《韩非子·诡使》
- ⑦〇⑦① 章太炎：《秦献记》
- ⑦② 李白：诗《秦王扫六合》
- ⑦③ 李贽：《藏书·卷二目录》
- ⑦④ 章太炎：《秦政记》
- ⑦⑤ 《史记·留侯世家》
- ⑦⑥ 柳宗元：《封建论》
- ⑦⑦ 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亻 加廖去广

@②原字卜 加灌去彡

@③原字门外加二

@④原字九加言（半包围）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第十一期；转载于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发表劲云戈的文章：《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孔子死去已经有二千四百多年了。但是，历代反动派、北洋军阀、蒋介石反动派，都捧他为“圣人”。党内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是尊孔的。五四运动时期曾经批判过尊孔思想的陈独秀，当他搞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以后，就叫嚣要“重新评定”孔子的“价值”，说什么孔子的“价值”在于“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吹捧孔孟是“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瞿秋白曾经搞过“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当他向蒋介石屈膝投降写《多余的话》时，就承认他自己“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有“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王明、刘少奇都是尊孔的。彭德怀也不绝口地宣扬孔子的“忠恕之道”。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野心家、阴谋家，在背地里装模作样地谈论“忠恕”和“仁义”，甚至在阴谋炮制反革命政变计划时也不忘写上一句“不成功便成仁”。他们是信古好古、装潢门面吗？不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是“以昨天



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他们抬出孔子的亡灵，借用孔子的名字、口号、语言和服装，是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

孔子是没落的贵族奴隶主的后代，生活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末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的理论和实践，是为了阻止奴隶制度的崩溃和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反动统治，妄图把社会拉向后退。现在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我国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革命，竭力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妄图把当代的中国社会拉向后退。因此，他们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就是很自然的了。

#### （一）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目标就是“复礼”。他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所谓“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贵族奴隶主阶级统治的一套政治制度和秩序。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制度已经出现以后，孔子以复辟西周贵族奴隶制度为自己的政治纲领，这无疑是反动的。孔子施行“仁”的方法是“忠恕”，而“仁”的标准和限度则是“中庸”。所谓“忠恕”，孔子曾简单地解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所谓“中庸”，就是不要“过”和“不及”。孔子对“仁”，还有“爱人”、“泛爱众”等欺骗性解释，来掩盖其爱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本质。孔子的这些反动论调，适应了隐藏在我们党内的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需要，被他们吸收和发挥为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他们用以破坏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在这方面，王明是突出的一个。

叛徒、卖国贼王明，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是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对孔子思想不进行阶

级分析，反而跟在蒋介石屁股后边宣扬“孔孟之道”是什么“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他胡说孔子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这种用剥削阶级的思想、传统、道德来冒充全民族的思想、传统、道德，正是孔子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和搞阶级调和的反动伎俩。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和搞阶级调和，在政治上必然走上投降主义道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王明竭力抹煞阶级矛盾和否认阶级斗争，反对划分左、中、右，混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阶级界限，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回到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去。积极推行王明路线的彭德怀，很懂得王明这一套的来路，他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却跳出来大讲孔子的“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彭德怀鼓吹这一套，就是不准中国人民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不准革命人民起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明奉苏修主义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华旨意，配合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活动，又重新祭起“尊孔”的破旗。他恶毒咒骂秦始皇镇压奴隶主复辟的“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充分表现了他仇恨一切进步措施的反动立场。

## （二）

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唯心论的先验论者。孔子要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反动统治，主张从“克己”做起，即要奴隶主们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多少克制一下自己的欲望和行为。他又很相信“天命”，认为人的一切都是“天”赋予的。因此，孔子和他的学派特别强调“修养”和内省的工夫，即所谓“慎独”。他们要人们不去接触外界，只要关门修养就能使人从心灵深处体验出“天”所赋予的先验的知识和德性。这完全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一套。为了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以适应地主资产阶级阻止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叛徒刘少奇把孔子及其学派的“修养”，搬到共产党内来。

刘少奇也是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早年被捕叛变，捧着反动军阀赏赐给他的“四书”，从敌人狗洞里钻出来又重新混进党内。他早就是一个尊孔派。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鼓吹说：“孔子思想在当时是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的，到今天还有其合理的因素”，“对我们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有用”，“应该充分利用它”。刘少奇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把反动说成“进步”。他所指的所谓“合理因素”和“有用”的部分，并且要加以“利用”的，就是孔子及其学派的唯心主义的“修养”。一九三九年第一次出版的黑《修养》，就是刘少奇利用孔子思想破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杰作”。在这本黑书里，刘少奇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而是大量引用孔子及其门徒关于“修养”方面的话，号召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向这些复辟奴隶制度的“圣贤”学习唯心主义的“修养”经。他要求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讲孔子的“忠恕之道”，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着想，体贴人家，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在刘少奇看来，“逆来顺受”才算得上实行了孔子的“忠恕之道”，才算有了“修养”。在黑《修养》中，刘少奇妄图利用孔子思想，按照他自己对待敌人屈膝投降的叛徒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员。他妄想否定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深刻阐明的唯物论的反映论，把毛主席所培育的斗争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成为实行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的机会主义政党，从而破坏中国的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奇又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主张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要把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统统交给国民党，实行所谓“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刘少奇要我们放弃武装斗争，就是妄图把我们党改造成象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那样只进行“议会”斗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把我们的党员改造成象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的不搞革命战争、不要武装夺取政权的“议会迷”。

一九四九年，我国无产阶级政权即将在全国建立的时候，刘少奇又一次修改出版了他的黑《修养》。一九六二年，我国处于暂时经济困难特别需要加强无产阶级

专政的时候，刘少奇再一次修改出版了他的黑《修养》。在这两个版本里，刘少奇继续发挥其尊孔思想，而在谈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权和为将来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问题时，却连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也没有用。在引用列宁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两段语录中，刘少奇也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及有关对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论述，都有意地删去了。对照他的另一些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行，其反对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用心，就一目了然。一九六二年，在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支持下，召开了一次疯狂吹捧孔子的黑会，竭力煽动尊孔的黑风。刘少奇在天津对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群众说，“要象孔夫子那样讲恕道”。他还要革命人民“要有很大的气量去容忍一切无理的事情，不要斤斤在意气上计较”。这实质上就是不许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是什么没有“气量”啦，什么在“意气上计较”啦，就是没有象孔夫子那样讲“恕道”了。总之，刘少奇就是要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孔子的所谓“仁政”，彻底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黑《修养》的要害。

孔子有抹煞阶级矛盾和否认阶级斗争的“忠恕之道”，刘少奇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党内和平论”；孔子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主张，刘少奇就有“驯服工具论”和“群众落后论”；孔子有“学而优则仕”的谬论，刘少奇就有“入党做官论”和“公私溶化论”。

很难怪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刘少奇在他的黑《修养》中“杰出地完成了”把孔孟思想“重新塑造为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任务”。刘少奇就是妄图利用孔子思想腐蚀和毒害我们的党员，使我们党员越“养”越“修”，使我们马列主义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从而使整个党和国家都改变颜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叛徒集团，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黑《修养》，批判了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沉重打击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罪恶企图。

(三)

孔子言必称周公、文王，说他们是天生的“圣人”，是“生而知之”的特殊天才，非常崇拜他们。至于他自己，有时虽然也说是“学而知之”者，但实际上他标榜自己也是象周公、文王那样的“天才”。他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孔子梦想把当时社会拉回到西周天子的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中去，造成他所谓的“天下有道”的政治局面，“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论语·季氏》）这就是要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到承天命的奴隶主贵族的总头目手中。他又特别强调贵族奴隶主的等级制度，严格划分治人的“君子”和治于人的“小人”、“上知”和“下愚”的界限。为了造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即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统治，孔子大力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维护奴隶制度的人，形成一个以复辟奴隶制度为宗旨的学派或集团，并亲自率领他们周游列国，到处兜售他的反动政治主张，寻找一个可以把它付诸实践的机会，甚至支持并准备亲自参加被他视为有利于复辟奴隶制度和打击新兴地主势力的地方叛乱。由于孔子这种对抗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行径，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只能到处碰壁。当时就有人批判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孔子的这些反动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后来被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地主阶级吸收和发展为封建帝王的“天人合一”、“王权天授”的反动政治理论。

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也是尊孔派。他吹捧孔子的反动政治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疯狂地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正义措施，而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派辩护。林彪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是来自孔子的“生而知之”、“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反动谬论。林彪混进革命队伍以后，顽固地坚持剥削阶级世界观，在革命的重要关头，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当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林彪同刘少奇一样，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效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在背地里攻击我们对被赶下台的反动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讲“忠恕”，是“做绝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驳斥主张对敌人施“仁政”的孔孟之徒时指出：“‘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坚持了毛主席这一条原则，才保证

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林彪的咒骂，只是暴露出他自己是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代理人。

林彪继承了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衣钵，大力宣扬从周朝以来的几千年的政变史，蓄谋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方法，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建立一个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林彪按照孔子唯心论的先验论，把他自己和他的儿子，打扮成什么“超天才”。他和他的死党利用各种形式“大树特树”林家父子的“绝对权威”，为建立林家父子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大造反革命舆论。林彪还网罗了一小撮反革命死党，结成一个阴谋集团，并建立武装特务组织。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林彪的指使下，这一小撮反革命死党又炮制了一个《“571工程”纪要》，精心策划了一个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的反革命武装政变。但是，林彪同历史上一切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一样，在人民群众中极其孤立，因而他们的阴谋计划必然遭到彻底失败。他们叫喊“不成功便成仁”，实际上是夜过坟场吹口哨，给自己几个死党壮胆，作垂死的挣扎罢了。林彪反党集团永远也“成”不了“仁”，请出孔子的亡灵和主义，也无法挽救他们彻底败亡的命运，就因为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子的倒行逆施一样，都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

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在我们党内企图借用孔子的亡灵来达到破坏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这更加清楚地说明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们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把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第十一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日，中央对外联络部长的耿飊在部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听说总理一次看到《光明日报》送审的清样时说，看来批孔文章太集中了。中央还没有正式文件，批孔搞一、二、三次就可以了。”

（耿飏在中联部核心小组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73年11月3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过几天没有空，无法开会。

传达主席指示，分两步。第一步按规定范围，第二步，中央正在搞个通知，传达到县团。编辑小组全体可以听，其他部门斟酌决定。以后中央通知发下来，照办。

主席讲话要全印一下，看看主席同意不同意。文字上有个本本。

下期，有几个问题，要抓起来。

一、抓大事文章，要改出来。现比较一般，思想没有和当前联系，不很领会精神，主要讲抓大事和反修防修，贯彻基本路线的关系，一般领导方法上的问题少讲。

二、学《哥达纲领批判》要有一篇，主席强调学这本书。过去找黑龙江写批判国富民强，写得不好，没有充分体现精神。这篇著作讲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政治经济学，工人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主席说，资本论第一部分难懂，可以先读《哥达纲领批判》，有人不懂劳动不是创造一切财富的源泉。还有给白拉克的信，讲不同派别联合时，马克思主义者应坚持的原则。一篇讲不完，你们研究，以正文为主，包括有马恩的信，要有一点文章。

三、红楼梦问题，主席讲过多次。发过一篇，一般可以，不算出色。你们议一下。主席要许世友同志看五遍。我们看几遍？“红”看五遍，马列应看多少遍？评“红”还需要有文章，最近看，没有很深刻的。

水浒也总要写文章，上次看一篇《李逵论》。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招安，是两条路线斗争妥协的结果，是内部斗争。前半部斗争，是逼上梁山还是妥协投降？革命路线胜利。后半部是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错误路线胜利，革命失败，最后被搞死。主要是“红”。看有无好文章。

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请部队写一篇扎实文章，发扬光荣传统。主要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第五。从建军路线、建军思想来谈，谈社会主义时期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重要性。各地传达，主席亲自指挥唱歌。要写得扎实一点。

五、批林整风，如何深入一步？社论提出主要从反修、防修教育，从这个角度深入。各地都有讨论。就近组织北京写，便于修改。反修防修写得好较困难，思考一下，研究实际材料，党校不行，省市写。

六、批孔，写进社论。已经搞的，留下一篇孔府，还有王荆公年谱一篇。批孔，苏修也叫，国民党叫得厉害，蒋介石新年文告有一半内容讲这个，反对批孔，如挖了他的祖坟，洪水滔天。国民党精神虚弱极了，不得了了，大叫大喊，说我们几十年搞批孔，五四从批孔起来。

辽宁一篇下期出来（讲打仗的）。

上海一篇批人性论。

蒋介石一上台就捧孔。搞一点杂文，不要正式文章，批他，把资料排比可以。

自写一篇。

其他经验典型继续搞。

教育有一组发不出去，好几篇何时发才好。

其他根据主席指示，讨论，贯彻进去。

计划可以报告给我，不要等批。先办。

《红楼梦》主席叫军队同志读五遍，中国古典小说最好的是《红楼梦》。吊膀子是现象，本质是政治斗争，真事隐去，不好讲，恋爱是现象。过去评“红”文章多讲宝黛爱情反封建。争夺厨房，上次请你们读 59、60 回，主席提的。只有从阶级分析观点去看，否则看不出来，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处理阶级关系去看，才能看得懂。我也看，以后可以吹吹。不是吊膀子的书。

（讲抓典型）主要强调对立统一规律，看工厂，看好的，中等的，坏的，比较中才能发现问题。光看坏的，漆黑一团，光看好的，就没有矛盾了。抓典型，从对立统一强调。大家反映走后门厉害，主席讲，有贪污才有廉洁，没有贪污就没有廉洁。

孟增林的文章怕话讲得绝对，要留有余地。你们看看。

抓大事这篇文章山西不一定写得出来。要结合批林整风，又不具体讲。总要结合那些大事，非抓紧不可，讲学习，批林整风，路线，政策，政治局议政，军委议军，也要议政。编辑部要议政、军、文议了才有题目，抓得准。



稿子发现有问題，改就是了。我抓重点，大的路线政策不要错，具体的错了，改就是了。措词错了再改。以后多负点责任。更正下次再说。

上海小评论改了几处。我们不搞奖励，但话不说死，不讲思想政治工作，抓不起纲来。这里只讲工人，农民也有不同。主席一贯关心工人生活的，注意群众生活问题说一两句。

注释可以不要。

小评论稿，上次讨论看到的，他们举例，大庆大寨开始苦得很，靠政治工作。但不把话说得没有余地，当然，我们社论不会提倡的，奖金也五花八门。

自然科学稿继续改，用不用再说。

传达通知下来，编辑组可以听，行政部门那些听商量决定。

北大清华一文，迟群看过没有？精神还可以。整一下八大学院什么时候搞（指出题目考教授）？不一定做得出来。

你们这期搞完，明后天目录登出来，付印后你们先办，讨论，不等批先办，批回又要等几天。

## 二、研究资料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

2010年1月4日初稿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九册（9）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九章 召开十大

#### 第九节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你（指叶剑英）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

他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几个大军区，政治委员不起作用，司令员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几年了，主要问题是军区司令员互相调动，政治委员不走。”

他提议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他接着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

他又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军委不议军，政治局不议政，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我无非是开个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在政治局。”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讲话记录，1973年12月12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政治局成员转到人民大会堂，在周恩来主持下继续开会。

会议一致同意邓小平列席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并作为政治局成员将提到十届二中全会批准。同时，同意邓小平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同意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3年12月14日。） 从这时起连续四天，毛泽东都开会或找有关负责人谈话，范围一步步扩大，谈的都是这些问题。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与政治局几个人谈话。

毛泽东一开头就问：“你们议了一些什么，行得通吗。”

接着说：“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调动，又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嘛，照样革命嘛，换个地方革命嘛。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不议政，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

（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3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毛泽东找政治局有关同志再谈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问题。

他在这次谈话中两次提议大家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他说：“大军区司令员调动，你们商量了吗？看有没有这个必要？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做久了，就不太好了。调动也有问题。比如，‘辽联’、‘八三一’（辽宁省的两派群众组织。——引者注）就会批你（指陈锡联。——引者注），那也不要紧。……各省都要做工作，分两派的地方要打一点招呼。我看呢，要招呼各地的政治委员，要欢迎呢。机关干部，找来一二百人，不要太多，军事机关。总之要欢迎。” 他又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了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引者注）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至于德生同志走了，还兼不兼总政治部，我说，不要兼了吧！”

（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4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同政治局有关同志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

他一开始就说：“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也不太好。要革命，哪个地方都可以革命嘛。”

他说：“从一个地方一走，有一派就要贴大字报。这个事情要好好研究。你要贴，何必贴得那么早呢？” “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动不动就说人家

是‘三反分子’、‘五一六’。真是三反分子也不要紧么，让他去吧，人民会管他们的，有什么要紧。犯点错误，改掉就好。” “互相对调，这个办法就是河南人发起的。这个军分区呆不了，就调得远一点去，那个军分区就欢迎。那个军分区调到这里也欢迎。”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他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 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他说：“现在好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你们那个青年时期，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相信。”

最后，他说：“要准备打仗！”

（毛泽东同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记录，1973年12月15日。）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

共四十三人，花了一小时二十分钟。

他先同到会人一一握手，

毛泽东对韦国清（中央军委委员、广州军区政委）说：“老朋友，你不是韦国清吧！样子变了嘛，胖了嘛。你要多帮助许世友同志。他到那里，人生地不熟啊！”

毛泽东对秦基伟（成都军区司令员）说：“你刚到四川吧，所以你不能调呢，刚到的人都不认识。”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身体还好吗？你是好人啊。”

毛泽东对聂荣臻说：“荣臻同志，你是好人啊！”

毛泽东对朱德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还不是红了吗？” 他说：“你陈（锡联）司令，济南的杨得志同志，南京的许世友同志，这几个同志呢，在一个地方搞得很久了。这个李德生同志、曾思玉同志、丁盛同志倒是搞得不那么久呢！你们带个

头呢。省军区、军分区、人武部就会照样去做。”“到一个新地方有很多困难呢，不熟人，不熟地方，不熟党，不熟军，党政军民都不熟。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许世友：有党，有同志们，可以学习。）慢慢来，就会顺手。”“你们呢，要交好班呢。有困难啊，人生地不熟。有些人就批你们。大多数呢，舍不得你们走呢。

他对韩先楚说：我不是跟你讲过嘛，这个世界上这类事啊，心放宽些，胆子壮些。心要宽，胆要大。无非是做官嘛，革命嘛，一个不撤，一个不批吧！你们想一想，总是有些缺点，十个指头有一个指头的缺点。一切错误都是我。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所以屡次想辞掉这个主席。八大我还设了一个名誉主席，就是为着我想当个名誉主席，让别人当主席。”

他对许世友说：“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吗？（许世友：看了，自从上次主席批评我，就全部都看了一遍。）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许世友：那没有看那么多，我还刚看一遍呢。一定坚持看下去。）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你就只讲打仗。（许世友：主席讲的这个话，确实打中要害。）你这个人以后搞点文学吧。‘随陆无武，绛灌无文。’汉书里边有汉高祖和陆贾的传，那里边说的：‘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许世友：应该搞点文。）你能够看《红楼梦》，看得懂吗？（许世友：大体可以。）要看五遍。（许世友：坚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指许世友）这个人也是厚重少文。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不怕啊！你就作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吧！”

毛泽东说：“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第七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

他对朱德说：“朱毛啊！你是朱（猪），我是朱（猪）身上的毛啊！”

他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

呢。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Self criticism, 自我批评。” 他对朱德说：“红司令，现在没有人骂你了吧！（朱德：没有了。）那好些了。这位同志跟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朱德：四十年了。）我跟你，四十年了。”

他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些人有些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姓邓，名小平。” 周恩来看会见的时间很久了，说：“唱个歌吧！”

毛泽东说：“就散了啊！”

这时，由李志民（福州军区政委）指挥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了第一段。

毛泽东说：“不错，就是这一条要紧。还有八项注意，第一注意，第五注意。第一项注意，说话要和气，第五项注意，是军阀作风不要呢！”

他又亲自指挥大家唱完了这首歌，宣布：“散会。”

（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21日。）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意见，几天来，周恩来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确定贯彻实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即日起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和中央军委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两份文件。

## 二、研究资料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

2010年1月18日初稿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十册（1）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十章 批林批孔

##### 第一节 新阶段新任务

###### 本节资料

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元旦献词》

战斗的一九七三年过去了。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我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地跨进了一九七四年。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战斗的一年。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祖国大地欣欣向荣。

我们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掀起了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的热潮。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政治上、理论上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教育战线出现了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群众性的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发展壮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茁壮成长。我们党更加朝气蓬勃，我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我们的军队更加坚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我国人民意气风发，为革命大干苦干，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二年增长百分之八以上。农业连续十二年丰收。粮、棉、麻、糖、烟的产量达到了新的水平。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钢、钢材、有色金属、原油、电力、木材、机械等重工业产品，棉纱、棉布、化学纤维等轻工业产品，化肥、农药、农机等支农产品，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基本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交通运输日益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对外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的信誉越来越高。科学技术获得了新的成果。

国际上同样是一片大好形势。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世界局势的发展，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对国际形势所作的一系列科学论断的正确性。过去的一年，苏修美帝争夺世界霸权愈演愈烈，整个世界很不安宁。欧洲是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了扩张各自的势力范围和争夺中东石油，搞得剑拔弩张，促使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更加激化，加深了世界大动荡的局面。苏修散布的所谓国际局势“和缓”的谎言，已为无情的事实所粉碎。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世界人民日益觉醒，阔步前进。越南和老挝人民抗美救国战争赢得了重大胜利。柬埔寨爱国军民战果辉煌。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事业取得新的成就。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抗击以色列侵略者的战争，冲破长期以来超级大国在中东制造的“不战不和”的局面，对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三世界更加壮大，更加团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衰败没落，危机重重。美帝国主义内外交困，日子很不好过。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搞声东击西，野心很大，力量不够，它到处伸手，到处碰壁，面目更加暴露。它在世界上已经是声名狼藉，处境越来越孤立。

过去的一年，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了新的胜利。我国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战斗团结日益加强。我国已同九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锻炼了群众，教育了干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我们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说明这场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我们一定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贯彻十大精神，抓紧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原则，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更大的胜利。



首先，要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林彪路线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个反党集团的斗争，都是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我们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要重温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在批林整风中，要认真看书学习。要坚持学好中央规定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继续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是我们应当反复学习的。还要努力读一点历史和小说。马列主义弄通了，路线才能搞对头，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坚持反潮流这个马列主义的原则，识别和抵制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

要继续搞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战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任务。毛主席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我们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指导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搞好斗、批、改，把教育卫生革命、文艺革命等进行到底。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批判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要继续执行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今年是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关键性的一年。我们要抓紧有利时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坚持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下去。这样，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我国工农业增产的潜力很大，只要我们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群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因素，就一定能够使国民经济有更大的发展。我们要以各项工作的优异成绩来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委要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大事要多讨论，讨论才能引起大家注意。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搞修正主义。我们要深刻领会十大文件强调抓大事的重要意义，提高抓大事的自觉性。各级领导机构都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认真注意培养革命接班人。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坚持真理，纠正错误。要加强调查研究，分析各阶级的状况，抓好典型。共产党员要执行党的纪律和党章的各项规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认真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要把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真正落实到各个基层。

毛主席缔造和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人民解放军要继续学习和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加强建设，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不断提高战斗力。要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要加强民兵建设，特别是城市和边疆民兵的建设，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和解放台湾。解放台湾是包括台湾省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神圣义务。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让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完成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四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一日，元旦社论）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 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 正在各个方面展开。

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 都是尊孔派。半个世纪以来,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 同中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 反复地批判孔学, 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 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 尊孔反法, 攻击秦始皇, 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 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 坚持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林彪这个政治骗子, 不读书, 不看报, 不看文件, 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他在见不得人的阴暗的角落里, 在他的死党中间, 甚至在公开场合, 狂热地鼓吹孔孟之道, 并且题在壁上, 记在日记上, 当作“座右铭”。为什么他拚命鼓吹孔孟之道呢? 就是因为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是一致的, 都要复辟旧制度, 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

孔孟提出了“克己复礼”这个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说什么“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 一旦这样做了, 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林彪在九大以后多次鼓吹“悠悠万事, 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 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孔孟鼓吹“生而知之”。说什么“如欲平治天下, 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也?” 林彪把反动的“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他自比天马, 以“至贵”、超人自居, 狂叫“天马行空, 独往独来”, 阴谋篡党夺权, 妄图实行独裁统治。

孔孟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林彪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 污蔑劳动人民只会说“恭喜发财”, 只能想“油盐酱醋柴”。

孔孟宣扬“德”、“仁义”、“忠恕”。林彪叫嚣“恃德者昌, 恃力者亡”, 用儒家的语言, 恶毒攻击革命暴力, 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孔孟鼓吹“中庸之道”。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孔孟鼓吹“以屈求伸”的处世哲学。林彪说他是“勉从虎穴暂栖身”，“随机应变信如神”，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使用的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

孔孟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林彪攻击“五·七”道路，污蔑干部下放劳动“等于变相失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妄图破坏毛主席制定的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

孔孟之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林彪教子尊孔读经，还把奴隶主头子周文王临死前对武王传授的统治经验，作为“教子经”抄录给他的儿子，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凡此种种，都证明批孔确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是为了更好的批林。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对封、资、修的宣战，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

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要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搞武的要学文，搞经济基础的要懂得上层建筑。要害问题是批不批。要批，就能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知难而进。

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著作和指示，带头批林批孔。要发动群众，把孔孟的反动论点同林彪的反动谬论和反革命罪行加以对照，逐条地批。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忱地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要通过批林批孔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要深入基层，进行试点，训练骨干，抓好典型。要经常研究批林批孔斗争的新动向，要严

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广大工农兵是批林批孔主力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最敢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批林批孔最内行。“孔子要复礼，林彪要复辟，两人一样的。”这话说得多好啊！工农兵用生动的语言，一语击中林彪鼓吹孔孟之道的要害。工农兵起来了，批林批孔才能批深批透。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努力改造世界观。一些受孔孟之道毒害较深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斗争中进行自我教育，工农兵对他们的进步是欢迎的。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我们要发扬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迎着风浪前进，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批林批孔 搞好春耕》

在批林批孔运动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国亿万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国营农场广大职工，迎来了春耕生产的大忙季节。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失时机地搞好春耕，是当前农村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这对于我们在农业连续十二年丰收的基础上，夺取新的丰收，对于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批林批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随着这个运动的深入发展，我国几亿农民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必将进一步提高，革命精神必将进一步发扬。

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就能更坚决地贯彻执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反对资本主义复辟，进一步解决发展农业的方向、道路问题，巩固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批判了林彪鼓吹的“生而知之”的天才论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学到了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就能使干部看到群众的力量，使群众看到自己的力量，更好地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发扬敢于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的

革命精神，不断总结经验，掌握客观规律，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批判林彪贩卖的“中庸之道”，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就能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折衷主义。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要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使批林批孔成为推动春耕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强大动力。当前，全国农业生产形势很好。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积累了很多抗灾夺丰收的经验。全国粮食亩产上《纲要》的县（市），已经增加到六百多个。去冬今春的农田基本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只要我们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纲，充分运用这些有利条件，就一定能够打好春耕这一仗。

领导干部要到基层、到斗争的第一线去，抓革命，促生产。凡是到农村工作的干部，都要和贫下中农一起，带头批林批孔，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要深入调查研究，抓好典型，以点带面。要坚持“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协助生产队按照国家计划，合理安排作物的布局。要预见到可能出现的自然灾害，做好充分准备，切不可掉以轻心。要继续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是农村革命和生产的一支重要力量，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要动员和组织各行各业及时支援春耕生产。要提高革命警惕，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的阴谋活动。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我们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把群众中的这种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搞好春耕生产，夺取农业战线的新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社论）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抓批林批孔 促工业生产》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各条战线上健康地、胜利地发展着，革命和生产的形势都非常好。工业交通战线上的形势也是一派大好。

广大工人阶级，以主力军的战斗姿态，集中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批判“中庸之道”和“上智下愚”等反动观点，深刻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进一步认清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革命团结大大增强。在批林批孔带动下，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蓬勃开展，出现了革命迅猛发展，生产持续上升的大好局面。今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又有了新的增长。

形势很好。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同志，要始终站在运动的前列，放手发动群众，积极地引导群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努力发展大好形势。当前，工业交通战线批林批孔运动，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重要内容之一，同样是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这样，抓住了党的基本路线这个纲，就能更好地解决工业交通战线的具体路线和政策问题。在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中，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有关文件。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使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发展。要牢牢掌握批林批孔这个中心，防止纠缠于某些问题而转移斗争的大方向。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抓革命、促生产。工业交通企业要继续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破除崇洋迷外思想，高度重视群众的伟大创造力，支持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在技术革新和科学研究方面所作的努力。企业领导同志应当充分看到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高。要善于把这种积极性组织起来，把生产进一步促上去。

工业交通企业的各级领导同志，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统筹安排，分工负责，依靠广大工人群众，加强生产领导工作。要加强全局观念，努力增产节约，充分挖掘企业的内部潜力。要坚持业余闹革命。煤炭、冶金、交通运输等部门的同志们，要做抓革命、促生产的先锋。

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内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基础产生深刻影响，促进生产力大大发展。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是关键性的一年。让我们在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争取革命和生产双丰收！争取更大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社论）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四日，李先念华国锋对参加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的各省市负责人的讲话

〔地点：国务院会议厅。华国锋同志、余秋里、谷牧、袁宝华同志及有关负责同志接见参加国家计委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座谈会”的十五个省市主要负责人。〕

开始，先由谷牧同志汇报了这次座谈会议的情况。当谷牧同志谈到这次会议是根据先念同志批示召开的，计委给国务院的报告，洪文、小平、登奎、国锋同志都圈阅了的时候，先念同志说：“这次会议是中央政治局批准召开的，总理知道，主席也知道。我们要你们多开两天是为了等社论和 12 号文件。多留几天值得。”

当谷牧同志汇报到座谈会先务虚，后务实，以虚带实。会上有十一个省市发言，介绍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然后研究怎么把煤、钢、运促上去时，先念同志说：“车皮总是调度的不大合理。昨天晚上我在政治局讲了，津浦、京广两条干线不够畅通，只好把大同、开滦的煤绕道由大连上船运往上海。看起来不合理。但按目前情况，还是合理的。看起来不合经济核算，但总比在那里停着好。山西煤运不出去，可不可以把北京的汽车抽出几千辆去山西运煤，行不行？（谷牧同志说：公路上汽车已经排满了，现在主要靠火车运。准备用大型机车。交通部准备派两个工作组去济南、武汉。宝华同志说：还准备用内燃机车，



火车在徐州不停。)这个现象是暂时的，会很快改变。通过现象看本质，批林批孔运动的形势好的很”。

当谷牧同志谈到座谈会还用了半天时间议了一下轻工市场，昨天又把广交会的供应问题谈了一下。大家都表示要保证供应时，国锋同志说：广东猪肉供应紧张，解决了吗？先念同志对湖南孙国治同志说：你们湖南要支援广交会一下嘛！（孙：我们给家里打了电话）

当谷牧同志汇报到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回潮，很多问题牵涉到北京的一些部，特别是国家计委时，先念同志说：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回潮，主要来自中央部门，一机部长春会议就反映了这个问题。一机部来人了没有？请打电话找来。上海工人同志提的意见是对的，我也有责任。有的批评不那么准确，不要紧，基本精神是好的，应该欢迎。如果要求人家的批评一点出入都没有，那就不要人家批评就是了。大概秋里同志讲了一些错话（秋里同志说：我昨天下午做了检查发言，同志们批评好的很，很中肯。谷牧同志说：很多都是来自计委。如十条我们在计划会议上印发征求意见，中央批评后，我们收回来了，实际上这以前专业会议上，早就传下去了。）在怎样办好企业问题上，贯彻《鞍钢宪法》，依靠工人阶级，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党的领导，还没有解决好。

先念同志看天津市委书记孙健同志发言简报时，问：孙健你多大年纪了？（孙：38岁）那里人？（孙：保定人）天津市有个工厂规定心跳200次、血压>90、发烧40度，才给病假。还规定工人一天只能小便两次，每次不能超过十分钟。这不是管、卡、压吗？这是那里规定的？这个问题揭的好，让他自己（指厂领导）先执行好了。（孙：我们有责任）有的同志就是喜欢压工人，根本没有群众观点。制度还是要的，但要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提高工人觉悟，不能光靠你的那个制度。

先念同志说：有些省看来很乱，但乱不能怨群众，还是领导的问题。有的对群众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阶级敌人是有，斗争是复杂的，要按政策办事。

当谷牧同志谈到上海同志讲全局保重点，重点为全局时，先念同志说：全国要保重点，要保上海，上海不保怎么行呀！林彪反党集团就是攻上海。上海这样好的城市，工人阶级觉悟又高。供应全国，支援世界，就是要保。

当谷牧同志谈到大家学了《人民日报》社论及中央 12 号文件很满意时，先念同志说：12 号文件发到县团级，可以向广大群众传达。但不能张贴。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也要认真学习一天，不然你们回去被事务缠住没有时间学了。世界划分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震动。第三世界喜气洋洋，第二世界如法国一再声明赞成。甚至对东欧小修都会有影响的。连美国都表示坚决反对。苏修葛罗米柯的发言有气无力。因为真理不在他手里。小平同志的发言，主席有个批语：“好，赞同，毛泽东。”把法国、澳大利亚划到第二世界，他们感到很光荣。学这个发言和学习毛主席同布迈丁、卡翁达的谈话结合起来。要好好学习一学这篇发言。整篇都是讲的战略、方针、政策、策略问题，很重要。

先念同志说：你们这次来，机会很好，正好发表社论和中央 12 号文件，可以好好学习。12 号文件的基本精神是强调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批林批孔。第一段说，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不要认为不要这、不要那。这样可好了。不要借此压群众。不要光看第一段，主要在第三段。第二段讲，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要揪军代表。当然支左中有部分同志犯了这样那样错误，也不要揪回去。揪回去有什么好处。不是给光荣、伟大的解放军抹黑吗？有的部里就提出要这个回来，要那个回来。有的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部队各级党委和被批评的同志应当欢迎。在那个形势下，解放军起了伟大作用。当然，也有林彪的死党，那就不同了，要肯定三支两军的伟大成绩，要讲三支两军的伟大成绩。第三段说：应强调指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的，怎么理解？有人说：读古书困难，董仲舒和历代儒家代表人物，都把孔孟之道加以发展，成为系统的东西，读起来比较困难一点，不只是这样，主要是从政治上讲的。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孔老二要恢复奴隶制度，以后的封建制，同样用孔孟之道作为他们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12 号文件总的精神是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搞好批林批孔。党的领导就是要执行正确路线，你领导群众犯错误，大家不干。

国锋同志说：各级领导务必理解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站在运动的前列，放手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批林批孔。还是路线决定一切，要敢于领导，不能压群众、怕群众。不能同群众对立起来，要加强领导，就要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同群众站在一起，站在一个战壕里。有的地方闹经济主义总是不行吧。正确的不坚持，错误的去迎合，这不叫领导。

先念同志说：有个工厂有些人要求增加工资，去找党委书记，党委书记就带着他们去造劳资科的反。这怎么算党的领导？武汉有个银行，还是个很小的银行，他们对闹经济主义的就是不给开支，顶得好。中央打电话支持这个银行。你不合理，闹经济主义，就是不该发嘛！

先念同志说：加强党的领导，就要执行正确路线，执行正确的政策，人家本来不是反革命，你把他打成反革命，他怎么高兴？本来是反革命，你一风吹，这怎么行？有的一说加强党的领导，就不发动群众了，这也不对嘛！有极少数干部挑动群众斗群众，不批林、不批孔，又不联系实际，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个县委书记就是这种人，跑了四个月，每月拿工资，煽动经济主义妖风，北京就有他的联络站。还有一种情况，运动来了，干部病号特别多，有的运动一来就搁担子。本是病了应该住院，有的不是这种情况，温度 37℃，脉搏 70 到 80 就住院了。一个共产党员，这样行吗？我们老同志，如果检查身体，多少都有些病。要表扬那些好的同志。

国锋同志说：要表扬好的同志，好的干部是多数。青岛有些同志表现很好，象郑干同志就敢于领导，淄博矿干部表现也很好。枣庄有个魏庄煤矿领导干部一直坚持指挥生产，象这样的班子和干部要表扬，要提拔。他们能团结大多数，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对少数极端恶劣的要执行纪律。

先念同志说：搁担子的，群众批一下也应该。批林批孔运动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上贼船的，用江青同志话讲，要用一百二十吨的吊车往下吊。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要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十二号文件的精神就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要注意总结经验，不要搞串联，一搞串联，分成两派，就把林彪、孔老二放掉了。

国锋同志说：这个文件又把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讲话重申了一下，要讲团结，不要分成两派，有缺点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有一个同志到北京，乘公共汽车不买票，让他买，他说：“批林批孔还买票，那象个革命的样子。”他忘了要遵守革命纪律。

先念同志说：他认为“满街没有大字报，不象个革命的样子。”你们回去向党委汇报要把商业抓一下。现在城乡交流有点不畅，现在不是没有猪，没有鸡，主要是没有很好的抓，对人民生活也有影响。要沟通城乡关系，加强收购工作。你们管工业的也要管管商业，经济领域修正主义回潮，强调制度多了，制度还是要的，但问题是制度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不能搞管、卡、压，要靠群众自觉地执行。还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冶金部有个高扬文，他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对群众有刻骨仇恨，高扬文的材料可以每人发一本，有个按语，江青同志、文元同志看了，认为写的还可以。要学一学小平同志发言，关心国家大事。

商业市场问题已经讲了，农业也不错。但农村的资本主义倾向不可低估，极少数地区有人煽动农民进城。对银行正确的东西要支持，围攻银行不是一个地方，要说服群众。是不是群众自发干的？不是的，背后是有走资派支持的，还有阶级敌人破坏。唐钢家属工二百多人闹经济主义，到冶金部、中南海闹，查了一下是支部书记的老婆，还有几十个共产党员的老婆。我们就通知了河北省委，唐山市委连夜赶来。我说一定有后台，这个话说的厉害了些，共产党员动员老婆闹，不好嘛！这些人就回去了。一定要把坏人揭露出来，如果现在都搞临时工转正，附加工资等，就冲淡了批林批孔大方向。

大家回去把军工抓一抓。军工有个报告文字长一些，我签了，总理也批了。有个体制问题，要规定几条，军工生产今年下放下去，北京怎么样，上海一直是统一领导，要以地方为主来管。要在定型中研究先进技术，不能等你研究好了再来定型，部队拿不到的东西。造船工业要找交通部，六机部研究一下。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对进口的东西要审查，如造船工业我们有基础，可以搞，就不要进口运输船，要立足于国内，该进口的还要进口，为了抢时间，港口工程船要进口，把货单审查一下是必要的，港口堵塞，外轮老罚款，影响很不好。

国锋同志说：主席讲了，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山西陈永贵同志传达了，北京倪志福同志在中央发文件前也用自己的话讲了。主席还讲了，“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为什么主席提这个问题呢？是不是孔

孟的书，语言文字难懂呢？恐怕主席讲的不只是这个意思。历史上，一切反动派都是用孔孟之道麻痹人民，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先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来宋朝的朱熹又发展了一下，更系统了。到元朝把孔老二吹的更高了，到了清朝就加了“大成至圣先师”等头衔。后来连不读书的袁世凯、宋哲元、张宗昌等也都尊孔，蒋介石也是把孔子抬出来搞什么“新生活运动”，现在台湾还在祭孔。盖孔庙，不仅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利用孔孟之道统治人民，就是外国人侵略中国，也是用孔孟之道麻痹人民。日本要在中国建立什么“王道乐土”，就是如此。林彪搞“克己复礼”也是用孔孟之道作为他的反动思想武器，历史上一切反动派都是如此。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过去儒法两家一直斗争。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主席评价很高，毛主席一直是反孔的。在毛选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批孔。这篇文章点了戴季陶，戴就是尊孔的。第二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到“温良恭俭让”，讲到“四权”，这些都是批判孔孟之道的。主席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很多文章是批孔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也都提到批孔。我们应该认识到，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孔老二的流毒是很深、很广的。听说日本也有孔庙，他们也读过四书五经，朱熹把孔孟之道编成课本，读书必须读它。从上层领域里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来讲，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是不是这样理解，请同志们研究。

《红旗》短评提出，学、批、联三者要结合好。联系实际，查林彪死党的罪行活动，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都是对的。但是如何联，把批林批孔深入下去，还要努力。我们强调团结起来批林批孔，一搞串联，一分两派，对批林批孔就没有心思了。有人提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当时条件还不能全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有这个条件了，批孔是批林的关键，是挖林彪的根子，要好好理解。

中央十二号文件，总的精神就是加强党的领导，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各级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前列，大胆领导运动，如果压群众，捂盖子，就会犯错误。如果跟在群众后面跑，有人闹经济主义，人家一说增加工资，你说行，就领他们他到劳资科那里去，你非犯错误不可。

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对群众提的意见，要持欢迎态度，即要听群众的意见，纠正错误。又要坚持原则，大讲三支两军的成绩。这次运动的矛头，是指向林彪、孔老二，批的好，大家都有提高。不好好学习钻研，你的话就说不深，说不到点子上。比如“人之初，性本善”，如何用马列主义观点去理解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柳下跖骂孔老二骂得好，我们现在报纸上登了女大学生嫁给农民，本来是表扬的，有的同志提出为什么要写嫁给，这不是孔老二的男尊女卑吗？你写个女大学生和农民结婚不是很好吗？这也是孔老二的流毒。

我相信，通过批林批孔，一定会大大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同意并批转国家计委《关于 1974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

1974 年 4 月 22 日，中共中央基本同意并批转国家计委《关于 1974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19

73 年 7、8 月间，国家计委同有关部门一起研究，提出了 1974 年的计划设想。

1973 年 10 月，国家计委又会同各部委到各地征求省、市、自治区的意见，对计划作了调整和修改，但由于“批林批孔”的原因，全国计划会议迟迟不能召开。

为了不影响全年的生产建设工作，国家计委在安排了 1974 年前两个季度的生产之后，起草了这个报告。报告中拟订的 1974 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要求是：

工农业总产值 4210 亿元，比上年预计增长 7.1%。

其中工业总产值 3000 亿元，增长 8.3%；

农业总产值 1210 亿元，增长 4.3%；

粮食 5400 亿斤，比上年增长 1.9%；

棉花 5100 万到 5300 万担。比上年预计增长 1.6—5.6%；

钢 2700 万吨，增长 7.3%；

原煤 4.3 亿吨，增长 5.7%；

原油 6400 万吨，增长 19.4%；

发电量 1750 亿度，增长 6.3%；

化肥 2800 万到 3000 万吨；

棉纱 1150 万件，增长 6.3%；

铁路货运量 8.5 亿到 8.6 亿吨，增长 4.6—5.8%。

由国家预算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 300 亿元，其中财政拨款 281.6 亿元，动用库存 18.4 亿元，加上地方自筹、军事工程、人防工程、援外项目等，总规模为 370 亿元。

计划施工的大中型项目 1135 个，其中新建项目 50 个，主要是进口成套设备的 13 套化肥、3 套化纤、1 套乙烯装置、1 套 1.7 米轧机，投资总规模 170 亿元，其中 1974 年内安排 16 亿元。

计划建成投产大中型项目 250 个，单项工程 520 个。

社会商品供应量为 1115 亿元，比 1973 年供应量增加 37 亿元；

计划进出口总额为 130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1.4%。

国家财政收支计划各为 8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6%。1974 年拟实行“固定比例留成，超支另定分成”的财政管理体制，地方固定机动财力将达 18 亿元。

职工人数计划达到 5625 万人，比上年增加上 10 万人。计划年内精简职工 280 万人（包括自然减员），安排家居城镇的复员军人和大中专毕业生 60 万人；工资总额计划 357 亿元。

这个《报告》未经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便由中共中央批转执行。但是，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干扰，1974 年的大部分主要指标没有完成计划。

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的通知

上海市、江苏、湖南、河南、辽宁、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国务院各部委：国务院同意国务院科教组《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请你们本着增强民族团结，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社会主义

教育事业，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的精神，按照报告中提出的具体要求，切实做好支援西藏师资的选调工作，努力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国务院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关于内地支援西藏大、中、专师资问题意见的报告

国务院：

为了适应西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迅速发展的需要，帮助西藏人民发展教育事业，尽快地改变历史造成的文化基础比较薄弱的状况，对西藏要求支援八所中学和一所师范学院所需的师资，拟由国家机关选调干部帮助西藏两所中学所需的师资，其余六所中学和一所师范学院所需的师资，拟采取与卫生部门支援西藏医疗队同样的办法，由支援西藏卫生工作的六个省市，定区定校包干支援。经商得上海、江苏、湖南、河南、辽宁、四川六省市及国务院政工小组的同意，现将具体办法报告如下：

一、派出支援教师的任务：

- (1) 宣传毛泽东思想、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同西藏当地教师一起，搞好批林批孔和教育革命；
- (2) 担任一定的教学任务；
- (3) 负责培养提高当地师资，从根本上改变师资不足的状况。

二、派出支援教师的分工：

(1) 国家机关负责支援那曲地区和格尔木两所中学教师共九十名（每所中学所需师资四十五名，计：汉语文十四名、数学五名、物理四名、化学四名、政治四名、外语四名；历史、地理、音乐美术、体育各二至三名；下同）。由国务院政工小组组织分配。

(2) 上海市负责支援筹建西藏师范学院的教师，一九七四年二十七名（其中：数学八名、汉语文六名、物理四名、化学四名、体育五名；两年后轮换，下同）。一九七五年三十八名（其中：政教四名、数学八名、外语四名、汉语文六名；物理、历史、地理、音乐各四名）。一九七六年三十六名（其中：政教八名、数学八名；外语、化学、历史、地理、美术各四名）。并负责支援八一中学教师四十五名。

(3) 江苏省负责支援札木中学教师四十五名。



- (4) 四川省负责支援昌都地区中学教师四十五名。
- (5) 湖南省负责支援拉萨市中学教师四十五名。
- (6) 河南省负责支援山南地区中学教师四十五名。
- (7) 辽宁省负责支援日喀则地区中学教师四十五名。

### 三、派出支援教师的条件和工作年限：

(1) 派出教师必须政治思想好，政治历史清楚，具有一定的业务水平，身体健康，能适应高原地区，年龄最好在四十岁以下。

(2) 派出教师工作期限每期二年（路途往返时间除外），工作期间不探亲。由派出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进行轮换，轮换三期，共六年。在各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帮助下，西藏即可自行解决师资问题。

四、各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应尽可能对支援学校提供教学所需的图书、仪器。

### 五、派出支援教师的生活待遇：

(1) 派出教师进藏不转户口，只带临时油粮关系，在藏工作期间一切生活标准，根据当地不同地区的规定，应与当地教师的待遇相同，并由西藏负责解决。派出教师的工资除原单位发给的外，差额部分由西藏发给。低工资生活有困难的，由派出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负责给予一定的困难补助。

(2) 派出教师所需冬装，由西藏负责每人补助制装费八十元。教师进藏前添置棉衣、被褥等所需布和棉花，请派出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本着节约的精神，根据情况，给予适当补助，经济困难的请原单位从福利费中酌情补助。

(3) 派出教师进藏路费由派出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负责，返回路费由西藏负责；在藏工作期间的公费医疗由西藏负责报销。

### 六、派出支援教师于一九七四年五月、六月间进藏。

以上意见，如无不当，请批转有关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具体事项由西藏派人同有关省、市和国家机关有关部委协商解决。

国务院科教组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九日

（原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西藏工作文献选编（1949-2005）》，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一九七四年五月一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调整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

1974年5月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调整国防工业管理体制的决定》。主要内容如下：（一）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二）撤销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和航空、造船、常规兵器、电讯四个领导小组。（三）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的直属企业、国防工业的高等院校和其他学校，有计划、有步骤地下放给省、市、自治区领导，实行地方和部队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四）省、市、自治区党委对本地区的国防工业企业实行统一领导，在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内，设立国防工业办公室或相应机构。撤销各大军区管理国防工业的机构。（五）搞好军民团结、平战结合。（六）各研究院、所归属各工业部门。这次对国防工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是总结以前搞独立的大军工体系的教训，要使国防工业建设同国民经济建设结合起来。

一九七四年五月四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

今天，是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我国人民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纪念这个光辉的战斗节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在五四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工人阶级作为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

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把批孔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对尊孔复古的反动顽固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正如毛主席说的：“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当前正在进行的批林批孔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对国内外敌人长期斗争的继续。它是在我国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开展起来的。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亿万群众，锋芒直指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直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场斗争，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是批林整风的深入发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以及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都告诉我们，批判孔孟之道是一个需要反复进行的艰巨的斗争任务。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反孔与尊孔的斗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内容，但都是当时阶级斗争、党派斗争的一种形式，是政治思想领域两条路线的斗争。尊孔复古，总是代表着倒退和复辟的没落阶级的利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纲领，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孔孟之道，在上层建筑领域中一步一步地清除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

孔老二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厚古薄今，主张开历史的倒车。这种思想适应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被他们大肆吹捧，不断加工，把它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一切反动派，包括妄图灭亡中国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都从孔家店那里寻找毒害人民、破坏革命的思想武器。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要从孔老二那里取经学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亲自跑到曲阜“朝圣”，多次抛出鼓吹孔孟之道的黑《修养》，为推行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搜集孔孟的反动言论，东拼西凑，在阴暗的角落里狂热鼓吹，进行反革命的阴谋活动，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这就充分证明，只要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还存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孔和尊孔的斗争就不会结束。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中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时，对孔学进行了尖锐的科学的批判。毛主席在一系列著作中，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戳穿了反动派宣扬孔孟之道的险恶用心，揭露了“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反动思想根源，引导中国人民打碎一切束缚他们的精神枷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取得革命事业的不断胜利。毛主席发动的对反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建国以后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第一个大战役，也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对孔孟之道的一次大批判。此后，毛主席领导的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历次重大斗争，都把矛头指向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把批孔和批林结合起来，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使中国人民的批孔斗争，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我们务必理解毛主席一贯坚持批孔的深远意义。要深刻认识，搞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就要同孔孟之道作坚决的斗争。不批孔，批林就不能彻底，反修就不能彻底，防修就没有保证。

五四运动以来的历史还证明，只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才能战胜孔孟之道。历史上劳动人民和进步的社会力量，对孔孟之道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不可能用科学的世界观深刻揭露孔学的阶级内容和反动实质。资产阶级在五四运动时期也批判过孔学，但是，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彻底战胜孔孟之道的历史任务，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解决。

毛主席曾经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还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没有把儒家和法家的斗争看作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反对儒家是很对的，却没有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对法家的著作也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分析，因而也就不可能彻底打败儒家思想。当年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新的武器以后，把对孔家店的批判提到了新的高度。鲁迅是个榜样。我们在批林批孔中要下苦功，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掌握马克

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养和锻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不断提高批判的水平。

批林批孔，如同一切革命运动一样，只靠少数人是不行的。一九三九年，毛主席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只有动员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毛主席号召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形成一支以工农为主力军的强有力的军队。毛主席说：“这是一支几万万人的军队呵！有了这支大军，才能攻破敌人的坚固阵地，才能攻破敌人的最后堡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重温毛主席这个教导，是多么亲切！今天，我们全国的形势，不但跟五十五年前根本不同，而且跟三十五年前也大不相同。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以工农兵为主力，包括广大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在内的几万万人的大军，朝气蓬勃，英勇战斗。大批的批林批孔的先进人物不断涌现。大批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斗争中成长。我们相信：批林批孔运动必将把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推向前进，我们伟大的祖国必将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更大的胜利。

让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胜利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五月四日；社论）

一九七四年六月三日，国务院关于恢复和新建一些高等院校的通知

1974年6月3日，国务院发出通知，恢复和新建一些高等院校。其中有：天津外国语学院，天津财经学院、四川农学院、西南民族学院、贵州民族学院、西安公路学院、蚌埠医学院、皖南医学院、广州体育学院、湖南林学院、云南工学院、浙江师范学院等27所高等院校。本年，恢复和新建的高等院校还有山东大学、曲阜师范学院、湘潭大学、广东民族学院、西藏师范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撤销山东科技大学。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1974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

1974年6月15日 国务院批转国务院科教组《关于1974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报告》指责1973年招生工作中“不少地区曾不同程度地

沿袭旧高考的办法”，在文化考查问题上突出反映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表现和影响。报告提出了本年度招生：一、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抓紧抓好批林批孔。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二、选拔学生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政治表现、路线觉悟放在首位，注意选拔批林批孔的积极分子。坚持选拔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三、坚持“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办法。文化考查可采用调查访问、座谈讨论等多种形式进行试验，反对“智育第一”，反对“用对待敌人的办法考学生”。四、在保证工农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的前提下，注意适当招收确实表现好的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本年，高等学校招收工农兵学员 16.5 万人。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党是领导一切的》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十三周年。

我们的党，是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风浪中成长壮大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各级党委和广大党员又经受了新的考验和锻炼。斗争的实践进一步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经过八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过党的九大和十大，我们党更加坚强，更加团结，更加朝气蓬勃。

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必须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在运动中，根据“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党委内部开展正确路线对错误路线的斗争，正确思想对错误思想的斗争，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它使我们党的组织更富有战斗力，能够更有力地来领导运动，而决不意味着可以削弱党的领导。

加强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

的行动。要坚决支持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欢迎群众的批评监督，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要深入到群众中去，及时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对于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某些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要坚持原则，加以引导。毛主席指出，关于党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应当是：“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党必须依据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而对于人民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的意见，则必须教育群众，加以改正。”我们应当这样做。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各级党委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牢牢掌握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大胆地领导运动。要在斗争中，使自己成为能够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战斗堡垒。现在，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要把这个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还需要全党作极大的努力。许多地方的工农兵理论队伍和专业理论工作者，已经积极行动起来，研究两千多年来不同历史时期儒法两家两条路线的斗争历史，吸取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搞好当前反修防修的斗争。这是运动走向深入的表现。各级党委要掌握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取得领导运动的主动权。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工、农、妇、青等革命群众组织，也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发挥自己的作用，努力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

“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社论）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当前工农业生产问题的汇报提纲》

1974年6月18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当前工农业生产问题。当时由于“批林批孔”运动，许多地方和企业的领导干部挨批挨斗，甚至被打倒打跑，不能领导和组织生产，许多地区和部门重新出现动乱的局面，国民经济重新下降。

计委在汇报中指出，

农业方面，全国夏粮总产量预计 840 多亿斤（实际是 922 亿斤），超过了上年。

二、工业方面，1974 年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和部门没有完成国家计划。“主要问题是煤炭和铁路运输情况不好，钢铁、化肥等产品和一些军工产品也欠帐较多，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战备影响较大”。

1 至 5 月份累计，全国工业总产值仅比去年同期增长 1%。在这 5 个月中，前 3 个月还能勉强做到逐月略有增长，从 4 月份开始急剧下降。同 3 月份相比，4、5 两个月平均日产值分别下降 6% 和 3%。

1 至 5 月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下降的有山东、湖南、贵州、内蒙、江西、浙江、安徽，山西、湖北、新疆和四川等 11 个省、自治区。其中贵州，1972、1973 年两年工业生产连续大幅度下降，今年 1 至 5 月又比去年同期下降 20.9%，全省工业基本上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

1974 年 1 至 5 月累计，全国重点煤矿欠产 835 万吨，比去年同期下降 6.2%，钢欠产 188 万吨，比去年同期下降 9.4%；25 个重点企业中，武钢、包钢、太钢等 12 个企业欠产较多。化肥欠产 185 万吨，比去年同期下降 3.7%。煤炭减产，影响了整个工业生产和市场供应，造成不少企业停产和半停产。

铁路运输方面。由于发生动乱，很多路段不畅通，所通过的列车比正常情况少 1/3 左右。

铁路货运量 1—5 月份欠运 2100 万吨，比上年同期下降 2.5%，

全国 20 个铁路局有 13 个未完成计划；

徐州、长沙、包头、贵阳等重要区段经常阻塞，使津浦、京广、京包、贵昆 4 条重要干线的列车不能畅通，“通过的列车比正常情况少三分之一左右”，严重影响了全国的货物运输，造成不少企业停工减产。由于铁路运输受阻，致使山西、河南的煤炭和其他物资不能及时外运，造成一些大中城市、工业基地和市场用煤告急。

财政收支方面，1 至 5 月份，全国财政收支比上年同期减少 5 亿元，财政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 25 亿元，出现财政赤字 5 亿元，而上年同期是收大于支 27.4 亿元。



国家计委的汇报认为，后几个月如不积极地把煤炭，把整个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抓上去，势必会影响抓农业，影响基本建设和战备，影响财政收支平衡和市场供应。

汇报提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把生产搞上去。

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

1974.07.01；中发 [1974] 21 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核心小组：

一、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在全国城市和农村普遍开展起来，正朝着深入、普及、持久的方向发展，人民群众发动起来了，形势很好。在批林批孔的推动下，全国夏收作物又一次获得丰收，总产量超过了去年。工业生产有了新的增长，幅度较大的是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河北、河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宁夏等省、市、自治区。总的来说，生产形势是好的。完全可以相信，随着批林批孔的不断深入，工农业生产的形势将会越来越好。

二、从上半年的工业生产情况看，还有一些地区和单位没有完成国家计划。当前突出的薄弱环节，一个是煤。一个是铁路运输。一至五月，全国重点煤矿共欠煤炭八百三十五万吨，其中山东、安徽、江苏三省，河南平顶山、河北峰峰两矿，欠产煤炭七百六十万吨。尽管开滦、大同、阳泉等不少重点煤矿，超产甚多，贡献很大，但三省两矿的大幅度减产，拖了全国的后腿。铁路运输多数单位是好的。主要是徐州、长沙、包头、贵阳等少数区段，经常堵塞。使津浦、京广、京包、贵昆四条干线不能畅通，严重影响了全国的货物运输。造成不少企业停工减产。钢铁、有色金属、化肥、水泥等产品的计划和军工生产计划，都完成得不好。这里有缺煤和运输的问题，也有企业本身的问题。武钢、包钢、和武汉重型机床厂、太原重型机器厂，成都一三零二厂等企业，大量减产。主要是内部因素。这些情况必须引起我们严重注意。

三、有些省、市、区和城市以及一些企业单位的减产，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革命没有搞好，批林批孔没有搞好。林彪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得到认真的揭发和

批判。领导的思想和政治路线不端正，党的政策不落实，群众不满意。运动一来，有少数领导干部又不是积极的站在运动的前面，领导好批林批孔，纠正错误，落实政策。许多人有错不认错，使矛盾激化。有少数领导害怕群众，不打自倒，一轰就跑；擅离职守，放弃领导；甚至躺倒不干，有少数领导干部，不坚持原则，违反党的政策，随意表态，造成了思想混乱，影响了群众的团结。还有少数的领导干部，捂盖子，保自己；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煽动经济主义，以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党的路线、政策贯彻不下去，群众团结不起来，一小撮阶级敌人，乘机兴风作浪，进行破坏和捣乱。

四、八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又一次证明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中央希望所有革命的领导干部，都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同群众一起，搞好批林批孔。在工作中犯有错误的领导干部，要作认真的自我批评，为上级和群众承担责任，取得群众的谅解。同时也教育群众和干部，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不准抓人打人。要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把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五、凡是擅离职守的领导干部，在听到本通知传达的半个月內，必须返回工作岗位。逾期不归的，停发工资。情节严重的，要经过群众讨论，给予必要的纪律处分，直至撤销他们的职务。其他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人员，要动员他们迅速回到本单位，搞好革命和生产。经过说服教育，仍然不回来的，也要按照旷工处理。

六、经济主义是腐蚀无产阶级队伍，破坏批林批孔的修正主义思潮。各级领导同志和革命群众，都要提高警觉，坚持原则，坚决煞住经济主义妖风。中央重申：当前为了集中力量搞好批林批孔，对于群众中提出的有关劳动工资和经济政策方面的问题，一律放到运动的后期，经过调查研究，具体分析后，统筹解决。

七、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项原则。什么是正确的潮流，什么是错误的潮流，要作阶级的分析。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那种不作阶级分析，笼统地讲什么：“只要造领导的反，就是反潮流”的说法，是错误的。有的人不批林、不批孔，不上班、不劳动，违背中央一九七四年十三号文件的规定，继续搞

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连，拉山头，打内战，还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反潮流的革命行动，这是对反潮流的严重歪曲。还有人散布什么“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谬论，公然煽动停工、停产，对于这些错误言论，必须给予批驳。对于幕后操纵者，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

八、充分发动群众，发挥专政机关的作用，坚决打击破坏批林批孔、破坏工农业生产、破坏交通运输的阶级敌人。对那些盗窃欺诈犯、杀人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对于贪污分子和投机倒把分子也要进行打击。

九、中央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要充分发挥作用，和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模范的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要就地闹革命，严格遵守劳动纪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夺取批林批孔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各地的党组织和各地的报纸、刊物和广播，都要表扬这些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批林批孔搞得好的，促进了生产的模范人物。宣传和推广他们的经验，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

十、各级党委都要深入学习中央今年以来发布的一系列文件，分析当前的革命和生产形势，在抓好批林批孔的同时，于最近时期，认真检查一次国家经济各项计划的执行情况，发动广大干部和群众，订出增产节约的有效实施计划。完成得好的地区和单位，要继续努力，做出更大的成绩。完成得不好的，要迅速赶上来。

本通知发到县、团级，传达到广大群众。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将讨论和落实的情况上报中央。

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七月一日

一九七四年八月，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402 页）

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不得擅自翻印、转抄、散发毛泽东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讲话及中央文件的通知

1974. 08. 04；中办发 [1974]16 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根据中央指示，现在通知你们：中央最近发现，有些地区有的单位和个人，仍违反中央规定，擅自翻印、传抄、散发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讲话及中共中央文件。在翻印、传抄过程中，内容错漏严重，有的同原意出入很大，甚至歪曲了原意，有的则是冒名捏造的。这种做法，不仅容易为阶级敌人所利用，而且对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贯彻中央的指示和政策，都是不利的，必须引起各级党组织的严重注意。要教育党员、干部和群众，进一步加强组织纪律性和敌情观念，向这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作斗争，严防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

中央再次重申：今后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讲话、诗词、照片以及中共中央文件，未经中央同意，严禁擅自翻印、传抄。对已翻印、传抄的文本，各地、各单位应采取坚决措施，认真追查收回，予以销毁。对于严重违反中央规定，不听教育，劝阻的单位和个人，应执行纪律，予以处分。对于那些造谣破坏，招摇撞骗，伪造中央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的阶级敌人，必须分别情况，依法惩办。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发出

共印四九、五七三份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通知)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了。这是我国各族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团结战斗的二十五年，是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二十五年。

在欢庆这个光辉节日的时候，我们向战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上的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向爱国人士、港澳同胞和爱国华侨，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对我国的革命事业和正义斗争给予支持的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十五年以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夕，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主席的话，表达了当家作主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各族人民对自己祖国前途的坚强信心。二十五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已经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政治思想战线上进行了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到处都在茁壮成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社会主义建设蓬勃发展，一个以社会主义农业为基础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正在形成。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侵略和颠覆，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毛主席指出：“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我们走过的道路，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也证明了为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团结全国人民，在长时间内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内四次大的路线斗争，都是围绕着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进行的。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长期进行下去。在经济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所有制的改造取得基本胜利而结束。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毛主席说：“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

的。”我们必须继续批判旧制度和旧思想，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作斗争，并在实践中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起来。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努力使社会主义的江山永不变色。我们要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在群众性的清查工作已经初步告一段落的单位，应当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要认真看书学习，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这是把批林批孔运动推向深入的关键。要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当前特别要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要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孔孟之道，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为反修防修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并注意在斗争中培养和壮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要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要坚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认真总结和推广那些革命和生产搞得好的先进单位的经验，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农联盟，充分发挥亿万群众在批林批孔中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我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各族劳动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能够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解放军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发扬我军光荣传统，为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新的贡献。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国内外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破坏我们的统一和团结，我们必须提高警惕。要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要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去处理各种问题，切实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

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

在欢度国庆的时候，我们对台湾省的骨肉同胞，表示深切的关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正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美苏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的斗争，推动着世界历史车轮前进。在这种大好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应当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加倍努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发展全国的大好形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社论）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

1974. 10. 11；中发 [1974] 26 号

毛主席已圈阅

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毛主席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中央已经发了几个通知，传达了毛主席各项指示精神。在毛主席指示的指引下，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各条战线的形势越来越好。在国际上，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正朝着越来越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敌人的方向发展。

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中央希望各单位抓紧做好下列准备：

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这是运动深入的关键。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挥工农兵在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做好培

养、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工作。各级领导同志要注意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正确对待在运动中给自己贴过大字报的广大革命群众。决不容许打击报复，“秋后算账”。

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抓紧专案清查工作。全国在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方面，经过三年的时间，总的来说，除个别单位和个别人以外，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清查大致差不多了。应当对清查出来的人和事加以分析，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严格区别、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对于极少数属于敌我矛盾的林彪死党，要继续清查、批判。对于少数犯了错误包括严重错误的同志，如问题已基本查清，要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作出结论，把他们解放出来。

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把社会主义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表扬那些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批林批孔搞得好，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总结、宣传和推广他们的经验。今年还剩下最后一个季度，要努力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全国军民务必提高警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为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新的贡献。

中央希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加强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发展当前大好形势，以实际行动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这个通知可以传达到广大群众，但不登报、不广播、不贴大字报，在中央宣布召开人大以前，对外保密。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毛泽东与李先念、汪东兴谈话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410 页）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严禁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自行到农村采购农副产品的通知

1974. 11. 15；国发 [1974] 109 号

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国务院各部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党中央各部门：

据反映，最近不少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不顾中央三令五申，不顾国家政策法令，直接到农村社队和农村集市采购粮食、油料、肉类、食糟、水产品以及药材、皮张等农副产品。有的抬价收购；有的用化肥、煤炭、机器设备等国家统配物资换购；有的用公车代社队运输，换取农副产品；有的同投机倒把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非法套购，甚至围攻殴打市场管理人员，扰乱市场秩序。严重的是，某些单位的领导人对这种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动，不仅不去纠正，反而支持纵容。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在市场上的一种反映。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严重地冲击国家计划，破坏社会主义统一市场，使国家本来应该收购的东西收购不上来，能够供应的东西供应不足，造成人为的紧张。而且还会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我们的干部队伍，影响工农联盟，助长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为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开方便之门。必须引起我们严重注意。

关于这个问题，中央曾经作过明确规定，现在有必要再次重申：

1. 一切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一律不许自行到农村和集市采购国家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未经产地县的市场管理部门批准，不许自行采购三类农副产品。不许用国家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物资去换取农副产品。要向广大干部和职工进行党的政策纪律教育和党的光荣传统教育，使他们树立全局观念，模范地遵照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更要以身作则。

2. 一切农村人民公社、生产队、所有属于国家统购派购的产品，需要出售时，应一律向当地商业收购部门交售，不得直接同商业以外的任何单位交易。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反对资本主义思想，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3. 商业部门要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努力促进生产，积极组织农副产品收购，进一步沟通城乡物资交流。要注意安排好市场，合理调整商业网点，做好农副产品供应。并提高服务质量，改进服务态度，严禁商品“走后门”。

4. 进一步加强市场管理，充分发动群众，坚决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要坚持原则，按规定不得上市的商品，坚决不许上市。按规定不得从集市购买农副产品的单位，坚决不许到集市购买。公安、税务、商业、交通等有关部门要紧密配合，共同把市场管好。

望各地在接到本通知后，要立即认真进行传达、讨论、布置和检查。要把这一问题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对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狠批刘少奇、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各级领导要亲自过问这个问题，要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监督，坚决防止和杜绝这种不正之风。并将贯彻执行这个通知的情况，及时上报国务院、中央军委。

国务院 中央军事委员会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的翻印件，翻印者未注明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毛泽东与周恩来、王洪文谈话

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416 页）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公安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关于边防检查站人民武装警察实行义务兵役制的请示报告》

《通知》主要内容如下：

边防检查站民警服役期限为 3 年，如因工作需要，可超期服役；

二、边防检查站干警的更新比例，干部每年需更新约 5%，警士每年需更新约 30%；

三、边防检查站应征民警的条件，按中国人民解放军征兵条件办理，但需具备特种政治条件和初中文化程度；

四、边防检查站的干部来源，主要从警士中提拔，级别工资按军队标准评定；

五、边防检查站民警实行义务兵役制后，干警的生活福利待遇按总后勤部规定的标准，由公安部门供给，干警的家属按军属对待；

六、边防检查站民警拟从今冬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毛主席指示

开个短会。过年筹备人大，没有时间。

问候全体同志新年好！

此期稿多，还是批林批孔，批孔还是要搞。

（主席同外宾谈话）记录发你们看看。

主席讲，国际形势，革命和战争因素都在增长，还是这个估计。主要倾向是革命这个提法，根据主席指示，最近没有多讲。会谈记录都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燕子忙，飞得低，雨要下了。总的是这个精神。打，最近几年还打不起来。天天讲缓和，因为有战争的危险。

今天讲一个问题。你们回去讨论。

主席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主席说：列宁为什么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要专政？这个问题要写文章，要把列宁的话摘出来。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主席上次接见丹麦首相哈特林讲过一个问题。（就你们内部谈）有这么一段：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度变了。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要靠无产阶级专政加以限制或者调节。列宁说，小资产阶级每时每刻都在产生资本主义。工人的一部分，党员的一部分，也会有这种情况。过去列宁说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会滋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有的人会沾染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因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林彪上台，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是很容易的。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要读马列的书，要写文章。要使全国人民都知道，都能懂得。这些精神，你们讲主要的。

这和 58 年讲资产阶级法权有关系。这个问题最近讲得少了。

我觉得首先要认真学习，想一下。你们回去传达，说主席提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要写文章。你们深入讨论。

《哥达纲领批判》也讲这个问题。

主席有一系列指示，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有一系列指示，要重新学习。

元旦社论提到批孔要结合学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主席又讲，刘少奇不强调打日本，不讲武装夺取政权。共产党不夺取政权干什么呢？也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

我这次注意改变文章强调这个问题。有些改进去。但只是改的。下期还要考虑学习、阐述、评论方面的文章。如学习《国家与革命》，基本观点要阐述，针对当前思想倾向写文章。

依靠工人阶级，不等于工人阶级内部没有矛盾。有矛盾，才要团结，才要正确处理，但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第一段讲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还有矛盾，工人阶级内部就没有矛盾？要同资产阶级影响作斗争，内部要对无产阶级、对人民多做工作。

党的问题也要写文章，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问题，要有马列主义的党。

山西谢振华走了。王谦，中央同意作人大代表，选举搞两派，把他选掉了。共产党员对党决定了的事，可保留意见，但组织上要服从，这是写在党章上的，否则如何发挥党的作用？这是无产阶级思想还是资产阶级思想？

还有少数干部愿做一派的头，不愿站在党性立场上。对他们做工作最难。要站在党性的立场上。如何办？还得做工作。

经济领域里的问题，你（指林兆木）和苏星研究一下。

谈社会主义教育一文可以用，提法再改一下。

经济领域，主席和丹麦首相谈话谈到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都看过，但未很好深思。

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国家与革命》讲到。

主席研究过生产关系，所有制，人和人关系，分配，商品经济。陈伯达不同意商品生产，认为人民公社可以消灭商品。

主席还说：有些事名为很难，但做起来并不难。五经四书可以卖了，一样可以治国。孔夫子不是也批了吗？关云长，也不拜了。（武圣人，可以组织一篇批判文章，实在是吹捧孔孟的典型，三国演义把他吹得太厉害了，尤其明清以后。越南关帝庙最多，旧戏也很多。）

这些问题不能传出去。

主席提出问题，研究列宁为什么讲无产阶级专政，你们研究可以了。

同哈特林谈话一段可以讲的。

我讲的可以说。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是个根本问题，列宁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起草九大报告，主席说引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主要几条，九大报告第一部分就有。

六七年六、七月，春桥和我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说，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又要继续革命，这个问题要写文章，讲清楚。

九届一中全会主席说，要使企业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我去传达，和工人讲，有些企业路线不对，刘少奇路线，领导权就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犯错误的，要教育改正过来。也是新年传达，九大之前。你们可以找一找看，传达群众，办学习班，写了报告。

把主席有关指示学习一下。组织三类文章，一是读书体会，二是阐述，三是思想评论。参加劳动的也算，这一类研究一下。积稿，讲社会主义所有制，（黑龙江）还有一篇，思想评论一类的还可以搞。

党的问题要写一点，元旦社论一大段讲党。人大报告和十大精神一样，报告多一点经济问题和国际形势，社论多讲党的问题和学习问题。国际形势，我在阿尔巴尼亚讲话，送主席批准了讲的。

人大开了，就等人大文件，登有关文件，宪法，别的不一定多写。

宪法是根本大法，是否和主席思想联系起来，写一点文章。宪法说明是很简单的报告，说明和原来不同的地方。主席基本思想能写可以写一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风，参加劳动，学习马列，反官僚主义，精简等等。

党的领导写得很明确的。党是领导核心，要实现党对国家的领导。人大是在党领导下的最高权力机关。

就宪法本身写一点文章。

不提人名，和党章一样，提毛泽东思想。

这类文章不急，开过会之后还可以写。

宪法和过去比：①去了讲林彪的，②和党章一样，简短。

工农兵文章不要紧，人都来，容易搞，计划有这一项。

主席提出的问题，上半年要好好宣传这个思想，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我们还要再研究。

《惟新生事物才有未来》一文，学列宁伟大的创举，可以改改。这是很重要的文章，较强调扶植新生事物，重点要放在反修防修。苏修搞物质刺激，金钱挂帅，复辟资本主义，完全背叛列宁的教导，列宁有一重要论述：为了要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私有制，消灭差别，克服反抗，克服习惯保守势力。为了取得胜利，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第一，组织吸引被剥削的劳动群众，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粉碎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劳动群众及所有小生产者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也讲，①镇压反动派，②改造小生产者农民，这样写更深刻，从专政的任务来写比较符合主席指示。《伟大的创举》58年学过，强调参加劳动，现在从专政角度学一下。列宁还说，义务劳动也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政权机关的阶级性表露得非常明显。应支持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主席58年讲过的有些精神，最近宣传少了。文章可以改一下。

山东的文章请他们改。题目可以改。要写清楚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包括哪些内容，几个方面，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马克思讲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列宁的论述都联系起来。要讲党内，资产阶级用代理人出马，要比自己出马好得多。我们对党员基本估计，95%都是好的，但少数为什么会变修？没有讲。小生产者的改造，教育农民，也没有讲。请他们去改。

北大学报，有一篇文章论刘禹锡的政治诗，排出来请他改。这篇文章有思想。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是讲统一的。鲁迅有一首诗：明眸越女罢晨妆，苧水荷风是故乡，唱尽新词欢不见，早云如火扑晴江。其中有一句就是用刘禹锡的诗。刘禹锡踏歌词的一首：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鲁迅喜欢刘的诗，可以叫他们补充进去。

另外，科学技术大学学报有一篇谈法家的产生及其意义的文章。现在对法家产生的经济基础，讲得少，这篇文章讲了法家产生是社会条件的反映，当然具体还可探讨。文章分析法家产生的经济基础，政治条件，思想和政治路线，认为

少正卯算最早法家不对。你们看看。还有一篇讲晁错“削藩”的经验教训，“清君侧”。

刘禹锡未出他的书。我喜欢他的诗，诗的艺术成就很高。秋月的诗，主席发挥了，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七言诗成就高的，很少有人比得上。

下期稿不会缺，我们自己写一篇讲学习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革命、专政的。弄通这个问题。

批因循守旧可以和这个思想结合起来。批孔要抓路线，抓反复辟倒退，可以努力。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文章，可用，还改一改。登不出来，就放在那里。批唯生产力论文章再看看。主席 58 年语录看看，和苏星研究一下，自己学习、考虑。你们学习，编点语录。

时间问题不大。下期不会有多少篇幅。要有几篇，两三篇。我也要学习，基本几本书（六本），但你们要多学一点。主席指示很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批林仍继续批。30 号文件较好，找他们写。

军事思想方面，党的领导是很大问题。主席讲这个问题搞不清要变修。不向下传。

对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如何理解，你们好好讨论一下。搞政治经济学的要认真研究。稿子多不要紧，半年也有用。这期加一点精神，主要第一二两遍。

讲学大庆的文章题目改了，过去有人们当作生产典型。今年农业好，工业差些，钢 2100，不是因为批林批孔造成的，干部中非无产阶级思想未很好解决，群众中两派，影响生产。

安定团结指示要继续贯彻，直接间接有一篇谈一谈是很需要的，这期也有，短的。云南打架，昨晚就处理这个问题，全国也有些问题。主席讲，有两派的地方不搞民兵，联合好了，才搞民兵，中央要发指示。安定团结要继续贯彻。

国际方面，主席同外宾谈话你们都有，学就是了。主席谈话好象随便谈，其实深思熟虑，如人口问题。

二月份不开会了，你们据此安排。我自己要学习，也要写一篇，学习这个问题。

本期搞完，集中开会学习，日常工作照样搞。

日常的稿子如科学史等继续抓。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等文件的通知

1974. 12. 31；中发[1974]32 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上海市《关于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及河北省《关于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有了较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二十八点五，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二十一，预计一九七四年将下降到千分之十九左右。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河北等五个省、市，提前完成了“四五”人口规划指标。今年可能还有三、四个省达到规划要求。但是，发展很不平衡，到一九七三年底，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外，仍有十三个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还在千分之二十以上。这些地区要实现“四五”人口规划指标，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上海等先进地区的经验说明，搞好计划生育，关键在于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经常抓，抓得紧。要充分发挥妇联、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作用，做到各级有人抓，层层有人管。实行计划生育，是一场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深刻的思想革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要抓好计划生育工作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认真地反复地宣传毛主席有关计划生育的指示和党的政策，批判刘少奇、林彪、孔孟在家庭、婚姻、生育问题上的反动谬论，肃清其流毒，提高群众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把生育计划



落实到人，不要强迫命令。要普及节育科学知识，把避孕药具送上门，方便群众。医疗卫生部门要提高节育手术质量，加强妇幼卫生工作。各地要认真总结和推广先进单位的经验，把计划生育工作搞得更有成效。

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口头传达到群众。)

关于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的教导，发动和依靠群众，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认真抓了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使全市的人口出生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十七，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十点二五(市区为千分之六点九五)；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十一点三，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四点七八(市区为千分之一点四八)。今年上半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低于去年同期。

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中，各单位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积极组织群众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开展革命大批判，使毛主席有关计划生育的指示更加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虹口区新港街道党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召开批判会、声讨会，组织小分队演出，狠批刘少奇和林彪一伙在家庭、婚姻问题上宣扬的修正主义谬论以及孔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尊女卑”等反动观点，提高了广大居民为革命实行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的自觉性。有些同志说：现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男孩、女孩都可以培养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我们工人阶级应该带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目前，全街道生了两个女儿的育龄夫妇有二百零一对，其中一百八十五对已表示不再生第三胎。

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中，各级党组织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做过细的政治思想工作。许多地区和单位，按照“晚、稀、少”的要求，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自报互评的方法，制订生育规划。川沙县金桥公社张浜大队，在制订一九七五年生育规划时，通过调查摸底了解到，打算生育的对象有三十八名，这样出生率就要高达千分之十八。大队党支部先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然后组织贫下中农进行回忆对比，干部上门促膝谈心，做细致工作。在分清路线、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发动群众讨论规划，讨论中出现了“二胎让新婚，新婚提倡晚胎”

的动人景象，许多育龄妇女主动推迟生育时间，全大队预计明年的出生率为千分之九。

为了真正实现生育规划，各单位还反复做工作，把工作做得更扎实。许多区、县、街道和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生育规划“半年一修订，每月一检查”的制度，及时分析群众思想动态和晚婚、生育规划的落实情况，交流经验，提出改进措施。同时，发动计划生育工作的骨干，根据群众需要，挨户送避孕药具上门，把工作做到家。如上海县辛庄公社莘联大队助产员顾美玲同志，积极主动送药上门，发现服药后有反应的，及时处理，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坚定服药者的信心，消除不必要的顾虑，数年如一日，热情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她的先进事迹在全市宣传推广后，许多单位都涌现出一大批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分子。由于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在全市一百二十八万余对已婚育龄夫妇中，已有一百零六万余对落实了各种节育措施，节育率达百分之八十三。

在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中，少数单位一度出现过强迫命令和违犯政策的现象。对此我们反复强调了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纠正了这种现象。如上海县有的公社采取不给婴儿报户口等办法去限制出生率，但出生率却是全县最高的。县委注意了这些情况，要求各社、队加强思想教育，狠抓政策落实。这样做的结果，全县人口出生率从一九七二年的千分之十三点零五，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十点九八。

几年来，我们还注意不断提高节育手术的质量，积极组织避孕药的科研和生产，现已鉴定推广的有口服避孕药一号、二号，薄型口服避孕片，避孕针一号，探亲避孕片一号、五十三号，以及中药引产天花粉针剂等，看来都有不同程度的效果。

实践证明：计划生育工作，抓与不抓，大不一样。一九六七年，有些单位放松了计划生育工作，一九六八年全市的人口出生率，从上年的千分之十二点三上升到千分之十五，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要求各级党组织把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积极抓好。一九六九年就稳定下来，以后逐年下降。在工作中，注意了抓两头，特别是抓住郊区农村这个薄弱环节。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郊区各县的人口出生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二十六点五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十三点九五，初步扭转了农村人口出生率较高的状况。现在各级党组

织普遍加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建立和健全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同时，注意发挥妇女、工会、共青团等各个群众组织的作用。从公社到生产队，从街道到里弄，从工厂到车间、班组，基本上做到层层有人抓，块块有人管，从组织上保证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但还有些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搞得不够好，出生率较高。有的单位工作做得不细，有强迫命令的现象。

最近，有关部门对上海人口发展的趋势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从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由于解放初期上海人口出生率高达千分之四十左右，这批青年将陆续进入婚期。因而一九七五年以后人口出生率可能有上升的趋势。为了使市区的人口出生率保持稳定，郊区的人口出生率进一步下降，我们准备再作些调查研究，依靠群众把这项工作认真抓好。我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以批林批孔为强大政治动力，积极加强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的精神，抓紧、抓细，进一步搞好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的工作。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日

中共河北省委员会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

我们于十月八日至十五日，召开了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市和部分县委、县革委的负责同志，各地、市、县卫生局、计划生育办公室和各地区商业部门的负责同志，省直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和部分先进单位的代表，共四百零九人。刘子厚同志主持大会并讲了话，马杰同志作了报告。

会议认真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传达贯彻了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议上的指示和汇报会议的精神；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总结、交流了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我省计划生育工作的新经验；讨论安排了一九七五年的工作，并对如何制订人口增长十年规划交换了意见。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全国计划生育汇报会议为我们搞好计划生育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使我们提高了认识，增强了信心。大家表示，要坚决贯彻落实。

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我省计划生育工作形势很好。各地、各单位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加强政治思想

教育，把计划生育作为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场深刻革命来抓，使许多单位出现了书记动手，全党抓计划生育工作的大好局面。毛主席关于计划生育的指示更加深入人心。党的有关政策进一步落实。为革命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正在成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自觉行动。按“晚、稀、少”要求结婚和生育的人越来越多，全省晚婚率已达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节育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预计一九七四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将由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十四点六下降到千分之十一左右。各地在工作中都取得了一些经验。南宫县在批林批孔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把计划生育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全党动员，书记动手，一年大抓几次，充分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在群众中培养了一大批积极分子，在农村建立一支平战结合的医疗卫生技术队伍，“送药、具上门，送手术到队”。该县一九七三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由一九七二年的千分之十五点六六降到千分之六点九九，一九七四年预计可降到千分之六以下。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的达到妇女劳力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全县一九七四年比一九七三年粮食亩产增长两成。定县发动群众，狠批孔老二“男尊女卑”的反动思想，破旧俗，立新风，提倡结婚后男到女家落户，目前男到女家落户的已有六千八百多对，深受群众的拥护和赞扬。乐亭县经过调查研究，按照晚婚、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和生育间隔四到五年的要求，初步摸到了一些人口增长规律，为制订人口增长十年规划提供了依据。但是，与先进的兄弟省、市比较，我们的工作还有不小的差距。从省内来看发展也不平衡。有十四个县的人口自然增长率还在千分之十五以上；有的地方节育手术质量不高，有事故发生；在工作中有的还有强迫命令现象。

我省“四五”期间，人口增长规划要求一九七五年全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实现这个要求，还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一、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狠抓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意识形态领域里狠批林彪、孔孟在妇女、婚姻、生育问题上的流毒和影响，用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造几千年来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批判“死生有命”的反动“天命观”，实现“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批判“男尊女卑”、“不

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反动谬论，树立“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的无产阶级观念。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促进计划生育工作不断发展。

二、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通过各种形式，进一步宣传贯彻毛主席关于计划生育的指示，宣传晚婚和计划生育的重要意义，普及节育科学知识。同时，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要培养大批积极分子，充分发挥党员、团员、民兵的骨干作用。教育医务人员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提高节育手术质量，防止和杜绝手术事故。大力做好妇幼卫生工作，努力做到生一个、活一个、壮一个，提高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体现党和毛主席对人民群众的关怀。

三、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委要把计划生育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一年认真抓几次。要组织力量，进行调查研究，制订一个切合实际的人口增长十年规划和保证实现规划的有力措施，使人口增长达到合理水平，并相对稳定。既要抓长远规划的制订，又要抓当年规划的落实，做到经常抓，反复抓。积极推广南宫等地的先进经验，层层抓好典型。充分发挥各级革委会有关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群众组织的作用，进一步把晚婚和计划生育工作做得更好。

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中共河北省委员会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出

共印四九、五七三份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2010年1月25日初稿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十册（2）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十章 批林批孔

##### 第二节 发动批林批孔

######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唐晓文的文章《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

公元前四九八年（鲁定公十二年，《左传》），孔子担任了鲁国管理司法、刑狱的司寇，并代行宰相职务。他上台不久，就利用职权，杀了革新派人士、法家的先驱少正卯。围绕这个问题，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地主资产阶级文人学者，出于他们的政治需要，曾经有过种种议论：有人对孔子杀少正卯的实质进行歪曲，也有人断言这件事是后人假造的。

事实到底怎样？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弄清楚这些问题，对于了解春秋末期儒、法斗争，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揭露尊孔反法思潮的反动实质，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是很有意义的。

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

孔子为什么杀少正卯？我们只有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春秋末期阶级斗争的状况，才能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

春秋末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变革的时期。由于奴隶反抗奴隶主斗争的发展，新兴封建势力的兴起，奴隶制正在崩溃，出现了被奴隶主阶级认为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孟子·滕文公》）的局面。要不要推翻奴隶制的问题，不能不表现为意识形态领域内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原来，殷周奴隶制国家的土地全归天子（王室）所有，诸侯（公室）、卿、大夫等各级奴隶主被分封和赏赐的土地只有享有权，没有所有权。后来，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求突破旧的奴隶制生产关系的束缚，建立与它相适应的封建生产关系。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了“初税亩”，即向私田征税，实际上承认

了土地私有，承认了新兴封建势力的经济地位。有些国家政权开始落在新兴封建势力手中。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趋势面前，奴隶主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总想阻止社会历史的变革。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搏斗中，孔子这个没落奴隶主贵族思想家，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反对新兴封建势力的任何改革措施。孔子猖狂攻击“税亩”制，说什么“初税亩，非礼也。”（《左传·宣公十五年》）。在孔子看来，按田亩征税，承认封建土地私有制，这是违反了“周礼”。他到处鼓吹什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企图继续用奴隶主阶级的伦理道德和典章制度来束缚人们的行动。主张倒退，搞反革命复辟，梦想阻挡历史的发展，这就是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反动本质。当时法家先驱者们的主张和孔子的倒行逆施是相反对的。代表新兴封建势力要求的，在郑国有邓析，在晋国有范宣子等，他们主张实行同孔子完全对立的政治路线。他们提出了“法治”思想，反对孔子的“礼治”思想，主张用“法治”代替“礼治”，也就是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在鲁国，少正卯也是主张这条政治路线的。他和孔子同时讲学，唱对台戏。孔子的学生几次被少正卯吸引过去，造成“三盈三虚”的局面。可以看出，当时这场意识形态的反复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因为少正卯的思想，正是反映了当时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孔子对少正卯的思想极端害怕和仇恨。所以，当孔子一朝掌权，就残酷镇压新兴的封建势力，杀了政敌少正卯。

少正卯的著述虽然没有遗留下来，但是，从《荀子》书中记载的孔子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完全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言论、行动和坚持“礼治”的孔子是根本对立的。当孔子的学生们对杀少正卯提出疑问时，孔子为自己辩护说：“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醜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荀子·宥坐》）。

孔子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心达而险”

这是说：少正卯的思想（心）“达”、“险”。什么是“达”？“达”，在当时是“显达”、“仕进”的意思，就是要做官，要掌握政权。在奴隶主专制时代，只能由奴隶主贵族（所谓“君子”）掌握政权，不属于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新兴

的封建地主和工商业自由民（所谓“小人”），要想起来掌握政权，就构成罪行。

《论语·宪问》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后人注解：“上达者，达于仁义也，下达谓达于财利，所以与君子反也。”奴隶主阶级要用“仁义”来维护奴隶主专政，而新兴封建地主阶级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反对奴隶主生产关系的束缚，就讲“财利”。这是两个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

什么是“险”？《韩非子·诡使篇》解释：“险”，就是“损人逐利”。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反对奴隶主贵族的“仁”。《礼记·中庸》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意思是：奴隶主贵族是根据天命得到统治权的，新兴地主阶级要起来倾覆奴隶制，自己掌握政权，这是冒险的侥幸行动。因此，“心达而险”，是说少正卯想要掌握政权，倾覆当时的奴隶制。这和孔子顽固地坚持奴隶制的反动立场，是针锋相对的。

#### “行辟而坚”

这是说：少正卯的行动是坚持“辟”的。什么是“辟”？“辟”字在当时有双重含义，这双重含义实则是一致的。《方言》卷三说“辟”是“商人丑称”。奴隶主贵族看不起新兴的工商业自由民，骂他们是“辟”。孔子给少正卯加上这条罪状，可以看出少正卯是代表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自由民的利益的。“辟”的第二重含义就是“刑”、“法”，当时称“刑辟”。原来，在奴隶制下，奴隶主贵族可以不受限制地任意生杀、掠夺，他们却将这叫作“礼治”。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自由民要求发展自己的利益，希望定出法律来限制奴隶主的种种特权，保障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主张“法治”。“礼治”和“法治”的斗争，就是当时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孔子杀少正卯之前三年（公元五〇一年），郑国的邓析就因“行辟”，被奴隶主贵族杀害了。因此，“行辟而坚”是说少正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自由民的利益，主张法治。这和孔子推行维护奴隶主“礼治”的政治实践，是背道而驰的。

“言伪而辩” 这是说：少正卯的言论是为“伪”辩护的。这个“伪”，并不是指一般的说假话。因为孔子主张：为了维护奴隶主的利益，是允许而且提倡说假话的（《论语·子路》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古代“伪”字，可省写成“为”字。“为”字原来是指农业和手工业劳动，是和劳动



人民直接相联的。所以，孔子删定的《诗经》中说的“伪言”，都是从“小人”、“思乱之民”（要想起来造反的奴隶）口中发出来的。“辩”是辩护，也有阶级性。《荀子·非相》中说：“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这就可以和第一条的解释相通了。奴隶主为“仁”辩解，而新兴封建地主阶级则为冒险倾覆奴隶主统治的言论辩解。因此，“言伪而辩”，是说少正卯的言论属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伪言”。这和孔子所鼓吹的“仁”是根本对立的。

第四条“记醜而博” 这是说：少正卯的著述（记录）中用大量材料（博）阐述“醜”的思想。这个“醜”字，古代与侏、匹、比字含义相同，原来是“讎”字，有相当、相等、相争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立、变革。因此，“记醜而博”是说少正卯在他的著述中，用大量材料，阐述变革的思想。这和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复古主义，是截然相反的。

第五条“顺非而泽” 这是说：少正卯是顺着“非”，并且把它加以润泽（加工、提高）。这个“非”和“诽”相通。“诽谤”就是反对、责备、批评。《春秋·谷梁传》说：“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当时奴隶主认为他们的“公田”种得不好，就要责备奴隶。奴隶们要反对奴隶主的压迫剥削，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和工商业自由民，对当时奴隶制的政治不满意，也要起来批评反对，就叫作“庶人议政”，就是“非”。因此，“顺非而泽”是说少正卯支持那些批判、反对奴隶制的言论，并且加以润饰、提高。这和孔子指责“庶人议政”的态度是水火不相容的。

总之，少正卯反对“礼治”，主张“法治”，倡导革新，适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人民群众的愿望。这在奴隶主阶级看来，则是大逆不道，是严重的犯罪行为，非杀不可。因此，孔子叫嚷：少正卯的言行是在到处煽动群众（“居处足以聚徒成群”）；鼓吹邪说（“言谈足以饰邪营众”）；颠倒是非（“强（御）足以反是独立”）。如果让他这样搞下去，对奴隶主专制制度的威胁实在太大了！因此，孔子便指斥少正卯为“乱政”的“小人之桀雄”，将其置于死地。毛主席指出：“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少正卯和孔子之间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中革新和保守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新兴封建势力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两个阶级尖锐斗争的表现。少正卯和孔子的斗争揭开了春秋战国时期儒法斗争的序幕。孔子以为杀掉少正卯，就可

以扼杀法家的兴起，就可以阻挡历史的发展。但是，与孔子的主观愿望相反，当时儒法斗争的结局，是代表新兴封建势力要求的法家取得胜利，而那些“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的反动儒生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中，受到严厉的惩处。“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中国的社会并没有倒退到西周奴隶社会，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叛徒陈伯达从托派的反动观点出发，否定中国有奴隶社会，从而把孔子和少正卯的斗争，完全歪曲为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个人之争，抹杀了这件事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质。这不仅表明了他对历史的无知，而且暴露了他的反革命托派分子的嘴脸。

“群而不党”是假，“党同伐异”是真

列宁指出：“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最新的哲学象在两千年前一样，也是有党性的”。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孔子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也不例外。孔子自己曾标榜过什么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什么群而不党！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思潮，任何一个学派，都根源于阶级斗争，都是一定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从来没有，也不会有什么超阶级、超党派的思潮和学派。孔子根本不是“群而不党”，而是“党同伐异”。他顽固地站在奴隶主阶级立场，一贯主张“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痛恨“邪说”，要讨伐异己，严厉惩处他的反对派（“远佞人”。《论语·卫灵公》）。他非常憎恶居于被统治地位而批判奴隶主统治的人，憎恶勇于斗争而无视“周礼”的人，憎恶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而不肯改变的人（“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论语·阳货》）。在孔子眼中，少正卯正是这样一个“佞人”。孔子杀少正卯恰好戳穿了他所标榜的“群而不党”完全是假的。

孔子还对季康子说过：“子为政，焉用杀”（《论语·颜渊》）。看，真是满嘴仁义道德！但是，当孔子看到少正卯所主张的“法治”思想，危及奴隶主阶级的统治时，他的“圣人”伪善的面貌，便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事实证明，孔子是一个阴险凶狠的伪君子。

历代的反动统治阶级都把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作为屠杀异己的先例加以仿效。例如：西汉文帝时，博士们奉诏作《礼记·王制》，就开始将孔子杀少正卯的所

谓五条罪状，抬高到法律的地位，作为镇压异己的根据。北洋军阀段祺瑞，针对当时群众革命运动，叫嚷“治国之道纲纪为先”，大谈孔子杀少正卯（《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十八号）。不仅如此，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在其臭名昭著的《中国之命运》中，也以孔子杀少正卯为由头，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少正卯，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有害于国家民族的学说和主张”。这些事实确凿地说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总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独裁和专政。

春秋战国儒法两条路线斗争过程中发生的孔子杀少正卯和秦始皇“焚书坑儒”两件事，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从来是不可调和的，总是一方压倒另一方。当然，孔子杀少正卯和“焚书坑儒”是两个不同阶级的专政。前者是反动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专政，后者是刚刚取得政权的地主阶级对搞反革命复辟的奴隶主阶级的专政。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我们对秦始皇“焚书坑儒”应该予以赞扬和肯定；对孔子杀少正卯应加以声讨、批判。但是，在林彪、陈伯达等假马克思主义骗子手里，却完全颠倒了过来。他们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陈伯达一方面把这件事说成是在历史上“无从抹去”的“大罪恶”（《国民精神总动员应有的认识》）；另一方面，他又把孔子杀少正卯看作只是个人之争，妄图抹杀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就清楚地说明，林彪、陈伯达一伙叛徒、卖国贼是尊孔反法反动思潮的狂热鼓吹者。他们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实行孔孟之道的反革命两面派。驳“伪造说”

有人说什么孔子杀少正卯是后人伪造的。这种看法就是历史上的“伪造说”。第一个提出这种论调的是南宋的朱熹。这个反动的地主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孔子杀少正卯是《论语》、《左氏春秋》没有记载，子思、孟子没有说过，“乃独荀况言之”，“吾又安敢轻信其言”（《晦安先生朱文公集·舜典象刑说》）。朱熹这种只迷信孔孟而菲薄荀子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难道事件、人物的有无，只能以《论语》、《左氏春秋》有无记载，子思、孟子有没有说过作根据么？

我们知道，对待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先秦的法家和儒家代表人物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作法。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法家的代表、唯物主义哲学家荀子，如实地记载了孔子杀少正卯这事实；而继承孔子衣钵、坚决维护孔子思想的以子思、

孟子为代表的思孟学派，奉行儒家所谓“为尊者讳，为长者讳”的道德原则，则故意回避了孔子杀少正卯这个血淋淋的事实，这一点也不奇怪。

事实上，从战国末年至南宋初，在《礼记·王制》、《史记》、《说苑》、《论衡》、《汉书》、《尹文子》、《礼记·王制·疏》、《东坡志林》等书籍中，对孔子杀少正卯这一事件都有记载。这些书的作者立场不同，观点不完全一样，说法也互有出入，譬如有的认为是三月而杀，有的则认为是七日而杀。但是，他们都肯定少正卯是实有其人，孔子杀少正卯是实有其事。其中，司马迁的《史记》是被称为“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说苑》的作者刘向也被评价为“博极群书”。汉代的王充，是一个反对因袭旧说，坚持独立思考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在《论衡》一书中，对《荀子·宥坐》篇所载孔子杀少正卯，既没有揭其“书虚”，也没有斥其“言妄”，而是把它看作信史。不仅如此，他还进而提供了“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的新史料。直到这件事情发生一千七百年以后，朱熹为了尊孔反法，才炮制出伪造说，来美化孔子，掩盖孔子的罪行。值得注意的是，朱熹本人对他抹杀史实的作法也是忐忑不安的。他晚年在《论语集注·序说》中也不得不说孔子“摄行相事，诛少正卯，与闻国政”。但是在朱熹以后，有些人又出于阶级偏见，宣扬朱熹的“伪造说”，才使这种论调得以泛滥。这难道是尊重史料、尊重历史事实吗？

五四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吼声中，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也曾被作为专制丑剧，受到有力的批判。当时，连自命“尊圣子”的梁启超也不得不承认，杀少正卯“此实孔氏之极大污点矣。”（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五四运动后，一些尊孔的资产阶级文人学者，又特意把朱熹的伪造说加以发挥，千方百计地掩盖孔子的“污点”。国民党御用文人钱穆就叫嚣什么《荀子·宥坐》篇记载的孔子杀少正卯是“虚造”的。也有人跟着叫喊，这件事“不可靠”。他们这样干的目的，是妄图把已经威信扫地的孔子偶像重新树立起来。这实质上是对五四运动的一种反动。

应当看到，有关中国历史的史料，都是经过历代统治阶级及其文人学者，根据他们的政治需要和阶级偏见，加以删定或篡改的。因此，我们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这些史料加以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重新进行整理和评价，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盲目地跟着剥削阶

级文人学者跑。

孔子杀少正卯的事件，反映了春秋末期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封建势力之间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它说明了当时保守和革新、复古和反复古、倒退和反倒退的尖锐斗争；说明了在阶级社会里，“群而不党”是骗人的鬼话，任何思潮和学派，从来都是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的，腐朽反动的旧思想、旧意识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在历史上是这样，在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尊孔与反孔的斗争，作为上层建筑领域内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仍然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进行下去。资本主义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修正主义思想回潮和马列主义反回潮的斗争也要长期进行下去。我们一定响应十大的号召，继续深入批判林彪，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肃清孔孟反动思想的流毒，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夺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四年一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刊登池恒的文章《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

一九五七年，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这样的大变动当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存在决定意识。在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人们中间，对于这个社会制度的大变动，有各种不同的反映。”毛主席分析了思想战线的状况后指出：“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毛主席提出，必须批判修正主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并号召我们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有亿万革命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它同样也是一次社会的大变动，而且比起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来，更为广泛，更为深刻。对于这场大革命，在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人们的思想上，必然会引起不同的反映。这种不同的反映，归根到底体现了两种对立的世界观。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

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热烈拥护的，他们一致认为好得很。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

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亿万革命人民充分发动起来，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摧毁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妄想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深入地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进一步得到巩固。

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深刻变革。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思想文化各条战线呈现一派兴旺景象。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广大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实行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老干部重新焕发了革命青春，增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自觉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批新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为各级领导班子增添了新鲜血液，带来了蓬勃的朝气。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经济领域里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一个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出现，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各项建设事业的迅猛发展。这就是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察问题所必然得出的结论。

刘少奇、林彪这些地、富、反、坏、右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一开始就对这场大革命极其害怕，极其仇恨。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推行了一条“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残酷镇压。林彪则歪曲、篡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妄图把这一革命引入歧途。在反革命的武装政变计划《“571 工程”纪要》中，他更是用最恶毒的语言，无耻攻击、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成就，污蔑在这一运动中出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反对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进行革命和建设。这并不奇怪。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对这场旨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矛头对准着他们的政治大革命，怎么能不害怕、不仇恨呢！反革命的本能，决定他们一定要跳出来进行疯狂的反对和破坏。被敌人反对是好事不是坏事。阶级敌人这样起劲地反对

文化大革命，正好说明我们党领导的这一场大革命完全必要，并且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罪行，不只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的问题的性质，也早已远远超出一般的世界观的范围。刘少奇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叛徒、内奸、工贼。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经营了几十年，最后投奔苏修，自取灭亡，叛党叛国，成了可耻的叛徒、卖国贼。他们在政治上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反对党的正确路线，以至完全堕入反革命泥坑，除了有它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以外，从思想根源上说，又是同他们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拒绝世界观的改造分不开的。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个人如果不改造世界观，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并极力要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在革命的重要关头，政治上会堕落到什么地步。

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为自己斗争的精神武器，作为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哲学基础，因而能够用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毛主席指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他们认识到，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并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基本胜利以后，只有坚持继续革命，进行多次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坚信，二十多年来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的社会主义道路和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正确。他们坚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必将战胜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旧事物。正因为如此，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然感到欢欣鼓舞，积极爱护和支持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促进新生事物的成长壮大。他们能够看到这场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深远意义，用辩证的观点去分析这场大革命中某些不可避免的曲折，提高对阶级斗争规律性的认识，吸取经验，而更加满怀信心地看到大好形势和光明的前途。

相反，如果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而是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去观察问题，由

于立场、观点、方法不对头，客观事物就会被歪曲，甚至颠倒过来。抱有这种观点的人，经常会低估以至看不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对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这也看不惯，那也不舒服，甚至阻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当然，有这种观点的同志，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也还不相同。但是，这些看法是错误的，有害的，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列宁曾经指出：“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涌现的新生事物持有错误观点的同志，应该以列宁的这段话对照自己，迅速把立足点转变过来，决不能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道路上去。

在一场社会大变动中反映出来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经常表现为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在阶级社会中，这种斗争总是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一切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当它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以后，必然以十倍的努力，百倍的仇恨从事复辟活动，妄想恢复它失去的“天堂”。他们竭力反对前进，主张倒退，企图开历史的倒车。这种现象，历史上多次发生。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也总是想把复辟的希望变为复辟的行动，利用一切机会，包括在我们党内寻找他们的代理人，企图使社会主义社会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在我国，就是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倒退，是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上的一种表现。毛主席说：“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党的十大文件指出：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种危险，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是需要经常注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个反党集团的斗争，都是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反对资产阶级世界观，坚持进步，反对倒



退，乃是我们经常的战斗任务。我们要把批林整风运动继续深入下去，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使我们的思想能不断适应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批孔斗争，是更加深入地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内容。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的斗争，反映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两个阶级，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反对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孔子，是反动的、腐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和政治代表，他的政治理想是恢复日益崩溃的奴隶制度，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中国历史上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总是借宣扬孔学来反对革命。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也都是用孔学来为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正象孔子妄图复辟奴隶制一样，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目的，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其共同特点，都是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林彪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因为这个革命把社会历史大大地向前推进了，而他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破产。因此，把批孔与批林结合起来，就能够更好地从世界观的高度认清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理解在毛主席制定的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必须联系当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从政治上、思想上深入批判孔子的反动观点，批判一切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尊孔崇孔的罪恶目的，同时克服学术研究中对孔子评价的一些错误观点，在批判中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使无产阶级的思想进一步占领上层建筑的各个阵地。

社会主义革命在不断深入。要使我们的思想适应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新情况，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做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促进派，必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认真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改造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作出艰苦的努力。它要求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同时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在斗争实践中改造自己。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才能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征途上，乘风破浪，永远向前！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一期）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就印发北大清华汇编《林彪与孔孟之道》给毛泽东的信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和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份材料，觉得对当前的批孔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有这种简要的材料。我们提议，可否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兵种、各大总部、国务院各部，作为当前批林批孔的参考。现将材料呈上，妥否，请批示。

王洪文 江青一九七四年元月十二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王洪文在中央读书班的报告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给大家吹一吹，最近接触一些情况，有些省老大难解决不了，主要是路线没有搞对头，有些地方嘛，除少数坏人外，多数是领导人的路线没有搞对头，主要是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没有正确对待运动。初期的冲击，如四川十二个厂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今天吹一下，希望起这个作用，就是大家能把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指示重温一下。同志们正在学习毛主席最近五次指示的重点，学习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这个问题已经涉及到了。抽点时间学习讨论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很有必要。

（一）为什么要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义

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件大事。

同志们都知道“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都把文化大革命写上了，而且写进了党章。党的代表大会作了决定的事，全体党员都应该照着全做，而且应该做到。新的一年开始了，国际国内形势很好，对革命来说，形势很好，一片大好，我们要发展大好形势，把我们国内的事情办好，把根据地建设好，要能解决一些省市的问题，首先要能解决路线问题，把路线问题搞对头，主要是解决正确对待

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从历史上看来是有必要的，而且从实际上看也是完全必要的。捍卫文化大革命就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每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中级干部，更应该把这个责任担负起来。

为了充分认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首先是要重新学习一下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系列的重要指示，这是我们认识文化大革命的纲，现在有些人把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忘记了，现在有少数地区还搞资产阶级专政。

早在一九六五年底，当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刚刚揭开，即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万历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就明确指出了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大革命。绝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运动初期，有些人就上了这个当，以为这是学术讨论，实际是在刘少奇指使下，彭真一伙跳出来扔出一个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实际是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妄图把运动引向纯学术讨论的资产阶级轨道。毛主席毅然决然的叫彭真一伙靠了边，同时指出旧宣传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决小鬼”，毛主席说，“我们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的，我就号召地方起来造反，向中央进攻”。这里“干坏事”指的就是搞修正主义。毛主席在杭州对许世友同志说到，“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怎么办？”毛主席曾反复讲过这个问题，一九六六年五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做了许多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这个指示已经发表过了，这个指示非常重要，但是“九大”、“十大”有些人就忘记了，有些人就不承认有走资派。

广大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地投入了文化大革命，这时刘少奇一伙慌了手脚，急忙炮制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亲自镇压革命。在这个关键时刻，毛主席亲自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十六条，写出“炮打司令部”的“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样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起来了。毛主席对文

化大革命运动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毛主席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鼓励革命青年在文化大革命中经风雨，见世面，在斗争中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在这时毛主席对广大干部也非常关心，亲切地指导“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中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毛主席亲切希望我们老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保持革命晚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一九六六年底，文化大革命出现了大好形势。当一九六七年初来临时，毛主席在十二月廿六日讲“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就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早在一九六六年十月，毛主席就坚决支持上海的工人运动，支持上海工人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工人运动起来了，毛主席很高兴，十六条讲“青少年是文化大革命的闯将，工农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当时派了中央领导同志（张春桥）去上海支持工人运动，处理安亭事件，同意工人成立自己的革命造反组织。毛主席指示“可以先斩后秦”，这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到一九六六年底，毛主席又指示“上海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也起来了”。在毛主席亲切关怀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在驻沪人民解放军的支持下，开展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斗争。

这不光是上海的事，而且是全国的事，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夺权的，不然这个权是夺不下来的。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了党委会，热情支持自下而上的夺权斗争，对“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斗争做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作用”。

一月廿六日，毛主席又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伟大号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毛主席还亲自总结了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毛主席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并指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组织，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革命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

在上海一月夺权，打退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时，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国务院发了贺电，指出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命运

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

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毛主席视察了三大区，对进一步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做了重要指示，毛主席高兴地指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毛主席就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同志们再回顾一下，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多么重要，当时是九次路线斗争，接着就是第十次路线斗争，我们学习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往往当时并不理解，没有读懂，而是经过一段时期才理解的。我们有必要学习毛主席的这些指示，这对我们提高阶级斗争觉悟很重要，最近中央准备把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编成一本书印发，只有把毛主席的指示学懂了，才能认识哪些是马列主义的，哪些是修正主义的，有利于开展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为什么讲这么一番？因为现在党内有些同志不理解，主要在这一段。

## （二）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

从上述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中，可以看出毛主席是下了很大决心，发动和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现在这个革命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首先是粉碎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最大的胜利；同时文化大革命锻炼了广大干部，锻炼了广大群众，促进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这个很多同志都看到了，但是少数人看不到。很快出现了普及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这个运动正在逐步深入。八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段指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要是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我们国家的情况会怎么样呢？最近中央准备发个材料：“林彪和孔孟之道”，发给全党，准备批判。林彪与叶群夫妻俩，加一个陈伯达，他们对社会主义极端仇恨。这个材料给我们那里工作同志谈了一下，大家很气愤。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国内外的阶级敌人必然要万般攻击，这是毫不奇怪的。蒋

介石也咒骂文化大革命，苏修的电台报纸也骂了七、八年了，林彪在“五七一”反革命政变纲领中，也用苏修的语言骂我们。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被敌人反对的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这证明我们文化大革命搞的是对的，我们的批林批孔越深入，蒋介石、南朝鲜、南越、苏修都骂我们批孔，这从阶级观点看是不奇怪的。问题在我们队伍内部，包括党内外，有的同志直到今天对文化大革命还像七、八年前那样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有的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个别的甚至把文化大革命描绘得一团漆黑，简直像洪水猛兽一样；有的说，一搞文化大革命就毛骨悚然。十大党章中，党的决议中说，文化大革命以后还是要进行多次；有的说文化大革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今后也不要再搞了。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说法是各式各样。有的说“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在我们这里看不到”。意思是说在这里看不到，在那里看不到，加在一起全国看不到；那还有什么必要呢？前边说过，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最大的胜利。怎么看不到呢？要说看不到，就把自己置于全党全国人之外了。刘少奇、林彪一伙要是上台，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中国社会将要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去，就会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成千上万的人头就要落地，到那时你还说看不到？我们说文化大革命不仅对于全国来说是必要的及时的，在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单位看也是必要的及时的。毛主席说：“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刘少奇林彪的路线在哪一个单位都有影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大多数地方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有的地方修正主义路线是相当厉害的，如旧中宣部，中组部，两个重要的部都不在我们手里。不要说被资产阶级专了多年政的文化战线了，就拿工业战线来说，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还很深的。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好得多了。专家治厂，管、（卡）、压、洋奴哲学，这一套不扔掉，工人阶级怎么成为工厂的主人呢？正是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我们的钢铁十年徘徊，有些企业形式上在我们手里，实际上掌握在资产阶级代理人手里，有的甚至在资本家手里，（上海有些厂实际上还是资本家当厂长）在这样一些单位，如果不来这样一场革命，怎么行呢？怎么能把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呢？毛主席高瞻远瞩发动了一场文化大革命，解决了这个问题。光这一次还不行。现在有些省市个别单位，关键是领导问题，不能怪群众，不能说群众不好。当然不是说那些都是坏人，有些是好人，但思想上是修正主义的，资本

主义的，一旦把问题指出来，这些同志是会改正的。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了，有些地方的问题应当解决了。要能解决问题，首先要把原因找对头，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有一些单位的坏事归罪于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是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这是错误的；这本来是修正主义的后遗症，怎么能说成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这些问题恰恰说明文化大革命非搞不可。哪些地方路线不对头，哪些地方就不能团结；广大的干部和群众把坏人挖出来。有的是批林批孔搞不起来。最近我们解决四川十二个厂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没有深入批林，关键在这里。我们认为，只要按照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办事，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大同坦克厂，闹了八年，这次两个月解决了；主要是原来的路线搞错了。当然我们不否认个别单位有坏人捣乱，这也要发动群众才能把坏人孤立起来。把这些问题说成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实际上就是要把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那一套搬出来，那就是越搞越乱。江西省就有人在干部会议上传达反革命谣言：“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师归位，小兵回营”；把小兵全打下去。最近看到一个电报，现在小兵都造反了，搞两个头头，弄得“不亦乐乎”。压而不服，这是一条真理；我同江西的一些同志说过，你们那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十大”以前说过，但没用，“十大”也说过，但也没用，不过不用担心，中央是知道这些事的。

还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好是好，但形式是不是非要这样搞？就是说不能搞四大，不能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他们不主张亿万革命群众，不主张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无非是这么个问题。因为否定了这些，就否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在一九六七年一次谈话中指出：“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仍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方式，一种方法，公开的、全面的、由上而下的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阴暗面。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实说，不是文化大革命，怎样能把刘少奇这样一个隐藏得很深的叛徒挖出来呢？对刘少奇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历史问题，过去我们并不能完全掌握刘少奇的叛徒问题；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到处查出来的，（当然对他公开发表过的修正主义的东西，我们是掌握的）。同时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式，怎么会出现革命委员会和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一系列新生事物呢？不可能。工农业生产也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没有文化大革命这

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也不可能普及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当然文化大革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本身也有个发展完善的过程。毛主席指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群众都知道”。现在毛主席的指示，中央的指示，在有些地方，在个别人那里卡住了，不告诉群众，有的给群众讲时，哪些是毛主席的话，哪些是党中央的话，哪些是他们自己的话都分不清。

有些人“称赞”文化大革命，说文化大革命群众不听话，动不动就贴大字报，开会七嘴八舌；这很对嘛！其实这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个胜利。

毛主席历来指出“我们党内要生动活泼，朝气蓬勃，不要搞得那么死刻板板的”。主席对王海蓉说“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打瞌睡，看小说”；有人很不理解。我体会就是不要把学生搞得太死，号召学生敢于造修正主义的反。

部队也有这样的问题。叫无条件服从命令，绝对服从命令。就是服从，也是有条件的服从，不是无条件的，符合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的就服从，不符合的就造反。我们每个共产党员，执行上级的指示，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要路线对头，执行正确的路线，正确的命令，不正确的就不执行。有些人对这类事情看不惯，说成是战士难管，爱提意见，这是很自然的。现在部队出政治事故，主要是对战士管教粗暴，不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结果使问题成堆，矛盾激化。这里的关键也是个路线的问题，如对待群众的问题。现在形势发展了，要研究思想工作的怎么做，完全用过去的那一套，吃不开。

这些事在我们看来是好事，有些人不这么看。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工农兵是各项事业的主人，这点不能忘记。“十大”一报告中指出，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包括最近报纸上登的两个小同学，一个叫黄帅，一个是广东的，先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日报”，要求支持，写的很有水平、很有感情，我们看了觉得应该支持。

毛主席最近指示：“牛为什么要长两支角？就是要斗争”；这句话在一九五五年就讲过了。毛主席还指示我们：“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说话为什么吞吞吐吐呢？”要少吹多批，我们就是要靠头上长角、有两支角。敢造修正主义路线的相反的工农兵群众。有些单位对“十大”报告要用“四大”，怕得要命，到现在还不敢组织群众学习，群众起来搞“四大”反潮流，我们应该赞成，为什么要害怕呢？只有



搞修正主义的人才害怕搞“四大”，凡是搞马列主义的，就应该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起老百姓了呢？怕老百姓，认为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有的人对毛主席的这句话是听不进去的，他们就喜欢压，压不服就抓。

有人说：“老干部过去南征北战，文化大革命七斗八斗”。这句话不对，而且也不符合老干部的心愿；应当说，老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他们过去南征北战，有的受过伤，他们并不因此就认为自己可以脱离群众，就认为自己可以摆官架子，而是积极投入到文化大革命去，发现自己有缺点错误，就作自我批评，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了功。这样的老干部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这才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正的代表。至于说有的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的冲击较多，这是要具体分析的。毛主席在视察三大区时说：“有的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同群众商量，不平等对人，不民主，喜欢训人、骂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像毛主席指出的这些人，就不可以批判一下吗？你可以训人家，群众为什么就不可以批评你一下呢？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本来大家已经熟悉的，但有些人忘记了。这里所说弄得狼狈的老干部，也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从积极方面接受经验教训，成了群众真正信任的老干部，这样的好干部不少，比如上海的马天水同志，文化大革命后精神面貌不一样了，更好深入群众，路线也搞对头了。另一种情况是从消极方面总结经验教训的。在群众面前，扭扭捏捏、缩手缩脚、实际上还是脱离群众，不过形式上不同罢了。

还有一种人，对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关系到国家不变颜色的事，根本不想，对群众的冲击，总是耿耿于怀，解放了、上台了、一有机会就想整群众，江西省的干部就是如此。这样整的结果，想必会整到自己的头上；“三气”不改总是要摔跤的，这个问题不解决，现在解放了将来还得被打倒。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被揪斗，账总是要还的，不拿利息就不错了，出口气有什么不可以？”我们要向这样的同志大喝一声，太危险了，人民群众欠了你什么账

呢？毛主席说：“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人民给的。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代表了人民群众，打倒了人民的敌人，人民就拥护我们”。“共产党最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要是一定要向人民群众讨账的话，群众就有权再把你的权夺回来。

还有一种倾向，认为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是极“左”实质；其实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是极“右”，而不是极“左”，右得不能再右了。但不久有个大学有人说：“极左不批，是非不明”；最大的证明，是所谓十七年的功过，谁人评说？已经评过了，文化大革命那么多大字报已经评过了，中央下发的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也早就评过了。就是说，教育战线上十七年基本没有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被修正主义专政了。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中说：“北大、清华是根深蒂固的盘根错节”，现在有人说这个“纪要”不灵了，说这个“纪要”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把这些话到处传。对某些人来说，批极“左”、批林彪是假的，批文化大革命才是真的。我们的结论“极右不批，是非不明”。当前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就要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不批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要巩固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是断然不可能的。去年有个单位写了一篇文章，说那个单位的青年是极右份子，把青年说得一无是处，全部是坏的。如果这样，中国革命的希望在哪里？我们的班交给谁？中央在召开省团代会上的批示中指出：大多数青年是好的，否则我们的革命前程就没有前途了，就不光明了。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地方散布反革命谣言。如“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师归位，小兵回营”；要害是后边两句，“老师归位，小兵回营”不管什么叛徒、特务、走资派、统统都归位，包括刘少奇也要请回来，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要统统打下去。这是典型的复旧，或者说是复辟，也可以说是反攻倒算。这个谣言是从部队里的两个高级干部哪里传出来的。传布这些东西是很坏的。像刘少奇的反革命谣言，江西省当作毛主席的指示，在几百万人的干部会上传达，这些事情也不怪，原因在于我们的一些干部头脑里存在着谣言市场，谣言到手，立即贩卖，因此从阶级观点来看，就不奇怪。

有些人不是坏人，但思想上早就解除武装了，没有辨别香花和毒草的能力了，毛主席严厉的批判了这个反革命谣言，把它改成“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师归线，

小兵提升”。毛主席的指示，充分体现了干部问题上的革命路线，我们应该发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同时要大力培养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不是一两个而是千百万。不发挥老干部的作用是错误，但讲老干部就论资排辈，不论现实阶级斗争中的表现，也是错误的。过去南征北战能打仗，这很重要；但更要看在现实阶级斗争中的觉悟和表现。如果思想是修正主义的，能为无产阶级打好仗吗？我们相信特别是在重大关键时刻，考察干部不应该光看历史不看现实；主要的还要看在路线斗争中的觉悟。不管他是地方的、或是军队的，老的、新的干部，都应该这样看。

老干部有错误要一看二帮，允许改正，对新干部也要这样。但现在有些地方，老干部犯错误，可以一看二帮允许改正，但新干部一犯错误就一棍子打死。为什么老干部犯错误可以教育，新干部就不能教育，要打下去呢？这不公平嘛！不利于党的团结嘛！毛主席批评了好些人看不起儿童团，提出“你们那几个十几岁、廿岁的人就那么高明”？现在新干部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自满、翘尾巴，要尊重老干部，向老干部学习；老干部要传、帮、带，对新干部要有个传帮带的问题。培养造就几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伟大的战略措施，是百年大计，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大事抓好，从上到下的培养接班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地方上的阻力还小些，军队阻力大些，我就主张找一个卅多岁左右的人担任大军区司令员。

关于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是好得很呢？还是糟得很？这个争论由来已久，可以贯穿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过程。彭真的二月提纲，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就是要扼杀文化大革命，林彪在本质也搞了一套同刘少奇一样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伙同陈伯达在“九大”前搞了一个唯生产力论的政治报告，说什么“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妄图以合法的形式对文化大革命实行反攻倒算，毛主席否定了这个政治报告。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九大”路线，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九大”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示下，取得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斗、批、改运动步步深入，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二中全会以来有一股右倾思潮在各地时隐时现，如新疆的龙书金、四川的梁陈、河南的干部都是这样的人物。他们转移批林斗争的大方向，企图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攻倒算。这种做法实际上

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斗争的继续，这种斗争今后还会有。毛主席最近说：对“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要看十年”；这就是提醒我们要有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同志们最近看批林批孔文章，说秦始皇搞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被骂了两千年，何况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呢？肯定有人要骂，有准备十年几十年以后还有人要骂，还有人出来为刘少奇、林彪翻案。孔子死了几千年了，还有人崇拜，秦始皇当时还是革命的，结果被人骂了二千年。

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对“九大”和“十大”，不是一般问题，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就是搞修正主义。我就是这样认识的：反对文化大革命，必然搞资本主义专政。同志们不要认为现在没有走资派了，甚至连走资派这三个字也不能提了，有的地方在讨论修改宪法、党章时，就不同意写上走资派。真是奇谈怪论。只要有阶级斗争存在，资产阶级就会到党内找代理人，就会有走资派，如果没有走资派，那过去的一切运动，都要否定，三反五反运动，五七年反右派，五七年反右倾，还有四清运动，这些通通否定，因此要写在党章上。这是个大事情，不是个小问题。关于有些人犯了走资派的错误，经过帮助后改了，改了好嘛，但不能说改了就不存在走资派了。走资派不但过去有，以后还会有。少数人现在还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甚至说造反派没有好人！这话那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呢？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就是领导我们造反的。有人骂我们是造反起家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造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这有什么不好？文化大革命我们造了资产阶级的反，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反，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有什么不好？过去有些人是造反派，现在还骂造反派，可见他的思想变了，忘记了过去。过去打土豪分田地难道不是造反？打蒋介石不是造反？不是造反是什么呢？有些人把这些都忘了。当然，一场文化大革命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不分，造反派中混进了少数坏人，这有什么奇怪呢？我们最初组织红军时，就那么纯吗？不可能！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怎能骂造反派没有好人呢？说造的派没有好人，岂不否定了自己！他忘记了是谁带领我们造反，忘记了造反派的老祖宗。

一个共产党员不造走资派的反，你要干什么？一个共产党员说这样的话，意味着对共产主义的背叛。共产党员就要造反，造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反。当然对多

数人来说是作内部问题、认识问题提出来的，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学习十大精神，可以改造过来，但就这些同志来说，也要在自己的世界观上找原因。用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把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一番。有少数人可能改造不过来。两种矛盾可以转化，有的向好的方面转化，有的向坏的方面转化；有的共产党员认识了，好转一些，或者说完全变过来了，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有的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转化为敌我矛盾。

在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中，不是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解放以来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好像是青天霹雳一样，一个早晨爆发的，甚至有人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一场大误会，非常反动。他们有套说法：“老干部回岗位，新干部回单位，支左人员回部队，文化大革命是场大误会”；这是思想问题，这是典型的唯心史观。他们现在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场大误会，就对当前的一切都看不惯，总是等呀等到一切恢复正常就好了。他们把发展看成不是螺旋式上升，而是看成在一个封了口的圈子里打转转。在工厂他们实行管、卡、压；在学校把智育第一的一套搬出来；总是把一切都照老格式走一遍，这是一种什么思想呢？是一种典型的庸俗化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地向前运动和发展中；这些守旧的人，口头上承认辩证法，实际上是反辩证法的。一提到企业管理，就主张把群众冲掉的旧规章制度恢复起来，热衷于搞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奖金等，他们说这样可以推动积极性。他们就没有想一想，革命几十年靠的是什么？是奖金？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吗？不是，我们靠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靠的是亿万革命群众，靠的是小米加步枪。如果说是搞物质刺激，苏修是搞得很厉害的，但搞得工业停滞，内外交困。如果那东西是灵的话，列宁格勒的工人，为什么要造反呢？文化大革命是靠物质刺激？还是靠群众觉悟？还是靠毛主席革命路线发动群众？当然不是说不关心群众的生活，但关心群众的生活和物质刺激是两回事。提高劳动生产力，应该在技术革新、机械化方面想想办法。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适当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是必要的，但搞什么计钟工资、奖金，不是关心群众生活，这是对工人阶级莫大的污辱。我们铁道兵修了那么多铁路，靠的是计件工资吗？这些战士一个月八元钱，没有奖金，这完全靠的是毛主席思想。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搞，中央有两个部，就是搞这个，到上海去搞试点，被工人赶出来了。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我们在这里吹一吹，希望读书班的同志回去观

察这些问题，要敢于斗争；起码向中央反映这些情况。有的地方提出来，能不能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规章制度？在计划工作会议上，有个工人回答的很干脆，说不能。他说了三种情况，第一，管、卡、压的那套我们不要；第二，月金全付够的我们反对；第三，在过去正确的，现在生产发展了，也不能把老一套原封不动地搬来套，就像成了不能穿的小孩衣服一样。这个工人很懂得辩证法，他说得很对，事物发展了，我们领导的思想也要跟上去，适应新形势。我们要坚决反对倒退，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不前的论点，悲观失望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我们要把批林整风深入下去，把批林批孔运动搞起来，批孔结合起来，要批林彪的流毒，就要打倒孔家店，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全面鼓吹唯心主义的思想家，一切守旧的家伙吹捧孔子。林彪是当代的孔老二，批林和批孔完全可以结合起来，也必须结合起来，要打倒我们头脑里的孔家店。孔子生活在中国由奴隶制度到封建制度的社会大变动时期，他仇恨社会制度的变革，拼命维护奴隶制度，反对封建制度，妄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孔子在鲁国当宰相上台七天，就杀了革命派少正卯，他的学生冉有有革新思想，他就挑动另一部份学生鸣鼓而攻之。毛主席说“孔子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由于他倒行逆施，上台三个月就下台了；他虽然下了台，但复辟的心不死，他到处游说，看到大好形势就叫喊“礼坏乐崩”，认为更坏事。昨天“人民日报”转变了哲军的文章，希望大家好好看一看，这篇文章写的很好。（按：元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哲军所撰‘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文章）

有些人对马列主义没有感情，对修正主义留恋顾盼、脉脉含情；对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看不惯，对旧的东西非常留恋。

毛主席说“资本主义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朝不保夕’，唯独共产主义的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斗争目标的共产党员，为什么对旧事物那样留恋呢？这是我们在座的同志应该很好研究的问题。

我们主要是提醒同志们好好学习一下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牢牢记住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的三项原则。毛主席最近还说“中国要出修正主义，同志们要注意呀”，批评政治局不论政，军委不论军也不论政。毛

主席这些指示，适用于政、军、学。东南西北各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要抓大事，值得同志们议论。今后出修正主义，还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毛主席最近指示，并亲自要我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就是要我们牢记步调一致才能得到胜利。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有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以便更好地贯彻“十大”精神，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

1974.01.18；中发 [1974] 1 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转发。

中共中央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发给你们，供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这个材料的传达方法，请你们按照中发 [1972] 3 号文件的范围，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传达以前你们要首先学习讨论，进行试点，训练骨干。

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仅供批林批孔参考）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

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由于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一致，都要复辟旧制度，开历史倒车，他就指使一些人，到处收集孔孟的言论，东拼西凑，分类摘抄，搞了大量卡片，用它装腔作势，骗人唬人，制造反革命舆论，大搞阴谋活动，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为了深入揭露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我们从林彪的黑笔记、手书题词和住宅里的其他材料以及他的公开言论中，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供批判用。这个材料选编得还不够完善，注译也不尽妥当，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们将陆续选编此类材料。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一九七三年十二月

## 目录

|   |         |
|---|---------|
|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 ( 3 )   |
| 二、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 ( 6 )   |
|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污蔑劳动人民·····               | ( 1 3 ) |
|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 ( 1 7 ) |
|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 ( 2 3 ) |
|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 ( 2 7 ) |
|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br>击“五·七”道路····· | ( 3 2 ) |
|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 ( 3 4 ) |
| 附件：名词简释·····                                | ( 3 9 ) |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

孔孟



悠悠万事 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书赠叶群同志  
 育容 一九六九·十·十九 (条幅, 林彪卧室) 注: 育容即林彪。  
 同日林彪还写了内容相同的另一条幅赠叶群。 悠悠万事 惟此为大。 克  
 己复礼。 书赠育容同志 叶群 于六九年十月二十三  
 日 (条幅, 林彪卧室) 悠悠万事 唯此、 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育容书赠宜敬 于苏州 一九七〇·元·一 (条幅, 林  
 彪卧室) 注: 宜敬即叶群按: "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  
 彪和叶群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 在不到三个月内, 连续写下了以  
 上四条。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 把复辟资本主  
 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  
 仁焉。 《论语·颜渊》 译文: 克制自己, 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  
 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 天人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

对过去……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 一律给于 [予] 政治上的解放。  
 《"571 工程"纪要》 兴灭国, 继绝世, 举逸民, …… 《论  
 语·尧曰》 译文: 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 国家, 接续断绝了 (世袭地位) 的  
 (贵族) 世家, 起用没落的 (旧贵族) 人士, ……

要设国家主席, 不设国家主席, 国家没有一个头, 名不正言不顺。 吴法  
 宪交代林彪的话, 转引自中发〔1972〕 24 号文件 按: 林彪对  
 抗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多次指示, 以孔子"名不正言不顺"的反动说教为根  
 据, 顽固地坚持反党政治纲领, 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必  
 也正名乎!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 《论语·子  
 路》 译文: 必须正名分! ……名分不正, 讲起话来就不妥当合理; 说话不顺  
 妥当合理, 事情就办不成; ……

二、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 阴谋篡党夺权

林彪 孔孟

天马行空 独往独来 林彪赠叶群 六二·六一  
 (条幅, 林彪卧室) 注: 据《史记·大宛传》记载, 天马是一种神马。《庄子·在宥篇》有"独往独来"一语, 原文是: "出入六合, 游乎九州, 独往独来, 是为独有。独有之人, 是谓至贵。" 按: 这是林彪手书, 挂在他的床头正中墙上。林彪自比天马, 以"至贵"、超人自居, 妄图实行独裁统治。值得注意的是, 这件材料写于一九六二年, 可见林彪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由来已久。 天马行空 猛志常在 (陈伯达题词册, 林彪卧室) 天马横空 知无涯 (陈伯达题词册, 林彪卧室) 如欲平治天下, 当今之世, 舍我其谁也? 《孟子·公孙丑下》 译文: 如果要平治天下, 在当今这个时代, 除了我还有谁呢?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571 工程"纪要》  
 天生德于予, 桓 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 译文: 上天把治天下的圣德和使命赋予了我, 桓(音桓。宋国司马, 管军事行政的大官)能把我怎么样!

王者莫高周文, 伯者莫高齐桓, 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 患在人主不骄故也。 育容书于苏州六九仲冬 (条幅, 林彪卧室) 注: 见《汉书·高祖本纪》十一年求贤诏。"骄"原文是"交", 两个"莫高"后, 原文都有"于"字。"患"字写后又圈去。《汉书》原文的意思是: 帝王没有比周文王再高的, 霸主没有比齐桓公再高的, 但是他们都是依靠贤人才成名的。现在天下有智能的贤人有的是, 难道只有古代才有吗? 问题在于做人主的不去和他们结交。 按: 林彪写这段话, 挂在他床头右侧墙上, 他自比周文、齐桓, 把历代统治者当"人主"的经验作为座右铭, 妄图建立封建法西斯的王霸之业。 每临大事有静气, 不信今时无古贤。 叶群同志存 伯达 [退思书屋] (题词, 叶群办公室) 按: 陈伯达吹捧叶群为今时之"古贤", 颂扬她帮助林彪搞反革命政变能沉住气。

有些人不承认天才,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 一九六六年

五月十八日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认为人有两方面：一方面有天生的问题，一方面有教育的问题。人才，人的智慧和能力，这是两方面的结合。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温文、豪放、理智，既受于天，且受于人。 书赠爱妻叶群 林彪  
五·廿六（刻在砚盒上，叶群办公室）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论语·季氏》 译文：生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经过学习然后知道的人，是次一等；遇到困难还学习的人，是再次一等；遇到困难不学习，老百姓就是这样等的人。

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论语·子罕》 译文：太宰问子贡：“孔夫子是位圣人吗？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艺。”（太宰，官名。据汉郑玄注，这里的太宰是指吴国太宰伯嚭。嚭音痞。又据唐孔颖注，是指吴国的还是宋国的太宰，不能确定。）

……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讲话 李杜诗篇万口传， 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陈伯达题词册，林彪卧室） 注：见清代赵翼《论诗绝句》。李杜指唐代诗人李白、杜甫。 按：陈伯达借这首诗恶毒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吹捧林彪是“天才”，为林彪抢班夺权制造根据。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孟子·公孙丑下》 译文：每过五百年一定会有英明的帝王出现，那中间一定有闻名于世的人产生出来。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污蔑劳动人民

林彪 孔孟

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 林彪一伙的黑话，转引自中发〔1972〕4号文件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孟子·滕文公上》  
译文：没有统治者，就没有人治理劳动人民，没有劳动人民，就没有人供养统治者。

先知先觉是有的，否认先知先觉的存在，这是大的错误。 陈伯达：《三民主义概论》（一九四〇年增订版）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 《孟子·万章上》 译文：上天生育人，就是要先知先觉者来使后知后觉者有所觉悟。我呢，是天生的先知先觉者；我就要拿这个〔尧舜之〕道使现在的人有所觉悟。不是我使他们觉悟，又有谁呢？

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千年愚。 （陈伯达题词册，林彪卧室）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漫漫思想界， 长夜有明灯。 赖此导人类， 探讨永无垠。  
录译诗 （陈伯达题词册，林彪卧室） 注：垠音银。无垠即无边、无止境的意思。  
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  
《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老百姓天天不是在谈抗日，在谈共产党这一套。他们谈的是他们本身的事情，怎样种田，年成好，每天怎样做工流汗，怎样做生意。整天男女大小全在这一套。……他们想他们生活那一套，我们想我们这一套。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七大的发言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论语·里仁》 译文：统治者注重道德，劳动人民想的是种地的事；统治者关心维护制度，劳动人民想的是小恩小惠。

你看中国人民见了面说，你吃了饭没有？蒙古人见了面说，牲口好不好？这就是讲生活问题。过了年见面时说，"恭喜发财"写对子时，写一个大"财"字，"

招财进宝"贴在门上。老百姓脑筋里想的就是这些东西。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七大的发言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译文：统治者明白大义，劳动人民只知道小利。

我们同志的脑筋不是普通农民的脑筋，也不是普通工人的脑筋。他们想的是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我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天壤之别。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七大的发言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论语·阳货》 译文：高贵的有智慧的人和卑贱的愚蠢的人是先天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泰伯》 译文：劳动人民只能供使唤，不能让他们知道什么道理。

####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林彪 孔孟

秦始皇焚书坑儒 转引自中发〔1972〕4号文件 按：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当毛主席讲到"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时，林彪插话指责秦始皇，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当即予以严驳斥。这里便暴露了林彪尊孔反法，借咒秦始皇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面目。秦……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 董仲舒：《对策》（《汉书·会董仲舒传》） 译文：秦朝……严禁学术文化，不许挟带书籍，抛弃礼义，连听到礼厉义的话都厌恶，其用心是要把先王骂之道完全毁灭掉。

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的讲话 林 xxx 号召我们做个革命的董仲舒，他是西汉人。秦始

皇当皇帝后，主张愚昧政策，大搞焚书坑儒，使孔孟的学说吃不开了。这时董仲舒给皇帝讲道理，要想永远统一天下，就要有一种能统一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是一种思想，那就是孔孟之道。如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由于他高举了孔孟之道，所以很快被人民接受了，一直传了几千年。 陈伯达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的讲话 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译文：汉朝的儒家，只有董仲舒（继承孔孟之道）最纯粹，他的思想（是儒家的）正统，别人没法比。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 赠宜敬同志 育容 一九六九·十·一 （条幅，林彪卧室） 注：“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见《史记》卷六十八引《尚书》的话。意思是：依靠德行必然兴旺，依靠暴力必然灭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见苏轼《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意思是：用君子长者的道理治理天下，这就是最忠厚的了。 按：正当亿万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林彪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用儒家的语言，恶毒攻击革命暴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孟子·公孙丑上》 译文：以力压服人的，人家不会从心里服从，……以德服人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

忠孝节义是封建的 用其内容……仁-团勇-斗 不用地词，用归纳法智-唯物论 吸其内容 （林彪存用的卡片） 按：林彪鼓吹儒家的“忠孝节义”，把孔子的“仁”、“勇”、“智”说成是“团结”、“斗争”、“唯物论”，用儒家的反动思想冒充并篡改马克思主义，赤裸裸地继承封建糟粕，作为他反党反人民的思想武器。 关于中国的旧道德，如“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些东西，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内容上可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认为这些道德在现代可以成为新的美德。 陈伯达：《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一九三八年五月） 孔子认为具有知、仁、勇三种德性，才是完全的人格。 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九三九年四月）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中庸·二十章》 译文：智、仁、勇这三样是通行于

天下的美德。

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己家的原理。 （《辞海》3058 页，"恕"字条上林彪的批语，林彪办公室）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矣。" 《论语·里仁》 译文：曾子说："孔夫子（贯彻始终）的道理，就是'忠恕'。"

从来人们都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成极高的美德，其实还是限于一面；极高的美德，极高的"忠恕之道"，应该还进而是"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我们就把儒家所代表的封建社会美德转变为极高的人类美德，而且在哲学上恰是由唯心论转变到唯物论。 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九三九年四月）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译文：子贡问："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呢？"孔子答："那就是恕吧！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加给别人。"

##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林彪 孔孟

中庸之道……合理 （林彪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三日口授，叶群亲笔记在《101 谈话》笔记本上）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论语·雍也》 译文：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老百姓缺少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 既不过度又没有不及叫做中。庸，是任何时候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程子说："不偏就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就叫做庸。中是天下必须遵循的道，庸是天下永恒不变的理。"

凡事勿做绝了，做绝即一点论、必有恶果 果大则现 果小、或其他力量能压得住则不显，（但大胆肯定必有恶果） 例 仲尼不为已甚者。

《孟子·离娄下》 译文：孔子不做太过分的事。

绝则错 阿处其女政局委员——做绝了对 X 骂绝了对明斗绝了、（乱了套）对大公做绝了"才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

（叶群亲笔记在《工作手册》（五）上，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之间） 注：阿女政局委员指阿尔巴尼亚党内修正主义分子贝利绍娃。X 指赫鲁晓夫。明指王明。大公指苏修。 按：林彪用中庸之道恶毒攻击反修斗争，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个对集之相成作用，过集对个之相成作用，过分则转化，而过极则相反结果相同而不过极则成。 （当前积极性问题最大——乃大中之大 积来于生活）

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 译文：（办事情）超过了（礼的规定）就象做不到（礼的规定）一样。

（叶群亲笔记在《工作手册》（五）上，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 按：林彪用中庸之道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过分"、"过极"，破坏了个人的积极性。 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它就会破坏统一。 （《辞海》461 页"反粒子"条上林彪的批语，林彪办公室）

两斗皆仇，两和皆友。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 译文：有子说："礼的应用，以调和为贵。"

本来在目前，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所强调的并不是阶级斗争；相反，我们是主张各阶级的联合，实行互助互让。 陈伯达：《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若干辩证》（一九三九年五月）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论语·颜渊》 译文：天下的人都是自己的兄弟嘛。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林彪                      孔孟

勉从虎穴暂栖身，            说破英雄惊煞人。            巧借闻雷来掩饰，            随机应变信如神。            （条幅，林彪卧室）            按：林彪抄录《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的这首诗，把原文的"趋身"改为"栖身"，一字之改，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韬讳            操之论英雄            胸有大志            腹有良谋            范蠡            （林彪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三日口授，叶群亲笔记在《101谈话》笔记本上）            注："韬讳"，原文是"韬晦"，见《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原文是："玄德也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胸有大志，腹有良谋"也见《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原文是："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范蠡（蠡音里）是春秋末年越王勾践的谋臣，越灭吴以后，他离开了勾践。            按：这件材料和上件材料一样，充分暴露了林彪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刻骨仇恨，他妄图用韬晦之计隐蔽其反革命真相，窥测方向，伺机而动。            子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易·系辞下》            译文：孔子说："……尺蠖（蠖音获）这类昆虫弯曲它的身体，为的是向前伸展。龙蛇的冬眠，为的是保存自身。研究屈伸一类的道理达到入神的境界，为的是应有。用以屈求伸的办法保全自身，为的是发扬〔奴隶主的〕道德理想。"

忍耐，大度的科学根据            ……            岂可为了一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终身大事。            （林彪亲笔写在一九六三年《工作手册》（十）上）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条幅，林彪卧室）            注：见苏轼《留侯论》，原载《应诏集》。苏轼曾做"侍读"，为皇帝讲授统治术。《留侯论》中吹捧张良为"盖世之才"，"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骤"原文是"卒"，在"卒然临之"前原文有"天下有大勇者"，在"无故加之而不怒"后原文有"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按：这是林彪手书，挂在他床头左侧墙上。林彪自命为"盖世之才"、"天下大勇者"，告诫自己，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狂妄野心，必须暂时"忍耐"。            小不忍则

乱大谋。 朱熹注：小不忍，如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论语·卫灵公》 译文：小事上不能忍耐，就会坏了大事。 小事上不能忍耐，诸如妇人的见识、匹夫的勇敢都是。

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 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孟子·离娄下》

立场 [三不]①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免争领导之嫌（不建言）②不批评③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 译文：大人物，说话不一定兑现，行动不一定做到，…… 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大学·十章》

（叶群亲笔记在《工作手册》（五）上，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之间） 译文：喜好人家所厌恶的，厌恶人家所喜好的，就是违背人性，那灾难就必然要临头了。 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论语·季氏》 译文：（对上说话要察言观色，）不看脸色而贸然说话，就是瞎子。（瞽音古）

闭目养神 照上面办 不置可否 三不主义 不负责 不建言 不得罪 韦编三绝 孔子读易的精神 面带三分笑 （叶群一九六三年亲笔记在《工作手册》（十）上） 按：以上两件材料，充分暴露林彪这个阴谋家、两面派的丑恶嘴脸。 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孟子·离娄下》 译文：说人家不好的地方，招来后患怎么办呢？

不成功便成仁。 《"571 工程"纪要》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译文：有志之士，有德之人，不会贪生怕死以损害仁，只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以完成仁。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林彪 孔孟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571 工程"纪要》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滕文公上》 译文：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别人，统治者靠人养活，这是天经地义的。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571 工程"纪要》 按：  
 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措施。林彪对此进行恶毒攻击，妄图煽动群众，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论语·卫灵公》 译文：种田嘛，免不了饿肚子；读书嘛，就可以升官发财。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论语·子路》 译文：孔子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如何种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樊迟出去以后，孔子骂道："樊迟这家伙是个没出息的小人！统治者如果重礼制，那么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统治者如果讲仁义，那么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统治者如果讲信用，那么老百姓就不敢不说真情。这样的话，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儿女投奔前来，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林彪 孔孟

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 知非而处……道之所止也。强而弱，忍而刚，……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录武经太公兵语赠虎儿 爸爸 一九六三·十一·十六 （条幅，林立果办公室） 注：见《武经七书》中《六韬·文韬·明传》。"时至而疑"四字林彪写了又划去，并略去"文王寝疾"、"明传子孙"、"柔而静"、"恭而敬"等

语。《明传》原文是：“文王寝疾，召太公望，太子发在侧。曰：‘呜呼！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汝。今予欲师至道之言，以明传子孙。’太公曰：‘王何所问？’文王曰：‘先圣之道其所起所止，可得闻乎？’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原文的意思是：周文王病危，召见姜太公吕望，太子姬发（即周武王）在旁。周文王说：“唉！老天爷要抛弃我啦，周朝的天下将要托付给你啦。现在我想学习最高的道理，来明确地传给子孙。”太公问：“王问的是什么呢？”文王说：“是不是可以把先圣之道提倡哪些，禁止哪些，说一说？”太公说，“遇到好事而怠慢，时机到了而犹豫，明知事情不对反而参与，这三点是先圣之道所禁止的。柔顺而又沉静，谦恭而又敬重，强毅而能卑弱，忍耐而能刚劲，这四点是先圣之道所提倡的。所以大义胜过私欲就昌盛，私欲胜过大义就灭亡，恭敬胜过怠慢就兴旺，怠慢胜过恭敬就覆灭。” 按：这是奴隶主头子周文王临死前对其子武王传授统治经验的遗嘱。林彪亲笔抄录，作为教子经，挂在林立果办公室正中墙上，梦想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世袭王朝。

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                      书赠老虎儿                      爸爸                      六  
三·十·二十四                      （条幅，林立果办公室）                      孔子……读《易》，  
韦编三绝。                      《史记·孔子世家》                      译文：孔子〔反复〕读《易经》，以  
致编联竹简的皮绳断了多次。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赠豆豆女儿                      爸爸  
一九六二·十一·十七                      （条幅，林立衡卧室）                      君子坦荡荡，  
小人常戚戚。                      《论语·述而》                      译文：君子心胸宽广，小人经常忧愁。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书赠豆豆欢欢喜喜                      爸  
爸坚持到底                      六三·十·廿四日                      六八年四月加写                      （条幅，林立衡卧室）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附件

### 名词简释

这个附件，是我们对《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涉及的一些人名、名词概念所作的简要注释。由于我们的认识水平所限，注释不一定妥当，仅供参考。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这个注释的不妥之处将得到纠正。

### 名词简释

**周** 朝代名。我国大约从夏朝（起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开始进入有阶级的奴隶社会。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商朝（又称殷）灭夏。公元前一〇六六年，周武王灭殷，建立周朝，都城在今陕西西安，历史上称为西周。公元前七七〇年，周迁都今河南洛阳，称为东周。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

**春秋战国** 春秋原是鲁国的一部历史书名，记载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前四八一年的历史。后来把东周开始的那一年即公元前七七〇年，到前四七六年这一时期，称为春秋时期。战国指公元前四七五年到前二二一年秦统一，由于这个时期各诸侯国连年战争，因而后来称为战国。春秋后期到战国，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

**孔子** 名丘，又叫仲尼，排行老二，春秋末期鲁国（在今山东）人，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死于公元前四七九年。他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他一生为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奔走卖命。他在鲁国代行宰相的时候，一上台就杀了主张革新的少正卯。他游说各国诸侯，推行反革命主张，进行复辟活动，到处碰壁。他又通过所谓办教育、删改史书，制造舆论、培养人材，妄图复辟奴隶制度。孔子建立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反动思想体系，提出“克己复礼”的复辟纲领，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以及“学而优则仕”、鄙视生产劳动的反动教育思想。孔子的主要言行由他的门徒记载下来，编成《论语》一书。

**孟子** 名轲（轲音科 ke），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约生于公元前三九〇年，死于公元前三〇五年。当时，封建制在各诸侯国已经或正在建立，孟子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上，激烈地反对主张变革的法家，鼓吹“法先王”即效法前代的帝王，要开历史的倒车。孟子提出“仁政”学说，主要是反对革命暴力，要求恢复奴隶制的井田制和奴隶主贵族的世袭权利。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思

想，宣扬“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论，天生“性善”的反动人性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英雄史观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孟子的言行和思想记载在《孟子》一书中。

**孔孟之道** 指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反动政治路线和唯心论思想体系。孔孟反对社会变革，主张复古倒退，顽固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度。汉代以后，经过历代统治者的修饰和发挥，孔孟之道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和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到现代，孔孟之道仍为中外反动派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所利用。

**儒家** 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儒，起先是指替奴隶主贵族办丧事之类的那些人。孔子开始也是从事这类职业的，后来办私塾，招收学生讲学，宣扬复古倒退的思想，从事反对变革的政治活动，千方百计挽救奴隶制旧制度，逐渐形成一个学派，后人称它为儒家。秦汉以后，继承发挥孔孟思想的，统称为儒家。

**法家** 战国时期与儒家对立的一个重要学派，以商鞅（？至前三三八年）、荀子（约公元前三一三至二三八年）、韩非（约公元前二八〇至前二三三年）为主要代表。这个学派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宣传“人定胜天”的唯物论，反对“听天由命”的唯心论；提倡变法革新，反对复古倒退；主张用“法治”代替“礼治”，实行地主阶级的专政以代替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后人称这个学派为法家。

**礼治** 儒家提倡的政治主张，它要求按周礼进行统治。儒家从孔子起就强调绝对遵守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礼节仪式，严格划分奴隶主和奴隶的社会地位，各级奴隶主贵族要安于等级名分，不得越轨。

**法治** 法家提倡的政治主张。它要用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公开法令，反对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和等级分封制度，用暴力打击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势力，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法治”和“礼治”的对立，反映了法家和儒家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

**董仲舒** 西汉儒家的代表，地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家，约生于公元前一七九年，死于公元前一〇四年。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他提出“罢黜（黜音触 chu）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奉为正统思想。董仲舒继承发挥了孔孟的反动天命论，建立了一个神学唯心论体系。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上天（神）有目的安排的，封建皇帝的统治权力也是上天授予的。他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

上学思想，提出“三纲五常”的反动说教，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制造理论根据。朱熹 南宋儒家的代表，是继孔孟之后封建时代影响最大的唯心论哲学家，生于一一三〇年，死于一二〇〇年。朱熹认为，宇宙万物和封建秩序都是由先于事物存在的“理”决定的。他把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三纲五常”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天理”，把一切违反封建统治秩序的欲望、要求，说成是万恶的“人欲”，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主张，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制造根据。朱熹编成的《四书集注》，被以后的封建统治者规定为必读教科书。

仁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关于仁有许多说法，根本的一条就是他说的“克己复礼为仁”，即要求人们一言一行完全符合周礼，为复辟奴隶制服务。他还宣扬“孝悌”，把孝顺父母和顺从兄长，作为仁的重要内容，以维护奴隶制的宗法关系，防止“犯上作乱”。他又说仁是“爱人”，实际上他们爱的只是一部分奴隶主贵族。孔子鼓吹“杀身以成仁”，要“志士仁人”为奴隶主阶级卖命。

义 孔孟说的义，是指行为服从奴隶制统治秩序的精神。孔子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可见他们宣扬义，正是为了防止“犯上作乱”，维护旧的传统和秩序。儒家标榜重“义”轻“利”。实际上是根本否定奴隶的利益，反对法家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保护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礼 孔子所说的礼就是周礼，是指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礼节仪式等，属于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在孔子看来，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破坏了礼就是大逆不道。孔子口口声声叫嚷“复礼”，是要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把社会拉向后退。

忠恕 孔子仁的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忠，就是要尽心竭力为奴隶主阶级效劳。恕，就是所谓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加给别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宣扬恕，是要奴隶主阶级内部互相体谅，对劳动人民则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决不宽容。

中庸 孔子宣扬的一种“最高的美德”。它要人们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完全按照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的规定办事，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违背和偏离。历代统治者鼓吹中庸之道，就是要用折衷调和、平庸保守的思想，掩盖社会矛盾，反对阶级斗争，巩固旧的统治秩序。

德 孔子鼓吹的德，是指奴隶主贵族的道德，它要奴隶主遵照仁义、孝悌、忠恕、

中庸等规范行事，以调整本阶级内部关系，和对奴隶进行精神统治。他鼓吹“为政以德”是要用奴隶主的道德说教，来麻醉劳动人民，加强思想奴役，维护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孔子宣扬德是天生的，只有奴隶主阶级才具备。

正名 所谓“正名”，就是用旧的奴隶制的等级名分去纠正已经发展了的客观现实：君要象个君，臣要象个臣，父要象个父，子要象个子，这一切都不能乱，不能动。孔子宣扬这种反动的唯心论，是妄图保住行将灭亡的奴隶制度。

三纲五常 董仲舒提出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说，君、父、夫具有绝对统治的权力，而臣、子、妻只能绝对服从，这是上天（神）的意志规定的。这“三纲”也就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成为两千多年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五常”就是所谓五个永恒不变的原则，指“仁、义、礼、智、信”，它是儒家用来维护和调整“三纲”关系的反动道德教条。

五经 五部儒家的“经典”，即《诗》、《书》、《礼》、《易》、《春秋》。汉以后，封建统治者把它们合称为《五经》，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

《诗》，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相传经孔子删过，又称《诗经》。

《书》，又名《尚书》、《书经》，是春秋战国以前的政治文告和历史资料的汇编。

《礼》，指《周礼》、《仪礼》、《礼记》等书。《周礼》记载周朝关于国家机构和官职的规定。《仪礼》记载周朝的婚、丧、祭祀、交际等礼节仪式。《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关于礼的论述的汇编。

《易》，又名《周易》、《易经》，古代一部占卜的书，分“经”、“传”两部分。《系辞》就是“传”的一种。

《春秋》，春秋时期鲁国按年记载当时历史的书。孔子根据维护奴隶制的需要作过删改。《左传》是一部解释《春秋》的书。

四书 儒家的“经典”。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作了注解，称为《四书集注》。

井田制 我国奴隶社会奴隶主剥削奴隶的土地制度。当时全国土地属于奴隶主天子天子所有，土地被划成井字形的方块田，分封给各级奴隶主贵族，由他们强迫奴隶耕种。井田是奴隶主贵族受封多少的计算单位，也是强制奴隶劳动的计量单位。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文章《略论秦始皇的暴力》

秦始皇处在我国历史由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急剧变革时期。他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结束了诸侯割据的局面，成为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他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大胆革新了旧的政治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运用法令的权威，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在全国范围的合法化，进一步促进了封建经济基础的发展。他崇尚法家，反对儒家，主张革新，反对复古，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坚决打击反动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两千多年来，在我国历史上，那些复古守旧的反动分子，无不咒骂秦始皇。他们极力否定秦始皇的业绩，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其中一种最为流行的说法，便是说秦亡于“暴”。有的说，“始皇暴虐，至子而亡”<sup>①</sup>。有的说：“秦政暴虐”<sup>②</sup>。有的议论说，“伤秦政之为暴，弃仁义以自亡”<sup>③</sup>。连一些对秦始皇有所肯定的人，也不敢冒犯这个结论。如西汉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称赞秦始皇“世变异、成功大”的时候，也同意那种责难秦始皇“以暴虐为天下始”的观点<sup>④</sup>。就这样，一个“暴”字模糊了历史的真相，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今天，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以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在秦始皇的“暴”字上大作文章，并借以恶毒攻击、污蔑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此，我们必须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对秦始皇的暴力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批判在这一问题上的历史唯心主义谬论，揭露国内外反动派妄图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一）

恩格斯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sup>⑤</sup>这是我们在分析暴力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那么，秦始皇的暴力究竟是为哪个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起了什么作用？

在秦始皇所处的时代，经过春秋晚期到战国几百年的斗争，封建生产关系已经在社会经济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奴隶制经济仍然占有很大地盘；适应着封建生产

关系的新的上层建筑刚刚建立起来不久，而为奴隶制经济基础服务的旧的上层建筑仍保持着相当强大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的地主阶级同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之间革命同复辟、进步同反动、革新同守旧的斗争表现得特别尖锐、特别错综复杂。由于新兴的地主阶级代表了当时新的生产关系，处在上升阶段的地主阶级是革命者，是先进者。它的经济利益首先要求击败奴隶主复辟势力种种形式的反抗，摧垮旧的上层建筑，扫除奴隶制经济所占据的地盘，保证封建经济基础的发展，巩固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借助于暴力才能完成。正如列宁所说：“在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用暴力来解决的。”<sup>⑥</sup> 纵观秦始皇的一生，在创建和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过程中，施用暴力于反动势力，数其大者有三：

一是公元前二三八年，秦始皇镇压了 l à o @①②反革命武装叛乱。次年，他又查办了吕不韦。秦始皇同吕、l à o @①复辟集团的斗争，是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秦始皇的胜利，意味着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暴力战胜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反革命暴力，制止了秦国在政治上的逆转，为统一中国的战争作了必要的准备。二是公元前二三〇年至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用战争消灭了关东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混乱的局面，统一了中国。这是秦始皇使用的最大规模的暴力。秦始皇领导的统一战争，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和人民群众的愿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战争是进步的战争。这一点，连指责秦始皇的西汉贾谊也不得不承认。他说：“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sup>⑦</sup>

三是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下令焚了宣传开倒车的私人所藏的儒家经典。次年，他又坑了进行复辟活动的四百六十多个犯法儒生。“焚书”是新兴地主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对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坑儒”是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不打击反动派的复辟，秦政权就不能巩固。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指出，那种把暴力看成是“绝对的坏事”的观点是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sup>⑧</sup>。秦始皇的上述暴力正属于这种性质，“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sup>⑨</sup>，是革命的，进步的。

然而，千百年来反动统治阶级却百般诅咒这种革命的暴力，把它说成是秦朝二

世而亡的原因。他们特别诅咒“焚书坑儒”，危言耸听地叫嚷，“竹帛烟销帝业虚”，“坑灰未冷山东乱”<sup>⑩</sup>。“秦坑儒耶？儒坑秦耶？”<sup>⑪⑪</sup>

果真是秦始皇的革命暴力，导致了秦朝的灭亡吗？果真是秦始皇的一把焚书之火，烧虚了自己的帝业？果真是那四百六十多个被坑儒生的亡灵，唤来了覆灭秦朝的风暴么？这个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什么是秦始皇的帝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秦始皇的帝业首先是革新的事业，统一的事业。恩格斯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sup>⑫⑬</sup>。时代变了，一切政治、思想、文化都要变，不能守旧，更不能复古。过时的奴隶制度要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新兴的封建制度要占领历史舞台。这就是秦始皇帝业的主流。斯大林指出：“如果不能摆脱封建分散和诸侯混乱的状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只有联合为统一集中的国家，才能指望有可能真正发展文化和经济，有可能确立自己的独立。”<sup>⑭⑮</sup>统一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历史趋势，是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愿望。旧的诸侯割据称雄的藩篱，是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阶级复辟势力的庇护所，统统都要拔除；新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的楼宇，要建立起来。这就是秦始皇帝业的主流。焚书坑儒于秦始皇的帝业，何虚之有？！

恰恰相反，如果不尊法反儒，不焚书坑儒，不坚决镇压反革命，不注意上层建筑包括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复辟反复辟的斗争，那才会真正地虚了秦始皇的帝业。君不见，那些旧贵族和儒家子弟，有的更名改姓，混入封建地主阶级新政权机关，伺机变天（张耳、陈余“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sup>⑯⑰</sup>）；有的闭门不出，将反动诗书密藏深匿，对抗秦始皇“焚书令”（孔鲋：“秦非吾友……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sup>⑱⑲</sup>）；有的更赤膊上阵，大搞卑鄙的暗害活动（张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sup>⑳㉑</sup>）。他们念念不忘的不正是要虚秦始皇的帝业么？

正是这伙反动势力，连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陨石也不放过，在上面刻写反革命标语，说什么“始皇帝死而地分”，妄想复辟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也正是这伙反动势力，当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以后，纷纷削尖了脑袋，钻入农民革命队伍。他们妄

图利用农民大起义，来实现变天复辟梦想。他们当中有的人，如张耳、陈余拥兵一支，忙于称王割据，公开号召“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sup>①⑦</sup>，大肆进行复辟活动。他们当中有的人，如孔子的八世孙孔鲋，混到了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身边，狂热鼓吹孔孟之道，大讲“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那一套反动儒学，对农民起义的领袖进行思想腐蚀<sup>①⑧</sup>。以上种种事实充分说明，秦始皇对奴隶主复辟势力使用暴力，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是完全必要的。尽管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在秦末活动猖獗，然而他们同农民阶级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到头来在农民大起义所推动的历史进步中捞到的只是更大的失败。他们千方百计地妄图实现复辟奴隶制的分封制的梦想，终究没有实现，也不可能实现。

秦始皇所创建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是适应封建社会的发展要求的。百代都行秦政法。这就是历史对秦始皇以革命暴力推行的进步事业的结论。

不同时代的各种反动阶级是息息相通的。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遭到可耻失败后，贼心不死，竟哼着“竹帛烟销帝业虚”，“坑灰未冷山东乱”，来表达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刻骨仇恨。他们左一个“虚”，右一个“乱”，念念不忘颠覆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伙无产阶级的叛徒竟堕落到向两千年前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一千年前封建文人的亡灵乞求精神力量，这就充分地说明，他们只能步其反动祖先的后尘，走完那条“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阴暗的路。

## （二）

恩格斯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一个阶级的任何新的解放，必然是对另一个阶级的新的压迫。”<sup>①⑨</sup>秦始皇的暴力是一把两面锋刃的宝剑，一面锋刃对准奴隶主复辟势力，另一面锋刃对准在新的封建制度下被剥削、被奴役的农民阶级。秦始皇对人民群众的暴力，是维护地主阶级经济利益的手段。这一暴力受到了农民阶级的坚决反抗。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推翻了秦的统治。在这场风暴的斗争实践中，涌现了我国第一代农民阶级的英雄——陈胜、吴广。

应该怎样分析秦始皇暴力的这一面锋刃？

我们首先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秦始皇对农民阶级的暴力，反映了封建社会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秦始皇的时代，

我国的封建生产关系还是一种新兴的生产关系。从春秋战国之交我国进入封建社会到秦始皇统一全国，不过二百多年。这二百多年间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了这种新的生产关系总的说来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同样，新建立起来不久的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特别是秦的统一，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割据和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给广大人民造成的痛苦，为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是受到人民欢迎的。但是，这决不是说，封建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之间，就没有矛盾了。秦始皇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新的解放，所带来的正是对农民阶级的新的压迫。秦帝国建立以后，地主阶级国家政权同农民阶级的矛盾迅速激化起来，主要表现在秦代大规模的强制徭役和十分苛重的赋税上面。特别是修阿房宫、造骊山坟，“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sup>②①</sup>，给人民带来巨大痛苦，并造成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的脱离，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马克思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sup>②①</sup>由于封建生产关系是一种剥削关系，所以它同生产力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具有对抗性。秦始皇对人民的暴力，就是这种封建生产关系同生产力对抗矛盾的表现。这个矛盾是封建制度的剥削性质所决定的，是新兴地主阶级包括象秦始皇这样杰出代表人物所不能解决的。只有农民阶级的武器的批判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个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sup>②②</sup>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陈胜、吴广农民起义的丰功伟绩，是历史上剥削阶级杰出人物所不能比拟的。

我们再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恩格斯在研究人类社会从原始公社制过渡到奴隶占有制时指出：“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深入地研究一下，那我们就一定会说——尽管听起来是多么矛盾和离奇，——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甚至对奴隶来说，这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成为大批奴隶来源的战俘以前都被杀掉，而在更早的时候甚至被吃掉，现在至少能保全生命了。”<sup>②③</sup>同样，在从奴隶制转变到封建制的时代，处在地主阶级统治下的农民比起奴隶主阶级压迫下的奴隶来，其地位有所改善，也是一个进步。正因为如此，秦始皇用革命暴力扫除奴隶制残余，取得的一些成果，在客观上是符合人

民利益的。

然而，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我们却看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那些曾经被秦始皇革命暴力打击得狼奔豕突的反动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把自己打扮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咒骂起秦始皇对农民的暴力来了。他们说什么：“秦……外内骚动，百姓罢敝，……财匮力尽，民不聊生”②④。其实，这种现象并不奇怪。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封建的社会主义时，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种反动阶级“为民请命”的罪恶行径，指出：“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却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②⑤原来那些冒牌的“农民利益的代表者”，正是这种臀部带着奴隶主贵族纹章的反动家伙。他们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为的是拉拢人民，混水摸鱼，妄图否定秦始皇对他们实行的革命暴力，恢复奴隶主阶级的天堂。他们丝毫没有打算对广大劳动人民施“仁政”，而是要把他们重新打入实行“人殉”、“人牺”的奴隶制的活地狱，复辟奴隶主阶级的残暴统治。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而林彪一伙也承袭了昔日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故伎，在反革命《“5 7 1 工程”纪要》中，大骂秦始皇，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打起了“为民请命”的旗号，叫嚷什么要“解放一大片”。他们所为之请命的“民”，他们要解放的“一大片”，不过是解放二十多年来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所镇压的那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大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统治。他们同历史上一切复辟势力一样，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补充通知

1974.01.22；中发〔1974〕2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中央决定，在传达、学习、讨论中发〔1974〕1号文件时，增加以下学习文件和

文章：

一、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

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

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四、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

五、《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

以上为学习的第一单元。

六、《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

以上为学习的第二单元。

七、《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

八、《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杨荣国）

九、《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杨荣国）

十、《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唐晓文）

十一、《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

——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罗思鼎）

十二、《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冯友兰）

十三、《孔子维护哪些奴隶制》（高亨）

十四、《〈封建论〉的尊法反儒精神》（北京师范学院史众）

十五、《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北京大学哲军）

十六、《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杨荣国）

以上为学习的第三单元。

中 共 中 央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的信

洪文、剑英、春桥、小平同志：

首先代我问候全军同志们春节好！相当长时间了，从许多材料看来，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

与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我特请谢静宜和迟群二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他们已下过连队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这是使国内外帝修反惊恐的事。全国党、政、军、民、学，通过这个学习，可以取得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现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解释》各二百份和《五四运动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十本，《鲁迅批判孔孟之道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一份供同志们参考。文件，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可以翻印。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我相信同志们会努力学习保持我军光荣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克的堡垒，只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将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但也是光荣的。毛主席说能文能武，长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学得文武双才，才能完成毛主席，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 74.1.24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转发《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学习江青同志给二十军防化连的信的报告》，《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给江青同志的来信》和《二〇八一部队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

1974.01.25；中发 [1974] 3 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南京军区党委给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报告以及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和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二件转发你们，供全国党、政、军、民、学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附件一：



南京军区党委关于学习江青同志给二十军防化连的信的报告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最近，江青同志看了解放军报内部参考上刊登的关于二十军军直防化连在批孔问题上的反映后，于一月十三日亲自给防化连全体同志写了信，赠送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各二百份。随信还附送：（1）《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一份；（2）《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一份；（3）《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一份；（4）《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哲学》一份；（5）读柳宗元《封建论》一份。并派谢静宜、迟群同志专程送到防化连。谢、迟二同志一月十五日到部队后，连夜向防化连全体同志宣读了江青同志的信，发了江青同志赠送的学习材料。防化连的全体同志十分感动，正按照江青同志的指示，认真进行学习。二十军党委除帮助防化连搞好学习外，并要求部队把学习江青同志的信，深入批林批孔，作为加强部队思想建设的大事来抓。

一月十六日，军区党委接到二十军报告后，除连夜派员赶到防化连，请谢、迟二同志转达我们对江青同志的感谢外，并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江青同志的信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军区部队广大指战员的关怀，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的重大战略措施，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抓好典型的要求。我们决心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关于议军、议政，提起政治思想工作的纲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把批孔作为深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深入批林整风的大事来抓，掀起一个新的批林批孔高潮，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建设；推动战备训练等各项任务的完成。我们打算通过二十军防化连和南京路上好八连，并要求各军、师都抓一个连队，先学习江青同志送来的材料，取得经验，逐步推广，努力克服不善于抓典型，工作一般化的毛病。我们已将江青同志的信和我们的上述认识，向军区领导机关和各军的同志通了个气，要求他们对当前批林批孔的情况进行一次认真地分析，提出深入批林批孔的意见。军区定于二月四日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学习江青同志给防化连的信，认真讨论深入批林批孔的措施，抓紧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抓好反修防修教育，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以上如有不当，请指示。

南京军区党委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日

附件二：

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给江青同志的来信

江青同志：

您一月十三日写给我部防化连全体同志的信和赠送的两百份批林批孔材料，已由谢静宜、迟群同志于到达军部的当天晚上面交防化连。收到您的信和材料后，我们和防化连全体同志受到很大的鼓舞，心情十分激动。

我们党委常委对您的信进行了认真的学习，一致认为，您的信不仅是写给防化连的，也是写给我们全军指战员的，是对我们党委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有力鞭策，它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深入批林批孔，抓好部队的思想建设。

江青同志，您在繁忙的工作中这样关心连队建设，关心战士的成长，使我们深受教育。防化连在我们身边，他们对批孔问题的反映，我们都看过，他们提出的问题也是我们军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我们对批孔的意义和批孔与批林的关系认识不足，没有很好地去抓，这是应该引为教训的。

为了进一步贯彻十大精神，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认真解决部队在批孔问题上遇到的困难，经常委研究：

一、已经将您的来信印发到全军各连，把您赠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除防化连人手一册外，分发给各师、团。要求各级党委认真学习，带动部队进一步提高对批林批孔意义的认识，在全军范围内掀起一个批林批孔的高潮。

二、军、师、团各级党委都要对部队的批林批孔形势作一次认真的分析研究，总结经验，找出问题，提出深入进行批林批孔的措施。

三、各级在批林批孔中都要深入实际，抓好典型。军党委拟在二月份由负责同志率领机关干部，深入一、两个连队，在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同时，进行批林批孔教育，认真抓好防化连这个点，总结经验，做出实际成绩来，向您汇报。

谨致

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中共陆军第二十军委员会一九七四年元月十七日

附件三：

二〇八一部队防化连全体同志给江青同志的来信

江青同志：

您请谢静宜、迟群同志专程送来的信和材料都收到了，我们怀着异常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对您的亲笔信连夜进行了认真学习和热烈讨论。正当我们在批孔问题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您在百忙中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我们受到一次深刻的路线教育，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战斗力量。您的来信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我军建设的亲切关怀，为我们贯彻十大精神，深入批林整风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们决心反复学习您的来信，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和深远意义。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把批孔作为批林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决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殷切期望，在批林批孔斗争中知难而进冲锋陷阵，争当闯将。在斗争实践中，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增强防修反修的自觉性，抓好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热情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以基本路线为纲，以您的来信为动力，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全面加强连队建设，做到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党指向那里，我们就坚决打到那里。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致 以

崇高的无产阶级革命敬礼！

二〇八一部队防化连全体同志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六日

来源：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江青迟群谢静宜姚文元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记录稿〕

周恩来：

同志们，现在开会了，请王洪文同志领头唱一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体起

立，唱歌)

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和所属单位的同志们，今天在这里开个动员会，进行批林批孔动员。我们中央和国家机关已经落后了。昨天在这里军队已经大动员了。我们晚了一天，但是现在我们赶上去。中央对批林批孔问题已经发了两个通知，第一号已经发到你们手里了，第三号还没有到大家手里。

去年“十大”以后，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迟群同志向各省传达了准备批孔的问题，指出批孔是批林的组成部分。批孔在北大、清华两个学校是很早就进行了，最近又搞了一个材料，就是已经附在中央七四年一号文件上的这个材料。所以总是一步一步前进的。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江青同志的帮助和指导，把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方面的材料综合成几个问题，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说明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真忠实信徒。这个材料受到了主席的称赞。

今年初，王洪文同志和江青同志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是这样写的：“主席：我们看了北大和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觉得对当前的批孔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要的材料。我们提议，可否转发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兵种、各大总部、国务院各部，作为当前批林批孔的参考。现将材料呈上，妥否，请批示。王洪文、江青一九七四年元月十二日”。

毛主席批示，同意转发。主席还指示，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一道发下去。但是发得晚了一些，开始时耽搁了一下。我有责任。这是一件大事，本来还可以更早一点。现在我把两个通知念一下。(念通知，略)

第二个通知也念一下：中央决定，在传达学习中发七四年一号文件时，增加以下学习文件和文章：一，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略)

在报告了毛主席并经主席同意转发后，印发的过程中，江青同志也是注意抓这个问题。江青同志首先发现了二十军防化连的一个对批孔问题的情况反映，是军报内部参考上登的。江青同志看到那里的批孔推动不起来，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例如文字太长、深、不好懂，要求通俗易懂。正好这个时候也就是七四年一号文件上附的，北大清华搞的那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付印这个材料把林彪与孔孟之道的言论分类对比，简明扼要容易懂，江青同志看了《内参》

上的反映，就请谢静宜同志和迟群同志带着材料直送二十军防化连。并带去了江青同志的一封信，是 1974 年 1 月 13 日写的，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二十军防化连的全体同志，当我看到军报《内参》上有关同志们在批孔问题上有困难时，我正好收到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解释》，这两个材料对你们会有帮助的。请谢静宜和迟群同志到你们那里宣讲，并送去二百份供批林批孔参考，有什么问题，可请谢迟两位同志转告我。江青一月十三日

附送：1.《五四以来反动派、封建地主阶级学者尊孔复古文章摘录》；2.《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3.《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4.《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反对社会变革的》；5.《读柳宗元的〈封建论〉》。”

谢静宜和迟群同志到现场后立即和他们进行了座谈，浙江省委、防化兵和廿军党委均给江青同志来信，现把信转发各地，作为批林批孔的参考。跟着江青同志又给空军马宁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据说空军机关对批孔有些困难，特请苏元勋同志送上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名词解释》100份，可能有助于批林、批孔。请指定一个连队，由苏元勋同志去宣讲。”苏元勋同志在空军机要部门工作，九·一三前是受林彪一伙压制的，还被关进了监狱，九·一三以后，才受到了重视。江青同志的信里还写了：“请指定一个连队，一定请苏元勋同志参加座谈，有什么问题，请苏元勋同志转告我。江青七四年一月十三日”今天本来想请苏元勋也来参加这个会，空军马宁、传作同志同意了在 34 师传达试点，他事先已经约好了，要去 34 师开座谈会，没有来。马宁同志又复了信给江青同志，联想起来苏元勋同志就是谢静宜同志的爱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压，还关进了监狱，斗争很坚决，林彪一伙是很害怕这些敢于革命的人的。

第三封信，就是给国务院文化组的，是江青同志写给吴德同志的。信里这样写的：

“吴德同志：我请谢静宜和迟群同志代我向你们问候春节好，此外，请他们带去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历代反动派、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文章摘录》和《名词解释》各二十份，材料不够，可翻印，我希望文化组的批林批孔不断深入下去，开花生果。江青一月十三日”

第四封信就是江青同志给军委几位负责同志的（洪文、剑英、小平）。信是这样写的：“首先请代我向全军同志问好，有相当长的时间没有见面了，当前在全国

范围内，批林、批孔深入不下去，对林彪的思想和孔老二的思想关系都搞不清楚。北大和清华搞的这个材料，可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现请谢静宜同志和迟群同志来宣讲这个材料。另外，他们下去搞些调查研究，也可能有所帮助。批林批孔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是反修防修的头等大事，是国内外帝修反非常惊恐的事，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一定会取得更大的团结胜利，现送去《历代反动派、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的文章摘录》二十份，鲁迅的《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二十份供参考。文件和材料分数不够，可以翻印。有什么问题可报告中央，我们共同努力学习，保持优良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知难而进，没有攻不破的堡垒，我相信在人民解放军的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们的任务是光荣而艰巨的，毛主席说，要能文能武。《晋书·刘元海载记（？）》里说，汉朝的文官随何、陆贾无武，武将绛侯、周勃·灌婴无文。我们应该“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解放军报，七四年一月廿六日一版）。我们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的柱石，是文武全才。我们一定能胜利完成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江青七四年一月廿四日”

军委收到此信后，昨天在这里已经召开了动员大会。我今天早晨得到了这个消息，向政治局几位同志建议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同志今天开这个会议，

第五封信，就是江青同志给海军苏振华同志的信，信里说：“现请谢静宜和迟群两位同志到海司去搞试点，并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其他材料以后再送。七四年一月廿二日”

现在海军正在直属系统动员，第六封信是江青同志写给外交部的，这几天外交部有外事活动，没有发出，今天我交给了仲曦东同志。在这里我也念一下：“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的同志们，为了使你部的批林批孔更好更深入地发展，特请谢静宜和迟群两位同志送去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二百份，《五四以来反动派，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文章摘要》和《批林批孔文件汇编》各廿本，到你们那里宣讲批林批孔文件，希望你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将批林批孔运动取得更大胜利。江青一月廿二日”

这是六封信的情况。除此以外，江青同志还直接作了试点，一个是卅八军，一个是警卫一师，再一个是江青身边工作的一个直属单位。这些单位都已经作了试点。我们现在收到各地的简报，在批林批孔中，广大群众已经开始发动起来了，我们

也要求新华社，人民日报，军报的记者，要把方面先进的经验。好的典型，及时推广出去。刚才说了，我们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是落后一步，今天补上这一课，请政治局在北京的同志也出席一下，开个动员会，我的介绍完了。

江青：

这个材料里头可能印的有赵纪彬写的《孔子杀少正卯》。他是很用了功夫的。我看了两遍，我个人啊，用了工具书，还是没有完全看懂，因此暂时不发给同志们，但是那写批判文章的地方，我们准备发。这个材料里面没有印好，没有推荐。但是不能抹杀他的功劳，因为他是用了很长的时间研究的。赵纪彬，教授吧？

迟群：

江青同志给我们两个人的任务有三条，下去以后，一个我们是送信，送材料，当通讯员；第二就是去学习；第三就是大家还有什么要求和意见带回来汇报。我们下去座谈和了解一些情况，许多同志提出一些问题来，当场有的时候我们临时作点准备，临时来回答，但是今天一下子开这么个大会，中央领导同志都来了，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了。刚才总理的讲话，这些都使我们深深感到抓大事的重要。就是说要用什么样的姿态，去抓大事，抓路线，如何理解抓大事的重要意义，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地去抓大事，所以中央给我们作了榜样，我自己要很好地学习，贯彻。因为在这一点，在我们自己所工作的那个部门，那个单位，问题都很多，差距是很大的，需要很好地赶上来的。

刚才总理的这个材料，就是主席批示同意转发中发〔74〕1号文件，这个材料的产生过程，简单给同志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材料是在我们主席，江青同志直接关怀下编写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地，具体地指导下编写的。

谢静宜：

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那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百页，当时只有两三百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同志看了以后，立即找我们去了，就是说，给我们提了意见了，感到东西不多，江青同志指（示）啊，东西不多，有些不够准确，还有一

些个别的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迟群：似是而非。

谢静宜：似是而非的东西，所以当时我们提议……

迟群：当时讲到了，抓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是当前的大方向。

谢静宜：当时我们提议，我们想成立一个班子，专门下点功夫好好地搞一下。江青同志同意我们这个意见，而且指示我们要老中青三结合，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资料。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他们那个里头的大磁缸子里头的东西，条幅，还有挂的条幅，横幅，我们反正到那里翻箱倒柜呀，东西很多，材料这样就丰富了。后来，就编了一本，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迟群：特别是在一些带有原则性的一些提法，作了一些指示。

谢静宜：看得很细，给我们作了指示，（把）我们叫去之后，讲了，肯定了这个材料比上次内容丰富多了，但是编得还比较乱，就是要分类，要通俗易懂，为工农兵着想，应该还编上一个简释出来，这样以便大家好理解。还给我们指出，有些地方不够准确，所以要查，要核实。那就多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天马行空”，我们只查到了汉，江青同志查到了宋，昨天晚上江青同志又查到了唐，今后还要查。这样，我们遵照这个指示，以后，我们又回去研究了。后来江青同志再让我们去毛家湾，看林贼大批的一些卡片，几十箱子，好多。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改动了，待会儿，卡片的问题，迟群同志还补充，所以后来又写了解释，包括前言怎么写，封面怎么写，都指的很细的，内容更是如此，一遍又一遍地改。后来我和迟群同志在下边讲的时候，感到江青同志象抓样板戏一样这么认真啊。当然，样板戏江青同志抓了好多年了，但是专案工作江青同志也是有几年的经验了。最后，编写完了之后，送给主席，江青同志看了，最后定了稿，同意转发。但是由于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水平是有限的，很低呀，学习也不够，还有很多不妥的之处，希望同志们提出意见，我们再修改。

另外，我还再讲一遍，就是对批孔的文章，主席是非常关心的，听我们说到，就是说北大冯友兰也写了批孔的文章啦，主席立即让我们回去，说你回去拿，拿回来，给我看一看。所以我们当时就回去了，然后返回，把那一篇冯友兰的文章拿



来给主席看，主席是一口气地把它看完。很长呐，字也很小，主席戴放大镜把它看完呐，一直都没休息，而且还看出了里头那些标点错了，叫我们去改一改，很细。第二篇文章也是这样的，第二篇冯友兰的文章出来之后，又送给主席，主席又看了。所以主席总是看到这些老人的进步啊，主席是很高兴的，那怕是微小的进步，主席就肯定。而且这两篇，江青同志看了，又转发了。

迟群：准备看第三篇。现在第三篇也出来了。

江青：我插一句。今天我们这个会，有一个缺点，忘了通知写作班子的同志来，我道歉。

迟群：这是我们的责任，没有想到这个事。

谢静宜：现在已经通知了。

迟群：通知了，现在可能来的要晚一些。

谢静宜：所以，后来看了文章以后，我们说，我们学报要发表的。报纸有人给冯友兰要约稿啦，可能是要会登报的，所以，主席就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所以后来等到报纸发表的时候，郭老的名字，郭沫若的名字去掉了，连书的名我们都没有登呢，这是主席保护郭老哎。

江青：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郭老的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功，就是考证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他这个《十批判》是不对的，听说，郭老今天来了。

迟群：这个材料的编写过程，当时组织了一个班子，江青同志是建议叫组织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一个班子，就是找一些老教授，在这方面有些研究的，作点顾问。当时北大、清华组织了一个班子，其中有的是江青同志提名的，就是譬如说，北京大学的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清华大学的王世敏。这不是教授了，是个讲师了。还有我们提出来，江青同志同意了，象清华的石国洪，此外还有一些同志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不在这里读了。一共有那么三、四十人。此外，就是为了搞这个材料，我们一些工人同志，就是给了很大的支持。但两校它是应该的了，它是印刷厂了，随叫随到，有的是昼夜地干，有时因为为了审查清样，要求

都比较严格的了。

江青：我的材料是这两个学校昼夜赶出来的。这两个学校的印刷厂，后来是人民日报的印刷厂昼夜赶出来的。春节没有按照旧习惯过，过了一个革命的春节。要感谢这些印刷工人。

迟群：还有新华印刷厂，也是春节期间，是大年三十都一个一个找来的，一要就是很多的，其中还有个别的，任务不太重了。但是科教组的这个印刷厂也参加了的。这些同志休息的很少。但是由于我们这个水平所限，对于一些指示的精神理解不够，所以不妥当的地方是会有有的，我们相信，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必将使这份材料逐步地完善起来。另外，据江青同志说，人民日报的鲁瑛同志也是积极地参加了这个工作的。再一点，汇报一下，我们和谢静宜同志带着江青同志的那个信和材料。

江青：还有党校的班子。

迟群：到二十军的防化连去的情况，简要地汇报一下。那个材料，当时批的那个材料，都是反映了这个连队它对批孔这方面一些模糊认识和提出的一些问题。

谢静宜：我想补充一句。就是这个材料印出来以后了，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印出来之后了，江青同志有一天晚上突然找我们去了，所以当时我们莫名其妙，是怎么回事？后来看了，江青同志给我们看了一个军报的一个内参，就是讲了二十军的一个防化连的批孔批不下去了，遭到了一些抵制了，叫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其中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说到河南去，有一个马振扶公社，唐河县的马振扶公社，有一个中学，出现了一些问题。

迟群：那个地方在反攻倒算，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谢静宜：所以我们就去了，因为这个事呐，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来谈了。

迟群：这是到的这个军，我们当天到了以后，军的领导同志，就是军长，政委，一起商量，当天晚上就和部队见了面，读了信，并且把材料发给大家。当时那个群众的心情哪，是特别激动的，因为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我们遇到了，一个连队遇到了这么一个困难，批林批孔，中央领导同志都这样的关心，而且派专人来送信，送材料，特别是亲自给我们写信。他们谈到，这真是雪里送炭，那时正好是他们在研究批孔问题，是及时雨，是对部队批林批孔的很大推动。

当时他们在座谈当中都说，林彪一伙和孔孟一样，他们根本不把劳动人民放在眼里，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我们的中央的首长，时刻都想念着，想着我们战士，关心我们的成长。所以当天，（那连队九点熄灯）后来我们快十二点了，我们去看了一下子，都没有睡觉，大家因为都在看材料，都觉得非常好，很兴奋，有的在写决心，表决心了，一定要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座谈当中，使我们也很受教育。就是说，战士们对批林批孔的认识，许多问题不象我们有些人反映的那样，好象那么样的愚昧无知，好象只有知识分子，只有那些个权威们，才能够去批。他们很概括的，很简练的说清楚了一个问题，说孔子要复礼，林彪要复辟，两个人是一样的。很简单。而且他们认为，江青同志那封信，绝不是一个批孔的问题，绝不是单独的是一个批孔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革命的问题，是贯彻“十大”，执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的问题，而且认为，也不单单是写给一个连队的，因为既然是一个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就是包括文化领域和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那么它就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事情，所以大家的认识，谈的一些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同时一些领导干部也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军里头一些领导同志了。这件事情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高级干部，一个领导者，怎么样经常地议政，作为一个军队来讲，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怎样来议政，怎样抓大事的问题。同时他们还谈到怎样改进我们的领导作风，说问题就在我们鼻子底下，但是我们无动于衷。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那么样的忙，还发现了我们一个连队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大事。我们却不敏感，说明不深入，政治上缺乏敏感，作风上不深入。他们的这样一些自我批评，这样一些认识，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当即说是我们马上就改，当即就把信的精神和材料，关于批林批孔的问题，当天就发了电报，噢，第二天就发电到各师，传达到团，到基层。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有关领导同志，也到了二十军，也在整个军区来抓这件事情。后来我们进一步了解，对这个材料编的，因为我们主要是去搜集意见么，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战士们能不能看懂，我们调查了九个班，九个班七十九个人，绝大多数的是初中以下，初中以下的，或者说高小的占多数，初中以上的占少数，初小和文盲的占少数。那么这七十九个人有七十一个人，他们粗看了那么一次到两次，他们就说可以懂，而且可以批得起来，那非常之好。因为过去光说是批林，还得批孔，说是林彪到

底有些什么孔孟的语言，找不到，这个材料非常直接，非常好，孔老二怎么讲的，林彪怎么讲的，林彪有些直接的语言，间接的语言，一下子就给了我们批判的武器，批判的靶子。七十九只有八个人，看了以后觉得难懂，看大不懂，但是后来呢，各种程度的同志搁在一起，他们一边看，一边议，就是一个班的战士，他们互相这么议论，也能够批得起来了，也能够领会这个材料里边所说的思想。所以他们最后在看到材料，因为我们走的时候，他们刚刚开始，刚开始他们粗看了那么几次，议了几次，他们就谈了自己的体会了，他们说确实是批孔是批林的继续和深入，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一位班长，八班的班长，他说：“批林必须批孔，锄草必须刨根。批林不批孔，流毒难肃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要当批林批孔的闯将，要作批林批孔的尖刀子，用实际行动搞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谈的，我们认为谈得都比较好。因为时间关系，简单把这个点上的情况，因为这个点在陆陆续续地还要往上报了。当时，材料里讲的是高中了，好象只有高中生他们能看得懂，就是能够才能批孔，就是初小的呀，什么文盲，现在所谓文盲，我们到连队了解，就是说入伍的时候是文盲，现在已经都能够写家信了，恰恰这些同志呢，是可以看得懂的，可以批得起来的。

谢静宜：人家批得也很好，不见得比那个高中生就批得差，而且我们听到了，就是一个初小的，还有一个文盲，就在当场我们认为他的水平还是很高，认识得很深。

迟群：再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为什么要批孔，就是说，批林同批孔的关系，这个因为给我们谈了很多，因为有些意思，我们丢三拉四，我们也没有很好地理解，所以简单谈那么几点看法。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有很多的话要说了，因为主席对这个方面有一系列的论述，从《新民主主义论》里头，那里头有很多批孔的指示的，以及以后组织的，解放以后组织的几次批判《武训传》哪，什么红楼梦研究的一些问题，批胡风等等的问题，以至于后来在去年的中央五月工作会议上，又提出来批孔的问题。首先要看到孔子，他所顽固推行的政治路线是什么？我们商量了一下，说是孔子，他是生活在春秋的末期，也就是说在奴隶制的崩溃，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制兴起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大变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当时孔子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他的政治路线，他的理想就是要拼命地维护和挽救奴

隶制，就是要复古倒退，反对社会的变革，开历史的倒车，这就是他所主张的政治路线，但是他一辈子，他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了，结果是被历史的潮流所抛弃了，淘汰了。孔子是两千多年反动统治阶级的圣人，被称作所谓圣人，封建地主阶级在孔子的时代，是一种新兴的力量，本来它是孔孟所反对的，可是因为它也是一个剥削阶级，所以封建制代替了奴隶制，也就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了另外一种剥削制度，所以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么，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以后，一个阶级斗争的规律，证明他们不可能再继续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也就是说，不能继续的去革命。他们就要反对变革了，他们就要强化和巩固他们对劳动人民的统治，随着这种阶级地位的变化，他们同孔孟所主张的复古倒退，反对变革，维护和挽救旧制度的思想路线的共同语言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汉朝以后，经过历代统治者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对孔孟之道进行了一些改造和发挥，这样，就使孔孟之道成为两千多年以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个思想武器。这正如主席所指出的，这段话是主席同斯特朗的谈话的那个题解里头有一段话，是主席解放以后讲的，就是说是五八年武昌会议上讲的，但是是在四卷的同斯特朗谈话的题解当中写上的。主席说：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他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他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候，这些剥削阶级，他们为了拼命地维护自己的生存，镇压人民，它们就要大力地吹捧同它们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孔孟之道，推行反革命的路线，孔孟的政治路线。那么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主张尊孔读经的半封建文化是帝国主义文化的非常亲热的兄弟。他们结成了文化上的反动的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反对人民革命，所以孔孟之道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三座大山的一个精神支柱。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有很多。这样一个阶级斗争规律，在我们党内也明显地反映出来，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从陈独秀开始，象王明，刘少奇等等，他们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他们用它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具体的阶级内容。在今年的元旦社论里头专门提到这段话，点出了历次的机会主义头子。

譬如说，陈独秀就有这样的话，他说孔教之今化，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这所谓共产党人，这是孔教，孔子那一套东西，是我们中国的伦理政治之根本，这怎么搞共产主义呢？并且说，孔孟是优秀分子，恨不能发展他们入党了。孔子有没有价值呢？他说，我敢肯定说，有。

王明讲什么呢？王明称忠、孝、仁、勇、礼、义、廉、耻为五千年的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一直到现在，他一直在苏修那里头骂我们，写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的文章，最近他还写文章吹捧孔子为堂堂夫子，宣扬所谓的温、良、恭、俭、让、忠恕之道，仁爱等等。

刘少奇他在二五年从那个，他就是自首叛变以后，他出来以后，军阀还给了他“四书”，带着这“四书”，爬出了狗洞。五一年他到曲阜去朝圣。六二年又修改他的黑《修养》，推行孔孟之道，他说，孔夫子是圣人，人民政府也要祭祀他。不光他自个要，还要叫人民政府，全国人民来朝圣孔子。

林彪是这些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当中吹捧孔孟之道非常突出的一个，现在大量的材料证明。江青同志要是在会上给大家说那么几段，我们自己理解的水平不够了，先说这么几段。这个材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林贼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里头有一个对比，林彪和叶群有这么一些个话，就是他们写的条幅，叫“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书赠叶群同志，育容，一九六九·十·十九”，就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这一个条幅挂在林彪的卧室里。就在同一天，林彪还写了内容相同的另一条条幅，赠给了反革命分子叶群。这就两条。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三号，又写了一条，就是，这是反革命分子叶群写的了，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书赠育容同志”，育容就是林贼。在一九七零年一月一号，还有一条，是林贼又赠给反革命分子叶群的，是“悠悠万事，唯此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多了个“唯此”两字，“育容书赠宜敬”，宜敬就是反革命分子叶群。“于苏州”。这就是说，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这两个家伙连续地写下了四条。

孔子他在《论语》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克制自己，克己复礼呀，使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符合周礼。他所讲的周礼就是讲的西周，因为西周是奴隶制最兴旺的时期，就是说典型的奴隶制，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关于仁，在这个名词注释里头讲了这

东西，就是说，要在政治上，道德上，思想上达到一种最高的境界。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把它翻译过来，什么叫“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呢？他们互相赠送这样的条幅，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头等大事就是叫作复辟。在现在来讲，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它并不是要复那个周礼，那一套东西，而是要恢复资本主义。特别是值得注意，当时的背景是，我党召开了“九大”之后，他们在不到三个月里头搞的。还有一条，就是材料里边，二十四页里边所谓讲绝了的问题。他们在黑笔记里头，有这么一段，说，“凡事勿做绝了，做绝即一点论，必有恶果，果大则显，果小，或其他力量能压得住则不显（但大胆肯定必有恶果），例，绝则错，什么例子呢，阿处女政局委员——做绝了。对赫骂绝了。对明斗绝了（乱了套）。对大公做绝了。‘才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反革命分子叶群她亲笔的笔记，一九六一年到六四年之间的。）象他对比之话，孟子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是“仲尼”，讲的是孔子了，“不为己甚者”。就是说孔子不做太过份的事，不做绝了，是一样的。

那么对于林彪他所讲的绝，我们也得给他加以翻译。他所谓的大胆肯定必有恶果，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革命，不能够造反，不能够反潮流，要这样做那就必然有恶果，这就叫反对革命，就是反革命。他讲“阿处女政局委员做绝了”，是谁呢？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大家知道的贝利绍娃，那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间谍，一个特务，他支持的是什么人呢？支持的是苏修的特务。

说“对赫骂绝了”，对赫鲁晓夫骂绝了，怎么骂绝了呢？当时赫鲁晓夫他们到我们国家里来，搞什么呢？说是要提出来要搞共同舰队，要搞长波电台，他们的阴谋是要控制我们。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斗争，它涉及到我们党，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现在的事实，别的国家的教训已经证明这个问题了。当时我们主席说，我们自己搞。因为他们要想搞合股一个公司，实际要控制我们，主席说我们要自己搞。他们赫鲁晓夫还是坚持要合起来搞，就是要控制我们，主席说，要搞，我们不要了。你不是要搞什么共同舰队吗，要搞我们一些个沿海，要控制我们整个沿海。搞长波电台，主席说我们不要了，上山吆。同志们，知道上山是什么意思吗？主席当时讲的上山，就是要上山打游击，要揍他。所以林贼在这里说，骂绝了，对赫骂绝了，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我们同修正主义作斗争，他要控

制我们，要颠覆我们。我们主席顶了他，同他们斗了，保证了我们国家，我们党不变颜色。“对明斗绝了，乱了套”就是对王明，王明他是执行错误路线的，先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后来从苏联回来，又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主席领导全党同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清算了他这条错误的路线，保证我们党沿着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使我们取得了胜利。怎么叫乱了套了呢？说明林贼完全是站在王明这个反党，反革命分子一个立场上，他们是一丘之貉。“对于大公做绝了”，大公就是苏修，就是他那个俄罗斯。什么做绝了呢？他们把专家撤退了，把我们那一些个项目工程搞了半截，他们就甩手走开了，甚至于把一些个图纸都拿走了，他们这样的整我们，想卡我们，结果怎么样呢？在我们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搞得更好更快。所以，他这些黑笔记里讲得做绝了，完全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我们主席、反对我们主席的路线、反对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立场上说的。

江青：也反对全国人民噢。

迟群：反对全国人民。

江青：也卖国嘛。

迟群：还有材料上林贼有一句话，是六零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叫两斗皆仇，两和皆友，这里正好对比着“子曰”，孔子讲的，“礼之用，和为贵”，“礼之用”就讲的周礼。“礼之用，和为贵”，林贼讲的两斗皆仇，这完全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混水摸鱼，他骗人的，他分裂我们革命的队伍，所谓斗，我们有两种性质，一个同阶级敌人斗，一个还有我们队伍内部的斗争的问题，因为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一个斗争问题，这样一斗就是仇，仇人了，敌人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当中，他也是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去分裂了我们一些革命的队伍，所以我们且不要上他的当，被他分裂了的地方，我们要团结起来，批林批孔。“两和皆友”恰恰刻画出这一个右倾投降分子的一个面孔，他要谋害我们主席，要谋害我们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要砍我们的头，那里还有和呢？完全是骗人。后边一句话也是给他作了注解的，说“勉从虎穴暂栖身”，后边的话就不读了，这是抄录了《三国演义》里的一句话。

江青：后边应该说，这一首诗呀，他用了，恰恰是刻画他这个反革命两面派，你得都读，因为到会的同志没有拿到这个。



迟群：“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二十七页第六个问题。“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掩，随机应变信如神”是一个条幅。

姚文元：这两句是搞反革命两面派的，“巧借闻雷来掩饬，随机应变信如神。”林彪自我暴露他怎么搞反革命的两面派，他除了改了一个字之外，这两句是搞反革命两面派的。

迟群：刚才文元同志讲，就是他后面那两句，特别后边那两句他是搞反革命两面派的，除了改了两个字，因为这个暂栖身，原来那个《三国演义》上叫“趋身”，就是趋向的趋，“暂趋身”，他把个“趋”字改了个“栖”，栖就是住的意思。两栖动物那个栖。

江青：这一段要文元同志解释。

姚文元：“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他把这个“趋身”改为“栖身”，“栖身”就是暂时住一住。鸟啊栖在树上，就是说他是这里讲的对啊，分析得很好啊，不打自招地告诉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是“栖身”嘛，栖身之后到一定的时候他就要杀头啦，就要谋害毛主席，谋害党中央。运用什么手段呢？“巧借闻雷来掩饬，随机应变信如神”，就是你看到什么气候要变，随机应变，这样子混过去之后呢，到一定的时候呢，他就搞反革命的政变，这又暴露了他是野心家，阴谋家，又暴露了他搞野心家，阴谋家的手段，是反革命两面派。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江青：对。

迟群：那就可以了，我就不解释了。文件里因为里边还有很多就不多说。

江青：这里搞错了一个字，“韬讳，操之论英雄，胸有大志，腹有良谋，就是范蠡，春秋战国。”是一九七零年三月十三日。同志们，那是什么时候？那就是林彪搞《“571 工程”纪要》的时候。《“571 工程”纪要》，大家在座的同志都有了，这个你们没有，所以我想这要说一下。实质上不是“韬讳”，是“韬晦”，他要把自己藏起来，藏起来，反革命，所以他搞反革命两面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还欺骗我们，伪装。

迟群：他就是说把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作为一个虎穴了，栖身嘛，藏起来，搞了许多画皮了。

周总理插话：七零年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七一年是他们搞《“571 工程”纪

要》。

江青：七零年他搞国家主席，就是这个“名不正言不顺”这一段，这七一年三月搞《“571 工程”纪要》，就这个小讳，刚才讲错了，历史背景。

迟群：林彪呢，他本来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的大党阀，大军阀，四书五经他也没有看，但是为了他这个反革命的罪恶目的，推行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极右的这条路线，所以他就找了一伙子人，为他到处搜集孔孟的言论，东拼西凑，分类摘抄，搞了大量的卡片。这卡片上他们还有一些记号，批了一些话。

江青：我补充一句。主席说，才不要迷信他什么读了什么什么孔孟的书，他才不读书呐。这个话原文就在这个地方。哎，林彪是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这是我们主席讲的。

迟群：当时江青同志叫我们去了，又到了林彪的黑窝去，我们去翻箱倒柜，查出了一些东西。首先看到有一层楼，就是他找了一伙子人专给他搜集这些卡片，搞阴谋诡计的那些东西的一层楼。我们看到了一个房间有四十七盒子卡片，其中搜罗了不少古今中外反动腐朽的一些东西，有些卡片是林彪，叶群他们批批划划，放了许多毒，极其恶毒。他们恶毒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篡改马克思主义。譬如说他们就在一些卡片上写，“两分法是思想水平低”，他们宣扬世界上一切等于一锅粥。屁也不懂，这是在那里胡说八道，但是他是为了搞阴谋的。他混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它的界限，他们利用历史来反党，进行阴谋活动。譬如说，他抄录了德国俾斯麦的反动言行，德国的一个反动的一个头子了，一个首相了，所谓基辛格所崇拜的一个德国首相了。他挖空心思地研究剥削阶级统治人物的上台和下台，怎么上的台，怎么下的台。他利用语言文学，来进行反党活动，等等。这里举一个例子，这事情都使人很吃惊的。

江青：我想提几条给同志们，很简单了。林彪不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吗？他有这样的话，一九六六年，“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孔孟呢，就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五百年必有王者，就是说出一个人才了。“其间必有名世者”，就是出名在世界上。这是他们的罪证。我们的主席怎么批他这一段呢？这说得过份了嘛，根本没有天才。这个我不讲，就是说他说得过份这一点，我来补充一下。

我所听到的,可能不完整,和主席的意见,全世界几百年才能出一个,而十九世纪就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不是不是几个世纪吗?而且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了一个,为什么这么自卑感呢?中国就在二十世纪初吧,还出现了孙中山嘛,主席举了,还有洪秀全嘛。洪秀全,同志们知道吧?太平天国的领袖。这个还举了几个,我一下子都记不清楚了。总而言之,他这个他这几句反革命的话,对中国人说是踏到地上,外国人他也说的不对,几百年,中国要几千年,因为中国人人家讲我们是东亚病夫嘛,过去,帝国主义,他接过来。这个地方我想讲一下,因为许多同志们还没有看到这份材料。另外呢,林彪这个政治纲领啊。除了设主席以外,就是天才论了。他说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这个文件上发了,孔孟怎么说呢?孔孟说,“不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就是说没有君子,就不能统治咱们的劳动人民,而没有劳动人民呢,就没有人养他那些鬼君子。这就是他们一个鼻孔通气。我们这儿,他们可能没有准备,我就提一下。

迟群:这些卡片中有一些个目录上面写的“上下关系”,“干部政策”,“追求真理”,“有勇有谋”,“辩证法”,“唯物论”等等。原先我们认为这后边都是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我们主席的一些话,结果一翻呢,下面都是子曰。他的干部政策也是子曰,辩证法,唯物论也是子曰。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一句,“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他也写到这就是辩证法。还有他的所谓唯物论,是“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就是唯物论,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了。

江青:这个地方我们准备不足,我要再说一下。林彪啊,对秦始皇,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孔孟呢,“秦……重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这是董仲舒的啊,就是汉朝的那个天下一孔孟,这个家伙。那么我们的主席怎么样驳林彪呢?我们的主席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这个大概因为还在档案馆了,是为了搞专案才弄出来的。我们的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我念一下,这个我们的主席当场驳了他这以后,接着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

现在苏修，美帝大骂我们批孔啊，蒋介石最近他们又祭孔了，还有香港有的教授抗议呀，说我们批了他的老祖宗啦。我们的主席是有这样的气魄的，实质上我们的主席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当时骑在人民头上的民愤甚大的，有血债累累的，你要不杀，群众起不来。我在土改的时候就杀了一个恶霸，不杀他群众起不来。在全国范围，我们有几亿人口啊，还是比不上秦始皇呐。同志们请算一算这个比例噢。我们现在是几亿人口，将近八亿了吧？总理，算八亿了。看那个时候只有多少人口啊？这当然要去问问我们的老先生们，查一查，因为汉志有人口的。唐朝好象只有六千万，秦更少了，连年战争嘛，又是从奴隶制转到封建制，所以那时人口是很少的，恐怕还比不上咱们现在一个省啊，这是个比例啊。我们的主席对于重要的案犯都不准虐待，养着留活口供。同志们都知道，这个传达，不许逼供信。所以在这儿主席这样子是驳那些资产阶级谬论，才这样说超过了一百倍。

迟群：他这个唯物论里边还有一句话，他们引的卡片，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余所在。”就是说他的唯物论就是说要说假话，说了也可以不去做。还有他在所谓“组织观念”这一个栏里边，他们引的孔子的话，一个意思就是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讲的是什么呢，组织观念呢，就是说当时在周朝的时候，天子要是宴会的时候，要找人唱，载歌载舞，天子找的是八排八个人，就是跳舞的，八八六十四个人。当了诸侯呢？就得降一级，就是六排六个人，六六三十六。那么到了大夫这一级呢？再往下降，只能是四个人，四排，四四一十六。后来慢慢地这个地主阶级慢慢地兴起来了，这时候下面就不管那一套了，连个大夫一级的，他也来了个八八六十四，他也不管你什么四四一十六了。所以关于这个林贼把它弄到组织观念。

江青：天子，天子，八佾之舞，六十四。

迟群：八佾之舞是指天子，六呢，是讲的诸侯，四个是讲的大夫。所以他用这个，把这些东西归纳到组织观念，这林贼。还有“坚持真理”这一栏里边，他引了孔子的话，叫作“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蒋介石他们经常鼓吹的就是不成功便成仁，这就是追求真理。

江青：蒋介石老说的。

迟群：这是他们引的是这些了。……

江青：他（指蒋介石）的老婆子当时他们那些人跑到那个岛子上去了。他们张灵甫也不是，《南征北战》的张灵甫也没有成仁，那是歪曲，张灵甫是被我们的战士打死的。因为他杀我们的人太多了，我们的战士气愤不过打死的。当时要为了使起义的人能多一点，所以就歪曲了这段历史。今后至于《南征北战》我们就要改回来，他是投降的，这个样子的。张灵甫啊，孟良崮他的王牌军队，我们的粟裕同志还在嘛。涟水战役七战七捷，我们的主席和中央要他撤，我们的战士说打了胜仗还要撤，不哪。当时中央，主席坚决要撤，要保存有生力量，才能歼灭敌人，这个王八蛋，张灵甫啊，杀了我们的人太多了，战士打死他，应该原谅这个战士，违反了主席的俘虏政策，不是一个战士，好几个人。王牌军啊，蒋介石替他，替戴知琪开了追悼会的，都是他的王牌军，全副美式装备，七十四师全副美式装备，我们是小米加步枪。

迟群：林贼在论学习的这一个栏里边，摘了孔子的这样一些话，论学习，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学习，“学也禄在其中矣。”禄嘛，就是金钱啦，地位啦。还有，他们在一些卡片上搞的批语，他们批些什么话呢？我也摘了一点，相当之多了，在这里给大家介绍那么几句了。他们批的是这样的话，“古皆真话惹祸。”就是从古以来，说真话的，都要惹祸的，都要惹祸的。“好坏正义，非正义，以利益为标准。有利就是朋友，不利就是敌”。他们还胡说八道，说“生产前必须生活，生活前必须是肉体的存在”。（共产主义只讲生产，未从根本上说起）完全是胡说八道。再就，他们还写了这样一些话，“进庙多磕头，少说话。”说好实质是懂事，说坏是大是大非，还说“政治工作是危险工作”。这回找着根子了吧。“懂决心方能当统帅，统帅是决心帅也，希特勒未当好大统帅也。大致艺术不差，只差一字之差，所以才复国亡身。”意思就是说，他不懂决心。另外，还有的讲，他们还在卡片上题的三保：“要保官，保产，保命。”另外还讲，说是德国那个反动首相俾斯麦，他只有用轻蔑的眼光和铁的手腕来对付人类。

江青：俾斯麦，德国的，镇压巴黎公社的那个宰相，德国的，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

迟群：还有他们讲所谓的养身之道，说，他们写的“口张言少”，口嘛就是嘴，言少，说话少。“心中事少，肚中食少”食就是饮食的食，吃饭的，食少。“子言虽少，以此事少，神仙可了。”胡说八道。另外，还批的三声好听，有三个声音

好听，书声，就是诗书的声音；歌声；小娃声，娃娃的声，小娃声。唇是圆的，嘴唇是圆的，天是扁的，天空是扁的，话是转的，说话是转的。他因为对这个他有好多的批法，还说“嘴是扁的，嘴是扁的，舌是圆的，舌头是圆的，话是转的”。

“人情大于王法。千里做官，为了吃穿”。他们还有一句话抄的，叫作“打起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非常之重要，这是一语道破了。他们还搜集了一些所谓一些语言文学里头一些话，象什么，他专门搜集这样的东西，叫作成语，里边什么“口蜜腹剑”，“两面三刀”，“过河拆桥”，等等。还有什么“辣手造乾坤”，辣手，就是手段要毒辣，才能造乾坤，说的就是改造世界，创造世界了，等等吧。所以说，林彪是历次我们党内机会主义头子当中吹捧孔孟之道非常突出的一个。所以主席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所以我们批孔，中外反动派都在反对，蒋介石他一直是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的，这我们大家都了解。最近，蒋经国又在说，今天批判孔子，（就指的我们现在批孔）就是批判中国文化，就是清算中国人。严家淦，是他的副总统，最近也说，我们与中共的作法，是完全不同的，中共在大陆上搞批孔运动，而我们是以孔子哲学为依归。依靠的依，归宿的归。还有些话了，不说了。苏修最近发表了一些许多的文章，就是攻击我们批林批孔，还有象那个帝国主义的小走狗阮文绍，也在攻击我们批林批孔，这恰恰证明了他们的政治路线，他们的哲学立场，是反对社会进步，反对社会的变革，主张历史倒退，他们反人民的，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这样一条政治路线。同时，也恰恰证明了我们坚持了一条主张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他们是搞中庸之道，就是讲折中主义，调和的，反对搞阶级斗争。在这个材料的二十三页，林彪讲中庸之道合理，是七零年三月十三号口授，叶群亲笔记在所谓的“一零一谈话”笔记本上。那么，孔孟呢，他也有论述，所谓的论述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注了这句话，“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里作了一个翻译，是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翻译孔孟的话。老百姓缺少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既不过度又没有不及叫做中。庸，是任何时候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程子说：不偏就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就叫做庸。中是天下必须遵循的道，庸是天下永恒不变的理。

姚文元：这个中庸之道啊，是历史上反动派向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人民进行复辟，进行镇压，进行反攻倒算的一种虚伪的，很毒辣的武器，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孔夫子是这样，搞中庸之道，但是七十二而诛少正卯啊。林彪也是这样，讲中庸之道合理呀，他就不搞，他那里呀，他就是要暗杀，要杀人哪。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搞《“571 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毛主席历来主张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看世界上的问题，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毛主席认为看问题，应该是要看全面的看，要有分析，但是要反对折衷主义，这是一致的。同志们只要看一看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农民运动轰轰烈烈起来的时候，毛主席以极大的革命热情，驳斥了那种打着中庸之道的幌子，来反对农民革命运动，当时就是有一句话了，“矫枉不能过正”，毛主席就驳斥了它。什么“矫枉不能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就是这样，当蒋介石反动王朝将要覆灭的时候，当时又有一些所谓的自由民主人士拿着孔夫子的中庸之道，想保存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就是以南北为界，要解放军不要再打。毛主席反驳了这种论调，写了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就是反驳中庸之道的。毛主席指出，一切革命人民和人民的朋友要更加巩固的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面，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到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粉碎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有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时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保护反动势力的阴谋诡计，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就有了今天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青：我想说一下，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也是很尖锐的写的这个问题。当时巴黎公社要起义，马克思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是对革命可能不利的，但是当巴黎公社起义，起来以后马克思是欢欣鼓舞，他的《法兰西内战》是写的非常的深刻，非常的动人。马克思从来不搞折中主义，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是这个在原则上不能作交易。我补充这一点。

迟群：这个正说明了我们的党，我们主席坚持了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变革，强调了抓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路线，这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批林批孔使帝修反非常的惊恐，这正说明历史上一切行将灭亡的阶级，一切反动派，一切开历史倒车的人都

要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现在则用他来恶毒地攻击和诽谤我们党，我们主席，我们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诽谤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文化大革命，攻击我们的批林整风等等。所以，批孔是批林的深入，是贯彻“十大”，元旦社论中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批判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批孔中，批林中结合批孔，要从阶级立场，阶级根源，阶级就是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从哲学的观点，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等方面来认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关系，这样才能深入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挖他们的祖坟，挖他的这条路线的老根，把林彪散布的反动谬论批深批透。通过批林批孔，将使我们进一步地打破旧的传统观念，同几千年来的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获得思想上的解放，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反对帝修反有着重大的深远的意义。现在我们下面座谈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联系实际问题，因为时间关系简单讲两句。这个问题有些人有些糊涂认识，说是孔子流毒咱们人人身上都有，所以我们人人都要作检查，都要挨批了，后来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什么是实际，联系什么，联系最大的实际，最本质的实际就是林彪他要改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要妄图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要叛党叛国，要当汉奸卖国贼。这就是最大的实际，丢掉了这个实际去联系，必然要走偏方向。

江青：当我们的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二十七次会议上，主席讲，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象梁先生。梁先生者，何人也，梁漱溟也，他现在还反对我们，反对我们批孔。他是尊孔。“吾自得子路而谋生，无辱与尔”，这是孔老二的话，“三盈三虚”，这不是，这是荀子的话，“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我们的主席说孔老二有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那么当时讲的这段谈话，象梁漱溟这样的先生老爷，会不领教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赵纪彬教授很详细地考证了资料，反复核对了，写了这本书。这本书是出版了的，如果有的同志有兴趣学，我建议学，可是比较难一点，不过也没有什么，世界上没有难事，只怕有心人。

迟群：还有些问题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样联系实



际啊，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的脑子里。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拍的一个纪录片，叫作《中国》，我们翻译过来的了，据说是还给有关的外宾去看，去作为介绍中国面貌的一个片子。该片里头有很多话，我就举两句，因为有的没有记清楚，里头有这样的说明词，说是中国人他们的生活是痛苦的，但并不悲惨，他们怀念过去，但是他们既怀念过去，也忠实于现在。他们尽拍了一些歪曲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镜头，我们有些个很好的一些个建筑，一些个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个别的我们有一个女同志和他们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一个特写镜头，他给搞你这个形象，所以象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吗？而我们有的人，出去拍别人的，到国外去拍片子，拍什么呢，生怕露了一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的那一点表面的骗人的繁荣，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的受压迫的人民那些痛苦的生活，那种景况，一点也不敢往镜头里去拍，是什么指导思想？难道批林批孔不应该联系吗？我们有的人就在那里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搞五七干校执行主席的这样一个指示，他说要还给我青春。这样的人不应该联系吗？教育战线上出现的那些复辟的现象，譬如说这一次江青同志叫我们出去，同时叫我们顺路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河南的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个中学所发生的事情，逼死了一个小女孩，十五岁，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每天几乎是一次考试，考的那个学生简直是昏头胀脑。家长们都提出意见，说这样势必把学生身体搞垮，他们完全违反了主席的指示，不要把学生当作敌人，不要搞突然袭击，不要搞闭卷考试，要开卷，可以交头接耳，他们不，搞 A、B 题，要互相背着答题，每天考一次，所以这个女孩她就有反潮流精神，她就写了一些个意见上面，结果就给逼死了。

谢静宜：全校批判。

迟群：全校来批判人家，还，还把人家家里还诬蔑人家。说他们家里人有跳井、跳河、跳坑的习惯，这么样诬蔑人家。

谢静宜：贫下中农老大娘说，这是对我们贫下中农的诬蔑，根本没有这回事。

迟群：没有那么回事嘛，所以，

江青：这个材料是人民日报的内部参考，人民日报的记者有一功。

迟群：那里完全是在反攻倒算，体罚学生，扎针，有一个教师学会了针灸，那是本来是治病的，后来发展成什么呢？就是谁要所谓他们讲的调皮捣蛋，就说给他针灸针灸，就扎得你，反正是叫你难受。

谢静宜：说扎一个好了三个。

迟群：因为有几个，他因为那几个调皮，扎他一个，那几个……

谢静宜：吓的就赶快跑了，是这样的，扎跑了三个。

迟群：不得了，完完全全是法西斯专政，象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江青同志批了以后，我们去了，去了，这个我们也实事求是的摆事实讲道理的，也到了他们小队、大队、学校、公社、县里，地委都去了。

谢静宜：到了他们家里进行家访。

迟群：到了，见到她父亲，她母亲，以及他的其他的一些亲属了。那里从县里头，当然教育部门还是主动反映了这个问题，教育部门，但是县里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也还是有些问题的了，公社里的第一书记，事情发生了半年，没有到这个人家里去，没有去看看人家的父亲，母亲，就隔了那么三，四里地，所以这一次他们都作了一些表示了，当然还要看下一步了。说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这样忙，还看到了这件事情，派人来。直接到了公社去，到了大队，小队，到了本人家里去，我们就离得那么近没去。我说那不光是个领导作风问题，查一查你们里头有没有什么背景，因为我们去，还让那一个逼死学生的人给我们带路，这事就莫名其妙了，事到如今还没处理这个人，而且给了人家五十块钱，县里头说，那从教育经费挤出一百元钱，加起来县和公社给了一百五十块钱，人命逼死了，只值一百五十块钱。这是路线斗争问题。还有那个走后门问题，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那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所以当时江青同志要了一份关于南京一个大学生走了，叫钟志民，就是一份申请退学的书了，大家可以再看一看，我们是在路上听到了广播发表了这个消息，那个按语说得很好。讲了两条，根本问题就是说，要搞马克思主义，还是要搞修正主义的问题，那批孔，孔老二就是嘛，学而优则仕嘛，我们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私有财产，看成是商品了，有的人。

江青：叫钟志民。他的父母现在接受儿子的意见，作了自我批评，我们也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

姚文元：这里顺便说一下，请人民日报把新华社的一些清样，就是关于父母接受批评，请你们把这些东西，采访的东西编一个报道，加上一个按语，加以支持。顺便插一句。

江青：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典型的例子，这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了，而是一批上山下乡的青年，就是湖南株洲市办的厂社结合，他们派了最好的最有觉悟的贫下中农，男的女的都有，去照顾上山下乡的青年。这个点是人民日报的内参，我现在请人民日报的同志再去深入地调查研究，如果这个典型啊，能够普及呀，是可以减少城市跟乡村的差别，是可以减弱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这个是非常好的，大有前途的。这个还有一个事情，我想在这儿道歉，因为我的疏忽，在这个材料第二个补充通知啊，总理是要我帮他，因为有疏忽，第二个学习单元里应该有周一良教授写的有关唐朝柳宗元《封建论》的那篇文章，人民日报转载了，因为是我让他们转载的，这篇文章很值得看，这个我忘了，再补充一次。

迟群：当时关于钟志民的问题，总理也有批示。就是当时他们叫说是退学，但是省里头决定，说是还保留他，在学校里学习，保留，就是继续学习。后来我们给他们打招呼，你既然申请退学，要造反你就彻底造反，不要人家造反，还不让人家造反。至于走后门问题，不只是这一个问题了，现在还有的单位，问题比较严重。譬如说，外交部、一外（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很值得检查，那里首先就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党委常委的一个孩子，是走后门进去的，所以我们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开了常委会的，在书记当中也专门作了研究，坚决退回，从一外退回来。但是，不光这一个人。所以，要想到我们的教育战线现在有一亿七千多万人，你开了这样一个口子，就不得了，它关系到上山下乡的问题，关系到一些人参军、招工、上大学等等，我们接班人的培养的问题。希望错了纠正，纠正的越快越好。另外，还有的单位，有一些个扯皮的问题，但是看我们正确与否，就是看我们是否执行了主席的路线，你是否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没有做到这一点，谈不到正确，没有做到这一点，说别的统统是屁话！你什么正确，你正确你团结不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

另外，我们要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要针对着林贼，他所提倡的，我们就要反对，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他要搞修正主义，我们就要通过批林批孔，搞马克思主义。他要搞分裂，我们通过批林批孔，就要搞团结。他要搞阴谋诡计，我们通过批林

批孔，就要搞光明正大。我们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东西南北中，那里都可以去，但是不要能左能右。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总理读了那些信，对这个信，我们和谢静宜同志我们商量过多次，怎么来看这个信？我们认为这个信，写信人也不是孤立的，就是说，也不是江青同志一个人的意思。第二，写的信也不只是一个批孔问题，它涉及到整个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的问题，一场革命的问题。它也不只是写给一个连队和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问题，它是涉及到我们全党全军全国的问题，它是体现和坚决贯彻执行我们主席革命路线，坚决贯彻执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思想政治工作，关于能文能武等一系列的指示的问题。总理、王洪文同志代表中央在“十大”作的报告当中，传达了我们的主席的声音，就是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所以，深入批林批孔，就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场革命，是防修反修的一个战略措施，所以它是贯彻“十大”的问题，是深入批林、批修，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所以，这些信，它本身关系到的问题是我们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整个革命队伍的建设，关系到我们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支持和保护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问题，关系到如何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理解，正确地解决本单位，本地区至今还在那里扯皮的问题，关系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准备打仗的问题，关系到各级领导如何敢于抓大事的问题。所以，信就不是一个孤立的批孔的问题，也不是给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问题。

现在有些单位，有一种不正之风，风气不正，最大的不正之风是什么呢？就是不抓大事，或者是抓得不够。所以现在就是要造成这样一种风气，要注意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经常研究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研究我们党的政策，也就是主席提出来的总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要注意研究，并且提出正确解决的办法。我们要对批林批孔加强领导，要领导带头，要发动群众，要抓典型，要进行试点，训练骨干，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知难而进，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要开花结果，遵循“十大”的路线，我们要批出一个成果来，使思想澄清，觉悟

提高，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争取更大的胜利。讲的不对的地方，请中央首长和同志们批评指正。以上研究的都是我和谢静宜同志我们俩领会一些指示精神，下面她还要作补充，不对的大家批评，完了。

谢静宜：迟群同志讲了。我再补充几点，也是我们议过的事了。主席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惕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主席叫我们抓大事，我们体会到就是抓国家大事，国际大事，党的大事，阶级的大事，一句话，就是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抓大事，就是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肃清流毒，挖掉他的祖坟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江青同志写的信，送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本身就是贯彻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把全党的政治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因此，这就不是孤立的给某一个领导同志，某一个单位的写的信的问题，而是给全党全军全民写的信。也不是孤立的在批孔的问题，是批林整风的继续深入，是关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防修反修的一个大问题。所以，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问题，也是就是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大问题。

我们到了一些别的单位，去学习的时候，在座谈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到，绝大多数的同志和指战员同志们，对这个认识，那还是正确的，要求批林批孔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但是，也有相当部分同志，有某些模糊的认识。你譬如说，认为孔子还是个大的教育家呀，什么批林与批孔呢，关系搞不大清楚啊，有的说是批孔是宣传部门的事，是教育界的事情，是学校里面的事情，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是文学家的事情，那是哲学家的事情，反正就是说与本单位无关啦，与己无关啦，就是这么一些问题啦。我们认为，这都是不对的，当然有些是认识问题了。还是我们认为，批林批孔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大事，不是少数人的事，是我们国家的大事，是我们全党全军全民的一个大事，也是工农兵的大事。只有发动工农兵群众起来进行批判，才能够批深批透，才能够肃清流毒，才能提高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和阶级觉悟。你譬如什么，文章难懂，难学呀，难批呀，难联呀，才不要相信这一套，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什么历史学家了，教育家了，文学家的事情，主席讲过嘛，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而且事实也是这样。我们下去座谈，我们觉得，广大群众通过了学以后，通过大家一议一谈，是

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批判的是很好的，而且还不见得是那些高中生批判的。所以，也不在于职位的高低，不在于文化程度的深浅，而是在于路线觉悟，在于识别能力，在于阶级立场，在于认真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才不要盲目的迷信一些专家权威。就从考试一些教授来看，就破除了这个迷信了嘛，东北就考过嘛，而且这一次，北京市去年年底三十号，当天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集会议，上午，完了之后，就在清华出题，出完了下午五点钟到北京市集合二十辆小车，同时到十七所院校去考试，当时我们说的是开座谈会，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啊，他们还真的拿着笔记本，还认为开什么座谈会。我们说，今天就是来突然袭击，给你考试，你不是看不起学生吗？这么一考啊，六百一十三名教授、副教授参加的，及格的是五十三名，占百分之八点六，不及格的是五百六十名，占百分之九十一一点四，还有二百名教授、副教授是交了白卷，打了零蛋的。其中还有两所学校都是考零的。还有些学校是平均零点一分，零点四分的，就是因为有那么一个教授大概考得好些，其他教授不好，那么一平均，还有零点一分，还有零点四分。

迟群：有一个单位是六个教授平均一个人一分，原来是有一个教授答了六分，其他是零分，所以一平均一个人一分。

江青：这个我还得要讲一下，有一些教授啊，他答不出来啊，是应该谅解的，因为他多年不搞了，多年不搞了，但是他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整学生啊。我觉得是应该的。这个考教授，是从东北开始，就是张铁生。我呢，也冒了冒失，我也不知道谁搞的，我是在一次会议上说，我说这是大好的事情，后来不是说东北也不对嘛，东北考教授的这个人，他自己本人就是大学生，他自己先考了，结果他有几道题答不上，他说我总是个大学生吧，他这样考了教授。那么北京考了，北京考了，这两次考都有缺点了，说是没有出社会科学的题目。上海考的时候出了社会科学的题目了，你连基本路线都答错了，另外

姚文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什么呢？有的教授答是注意清洁卫生。还有说是《水浒传》是讲什么东西呢？有的教授说是讲社会上很怪的事情。

江青：最糟糕的是，自命为社会科学家，但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哪，五大特点哪，一概答不上，那么，这就不能够说考得不对了。你自己专业是社会科学家嘛，列宁的名著嘛，《帝国主义论》嘛，有五大特征嘛，一个也答不上。

姚文元：几大特征。

谢静宜：还有答基本路线是三要三不要。

江青：哎，基本路线他说是，不是，还有多快好省，总路线有的说是三要三不要。

姚文元：有的说是遵义会议上提出来的。有一位教授写了一首诗，我想也是暴露嘛，孔孟之道的危害啊，说，突闻考试实担心，突然闻到考试，实在心里很害怕了，此事当年害学生，这件事情当年害学生，指的从孔夫子下来害了多少人，搞资产阶级呀，修正主义呀，苏修那一套啊，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试滋味，今天临头我尝到了这个滋味，从今开始做新人，从现在开始要象，现在是谁，以张铁生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谢静宜：所以考完了，考糊了，有的说什么，这一次啊，我对张铁生的信才有体会啊，所以教育革命，一些旧的制度，原来的一些旧的制度啊，非要改革不行，我们一定提一些积极性的建设性的意见，有些这样的，当然也有个别的还是不满意了，到现在也还是不服气，也有那样的。所以这是一个例子。譬如在批林整风这个过程中，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好象是些难题，就是这不理解，那不理解，但是到了工农兵那里呢？很好解决问题。譬如说，一个贫下中农，一个妇女，她说为什么不理解呢？她说林贼出来，我们是完全理解的，她说千尺的水深能看清，寸厚的人心看不透，你不暴露他怎么能知道呢？说他不暴露啊，咱们怎么能知道呢。因为还有一个贫下中农老大爷讲了，它就象我们种庄稼选种子一样，种下去之后，选完种，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种下去之后，我们又浇水，出来了苗又除草，我们总希望它长个好庄稼，而最后呢？谁知道它长了一个大乌米，

迟群：有的个别的长了个大乌米。也有个别的。

江青：孔孟之道啊，有“三纲五常”，其中一纲就是对着我们妇女的。

谢静宜：譬如说，搞封资修这一套，工农兵是外行，但是批判呢，封资修，工农兵是内行。还有什么难学呀，难懂，难批，一大堆的难字，一堆矛盾。但是，主要的矛盾就是要不要批判的问题，这是要害问题，这是根本问题，这是第一位的问题。如果有决心要批，敢批的话，就不怕困难，就会知难而进，迎着困难而上，而不是知难而退。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要有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要敢字当头，因为这是挖修正主义，林彪反党集团的祖坟，是啊，向封资修帝修

反的宣战。所以要把批林批孔看成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所以，不懂不是主要矛盾，不懂可以问嘛，不会可以学嘛。主席讲了，入门并不难，深造也是可以办得到的，是人的因素第一。关键在于觉悟，在于学习，敢于斗争。一个善于抓大事的人，一个有创见的人，一个敢于反潮流抗逆流的人，一个敢于向帝修反作斗争的人，一个谦虚的人，必然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就是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体会到，不怕人的水平低，就怕你不学习，就是不学习马列主义，不学习主席著作。不怕你能力弱，就怕你没有干劲，没有革命的干劲。也不怕你事情多，忙，就怕你不抓大事，不抓大事，那就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么，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不怕你摊子大，就怕你不抓典型，因为没有典型就没有领导。

迟群：没有发言权。

谢静宜：毛主席就是善于抓典型的典范。江青同志这次写信，送材料，就是贯彻执行主席抓典型的指示的。江青同志抓样板戏，我们感到这是抓典型，而且最近又抓了好多关于教育革命这方面的一些典型，把教育革命现在搞得轰轰烈烈的，这是抓典型。而对于这个，批林整风的问题，批林批孔的问题，我们认为这又是抓典型，是抓大事，就是要点起批林批孔的烈火，就是要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所以，我们觉得要克服一切困难，排除一切障碍，掀起批林批孔的高潮，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我们各项工作做好，因为这是一个纲嘛。

再一点，就是从一个材料上看到，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对于批林批孔的认识还有一些问题的。你譬如说，把批孔定出什么样的口径呀，批到什么程度啊，定出一个什么标准哪，口号怎么提法，位置怎么摆法，什么还讲了不能搞运动啊，不能登小报啊，军区的小报上不要登批林批孔的文章，等等。这么多的清规戒律啊，这是实际上是下的禁令，就是不让你批孔，实际上就是不批林。也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从那里那些框框来的，那儿定的调子，所以才不要相信这些屁话的。

我念念这个屁话吧。总政宣传部一个负责人在战备教育座谈会上关于批孔问题的一段讲话。关于批孔的问题，最近中央报刊发表了一批文章，军队怎么搞？总政宣传部根据总政首长的指示，拟了一个意见，已通知下去了。主要谈了三点，一是批孔的意义。二是批孔的位置，要把批林摆在首位。三是批孔的方法。对批孔



再提两点，请大家注意。一是批孔的口径，批什么问题，批到什么程度，一定要以中央报刊为标准，不要乱批，不要乱提口号，不要乱点名。二是批孔的位置和声势，一定要按“十大”精神办。实际上他没有按“十大”精神办。“十大”强调一定要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批林可以联系批孔，揭露林彪利用孔子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连队可以讲讲孔子是个什么人，批孔的意义，引导学习中央报刊的批孔文章，不能把批林和批孔并列，整个这一点，就是不能把批林和批孔并列，不要把批孔搞成运动。军队的小报要注意掌握，不要登载部队批孔的活动，发表批孔的文章在数量上也要控制，不能搞多了，内容也要很好进行审查。你审查什么不知道！

江青：屁话！就是主席讲的屁话。

谢静宜：批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

江青插：不准批林，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

谢静宜：批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在去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指示嘛，那时候就讲过这个问题，而以后呢，主席又非常关心这件事情，这一次七四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主席批示转发的嘛，是党中央同意的嘛。因为我们在下面的一些座谈会上，有的同志说，部队为什么不动呢？他们说，一是有的同志把批孔与批林与贯彻“十大”精神割裂开来了，对立起来了。这个问题，“十大”精神，总理报告，洪文同志的讲话当中，首先第一条就是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嘛，敢于反潮流嘛。但是有的单位呢……

江青插：在这个“十大”，“十大”的党章讲话，王洪文同志也特别提出，这是主席讲的，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的总纲上了。

谢静宜：但有的单位呢，对于批孔无动于衷，其实这样就是不批林的问题。二是有的同志把批林批孔与军队建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所以那么离开了批林批孔，离开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离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你军队建设还有什么可言呢？

迟群：还有国家机关建设，就是说，整个的党的队伍的建设，我们革命队伍的建设。

谢静宜：你这样的话，政治思想工作就不可能提到纲上来嘛。

所以说呢，不批孔呢，种种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你作为一个领导，你领导什么？

关键是领导抓大事，埋头小事就要变修。所以，对批林批孔的问题，是批呢还是  
不批，是促进还是促退，是赞成还是反对，是积极呢还是消极，是对每一个革命  
者，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一个考验，是马列主义，是真马列主义还是假马列主义  
的一个试金石。

最后一点，就是要敢于反潮流，抗逆流，坚持斗争的哲学。主席指出啊，反潮流  
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一  
个无产阶级革命者革命精神的表现，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表现。一个革命者就  
是要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做到天不怕，地不怕，特别是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  
般地涌来的时候，要敢于反，不怕有压力，就怕不敢顶，要硬着头皮顶住。要出  
于公心哪，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最多是  
一死嘛，有什么了不起。反潮流这是事关路线，事关大局，是能够将无产阶级革  
命事业进行到底的一个大问题。毛主席就是敢于反潮流，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  
导师，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没有毛主席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就不可能有今  
天的胜利。毛主席教导，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  
无穷。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革命的精神是斗出来的，革命的事业是在斗  
争中发展的，不斗则退，不斗则垮。

迟群：不斗则修。

谢静宜：不斗则修。就要敢于同阶级敌人斗，敢于同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  
的一切言行作斗争，要敢于同一切不正之风作斗争。譬如说，走后门，特殊化的  
歪风邪气作斗争。这个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啊，是资产阶级思想，是封建士大夫阶  
级的特权思想，是孔老二的思想，它严重地破坏了干群关系，军民关系，破坏我  
党的优良传统，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在下面搞座谈的时候，以及我们在底下到  
学校的，在学校的工作，我们经常碰到的是这些问题，群众极其不满意呀。走后  
门这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格格不相容的，与文化大革命格格不相容的，这也  
是坚持不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一个基本原则的一个重大问题，  
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所以我们各级领导同志不要忘了，是党是  
人民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权力，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  
可能有我们的一切嘛，就不可能有我们的今天嘛，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嘛，我  
们只能有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丝毫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利。什么，就是在

我们碰到一些问题，经常有这样一些体验，这个人不好办啦，什么不同意呀，领导就不会高兴。我们办事情要让谁高兴呢？应该是让党高兴，让党高兴，让毛主席高兴，让全国人民高兴。要符合原则，就是符合党的原则，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原则。要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主席要我们做的，我们一定要做好。什么走后门，等等，领导同志批准了，某某领导同意了，不好办呀。我们说他批示了同意了，算个什么！毛主席对关于杜绝走后门多次的指示，多次的批示，你知道吗？应该按照谁的指示去做呢？谁的指示最重要呢？服从谁？应该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嘛。有些人总是口口声声说他忠于毛主席，但是不照主席指示去做。可是某一个领导人，为了让自己的子女当兵上大学，什么一个批示，一点头啊，一个电话，比主席的批示都重要哎。这是为什么？几千年的封资修的流毒，孔老二的一些流毒，旧的习惯势力，还有什么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裙带关系，把一些人就给俘虏了，这些关系超过了阶级关系，超过了政治关系，超过了党的关系。我们的干部要坚持原则，要不受捧，不受压，不受软硬兼施这一套东西。什么请客吃饭啦，他请客你可以不去嘛。所以有的群众就给我们说嘛，说“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可是也就有那么些人有人愿意请他的客，他就愿意去吃饭，吃饭了你不干还好嘛，吃饭吃了就给人家干，几十年的原则他都能坚持，但是一两小时就被人家给拉过去了，俘虏了。

迟群：所以说在一个人的身上失去了原则，将在千万人身上失去了说服力。所以我们就要在第一个人身上不要失去原则。如果在第一个人身上失去了原则，那么我们就在第二个人身上去纠正过来。

谢静宜：你这个很重要来。有的群众给我们说，他说有些领导，就是他那省的了，去给他作上山下乡的动员报告，他说你上面在讲话，底下就议论，说你有什么资格给我们作报告，你首先把你的孩子叫回来嘛，你跟我们一块上山下乡，我们没有话说，一块去。可是你说话没有用。这样的人简直是革命的败家子，所以主席讲到文化大革命搞一次不行，要搞多次。当然这一方面例子很多，因时间关系我不多讲。

江青：我在这儿要说一句话，这是少数人的事情，当然了，他也是相当典型的事情，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我们的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在西沙群岛为保卫祖国的主权，打了胜仗。

谢静宜：通过这次江青同志的信，送的材料，抓典型，通过广大革命群众的努力，特别是今天中央首长同志这次这么重视，都亲自到会，我们还是深受教育，对我们自己本身是个教育，是个鞭策，所以我们深信，我们有信心，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一定会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以取得更大的胜利和团结。完了。

姚文元：我稍微讲几句。刚才江青同志还有谢静宜同志讲到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写进了党章，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党章报告。我想起主席一首词，水调歌头，第一次横渡长江的时候毛主席写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第一，我们今天就要有毛主席横渡长江那一种迎着风浪前进的革命精神，把批林批孔搞到底。“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迎着风浪前进，比在平稳的环境里生活，有意义得多。一个革命者，毛主席说过，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另外一个呢，主席这个气魄大，主席是迎着风浪前进，这个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主席提到孔子说是逝者如斯夫。孔子是个着眼于已经死亡阶级的人，一个反动派，主席藐视他，嘲笑他，批判他。所以这里一面表现了主席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面批了资产阶级。所以我们要学习主席这一种反潮流的精神，横渡长江的精神，把这一场批林批孔的仗，认真地发动广大群众打好，打胜。

（当中联部政工组宣传组李宪魁讲到部领导不让印北大的材料时）江青：给你们送去。

来源：《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以及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材料。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姚文元转述毛主席历次对批孔的指示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毛主席同波兰共产党的同志谈话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要任务之一，是清除孔子在各方面的影响。”

（一九六八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主席针对林彪所说“孟子的王道还好一点吧”的谬论，说：“我这个人有点偏向，不那么喜欢孔夫子，我赞成孔夫子是代表奴

隶制旧贵族，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说法，要给韩非子、申不害、商鞅，要给法家应有的历史地位。人定胜天是荀子第一个提出来的。”

（一九七三年）“十大”以后，九月二十三日主席接见沙菲时谈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史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了文字，修筑了广阔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中制，由中央派人到各地，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主席指出秦始皇二十二项功劳，粉碎了林彪的进攻。）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给河南郑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

请浩亮同志亲送

河南省郑县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知识青年同志们亲启

江青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

我看了人民日报今天对于你们批林批孔的报导，十分高兴！为了使你们早日得到阅读材料，更为了使你们知道毛主席、党中央对你们的关怀，我特请浩亮同志和一名新华社记者同志前去探望你们，祝你们坚持乡村的伟大胜利！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也会得到更大的胜利！

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及其附件二百份；《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各二百份；《鲁迅批判孔孟之道的言论摘录》二百份；《五四运动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二百份。其他材料中央将来会发给你们。

要重新学习毛主席的以下著作：一，《我的一点意见》；二，《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信》；三，《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四，十大和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这些文件你们可能还有，如果没有请河南省委帮你们解决。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来源：来源：中共开封地委办公室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翻印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江青致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苏振华的信  
洪文、剑英、春桥、小平、锡联、振华同志，请转世友、紫阳同志：

请代我向广州军区全体指战员，海南岛，西沙群岛全体军民，同志们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祝贺西沙群岛全军，民兵，渔民同志们与敌周旋，取得维护祖国主权的伟大胜利。

我身在北京，心逐南海汹涌澎湃，虽不能与同志们一块持枪战斗，但在思想上，政治上正在进行着一场大斗争。这场斗争是大是大非，是路线斗争，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一场持久的斗争——批林批孔运动正向纵深发展，势若燎原。我们是心连心的，我们都要打倒帝修反，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各自在党分配的岗位上战斗着，为了表示我对同志们的祝贺，特请作家浩然同志，诗人张永枚同志，记者蒋豪济同志代表我前去看望坚持在前线的英雄们并送给你们

——《林彪与孔孟之道》500份

——《五四以来反动派和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言论辑录》500份

——《批林批孔材料（一），（二）》各500份

——《鲁迅批判孔孟之道言论摘录》500份

学习的第一单元是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第二单元是《毛主席致江青同志的一封信》，第三单元是《毛主席视察南方时和沿途负责同志的谈话》以上三份文件请世友，紫阳同志为你们准备。中央的通知还会告诉你们其他读物。

致

无产阶级革命的敬礼

江青 74.1.28 凌晨 5 时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报道《上海港务局第五装卸区工人一张革命大字报：要当码头的主人 不做吨位的奴隶》

人民日报编者按：上港五区工人的这张革命大字报，抓住了当前企业管理中的要

害问题，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企业，到底靠什么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靠什么把生产搞上去？这个问题不是小事，是大事。大字报向我们敲了警钟：党委不抓大事，文化大革命中已被批判了的东西也有可能重新出现，社会主义企业仍然有可能走到修正主义路上去！

上港五区工人说得好：我们不仅要管生产，更要管路线。所有企业的领导同志，都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虚心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要发动工人群众帮助领导把好路线关，抓革命，促生产，使我们的企业始终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杨树浦装卸站经验重要的一条，就是把码头工人当作码头的主人，全心全意地依靠广大工人群众。而我们区的领导，嘴上是说依靠群众，可是做起来就忘了群众。几年来我区的面貌改变不大，原因也就在这里。领导不是把工人当作码头的主人，而是视为吨位的奴隶，这是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在我区的反映。

两种不同的依靠，反映两条不同的路线

国家计划靠什么去完成？杨树浦装卸站的经验，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工人群众，充分相信和依靠广大工人群众。领导依靠工人，工人提高了当家作主的自觉性。广大工人以吃苦为荣，为革命多做一点，成为自觉行动。而我区领导，不是靠做政治思想工作去发动群众，而是靠“刺激”，靠压力。常常可以听到队领导这样的动员：“做完下班”，“完成计划后洗澡”。有时装卸速度慢了一点，领导就压：“你们不能搞无政府主义！”为了完成任务，千方百计“走捷径”，不是靠工人积极性，而是靠“压吨位”、“超负荷”。为什么我区违章操作制止不住，关键就是领导执行路线不对头。

两种不同的挂帅，反映两条不同的路线 怎样处理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到

杨树浦装卸站的经验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抓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抓好生产关系的变革，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而我区领导，是“单纯军事观点”、“吨位挂帅”：抓了吨位，忘了首位；抓了开几条线，忘了走什么路线。一次装大米，有一个班为了保证其他班大米装货质量，安排做了准备工作，耽误了一些装大米时间。第二天工班会，领导表扬了吨位高的班，对发扬风格的那个班一声不吭。群

众气愤地说：“风格风格，不如吨位及格！”“风格高，不如吨位高！”为了抢吨位，领导不是从长远考虑，抽出一些人去搞机械化，而是安于用人力一块一块搬生铁。有个工人为了港口早日实现机械化，提议采用荷花抓斗式吸铁机，队长听了不但不支持，还把脸一板，呵斥道：“做依格大梦！”群众改变海港面貌的积极性，被那沉重的吨位压抑下去了。

两种不同的出发点，反映两条不同的路线——完成计划只看到自己的一个部门、一个局部，还是顾全大局，从“一盘棋”出发？杨树浦装卸站的经验是分工虽不同，思想一条龙，搞好一根杠棒前后肩的关系，互相配合，协同作战。而我区领导只顾自己，不顾他人；只顾局部，不顾全局；有时甚至出现有些班完成吨位多了，而总的装卸速度却放慢了的怪现象。有的班为了抢卸重货，把轻货朝里翻，来个“挖井留山”，自己队吨位多了，却要别人重复劳动，把轻货再翻出来，装卸速度反而慢了。有的班为了图方便，把垫仓板朝边上一甩，结果接班的又得收拾一遍，速度又了。

我们要当码头的主人，决不做吨位的奴隶。我们管码头，不仅要管生产，管多装快卸，更要管路线。我们要行动起来，讲路线，揭矛盾，找差距，促转化，把我们五区的事情办好，把我们海港的事情办好，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办好。

上港五区部分工人

一九七四年一月七日

调查附记

据了解，五区部分工人揭露的问题完全属实，这说明经济领域里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十分尖锐的。五区领导不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依靠和相信群众，而是吨位挂帅，不讲路线，不讲风格，只要完成吨位，就可得到表扬和提早下班。这种做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丢掉协作风格，助长本位主义；不顾安全，不管质量，不搞机械化；装卸队之间争着卸重货，不愿卸轻泡货。一句话，挫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第五装卸队有的班在领导这种错误做法的影响下，抢吨位、超负荷比较突出，区领导对此却十分赞赏，而工人群众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它是唯生产力论的流毒。五区调度室的墙上，挂着一块记进度的大黑板，工人贴出大字报要求改变这种吨位挂帅的做法，指出：“黑板无罪，路线不对！”在座谈会上，工人们说：我们要当码头的主人，而不做吨位的奴隶。我们装装卸卸，为



的是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我们快装快卸，是要社会主义的吨位，而不要本位主义的吨位。

大字报贴出后，五区党委召开了会议，表示诚恳接受工人的批评，决心进一步学元旦社论，学杨树浦装卸站的经验，狠批唯生产力论，进一步发动全区的群众，揭矛盾，促转化，迅速改变面貌。

《解放日报》《文汇报》记者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罗思鼎的文章《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

王安石是北宋时代一位比较进步的地主阶级政治家。长期以来，他一直是自命孔门正统的道学家们的眼中钉。资产阶级阴谋家林彪所奉为至宝，并用以作为他搞阴谋、搞政变的立论根据的那篇托名伪造的《辨奸论》，就是当时道学家对王安石进行造谣、诬蔑和中伤的一篇代表作。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了清代蔡上翔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以下简称《考略》）。这是一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辩护的著作。它驳斥了宋朝以来道学家对王安石的攻击，为研究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儒法论战，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结合批林批孔来研究封建社会的这场儒法论战，有助于我们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阴谋手段，有助于我们揭露林彪反动世界观的根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儒家思想的反动性和儒、法两种思想斗争的历史演变过程，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

一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自从董仲舒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经过董仲舒等人的改造以后，逐步演变成为地主阶级的正统思想。法家主张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实际上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但作为一个宣扬革新、反对复古、尖锐地批判孔学的学派，却长期处于被封建统治者咒骂、排斥的地位。法家学派从汉代以后虽日趋消沉，但实际上地主阶级中一些主张搞革新的政治家，如桑弘羊、曹操、柳宗元、王安石等人，往往从提倡变革的先秦法家学派中寻找思想武器。因此，汉代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革新和守旧的斗争，在思想领域里往往以儒法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宋代，它直接反映为

“荆公新学”和反动理学的对立。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所谓“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后，为了替推行新法制造理论根据，吸收法家思想而创立的一个新学派。有进步必有反动。站在王安石对立面的，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这一政治派别的思想代表程颢、程颐在反对新学的斗争中，发展了反动的孔学，形成了极端唯心主义的理学即道学。这场新学与理学的斗争，实质上是封建社会中长期进行的儒法斗争的继续。

北宋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都是极端的尊儒反法派。他们把同王安石的斗争，看成是一场捍卫孔孟道统的斗争。《考略》指出，顽固派异口同声地攻击王安石“挟管（仲）商（鞅）之术”<sup>①</sup>，是少正卯那样的革新派。道学家程颢兄弟首先跳出来攻击新学，惊呼“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按：王安石字介甫），“坏了后生学者”<sup>②</sup>，表示要同它拚命。司马光的喽罗吕晦攻击王安石“如少正卯之才，言伪而辨，行伪而坚”<sup>③</sup>。范纯仁大骂王安石“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sup>④</sup>。南宋以后，道学家朱熹等人更是杀气腾腾地叫嚷王安石“学本出于刑名度数”<sup>⑤</sup>（意指王安石的学问都是以法家的理论为出发点的），如果落在孔子手里，必然要受到“少正卯之诛”<sup>⑥</sup>。这些孔门之徒口头上仁义道德，骨子里是要残酷无情地镇压劳动人民和本阶级内部的革新派的。林彪这个孔老二门徒，一面假惺惺地讲什么“和为贵”，咒骂法家是“罚家”，同时大喊“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在暗中策划反革命政变，也正是继承了孔子这个“巧伪人”的一套手段。

地主阶级顽固派以保卫孔子自居，斥责王安石的新学崇尚法家思想，是违背儒家正统的异端邪说，从反面说出了事物的真相。王安石在当时确实是一位有尊法反儒倾向的人物。变法期间，他把“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黜春秋之书”<sup>⑦</sup>，代之以自己撰述的《三经新义》、《字说》等著作，用来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顽固派骂他是商鞅，他针锋相对地回答：“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sup>⑧</sup>他嘲笑汉儒的烦琐哲学是坑害人的“无补之学”<sup>⑨</sup>，骂他们是区区修补，百孔千疮。至于对那些“据经泥古”的儒生，则抱着极其蔑视的态度指出：“后世所谓儒者，大抵皆庸人。”<sup>⑩</sup>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王安石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sup>⑪</sup>

<sup>⑪</sup>（“天象的变异不值得害怕，旧的传统不能作为依据，流言蜚语用不着去顾虑”）

这三句话，和孔子所鼓吹的“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①②（“对天命要畏敬，对王公大人要畏敬，对圣人的言论要畏敬”）直接相对立。这一下，在当时死水一潭的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死守儒家反动传统的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司马光竭力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再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也”①③。文彦博也跟着喊叫：“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①④。王安石则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的立场上，针锋相对地提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是如此。”①⑤他在《兼并》诗中愤慨指出：“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①⑥，毫不留情地揭露了顽固守旧的俗儒是大地主兼并势力的走狗，是变法的凶恶敌人。

思想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是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反映。环绕着王安石变法而展开的这场儒法斗争，归根到底，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之间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宋代在变法开始前，一小撮大地主霸占了全国十分之七以上的土地，广大农民日益赤贫化，自耕农以及中小地主大批破产，造成了“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①⑦的严重局面。这种状况既促进了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又进一步缩小了赋税的来源，引起了封建国家的财政危机。因此，王安石一上台，就提出了反兼并的理财措施，力图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对地租剥削的分配比例。他一再说：“理财为方今先急”①⑧；“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①⑨。办法呢？“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②⑩。他特别推崇汉朝著名法家桑弘羊坚持推行的“建本抑末”、“绝并兼之路”②⑪的法家经济政策，认为“催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②⑫。这就是要用法家学派的经济思想来重新调整权力和财产。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就是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②⑬。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大地主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因而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大地主顽固派的疯狂破坏。他们口口声声攻击王安石变法“用贱陵贵，以邪妨正”②⑭，“夺富民之利”②⑮，使“上户”“年年出钱，无有休息”②⑯。当时司马光身居洛阳，暗地里以“真宰相”自居，亲自指挥顽固派的捣乱活动，发誓要推翻新法。苏轼、苏辙兄弟之流，则是典型的投机派。他们有一套适应形势的两面派的手法，他们原来是恪信儒家信条的孔孟之徒，但在变法舆论高涨期间，也大唱起“常患法之不变”②⑰的调头。等到逆流一来，他们就马上把脸一变，落井下石，

攻击王安石“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②⑧（“使老百姓只知道财利而不懂得仁义，只看到刑罚而看不到道德”）。

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社会基础是很狭隘的。他们提出抑制兼并，目的是为了缓和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稳定中小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它并不可能改善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因此也不可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在变法派内部，也是各有各的心思，真正态度坚决的只是极少数。其中有的人根本就是投机分子。有个叫邓綰的，就是为了过官瘾而附和变法的，当别人斥责他时，他说：“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②⑨宋朝的社会危机是由封建制度本身所决定的。王安石由于其地主阶级的局限性，幻想在不根本触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作些修修补补，走改良的道路，这只能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他的法家思想也是不彻底的，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至于王安石的变法实践则比他的理论更要软弱，时停时续，时松时紧，从来也没有被认真实行过。后来，顽固派司马光上台执政，推翻了一切变法措施，竭力鼓吹儒家的反动理论，加速了宋王朝的灭亡。

反动的道学家们企图把北宋封建王朝灭亡的原因归罪于王安石变法，说什么“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③⑩。事实上，北宋王朝的灭亡，正如蔡上翔《考略》中所指出的，完全是“苟且因循不振之故”③⑪（“苟且偷生、因循守旧而不知奋发图强的原因”）。换句话说，北宋的覆亡恰恰是由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地主顽固派的反动守旧的路线造成的，是理学家们造成的。鲁迅说得对：“宋朝的读书人讲道学，讲理学，尊孔子，千篇一律。虽然有几个革新的人们，如王安石等等，行过新法，但不得大家的赞同，失败了。从此大家又唱老调子，和社会没有关系的老调子，一直到宋朝的灭亡。”（《老调子已经唱完》）

林彪跟着宋朝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屁股后面，恶毒咒骂王安石是“拗相公”，用以咒骂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咒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中国人民，正暴露出林彪路线的卖国主义本质。果然，林彪投奔苏修，自我爆炸，成为不齿于人类的叛徒、卖国贼。而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在粉碎内外敌人阴谋的斗争中，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欣欣向荣，继续胜利前进。

二

要正确认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根源和蔡上翔在《考略》中为王安石辩诬的意义，还必须进一步考察中国封建社会中儒法论争的全过程。

秦代以后，地主阶级的历代统治，是建立在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专政的基础上的。他们采用了法家学说中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专政的一面，可是却十分嫉视法家学说中提倡变革的一面。因此，整个封建社会中儒法斗争的趋势，是儒家学派越来越占据统治地位，而法家学派却越来越受排斥和咒骂。秦始皇是公开提倡法家思想的，“焚书坑儒”就是对先秦儒法斗争的一次革命性总结。在汉代，汉武帝虽然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把孔学封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但实际情况正如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③②。((1)(4))

孔子在思想界至高无上地位的确立，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同地主阶级在政治上逐步向反面转化为反动派的过程一致的。汉武帝以后，孔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不是那么高不可攀，历代都有人对他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桑弘羊就痛骂孔子是一个反动政客，直率地斥责孔子和他的学生“不耕而学，乱乃愈滋”③③。东汉的桓谭“非圣无法”③④，对待孔子也有点不太尊敬。王充则专门写了《问孔篇》，揭露孔子的说教“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直言不讳地说：“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③⑤西晋的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③⑥，结果为了这桩罪名而丢了脑袋，可见这时的孔圣人已经是不能随便得罪的了。到了唐代，孔子被抬上了“文宣王”的宝座，连唐玄宗这个风流皇帝也哼起了“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③⑦的调子。但就在这时，用大不敬的态度直呼孔老二名字的也还大有人在。李白自称是“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③⑧，对孔圣人有点油腔滑调，很不礼貌。直到唐代后期，韩愈大谈特谈孔孟的“道统”，说什么“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③⑨，孔子才开始被看作神圣不可触犯的偶像。但就是韩愈这个铁杆尊孔分子，有时也还难免要与孔圣人开个小玩笑。《石鼓歌》中的“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捭星宿遗羲娥”，就是在讽刺孔子不到秦国，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宋代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步向后期过渡，这种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其转折点是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清代李慈铭说：“自宋王安石变法，驯致大乱，后世以为大戒。少有更张，则群起而非之曰：‘又一王安石也。’由是相率为循默，不敢少出意见”④〇。李慈铭的立场是反动的，但他认为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

封建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和僵化，这个意识却是不错的。蔡上翔在《考略》中就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地主阶级一天天走向下坡路，孔子的地位也被封建统治者越抬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反动的程朱理学由于继承和发展了孔学的反动思想，在大地主阶级的支持下，成了封建社会后期的反动统治思想。这些道学家们为了维护孔孟之道，到处散布流言蜚语，不择手段地对王安石及其新学进行攻击和歪曲，正如《考略》所指出的，“种种阴谋诡秘，有同鬼蜮”④①。《考略》揭露了《辨奸论》是南宋道学家邵伯温冒名苏洵所写成的一篇造谣作品，它胡诌一通“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鬼话④②，目的是为了攻击王安石是“阴贼险狠，与人异趣”④③的大奸大恶。这个邵伯温还捏造说，他的老子邵雍在洛阳天津桥上听到杜鹃的啼声，就预见到政治将发生变乱，十年之后，果然发生了王安石变法。这完全是在胡说八道。早在清代初年，李绂就已指出：《辨奸论》“无端造谤”，“诬枉而失实”④④。蔡上翔更进一步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但是，《辨奸论》这种卑鄙无耻的造谣手段，却受到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的赏识。他以伪《辨奸论》为理论根据，捕风捉影地罗列一堆现象，大谈“政变”经，用什么“见微而知著”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妄图为其篡党篡政的阴谋服务。这充分说明林彪同历史上那些反动道学家一样虚伪无耻，只能靠搞唯心论，散布谣言，玩弄阴谋诡计过日子。林彪欣赏《辨奸论》，就是刻骨仇恨在毛主席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的中国革命人民，这种仇恨是地、富、反、坏、右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恨，后来集中表现在见不得阳光的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当中。

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是林彪所特别崇拜的一个南宋反动道学家。就是这个朱熹，编了一部《三朝名臣言行录》，把以前攻击王安石的一切反动言论统统收集了起来，流毒极深。蔡上翔指出：“安石得谤于天下后世，固结而不可解者，尤莫甚于《言行录》。”④⑤自从这部书问世以来，王安石受到了更恶毒的谩骂和污蔑。有人甚至捏造说，阎罗王新造了一个“变古狱”④⑥，又说地狱中有个“被械白须”的人，“乃王安石介甫”④⑦。明代有个叫周德恭的反动理学家竟大骂王安石是“古今第一小人”④⑧。到了清代，钱大昕咬牙切齿地攻击王安石“得罪于名教”，是“狂惑丧心之大恶”④⑨。这种极端嫉视和害怕任何改革的心理，

说明封建社会已经走向衰落和崩溃了。

在地主阶级逐步由真老虎变为纸老虎的过程中，尊法反儒思潮的总趋势只能是一浪低于一浪。从春秋战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儒法论争表现为法家节节胜利和儒家步步败退。在西汉前期，儒法两派在思想界也还保持着“两刃相割，利钝乃知”<sup>⑤①</sup>的对垒局面。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是一场儒法的大论战，斗争的结果是法家桑弘羊的失败和遇害。此后，法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是被镇压下去了，但法家思想中的许多内容却继续被地主阶级中的进步思想家所接受。这时的儒法论争，主要表现为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学派和正统的儒家学派的斗争。王安石是有法家倾向的，但已不敢公开承认自己是法家；他批判了孔子的反动论点，但不敢指名道姓批判孔子。在他以后，不少思想家在批判程朱理学的形式下冲击了孔孟之道，但却往往又抬出了孔子来作为护法神，竭力表白自己是真正的孔子之徒。黄宗羲反程朱，不反孔孟，还借用儒家的“三代之法”来反对“一家之法”的专制统治。戴震袭用了王安石的经注形式对理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他们都不敢公开打出法家的旗号，也不敢公开批判孔子。其中有些人反对了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却又陷入了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之中。清代乾嘉学派中的不少人刚跳出了宋代理学的圈子，又陷进了汉儒烦琐考据的泥坑。蔡上翔同样也不例外。他在《考略》一书中肯定了王安石变法，同时却又想竭力证明王安石的思想是合乎“真孔孟之道”<sup>⑤①</sup>的。上述事实说明，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地主阶级中的尊法反儒思潮也已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了。

我们回顾封建社会儒法斗争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尊儒反法思潮在中国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的政治势力的利益。他们尊儒是为了维护或复辟其反动统治，反法是为了反对进步的阶级或政治集团。今天，台湾的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尊孔，刘少奇、林彪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打起尊儒反法的黑旗，就是为了妄图在我国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揭露历史上儒法斗争的实质，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我们肯定法家在历史上的进步性，批判儒家的反动性，目的“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同时，这也是为了揭露和批判林彪这个政治骗子怎样利用历史上的反动思潮和反动学派向无产阶级进攻，以便更好地同他们作斗争。我们必须深入批林批孔，同一切剥削

阶级的传统思想实行最彻底的决裂，为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全面专政而努力奋斗！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第二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

在党的十大精神的鼓舞下，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激烈搏斗中，“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当前蓬勃兴起的批孔斗争，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深挖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老根的一场战斗。在林彪居住的黑窝里，到处充斥着儒家的思想垃圾，散发着孔学的霉烂臭气。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反动的孔孟之道是林彪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林彪一伙无论在政治上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思想上篡改党的理论基础，还是在组织上招降纳叛、结成死党、拼凑反革命队伍，在策略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剥开林彪的画皮，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的丑恶嘴脸。

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的政治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复辟倒退的极右路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克己复礼”。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林彪和他的死党连续写下了四条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把“克己复礼”作为自己万事中最大的事，这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春秋末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当时天下大乱，奴隶们纷纷起来造反，新兴地主阶级大力倡导革新，向奴隶主展开夺权斗争，使奴隶制旧秩序——“礼治”处于全面崩溃之中。孔子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上，把这种“礼崩乐坏”的大好形势诬蔑为“天下无道”，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他的“复礼”，就是要镇压奴隶起义，反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



的法家的革新路线，把社会拉向倒退；要按照周礼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奴隶主阶级专政；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已被推翻的奴隶主政权和丧失了特权地位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向新兴地主阶级进行反夺权。总之，孔子的“复礼”，就是复辟。林彪也是搞复辟的，他们具有共同的反革命本性和政治需要，所以林彪紧紧抓住“克己复礼”不放，认为“唯此为大”。他搞反革命政变和《“571工程”纪要》，正是他“复礼”内容的最好说明。

林彪的“复礼”，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林彪一伙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诬蔑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制造矛盾”；他们竭力诋毁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大肆诽谤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诬蔑为“危机四伏”、“停滞不前”，把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描绘成漆黑一团。一句话，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切，都不符合他们的“礼”。他们和孔子一样，都是颂古非今、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

林彪的“复礼”，就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恢复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在写下“克己复礼”条幅的同时，还学着孟子的腔调，告诫他的死党要“当务之为急”。他们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呢？请看：一九六九年冬，林彪亲笔题书“王者莫高周文……”的条幅，挂在床头，自称“人主”，自比“文王”，急于要实现当皇帝的美梦。

一九七〇年，林彪再三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抛出他的反党政治纲领，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急于要当“国家的头”，阴谋篡党夺权。接着，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了未遂的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一年，林彪一伙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急于“夺取全国政权”，并于九月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林彪反党集团“复礼”的首要目标，是他们反革命战略的“当务之急”。

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要在国内建立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在国内，他们照搬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那一套，进行复辟变天的反革命活动，

猖狂叫嚣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复辟资本主义。到那时，大大小小的黄世仁、南霸天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叛徒、特务、卖国贼王明之流就会大摇大摆地重新上台，成为林家王朝的“座上宾”，千百万革命者就会惨死在他们的反革命屠刀之下，亿万工农群众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国际上，他们按照自己的座右铭——孟子的“小国师大国”行事，进行投降卖国的反革命活动，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如果林彪这个“超级间谍”的阴谋得逞，我国锦绣河山就会遭到苏修坦克的蹂躏，社会帝国主义强盗就会在我国横行霸道，中国人民就会成为亡国奴。

总之，林彪捡起孔子“克己复礼”的破旗再三挥舞，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但这一切，不过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林彪就是这样的反动派，他本来想打着苏修主子的“核保护伞”，登上儿皇帝的宝座，结果却葬身沙漠，扛着“克己复礼”的破旗，走完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穷途末路，到孔老二那里报到去了。

用孔孟反动哲学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但有一条反革命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为它服务的反革命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孔孟的反动哲学。他用孔子的天命论、天才论反对唯物论，用中庸之道反对唯物辩证法，用儒家的“德、仁义、忠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发动了全面进攻。

孔子鼓吹“天命”，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叫作“天”老爷，他生育万物和人，主宰自然界和人间的一切。他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周文王等奴隶主所以有权统治人民，就是因为受命于天，而周公和孔子本人所以有“德”成为“圣人”来“教化”人民，也是因为受命于天。这完全是一种为了维护奴隶主专政而制造出来的宗教神学的唯心理论。孔子“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就

是从这种反动的天命论引伸出来的。林彪为了篡权复辟，把孔子的这一套唯心论当作宝贝。他手书“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八个大字，悬挂在床头正中墙上，自比天马，把自己说成是上天赐给人间的象龙一样的神人、超人和天才。他还在给其死党的题词中，把他们自吹的“美德”说成是“受于天”，这同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岂不完全是一路货色！多年来林彪及其死党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用谣言和诡辩把天才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这完全是枉费心机。他亲手写的“受于天”三个字，证明了林彪的天才论是孔子天命论的翻版，他坚持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就是企图论证他是“受于天”的最高统治者。

林彪说什么“中庸之道”“合理”，这就暴露了他反对革命、反对辩证法的真面目。孔孟所谓的中庸，就是做什么都要合于“礼”，既不过度又无不及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叫做“庸”。一句话，按奴隶制老规矩办事，不能有丝毫偏离和改变，就是中庸之道。这完全是反动阶级维护旧制度、反对变革的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对于这种东西，林彪赞不绝口，说是“合理”。按照这种“理”，林彪恶毒咒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路线是什么“过分”、“全左”、“做绝了”、“斗绝了”、“乱了套”。好家伙，一大堆帽子扣上来。其实，这丝毫无损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恰恰说明了林彪所坚持的，是一条维护旧制度旧秩序妄想开倒车的极右路线。林彪的所谓“过分”，就是用中庸之道反对革命。毛主席早就批驳了这种谬论，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林彪说“乱了套”，无非是乱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这一套，不乱这一套，就不能消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怕乱你们这一套吗？这才刚开始，到全世界彻底消灭剥削阶级，还差得远呢。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是唯物辩证法，“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的跋）是扶植新事物战胜旧事物，还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这个斗争在理论上必然表现为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林彪用孔孟的中庸之道反对辩证法，正是他搞极右路线的一个思想根源。

林彪说儒家的“德、仁义、忠恕”是“人的关系”的原则，并说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还说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家的原理”。他完全抽掉人的阶级性来讲什么“仁爱之心”，抹煞阶级对立来讲什么“人的关系”，这就是拿孔孟之道的反动的人性论，篡改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论。

儒家所宣扬的人性论,是一种虚伪的唯心主义理论,它总是宣扬一种先验的超阶级的人性。孔子宣扬什么“仁”就是“爱人”,孟子说“仁心”是人生来就有的,“人性善”。他们果真不分阶级地爱所有的人吗?没有那回事。郑国把起义奴隶“尽杀之”,孔子不是表扬他们干得好,赞为“善哉”吗?孟子不是专门论证对奴隶和劳动者进行剥削和统治是“天下之通义”吗?对新兴地主阶级,他们也是一点不爱的。孔子在鲁国代行宰相,一上台就杀了革新派代表人物少正卯。孔子的学生冉求为新兴地主阶级干事,孔子就马上开除他的学籍,断绝师徒关系,还要煽动学生攻他。这就说明孔孟讲的什么不分阶级的“人类之爱”,什么天生的“仁心”等等,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剥削阶级中的奴隶主那一小撮,只是那个反动的奴隶制度。林彪讲什么“仁爱之心”,可是,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凶相毕露地叫嚷:要一口“吃掉”无产阶级,要谋害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要把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统统打下去,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被我们打倒的那一小撮阶级敌人。这就是林彪的“人性”,也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蒋帮头目在林彪死了两年后哀悼他说:“林彪……较有人性,这就是孔子的伦理学说潜在人心的佐证。”蒋帮的这种赞扬,对林彪的人性究竟是什么货色,是一种绝好的说明。

反动阶级拚命宣扬人性论,一方面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关心人民的“仁义之主”,掩盖自己的吃人真相。另一方面,则是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号,向先进阶级的革命暴力兴师问罪。孔子不是骂新兴地主阶级是“有勇而无义为乱”,骂造反的奴隶是“有勇而无义为盗”吗?孟子更是这样,他破口大骂革命暴力是“杀人盈野”,“杀人盈城”,是“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应当处以极刑。林彪完全承袭了孔孟的一套,以反动的人性论为理论根据,猖狂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大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仁”。“‘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无产阶级对于一切敢于反抗的反动阶级的反动分子,必须给以坚决无情的镇压。不这样做,我们就要亡国,地主资产阶级就要复辟。在林彪的假仁假义后面,难道不就是要用反革命暴力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吗?对于反动派的反革命暴力,我们只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革命的暴力来镇压反革命的暴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使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这就是我们的结

论。

玩弄儒家权术，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林彪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搞修正主义，决定了他在组织上搞分裂、结党营私，在策略上要两面派、搞阴谋诡计。为了在党内隐藏下来，为了拼凑反革命队伍，伺机而动，实现其“复礼”的野心，林彪指使他的死党和一些人，挖空心思从四书五经、中外历史、以至小说谚语中搜寻材料，研究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权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所总结的一套反动统治术和两面派的伎俩，都成了他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重要思想武器。

孔子为了维护没落的奴隶制，提出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作为处理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准则，林彪在反党集团内部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林彪的“君使臣以礼”，是一种虚伪的姿态。林彪明明是一个法西斯独裁者，他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他却偏要唱起“使臣以礼”的腔调，打出“求贤”的招牌。其实，他这里所说的“礼”，不过是封官许愿、请客送礼、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一句话，就是用名利地位收买拉拢一些人为其反革命复辟事业服务。当他的死党的狐狸尾巴被群众揪住时，他便利用职权，包庇保护，使其蒙混过关。他的所谓“求贤”，就是按照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拼凑大小反革命“舰队”。

林彪标榜“君使臣以礼”的真实意图，是要他的死党“臣事君以忠”。象历代反动统治者一样，林彪也把“忠君”思想作为维持其反革命队伍内部统治的精神支柱。他宣扬孔孟“敬上”、“无违”和“忠孝”之道，提倡绝对服从；他强迫其特务组织成员向林家父子宣誓效忠，要他们“永远忠于”林家父子；当林彪反党集团末日来临的时候，他还发出“不成功便成仁”的反革命训令，妄想要其反革命“舰队”成员为“林家王朝”殉葬。这些事实说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就是孔孟之道的纲常名教。

林彪十分欣赏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把它抄录下来，挂在墙上，作为反革命的信条。林彪对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多次耐心的批评教育，怀恨在心，伺机反扑。为了阴谋篡党夺权，他反复告诫自己，要“忍耐”，切勿因“匹夫之勇”而败坏了“复礼”的“大谋”，“耽误自己终身大事”。在“忍”的背后，林彪咬

牙切齿，磨刀霍霍，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这实际上是胡风“在忍受中求得重生”的反革命故伎的重演。

为了“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实现他的“大谋”，林彪把“韬晦之计”奉为至宝。一九七〇年三月，正当林彪反党集团紧锣密鼓策划篡党夺权的时候，林彪指使他的死党把“韬晦”二字记在黑笔记上，并亲笔抄录了《三国演义》上赞扬刘备用“韬晦之计”欺骗曹操的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在这里，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虎穴”，自比为暂时栖身于“虎穴”中的“英雄”。这就不仅暴露了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同时也暴露了林彪用两面派手段乔装打扮，把反革命真相掩饰起来，等待时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毒手的狰狞面目。

为了伪装掩饰自己，“随机应变信如神”，林彪又根据孔孟的所谓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就会大难临头等说教，暗地里制定了一系列反革命两面派策略。什么“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什么“面带三分笑”，这一切，无须多加一字，就活灵活现地暴露了林彪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前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为什么乞灵于孔孟之道？

林彪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一样，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是不折不扣的尊孔派。人们会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什么要到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那里去寻找思想武器，党内的修正主义头子为什么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之流尊孔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首先，林彪之流的尊孔是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和阶级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它自己的阶级特点。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在思想文化上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足以取代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在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的产物，买办性和封建性是这个阶级的根本特性。他们历来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尊孔读经的封建文化的顽固的维护者和狂热的推销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

级的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谁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必然要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思想文化上也只能是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寻找武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之流，搞修正主义，乞灵于孔孟之道，正是反映了这样一个阶级的特点。出身在地主兼资本家家庭而又长期抗拒世界观改造的林彪，更是如此。

其次，从历史根源来看，孔孟之道原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极大欺骗性的剥削阶级思想体系，它的实质是主张倒退，反对进步；主张保守，反对革新；主张复辟，反对革命；是剥削压迫之道，反革命复辟之道。它后来被腐朽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所利用，也被妄想灭亡中国的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为历代反动统治者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成为一切搞复辟、搞反共的反动派的思想武器。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大力提倡、强制推行孔孟之道，使它渗透到旧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年深日久的传统观念。一切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总是祭起尊孔的破旗，千方百计地利用孔孟之道，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反对革命，主张倒退，他们尊孔也就毫不奇怪了。修正主义头子林彪，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但他到处搜集孔孟的言论，大讲孔孟之道，这完全是由于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一致，要搞复辟的反革命本性决定的，完全是出于利用反动的传统观念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的思想。当前开展的批林批孔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不批孔，不批判尊孔反法思想，实质上就是不批林。深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思想，对于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第二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二月七日）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中共河南省委通知

1974.02.01；豫发（1974）7号

全省各级党委、党支部：

江青同志一月二十八日给郟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写了一封信，并请浩亮同志专程亲送给知识青年同志们，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党中央对下乡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

江青同志的信，不仅是写给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也是写给全省下乡知识青年的，是写给全省人民和各级党委的。

江青同志的信，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伟大战略部署，是我们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斗争的强大动力。江青同志的信，是对坚持乡村的知识青年的莫大鼓舞和激励，是对我们各级党委的有力鞭策和教育。

省委决定，立即把《江青同志给郟县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人民公社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印发给全省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并发到全省城乡党支部，向广大群众宣读。我们要认真学习讨论，坚决贯彻执行，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公社的下乡知识青年同志们那样，当批林批孔的尖兵，做革命的促进派，迅速在全省范围内掀起批林批孔的新高潮，坚决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中共河南省委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政治斗争，正在各个方面展开。

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派。半个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同中外反动派作斗争、同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同时，反复地批判孔学，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想。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批判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才能进一步批深批透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这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和贯彻执行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他在见不得人的阴暗的角落里，在他的死党中间，甚至在公开场合，狂热地鼓吹孔孟之道，并且题在壁上，记在日记上，当作“座右铭”。为什么他拚命鼓吹孔孟之道呢？就是因为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是一致的，都要复辟旧制度，妄图把历史拉向倒退。

孔孟提出了“克己复礼”这个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说什么“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林彪在九大以后多次鼓吹“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孔孟鼓吹“生而知之”。说什么“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林彪把反动的“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他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狂叫“天马行空，独往独来”，阴谋篡党夺权，妄图实行独裁统治。

孔孟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林彪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污蔑劳动人民只会说“恭喜发财”，只能想“油盐酱醋柴”。

孔孟宣扬“德”、“仁义”、“忠恕”。林彪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用儒家的语言，恶毒攻击革命暴力，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孔孟鼓吹“中庸之道”。林彪叫喊中庸之道“合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攻击反修斗争“做绝了”，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孔孟鼓吹“以屈求伸”的处世哲学。林彪说他是“勉从虎穴暂栖身”，“随机应变信如神”，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使用的是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

孔孟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林彪攻击“五·七”道路，污蔑干部下放劳动“等于变相失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妄图破坏毛主席制定的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伟大战略部署。

孔孟之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林彪教子尊孔读经，还把奴隶主头子周文王临死前对武王传授的统治经验，作为“教子经”抄录给他的儿子，梦想建立林家

世袭王朝。

凡此种种，都证明批孔确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是为了更好地批林。批林批孔是我国当前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彻底革命，是对封、资、修的宣战，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

在批林批孔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积极还是消极，对每一个领导者都是一个考验。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我们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要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搞武的要学文，搞经济基础的要懂得上层建筑。要害问题是批不批。要批，就能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知难而进。

各级领导都要站在斗争的前列，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来议，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著作和指示，带头批林批孔。要发动群众，把孔孟的反动论点同林彪的反动谬论和反革命罪行加以对照，逐条地批。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忱地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要通过批林批孔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要深入基层，进行试点，训练骨干，抓好典型。要经常研究批林批孔斗争的新动向，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广大工农兵是批林批孔主力军。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群众，最敢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批林批孔最内行。“孔子要复礼，林彪要复辟，两人一样的。”这话说得多好啊！工农兵用生动的语言，一语击中林彪鼓吹孔孟之道的要害。工农兵起来了，批林批孔才能批深批透。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要积极参加这场斗争，努力改造世界观。一些受孔孟之道毒害较深的知识分子，在这场斗争中进行自我教育，工农兵对他们的进步是欢迎的。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我们要发扬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迎着风浪前进，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一九七四年二月四日，毛泽东关于一篇文章的批示

“此文似可发表。毛泽东 1974 年 2 月 4 日”

（对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的批示。来源：姚文元 1974 年 2 月 16 讲话）

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唐晓文的文章《“克己复礼”与野心家、阴谋家林彪》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把“克己复礼”作为自己的最高信条和搞反革命复辟的纲领。林彪和他的死党互相赠送的条幅里反复互相嘱咐：“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说世界万事中，“克己复礼”是最大的事，也就是说复辟资本主义是最大的事。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

“克己复礼”是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是孔学中最本质的东西。孔子曾经叫嚷：“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意思是说，约束自己的言行，以达到恢复周礼，即复辟奴隶制的目的，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正是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在奴隶起义的打击下，奴隶制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封建制正在兴起，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奴隶制社会的上层建筑正在土崩瓦解。在这种形势下，孔老二顽固地站在奴隶主的立场上，极力鼓吹“克己复礼”，就是要维持和复辟奴隶制，开历史的倒车。

孔老二讲“克己复礼”，林彪也讲“克己复礼”。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林彪和孔老二臭味相投，同气相求。两千多年的一条长长的黑线，把林彪和孔老二这两个反动政治集团的头子紧紧地连在一起。

林彪再三再四地挥舞“克己复礼”的破旗，正是在党的九大（一九六九年四月）以后，九届二中全会（一九七〇年九月）以前，这决不是偶然的。他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的阴谋被中央挫败之后，就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紧炮制蓄谋已久的反革命复辟纲领，密谋反革命策略，窥测方向，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孔老二讲：“克己复礼为仁”。意思是，“克己复礼”是“仁”的中心内容。林彪抓住孔老二的所谓“仁”如获至宝，大肆鼓吹“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娄上》）他拚命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仁”，是什么“暴政”、“独裁”，等等。在他看来，不“仁”就是非“礼”。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不符合“礼”，当然也就非

把它推翻不可，非“复礼”不可了。

为了“复礼”，林彪恶毒攻击我们对阶级敌人的专政，咒骂我们是秦始皇。不错，我们就是要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秦始皇为了镇压奴隶主的复辟阴谋，巩固新生的地主阶级政权，采取了“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这完全是正当的。林彪尊孔反法，借咒骂秦始皇，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林彪日夜梦想的，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这就是他所谓“复礼”的核心。他在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中，不是狂叫要对被镇压的一小撮地、富、反、坏、右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一律给予（予）政治上的解放”吗？解放他们，对这些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施“仁政”，就是要把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重新打入十八层地狱，这就是为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翻案，彻底否定我们党领导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几十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流血奋斗换来的革命成果。一旦达到了这个反动目的，林彪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即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就要重新出现；地主资产阶级就要重新骑在我国劳动人民头上；一小撮反动剥削者、寄生虫的“安居乐业”的宿愿就要如愿以偿。这就是林彪所念念不忘的“复礼”的美妙情景。

伟大导师列宁说过：“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他们……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弄得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六四〇页）林彪的“复礼”正是反映了一小撮剥削者这种强烈的“复辟希望”和疯狂的“复辟行动”。林彪不是搬出孔老二的所谓“正名”，大叫什么“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妄图篡党夺权，实行“权力再分配”吗？林彪要“复礼”，正是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级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我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要搞修正主义，就一定要玩弄阴谋诡计。他要“复礼”，就要“克己”。他所谓“克己”，就是他骗人的两面派手法，是地地道道的阴谋诡计，是他妄图搞复

辟的反革命策略。

林彪把孔孟之道奉为处世哲学，怀着对无产阶级的刻骨仇恨，妄图用所谓“韬晦（晦）”，即隐藏不露之计，掩蔽其反革命真相，伺机而动。

他曾经写了这样一个条幅，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这首诗，是从《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抄来的。这一回讲的是：刘备被吕布打败后，依附于曹操，他根据汉献帝的密诏，与董承等人勾结，阴谋杀害法家代表人物曹操，恢复东汉的统治。但是为了等待时机，刘备装出安分守己的样子，“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曹操对刘备的阴谋有所警惕，便请刘备吃酒，论当时英雄，进行试探。当曹操说破了只有刘备和他自己是“胸有大志，腹有良谋”的英雄的时候，刘备吃了一惊，手中的筷子也掉到地下了。刘备怕曹操生疑，而恰好当时雷雨大作，他便随机应变，假借害怕雷声来掩饰自己的惊慌。上面这首诗，是《三国演义》作者引用来称赞刘备善于随机应变，巧妙的掩饰自己的阴谋活动的。林彪抄这首诗来自比，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值得注意的是，林彪不仅抄录了这首诗，而且把原文中“勉从虎穴暂趋身”的“趋”字，改为“栖”字。他把我们革命队伍看成“虎穴”，他在这里不过暂时栖身，目的是要完成他的“大志”即反革命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一字之改，更加明显地暴露了他是隐藏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暴露了他是一个十足的反革命两面派，时机一到就要搞反革命复辟。

这个野心家、阴谋家为了隐藏不露，煞费苦心地想出了许多“克己”的卑鄙手法。对党和群众，他以“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假象来欺骗；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他以所谓“三不”、“三要”等来应付。“三不”，就是“不干扰”，“不批评”，“不报坏消息”；“三要”，就是“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免争领导之嫌”，“去影射之嫌”。这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他本来就是一个处心积虑地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疯狂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以最残暴的法西斯手段来对付人民的魔鬼，却给自己披上一张人皮，戴上种种假面具。魔鬼就是魔鬼，不管怎样乔装打扮，“面带三分笑”，也决不会成为美女。他的阴谋诡计，也决不能得逞。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

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林彪就是这样的人。他以“克己”骗人开始，以身败名裂告终。

林彪反复告诫自己及其同伙，把“克己复礼”看作是万事中最大的事。千百万善良的人们，请看吧！林彪这个叛徒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野心是何等之大，何等迫切！我们应该十分感谢这个绝妙的反面教员，他告诉我们：阶级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息，阶级敌人在抓反革命大事，我们决不能埋头于小事，忘记了抓革命的大事。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革命群众，都要充分认识到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革命的大事来做，都要服务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反修防修这个根本的目标。

在当前，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批林必须批孔，批孔是为了更好地批林。我们要大抓狠抓批林批孔斗争，把这个斗争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二月五日）

一九七四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二期文章《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

一个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掀起。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这是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的关键，是上层建筑领域里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努力作战。

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抓大事，要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就是当前全党的大事，全军的大事，全国人民的大事。不批林批孔，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是放弃对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进攻，这样下去，势必滑到修正主义的斜路上去。我们必须引起注意和警惕。

为什么要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呢？因为林彪同历史上的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一向尊孔反法，多次攻击秦始皇。他对腐朽不堪的孔孟之道五体投地，把它视为信条，奉为经典，贴在和藏在那些阴暗的角落里。他的反革命言行中，浸透着孔孟的反动思想。林彪尊孔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出于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为推行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他把孔孟之道

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对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因此,要深入批林就必须批孔,批孔正是为了深入批林。只有通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也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正因为这样,深入批判孔孟之道,就不是个“学术问题”,也不是象有的人所认为的仅仅是“文化教育界的事,与己无关”;恰恰相反,它是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紧密联系的政治问题,是工、农、商、学、兵、政、党都必须关心的反修防修的大事。这怎么能说“与己无关”呢?“不破不立”,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必须批林批孔。我们不信“中庸之道”,我们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革命者,把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打好打胜批林批孔这一仗。

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要着重揭露和批判林彪利用孔孟之道妄图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这个阶级的死硬派,他反对变革和进步,坚持复古和倒退。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是妄图复辟日益崩溃的奴隶制,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克己复礼”,是他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很懂得“克己复礼”的政治含意,对它心领神会。他认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林彪万事中的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效法孔子的“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孔子不是说过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吗?林彪正是继承了孔子的这个衣钵,妄图把被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扶植起来,让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恢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使我们的国家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林彪宣扬“德”、“仁义”、“忠恕”,贩卖“中庸之道”,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教子尊孔读经,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等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这就是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还要着重揭露和批判林彪的反动世界观及其根源。孔子为了复辟奴隶制，是以反动的“天命论”以及由此产生的“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唯心论的先验论作为思想基础的。林彪的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论”，就是来自孔子的“天命论”。他胡说自己的脑袋“长得好”，“特别灵”，把自己比作“天马”，可以在空中“独往独来”。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是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是他妄图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林家世袭王朝的精神支柱。这也正表现出林彪这个反动派的虚弱性。深入揭露和批判林彪的“天才论”，结合批判孔子的“天命论”，可以使我們更清楚地认识到维护“吃人”制度的剥削阶级世界观的反动性，认识到无产阶级世界观同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斗争的长期性。

批林批孔，触及到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许多方面。有一些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如轻视劳动，蔑视妇女，瞧不起工农群众，看不惯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崇洋复古，以及“开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这些除了有它们的社会阶级根源外，都可以从孔孟之道那里找到思想根源。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要通过深入批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清除这些流毒。

批林批孔必须掌握思想武器，加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许多著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毛主席对于孔孟之道和尊孔思想多次深刻的批判；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都是我们批林批孔的强大思想武器。联系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才能把批林批孔的斗争搞深搞透，真正分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论和唯心论、革命和反革命，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批林批孔中的许多有质量的文章、资料和发言，都是作者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而产生出来的，要坚持这样做下去。

在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从来是站在反孔斗争的前列，是批孔的主力军。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每一次农民革命战争，总是冲击了被反动统治阶级尊为“圣人”的孔子。他们对孔子的批判一次比一次更勇敢、更深刻。但是，由于他们不是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因而不可能用科学的革命理论彻底战胜孔子的反动思想。这个任务只有我们无产阶级才能完成。现在放在我们工农兵肩上批林批孔



的担子是很重的。我们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继续发扬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孔孟之道批个落花流水，批得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积极投入战斗。“工农兵文化低，不懂古文，批不出水平”，这是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对工农兵的污蔑。工农兵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和丰富的斗争知识，在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方面，已经涌现出一批敢于和善于斗争的生气勃勃的先进分子，他们必将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做出更巨大的贡献！

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带领群众切实抓好批林批孔这件大事，领导干部要做出榜样。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批林批孔中促进和加强广大群众的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我们坚信，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有几亿工农兵做坚强的主力军，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一九七四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第二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林彪与孔孟之道》

在党的十大精神的鼓舞下，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激烈搏斗中，“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当前蓬勃兴起的批孔斗争，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深挖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老根的一场战斗。在林彪居住的黑窝里，到处充斥着儒家的思想垃圾，散发着孔学的霉烂臭气。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反动的孔孟之道是林彪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林彪一伙无论在政治上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思想上篡改党的理论基础，还是在组织上招降纳叛、结成死党、拼凑反革命队伍，在策略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剥开林彪的画皮，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的丑恶嘴脸。

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的政治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复辟倒退的极右路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克己复礼”。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

在不到三个月内，林彪和他的死党连续写下了四条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把“克己复礼”作为自己万事中最大的事，这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春秋末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当时天下大乱，奴隶们纷纷起来造反，新兴地主阶级大力倡导革新，向奴隶主展开夺权斗争，使奴隶制旧秩序——“礼治”处于全面崩溃之中。孔子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上，把这种“礼崩乐坏”的大好形势诬蔑为“天下无道”，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他的“复礼”，就是要镇压奴隶起义，反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的革新路线，把社会拉向倒退；要按照周礼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奴隶主阶级专政；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已被推翻的奴隶主政权和丧失了特权地位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向新兴地主阶级进行反夺权。总之，孔子的“复礼”，就是复辟。林彪也是搞复辟的，他们具有共同的反革命本性和政治需要，所以林彪紧紧抓住“克己复礼”不放，认为“唯此为大”。他搞反革命政变和《“571 工程”纪要》，正是他“复礼”内容的最好说明。

林彪的“复礼”，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林彪一伙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诬蔑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制造矛盾”；他们竭力诋毁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大肆诽谤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诬蔑为“危机四伏”、“停滞不前”，把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描绘成漆黑一团。一句话，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切，都不符合他们的“礼”。他们和孔子一样，都是颂古非今、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

林彪的“复礼”，就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恢复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在写下“克己复礼”条幅的同时，还学着孟子的腔调，告诫他的死党要“当务之为急”。他们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呢？请看：一九六九年冬，林彪亲笔题书“王者莫高周文……”的条幅，挂在床头，自称“人主”，自比“文王”，急于要实现当皇帝的美梦。一九七〇年，林彪再三对抗毛主席

席的指示，抛出他的反党政治纲领，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急于要当“国家的头”，阴谋篡党夺权。接着，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了未遂的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一年，林彪一伙炮制了《“571 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急于“夺取全国政权”，并于九月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林彪反党集团“复礼”的首要目标，是他们反革命战略的“当务之急”。

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要在国内建立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在国内，他们照搬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那一套，进行复辟变天的反革命活动，猖狂叫嚣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复辟资本主义。到那时，大大小小的黄世仁、南霸天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叛徒、特务、卖国贼王明之流就会大摇大摆地重新上台，成为林家王朝的“座上宾”，千百万革命者就会惨死在他们的反革命屠刀之下，亿万工农群众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国际上，他们按照自己的座右铭——孟子的“小国师大国”行事，进行投降卖国的反革命活动，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如果林彪这个“超级间谍”的阴谋得逞，我国锦绣河山就会遭到苏修坦克的蹂躏，社会帝国主义强盗就会在我国横行霸道，中国人民就会成为亡国奴。

总之，林彪捡起孔子“克己复礼”的破旗再三挥舞，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但这一切，不过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林彪就是这样的反动派，他本来想打着苏修主子的“核保护伞”，登上儿皇帝的宝座，结果却葬身沙漠，扛着“克己复礼”的破旗，走完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穷途末路，到孔老二那里报到去了。

用孔孟反动哲学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但有一条反革命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为它服务的

反革命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孔孟的反动哲学。他用孔子的天命论、天才论反对唯物论，用中庸之道反对唯物辩证法，用儒家的“德、仁义、忠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发动了全面进攻。

孔子鼓吹“天命”，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叫作“天”老爷，他生育万物和人，主宰自然界和人间的一切。他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周文王等奴隶主所以有权统治人民，就是因为受命于天，而周公和孔子本人所以有“德”成为“圣人”来“教化”人民，也是因为受命于天。这完全是一种为了维护奴隶主专政而制造出来的宗教神学的唯心理论。孔子“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就是从这种反动的天命论引伸出来的。林彪为了篡权复辟，把孔子的这一套唯心论当作宝贝。他手书“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八个大字，悬挂在床头正中墙上，自比天马，把自己说成是上天赐给人间的象龙一样的神人、超人和天才。他还在给其死党的题词中，把他们自吹的“美德”说成是“受于天”，这同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岂不完全是一路货色！多年来林彪及其死党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用谣言和诡辩把天才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这完全是枉费心机。他亲手写的“受于天”三个字，证明了林彪的天才论是孔子天命论的翻版，他坚持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就是企图论证他是“受于天”的最高统治者。

林彪说什么“中庸之道”“合理”，这就暴露了他反对革命、反对辩证法的真面目。孔孟所谓的中庸，就是做什么都要合于“礼”，既不过度又无不及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叫做“庸”。一句话，按奴隶制老规矩办事，不能有丝毫偏离和改变，就是中庸之道。这完全是反动阶级维护旧制度、反对变革的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对于这种东西，林彪赞不绝口，说是“合理”。按照这种“理”，林彪恶毒咒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路线是什么“过分”、“全左”、“做绝了”、“斗绝了”、“乱了套”。好家伙，一大堆帽子扣上来。其实，这丝毫无损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恰恰说明了林彪所坚持的，是一条维护旧制度旧秩序妄想开倒车的极右路线。林彪的所谓“过分”，就是用中庸之道反对革命。毛主席早就批驳了这种谬论，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林彪说“乱了套”，无非是乱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这一套，不乱这一套，就不能消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怕乱你们这一套吗？这才刚开始，到全世界彻底消灭剥削阶

级，还差得远呢。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是唯物辩证法，“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的跋）是扶植新事物战胜旧事物，还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这个斗争在理论上必然表现为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林彪用孔孟的中庸之道反对辩证法，正是他搞极右路线的一个思想根源。

林彪说儒家的“德、仁义、忠恕”是“人的关系”的原则，并说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还说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家的原理”。他完全抽掉人的阶级性来讲什么“仁爱之心”，抹煞阶级对立来讲什么“人的关系”，这就是拿孔孟之道的反动的人性论，篡改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论。

儒家所宣扬的人性论，是一种虚伪的唯心主义理论，它总是宣扬一种先验的超阶级的人性。孔子宣扬什么“仁”就是“爱人”，孟子说“仁心”是人生来就有的，“人性善”。他们果真不分阶级地爱所有的人吗？没有那回事。郑国把起义奴隶“尽杀之”，孔子不是表扬他们干得好，赞为“善哉”吗？孟子不是专门论证对奴隶和劳动者进行剥削和统治是“天下之通义”吗？对新兴地主阶级，他们也是一点不爱的。孔子在鲁国代行宰相，一上台就杀了革新派代表人物少正卯。孔子的学生冉求为新兴地主阶级干事，孔子就马上开除他的学籍，断绝师徒关系，还要煽动学生攻他。这就说明孔孟讲的什么不分阶级的“人类之爱”，什么天生的“仁心”等等，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剥削阶级中的奴隶主那一小撮，只是那个反动的奴隶制度。林彪讲什么“仁爱之心”，可是，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凶相毕露地叫嚷：要一口“吃掉”无产阶级，要谋害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要把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统统打下去，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被我们打倒的那一小撮阶级敌人。这就是林彪的“人性”，也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蒋帮头目在林彪死了两年后哀悼他说：“林彪……较有人性，这就是孔子的伦理学说潜在人心的佐证。”蒋帮的这种赞扬，对林彪的人性究竟是什么货色，是一种绝好的说明。

反动阶级拚命宣扬人性论，一方面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关心人民的“仁义之主”，掩盖自己的吃人真相。另一方面，则是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号，向先进阶级的革命暴力兴师问罪。孔子不是骂新兴地主阶级是“有勇而无义为乱”，骂造反的奴隶是“有勇而无义为盗”吗？孟子更是这样，他破口大骂革命暴力是“杀人盈

野”，“杀人盈城”，是“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应当处以极刑。林彪完全承袭了孔孟的一套，以反动的人性论为理论根据，猖狂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大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仁”。“‘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无产阶级对于一切敢于反抗的反动阶级的反动分子，必须给以坚决无情的镇压。不这样做，我们就要亡国，地主资产阶级就要复辟。在林彪的假仁假义后面，难道不就是要用反革命暴力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吗？对于反动派的反革命暴力，我们只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革命的暴力来镇压反革命的暴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使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玩弄儒家权术，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林彪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搞修正主义，决定了他在组织上搞分裂、结党营私，在策略上要两面派、搞阴谋诡计。为了在党内隐藏下来，为了拼凑反革命队伍，伺机而动，实现其“复礼”的野心，林彪指使他的死党和一些人，挖空心思从四书五经、中外历史、以至小说谚语中搜寻材料，研究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权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所总结的一套反动统治术和两面派的伎俩，都成了他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重要思想武器。

孔子为了维护没落的奴隶制，提出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作为处理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准则，林彪在反党集团内部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林彪的“君使臣以礼”，是一种虚伪的姿态。林彪明明是一个法西斯独裁者，他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他却偏要唱起“使臣以礼”的腔调，打出“求贤”的招牌。其实，他这里所说的“礼”，不过是封官许愿、请客送礼、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一句话，就是用名利地位收买拉拢一些人为其反革命复辟事业服务。当他的死党的狐狸尾巴被群众揪住时，他便利用职权，包庇保护，使其蒙混过关。他的所谓“求贤”，就是按照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拼凑大小反革命“舰队”。

林彪标榜“君使臣以礼”的真实意图，是要他的死党“臣事君以忠”。象历代反动统治者一样，林彪也把“忠君”思想作为维持其反革命队伍内部统治的精神支

柱。他宣扬孔孟“敬上”、“无违”的“忠孝”之道，提倡绝对服从；他强迫其特务组织成员向林家父子宣誓效忠，要他们“永远忠于”林家父子；当林彪反党集团末日来临的时候，他还发出“不成功便成仁”的反革命训令，妄想要其反革命“舰队”成员为“林家王朝”殉葬。这些事实说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就是孔孟之道的纲常名教。

林彪十分欣赏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把它抄录下来，挂在墙上，作为反革命的信条。林彪对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多次耐心的批评教育，怀恨在心，伺机反扑。为了阴谋篡党夺权，他反复告诫自己，要“忍耐”，切勿因“匹夫之勇”而败坏了“复礼”的“大谋”，“耽误自己终身大事”。在“忍”的背后，林彪咬牙切齿，磨刀霍霍，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这实际上是胡风“在忍受中求得重生”的反革命故伎的重演。

为了“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实现他的“大谋”，林彪把“韬晦之计”奉为至宝。一九七〇年三月，正当林彪反党集团紧锣密鼓策划篡党夺权的时候，林彪指使他的死党把“韬晦”二字记在黑笔记上，并亲笔抄录了《三国演义》上赞扬刘备用“韬晦之计”欺骗曹操的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在这里，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虎穴”，自比为暂时栖身于“虎穴”中的“英雄”。这就不仅暴露了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同时也暴露了林彪用两面派手段乔装打扮，把反革命真相掩饰起来，等待时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毒手的狰狞面目。

为了伪装掩饰自己，“随机应变信如神”，林彪又根据孔孟的所谓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就会大难临头等说教，暗地里制定了一系列反革命两面派策略。什么“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什么“面带三分笑”，这一切，无须多加一字，就活灵活现地暴露了林彪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为什么乞灵于孔孟之道？

林彪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一样，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是不折不扣的尊孔派。人们会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什么要到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那里去寻找思想武器，党内的修正主义头子为什么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之流尊孔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首先，林彪之流的尊孔是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和阶级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它自己的阶级特点。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在思想文化上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足以取代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在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的产儿，买办性和封建性是这个阶级的根本特性。他们历来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尊孔读经的封建文化的顽固的维护者和狂热的推销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谁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必然要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思想文化上也只能是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寻找武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之流，搞修正主义，乞灵于孔孟之道，正是反映了这样一个阶级的特点。出身在地主兼资本家家庭而又长期抗拒世界观改造的林彪，更是如此。

其次，从历史根源来看，孔孟之道原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极大欺骗性的剥削阶级思想体系，它的实质是主张倒退，反对进步；主张保守，反对革新；主张复辟，反对革命；是剥削压迫之道，反革命复辟之道。它后来被腐朽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所利用，也被妄想灭亡中国的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为历代反动统治者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成为一切搞复辟、搞反共的反动派的思想武器。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大力提倡、强制推行孔孟之道，使它渗透到旧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年深日久的传统观念。一切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总是祭起尊孔的破旗，千方百计地利用孔孟之道，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反对革命，主张倒退，他们尊孔也就毫不奇怪了。修正主义头子林彪，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但他到处搜集孔孟的言论，大讲孔孟之道，这完全是由于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一致，要搞复辟的反革命本性决定的，完全是出于利用反动的传统观念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的思想。当



前开展的批林批孔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不批孔，不批判尊孔反法思想，实质上就是不批林。深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的思想，对于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江青给国防科委情报资料研究所恽仁祥的信

恽仁祥同志：

你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的信，我今天早上才收到。我很抱歉，未能及时收到你的信。

你们的材料那么困难，我很惊讶！国防科委的批林批孔运动搞不起来，必有原因，得你们自己找。我相信只要按毛主席的教导去做，总会冲破障碍而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现送上：

《林彪与孔孟之道》

《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

《批林批孔文章汇编》（一）（二）

以上材料各 100 份。如不足，我可以再送，请告我数字。

这封信可以给国防科委所有愿意参加批林批孔的同志看。不愿参加批林批孔的人要，也可以看。

不要再闹资产阶级派性了，敌人利用派性挑拨离间，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批林批孔是路线斗争，要抓住批林批孔路线斗争这个纲，这就是目前我国党、政、军、民、学以及其他各界的头等大事。

胜利是会属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同志们！

致以

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敬礼！

江青一九七四．二．十．晨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罗思鼎的文章《评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年）是宋朝唯心主义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发展了孔丘、孟轲及董仲舒以来的儒家唯心主义，形成庞杂的反动哲学体系。元、明、清三代，朱熹的《四书集注》是封建知识分子必读的教科书。他对《五经》的解释，被奉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直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搞阴谋、搞复辟，对朱熹也十分崇拜。他关起门来以朱熹的注解为蓝本搞了《四书集句》作为《四书集注》的续篇，叫嚣“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因此，要深入批林批孔，就必须批判朱熹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一

孔孟的儒家学派发展到宋朝，演变成为理学，又称道学。朱熹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是反动理学的集大成者。

在宋代，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中心，是怎样看待“理”和“气”的关系问题。“理”就是观念、思想，“气”就是物质。朱熹认为“理在先，气在后”，（《朱子语类》卷一）精神的东西先于物质而存在，万事万物，大至天地，小而蝼蚁，都是由“理”派生出来的。他用了这样一个譬喻：天上有一轮明月，世上无数江湖水面上有月亮的影子。“理”就是这个月亮，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则不过是“理”这个月亮照在水面上的影子罢了。

客观事实与朱熹说的正好相反。客观世界决不是“理”的影子，而朱熹的“理”倒是现实生活中的封建专制统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朱熹说：“帝是理为主。”

（《朱子语类》卷一）这就是说，天上的上帝和人间的皇帝都是“理”的体现和化身，老百姓们应当乖乖地服从他的统治。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时指出：“黑格尔力图在这里把君主说成真正的‘神人’，说成理念的真正化身。”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朱熹在这里玩的是同一套把戏。他所以要提出“理”的观念，目的是为了说明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说来说去，全是为封建统治辩护的歪理。林彪所说的“受于天”的“理智”，就是这种老调子的新唱。

朱熹的反动理学是孔孟儒家学说的进一步发展。孔丘为了维护没落奴隶主贵族的

统治，鼓吹反动的“天命”论，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反动统治秩序。到了汉朝，董仲舒改造了儒家学说，竭力宣扬“天人合一”，并制订了“三纲五常”的反动教条，为封建统治制造理论根据。朱熹继承和发展了从孔丘到董仲舒的反动理论，鼓吹“天命即是天理”，（《朱子语类》卷四六）而“三纲五常”则是这种“天理”在人间的体现。这个“理”，“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朱子文集·读大纪》）其中特别以父子君臣关系为“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朱子文集·垂拱奏劄》）朱熹甚至从蝼蚁之中看到了君臣关系，从犬马牛羊之中看到了朋友关系，其目的无非是要证明作为封建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是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是支配世界的原则，借以论证地主阶级专政的“合理”。

朱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认为封建统治不仅是合乎“天理”的，而且是永恒不变的。他胡说什么“纲常千万年磨灭不得”。（《朱子语类》卷二四）即使是“万一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朱子语类》卷一）其实，无论是孔丘的“天命”，还是朱熹的“天理”，都只是为了证明没落的腐朽的奴隶制或封建制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林彪继承了这套反动衣钵，把腐朽的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天命所归，叫嚣“顺天者兴，逆天者亡”，还胡说什么“这是辩证法”。看，这些反动派的腔调是何等地一模一样！它说明越是腐朽没落的阶级，越是要煞费心机地制造出一套骗人的理论。这是因为它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还需要欺骗自己。不然的话，他们的日子就连一天也混不下去。

朱熹把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说成是由“天理”命定的，叫嚷“存天理，灭人欲”，归根到底，是为了从思想上扼杀被压迫阶级的正义要求和革命行动。朱熹公开声言“佃户不可侵犯田主”，要农民“各依本分，凡事循理”。农民如果敢于“鼓众作闹”，起来造反，那就要吃官司，坐班房，“决配远恶州军”。（参见《朱子文集·劝农文》、《朱子文集·劝谕救荒》）朱熹还叫嚣说，凡是敢于“以下犯上，以卑凌尊”、“以地客杀地主”者，一律严加镇压，决不宽恕。这一切，都是为了消灭劳动人民的“悖逆作乱之心”，维护“三纲五常”，使“天理”不至于泯灭。（《朱子文集·戊申延和奏劄》）由此可见，朱熹的理学是地主阶级手里的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它和血淋淋的反革命暴力起着同样的反动作用。林彪鼓吹要学习朱熹的“待人”哲学，目的同样是为了镇压革命，妄图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中

国，恢复已经被推翻了的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

## 二

朱熹从“天理”是事物的本源出发，形成了他的以“格物致知”为基本内容的唯心主义认识论。

朱熹所说的“物”，并不是指客观存在，而只是“理”的影子。因此，他说的“格物致知”，并不是要人们通过社会实践去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而是指人们必须自觉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并从中去领悟和体会先验的“天理”。他明确提出，“格物致知”就是“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朱子文集·答陈齐仲》）换句话说，也就是要人们精通反动的孔孟之道，处处按照封建统治哲学去立身处世。所谓“格物致知”，对反动统治阶级来说，是维护和巩固统治秩序的药方；对被统治阶级来说，是要他们心甘情愿地当奴隶。

朱熹的“格物致知”，同一切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一样，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完全排斥了人们参加社会实践的必要性。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朱熹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出发，认为人是“理”所派生的，人心就反映着“理”，因此，“人心之灵，莫不有知”，（朱熹：《大学 章句》）“人心”能够领悟“天理”。他否认认识依赖于实践，否认人的认识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逐步发展和深化，说什么只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朱子语类》卷十二）就能到达“一旦豁然贯通”的境界。换句话说，人们根本不必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只要关起门来冥思苦想，就能逐步领悟“天理”，最后“忽然爆开，便自然通”，（《朱子语类》卷十一）从而穷尽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道理。这简直象变戏法一样神奇！叛徒、卖国贼林彪也鹦鹉学舌地说什么“要解决问题，就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照这种说法，根本不需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需要参加社会实践，不需要在革命斗争中改造世界观，而只要在灵魂深处那么“爆发”一下，就可以百功齐备、万事大吉了。

朱熹宣扬“格物致知”，目的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朱熹说：“致知格物，是穷此理。诚意正心修身，是体此理。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推此理。”（《朱子语类》

卷十五)总之,从封建帝王直到庶民百姓,都应该从思想上和行动上服从封建伦理道德,遵守封建秩序,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就是要“居敬”。朱熹说:“敬字工夫,乃圣门第一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少个敬不得。”(《朱子语类》卷十二)为什么“敬”字这么重要呢?因为这是封建统治的重要保证。对于地主阶级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要求他们恭恭敬敬地去维护“三纲五常”,不得有半点怠慢、放肆和动摇。对劳动人民来说,要服服贴贴地忍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朱子语类》卷十二)把自己手脚捆绑起来,就象“放在模匣子里面”一样。朱熹得意地吹嘘:“修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于此。”(《朱子语类》卷十二)这几句话,充分暴露了所谓“敬字工夫”的反动本质。

这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修养”经,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朱熹打着“敬”字的幌子,大搞形式主义,甚至专门规定了一整套“敬”的规矩,什么“坐如尸,立如齐”啊,什么“头容直,目容端”啊,(《朱子语类》卷十二)连走一步路,抬一下手,都要毕恭毕敬,多么庄严虔诚的道学先生面貌啊!林彪就十分欣赏这套反动的“敬字工夫”,鼓吹“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但是,剥下道貌岸然的画皮,骨子里却是阴谋欺诈,男盗女娼,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这就是朱熹的“待人”哲学。朱熹曾以查冤狱为名,行打击报复之实,为了打击反对派,祸及一个无辜的官妓,几乎用重刑把她折磨死。鲁迅在揭露宋朝道学的虚伪性时说过:“道学先生是躬行‘仁恕’的,但遇见不仁不恕的人们,他就也不能仁恕。所以朱子是大贤,而做官的时候,不能不给无告的官妓吃板子。”(《论俗人应避雅人》)这个自命继承了孔丘“道统”的伪君子,听说建阳县学堂风水好,企图占为己有,用粗绳捆绑孔子“圣象”,强令“搬家”,结果把孔“圣人”的手脚都搞断了,闹得舆论哗然。什么“敬”啊,“忠”啊,都是自欺欺人的鬼话。明代李卓吾曾骂道:“真个道学,脸皮三寸。”(《世说新语补》卷四)宋朝以后,“道学先生”成了伪君子的代名词。

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对于朱熹的这套两面派手法是心领神会的。孔丘说什么“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朱熹进一步鼓吹:“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四书集注·论语·子路》)林彪将这几句话收录在他的《四书集句》中,奉为信条。林彪还按照孟轲主张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

必果”的逻辑，露骨地宣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至于林彪自己所供认的要按照道学家们的“亲亲、尊尊、长长”之道办事，倒是供出了一部分反革命的真实意图。朱熹曾公开鼓吹：“亲者重而疏者轻，近者长而远者短。”（《朱子文集·经筵讲义》）十分清楚，朱熹的“待人”哲学，是从反动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出发的。林彪要学朱熹的这一套，是为了结党营私，纠合一小撮死党，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原来，他口口声声要学的“要象朱子那样去待人”的哲学，说穿了，就是要学道学家的虚伪和残忍。“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正是形象地刻画了这个骗子的虚伪残忍和狡猾阴险。

### 三

孔孟之道的唯心主义哲学，经过朱熹的加工改造，才最后系统化和定型化。孔丘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被地主阶级改造成为封建统治思想，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汉代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反动的唯心论体系为“王权神授”论制造根据。但是，儒家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不断地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和唯物主义思想家的批判，在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并不是很巩固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的一段时期内，玄学和佛学曾一度泛滥。唐代的韩愈，从世俗大地主立场出发反对僧侣地主的佛教哲学，强调要继承孔孟的思想传统，但在他手里没有构成周密系统的理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最终把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巩固下来的是宋代的理学，特别是朱熹的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宋史·道学传》指出，孔孟之道的“正统”，“至（朱）熹而始著”。

毛主席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朱熹的理学是腐朽的封建统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把代表全部封建宗法统治的思想和制度的“四权”概括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使孔孟之道进一步适应了反动封建统治的需要。朱熹理学在宋朝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中国封建社会到宋代已经走下坡路。宋代官僚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恶性膨胀，地主阶级残酷压榨农民，“小民田日减”，“大官田日增”。（《宋史·食货志上》）社会危机加剧，农民起义接连不断，提出了“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口号，斗争矛头直指封建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竭力加强对农民的政治压迫和思想统治，妄图防止封建社会的崩溃。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就是地主阶级在思想领域内加强统治的表现。

北宋理学兴起的时候，王安石曾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冲击了唯心主义理学。他继承了荀子以来朴素的唯物主义天道观，驳斥了儒家思想代表司马光等人的“天命”论；继承了先秦法家思想，主张以法治对官僚大地主作一些限制。朱熹理学是对王安石法家思想的反动。朱熹大骂王安石“全不用许多儒臣”，“其术足以杀人”。（《朱子语类》卷一三〇）与朱熹同时代的唯物主义思想家陈亮，也是朱熹大肆攻击的对象。陈亮说：“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途万辙，因事作则。”（《龙川文集·与应仲实》）他认为“道”体现在日常事物之中，任何具体事物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这是和朱熹的“理在气先”、“格物致知”的唯心主义认识论针锋相对的。因此，朱熹面对陈亮学说的传播，不由得惊呼：“陈同甫（陈亮字）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可畏，可畏！”（《朱子语类》卷一二三）这种情况，正好说明了在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斗争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绝对没有任何折衷、调和的余地。朱熹的理学对于维护反动的封建统治起着特殊的作用。正因为这一点，它得到了宋以后反动统治者的尊崇，成为指导封建社会的政治、法律、道德、文艺等上层建筑的总原则。宋理宗即位后，读了朱熹的书，大发感慨地说：“朕读之不释手，恨不与之同时。”追封朱熹为“太师”，下令把王安石的牌位抛出孔庙，而把朱熹的牌位抬进了孔庙。从此，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确立了朱熹的唯心主义理学的正统地位。正如鲁迅所指出：“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我之节烈观》）

从孔丘到朱熹，可以清楚地看出，反动统治阶级随着政治上的日益没落，越来越需要乞求于唯心论的先验论。直到今天，唯心论的先验论仍然是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叛徒、卖国贼林彪利用朱熹的反动哲学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工具，就是一例。因此，要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的革命，就必须彻底批判孔丘、朱熹直到林彪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只有这样做，才能进一步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六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传达毛主席指示一直没有时间谈，开个短会，传达主席指示。

“此文似可发表。毛泽东 1974 年 2 月 4 日”

（对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的批示）

排了三份清样，随杂志送，主席四日批，五日登报。

我领会，讨论一下，为什么三篇选这篇，是否这样几点：

1. 紧紧抓住批林批孔这个中心。这篇文章，从批孔一直挖到林彪的思想根源，不是一般的，而是搞政变经的思想根源。主席过去说，林彪靠伪辩奸论起家。紧紧抓住这个中心。
2. 抓住政治问题，路线问题。这篇文章从路线提出问题，讲两条路线斗争，分析尊孔反法思潮代表的什么阶级利益。
3. 说明在革命大批判中，要搞些扎实的、有分析的文章。此文虽讲古代问题，但是有分析的。以后文章古文尽量先翻成为白话文，我向政治局报告，这个文章很重要，有同志反映古文看不懂，我也作了一些工作，有的已翻译了。

我们要搞有分析的文章。

上海，我走时安排计划。评红楼梦，一个题为“大有大的难处”，对红楼梦评论要讲政治，讲路线，传达过。还有争夺厨房问题，试写看。

主席批示了，要我们想一想，今天觉得非谈一下不可，从这里得到启发，不一定对，请同志们讨论。文章对各阶级、集团思想面貌，政治立场，分析得比较清楚，对王安石也有批判。主席早就提出这个问题。好几段，我写上去的，原来联系实际总是少。上海不一定告诉他，就在编辑部内部说一下。

四川烧毁纸型，请新华社帮助了解，不要过分责备工人，责任在领导。

这一点传达到全体同志。

凡是主席讲的思想战线上的重大问题，都要落实。去年中央工作会议上我就发言讲过（指辩奸论）。文章要多改，你们要敢于提出问题，我有时可能疏忽。这期评论，加掌握大方向，区分两类矛盾，但不细。大家注意，减少片面性。

以下精神，限于到会同志，不外传。主席又批一件，关于走后门问题。



主席说：走后门问题很大，从支部到中央，牵涉到几百万人，批林批孔又夹杂着走后门问题，可能会冲淡批林批孔，（还是要紧紧抓住批林批孔）开后门进来的也有好人，走前门进来的也会有坏人，要防止形而上学片面性。（可能不完整）我领会，还是要抓批林批孔这个中心，不要转移了，不能分散，要有分析，看稿注意这个问题。

下期稿中，各种典型综述（辽宁文章）来了要重新研究一下。这期改文章，针对群众中的问题的话都改光了，批林批孔还是路线问题，重点在领导机关。主席讲要抓住重点，不要片面，要一分为二。

这期稿主要是批林批孔，对工农兵稿也不要马虎，有些口号等，要很仔细推敲。我对人民日报、新华社提出，“挖祖坟”提法如何，口头讲可以，报上如何讲？还有“斩草除根”，工农兵中讲，但是否很准确，很科学，要注意。要改的地方，不要马虎，要准备，鲜明，生动，文风要注意。不能因尖锐政治斗争，发动群众，提法就可马虎一点。

和江青商量，批英国两部电影，因批安东尼奥尼未结束，文章可写好，放在那里。批安东尚未结束，什么时候登再说。安东很凶，苏修也想捞点什么。安东和意修有关，但实为靠苏修，斗争是长时期的，稿子写好的送我可以。

《林彪与孔孟之道》，工农兵、知识分子、干部批判当中，有的批得很丰富，群众中有好多材料，北京吴德、倪志福同志来讲很多材料，讲解一号文件，相当不错。

上海来信，说“勉从虎穴暂栖身”一句，三国演义 35 种版本，9 种是“栖身”。这个问题不大，一字不改，照样暴露林彪野心家阴谋家面貌。

上海查出陈伯达亲手写“克己”二字，裱起来。

批林批孔，抓住中心，深入批。学习要强调，短评你们提出意见，可以的，抓住中心认真学，深入批，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深入学习，掌握武器，不能持久，上期短评已讲，还可强调一下。

过去批刘时，当刘公开点名后，文章多，主席仍很注意准确性，要求每条引文，认真查明出处。批林批孔也要这样，每条材料，从材料到观点，都要力求准确，防止形而上学，片面性。过去曾产生批林即批极左，我们转载甘肃文章，修改，强调批极右。这么大运动会出现支流，我们要把关，不准确的不要在版面上出现，

发现就改正。

我在上海，和工人座谈，批林批孔，读三本书，工人反映很好的意见，批林批孔很必要。大家反映，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走后门反面多了？知识分子也有反映。我说，文化大革命前不需要走后门，路线不对，搞修正主义路线，走前门，培养地主资产阶级接班人，前门就可以进去。文化大革命，学制改革，工农兵上大学，斗批改，前门无产阶级占领了，当然还不巩固，这样后门就突出了。有人反映过去学生中阿飞流氓多，也不一定，他也可以不是阿飞，但思想上是修正主义，表面看也好，但思想路线不对。这个道理看能不能说服多数同志，也说服不了顽固派，座谈会反映不少问题。

批林批孔还是抓住路线问题，政治问题，区别两类矛盾。

无标题音乐，他们后来开会，江青同志意见，音乐的阶级性，不单无标题有这个问题，坏的音乐，有些也有标题。形式是有标题，无标题，问题还是音乐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文化组文章还可以。人民日报对此也发一点，但分析不够。

对文化组谈明，我们对文章要求严格，不要见怪，好了还可以转载。不要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谈总结经验文章）主席在一月份提醒我们，要注意总结经验。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不注意总结经验就不容易搞好。至少一年总结一次。解放战争，有的几个月总结，有每项工作的总结，如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十大军事原则，三个月总结等等，很多，提醒我们注意总结。主席的意思，一个要注意总结当前经验，一个不要忘记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这很重要。所以要你们写，没有开会谈，未说清。此次短评只能带一句，要专门写。我们有正面经验，也有反面经验，例子很多，主席好多著作都是总结经验。即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集中起来，坚持下去，错误的在实践中区别开来，一分为二。批给你们看的材料，有的领导上有些被动，看到这些侧面如何办？一要善于学习，主席历来教导不要忘记，一要善于总结经验，有的消极总结，少发言，不要这样，不是这个。这不对。

（传言短评有两段是主席加的）辟谣。

（有人反映短评调子低）不要紧，意见都听。

（反映发行量增加）问题也还是编好，多了也不怎么样。

点叶群的名，这问题要注意，新华社消息未送我看，这种问题不能……，要注意。

短评写好后磨几次。本月 28 天，迟一两天早一两天问题不大，我没有时间过细磨，靠一个人不行，靠大家集体多商量。

稿子总是要压下一点，不要紧，发不了那么多。

辽大秦统一六国一篇，开始如何和批林挂上，研究一下。

师大谈孔老二怎样变成“圣人”一文，觉得宠杂，弯子多了，后根据会议精神加几段，不是显得很自然，再研究一下。

三本书，文章可以搞，别的栏目，也批林批孔，写得比较扎实，争取搞出备用。

周一良《读封建论》文，改后有无反映，篇幅增加相当多。

上海还约他们，接着秦复辟反复辟斗争一文之后写批《吕氏春秋》讲儒法斗争，看能不能写出？前一篇文章提到过，但未展开。现有初稿。题目架子议过，不知内容如何？这类文章，《红旗》总是要的。主席批了读《王荆公年谱考略》这篇，说明从历史上理论上批林批孔，要的。

短评，用短评可，也可能署名文章，自己研究，看内容把握如何，再看。

主席精神，第二条不传达，你们掌握，总结经验，主席专门批示，可传达。第二点我说不很准确，中央也未规定，你们看稿掌握。

（学习主席五次指示报告问题）主席指示和批林批孔两个一致的，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就是反修防修。不抓大事，政治思想工作就提不起纲来，有些地方割裂开来不行的。学一段向主席、中央写报告。

发现我们自己有缺点错误，严肃认真地改正，不要因为主席批了一篇文章，就骄傲，骄傲就糟糕。（对胡）不要告上海。经常相互提醒，多注意。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批“克己复礼”——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个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兴起。

当前，许多地方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首先集中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效果较好。

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克己复礼”。他把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这面破旗，视为至宝，称为万事中的大事。在九大以后，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到一九七〇年元旦，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林彪及其死党就写了四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这充分暴露了林彪反党集团迫不及待地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林彪“复礼”的政治纲领，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他对抗毛主席的多次指示，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名正言顺”地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林彪“复礼”的理论纲领，是“天才论”。他把自己吹成“生而知之”的“天才”，以“天马”自居，自比文王，为他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

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他接过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口号，狂妄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林彪这条“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反映了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在中国搞反革命复辟的愿望。

早在建国前夕，毛主席就告诫全党：“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问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更是一次尖锐复杂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抓住林彪鼓吹的“克己复礼”，深入地进行批判，就能进一步认清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的真面目，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其流毒。这对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极为重要。

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妄图复辟修正主义那一套的罪行，坚

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恶毒咒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种种谬论，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坚持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的罪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总之，要通过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广泛深入地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各项工作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批林批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有关文件。这是我们战斗的武器。我们要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学好学通，批深批透。在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时，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著。这样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理解反对修正主义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战斗任务，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紧紧掌握批林批孔这个中心，放手发动群众。要把革命大批判一步步地持久深入下去，防止纠缠于某些问题而冲淡批林批孔。要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能够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的。只要我们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就一定能使批林批孔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胜利前进。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社论）

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谈批林批孔及毛主席与卡翁达布迈丁的谈话

（关于调进编辑问题）考虑一次不调很多，还是调一点，万一病了，我病了，也有可能。工作不能中断。（孟兵山说：可以调些人临时帮助工作）临时帮助工作，可以的。

人总是要生病的，生老病死，时至则行。工作不能中断，特别最近紧张，（稿件）

我看一部分，大部分请你们看，我看不过来。

工农兵大学生中有无较好的？搞大批判有无较好的？（孟兵山说，曾在北大选过）不限于清华、北大，别的地方也可以。

将来可以调一点，有的同志可以看一看。第一步不一定参加编辑工作，搞调查研究，工农业生产，批林批孔典型，或校对材料，修改，慢慢地搞，是否可好一点？一个单位总要准备若干病号，调一点，准备一两年内培养。现在能工作的也好，培养也好，调（编辑），依靠组织部不行，从来稿中看，写作组的同志，都可以。

（有人插话：有的省市写作组的同志已当了副部长）当官的不要，下面的可以。

（有人插话：编辑组现没有女同志）可以调。

图书馆，要他们写新书介绍，锻炼他们，写书评，能不能用，另一回事。

思想动态仍不对外，内部大家看，研究一段时间再说。

谈几个问题：

这期稿件，可以这样办（按指组稿计划），几个问题商量一下。

一，第一个题目，看了下《盐铁论》，值得一看。里面批孔，相当尖锐。此文是汉昭帝六年，一场大辩论，题目是经济问题，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军事、经济、思想各个方面，是儒法两家在路线问题上一场激烈争论。王充《论衡》批孔，偏重于批迷信，唯心论，批逻辑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联系当时现实，象《盐铁论》这样大胆的批判，是不多的。上海一篇讲桑弘羊的，批判不多，（计划里的）这一篇是否突出出来。《盐铁论》总结，大夫（桑弘羊）说四条（大论，第59），讲孔四字：（一）强，是勉强的强，逆潮流而进。孔子治鲁不遂，在齐被赶走，卫不见用，围于匡，困于陈、蔡，“知时不用犹说”，强也。（二）贪：“知困而不能已”，贪也，境遇江河日下，不能“已”，追求功名利禄。（三）愚，“不知见欺而往”，愚也，愚蠢。（四）耻，怕死，“困辱不能死”，耻也。林彪不成功便成仁，困耻而不能死，耻也，无耻。总结四个字，驳孔很尖锐。桑弘羊最后失败，汉昭帝是傀儡皇帝，当权是霍光，桑弘羊被杀，废除烟酒专卖，归地方。批儒家是骗人的能言而不能行。驳得很多，粗翻一下，法家思想很活，桑弘羊是称赞陈胜的。（《盐铁论》的）编者桓宽倾向儒家，每篇用儒作结论，即贤良文学，材料本身显示真理在桑弘羊而不在儒家。

对外涉及打匈奴。桑弘羊主张屯兵，防止匈奴入侵。儒家之徒搞投降，和亲，仁

义，不打仗。这个问题这篇写进去也可以，也值得专门写。杨荣国写过王充批儒家的唯心论，那是思想方面。《盐铁论》政治讲得多，王充在他之后，到东汉。上海写了一篇，在《学习与批判》上。这一篇讲儒法斗争，要讲，但还可专门写一篇。

《盐铁论》本子很多，郭老编了个读本，这是 56 年出的。

王充讲到，两刃相割，利钝乃见。两派斗争，看出谁是谁非。林彪一套，贤良文学都用，如讲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联系批林容易，可以看出林彪的东西不是新鲜货色，是历代孔孟之徒多次攻击社会进步阶级、进步集团的，包括地主阶级进步集团。地主资产阶级用以攻击革命阶级，也攻击本阶级内部进步集团，儒家之徒，整个就是这一套，克己复礼，仁义。

《盐铁论》文字不难懂，可以看的。

第 54 段，继承荀子天论精神，信人不信天。儒家之徒拚命讲阴阳，仁义礼智和迷信结合，桑弘羊就不信。他驳儒家“信往疑今，非人自是”，说“日月在天，其征在人”，很大一段。

专门写，结合批林写得尖锐点，尽可能翻成白话。加注解，或用刮弧。杨荣国文章较通俗，一般好懂，文字较平易。上海一篇朝此努力，上次对讲王安石的一篇提意见，不翻译，一般看，要查书。

从《盐铁论》看到儒家之徒非常想做官，爬不上去，搞仁义一套。爬上去，杀起人来，比法家还厉害。这一篇要讲到。江青也讲到，不要看他口讲仁义。

你们看找谁写好。在北京找，改起来方便，大学里找。

《盐铁论校注》，56 年版。

写得要生动。本来对话就很生动，两刃相割，针锋相对。这样痛快淋漓驳儒家是很少的，如庄子盗跖篇。这样归纳为四个字，很少的。

写得生动点，要出点子，不写成学术性的，要写成政治性的、辩论性的。列宁讲过，把资产阶级反对唯神论的东西拿过来，有助于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这些我们也可以用以批孔，批林。农民不知孔子，而知道“孔圣人”。

在北京约人写，改起来方便些。

第二件，写一篇文章，批周赤萍的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此书流毒全国。周赤萍已隔离审查，属于死党，福建日报在 9·13 之后，写过一篇短文，

二篇杂文批此书，但浮皮了草，轻描淡写，未深刻批判，要写文章驳他，批他。10 大以后林彪已公开揭露了。

据说，原来周赤萍有一篇东西，70 年 9 月 23 先在福建日报“动向”上登，后在福建日报通讯上登，后来报纸登三天新书广告，第一版到第三版登载，印刷时间七个多月，300 多万册。我这一本原载人民中国日文版，可见版本很多。71 年 1 月出版的，福建新华书店。这里面有鬼，要揭开这个东西。到 9·13 前夕，（要新华书店提供材料）全国发行，翻成各种外文本子。新华社提供：国务院查过，72 年 5 月 18 日福建省委报告也没讲清楚，说是周赤萍背着省委搞的，实际也不是这样，这可以查的。查福建日报杂文，广告。出版之前经过修改，查查原来是什么，增加好多肉麻的东西，如“非凡天才”、“马列主义优秀的政治家活动家”，过去发表在那里，“红旗飘飘”拿出来对一下，最坏是颠倒历史，辽沈战役胜利，是主席路线战胜林彪路线而取得的，这本书完全颠倒，说什么是林彪的功劳。林彪要打长春，不打锦州，但书中说党中央、毛主席和林总深知完全可以一鼓作气拿下锦州。现在批判它，要点名，政治局议了，可以写。

一揭露此书出笼目的，九届二中全会之后，9·13 前夕出笼，为林彪反革命政变作舆论准备的。

二揭露此书伪造历史，辽沈战役是毛主席路线的胜利，战胜了林彪错误路线，林彪接受，纠正先打长春的错误，这有一系列决策，和林彪针锋相对的。这本书伪造林彪的“天才”，伪造历史，要剥掉。辽沈战役有一篇沈阳军区写的，重复不要紧，指出辽沈战役胜利是主席路线的胜利。

三揭露林彪的一点两面三三制。

此外还有生活方面的吹捧。伪装的东西要剥掉。

9·13 前夕，周赤萍在上海，于新野到杭州策划反革命政变，回上海专门找周谈，反革命密谋。周稍交代一点，是死党。

这本书抛出来不是偶然的，这点要指出。省委常委、政治部主任、报社核心小组组长夏仁静打电话给报社，说看戏时，周赤萍说，印了很好，可多印，福建就未很好宣传林彪。出版组提出，请示夏仁静，夏后来请示周赤萍，全国各地都发，上海抵制，未要，福建是用省里通知的。国务院出版口有材料，外文出版社也有名堂。“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这为林彪上台作舆论准备。福建日报可以查



查。可向新华书店要材料。

这期争取写出来，不要太长。

批孔丘的道德观念写也可以，写出来再看。

学习三本书，准备发文章，结合批林批孔，要有这方面内容。上海理发业工人有一篇学习《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文章。

经济，可以写，天津去年那篇如何？

《北大学报》第一期，有一篇《中庸之道和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光明日报也有一篇。引用林彪 70 年在辞海边上批语四句话：一，坚决的左倾高姿态；二，大胆的反极左思潮；三，大胆的反极右机会主义；四，耐心的团结大量的中间分子。这四条合起来，就成为正确路线。这是揭林彪很好的材料。“左倾”，不过是姿态，用左倾高姿态出面，搞反革命。高姿态者，画皮也。第二条，林彪是做了的，把社会主义革命，主席路线，文化大革命，历次路线斗争中对机会主义的批判（包括对彭德怀的批判）都叫做极左思潮，流毒甚广。黄、吴、李、邱也是这样。第三条，把执行主席路线的同志都作为右派，《571 工程纪要》就是这样讲。第四条，耐心团结大量中间分子，他搞阴谋，就要拉拢、收买一些人，北大文章解释为解放地富反坏右，值得研究，看是否要拉拢一些人？他所谓“解放一大片”，是不是这样有地富反坏右，但只此不完全。这四条合起来成“正确路线”。

我的意思另写一篇。他有六条（专案材料）写在另一条。四条之外还有两条。先说中庸中道，亚里士多德合理，然后讲四条之外，还有（5）瓦解间接同盟军，（6）韬、讳，操之论英雄，胸有大志，腹有良谋。不论四条，六条，都和中庸之道联在一起。亚里士多德是否讲过中庸之道，可以查一下。写一篇很有意义。揭穿林彪利用中庸之道搞反革命路线，搞阴谋，一整套反革命策略，包括左倾高姿态，“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前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揭露其伪装，为什么搞反革命叫“左派队伍”？他不是自命为“左派队伍”吗？自封“左派”为什么又大反极左思潮？瓦解间接同盟军，谈他的反革命策略。主席在胡风材料按语中有一段话，指出有些人搞自由主义，讲犯错误的人有两条道路，一条改正，一条堕落，走后一条道路反革命就向你招手呢！就要成为他们的间接同盟军。这个材料不知何时搞的。这个材料已用，不是请他们（北大）改，另组织一篇。要

逐条批驳，为什么要在中庸中道幌子下来搞？直接批林，联系批孔。（材料）他们已用了，也可以用。联系林彪反革命路线、阴谋。

新华社编的“蒋帮头目和反动文人尊孔言论”中有一条，蒋介石亲自给蒋经国讲中庸，一句句解释，说最重要是朱夫子在中庸章句前一篇序，指出中国道统与心法。“道统”为反革命的思想支柱，“心法”是阴谋诡计。蒋介石的思想支柱是孔孟之道。你们把这篇序找来看看。你们可向新华社要，是 73 年搞的。大吹孔孟之道，看反革命的心传是什么货色。什么文章用用这材料。

这两篇现实意义大，政治上较尖锐的，必要时可自己写。

下面的文章都要，典型经验，可以组织。

夏美珍文章不要了。

讲五七干校的文章可以。

工农业方面的文章积累一点，包括二部分，批林批孔推动生产的，再有的和批林批孔扣不上也要，三大运动，没有不行，否则有问题，没有以纲带目。版面还要生动活泼，要各方面稿子。别的报纸不注意，我们要注意，还要积累一点。

上海试制太阳伞，可以烧饭，烧水，只要 30 分钟。是个新成就。

（讲到请武钢写文章）武钢又在闹，放了两个人，文章不搞可以。搞一点和这些没有关系的，每期这方面要有一点，以纲带目。（造林的文章）可以搞。

（问山西稿，林兆木汇报）山西有一种倾向，压大寨，是不对的，山西在这里开会。盖子揭开，三个戏，都压下，谢振华同志有责任。一张大字报，山西满城风雨。大寨问题，内部有路线斗争。

曲阜，（陈以梅）这个人不一定很坏，要闹几天，这种情况经常有，不一定是坏人。文章登出去好象受过压。

短评看一看，想不出什么意见。月中再看，15 日或 20 日。

上海二篇文章，希望写出：一评吕氏春秋，二讲红楼梦，“大有大的难处”。不写为学术性的，要批判投降主义，卖国主义。这些东西的思想根源之一，是对处于没落过程中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估计过高，而对人民力量估计不足，所以怕嘛！主席评白皮书几篇文章很好，说帝国主义者艾奇逊对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我们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写成短文，看看如何。

各种各样典型准备一点。

教育革命要准备一点稿子。去年是否还留下一点？

批林批孔，搞一组小评论，不是直接批判，联系各条战线的问题，可以写得生动一点，各地大字报，总有好的，选一点。配合典型经验，搞一组小评论。

中联部编了苏修尊孔、攻击秦始皇的材料。苏修吹孔到家了，用修正主义解释孔子、吹捧孔子。说孔子培养“君子”，“君子”是完人，用修正主义观点吹“君子”是崇高理想，是各种美德的“综合体”，搞“合二而一”，认为“孔子可以造成美德的人”，你们写批判道德的文章可以考虑批判。对孔子道德吹到天上，为修正主义典范。说“以大丈夫之道反对妇道”。苏修重视“君子”，批道德的文章可以结合批判。他讲什么修身手段，教育教养作用，有学识，一言蔽之，“君子”就是修正主义典范。这一点有特色。攻秦始皇，同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是一致的，结合批判用。除《孔夫子在莫斯科》一文外，还用得不多。这有很多材料可用。

批“红地毯”的文章搞好后，送我看看。批周赤萍的文章，抓紧搞。有些东西（主席电报，关于辽沈战役的）也可说。出版口找几个人，天才论等好批。政治部分好写，资料室做一点工作，福建日报发过二篇杂文，一篇短文找出来印我看看，这是有利条件。对一点两面三三制，要求从军事路线、战略思想上驳他。主席讲的是歼灭战，四面包围，什么两面？军报文章写得很细。写军事一部分，怕出版口写有困难，请谁帮助？你们商量一下。这本书公开的，北京军区找一个人也可以。和“三上桃峰”一类，一为刘少奇翻案，一为林彪上台作舆论准备。9·13前加的要揭出来，如天才，就是新加的，庐山会议之后，主席批了天才论，他特别要加天才，就有这么个目的。

罗马尼亚提出中罗（两党的党刊）交换互访，婉言转告，我们人太少，最近不搞了。

主席指示，同外宾卡翁达、布迈丁的谈话，印数很少，讲一点。（编者：括号内为姚文元的话）

一、第一、二、三世界的问题。主席对此作了进一步分析，过去有各种解释。

主席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比较第三世界要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这一分析很重要,跟主席一贯思想第一、二中间地带是一致的。第一世界缩小到美苏两家,第二世界包括广大第二中间地带,第三世界是亚非拉,这对我们团结广大世界人民,争取中间派,孤立打击两霸,有很大战略意义。是否发文件,正在研究。这个分析很重要,看世界形势要用这个观点去看。把小修与苏修分了一下,苏修是第一世界,小修也放到第二世界,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这个问题马上写文章难,国际稿子要谈一下。我们这方面稿子也少。主席把两个中间地带和第一、二、三世界的思想统一起来。)

二、主席说,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

三、关于美苏争夺,主席说,美苏协议可能有,但我看不那么巩固。它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以争夺为主。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要打的,争夺的结果可能会武力解决的,但暂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我跟法国朋友讲得多了,要他们准备打。第二次世界大战快 30 年了,再有 30 年不打就 60 年了。这个社会制度不改革,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要准备他们(美苏)在世界上闹事,决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的和平,60 年一代,可见得第二代人他就不讲。

(这个思想很重要,驳苏修所谓“持久和平”,美国的“一代人和平”。美苏妥协是表面的、暂时的、骗人的,骨子里头争夺为主。主席一直讲天下大乱,和帝、修的看法对立的。战争,要么是帝国主义之间打,要么人民革命。苏对和平吹得起劲。发表学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文章讲了主席的这个意思,改时改进去了。对持久和平问题,可写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30 年了。)

和这相联系,主席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我们看,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社会制度,就是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不是我们要打,不是第三世界,也不是富国人民想打世界大战。这种东西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谁想到希特勒几乎统一欧洲,又失败了。谁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产生十月革命。中国在二次世界大战结尾,把日本,又把蒋介石赶走了。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较穷的国家站在一起。

（这里着重讲到战争主要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帝国主义是酝酿战争。要打，主要是制度，社会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一种。列宁讲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不是主观政策的问题。战争总是要打。最近时期，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动荡厉害。英国大选，保守党、工党都不能取得多数票，组阁组不成。自由党，14 席，票数占 19%，资产阶级虚伪的制度，组不成阁。意大利、西德动荡，意传说搞政变，很紧张。美国也不行，国内一团糟。苏修国内矛盾不断发展，苏修和它控制的国家的矛盾不断发展，世界继续在天下大乱中，革命人民力量在发展，帝国主义进一步衰落，这种情况下，主席提出认识帝国主义本性，注意战争。如何写文章要研究，要批判一代人和平、持久和平这两个口号，现在就是不和平。）

四、工作方法，如何看成绩缺点，主席说，我们有时候工作方法比较好，有时不大好，如果片面介绍中国说怎么好，那是不妥，当然说中国一片黑暗也是不对的，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时候有黑暗这一面。

（我体会，提醒注意工作方法，又驳安东尼奥尼把我们写为一团漆黑。主席历来看形势是坚持两点论，光明面是主要的，也不是一切都好，有黑暗一面。看国内也应这样看，形势大好是主要的，不能看到很多问题就认为一团漆黑了，黑暗总是次要的。）

我们下面工作人员爱吹成绩，不说错误，我们这个教育，要讲两面，讲得太好，往往办不到。

（成绩很大，但资产阶级东西还是有。）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再批“克己复礼”》

目前，全国人民集中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健康地发展。

党的九大以后，正当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号召，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推进的时候，林彪及其死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了许多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据《后汉书·李杜列传》的李固传中记载，东汉质帝被害，朝廷没有皇帝，太尉李固等联名上书大将军梁冀说：“今当立帝”，“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林彪把“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和“克己复礼”连在一

起，多次地大书特书，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孔老二“克己复礼”，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恢复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把丧失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扶植起来，让被打倒的旧贵族重新上台。林彪想当“皇帝”，搞“克己复礼”，也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林彪“兴灭国”，就是要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国”在中国复辟。“继绝世”，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继”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绝世”，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举逸民”，就是为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为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翻案，让那些牛鬼蛇神重新上台。

林彪的这一套，根本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他推行的是一条倒行逆施，妄图扭转我国社会主义历史车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就要深入揭露和批判他阴谋篡党夺权，“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罪行。

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两千多年来，从孔老二到林彪，那些叫嚷“克己复礼”，要倒退、复辟，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英雄们，都被历史的车轮压得粉碎。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倒退更是没有出路的。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阴谋复辟的罪行，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是巩固和发展这场革命的伟大成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倒退回去，搞资本主义复辟？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旗帜鲜明。林彪反党集团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中外反动派，包括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包括蒋介石集团，包括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都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他们现在又在极力攻击、诬蔑、破坏批林批孔运动。对于阶级敌人的诬蔑和攻击，我们要给予有力的回击。对于我们队伍中犯有错误，包括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转变立场，回到毛主

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让我们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达到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社论）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给江青的几封信和批语

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3. 20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几封信和批语

江青：

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

3. 27

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文章《孔丘其人》

孔丘其人，顽固凶狠却又十分虚弱，阴险狡诈而又极端腐朽。这是他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本性，也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的共同特点。今天，彻底揭露孔丘的反动面目，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

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

孔丘（公元前五五一——四七九年）生活的春秋末期，奴隶起义、平民暴动、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把腐朽的奴隶制度冲得“礼坏乐崩”，使整个奴隶主阶级面临灭顶之灾。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占领历史舞台。

孔丘出身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他的祖先原是宋国的大贵族，后来搬到鲁国。到他父亲 zōu ① 叔纮（zōu ① 音邹，

纥音合)一死，孔家就更加日益没落。孔老二从小接受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教育，年轻时就走上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道路。阶级的衰败和家庭的没落，更使他顽固地、狂热地为恢复被夺去的“天堂”而斗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孔丘终生的复辟梦想。它的集中表现，便是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

什么是“礼”？就是西周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孔老二把它吹得天花乱坠，说：“周代的制度是多么昌盛，多么丰富多采呀！我崇拜它！”（《论语·八佾》）实际上，周代实行的奴隶制，是一种在当时已经过时的极其反动、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它的“丰富多采”，正是无数奴隶的鲜血染成的！在这种制度下，奴隶主根本不把奴隶当人看待。一匹马一束丝就能换五个奴隶。奴隶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被迫从事极繁重的劳动，受到残暴的压榨。如果逃亡，抓回来后就要被活活锯掉一条腿，然后被扔到荒野“与禽兽为伍”，悲惨地冻饿而死。而奴隶主却靠着榨取奴隶的血汗，过着极其奢侈腐化的生活。甚至在他们死后，也要建筑富丽豪华的大坟墓，还把大批奴隶残酷地杀掉或者活埋，作为殉葬品，有时一次达上百人之多。孔丘要复的“礼”，就是这种奴隶的地狱，奴隶主的天堂。这种大批摧残劳动力、大量浪费劳动成果的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

孔丘这个家伙对于往日奴隶主阶级的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十分怀念，对于当时大好的革命形势刻骨仇恨，满脑子反革命复仇思想。看到烽烟滚滚的奴隶起义，孔老二破口大骂是“强盗”和“祸害”，恨不得斩尽杀绝。郑国奴隶主在一次镇压奴隶起义时，杀害了全部参加起义的奴隶，他听到后狂叫“杀得好！”（《左传·昭公二十年》）孔丘的“克己复礼”，就是奴隶主屠杀有理，奴隶造反无理，他完全是奴隶解放的死对头！

在孔老二心目中，周朝奴隶制的一切，从井田到法律，从音乐到酒杯，都是尽善尽美、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新兴地主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任何一项革新，对于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涌现的一切新生事物，孔老二都疯狂地跳出来反对。学生冉求去帮助革新，促进封建生产关系发展，他就恶狠狠地要门徒“鸣鼓而攻之”；晋国铸了刑鼎，破坏了奴隶制的贵贱秩序，他诅咒人家要“亡国”；甚至在他七十一岁、重病在床的时候，听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取了政权，还拚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再三请求讨伐。



孔丘如此仇视新事物，以种种努力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简直达到了发狂的地步。孔老二这个“复礼”狂，正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

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

孔丘此人，阴险狡猾。明明要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吃人政治，却偏偏装出一副“爱人”的面孔。他平时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不射窝里的鸟，不用带许多钩的大绳钓鱼，简直是不仅爱人，而且连鱼、鸟都爱。实际上，他是一个心黑手狠的恶鬼。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假仁假义地熬了一点粥给服苦役的奴隶喝，孔丘为此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触犯了“周礼”，急急忙忙派人砸了饭锅饭碗，把粥泼在地上。这就是孔丘的“仁者爱人”，真是虚伪到了极点！

孔丘还拚命鼓吹“信”。说什么“做人不讲信用，是根本不可以的”，妄图要人们相信他孔老二才是天下最讲信用的人。其实，“信用”从来就是有阶级性的。孔老二的所谓“信用”，不过是奴隶主贵族骗人的手段。他自己就承认“君子只注意坚持正道，而不必守信用”。（《论语·卫灵公》）就是说，为了实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之道，什么撒谎骗人、什么背信弃义的勾当都可以干。有一次孔丘路过一个叫蒲的地方，被当地起义抗卫的群众包围，不准他去卫国。孔老二指天发誓，与蒲人订下盟约，保证不去卫国。但刚一被释放，他就跑到卫君那里，递情报，出主意，要卫国派兵镇压起义。当面赌咒发拆，背后冷箭黑枪，这就是孔后的信用。

政治骗子都很注意窥测方向，见风使舵，经常涂改自己的脸谱。用孔丘自己的话说，就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这就是说，国家形势对复辟有利时，就大喊大叫，赤膊上阵；形势不利时，还要坚持复辟活动，但表面上要说好话，装笑脸，不露马脚。公元前五〇一年，鲁国发生了一次政变。公山不狃以费城为据点，准备推翻新兴地主阶级季桓子等人的统治。公山不狃派人与孔老二联络。一心要复辟变天的孔老二欣喜若狂，手舞足蹈，企图利用这次政变，从费城起家，干一番“复礼”的大事业，大叫要“使周代的制度在东方复兴”（《史记·孔子世家》），抛出了一个反革命复辟的行动纲领。但是，这次政变很快就失败了。孔丘贼心不死，摇身一变，隐瞒了自己要参与政变的真象，还说了一个政变头目的坏话，蒙蔽了季桓子，骗取了信任，居然当上鲁国首都行政长官，并很快窃取了警察总监和代理宰相的要职。就这样，孔丘这个政治骗子

改用“钻进去”的战术，篡夺了鲁国的一部分权力。

### 凶狠残暴的大恶霸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孔丘一上台，就立刻把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疯狂地推行他的反动政治路线，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特别把广大妇女压在社会最底层。

孔丘这个公开申明搞政治根本不需要杀人的伪君子，稍一得势，就露出了一副大恶霸的凶残面目。他当代理宰相仅三个月，就对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少正卯下了毒手，杀了之后，还下令把尸体示众三天。

少正卯是鲁国的大夫，是一位法家的先驱者。他宣传革新思想，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在他周围“聚徒成群”（《荀子·宥坐》），集合了一批先进的社会力量。甚至孔老二的学生也纷纷赶到少正卯那里去听讲，弄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王充《论衡·讲瑞》），学生好几次都跑光了，冷冷清清，只剩下颜渊一个人。少正卯的革新理论严重威胁着孔老二的复辟事业。孔丘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要干掉他。按照周礼，“刑不上大夫”，而且少正卯声望那么高，杀害他必然遭到舆论的谴责，甚至孔老二的学生也表示反对。然而孔丘为了反革命复辟的需要，根本不顾舆论的反对，利用他篡夺的代理宰相的权力，给少正卯硬安上五大“罪名”，极端凶残地把他杀害了。这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血腥的阶级报复。

列宁说：“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孔丘的“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奴隶主阶级法西斯式的专政。孔丘杀害少正卯这一事件告诉我们，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是生死斗争。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所谓超阶级的“仁政”。代表反动阶级的复辟势力一旦上台，就会象孔丘那样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革命者就会人头落地。这是一个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 不学无术的寄生虫

孔丘从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政治需要出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集中了西周文化的天生“圣人”、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欺世惑众。后代的反动派同样是为了维护和复辟旧制度的需要，也把孔老二捧为“大学问家”。这个纸老虎，必须彻底戳穿。

孔丘是什么“大学问家”吗？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毛主席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整顿党的作风》）孔老二这个家伙，一不懂革命理论，二不会生产劳动，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而是一个满肚子秕糠的大草包。当时劳动人民就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的生产知识等于零。他向学生灌输的所谓礼乐仁义，也完全是奴隶主贵族僵死的旧文化。他修的《春秋》，更是颠倒历史，混淆黑白，是一本无耻美化奴隶主头子、恶毒攻击革新势力的变天账。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当中，有不少人写了专门著作，总结了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某一方面的经验，在认识史上有所贡献。特别是法家的一些优秀代表，如商鞅、荀子、韩非子等人，更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阐发了革新的思想，丰富了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而孔老二这个家伙却是“述而不作”，根本写不出什么东西。儒家经典《论语》也不是孔丘的亲笔，而是他生前的一些言行，由他的徒子徒孙回忆记录下来，拼凑而成，鸡零狗碎，杂乱无章。查其内容，更是反动腐朽。不是鼓吹“天命”论，就是大念复辟经，再有便是如何搞阴谋、耍两面派以及腐朽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什么“粮食越精越好，肉切得越细越好”，“烹调不到家，不吃。肉切得不方正，不吃”，“穿黑色的羊羔皮袍，一定配上黑色的罩衣；穿白色的鹿皮袍，一定配上白色的罩衣；穿黄色的狐皮袍，一定配上黄色的罩衣”；什么对国君如何毕恭毕敬，对权臣如何笑脸相迎，在大庭广众之中如何装出一副忠厚老实的面孔，在社会上如何骗取正人君子的美名。（《论语·乡党》）看，乌七八糟，腐败不堪，这就是儒家的经典！卑鄙无耻，百般钻营，这就是孔丘的学问！明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贽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无学无术”。（《焚书·答耿中丞》）连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也瞧不起孔丘那一套，说在孔丘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还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哲学史讲演录》）这对于孔老二这个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倒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到处碰壁的丧家狗

毛主席说：“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孔丘一生，到处搞复辟，到处碰壁。当时人民群众骂孔老二“累累若

丧家之狗”，这句话生动地概括了孔老二一生的遭遇。这是他推行那条倒行逆施的政治路线的必然结果。

孔老二打着“克己复礼”的破旗，坐着一辆马车，颠颠簸簸，先后到过齐、卫、宋、陈、蔡、楚等国，奔波了十几年。但所到之处，不是坐冷板凳，就是被驱逐出境，大家都厌恶这个死顽固。卫国国君听说孔丘善于搞阴谋，派人带着武器出出进进地盯着他；齐国和宋国的新兴势力还要杀掉他。孔老二每次都夹着尾巴狼狽逃窜。在陈、蔡，新兴势力还派人把孔丘一伙包围在野地里，使他们七天吃不上饭，饿扁了肚子，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还病得爬不起来。连他的几个得意门生也大闹情绪，对孔老二那一套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孔老二在劳动人民那里，更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种田的，背筐的，守门的，都对他群起而攻之。有的唱歌嘲笑他，有的斥责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反动派。匡城的老百姓还把他包围了五天，要杀他。孔老二几乎丢了一条老命。有一次，孔老二装出一副亲善的样子，面带三分笑，心藏一把刀，跑到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柳下跖那里，妄图用“仁义道德”的说教和名利地位的诱饵瓦解奴隶起义军。柳下跖满怀革命的义愤，痛斥孔老二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吸血鬼，是当面说好话、背后搞阴谋的两面派，是油嘴滑舌、“诈巧虚伪”的“巧伪人”，是“罪大极重”的“盗丘”！骂得孔老二脸色刷白，两眼发黑，丧魂落魄地滚跑了。（《庄子·盗跖》）

孔丘到处碰壁，连他的弟子们也纷纷离开了他。孔老二哀叹：“如果我的主张行不通，我要坐着木筏到海外去。能跟随我的人，大概只有子路了。”（《论语·公冶长》）但就是这个子路，也在一次维护奴隶制的战斗中被人砍成肉酱，成了奴隶制度的殉葬品。孔丘如果还想坐着木筏亡命海外，就连一个追随的人也没有了。到处碰壁，众叛亲离，这就是一切搞复辟的反动头子的必然下场。

马克思说：“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死抱住孔老二僵尸不放、妄图开历史倒车的人，他们的前途是不美妙的。世界的未来属于无产者！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第四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

一九七四年四月六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送主席参阅。在省一级的材料中，此件是比较有分析的。想请《红旗》编辑部找江渭清同志写一篇讲学习和调查的体会，联系农村阶级斗争及我们的基本政策的文章，妥否，请指示！

姚文元 四月四日（毛主席已圈阅）

这什么把这件送主席参阅、想组织一篇文章呢？是要逐步组织一点更实际的文章。另外可以打破省里的人不能写文章。江渭清同志去江西不久，跟两派没有关系，不至于引起两派的问题。他作了调查，谈的体会，有些分析。对农村阶级斗争的状况，如何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作了一些具体分析。

文章要先讲光明面，讲主席理论问题指示的意义，一层一层分析，对农村的几种表现，提出适当的政策界限。

可以跟新华社通通消息，告诉他们主席已批了。你们去一个同志跟新华分社写这个材料的同志一起帮助江写。争取本期搞出来。

并不太难，现在已经发了一些文章，讲这些问题波动不会大。基本形势还是好的，群众、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贫下中农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肯定这些，再讲问题。

文章不要写得死板。完全不要代笔也难。你们去一个同志，还有新华分社的帮助他。

这样，至少有一位省委书记写写文章，中央已有两位写文章了，不光中央的同志写。主席讲了要大家都写嘛！也不光编辑部写，所以还要组织点人写。

还可以找一个讲城市的。

材料中后面提到两个思想问题，要讲清楚，讲清楚了可以解决不少问题。

文章要通过分析肯定主席的指示完全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说明“无论经济领域或是政治领域，都存在着复辟与反复辟、占领与反占领、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的严重斗争。”文章要把这个问题讲透点。说明斗争的长期性。也可以举一点好的典型，原来有问题，通过学习，解决了问题的典型，可以鼓舞人心。说明农村的形势是好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农村大多数还是好的。多数还是教育问题。批判的锋芒，指向少数投机倒把分子，部分富裕中农。不要批评大多数，团结两个 95%。

这个材料中讲到有一个地主，腐蚀了公社干部，向国家贷款七千元，雇了五十多个工人，盘了一块青山，砍伐树木，牟利八千元。这个例子很典型。四清时没有全部搞，后来刘少奇搞反动路线，纠正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很快接着就搞文化大革命了。文化大革命斗争中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主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这几年农村生产有较大发展，粮食产量增长了，这种情况也容易产生资本主义。文章也要讲到注意如何促进生产，不是影响生产。农村现在发展生产的潜力很大。农业机械有很大增加，主要因素在人，在相互关系，所有制。

他这个材料，我感兴趣的就能从感性印象中拧出一点东西，从资本主义活动的现象中，提出问题，提出观点。

要划一点思想界线，政策界限。提倡什么？反对什么？例如，我们总是提倡农民有东西先卖给国家。

农村自由市场，有人搞投机倒把，占便宜的只是极少数投机倒把分子，农民是吃亏的，有的东西卖价高，但买进东西价格也高，而且最容易引起两级分化。文章对“自由贸易”问题可以作点具体分析。

这个材料也讲到了主要是一部分干部的问题。有些数字不能公开，举典型的材料、典型的思想。

文章一个强调自己学习，一个是强调下去调查研究，（那怕是走马看花也好）强调这两点，对其他省市会有推动。自己学了，而且下去看了看，这就好。

关键还在领导干部，搞一个好的写写文章。

文章要说一点领导干部，干部自己世界观的改造，不光讲下面的。

要把后面说到的两个思想问题讲透点。

江西两派头头一个叫万里浪，一个叫涂力，涂是中央委员。这两派是原来一派，后来分开了。你们不要跟他们接触。

你们去可以找新华分社的记者。免不了有点代笔。江渭清去江西以后，那里还比较稳定。但也要估计两种可能，如有什么特殊情况再报告我。

去了以后，要他们写一个报告，你转给我。

试试看，过去县以上不能写文章，现在可以试一试。

可以告诉江：“编辑部根据文元的意见请你写一篇文章。因为文元把新华社写的国内动态清样送主席看。主席圈阅了。”（这份记录稿是当面对林兆木同志谈话讲

的)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

1974.04.10；中发[1974] 12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全国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胜利展开，逐步深入，形势很好。

对有些单位请示中央的几个问题，答复如下：

一、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中央重申毛主席的教导：“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对已经成立的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各级党委应做好工作，劝他们回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如果对他们有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部队各级党委和被批评的同志对人民群众的批评应当表示欢迎，认真地妥善地处理。

三应当强调指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各级领导同志务必理解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要把各级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作为重点认真搞好。要欢迎群众联系本地区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实际所提出的批评。有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甚至采取恶劣手段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完全错误的。对阶级敌人的破坏，要提高警惕。中央希望各级党委认真加强领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批林批孔进一步开展起来。

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原文件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四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讲毛主席指示精神（谈湖北未印《红旗》）背离批林批孔中心。

十二号文件根据主席意见起草的，主席讲两次，不搞战斗队这类东西。

湖北首先省委内部意见不一致，社会上存在两大派，估计十二号文件尚未到那里。给省委打招呼，说接到的情况不知是否正确。希望他们解决。

下一期，五四运动 55 周年，上次计划一篇，尽量还是能写出来。天津一篇（主席批孔论述）能不能和五四联合起来，开头也讲五四，未看。上次编文件，主席批孔论述，主席未批下来。这篇文章材料都是公开的。中央文件讲，批孔更困难些，因为要做很多工作，如资料等。这一篇，研究一下，开头讲五四运动 55 周年，讲半世纪以来，其他看后再研究。

教育革命文章搞一点，这是比较艰苦的工作，不容易搞，要作很大努力。文化方面登了一些，教育方面要有一点。“五一”要有工人的文章，各地，面广点，讲工人阶级团结，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重学主席指示，都有针对性。

对于校学员，还是做思想工作让回去。应当是有组织纪律的。不回去是什么道理？办公厅比较坚决，不能随便到处跑。有病都有一点，生病要看，借故留在这里，不是很好。信转中办。

科学史文章要搞起来（还有上海，北京一篇）。其他题目可以多想，现在面窄一点。如农业科学历史就可以搞。全世界都在叫原料粮食问题。21 世纪，人口多少，粮食不够，这是资产阶级悲观论。收集资料。原始人类时究竟多少粮食。农科可以写，可以和当前实践，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方针都联起来。有利条件是自己资料较丰富，有实践经验。这也容易找人，农业研究机构不少。写法还是和过去写法一样，从哲学上写，联系劳动人民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历史。

最近读红楼梦，发现原来版本，和高鹗改的，差别相当大，有些重要内容被砍掉了。《红》是政治历史小说，这种写法已开始，以后根据这个路子还可以考虑题目。（胡锡涛：上海写论厨房斗争）原从宝黛悲剧写，提不高，这一篇文章《大



有大的难处》虽不满意，提意见尚可以，但和实际联系紧，当前反两霸。我发烧，加了一点（华盛顿明星新闻报说的几句），联合国开会。

批孔更困难，主席讲的。《光明日报》有一篇《从林彪床头条幅看他克己复礼的迷梦》。“天马行空”，可否写一篇驳他，用点历史材料，“天马”来历，不光是驳天才论。“光明”一文主要驳天才，说表现了林彪阴谋家、野心家的世界观。“独往无来。王明也是“天马行空”，独往而不独来。我们党历来反对“独往独来”，主席教导搞群众路线，调查研究，不搞独来独往。可以深批一下。他搞阴谋诡计，要破产的，就联系批孔，驳斥，找点历史资料。光明日报文章找了杜甫的诗，“先帝天马玉花骢，……一洗万古凡马空”。多找古董考证可以，但着重政治上思想上批判。天马就是大宛汗血马。

勉从虎穴暂栖身，未有短文批。和“韬讳”结合，短文，可以搞。不是系统的，也不是工农兵一般写的，介于二者之间，着重政治上批，也讲资料，着重观点，政治上批，也不长，三四页，可组织一点，备用。

“五·四”一篇写好它。（余征讲重点）把批孔意义讲一下。历史上历来就有批孔的，批孔是历史的内容之一。五四内容之一，就是打倒孔家店，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了党的成立，民主革命多次批孔。今天发动工农这样批，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

缅共科森说批孔重要。在经过许多政治运动以后，只有现在才能搞起来。他说我们有释迦牟尼，比孔影响大，只有民主革命完成，做很多工作，所有制改造了，才能提出，这是不容易的事。

（余征讲，五四文章作者要谈鲁迅、陈独秀等）鲁迅、陈独秀有不同方面，恐不能讲得多，不作重点。作为经验，各种人开始都批，以后就有变化。鲁迅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湘江评论，有主席批孔的文章，叙述可以的，不用原文，主席有不少文章，短的，一段段。

总结经验问题。主席给乔森潘谈话又强调讲打仗经验。这次写了文章，还可以再写，不一定很大，讲中国革命历史，总结自己经验，还可以再写，不一定那么广泛，是否这一期可以研究，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都可以考虑。

国务院开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计划会议未开，整个形势不错，讲一讲促生产有好

处，每期要有一点。最紧张的是煤、运输，压钢铁。上海第一季度钢铁计划未完成，煤主要在运输。铁路方面可以写一点东西。（胡锡涛：上海铁路局）别的地方可以找一点。上铁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不知解决没有？山海关可以。成昆铁路电影很好，未公开，否则可以影评。

（胡锡涛谈文化组京剧革命十年文章）

文化组报告写几篇文章，送给谁，我们都画了圈。写好了送来看，不是要卷进去（《人民日报》可卷进去），可能有的征求报刊意见，没有要我们卷进去的意思，可以一起商量。

谈柳下跖的文章，驳寓言说也是可以的。历代尊孔派对跖的咒骂，驳一下。考古还是文物，赵纪彬有译文。原文可作为附录注一注，荀子、庄子中的记载作附录加注。原文可以大大精简，翻译，不如注出来，节录去掉一些可以的。注出备用。专案组的同志可以请他们写文章。

（余征讲几个问题①柳下跖是否有其人；②是否柳下惠弟弟；③是否有其事）

不扭在柳下惠的弟弟上。荀子上讲的跖的评价和日月并传而不息，孟子也都骂他，可见不是虚构。

写出来看。作者是钻了这个问题的，扩大一点，肯定跖有其人，是奴隶起义领袖，是批孔的，增加尊孔派骂跖的内容，可见真正是批孔了尊孔派都把跖看作是孔孟死敌。誓以金锥砸盗丘，可以写进去。

文章多一点没关系，可以准备。

刘德献书，可以要农民写文章。发现李卓吾藏书，焚书，福建翻出来，以后可以写评论。

王安石有部《梦溪笔谈》字说，王下台之后，司马光把它当时毁版，找不到了。马叙伦有见解，提到这本书不错。三言二拍说他是右说，为什么红、扛，右边都是“工”字，书已毁版，失传，沈括还引用一点。

计委会议，有救急的性质，运输搞一点，工农业要搞得好一点，闹经济主义的地方比过去多了一点，中央通知提了一句，文化大革命中，作为一个支流就是要出来，上海一月革命粉碎经济主义妖风。经济主义是小资产阶级想干扰批林批孔。反映黑暗面的材料我不多给你们，两千个县，一县一个就不得了。看多了不好，内部材料都是这些，其实好的东西很多。

短评你们研究一下，写可，不写也可。

下期语录，马列的准备一点。

常常很坏的地方出好的事。枣庄十个矿九个停产，一个矿坚持下来，很想组织他写。政治局的同志都称赞。开滦也不错，新华社几次内参反映，最近仍说不错，领导群众关系很好。有些不好的，是领导挑动群众斗群众，编两大派，制造分裂，不批林批孔。

下面讲点主席指示精神。（同外宾谈话都说了）短评你们研究。

一、批林批孔，我们提出的口号，批林比较容易搞，批孔更困难些。批林批孔，夹杂走后门，人家难于讲话，要发动走后门的人起来批林批孔。

二、法家的著作要注，（论衡）问孔篇已注了，刺孟篇也要注，王充在问孔篇用形式逻辑揭露前后事实矛盾。他批孔不抓路线，但那时能那样批也不容易，李斯有“说难”，前半篇很难懂，唐时有人注过，但太简单，李斯后半篇好懂。讲一个故事，郑武公想打胡国，有人就提出来，郑武大怒，立即把他杀掉了，把自己女儿嫁去，胡不戒备，一下就攻下了。这好懂的。（可以想一下，注）

韩愈《进学解》评孟、荀说，孟轲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说孟没有什么成就就死了）。荀卿守正，大论是宏，逃谗于楚，废死兰陵（台儿庄附近易里）。（盐铁论也可以注一下，作参考资料发表，想想看）

三、形势还是好的，中国基本上是好的国家，党是好的党，列宁说事物总是螺旋式上升的。这么大国家，有点乱子，正常的（看大好形势的一面）。

四、学马列，无非三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主要是党的学说，阶级斗争，国家学说。国家学说主要是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包括在内（把马克思主义最主要内容集中概括起来了，劝西哈努克……）。

不搞战斗队，搞批林批孔。

短评商量一下，如何办，越短越好，二页，三页，以后要短，不一定每期都有，没有也可。

这一点，不一定讲，工作上如何办，你们考虑。短评到 20 日也来得及，基本思想议一议，不硬性规定。

韩愈《进学解》可以看看，他要修改荀子，他是尊孔派。

主席对王充论衡评论很深刻，讲王充基本方法，抓路线不够，刺孟篇，驳五百年

必有王者兴，他给你算账，如尧舜等连着出，有时又七百年出的，他抓路线不够。比杨国荣要讲得更深，形式逻辑揭事实矛盾，言行不一。这观点未有人写过。中央 12 号文件下去之后，有何反映尚未看到，精神是积极的，批林批孔。国际揭苏修可以搞一点，但主要精力不一定放在这方面封面——标准像。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给江青的几封信和批语

江青：

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面（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4. 17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1974.05.18；中发〔1974〕17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

中央最近根据毛主席指示，讨论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几个月来的运动，冲破了种种阻力，排除了一些干扰，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正在深入发展。当前，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争取批林批孔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

二、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在时间上，应当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巡视各地打招呼为界；以听到传达中发〔1971〕57号文件为界。在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向党讲清楚，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这些老账。中央重申中发〔1971〕57号文件宣布的政策：“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

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中央希望在林彪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已经交代了问题的同志，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投入批林批孔，将功补过。也希望那些隐瞒了某些问题的同志，把问题讲清楚。凡属好人犯错误，都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应当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三、确定陆、海、空军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科研单位、军事院校不含，野战军含）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力量把军以上单位的运动较快地搞好。请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照此方案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并随时总结这方面的好坏经验报告中央军委。

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应当注意培养，并且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逐步地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各级党委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

五、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历来的估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好的，是经得起风浪的。经过八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各级党委应当结合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历次指示，认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形势，加强领导，争取批林批孔运动和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

（发至县、团级，传达到群众）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原文件题为：通知）

一九七四年六月五日，姚文元对《红旗》杂志编辑组召集人的谈话

中央文件发了，主席关于国际形势同外宾谈话已学了，据此安排工作。

情况大概这样：中央 17（号）文件下达后，各地进一步据此分析情况，布置工作，落实政策，全国运动情况很不一样，提出问题也不一样。运动继续深入，有

各类不同情况, 有的已在揭发批判, 要注意区别两类矛盾; 有的未深入揭发批判, 有问题; 有的搞到邪路上, 南京搞经济主义, 未全解决。全国形势好的。18 号文件讲涉外, 不完全是涉外。云南发生外宾去参观, 一派贴大字报, 军区派人包围, 不让贴, 说是破坏。这就没信心, 文化大革命中那么激烈的外宾也看到。

17(号)文件下达后, 问题: ①军以下提正面教育, 什么叫正面教育, 要不要联系实际? ②提清查林彪集团阴谋活动, 反复辟还搞不搞? 那些问题仍存在, 好好联系起来贯彻就能解决, 和林死党有关的, 很少, 文件中说不算老账, 有一条线, 要交代清楚, 主席打招呼, 57 号文件为界。③领导和基层关系, 重点领导机关如何搞, 军队正面教育, 不搞四大, 地方如何? 不存在这个问题, 可以搞四大。④革命大批判如何进一步深入?

问题就这些。组稿考虑这些方面, 个别地方发现压群众情况, 说过去搞错了。理论队伍各地重视, 在抓, 要从路线上认识深刻, 还得有一个过程。这是党的建设问题, 不是一般几个人写文章问题, 当前斗争有需要, 但不完全在此。57 年夏季形势讲没有这支队伍, 专政是不能巩固的。

“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自己的队伍, 宏大的队伍, 人少不成, 10—15 年基本解决, (现在努力不够) 党员团员, 都要懂得这个任务, 人人要努力学, 造成新部队, 包括……没有造成之前, 工人阶级革命事业不会充分巩固的。”这和社会主义时期斗争特点联系着的。资产阶级复辟总是从上层建筑搞起, 不仅意识形态, 但总抓意识形态, 搞反革命舆论, 如不批判、抵制, 反革命阶级、集团、势力就破坏无产阶级专政, 篡夺无产阶级专政, 改变经济基础。从林彪六条策略可以看见。对此理解要有个过程。这么多队伍, 马列理论队伍尤其重要, 这个队伍的建立和其他队伍的造成, 关系密切。另一点, 牵涉到基本路线, 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指导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不断胜利, 要这样做, 反对违背此原则错误倾向, 即理论和实际相分离的机会主义路线, 也必须加强理论队伍的建设, 反对机会主义, 反“左”、右倾, 都讲理论实际统一。59 年批彭, 提到路线, 反修防修(反经验主义), 那封信的思想最完整。对此认识还要有过程, 指示作了若干年, 以后碰到实际斗争, 就有不同体会, 要宣传, 组织文章, 对此要说得深刻一点。批林批孔是社会主义革命一次大战役, 提出革命建设带普遍性的问题。

上海韩非稿，你们提有点“现代化”，有的。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镇反是有限度的，只有无产阶级才彻底，（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的按语，……从未革命，奴隶制代替……他们没有必要没有可能彻底镇反……只有这时才有必要，可能……）

强调地主阶级革命作用是必要的，正如主席讲上升时期，是真老虎。秦灭亡原因之一，杀人太少。主席驳林彪攻击秦始皇，说他只杀了 460 个。罗伯斯比尔，打下去封建阶级，镇压了一批。以后很多资产阶级代替封建阶级，以妥协而告终。英国留下女皇，收买、妥协一部分。《论商鞅》说地主阶级专政也包含对农民的镇压，未改，留一句，可讨论。后地主阶级采用法家专政部分，抛了他要求革命、反对复古部分。奴隶也不可能说批林批孔那么彻底，不可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完成，很不容易。柳下跖、桑弘羊，直接骂，封建早期，尚不多。

批林批孔，典型要，围绕这方面问题。军队，总政垮了，组稿困难，有好材料也可以。武鸣材料虽不够深刻，但也提出了问题。联系实际解决问题的仍需要，领导和基层批孔的那一论点深入，这样材料可以找，势必联系本单位解决问题，仍需要。来信反映，一部分人未看理论文章，一部分基层干部专看运动的办法。

生产，农业总的好的，有的有灾，前几天下雨旱象减轻，甘、新有灾，新疆麦收减产，定了。全国整个夏收不比去年低，工业仍钢、煤、运输问题多，轻工尚好，石油始终好的。你们搞大庆文，可以，天津开会学大庆提出到底学哪几条？

钢计划 2700，欠产很多，国务院正想办法抓。还是革命形势决定的，武钢最近全部停了。有一些干部，少数，用破坏生产压革命。总要经过一个过程。多数人抓生产的，搞坏生产不得人心的。工业生产也要抓一下。大体情况如此，据此组稿。

国务院开法家著作注释会，各地批论语、孔老二很好，但不如注法家著作。主席讲儒家过去都忘了，现一句句批，又加深印象了。中国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革命，就地主阶级一次，二千多年。中国没有资产阶级专政一段，研究剥削阶级革命历史经验，只此一次。奴隶制上限没有，夏无地下材料，一点没有的，道理说不出。要有在黄河流域。商、周都有，青铜，乌龟壳。夏有文字，已有一段历史（鲁迅门外文谈）。夏代替原始公社只能从传统看。如商鞅更法篇，讲当时“外用甲兵，内用刑法”，说这是时事变化的需要。他不是复古，而是说

奴隶社会的产生，是历史的进步，不是倒退。用以说明地主阶级代奴隶主阶级是必然的。奴隶社会上限不能确定，确当材料只有封建制代奴隶制，材料多。中国资产阶级专政只是幻想，买办、殖民地，投外国，林彪即如此。研究这一段历史必要的。

上海一些工人已注意法家著作，面宽阔了，从当时历史批孔。

精力不行了，以后改变一下。看稿实在看不过来，只要大的方面不出问题，小的问题经常有的。也不要紧，即使看了，也难免有错。

胡干卿如何？不是一定就调来。

汉武反匈奴稿，他们学报可用。

汉武时版图扩大不少。统一六国文章，有一点，引三苏的话太多，没引王安石的话。他六国论，见解不是太高明的。整个观点可以的，有人提出有牵强附会的地方。

（谈匈奴文影射）郭老用秦始皇影射蒋介石，犯了大错误。无产阶级用历史借鉴可以的，如地主阶级代奴隶主阶级，必须镇压反革命。借鉴不是影射，而是用马列主义吸取历史经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主席说专政是从反动阶级学来的，代替他，为了消灭一切剥削阶级。上升、没落阶段，作用有区别的，要研究历史经验。以匈奴影射苏联，也不是我们打他。北大“盐铁论”一文中说北方有个很大强国，留下了一句。苏联讲我们版图不超过长城，但汉武时已大大超过，有人画了个图。

主席批谈王安石文章，直接联系现实阶级斗争，讲儒法两条路线斗争。那篇不回避问题，讲他的进步作用，讲保守派的反动作用，也讲王是地主阶级革新派，只能做到此地步，也讲出来。

（胡：文物稿讲秦只焚书坑儒，未批判肃清）

这个历史任务多次批判才能完成它，不可能一下子解决它的反动思想。论韩非说他主张全面专政，可以研究，不一定用这个话。找一个适当地主阶级上升时作用的辞汇。列宁讲资产阶级上升，罗伯斯比尔；有的，找马列的书。到韩非，比过去有发展，指出进步，不一定用这种话。韩非入秦，被李斯告他反革命，杀了，最后李斯又被反革命杀了，史记记载，他有动摇，屈服赵高，二八开，他妒忌韩非，是否尚有反革命挑拨？杀了，秦始皇就懊悔了。古代斗争不那么讲政策，只



有无产阶级才讲。

论荀子文，从荀孟斗争中写好些，上次推荐吉林大学一文，不要对一个人作全面结论，从斗争中写。有鉴别、有斗争，才有发展。荀孟斗争，矛盾比较清楚。

不要一个一个人写，要讲路线，讲斗争。王充批孔不抓路线问题，我们要抓路线。对人物作结论比较复杂，儒法两条路线较清楚。

论王充一文，叙述的东西多，杨荣国写过一篇，最好是论战性的。回避了一个问题，问孔刺孟中间，有非韩篇，在中间。为什么写非韩，王对孔孟很尖锐，挖苦，用形式逻辑，讲他违反实际，言行不一，伪君子。非韩，主要说韩非有片面性，只讲耕战，不讲礼义；讲练武，不讲德，正好暴露弱点，不看路线。秦为何能灭六国，是否提倡耕战结果？说韩重耕战不重儒生。“六国之亡，亡于秦兵……众寡不同……”他说秦统一，力气大，有本事，兵多，因而有片面性，没有看路线。秦为什么强，就说不出来了。他是在秦亡之后看法家，看不清法家路线。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解决。他未写这个问题，不要回避。只有无产阶级才能解决。前面改一下，不是铺陈。还有，后汉奴隶主势力还有无那么大？四百多年了，主张复辟有的，如王莽，但势力那么大？主要是地主阶级同农民的矛盾，农民起义了，要研究一下，刘盆子是农民起义。不要写得这么大。杨荣国文强调巩固封建制一面，还是杨文清楚。王充立论形式逻辑讲得多，刚才例子，就能说明。主席看了，认为王充能这样，不容易了。“刺孟”中批“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他说不是，而是有时接踵而行，有时一千年没有，直接可批林。这是很有光彩的一篇。王文文字也枯燥。此文一改，二别人写。

和北京谈，你们发现有人，和吴德商量，借调半年。

历史发展辩证法，内容好的，题太大。历史辩证法内容很多，生产关系，生产力，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此文主要讲革命和反革命斗争，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事物螺旋式发展。斗争——失败——再斗争，捣乱——失败——再捣乱……规律，反映螺旋发展。为什么？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过程，不能是直线，是对的，但这样讲，未深刻讲清辩证法。曲折、倒退是支流，是暂时，也是必经的过程，主席讲革命政党要两面教育，才能成熟起来。1840—50 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和主席思想一致，1848—1849，每一段重要篇章都是写的失败，写灭亡的是旧传统残余，写为革命向前发展开辟了道路。由于产生坚强反革命敌人，无产阶级只

有在斗争中，才能产生马列主义政党，最后取得胜利。我们也是这个教训，用革命武装对付反革命武装。27年失败，懂得武装斗争道路。失败，产生了反革命，是坏事，又是好事。斗争中，才产生坚强的政党。主席讲蒋介石教育人民拿起刀，有反革命就要拿起武器。对此，此文讲不够。

第二，讲我们自己这一部分，也讲曲折光明。要讲无产阶级历史任务和任何剥削阶级不一样。他们夺政权——镇压人民——反动，我们经过革命建立政权，还要依靠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消灭剥削阶级，搞上层建筑革命，很长历史时期，这一艰巨任务，不能不经过艰苦曲折。这是马克思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过渡时期，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主席发展坚持专政，反复辟，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践经验提出的。苏联斯大林36年宣布消灭阶级。这些要说，已经经历的说了，还有将要经历的斗争，都要说明。要使后一代后几代都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党、广大群众，都得懂得这一任务。此文文字也还干净。

政治斗争文：这个问题可以写。批林，军事路线无扎实文章，包括军党论，现在找谁写？困难。总政瘫痪，谁能写？

这问题，有一个意见，还是从反修防修角度来提。修正主义强调经济利益，为他政治服务。列宁说为了工人贵族，背叛了无产阶级的人，不是真正符合工人阶级利益。只讲政治斗争，国民党，帝、修、反也搞政治斗争。无产阶级不能不从政治斗争谈经济。不从七大提起，提九大林陈报告。他们有三个（报告），这是一个，周宇驰小舰队也有一个。林的七大发言不讲，或作根源来讲。直接批，对象和路线扣得紧，主席否定他的报告。九大报告讲革命生产关系，就是主席痛斥林陈报告之后，加的一大段。这样从路线上讲。短评中讲，阶级斗争激烈时经济主义要冒出来，可以驳经济主义思潮。我们有些问题要解决，但作为中心，用以否定批林批孔，就搞歪了。如工资制度，受修正主义影响有的，但批林批孔只解决工资就搞不下去了。你们去考虑一下。知青问题主席批了就解决了。经济主义，武钢全停，上海赤卫队搞过。自己工资照拿，别人生产就冲。

“七·一”共产党员一组文章，考虑讲点什么东西，培养党的干部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各地争的是补台的问题，两派，总是你几个我几个，平衡，不讲路线。要靠路线，共产党员讲阶级，讲路线。科学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包括党，

国家学说（包括无产阶级专政）。离开这些，争名额，就不对。当然，作为政府要考虑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要争，争到很快就失掉了。路线不对，很快打下去了。3000 万党员，党员教育、发展是个问题，女党员很少，10%，脱产干部 150 万，这么大党，党员教育、发展要研究一下，写什么问题？党基本上是好的，17 号文件上是主席讲的，不赞成悲观论，问题当然有的。重视批林批孔中加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研究一下。

（讲大连学生考卷）基本理论不能否定，发表科学史就是这个意思。老三段要批，是烦琐哲学，他（辽宁文）用辩证法把阵地占领，没有理论武装不能占领。北大清华文，留了一点余地，他们反右派对的，我们要考虑全国（胡锡清反映北京有人提出看法），我们很简单，就是考虑全国，不仅北京市，还考虑外国。有一个提法，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仔细推敲一下。党是斗争哲学，斗争前提，坚持什么路线，路线错了，也斗不胜。斗，也有方法问题，普遍化之后，不能概括复杂的事物，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有路线问题。读者对回潮提出看法，还是讲修正主义，一它是局部性，一是有的根本未动。如批林批孔，《十批判》就未批，儒法斗争“五四”以来未解决，有些东西有时间地点条件。这是通俗语言，群众可以用，修正主义不能说消失，实为复辟代名词，写文章就要考虑。如走后门，主席讲前门有坏人，后门也有好人，这就有分析，驳不了的。注意科学史（办法可以），还是基本方面来谈，不要分得太细，有个规划好，搞十几篇差不多了，大体把自然科学轮廓写了，主要写辩证法。还有农、医要写。这种事有意义，以后出版社编本书，最后一篇为对科学史本身认识的发展。古代科学和农业合在一起的，古代如何分类，封、资都如何看，主要趋向越分越细，综合方面相当缺少，和自然辩证法批判的差不多，现在基本仍如此。资产阶级作为阶级（不是个别人，如达尔文）对理论兴趣不大，从理论发展考察自然界很少，技术理论有发展。细分越来越多，能把自然科学史发展讲一下有好处。自然科学面临繁重的任务，要打破过去脱离实际的东西，唯心论形而上学，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要改造队伍，资产阶级意识根深蒂固，还要做工作。

（湖南出版一本解剖学）分两部分，序言，讲要有辩证法，讲了要有四个观点，对的。讲解剖是生理、是西医基础，但本书理想未实现。两部分，一是系统解剖，一局部解剖学。前讲九大系统，局部讲几段，头、胸、腹、会阴、上肢、下肢。

解剖是 16 世纪以来资产阶级生理学重大成就之一。解剖有矛盾，为了解剖一个器官，必然看作是孤立的。实际人体不是这样，得机构非常密切，相互作用如何，综合起来很难，不完全那么回事。大脑不是那一块管那一部分，一块坏了，还有代偿作用。活的人体中，器官如何起作用，中医有此长处。要写一篇自然科学本身的历史，发这一篇之后，告一段落，搞一年半计划，编一本书，明年底。

（谈上海科学史文章），德谟克里特，伊壁鸠鲁是一派，马克思博士论文就论此。他们都讲原子，但具体有许多不同地方，伊主张原子中仍可研究性质，德认为不能研究性质了（介绍上海同志去看），原子斜线。

“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文，题和内容有矛盾，要融会贯通，帮助改，万一改不出，学报发表。

文章多，存一点，大团结一文压半年，现在用适合时机。

京剧十年文要精练。三突出，包括内容丰富。国庆 25 周年时发行不行？

各地“红楼梦”文不理想，主席讲看五遍，恐未看五遍。高鹗改的，有些重要材料，被删改了。上海“红”文较好，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从中吸取教训。主席说，贾母死后都哭，每人有每人的心思，各有各的事情。

（总结经验文章问题）联系具体方面总结经验，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从中提炼出来总结经验的重要性，记住，革命就前进，忘记就受挫折。

机关运动，那一段红旗，要我管之后一段，陈伯达破坏得厉害。

批林批孔，你们和学习结合起来，批深一点，准备发言。大背景，主席当时不要陈管红旗，斗争很尖锐，到 9·13 为止，大是大非中，杨纪元是个代表，要保卫接班人，向陈告状。九届二中全会之后，删过一些提法，三个副词，组织些文章，攻了一下这些，也不牵涉保卫接班人，这个问题始终是个迷，干校，也未给我解决。

行政部门，其他部门，也多搞点批判。

短评以后再议。

水浒，主席指出反贪官不反皇帝之后，各地有点议论，受招安以后，英雄形象不象话了，反贪官不反皇帝，必然涉及路线，水浒也有传统的评价。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在批林批孔座谈会上的讲话

地点：人民大会堂

武则天得人心，是代表中小地主的。为什么女的能当皇帝？有二十万人上书，主张武则天当皇帝，说明有社会基础，代表面广，是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比李世民的阶级基础厚。

吕后要作单独一条宣传一下。汉高祖死後，天下大乱，吕后掌权，又重新统一了天下。吕后主要执行法家路线，是汉高祖的路线。

吕后了不起，她对刘邦的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出身很苦，参加劳动织布。在刘邦很穷的时候，吕后就跟着刘邦，一直帮助刘邦平定天下。刘邦没有果断地杀韩信，只是贬了韩信。而吕后果断地杀韩信，这样就断了後患。刘邦死後，吕后亲自掌权，起用了一些比较得力的法家人物。刘邦死後汉朝为什么没有乱？就是因为有吕后。

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要宣传一下，是奴隶出身。

现在的文章有个毛病，很少提现在的儒。现在批林批孔，除林（彪）、陈（伯达）外，不提现在的儒。现在有很大的儒，蒋介石就是，苏修也是，还有。不然搞这么长的批林批孔干什么？党内就有，刘、林就是最大的儒。中国长期伴随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後期一定有儒，现在一定有儒。要不为什么批林批孔？

尽管有人反对，我还是坚持有现代的大儒，蒋介石、林彪就是现代的大儒。现在的批孔文章，一是不讲古代的无神论，二是不讲现代的大儒。

儒法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是贯穿着这个斗争，贯穿着复辟反复辟的斗争。当前，还有人搞复辟，搞复辟就把儒家抬出来。

批林批孔要深入、持久、系统、普及，必须把批林批孔放在儒法斗争中来批才能深入，只是单纯的批儒不能深入。单纯批儒，没有对立面，不能从路线高度来看，看不到路线斗争的规律。

批判儒家宣传法家不能只限在知识份子和上层，是广大群众的事，全党全民干，与工农兵结合。……要搞得通俗易懂，对当前有用的东西，使全党全国要懂得儒法斗争的现实意义。这是百年大计，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要用马列主义总结儒法斗争经验，总结对当前有用的问题和经验。古为今用，不是单纯搞历史。这是百年大计。

当时要干事，只得打着正统的旗号，否则不能号召群众。刘备不说明自己是刘家後代，就不能号召群众。曹操也是一辈子称臣，否则是不行的。农民运动也往往如此。

对法家能否找出个标准来？法家都有特点，主要是看其是“法先王”还是“法後王”；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是主张前进革新还是主张复古倒退；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者，儒家都是卖国主义者；同时还要看其执行什么路线，法家对内是反对土地兼并，对外是反抗侵略的。一般说来，法家都是唯物论，是讲究实际的，是朴素唯物论。

王安石变法也是为对付外族的侵略，对内是反抗高压政策，过去反儒的打着儒的招牌，连王安石不打也不行。我们分析问题不能简单化。宋神宗是王安石的後台，是主张变法的，项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略。司马光的後台是曹太后，英宗的老婆，还有高太后，神宗的母亲。二后代表保守门阀集团。宋二后势力大。王安石有神宗，神宗胆子小，最後对王安石也不敢用。王安石反对异族，符合广大地主利益，代表中小地主，对劳动人民也有点好处。凡反对国内高压，反对外国侵略的，都是法家。

有人对肯定法家怕说是“让步政策”回潮，说李世民不能肯定，是回潮。这不对。

“让步政策”根本不存在，只有赤裸裸的镇压。李世民统一天下，人口只有一千万，到李隆基时只有五千万，地大人少，当时不鼓励生产怎么办？这不是让步政策，是农民起义的结果。对他们有利，对人民也有点好处。

汉武帝……对统一是有贡献的，吴楚七国之乱，也是他平定的。

来源：北京工业学院运动办公室根据北京市委科教组推荐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大字报选编翻印《大字报选编（二）》（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第 1—7 页。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国理论战线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革命景象。

一批工农兵积极分子，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批判儒家的书，研究法家著作，有力地揭露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思想根源。

一些专业理论工作者，坚持理论工作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原则，在革命大批判

中作出了新的贡献。

毛主席提倡的用马克思主义认真研究现状和历史的空气，开始浓厚起来。

毛主席提出的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号召，正在进一步实现。

理论战线这些新的变化进一步证明，现实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最好的课堂，只有在这种斗争中，才能培养和造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当前，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对林彪、孔老二的批判如何深入，如何普及，如何持久，如何系统化，以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这场艰巨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需要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各级党委要把加强理论队伍作为深入批林批孔的重要措施，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马克思主义的这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决定了理论工作者应该是在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冲锋陷阵的战士，而不应该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只能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造就成长，而不是关在书斋里能够培养出来的。过去有些搞理论的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注意改造世界观，结果跌进了修正主义的泥坑。我们要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要看到在怎样培养理论队伍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斗争的实质是按照哪个阶级的面貌培养理论人材，指引他们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继续进行下去。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的教导，在深入批林批孔的实际斗争中，培养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进行战斗的理论队伍。

要大力培养不脱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工农兵理论队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新生事物。它的出现，有力地粉碎了“大老粗搞不了理论”的资产阶级偏见。我们要深入批林批孔，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

阶级的全面专政，要用新鲜血液去充实和改造原有的理论队伍，要及时地批判在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某些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促进广大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团结，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都要继续加强群众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的建设。有些地区、有些单位在这方面积累了比较好的经验，要及时总结和推广。

要鼓励专业理论工作者同工农兵相结合，他们是理论工作的骨干力量。专业理论工作者应当和不脱产的工农兵理论队伍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有些大专院校的师生和学术、出版部门的工作人员，同工农兵一起批林批孔，进行理论辅导，写出了一些较好的理论文章，也促进了他们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对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都要团结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

要在斗争中认真看书学习。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搞理论工作的同志更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用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回答现实斗争中提出的问题，从政治上、思想上战胜修正主义、战胜资产阶级、战胜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学历史，包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读一点法家的著作。刘少奇、林彪都是尊儒反法的，苏修也是尊儒反法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我们要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坚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反对倒退，坚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复辟资本主义。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很重要的。

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是全党的大事。把理论工作仅仅看作宣传部门的事情，把培养理论队伍仅仅看作大专院校的事情，这是片面的。各级党委都要把理论队伍的建设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要作出规划，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领导机关到基层，包括工厂、农村、连队，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逐步地建立起来。要加强理论队伍的思想建设，教育他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即使是工农兵理论工作者，也要注意自觉地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自己，抵制资产阶级的思想侵蚀。党的高、中级干部都要带头读书，更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这对于带动广大干部和群众学习理论，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极为重要。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发展和壮大了，我们党的战斗力必将进一步加强，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批林批孔斗争的更大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社论）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九日，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

没有准备讲话，因为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来啦。我们来的有一些专家，专门写批孔文章的专家，老先生，老、中、青相结合的写作班子。我们还有文化组的成员，领头的就是你们的市委书记。

我没有什么准备，想到那里就讲到那儿。我对历史不很知道，就是为了打这一仗而努力学习。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如果有讲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我很抱歉，刚才我迟到了一刻钟的样子，因为有几个文件要急着处理，没有准时来到，希望同志们谅解我。

首先，报告同志们一个好消息，在十七号的下午二时，我们又爆炸了一颗氢弹，但是，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听了工人同志们批林批孔，比那个氢弹的威力还要大。有几个问题我想提出来和同志们商量讨论，跑专家商量商量。在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卖国主义的，所有的尊法反儒的都是爱国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标志。刚才这个女同志年龄虽小，她提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历史知识是很菲薄的。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凡是有作为的封建人物也好，封建帝王也好，不管是打天下的还是治天下的，一般都是法家或接近法家。但程度不同，都要作具体分析。总的来看，历史上法家是爱国主义的，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儒家对群众，奴隶也好，农民也好，对我们工人阶级也好，他们是残酷无情的，残酷极了。孔老二那一套全是赤裸裸的，他是后来被他的徒子徒孙粉饰起来的，完全是赤裸裸的。他是吹鼓手，是过街的耗子人人喊打，他到过很多国家，想作官，到处都不要他，好容易在鲁国当了官。他本来不是鲁国的人，他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叫孔父佳，是宋国的后代，是第几代记不清了。孔老二的父亲叫叔梁纥，是个没落的贵族子弟。孔老二到处想作官，到处劝人家要恢复奴隶制。那时候，春秋战国时期，经济上

不平衡，有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主义的经济，有的是落后的反动的奴隶制，所以在历史分期上我们的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功的。在尊孔问题上，他有点问题，特别是对秦始皇的看法上有些问题。他有一本书，叫做《奴隶制时代》，是值得看一看的。主席肯定这一本书，就是说中国奴隶制跟封建制的分界是春秋战国，这是对的。我看历史材料跟专家比起来看得少得多了，主席说郭老这一功是肯定的。

实际上，四书五经起到了束缚人们的思想的作用，最大的束缚人们的思想的还是宋朝，就是程朱理学，就是程颐、程颢、朱熹，他们是理学家。从宋朝以后，做官要用四书五经作考试，人就不要自己去想了，所谓十年寒窗就是自己去背四书五经，学了以后思想很受束缚。最近，《参考消息》上（同志们有参考消息吗？大家答有）有篇英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文章，很长，他说，欧洲人的科学是从中国的古典的科学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们祖国的天文学最早了，指南针、造纸、火药、排字，这都是很早的，还有炼丹，从炼丹发展到火药。火药，欧洲原来是没有的，怎么到的欧洲呢？成吉思汗不是一直打到莫斯科，打到欧洲匈牙利嘛，同志们知道吗？这样就把我们汉族发明的火药带过去了。比如足球，宋朝就踢，这是我看《聊斋》知道的。就是说，不要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但也不要肯定得过分，过分了就象主席批评我们的成了大国沙文主义了。对自己的祖先有哪些好的东西，要批判地继承，全部否定是不对的，当然全部肯定更是错误的。《参考消息》上讲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世界的影响，有一些说的是不错的，有一些说得有遗漏，有待于我们自己的学者，工农兵集中起来，整理起来。

我建议全国各省市都要建天文馆，这不仅对儿童需要，象我们这样的人也很需要。北京的天文馆什么东西都是外国人的，只有一幅是中国的，其实这一幅也是错误的。你们天津建立天文馆，应该着重从历史上整理我们自己的。二十四史同志们看一看，对天文学记载特别多。

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听到薛清泉同志讲到的孔子修《春秋》的问题。这本书可能是假的，我没有考证，据说是后来人搞的，当时他可能有这个意思。这一点请专家来考证。《论语》也不是孔老二写的，也是后来他的徒弟写的，他有那些话，他的徒弟给他记载下来的。《春秋》也不是孔老二亲自搞的，可能他有这个思想，传下来的。时代的问题不要说死，我们还要做一些工作。

刚才讲到“星火燎原”的问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主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主席写给林彪的信，是主席批评林彪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过去我们都不知道。林彪要主席改掉许多话，现在《毛选》上的不是那时候的东西了，我找到原来的东西看了，批评得很厉害。刚才那位同志批到：林彪的“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但是没有讲到这个情况，我补充一下。

奴隶、农奴、农民是有区别的，奴隶跟农奴有区别，农奴跟农民有区别，刚才那个同志提出西藏电影《农奴》就是奴隶，要注意奴隶、农奴、农民的区别。奴隶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而且带着枷锁，就是在井田上劳动，而他们本身是那样的不值钱。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要四个奴隶一束干肉，才能换一匹马，殉葬的就很多了。刚才说的郭老的那本书，就有大量的证明。现在出土的大量材料更说明这个问题。农奴，就稍微好一点，就是不带枷锁了，个别的也有殉葬的。后来搞殉葬，大量的是做假人，就是墓里挖出来的俑。在我们家乡，我小的时候看到做童男童女，也是一种殉葬的意思。解放以前，我家乡的土地还残存着“圈地”的痕迹，不象江南，当然这是极少数的。我的家乡主要是实物地租，江南是交货币地租。在我们那里地契都刻在地主的房基石上。在土改时候，我们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不敢要，问我们，你们分大地，房屋是真是假？我们说是真的。他们说你们跟我走，就到了地主房前，把房子扒开一看，房基石上都刻着×××欠我多少租子。农民，农奴，奴隶这三种东西不能混淆。西藏的农奴，就是比较偏向于奴隶制的，但是他们不等于完全的奴隶，不是奴隶制时代的奴隶。少数民族地区，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一些兄弟民族如海南岛，解放的时候，还是刀耕火种，就是用一把刀耕地，放一把火烧了草当肥料，就种田，单位面积产量很少，现在有很大的发展。现在海南岛收获三季，如果有水的话，恐怕四季都可以。水不够，东部，北部好一些。

解放以后，在汉族帮助下，少数民族很快摆脱了类似奴隶制或者农奴制，一下子就过渡了，当然经过一个民主改革了。最近一、二年前还进行了人民公社化，现在合作化基本上搞完了。有些地方还残存着个体生产，象黑龙江、江西的山上，也有一家一户开荒种地的，这是少数，例外。整个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

我建议同志们看两篇文章，就是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原来登在十五日北京日报上，

我当天就批给《人民日报》转载，十六日人民日报就转载了，我看你们今天也转载了。现在人民日报又出第二篇了，我刚收到还没来得及细看。第一篇先秦的，也有遗漏，第二篇从秦始皇一直到西汉，有一部分没有写全，主要的代表人物写上了。有不少的遗漏，有一些缺点。

刚才薛清泉同志讲秦始皇是有功勋的。我想，他的功勋还不单是郡县制，他统一全中国，实现郡县制，统一中国的文字，统一度量衡，车同轨，等等，都是很先进的。我最近在《文物》上看到，商鞅变法用的斗是长方形的，现在出土了，秦始皇就是在那个基础上改的。

还有一点同志们也要知道，所谓西周，就是指文王、武王。武王伐纣，他名义上统一了，实际上有八百诸侯。到了春秋战国时候，就是七雄，这在中国发展史上就是很大的进步。而秦始皇能够消灭六国，统一全中国，是了不得的。筑长城的不单是秦始皇，而是到了秦始皇时是大量的修。同志们看到八达岭吧，见了长城吧，我到过雁门关，沿着长城走过，很了不起，是很大的工程，是抵抗外来侵略的，因为我们当时是先进的农业国家，要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犯。当时顶住了匈奴的侵犯，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的，从头到尾都有这一点。秦始皇的时候，就存在着匈奴，还有其他游牧民族，还有那些反动的，没落的奴隶主，一直到汉代初期还有很大的奴隶主。刘邦分封了同姓王，异姓王都干掉了。当时最大的是吴王濞。当时也存在着不平衡，四川的大奴隶主卓王孙（有个卓文君大家知道吧，她是司马相如的老婆，是卓王孙的女儿），他家家奴一万，我们讲的一万是个数目字，可能还不止。吕不韦也有家奴一万。

自从我们进入批林批孔，世界上都很震动。苏修是尊孔的，拼命骂我们，美帝还不这样。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震动得很厉害。日本的军国主义就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日本的友好人士，来了说：不得了了，你们批孔老二，我们受不了。一个友好人士说：你们这么搞，我们受不住了，批到我们这儿来了。还有回教，批孔对他们也有影响，有人说“汉族兄弟批了他们的圣人，也批了我们的圣人，我们的穆罕默德也是这样”。对基督教也有影响。欧洲的朋友说，他们那儿也有圣人，都受影响。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都受影响，有的跟着批孔，有的反对批孔，日本的反动组织青岚会反对我们批孔，苏修最卖力了。所以不要以为批林批孔这只是中国的斗争，现在是涉及到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大斗争。过去外国人

到中国来跟中国人学，都是学的四书五经，孔老二是“大圣人”，你们怎么批起圣人来了？

刚才那位同志讲到荆柯刺秦王。当时燕太子丹要报仇，他是没落的奴隶主的头子。太子丹有一个征求人才的黄金台，荆轲是很反动的侠客，是个小丑，他一定要找一个人作助手，这个人叫秦舞阳。当时为什么要搞“图穷匕首见”？因为秦王在殿上，卫士在殿下，荆轲刺秦王，秦王跑到柱子后边，荆轲没有刺着，卫士就跑上去了。实际上荆轲是一个遗臭万年的小丑。我们一个电影叫“狼牙山五壮士”，本来五壮士是非常英雄的，牺牲了三个，剩下两个，但是，电影还弄得凄凄惨惨的，什么“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把五壮士比做荆轲，这是不对的。

刚才那位同志讲到秦始皇的时候。当时，儒、法对立一面是秦始皇、李斯，那一面是吕不韦，××以及没落的，搞复辟的奴隶主皇亲贵戚，就是皇帝的亲戚朋友、内戚、外戚。吕不韦不是秦国人，是赵国人。那时候，秦国有一个公子叫异人，被质于赵。吕不韦是大商人，他看到异人便和自己父亲说，这人奇货可居。吕不韦就要在异人身上投资，把他弄到他家去，把他的赵姬给异人做老婆。后来，他又到秦国去，买通了华阳夫人，因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要她把这个异人做为她的儿子，将来年老气衰就可以巩固她的位置。当时华阳夫人接收了异人为儿子。秦王死去后，就把异人接回去了，做秦王。异人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始皇很年轻的时候就当政了。吕不韦为仲父，他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搞了一部书叫做《吕氏春秋》。我建议同志们很好地看一下那篇文章，就是《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吕不韦勾结没落的奴隶主，皇亲贵戚，内戚，一块搞政变，被秦始皇扑灭了。然后秦始皇任用李斯。

为什么秦始皇死了以后，秦就亡了呢？因为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信奉儒，秦始皇不喜欢，就派他到大将军蒙恬那里守卫边疆。秦始皇死在路上，政权落到宦官赵高手里，这是秦覆灭的一个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个剥削阶级代表，封建帝王，有对人民剥削压迫的一面。要看到他的功勋，同时要看到他的剥削。同时他杀人太少。他迁了几十万户豪强到咸阳，把很多儒都养起来了。他坑的知识分子是儒家的一派，就是胡说八道搞政变的，而且是宣传天老爷的，宣传迷信的，杀的对。焚的书更少了，他下令保护好书，对农业，医药有帮助的书不

许烧，只烧儒家的书，全国那么多儒家的书那能都烧掉。杀人四百六十个，杀的太少了。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年龄小，不懂事。代表没落奴隶主的赵高执了政，赵高是代表儒家的。汉朝打的时间并不长就灭了秦，统一了中国。刘邦有一定的妥协的，采取了分封制，封了同姓王，搞掉了异姓王。吴王濞最大，他可以自己铸钱，可以晒盐，他比中央集权要富的多。

刘邦，吕后是法家，以后的文、景、武、昭、宣帝都是法家。他们用的大臣不是儒家，是法家。汉武帝用的大臣不是儒家，主要是法家。有一个大臣叫汲黯，在朝上当面对汉武帝说：“你内多欲外施仁义”。汉武帝一听，很生气，脸都变了颜色，罢朝后回宫去了。别人都替汲黯担心，都以为要杀他，结果没有杀，汉武帝说：汲黯戇也。

刚才说的刘少奇、林彪那一段，同志们提供了很新鲜的材料，我知道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刘少奇进城初期亲自祭过孔。一九六二年他亲自组织好多人到曲阜去，有上千把人吧。全国很多单位都去了，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去。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同志们都有材料，都可以看。刚才讲了刘邦，就是汉高祖。吕后、张良、肖何、曹参、晁错、桑弘羊都是法家。刚才有的同志说到了男女不平等的事，孔老二的东西到董仲舒才增加上夫为妻纲。其实孔老二老早就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不过到董仲舒成了一纲。汉朝的女人，还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有“面首”，什么叫“面首”，同志们知道不知道？“面首”就是除了丈夫以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

唐朝的女人也没有那么严重的不自由，因为唐朝的女人不自由就可以出家，做女道士，尼姑；在劳动人民中就有更多的自由了。只有到了宋朝就倒霉了，这可能是与封建制的经济下降不是上升有关。他们奴役，束缚的厉害，反抗就更强一些。中国的农民暴动是上百万到几百万人，两汉有黄巾、赤眉、铜马，唐朝有王仙芝、黄巢，元末有张士诚、陈友谅，明末有李自成，清朝有太平天国，义和拳，这是最大的两次。朱元璋也是反儒的。

再就是我们党领导的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贫下中农为巩固的同盟军的革命，特别是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使我们的国家得到解放。十年内战，抗战八年，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半，把蒋介石打得滚到那个岛上去了，蒋介石是个大儒。

我昨天晚上才把《盐铁论》的本子读完了。我建议你们读一下。斗争很激烈，主要是昭帝坚持执行汉武帝的路线，另一批王八蛋要反对。刘邦开始不信儒，他不愿见酈食其，说老子不见儒生，酈食其就骂：“我不是什么儒生，老子是高阳酒徒。”刘邦当时正在洗脚，光着脚丫子就去见酈食其，他不是真的儒。刘邦为什么尊儒呢？因为他统一天下后，不好支配他的几个大臣。后来叔孙通给他制礼作乐，刘邦说我才知道当皇上的滋味。

《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叫《读（盐铁论）》，我建议同志们看一看。林彪不是骂我们笔杆子压枪杆子吗，他的笔杆子可多了，反革命舆论多的很，造谣诬蔑我们中央的同志跟主席革命就是笔杆子压枪杆子。我也算笔杆子，我也不会动笔，我压了你们没有？你们今天来了一百多个战士嘛。造谣，他用这个骗人，什么“民富国强”！他是大叛徒，大卖国贼，是大盗窃犯！“一平二调”！我举一个例子，云南有他的一个相当大的死党，给他送茅台，一次一千，一次一千五百瓶，还有云烟几百箱，他有那么高的薪水吗？是不是贪污来的？（大家答是）“一平二调”！他吃的东西全国进贡，家里有很多灵芝草，他还抽鸦片烟，他想长生不老，过去我们不知道。毛家湾有工作人员去过，看到前面两间小房，后面可了不得，从来不让我们去。我去过几次，很隐蔽。他在北戴河也修了行宫，楼梯很宽，只有人民大会堂有那么宽的楼梯。有两个放映室，在中间还修了个大游泳池，说林彪怕水，混帐！造谣骗人。说他小腿出汗，其实他一走道走多少公里。这个人胆小鬼就是了。主席在“九·一二”晚上回来前他就跑了，他不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吗？他就是独往而没有独来嘛。他说吃茶叶还膀胱出汗，谁看得见？

诸葛亮虽然维护正统，过去以为他有正统思想，实际是法家。

曹操是很了不起的法家。他用的郭孝直很年青就死了，是个大法家。曹操很能用人。袁绍有个谋士叫陈琳，他写了一篇檄文骂曹操，骂得很厉害。曹操正在生病，头疼，看了他这篇文章后，出了一身汗，连头也不疼了。后来曹操把陈琳俘虏了，他问陈琳，你为什么骂我骂得那么厉害？陈琳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没有杀他，留用了。还有个大将庞德被俘虏了，放回来也没有杀。在历史上法家杀人少，儒家杀人多。孔子上台三个月就杀了少正卯。少正卯影响很大，孔老二的门下三盈三虚，只有颜回一个没有走。孔老二上台以后杀了少正卯，七天不准，三个月可靠。少正是官名，是个大夫，杀要有手续，三个月比较可靠。

唐朝李世民，要做具体分析，恐怕法家的成分多一点，希望专家研究一下。他的父亲李渊，给隋皇帝守行宫，在晋阳，不敢起来造反。李世民手下有一个人叫刘文静（晋阳令），说站起来造反。李世民用了他的建议，取得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做了皇帝。他还用一批农民暴动的领袖，就是瓦岗寨的人，同志们知道不知道？比如李绩，原来叫徐绩，就是徐茂公。魏征是法家还是儒家，还值得研究。武后用武元衡、狄仁杰、姚崇、宋景、裴度等，这些人都值得研究。

后来有韩愈。韩愈是儒家有点法家味道，要分析。柳宗元是法家。王叔文是法家。所谓八司马，其中也有韩愈。韩愈被贬到了潮州，哭哭啼啼的，有一首律诗，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而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就不那样。也有一首诗，题为《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韩愈作为文学家不能完全抹煞。他是儒家，还有点法。对他不能绝对化，要具体分析。他就批评过孔丘，说：“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搯星宿遗羲娥。”（《石鼓歌》）当时对孔丘是不能批评的。

武元衡，裴度，李塑等是儒家还是法家值得研究。他们都是反对藩镇割据的。李师道派人去刺武元衡和裴度，武元衡被刺死了，裴度滚到沟里去了，没有死，这时就有人把刺客抱住喊“有贼”！刺客把抱的人的臂砍断逃跑了。

李塑在雪夜攻蔡州时，抓了一个俘虏，大家要杀掉，李塑不让杀。后来他写了一封信连俘虏带到皇帝面前，皇帝把这个俘虏赦免了。

八司马是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的人。

宋朝的赵匡胤，赵匡义也要研究。

寇准是爱国主义者。岳飞也要研究，是法是儒，也许又是法又是儒。

王安石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变法除了维护较先进的封建制度外，还是为了防御异族的侵略。李世民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游牧民族侵略我们，每到草肥马壮的时候，他们就来了，靠轻骑兵，重骑兵。轻骑兵两匹马，重骑兵四匹马，不带干粮，吃马奶就可以，马奶没有了，就用锥子扎马腿喝马血。他们不要辎重，不象我们的部队要有很大的后勤。

汉朝的霍光有个兄弟，叫霍去病，此人很了不起。大将卫青，是霍去病的舅舅，



奴隶出身。还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是卫青的姐姐，最初是平阳公主的歌奴。汉武帝用人很了不起。当时两派斗争，挑拨武帝父子关系，戾太子受一些人鼓动，反对汉武帝。武帝劝他不听，后来才把他干掉了，并且追查余党。戾太子的孙子关在狱里，在搜查时，邴吉拒门说：里面有皇帝的骨血，谁也不能进去。后来武帝觉得杀人太多，就宣布赦免。邴吉就这么顶一下，汉宣帝就这样保存下来了。刚才那个同志的报告说孔融和弥衡都是曹操杀的，这不对。弥衡不是曹操杀的，是黄祖杀的。弥衡是个大文学家。要看《三国志》，不要看《三国演义》。小说不可信。李白有一首诗讲这个事：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弥衡，  
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

唐朝有三个姓李的大诗人，二李是法家：李白，李贺。李白的诗说：“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见《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中国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我这是念的主席的原话，李白也是这样。主席讲学马列要有势如破竹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是很危险的。我们今天批林批孔，也要有这种精神，同志们说对不对？没有这种势如破竹、风扫残云的精神是不行的。主席讲批林比较好办，批孔就难了，我们就是要知难而进。

王安石变法，许多是针对外族入侵的，都是有针对性的，是为了国家强盛起来。司马光的后台是皇太后，太皇太后，是宋神宗的祖母；王安石的后台是宋神宗。后来宋神宗怕了，王安石也就下台了。

明朝的李贽，他的书我没有全看，《焚书》翻过一点，不多。上海新发现了一种李贽的《（四书）评》，已拿到北京去印，不久可以发行。厦门大学还发现了一部《史纲评要》，现正出版。他是不能忍受凌辱，死在监狱里的。

对清，也要很好做点研究。比如康熙，康熙是顺治的儿子。有人说顺治死了，有人说他出家做了和尚。顺治的母亲下嫁给多尔衮，多尔衮统一了全中国。康熙八岁登基，他的辅政大臣是鳌拜，他没有自由。他想了个办法，搞了一些小孩和他一起玩。到十六岁时，等鳌拜来的时候，这群小孩一下子围上去，将鳌拜捕捉下狱质罪，他就自己搞。十六岁他就过问政治。这样的人值得研究。要注意这些人，

但不要过了，过了就要回潮，就又出来让步政策了。那来什么让步政策是绝对没有的，是反革命造出来反对历史唯物论的。他们反对历史唯物论就来一个让步政策；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就来一个合二而一。让步政策实际是合二而一在史学中的反映。

同志们，我自己的历史知识也不多，你们讲得不够的地方，或者错了地方，我加以补充，少数地方加以纠正。我们是来学习的，我也向在座的两个写作班子的同志学习，向天津市的同志学习，我们共同学习吧！我可能说的有错误，有缺点，同志们允许我改正，不然，我以后就不敢来了，也不敢给同志们讲话了。我的话完了。

当薛清泉同志讲到孟姜女哭长城的事时，江青同志插话说：“那么远，她怎么去呀？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即便是有的话。”

东晋的刘昆也是爱国主义的。

来源：《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以及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材料。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北京市委报送的首钢炼铁厂批林批孔的材料

1974.06.25；中办发[1974]10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央报送的首钢炼铁厂批林批孔的材料转发给你们参考。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

中央：

送上首钢炼铁厂批林批孔的材料，请审阅。

中共北京市委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五日

批林批孔是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

中共首都钢铁公司炼铁厂委员会

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我厂职工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文件，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批林彪一伙“克己复礼”，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罪行，从根本上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今年一至五月，在原料、燃料比较紧张的情况下，生铁产量节节上升，消耗步步下降，革命和生产都呈现一派大好形势。第一季度提前四天半完成了生产计划，超产生铁两万二千多吨。前五个月产量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八点二五。

狠批“克己复礼”，把对林彪的无产阶级义愤化为促生产的强大动力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中发[1974]1号文件下达后，我厂迅速掀起了批林批孔高潮。广大职工愤怒声讨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

一高炉老工人蒋伯诚，他家解放前借了地主二斗粮食，驴打滚的阎王债，把他家里仅有的三亩薄地滚到地主手里。父亲病饿而死，母亲被迫改嫁，害得他家破人亡。蒋伯诚愤怒地说：“林彪的‘复礼’，就是让地主老财骑在我们劳动人民头上，再算阎王账，再吸穷人血，我们坚决不答应！”一高炉老工人白明立用父亲惨死在日本鬼子屠刀下的事实，戳穿反动统治阶级的所谓“仁爱”。他说：“我们决不允许林彪打着孔老二的‘仁爱’的招牌，为吃人的旧社会翻案，攻击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二高炉老工人牛永顺，用他一家解放前后的巨变，狠批孔老二、林彪宣扬的“天命观”。他说：“孔丘讲‘天命’，工头讲‘天神’，林彪讲‘天才’，满口天天天，全是骗骗骗。林彪贩卖‘天命观’，就是要把我们劳动人民推进鬼门关。我们要砸碎千年精神枷锁，不信天，不信命，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大家越批对林彪、孔老二越恨，越批对党和毛主席越亲，越批用实际行动捍卫社会主义、干革命的劲头越大。一致表示：钢铁工人誓作批林批孔的主力军，抓革命、促生产的闯将，狠批“克己复礼”，大干社会主义，多炼铁，炼好铁，用实际行动彻底粉碎林彪及其死党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

前段时间，一高炉炉前的工人们在渣沟旁挖了一个“坑”，准备把渣中带回的铁

回收起来，大家称它为“聚宝坑”。当时，有种论调认为，搞节约就得给点奖金，不然坚持不下来。可是，批林批孔以来，炉前这个“聚宝坑”却越挖越大，每天可以回收好几百公斤铁。大家还把炉台上用剩下的半截元钢一节一节焊接起来使用。在一次批判会上，炉前丙班副班长马福同志谈了自己的体会。他说：“林彪竭力鼓吹物质刺激，诬蔑我们劳动人民是只知‘恭喜发财’的小人，妄图用金钱迷住我们的眼睛，把我们引上修正主义的黑道。我们决不上当！咱挖‘聚宝坑’，焊接元钢，心里想的不是钱，为的不是奖金，我们想的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是高炉的主人，就是要想大事，议大事，砸烂林彪‘复礼’的破车，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大家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为社会主义大干苦干的革命干劲越来越足。

今年第一季度，这个高炉在增产过程中，面临不少困难，在批林批孔推动下，都被他们一一克服了。风机能力小，值班室改进炉内操作，努力增加风量；煤、油不足，喷煤工人大搞均匀喷吹，千方百计降低燃料比；焦炭不足，他们就主动吃其他高炉筛下的小焦块；使用小焦块，出铁时容易卡住铁口，炉前工就冒着高温去捅，为了多出铁，再累也心甘。在全炉职工的努力下，这个高炉的平均日产水平，从一月份的九百二十八吨，上升到二月份的九百八十五吨，三月份达到一千零三十八吨，一季度的生铁产量，比去年第四季度提高了百分之七点零九。

痛斥林彪“今不如昔”的反动叫嚣积极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二月下旬进入专题批判以后，全厂职工针对林彪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进一步深批“克己复礼”。大家愤怒地指出：林彪的“复礼”，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开历史的倒车。广大职工在痛斥林彪“今不如昔”的反动叫嚣的同时，用我厂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巨大变化，热情歌颂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大家分清了两条路线，无产阶级办企业路线在思想上进一步树立起来，有力地推动了生产。

三月份以来，正当我厂生产水平不断提高的时候，炼钢厂三座转炉有两座要进行检修。这样一来，铁水不能直接用来炼钢，要铸成铁块，铸铁量由每天一千七、八百吨猛增到三千吨以上。怎样解决这个问题？铸铁机的干部和群众从深批林彪“克己复礼”，热情歌颂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过程中，受到了启发。

文化大革命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铸铁机生产迫切需要的铁锅棚子，喊

了十多年没有盖起来。文化大革命以来，依靠群众，自己动手，只用了五十天就盖了座铁锅罩棚。大家通过铁锅棚子的上马，畅谈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他们说：“过去靠‘物质刺激’，上班想的是几大指标，份外的事不愿多干；现在靠政治挂帅，干起活来不分份内份外。过去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捆住了我们的手脚；现在大搞群众运动，工人成了工厂的主人。过去靠‘专家治厂’，越治越坏；现在靠群众办厂，‘鞍钢宪法’的道路越走越宽广。”通过歌颂，大家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干劲倍增。他们豪迈地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盖锅棚，没向困难低过头，没向困难让过步。今天，我们要用新的胜利痛击林彪一伙搞复辟、开倒车的罪行，这点困难算什么，只要大搞群众运动，没有攻不下的难关。”

为了打好多铸铁块这一仗，大家利用工余时间，自己动手，提前一个星期更换了一千八百多个铸床备件。干部下到第一线跟班劳动。结果，达到平均每天铸铁三千一百吨，在炼钢转炉检修的情况下，保证了高炉继续高产。

坚持继续革命，依靠工人群众办好社会主义企业

在深批“克己复礼”中，广大职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联系现实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继续批判修正主义路线的表现和影响。工人们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才结束了钢铁十年徘徊的局面，促进钢铁生产连年上升。”大家表示，一定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反对倒退，继续革命。在制订今年生产计划时，我们只想到两台大风机要检修，喷吹用的重油供应减少一半，以及焦炭灰分提高等不利因素，结果订出的一九七四年计划指标比上一年实产还低四万吨。一高炉工人群众在“四万吨之差说明了什么？”的大字报里，尖锐地批评厂党委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只是依靠少数人算死账，摆了许多条物质条件，就是没有把全厂职工大干快变的革命愿望摆进去，没有把广大群众经过文化大革命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摆进去，大字报热情诚恳地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之差，而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林彪要把“唯生产力论”的黑货塞进“九大”政治报告，没有得逞，可千万不能让这些黑货塞进我们党委领导同志的脑袋里去啊！工人群众的大字报，使党委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党委专门召开了会议，认真地讨论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认识到刘少奇、林彪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路线，决不是经过几次批判就能彻底肃清其影响的。于是在批林批孔大会上，由

三名市委常委分别就怎样看待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群众，怎样对待广大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出来的首创精神，怎样对待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和老中青三结合这些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事物，带头批，带头联，和群众一起，热情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狠批林彪攻击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随着党委领导班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的不断提高，党委根据群众的意见，重新调整了今年的生产计划，整顿了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党委主要领导成员经常深入车间、班组，主动向群众学习，从群众中吸取力量，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同时积极培养青年干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干部和群众一致表示，只有坚持前进，反对倒退，革命才能步步深入，生产才能节节上升。今年三月，三高炉使用的大风机检修，改用小风机进行生产；三座热风炉也有一座需要检修设备，造成风温下降。在这种不利条件下，我们坚决肃清见物不见人的“唯生产力论”的流毒，坚信“人定胜天”，充分发挥三高炉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依靠群众的智慧战胜困难，经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三月份的生铁产量和去年使用小风机时相比，增长了百分之十一点六，使全厂的生产水平比二月份又有了新的提高。一高炉的喷煤设备需要检修，工段干部原来怕喷煤工人对这个“份外的活”有意见，等外援等了七个月。批林批孔运动中，喷煤工人狠批林彪、孔老二“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以主人翁的精神大干社会主义，主动向党支部请战，仅用了七天就把闲置七个月的设备修复了，使生铁产量有了新的增长。

目前，全厂干部和职工，情绪高昂，干劲倍增，大家决心响应毛主席“多搞点钢”的伟大号召，继续深入批林批孔，用增产节约的实际行动，进一步发展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发出共印四五、五二一份  
(根据中办原件打印，原件无题)

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罗思鼎的文章《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刘邦建立西汉王朝，这是我国封建制战胜奴隶制复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巩固封建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法家和儒家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条战线大决战的时刻。阶级斗争尖锐复杂，农民起义同反复辟的斗争紧密联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这一时期的阶级关系，研究、总结这一时期阶级斗争包括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对于开展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深入批林批孔，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有帮助的。

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连绵不断的大规模奴隶起义，沉重打击了奴隶主贵族反动统治，替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创造了条件。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进一步摧毁了在关东六国还大量存在的奴隶制残余，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雄图发英断，大略驾群才。”<sup>①</sup>李白的诗，歌颂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功绩和他的卓越政治才干。凭借着已经成熟的历史条件，在奴隶们反抗奴隶制的伟大斗争的基础上，在经过商鞅变法等一系列社会变革所造成的形势下，秦始皇坚定地实行法家路线，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敢作敢为，生气勃勃，成为革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最杰出的代表。

秦始皇统一中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明代进步思想家李贽曾满腔热忱地说：“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sup>②</sup>。秦始皇统一中国，确实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它宣告了封建制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是，当秦始皇死后，在短短三年内，秦王朝也随即灭亡了。古往今来，有多少人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探讨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的问题，作出了各种各样的答案。

从来的尊儒反法派，从董仲舒、朱熹到林彪，从苏修到国民党反动派，无不抓住秦朝二世而亡，大肆攻击“焚书坑儒”，胡说秦朝迅速灭亡是秦始皇实行“暴政”的结果。秦朝的覆灭，是因为对儒家复辟派镇压得太多了吗？不！事实同这种断语相反，秦王朝的失败，正好不是因为对奴隶主复辟派镇压太多了，恰恰在于秦始皇对反动派的专政还不彻底，甚至让他们钻进了政权机关，窃取了重要职务。这是地主阶级的局限性所决定的。毛主席指出：“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

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秦始皇在粉碎吕不韦复辟集团的同年，鉴于吕不韦大批招募六国儒生入关，图谋复辟，曾下了逐客令。法家李斯做过吕不韦的舍人，因而也在被驱逐之列。李斯写了《谏逐客书》，这是正确的。对“客卿”应该作分析，不能采取“非秦者去，为客者逐”<sup>③</sup>的政策，一概排斥。但“客卿”中也确实有象吕不韦、淳于越这样代表被打倒的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坏人，采用“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战术，企图从内部瓦解秦朝的地主阶级专政。根据历史记载，所有知名的秦博士都是齐人和鲁人。齐鲁地区原是孔孟一派儒生根深蒂固的老窠。这种现象是很值得深思的。特别严重的是，他们的政治代表赵高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深深地隐藏了下来。这就为秦王朝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当时，六国旧贵族的复辟势力也是相当强大的。在全国各地隐藏着大批心怀不满的六国奴隶主复辟派和封建割据势力。章太炎指出：“六国公族，散处闾巷之间”，“公族之欲复其宗庙，情也”<sup>④</sup>，他们企图复辟已经失去了的天堂，是必然的情势。秦始皇对公开的敌人是有一定警惕的，也采取了措施。如平毁六国军事要塞，征收全国的武器，多次巡视，到处刻石，宣传封建制的优越性，批判奴隶制的落后性。但是由于地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由于这个阶级取得全国政权时间不长，对反复辟、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和曲折性认识不足，特别对复辟派从内部颠覆封建政权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在取得了夺取政权的胜利以后，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便滋长了太平麻痹观念，幻想从此“天下和平”<sup>⑤</sup>。秦始皇一死，秦王朝对复辟势力镇压不彻底的恶果便迅速暴露，从埋藏在秦王朝内部二十多年的赵高，到躲藏在全国各地的六国旧贵族，一下子都从地底下涌了出来，而地主阶级却没有能够把这股复辟逆流打下去，秦王朝的灭亡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明朝张居正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指出，如果秦始皇的继承者能够“守其法而益振之，积至数十年，继宗世族，芟夷已尽，老师宿儒，闻见悉去”，秦朝就不会这么快灭亡。他所说的，实质上是一个继续和加强秦始皇法家路线，铲除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问题。而历史事实却相反：“扶苏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sup>⑥</sup>，导致了秦王朝的倾覆。“六国余孽”是颠覆秦王朝的复辟势力，而所谓“奸宄内发”，就是指赵高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它是秦朝灭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赵高是赵国奴隶主贵族后代，因为“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sup>⑦</sup>，在秦宫廷里当上了一名宦官，并成了公子胡亥的师傅。赵高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儒。赵高父母都因犯秦法而被判处重刑，他本人也差一点因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而被处死。“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sup>⑧</sup>。后来秦始皇看他能说会道，又“复其官爵”<sup>⑨</sup>，给予重用。阴险的赵高从此改变策略，骗取信任，除继续担任掌管车马乘舆的中车府令外，后又兼管皇帝的印玺和起草机要文件。这样，就使赵高有可能趁秦始皇病危，发动政变。

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巡游到沙丘时，因病重曾令赵高起草命令，要太子扶苏赶快从前线回来准备后事。但“书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书及玺皆在赵高所”<sup>⑩</sup>。紧接着是赵高的一系列阴谋活动，他“留所赐扶苏玺书”，诱骗胡亥，大谈“汤武杀其主”，“卫君杀其父”的历史，叫嚷卫君杀其父“孔子著之，不为不孝”<sup>⑪①</sup>，大造反革命政变舆论。同时又拉拢李斯，说什么“书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sup>⑪②</sup>，使用各种威胁利诱手段，迫使李斯就范。然后，赵高伪造诏令，逼死太子扶苏，逮捕并杀害坚持秦始皇法家路线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为秦二世。一场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终于得逞了。汉代的樊哙曾用秦始皇的历史教训警告刘邦：“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sup>⑪③</sup>樊哙和赵高是同时代的人，他对赵高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是记忆犹新的。

赵高政变后，立刻用儒家的路线代替了法家的路线。他改变秦始皇执行的保护新兴地主阶级、打击奴隶主阶级的政策，实行“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的政策<sup>⑪④</sup>，把没落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在赋税和徭役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倒退措施，企图使贫苦农民重新沦为奴隶。秦自商鞅变法后，对公开的奴隶主反对派都是坚决镇压的，“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sup>⑪⑤</sup>。赵高篡权后，公然下令“更为法律”<sup>⑪⑥</sup>。反革命派上台，都要搞翻案，实行“大赦”。秦二世元年一月，“大赦罪人”<sup>⑪⑦</sup>，被秦始皇专政的罪犯纷纷跑出监狱，在咸阳街头弹冠相庆，而法家人士却遭了殃。儒家比法家杀人要厉害得多、残酷得多。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名反动儒生；赵高却千方百计“尽除去先帝之故臣”，实行血腥的反革命阶级报复。继扶苏、蒙恬、蒙毅之后，秦始皇的子女二十多人先后被害，“相连坐者不可胜数”<sup>⑪⑧</sup>。接着，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被迫自杀，

李斯也遭到被腰斩和“夷三族”的惨祸。同时，赵高对各郡县地方官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洗和屠杀。秦始皇时代的法家几乎一网打尽，无一幸免。赵高镇压了法家的反抗，任意“指鹿为马”，为所欲为，在公元前二〇七年，又杀了秦二世，并公开主张恢复六国的分封制。这个钻进秦朝内部的六国旧贵族代表，终于达到了“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sup>①⑨</sup>的罪恶阴谋。

在赵高一手策划反革命政变时，唯一有可能起来揭露和抵制的李斯，却表现了不可原谅的妥协和动摇。李斯曾帮助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后来又参加制定了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制度和政策，反对倒退，反对恢复分封制，是一个有过重要贡献的法家。但他也有过许多严重的错误。在赵高策动政变时，李斯为了保全自己“富贵极矣”的地位，一开始就摇摆不定，妥协退让，以至容忍了赵高的阴谋得逞。后来，李斯企图重新进行斗争，然而大势已去。李斯的致命伤是私心重，骨头软，他企图“委曲求全”，但向反动政变策划者讲“委曲”，是无法“求全”的。当然，李斯同赵高有本质的不同。李贽把李斯和赵高作了比较：“斯，龙也。高，蛆也。”（20）李斯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在历史上是功大于过。而赵高则是韩非在《孤愤》篇中痛斥的那种“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的“重人”，是新兴地主阶级及法家的最危险敌人。从赵高的政变，可以清楚地看到秦王朝建立后，奴隶主复辟和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还是非常激烈的。

## 二

以赵高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的复辟，教训是惨痛的。它证明秦王朝没有能够最后战胜奴隶主复辟势力。这一历史任务自然落到了革命农民的肩上。就在赵高发动政变，篡夺政权后九个月，陈胜领导的革命农民，在大泽乡上空点燃了武装起义的烽火，宣告了赵高、胡亥反动统治的迅速灭亡。

历来的尊儒反法派，包括林彪及其死党，总是把陈胜、吴广起义同“焚书坑儒”联系起来，胡说什么“坑灰未冷山东乱”。这是歪曲历史真相。毫无疑问，秦王朝是要对农民实行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是要把地主阶级的挥霍享受建筑在劳动人民遭受剥削的基础上的。如同资本主义制度一诞生，无产阶级就立即开始了反抗一样，从封建制产生的第一天起，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和斗争就出现了。这种阶级矛盾构成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在历史上毕竟是一

个很大的进步。维护这个革命成果的斗争是很艰巨的。秦始皇采取的专政措施，当然有针对农民的一面，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更迫切的却是要解决防止奴隶制复辟的问题。特别是“焚书坑儒”，根本就不是对农民的镇压，而是对反动派的专政，那些被坑掉的儒，明明是奴隶主的代言人，也是劳动人民的凶恶敌人。坑掉一批“不耕而食”的寄生虫，广大农民只会拍手称快，决不会加深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章太炎认为，“诸巫食言，乃坑术士，以说百姓”，秦始皇“坑儒”是为了取得老百姓的谅解，这种看法是有见地的。章太炎还指出：“世以秦皇为严，而不妄诛一吏也。”<sup>②①</sup>从秦始皇接受李斯的《谏逐客书》以及对待法家尉繚的态度看，也并不象是儒家所攻击的那样不能听取正确意见。总之，把“焚书坑儒”说成是引起农民起义的原因，是一种违反阶级分析的错误观点，是反动派混淆是非的言论。

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在秦二世的时候，正是钻进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的复辟派，大大加剧了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我们应当从阶级观点比较一下秦始皇和赵高两条不同的路线。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继续实行法家路线。始皇二十六年，下令“更名民曰黔首”，黔是黑的的意思，秦始皇根据五德终始崇沿黑色，“黔首”在当时应是指新兴的地主和自耕农，是秦始皇对当时人民的一个尊称。在以后的石刻中，多次提到“黔首”，如二十八年的石刻中讲到“上农除末，黔首是富”<sup>②②</sup>。三十一年下令实行“使黔首自实田”<sup>②③</sup>的政策，鼓励发展封建地主和自耕农的经济，促进生产的发展。赵高掌权后，却对广大农民实行奴隶主式的掠夺，造成“黔首振恐”<sup>②④</sup>。应该指出，引起陈胜起义的直接原因，是赵高实行使“黔首振恐”的复辟奴隶制的儒家路线。

在秦始皇时，劳动人民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激化。秦国从商鞅变法时起，废除了井田制，解放了奴隶的生产力，实行“奖军功”，“教耕战”的政策，使“秦民大说（悦）”<sup>②⑤</sup>。当时“山东之民，无不西者”<sup>②⑥</sup>，东方诸国的人民都跑到秦国来。可见，人民群众是拥护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秦始皇继承了商鞅的发展封建农业经济，保护农业劳动力的政策，“缓刑罚，薄赋敛”<sup>②⑦</sup>，对于从事农业劳动的贫苦农民即“闾左”，规定每年只服劳役一个月，一生作正卒一年和戍边一年，也就是说，一般是不随便“发闾左”服役的。赵高上台后，改变了

秦朝法家政策，“始皇既歿，胡亥极愚，骊山未毕，复作阿房”②⑧，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空前繁重。在赋税方面，采取“头会箕敛”②⑨，甚至大规模地“发闾左”充戍卒，实质上也就是使已获得人身自由的农民又重新沦为奴隶，这是革命农民所不能容忍的。赵高复辟奴隶制的罪恶行径，激化了同农民的矛盾，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条件。“赋敛愈重，戍徭无已”（30），大规模地征发农民服徭役，把全国各地分散的农民都集中和组织起来了。当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广大农民就能很快地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给赵高的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赵高的倒行逆施，也加剧了地主阶级同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矛盾以及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对于赵高在沙丘发动的政变，“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赵高也担心“皆不服，恐为变”。随着赵高、胡亥“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③①，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都反对奴隶制复辟。当时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代表，也参加了推翻秦二世统治的斗争。陈胜起义时打出扶苏的旗帜，正是为了孤立和打击赵高。但当时单靠地主阶级不可能粉碎赵高政变，只有农民的革命斗争才是防止奴隶主复辟的主力。对农民来说，一旦奴隶制复辟，就要重新沦为奴隶。奴隶制残余保存得越多，农民依附于封建地主的程度也就越严重。在思想上，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孔孟之道，是束缚奴隶和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桎梏。因此，农民起义的斗争锋芒必然要指向奴隶主复辟势力，指向反动的孔孟之道。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由关东六国奴隶组成的“苍头军”，也参加了革命的洪流。如东阳陈婴起义，就有“异军苍头特起”③②，由奴隶组成的起义军成为一支重要“异军”。陈胜牺牲后，“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③③，继续进行英勇斗争。

陈胜、吴广起义最后失败了。除了政策上的一些问题之外，失败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六国旧贵族和反动儒生从内部的破坏。随着秦末农民起义迅速发展为燎原烈火，潜伏在各地的奴隶主复辟派也蠢蠢欲动，起来“造反”。一时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不少反动儒生乘机混进了农民起义队伍。如秦王朝悬赏通缉的要犯陈余就“好儒术”③④。他和另一被通缉的要犯张耳都与孔子后代孔鲋“相善”③⑤。陈余隐姓埋名，四出游宦，“尝游赵，知其豪杰及地形”③⑥，积极从事复辟活动。混入陈胜起义军队伍后，张耳、陈余又派人去动员孔鲋，认为“天下之事已可见矣”，时机成熟了，“子宜速来”③⑦。于是，孔鲋等鲁诸儒抱着“礼器”也

混了进来。大批反动儒生混入起义队伍，必然企图改变农民起义的路线，于是在农民起义队伍内部也出现了儒法斗争。

孔丘的后代孔鲋公开要陈胜“法先王”，胡说：“昔周代殷，乃兴灭继绝以为政首”，把“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摆在施政方针的首位，要陈胜“诚法之”。陈胜当场义正词严地驳斥道：“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远世之王，于我何有？……安能纯法之乎！”我是靠自己起来造反的，同周灭商不一样，怎么能完全去学呢？把孔鲋顶了回去。陈胜对孔孟之道是采取怀疑批判态度的，他说：“始，余信圣贤之道，乃今知其不诚也。”陈胜手下将领武臣，在与孔鲋辩论时，也认为孔学未必正确，“若韩非者，亦当世之圣人也”③⑧。可见，尊儒还是反儒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很激烈的。

孔鲋等反动儒生的政治目的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张耳、陈余攻击秦始皇统一六国的革命行动是“破人国家，灭人社稷，绝人后世”。他们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政权，主张“遣人立六国后，自为树党”，遭到了陈胜的抵抗。张耳、陈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诱骗陈胜分兵“北略赵地”。陈胜对他们是有所警惕的，派“故所善陈人武臣为将军”，率领三千农民军出发。后来武臣受张耳、陈余腐蚀，自称赵王。陈胜命令武臣向咸阳进军，张耳、陈余又反对，主张“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广”，公开从农民起义队伍中分裂出去。在张耳、陈余的蛊惑下，武臣派韩广“略燕”，在燕国旧贵族支持下，韩广也割据称王③⑨。六国奴隶主残余和割据势力纷纷“逐秦守宰而自王故地”（40），实行复辟，这样就牵制和分割了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如田儋是齐王田氏后代，他收罗“豪吏子弟”，自立为齐王，带兵进攻陈胜手下大将周市，“周市军还去，田儋因率兵东略定齐地”，然后就在齐鲁一带割地称王④①。当时，各地起来称王的都是韩、赵、魏、楚等国的贵族后裔。汉代的刘敬说：“夫诸侯初起时，非齐诸田，楚昭、屈、景莫能兴。”④②六国旧贵族虽然经过秦始皇的沉重打击，但百足之虫，死而未僵，一旦时机成熟，又死灰复燃。他们是农民革命的死敌。

陈胜、吴广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它证明：“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粉碎了赵高复辟奴隶制的阴谋，“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④③。在这期间，六国奴隶主复辟势力受到了

农民起义的革命大扫除，地主阶级也第一次受到农民起义的强有力的冲击。秦统一后，六国旧贵族盘根错节，在地方上还有相当大的势力。农民起义扫荡了各地还保存着的奴隶制剥削方式。大批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砸烂枷锁，参加起义，求得解放。陈胜、吴广起义在摧毁奴隶主复辟政权，扫除奴隶制残余方面，建树了不朽功勋，为汉初最后消灭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封建制度开辟了道路。陈胜、吴广起义还显示了农民革命反封建的巨大威力，使历代封建统治者提起这次起义就胆战心惊。

### 三

陈胜、吴广起义后，紧接着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是以项羽和刘邦为代表的儒法两条路线的大搏斗。斗争的实质是继承还是推翻由秦始皇开创的封建大一统的国家制度，这是从秦王朝开始的复辟和反复辟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

项羽和刘邦，原来都属于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参加了农民起义斗争。陈胜、吴广牺牲后，项羽和他的叔父项梁立楚国贵族后裔为楚王。后来，项羽消灭了秦军主力，刘邦则占领了关中和秦的首都咸阳。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并封刘邦为汉王。项羽和刘邦之间的战争，历史上就称为“楚汉相争”。

楚汉相争，从路线上看，是一场儒法斗争。刘邦平生“不好儒”④④，认为“为天下安用腐儒”④⑤。项羽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孔门信徒。刘邦平时“慢而少礼，士廉节者不来”④⑥。同刘邦相反，项羽出身于楚国贵族，“仁而敬人”④⑦，很讲究儒家那套虚伪的礼节，但对劳动人民却极残酷，他将秦朝放下武器的二十余万士兵当作奴隶，“俘虏使之”，最后残暴地全部杀害④⑧。项羽好“礼”，儒家之徒都麇集到他的旗帜下来了。他任人唯亲，“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④⑨。项羽最初被封为鲁公，也决不是偶然巧合。项羽死后，“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按照儒家的“礼义”，标榜为项羽“死节”，但不久“乃降”(50)。可见，项羽依靠的是六国旧贵族和反动儒生。刘邦原是个亭长。他的主要谋臣和将领中，肖何、曹参、夏侯婴等都是秦朝地主阶级的下层官吏。另一些人是劳动者，如周勃是手工业者兼办丧事，樊哙以屠狗为业，灌婴是小商贩。项羽和刘邦都参加了农民起义的队伍，但这两个政治集团的思想、阶级基础是不同的。(2)(3)

刘邦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他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坚持统一，反对分裂，

坚持地主阶级专政，反对奴隶主复辟。项羽则站在六国旧贵族的立场，执行了一条儒家的反动路线，大搞分裂割据，开历史倒车。这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在项羽和刘邦进入秦国的首都咸阳时，就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刘邦入关后，废除了赵高的严刑苛法，对杀死赵高、主动投降的秦王子婴及关中地主阶级采取保护政策，取得了关中地主阶级的支持。项羽入关，“杀子婴及秦诸公子宗族。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之”<sup>⑤①</sup>。项羽挖秦始皇坟墓，火烧阿房宫，大肆抢掠，完全是一种发泄六国旧贵族亡国之恨的阶级报复。公元前二〇七年，项羽凭借暂时的军事优势，一下子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把关中地区一分为三，封章邯等三人为王，“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sup>⑤②</sup>。刘邦列举项羽的十大罪状，痛斥项羽“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sup>⑤③</sup>，项羽恼羞成怒，但无言可对。

在楚汉相争中，刘邦能够战胜项羽，关键是这个集团的路线比项羽正确。同时也依靠了秦始皇时留下来的强大的物质基础。从军事实力上讲，刘邦远远不是项羽的对手，屡战屡败，几次全军覆灭，但最后却越战越强，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中人民的支持。关中在吕后、肖何的领导下，积极进行建设，成为支援前线的根据地，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人力和物力。刘邦有关中根据地作为坚强后盾，因此稳操胜券。汉朝建立后，评肖何为第一功。大臣们也认为：“肖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肖何常全关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sup>⑤④</sup>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失道必然寡助，项羽转战八年，身经七十余战，所向披靡，未尝败北，但政治路线错了，军事上仍旧要失败。垓下之战，四面楚歌，落得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的下场。但项羽临死时还说什么“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难怪司马迁要嘲笑他：“岂不谬哉！”<sup>⑤⑤</sup>

在战胜项羽后，刘邦建立了西汉封建王朝。“汉承秦制”，刘邦基本上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肖何进入咸阳后，“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sup>⑤⑥</sup>，汉朝的法律基本上是参照秦律制定的。刘邦消灭了以项羽为代表的一大批六国旧贵族，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但在战争过程中，仍然还遗留了一批六国贵族残余势力，并形成了一批新贵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刘邦不得不同他们作暂时的妥协，对他们的代表人物封王封侯。例如齐王韩信，梁王彭越，九江王英布，燕王卢绾等。这就酿成了汉代初年汉王朝同以异姓王为代表的分裂割据势

力的斗争。这场斗争是楚汉相争的继续。这些异姓王，对内实行分裂割据，保护工商业奴隶主残余势力，对外向我国北方的匈奴族奴隶主贵族屈膝投降。刘邦、吕后刚毅地消灭了韩信、彭越等人的叛乱，保卫了西汉王朝的中央集权。在消灭异姓王的进程中，刘邦又封了一些同姓王，为后来的吴楚七国之乱埋下了根子。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奴隶主复辟的严重时期过去了。从刘邦、吕后，中经文帝、景帝，到汉武帝刘彻时进一步加强了统一和中央集权，标志着封建社会制度终于巩固了下来。它离开秦王朝统一中国又经过了整整一个多世纪。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对立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复辟和反复辟的阶级斗争，儒家和法家的斗争，始终非常激烈。历史证明，即使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光有一代人的努力也还不行，必须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今天进行的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更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长时期的斗争。地主阶级要取得反复辟斗争的胜利，就必须执行一条法家的路线，坚决反对儒家的路线，否则就有出现复辟和倒退的危险。我们今天要巩固社会主义江山，防止地主资产阶级复辟，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决反对修正主义路线。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经过赵高的反革命政变和项羽的倒行逆施的教训中，我们还可以认识到：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看，新制度终究要代替旧制度，即使反动派复辟的阴谋一时得逞，那也只能是短命的，暂时的。赵高政变，不到三年，很快就垮台了。项羽倒行逆施，也只能昙花一现。历史的车轮是不能倒转的。新的社会制度必然会在斗争中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是不可抗拒的。我们应当满怀信心地在批林批孔中加强团结，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第八期；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八月六日）

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

两千一百多年前，在我们伟大祖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初步统一的



封建国家，这就是秦始皇领导建立的秦王朝。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进步。然而，这样一个颇有新兴阶级革命朝气的王朝，在统一中国之后不久就灭亡了。

这样一个历史现象是怎样发生的？

历代的孔孟之徒，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了大量的谎言。他们把秦王朝灭亡的原因，统统归罪于秦始皇，归罪于秦始皇的法家路线。

这全然是对历史的歪曲！

沙丘反革命政变和秦始皇法家路线的中断

“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sup>①</sup>在我国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王朝建立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复辟反复辟的激烈斗争。统一以后，这种斗争并没有结束。奴隶主阶级复辟势力采取种种手段，进行拚死的挣扎。他们有的在朝廷和宴会上公开跳出来鼓吹分封制，反对郡县制；有的“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大造反革命舆论，诋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有的更名改姓，潜伏下来，伺机变天；有的甚至赤膊上阵，进行卑鄙的暗杀活动。混在秦政权内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野心家、阴谋家赵高，就是复辟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

赵高本是赵国旧贵族的后代。在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中，他全家成了秦王朝的官奴婢；赵高本人也做了宦官，“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这个家伙怀着满肚子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仇恨，采用韬晦之计潜伏在秦王朝内部，表面上装作拥护秦始皇，当上了秦始皇宠爱的小儿子胡亥的法律教师，“得幸于胡亥”，并且窃取了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的职务，篡夺了秦朝中央的一部分权力。秦始皇出巡的时候，他竟成为身边随行的几个近臣之一。公元前二一〇年，秦始皇出巡东方，当年夏天，到了沙丘（今河北平乡、广宗一带），突然死亡。赵高看见篡夺大权、改变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时机已到，立即跳出来发动了一场反革命政变。他利用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车马卫队和用来传达朝廷命令、征调军队的“符玺”大权，扣压了秦始皇临终给公子扶苏的信件，煽动和诱骗胡亥，威胁和拉拢李斯，伪造秦始皇的遗诏，逼死太子扶苏，禁闭并害死坚持秦始皇的法家路线的大臣蒙恬、蒙毅，立胡亥为秦二世。

赵高用反动的孔孟之道作为发动政变的思想武器。他引证儒家经典，说什么，历史上有的夺权政变，“孔子著之”，“不为不忠”，“不为不孝”；今天发动政变正合乎孔丘之“智”。他对胡亥说，始皇临死前没有分封诸子，不搞政变你就会“无尺寸之地”。他对李斯说，秦的丞相功臣没有“封及二世”的，都是被杀身死，而发动政变拥立“慈仁笃厚”、“尽礼敬士”的胡亥，就会“长有封侯，世世称孤”<sup>②</sup>。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几年之后，赵高如此明目张胆地吹捧孔丘，鼓吹所谓“仁”和“礼”，宣扬分封诸侯，这充分暴露了他复古倒退的反动儒家立场。在这个关键时刻，身居要职的丞相李斯，本来有可能搞掉赵高，粉碎复辟势力的政变阴谋，但却受剥削阶级自私自利的本质所制约，为了维护个人的名利地位，妥协动摇，铸成大错。李斯在帮助秦始皇统一中国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方面是有过重要贡献的，但也犯过严重错误。他在赵高发动反革命政变这个紧要关头，出于私心，向反革命势力退让、屈服，就是重大污点之一。

沙丘反革命政变后，秦二世胡亥完全成了赵高手中的一个傀儡皇帝。“事无大小辄决于高”。赵高独揽了大权，立即向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展开全面的反扑。他推行了一条“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sup>③</sup>的反动政治路线。这些所谓“余民”，所谓“贱者”、“贫者”、和“远者”，决不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动人民，而是那些被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和专政打翻在地的没落奴隶主贵族。这条路线，完全是孔老二、吕不韦“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克己复礼”的反动路线的继续。在组织路线上，赵高大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安插亲信，网罗死党，让他的女婿阎乐当上了首都咸阳令，他的弟弟赵成当上了郎中令。同时，“更为法律”，篡改了以坚决镇压奴隶主反动势力为重要内容的秦法。在秦二世元年初，“大赦罪人”，把秦始皇执政的时候关押的罪犯放出监狱。另一方面，则向秦始皇的法家领导集团进行血腥的阶级报复。儒家搞复辟倒退，从来是杀人不眨眼的，极其残暴狠毒的。赵高煽动秦二世“灭大臣而远骨肉”，“尽除去先帝之故臣”<sup>④</sup>，杀害了蒙恬、蒙毅、去疾、冯劫等著名的文武大臣和秦始皇的二十多个公子、公主。牵连受害者不计其数。最后，连李斯也没有被赵高放过，终于“腰斩咸阳市”，并“夷三族”。对各郡县地方官，也大规模地进行了清洗和杀戮。到了秦二世三年（公元前二〇七年），终于又杀害了秦二世，并且公然提出恢复分封制。

赵高篡权以后，还大大加重了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弄得“黔首振恐”。在埋葬秦始皇的时候，恢复了奴隶制时代的“人殉”，“后宫非有子者”“皆令从死”；甚至还把许多修坟的工匠活活封死在墓中，“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sup>⑤</sup>。这种惨绝人寰的残暴行为，是历史的倒退。他们恢复了阿房宫的修建，并征调五万人为屯卫，“令教射狗马禽兽”。“赋敛愈重，戍徭无已”。结果，京师的粮食草秣都严重不足，又从全国各地征调大量粮草入都。秦始皇的时候，为了发展封建农业经济，对从事农业劳动的比较贫苦的农民（当时叫“闾左”），规定的服劳役、兵役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赵高篡权后，就大规模地“发闾左之戍”，把日益沉重的徭役负担直接加在贫苦农民的头上。种种倒行逆施，都是想要使贫苦农民重新沦落为奴隶。他们还采用残暴的刑罚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刑者相半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sup>⑥</sup>。

这些情况说明，在沙丘反革命政变之后，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已经中断，而被赵高代之以复辟的儒家路线。赵高复辟集团虽然没有来得及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但它的倒行逆施，迅速激化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奴隶主复辟势力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矛盾、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矛盾。在赵高篡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公元前二〇九年夏天，爆发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很快就推翻了赵高、胡亥的反动统治。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的激化是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赵高篡权是秦朝灭亡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 驳“法家亡秦”论

秦王朝迅速灭亡到底是不是“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sup>⑦</sup>，推行了法家路线的结果？这是历史上儒法论争十分激烈的一个问题。历代的孔孟之徒常常利用这个题目攻击秦始皇及其法家路线。叛徒、卖国贼林彪也学着他们的腔调，写了“论秦”三条，对秦始皇的法家路线极尽诽谤诬蔑之能事。

孔孟之徒叫嚷说：秦朝的迅速灭亡，是由于秦始皇“穷兵黩武”，“内平六国”，“北却强胡”。林彪也攻击秦始皇“轻启战端”。

毛主席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秦始皇所进行的战争，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公元前二三〇年到公元前二二一年，在十年之内，以摧枯拉朽之势，消灭了关东六国的诸侯割据势力，统一了中国；一种是公元前

二一五年，派大将蒙恬发兵三十万北击匈奴。这两种战争，前者结束了封建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后者反击了北方落后的匈奴奴隶主贵族的侵扰，保卫了人民的生命财产，保卫了中原广大地区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两种战争都是正义的、进步的战争。消灭诸侯割据局面所用的“兵”，抗击匈奴奴隶主侵袭所用的“武”，都是完全必要的。“内平六国”，“北却强胡”，不但不是秦朝灭亡的原因，相反，正是它兴盛的两个重要条件。只有那些在社会制度上主张倒退，在侵略者面前主张投降的儒家无耻之徒，才会对此进行丧心病狂的攻击。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比起春秋、战国几百年的任何时候，战争都大大减少了。春秋时期的二百四十年间，仅在鲁史上有记载的，列国间的战争就有四百八十三次之多。到了战国时期，战争的规模更加扩大，次数频繁。其中很多是非正义的割据混战，给人民造成极大的痛苦。西汉的贾谊说：“诸侯力政，……兵革不休，士民罢（pí音皮）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sup>⑧</sup>。这段话，从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统一前后的实际情况，也是对儒家恶毒攻击的一个驳斥。

孔孟之徒的反动宣传说，秦王朝的迅速灭亡，是由于秦始皇“赋敛无度”。林彪也跟在他们屁股后面，攻击秦始皇“苛赋税”。

这是儒家反秦的老调。西汉的反动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信口开河，胡说什么：秦时“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sup>⑨</sup>。此言一出，竟成了后代孔孟之徒攻击秦始皇所引据的经典。一提起秦始皇的赋税徭役，便开口“二十倍”、“三十倍”地念下去，好不吓死人也。

儒家鼓吹的那个“古”，果然是那么“轻徭薄赋”么？完全是无耻的伪造！

在奴隶制度下，哪有什么徭役、赋税制度可言！那时候，千百万奴隶戴着沉重的枷锁被束缚在“井田”上从事艰苦的劳动，甚至被活活杀害作为“人殉”和“人牺”，他们连自己的身体都属于奴隶主所有，和牲畜一样，没有做人的权利，只是被当作会说话的工具。他们千辛万苦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手工产品，全部属于奴隶主。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历史上的一次大进步。秦国在商鞅变法以后，废井田，开阡陌，实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奴隶的劳动力，吸

引了关东六国的很多劳动人民跑到秦国去，这就说明在秦国的封建制度下人民生活比在有大量奴隶制残余的关东六国的人民生活好。秦王朝统一中国后下令“更名民曰黔首”，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从法律上承认了由奴隶逐渐变为农民的人们的新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在秦始皇奖励发展封建农业经济的政策促进下，生产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当然，秦朝是地主阶级专政的王朝，秦朝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是残酷的；但比之奴隶制度下奴隶的生活已经有了改善。这个历史事实是谁也抹煞不了的。

人民的负担是重还是不重，还要看当时社会生产发展的水平。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在位的十二年，不断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奖励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大兴水利工程，修驰道，通水路，统一币制，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等，这些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秦朝人民负担虽然不轻，而在秦始皇在位期间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并未激化到大规模外部对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生产有了发展。

秦统一前的封建诸侯割据的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虽然基本上已经建立了封建制的生产关系，但是生产的发展仍然受到诸侯割据局面的严重阻碍，人民的实际负担在社会产品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加以那时候，小国除了要维持自己的军队、国家机关和满足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以外，还常常要向大国奉献十分苛重的贡赋，这些负担全部落在小国人民的头上。即使是象战国七雄那样的大国，也常常征发大部分青壮年农民出征打仗，从事生产劳动的人少了，人民负担就不能不加重。比起封建诸侯割据时期的这些情况来，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人民负担，相对地说是减轻了的，又哪里有几十倍苛重的问题呢？在秦始皇执政时期，为了鼓励发展农业，规定贫苦农民（即“闾左”）每年只服劳役一个月，一生只做“正卒”一年，“戍边”一年。何况，秦统一后人民的负担中，有些是为了抵御匈奴奴隶主的侵扰。面对匈奴奴隶主的侵扰，是抵抗还是不抵抗？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抵抗，人民当然要有较多一些负担。可是，不抵抗，人民就势必要遭受更大的苦难。为抵抗匈奴奴隶主的侵袭而动员人力物力，这怎么能和诸侯割据混战时期的情况相提并论呢？

至于儒家说的什么秦始皇“残暴”，无非是指他消灭了六国诸侯，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焚书坑儒。林彪也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还别有

用心地攻击秦始皇“不民主”。其实，消灭六国诸侯，焚书坑儒，都是革命行动，是实现中国的统一，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所必需的，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秦始皇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农民当然也是实行暴力统治的；但儒家所说的秦始皇的“残暴”，显然并不是指这个方面，而是指他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镇压。其实，在我国历史上，最残暴的是代表没落反动阶级的儒家。儒家满口“仁义道德”，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却十分毒辣凶狠。他们对革命人民和法家的镇压和屠杀，手段之残暴无所不用其极。这帮反动家伙对革命人民哪里有什么民主？在他们拚命要恢复的奴隶制度下，奴隶主对奴隶有什么民主？赵高这个儒，代表着没落奴隶主势力，他上台后，就疯狂屠杀了大批法家革新派。他对革命的劳动人民的镇压，就更加凶恶了。儒家杀人的血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复辟势力上台，革新者就会人头落地，广大劳动人民更要深受其害；对于复辟势力，只有实行专政，实行独裁，才能巩固新兴的社会制度，巩固国家的统一。秦朝之所以灭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革命暴力运用得还不够，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镇压反革命不够彻底。这些反革命的儒、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存在，正是赵高篡权、妄图复辟的社会基础；也是后来乘农民起义之机大搞复辟活动的反动力量。

秦末农民大起义与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

马克思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sup>⑩</sup>。秦朝是地主阶级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从封建制度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对抗性的矛盾。这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应该从这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中寻找。

秦始皇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在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这一点上，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特别是他修造阿房宫、骊山墓，滥用了民力，妨碍了生产，激起劳动人民的反对。秦始皇在位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小规模农民反抗斗争。但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上还是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也正在不断调整，大体上是相适应的，生产力有所发展。秦始皇坚持法家路线，打击矛头主要指向六国旧贵族，指向以儒家为代表的复辟势力。“焚书坑儒”，镇压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是广大

农民所拥护的。当时，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还没有激化到大规模外部对抗的程度。

钻进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的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赵高篡权以后，中断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逐步推行复辟倒退的儒家路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社会性质虽然还没有根本的变化，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却大大加重了。这种奴隶主式的残酷压榨，使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激化起来，导致了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历史并没有按照复辟势力的代表赵高的主观愿望向后倒退，而是恰恰相反，赵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秦末农民大起义打击了赵高操纵的正在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政权，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同时也沉重地打击了奴隶主复辟势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历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这在客观上也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扫清了障碍。

赵高把持的反动政权是当时继续推行法家路线的主要障碍，不推翻它，社会就不能继续前进。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对于赵高的反革命行径曾经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斗争。在赵高篡权之际，蒙恬、蒙毅看出了赵高是“孽臣逆乱”，上书反抗。在赵高篡权之后，李斯逐渐认清了赵高的反革命狰狞面目，想要起来进行斗争，曾上书揭露赵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建议秦二世铲除这个国家的祸害①①。他们受时代、阶级和自己的思想的局限，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帝王身上，而不是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军事、政治力量进行斗争，不依靠当时整个新兴阶级的力量，更不知道也不可能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而且，大势已去，悔之晚矣！结果，不但无济于事，反而遭到复辟势力更狠毒的迫害和杀害。在赵高的反动统治下，“宗室振恐”，“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①②；但却没有一个人能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反对奴隶主贵族复辟的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了革命农民身上。农民革命的风暴一起来，赵高操纵的这个貌似强大的反动政权，就象纸糊的房子一样倒塌了。

“散处闾巷之间”的“六国公族”①③是推行法家路线的又一障碍。秦始皇当权的时候曾通过迁徙、收兵器、焚书坑儒等措施，对六国旧贵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防范和镇压。但是，地主阶级毕竟也是剥削阶级，它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对旧贵族采取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措施的限制性，不可能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

清除这些复辟势力。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这些以各种伪装潜伏在各地的反动家伙乘机纷纷跳了出来，也要“造反”，有的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企图借农民军的力量实现自己的野心，“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sup>①④</sup>；有的拥兵自立，割地称王；有的妄图用儒家的反动理论影响起义军领袖，以改变农民斗争的方向。农民革命的英雄们饱尝了诸侯割据的苦难，坚决粉碎了复辟势力“立六国后”的阴谋。农民起义军的杰出领袖陈胜坚决拒绝了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孔丘后代孔鲋要他“兴灭继绝”的反动说教，他说：“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毅然决然地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后来，由于六国旧贵族和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反动儒生的破坏和起义队伍本身的某些弱点，陈胜、吴广起义最后是失败了。但是，在农民大起义期间，奴隶主复辟势力受到了农民军的沉重打击。原关东六国各地仍然保存着的奴隶制残余也被进一步扫除。儒家的反动政治路线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在秦末农民战争之后，又经历了以项羽和刘邦为代表的儒法两条路线的大搏斗。这场大搏斗又以法家路线的胜利而结束。刘邦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在女政治家吕雉和法家萧何、张良等协助下，为创建和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封建王朝进行了多次重大的斗争。刘邦、吕雉以后，文、景、武、昭、宣几个皇帝也都是坚持法家路线的。他们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复斗争，基本上打垮了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打败了不断侵扰的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捍卫了新兴的封建制度和国家的统一。秦始皇开创的封建大一统局面，到汉武帝的时候基本上得到巩固。正是在秦皇、汉武这个时代，我国初步形成了强大的统一的国家，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唐晓文的文章《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研究儒法斗争史》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

批林批孔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随着这场斗争的深入发展，我们要对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的研究和总结，更好地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要完成这项艰巨的战斗任务，我们必须进一步认真攻读马



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批判修正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锐利武器，也是我们研究儒法斗争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根本指针。两千多年来，历代反动派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总是任意歪曲历史，千方百计地推崇儒家，诽谤和攻击法家。叛徒、卖国贼林彪，出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也继承了这套反革命伎俩，尊儒反法。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只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重新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才能把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积累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和丰富的思想资料。法家的进步思想，就是其中的一份珍品。我们不能割断历史，而应该批判地继承这份历史遗产，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从历史经验中，吸取对于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有益的东西。研究儒法斗争史，要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我们今天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绝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历史的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我们要注意总结历史的和现实斗争中带有规律性的经验，把历史经验作为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借鉴，更深刻地理解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具体分析不同历史时期儒法斗争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内容

毛主席教导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研究儒法斗争史，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向历史作调查，详细占有和分析材料，对历史上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

儒法斗争是两个阶级或两种社会势力之间的斗争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恩格斯说：“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

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德文第三版序言）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个上层建筑领域里两种政治、思想路线的对立，都是这个社会不同阶级、不同社会势力的经济利害、政治权力发生矛盾斗争的表现。春秋战国到秦和西汉前期的儒法斗争，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斗争的实质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主张变革、前进，要建立和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儒家主张守旧、倒退，维护或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西汉后期，奴隶主复辟的严重威胁逐渐过去，封建制度逐渐巩固，农民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这以后的儒法斗争，主要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促使了地主阶级内部分化：一部分人为了维护已经取得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反对继续变革，他们把反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经过一翻加工和改造，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成为地主阶级的顽固派；另一部分人，一般说来，没有取得特权地位或权益较少，他们不满现状，主张变革，坚持法家的进步观点，批判儒家的反动思想，对地主阶级的顽固派作斗争。这种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过去的儒法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续。同时，这种斗争又是和当时的社会阶级斗争紧紧连结在一起的。所以，研究儒法斗争史，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去考察。脱离一定历史条件下的阶级斗争，脱离社会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的斗争，就不可能了解儒法斗争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儒法斗争在我国历史上持续了很长时间，它的发展是一个长过程，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要认识这种规律性，就要把儒法斗争同社会其他各种矛盾联系起来加以分析，考察儒法两家在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各自所处的地位和斗争内容，以及各个不同阶段中斗争的特点和实质。儒法斗争不可能孤立地进行，它同社会各种矛盾总是相互影响的。在封建社会里，存在着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这一主要矛盾；此外，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内部也有大地主同中小地主之间、士族地主同庶族地主之间、中央专制集权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封建社会初期还有奴隶主复辟势力同

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封建社会末期，又有没落地主阶级同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矛盾；还有我国各族人民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主要矛盾的制约下，互相关联，互相作用。与之相适应，儒法斗争在民族压迫下则表现为投降同抵抗两条路线的斗争，此外又有兼并同反兼并、维护门阀特权同反对门阀特权、地方割据同中央集权、复辟同反复辟、保守同变革、卖国同爱国的斗争。因此，只有从社会矛盾的总体上、从各种矛盾的相互关系中，去了解儒法双方的具体情况，才能弄清儒法斗争的阶级基础和政治内容。

在儒法斗争的长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若干不同阶段呢？这是由于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这一主要矛盾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它影响的其他矛盾，有些激化了，有些解决了，又有些发生了。随着这种矛盾的变动，儒法斗争也就显现出阶段性来。秦汉之际，当奴隶主复辟势力严重威胁封建制度的存亡时，地主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就成为主要任务。被推翻了的奴隶主阶级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构成了这个时期儒法斗争的焦点和特征。西汉后期以后，阶级斗争的情况有了变化，儒法斗争就出现了新的内容和特点。因此，研究各个阶段上矛盾的变化，以及矛盾各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找出各阶段儒法斗争的特点，是我们认识儒法斗争规律性的基础。

正确看待法家人物的历史作用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关系

如何具体分析和评价历史人物，是研究儒法斗争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判断一个人不是以他对自己的表白、挂什么招牌为标准，而是根据他们的行动，看他们对历史起过什么作用，执行什么路线。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先辈提供了新的东西。”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决定，法家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但是，总的来说，法家人物是有历史功绩的。对于法家的作用，我们应当给以必要的历史的肯定，同时也必须指出他们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正确评价法家人物，需要多方面掌握材料，需要对他們做历史的、具体的、全面的分析。要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绝不可“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

法家人物的历史作用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劳动人民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主体，

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在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走向腐朽和反动而被推翻，都是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发展壮大，并同它们进行越来越尖锐的斗争的结果。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黑暗统治的斗争，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得到成功的。秦汉之际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事实证明，单靠地主阶级不可能粉碎奴隶主复辟势力，只有农民的革命斗争才是反对奴隶主复辟的主要力量。陈胜、吴广领导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推翻了赵高掌握的为奴隶主复辟服务的政权，打击了奴隶主残余势力，为汉王朝的建立和汉初消灭奴隶主复辟势力，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开辟了道路，显示了农民革命的巨大威力。法家的革命作用，集中表现在他们在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时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提出了一条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路线，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秦汉以后的法家，在维护地主阶级统治地拉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了一些调节和改革，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随着整个地主阶级走向没落反动，到了封建社会的后期，法家作为地主阶级一翼的代表，虽然能够尖锐地揭露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黑暗和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他们已经不能提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真正革命的主张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彻底推翻和改造旧社会的任务，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才能完成。叛徒刘少奇、林彪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根本否认几千年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根本否认奴隶们是历史的创造者。我们今天在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前提下，对法家人物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同他们的那种反动的唯心史观，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历史上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地位的新的剥削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总是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总是需要而且也有可能暂时地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因为这个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这一点来说，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

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来不及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从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作为矛盾的双方来说，他们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各自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但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农民阶级为矛盾的一方，同矛盾的另一方没落奴隶主阶级相对立时，这些阶级之间在利益上就有一些联系。同样，儒法斗争主要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时候，当代表地主阶级中地位较低阶层的法家同大地主、大豪强作斗争时，法家同农民群众之间也有某种利益上的联系。因此，当法家顺应历史的潮流，制定和推行革新的路线和政策，在客观上符合群众的某些要求的时候，他们的主张就能够得到群众的某些支持。“所以在变革发生时，被统治的多数或者是站在这个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或者是安然容忍这个变革。”(恩格斯：《(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在封建社会，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的封建统治和腐朽的儒家思想，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在农民起义之前或之后，往往会有一些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因此，肯定法家的进步性，正是从人民群众对法家的影响这个侧面，看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把法家人物的作用同劳动人民的作用混同起来或者绝对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

\* \* \*

当前，以亿万工农兵群众为主力军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也出现了良好的开端。在这场斗争中，必然会有种种不同的意见。还会有来自阶级敌人的造谣破坏，企图扰乱我们的阵线。这就更需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下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史。我们要通过研究、总结儒法斗争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联系现实的斗争实际，坚持看书学习，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我们要紧密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斗争中培养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批林批孔正在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引向深入，正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地发展。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让那些

咒骂批林批孔斗争的国内外反动派发抖去吧。中国无产阶级夺取这场斗争的胜利，则是确定无疑的。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梁效的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逐步深入，我国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遵照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的教导，正在广泛开展对于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研究。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夺得了政权的无产阶级，这样广泛地发动群众来研究和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还是第一次。这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列宁在谈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历史任务时指出：“我们不知道，我们胜利后是不是会出现暂时的反动时期、暂时的反革命胜利时期，这不是没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胜利后一定要挖上‘三道战壕’来防止这种可能性。”

（《论修改党纲》）为了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专政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在长期的、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不仅要善于从自己的斗争实践中积累经验，而且要研究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研究社会大变革时期的革命和反动、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特点。由于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异常软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且使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阶段，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历史上，一个阶级专政代替另一个阶级专政这种完整意义的社会变革，除了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以外，实际上就只有封建制代替奴隶制那一次。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在那场社会变革中产生的。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始终存在着尊儒反法和尊法反儒的斗争，这种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都把孔孟之道作为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儒反法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竟然把孔孟说成“先圣”，把马列说成“后圣”，极力

鼓吹所谓“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就必须彻底批判这种反动观点，彻底批判孔孟之道。

在我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时代，法家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在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过程中，与没落奴隶主阶级及其政治、思想代表儒家，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经过了一百三十多年。如果更早一些，从鲁国实行“初税亩”算起，则经过了三百七十多年。在这几百年中间，新兴地主阶级几度夺得政权，又几度失去政权。秦始皇统一中国，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从秦王朝建立，一直到西汉王朝灭亡，将近二百五十年中间，尽管奴隶主复辟势力逐步削弱，但是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始终没有间断。

正是这整整一个时代的革命和反动、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包括公开的和隐蔽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斗争，给我们提供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它带有我国社会历史特有的生动性和深刻性。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进行革命的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这些经验教训，来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现实斗争服务。

儒法斗争史告诉我们，一条正确的路线，并不是自发地产生的，而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先进阶级必须通过对反动路线、反动思潮的批判，通过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才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革命的路线，为下一步的战斗作好准备。新兴地主阶级在战国时期开始了自己的全面进军，变法的热潮席卷了各诸侯国。其中商鞅变法以其变革的彻底性在各国引起了普遍的震动。围绕着否定还是肯定这场社会变革，儒法两条路线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儒家代表人物孟轲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提出了一套鼓吹“仁政”的理论，其目的是要否定和推翻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复辟奴隶主专政。法家代表人物荀况、韩非坚决驳斥了孟轲的“仁政”的谬论，指出所谓“仁义”之说不过是“愚诬之学”，是反对变法革新的复辟理论，从而对各国的变法作了热情的辩护。这场论战，扩大到关于社会政治问题和世界观问题的广泛领域，推动法家路线进一步发展和完备起来。秦始皇坚决实践了法家路线，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始皇统一六国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也是那场大论战中法家批判儒家学说的直接成果。

秦王朝建立后，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新兴地主阶级能不能保持政

权，关键在于能不能保证继续推行法家路线。在这里，秦王朝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被推翻的奴隶主阶级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以古非今，向秦王朝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千方百计地要改变秦始皇的法家路线，颠覆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秦始皇坚决采取了“焚书坑儒”等革命措施，粉碎了奴隶主复辟势力的进攻，坚持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坚持了法家路线。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深刻地总结的：“从来的革命，除了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剥削制度代替非剥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为其结果的，他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作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秦始皇也不例外。正当他多少有点陶醉于“黔首安宁，不用兵革”这种太平景象的时候，奴隶主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赵高已经披着法家的外衣钻进了秦王朝的心脏，对地主阶级政权进行“挖心战”。秦始皇一死，赵高立即发动沙丘反革命政变，用一条“收举余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的儒家路线代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对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实行血腥的阶级报复。这段历史表明，地主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奴隶主复辟势力无论进行公开的斗争，还是进行隐蔽的斗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改变中央政权的法家路线。路线一旦改变，复辟也就打开了大门。因此，夺得了政权的革命阶级必须把路线问题放在首位，对于反动阶级改变革命路线的阴谋诡计，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坚持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导，记取儒法斗争史上这一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叛徒、卖国贼林彪就曾在他的黑窝里咬牙切齿地写下：“忍忿法——立大谋。立了大谋，才能忍小忿。九等九忍一狠”。林彪立的是什么“大谋”？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他采用“等”、“忍”、“狠”的反革命策略，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

赵高篡权和秦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表明，新兴地主阶级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可能把反复辟斗争进行到底的，反复辟的主要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因为新兴地主阶级毕竟是剥削阶级，在整个社会中只是占少数。他们与广大农民处于对抗的地位，当然不可能真正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反复辟的斗争。这正是新兴地主阶级政权不可避免的弱点。赵高篡权，地主阶级政治家束手无策。但是农民起义一爆发，局面



立即改观。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军“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在打击地主阶级统治的同时，不到三年就把赵高复辟政权送进了坟墓。恩格斯在总结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普鲁士“危机”》）同样，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中，反对奴隶制复辟的主要力量，也是广大农民和一部分尚未转化为农民的奴隶。这是他们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因为奴隶制一旦复辟，首先意味着广大农民将重新回到最悲惨的奴隶地位。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任何一次反复辟斗争，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都是不可能完成的。无产阶级专政是绝大多数人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必须依靠和团结广大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粉碎阶级敌人的复辟阴谋。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关于“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的教导，以及关于“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的教导，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在秦末农民大起义扫荡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基础上，新兴地主阶级的西汉王朝诞生了。但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在某些领域的力量仍然要比新兴地主阶级更为强大，他们在某些方面的斗争经验也比新兴地主阶级政治家更为丰富。他们必然要利用这些来同新兴地主阶级作反复的较量。西汉初期，有一批大工商奴隶主，利用当时的经济困难，囤积居奇，抬高物价，同地主阶级争夺土地和劳动力，破坏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这些大工商奴隶主同地主阶级中出现的保守派，也就是那些各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地方割据势力勾结在一起。大搞独立王国。他们纠集了大批儒生，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复辟舆论。他们利用手中的军事实力，发动武装叛乱。不仅如此，他们还常常勾结中国境内的匈奴奴隶主贵族，企图用两面夹攻的方法来颠覆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所有这些都造成了西汉时期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在西汉的前期和中期，斗争就在这几条战线上激烈地进行着。经过汉景帝时削平吴楚“七国之乱”，再经过汉武帝时对奴隶主商人进行全面反击，以及抗击匈奴战争的胜利，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才算稳定下来。这说明，即使在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社会变革中，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也是长期的和复杂的，并且是在各个领域中的进行的。被推翻的

阶级只要还有一点力量，总要进行复辟的尝试。阶级斗争的这种规律是不会改变的。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时说过：“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在我们研究儒法斗争史时，重温毛主席这一科学的历史经验总结，感受就更深刻了。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人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世界上还有敌人存在。

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坚持了法家路线。秦始皇死后，法家路线就告中断，而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历经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同样是处在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这显然和秦末农民战争扫荡了奴隶主贵族的残余有关，和汉初的阶级力量对比有关。同时也不可否认，这和西汉王朝在中央政权中长期保持了一个法家领导集团有很大关系。刘邦从秦王朝的灭亡中，认识到中央领导集团的极端重要性。他坚持法家人物路线，在斗争实践中选用人才。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象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即使发生了武装叛乱，也能够加以削平。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那些奴隶主复辟势力才把中央机构中的法家领导集团看作它们进行复辟的最大障碍。吴王刘濞提出“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就是为了打着拥护中央的旗号，搞掉在中央决策的法家人物，搞垮中央的法家领导集团，从而根本改变整个西汉政权的法家路线。毛主席总结了儒法斗争史上的这一重要经验，指出：“自从汉朝的吴王刘濞发明了请诛晁错（汉景帝的主要谋画人物）以清君侧的著名策略以来，不少的野心家奉为至宝，胡风集团也继承了这个衣钵。”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那些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根本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也往往采用这种“清君侧”的反革命策略。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在《“5 7 1 工程”纪要》中，不就是叫嚣要打着革命的旗号，打击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革命力量吗？“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我们要善于识别那些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

一直到西汉的前期和中期，封建统治者实行的还是法家路线。但是，地主阶级反复辟的目的仅仅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而不可能再给自己提出新的革命任务了。汉初的曹参在继肖何当了丞相后曾对惠帝说：“高帝与肖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这段话典型地反映出一个事实，就是这时的地主阶级虽然仍坚持法家路线，但已不象阶级斗争狂飙时期的法家那样具有鲜明的革命气息了。它的革命性在逐步消退。西汉以后，随着奴隶制复辟的危险逐渐成为过去，地主和农民的矛盾日益尖锐，地主阶级逐步从真老虎向纸老虎转化。法家思想已经开始为地主阶级所厌恶，而经过适当加工改造的儒家思想则适应了他们的需要。这种转化是一个剥削阶级所不可改变的历史命运。而无产阶级则不同，它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它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因此，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正如列宁指出的：“我们的‘防止复辟的保证’是把革命进行到底”。也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能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只有在政治、思想、经济各个领域中长期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

封建社会中后期，儒法斗争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变化。儒家学说成为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法家则失去了新兴阶级代表的资格，成为地主阶级中的革新派。法家在不同时期，针对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所提出的某些改革的主张，他们坚持统一、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主张，他们对于孔孟之道的揭露和批判，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文化科学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独立，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们不可能解决封建社会的日益尖锐的基本矛盾，不可能为封建制度找到一条出路。他们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批判孔孟之道，但是不愿或不敢同孔孟之道彻底决裂，甚至不敢公开打出法家的旗号。他们虽然进行斗争，但是在斗争中已经不再象西汉以前的法家那样对前途充满信心。由于儒家在封建社会中越来越占统治地位，因此法家也越来越受到儒家的压制、打击和迫害。宋代以后，这种情况就更加突出。任何一点小小的改革，都被看作

是洪水猛兽，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无限惊恐，立即加以扼杀；任何一点新的思想，也都被封建统治者当作是异端邪说，千方百计地加以扑灭。整个封建社会的儒法斗争表明，尊儒反法思潮在中国代表着最反动最黑暗势力的利益，这种思潮始终是社会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障碍。如果不用极大的力量来批判这种反动思潮，革命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能前进。

历史上的法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情况下，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他们不可能自觉地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可能认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而无产阶级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指导，能够认识和自觉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能够进行彻底的革命。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客观规律的科学反映。虽然我们斗争的任务是艰巨的，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只要我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不断胜利前进。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普遍规律，可以加深我们对现实阶级斗争规律的认识，进一步锤炼我们的阶级斗争观点，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是我们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根本目的。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彻底批判儒家的反动思想，正确评价法家的历史作用，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前面还有许多工作等待着我们去。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再接再厉，继续努力，把这一工作做得更好。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十月一日，第十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一点意见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405 页）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毛泽东的指示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410 页）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同邓小平在长沙的一次谈话（节录）

（未经邓小平核对）

（毛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

（邓：主席也知道了。）

好！

（邓：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我赞成你！

（邓：她〔指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

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用手指王、唐）都不高兴。

（邓：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

这个好。

（邓：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罗。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唐闻生、王海容的记录稿。）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在江青的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94 页）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

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

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1 1.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47-348 页）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继续搞好批林批孔》

当前，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各条战线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

形势大好，还要不要把批林批孔运动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呢？要。继续搞好批林批孔，正是毛主席、党中央历次指示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才能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新的胜利。

大好形势是在斗争中得来的，是批林批孔的结果。在这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中，我们批判了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孔孟之道，提高了亿万群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阵地，有力地推动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批林批孔运动，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深远影响，已经而且将要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没有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斗争的胜利，没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好形势。任何自满、松劲的情绪都不利于继续搞好批林批孔，不利于继续发展大好形势。

“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他妄图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一些谬论，还需要更深入地批。这对于加强团结，非常重要。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对于孔孟之道已经广泛地进行了批判，要彻底清除它的影响，还要经过长期的斗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必须坚持下去。批林批孔紧密联系各条战线的斗、批、改，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扶植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更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的批判，不是差不多了，而是要继续下功夫、用力气，继续批判，切切实实地抓紧抓好。我们要

乘胜前进，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应该放下批判的武器。

继续把批林批孔当作头等大事，这对于能否发展大好形势，关系很大。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我国国民经济正在出现蓬勃发展的新形势。我们要抓紧有利时机，努力工作，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牢记毛主席“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坚持抓大事、抓路线。经验证明，要搞好生产，最根本的是把革命搞好，把路线搞对头。革命搞好了，路线对头了，群众团结了，就能把生产促上去。革命搞不好，路线不对头，团结搞不好，生产就上不去。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坚持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经济，统帅业务。越是任务重，工作忙，越要注意抓好批林批孔，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生产是这样，其他各项工作也是这样。

当前，我们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要进一步提高认真看书学习的自觉性，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才能对修正主义和孔孟之道进行深刻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才能科学地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真正做到古为今用。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状密切结合起来。在这里，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键。搞好学习，就能使理论和实际、历史和现实结合得更好，把批判的水平提高一步，把运动推向前进。

“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有许多创造，为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闯出了路子。我们要深入下去，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批判，抓好典型。要善于发现和总结群众的新经验和新创造，及时地推广到面上去。要发挥工农兵理论队伍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战斗作用，使他们在斗争中得到巩固和提高；同时采取多种方式，使专业理论队伍同工农兵理论队伍更好地结合起来。运动在前进，新情况新事物不断出现。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革命团结，就能使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进一步促进生产。让我们用革命和生产的新成就，迎接一九七五年的到来！

## 研究资料

姚保钱口述：《有关“某军长为江青牵马提鞋以示效忠”的一段往事》

作者：陈寒鸣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在“揭批‘四人帮’”时，天津乃至全国都曾有过“江青插手部队”，而“某军长则为江青牵马提鞋以示效忠”的说法。尽管近三十年过去了，这说法已很少有人提及，但也从未见有人说其真伪，以致沉封于历史之中，渐渐为人忘却。至于当年听过这说法的人，耳食之余，多信以为真的。

我便是听过这说法人中的一个，但由于搞史学研究的缘故，凡事总喜刨根问底，追究其可信度，故而对此说法亦采取存疑的态度，只是始终没有机缘与亲历其事者交谈，难明真象了。2007年暑期，为避苦夏而到蓟县山中小住，幸遇原24军军长姚保钱，与他闲谈中聊到这事，问他可曾听到过这说法，当时的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

“岂止听过？你算问对人了，我当时担任66军的参谋长，还是这事的亲历者呢，只是这事的真象完全不是传说中的那样！”姚老很爽朗地说。

“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好奇地问。

于是，他向我记述了与江青有关的一段往事：

事情发生在1973——1974年间“评法批儒”运动期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江青与纪登奎（时任政治局委员、北京军区政委）、于会咏、庄则栋、浩亮、刘绍裳及北京大学冯友兰、周一良教授等一行到天津对当地“评法批儒”情况进行调研。一日，纪登奎突然来到66军军部。当时，正在召开常委会，时任66军参谋长的姚保钱自然在会场中。纪登奎对大家说：“江青同志打算到部队来看看军事表演，你们这两天就抓紧准备一下吧。”并布置道：“你们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要亲自去部署。”由于66军所辖的196师是开放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来华访问的外国友人经常来观看该师的军事表演，接待各方来访者是很正常的事，故而与会者对此并未感到有什么特别之处。

两天后的上午，江青等在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



66 军军长刘政等的陪同下乘专列到达杨村机场。姚参谋长和 66 军政治部王克主任及驻于杨村机场的空六军领导将江青等迎接并带到 196 师的接待室。不久，纪登奎等一行人也来到这里。在接待室，江青提议，与 66 军、空六军的陪同人员及一些文艺女兵大约八十余人开个同乐会，其间江青对大家说：“我代表毛主席来问候你们！”并为活跃气氛还率先邀请浩亮清唱了一段《红灯记》。

吃午饭的时候，加上陪同人员共三四桌，桌上没酒，倒是落坐后，江青主动问：“有没有香槟酒？我想敬大家一杯。”席间，有人问江青：“吃饭后是先休息一下，还是直接看表演？”江青说：“不休息了，直接看表演吧。”于是，姚参谋长和 196 师副师长张胜贵因要安排军事表演，未等午餐结束就先行到表演场去了。

午餐很快就结束，江青等立即来到靶场，先看了阅兵式，然后观看步枪、轻重机关枪、冲锋枪、排击炮射击以及其他一些战术表演。战士们的射击成绩都很优秀。请江青打靶，她愉快地和大家一道打了几枪。

靶场表演结束后，要转到二三公里以外的另一个场地去观看侦察小分队的军事表演（“抓舌头”）。当时调转汽车不便，就准备了几匹马，请江青等几位主要人员骑过去，其他人则徒步走到表演场地。这样，由姚参谋长带路，纪登奎、解学恭、刘正及江青的警卫陪着，江青等先行到达表演地。一路上，姚不时回头看，江青很随和地说：“我没问题，你自己要注意安全。”到观礼台前，江青从马上下来，刘正把江青所骑马的缰绳转交给饲养员，然后便陪同江青等人上了观礼台。记述至此，姚老笑着说：“真没想到就这么一个过程、一个举动，后来居然被讹传为‘某军长为江青牵马提鞋以示效忠！’”

观看完侦察小分队的精彩表演后，江青等来到附近部队的宿舍，她在战士的双人床上坐了一会儿，问问战士“辛苦吗？”“伙食怎么样？”“想不想家？”“都有些什么业余生活？”随后，她又到宿舍外的战士俱乐部与士兵打了一会儿乒乓球。

参观结束后，江青很高兴，写了四句小诗：“六十六军战斗队，能文能武啥都会。能文赛过汉隋陆，能武赛过管周退。”她把这小诗送给了刘正，以表示对 66 军的感谢和敬意。

下午四时许，江青等离开营区到杨村机场去了，而 66 军领导都只是就地话别，并未送到机场。

姚保钱口述 陈寒鸣整理

朱永嘉：怀念周恩来——兼念徐景贤

朱永嘉(2009-03-08 16:59:27)

昨天三月五日是周恩来诞辰一一一周年纪念日，从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离开我们远行迄今已有三十三年了。我见过周恩来晚年的身影，他始终在我脑际萦绕。记得在七四年十月间，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过春节，他们找我与王知常一起去汇报写作组的工作，谈话间，张春桥说总理曾提出要徐景贤与我一起去北京，让徐参加文化部的工作，让我去参加科教组的工作，多管一些教育方面的事，会上江青不赞成，她说把他们都调到北京来，将来需要文章的时候，找谁啊！所以，这件事也就搁置下来了。当时，王知常在寝室对我说，人在事在，人亡政息。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不希望我离开上海写作组的工作，从我自己讲，我也不想离开写作组，因为写作组有一个班子在，而且有复旦和师大这二所大学的文科作支援，更有自己的刊物作阵地，报纸也能呼应过来，上面有徐景贤给我撑着，方方面面如鱼得水。一个人去北京，面对完全陌生的环境，京官难当啊！我这个读历史的还多少懂一点，那时上海的干部如石西民、金冲及、沈竹去北京后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根本就不想去，既然江青给我挡住，我是高兴的。对总理能够想着徐景贤和我，我还是感激的，心里有一种知遇之恩。总理日理万机，怎么会想到上海有我这么一个人呢？而且在此之前，我与总理没有任何个人之间的来往，当时我一直在反来复去地思考为什么那时总理会想着徐景贤与我？还有一件事，去年香港出版了一本介绍于会泳的书，书的题目叫《走向毁灭》，介绍于会泳的经历，于会泳出身于搞民族音乐的专业创作，后来从上海调北京在江青身边搞样板戏音乐创作。我见过他几次，但关系不深。我身边用了一个贴过他大字报的高义龙，为此他还很不高兴。我对高义龙说，你尽管在文艺组工作，只要不在外面太张扬，我能保你平安无事。所以我与于会泳的关系淡淡然，说不上好，也谈不上坏，各人工作的方面也不同，大家河水不犯井水。但是在这本书的第四章中讲到四届人大国务院文化部部长人选的时候，周总理提出正式恢复文化部，并说有人提名让沈雁冰（茅盾）来任文化部长，遭到江青与张春桥的反对，于是周恩来提出“徐景贤行嘛！”张春桥也反对，张说：“上海的工作离不开徐景贤。”周恩来接着说：

“那么我不调徐景贤，调朱永嘉来还不行吗？”结果张、姚还是舍不得我离开上海写作组的工作。毛不让江青参预四届人大的组阁，但总理安排各部人选时，还不得不考虑江青的情绪，所以在张、姚的系统中，找一二个还比较能办事的人去国务院工作，也便于相互沟通。所以才会在上海的干部和知识分子中挑选徐景贤和我，这是不得已而求其次，求得大家都能融洽相处，当然文化部长最终还是于会泳去当。其实谁去当文化部长，在那个时候都是放在火坑上烤呀！我是无法侍候好江青的，也很难与迟群相处得好，这次实在是逃过一劫。事后回想起来，虽然当时没有人告诉我上面讨论人事问题的具体情况，但在四届人大会议时，于会泳对我特别热情，几次到我住地来看我，毛泽东去世时，我去北京参加追悼大会，他又二次来住地探视我，过去从未有过那样的热情，七五年于会泳来上海，看到我在上海组织歌泳大会，他感到这种形式很好，立即去北京推广。但现在想来，这一切都事出有因吧！大概因为他顶了我那个位置。其实不然，否则的话他的处境或许是我该受的，现在想来他可是我与徐景贤的替死鬼。所以事情的得与失，幸与不幸都很难说，不管怎么样，总理这番知遇和盛情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啊！然而我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周恩来为什么会记得和想着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呢？他是从哪儿知道我的呢？

由于过去我并没有直接与周恩来面见和交往的机会，我只能从与周身边的人的接触过程来思考了。我记得江青在六七年四月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的那篇“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稿上，讲到姚文元写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章，毛在姚的名字旁加了一个括号，说：“及其组织的写作班子，”那就是我们那个罗思鼎小组，毛所以会加上这一笔，那当然是姚向毛报告的。六九年我们去北京参加国庆二十周年的观礼活动时，姚的夫人金瑛也在内，那时我们都住在中南海，周的夫人邓颖超特地到住地来探视我们，这样金瑛与我一起都与邓在中南海我们住地的院子内交谈过。这些事，或许在周的耳边多少留下一点印象。六八年九月以后，姚让我们在上海成立《红旗》组稿小组，那是经毛批的，以后我与王知常，肖木三个人，在上海为《红旗》组织大批判文章和总结斗批改的经验，那时我们与文汇报社一起组织的关于乡村赤脚医生的报导，与新华社上海分社搞的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经验，以后又让胡锡涛搞的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经验，后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召开的理工科大学座谈会纪要，文科大学座谈会纪要，

这些都是我在旁做组织工作，复旦理科和文科的几个试点也都是我通过朱惠民在具体抓的，这些情况我都比较熟悉，我抓这些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便是根据毛《实践论》的思想，强调课堂教学的整个过程中，学生一定要亲自在动手参加实践的过程中接受知识，不仅学习知识，也要学会如何动手做事的能力，所以同济大学五·七公社的经验是强调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让学生带着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在复旦理科我强调学校办工厂，让学生结合生产课题中的问题进行学习，那是带了问题学习系统的知识。复旦物理系便办了四一电子工厂，生物系结合农业生产实践的问题，数学系也到工厂去结合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讲数学，连苏步青、谷超豪也去了江南造船厂，大学者下厂也确实帮助工厂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那些经验还都登了报，因此这些点上的情况，由于我参加了座谈，听过汇报，改过稿子，所以让我讲这方面的事，如数家珍，可以说得有理论有实际，不仅头头是道，而且一清二楚。七一年时，总理派刘西尧到上海来了解教改的情况，这个事本来应该是文教组去汇报的，文教组的头头是警备区来的，叫杨一民，他不懂行，一点也讲不出来，他只能拖着我去向刘西尧汇报。那次我在东湖宾馆给刘西尧足足汇报了二天，到了第二天他是频频点头，赞不绝口。也许刘西尧回北京，向总理汇报教改方面的事，给他留下了印象。以后北京和外地来的头面人物，要了解上海一月革命和文教方面的情况，我成了接待员，如鲁迅的兄弟周建人到上海来，我也陪了他二天。

另一次是七四年的夏秋之际，在北京召开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我是上海代表团的团长，实际组织这次会议的是总理身边的李琦，在宾馆我住的房间与他是贴门相对，所以二个人一来一往便熟悉起来，在五七干校时，他与金冲及在一起，他对石西民从上海带去北京文化部的金冲及与沈竹都很欣赏，那时金冲及与沈竹都在文物局王冶秋手下，成了他的得力助手。我在李琦房间与他闲聊时，他给我说金冲及这个人你们想不想收回去，他想回上海啊！这个话我就很难说了，因为这个问题，我做不了主，从我个人讲，我当然希望他回上海，我的担子可以轻许多了，但这要张春桥、姚文元作主的，我既不能点头，也不能摇头。李琦看我不说话，他说你们不用我用了，所以金冲及会一直在他的手下。过去有人说过，士大夫用则似虎，不用则似鼠，这个话有一定道理。金冲及在文化部，确实埋没了他的才学和能力。到了李琦那儿便有充分的机会施展他的才能了。幸与不幸决定

于机遇，知识分子看重知遇自己的人，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这话还是有道理的。在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要讲什么独立性，实际上还是空话。总还要依附在一张皮上，不是这张皮，便是那张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没有了，那张皮上的毛就倒霉了，我的结果也就是这样。话再说回去，在七四年秋天北京召开的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上，我也作了一个发言，讲思想发展中源与流的关系，我借用的还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讲的精神，历史上的思想资料只是流，不是源，许多人把这个关系颠倒，把过去的思想资料当作源泉，这是误解，吸取什么，发扬什么是现实的需要，必须落脚于古为今用。他听我这个发言后，大为赞赏，说我讲在点子上。总理虽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总理应该知情的吧。文化部长，总理只能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边的人中排，所以排徐与我，只是与于会咏比，那个好使唤一些罢了，关键是要江青点头，江青当然要挑选于会咏，毕竟他跟江青久了。即便如此，我与徐对周都有一种知遇之恩的感觉，这种情感徐在《十年一梦》中反映得很清楚。徐得以保外就医提前出狱，还是由于邓颖超的援手，这一切都是看在总理的面上。

至于说我们在批林批孔中，影射攻击周总理的问题，那真是冤者枉也，根本没有这回事。批林批孔就是为了解决林彪事件所留下的恶劣影响，林彪是尊孔的，林立果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诅咒毛是秦始皇，是暴君，毛是反孔的，尊法反孔是毛一贯的思想，批林批孔就是那么回事，没有其他的用意。抓了“四人帮”以后，我们成了清查对象，所以会提出批周公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声讨影射史学，其实只是为了借此激起群众对“四人帮”的仇恨而已，但在清查运动中把我们写作组给整苦了，后来在审判我们时，这一条根本就不提了。因为，完全没有事实依据嘛！再说影射史学这个概念作为贬义词也不能成立，它只能是中性的，人们为什么要读历史，那是为了以史为鉴嘛，结合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来解剖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为未来指明方向这本来是人们阅读和研究历史的出发点。什么为历史而历史，那只能钻牛角尖，只会把历史研究引入象牙塔的死胡同中去。批了影射史学实际上害苦了历史研究。现实生活的问题需要借助历史来为其指明未来方向，历史、现实和未来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啊！批影射史学不仅害苦了大陆的史学工作者，而且还害了海外的一些史学名家，跟着一起说错话，真是以讹传讹害人不浅。

说我们反总理的另一件事，便是我们对周培源那篇强调要加强基础理论的文章持保留态度。事实上我们并不是反对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我们认为应该加强，但毕竟是少数人干的事，不能大家都去做扬振宁、李政道啊！多数人应该到生产实践中去，从那里提出研究的课题，为生产服务，这实际上是如何处理应用与理论研究之间关系，这根本说不上什么反总理的问题。事后为了消除误解，我们还请周培源来上海一叙，是徐景贤与我一起在锦江饭店与周培源共进午餐，大家都很高兴，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借题发挥，无非是为了讨好什么东西，说来也实在无聊。

最后我还得说，对周恩来总理我还是尊敬的，有感情的。一九七二年九月底，中日建交以后，周总理陪田中角荣到上海，在中苏友谊馆的宴会厅，举行宴会，我也在场，总理到各个桌子祝酒时，他跟我碰杯，还特意说了一句保重身体。啊！那时我因胃出血刚从华东医院出来，医院打报告要给我作胃切除的手术，张春桥不同意，这大概是徐景贤告诉总理的。宴会结束后，他还召集市委常委去锦江对面的锦江俱乐部会议厅接见大家，还特意通知我去，我们坐定以后，总理说今天他请客，每人一盒紫雪糕，接着便给我们传达了毛泽东与田中的谈话记录，这一天他很兴奋。第二天徐景贤还告诉我，他把我们编撰的《战后帝国主义经济》一书送给了总理，总理很高兴，并说以后有这方面的书都要报送给他。我让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知识青年自学丛书，总理知道了，立即让总理办公室打电话到上海，即送他一套。总理去世以后，我自己去市革会在外滩的大厅布置灵堂，我还去党校那儿布置灵堂，因为那里是我们历史组工作的场所，写作组的成员对总理的去世都是非常沉痛的。我们大家到现在还在怀念周恩来总理，很多人都还在，历史的真相总还是能够说清楚的吧。那些没有根据的胡言乱语，随着时间的检验，终将灰飞烟灭，对许多事，历史自会作出公正的裁决，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恽仁祥：《我亲历的批林批孔运动》

关于批林批孔

1973年7月，毛主席在对王xx、张xx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毛主席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复辟倒退，而提出“批

林、批孔”。1974 年中央决定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并发了批林批孔的中共中央 1974 年 1 号文件，附了《林彪与孔孟之道》附件材料。发至全党，至同年 6 月结束，历时半年左右。

批林批孔，在近 30 年是走资派、文痞全部否定的。主要论点是：批林批孔是“四人帮”利用毛主席的讲话，背了中央发动的；批林批孔中“四人帮”反对周总理“组阁”，阴谋夺权；“四人帮”批林批孔反周总理，即批林批孔“批周公”。但事实究竟怎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重大事件纪实》一书：“(1974 年)1 月…25 日，江 X 等人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江 X 等人俨然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出现，置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于被领导、被指责的地位”。(参见第三卷第 1712 页)。

本人能查到的这一段内容的证据是王 XX 交代材料(参见“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第七页)。再没找到旁证。

凭记忆，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召集并主持召开的，所谓江 X 等人不经中央同意……。不符事实，江 X 就没有到会，但有一段插曲：会议迟迟不开，后来听说是叶剑英一直等江 X 给他写的信，信一到，会议开始。江 X 给叶剑英的信，成了叶剑英动员军队批林批孔的组成部分，向下传达也是这样，还包括江 X 给其它单位的信，都是部队动员批林批孔的组成部分。叶剑英把江 X 的信作为动员在京部队批林批孔的重要内容，就不知“精英”该作何评论？本人的看法是，叶剑英在军内搞揭批“四人帮”，指导思想形而上学猖獗，“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但唯独江 X 给他本人的信，他可一声不吭，如果硬要说江 X 插手军队批林批孔，则事实是叶剑英请进来的。叶剑英作为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主持、领导全军批林批孔运动这一事实，证明江 X “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是无中生有。明明是叶剑英自己主持、召开的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就不知是否经过中央同意？然而在中央下发的关于江 X 等人“罪行材料”竟篡改改为“江 X 等人不经中央同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对江 X 作了伪证。同年 3 月 8 日，中央军委通知国防科委、七机部，向中央军委汇报批林批孔运动情况。这个会议，也是叶剑英主持召开的，听取汇报的其他

军委领导同志有王 xx、邓 XX、张 xx、陈锡联、苏振华。会上，王 xx 和张 xx 讲不少话，但都是狠批了陶鲁笱同志；邓 XX 讲了话，叶剑英最后总结性发言，对下一步怎么搞作了指示。这进一步证明，军队的批林批孔，不仅是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动员的，而且也是他亲自领导、检查、督促下开展的。足以证明，走资派、文痞，上述对批林批孔的污蔑，只能是背石头砸自己的脚，并暴露了他们尊孔、保林的真面目。

1974 年初，听了叶剑英对驻京部队作的批林批孔动员报告，包括关于批林批孔的 1974 年中共中央 1 号文件，和附件《林彪与孔孟之道》的传达。当时，1 号文件和附件，每个支部仅一份。几十个人一份材料，而又是孔孟的老古董语言，显然影响运动开展。加上林彪最亲密战友聂荣臻追随林彪，蓄意捏造假案，大抓“反林”、“反聂”“国防口 5.16”，本人深受其害，然而科委的批林和批林彪死党王秉璋、梁军搞得冷冷清清。借此讲几句题外话，说我“反林彪”、“反林彪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纯属捏造，说心里话，当时敢反他们吗？不敢；而且也不知道他们那么反动。但他们明显错了的地方，批评几句是正常的。前面讲了叶剑英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直等到江 X 给他写的信送来后才开始。因此，便认为中央是否分工江 X 负责这个运动。而提笔给江 X 写了一封信，反应科委批林没有搞好、批林批孔的材料太少，并如实简要介绍了我被林彪集团迫害的情况。信写好后，敞着信封交给了正在主持核心组会议的核心组组长刘毅民手里。他当即看了信的全文(注：全文较简短)，提出了修改意见。我按他的意见当即作了修改，又交给了他。他怎么交给江 X 的？本人至今不知道。约半个多月后，正好是星期天，上午约 10 点多，我在菜市场买菜，中央办公厅两位同志在本所一位同志陪同到菜市场找到我，说：江 X 同志给你写了信，并送来 100 份《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我接过信便回所，把信交给了刘毅民，两人一道看了信的内容。他说要把信送科委领导看，我表示同意。科委领导看完后，刘毅民批了把信复印了好几百份，并铅印了一批。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给了我 3、4 份，其余都是他们分发掉的。约过了 3、4 天，政治部告诉我周总理指示：江 X 同志的信，铅印件可以下发，影印件不要下发。又过了 1、2 天，政治部告诉我：王 XX 要看江 X 同志的信，并指定政治部领导陪同我把信送到中南海西门传达室。又过了 2、3 天，政治部把信给了我。看了信，发现王 XX 改了信中一个字(笔误)。不久，



国防科委常委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群众大会，传达江 X 的信。这就是江 X 给我写信的全过程。

我接到江 X 的信，思想上一是高兴，我这样一个土老儿出身的，毛主席夫人江 X 同志亲笔给我写信，感到高兴是很自然的。二是感到压力大，怕犯错误，给党和革命造成损失。我对我哥哥的一段讲话，概括了这种心情：俗话说“树大招风”、“人怕出名，猪怕壮”。我就是在这种心态下主持全所批林批孔运动，加上主管行政工作的领导因病住院，所以还兼管全所行政工作。

很快，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党委书记陶鲁笏同志，和科委副主任、党委常委委员钱学森同志来本所蹲点。在他们亲自指导下，情报所的批林批孔运动，比较顺利，本人也深受教育。

他们一再强调领导干部多作自我批评，尤其要带头检查资产阶级派性。所谓“领导”被“领导”，是相对的，当领导的如果不首先领导好自己，领导工作是做不好的。所以，从此自我批评成了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处理问题时，首先适身处地的考虑一下，凡自己做不到事，决不强加于人。也举个例子，我主持全所住房调整，我在全所动员大会上讲：我是住草房长大的，一个人睡着了，仅占一平方米的地方，希望大家在住房不宽裕的情况下，互爱互让。有同志站出来问我按什么标准分房？我明确答复按普通群众标准分房。最后，我选择了有的人不肯去住的房子，我搬去住了。结果几百户的住房大调整，很顺利完成。

2、要求我刻苦学习，向书本学习、向群众学习。使我在工作期间，每晚处理完公务后，坚持 2 小时以上看书学习，没有间断过。工作中考虑一项重要安排时，大多反复召开干部、群众座谈，广泛听取意见，尤其涉及大部分群众利益的问题，更是如此。一旦形成党组决定，贯彻就较顺利，即便碰到点阻力，也容易解决。

3、一再提醒我正确对待犯有错误的干部问题，特别强调团结反对过自己而被证明反对错了的同志一道工作。坦率讲，这个问题嘴上好说，实践起来不容易。如果观察一下社会，会发现凡走资派、文痞决没有这个品质，他们所具特点是老子天下第一、老虎屁股摸不得，拉帮结派、搞阴谋、搞分裂，排斥异己、打击报复。而情报所在这方面，不少同志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归功于陶鲁笏和钱学森两位同志的指导。因为在我发表的文章中介绍了本人这方面情况，就不重复了。在此谈谈我对大字报的态度。

贴我的大字报，有两次是林彪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的“聂常委”（即以林副主席最亲密的战友聂荣臻为核心的科委党委常委，以下称聂常委）派驻情报所的“军管组”、“工作组”有预谋精心策划为制造假案（具体情况我在“从国防科委文革看中央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一文作了介绍）煽动的。这两次大字报都有上百张以上。我对这些大字报的态度是：凡以批我为名，而恶意凭空捏造事实明目张胆攻击毛主席的，并造成极坏社会影响的，本人在下面本文中会明确表态应依法追究，但这类大字报极少，仅 4、5 个人，是一小撮；其中大量是“跟形势”写的，但有不少善意的批评意见，我都详细看过；也有少数很有水平的大字报，看了很受感动。除了这两次大字报外，平常有些同志对某项工作有意见，也断断续续读有些大字报，对这类大字报根据实际情况，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有帮助。我本人思想上，不怕群众贴大字报，对我起码有三大作用。一是工作中有差错能及时被发现，对群众关心我的工作，内心很愉快；二是有些大字报意见不一定正确，但说明有些工作没有向群众讲清楚，没有能变成群众自觉行动；三是，也确实有极个别的大字报，因为个人私利没有达到而写大字报的，对这类情况就是做思想工作。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怕大字报是无法理解的，我们天天说群众路线，对这些送上门的意见和建议（大字报）不欢迎是没有道理的。除非自己干了见不得人的亏心事，心里有鬼，怕暴露，才怕大字报、反对大字报。本人不仅不怕大字报，而且自己也写大字报。

在陶鲁笱、钱学森两位领导同志指导下，情报所的批林批孔运动，集中批判孔老二的“克己复礼”，林彪的“天才论”、“五七一工程”武装政变的罪行。并坚持业余闹革命，理直气壮提出检查批林批孔是否搞好了，就看是否批出了团结、促进了生产和各项工作？情报所的批林批孔，不仅在短短三个月内，解决了林彪最亲密战友，伙同刘毅民等人诬告彭德怀等老同志，公开打着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造成情报所长达 3 年彻底瘫痪的残局；而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在此也举个例子，本人针对本所在发展新党员入党方面存在的问题，讲了一堂全所同志参加听的党课。结合宣讲党章有关内容，其中谈到要跟党、跟路线，而不跟人的问题。严肃地批评了本所存在的问题。例如：不能把拥护党、紧跟党，错误地理解为跟了本单位某个党员屁股转，也不是跟了某个领导屁股转，这势必造成溜须拍马的歪风邪气，损害党的形象；我们有的党员，自命高人一等，其实表

现不怎么样，对己自由主义，对要求入党的同志“马列主义”，这种党员，最乐意人家围了他屁股转，还爱给领导打“小报告”；这种风气不纠正，势必走上邪路，甚至利用发展新党员拉帮结派，……。由于讲的内容针对性很强，受到了全所绝对多数同志赞扬，还有贴大字报赞扬的。而促使情报所党建工作扭转了局面。情报所的批林批孔运动，不必回避，事实是成功的、收效是大的。国防科委常委决定把情报所的搞法，在科委驻京各单位推广。在我参加四届全国人大期间，江 X 来到我们代表组(由海军、科委、工程兵、装甲兵代表组成)，钱学森同志(代表组召集人)向她介绍了我。她面对面问了我们批林批孔情况，我简要介绍了一下。从她当时的讲话，是肯定了我们的做法的。另外，1974 年国庆招待会上，我遇到中央领导同志对我说：你们的材料(指我在科委召开的，在京厂、所以上干部会上介绍的批林批孔经验)看到了，搞得很好。还有在“后文革”聂常委整我时，中央军委办公厅主要领导告诫情报所领导：“恽仁祥的情况中央知道，(毛)主席还有指示。这个人不能搞他，谁搞了要倒霉的”。可以说，我一生中干的事，中央知道的只能是批林批孔，因为我在厂、所以上干部会上介绍的批林批孔经验，科委报给了中央。但我们所的批林批孔运动，不仅不存在批林批孔批周总理的问题，还根本不知道有这事。而且自从走资派复辟以后，聂常委派来的常勇为头子的“工作组”，也没有从我们批林批孔总结的经验中捞出一根稻草而可否定的事例。说明，情报所批林批孔运动，经受了走资派复辟后的检验，没有找到他们渴望的岔。但情报所的批林批孔不存在批周总理的问题，常勇为头子的“工作组”在这方面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只得以一无所获而告终。出奇的是，情报所却发生了中央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自称“四大金刚”、“四条汉子”伙同刘毅民等人，疯狂从进口反动报、刊搜集了恶毒攻击、诽谤周总理的黑材料，并一再企图对知情人杀人灭口。人证、物证俱在，我在“从国防科委的文革看中央两个司令部斗争”一文，详细介绍了这个案子，并公布了一些重要物证。这个案子，中央不仅知道，而且有要“追查清楚”的批示。但为什么不让查下去，反而把主要责任人提拔为国防部长、国务委员，这不正说明，资产阶级司令部，大叫什么批林批孔批周总理，是一出最典型不过的贼喊捉贼的闹剧！

关于江 X 给我的信，现在有的互联网把江 X 给叶剑英的信等公开在网上，在此不抄录了。对这封信，从揭批“四人帮”以后，就不知多少所内外的人要我谈看

法。共产党人不隐瞒观点，我始终是一个回答：从江 X 的信可见，她一手好字，很有功底；至于信的内容，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如有人认为有问题，提出有说服力的批判，本人愿聆听。我信奉的是说实话，不做两面派。

关于我给江 X 同志的信，抱歉，被常勇非法抄家抄走了，已不可能全部回忆出来。在此，把科委纪检委和情报所纪检委联合调查研究对我写的信的结论介绍一下(注：所新党委书记赵玉山同志向我传达的)：信的第一部分说被林彪集团迫害，这是事实，还被关了 3 个月；第二部分说批林没有搞好，邓 XX 对批林表了态，说批林没批好，揭批“四人帮”时还要继续批林，说明反映的情况属实；第三部分说批林批孔的材料《林彪与孔孟之道》太少，事实上后来科委又加印了不少，也说明反映的情况属实；第四部分是个人批林批孔的决心和态度。结论是：“属于一般反映情况的信，信没有问题，连检讨都不用检讨”。

(摘自网文恽仁祥《漫谈文化大革命(之三)》)

毛远新：《毛主席谈批孔》

在谈到中央电视台有人讲主席诗词讲的非常好时。

毛远新说，1973 年主席给郭老写了首诗，没有公开发表过，后来有一部分已经成册，包括主席未发表过文章、诗词包括进去了，这首诗谁都不敢讲，为什么不敢？涉及政治问题：批孔。因为后来邓讲，批孔就是批总理，那一段都这么讲，所以都回避，包括有一个专题片，讲主席诗词的，叫：独领风骚，这个解说片街上有卖的。主席 110 周年，中央文献发行的，讲诗人毛泽东，从主席的诗讲主席的一生，讲的水平很高，独领风骚在中央一台播过，后来在中央四台播过，有声有色，作者陈晋，我见过。但主席给郭老写的这首没有收入主席的诗集，当年主席给我一句一句讲这首诗，我拿着这首诗，主席还给我讲了柳宗元的封建论，一种单行本，字很大，还有章太炎的两篇文章，也都是印成单行本，主席让我回到沈阳，召集省委常委给每人印发一本，大家讨论学习，还要把黑龙江、吉林两个省委集中到沈阳来，同时给他们每人都发这首诗，主席的诗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我们请把主席的诗写下来。

毛远新说，说是一首诗，实际是布置工作，原本好像是《读〈封建论〉赠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十批不是好文章。

百代都行秦王政，孔学名高实秕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祖龙——指秦始皇 十批——郭老的十批 唐人——指柳宗元，他写的封建论子厚——柳宗元的字。

毛远新说，主席这首诗是 1973 年夏写，但跟我讲是十大后，十大是 1973 年 9 月，我在辽宁工作，十大开过以后，我要回去和主席告别，他给我讲。

郭老的十批书里边有一批是批秦始皇的，骂秦焚书坑儒。他的书 50 年代发行的，所以主席把柳宗元的封建论给了我，我详细读了，唐朝的古文又并不难读，但到了清朝，章太炎的文章我还真读不懂，许多怪字我都不认，我问毛主席这啥字，主席给我讲什么字，我说怎么明末清初的文章比唐朝的还难读。主席说唐朝的人还没到那么严重，写的文章，李白的诗还比较接近老百姓。越到后来，特别是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等，到了元明，好象是越用的字谁都没见过，谁的水平越高。封建论这本书说的是什么？网上有，百度查国学栏目，柳宗元诗、文。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肯定秦始皇，主席拿着这本书给我讲。有一段话：说秦二代就亡了，但是公天下者（天下为公的“公”）秦始皇，当然后边也说了，他是以一个人之私来公天下，他自己皇帝还是为私的。他指的是分封制，柳宗元反对封侯，封侯只能造成国家分裂，先是分争，最后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国历代都发生过这样的事。秦统一了以后要不要分封，李斯和好多人发生分歧，李斯反对分封，搞郡县制，皇帝任命省长、县长，而不是封一个王到全国各地，他的子孙后代都是统治者，世袭。他把这个东西破了，主席说秦始皇功劳非常大，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事。秦始皇之前很多都是王侯，秦始皇以后都感觉分封王侯不行，就实行郡县制。后来一些朝代又实行分封，如汉朝开始，七王、八王之乱闹的汉武帝不得安宁，不少王造反。汉朝分封，到唐朝李世民也要封，封王有功的也要封，但没有封，实际上内部有争论，历朝都有这事，要不要封王。如\*\*省要封一个王，那就世袭了，他的子孙、阿斗也得说了算，最后国家分裂，都是这样，封建论对秦始皇是

肯定的，所以劝君（郭老）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不是郭老你作的结论，迫害知识分子（秦始皇：统一度量，还要统一思想）秦灭六国都有一大帮儒生。诗中祖龙指的是秦始皇，祖龙虽死，就是秦始皇死了。十批就是指郭沫若的那本书。当时我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祖龙什么意思，主席说就是指秦始皇，第二历代都行秦王政，这个政是嬴政的政还是政治的政（因为秦始皇名嬴政），是政治的政，按秦始皇的治国方略。孔学名高实秕糠，就是孔夫子的那一套名气很高，实际上没用。熟读唐人封建论，就是柳宗元的封建论（子厚就是柳宗元的字），不要从柳子厚以后退都回到周朝去了。文王就是周文王。

对于孔夫子的理论，毛远新说，主席认为，孔子当年，他那套东西没有市场，周游列国，到处被赶出来，为什么？战国七雄，唯独秦国是不允许孔夫子的弟子进去的，从商鞅变法以后，其它国家允许孔子的弟子（那时孔子已死）去讲学，可为什么那些相信过孔夫子的国家都灭亡了！唯独秦国，不听孔子那一套的秦始皇能统一，是不是这个道理！历代都行秦王政，从秦始皇死了以后，农民起义，楚汉相争，刘邦把项羽打败了又统一了中国，这以后，汉以后，从三国、魏晋，一直到南北朝元明清，历代皇帝都是骂秦始皇的，但是做起事来都是学秦始皇的，说一套，做一套，想想看道理是不是这样？都骂秦始皇是暴君，但是他们做起来并不比秦始皇手软，秦始皇坑了四百多个，后来的皇帝不是照样骂！文字狱一个比一个厉害！都学这个，所以历代都行秦王政，实际上孔学名高实秕糠。主席说，孔夫子的很多话都是好话，现在看起来也都是好的，但是拿到现实社会里，那种复杂的矛盾他都处理不了，他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又都是废话屁话！这都是主席的原话。主席说历代农民起来造反，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改换皇帝，他们起兵造反的时候都是批孔，为什么呢？因为孔夫子讲的君君臣臣，臣是不能反君的，你要造反，把皇帝换掉，你得违背，违背孔夫子儒学理论，他必须得批孔，要不然师出无名，造反无理，特别是农民起义，举了个例：如刘邦，最看不起儒生的人是刘邦，见了儒生把帽子拿下来洒尿，史书有记载，可是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这就说明了到了统治地位以后，又要把孔子请回来，为什么呢？要用他那套理论管理国家。宋太祖赵匡胤他搞陈桥兵变，军事政变，发生在河南，把皇帝推翻，皇袍加身，自己当皇帝，这不符合孔子的理论，他肯定不符合。但他当皇帝以后又把孔夫子请了回来。造反的时候批孔，治国时尊孔，都是这样。成吉思

汗他读过论语吗？他的铁蹄杀遍欧亚大陆，见人就杀，简直是要把所有的农业区都变成牧区、草地。可是到了元朝后边皇帝，到山东去祭孔啊，给孔的地位那么高，戴高帽，封的很高，好像元朝皇帝给孔子封的帽最高，朱元璋起兵造反，你不批孔，造反有理吗？没理，他很反孔。但朱元璋上台以后，要到曲阜祭孔。清朝也一样，努尔哈赤读过什么书，满清入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那符合孔子的理论吗？可是等到清朝皇帝入位以后，要把孔夫子请出来。太平天国洪秀全也是从批孔开始，不批孔他敢造反吗？可是等他到了南京做了天王以后又要尊孔。

毛远新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孙中山也好，陈独秀、李大钊也好，“五四”运动就是批孔开始的，是不是这样？等到蒋介石坐上了宝座以后去尊孔、祭孔。蒋介石把孔家的后代请到台湾，现在还在那里。中国历史不就是这样吗！当要起来造反的时候，都要批孔，用我们的话说，你是革命党的时候是批孔的，当成了执政党，巩固地位时又要尊孔。中国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为什么？这是什么道理？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席说到现在孔夫子已经不是当年的孔丘本人，历代的统治阶级都给他梳妆打扮，根据统治者的需要，用鲁迅的话说，后边讲的孔孟之道，是御用文人经过梳妆打扮过的孔夫子，他们就是以这套思想来束缚统治人，是思想专制的工具，回顾中国历史是不是这样？

毛远新说，你说蒋介石真正相信孔夫子吗？对共产党员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孔夫子什么时候教过他这一条？孔夫子是和为贵，所以主席那个时候搞那个东西，为什么主席提出要批孔，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员要保持自己的革命性，一旦中国共产党也尊起孔子来了，就说明你也到时候了，就说明你统治不下去了，要靠他来维持你的统治了。想想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后边这话没有讲，这是我悟出来的。主席说，你看看历代，革命的时候都是从批孔开始，等到他掌权的时候，都要把他请回来，干什么呢？把他作为对人民统治的思想专制的工具，所以主席的结论是什么的，他说孔子作为中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荀子他们一样，都值得我们尊敬，纪念，值得研究，因为他们的思想实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每个人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作为孔子的这套理论，它是唯心的，主张政治倒退的，不能接受的，至于说我们现在说批孔（鲁迅说）已经各朝各代梳妆打扮以后的孔，不是当年的

孔夫子，孔子不过就是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可是到了南宋以后，你让妇女缠小脚，这是对人体的伤害，男尊女卑，不知道比孔子发展了多少倍，男女不平等，孔子那时还没到这个地步，但是理论根据是孔夫子。

主席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从批孔起家的，但是我们决不能走前面他们的路，批了再尊，等到我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再把孔子的思想来与老百姓的思想时，落入历史的一种循环，这是不行的。如果共产党也到了自己没法统治或者遇到难处了，也要把孔子请回来，说明你也快完了。

毛远新回忆，主席还说，中国没有一个真正能够占统治地位的一个宗教，不像西方。主席举例子，主席说西方耶稣和孔子差不多，他那个时候也是到处受人迫害，还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创立的这一套东西，在当时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到了欧洲的中世纪，教会是统治和奴役人民的一个最坏的工具。主席说你看资产阶级革命，从欧洲文艺复兴开始，首先就是对着教会，批判神，就像我们批孔一样，但是这个教会不是说耶稣本人怎么样，只有打破这个东西，资产阶级革命才能起来，那个时候教会是宗教裁判所，有时比法院还厉害，科学家好多都是被他们迫害死的，像哥白尼，伽利略你必须自己的改变理论，不改变就要处死！这能怪耶稣吗？不是耶稣问题。但是因为中国没有这样的宗教，就用孔夫子的这套东西来统治中国的老百姓。在中国，是实用主义。有病了，生不下孩子就想神来了，孩子生下来病好了，早把她忘了。宗教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对它进行了一次批判，然后进行改造，改造以后他适应用资产阶级的社会。所以现在的宗教和中世纪的宗教大不一样。

毛远新说，主席想的是，我们既然已经认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就应该以这个思想来教育人民。孔夫子那一套虽然话都很好听，拿出哪一句话你也不能说他错，他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讲和谐，和为贵，引起矛盾，处理不了，和的起来吗？

2010年2月1日初稿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十册（3）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十章 批林批孔

#### 第三节 各地区的批林批孔运动

#####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人们都在关心着四届人大的召开，尤其关心着与每个中国人命运密切相关的国家法制。

人们为甚么这样关心呢？二十多年来的革命动荡，发生了一些甚么新的问题使得人们必须关心新的国家法制这个四届人大的产儿呢？

##### （一）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已经进行了两次大斗争：一次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与刘少奇集团的斗争，一次是与林彪集团的斗争。

斗争的实质是要解决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过去的反右和社教运动也进行了这样的斗争，所要解决的也是这个问题。那么新的问题又是甚么呢？

新的问题就是刘少奇集团特别是林彪集团要搞的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是要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

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是从特权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在现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他们只可能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政，而不可能与被打倒的老地主、老买办们平分既得利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的反革命演变的得逞不能使白俄恢复他们的贵族世袭就是证明。早在流失年代初期，毛主席就向全党全国人民警告了社会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这样

的国家发生复辟，那就不只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他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整整想了十年，难道不是林彪路线给人民带来的祸害才帮助人们真正开始理解毛主席的警告了吗？

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到今天的特点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企图是搞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那么革命人民应当拿起武器去反对他们呢？

## （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在对当前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深刻研究中，毛主席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式上说，实际是一个最广泛的人民的革命大民主，它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是防止和反对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武器。

从战略的观点来看，与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首要任务是揭露和摧毁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如说是为了锻炼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民主精神。“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还有甚么能比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的议论国家大事，批评错误路线更能成为生产力解放的标志呢？

上了宪法的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以及未上宪法的串连自由都在这场大革命中真正实行起来，并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这是中国人民数千年来没有过的，生气勃勃的，这是革命的奇勋。

但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住广泛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会主义的法治“突然不灵了”，“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灵了起来。在范围广大地区内，到处在抓人，到处在镇压，到处是冤狱。社会主义法制跑到那里去了呢？据说，它没有用了，因为这是旧人大的宪法，而新人大还没开，现在是无法无天了！

这是在我国进行的一场社会法西斯主义的演习，演习的总指挥是林彪。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毛主席愤慨地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林彪为甚么要镇压人民的民主呢？他们不是还鼓吹过“天然合理”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么？

把林彪体系当作正统的毛泽东思想来崇拜，这是中国人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不可避免的历史错误。

林彪及其党徒把人民的革命运动当作他实行篡权复辟的“借用力量”，于是对待“天才”的态度这个准则代替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准则。“共诛之”，“共讨之”和“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原则向法制挑战，成了保卫对“天才”绝对崇拜的上方宝剑。当他的地位一经确立并由党刊宣布以他的地位的确立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标志时，他便要建立“新秩序”了，就要“正名”了。在这方面，他还有他的董仲舒哩！

甚么“新秩序”？就是“最后胜利论”、“四大过时论”、“政权即镇压论”、“军党论”，总之，就是把我党我军搞成“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关系的社会法西斯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人民的大民主不能离开正确的路线；否则，革命非但不能完成其自身的任务，相反将会为资产阶级野心家所利用，而人民群众获得的只是新的枷锁。

### （三）关于林彪体系

甚么是林彪体系？这是指林彪已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的时期，他在党内推行了那一整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党、全国的东西。这就是哲学领域的唯意志论，历史领域的天才史观，政治领域的政权即镇压论，经济领域的“公产”论和对外关系的大国沙文主义等等，天才史观则是其纲领。

毛主席一开始就和林彪体系发生了矛盾，当林彪体系尚未确立时，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信便是这一矛盾的表现，而林彪体系一旦确立，并使中国革命乃至世界革命面临着巨大危险时，这个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尖锐起来。

如果我们不去懂得毛主席对林彪法西斯主义镇压人民民主的深恶痛绝，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毛主席为甚么在庐山提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问题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斗争所反映的整个中国社会的

深刻危机呢？我们又怎么能够懂得庐山的大笑话所应当给予我们的教训呢？

“路线斗争不可知”的说法和“路线斗争不过是中央内部的权力之争”的说法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它站在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否认了一切错误路线，无论是“左”还是右的，给人民群众的利益所带来的直接损害。人民群众为了维护和争取自身的利益，总是要以各种形式（甚至包括消极或“反动”的形式）去进行抵制和反抗。中央的斗争无非是社会斗争的集中表现罢了。

#### （四）关于批林批孔以来的形势

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顶点，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它造成了它自己的反动，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是在这场大革命中，在毛主席的启发下逐步地懂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们。林彪垮台以来民主精神的普遍高涨，更形成了他们的群众基础，他们大多数是林彪体系的受害者，他们对林彪体系有着切齿之恨，他们要求继续革命，要求人民的革命大民主，要求恢复社会主义法制。

这一次，人民的要求又披着历史的外衣出场了，哲学家作了新的政治变革的前导，这个人杨荣国。

当“反革命黑手”的牌子勒在脖颈上的深痕尚未消愈，杨荣国和它的助手们甚至是在“牛队”里就开始了他们批孔和批新孔的研究。这位白发苍苍的教授是一个真正的造反派，他首先揭破了“礼治”秘密，“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杨荣国同志控诉说：“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压迫和剥削奴隶，甚至加以屠杀，奴隶们只能绝对服从，不许反抗，这就是所谓‘礼治’”。

杨荣国反复地控诉“礼治”，反复地控诉孔子杀少正卯，少正卯有甚么罪？他无非是“联络人民自由集会结社，乱批评当局”罢了，这样就该杀了么？！

毛主席支持了杨荣国派要革命要民主的呼声，给李庆霖那封到处谓之“反动告状书”的复信，是多么大的鼓舞了人民群众啊！真的，一九六八年以来，没有见过人民群众“这样的兴高采烈”。“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这是把多少人民群众压抑在心里头的对林彪法西斯主义的仇恨的呼声喊出来啊！

但是，兴奋很快就过去了，伴随而来的是对李庆霖式的信件大肆的封锁、

恐吓和镇压，李庆霖的遭遇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耽心。他们在说：“幸亏信让毛主席收到了”，他们在想，是甚么压制着他们的民主权利呢？

林彪的垮台，并不等于他的体系的完结。林彪体系确立的过程造成了一个文人既得利益的势力，他们害怕汹涌起来的人民群众。清算林彪体系的浪潮摧毁了他们既得利益的基础，他们耍了一个诡辩，歪曲主席的思想，把林彪体系实质的极右说成是甚么“右倾”，或者回避林彪在成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他所推行的那一套对抗毛主席流毒全国的东西，用林彪那些见不得人的反动言论来掩盖林彪见不得人的蛊惑言论。他们站在要求批判林彪体系的人民的反面，把一派热气腾腾的批林局面打了下去。他们骂人民群众是“复辟派”“回潮派”，他们打的旗号是“反复辟”“反回潮”，好像他们就是革命，动他们不得。

可笑的是他们也来批孔，他们千方百计地掩盖被杨荣国揭发出来的“礼治”的秘密，把血淋淋的“礼治”说成是一种假仁假义。肯定焚书坑儒的革命作用使他们自以为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无原则地吹捧秦王朝的封建专制，非历史主义地鼓吹要从肉体上消灭一切反动派，这实际上是在为社会法西斯主义作舆论，以完成林彪未竟的事业。他们不敢触及秦王朝面临的两个否定：即来自六国旧贵族的反动否定和来自大泽乡农民的革命的否定。农民为甚么要反对秦王朝？秦灭六国时，农民“莫不虚心而仰上”，不都是拥护它的么？因为秦王朝终于损害了农民。人民群众为甚么要反对林彪体系？当年横扫一切的红卫兵运动不是高喊着林彪“谁反对就打倒谁”的口号去作英勇的战斗的么？也因为林彪体系终于损害了人民群众。几千年来凡是损害了人民的利益的人，终究是要被人民打倒的，这就叫做奴隶们创造历史。

那些“既得利益者”骂所谓“复辟派”“回潮派”要复旧，是的，人民群众中也许有不少人在林彪体系面前产生了一种怀旧情绪，但这只是因为当前林彪体系直接损害了他们，他们客观上要求进步，主观上却不懂得进步而已。这几乎是一个历史规律。被毛主席称为天才的陈胜。吴广，不都是自命扶苏，自号楚王，在反革命复辟的旗号下，举行了他们的革命起义么？既然我们无产者对这样打着反革命旗号的农民起义都要给予他们以历史上崇高的地位，为甚么今天广大人民群众在批林斗争中有了一些错误的怀旧情绪，就非大兴问罪之师不可呢？更何况否定之否定，“仿佛是向旧的事物的回复”，不也是列宁的辩证法么？革命的道路

要笔直而笔直是王明的形而上学，对革命作辩证的否定不是历史的退步而是历史的前进。

当然，如果真正的反革命复辟派孔鲋之流可以混进从大泽乡出发的革命队伍，今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面临的反攻倒算和辩证否定，便更可鱼龙混杂。我们必须反对反攻倒算派，以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然而，当前批林的主要危险，是在“反复旧”的旗号下维护林彪体系的错误潮流。

总之，批林以来的形势，纵横观之，斗争是激烈的，批林整风仍是首要任务。第十次路线斗争尚在继续深入。也许在这种深入之中，它还孕育著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哩！

#### （五）谈反潮流

“十大”废除了林彪塞进“九大”的“共诛之”“共讨之”的原则，而代之以反潮流的原则。这是“十大”的一个大功绩。

然而，现在情况是一个口号响亮了，人人都来喊：反潮流！

今年（七三）年八月，不是有个张铁生的也出来“反潮流”了么？结果一没有杀头，二没有坐牢，三也好像没有老婆要离婚，反倒是扶摇直上，据说到甚么学府深造“反潮流”的奥秘去了。可是，那些为反对林彪体系作了真正战斗的革命者，不少的情况是杀了头的，头还是杀了，坐了牢的，仍旧坐着，罢了官的，照样罢着，他们那有那么优哉游哉？“你们是为被打倒的牛鬼蛇神翻案”、“你们是‘571’”，不对。林彪的“571”不过是企图把受他的体系损害的人民群众，当作一种“借力量”去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罢了。“借 B52 打 B52”本身何罪之有？甚至“571”自己也明白那些被损害的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力量，而不是它的力量呢！

人民群众不是阿斗，他们深知所受的根源，它们攻击的锋芒是向着林彪体系，他们谁也没有表现出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憎恨，相反，他们憎恨那些歪曲和阻挠这个路线和政策的林彪及其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他们要求民主、要求社会主义法制、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的革命权利和人身权利。“甚么？你们要民主？你们是反动派！因为你们是反动派，所以不能给你们民主。”他们振振有词，

喜欢引用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段话。

但是反动派的头上是没有“反动派”三个字的。“只给人民以民主”，很对。可是，你们还为林彪体系大喊大叫时，又给了反对这个体系的人民群众那怕一点民主没有呢？给他们的只是残酷的斗争和拘押呢！“不给反动派以民主”，应该这样。但不要忘了林彪体系风靡一时，甚至庐山成百个中央委员跟着跑，不就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民主么？这个民主不用你给他也有，一他有权，二他有革命的旗号；你不给人民群众，他就没有，一他没权，二他有时也打不出革命的旗号。

历史教训我们，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派有时会被认为是反动派而没有民主，反动派有时会被认为是革命派而有民主，甚至出现了革命派遭到镇压，反动派青云直上的反常局面。我们必须对谁是革命派，谁是假革命派，谁是反动派，谁是被打成“反动派”作认真的分析。分析的标准只能是看谁的社会实践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是对待所谓“天才”的态度。

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民主。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对阶级的民主作过许多论述，他们是把整个的革命阶级和反革命阶级来加以对立的考察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人民内部的派别斗争所反映的阶级斗争的经验，把派别的民主突出地推到了愿意研究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面前，因为反映这个阶级斗争的双方都应当有民主的权利。一派压一派是不灵的。这种后遗症至今难道还少么？于是，它使我们懂得，若不把革命队伍内部现在可称之为“潮流派”和“反潮流派”之间，过去那种压制与被压制，甚至镇压与被镇压的关系，改变成基于团结的批评与反批评的关系，阶级的民主是不会存在的。人民民主专政将变成派别专政，这个专政派别若是“正确”，它不能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它若是错误的，便将是社会法西斯的开始。

王洪文同志报告号召人们发扬“五不怕”去反潮流。但是，现在的情况，没有“大人物”或中央报刊的认可和宣传，任何思潮都不能形成潮流，尤其是不能形成涌来之势的潮流。古今往来，中国总会有人为了说话而不怕杀头的。鲁迅自然是不怕杀头的一个。但是鲁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里去发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们又能到那里发表他们的文章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幽灵，时常在他们的身边徘徊，他们不止一次地想到了恢复革命大字报的权威。但是，林彪体系压迫着他们，“忠”字化的森严礼仪在束缚着他们，镣铐、铁窗、皮鞭和子

弹在等待着他们。

一九六八年以来的中国现实就这样严酷地向人们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死”了么？

#### （六）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曾经使全世界在它的面前目瞪口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所给予中国的社会深刻震动和它的深远意义，必将影响我们今后的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

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它将怎样反映被人们称之为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呢？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那么，它所要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新宪法里，它将怎样表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意志呢？

现在人民群众在想些甚么？要求甚么呢？他们对“全国人民”的代表大会抱着怎样的希望？

#### 一、要法制，不要“礼制”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以“造资反线的反”“夺走资派的权”为其基本内容的。但是可以说，镇压（人民民主）与反（资反线）镇压贯穿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而且，一九六八年以后的多次运动，也总是要打击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反的人们，简直把他们非打下十八层地狱不可。正是把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之后，林彪体系才得以确立，他们才能把封建宗法性的字句塞进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中。

这个基本事实说明了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

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社会主义的，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所形成的传统，顽强地盘踞在思想、文化、教育以及法律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刘少奇，特别是林彪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封建性和宗法性，难道还不



足以证明，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吗？

还有甚么能比“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原则更能成为维护林彪体系“礼治”的神圣支柱呢？名为树人，实为树己。如果林彪能够名正言顺地上台的话，岂不是谁反对林彪就打倒谁了（实际上他是已经实行了）吗？而且任何一个大人物只要他宣布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化身，他便从此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了，而“那一小撮”竟敢冒犯了他的尊严的革命群众，便决不能成为法律的保护的对象了！

如果我们不去反对这种封建性的“君臣父子，不得犯上”的礼治原则，我们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敌人，保护人民”的法治真正实行起来吗？

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一方面党的一元化领导决不可动摇，一方面“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而这些走资派恰恰是他们把持的地方和部门的一元化领导的具体体现者。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应当怎样保护人民群众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对党内走资派和错误路线斗争的权利呢？这是摆在“四届人大”面前的一个大课题。

不用说党的领导应当细心倾听群众意见，也不用说人民群众对党的各级领导实行革命监督的权利，更不用说对走资派造反有理了，即使群众的意见是错误的，过火的，或者对党的政策某些方面不理解而发生不满，难道就可以“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么？而且，香花与毒草、正确与错误、革命与反革命，又常常是不那么容易鉴别的，要有一个过程，要经历时间的考验，因此，我们不应当怕光明正大的反对派，界限是服从纪律不要搞阴谋诡计。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除了杀人、放火、流氓、盗窃等刑事犯和挑动武斗、组织阴谋集团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外，应当保护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

## 二、限制特权

承认不承认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刘少奇、林彪等不过是他们政治上的代理人罢了），这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

必须首先指出，我们的党员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是，这个特权阶层

是客观存在的，是我国社会经济条件下所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产生的。

“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的现实从哪里来？对社会的财产肆意挥霍，高级的惊人享受，是从那里来的？相当的部分高干子弟理所当然有财产权力的变相世袭从哪里来的？新资产阶级占有方式和维护这种占有方式的政治手段凭籍的又是甚么呢？文艺、教育、“五·七干校”、上山下乡、吐故纳新、上大学、培养接班人等等，几乎每个被人们称之为“新生事物”的地方，都可以成为特权显圣的场所。难道我们不可说苏联的演变是从苏联的高级干部实行了高薪制而向资产阶级专家看齐的么？在我们中国，对据说为革命流了很多血汗的老干部实行某种特殊的照顾，即使是传统所允许的，老百姓也没有表示多大的异议的话，但是我们能够轻视对政权的腐化作用和对新的社会关系带来的影响么？我们能够对正在产生和形成的新贵族、新的资产阶级熟视无睹吗？

我们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我们承认我们社会现阶段存在着种种差别，它并不是一个法令所能完全消灭的。但是，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自身发展的规律，不是要扩大这些差别而是要消灭这些差别，更不允许这些差别扩大为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特权。特权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对立的。为甚么我们要那么回避对于特权的批判呢？为甚么要用所谓“好人”“坏人”的问题去偷换“走后门”反映在路线上的大是大非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限制特权的条文。

### 三、保证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

一九六九年的“新党章”、一九七〇年的“新宪法”（草案），把林彪这样一个法西斯魔王法定为接班人的事实，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阴影。同时，也给人民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保证我们党和国家的政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呢？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应当怎样才能“千千万万”地涌现出来呢？

使“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青年成了勇敢的闯将”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毛主席和广大人民群众非常反感的是那些充满宗教情绪的“活学活用”（即投机取巧）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毛主席提出了接班人的五条，但林彪也提出了他的三条。在林彪体系得到了确定的那几个年头，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主要地是用了林彪的三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从天才家族的根苗中挑选的；还是在大风大浪成长，在阶级斗争中涌现的呢？这个问题直到如今理论和实际还是多么矛盾啊？

“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人民给的。我们的干部不应是做官当老爷，而是人民的勤务员。但是权力是最能腐蚀人的。一个人的地位变了，是最能考验他为大多数人谋利呢，还是为少数人谋利？能否保持为人民服务的精神，除了他自己努力之外，最主要的是人民群众的革命监督。而群众运动是一个革命者保持革命精神的最丰富的源泉。

应当怎样规定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权利呢？并且应当怎样明白规定，当某些干部（特别是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失去了广大人民群众信任的时候，人民“可以随时撤换他们”呢？

“四届人大”应当回答这些问题。

#### 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

我们的宪法、党章以及中央文件不是写上了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是的，写了，不但写了，而且还规定了“保障人民民主”，“不准打击报复”，“严禁逼、供、信”。可是事实上都是经常不能保障，却是经常“准”对革命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制，关的关、杀的杀，制造假案，甚至大兴野蛮的肉刑就是“严禁”不了！

中国人民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在正确路线指引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可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革命纲领，在反动派的手里就变成为对群众的革命意图的讽刺，从而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手中最利害的杀人武器。

不惩办一些坚持反革命路线、变无产阶级专政为法西斯专政、血腥镇压和屠杀革命群众的民愤极大的蒋匪帮，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是确立不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巩固的。必须对镇压人民者实行镇压。“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制造假案，公报私仇，私立专案，私设监狱，大兴肉刑，草菅人命，罪恶极大的“大夫”们的条例。

## 五、落实政策

一九六九年“九大”就已经提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落实（政策）”，至今五年了，林彪垮台也已经三年了，为甚么许多重要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落实不了？

同时近年来，政策的多变，甚至“朝令夕改”（有认识上的原因但主要是反映了路线斗争的激烈）加上土政策层出不穷，造成了人们的思想混乱，甚至对党怀疑。我们认为“四届人大”应重申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那些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应长期实行的政策，并应通过法的适当形式体现出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对于那些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人应当严肃处理。

## 六、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一九六八年夏季以后，由于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的压制，特别是林彪的法西斯的组织路线，他们任人唯亲和对逆己势力采取惩罚主义的人事调动，搞大换班，使得“各尽所能”、“任人唯贤”的原则受到了破坏，人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摧残。

我们在看到特权膨胀的同时，同样清楚地看到了工农劳动群众在所谓“共产主义”的口号下，他们许多合理的经济利益遭到了剥夺。工人多年没有提高工资了，而且还取消了曾作为他们工资一部分的合理奖金；而农民群众在无谓的“忠”字粮，高征购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运动中，遭到了更大的损害。这个林彪的极“左”路线所带来的危险性，现在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了。

列宁不是欢呼“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为“伟大的创举”吗？中国的劳动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中，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也涌现了无数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的革命英雄么？这正是极为宝贵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但是，能不能由此而绝对化，认为精神可以代替一切了，可以代替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了？显然这是极其荒谬的，它必然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它也已经遭到了惩罚。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反对了高工资、高奖金、高报酬，但是我们应当绝对

地否定奖金的作用么？一个比较积极、认真负责、超额完成任务或者有所发明创造的工人，为甚么不可以比他的同级工资多得些适当的奖励？一个业余从事写作或者对某一专业有所发现、新发明的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为甚么不可以得到适当的物质鼓励呢？空头政治的原则是奖懒罚勤的原则。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调动和保护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原则，而且认真实行这个原则，也是对特权的最有效的限制措施呢！

“四届人大”应当明文规定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条文。我们对“四届人大”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希望能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一个胜利的大会，开成一个反映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广大群众统一意志和愿望的大会。但是，毛主席在与林彪反党集团激战的关头引吭高唱悲壮的国际歌，已经深深地震动了广大人民群众。他们知道，新宪法的规定只是再次给了我们一个武器，要真正实行还必须靠广大人民自己的斗争。

一九五四年的宪法不是也规定过人民的民主权利么？毛主席不是还多次说道：“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巩固”么？但是，一方面存在着林彪为代表的镇压人民的反民主势力；另一方面也由于人民群众自己对这个民主权利运用得太少了（这是由于中国封建传统的根深蒂固，也由于我国生产还比较落后，人民的文化水平还不高，因而比较缺乏民主精神的缘故），毛主席提出多年的“造成一个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

正如一个南方水乡的客人来到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惜一样，文化大革命中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也是在遭到剥夺的时候，才更感到民主权利的珍贵。尽管一九六八年把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革命造反派群众）残酷地镇压下去了，但是“现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动派只是一股逆流。”一个彻底摧垮林彪体系的群众运动在不久的将来必定会到来，他们必将重新恢复和发展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切精神。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三日初稿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二稿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定稿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李一哲的大字报：《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 (一) 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问题
- (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 (三) 关于林彪体系
- (四) 关于批林以来的形势
- (五) 谈反潮流
- (六) 对四届人大的希望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张贴序言

去年八月以后，人们以为很快就会召开的四届人大至今终于还没有召开，但是我们献给它的这篇文章，却被认为是我们的“体系”了。

我们在这篇文章里初步批判了林彪体系，后来的文章继续了批判，殊不料，我们的一些朋友却把“体系”作为一种吓人的东西赠给了我们，也许我们在这一批判中涉及领域之广阔，自我暴露之全面，真的够得上一个“体系”了。但是，这种体系——即使我们也可承认我们具有某种体系的话，也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影响、祸害所及的范围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实际上我们还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林彪体系的新暴露与我们一年前对它的评论没有发生多少矛盾，相反，使我们惊奇的倒是在许多方面得到了证实。这次街头张贴的（第三稿）前五部分只作了少量修改，对于第六部分——即关于对人大的希望和对法制的建议，随着一年来形势发展，我们不满意原来的写法了，认为有必要作深入一些的阐述，所以重新写了，而更多的是去年只简略提及，有待发挥和新牵连进来的问题，我们想在这篇序言里说一说。

\* \* \* \* \*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使某些人感到吓人，首先是我们讨论的这个题目本身。

据说，稍微有一点马列主义常识的人是不会讨论甚么“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我们算是连一点马列主义常识也没有的，但是，我们却知道六十年代以来世界上的几件事情：一是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复辟了，一百多个党大

多数不信马列了；二是在我们中国出现了曾经并且至今还为许多人很不理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三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半个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我们必须全文抄录在这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于是，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是要改善的，它并非尽善尽美，它在那么多国家打不过新资产阶级，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和在中国必须进行“第二次革命”的事实就是明证。无产阶级必须在今后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进行多次文化大革命，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

以上几点，不算马列主义常识。然而，我们却可以据此断言，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完全可以而且应该讨论的。“异端邪说”有甚么可怕？真理是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列宁说得好：“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相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该在各个方面把这个科学向前推进。”（引自列宁全集第四卷一八七页）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某些人感到害怕，第二是因为我们在一年以前的这篇文章里根据严酷的阶级斗争事实和基本路线的启示，提出了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以及同他们作斗争的问题。

正当我们的文章对于走资派和野心家的社会基础的阐述遭到一些朋友的批评的时候，一个处于享有各种特权的阶层中的青年以贾宝玉所不可能有的勇气叛逆了出来。虽然钟志民学生退伍的行动不过是李庆霖愤怒的呼喊，在特权阶层中引起的微弱的回声，但是在人民群众中这个回声却引起了连锁般的震动了。这一叛逆行动吓坏了一些人，鼓舞了一些人，有人切齿痛恨，有人衷心欢迎。这些

互不相同的反响，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阶级关系的变动和新的阶级矛盾状况吗？

新的资产阶级占有方式的本质就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条件下，“化公为私”，当国家或事业的领导人将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再分配的时候，他便在实际上对这部分财产和权力实行了新的资产阶级私人占有。

这种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常见的是某些领导者将党和人民给予的必要特殊照顾膨胀起来，变为政治和经济的特权，并无限地荫及到家族、亲友乃至实行特权的交换，通过“走后门”之类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经济上实际的世袭地位，并且围绕着他们的私利，改变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扶植起一批特殊于人民利益并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新贵”集团和势力来。

更重要的是，他们为了维护已得的特权和争取更多的特权，他们必然要打击坚持原则的正直的革命同志，镇压起来反对他们特权的人民群众，非法地剥夺这些同志和群众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这样他们便完成了“人民公仆”向“人民的主人”的质的转变，成为我们称之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们了。我们在本文里提的“党内走资派和野心家的基础是从特权中孵化出来的新生资产阶级”就是这个意思。

按照基本路线所警告我们的，在今后几百年内，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必然一代一代地产生，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承认不承认这个新生资产阶级（以党内走资派为代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这点，乃是当前无产阶级革命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分水岭，是肯定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你今天不承认，可以，因为有钱守维、黄国忠们帮忙，还有蒋匪帮经常派人来。廿年不承认，也许可以，勉强维持到五十年，一百年以后又怎么办呢？总归还是要承认的。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三，是我们断言：“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因为它并没有使人民群众牢牢掌握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这岂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断言有什么根据呢？



当我们再次面对这篇文章的时候，广东的革命群众运动又一次兴起半年之久了，很有意思的是，作为它的序幕和武汉几乎一样，撕大字报和贴大字报的斗争。

在外国人眼里看来，中国是完全不应该有这样的斗争的。当埃塞俄比亚皇宫前出现贴在墙上用大字报写成的传单时，西方通讯社毫不犹豫地把它称之为“中国式的大字报”。

可是，“中国式的大字报”在中国却遭到了灾难，前几年不说，今年五月，广州市委组织的“政治市容清扫队”已经准备好水龙头和扫把，随时可以把任何大街小巷出现的大字报清除干净。如果说他们终于没有清除干净，这只是因为前仆后继的大字报的不断涌现罢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还在继续吗？谁曾经宣布过大字报使命的完结呢？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里关于大字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的那段论述不也是“最高指示”，应当“坚决执行”“坚决照办”的吗？可是当被镇压下去的革命群众从地下爬起来，企图继续运用这个武器去批判林彪路线，并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要为自己本来已有的民主权利本身作一番苦战哩！正当广州街头贴——撕——贴大字报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十八号文件下来了，毛主席又一次地为大字报表了态。在林彪路线淫威下，万马齐喑几年之后，大字报重新被宣布为合法，十八号文件的深远意义，至今还没有完全向人们展示出来，但人们要是看不到这一点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权利最根本的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权，而十八号文件正是为这种人民的管理权和批评权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即使人们对这场革命群众运动再次兴起原来所抱的期望绝大部分没有达到，他们获得了十八号文件本身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如果说，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七年的下半年得出它“没有完成任务”的结论为时过早，我们是乐于承认的，因为现在在大革命第八个年头结束的时候，人民群众绝对的无条件的使用大字报这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十八号文件确立了。但是一年以前，有多少人承认文化大革命进入了第八年呢？即使在今天，如果不是毛主席说了话，也是没有人承认的，这其中不是包含了复杂的内容吗？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第四是因为我们提出了“林彪体系”，并指

出了它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确立的事实。什么是“体系”？就是事物有联属关系的全体——全部系统。林彪体系就是林彪那一套包括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办法、党风、学风、文风、作风，在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祸害人民、流毒全国的东西。六年前，林彪那一整套“体系”的确立，无疑破坏了甚至取代了毛主席的那一套。到“九·一三”事件（它是林彪那一套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激化到绝对不可调和的表现）以后，才开始显著地逐步破坏、抛弃林彪那一套，历史事实难道不是这样么？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林彪体系“鼎盛”时期的情景吧！

我们没有忘记代替一切，奖懒罚勤的突出（空头）政治，念经式的“天天读”，越搞越虚伪的“讲用”，越闹越荒谬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鼓励政治投机的“表忠”，不伦不类的“忠字舞”，不胜烦琐的忠孝礼仪——早祈祷、晚赎罪、集会、集队、上下交接班、买卖东西、写信、打电话，甚至吃饭等等，都涂上、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气氛。总之，让忠字占领百分之百的时间，百分之百的空间，而这个“好”那个“好”的运动，则是“左！左！左！”的比赛，“……最……最……最”的竞争，不计其数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实际上假、恶、丑行径的博览，“一本万利”的赌场。

我们也没有忘记那损害工农群众基本利益的“公产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党风，鼓吹“有用就是真理”“立竿见影”的学风，提倡讲假话的“新八股文风”，“小节无害”论所鼓励的腐败恶棍的作风，以及“当今社会走后门成风”……。

我们更没有忘记那些公式化的阶级斗争说“教”、“渣滓洞”式的牛栏比之历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屠杀——仅广东一省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干部就近四万人，被关、管、斗的革命干部、群众上百万人。

然而，有人却闭眼不承认林彪体系曾经确立的这个有八亿人见证的事实，厚着脸皮硬说“时时处处”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这岂不等于说，血腥的屠杀，长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线”决定的么？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落实政策的号召发出五年多，经过三十次申、五十次令，才落实到贺龙同志那里呢？

如果不曾有林彪体系的确立，为什么会发生“庐山大笑话”呢？

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发誓不让被他们打下去的共产党人再从地上爬起来。为此，他们找到诀窍，就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对他们危害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坏头头”、“五·一六”“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等等，长期监禁、肆意虐待。到甚么也打不成的时候，就把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弄得似乎永远也搞不清楚，以此籍口，长期挂着，等待时机，卷土重来，难道大量的事实不正是这样么？

林彪体系的产生，乃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我们中国是直接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脱胎进入到社会主义的，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它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不仅在旧民主主义时期，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都没有给予摧毁性的打击。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难道不是这种情况才提供了林彪体系以风靡一时的条件，以至把毛主席“逼上梁山”的么？难道不是这种情况，使得林彪党徒在其势力所及之处，以镇压人民民主来宣告“全面胜利”的么？

我们说林彪体系，我们同时还指出“天才史观则是其理论纲领”即思想上的纲领。为什么呢？几百、几千年出现了一个“天才”，无限崇拜“天才”，绝对忠于“天才”，一切照“天才”意志办事，谁反对“天才”就打倒谁，这不是一条极其完整的思想政治路线么？不准思想、不准研究、不准探索、不准对任何一个问题“问一个为什么”，“天才史观”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现在，人们看得很清楚了，他们从天才史观出发，搞了那么一套“体系”，这是一套现代的“礼”。他们就是拿了这一套“礼”来“治”党、“治”国、“治”军的，这就必然把我们的党“治”成君臣父子党，把我们的国家“治”成封建性的社会法西斯专制的国家，把我们军队“治”成袁世凯北洋军那样的军队。可不是么？林彪在北京有他的冯、段，在地方也有他的督军，那些“大将”、“督军”除了没有来得及带兵打到北京以外，别的几乎样样他们都干出来了。

人们会问：既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完成其自身任务反而曾经确立了林彪体系而且至今未被清算”，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有甚么积极成果可言呢？

我们回答说：不！我们说林彪体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得到了确

立，但这并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绝对地被它所取代。我们说那时候似乎是出现了一种暂时的二元状态（这是两个司令部的存在决定的），就好像董仲舒确立了儒家的地位并没有马上停止了汉武帝的法家路线一样。而且，在我们断言林彪体系曾经确立了的同时，已经指出：“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是它造成了它的反面，即造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力量”。在这里，我们想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話：

“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悲剧式的胜利反而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和坚强的大革命，由于它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有在和这个敌人斗争中，来发展成了真正的革命党”。（“1848——1850 法兰西阶级斗争”）

这就不用我们罗嗦了。

在林彪体系统治十分严密，显得似乎会永世长存的那些日子里，忠于马克思的共产党人就是根据马克思指示冷静地观察着这一历史现象，知道它是暂时的，他们满怀着必胜的信念进行着不屈的斗争。

现在我们看到了，从 1968 年以来，我们党和林彪体系这个新式的敌人之间进行的这场空前激烈、复杂的斗争，对于党内的今后的发展何等重要呵！没有空前强大的敌人，就没有空前的激烈斗争，就不会造成空前强大的革命力量，也就不会完成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空前艰巨的革命任务。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叫人害怕，第五是我们涉及了林彪路线是右还是“左”的问题。

“九·一三”事件后，全党、全国人民根据他们的切身经验和毛主席批判林彪一伙的一系列指示，批了林彪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左”派朋友。他们批了林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路线，批了“政治冲击一切”，批了“公产主义”，批了“顶峰论”和“绝对论”，这一批，批到了林彪体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些人头上了。于是有人出来说，不许批了，“批了群众了”。

群众整整挨了三年批，挨了三年斗，没有人出来说一句话，保护一下。现在突然有人说，不许批极“左”了，群众一下子有了保护了，真是受宠若惊！这里，我们倒确是很想和这些保护群众不挨批的理论家们讨论讨论。

理论家们问，“林彪路线的实质是‘左’还是右呢？”这一问真是荒唐得

郑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无论其表现形式是“左”是右，其实质都是右，因为它们结果都必然导致革命的损失甚至失败。这里是没有“左”和右的区别的，难道我们的理论家们真的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可是，历史上那个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没有表现过时“左”时右呢？

理论家们，林彪不是宣扬孔孟之道么？怎么说极“左”呢？可是从 1960 年到 1971 年的报纸和文件上，我们怎样才能查到“最高、最高”的林付主席号召我们学习孔孟之道的指示呢？他们要使人们学董仲舒，也要人们将毛泽东思想当作宗教来礼拜哩！我们认识林彪的封建性，难道不正是以新的礼教原则——谁反对毛主席思想就打倒谁来表现的么？作为刘少奇、周扬一类非常仇恨毛泽东思想的人的对立面，林彪不是“左”得很么？

这是把“延安”和“西安”放在一锅煮，越煮越糊涂。“五七一工程纪要”只能说明林彪集团是反革命匪帮，怎么说明他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

必须把反革命两面派在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与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区别开来，斯大林对托洛茨基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一五三页注（三〇）），毛主席对张国焘作过这样的区别（参考毛选二五八页注（一〇）），为甚么对林彪却可以不作这样的区别呢？

这是明目张胆的偷换概念，混淆两类矛盾，这本身就体现了林彪在党内的形“左”实右路线。

现在我们看到了那些参与了“五七一”计划阴谋，响应政变的死党，以所谓的“路线错误”逍遥法外，而不少仅仅在某些方面执行了刘少奇、林彪在党内贯彻的错误路线的好干部却继续被当作敌人加以无情打击。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发人深省么？

马克思说：“如果说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资本论）

我们的理论家们，你们为甚么对林彪成为党内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1966 - 1971）推行的实右而形极左路线那个形左的问题讳莫如深呢？我们能举出一百个、一千个现象形态来说明林彪的“左”，而你们能举出多少林彪作为机会主义路线总头子时期在党内表现的现象形态的右呢？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第一回太虚幻境挂这幅

对联却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哩！

“黑格尔在一处说过：一切巨大的世界历史事实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笑剧出现……”（马克思“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

如果王明反对李立三的“左倾”是第一次的话，现在谁又高兴来扮演第二次出现的王明呢？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令人望而生畏，第六是我们对“反复辟”、“反回潮”口号的评论。但是，我们去年在评论中所作的判断已经被证实了。

甚么时候发生了“复辟”，甚么时候发生了“回潮”呢？今年以来某些大人物和权威性的文章（例如“评湘剧园丁之歌”告诉我们，“复辟”和“回潮”发生在一九七二年，今年三月，“广州日报”头版头条大吹特吹的市一医院的那张所谓“反潮流”大字报里甚至把一九七一年说成是“热血沸腾”，“火红的年代”，而一九七二年后便几乎是进入了“复辟的年代”了。

林彪垮台是在那一年？一九七一年秋。可是，为甚么林彪不垮台到处都是好好的“一片红”了，“全面胜利”了，林彪一垮台就是“复辟”了，那里也是“回潮”了，年代也不火红了，热血也不沸腾了。这倒是咄咄怪事！

难道第十次路线斗争中，一九七一年秋的伟大胜利导致的直接结果，不是人民的进一步解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相反的倒是为“复辟”和“回潮”开辟了道路吗？这是对第十次路线斗争的嘲弄。

毫无疑问，人民群众是反复辟的，但是他们亲眼看到的鲜血淋漓的杀气腾腾的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这便是某些人“热血沸腾”的东西）经过一九七〇年八月至一九七一年八至九月的决战，随着林彪垮台，这种复辟行动恰恰是到一九七二年才大致上全面停止下来，从而开始人民群众的反攻。某些人正是把这种人民的反抗说成是“复辟”，因此，他们“反复辟”，实际上是反反复辟。显然，高呼“反复辟”的口号有两种人，也是截然相反的内容。但是，“反复辟”这个口号的实际效果比我们原来预料要好，因为人民的革命不会对革命的口号容易发生怀疑的，他们一般没有对一九七二年开始“复辟”、“回潮”这种提法发生大多数的敏感，于是，尽管鱼龙混杂，纠缠不清，但一九七四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反复辟”毕竟还是

成了人民群众向林彪及其党人作斗争的旗帜了。

现在需要研究一下的是，为甚么那些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在林彪垮台后，在“礼崩乐坏”的形势下要高喊“反复辟”“反回潮”呢？

很清楚，他们现在的地位，是随着林彪的体系的确立而确立的，动摇了林彪的体系无疑是动摇了他们的地位。他们叫喊“反复辟”，乃是他们对一九六九年“全面胜利”的规定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现实矛盾尖锐化的反映。

他们十分留恋林彪体系达到顶点时的那些“光荣的日子——成千上万的人民人头落地的日子”，他们在“全面胜利”中得到的一切——地位、特权……乃至驱打奴隶的鞭子，全都是闪着圣光的宝贝，不容许奴隶有一点褻渎，那时候中国的社会是他们的“天堂”，天堂里的社会关系丝毫不可改变，如果林彪不允许“右派势力抬头”，那么他们也不允许。

因此，一九七二年后，当宝贝的圣光越来越暗淡，奴隶们的态度越来越放肆，“天堂”里的社会关系越来越不稳，念“紧箍咒”也越来越不灵（“金箍”在“全面胜利”时套在奴隶们头上）的时候，他们急了。于是，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祭起了非常革命的法宝，叫做“反复辟”！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九届二中全会后，特别是“九·一三”后，是一年不如一年。正是他们开历史倒车，先是想开回七〇年八月以前，后来想开到七一年九月以前，现在无可奈何开到七四年三月以前。当然，他们是绝不甘心放弃倒退四年的目的的。可笑的是他们却指斥人民为“复辟派”、“回潮派”。这里，我们倒要问问他们：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了的党的、军队的、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不要恢复吗？难道被林彪一伙破坏、抛弃了的“三大作风”，我军的优良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要恢复吗？被林彪一伙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党史、军史要不要恢复其本来面目呢？被林彪一伙用压、抓、打、杀代替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不要恢复？被林彪一伙“从客观到主观”的模式篡改了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艺创作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政治冲击一切”代替了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破坏践踏了党的一系列政策——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政策、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政策、华侨政策、各项经济政策……要不要恢复呢？被林彪一伙天才观压抑下去了的“五

敢精神”要不要恢复呢？难道林彪一伙炮制的从中央到地方成千上万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吗？难道大批虽然犯过这样或那样错误但经过长期考验证明是对党忠诚的老干部就不应该再使用了？邓小平、赵紫阳这些同志根本就不应进入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呢？即使给他们出路也要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随时准备给他们再戴上是不是呢？

在坚持林彪体系的顽固派看来，我们在这里以老大不敬的态度提出一连串“挑衅性”问题本身就是“复辟”、“翻案”的证据，更不用说这篇序言和本文以及“广东怎么办？”、“星火燎原馆的始末”……，还有甚么“革命死了，革命万岁！”篇篇都是“大毒草”，都够得上“反革命宣言”的资格了。如果是在三年前，早就打成“反革命”了，于是他们哀叹：回到三年前有多好啊！

三年以来，中国人民确实确实看到了一些“仿佛是向陈旧东西的回答”（列宁）的东西，可是，那又有甚么办法呢？事物按照其自身的规律（包括否定之否定规律）向前发展的，历史车轮不可抗拒，它是不会照顾甚么人的面子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我们奉劝那些狂热追随林彪而至今还保有“高官厚禄”的大人物，不妨把这对联徘徊吟咏，深入领略其中的意味吧！

那么，是不是一九七二年就没有任何“回潮”呢？我们说存在着各种修正主义路线的各种表现，但决不能说是“回潮”。因为“回潮”这种提法本身就是美化林彪体系确立的时期，把它说成是没有修正主义的“无差别境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当然也决定教育路线和文艺路线。林彪一伙的思想、政治路线是反动的，他们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也不会是革命的。如果说张玉勤事件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表现，不如说是林彪路线在教育战线的反映。难道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以死人为基本特征的吗？被林彪路线整死的人何止万千，年过半百，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干部尚且被逼死，何况十五岁的女孩子？黄帅的老师整黄帅的那一套，是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里继承来的，还是更多的从林彪路线那里来的？后来，“黄帅”对革命同志王亚卓的不同意见那样无限上纲，气势汹汹，把他骂成“复辟势力”，又是从哪里来的呢？难道谁反对我就给人家扣个帽子然后加以“打倒”的霸王作风是一个十来岁的女孩子身上固有的吗？

谈到教育路线“反潮流”的问题，我们提到过张铁生，张铁生反的是甚么



潮流呢？据说是所谓“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回潮的潮流。说实话我们从他的答卷除了能够找到他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妥协的证据外，是找不出挑战的证据的。而且他的白卷本身就迎合了一股“空头政治冲击一切”在教育战线的表现的潮流，虽然这个潮流走向反面也出现了一些“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但它还远远没有形成潮流呢！于是张铁生之所以成了幸运儿，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可以利用来作为一九七二年后“复辟”“回潮”的活证据罢了。

我们的“体系”颇吓住了一些人，第七还因为我们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但现在看来这没有甚么可怕了。儒法斗争史的批判正在深入展开，对秦王朝封建的肯定已经开始变得有原则了起来。“文汇报”刚刚开展着很有意义的讨论。毫无疑问，法家先驱者们对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所引起的历史作用是伟大的。然而，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又何尝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欧洲近代革命史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不是也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吗？既然我们那样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从克伦威尔到罗伯伦斯庇尔，从“百科全书派”到别、车，从贝多芬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为甚么对地主阶级的秦皇朝却要看得那样光明呢？恢复被儒家歪曲了的历史本来面目，肯定秦始皇和他建立的一统天下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种肯定必须遵守严格的界限，以便以后对他进行无情的批判——这是我们这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面临着的反封建任务所决定的。

很可以让人感兴趣的是，我们发现一九六五年末到一九六六年初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与现在我们的报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存在着多么巨大的矛盾呵！“一切反动派和机会主义头子都是尊儒反法的”，可是无论是吴晗笔下的海瑞还是田汉笔下的武则天那个不是法家呢？然而对他们的批判确实变成了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我们认为，今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比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确实有了更多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这是革命深入的结果。但是，既然吴晗说海瑞是“爱护人民的”，曾经遭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篇文章的批判，那么，现在又有人说，“法家是爱护人民的”，这岂不真是一个吓死人的“回潮”吗？海瑞无疑是个法家，而且是一个历史上难得的少数民族出身的法家。现在有人从秦始皇到孙中山，罗列了一大堆“落实政策”的名单，可是为甚么对海

瑞却要刻薄妒恨，拒不“落实政策”，最近还要在报上臭骂几句呢？这说明骂法家的人还是有的。何况我们对秦始皇还没有骂哩！

我们不明白的是研究儒法斗争，为甚么有人总要在“爱国”还是“卖国”这些历史上很不严密的概念圈子里打主意呢？他们到底想把火往那里烧？为甚么不可以联系一下林彪一伙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杀人，强男霸女，根本不要法制的实际呢？古代的革新派——法家尚且反对世卿世禄，反对任人唯亲，反对枉法徇私，反对走后门，反对刑不上大夫，我们现代的革新派怎么就不可以拿来联系一下这些实际呢？难道今天这等事还少么？联系一下这些，对于获得人民的拥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很有实际利益么？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侈谈儒法斗争史，于民何益？

在我们看来，既然封建的社会法西斯专制是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反封建依然是我们继续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批林批孔问题除了应当研究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的思想政治上的路线斗争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外，应当着重地批判经过董仲舒改造了的封建专制的思想体系。如果“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是提出了彻底的反封建口号，那么我们今天的批孔运动就应该是在思想政治战线上彻底的实现反封建的任务了。我们不应当如某些人那样，在批判地主阶级保守派的同时，却极力讴歌地主阶级的所谓革新派，他们根本忘记了秦、汉以后的所谓儒法两家都是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们的斗争实质都是维护封建专制这一基本事实。而忘记了这一点，他们不也就忘记了我们今天应当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批孔的根本任务了么？

我们的“体系”之所以吓人，最后还因为据说它拾起了一九五七年右派的余唾。

是的，“民主”、“法制”的口号是右派分子高呼过的。可是自从一九六六年以来，革命造反派和人民群众所呼喊的右派呼喊过的口号难道还少么？“炮轰黑省委”、“反迫害、反镇压”不是至今还使那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视为“右派翻天”么？李庆霖信件“右派言论”比一九五七年的右派是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们的一些朋友完全不去想一想，为甚么“民主”“自由”的口号在一九五六年布达佩斯曾经集合起来了反革命，而同样的口号在一九七〇年的波罗的海南岸却成了波兰工人阶级战斗的旗帜了呢？

为甚么一九五五年苏联出兵匈牙利曾遭到了我国右派分子的反反对，而一九六八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却遭到了中国人民的抗议了呢！

批评我们的朋友完全没有根据基本路线对六十年代以来国际和中国的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作一番分析，他们不明白五十年代后期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危险是从旧社会包下来的资产阶级右派，而六十年代初期以后，这个主要危险则是党内走资派了。似乎同样的口号，反对的却是不同的内容。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后人民群众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则是党内走资派的资反线，特别是反对林彪所推行的那种面目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法西斯路线，他们的目的则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道理应当是不难懂得的。

关于重写的第六部分，我们不打算多讲了，留给人们评判吧。作为对“四届人大”的希望，无论它们能否得到充分的实现，重要的是，林彪体系的冰山正在溶化，思想开始解放，问题已经提出在愿意研究社会主义的人们面前了。可以补充的一点是：我们希望参加“四届人大”的代表（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代表是怎样选出来的），不要忘记了一九七一年庐山大笑话的沉痛教训。

对我们这篇冗长的序言，如果读者们竟能够看得下去，不觉得索然无味，我们只能感到高兴，现在再写几句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是所谓“不畏虎”的年轻人，但也并非不知道虎的凶残，甚至可以说，我们是被那种动物吞噬过一回，但终于咬不住，吞不下去的余生者，脸上留着抓痕，不是漂亮人物。

显然，我们读马列很少，主要是受了严酷现实的教育，懂得一点，说几句坦率的话。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对于“全国人民——我们还总算其中一分子——的代表大会”及其以后的革命发展表示我们的希望和信心，也是试一试违了报上的“禁”，犯了刊上的“忌”，冒犯了大人物，究竟会怎么样？也算是以身试“礼”吧！如果我们因此而得到某些理论权威的特别关照，我们只能认为是好事，必定会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效益，虽然我们并不怎样期望他们。

然而，我们把受教益的期望更多地寄托在街头读者身上，衷心希望同志们给我们提出批评指正意见，特别希望街头理论家、政治家、法律家、哲学家、批评家、观察家们不吝赐教。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同志公开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深信：在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烈士的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应该是生长鲜花的时候。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 稿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李一哲的大字报：《吓人战术——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为了打击李一哲，全市上下都大张旗鼓地“动员”起来了！

在那些人那里，批林批黄他们完全没有发挥的积极性也一下子迸发出来，他们把全部的怒气都倾泻到了李一哲身上，他们把全部的积怨都算到了李一哲身上——李一哲有罪！李一哲有罪！李一哲有罪！

李一哲是什么人？一个工人，一个青年学生。他们有什么罪？他们写了一篇文章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

那些盘踞在广东土地上，为林彪的南逃搞反革命割据，长期进行着准备的毒蛇们，罪是不大的。他们策划反革命军事演习，他们阴谋夺取报纸和电台，他们为了反革命目的制造大量军火……总之，他们为了发动反革命内战所干的这一切都可以算作是“同志”犯错误。而李一哲只是写了一篇为相当大部分工人和群众所同情、所支持，为某些人认为是“反动”的文章就有罪了，而且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

为了压制李一哲进而压制广大人民群众，为了掩盖他们的毫无原则和理论上的软弱无力，他们搬出了为马克思、列宁、毛主席和鲁迅所不齿的吓人战术。

什么是“吓人战术”？为了把他们的面目勾画出来，我们不妨引用两段毛主席对这种“战术”的评论：

“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可以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

毛主席又说：

“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

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

毛主席指出：

“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

广大的革命同志们，请拿毛主席的这些评论和那些现在正在施行着吓人战术的人对比一下，看看像不像？在我们看来真是维妙维肖，像极了。他们也自称马克思主义，可是为什么他们吃的却不是真理、实事求是和科学这三碗饭呢？

他们现在在“动员”群众的时候，对人民群众说：“我们对李一哲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政治斗争，不要跟他在学术上兜圈子，不要跟他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而是要在政治上压倒他们。”

是的，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斗争性质是一场阶级斗争、政治斗争，这是说得对的。但我们什么时候要求过他们作“学术”上的斗争呢？我们的文章从来也没有以“学术”的姿态出现过。

“不要和他们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而是要在政治上压倒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知道自己在理论上是抵抗不住的，在事实面前是站不住脚的，于是他们就企图回避理论上的辩论，回避摆事实、讲道理。他们只有一个法宝，就是“压”或“压不服就抓”。压服了自然是胜利，压不服就抓也是胜利，都可以雄纠纠气昂昂地“得胜回朝”了。

在思想领域里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当然也是“压”。但是，为什么“不要和他们在理论上、现象上兜圈子”呢？难道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搞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时候是不能讲理论，不能通过现象去揭露实质，也就是说，不能摆明道理，讲清事实么？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最无赖歪曲。

我们再来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毛主席又说：

“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

有人会跳出来说，不对，这种充分说理的、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判，只运用于人民内部，李一哲是“阶级敌人”，李一哲的文章是“反动文章”，当然不能和他讲理。

可是，难道在政治思想领域里的革命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便可以是不讲道理的了么？毛主席在上面提到的需要批判的“牛鬼蛇神”难道也是人民内部吗？但在毛主席看来，对敌斗争也同样适用讲理的原则。在上面，我们也看到毛主席说过，吓人战术，对敌人也是“毫无用处”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针对现代修正主义者所写的“九评”便完全不是多余的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们究竟有什么理由把我们——一个工人，一个青年学生从人民划到“阶级敌人”那边去呢？你们有什么法律根据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哪一条告诉你们可以这样随便地把人民群众划成“阶级敌人”？如果你们可以这样随便把我们划成“阶级敌人”，那么，广大支持、同情我们的工人群众是否也可以划为阶级敌人或阶级敌人的同情者呢？为什么你们这样敌我不分？联系到你们对刘、丁之流那样心慈手软，对人民群众却如此心狠手辣，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你们说，划我们是“阶级敌人”有根据，根据的是毛主席的“六条标准”。

不对！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是划分我们人民内部言论行动是非和香花毒草的政治标准。而且毛主席也多次说过，衡量言论行动是非需要时间的检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经验正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何况在我们看来，在相当部分同情、支持我们的工人群众看来，我们的文章也完全没有违反这六条标准。为什么你们那样热衷于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呢？

敌我不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穿了都是为了一个——吓人！

以下就是他们吓人战术的逻辑：

李一哲的文章——“反革命的大字报”——不进行理论辩论——压倒（甚至可能抓）——于是就胜利了。

是不是这样呢？一切有革命正义感的人民群众可以再看一看，议论一下。

1974 年 12 月 11 日

（附注：“批林批黄”，黄指曾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刘、丁之流”，刘指曾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的刘兴元，丁指曾先后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的丁盛。）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李一哲的大字报《请君入瓮——二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我们的一评（《吓人战术》）刚贴出，某些权威立即打上门来，毫不羞耻地反问道：“怎么能说我们是吓人战术呢？怎么能说是煽动群众围攻呢？”他们炫耀着一篇“宣集文”的文章，（这篇文章像文件一样发到各个单位，组织学习，供人在批判时参照），并吹嘘说，这是一篇“像样的文章”了，已经把李一哲批得“体无完肤”了！

好一个“没有吓人”！好一个“没有煽动群众围攻”！你们在许多单位强迫干部和群众对李一哲大字报表态，这难道是假的？你们从上到下，层层动员，层层加码，这也不是事实？就在你们这篇“像样”的文章里，在这几万字的“批判”中，你们几次、几十次返来复去地重复下面这些字眼：“恶毒”、“极其恶毒”、“极尽诬蔑之能事”、“疯狂”、“丧心病狂”、“极端狂妄”、“别有用心”、“蓄意破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动理论”、“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诬蔑文化大革命”、“诬蔑批林批孔运动”、“鼓吹资产阶级民主”、“煽动匈牙利事件”等等，“简直无以复加”！——这些东西是不是吓人？用这些东西来吓唬工农群众，吓唬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妄图煽动他们来压制不同意见，围攻革命同志，围剿李一哲，白纸黑字，难道不是赤裸裸的吓人战术又是什么？

好一篇“像样”的东西！一篇文章，颠来倒去，几顶帽子，几根棍子，总是那么几个名词、形容词，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么？你们用这些东西就可以吓住人民群众，就可以把李一哲驳得“体无完肤”了么？好吧，在这里，我们来一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首先剥掉“宣集文”的革命权威的外衣，让广大革命群众看一看，他们在顽固地坚持林彪体系的狰狞面目，而且以后我们还将陆续予以评论。

## “宣集文”恶毒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

“宣集文”说李一哲“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使他们感到“特别令人不能容忍”，这岂不是说，在这些威心目中从来就认为毛主席就是秦始皇了么？右派分子恶毒攻击毛主席是秦始皇，林彪恶毒咒骂毛主席是秦始皇，现在“宣集文”公然把毛主席看成是秦始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是的，毛主席在右派和林彪的攻击面前，是承认过“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但是，毛主席在这里完全是从镇压反革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场说的，是有条件的，怎么能把右派和林彪咒骂我们的东西神圣起来呢？怎么能够说毛主席就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秦始皇呢？

我们在文章里“对秦始皇不表尊敬态度”，难道不对么？我们要搞评法反儒，“宣集文”他们要搞尊法反儒，一个评法，一个尊法，一字之差，正是反映了两种立场。是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立场尊法呢？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评法呢？

无论怎样，作为广东理论权威的“宣集文”把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的伟大领袖和封建专制的皇帝合二为一，等同起来，这难道是我们能容忍的么？

“宣集文”对毛主席的咒骂，比他的前辈又有了一个发明——叫做指桑骂槐，他们借打击李一哲之名，行反对毛主席之实。请看两段话：

“中国正在出现一个如苏联那样的特权阶层么？这是李一哲的无耻捏造，这是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恶毒的诽谤。”

注意！“宣集文”用了“无耻的捏造”和“最恶毒的诽谤”来破口大骂。他骂谁呢？骂李一哲么？不是，他在代表他那个特权阶层骂毛主席。因为这个“无耻的捏造”全部都是毛主席的意思，我们几乎是逐字照抄的。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把这个意思传达了出來。他写道：

“毛（主席）的信念所指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向资本主义，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一个掌权的官僚阶层，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吏阶层。”（见《斯诺访华文集》第 6 页，新华书店发行）

“宣集文”，我们不能不愤怒地质问你：



难道中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是毛主席“无耻的捏造”吗？

难道中国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是毛主席“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最恶毒的诽谤”吗？

“宣集文”，你决不能滑过去，你必须正面回答以上的两个问题！因为你的又长又臭的文章的整整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向毛主席的这个诊断开火，都是在代表着混进党内的那些资产阶级分子向毛主席发泄最刻骨的、咬牙切齿的仇恨。如果你们不敢回答这个问题了，从此哑口无言了，那么我们就只能认为你们是被毛主席打败了，你们是被我们打败了，你们是被中国人民所切身感受到的事实打败了！

“宣集文”另一个反毛主席的真凭实据是：

“宣集文”说“李一哲说封建独裁专制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共产党员的头脑之中”，因此，“宣集文”说这是“强加”，是“诬蔑”广大群众、党员。

其实，这句话也不是李一哲创造的，而是毛主席说的（见毛选《井冈山的斗争》）。也是我们逐字逐句抄下来的。那么，按照你们的说法，岂不是毛主席在“强加”，在“诬蔑”广大群众和广大党员了么？你们该当何罪？你们该不该打板子？

出一身冷汗吧，“宣集文”！

“宣集文”疯狂反毛泽东思想

“宣集文”写道：“李一哲大肆攻击毛泽东思想，胡说什么‘不准思考，不准研究，不准探索，……简直取消了八亿个大脑！’”

注意！这里有个省略号——六个点，我们的原文是“天才史观”，“宣集文”把它代表了“毛泽东思想”，这岂不是明明告诉人们“毛泽东思想就是天才史观”么？这岂不是承认你们从来就是把林彪的“天才史观”作为正统的毛泽东思想么？

“宣集文”还写道：“党章上明确规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李一哲却诬蔑为‘封建性的新礼教原则’，并且别有用心地把它诬蔑为维护林彪

体系的神圣支柱。”

无赖+流氓的卑鄙歪曲！我们明明讲的是林彪提出的“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这个礼教原则，“宣集文”却说成是“党章上明确规定的指导思想”，这不是明明告诉人们，他们还要把林彪这个被“十大”废除掉的原则塞进我们的党章，而且还要把它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么？

“宣集文”猖狂反对党的基本路线

“宣集文”说，找遍李一哲的全文，都找不到一个镇压地富反坏右的字句，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李一哲主张保护地富反坏右。

他们还当面责问道：“你们‘对四届人大的希望’里不是写得很清楚么？”

我们当场反驳了他们。我们说，我们写的是：“除了放火杀人……等实行专政外，应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民主权利。”这里说的明明是人民的范畴，难道你们认为人民应当包括地富反坏右么？他们当场哑了口。

其实，“宣集文”的这个指责本身，不仅暴露了他们在理论上的满脑子浆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敌我不分，总是喜欢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也许他们还会说，你们没有一字一句提到对地富反坏右的专政！先生们，“抓鸡脚”不要抓得太离谱了，我们文章里完整地引用了党的基本路线，你们是不是说，党的基本路线里也没有一字一句提到镇压地富反坏右呢？而且党中央在许多文件里，例如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里不也没有一字一句提到镇压地富反坏么？那是不是说《十六条》这个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是保护地富反坏了么？这个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的罪名，你们担当得起么？

“宣集文”蓄意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宣集文口口声声提到镇压地富反坏右，提到“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不要被那些“万岁不离口”的东西迷惑了。一个解放军战士写得好：“难道高喊‘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的人们，都真是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了么？”

“宣集文”不惜造了一个大谣，胡说李一哲主张“一切为了民主，民主就

是一切。”根本不敢提及李一哲主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制裁反动派特别是那些小蒋介石的观点。不言而喻，这恰恰是“宣集文”最反动的东西。

即使是在镇压地富反坏右的问题上，“宣集文”也歪曲了毛主席的专政思想。毛主席主张的是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强迫他们改造成为新人，而镇压的是那些抗拒改造死不悔改的顽固分子。

一九六八年教训了我们。林彪一伙曾在“镇压阶级敌人”的口号下镇压了成千成万的革命群众。现在“宣集文”又大肆鼓吹李一哲是阶级敌人，是不是又要镇压李一哲及同情支持李一哲的干部和群众了呢？说穿了，他们高喊“专政”时就是要镇压人民的民主权利。

“宣集文”真的要无产阶级专政么？如果真要，当然很好。但是他们根本否认我国出现了一批新资产阶级分子，根本否认有镇压人民群众的“小蒋介石”的存在，举个例子吧，广东就有一县委领导班子非但抗拒中央“不准私建楼堂馆所”的指令，反而变本加厉地动用国家资财，为几个人营造别墅，甚至变县木器厂为私人家具厂，而且在上级发现后又一直拒不退赔。这是不是喝人民血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一类事实，即使仅仅是前一段的运动揭发出来的还少吗？你们为什么不去主张严厉惩办这些大贪污犯、大盗窃犯、新资产阶级分子呢？

“宣集文”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

“宣集文”说，文化大革命的焦点和实质，是解决两个司令部的问题，是解决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的问题。

这是一个全新的理论！这是一个如同毛主席批驳过的社教运动中“四清四不清”、“两类矛盾交叉”的理论，这是一个用杜林的模式印出来的绝对的终极真理，因而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谬论！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的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文化大革命斗争的实质只能是毛主席指出的“一反两继续”，只能是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党内的路线斗争，则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集中反映。

“宣集文”说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但是他对“走资派”、“特权阶层”、

“新资产阶级分子”、“新贵集团”的提法那么恼火，否认它的存在。那么何来的两个司令部呢？难道刘少奇、林彪真的是光杆司令或者仅仅是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的代表？究竟中央的路线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抑或相反？

按“宣集文”的说法，岂不是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纯粹的中央内部的权力斗争了么？这是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的放肆污蔑！

“宣集文”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和权威，请问，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些什么？联想到你们在批林以来拿不出一篇像样的东西来，却反而对人民群众的批林运动咬牙切齿，你们的面目不是很暴露了么？

“宣集文”顽固地坚持林彪体系

“宣集文”以上的一些带根本性的错误产生的思想根源，是他们多年来不读马列，甚至不读毛主席著作么？不仅仅是。更重要的是在于他们顽固地坚持林彪体系，即坚持林彪那一套东西。

他们以为对李一哲的批判，只要扣上“反动”、“反革命”的帽子，就可以任他们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就可以把李一哲压下去，就可以“得胜回朝”了。

工人同志们，一切正直的同志们，现在在你们面前有两篇东西，一篇是李一哲的，一篇是“宣集文”的。有对立面就好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究竟哪一篇是反动文章，究竟李一哲反动，还是“宣集文”反动？而且，究竟什么是批林批孔的大方向？现在这么大张旗鼓地要“批判李一哲”，究竟是为了什么？

结束这篇评论之前，我们再说两句话。

自告奋勇充当“批李”马前卒，耀武扬威杀进北京路的赵真哲同志，你不是说“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这个口号本身没有错么？你不是说要坚持这个口号么？现在“宣集文”在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反党的基本路线、反无产阶级专政、反文化大革命——请你在北京路上带头高喊一句“打倒宣集文！”吧。

对于“宣集文”，我们这里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随便抓了他几个“鸡脚”，把他送给我们的帽子回敬给他。让他尝尝戴上他自己制造的帽子的滋味罢了。我们并没有对他“打倒”或“专政”的意思，但是，我们一定还

要继续揭露他，批判他。

帽子是要你自己戴才合适的，“宣集文”同志：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以势压人的新“党阀”，“新学阀”——这顶帽子，你戴一戴，看合适不合适？

1974 年 12 月 16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李一哲的大字报《杜岗的把戏——四评某些权威的批判》

(一)

列宁在揭露杜岗时说，先歪曲社会主义，把一大堆谬论说成是社会主义，然后成功地推翻这些谬论，就以为把社会主义驳倒了。

现在“宣集文”和其他“权威”以及街头那几条不三不四的汉子耍的就是这一套把戏。

一切正直的工人同志和广大群众都看得很清楚，我们论述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

可是这群无赖却喋喋不休地大骂我们，说李一哲要的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与法制，李一哲鼓吹“绝对的民主”、“纯粹的民主”，于是他们便煞有介事地长篇论述为什么没有绝对的民主，为什么没有纯粹的民主。

还有什么比公然的歪曲更可恶呢？难道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吗？难道社会主义的法制是资产阶级的法制吗？

(二)

我们从来就认为，民主是有着强烈的阶级性的，因此我们说的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这种人民的民主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个专政。反过来，党内走资派、野心家剥夺人民的民主本身就是对人民的专政。那种把民主与专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难道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八年，我们亲眼看到了，一九六六年的“五十天”里，有了刘少奇镇压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了无产阶级揭露他们的民主；一九六八年夏季在广东省有了林彪、黄永胜镇压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了无产阶级反抗他们的民主；“九一三”事件以后，有了林、黄的一伙在广东捂盖子的民主就没有了人民群众揭盖子的民主……难道这一切不是事实吗？

因此，我们从来也没有主张过什么超阶级的绝对民主，也从来没有主张过超阶级的绝对自由。那些对我们作了诬蔑的人完全是颠倒是非、无中生有的捏造。

那么，我们主张的是什么样的民主呢？我们主张的是人民群众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作斗争并对他们及他们所代表的地富反坏右实行革命专政的民主。

难道这个民主不是无产阶级的民主吗？难道这个民主会成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吗？

为了使那些无赖开开眼界，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把我们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整个基本意思表达出来，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应该保护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民主权利，并镇压或制裁那些剥夺人民这个斗争权利的“小蒋介石”，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于是，他们会质问我，难道广大人民群众没有这样一种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吗？

我们说，这种民主权利，路线正确时就有，路线不正确或受严重干扰时就没有。

他们说，这种民主权利，从来都有，什么时候都有。

其实，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歧并不在于要资产阶级民主还是要无产阶级民主，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分歧恰恰在于，他们不承认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权利，曾经有过被剥夺的事实，他们不承认在保护还是剥夺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

到底是他们的看法有根据呢？还是我们的看法有根据？让我们来看看事实。

我们现在知道，刘少奇之后，林彪便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和野心家，但是

“九一三”前，人民群众有没有揭露和批评林彪，并向之作斗争的民主权利呢？

大家都记得很清楚，甚至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也不能否认，那时候是不能揭露和批评林彪的（甚至对林彪的党羽也不能揭露和批评，广东 1968 年对革命人民的镇压就是证明），因为林彪已经把谁反对他就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政条文塞进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律之中，（见“公安六条”），难道这不足以证明革命人民群众向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民主权利——无产阶级的民主权利——曾经遭到过剥夺吗？

现在从“宣集文”到赵真哲之流却在那里吵吵嚷嚷说，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作斗争的民主权利从来都有，从来也没有被剥夺过。在他们看来，昨天喊“林×××永远健康”是“无产阶级民主”，今天喊“打倒林彪”也是无产阶级民主。但在我们看来，人民群众喊“永远健康”的时候，恰恰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完全被剥夺了向林彪修正主义作斗争的民主权利的时候。

他们现在大吹大擂说，他们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粉碎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好吧，让我们来问问他们：

“九一三”之前，你们究竟采取了哪些具体行动去揭露、去批评、去反对林彪及其资产阶级司令部呢？

你们采取这些具体行动的时候，又去一些什么样的“最好的大厦”开会，又得到了一些什么样的“最好的纸张”乃至笔墨呢？（见赵真哲“三批”）

就是说，在“九一三”以前人民群众向党内走资派（首先是林彪）作斗争的无产阶级民主权利，你们究竟是如何“最广泛地”具体享受到了呢？

你们能够回答出来吗？如果你们回答不出来，那么，就请你们不要在那里吹牛皮，唱高调吧，就请你们靠边站吧！

（三）

他们又会跳出来说，好吧，就算人民群众向林彪一伙作斗争的民主权利曾经被剥夺过，但现在不是又有了吗？

好一付无赖的嘴脸。

是的，向林彪一伙作斗争的民主权利，人民群众基本上有了，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反潮流的结果，也是人民群众付出了大量鲜血和生命的结果，好了，有了结果了，在林彪路线淫威之下，连屁都没有放一个，甚至可能还在那里为虎作伥的“宣集文”、“赵真哲”之流便出来摘桃子了，充英雄了，吹嘘他们粉碎了林彪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了。

也许，他们会抱怨说，在人民群众向林彪作斗争的民主权利遭到剥夺的时候，要他们出来反潮流是对他们的要求太高了，那么，在前一段的运动中，在基本上有了这个民主权利的时候，你们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你们那时为什么不出来“集文”一下，“真哲”一下呢？你们打人民群众的屁股那样积极，那样卖力，打林彪、黄永胜一伙的屁股却是那么消极，那么不得力，人们不得不问，你们这些像瘟疫一样，像臭虫一样，像狗屎一样的文章，它的策划者，它的炮制者，它的执笔者，“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呢？

#### （四）

对于“宣集文”的批判，我们发现了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每当我们明确地指出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时候，他总要把“人民”砍掉，然后再来问一句：哪个阶级的民主？似乎是“左”得很，似乎是“马列”得很，但是这一切仍然掩盖不住他顽固地企图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面目。

我们说：“人民群众绝对地、无条件地使用大字报这一个广泛的人民民主的武器的权利，毕竟由历史性的十八号文件确立了。”他们却把这种人民民主说成是“纯粹民主”、“一般民主”，那么，他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求的“不纯粹的民主”和“不一般的民主”究竟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是林彪、黄永胜使用刺刀和子弹的民主，是私立专案，私设公堂，私设监狱，草菅人命的民主，是“政治市容清扫队”使用水龙和扫把的民主，难道不是这样吗？

对于人民群众使用大字报这个“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毛主席曾经热情洋溢地说：“已经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矛盾绝对地、无条件地存在，人民内部矛盾绝对地、



无条件地存在，因此，作为人民群众（整个意义上来说的人民群众）揭露和解决这两类矛盾的武器的大字报，也应当绝对地、无条件地“永远使用下去”。这个道理，和由于阶级敌人的存在，无产阶级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掌握枪杆子的道理一样，是不难理解的。

最近，《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第一版连续发表了几篇署名文章，他们在教训人民群众“怎样看大字报”，“怎样对待反潮流”，“怎样辨别香花与毒草”等等。

但是，非常奇怪，这样教训人民的先生们，就是闭口不谈毛主席是“怎样看大字报”的，闭口不谈毛主席亲自圈阅的十八号文件的内容。

他们把我们的大字报说成是“反动大字报”和“反动潮流”，可是他们绝对不提倡广大干部和群众运用大字报去反潮流，据说，大字报会破坏“安定”，会上李一哲的当。

于是，毛主席说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标志”应当取消了，应当换标志了，马列主义的“标志”（大字报）应当收起了，修正主义的标志（水龙和扫把）要准备了。

先生们，你们是大字报的取消派！你们是中央十八号文件的顽固抵制派！你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运动）的拼命反对派！面对着这些反对派，我们必须再次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警句：“人民得到的权利决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

#### （五）

为了对人民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宣集文”公然炮制了一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理论。他说：

行使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就是必须遵循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规定的区别香花与毒草的“六条标准”。

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公然歪曲。

所谓“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的条件”，就是说，什么人能够享受、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呢？

毛主席说：人民。

“宣集文”说，不管什么人，“符合六条标准”的就有资格行使民主权利，不符合六条标准的就没有资格行使民主权利。

究竟是毛主席正确，还是“宣集文”正确？

对于六条标准，毛主席自己是怎么说的呢？就在提出六条标准后，毛主席紧跟着说：

“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讨论，而不是妨碍这种讨论。”

毛主席还说：

“大多数人有了明确的标准，就可以使批评和自我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就可以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

认真学习一下毛主席的这番话就可以看出：

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是在人民群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基础上检验是非和香花毒草的标准。

“宣集文”的理论对毛主席所作的“修正”就在于企图在六条标准的幌子下去剥夺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就在于企图用毛主席鉴别是非的标准去代替划分敌我的标准。

两者之间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吗？没有，完全没有！

“宣集文”这种反动理论在实践上所必然带来的危害，和事实上已经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

就是由人民的一部分去压迫人民的另一部分，就是由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专政。

我们知道，人民内部，甚至在工人阶级内部，都始终存在着左、中、右的派别（“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矛盾，解决它的办法，“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只许一种观点讲话不许另一种观点讲话是有害的。一派压一派的“派别专政”是不行的。“一派掌权（是）不灵”的（毛主席）。难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吗？

必须揭穿的是，“宣集文”鼓吹和炮制这样一种由一部分人民对另一部分人民专政的反动理论，他的真正祸心，决不是要搞什么“派别专政”，他炮制这

个反动理论，是为了使他们可以随便剥夺被他们自己认为不符合“六条标准”的人民群众行使民主的权利。所以，尽管“宣集文”“无产阶级专政”不离口，但他们主张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专政。

（附注：这四份大字报原文张贴在广州中山路到北京路口的墙上。后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即“宣集文”大量印发全省各基层单位供群众批判参考。奇怪的是，在印发的这份批判材料中，前边是“宣集文”批判李一哲《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文章，后边是李一哲反驳“宣集文”的这“四评”。因此给人的感觉是：李一哲批倒了“宣集文”。批判李一哲的主持者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安排？令人不解。）

## 二、研究资料

李九莲年谱

李九莲，女，1946年生，江西赣州人。

文革时为赣州第三中学学生，校团委宣传股长，学生会学生部长。文革中任第三中学革命造反派”卫东彪“造反兵团负责人。

1968年分配到工厂当学徒工。

1969年4月3日，年轻的李九莲因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太理解（当时对刘少奇的政治面目有些误判），主要是因为怀疑野心家林彪的若干观点被友人告发而被捕。

1972年7月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获释。

1974年春写出大字报《反林彪无罪》，要求平反。赣州地区数万人组织了“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给予声援。4月再次被捕。1975年5月兴国县人民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李九莲断断续续绝食73天进行抗议。

1976年底，李九莲在狱中宣读“我的政治态度”一文，反对华叶等走资派发动反革命右派军事政变、逮捕江青，认为“华国锋把党政军大权独揽于一身”，是“资产阶级野心家”，“寄希望于江青”……，同文中对铁杆走资派邓小平亦颇

有不敬，由此触怒了军事政变集团，1977年12月14日被判处死刑。

直到1980年1月新华社《内参》上报后才得以重新审查此案，1980年9月江西省委研究认为李九莲“属轻罪重判，错杀”，但此后为革命造反派李九莲案奔走的“李调会”成员仍持续受到政治迫害。直到今日，革命造反派李九莲案仍未完全平反。

1946年9月9日

李九莲出生于江西赣州市。祖籍江西丰城。父李忠华，老共产党员，赣州通用机械厂工人（大革命时期赣州总工会秘书长陈赞贤麾下的工人赤卫队员）。母卢菊英，家庭妇女，略识字。她共生育过十一个孩子，九莲是第九个。这些孩子们死的死了，送人的找不回来，只剩下一男四女。上有兄姐下有两妹，李九莲排行居中。

1947年 李九莲因病休克被父母装入提篮扔出去，听见哭声又提了回来。

1948年 因家境贫困李九莲被送人做童养媳。

1949年 赣州解放，父亲把李九莲背回家。

1953年9月 李九莲入学赣州市文清路小学。

1955年 因体弱多病李九莲休学一年。

1956年9月 李九莲回到文清路小学继续读书。

1960年9月 李九莲进入赣州市第六中学读初中，初二加入共青团并担任团干。

1963年9月 李九莲入赣州市第三中学63（一）班就读高中，任团委宣传部长、学生会学习部长。

1966年8月

李九莲参加原空军司令刘亚楼侄女邹军领头组织的赣州市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八一战斗队”，为三头之一，任组织委员。（赣州一中学生舒北斗任宣传委员。）

1966年10月1日 李九莲作为红卫兵小将在北京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

1966年10月底 李九莲参与组织赣三中“卫东彪战斗兵团”，任副团长。（曾昭银任团长。）

1967年4月22日

李九莲率团参加朱毅任总指挥的为营救因“反军”陷狱的舒北斗的红卫兵五

千五百三十五人绝食。李九莲堂兄李全瑞代表江西冶金学院参与指挥。绝食“斗争”持续了七天七夜。

1967 年 4 月 27 日 周恩来联络员与绝食指挥部通电话，询问赣州红卫兵绝食情况，商谈解决方案。

1967 年 6 月 6 日 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六·六”通令。同日中央文革严令当即释放舒北斗，李九莲为此而欢欣鼓舞。

1967 年 6 月 29 日 至 7 月 14 日

李九莲姐妹三人分两派，经历了赣州发生的全国最早、规模最大的武斗。武斗丧生者达 168 人。李九莲震惊不已，陷入深深的忧患。

1967 年 8 至 9 月 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在接见江西革委会主任程世清时说“江西有个舒北斗，李胜（原赣州军分区政委）变成了李败”。举城欢呼之际，李九莲却陷入协查赣南医专陈耀庭“现行反革命”案的犹疑和痛思之中。

1967 年秋 李九莲作为代表出席“江西省第一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提名为省革委会委员候选人。

1967 年 12 月 18 日 赣州军分区发布《关于为舒北斗革命小将平反的声明》，军分区政委李胜停职检查。

1967 年 12 月， 赣州市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八大成员之一的学生代表舒北斗、曾昭银同时参军入伍。当时舒北斗任市治安保卫办主任（佩发手枪）兼赣州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副政委。曾昭银是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副司令。李九莲一一为他们送行、留念。

1968 年 2 月 李九莲被分配赣州冶金机械厂当学徒工，为厂民兵团武装基干连民兵，建党对象。

1968 年夏 李九莲姐李兰香赴军垦，妹李青莲插队崇义，小妹李玉莲远赴深山“共大”，哥哥李东林则在西宁基地有“科”难“研”。

1968 年秋 看到纯洁的青年熊辉被以现反判刑的布告，李九莲同情不已。

1968 年秋 “清队”（“三查”）开始，李九莲的父亲、老赤卫队员、共产党员李忠华因黄埔军校同姓同名者被“揪出”，常跪地求李九莲代写认罪书，屡遭李九莲拒绝。

1969 年 3 月 21 日

李九莲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家庭只是整个社会的缩影。由幸福走向痛苦，这样的家庭有多少？巴金的《家》、《春》、《秋》作于旧时代，反映了时代的去向。今天的《家》、《春》、《秋》也似乎如此吧！我决不在革命的路上倒下去，只不过想试图开辟一条新的路罢了。”

1969年2月28日 李九莲给已经参军入伍的曾昭银写未署名的恋爱信。

曾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刘少奇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刘少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刘少奇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很多现象，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 二、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的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低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

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祝好！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1969年2月29日

1969年3月5日 曾昭银在不知信的作者的情况下，接信后上交团政治处。信很快被转往赣州地区保卫部。

1969年4月 曾昭银被当作“有嫌疑的人”提前退伍。部队和赣州军管小组保卫部让他协查“反革命匿名信”。

1969年4月30日 曾昭银与李九莲见面时，李九莲说破实情。当夜曾昭银向军管小组保卫部报告。

1969年5月1日凌晨三点

由冶机厂保卫科长宋德恒带领一个班武装民兵，以五一“民兵检阅”为由敲开李九莲家的门。李九莲被赣州市军管小组保卫部以反林彪现行反革命罪拘捕，信的底稿和九大前后的日记被抄。

1969年5月1日傍晚，曾昭银约见朱毅骗造“恶攻”林副统帅信是左手写，他说他原来并不知道信是李九莲写的。

1970年1月29日 冶金机械厂向地区军管小组保卫部提出李九莲交厂群众处理的意见。保卫部同意。支左部队赵副师长一人认为处理太轻，怒而携卷往省革委会要求重判。

1970年2月 林彪死党、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说“像李九莲这样全面系统反林付主席的，全国罕有”。批示：“性质是敌我矛盾，要从严处理”。

1970年6月21日 李九莲父亲李忠华在对女儿的极度思念中含冤饮恨郁郁而死。

1971年1月5日 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作出（71）赣刑字第3号判决书，以恶攻林付主席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九莲有期徒刑五年。

1972年6月20日

鉴于林彪折戟沉沙，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遮掩对李九莲作过的判决，批复赣州冶金修造厂革委会，对李九莲免于刑事处分，不戴现行反革命帽子，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1972年6月20日上午八时 李九莲被释放出狱。

1972年7月 李九莲被安排去远离赣州城的兴国县画眉坳钨矿陈也矿区当电焊工，但被剥夺一切政治权利。

1973年5月 李九莲向市、地、省投诉无效，进京上访最高法院、公安部。上访的困窘中节食资助一位带着孩子的新四军干部的妻子——也是冤屈上访申诉者。

1974年3月初 赣州开始批林批孔运动，李九莲听从朱毅意见给曾昭银写信，要求曾昭银帮其辩冤。李九莲同学丁承华为其送信给曾昭银。

1974年3月18日 李九莲往见曾昭银。曾昭银拒绝帮她翻案。

1974年4月4日

李九莲在赣州公园女墙贴出第一张公开申辩大字报——《反林彪无罪》，引发社会极大关注。随后陆续贴出《一评反林彪有罪——斥反林彪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二评反林彪有罪——谁是反林彪的英雄》、《关于我的日记》、《血泪控诉》、《乱讲一通》……

1974年4月13日

赣州地区中级法院、公安局、工代会张贴《联合声明》称“李九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大革命，确确实实构成了反革命犯罪，”“当前批林批孔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对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破坏、翻案活动，必须坚决打击。”

1974年4月14日 冶金十三队工人刘庭荣张贴《评三家“联合声明”的反动性》大字报，代表义愤的赣州人民，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1974年4月14日 地区公安局、地区工代会印发《李九莲有关罪行材料》，公布了影印的李九莲的“反革命匿名信”和“反动日记”供批判用。

1974年4月16日下乡知青康为民张贴署名“李九莲辩护士”大字报《掀翻现行反革命李九莲一案》。气压机厂工人管佑龙张贴声援李九莲大字报《路遇不平，拔笔相助》；……群众不平之鸣越趋强烈。

1974年4月17 应地区工代会强烈要求，赣州地委常委会议决议重新逮捕李九莲。

1974年4月18 李九莲去舒北斗家恳请他鼎力相助。

1974年4月19 在最后一篇公开申辩《我的人生态度》中李九莲写道：“为



了真理，我不惜再度失去自由而入铁窗！”“人民起来了，一切妖魔鬼怪统统都会被消灭！”“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1974 年 4 月 20 日傍晚 朱毅由全南回到赣州，直趋地区公安局见领导询李案。

1974 年 4 月 20 日晚十点 在地区工代会人员参与下，九莲再次被赣州市公安局拘捕，当晚押往兴国。

1974 年 4 月 22 日

朱毅、舒北斗、曾传华等三十余众署名张贴《众手掀翻独霸天》大字报，称“李九莲精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敢于探索，充满献身真理的精神。李九莲以对林彪的及时洞察表明了她是立志献身革命、酷爱真理、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敢想敢为、无私无畏的好青年！”抗议地委和公安局重新逮捕李九莲。

1974 年 4 月 25 日晚 朱毅在市委党校礼堂演讲李九莲问题真相，赣州地市二百五十九个单位签署要求立即释放李九莲的《联合声明》。

1974 年的 4 月 25 日 赣州三百民众乘车前往兴国县营救李九莲。最初曾得到兴国县革委会和公安局的支持和理解。

1974 年的 4 月 25 日下午 赣州地区公安局、工代会、红代会紧急汇报赣州、兴国情况，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下达“五点指示”：

一、李九莲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跳出来翻案。

二、赣州某些人争论李案，实际上是为现行反革命翻案。

三、冲击兴国监狱是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必须立即制止。

四、某些领导干部和公安干警在李九莲问题上严重丧失阶级立场，实际上是向反革命投降。

五、对于在李案问题上立场坚定、坚持原则的同志，应予表彰。

1974 年 4 月 26 日 省军区政委、省革委会主任陈昌奉派秘书召见舒北斗，同日赣州地委工交办主任杜昭约见舒北斗，“苦口婆心”深入反复地动员他和“现行反革命”李九莲划清界限。

1974 年 4 月 26 日

顶着巨大压力，“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立”。庄严宣告：“还李九莲以本来面目之日，就是调委会自行解散之时。或者走向真理的光明，或者走

向牢狱的黑暗。”

1974 年 4 月 27 日 李调会建立广播站、宣传组、材料组、动态组。

1974 年 4 月 28 日 李调会创刊《战旗》、印行《动态》。

1974 年 4 月 29 日 在地区工交办主任杜昭和家庭的压力下，舒北斗退出李调会。

1974 年 4 月 30 日 江西省委书记陈昌奉在省委三届八次全委会上斥责赣州有人为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

1974 年 4 月 30 日 李调会在市体育馆召开第一次万人大会宣讲李九莲案真相。李玉莲交出姐姐未被搜走的思想提纲和文字草稿。

1974 年 4 月 30 日 景凤山小学教师钟海源参加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为李调会广播站主播人员。

1974 年 5 月 2 日

李调会在赣州公园门外设立讲坛，让民众自由发表对李九莲问题的看法。这一自由民主讲坛持续数月之久。严金禄、刘挺荣、管佑龙、林锋、吴文甫等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实事求是发表入情入理、动人心魄的讲演。

1974 年 5 月 9 日 江西省委下达有关李九莲问题的“三点指示”：

一、赣州地委常委陈万兆同志支持现行反革命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省委责成其停止工作，反省交待问题。

二、兴国县委、兴国县公安局主要负责同志支持不明真相的群众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李九莲翻案，严重丧失阶级立场，责成作出深刻检查。

三、赣州市公安局批林办 4 月 24 日的声明是向阶级敌人投降，责令立即收回，挽回影响，并作出深刻检查。

1974 年 5 月 10 日 李调会发表《关于不准利用李九莲问题打击陷害革命领导干部的严正声明》。

1974 年 5 月 11 日 李调会林锋写《西安还是延安》。

1974 年 5 月 11 日 管佑龙在大字报中提出“我们的法律，甚至宪法中对当前不适应的问题也要修改”。

1974 年 5 月 12 日

省委电话指示省领导决定召见赣州李调会负责人。指名朱毅、刘庭荣、曾传

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五人前往南昌解决问题。朱毅拒绝前往。省委书记陈昌奉接见了刘庭荣、曾传华、黄智荣和赣州地区农林系统代表，调委会代表始终坚持李九莲的革命本质。

1974年5月18日 李调会大字报提出：“取消公安六条，不能用法律保卫领袖！”“阶级斗争扩大化，百扩不灵！”

1974年6月1日 省委秘书组给赣州地委打电话，传达省委“关于李九莲问题”四点意见。

1974年6月2日

李调会由一百八十四各单位签名的《联合声明》：省委的五点指示和两次三点指示，不仅是地委某些人片面汇报所骗取的，而且是省委分工负责李九莲问题的涂烈一手泡制的……

1974年6月1日 生物农药厂李冰姜写大字报《赞李调会》。

1974年6月7日 李调会刘庭荣、李冰姜一行五人驱车前往福建省寻找新华社记者戚休反映赣州李九莲案件情况。未能如愿。

1974年6月10日夜

原赣南日报总编辑、九二盐矿党委书记方道球在公园门前发表演讲，支持公开争辩李案。接着，1969年带领武装民兵第一次拘捕李九莲的冶机厂宋德恒公开演讲，揭露事实真相，公开支持李九莲翻案。

1974年6月11日 国家公安部对李九莲案件作出批示：“按省委意见办理。”

1974年6月13日 李调会廖树才写《登龙术浅谈》，对趋炎附势的小人进行解剖。

1974年6月14日 机床厂谢明写大字报《官官相护》。

1974年6月17日夜 万人空巷：朱毅、方道球、孙成璋邀请地委书记田启松激辩李九莲案性质。

1974年6月29日 大雨滂沱中，李调会主持纪念“六·二九”死难者七周年大会。钟海源主播《祭文》。

1974年6月30日 李调会李抹照、黄志荣、郭宗秀、路扬、陈富等十二人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1974年7月4日 李调会孙成璋、徐声扬等四人再次就李九莲案赴京上访。

1974 年 7 月 10 日 李九莲辩护士（康为民）写《坚持革新办李案》、《斩断接着李案的黑手》。

1974 年 7 月 12 日 刘庭荣写《法治者专政也》。

1974 年 7 月 23 日

赣州地区工代会、红代会为批判李九莲攻击李调会开办了刊物《投枪和匕首》，于是李调会小报《野草》创刊。以鲁迅杂文《野草》命名的刊物，寓意野火烧不尽。此时更名亦有在“投枪和匕首”的寒光中萌发新叶之意。

1974 年 8 月 李调委连续三次就李九莲案继续派员赴京上访。上访人员赣南纸厂林锋、地区外贸公司吴文甫和地区土产公司刘文锋。

1974 年 8 月 8 日 《野草》七期刊登曾小舟讽刺性杂文《调委会者该杀乎》，为李调会鸣不平。

1974 年 8 月 20 日 汇众思写《李案争论的根本和归宿》、《李案争论的实质和要害》等理论探讨文章。

1974 年 8 月 21 日 继《静夜扪心录》九篇之后，朱毅开始写《九吐心丝》，全面为李九莲的真理执著、革命理想、人生态度，爱情观及在禁区中勇敢探索的人格力量和精神勇气等辩护。

1974 年 9 月 15 日 朱毅发表《九吐心丝之九. 并非最后的话》动员解散调委会，以避免招致大规模镇压，但遭到李调会大多数人反对。

1974 年 9 月 30 日 朱毅、廖树才、康为民、罗汉进行李调会人员就李九莲案的第六次赴京上访。

1974 年 10 月中旬 赣州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徐承中，对李调会调查其在瑞金“三查”中滥杀数百无辜事件中的责任不满，利用毛主席“文化大革命已经七年，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最新指示，借口李调会人员“无理”强求其解决停发工资事，赖在李调会交际处北院办公区不走。据此，地委以李调会“绑架”地委领导为由密电中央。

1974 年 10 月 22 日 江西省委陈昌奉等在京常委终于通过对李九莲问题的“四点决议”：

- 一、李九莲反革命案不能翻。
- 二、调委会是非法的，要立即解散。

三、阶级敌人正利用李九莲案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四、李九莲案件长期得不到解决，一定有阶级敌人破坏。希望地委做好工作，发动群众，揭露和批判，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

1974 年 10 月 23 日 赣州地委提出取缔李调会的“八点意见”。

1974 年 10 月 25 日 为应对即将而来的大规模镇压，避免一网打尽，朱毅写《告全省人民书》，并将管佑龙、林锋、廖树才、卜谷、谢明、康宏垠等李调会骨干派往南昌。

1974 年 10 月 28 日 朱毅将《九吐心丝》底稿和《野草》等李调会文件交钟海源保存，以备不测。

1974 年 10 月 29 日

上午，朱毅贴出的《仍然并非最后的话》，说：“我们和赣州人民及其思想的女儿共同创造和度过了一段这样难忘的岁月……既然需要经过牢狱的黑暗，才能到达真理的光明，人民会相信面对铁窗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坦然的……”。深夜，赣州地区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主任朱毅被拘捕。一个小时之后，曾传华、孙成璋、李抹照、刘挺荣……纷纷被保卫干部和武装民兵从家押出。

1974 年 10 月 30 日凌晨 数百干警和五个武装民兵连查抄捣毁李调会广播站及有关场所。调委会负责人员和骨干被强制办班审查。

1974 年 11 月 1 日 赣州李调会的《告全省人民书》和为李九莲辩护的大字报在南昌八一大道旁贴了一里路长。赴昌人员在樟树被捕押回赣州。

1974 年 11 月 江西省委针对赣州李调会问题下发（74）四十六号文件。

1974 年 11 月

李九莲在狱中遭遇审判高潮。面对越愈恐怖的高压，李九莲在狱中无数次的反复吟诵共产主义者臧克家的《弔屈原》宇宙这样宽大/却容不下一条身子/天地如此广阔/思想却无处安放/只好抱着贞节去追踪彭咸/D 带一颗眷恋的心跳下了泪罗江/（生命就是这样/不能去碰死僵冷的社会/就只有碰死在它身上！——这三句显然是李九莲自己加上去的）泪罗江的水/为诗人流了二千多年的清泪/到如今/上官令尹/依然在人间充沛……（所有这一切都被视为李九莲的罪证列入起诉。）

1974 年 11 月 29 日

李调会广播员钟海源、刘华英、肖国涵等四人在赣南采茶剧团散发《强烈抗议》和《紧急告全市人民书》传单，传单如雪花从剧场空中飘落。因遭“线人”邹根保出卖，4人被当场拘捕。

1974年12月3日

赣州地委副书记吴清明在地市直属单位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处理李调会问题的报告》，称调委会“一赴兴国、两张小报、三请领导、四处南昌、五次大会、六上北京”，“这些活动都是为李九莲翻案，都是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都是妄图干扰和破坏大好形势。”

1975年1月

江西省委下发关于赣州李调会问题处理的（75）六号文件，以党的正式文件形式重申了在京学习班10月22日讨论通过的四项决议，在全省范围内宣布李九莲的反革命性质和李调会的非法性质，并且强调进一步坚决取缔李调会转入地下的活动。

1975年5月 以华国锋为部长的公安部党组讨论批准了赣州地区公安局关于李九莲问题的报告。

1975年5月22日 李九莲开始长达七十天的绝食，靠强行鼻饲得以存活。

1975年5月30日 兴国县人民法院对绝食中李九莲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75年5月30日 全南县公安局对朱毅正式逮捕。

1975年7月3日，仍在绝食中的李九莲被从赣州的江西二监狱押送到位于赣北鄱阳湖畔的珠湖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例行检查时发现李九莲写于绝食前的绝命书——《投降书》：“不知何人，劝我投降，似真似假，为此写出‘投降书’。是的，我有‘罪’。

我的‘罪’就是为党出过力，效过劳，动过太多的脑筋。真理是个美丽的字眼，吸引了无数的年轻人，我为她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原则，我做到了不怕开除厂籍，不怕解除婚约，不怕坐牢，不怕杀头……

凡真理，都有三种遭遇：用得着时，便奉为至宝；用不着时，便贬为粪土；非但用不着而且有。‘害’时，就象狗一样关进笼子里——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理的遭遇。谁准备用真理的花环装饰自己，谁就得同时准备用粪土包裹自己纯

洁的灵魂！”

1975 年 9 月 27 日，赣州地委决定对李调会人员第二次大抓捕，刘庭荣（后被判刑 15 年）、管佑龙（后被判刑 15 年）、钟海源、康为民（后被判刑 7 年）、林锋（后被判刑 5 年）、罗斌（后被判刑 15 年）、邱彩云（后被判刑 10 年）等 16 人被拘捕。

1975 年 12 月 20 日 朱毅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1976 年 5 月 钟海源坚持为李九莲鸣不平，被加刑五年至十二年，押往南昌新建服刑。其他被捕调委会人员，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高潮中被判五至二十年不等。

陈益南《回忆湖南的批林批孔、批卜揭景运动——批林批孔运动让造反派第二次风光》 现在的人们，以为文革运动就是一派观点对另一派观点，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其实，这是个误解，事情远不是这样简单。实际上，文革中发生的情况，既复杂交错，而各地发展也不平衡。更特别的是，对于文革的理解与诉求、愿望，上面与下面，往往想的是两码事，而仅仅只是在运动的某些过程形式上，好像显得是追求的同一个人。 批林批孔运动中，就极鲜明的体现了这个道理。 在高层，批林批孔，一则是为出现令人尴尬的林彪事件，做一些事后的补救说法，以证明林彪是如何打着红旗反红旗，才欺骗了世人的。二则也是对于任何企望否定文革、回复旧体制者，从理论上堵死因林彪事件而露出的漏洞。 而到社会底层，受压数年的造反派则利用这次高层“反复旧、反倒退”的机会，利用上海的王洪文这个造反派头头居然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特别情况，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大反击，从而达到了又一次为自己“平反”翻身的目的。 现在很多人以为，在文革中，造反派作为一支产生于文革、也拥护文革的特别政治势力，一定在文革中都享尽了荣华，抖足了风光。然而，历史的真实，却并非如人们的想象，很多情况甚至是恰恰相反，十年文革，从整体上讲，给予造反派的苦难，远远多于风光。除上海那个特殊的地方外，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各省（区），自从中共“九大”后，随着“一打三反”与抓“五·一

六”这二个运动的进行，造反派的骨干分子们便先后跌入到了重新挨整受压的境况，文革初期他们曾被戴上过的“右派”、“黑帮”、“小邓拓”等政治帽子，相当多地又重新以“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坏分子”、“五·一六分子”罪名，被打入了专政对象的行列。文革中因造反运动而产生的所谓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依然在行使权力，但它的构成，只剩下了“三结合”中的军队首长与原地方领导干部，而已将原在其中的造反派分子都踢了出去，并且，也是以“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对造反派进行了大规模的整肃。可以说，自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九大”后，除上海的王洪文等，因其得张春桥、姚文元特别庇护而能持续掌权外，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却先后陆续被整肃而垮台，至一九七四年初开始进行“批林批孔”运动时，已陷苦难泥潭长达三、四年之久了。湖南的造反派分子重新集结反攻，以求获得再次翻身的行动，是从当时实际主政湖南的卜占亚因林彪问题而下台并受到批判的时机，予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前，尚只是“批陈（伯达）整风、批林（彪）整风”运动，而且尚只局限于省市级的党政官员内部层次，与下面的老百姓没什么关系。但是，湖南的造反派们却从中看到了借此使自己得以改善处境的机会，因为，曾经在这几年负责主持全省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卜占亚，在“批林整风”中倒了台。身为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的卜占亚（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一职仍由已调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兼着），原是一个军人，他的一个重要的身份，即为广州军区副政委。而就是这个大军区副政委的身份，让他莫名其妙成了林彪在线的人，在林彪事件后的清查工作中，被受到牵连。一九七二年十月，他被作为与林彪事件有关的人，跌入了灾难黑洞，被中央撤消其一切职务，并对他进行审查。卜占亚出了问题，按文革中常有的下揭上连、上联下串的运动形式惯例，一九七二年底开始的、湖南的“批林整风”运动，便演变为了“批林、批卜”运动。而当一九七四年初，全国性的“批林整风”转变为“批林批孔”的大规模运动后，湖南的“批林、批卜”，更正式转为公开的“批林批孔、批卜占亚”活动了。在湖南省会的长沙市做了较长时间的市革委会主任的景林，也是军人，他是省军区的副政委。当时，省、地市、县革委会的一把手，大多是军队干部，所以，人们对卜占亚、景林这二位省与市革委会的头头，平日不论是开大会作报告，或是私下谈及他们二位，都是不称“卜副主任”、“景主任”的，而是称之为“卜副政委”、“景副政委”。



因为，卜占亚不可避免是景林的亲密直接上司，因此，造反派便成功地造出了舆论，使湖南的“批林、批孔、批卜”口号，扩展为“批林批孔、批卜揭景”，将求翻身而再次造反斗争的锋芒，重点放在了卜占亚与景林这两位“副政委”身上。当时，已没有什么造反派群众组织了，原来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在成立革委会前后，早已被解散了。那么，造反派们是如何集合而来再次进行造反的呢？

第一，利用合法的组织形式，将各单位的原造反派积极分子骨干分子汇集起来，重新聚集为一股强大的政治活动力量。第二，则是再次让大字报发挥舆论作用，以呼唤与联络造反派成员、影响“批林批卜”的形势、并藉以公开向中央传递造反派的信息。

这个合法的组织形式，便是利用了一个名为市“工代会”的组织，并在实际中，使市“工代会”变成了一个新的造反司令部。

所谓“工代会”，全称叫“革命工人代表大会”，原是在文革中期解散所有造反派组织时，按中央指示，将工人造反派都统一纳入到新成立的“工代会”，以便将来取代文革前的“总工会”，使“工代会”成为一个纯粹的工会组织。所以，尽管解散了所有的群众组织，也经过了“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的运动而整肃了所有的造反派，但这个“工代会”机构却仍保留下来了。

不过，由于因应如何将“工代会”代替工会的操作办法与政策，中央一直没能够下达，因而，这市“工代会”无事可为，它便被造反派、也被官方、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而仅仅在市革委会大楼的后面不远的一条小街上，留有二间临街而不大的办公室，挂着一块小小的“市工代会”简易木牌，留有二名工作人员守在那儿。

一九七二年底开始，这二间小小的市“工代会”办公室，渐渐成为造反派们悄悄串连聚会的场所，一些原来有着省或市的革命委员会常委、委员身份的造反派头头的工人，也不时地出现在这儿，向到场的造反派们传递有关“批林、批卜”的信息，并发布一些秘密行动指令。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些，是因为造反派头头中的工人，基本也都是这“工代会”中的主任、常委及委员什么的。因而，他们便能借此身份，一步一步，名正言顺地集合到了这个小小的“工代会”办公室，将这里变成了进行再次造反活动的“司令部”。

与此同时，大字报也上街了。当然，大多是造反派们所为，主题是批判卜占亚与景林，称他们为林彪路线的在湖南长沙的代理人，内容则将他们整肃造反派时发布的指示与讲话，抨之为“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而否定文化大革命”、“重蹈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

由于有“批判

林彪路线”这个旗号，加上当时对于卜占亚的问题，是由上面“端出”而并不是由群众揭发出来的，因此，对于造反派们的这次反击，省市市委与省市革委会的当权者们便不敢随意镇压，而任凭造反派暗中串连与大字报公开上街。加之，毕竟文革初期那次由于镇压学生红卫兵而后导致了他们挨批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在中央没有对这类问题处理的明确指示下达前，他们显然会认为，最好的办法，自然是旁观而不动作。 那段时间，我也是市“工代会”那二间小房子的常客，在休息日或下班时，都想到那儿去看看、听听，有时也与省市级别的造反派头头们，讨论对时局的看法与应采取的行动起来。在那襄，我是一个最年轻的人。因为，各单位造反派工人的头头们，当时大多是三十、四十以上的年龄了，而我却只有二十出头不远，所以，在“工代会”聚会的造反派，都以为我是文革初期的中学红卫兵。我告诉他们，我已是一个有着八年工龄的工人，并且曾在几千人的公司担任过革委会副主任时，大家都有些惊讶。因为，他们都看到过我在这段时期所写所贴的大字报，于是便视我为“会写文章”的知识青年，也误认为我是一名前红卫兵。毕竟，在文革前段高潮中，除了仅以普通成员参加“青年近卫军”那件社会活动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只在本单位搞造反，与省市级的“工代会”头头们基本没有多少往来。 我写的并贴在了市委大楼外墙上一份名为“怎么办？”的长篇论文大字报，当时曾引起过很大的轰动，每天都有几千人围观，并且还得到许多观看者的留言支持。那大字报实际是向重新回湖南工作再担任省委书记的张平化的一份进言，向张反映长沙的造反派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挨整的情况，并希望张平化能解决造反派受压的处境。 张平化在文革前就是湖南省委的第一书记，在文革初，他一场“抓右派”的报告，曾让成千上万的普通群众与干部遭到了短时间的厄运。造反运动开始后，他自然成了被造反派们批斗的重点，后来，中央将他召到北京，检查几年后，于一九七三年三月又被重新派回湖南做省委书记，主持工作。 大字报贴出后，也有朋友为我担心：因造反，一九七〇年挨了那么长时间的整，现在又造反，结局那将会如何？太令人不安了。 我当时似乎想通了并做出了自己的人生抉择：与其这样像一个准“四类分子”般的生存，不如拼他一把，以争得应有的人权。何况，我也觉得，这道理似在我们一方：我们闹造反，不是毛主席与党中央号召的么？不是有那么多中央文件与毛主席指示为证么？可是，为何却又要将我们置于死地呢？而整造

反派者，实际不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新形势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我的活动与所写大字报的影响，使我不知不觉成为了一批造反派活动分子的负责人。因为，我们不仅常聚会于市“工代会”的小房子，而且更多时间，是在原市委大楼的第六楼大礼堂召开几百乃至数千人的大会，宣传鼓动批判卜占亚与景林。因此，我便被人认为是所谓“六楼派”的骨干分子。那时，原市委大楼的六楼礼堂，空着的时间很多，我们到那儿召开大会，市委办公室的人也不敢管我们，任由我们活动。而我们这批被称为了“六楼派”的人，在当时，实际是做了全省造反派又一次展开反击的先锋部队。我们有时写大字报，或者以大字报形式张贴大会通知时，落款署名则为若干个工厂企业单位的“革命工人”。那些署上名称的企业，实际有的只来了几个人，甚至是只有那企业的一个工人或干部，但却便可添加上他所在的企业名字。因而，几百名“革命工人”举行的大会，却能在大字报上列出上百个企业单位“参入”者的长长名单，让全市有名气的工厂大企业几乎统统出了场亮了相，气势顿时显得非凡，让其它未入会的造反派们信心大增。自然，这也使当权者们感到了不知所措，也不敢轻易予以弹压。 对这套无师自通的组织宣传办法，及其产生的积极效应，我们这些领头者都很得意。文革后，有次我读中共党史资料时，看到一篇自传性质的文章，是原中共第六届中央候补中央委员唐宏经，写他如何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那二个月中，凭他一个人单枪匹马，竟一下子将散沙一般的旅大市二十万工人组织了起来，并迅速搞成了一个受到抗日的苏联红军占领当局承认的市总工会。仔细看他那组织速成法，原来竟就是像我们这“六楼派”的做法一样，不，应该说，是我们的做法，竟无师自通地与工人运动老前辈唐宏经的套路相同！那时，唐宏经也是将他熟悉的一些工人朋友召集到一起，并要他们再各自多召集一些熟人朋友，然后由他集合领导，并宣布凡来参加这工人集会者，均可代表他所在工厂企业的工人，哪怕那企业仅仅来了一个工人。然后，唐宏经以这些企业的工人代表名义，向苏军当局申请成立市总工会。见有那么多工厂企业的工人代表参入，苏军当局自然巴不得工人能组织起来，于是，立马表示批准支持。有了市总工会的名义，自然很快几十万工人便被正式组织起来了，成为了抗战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在东北公开成立的强大市级工会机构，从而使来“接管”旅大市的国民党人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想不到，几十年后的我们，无意中也就学会了这种工运组织速成法。 由

于我们的活动实际是全省造反派的先锋，所以，省市级别的造反派头头，如连续做了第九、第十两届中央委员的唐忠富，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胡勇、叶卫东，市革委会的副主任许新宝等，都关注到了我，并让我参加了数次全市造反派头头的秘密会议。由于我是当时与会的造反派头头中最年轻者，又是当时活动影响很大的“六楼派”负责人，因此，使我得到了大家的很多好评，也让我由此而结识了湖南与长沙市几乎所有闻过名的造反派头头，并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了长久的朋友。无疑，我的活动也纳入了官方关注监视的范围。不过，在当时文革仍受中央肯定，而文革前段那次高潮中发生的种种“造反有理”事情，仍深深烙在人们的思想当中之际，官方也没有对我有什么为难。只是，每当在我们举行什么大会或活动而显得过激时，有时会有人悄声向我做些劝说，并且，他们也告知我，他是市委办公室的人。这是由于，当时调到长沙市的市委张书记，原本就是一个在文革中支持过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被称为“亮相干部”），他同情造反派的遭遇，但他却也不希望出现他无法控制的局面而受到省里的指责。所以，有时候，他仗着他曾支持过造反派、受到过省市造反派头头们尊敬的地位，竟然会带着市委干部们上街撕我们贴的大字报，别人不敢撕，他就带头第一个撕。我们开大会，他则带着一群市委办公室的干部们，像我们造反派曾对付当权派的会议那样，让人上台制止我们的会议进行。他的行为曾让我们为难了一阵，很是恼火，有的人还气愤地说：“干脆将大字报贴到张老头（指张书记）的家里去！看他还撕不撕我们的大字报。”与他斗吗？他确又是一个曾支持造反派的“亮相干部”，省里的造反派头头们也不同意。任其带头撕我们的大字报、中断我们的大会？却又损害了我们极力想点燃再次造反烈火的计划。后来，只好用派人缠住他的办法对付他，一贴大字报，一开大会，就布置了专人，若张书记一出场，这些专人就会上去缠住他，让他无所作为。现在想来，张书记当时也是一片好心，不想我们再出什么事。可是，他没想想，我们这么多造反派已再次被打成了“反革命”、“坏分子”，再次陷入了类似四类分子们一样的境况，不再次奋起造反解救自己，能行吗？文革以来，我们都有了一个经验，中央的指示，若不自己奋力落实，是没有人会主动为我们考虑的，当权者大多数都是曾被我们造过反的领导干部，他们岂会喜欢看到我们平反的结局？另外，中央的指示，实际也是有时效的，该落实时你不落实，等过一段时间，这指示就不能再办了。所以，当时省革委会副主任、

造反派头头胡勇说了一段话总结：“落实中央的政策，就像打一场篮球，是有时间规定的，在场上你不用力，到时，哨子一吹，散场了，什么事你就都不能做了，政策过了期，就会作废！”所以，我们对张书记既尊重他，但也绝不会都听他的。张书记曾两次派人将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话，既为了解情况，更是为劝说我们，不要使他为难。我们当然也只能敷衍他，不能冲他，也不能听他。不过，据我看来，张书记的确是个厚道长者，说话很直率，说得不对，你批他，他会先同你争辩，但他若觉得自己确不妥时，他又会当面向我这些后辈道歉。就是我们直呼他“张老头”，他也不恼，还笑眯眯的。当时，张书记自然日子不会好过，因为他被夹在了中间：对我们弹压不力，省委则批他；对我们做过分了，他于心不愿，并且也不想得罪造反派们，加之我们有时也会攻击他、敲打他。其实，当时，谁处于了那个省会长沙市的市委书记位置，都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上有中央要搞批林批孔运动的指示，下有负着冤屈而怒气冲冲的造反派，夹处在中间的领导干部，两头都得罪不起。[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所以，当时很多领导干部便以休病为名，自愿放弃领导职务，躲到医院里面去见机行事。四人帮垮台后，张书记被作为“四人帮”在湖南的一个支持造反派的“黑手”，开除了党籍、干籍，判刑七年，此后每月只发几百元生活费，后于一九九一年初病逝。他治病期间，我曾去医院探视过他，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想在出医院后，回山西文水老家一趟，因当时这种状况，这种年龄，这种身体，不知以后还能不能行走远方。他说，他自一九三七年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后，又随军南下，便再没有回过老家，现在特想回去看看。山西文水，也就是出了一位女英雄刘胡兰的那个地方。他从山西回长沙后，还向我馈赠了二瓶文水产出的酒，说是他们文水的特产，也是那首后来曾被热唱过一阵的《交城山》歌词中所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文水”的甜水，而酿制的。其实，我觉得张书记的人生是挺冤的。文革前，他就是一个地委书记，文革中，他并没有获得什么额外的提升，还是做市（地）委书记。而且，他那支持造反派，也完全是想不想局面失控而出头来支撑，并非什么卖身求荣。当时，他若狡猾一点，或者没那么重的责任心，即便支持造反派，也只虚于委蛇敷衍一番，不真来出面为上级挺着，那么，他的结局反而不会那么惨。当时，那么多休病的领导干部们，后来都个个风光洋气，还口口声声说什么与“四人帮”作了斗争。实际上，他们是躲避了那场本应由他们出面维持力争使局面不乱的风暴。

张书记当时若也像他们一样，或假称病而住医院去，或向省里请求调离长沙这个省会，到远一点的遥远地区去任职，躲开这政治风云，那么他的后半生日子便也可安然无恙。张书记的山西老乡中，有一个就是华国锋。张是文水人，而华则是文水邻县的交城人。（但是后来我从一份资料上看到，说张也是交城人，而我确记得张书记同我讲了他是文水的，是我听错了？或者还是张的家乡原是交城县而后又变动为属文水县的了？不过，无论如何，张书记与华国锋曾是很亲密的“老乡加战友”了。一九四九年张与华一道南下到了湖南，张被任命为湖南醴陵县委书记，华则担任了湖南湘阴县委书记。）华后来上台做主席时，那首《交城山》老民歌被翻出来大唱了一阵，那歌中有一句词说“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不浇那个交城，浇了文水”，而在张书记与华国锋二人身上，交城的水，可没恩泽于文水的张书记。他俩原来关系并不错，又同在湖南共事二十几年，文革中，华也支持过造反派，一段时间，是与张同属一个阵营的人，对张在文革中的状况，无疑是很了解的。四人帮倒台后，身为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其实是很容易出手来救助一下张书记的，随便发句什么希望减轻对张的处分的话，湖南当局就会听从。即便非要处罚张，也似可不搞得这么惨：又是开除党籍干籍，还要判人家的刑。至少，应可不判刑而保留干籍，让他有一个身份领工资、能公费住院治病而养老送终。然而，华国锋却没有做这样举手之劳之事。

批林批孔运动初期，除了我们这些人在市里鼓捣造反外，另外还有一支力量也在争取“要平反”而闹造反，他们的负责人是一个姓纪的工人。纪某在一家区办工厂工作，也是一个老造反派，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也被整得死去活来。所以，他的造反积极性非常之高，而且，由于他也有很强的演说鼓动能力，故他在市里的建筑工人俱乐部内，便经常能集聚着一些工人造反派。但是，他那个“山头”与我们“六楼派”不同，他是完全凭其一个人的组织能力搞成的集会，而我们的背后，却有着是中共中央委员身份与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常委头衔（当然，当时并无实权）的造反派头头的系统支持。所以，当我们贴出的大字报，说我们代表多少多少工厂企业的工人时，虽然不无虚张的成份，但的确也是能有相当的代表性，是能以全市造反派工人的身份发言，因为我们的身后真有省市级造反派头头的指挥。

然而，纪某的发言，虽确也代表了全体造反派的利益，可是从组织性质来讲，他却只能代表当时参加他那集会的几百名与会者。可惜，纪某当时没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

当我们派人同他去联系，希望两股势力能合到一起来，共同展开造反活动时，纪某却不愿。他一则认为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唐忠富等头头“太右”，而我们“六楼派”又是追随唐忠富等头头的；二则，他可能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以为批林批孔运动是又一次文革高潮的开始，是重新进行造反派“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一次新机会，而对他凭个人单枪匹马也能集聚这么多任务人的所体现的能力，可能自我评价过高。因此，他不想合作，依然以那工人俱乐部为他的“司令部”，单独进行造反活动。但是，批林批孔运动毕竟与文革前期造反高潮时的形势不同了，毛泽东与中央都不会同意全国局势又发生混乱，即便允许工人造反派们活动，也只能在新的秩序下进行，即在以党委、革委会的领导名义下进行，至少，也得在官方的各级总工会领导名义下开展。由于当时已有很多造反派是省级革委会的成员，还有不少副主任、常委之类职务头衔，因为，虽然“一打三反”运动将他们赶出了权力舞台，但由于他们的任职是中央批准的，而中央以后却又没有明确下文撤消过他们的职务，所以，他们即便已无实权而在做工人了，但凭这些虚衔，却可以在革委会中发挥造反作用。所以，中央的这一既要搞运动而又不想局面失控出乱的精神，大多数造反派头头们也愿遵照执行。纪某没有看到这一点，由于他是单枪匹马，故也看不到有关中央文件精神，而我们通过中央委员、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头头却能获知。因而，纪某组织的活动，常常不知进退的分寸，而仍只是重演过去的主观造反故事，结果，既不为当权的官方高兴，也不为正统的造反派头头喜欢。最后，一九七三年底，终于在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场之际，孤立无援的纪某，却被官方在正统造反派头头们的默许下，动用公安，被逮起来了，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山头”。纪某被抓捕关进监牢后，他所追求的愿望，即为受整受压的工人造反派们平反的希图，却在唐忠富、胡勇等造反派头头们的领导下，借已做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的一次讲话精神，大规模的开展进行了。而为此愿望也作过极大努力奋斗的纪某，却被以扰乱社会的罪名，反被法院判了二年刑。那情形，真是“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但结局终究是“春来反雕残”，令人不能不为之叹息。作为个人，纪某确属冤枉；但是作为一种群体首领，他则却是搞错了方向，而未能正确的审时度势。在需要承认历史平台之时，却不能顺势，总欲凭个人的力量重建新队伍，逆势而为，结果，反遭同为造反派者打压。像这类因意见稍有不合，便另行自立山头的事情，在文革

群众组织活动高潮之时，是经常发生的，人们也不以为然。但是，一般的情况是，分裂出去的人，要搞出新气候，往往并不容易，也不能动摇原有组织。而到社会走向需“治”而不再要“乱”的形势下，不随大队伍而另立山头者，更是难以做出什么新成就，而往往还会遭到同性质的大组织势力的打压。文革高潮中湖南发生的“省无联”事件，批林批孔运动初出现的纪某“小山头”事件，便是证明。同室操戈，固属心痛，也为憾事；但，同室之内，各吹各号，不能统一，也确实让人恼火，易使人生打压之心，出现历史悲剧。此类现象，不独文革，自古即有，而今也不能断。不过，除了纪某被打压以外，湖南的造反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却又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那就是以胡勇、唐忠富为首的原“汽电”派系的造反派集团，居然将原被他们打击过的“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造反派，都又成功地团结统一起来了，以共同争取造反派的再次翻身。胡勇等头头不仅向“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那些头头做工作，让他们出山，并且，还向他们作了适度的自我批评，表示过去对他们有些做法“过了火”。由此，使叶卫东、周国强等原已遭冷冻的造反派头头都得以东山再起，恢复在省、市革委会中的职务，重新进入湖南造反派的决策层，进行造反活动。甚至，一些已入狱几年的“湘江风雷”派系与“湘瓷”派系的造反派头头，如“湘江风雷”的王某，湘潭的“湘瓷”派头头沈桂华等，包括我们“青年近卫军”的海司令，都被胡勇等人设法，一度保释出狱（包括海司令在内的这批出狱者，后来因形势急变，而其问题又尚未迅速得以结论，有些则又重回了监狱）。这样，一九七四年湖南的造反活动，便出现了一种造反派重组力量后呈空前一致行动的独特态势。一九七四年二月二日，北京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将一场运动称之为“斗争”，使人们不能不再次关注政局形势的走向。然而，让湖南的造反派们真正激动与兴奋起来的，却主要还并不是这篇《人民日报》社论，而是通过各种正式与非正式渠道传达下来的王洪文的一个讲话。王洪文作为新上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元月间在中央所办的工农干部读书班中，对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或省一级机构负责人中的“群众代表”（即由造反派头头与各种有名望的工人或农民劳动模范）发表的一个讲话中，大力赞扬了“反潮流”的造反精神，并提出了要大力提拔造反派分子进入各级领导机构，还具体说了要提拔一个三十来岁的人，做大军区的副司令员，以树一个提拔年轻干部的榜



样。后来，果然，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立了大功的边防部队副营长孙玉国，一个三十来岁的青年军官，首先“坐了火箭”，连升数级，很快被提升为沈阳大军区的副司令员。听到王洪文的这篇倾向明确的讲话，湖南的官方领导与造反派头头们双方，都觉得找到了一个共同的沟通平台。于是，以造反派为先导、并大体上顺着造反派意愿的新一轮平反与批判运动，便在“批林批孔”的旗号下，由省委与造反派共同营造，而轰轰烈烈地又搞了起来。省委领导人自然从王洪文的讲话中，感觉到了某种份量。虽然，他们在心中，对王洪文不会有好感，但，此时的王洪文却不再仅仅是上海造反派“工总司”的头头，也更成了中共中央的副主席、毛泽东的接班人；他的话，不再是造反派头头常常发出的虚张声势的“通令”，而已经是不能违抗的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了。对此，省委领导人又岂敢不听从何况，湖南的“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对于刚回湖南重新担任省委书记主持工作的张平化，则根本没有任何责任，那全是卜占亚当权时的问题。大概，吸取了前次没有坚持支持造反派的立场而结果差点被打倒的教训，因而，这次对造反派，张平化便小心翼翼不予得罪，以免在这场新的造反运动中，又被挨批挨斗；加上这次又有已是代表官方最高层意见的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讲话精神，传了下来，便使张平化加大强化了顺从造反派的想。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一日，省委批准，由唐忠富为首的湖南省总工会和长沙市总工会联合召开十五万人的批林批孔大会。随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三位省级造反派头头，还联合以“富勇忠”的笔名，在《湖南日报》上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篇幅文章。由此，湖南的“批林批孔”运动之初，就出现了几乎是官方全体向造反派方面一边倒的局面。各级党委都公开表示支持造反派，并迅速落实解决为造反派平反的问题。甚至，如上文所述，对某些被关在监狱的造反派头头，如原“湘江风雷”的头目王某与湘潭“红造联”的头头沈桂华，在其平反工作的材料还没有准备好之时，省委常委便同意造反派们的要求，先将他们保外释放再说，“先下车，再出票”。同时，很多单位的原保守派人士，也都采取了一种不对抗而顺从造反派的立场，以避免受到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中被他们整过的造反派们的报复。这一来，湖南便在短时间内出现了一种“各派团结、一致造反”而均都欢欢喜喜的热闹形势。造反派们不仅能较为顺利地平反、再次烧掉单位整自己的“黑材料”、恢复革委会职务，还能入党；而

保守派们则为自己能获得造反派们不予报复、也仍保留他们在整造反派时得到的党籍、干籍而不受威胁，与革委会曾将他们“补台”加入之事实的承认；各级党委的领导们，则更为自己这次不用再受造反派的批斗，反而能同造反派站在一条“战线”上、可轻轻松松顺利渡过这场新的造反运动而庆幸。虽然，在大批造反派们加入中共党组织、并且有的还被正式提为党内的领导干部后，也曾引起过一些保守派公开表示不满，原“高司”派方面有六个人，也曾写了一封公开信，还贴到了大街上，对当时省委顺从了造反派的一些意见深表不满；并且，有人还以“穷志诚”的名义（针对于造反派头头“富勇忠”笔名），在城市中心广场，贴出了反对造反派观点的大标语。但是，这种公开的反对很微弱，在长沙市能够公开出头来这样做的人也很少（省下面有的地区则多一些），根本没会成为一种公开的、有组织的潮流，而其标语，却常常很快就为造反派方面的标语所公开覆盖或撕毁。甚至，当时中共长沙市委，还专门召开全市领导干部大会，发文件，指责以“穷志诚”名义在活动的保守派。造反派们当然能从王洪文的讲话中领会到自己应该如何做，立马看到了下一步造反的“前景”：重新进入各级领导机构，而且这一次，不仅仅是解决平反问题就完事，也不是以单纯的“造反派”名义，而是要以中共党员的身份进入掌权者的行列。不过，最初，造反派的我们，希望借批林批孔运动解决的问题，只是要争取为我们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挨整的事（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五·一六分子等），予以平反，讨还基本人权。至于什么入党当官，开初则的确还没有考虑到。但，王洪文的讲话，却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彻底为自己平反的最佳途径，那就是自己也去当中共党员，做中共的官员，以免以后仍还在掌权的“走资派”与保守派分子手下过日子，随时又有遭挨整的危险。对此，造反派用一个策略性口号将其具体化，提出：借此东风，不仅要实现推翻“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中镇压造反派的整条路线，使造反派再次予以获得平反的大事，而且更要完成毛泽东与中央在一九六九年年初曾提出过的“吐故纳新”，即将造反派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先锋分子、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到中共党内的方针；提出“只有从组织路线上，同时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落实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才能保证从政治路线上真正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落实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才有可能永远摆脱造反派总是挨整的命运！”这个策略的具体做法，便

是迅速让各级党组织吸收造反派的骨干分子，同时，将他们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文革中修改的党章规定，新入党者已不需预备考察期，入党即为正式党员，所以，造反派骨干分子入党后，即可进入党委领导机构。造反派在操作这件事时，作为施行方针的团体力量，当然不能再搞群众组织“司令部”之类的山头，那样做决不会得到中央的同意。但一切事情若都需党委同意，那造反派们欲实现的要求，便又只会遥遥无期。因为，当时，没有哪一级党委会喜欢造反派卷土重来，更不会甘心同意造反派合法地进入各级党委机构，实行变相部分夺权。虽然王洪文的讲话，来头不小，但对付中央政策，地方上早已有驾轻就熟阳奉阴违的办法。如果没有一定的压力出现，王洪文所提出的“吐故纳新”，就会在地方上成为一句空话。深深明白这一点的湖南造反派，于是很巧妙地在省地市县及所有企事业单位的党委体制下，搞了一个“批林批孔运动办公室”（简称“运动办”）的机构，造反派便凭借这个“运动办”，作为与省地市县各单位党委交涉，要求达到上述目标而进行施压或讨价还价的指挥部，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压力团体，在实际运行中与各级党委并行存在，而成为了党内建制合法的特殊机构。由于这个“运动办”虽是基本由造反派左右，但却是党委的工作机构，所以能量很大。在省内各级“运动办”的运作指挥下，自四月份起，为造反派的再次平反活动，以及几乎同时进行的大批造反派骨干分子加入中共党组织的活动，便如火如荼展开了。这样，文革前期中大造各级党委的“反”的造反派分子，在七年后，却又大批地要求做一个中共党员，有的还成为了党委会机构的要员。例如，长沙港务局的造反派头头赵某，平反、入党后不久，即被任命为该局党委会副书记。此时，中央也任命造反派的中央委员唐忠富担任了中共省委常委，胡勇则进入了省委委员的行列。人们对当时造反派们既要造党委的反，却又要求做一个党员的做法，这个看似矛盾、也显得滑稽的事实，如果不清楚上述文革运动的前期起伏周折的情况，那便会绝对无法理解。当然，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加入中共的造反派，在四人帮垮台后，全部被指责为“突击入党”，并宣布对他们的党籍，全部不予承认。我也成了我们公司“运动办”的一名副主任。那时，已撤消了原来合并重组的新公司，仍以原来的体制还原了公司构建。一九七四年二月，在很短的时间内，由市委与商业局党委发下了文件，对我们公司革委会几位正、副主任宣布予以平反、恢复公司革委会正、副主任职务，并且，将被贬到

市里停车场守大门的章忠全调回公司，重新担任了公司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当然，公司前所谓“走资派”江山，也仍继续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做第二把手。同时，退还了在“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时整我们的那些档案材料。有部分档案材料，因是其它人的检举，不退本人，只是在平反大会上当众烧掉。在看烧那些材料时，我很高兴，心想总算从类如“四类分子”的泥坑里跳出来了！但是，不知为何也有一种担心油然而现：以后会不会又被再次打入另册呢？果然，没过几年，四人帮垮台后，这些被烧掉的东西，又重新被人整理，再次装进了我的“档案袋”，我的名字也再一次重入另册。我入党的事，进展非常顺利。不过，对于入党这事，在三个月前，即王洪文的中央读书班讲话精神传达下来前，包括我在内的所有造反派，是谁都没有想到过事。因此，当长沙市委在市港务局率先做了一次吸收造反派头头入党的典范试验，甚至下发了一个要求积极发展造反派入党的文件后，我们便知道，一九六九年原吹过的“吐故纳新”之风，真的又来了。虽然我又已是公司革委会的副主任了，但按组织原则，我的党籍需要在自己所在的机修厂党支部解决。于是，我向机修厂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机修厂的党支部书记、全体支委，以至支部全体党员，都一致投票同意我入党，于是，一九七四年四月八日，我就成了一名中共党员。文革期间中央有新的规定，中共新党员不需预备期，入党即正式获得党籍，所以我一入党即是有被选举权的正式党员。当然，我也知道，虽然我平日在机修厂的群众关系不错，但那些党员们，无疑，并非全是真心同意我入党的，之中，特别是文革中的保守派骨干，以及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入党的积极分子，让我这个造反派小头头入党，他们是极不情愿的。但是，当时类如文革初期造反风潮时的批林批孔运动大势，使他们又不敢反对，或者是他们害怕，或者是他们也认为这次不能站错了队，即不能再做保守派。因而，我入党的事，便无任何障碍。我虽然被恢复了公司革委会副主任一职，但此时我的兴趣却转到了共青团。当时商业局要筹组新的共青团委员会，因我当时尚只 24 岁，又是公司革委会头头，还成了中共党员，于是，我被邀请参加新局团委的筹建，出面组织领导了局共青团的“运动办”，以与省、市共青团委的“运动办”对接。我便从基层单位挑选了一批有造反观点并有政治抱负又能说会道的共青团员，到局团委“运动办”工作，同时想将他们逐渐培养成局属各公司的团委书记。我的挚友聂常茂，是另一个公司属下

一家豆制品厂的革委会成员，后来也作为造反派的优秀分子而入了党，他也被我邀请到局团委来工作，作为我的副手，一道筹建了新一届局团委会班子。这一来，领导局共青团“运动办”的事，便成了我的主要工作，而没有去打理公司革委会的事务。由于我有在社会上造反的经验，因此，没多久，我们商业局的新团委（我任主要负责人）及其“运动办”，迅速在市里与省里都创出了名气，省市级的造反派头头们都知道了商业局团委这支“不做小绵羊”的新红卫兵队伍，也知道了是我在领导。因而，后来我被认为是造反派的“预备队”的代表及负责人，经常被邀参加省市造反派头头的核心会议。不过，以批林批孔为形式的文革第二次造反高潮，没能维持多久，仅搞了四个多月就停了下来。因为，毛泽东对批林批孔运动的想法，显然与下面的造反派之企图不一样，他并不想再来一次大造反大夺权运动。于是，到八月底时，传来了中央对湖南批林批孔运动的一个“八条”文件，之中，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强调生产，强调秩序。随后，王洪文也从主持中央工作的位置上退了下来，转为让邓小平主持。形势发生的微妙转变，使很多造反派骨干分子还来不及进入党组织，所谓突击入党的活动便戛然而止。已进了党组织的，自然也就进了；而没能进的，哪怕是连《入党申请书》都填好了的，也被卡住不让入了。其实，这个紧急刹车，也没有什么中央文件下来，但大家——不论是官方、保守派，还是造反派方面——则对此都有了共识与预感：文革中已发生的历史多次表明，不让做了的事，那就是中央认为是搞错了，至少是不能再搞了。现在，既然毛泽东不让王洪文再主持一线工作，又说了“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那么，一切与造反派有关的事，显然都有可能要重新认识了。刹时，省、市委与各级党委便不再提优先大力发展造反派入党的事，造反派们也都知趣，也没人敢再说要入党了，而都抱一种看形势发展再说的心态。机修厂有个造反派工人，是手艺极好的木工师傅，姓萧，还是厂革委会的一名副主任。原本党支部已讨论了他的入党问题，但因有个支部委员小心翼翼提出：听说其家乡亲属中有个地主分子，但萧师傅没在其入党申请表中填上，是不是要落实一下？当时，我已入了党，又是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因此，机修厂党支部便征询我的意见，问如何办理为好。我想，这件小事还不容易？派人去萧师傅家乡调查一下，不就水落石出？其实，当时党支部副书记问我的意见时，我若坚持以萧师傅的填表为据，先批准

入了党再说，他们也会同意。但，那阵我却觉得调查一下搞清楚也好，免得人家说闲话，大势之下，反正迟几天早几天入党，都不会对萧师傅有大障碍。私下，我将意见也同萧师傅说了。萧师傅虽有几分不快，但他也想通了，也说“既要迟几天入，就只好迟几天入（党）了”。不料，调查人员还未回厂，上面的风向却陡然生变，各级党委都奉命暂停批准新党员入党事项。萧师傅正好被卡在当口上，入党的事便告吹。对此，有一段时间，萧师傅不知埋怨了我多少次，说我入了党，就不顾下面的弟兄了，明明我一句话就可以说服党支部，甚至压服党支部，解决他的入党问题，却非要同意去搞什么外调——外调回来说，那地主确与萧师傅家人无关——而害得他入党被卡了壳。为此，我不得不私下向他数次赔礼致歉，承认自己对大势过于乐观，犯了错。后来，一九七六年的“批邓反右”运动中，我便着手出力，想帮助萧师傅能趁势入党，可是，“批邓反右”运动还没搞几天，造反派就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而全军覆没了。最终，不仅萧师傅的入党一事从此无望，而且，连我的党籍也被吹了。不过，虽然毛泽东重新启用邓小平后，造反派不能再如批林批孔时那样威风；即便是邓小平出山后在一九七五年搞的大整顿与“批派性”，让部分造反派头头灰溜溜了一阵。但，由于对整个文革，当时谁也不敢否定，所以，造反派的的活动也只是沉寂下去了，却并没有完蛋，当权者更不敢随意就处置造反派分子。所以，一年后开展的“批邓反右”运动，造反派又出头了。一九七四年底，批林批孔运动完全结束，报纸上邓小平的新闻越来越多，而王洪文却难得露一下面，正统的官方意识又慢慢重新回归。呆在局团委也好，留在公司革委会也好，都使我感到了压抑，让我想起了一九六九年“九大”后的复旧情形。于是，我决定仍回自己的“老窝”——机修厂，回到车间里，重操钳工技术。在机修厂，由于身份上仍有局团委负责人与公司革委会副主任的名义，而且又还是一个中共党员了，因此，我反而觉得精神上特有优势，自由自在，谁也不会管我。虽然又重回到机修厂，但，批林批孔运动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我改变人生地位，得以摆脱那“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带给我的阴影与黑暗。□ 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第二十五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

雷运河：《运河惊蛰——山东省运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回顾》摘录

#### 第四部分 曲折历程的壮歌

##### 五、真 5·16 清查假 5·16

一九七三年冬到一九七四年春，运河市区革命造反派首先成立了“批林批孔批袁汇报团”、“批林批孔批袁指挥部”，向以袁升平为代表的真 5·16 分子发起进攻，强烈要求：1、给被打被压被迫害的假 5·16 平反伸冤，2、给因清查 5·16 再次受株连的所谓“孙、孔、王右派集团”平反，马上释放孙铁民、孔宪美、王锡山（已死去）3、清除混进各级革委会中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4、增加革委会中革命造反派的力量，把造反的干部、群众代表补充进去。

于是，各县各单位各系统的革命造反派，也积极行动起来，在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安排下，纷纷集会，声讨袁升平！召开各种形式的控诉会，讲演会，把一肚子苦水倒出来，把满腔的愤怒喷射出来；发表声明，书写讨袁檄文，张贴公开信，决心把批林批孔批袁斗争进行到底。

下面摘录几段运河地区滕县革命委员会 28 名成员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发出的“致县委和全县人民的一封信”。

题目：一切行动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

信的开头说：“正当我县批林批孔批袁运动深入开展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 1974 年 12 号文件和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重要指示下达了。喜讯传来，全县人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这是毛主席党中央对山东人民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是正确解决山东问题的根本方针，是推动我县批林批孔批袁运动胜利发展的强劲东风。我们坚决拥护，坚决贯彻执行。”

全信共有七条。第二条写道：“二、牢牢掌握批林批孔批袁斗争的大方向。狠批‘克己复礼’，狠批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狠批林彪死党袁升平的反革命罪行。紧密联系我县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实际，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及其死党袁升平疯狂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破坏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阴谋复辟倒退的罪行，迎头痛击右倾复辟思潮。”

信的第三条有这样的话：“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县委必须立即改变不批林，不批孔、不批袁、捂盖子，怕群众的被动落后状态。”“欢迎犯错误的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混在干部队伍里进行破坏活动的个

别坏人。对我县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马启廷（文革前的县委书记——抄者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以养病为名，借故逃跑，长期擅离职守，对抗批林批孔批袁运动的严重错误和罪行，必经彻底揭发批判。坚决按照中央 12 号文件的规定，切实把我县县委、县革委机关的批林批孔批袁运动作为重点，认真搞好。”

信的第四条点了滕县驻军政委周克玉的名，说周克玉是“袁升平的私党”，是“破坏我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支左工作的罪魁祸首，必经彻底揭发批判。”

信的第五条要求全县革命造反派应做工农业生产的模范，“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信的第六条指出，革命革命造反派要继续促进革命大联合，要增强党性，反对派性，记取走资派利用派性，“挑拨离间，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深刻教训。”“要把千仇万恨集中到林彪、袁升平身上。”

信的最后第七条是：“七、我们必经清醒地看到，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解决山东问题的重要指示，深入批林批孔批袁，纠正错误，落实政策是一场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要提高警惕，坚决揭露和打击破坏批林批孔批袁运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要克服左右干扰，特别是右的干扰。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让我们乘党中央解决山东问题重要指示的强劲东风，继续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深入放手发动群众，冲破一切障碍和阻力，把批林、批孔、批袁的斗争进行到底，达到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这场反击“真 5·16 清查假 5·16”的斗争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五年，虽然没能取得全面胜利，但又一次显示了革命造反派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卢 荻《“李一哲”大字报和反革命集团案件》“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前前后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广东开始全面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省委第二书记杨尚昆和省委书记吴南生等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闻名广东全省乃至国内外的“李一



哲”大字报和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

◇ “李一哲”案件的由来

1973年11月10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在广州闹市区北京路口张贴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长达2万字，从头至尾长度约100米。这张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指出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及对江青一伙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表示不满。大字报列举了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六点要求或者“期望”：（1）制定法律保障群众的“民主权利”；（2）采取措施防止出现特权阶层；（3）采取措施保障群众对党政领导人员实施监督的权利；（4）制定条例严禁拷打、诬陷以及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专政”；（5）政府和党的政策不要经常改变；（6）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不久，这张大字报流传到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应。江青说它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

当时，“四人帮”正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大乱全国，海内外别有用心的人也乘机插手。在斗争形势很复杂的情况下，1973年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认为这是一张“反动大字报”，决定在内部组织批判；以后又在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1975年1月，广东省、市有关部门按照上级布置，在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大张旗鼓地开展批判活动。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哲”案件。后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有期徒刑。

◇ 习仲勋主动承担责任

1978年4月，习仲勋受命到广东任省委第二书记，后任第一书记。他一到广东，就注意到“李一哲”案件，亲自抓这个问题。从1978年八九月开始，省委曾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件，并数次报告党中央。1978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又一次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写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经省委决

定，12月30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从监狱被释放出来，安排住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习仲勋指定分管宣传工作的省委书记吴南生处理此事。12月30日、31日连续两天，吴南生接见他们，进行多次谈话，明确宣布，他们所写的“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他们）不是反革命集团，不是打砸抢分子，不是帮派势力”。吴南生在讲话中还向他们提出，为了安定团结，为了搞四个现代化，要总结他们的成长过程，总结经验教训，也有必要讲自己的缺点错误。

1979年1月24日下午，习仲勋、吴南生和省委常委王宁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习仲勋说：你们放出来，完全自由，到今天第25天了。现在春节快到了。原想春节前把你们的问题结束，现在看太仓促（李正天：是仓促）。比如说，开个会，总要表个态，讲个话，总要准备准备。你们想过没有？（答：想过。）现在看只有到春节后才行。春节，你们有家的回家，没家的住在东湖这里。现在听听你们的意见。李正天等人详细述说他们写大字报、受到批判和迫害的经过以及提出平反方案之后，习仲勋讲了几点意见：“一、我跟你们谈话，我从来不愿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不仅是现在，历来如此。二、更重要一点，是你们怎样配合省委把你们的事情处理好。你们也想一想，除了你们今天提的方案，还有没有其他方案更合适，请你们考虑一下。一切尊重你们的意见。不要说省委怎样怎样，否则一切不牢靠。三、你们切记注意要冷静。你们所遇到的人有两种，极少数的人是真正的反动，他们会利用你们，会钻空子的。拥护、支持你们的，不一定百分之百是好人。要有敌情的观点。光有一头，你们也会犯错误。对坏人、对反动的观点，你们要顶回去。……你们的路还长。希望你们把路子走对，健康地成长。”李正天等人提出，因他们的事而受牵连的有二三十人，虽没有关进监狱，但也办班审查，气很大，在开平反大会前，希望省委安抚他们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习仲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春节过后，习仲勋感到有必要和李正天等人再谈一次话。2月1日上午，习仲勋在吴南生等人陪同下，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二次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李正天等人谈了过春节的感受。习仲勋对他们说：第一，当时

那样处理不对。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还要对上届的省委负责。第二，你们要谅解当时的情况，要理解当时的历史条件。第三，你们的问题是历史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要当现实问题来解决。处理这个问题的意义主要是为了今后，不是为过去。第四，你们在平反大会上的发言，要集中揭发控诉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这是造成你们问题的总根子。

此外，还要讲正确使用民主权利，划清社会主义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

习仲勋、吴南生还与他们商定 2 月 5 日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这次谈话足足谈了 3 个多小时。习仲勋讲话语重心长，主动承担责任，令在场的人为之感动。

当天下午，遵照党中央 1979 年 1 月 26 日批复的精神，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如何召开平反大会问题。

#### ◇ 再次沟通

但习仲勋没有料到的是，1979 年 2 月 2 日，即第二次接见的次日，郭鸿志、李正天、王希哲三人给省委、习仲勋、吴南生写了一封紧急信，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在广州最大的会场中山纪念堂而不是在原定的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二是希望习仲勋能参加平反大会，三是强烈希望省委领导接见“李一哲集团”所有成员一次。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件事，2 月 3 日晚上习仲勋在开完省委会议之后，紧接着在 23 时 23 分至 2 月 4 日 2 时 20 分，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三次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习仲勋以批评的口吻说：你们的紧急信，“好像文化革命时给党委紧急通令”。

习仲勋指出，第一，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并不是有意缩小你们的影

响。你们这个会的消息，要见报，全中国、国内外都知道了，为什么强调选择开会的地方

？第二，我能和你们这样谈这么多次，为什么不能去参加大会呢？主要是我的时间问题。习仲勋说明他要赶着到肇庆参加地委召开的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大会，实在抽不出时间。他接着说：我参加不参加会议，这不是一个主要问题，你们看得太重了。我和你们多次谈话，我的时间就是那么充裕？我已经是 66 岁的人，你们要谅解老同志。第三，你们提出接见“李一哲集团”的所有成员和有牵连的人，完全可以接见，明天可以找一个时间。

嗣后，习仲勋开诚布公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双方进一步沟通了思想。

第二天下午，习仲勋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会议室接见了“李一哲集团”成员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李秀芳、陈锦禄、杨万翔、刘和明、张嘉琪等 30 人。习仲勋在李正天的介绍下，与到会人员一一握手。客套过后，习仲勋说，大家都受了一点苦头，这也不足为奇。你们经过风浪，我也经过风浪，我还活着。“李一哲”的问题，本来应该早解决，但没有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能早解决，所以到去年 12 月 30 日才放出来。刘和明问：你参不参加平反会？习仲勋解释说：平反会，我不参加了。广东人多，5500 万人口，现在 1000 万人口粮在 30 斤保护线以下，不解决不行，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要很快搞上去。工人、农民、干部不吃粮食不行。我明晚要到肇庆去，省委有分工。你们不要只相信一个人，省委是集体领导，只要是集体作的决议，哪一个人代表省委去讲都算数。

我不是官僚主义者，和李正天他们谈了三次话，昨天晚上谈到凌晨两点多，一连三个多钟头。为解决你们的案子，和你们促膝谈心，你们还说我不民主，不出席你们的平反会。但这些人仍坚持他们的意见，由张嘉琪念了“对‘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平反问题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强烈要求省委在中山纪念堂开平反大会，还要求习仲勋出席大会并作讲话。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没有按昨晚他们的诺言办事。经习仲勋反复做工作，还是决定按计划召开平反大会。这次谈话进行了

两个多小时。

◇ 公开平反

1979年2月6日下午，省委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有1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李一哲”案件平反。会上，省委常委寇庆延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决定》指出：1978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重新讨论了“李一哲”案件，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为此决定：“因‘李一哲’问题被拘留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应予释放”。“因‘李一哲’问题受牵连被审查的其他人，应按照本决定的精神，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省委认为，在处理‘李一哲’问题上的错误，应由省委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省委要求有关单位依照‘有错必纠’的原则，抓紧解决有关‘李一哲’案件的遗留问题。”

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讲了话。他说，“李一哲”案件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所谓“反动大字报”问题。现在看来，这张大字报提出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例如，大字报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的事实，指出林彪反革命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等等。但我们却把大字报看成是破坏安定团结，妄图搞新的“匈牙利事件”，对它作了错误的批判。第二，关于所谓“反革命集团”问题。“李一哲”一案是在十分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以，省委认为“李一哲”不应定为“反革命集团”，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在平反大会上，李正天等三人分别发了言，一致拥护省委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和吴南生的讲话。吴南生的讲话和李正天等人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会后，广东省委给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况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会前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平反大会开得比较好，绝

大多数干部、群众的反映是好的，认为给他们平反是应该的。

2月5日，习仲勋抵达肇庆。他在肇庆时，仍关注“李一哲”案件问题，看了李正天等三人在平反大会上的发言稿，并看了《南方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的有关报道和文章。

习仲勋从肇庆回到广州之后，又于2月25日上午在省委珠岛宾馆11号楼202房接见了李正天。习仲勋特别提醒要肃清林彪、“四人帮”搞极左、搞无政府主义的流毒。“讲民主，不能讲资产阶级个人民主，要讲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民主。”李正天说：“不能离开法制讲民主。”习仲勋询问李正天等四人平反情况之后，鼓励他说：“你在艺术上还要精。还要学习马列主义，还要搞社会工作。你们出来后，有人要你们去工作，你们不要答应，还是暂时不要离开广州好。社会上有些什么事情，通过你们去做工作就容易把事情搞清楚。”李正天说：“我认为‘李一哲’作为历史已经过去，今后不再以‘李一哲’的名义去搞什么东西了，以后要写什么，以个人的名义去写。”习仲勋说：“对。你们几个人的认识也不尽一致，认识问题的深浅也不同。过去那样搞允许，现在情况不同了，再那样搞，是背了个包袱。”李正天说：“我不会忘记党培育我的恩情。我不要求当官，只有一个要求，我的待遇就是按我同届毕业生的转正、定级、提级、计算工龄去办。”习仲勋答应：“可以。……凡是合理的要求，过去应该办没有办的，都要落实。现在还没有办的，可以提意见。”

#### ◇ 再起波澜

可是，半个月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1979年3月15日，李正天等四人，再用“李一哲”的名义，在广州市街头多处贴出《为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理论讨论会启事》，决定于4月5日上午在黄花岗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朝人民友谊亭内举行理论讨论会，王希哲和李正天还分别给香港《争鸣》杂志写信，寄去该《启事》，要求在《争鸣》杂志上刊登，欢迎港澳或海外的同胞和朋友们到会参加讨论。3月16日上午，李正天还送来一封他和王希哲两人联名

写给习仲勋的信，希望省委和习仲勋能够理解他们的行动，并提供物质保障。

为此，3月17日下午，习仲勋在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和省委办公厅陈仲旋、雷力行、据立铭等人的陪同下，专门在珠海宾馆5号餐厅约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谈话。在听了李正天等人陈述之后，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这种将会影响安定团结和擅自邀请港澳或海外同胞等回来参加政治活动的错误做法。习仲勋指出：

你们发海报、出广告，是“文化大革命”中搞的那一套。4月15日是春交会，成千上万外宾都来了，你们把广州市搞乱了，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你们想问题，要想安定团结、搞四个现代化这个大前提。李正天等答：我们没有想到。习仲勋批评说：你们不受管，也不打个招呼。这样一弄，会弄乱了。你们这么一搞，开了个头，对别人也没办法了。难道这叫民主？！这叫无政府、无纪律！这个口一开不好填，即使能填，在国内外都会造成影响。“现在，党中央多么强调安定团结，在广东更有强调的必要，要有良好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你们这样搞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习仲勋明确表示：“省委的态度很明确，你们这样搞是错误的，我们是反对的。咋办？给你们一天时间，你们商量一下。”

经习仲勋做工作之后，第二天，李正天、王希哲给省委、习仲勋写了一封信。

信中说：我们认真讨论了你的意见，确实感觉到我们错了，我们接受省委的意见，取消这次“讨论会”。但为了做好善后工作，尽量减少由于我们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拟出几种“再启事”的写法方案，以征求省委意见，请省委直接指示我们。或通过李海东同志明天与我们定下来，不知当否？我们已给香港《争鸣》杂志去了信和电报，声明取消这次讨论会，勿发消息。

3月18日上午，习仲勋收到李正天、王希哲写来的信后，于11时45分至12时45分，召见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委托李海东3月19日找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三人谈话，做工作。

3月19日上午，李海东约了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谈话，他们一致同意习仲勋的意见。当天晚上，李正天等人以“李一哲”名义在广州市贴出《再启事》：“原定于烈士陵园召开的‘四·五’理论讨论会因故取消举行。”

◇ 反对极端民主化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有些年轻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影响较大，加上有的人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因此，不经过批准，就搞结社和集会。当时，青年工人刘某某等人组织了一个“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还办了《人民之声》杂志。1979年3月28日，该学会在广州街头贴出海报：定于4月5日下午5时半，在烈士陵园对面广场举行集会。团省委按照省委指示精神，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出发，曾找他们谈话，劝说他们不要搞这样的集会。4月1日，《未来》编辑部在广州师范学院召开讨论会，王希哲等人在会上讲话。

4月2日晚上，习仲勋、杨尚昆在留园6号约见了广州市负责人梁湘、薛焰和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听取他们汇报两天来对《人民之声》、《未来》两个刊物人员做思想劝导工作的情况，决定立即约李正天来谈话。

李正天到来后，习仲勋向他询问了《人民之声》和《未来》杂志编辑部的情况。李正天将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并说明自己虽然收到他们的请贴，但没有参加讨论会。习仲勋说：他们那样搞还行呀，不是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连个国家观念也没有。他们还搞什么纠察队，脱离党还行呀！现在人民群众都要求安定团结，要搞四化。省委为什么不同意他们那样搞？是为了保证有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个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好进行四化建设。如果在广州那样闹法，就不仅仅影响全省，还会影响上海、北京。有坏分子钻空子的，

有存心搅乱的。这样搞，算是什么民主？是极端民主化，是无政府主义。



习仲勋对李正天特别说明，为什么今晚找你来呢？尚昆同志他们几位也在。可以说你是我的朋友吧，应该相信你。可能我要下乡一段时间，有什么急事，你可以找尚昆同志，他还兼广州市的第一把手。习仲勋所说的要下乡，实际上是要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因暂时保密原因，他才这么说。而正是这次会议，习仲勋代表广东向中央提出允许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建议，并得到中央和邓小平的赞同和批准。

李正天在谈了对王希哲等人的讲话看法后说：王希哲不能代表“李一哲”。我可以以个人名义去说服他。说服不了就由他自己负责。我们要为安定团结做贡献。生产上不去，工资、复退、知青等问题都解决不了，多发钞票也是空纸一张。

习仲勋认为他这个观点是对的。在李海东汇报当天同《人民之声》的人谈话情况之后，习仲勋征求李正天意见，看看对此事该咋办。李正天提出，第二天能不能找王希哲等人开个会，做劝说工作。另外，能不能由团省委出面召开一个理论讨论会，邀请他们以及对“四·五”运动的热心者参加，希望他们不另搞什么集会。杨尚昆表态说：我看这个建议基本上可以。由团省委出面组织开个理论讨论会，你帮助做些工作，他们那个会就可以取消。

4月3日晚上，团省委李海东、江东海等人约见“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未来》编辑部的主要成员以及李正天等17人，进一步劝说他们取消公开集会。22时30分至次日0时25分，习仲勋、杨尚昆刚刚接见香港总督回来，就到团省委会议室接见了他们。习仲勋极为严肃地指出：“你们搞集会，不仅仅会影响广东，如只影响广东，我完全能控制得住，特别是会影响上海、北京。上海、北京那样闹起来是给国家脸上抹黑，是给国家帮倒忙。”“当然，你们也可以口头上说是民主，说你们是拥护党中央，拥护省委领导的，而你们的行动就不是，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大好形势。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事不做，不利于搞四个现代化的话不说，不利于搞四个现代化的事不做，这就是大道理。这样才能想得通。你们搞这些活动，去找共青团嘛！”

杨尚昆也严肃批评他们这种不经请示就准备在大庭广众召开集会而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做法。李正天也劝他们，说现在不必要召开这样的会。

经习仲勋、杨尚昆进行较长时间的谈话，最后说服了这些人取消公开集会。经团省委与他们进一步协商，“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撤销了4月5日集会的“公告”，大家一致同意4月5日由团省委召集第一次青年理论讨论会。

#### ◇ 尾声

4月5日至28日，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经与杨尚昆等在穗的省委领导人商定，4月25日，以中共广东省委名义上送一份报告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并报党中央，汇报了与李正天等人多次谈话的情况，并将习仲勋等接见李正天等人的三次谈话记录送上。鉴于北京有的单位来函要求调李正天等人去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些集会，省委意见“最好还是让他们留在广东目前的工作岗位上，扎扎实实地经受一些锻炼，对他们的成长较为有利。建议耀邦同志是否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场合说一下，不要轻易调这些人去北京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什么座谈会”。

习仲勋、杨尚昆之所以如此重视“李一哲”案件的平反以及善后工作，一是此案在广东乃至全国有一定的影响，此外，港澳台地区与美国、日本等国都有人关注此事，处理不好，将会借此大做文章；二是由于当时国内有人借“解放思想”之名，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任由“李一哲”等人进行集会，可能会波及北京、上海等地，将会影响安定团结的大好政治局面，不利于工作重点转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因此，习仲勋、杨尚昆和吴南生等人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做李正天等人的思想工作，以利于稳定安定团结的大局。

2010 年 2 月 8 日初稿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十册（4）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十章 批林批孔

#### 第四节 批判各领域的复辟回潮

##### 本节资料

一九七四年一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柴春泽》

编者按：这是下乡知识青年柴春泽给他父亲的复信，很值得一读。这封信，代表了我们的革命小将在思想领域里向老将的挑战：看谁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柴春泽，还有千千万万的下乡知识青年，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扎根农村，建设农村，与轻视农村、轻视农业劳动的旧思想、旧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我们的老将们，经受过革命斗争的多次考验，经过了党的长期教育，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更应该坚决地支持子女上山下乡，扎根农村。我们愿意看到更多的革命小将向老将挑战，也愿意看到更多的革命老将接受小将的挑战，带领小将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

\* \* \*

知识青年柴春泽给他父亲的信

敬爱的爸爸：

您好，近来工作一定很忙吧！八月二十日来信已于八月三十一日上午收到。爸爸，看完您这封信后，我心情不平静的程度简直无法形容。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特别是最近学习吴献忠同志先进思想和先进事迹以来，我脑子里所想到的是如何为共产主义在农村广阔天地奋斗终生的问题。同是一个党领导，同是一个阳光照，同在农村干革命，同奔共产主义大目标，吴献忠做到的，我为什么没做到？做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感到问心有愧。因此，我最近发下

誓言：

向前看——共产主义金光闪。

途无限，扎根农村争取奋斗六十年！

向前看——征途仍然有艰险。

讲路线，建设农村不获胜利心不甘！

向前看——世界风云在变幻。

立大志，誓为全球红遍决裂旧观念。

爸爸，这是我发自内心的誓言，是我向敬爱的党，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表达的真诚心愿。

是党的培养教育和贫下中农好老师的再教育，使我认识到：玉田皋这个地方是多么不平常啊！在那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革命战士曾在这里把战场摆开，为了解放千百万劳苦大众，为了消灭美蒋反动派，无数先烈在这里壮烈牺牲。玉田皋大地是烈士鲜血换来的！

可现在玉田皋还没有变大寨。我，做为贫下中农的后代，下乡到这里两年来，并没有为这里大变快变做出大的贡献，党和人民在我刚刚迈出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第一步的时候，就给予了我很大的鞭策和信任，让我先后出席了旗、盟、省团代会，出席省知识青年批林整风讲用会，被选为旗团委委员，大队团总支副书记，最近又加入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我怎样才能对得起党的培养、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呢？难道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应扎根农村、建设农村，把我的一切献给敬爱的党，献给我国农村面貌的改变，献给人类的解放事业吗？

爸爸，您的意见，我很明白。但我仍然坚持我一年前向您汇报过的思想：即主观愿望是否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需要相符，相符是正确的思想路线，不符是错误的思想路线。进工厂，当工人，这一主观愿望同咱家的客观情况来看，同我个人的客观情况来看，站在个人利益的角度来说，好象是相符的。但是这同我们家和我个人真正的最根本的利益、最大利益却是不相符的。这个最根本的利益是消灭私有制，决裂旧观念。而这样一个最根本利益则往往由于我们学习不够而意识不到，认识不到。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爸爸，我个人理解毛主席讲的“认识自己的利益”，正是指有利于消灭三

大差别，消灭私有制，决裂旧观念这一个根本利益。咱们家出身是贫下中农，咱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的根本利益就是消灭私有制，决裂旧观念，而一切重工轻农，重城轻乡，只顾个人利益的思想，都是建筑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存在决定意识，正是如此。《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革命老前辈，抗日战争扛过枪，解放战争负过伤，有的抗美援朝还跨过鸭绿江，这只能说明过去，现在同样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离不开消灭私有制，决裂旧观念，违反了这一观点，就是搞修正主义的开始。

爸爸，您同其他很多革命老前辈一样，在战争年代同敌人斗过，在枪林弹雨中冲过锋，陷过阵，那时你们那样干，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家如何，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置之度外，因而打下了今天的江山。可是，自然法则决定了老一辈革命家不可能直接去完成共产主义事业。我们这一代青年人要接你们这些革命老前辈的班，我们好与坏，关系到中国革命千秋万代问题。一旦党变修，国变色，我们还会有什么家，甚至还会有什么我们自己现在的政治地位？

爸爸，我现在百分之百地需要你对我进行扎根教育，我不同意你这拔根教育。

我的决心、想法已向爸爸您汇报了。在这封信里我能这样说，是我下乡前办不到的，甚至想都想不到这些，我要感谢党，感谢贫下中农对我进行的再教育。我想，爸爸你做为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干部，是不会生气的，因为我们党章上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条。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请爸爸在百忙中一定回信。

此致革命敬礼！

儿 春泽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下午

\* \* \*

调查附记

柴春泽，原是辽宁省赤峰市红代会副主任。一九七一年中学毕业时，他在学校最先贴出大字报，申请到风沙大、路途远、环境比较艰苦的翁牛特旗插队落

户，锻炼成长。

到翁牛特旗玉田皋生产大队半年多，青年点出现了一股“转点风”，他的父亲也动员他转回赤峰县。柴春泽感到这场斗争的激烈，更需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实行《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两个决裂”，坚持实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伟大教导。他给父亲回信说：“爸爸，我是响应毛主席的指示来到农村的，您是一个具有二十七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建议您考虑一下您的意见是否符合党的利益。”不久，父亲来信做了自我批评，支持儿子扎根农村的决心。柴春泽感到很高兴，在农村干得更加出色了。

去年六月，柴春泽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公社党委副书记。八月三十一日，他突然接到父亲的一封来信，告诉他现在有一个招工的机会，一定不要错过。他很不平静，觉得父亲思想上的反复，在一些家长中间很有代表性，便把父亲的信和自己写的复信在青年点拿出来公开讨论，鼓舞了战友们扎根农村干革命的雄心壮志。他父亲收到这封复信后，又受到很大教育，承认原来的想法是错误的，但因公出差，没有来得及回信，便嘱咐柴春泽的弟弟、妹妹向哥哥学习，并让柴春泽的母亲把他的想法告诉了春泽。

柴春泽所以有这样高的路线觉悟，敢于向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是由于他在党的领导下，能够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参加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坚持认真看书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下乡两年来，他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学习了五遍《共产党宣言》，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学习了《法兰西内战》、《自然辩证法》、《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选学了《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有关章节，写了许多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体会和学习心得笔记。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五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朝华的文章《无标题音乐没有阶级性吗？》

（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朝华）

在深入批林整风，上层建筑领域批改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文

艺战线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仍然是极其尖锐复杂的。当前出现的那种所谓无标题音乐仅仅表现某种情绪的对比和变换，而无社会内容的奇谈怪论，就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一种反映。要不要揭露这种谬论的反动实质，关系到承认不承认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要不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资产阶级艺术是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还是按照周扬之流的修正主义谬论搞“全盘继承”，关系到无产阶级的文艺革命能否进行到底。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

无标题音乐一般是指不具体用文字来标明其题目或内容的器乐曲，往往同曲式或速度名称等来命名，如 F 大调交响乐，C 小调协奏曲，慢板、快板……。

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理论家鼓吹无标题音乐是一种所谓“纯音乐”，否定它的社会内容和阶级性。他们胡说什么音乐“是幻象而不是现实”、“音乐就是它自身，其他什么也不是”。现代修正主义者表面上不反对音乐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实际上却给无标题音乐贴上“人民性”、“现实主义”等标签，抹煞无产阶级音乐与资产阶级音乐的阶级界限。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为什么用种种谬论来掩盖文艺的阶级性呢？因为包括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在内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他们不敢公开承认他们那种文艺的剥削阶级性。为了掩盖资产阶级剥削的实质，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全民的代表，以欺骗广大劳动人民。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音乐作品，不论是标题音乐还是无标题音乐，作为观念形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虽然无标题音乐没有标明题目和内容，但决不只是什么“发响的音响的流动着的形式”。“无标题”，只不过是掩盖作品的阶级内容的一种手法而已。事实上，作曲家在创作所谓无标题音乐时，对于歌颂什么，反对什么，表现什么内容，抒发什么感情，心里都是明明白白的。例如：德国资产阶级作曲家贝多芬（一七七〇——一八二七）的《第十七奏鸣曲》，没有注明标题。当有人问他，你那首奏鸣曲是什么意思时，贝多芬回答：“你去念念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吧！”我们知道《暴风雨》正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当然，音乐和文学的表现手段不同，音乐是通过曲调、节奏、和声等音乐手段去写景、叙事或抒情，表现作曲都的世界观和思想感情，不过有的表现得比较明显，有的表现得比较隐晦和曲折罢了。但不论表现得多么隐晦和曲折，它们反映的社会阶级内容和思想感情绝不是抽象的不可知的“幻象”，



而是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认识的。例如：以奥地利资产阶级浪漫派作曲家舒伯特（一七九七——一八二八）的代表作品《B 小调交响乐》（即《未完成交响乐》）来说，它虽然没有标题，但所表现的阶级感情和社会内容是非常鲜明的。这部作品写于一八二二年，当时奥地利是德意志联邦中的封建反动堡垒，奥地利反动当局，不仅对工人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镇压，而且对具有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进行种种迫害和监视。象舒伯特这一类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感到政治上经济上没有出路，但又缺乏反抗的勇气，因而产生一种苦闷、彷徨、悲观、失望的情绪和逃避现实、幻想自由的愿望。《B 小调交响乐》就是这种阶级感情和社会内容的反映。交响乐引子给人一种阴沉、抑郁之感，整个交响乐都是这样感情的继续和发展，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悲观失望、孤独苦闷的感情。虽然偶尔也出现对自由的幻想，但这种幻想也是逃避现实的，消极的。

欧洲十八——十九世纪的无标题音乐，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文艺，它们的内容和渗透的思想感情都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属性。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产阶级的音乐，正是对这种肮脏东西的颂歌。尽管某些作品在当时有一定的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但是，即使在当时，它们也并不反映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对于我们今天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更是格格不入的。怎么能抽去它的阶级内容，加以吹捧呢？有些人至今还在把这些东西不加批判地、原封不动地向我们的青年灌输。这样做，究竟要把我们的青年引向何处？

某些赞赏资产阶级标题音乐的人，常常用空谈某种情绪的对比和变换，来掩盖它的阶级性，这是一种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反动观点。

所谓情绪，无非就是人的喜怒哀乐之情的反映。时代不同、社会不同、阶级不同，人的思想感情也就截然不同，喜怒哀乐也决不会一样。鲁迅对于那些宣扬什么人类有共同的感情和感受的资产阶级滥调，曾进行过无情的驳斥。他说：“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 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世界上哪里有不打上阶级烙印的情绪呢？同样是表现

“喜庆”，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三场南霸天请客祝寿的音乐，以飘浮的旋律、慌乱的节奏，来揭露恶霸地主阶级建筑在劳动人民白骨堆上的穷奢极欲狂喜淫乐，而第四场军民联欢舞，豪放、热烈的音乐所表现的是革命根据地阳光灿烂，军民欢腾，这两者之间情绪一样吗？同样是表现“哀恸”，南唐后主李煜，在亡国后作囚徒时写的词句“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表现了封建皇帝留恋“雕栏玉砌”灯红酒绿腐烂生活的哀愁。而无产阶级的战士鲁迅悲愤控诉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人民的残酷压榨，挥笔所书的“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表达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民族恨。这种充满斗争精神的“动地哀”和封建皇帝对丧失家国的哀怨哪有一丝一毫的共同之处呢？如果说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在音乐上可以用同样的旋律来表现，那只能是欺骗！

至于抽掉作品的阶级内容，泛谈所谓“明朗”、“健康”的调子，正是修正主义者贩卖资产阶级货色时惯用的形而上学手法。周扬就曾经吹捧惠特曼所歌颂的美国资产阶级人物是什么“身体健康，心胸开阔，有崇高的理想，劳动的双手，并且永远乐观”的“新型的人”，是“足资我们学习、模仿的光辉榜样”。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无产阶级真的去“学习”“模仿”资产阶级，那么，等待着我们的结果，决不是“明朗”的天空，而只能是黑暗的地狱。资产阶级当然可以认为十八世纪奥地利资产阶级作曲家莫扎特作品中具有“明朗”、“健康”的情调。但是，我们无产阶级却清楚地知道，这种情调和《白毛女》第七场“太阳出来了”的大合唱洋溢着开朗、奔放的情感，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的。《白毛论》中“太阳出来了”的大合唱，以沸腾的豪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共产党，展现了翻身农民得解放，“芙蓉国里尽朝晖”的一派动人景象。这样磅礴的感情，这样豪放健康的情调，是那些资产阶级音乐根本无法比拟的。

周扬一伙还曾经鼓吹“音乐是世界共同语言”，为他们在音乐领域中推行全盘西化制造所谓理论根据。其实，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超阶级的世界语言是根本不存在的。响彻全世界的《国际歌》只是无产阶级的共同语言，资产阶级听了，只会全身发抖。列宁说得好：“一个有觉悟的工人，不管他来到哪个国家，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不管他怎样感到自己是异邦人，言语不通，举目无亲，远离祖国，——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的熟悉的曲调，给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八

十多年来，雄壮的《国际歌》鼓舞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但是，一切反动派，都把这首无产阶级的战歌，视为洪水猛兽，想方设法禁止它在人民中间流传，这难道是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语言吗？刘少奇、林彪和周扬之流，倒是同资产阶级和国内外的一切反动派找到了共同的语言，这是因为他们一伙叛徒，同帝修反一个鼻孔出气，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都妄想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正如我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子，站在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立场上，痛心于“礼崩乐坏”，因而拚命宣扬麻痹人民、奴役人民的反动的音乐“弦歌之声”，而对于新兴的民间音乐郑声却极尽其排斥打击之能事，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行将崩溃的奴隶制度。

音乐，和其他各种文艺一样，从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文艺战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广大知识分子也有了不小进步。但是刘少奇、林彪、周扬一伙长期贩卖“全民文艺”“养人文艺”等修正主义黑货，流毒很深，至今远远没有肃清。有些人谈起资产阶级古典音乐就津津乐道，迷恋之至，顶礼膜拜，表现出一派洋奴思想。他们在艺术上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们崇洋，实质就是崇拜资产阶级。如果不批判这种颂洋非中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文艺就不能发展，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不能贯彻。我们对于外国的东西并不是一概排斥。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创造的革命理论，要学习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革命经验，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对资产阶级旧音乐中的某些技巧，也可以批判地借鉴，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更不能拜倒在资产阶级艺术家的脚下。正如恩格斯所说：“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我们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创造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无产阶级自己的音乐艺术。

周恩来同志的十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是通过一两次批判就可以埋葬掉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批林整风，要联系实际，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道路继续前进，决不能倒退，要警惕和抵制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坚

决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一九七四年一月六日《北京日报》；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人民日报》刊登初澜的文章《应当重视这场讨论》

当前正在展开的关于无标题音乐是否反映社会内容、有无阶级属性问题的讨论，引起了音乐界和各级文化部门以及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注意。这个问题提得很及时，很重要，这是贯彻十大精神，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是同继续搞好文艺革命直接有关的一件大事。“大事要讨论，讨论才能引起注意”。我们应当关心这个讨论，并将这一讨论逐步引向深入。

为什么要展开这个讨论？仅仅是为了对某些无标题音乐作品作些分析评价吗？或者是为了对音乐的标题性或非标题性问题作学术研究吗？统统不是。这是文艺战线的一场大是大非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在文艺的根本性质问题上所展开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音乐是有标题的还是无标题的，这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在于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今还有人持有“无标题音乐没有什么社会内容”这样一种修正主义的反动观点。这种反动观点很有代表性，它比较集中地代表了音乐界所存在的一种崇洋复古倾向。这一倾向不但表现在音乐理论方面，而且在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方面都有所反映。这一倾向也不仅仅限于音乐界，它是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和当前文化艺术领域的阶级斗争，和某些地区所出现的文艺黑线回潮现象相联系的。它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国内外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必然反映。如何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音乐文化，有一个阶级立场问题。有人说：欧洲音乐会上经常演出的古典音乐，没有什么社会内容，仅仅表现某种情绪的变换和对比；这些乐曲既无情节，也无标题，音乐还是健康明朗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无非是想说明：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上层建筑之一的音乐艺术，仍然可以适应社会主

义的经济基础。换句话说,它是“无害”的。试问,为宫廷社会和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经常演出”的曲目,能否用来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农兵“经常演出”?十七世纪——十九世纪的资产阶级音乐文化,即所谓“古典音乐”,应该怎样向二十世纪的革命群众作介绍?音乐作品所表现的“情绪”,能否和音乐家所处的时代环境、所依附的阶级以及他所经历的社会生活、他的政治态度、思想倾向、世界观、艺术观等等截然分开?离开了阶级立场而空谈没有什么社会内容,认为音乐只是表现抽象的情绪的变换和对比,这就否定了音乐的阶级属性。这种超阶级的观点,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反映论的基本原理,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艺术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科学论述,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这种宣扬音乐可以不反映社会生活的谬论,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性论是修正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它的哲学基础就是主观唯心主义。究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还是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历来是文艺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和文艺观斗争的焦点。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从资产阶级那里捡起了人性论这件破烂武器。苏修的音乐界,无论是在创作上或是在理论上,都在大肆宣扬超阶级的所谓“人类共有”的感情和情绪。甚至恶毒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为“庸俗社会学”,妄图用偷天换日的伎俩修正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否定音乐的阶级性。所谓“人民性”、“全人类性”这类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概念,就连篇累牍,塞满了他们的音乐论著,毫不掩饰地暴露了他们的修正主义的本质。苏修的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维护了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培植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在文艺领域的专政,成为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毛主席早就指出:“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阶级社会中,任何艺术现象都不能离开阶级而孤立存在。无论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音乐,或者是资产阶级没落时期的音乐,都有它的阶级倾向性,都必须根据它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作具体的阶级分析。关于艺术的阶级倾向性问题,鲁迅说得非常好,他说:“既有消费者,必有生产者,所以一面有消费者的艺术,一面也有生产者的艺术。”为消费者欣赏的音乐同为生产者服务的音乐显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把无标题音乐说成是各个时代、各个阶级都可以接受的,

这种谬论比公开叫嚣“艺术至上”、“音乐是上界的语言”等等资产阶级论调，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它和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是完全敌对的。列宁说过：“无党性是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必须揭露这种在超阶级的幌子掩盖下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实质。在揭露它的实质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这种反动观点以及它所代表的崇洋复古倾向的危害性。如果允许这种思潮泛滥，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轻者，会造成对资产阶级文化丧失警惕；重者，将会为资产阶级文化重新泛滥大开方便之门。历史的教训不能忘记：苏修搞和平演变，就是利用文艺（包括音乐）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手段之一。前车之鉴，不能不引以为戒。它的危害性还在于：如果我们不对这种思潮进行批判，客观上就是替周扬所鼓吹的“全盘继承”、“全盘西化”、“无害有益”等谬论翻案，为文艺黑线举幡招魂，甚至可能使文艺革命成果有丧失的危险。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我们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非破除对资产阶级文化的迷信不可。它的危害性还表现在：如果我们对这种思潮的出现掉以轻心，就会使人产生对外国资产阶级文化盲目崇拜，对自己民族的文化则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十七年文艺黑线的统治不但毒害了相当一部分文艺工作者，而且也培养了一批盲目崇洋的观众，这难道不是严重的教训么？尤其要注意的是，我们决不能用资产阶级音乐文化去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不能用崇洋思想去侵蚀孩子们幼小的心灵。总之，对于资产阶级的文化侵蚀，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如何对待外国文化，毛主席为我们指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这一方针是立足于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文化的基础上的。我们既反对盲目崇洋，又反对盲目排外，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洋都是错误的、有害的。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批判地借鉴、批判地吸收外国的东西，而不是被外国的东西牵着鼻子走。关键在于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态度去介绍它们、对待它们。完全不接触是不行的；被它牵着鼻子走更是错误的。要洋为中用，就得去接触它，研究它，学习和吸收其中好的有用的部分，作为发展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借鉴。但是，接触的目的，只能是为了创造我们自己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独特的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艺术，而不是其他。因此，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西方资产阶级的音乐文化作出正确的介绍，在今天，尤其显得重要。上述这种谬论，在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文化战线的历次斗争中，都是已经批判过

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又对它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斗了几十年，它仍然会冒出来，这充分说明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几十年思想文化战线斗争的实践，反复证明了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的正确性。当前，在学习了革命样板戏，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不断取得新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出现这样一种思潮，也是不足为奇的，它是和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动向密切联系着的。我们应当重视这场讨论。但也不是说，经过这次讨论，开一个会，写几篇文章，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此就偃旗息鼓了。这种想法不符合阶级斗争的规律。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只要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存在，今后这方面的斗争仍然是不可避免的。一有机会，这种思潮还是会冒头的，必须再批判，再斗争。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责任是，必须紧紧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经常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反击它的回潮，清除它的影响，用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牢固地占领艺术理论、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的阵地。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钟志民《一份退学申请报告》

编者按：南京大学政治系学员钟志民的这份申请退学报告，自觉地批判了自己“走后门”进大学的错误，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工农兵学员向地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反映了教育战线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

这份报告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一、革命干部的子女，是在三大革命运动的风浪中锻炼成长，还是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享受“特殊照顾”？二、革命干部是教育子女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还是把子女当做“私有财产”，把“走后门”上大学作为成名成家的阶梯？建议大家读一读《战国策》上《触① z h é（音哲）说赵太后》这篇文章，看看触① z h é规谏赵太后不要溺爱自己的小儿子长安君的故事吧！那是说的剥削阶级内部的事。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

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这是事关反修防修，事关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问题，难道不值得我们严重注意吗？

\* \* \*

敬爱的校党委：

我是一个通过“走后门”来上大学的部队学员。去年大学招生的时候，在我自己的多次要求下，爸爸打电话给军区干部部门指名调我，把我送上了大学。

来到学校以后，通过一年多来的学习，特别是通过“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到了一些矿山、工厂，接触了一些工人和群众，接触了一些社会问题以后，我开始感觉到自己过去的很多想法都是不正确的，逐渐地认识到“走后门”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的大事。因为它涉及到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把人民给予的职权用来为人民服务，还是用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的问题！毛主席说：“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可是，“走后门”这种做法，却是利用人民所给的职权，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不是按照党的原则办事，而是违背党的原则。为了让自己的子女上大学，不经过群众推荐、选拔，不经过党组织的正当手续，而凭着自己的职权和势力，凭着私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来解决问题。有的甚至把大学的招生名额当“礼品”，送来送去，拉拉扯扯，却把真正的工农兵的优秀代表关在大学门外。这种做法难道是为人民服务吗？不，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这种不正之风象瘟疫一样地侵蚀着我们的党，它破坏党和人民的联系，损害党的优良传统，它是同无产阶级的党性根本不相容的！

“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一切真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为什么总是想着把自己的孩子送上大学，而不是想到按照党的原则办事，把工农兵中的优秀代表送上大学呢？无非是感到这是自己的孩子，那是别人的孩子，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罢了。为什么总是想着把自己的孩子往大学里送，而不是想到让他们去农村、去工厂、去部队呢？无非是以为社会主义的新型大学还跟过去一样，是成名成家的阶梯，上大学可以“有出息，有知识”罢了。

“走后门”的思想基础，是资产阶级私有观念的残余。“走后门”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总之一句话，“走后门”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林彪一伙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党内走资派，就是惯用这种



吹吹捧捧，拉拉扯扯的“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来拉拢腐蚀我们的干部，来结党营私，来分裂和毁坏我们的党。我们要搞马列主义，要团结，要光明正大，就一定要同“走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作坚决的斗争！不把这种不正之风反倒，无产阶级革命就不可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到底。这是一个路线问题。

人民给予的权力，应该也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能用来谋自己或少数人的私利。因为我们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我们是服务于人民的政权，而不是压迫人民的政权。早在世界上第一个人民的政权巴黎公社刚刚诞生的时候，马克思就指出：“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伟大领袖毛主席更加明确地指出了“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只有遵循了这些原则，才能保证我们的国家不改变颜色，才能保证我们的干部不变成修正主义，才能够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作为一个党的干部，应该努力为人民服务，不搞“特殊化”。作为一个干部子弟，就更没有权利脱离人民群众，去当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

过去我总感到自己家庭出身好，爸爸从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参加过长征，参加过抗战，从抗美援朝，到东海前线……，出身在这样一个对革命有“功劳”的家庭，受到一点特殊照顾有什么不应该的呢？

不，这种想法错了！干部子弟为什么不能离开父亲、母亲的“特殊照顾”去自己创立自己的生活呢？我们为人民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有什么权利去享受照顾？凭着一个电话就来上大学，这是不合理的。特别是那种以为出身好，好象在人格上就比别人高贵，享受“特殊化”理所当然的人，思想更危险，发展下去，很容易走向“特权阶层”，很容易成为修正主义。

伟大的革命导师在很多著作中反复地强调了这种蜕化变质的可能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现实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更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干部子弟长期生长在比较优厚的生活环境中，又长期脱离工农群众和生产劳动，如果他们不注意自己的世界观的改造，就比较容易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俘虏，比较容易在他们身上出现修正主义。我说这些话当然是包括我自己的，首先是对我自己而言的。

在我们身上出现修正主义，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父亲、母亲，革命的前辈用鲜血打来的江山难道就在我们面前断送掉吗？不，决不能！我们在生活上不应该依靠父亲、母亲，在政治上却一定要继承他们的事业，把他们没有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要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就要有决心彻底地改造自己。“走后门”这种做法，对我们的世界观改造是不利的，它帮助我们逃避火热的斗争，它引导我们去走个人主义的道路，它的的确确是一个误人不浅的、通向资本主义的“鬼门关”。

敬爱的校党委，以上就是我对于自己“走后门”上大学的认识。这些想法，暑假以前就逐步形成了，假期我把自己的想法跟爸爸、妈妈都谈过了，他们都支持我的想法，都同意我对问题的认识。回校以后又跟系里同志谈过。现在，通过十大文件的学习，使我更进一步坚定了自己改正错误的决心。毛主席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我没有经过推荐，也没有经过选拔，最主要的是没有按照党的原则、招生手续入学。所以，我向校党委申请，把我退回部队去。

我决心回到部队去，虚心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努力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自己，改造自己，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顺致革命敬礼

政治系哲学专业二年级学员 钟志民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刊登宇晓的文章《驳一种修正主义的音乐谬论》

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音乐理论，对“音乐”的概念，作了种种玄妙莫测的解释。特别是对无标题音乐，说得更玄，说是什么“纯音乐”，“绝对音乐”，是一种“超凡”的幻响，等等。这纯粹是骗人。鲁迅说得好，“一切文艺，是宣传，

只要你一给人看。即使个人主义的作品，一写出，就有宣传的可能”。当前出现的关于无标题音乐没有社会内容，仅是表现某种情绪的变换、对比的谬论，是资产阶级的欺人之谈，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一种反映。对它的虚伪性、反动性与危害性，必须予以彻底揭穿，进行严肃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文学艺术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都要表现一定阶级的思想内容。无标题音乐也不可能例外。尽管它没有写上标题，没有歌词，但还是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马克思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资产阶级音乐家创作的音乐作品，不论有标题无标题，都是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的产物，都是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的，都刻有资产阶级的印记。我们绝不能低估它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社会作用。

就拿欧洲资产阶级“古典乐派”的音乐家贝多芬（一七七〇——一八二七）来说，他生活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上升时期，资产阶级的革命仍然在发展。这个斗争的生活内容，在贝多芬的作品中反映得很明显。例如他的《第九交响曲》就是这样。这部作品前三个乐章没有标题，都是用器乐来演奏的，最后一个乐章是用席勒的诗《欢乐颂》谱写成的领唱与合唱，更明确地宣扬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的思想内容。而资产阶级印象派音乐家德彪西（一八六二——一九一八），却说“席勒的诗在这部交响曲里实在说只具有音响价值。”德彪西把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诗，说成“只具有音响价值”，完全是为了掩盖它表现的资产阶级政治内容，欺骗人民群众。贝多芬这部作品是为资产阶级取代封建阶级的统治地位制造舆论的，它在历史上为资产阶级的反封建斗争起过一定的作用，要给它一定的历史地位。但是，决不是赞扬任何资产阶级思想毒素。这部乐曲所宣扬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在今天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来说，是极其有害的。如果用超阶级、超社会、超时代的音乐谬论来解释这样的乐曲，就会放弃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产生极坏的影响。

这里所举例子还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作品，在历史上还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倘是资产阶级没落时期的作品，那在历史上也是反动的。对于文艺遗产，我

们“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那些内容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一定的艺术性。但是“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这就需要我们认真作好严肃的分析、批判工作。否则，我们就会放松警惕，那是十分危险的。

关于无标题音乐的反动谬论，兴盛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它不仅指无标题音乐而言，同时，把有标题的器乐曲，以及声乐、戏剧音乐等所有音乐作品，都说成了与任何“思想范围都没有关系”的单纯“声音形式”。这个时期在文学上也出现了什么“纯文学”、“为诗而诗”，戏剧上出现了“未来主义”，美术上出现了“新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反动流派。这是和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分不开的。

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和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资产阶级已经没落，无产阶级已经形成一支社会政治力量走上了历史舞台。这种社会存在，必定要反映到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中来。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取得了统治地位，达到了自己预想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了。反过来，它已成了镇压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阶级。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意识形态方面，便从唯心主义思想武库里取出全部武器，有的直接使用，有的加以“改装”，统统都涂上一层极其神秘的色彩，把反动实质掩盖起来，以欺骗、愚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为资产阶级服务。在文艺上也是如此。这个时候，各种打着“为艺术而艺术”的幌子纷纷出笼的反动谬论，都是在极力鼓吹艺术的“神秘性”，用“艺术”掩盖资产阶级的政治，用“形式”来隐藏反动的思想内容，形成了一股极其反动的文艺思潮。资产阶级所谓的“纯音乐”、“绝对音乐”的理论，就是这股思潮中的一条主脉。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就曾指出当时的资产阶级音乐，“只能引起对于‘未来’及其诗歌和音乐的恐怖”，深刻地揭露了资产阶级艺术的没落和危机。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也产生了无产阶级的战斗音乐艺术。马克思高度评价一八四四年西里西亚工人起义的战斗歌曲，“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大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另外，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许多论著中，也高度评价了十九世纪中叶欧洲工人阶级的革命音乐活动。特别是在伟大的“巴黎公社”革命之后，诞生的“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国

际歌》，宣告了无产阶级音乐新纪元的开始。

资产阶级的“纯音乐”、“绝对音乐”谬论，在历史上一贯与无产阶级音乐根本对立，今天更是如此。资产阶级宣扬它是为了进行反动思想统治，修正主义者宣扬它是为了复辟，今天又有人宣扬它是反映了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苏修抽掉音乐的阶级性，空谈什么“标题性”、“非标题性”，把“标题性”说成是“现实主义音乐”的“传统”和“标志”。于是各色各样的资产阶级反动音乐到处泛滥，甚至出现那种“曲不符题”、挂着“革命”标题、奏着歪曲和诬蔑革命乐曲的怪现象。刘少奇、周扬一伙，大谈古人、洋人，叫嚷“光复古不行，还要搞洋务”，鼓吹“全民文艺”、“有益无害”等反动文艺谬论。在这股逆流中，音乐界的崇洋复古的倾向也相当严重。

崇洋复古的问题，决不单纯是个艺术问题，而是个阶级立场问题，是个思想感情问题。试问，历史上哪一个剥削阶级的洋的、古的文艺作品，能够和无产阶级的优秀作品、特别是今天的革命样板戏相比呢？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仇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攻击革命样板戏，贩卖封、资、修文艺，完全是出于他们反动的阶级本质。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受到了革命群众的严厉批判。而那些已经被批判了的谬论，今天又乔装改扮地钻出来抢夺阵地，不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又是为了什么呢？！不是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翻案又是为了什么呢？！

毛主席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我们决不能低估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想在文艺领域的恶劣影响。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发展，各种反动思想，必然会以新的形式反映出来。文艺理论战线上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的任务，是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该重视、抓紧这条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把文艺革命进行到底！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九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段文秋的文章《柴春泽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要做到》

（山东平原县段集大队回乡知识青年段文秋）

知识青年柴春泽给他父亲的信，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心里很不平静。

一九六八年七月，我中学毕业后，满怀革命豪情回到了家乡，决心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回乡后，贫下中农推选我当会计、生产队长。一九七一年，我入了党，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几年来，贫下中农曾几次推荐我当工人，去上学。我想想金训华，看看俺大队的变化，毅然决然地留了下来。最近，我的一个表哥从城市来了一封信，说给我找了个工作，要我快去。我的思想波动很大，反复考虑，是去城市，还是留在农村？

正在我踌躇不决的当儿，忽然看到了《人民日报》发表的柴春泽给他父亲的回信。我边读边想：我和柴春泽同样都是知识青年，都是共产党员，为啥在同样的情况下，柴春泽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而我却踌躇不前呢？我越想越感到惭愧。我回乡五年多了，柴春泽下乡才两年，可他做到的，我却没做到。如果不是读了柴春泽的信，擦亮了我的双眼，岂不要上了刘少奇、林彪鼓吹的“下乡镀金论”的当吗？我如梦初醒，连夜给表哥写了回信，批评他搞不正之风的错误做法，表示我要永远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

今后，我一定要向柴春泽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扎根农村，建设农村，与轻视农村、轻视农业劳动的旧观念彻底决裂。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刊登邓绪东的文章《为“扎根精神”叫好 读柴春泽的信有感》

（解放军某部邓绪东）

下乡知识青年柴春泽在给他父亲的信中说：“我现在百分之百地需要你对我进行扎根教育，我不同意你这拔根教育。”这个问题提得尖锐，提得深刻，代表了革命小将在思想领域里向老将的挑战。我们为这封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书信叫好，为“扎根精神”叫好！

“扎根精神”好，好在贯穿了斗争。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要“扎根”，就要同“拔根”斗。高山上的青松要扎根，必须同狂风暴雨、霹雳闪电斗，同板结的土壤、坚硬的地层斗。下乡知识青年要在农村扎根，除了同风沙

大、路途远、环境艰苦等自然条件斗争外，还要同阶级敌人斗，同来自社会上乃至家庭里的错误思想、传统观念斗。柴春泽斗得好，因此，根扎得深，扎得牢。

要“扎根”，种子很重要。水上浮萍只能随水漂，泰山青松却能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我们要做红色的革命种子，象柴春泽所说的那样，“向前看——共产主义金光闪。”“立大志，誓为全球红遍决裂旧观念。”如果抱着“下乡镀金”、“两年回城”的思想，一遇风吹草动，就会东摇西摆，甚至被连根拔起。

要“扎根”，离不开土壤。花盆里的一杯土，长不出钻天的白杨和傲霜雪的松柏。我们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要象柴春泽那样，老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如果不结合，就成了无土之草，很快就会枯萎。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个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要“扎根”，必须有阳光照射。万物生长靠太阳，干革命靠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柴春泽所以有那样高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敢于与旧的传统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最根本的是由于他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世界观。要在农村扎根，先要毛泽东思想在自己头脑中扎根，把资产阶级思想连根拔掉。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告诉我们，如果不认真看书学习，不彻底改造世界观，“拔根风”一吹，就会迷失方向，就不能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今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灿烂阳光普照神州大地，亿万贫下中农热情欢迎、关怀和教育下乡知识青年。知识青年战友们，要象柴春泽那样：“扎根农村争取奋斗六十年！”“建设农村不获胜利心不甘！”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解放军报》刊登钟志民同志在校党委常委一月十七日约见他时的谈话记录《珍惜革命前辈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 决不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过日子》（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整理）

校党委对我的事情很关心。我深深感到党的温暖，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温暖。

我入大学是“走后门”来的。这是个错误。我一九六八年初中毕业，到江西瑞金县沙洲坝公社插队劳动。一九六九年，我到部队以后，很想上大学学点认识，曾向父母亲讲过多次，认为干部子弟受点照顾是应当的。一九七二年四月招收大学生，我爸爸给有关部门打了电话，就这样，我上了大学。临走时，部队机关有些干部和同志对我上大学有议论，我走时就感到不光彩。到学校以后，很想给部队写信，想写“决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但想到自己不是组织推荐来的，一直没有勇气写。到学校以后，学了一点东西，又到社会上去接触了一些工人、农民，到过南京汽车制造厂、凤凰山铁矿、人民商场，听到很多人对“走后门”不满，联想到自己，感到“走后门”上大学不合理。特别是去年五、六月份，我在凤凰山铁矿时，听到毛主席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纠正不正之风的有关指示，那里的工人群众反映非常强烈，我思想上震动很大，更感到自己做了错事，应该作斗争，反对这些错误的东西。暑假回家，我跟妈妈讲了，她也很感动，认识到这件事做得不对，但又担心退学影响不好。暑假中，我们每天都谈这个问题。爸爸工作很忙，只跟爸爸讲过一次，开始爸爸也认为不一定退。我向他提出我们这个部队领导机关的干部子弟，没有一个在农村，不合理，马列主义都是对别人的。最后爸爸表示“家里出个农民也好”。我回到学校，找了老师，说明我是“走后门”来学校的。同时，我又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退学。妈妈回信说，你是党员，可以向党组织写个思想汇报，组织让退就退，不让退就读下去。后来，在学习十大文件以后，我还是打了报告，退不退，听从党委的决定。当时我还搞不清楚，该退还是不该退。我的一个亲戚说，退学恐怕会从“左”的方面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落实，你要这样搞，就乱了套了。有的领导同志还给我讲了三全：（一）你的问题发生在上级有关规定以前，不在退学范围，可以不退；（二）同学教师对你反映比较好，没有退学必要；（三）学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对国家也是个损失。后来，我一直考虑到底该不该退的问题，自己觉得事情好象没有结束。这次到江苏阜宁县，参加县委常委批林整风，从群众对县委的意见中，我联想到自己、家庭，感到自己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个向党内不正之风作斗争的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退学。回校以后，我又进一步想，既然我这样做，路线正确，我应当退学回部队，回农村。

在这个问题上，对干部子弟如何看，回想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在南昌二中当红卫兵时，自己也受到过反动的血统论的影响，认为父亲革命，儿子当然革命，吃一只锅里的饭嘛！现在一想到这个问题，就有些担心。我们有的干部的子弟到底有多少革命感情？有多少干部子弟能成为马列主义者？我们有的干部子弟，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是严重的。比如我的一个亲戚假期回家，都要家里派小车子接，我曾说他是特权思想，脱离群众。高干子弟要成为马列主义者，就要努力学习，认真改造思想。

“走后门”对党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应该斗争，如不去斗争，就是讲空话。以前我对“走后门”的问题，总感到是小事，通过去阜宁搞批林整风运动，我更看到了“走后门”问题的严重性。要搞马列主义，就必须把“走后门”斗倒，这是关系到为自己还是为人民的问题，我决心把它斗倒。

我对到农村去扎根一辈子，开始有很多想法。农村生活苦，要扎根一辈子，行吗？为了解决扎根农村的思想，去年暑假，我回到了瑞金。我买了一条香烟，几斤糖果，想去原来插队的地方看看大家。但是，到了村子口，感到不好意思进村。我算什么呢？是当兵的，还是大学生？人家在那里劳动五、六年，我只有三个月就走了，觉得不好意思回去。于是我就转回到叶坪公社一位伯父家，在那里住了三天。几个堂兄弟和我讲了过去家里的事，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我爷爷是被敌人杀害的。一九二八年，一个红军叫杨子光，从闽西来到瑞金，住在我家，他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搞地下工作。我爷爷做他的交通员，帮助他做了很多事。在他的启发下，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他们组织暴动，成立了工农红军赤卫队第五团，爷爷当了村苏维埃主席。当时瑞金是游击区，红军走了以后，地主还乡团回来，村上的人都撤到山里去了。因为村里有一位军属生病，没有走，爷爷就下山背他，不料在路上被抓了，吊在祠堂里遭毒打，要他讲出红军在什么地方，群众在什么地方。爷爷不肯讲，敌人便向他打了两枪，爷爷没有死，还是骂声不绝，后来敌人又用刺刀戳他，就牺牲了。当时，家里很穷，连棺材也买不起，就用一条布腰带把戳破的肚子包起来埋了。后来在一次迁墓的时候，还从一根肋骨上取下一颗子弹头。我奶奶下决心送三个儿子参加红军。当时我父亲只有十四岁。大伯父后来因为一条腿被敌人的子弹打断了，没有参加长征。他在家养伤，躺在床上，被地主活活砸死了。父亲和二伯父参加了长征，在长征路上，他们见过三次面，讲了几句活，生活艰苦，二伯父负了伤，一条胳膊被敌人的炮弹炸断，还生

了病。进草地以后，我父亲再也没有见到他。到了延安，遇见二伯父所在的警卫连的同志，才知道二伯父已在过草地时牺牲了。

联想到我自己的生活在，我感到自己很对不起革命前辈。我们现在享受着革命前辈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躺在父母亲的“功劳簿”上过日子。我到了学校里，丢了一块手表，却毫不在乎。我们在生活上大手大脚，在政治上却不求上进，这样下去，就会变成老一辈革命者的叛徒。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江山，难道能够在这一代手里断送掉吗？不能！过去老一辈打仗干革命，现在我们也要革命！我是一九五三年生的，出生不到一个月，父亲母亲都去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把我留在营口一个老大娘家里。后来又把我抱回来了。我是人民群众抚养大的，应该尽力为人民服务。这次我在阜宁县参加批林整风运动，看到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还要经过艰苦努力，更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

中国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党内还有路线斗争。我们要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跟广大革命干部、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一起，同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到底。同我们自己队伍中、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到底。这关系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委支持我的行动，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干！（南京大学党委办公室整理）

（原载《解放军报》1974年1月25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新华社报道：《热烈支持反潮流的革命精神 南京大学党委批准钟志民的退学申请；全校师生员工纷纷表示学习他敢于反潮流，敢于自我革命的精神，进一步搞好教育革命》

新华社南京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电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最近批准了政治系学员钟志民申请退学的报告，热烈支持他的革命行动，并号召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学习钟志民的革命精神。

钟志民写给校党委的退学申请报告在南京大学公布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级领导干部和师生员工一致赞扬说：钟志民的退学申请报告，是向资产阶

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展开新的进攻的一份宣战书，是向广大革命干部和干部子女进行反修防修教育的一份好教材。大家纷纷表示要学习钟志民敢于反潮流，敢于自我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进一步搞好教育革命，把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近几天来，南京大学党委连续召开常委会和扩大会，认真讨论了钟志民的退学申请报告，并听取了钟志民关于退学问题的思想汇报。钟志民在汇报中谈了自己在开门办学过程中接触工农群众所受到的教育，还回忆了他的革命家史。原来，他祖父一九二八年在江西瑞金叶坪任村苏维埃主席时，为了掩护红军，被白匪军杀害了。他祖母随即送三个儿子参加红军。大伯父在战斗中负伤后，在家养伤，被反动地主活活砸死在床上。二伯父在长征途中过草地时英勇牺牲。他父亲跟毛主席长征到了陕北，南征北战几十年。钟志民联系到自己的革命家史，沉痛地说，干部子女不能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享受“特殊照顾”，要下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努力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做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说，“走后门”的问题，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执行什么路线的大问题。我既然认识到这是错误的，就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退学回部队、回农村的实际行动，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到会同志听了钟志民的汇报，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路线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心情十分激动，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南京大学党委经过讨论，决定批准钟志民的退学申请，希望他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南京大学干部、教师、学生对钟志民的退学申请报告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政治系教师、政治系党总支委员胡福明激动地说：“钟志民在觉悟不断提高，一直到下决心要求退学的过程中，经常和我交谈，使我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钟志民是个勇敢的革命战士，我们要学习他敢于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挑战的反潮流精神，要学习他理论联系实际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从他的革命行动中，看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迅速成长，心里感到非常兴奋。”历史系二年级工农兵学员刘泽英说：“我坚决支持钟志民同学这种反潮流的革命精神。钟志民在退学申请报告中提出的干部子女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对我们广大工农兵学员来说，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决不能把上大学当作成名成家的阶梯，而是要锻炼改造自己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再有一年，我就要毕业了，我一定以小钟为榜样，毕业后回到苏北农村去，一辈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钟志民是一九七二年四月进入南京大学的，在这两年的学习过程中，他努力学习马列主义，除教学上规定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外，还坚持自学其他经典著作。在学习中，他敢于联系当前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提出问题，独立思考。在执行毛主席关于“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的指示当中，不论去工厂或农村，他都能够自觉地深入群众，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去年，他利用暑假回到江西老家瑞金的农村，作了一次访贫问苦的社会调查，并详细地整理了自己的调查笔记。回校后，他感触很深地说：“生活在幸福中，决不能忘本。只有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才能不断前进。”他在凤凰山铁矿劳动时，用生动而有说服力的材料，写了一篇《青年人一代胜过一代》的调查，有力地驳斥了“青年人一代不如一代”的谬论。去年十一月，钟志民参加了江苏省委工作组去阜宁县搞批林整风运动，农村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又一次使他受到了深刻教育，更加坚定了与不正之风进行斗争的决心。

钟志民不仅学习上刻苦，而且实践毛主席的教导，积极为人民服务。他担任南京人民商场职工业余学哲学辅导员期间，每周轮到他辅导讲课时，他都按时步行赶到。他的讲课能够深入浅出，联系实际，受到了商场职工的赞扬。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孔子是怎样利用教育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

孔子是春秋末期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他一生都在维护正在崩溃的奴隶制度。他的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办教育。

历代反动统治者把孔子吹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林彪一伙甚至公然叫嚷：要“大书特书”孔子在教育史上的“划时代的功绩”。

孔子办教育的历史本来面目究竟怎样？我们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马列主义观点加以剖析。这对于深入开展批林整风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很有

必要的。

为奴隶主服务的“私学”

过去，有的人因孔子办私学，吹捧他是我国历史上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把学问从贵族手里拿到平民手里的一位大师。从那时候起，中国的教育已经掌握到平民手里了”。把孔子说成好象是一个“进步的大教育家”。这是对历史的歪曲。

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的时期。当时，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与此相适应，在上层建筑领域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专为奴隶主贵族官僚子弟开设的官办教育——“官学”，妨碍了新兴地主阶级掌握文化和从事政治活动。同时，社会上主张变革的新思潮也波及“官学”内部，引起了奴隶主当权派的恐惧，有的人提出了“可以无学，无学不害”的主张（《左传》昭公十八年），甚至有“毁乡校”的议论（《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特别是在大规模的奴隶起义的不断冲击下，“官学”就再也难于维持下去了。

随着“官学”的日趋衰落，私家收徒讲学日渐兴起。与孔子同时期办私学的，有郑国的邓析、鲁国的少正卯等。少正卯宣讲的是革新思想，吸引了大批学生，甚至孔子的弟子也离开孔子而“归少正卯”，以致“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王充：《论衡·讲瑞》）。

这些史实说明，官学并非孔子“打破”，而是当时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教育“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论是官学还是私学，都有鲜明的阶级性。孔子办学和少正卯办学，虽同为私学，却属于不同的阶级和政治路线，有着不同的目的和内容。因此，离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离开教育为哪一个阶级服务，用“官办”还是“民办”来评价办学是反动还是进步，这是十分荒唐的。

孔子所办的私学，是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服务的。在腐朽的官学制度已经不能抵挡新思潮的进攻，私学兴起已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孔子以奴隶主阶级卫道士的姿态，也用办私学的方式，把奴隶主阶级官学的反动使命接了过来。他收罗门徒，培植势力，利用讲坛，制造舆论，妄图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接续断

绝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统治，扶植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上台，即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他办的私学，从招收学生的阶级路线到教育的政治思想内容，同过去的官学并无实质上的区别。这分明是拉着历史倒退，哪有什么进步意义？！

如果认为，孔子办私学，改变了文化教育由少数贵族官僚子弟垄断的局面，使之“扩大”到了没落的贵族，也算是一个“进步”，而不问这种“扩大”究竟对哪个阶级有利，那岂不是等于说，孔子变奴隶主官学为奴隶主私学，从而为奴隶主阶级培植更多的反动“人才”，也是他的“进步”，是他的“划时代的功绩”？！这是在超阶级观点的幌子下，替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子涂脂抹粉。可见，把屠杀革新派人士少正卯、镇压进步私学的反动学阀孔子，捧为中国“进步的大教育家”，这是对历史的颠倒！

#### 以讲学为名的反动政治集团

过去，有的人还把孔子描绘成一个脱离政治的教育家，说因为“天下无道”，“乱臣当国”，“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难道真是这么一个洁身自好，埋头讲学的“老教书匠”吗？这也完全歪曲了历史。

孔子一生都念念不忘当官“为政”，搞复辟。他常把自己比作“美玉”，“求善价而沽”；又说自己不是一个葫芦瓜，岂能光是挂在那里，只摆样子不能吃？他只要三个月没有做官，就惶惶不安。即使在他当不成官，无可奈何，只好去办私学的时候，也决不是要摆脱政治，而是把教育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孔子自己就曾不打自招地说：“我用孝悌教人，从而施加影响于当政者，也就是搞政治，何必亲自去当官？”（“《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从这句话里可以看出，孔子办学的目的是“施于有政”，把办学与“为政”结合，用教育进行反革命的政治活动。

孔子经常向学生们讲授如何谋求官职禄位，鼓吹“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后来经由他的学生卜商（子夏）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口号。这个口号是否仅仅是宣扬个人名利观念，鼓励学生升官发财呢？显然不是。孔子有一个谬论，叫做“为政在人”。他认为政权的存亡兴衰，完全决定于有无几个“贤”人执政。“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他说：

舜有贤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贤臣九人，而后取得天下（《论语·泰伯》）。所以“为政在人”，是说有了有“天才”的“贤人”，就能够“发扬光大”奴隶制之“道”，扭转他所谓的“世衰道微”的局面。子贡问他：“今之从政者何如？”他鄙屑地回答说：“唉！都是些卑微低贱的人，不足道！”（“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于是，他就妄想通过办私学，培养一批他所理想的“学而优”的“志士仁人”，去“为政”，来维护奴隶主阶级专政。他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挡历史前进，挽救奴隶制必然灭亡的命运。这完全是帝王将相决定历史命运的唯一史观，也是他鼓吹“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目的。

孔子办的私学，实际上也是一个儒家反动政治集团。

孔子的讲学活动，是他反革命政治活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他率领弟子，游说诸侯，力图运用这个政治集团的声势，兜售他炮制的儒家思想，制造复古倒退的舆论。《论语》这部孔子施教的言行录，实际上也是孔子施政的言行录，讲的内容大都是政治。直接回答国君、大夫、弟子们“问政”，以及议论如何“为政”、“从政”、“事君”、“使民”的条目，就有一百多条。孔子以讲学为名大搞反革命政治活动的行径，曾被他的学生子禽一语道破。子禽说，“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论语·学而》）。

孔子办私学，也是“聚徒成党”，培植反革命党羽。孔子鼓吹君子“群而不党”，这是说谎。孔子杀少正卯，就是有党。他还积极干预和指挥学生从事政治活动。学生在当官之前或“从政”过程中，都得向他请示汇报如何“为政”。子路去当卫国蒲邑大夫，临行前孔子嘱咐他说：“蒲多壮士，又难治”，就教给他治人的权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当他发现新兴封建势力季氏违反周礼，私祭泰山，和季氏准备讨伐奴隶制小国颛臾时，他都立即要求在季氏那里做官的门徒设法加以阻止。他还多次亲自去巡视弟子们的“政绩”，凡是卖力执行他的反动路线的，孔子入其境就连声赞扬（《韩诗外传》卷六），若是背离了他的反动路线的，他就号召门徒“鸣鼓而攻之”（《论语·先进》）。

有时，他还带领弟子一起去当官篡权。当他在鲁国做“司寇”的时候，他就趁机把他的门徒子路、冉耕、原宪、高柴、公西赤等人，分别安插在基层当官或出使外国，企图全面控制鲁国大政。他这种师徒结伙篡权的行径，引起了齐、楚等国统治者的警惕，以致后来孔子亡命楚国时，楚国大臣子西就劝阻楚王不用

孔子，以防他带着一帮“贤弟子”在楚国“明周召之业”，搞夺权复辟的勾当（《史记·孔子世家》）。

由此可见，孔子办私学，并非只是给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而是把它作为培植势力，攫取政治权力搞复辟的手段。孔子同学生的关系，也不是象他自称的：“你出十条干肉，我就教你读书”，只是买卖知识的关系，而是一个反动政治集团的首领同他的党徒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当资产阶级思想家章太炎还在反对孔学的时候，就曾经指出：“大抵孔子乃春秋时一政客，其七十子之徒，不过其政党中之党员耳。”（金毓绂：《国学会听讲日记》）培养奴隶主精神贵族的教育内容

孔子经常告诫他的学生，要做“君子儒”。什么是“君子儒”？就是死心塌地为奴隶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

孔子对“君子儒”的基本要求是：对自己，能用“礼”来修身养性；对奴隶主阶级，能充当一个“不辱君命”的帮凶；对奴隶和劳动人民，能有一套“使民服”的统治权术。可见，所谓“君子儒”，就是浸透了奴隶主阶级世界观，顽固地维护奴隶主阶级专政，专门“治人”的精神贵族。

为了培养“君子儒”，据《论语》记载，孔子对学生进行“四教”，即“文、行、忠、信”的教育。这“四教”有一个总纲，就是“克己复礼”。

所谓“文”教，是以西周以来的诗、书、礼、乐等典籍为教材，灌输奴隶主阶级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其中“礼”是最基本的。孔子反复强调“不学礼，无以立也”。这是因为，“礼”包括政治制度、道德规范等，全面地体现了奴隶制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因此，孔子就紧紧抓住“礼”的教育，作为培养学生反动政治立场和世界观的中心环节。“文”教的其他内容，都是为这个中心服务的。学“诗”（《诗经》），可以“思无邪”，不致“僭礼逾矩”，以便更好地“事父”、“事君”。读“书”（《尚书》），是要从历史文籍中领悟“先王”的“圣德”“明治”，以资效法。习“乐”（音乐），是为了陶冶奴隶主贵族的情操，并且往往是和等级森严的礼仪相配合，以加强“礼”的教育。

所谓“行”，是行其所知，即对于学来的“文”要身体力行。孔子提出君子要“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上述“文”教，即属于“博文”，但这还只是从书本上接受了“礼”的教育，而它的实际作用则在于付诸实行。所以，还必须以“礼”



作为行为的准则,即“约之以礼”,也就是以“礼”为标准去“克己”。具体地说,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四教”中的最后两项“忠”、“信”,是道德规范的教育,它同样是属于“礼”的范畴。所谓“忠”,就是“臣事君以忠”;所谓“信”,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欺骗奴隶们,使他们老老实实在地受奴役(“信则民任焉”《论语·尧曰》)。

以上分析说明,孔子教育内容的阶级性是很鲜明的。列宁曾经指出:“整个旧学校都浸透了阶级精神,……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青年团的任务》)孔子的所谓“四教”,都浸透了奴隶主贵族精神,它可以用孔子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要背叛奴隶制(“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孔子教育内容的阶级性决定了它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决定它的特点就是“颂古”、“学古”、“复古”。孔子曾经标榜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正是对他的教育内容反动性的自供。

其次,孔子的教育是与生产劳动相脱离,与劳动人民根本对立的。当樊迟请教如何种田种菜时,孔子不但推开不理,而且大骂樊迟是“小人”。在孔子的眼里,剥削阶级是“高尚”的,而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和劳动人民则是卑贱的。他鼓吹“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君子”的任务就是致力于“治人”之道,劳动是奴隶们的事。君子只要学会礼、义、信等一套统治权术,奴隶们就会来归顺你,自己根本不必去种庄稼。在孔老二看来,“君子”去种田,有失奴隶主阶级的尊严,是违背“礼”的行为。

为了执行这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的路线,孔子还竭力宣扬奴隶主阶级的寄生哲学。他说,种田会饿肚子,读书则可以坐享俸禄(“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用“馁”和“禄”施以威胁利诱,驱使门徒去“谋道不谋食”。在这种反动教育的熏陶下,孔门弟子也鼓吹生产技能是“小人”之道,“君子不为也”,否则,就会妨碍君子的“远大事业”(“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孔子的这种剥削有理、读书高尚、劳动卑贱的谬论,后来被孟子发展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也极力加以宣扬,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反动阶级偏见。林彪和孔子是一条黑线

在阶级社会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是阶级斗争的工

具。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吹捧孔子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都是出于巩固剥削阶级专政的需要。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反动教育制度，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造。但是，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则竭力利用他们在教育领域里年深日久、盘根错节的影响，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传播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培养他们的接班人，以复辟资本主义。这些反动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从刘少奇到林彪，集中代表了他们反革命复辟的要求，炮制和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继承了自孔子以来二千多年的反动教育传统。从“有教无类”到“全民教育”，从“学而优则仕”到“读书做官论”，从轻视种田、种菜到“三脱离”的修正主义道路，一条黑线，前后贯穿。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战线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工人阶级登上了上层建筑斗批改的舞台。大学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学生，在学校学了几年以后再回到实践中去。学校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坚持“五·七”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教育领域里翻天覆地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必然引起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极端仇视，他们必然进行疯狂的反扑。林彪反党集团对于教育革命的污蔑和攻击，就是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林彪一伙继承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竭力维护地主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垄断。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阻挠工农兵上大学，妄图继续把劳动人民排斥在学校的大门之外；另一方面却要把教育变成他们这些“高贵者”的特权。他们对其子女宣称：“大学就是为你们办的”，“你们是当然的接班人”。这就暴露了他们想由垄断教育，进而篡夺党和国家权力的狂妄野心。

林彪一伙顽固坚持自孔子以来的反动教育传统，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分子走“五·七”道路，是什么“变相失业”、“变相劳改”，这些完全是孔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谬论的翻版。他们还提出“教师要老，教材要厚，理论要多，下乡要少”的反动口号，继续坚持“三脱离”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继续推行“智育第一”的修正主义教育方针，继续采取旧学校里那种“用数不胜数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的办法，以培养“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青年团的任务》）。

林彪之流不仅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在房间里高挂四书集句作

为座右铭，而且还用孔孟之道去传宗接代。他们亲笔抄录孔孟的诸如“君子”“小人”之类的谬论奉为家训，向他们的子女传授剥削阶级的等级思想，要其子女“念念不忘”做一个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的“君子”。林彪一伙还利用孔孟“臣事君以忠”、“杀身以成仁”等反动道德观念去蒙蔽一部分青年，要他们对林家父子象对奴隶制的君主那样“宣誓效忠”，死心踏地地为林家父子卖命，“不成功便成仁”。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甚至公然要社会主义学校的学生必须熟读《孟子》，用以毒害青年学生。他们这一套反动教育思想，完全是从孔孟那里继承来的。

教育领域里几千年剥削阶级的传统偏见和旧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在坚持什么教育方向，培养什么人，走什么样的办学道路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十分激烈。极个别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人，代表着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复辟愿望，多方诋毁教育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到处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极力鼓吹渊源于孔孟教育思想的“闭门读书”、“天才教育”等修正主义货色，妄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学校。因此，为了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必须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批判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批判孔子的反动教育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而奋斗。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新华社报道《钟志民的父母积极支持儿子退学的革命行动 让孩子听毛主席的话，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编者按：南京大学学员钟志民的《一份退学申请报告》在本报刊登后，钟志民的父母立即表示坚决支持儿子的退学要求，并检查和批判了自己“走后门”的错误。革命小将挑战，革命老将应战，值得欢迎。值得支持。

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当中，我们一定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认真纠正“走后门”之类的一切不正之风。这是关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大事，必须认真对待。那种明知是错，只要“下不为例”就可以了的说法，既是为资产阶级思想打掩护，也是广大干部、群众通不过的。钟志民父母的革命行动，鲜明地表现了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风尚，应当加以发扬。

\* \* \*

新华社福州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六日电 《人民日报》一月十八日加按语发表了南京大学政治系学员钟志民的《一份退学申请报告》以后，钟志民的父亲钟学林、母亲黎明心情十分激动，热烈支持钟志民的革命行动。

钟学林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现在人民解放军福州部队政治部担任领导职务；黎明是一位退休的老干部。当他们从广播中知道儿子申请退学的报告已经公开发表时，都非常高兴。正在江西驻军某部检查工作的钟学林，立即打电话向福州部队政治部党委汇报，表示完全拥护《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坚决支持儿子的退学申请报告。黎明说：“从志民的行动中，我意识到孩子在向我们作父母的挑战了，我们要好好地向他们学习。”

钟学林和黎明同志原来想把自己的子女“前途”安排得好一些，通过“走后门”，把到农村插队三个月的钟志民送到部队，后来又“走后门”，让他上了大学。钟志民在教育革命实践中，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一九七三年暑假，钟志民从大学回到家里，对父母说：“毛主席教导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我是通过‘走后门’上大学的，不符合党的原则。我要听毛主席的话，打算申请退学。”钟学林、黎明听了之后，思想上震动很大。他们想，让志民“走后门”上大学是错误的，是不正之风，但是他上大学快两年了，再退学有点可惜。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钟学林和黎明反复学习《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论述，学习毛主席关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进一步想到对子女“前途”的看法有错误。后来，钟学林带领工作组到生产建设部队和基层去，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系列指示，亲眼看到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认识又进一步提高：是教育子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还得利用党和人民给予的职权“走后门”，让子女上大学？这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他回顾了自己跟随毛主席干革命四十年的战斗历程，深深感到，作为党的一个高级干部，更应该模范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此特地写了一封信给钟志民，要他把自己“走后门”上大学的经过和准备申请退学的想法，如实地向校党委汇报。

钟志民的《一份退学申请报告》和《人民日报》编者按发表后，钟学林、

黎明立即给南京大学党委发了一封电报，表示完全支持钟志民的退学报告，并且对自己过去的错误做法作了自我批评。他们在电报中说：“孩子是党的财产，要服从党的安排。我们决心让孩子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下午，钟志民从南京大学回到家里，一家人欢欣鼓舞。钟志民向父母谈了自己认真看书学习，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努力改造思想的体会。钟学林和黎明也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讲了革命传统，总结了在教育子女问题上的经验教训。他们对钟志民说：“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你要坚决地走下去，风吹浪打不回头。我们还要教育你的小弟弟向你学习，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通讯员《老一辈打仗干革命，我们也要革命： 钟志民同志谈申请退学的思想经过》

本报讯一月十七日上午，南京大学党委全体常委开会，听取了政治系二年级学员钟志民同志关于申请退学问题的思想汇报。现刊登如下：

党委对我申请退学的事情很关心。我原来有灰溜溜的思想，觉得不光彩；现在认识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比正确，党的领导无限温暖。

我入大学是“走后门”进来的，这是个错误。我是一九六八年初中毕业生，到瑞金县沙洲坝公社插队劳动。开始不愿意去，大势所趋，父母又告诉我，你先去，以后再把你调上来。一九六九年征兵，我到县人武部找杜政委，他一口答应。我参军的名额是另一个公社的，那个公社的一个社员体检已经合格了，马上就可入伍，结果名额给我占了，那个社员就没能入伍。我在沙洲坝公社仅做了四五十个工分。到部队以后，很想上大学学点知识，曾向父母讲过多次，认为干部子弟受点照顾是应当的。一九七二年四月大学招生，我爸爸在军区是分管干部工作的，给有关部门打了电话，很快就决定了我去上大学。上大学前，妈妈又给我打了电话，问我学什么，我说爱学哲学。我就这样上了大学。临走时，福州军区有些干部和同志对我上大学有议论，我走时就感到不光彩。到学校以后，很想给部队写信，想写“决不辜负党组织的信任”，但想到自己不是组织推荐来的，一直没有

勇气写。到学校以后，学了一点东西，又到社会上去接触了一些工人、农民，到过南京汽车制造厂、凤凰山铁矿、人民商场，听到很多人对开后门不满，联想到自己，感到“走后门”上大学不合理。特别是去年五、六月份，那时我在凤凰山铁矿进行开门办学，听了传达《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那里的工人群众的反应非常强烈，这些是我在学校里听不到的。思想上很受震动，感到自己做了错事，应该作斗争，反对这些东西。暑假回家，我跟妈妈讲了，她也很感动，认识到这件事做得不对，但对我要求退回部队，不同意，说影响不好，还说有的领导同志的孩子也没有退。姐夫说我是极“左”派，“只有你革命”。暑假中，我们每天都谈这个问题，妈妈再三说，只要认识了就好了，不要退了。并要我等商量好以后再决定。爸爸工作很忙，只跟爸爸讲过一次。开始爸爸也认为不一定退。我向他提出领导干部的子弟不去农村，不合理，马列主义都是对别人的。最后他表示“家里出个把农民也好”。家里其他人也不同意我的做法。我回到学校，找了老师，说明我是“走后门”来学校的。同时，我又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要求退学。家里回信不同意我退学，妈妈说，你是党员，可以向党组织写个思想汇报，组织让退就退，不让退就读下去。后来，在学习十大文件以后，我还是打了报告，退不退，听从党委的决定。当时我还搞不清楚，退还是不退。我的一个亲戚说，退学会从“左”的方面干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落实。全国“走后门”的这么多，你要这样搞，就乱了套了。记得王主任（南大革委会主任王勇）那次谈话给我讲了三条，（一）你的问题发生在一九七二年中央十九号文件下达以前，不在退学范围，可以不退；（二）同学、教师对你反映比较好，没有退学必要；（三）学了一年半，再退回去对国家也是个损失。后来，我一直考虑到底该不该退的问题，自己觉得事情好象没有结束。这次到阜宁县帮助县委常委整风，群众对县委的意见很多，我联想到自己、家庭，感到自己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向党内不正之风作斗争的问题，是一个路线问题。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去。回来以后，思想震动很大，我深深感到党的正确路线的温暖。既然这样做，路线正确，就应当退到底，退回部队，退到农村。

在这个问题上，对干部子弟如何看？回想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南昌二中当红卫兵时，认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血统论”是对的，还曾写过坚持“血统论”的大字报。可是，现在想到这个问题，我有些担

心，有些干部的子弟到底有多少革命感情？有多少干部子弟能成为马列主义者？干部子弟有很多特权。我的一个亲戚假期回家，都要家里派小车子接，感到坐公共汽车不光彩。有一次，家里派小车子没有接到，她乘了军区的班车不直接回家，先到招待所，然后再叫家里派小车子去接。我曾说她是特权思想，脱离群众。高干子弟要成为马列主义者，要脱胎换骨，改造思想。

“走后门”这种事情，对党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应该斗争。如不去斗争，就是讲空话。以前我对“走后门”的问题，总感到是小事，通过去阜宁县工作，看到开后门问题的严重性。党要搞马列主义，必须把“走后门”斗倒，这是关系到为自己还是为老百姓的问题。

我对到农村去扎根一辈子开始有很多想法，农村生活苦，要扎根一辈子，父母死了怎么办。还有个人问题没有解决。

为了解决扎根农村的思想，我在去年暑假，回到了瑞金。我买了一条香烟，几斤糖果，想去原来插队的地方看看大家。到了村子口，感到不好意思进村。我算什么呢？是当兵的，还是大学生，人家在那里要劳动五、六年，我只有三个月就走了，觉得不好意思回去。于是我就转回到叶坪公社伯父家，在伯父家里住了三天。几个堂兄弟和我讲了过去家里的事，使我受到很大教育。我爷爷是被敌人杀害的。一九二八年的冬天，红军杨子光同志从闽西来瑞金，住在我家，以教师身份作掩护，搞地下工作。我爷爷做他的交通员，帮助他做了很多事。在他的启发下，我爷爷逐渐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一九二九年冬天，他们在黄沙地区组织暴动，成立了工农红军赤卫队第五团，爷爷当了村苏维埃主席。当时瑞金是游击区，红军走了以后，地主还乡团回来，村上的人都撤到山里去了。村里有一位军属，因为生病没有走，爷爷就下山背他，不料在路上被抓了，被吊在祠堂里毒打，要他讲出红军在什么地方，群众在什么地方。爷爷不肯讲，敌人便向他打了两枪，爷爷没有死，还是骂声不绝，后来敌人又用刺刀戳他，就牺牲了。当时，家里很穷，连棺材也买不起，就用一条布腰带把戳破的肚子包起来埋了。在解放后迁墓的时候，还从一根肋骨上取下一颗子弹头。我奶奶下决心送三个儿子参军。当时，我父亲只有十四岁，他们兄弟三个都参加了红军。后来大伯父因一条腿被敌人子弹打断，没有参加长征。在家养伤，被地主活活砸死。父亲和二伯父参加了长征。在长征路上，二伯父负了伤，一条胳膊被敌人的炮弹炸断。父亲到了延安，才知

道二伯父在过草地时牺牲了。

联想到我自己的生活在，我感到自己很对不起革命前辈。我们现在享受着父亲母亲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成果，躺在前辈的功劳簿上睡觉。我到了学校里，丢了一块四百多元的手表，却毫不在乎，后来家里又给我买了一只一百八十多元的。我们在生活上大手大脚，在政治上却不求上进。这样下去，我们可能会变成老一辈革命者的叛徒！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换来的社会主义江山，难道能够在这一代手里断送掉吗？不能！过去老一辈打仗干革命，现在我们也要革命！我是一九五二年出生的，不到一个月，父亲入朝，母亲在部队也要入朝，把我留在营口一个老大娘家里，后来又把我抱回来了。我是人民群众抚养大的，应该尽力为人民服务。这次我在阜宁县参加整风运动，看到解放三十多年来，有很大进步，但还有不少落后、反动的东西。认识到社会主义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现在想到自己做错事很难过。中国革命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党内还是有路线斗争的。现在世界上不少社会主义国家已变成为修正主义国家，全世界无产阶级都在期待着我们。但在某些人那里，马列主义变成了装饰品，口头上讲的是马列主义，实际不按马列主义办事。我们要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把无产阶级的革命进行到底，就应该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跟广大革命干部、广大工农兵群众在一起，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到底，同我们自己队伍中、自己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斗争到底。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希望党委支持我的行动，我回去以后，一定好好干。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恶毒的用心 卑劣的手法——批判安东尼奥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

自从天安门广场上升起五星红旗，新中国宣告诞生的一天起，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就对我们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抱有不同的态度。亿万革命人民和广大国际朋友表示赞扬和同情，而一小撮反动势力则表现出极端的恐惧和刻骨的仇恨。这是古今中外一切大革命所必然遇到的一种现象。去年开始在一些西方国家放映的、由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



尼拍摄的题为《中国》的反华影片，就是当前国际上一小撮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分子对新中国极端仇视的心理的反映。这个影片的出现，是一个严重的反华事件，是对中国人民的猖狂挑衅。

安东尼奥尼是在一九七二年春作为我们的客人到中国来的。他带着摄影机访问了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但是，他的中国之行，不是为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更不是为了增进中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是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敌意，采取别有用心、十分卑劣的手法，利用这次访问的机会，专门搜罗可以用来污蔑攻击中国的材料，以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在他拍摄的长达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根本没有反映我们伟大祖国的新事物、新气象、新面貌，而是把大量经过恶意歪曲了的场面和镜头集中起来，攻击我国领导人，丑化社会主义新中国，诽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侮辱我国人民。任何稍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看了这部影片，都不能不感到极大愤慨。如果容忍这样的影片在世界上招摇撞骗，那就等于承认任意侮辱中国人民的反动宣传是正当的行为，那就是向国际反动派的反华挑衅投降。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回答国际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挑战。这是当前值得人们十分重视的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

#### （一）

影片摄制者在解说词中说，他“不打算评论中国，而只想开始观察中国的各种面目、姿态和习惯”。这完全是骗人的。这个所谓“纪录片”，每一个镜头都有评论，这是借用反动艺术手法污蔑和丑化中国的极其恶毒的政治评论，是肆无忌惮地公开露骨地反华反共反革命的政治评论。

影片的镜头从北京天安门开始，看起来似乎是很自然的，其实，这种安排却是为整个“纪录片”的反动主题服务的。影片说，“北京是中国政治、革命的中心”，“人民共和国就在天安门宣告成立”，“文化革命的红卫兵浪潮也在这里兴起”。然后，影片“离开天安门”，带领观众开始“观察”中国，也就是要人们看看中国革命究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接着就展开一连串的反动画面，把新中国糟踏得不象样子。影片的这种结构和布局，纯粹是为了把攻击矛头集中地指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咒骂革命，否定革命，反对革命，就是这部影片的要害所在。

反动影片《中国》全盘否定和完全抹煞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取得的伟大成就，企图使人相信今天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往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安东尼奥尼把上海作为“工业化的大城市”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是要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明明上海有许许多多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影片的摄制者却视而不见，而专门搜集设备简陋、手工操作的零乱镜头。明明黄浦江边矗立着能制造万吨轮的造船厂，江上停泊着我国的远洋轮，而在安东尼奥尼的镜头下，黄浦江里的大货船都是外国的，小木船都是中国的。影片的摄制者公然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说，上海的工业“并非产生于今天”，“上海作为一个城市，则完全是由外国资本在上世纪建立起来的”，而解放后“仓促建立起来的工业往往只比大的手工业工厂好些”，“上海最大的炼油厂，也是一个可怜的厂，几乎是用废料建成的”。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大肆炫耀十九世纪帝国主义侵华的“功劳”，竭力贬低我国人民自力更生发展工业的伟大成就吗？影片中还以极其卑劣的手段拍了一些丑化劳动人民的镜头。作者的险恶用心是要暗示，中国的主要工业城市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区岂不可想而知！

安东尼奥尼把林县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山区”介绍给观众，其目的恰恰是要污蔑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在影片中，闻名中外的红旗渠一掠而过，既看不到“人造天河”的雄姿，也看不到林县河山重新安排后的兴旺景象。银幕上不厌其烦地呈现出来的是零落的田地，孤独的老人，疲乏的牲口，破陋的房舍……。他大肆渲染林县“农民的贫困”，把一个山村说成是“荒凉和被抛弃的地方”，把一所乡村小学竭力加以丑化。安东尼奥尼还恶狠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如果我们想发现一个农村‘天堂’，那就天真了”。这不是赤裸裸地诬蔑解放了二十多年的中国农村是人间地狱吗？

这部影片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诋毁和污蔑是多方面的。从城市建设到人民生活，从文化教育到体育运动，从医疗卫生到计划生育，以至幼儿园，统统不放过。

影片完全无视我国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渲染北京“依然是个古老的城市”，住屋“非常简陋”，“城市规划化令人失望”；苏州“同它的古老的面貌差异很小”；上海城市面貌的改变，不过是昔日“西方的经济帝国”在租界修建的房

子“今天成了办公楼”。

影片竭力否认我国人民生活条件的显著改善，说什么“北京人是贫穷的，但并不悲惨”。承蒙这位导演先生手下留情，还说我们不算悲惨；但他的真意是嘲笑我们“贫穷”。他不是在城市和乡村拚命捕捉一些镜头，攻击人们“衣服破旧”，“劳动繁重”，诬蔑在中国到处都可以遇到“穷人”吗？所以这些完全是一副帝国主义老爷的腔调！

安东尼奥尼所以把解放后的中国描绘成这样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无非是要人们得出中国不应当进行革命的反动结论。他攻击人民公社经历了“失望”，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乱了生产系统”，使前人遗留下来的古迹只剩下“寥寥无几”，甚至借用打太极拳的镜头，造谣说“新的领导人”要“取消”这一“古老的传统”。总之，在安东尼奥尼这个反动分子看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好，中国的革命搞糟了，只有倒退，只有复旧，才有出路。这就充分暴露了挂着“左派”招牌的安东尼奥尼的反革命真面目。

## （二）

安东尼奥尼为了诋毁中国革命，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影片中对中国人民的形象和精神面貌进行了令人不能容忍的丑化。他企图通过影片制造这样的假象，似乎中国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地位，没有使中国人民在精神上得到解放，而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没有热情的。

全世界都看到，已经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在我们的国家，“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但是，安东尼奥尼却把中国人民描绘成愚昧无知，与世隔绝，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不讲卫生，爱好吃喝，浑浑噩噩的人群。为了丑化中国人民，他挖空心思地拍摄坐茶楼、上饭馆、拉板车、逛大街的人们的各种表情，连小脚女人走路也不放过，甚至于穷极无聊地把擤鼻涕、上厕所也摄入镜头。在林县，安东尼奥尼突然闯入一个山村，把摄影机对准那里的群众，当群众反对他这种手段时，他就诬蔑群众的反应是“有的恐惧，有的害怕”，“经常是麻木不仁和毫无表情”。安东尼奥尼大摆其“欧洲人的自傲”的架子，处心积虑地往中国人民脸上抹黑，这是对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莫大侮辱！

更刻毒的是，安东尼奥尼还用拐弯抹角的语言、含沙射影的手法来向观众暗示，中国人民的精神是受压抑的，心情是不舒畅的，对现实是不满的。他在上海城隍庙茶楼的画面中插入了一句不怀好意的旁白：“这里的气氛稀奇古怪”，“既想念过去，又忠于现在”。他在这里说的所谓“忠于现在”不过是一句反话，实际上是要诬蔑中国人民对新社会的拥护是出于被迫的，并非真心实意。安东尼奥尼不是在影片中一再渲染中国人民是不自由的吗？他公然嘲讽工人讨论会的发言“重复而单调”，“不是一个真正的讨论会”，诬蔑中国儿童高唱歌颂毛主席、共产党的“政治性”歌曲同他们的天真可爱不相容，因而并非发自内心。他还胡说由于人们的“谨慎”“使人几乎觉察不到他们的感情和痛苦”。在他看来，中国人民是有着不满现实的莫大“痛苦”的，只是不敢表达出来而已。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在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局面生动活泼，广大人民享受着真正的民主，心情无比舒畅。安东尼奥尼企图钻空子，煽动中国人民对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只能是枉费心机。感到“痛苦”的则是一小撮妄想在中国复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派。至于说什么中国人民“想念过去”，这更是污蔑。什么人“想念过去”？中国人民对百年魔怪舞翩跹的“过去”，是深恶痛绝的，只有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才念念不忘他们失去了的“天堂”，朝朝夕夕梦想使中国倒退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但是，历史的车轮是拉不回来的，任何企图开倒车的人，必将被历史的巨轮辗得粉碎！

### （三）

安东尼奥尼拍摄影片《中国》所采用的手法，也是极端反动和卑劣的。

在镜头的取舍和处理方面，凡是好的、新的、进步的场面，他一律不拍或少拍，或者当时做做样子拍了一些，后来又把它剪掉；而差的、旧的、落后的场面，他就抓住不放，大拍特拍。在整个影片中，看不到一部新车床，一台拖拉机，一所象样的学校，一处热气腾腾的工地，一个农业丰收的场景……。而他认为可以用来污蔑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东西，则又是全景，又是特写，不厌其冗长。影片在拍摄南京长江大桥时，故意从一些很坏的角度把这座雄伟的现代化桥梁拍得歪歪斜斜，摇摇晃晃，还插入一个在桥下晾裤子的镜头加以丑化。影片关于天安门广场的描绘更是十分可恶。它不去反映天安门广场庄严壮丽的全貌，把我国

人民无限热爱的天安门城楼也拍得毫无气势，而却用了大量的胶片去拍摄广场上的人群，镜头时远时近，忽前忽后，一会儿是攒动的人头，一会儿是纷乱的腿脚，故意把天安门广场拍得象个乱糟糟的集市，这不是存心污辱我们伟大的祖国吗！

在影片的剪接上，画面跳来跳去，好象是东拉西扯，杂乱无章，其实每一个片段的衔接，都是恶意安排的。比如，影片拍摄者先是向观众介绍十三陵地下宫殿陈列馆中反映明朝劳动人民受压迫和进行反抗的泥塑群象，讲述当时农民的生活是如何的悲惨，然后镜头一转，就出现一队青年学生扛着铁锹下乡参加劳动的情景，再转到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用一位女社员在劳动中擦汗的镜头，来宣扬什么“日常的田间劳动是劳累繁重的”，并且叫嚷中国农村没有“天堂”！这种手法分明是影射今天中国农民的境遇比几百年前封建社会的农民好不了多少。

影片在光线和色彩的运用方面也是很坏的。影片的大部分都以灰暗的光线和阴冷的色调拍摄。黄浦江象笼罩着浊雾，北京的街道被抹上一层青光，林县的山村阴影重重。总之，许多画面给人以惨淡、凄凉、阴郁、冷酷的印象。尤其恶劣的是，影片摄制者还利用配乐作为进行诽谤的手段。他在影片中没有拍过我国一个革命样板戏的镜头，却拿样板戏的一些唱段肆意嘲弄。当响起《龙江颂》中江水英唱“抬起头，挺胸膛”时，画面上出现的竟是猪摇头的动作。据有关单位揭露，这种剪接完完全全是伪造的。这是蓄意污蔑我们的革命样板戏，攻击我们的文艺革命，真是恶毒透顶！

安东尼奥尼对中国人民怀有敌意，这从他在中国的拍摄活动中也可以得到证明。他在解说词中公开宣扬有很多镜头是象间谍那样偷拍的。他得意地说，他在黄浦江如何“冲破禁令偷偷地拍摄了”中国军舰；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如何“把摄影机掩盖住”，“冷不防地抢摄这里的生活场面”。他还埋怨说“带着摄影机在前门大街那里行走是不方便的”。什么不方便？就是做贼不方便。更有甚者，他为了炮制污辱中国人民的镜头，在北京中阿友好人民公社，竟然要别人制造社员打架的场面，让他拍摄；在另一个场合，他还要群众按照他的口味改换服装，否则拒绝拍摄。他的这种偷拍、强摄、作假的行径，本身就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的不尊重和藐视。

#### （四）

反华影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出现，决不是一个偶然的孤立的事件，

而是有它的国际背景的。

近些年来，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越来越好，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新的更大胜利，我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妄想孤立中国、颠覆中国的阴谋遭到可耻的破产。但是，我们的敌人对于他们在中国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攻击中国革命，污蔑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他们妄图在中国实现反革命复辟，使中国重新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一种舆论准备。

人所共知，苏修叛徒集团是国际上反华的急先锋和总后台。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都使出浑身解数，对中国人民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他们说，中国人穷得喝大锅清水汤，连裤子都没得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的生产力遭到“新的破坏”；中国人民“疲困不堪”，处在“严重的苦难”之中，过着“兵营式的生活”，等等。可是，所有这些愚蠢的诽谤，只是暴露了苏修叛徒们的丑恶面目，而没有使他们捞到任何东西。在今天的世界上，苏修的反华谎言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东尼奥尼的反动影片披着“客观”、“真实”的外衣来欺世惑众，又把苏修这一套造谣诬蔑搬出来，妄图起苏修反华宣传所不能起的作用。安东尼奥尼实际上不过是充当了已经破产的苏修反华宣传的应声虫。

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中国》出笼之后，美国广播公司花了二十五万美元重金购进这部影片，并在美国公开放映，还有人帮腔说这部反动影片是“吸引人的”。看来，杜勒斯的阴魂仍然附在一些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身上，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的出现，也适应了这些反动势力的需要。

安东尼奥尼是一个意大利人，但是，他决不能代表千百万对中国人民抱着友好态度的意大利人民。反华，这是广大意大利人民决不会同意的。安东尼奥尼拍摄这样的反华影片，同意大利人民和中国人民要求加强友好关系的愿望，显然完全背道而驰。

中国人民一贯主张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互相了解。在同各国人民的交往中，我们从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我们一再指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从不隐讳我们的国家还存在着前进中的缺点，还有落后、反动的东西，需要继续革命。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欢迎各国朋友对我们

的工作提出批评。但是，谁要是冒充“朋友”而实际上却干着卑鄙的反华勾当，去博取极端仇视中国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喝采，我们就要给予彻底揭露，以剥夺其招摇撞骗的资本。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友好往来。

安东尼奥尼的反华影片告诉人们，在目前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下，必须继续保持清醒的头脑，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世界上总有敌视中国人民的势力，还存在着尖锐复杂的斗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反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切反华的好汉，不管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不管使用什么武器，玩弄什么手法，都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中国人民将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说过的：“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报导《狠批孔孟之道 深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联合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纪要》

新华社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日讯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党委今天联合召开批林批孔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师生、干部和工宣队员们斗志昂扬，愤怒批判林彪利用孔孟之道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罪行，深挖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老根。他们决心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掀起批林批孔运动的新高潮，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彻底批倒“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谬论，工农兵要做文化教育的主人

清华大学革委会委员、工宣队员袁炊才说：历史上反动统治阶级总是利用他们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地位，剥夺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反过来又利用孔孟“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套反动谬论，证明他们对劳动人民的统治是“理所当然”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对孔孟之道和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一场深刻的批判。几千年来被剥削阶级骂作“小人”的劳力者，第

一次成为大学的主人。象我这样的普通工人，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成了光荣的工宣队员，参加了领导大学的工作。几年来，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广大师生员工，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深入进行教育革命，逐步改变着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脱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状况。

林彪一类骗子大肆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极力反对教育阵地上的伟大变革，恶毒攻击知识分子参加劳动是“变相劳改”，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和工农兵上大学。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维护和扩大劳力者和劳心者的差别，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学校。几年来，工人阶级领导学校斗、批、改取得丰硕成果和工农兵学员迅速成长的事实，有力地粉碎了他们的攻击和污蔑。我们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有个二十多年工龄的木工，原来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到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进修一年多，就根据木工结构原理，提出在厂房建筑中革“肥梁胖柱”的命，经过他和其他师生共同努力，打破了国内外长期使用的设计规范，提出了新的计算方法。采用这个方法，可以大大节省建筑材料，扩大厂房使用面积，已被国家正式列入建筑规范。“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我们劳动群众一旦成为文化教育的主人，就一定能培养出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创造出比资产阶级高千百倍的科学文化。“克己复礼”是复古主义路线的核心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说：林彪特别欣赏孔老二所讲的“克己复礼”。他写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他和他的死党叶群，一唱一和，把这几句话写成了四个条幅，互相鼓励，挂在他们的卧室内作为“座右铭”。是哪一种人就有哪一种人的思想。林彪这个现代的复古主义路线的头子，真是抓住了古代孔子的复古主义路线的核心。孔子所说的“礼”，就是奴隶主阶级的规章、制度、社会秩序。孔子“复礼”，是要复辟奴隶制，妄想把当时中国社会恢复到奴隶社会。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复礼”，是想复辟资本主义，使中国重新沦陷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

过去我的立场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我的世界观和所走的路线，都是复古主义的。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尊孔。过去我在哲学战线上的写作和行动，都是同当时政治上的尊孔配合起来，为当时的复古主义的反动路线服务的。我是



“五四”运动时代的人，可是我拥护孔家店。经过“五四”运动，封建式的拥护方式不行了，我就用资产阶级的方式，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我在三十年代写的那部《中国哲学史》以及在抗战时期所写的宣扬儒家垃圾的那些书，这就同蒋介石的尊孔配合起来，为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服务。解放以后，资产阶级方式又不行了，我就用修正主义的方式，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我在六十年代所写的那半部《中国哲学史新编》，这就同刘少奇、林彪的尊孔配合起来，为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以及参加批林批孔的斗争，我才逐步地对于现代和古代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其间的连贯性有所认识，对于我过去的中国哲学史工作的危害性之大有认识。我们现在反对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必须从这两条路线的历史根源上，彻底批判以孔子为首的复古主义路线，宣传从法家开始的反复古主义路线。“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要害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汤一介说：林彪这个叛徒、卖国贼，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武器。孔孟的“德”、“仁义”、“忠恕”，就是林彪用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篡改党的理论基础的一个重要的反动思想武器。

正当我国各族人民欢庆国庆二十周年的时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在暗中干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勾当。他给他的死党叶群写下一个条幅：“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句话原是出于《尚书》，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信徒赵良用来攻击当时法家的代表商鞅的。事隔两千多年，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为什么又搬出儒家“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这一套呢？而且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提出这一套呢？这不是偶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一次伟大的革命实践。这一革命震撼了世界，把帝、修、反吓得要命，沉重地打击了地、富、反、坏、右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大大地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这个隐藏得很深的反革命林彪实在按捺不住他自己，就用两千多年前儒家攻击法家的反动东西“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来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林彪要行的“德治”“仁政”呢？《“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是他要行“德治”“仁政”最好的注脚。林彪鼓吹“恃德者昌”，

就是要对反动派“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把被我们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林彪鼓吹“恃德者昌”，就是要使地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得到真正的解放”，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变为地主资产阶级所有制；林彪鼓吹“恃德者昌”，就是要用孔孟之道代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用孔孟之道的“德”、“仁义”、“忠恕”等反动思想来篡改党的理论基础。革命人民对林彪鼓吹的这一套是坚决反对的。我们对于鼓吹“德治”“仁政”、妄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派，决不施“仁政”。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得好：“‘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一切要把历史拉向后退，反对革命的反动派，都逃脱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孔孟鼓吹反革命的“德治”、“仁政”，没有能挽救得了奴隶制的灭亡。林彪乞灵于孔孟的“德治”、“仁政”也救不了他们的命。这个叛徒、卖国贼和历史上一切倒行逆施的反革命小丑一样，变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古今中外的历史，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是一个真理。无产阶级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就要镇压一切主张复辟倒退的反动派，揭露他们各种反动虚伪的说教，让他们的反动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林彪、对孔孟的反动思想的批判，一定会使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使我们的路线觉悟更加提高。彻底批判林彪和孔老二的反动思想，坚决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工农兵学员孙海燕说：毛主席提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对几千年来剥削阶级陈腐观念的反潮流，是对孔孟之道的彻底批判。林彪这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极端轻视工农，鄙视劳动，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什么“变相劳改”，妄图破坏毛主席的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措施，腐蚀我们革命青年，要我们走回头路，做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这只能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

我们千百万革命青年坚决批判孔孟之道，坚决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就是千百万青年中的一个。我是一九六八年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农村去的。我插队的地方正好是孔老二的老家山东曲阜附近。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贫下中农对我的教育真是胜读十年书。我们经常听到贫下中农对“孔府”地主的血泪控诉，我们多次参观了“孔府”的罪恶展览。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

反动统治，极力抬高孔老二的身价，扩大孔孟之道的影响。除了尊孔老二为“先师”、“至圣”外，还对他的子孙封官加爵。孔老二的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一家七口就占有一百多万亩土地，遍及山东、河南等五个省，每年收进大量的地租，榨尽了劳动人民的骨髓，吸干了劳动人民的血汗。贫下中农用一首歌谣，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说他们“满口三纲五常，实是吃人豺狼，说的是仁义道德，行的是男盗女娼”。贫下中农愤怒控诉说：“孔家店是吃人的阎王殿，‘圣人’家是万恶的强盗家。”林彪打出孔孟之道的破旗，就是梦想复辟剥削阶级吃人的天堂，我们永远不能答应。工农兵学员要彻底批判孔孟之道，永远坚持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 阴谋诡计挽救不了林彪彻底灭亡的命运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一良说：从林彪这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的鬼花招，可以看出他跟两千多年前的祖师爷孔老二是一脉相承的两面派。林彪长期以来千方百计地掩盖自己的反革命真面目。在他指使别人东拼西凑的卡片里，有不少条条是关于“忍耐”的。他早就写下了“忍耐”两个大字，告诫自己“岂可为了一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终身大事”。什么是林彪的“大事”？不就是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吗？一生为复辟奴隶制而到处奔走卖命的孔老二，也叫嚷什么小事上不能忍耐就会坏了“大事”。林彪和孔老二隔了两千多年，可是都为自己的“大事”而号叫“忍耐”，正由于他们都妄图阻挡历史车轮前进，都要搞复辟倒退。他们是有共同政治需要的一丘之貉。“忍耐”这两个字，听起来多么善良而无辜，它背后却隐藏着把历史拉向倒退的复辟阴谋，掩盖着使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血腥罪行。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阴谋诡计的一根毒蔓上挂了两个黑瓜，“忍耐”以外，还有所谓“韬晦（晦）”。这是他从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上学来的。林贼的“韬晦”就是说，躲在阴暗的角落，把凶如尖刀利剑的狼子野心藏在套子里，忍耐又忍耐，掩饰再掩饰，一旦时机成熟，恶狼就立刻跳出来吃人，来搞罪恶滔天的“571 工程”了。“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反动派不可能认识这条规律，总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尽管林彪以一系列反革命策略来隐蔽自己，伺机而动，妄图拉历史车轮向后退，历史潮流照样奔腾前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

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深远的意义。林彪无论怎样以不变应万变，千方百计“忍耐”“韬晦”，都无损于社会主义一根毫毛。等到他反革命魔爪刚一露头，立即被抓住，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林彪连同他的“五七一工程”统统被粉碎。任何阴谋诡计都挽救不了这个叛徒、卖国贼彻底灭亡的命运。

在今天的批林批孔座谈会上发言的，还有清华大学党委常委王德武、数学教研组教师陈景良、工业自动化系教授童诗白、建筑工程系工农兵学员陈锋、学校工人刘福生，北京大学经济系教师张秋舫、物理系教师周岳明、历史系工农兵学员张炜、中文系教授魏建功、哲学系工农兵学员王秀华等。他们分别从林彪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等方面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一九七四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

1973年7月10日下午，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进行英语考试，张玉勤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道，“我是中国的人，何必要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并要她作出检查。

12日，学校负责人罗天奇在初中班学生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她，要求各班对此事讨论批判。由于老师批评方式失当，加上其他原因，张玉勤当日称病请假离校后即投河自杀，14日才在水库中找到她的尸体。事情发生后，公社、县有关部门和学校都已做了调查并妥善处理。

1974年1月，江青在一份内部刊物上看到此事后，派迟群和谢静宜带人到马振扶公社中学重新进行调查。

他们召开了两个半天的座谈会，于1月26日写出《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把马振扶公社中学诬为“法西斯专政”、是“复辟”、“回潮”

的典型，说“张玉勤之死，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迫害所造成的”，说中学负责人和班主任老师是杀人“凶手”。

1月31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并提出：“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有无类似情况”。

1974年2月，江青一次会议上说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逼死了天真的女孩子，“要向全国控诉”。

王洪文也指示要给该校老师和负责人“判重刑”。

迟群把江青、王洪文这些话用电话通知了中共南阳地委。

当地政府对这一事件重新作了处理。罗天奇、杨天成被判刑2年。

唐河县层层办学习班，揪“罗、杨式人物”，共批斗了280余人。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按文件精神检查、揭露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和复辟。在全国掀起“反复辟”浪潮。

（1977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对于南阳地委和省教育局重新处理“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的报告作了批示，指出，这是一个大冤案，决定撤销对罗长奇、杨天成的刑事处分，恢复他们的职务，为受迫害的干部和教师平反。

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教育部党组的建议，决定撤销“1974年1月31日中央转发的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指出，“这一事件是‘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在‘批林批孔’中另搞一套炮制的”。“这个文件把‘马振扶事件’作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恶果’的典型通报全国”，不少地方也抓了大大小小的‘马振扶’，制造了许多冤案，不少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教师和干部遭到残酷打击迫害，蒙受不白之冤，给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灾难”。

此后，各地类似冤案便陆续平反昭雪。）

一九七四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初澜的文章《抓住实质 深入批判——再谈应当重视关于标题音乐、无标题音乐问题的讨论》

当前，一场群众性的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关于标题音乐和无标题音乐的讨论，对于宣扬资产阶级古典音乐作品“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

的修正主义观点的批判，也正在逐步深入。这是文艺领域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尖锐斗争。斗争的实践证明：对这个问题的批判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必须把这一批判纳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之中，进行到底！

为了进一步深入展开批判，我们一定要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纲，透过表面现象，抓住修正主义观点的实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修正主义观点批倒、批臭！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要从本质上看问题。音乐作品是有标题的，还是无标题的，这不是问题的实质。主要是要看音乐作品表现了哪一个阶级的政治内容，为哪一个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资产阶级的标题音乐和无标题音乐，都是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服务的舆论工具。音乐史上大量事实证明：无标题，仅仅是资产阶级作曲家掩盖其作品阶级内容的一种手法而已。他们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和斗争形势的需要，在有些作品上公开写明标题，有些作品则不公开写明标题。有标题的，他们也可以完全脱离标题，乱奏一场。

那些印象派、现代派的音乐作品不是经常写着什么“松树”、“喷泉”、“月光”之类的标题吗？但是只要运用阶级观点来加以分析，我们不难透过这些光怪陆离的音响，看到其中所反映的资产阶级乌七八糟的腐朽生活和颓废情调。特别是现代修正主义的音乐作品，往往在“革命”标题的掩护下，大肆污蔑、丑化人民革命斗争和劳动人民英雄形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可见，音乐作品有没有标题，这丝毫不能改变作品本身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内容和阶级实质，丝毫不能改变作品本身客观的社会作用。因此，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应该以什么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对待资产阶级的音乐作品（包括标题音乐和无标题音乐）。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联系一定时期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批判地分析资产阶级音乐作品的阶级内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空谈什么“情绪的变换和对比”、“健康、明朗”之类抽象概念来代替具体的阶级分析，实际上是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掩盖音乐作品的阶级实质，以蒙蔽和欺骗广大群众。这是论争分歧的焦点。

绝不能脱离阶级分析，来空谈什么音乐作品有没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在存在着阶级的社会里，任何文艺作品都只有具体的、阶级的社会内容，决没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社会内容，也决没有什么抽象的“深刻”。宣扬资产阶级

的音乐作品“没有什么深刻的社会内容”等论调的真正目的，是掩盖资产阶级的音乐作品所反映的阶级内容，只能使革命人民丧失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警惕性，为资产阶级的文化渗透大开方便之门，为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文艺阵地打掩护。

抹杀音乐作品阶级性的修正主义观点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个别的、偶然的現象，而是当前社会上和音乐界的一种崇洋复古倾向的集中表现。这种倾向，不仅反映在对待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有无社会内容的问题上，也反映在对待资产阶级标题音乐的问题上；不仅在音乐创作上反映出来，也在音乐演奏和音乐教育上反映出来；不仅在音乐战线上反映出来，也在其他文艺战线上反映出来，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而已。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抹杀音乐作品的阶级性，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在音乐方面的一种反映。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揭穿，进行严肃的批判。

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是标题音乐、无标题音乐问题上修正主义观点的实质。这种抹杀音乐作品阶级性的人性论，既是从欧洲资产阶级那里贩卖来的，又可以从中国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孔丘的学说里面找到根源。我们要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进一步批判这种修正主义观点。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要充分认识这方面斗争的长期性。我们要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联系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文艺战线（包括音乐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实际，对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修正主义观点和思想倾向，进行持续的革命大批判，在斗争的风雨中，进一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阵地。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二月八日）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给叶剑英的信

剑英同志：

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

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77 页）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

1974.02.20；中发〔1974〕8号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展开，主流是好的。各级党委，首先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组织，应当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学习，联系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认真地抓紧批林批孔。要注意不断总结经验，使批林批孔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开展起来。

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

（这一文件发到县、团级、可向基层群众传达。）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原文件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附录：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

1972.05.01；中发〔1972〕19号

毛主席批示：同意。

目前，高等学校一九七二年春季招生工作正在进行。遵照毛主席关于“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自一九七零年招生试点以来，招生工作的主流是好的。各级领导对招生工作一般比较重视，注意发动群众，宣传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较好地完成了招生任务，促进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发展。



当前值得认真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走后门”现象，有些地区和单位情况比较严重。据反映，有少数干部，利用职权，违反规定，采取私留名额，内定名单，指名选送，授意录取，甚至用请客送礼、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将自己、亲属和老上级的子女送进高等学校。有些招生主管部门和负责招生工作的干部，不按党的原则办事，讲私人交情，私送名额，或强令招生人员违章接收不够条件的人入学。这种“走后门”不正之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破坏教育革命的成果，败坏党的优良作风，损害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对于这些“走后门”进学校的青年的学习和进步，也是不利的。为了反对特殊化，纠正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的不正之风，现通知如下：

（一）各级领导部门要加强对招生工作的领导，严格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在方法上要切实执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原则。选送学员的地区和单位，要把中央有关招生工作的方针、政策、办法和本地区、本单位的选送名额原原本本告诉群众，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推荐选拔；审批机关要了解群众评议和推荐的情况；学校要认真进行复审，有关领导机关和选送单位要给以支持。

（二）各有关领导部门、选送学员的单位和招生的学校，要按照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对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采用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对招生工作认真进行一次检查。对检查出违反招生规定的问题，应及时向当地有关党、政、军领导机关反映。各级领导机关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和纠正。今后，如再有干部滥用职权、违反招生规定“走后门”者，除对有关干部进行严肃处理外，也要把学生退回。

（三）对干部子女应和广大工农群众子女一样看待，都要按招生条件办事，即：具有二至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年龄在二十岁左右，身体健康，一般是未婚的，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程度。

本通知发到县、团和各高等学校。通知内容要向选送学员的基层单位的干部和群众传达。

一九七二年五月一日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初澜的文章《评晋剧《三上

桃峰》》

当前，文艺战线的形势同各条战线一样，一派大好，欣欣向荣。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蓬勃兴起，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越来越多，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情鼓励和欢迎。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反映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迅猛发展的趋势，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取得的新胜利。但是，文艺战线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总是敏锐地反映着社会上的政治斗争。在大好形势下，冒出个把毒草，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由山西省文化局创作组集体创作的晋剧《三上桃峰》，就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叛徒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

《三上桃峰》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说的是某公社杏岭大队，以欺骗手段把一匹病马当作好马卖给了桃峰大队。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发现此事，亲自三上桃峰，退款道歉。

该剧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声称：“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嘛！”“《三上桃峰》就是要通过小题材表现大主题”。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三上桃峰》的“大主题”究竟是什么？

一

《三上桃峰》的出笼，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

在我党的历史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战斗任务。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在广大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后不久，刘少奇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人民群众，保护牛鬼蛇神。刘少奇指派他的老婆王光美窜到河北省抚宁县的桃园大队，以“四清”为名，行复辟之实，炮制了一个旨在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桃园经验”。王光美狂妄地说：“全国都在学大寨，桃园要在政治上超过大寨，叫全国也要学习桃园。”妄图用桃园对抗大寨，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取代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

问题》(即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以及“桃园经验”，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向深入。

但是，刘少奇一伙贼心不死，负隅顽抗。王光美不得不从桃园撤退以后，还留下一个“巩固组”，送去一匹大红马，死守桃园这块阵地。他们不仅在桃园附近立起了一块高达丈余的石碑，上刻“永不要忘记”四个大字，为她树碑立传，王光美还亲自跑到旧文联礼堂作报告，策动文艺界运用文艺形式来为她树碑立传，歌功颂德。

就在这样的历史政治背景下，一九六五年夏天开始，在被旧中宣部这个阎王殿控制的舆论阵地上，围绕着通讯《一匹马》和故事《三下桑园赎马记》，掀起了一股宣传热潮。主持宣传的人特意提醒说：这个“故事发生在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河北唐山地区抚宁县，更加引起人们深思。”“深思”什么？就是要人们看清楚这个故事是为王光美涂脂抹粉的，是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他导演的“桃园经验”翻案的。

在这场阶级斗争中，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及其同伙，倾巢而出，喧嚣一时。在当时被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的文艺界，以《一匹马》的故事为题材的报告文学、连环画、纪录影片和各种样式的戏剧、曲艺，纷纷出笼。旧中宣部的一个副部长，指令在北京的某一话剧院赶排同一题材的《春风杨柳》，叫嚷“要搞出样板，起示范作用”。旧文化部的一个副部长，计划亲自带领一个文化工作队去抚宁县，把王光美蹲点的这个地方搞成群众文化活动的“样板”。

紧步周扬之流的后尘，一九六六年一月，山西省的《火花》戏剧专刊，以卷首的显赫位置，发表了根据上述通讯改编的大型晋剧《三下桃园》。请同志们注意：通讯中的真实地名是“桑园”，剧本却偏偏改为“桃园”。一字之易，点在题上，更为醒目。剧中大唱什么“社社队队全一样，唯有桃园不大同”，用反动的“桃园精神”，对抗毛主席发出的“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他们唯恐观众看不清楚这个戏的政治意图，还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一个原通讯中没有的人物——一个姓王的女县长，让她从幕后走到前台，颐指气使，招摇过市，用她之口点破这个剧本的主题在于歌颂桃园“社教运动的胜利果”。这是在文艺舞台上为刘少奇、王光美树起的又一块“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三下桃园》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这块“碑”

被推倒了，打碎了。事隔八年，在某些人的指使和鼓励下，《三下桃园》改名为《三上桃峰》，又被重新搬上舞台，把这块被推倒了、打碎了的“碑”又树了起来。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从《三下桃园》到《三上桃峰》，中心事件没有变，故事情节没有变，基本的人物关系也没有变。惹人注意的三处改动是：一、“桃园”变为“桃峰”；二、时代背景从“四清”运动后的一九六五年推到了一九五九年；三、那个姓王的女县长不见了。然而，越描越黑，欲盖弥彰。这些改动，除去说明炮制者完全知道一匹马的故事的政治背景，完全知道《三下桃园》的政治要害，作贼心虚，害怕马脚太露以外，丝毫不能说明别的。

人们不禁要问《三上桃峰》的炮制者和支持者：既然明明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三下桃园》，明明知道这个毒草剧本的要害所在，为什么现在又为它改头换面，乔装打扮，迫不及待地搬上舞台？

《三上桃峰》的炮制者曾经说过：“要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戏早就红了！”一语泄露了天机：他们这个戏跟刘少奇是同命相连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刘少奇垮台了，他们如丧考妣，于心不甘。经过几年的炮制，他们认为时机成熟了，就明目张胆地把《三上桃峰》抛了出来，大喊大叫什么“《三上桃峰》是山西的代表性剧目！”“《三上桃峰》是经过七年锤炼的。别的戏不上，行；《三上桃峰》不上，不行！”当演员表示不愿排练这个戏时，他们竟威胁说：“是毒草也要演”，不演就“以破坏革命现代戏论处”。看，他们要用这个戏来为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气焰何等嚣张！可是，当革命群众揪住了他们的狐狸尾巴之后，他们又装出一副可怜相，说什么“没有看过原来的报道”呀，“不知道这个故事有什么政治背景”呀，等等。躲躲闪闪，支支吾吾。事实胜于雄辩。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三上桃峰》是经过精心炮制，有人批准，有人支持抛出来的。《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抵赖不掉的！

## 二

从《三上桃峰》的政治背景看，是为刘少奇翻案的。从《三上桃峰》所表现的政治内容看，也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是为刘少奇、林彪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

第一，《三上桃峰》的炮制者，竭力鼓吹刘少奇、林彪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三上桃峰》却千方百计地掩盖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大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二而一”。对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杏岭的贫下中农和党员不反击，不斗争。剧中还将老六美化为想为集体“办好事”的人。对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杏岭大队的大队长李永光，不仅不去表现党员、群众对他的斗争，反而为他开脱罪责，把他的错误性质说成是什么“本位主义思想”，还为他评功摆好，故意回避这场尖锐激烈的路线斗争。

在这个戏里，没有阶级矛盾，没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可真是个人人“忠恕”、个个“礼让”的“君子国”呵！当年大刮吹捧“桃园经验”的妖风时，报纸上不是有人通过讲述小说《镜花缘》里“君子国”的故事，号召人们在创作中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君子国”吗？《三上桃峰》的炮制者果然把一个“君子国”搬上了舞台。这个“君子国”不是别的，就是刘少奇、王光美在桃园已经建立过的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劳动人民重新受压迫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王国！

第二，《三上桃峰》的炮制者，狂热地宣扬刘少奇、林彪所贩卖的“孔孟之道”，把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冒充为共产主义风格和无产阶级思想。

风格是观念形态，是客观实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风格是有阶级性的。《三上桃峰》所宣扬的这种不讲阶级、不讲路线、互相“礼让”的“风格”，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两千多年前，反动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丘之流鼓噪什么“忠恕”、“克己”，什么“礼之用，和为贵”，目的是“复礼”。刘少奇、林彪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也大讲什么“以德报怨”、“忍辱负重”，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目的是复辟。《三上桃峰》所宣扬的“风格”，就是这种主张倒退、反对革命的孔孟之道，是束缚革命人民斗争意志的精神枷锁。剧中的“风格”体现者、主要人物青兰，就是奉行孔孟之道的典型人物。她在全剧中的行动，就是往来奔波于杏岭、桃峰之间，忙于补过失、堵窟窿。这是个只抓小事不抓大事、只顾“马情”不顾敌情的政治庸人。炮制者把

这样一个依照黑《修养》的规格铸造出来的人物，冒充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赋予她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名字，就是要人们学习青兰，做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以便推行他们“复礼”、复辟的反革命政治路线。

第三，《三上桃峰》的炮制者，采用含沙射影的卑劣手法，使用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语言，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诋毁和谩骂。

全剧结构的中心是马。戏的开头，作为主要人物的青兰，在初上场的唱段中唱道：“持续跃进，万马奔腾”；接着，在同一场，她又唱道：“他扬鞭催马猛驰骋，菊花青怎经得猛烈奔腾”，于是，全剧就围绕着这匹病马兜起圈子来。剧本告诉人们，这是一匹患有“脑迷症”、“病了好几个月”的病马，此马“千万不能猛骑快跑”。后来，它被猛骑了一阵，由于“快速奔跑使猛劲”，就“浑身淌汗，四肢发抖”，卧倒在地，终于死去了。对此，剧本叫嚷“要接受教训”。好一个“接受教训”！须知这个剧本是把故事的发生年月别有用心地改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的。这时，正是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革命红旗高歌猛进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剧本刻意讲述一个“跑死病马”的“寓言”，它的矛头所向难道还不清楚吗？这种咬牙切齿的咒骂，和赫鲁晓夫对我们的诬蔑有何不同？和刘少奇攻击大跃进是“搞的太猛，出了毛病”的黑话，有何不同？和林彪一伙攻击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的黑话，有何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人民群众的劳动所结出的胜利果实是抹杀不了的，这种咒骂只能暴露出这个戏的炮制者完全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更有甚者，当剧本写到病马累死之后，另一匹马就立即登场了。这匹大红马是由剧中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牵上台的。这匹象征着资本主义“胜利”的马一上场，就博得了满台人物的一片喝采：“好马！好马！好马！”连用三个“好”字。无需再做解释了，作者的用心已十分明白。他们就是要通过这两匹马的对比，咒骂党的正确路线，呼唤资本主义复辟。

晋剧《三上桃峰》大肆兜售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黑货，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肆无忌惮的攻击。他们叫嚷这出戏要表现的“大主题”，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刘少奇、林彪和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有人还叫嚷这出戏“好就好在突破了样板戏的框框”，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敌、与革命样板戏为敌的反动面目。《三

上桃峰》正是顽固地坚持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集“无冲突论”、“中间人物论”、反“题材决定”论、“人性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之大成的大毒草。

### 三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过去之后，总是伴随着一场复辟与反复辟、倒退与反倒退的激烈斗争。一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要作垂死的挣扎，妄图复辟他们失去了的“天堂”。他们进行复辟的一个常见方式，就是利用文艺为历史上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翻案。六十年代初，有人抛出《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如今又冒出个《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就是这一阶级斗争规律的生动例证。

从《一匹马》、《三下桑园赎马记》，到《三下桃园》，再到《三上桃峰》：桑园改桃园，桃园变桃峰；一匹病马上台又下台，下台又上台。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不管革命的阶级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的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还是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要想避免，也不可能。它说明了文艺战线上的斗争从来就是政治战线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反映。某些地区、某些部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现象，就是政治上那股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翻案风在文艺上的表现；这也是和国际上阶级敌人反华、反共、反革命的反动逆流相呼应的。它还说明了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击中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要害，他们必然要跳出来进行破坏和捣乱。

因此，我们对大毒草《三上桃峰》的批判，不是一般的文艺论争，不是什么创作问题，而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样的斗争，今后还要长期地进行下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三上”被揭露了，会不会搞“四上”“五

上”呢？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一定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密切注视思想文化战线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和新特点，反击一切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击退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大好形势，夺取新的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江青关于拍摄《太阳与地球》影片给王洪文李先念吴德的信

江青在科影厂关于拍摄《太阳与地球》影片的信件上的批语

洪文、先念、吴德同志：

这是件大事，不仅青少年需要。我们这样的人也需要学习这种知识。北京天文馆被外国人占领了，只有中国人一个画面。而天文学是中国最早发现的，并且有大量的历史记载，单是二十四史上就占有很大篇幅。

有些中国人不象中国人，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应该批判他们。我们建议支持拍电影，并组织一个班子专门整理、研究祖国的天文学。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江青一九七四年六月十四日 拂晓

（文化部办公厅提供）

一九七四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刊登湘晖的文章《评湘剧《园丁之歌》》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和持久的发展中，我国文艺革命的形势一派大好。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蓬勃发展；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对林彪、孔老二的反动文艺观和一些坏作品展开了深刻有力的批判。名为歌颂教育革命的“教改新篇”，实为吹捧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湘剧《园丁之歌》，就是正在受到批判的一出坏戏。《园丁之歌》是在我们湖南一九七二年的专业文艺调演中出笼的。当时，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整风运动，粉碎了以刘少奇、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十分激烈。一小撮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竭力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恶毒攻击无产阶级



教育革命“搞糟了”，污蔑教育质量“今不如昔”。在文艺领域里，他们反对学习、移植和普及革命样板戏，散布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园丁之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是教育战线、文艺战线上修正主义思潮的反映。《园丁之歌》写的是两个教师对一个所谓顽皮学生进行教育的故事。它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宣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它歪曲党的教育方针，兜售“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的黑货；它反对“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鼓吹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它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彻底批判。一教育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而《园丁之歌》却鼓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学校，取消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园丁之歌》的主题歌——“百花园中花似锦，花红要靠育花人，滴滴汗水花上浇，喜看来日满园春”，在序曲、尾声和剧中，以幕后合唱的形式出现了三次。它所反复强调的一点，就是“园丁”主宰学校的一切。“园丁”是谁？俞英对方觉唱道：“好花要靠园丁育，你我共同努力把水浇。”显然，这个“园丁”指的就是俞英和方觉这样的教师，他们都是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世界观并未得到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园丁之歌》把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作“园丁”来歌颂，其目的就是要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维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复辟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党的阳光雨露，哺育青少年一代茁壮成长；是党的辛勤耕耘，培育革命新苗欣欣向荣。同时，也是在党的领导下，才团结、改造、教育和培养了教师队伍。我们的教师大多数是好的，坏人是极少数。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教师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育战线上一切革命成就，都是实现党的领导的结果。因此，要完成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要由党来领导，必须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园丁之歌》根本不去表现党的领导，却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吹捧为“园丁”，这难道不是为了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吗！把教师比作“园丁”，把学生比作“桃李”，这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儒家的道统，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剥削阶级从私有观念出发，总是把知

识当成个人的私有财产，把学生视作教师私相传授的“门人”、“弟子”。因而，他们要鼓吹和树立“师”的权威。从孔老二的“师道尊严”到修正主义者的“教师中心论”，都是这样的货色。例如，汉初韩婴的《韩诗外传》上说：“夫春树桃李者，夏得阴其下，秋得其实。”历来的儒家，就是把教师比作“园丁”，把学生比作“桃李”的。《园丁之歌》里的俞英不是也说，“看明朝桃红李熟一派丰收景”，大做“桃李满天下”的剥削阶级“园丁”之梦吗？修正主义的反动教育权威凯洛夫，胡说什么教师是学校里的“园丁”和“中心人物”，教师的“每一句话和每一项指示”，对学生都“具有法律性质”，鼓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刘少奇一伙拣起这些封、资、修的破烂，推行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园丁之歌》就是宣扬这一条路线的。与此相反，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路线，学校和教师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教师是党派到教育战线为无产阶级教育青少年的革命战士，他们必须“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向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传授社会主义文化知识。但是，教师为了改造世界观和更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还必须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在党的领导下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和同志的关系。《园丁之歌》把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比作“园丁”与“桃李”的关系，这是对社会主义学校师生关系的严重歪曲。当这种关于“园丁”的论调受到批判以后，有人竟然还辩解说：“《园丁之歌》里的俞英是共产党员，怎么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不对！党的领导，最根本的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领导。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问题不能只看现象，不看实质。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揭露那些标榜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马赫主义者时尖锐指出：“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在《园丁之歌》里，俞英虽然挂的是“共产党员”的招牌，但她推行的却是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另外，在剧中既看不到党组织的存在，又看不到俞英和党组织之间有什么关系。把这样的一个人说成是党的领导的体现者，显然是一种不分路线是非，混淆个人与党组织区别的糊涂观念。

二 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还是鼓吹“智育第一”？这是教育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毛主席教导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社会主义学校里，必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要地位。而刘少奇、林彪却鼓吹“智育

第一”和“文化至上”的资产阶级教育方针。《园丁之歌》就是为这一教育方针吹喇叭的。在《园丁之歌》里，方觉成天忙于抓“作业”、抓“考试”、抓“分数”，完全是一个“智育第一”的推行者。一开场，我们就看见方觉在眉飞色舞地批阅一份百分卷：“好啦！（打钩）好啦！（打钩）全好啦！”“是棵好苗子”。另一方面，他把蔑视“智育第一”的学生陶利攻击为糊不上壁的“稀泥”，不能成材的“锈铁”，抓不住的“野牛”。他恶狠狠地把陶利的小火车摔在一边，破口大骂陶利“不务正业”，“好逸恶劳”。这一鲜明的对比，说明了方觉是以智育作为选择“苗子”的唯一标准的。作为正面人物形象来歌颂的俞英态度怎样呢？她不但没有对方觉的错误进行批判和斗争，而且跟着方觉一道骂陶利为“锈铁”和“野牛”，为方觉的错误百般辩护，把方觉对陶利的“管、卡、压”，美化为对陶利的“严格要求”、“关心”和“爱护”。她根本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只强调文化知识，高唱“没文化怎能担革命重担来承当”。这实质上就是赤裸裸地在宣扬资产阶级的“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马克思主义认为：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能不能承担革命的重担，首要的是看执行什么路线，而不是文化的高低。如果路线不对，文化再高，也只能为错误路线服务。《园丁之歌》不但把文化当做挑革命重担的唯一条件，而且它鼓吹的所谓“文化”，实质上仅仅指的书本知识。世界上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直接知识，一种是从书本中得来的间接知识。“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过去有许多工农出身的老同志，他们在参加革命之前，没有掌握多少书本知识。参加革命以后，他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挑起了中国革命的重担，边干边学习，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又反过来指导他们把革命干得更好。今天，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我们劳动人民掌握文化创造了条件。我们批判《园丁之歌》宣扬的“智育第一”和“文化至上”，决不是取消智育，不重视文化。关键是看把智育摆在什么位置上，是不是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毛主席历来重视革命人民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的必要性，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因此，学生应该努力学好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努力学好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知识，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园丁之歌》宣扬的资产阶级“智育第一”，完全是骗人的幌子。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虚伪

表现之一就是相信学校可以脱离政治”，“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刘少奇、林彪疯狂推行“智育第一”的方针，实际是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政治、突出资产阶级政治打掩护的。在《园丁之歌》里，俞英不是扬言要做什么“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要“转变”学生的思想吗？可见她也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的。然而，她是在“耐心细致”地向学生灌输“智育第一”、“文化至上”的修正主义思想；她搞的思想“转变”，不是向无产阶级转变过来，而是向资产阶级转变过去，不是前进，而是倒退，不是革命，而是复辟。诚然，在《园丁之歌》里，俞英和方觉是有矛盾的，但并不是两条教育路线的矛盾，而是在推行同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中两种方法上的矛盾。他们二人都是主张把陶利往修正主义路线上引的，不过方觉主张压服，采取“简单粗暴”的“管、卡、压”的办法；俞英则主张诱服，披上“启发诱导”的伪装，实行资产阶级的人情感化和变相的“管、卡、压”。一个是硬，一个是软；一个是“打”，一个是“拉”。他们都是贩卖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如果说，方觉是一个蹩脚的推销员，那么俞英就是一个颇为能干的推销员了。

三 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的问题。《园丁之歌》鼓吹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呢？我们从它对待两个学生的不同态度上，可以找到答案。作为转变人物塑造的学生形象陶利，虽然被歪曲为“不守纪律、不爱学习、不讲礼貌”的“淘气”学生，但仍然可以看出，他的方向基本上是对头的。第一，陶利的父亲是火车司机，他表示长大以后也要开火车。方觉质问他：“读书为什么？”他回答：“为革命。”方觉又质问他：“玩小火车呢？”他回答：“也为革命！”这说明陶利有一个为革命而学习的明确目的，没有沾染孔老二“学而优则仕”和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毒素。第二，陶利虽然是一个四年级的小学生，但能制作出小巧的火车模型，说明他重视实践。第三，陶利对于教师方觉推行的资产阶级“智育第一”和“管、卡、压”，表示了严重的不满，并且进行了某些反抗。而作为正面人物来歌颂的学生形象小玲，则与陶利恰好相反。她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下，不但自己死啃书本，什么都不管，而且还拦阻陶利对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反抗，协助教师把陶利拉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来。剧本把陶利加以丑化，骂之为“小淘气”；而把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唯命是从的小玲予以美化，让她当上“学习组长”。这种颠倒是非的一褒一贬，究竟鼓吹培养哪个

阶级的接班人，不是十分清楚了吗？《园丁之歌》宣扬的这一套完全是孔孟之道。二千多年前，孔老二的学生宰予对死啃书本不感兴趣，有时打起瞌睡来，孔老二就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圻也”；樊迟要求学种庄稼和蔬菜，孔老二就骂他为“小人”。俞英和方觉，正是继承了孔老二的这种反动思想，竭力要把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少年引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邪路上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蓬勃发展，开门办学的革命行动，打破了资产阶级“智育第一”的老规章，搅乱了资产阶级“关门办学”的旧秩序。象俞英、方觉这类迷恋旧教育制度的人，总是千方百计要退回到旧的轨道上去。《园丁之歌》叫嚷什么陶利的“火车虽好离了轨”，就是指责陶利离开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轨；叫嚣什么要给陶利“引路”，就是要把他引向修正主义之路。其实质，就是要复辟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制度那一套，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湘剧《园丁之歌》出现在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的今天，并不是偶然的。这表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上层建筑包括文艺和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长期的和复杂的。列宁指出：“我们的‘防止复辟的保证’是把革命进行到底”。因此，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在当前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中，我们一定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联系斗争实际，认真看书学习，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教育、文艺阵地，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教育路线，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而斗争。

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人民日报刊登初澜的文章《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

湘剧《园丁之歌》，是一出名为反映“教育革命”，实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的坏戏。它所歌颂的路线和人物都是错误的，其要害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的大好形势下，联系教育战线和文艺战线的斗争实际，把这个坏戏作为反面教材，提供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分析批判，这对于进一步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划清两条教育路线、两条文艺路线的界限，巩固并发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和文艺

革命的胜利成果，是很有必要、很有现实意义的。

《园丁之歌》的剧情，说的是一个工人的孩子陶利，本来很有生气，因为想当火车司机，爱玩小火车，就被教师方觉斥为“不守纪律、不爱学习、不讲礼貌”，甚至是不能成“材”的“锈铁”；但在另一教师俞英的“循循善诱”之下，终于“悔悟”过来，“进步了”。这出戏通过它的剧名和全部情节，特别是对俞英这一主要人物的塑造，向观众宣扬了如下的观点：一、培养我们青少年的“园丁”是教师；二、没有文化就不能担当革命的重担；三、学生如不循规蹈矩地死啃书本，就是“糊不上壁”的“稀泥”。十分明显，这些观点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上一系列革命变革的反攻倒算。对此，必须坚决批判。

“花红要靠育花人”，“培育还靠好园丁”，这是贯穿《园丁之歌》全剧的主调。这个主调，把俞英、方觉这样的教师奉为培育青少年一代的“园丁”。俞英、方觉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都是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这就不只是一个剧名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事业的领导权究竟应该掌握在谁手里的大是大非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的学校，竟然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文化大革命的急风骤雨有力地冲击了资产阶级的这块“世袭领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开进了学校，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与广大革命师生一起团结战斗，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了教育事业的领导权，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胜利。毛主席指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因此，如果把我们的青少年比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幼苗”，那么，培育革命幼苗的“园丁”，就是我们伟大的党！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滋润着革命幼苗茁壮成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着青少年一代前进的方向！

两个阶级争夺教育阵地的斗争，必然要在领导权问题上进行长期的、激烈的反复较量。我们的教育事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

对教育事业的领导, 推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 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 资产阶级对于失去这块“世袭领地”, 是怎么也不会甘心的, 他们总是要用孔孟之道的“师道尊严”和资产阶级的“教师治校”等谬论, 来排斥和对抗工人阶级的领导。《园丁之歌》把俞英、方觉这样的教师奉为“树人”的“园丁”, 甚至称之为什么“引路人”, 大加美化和颂扬, 其实质就是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 而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我们的学校!

革命的教师, 是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我国有一支很大的教师队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好的, 是要革命的,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锻炼,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涌现出许多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同时由于大多数的知识分子, 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 这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 认真改造世界观, 才能不断增强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自觉性。在党的教育事业中, 一个革命教师的职责是光荣而又重大的。教师在组织、进行教学活动的整个过程中, 应当发扬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积极主动的工作精神。但是, 作为教育者, 又“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 “要向学生学习, 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学校里, 革命的教师和革命的学生都是在党的领导下, 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和同志, 应当互教互学、共同前进。《园丁之歌》否定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 要恢复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所鼓吹的“园丁”和“桃李”的关系,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教育制度, 否定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

《园丁之歌》在俞英的最后一个唱段中, 唱出了“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担当”的谬论, 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只强调文化的重要。这是在文艺舞台上露骨地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化至上”论, 贩卖“智育第一”这一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在这出戏出笼的一九七二年前后, 教育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鼓噪一时, 胡说什么“教育质量下降”, 要走“关门教学”的老路, 妄图迫使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 死啃书本知识, 其目的就是为了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这个新生事物。联系这一现实的阶级斗争背景来看, 《园丁之歌》宣扬这样的谬论, 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出戏的全部剧情, 集中到一点, 就是围绕着解决所谓“学生不好学”的

问题，渲染俞英同方觉的“矛盾”。其实，俞英同方觉在维护和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鼓吹“文化至上”，贩卖“智育第一”的黑货，配合默契，殊途同归。他们的争吵，不过是“方法”之争。《园丁之歌》就是以这种“方法”之争，掩盖了宣扬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实质。方觉用“停课”、“没收”等“管、卡、压”的“行政手段”来推销“智育第一”，俞英却认为这是出于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和“严格要求”，只是不如她那样“夫子善诱”，“水往根上浇”罢了！她可以同陶利一起玩小火车，然后搞了个“突然袭击”，用一道难题把这个“不好学”的学生憋得“脸上发烧汗直淋”。她还善于进行这样的“忆苦”教育：以陶利的祖父在旧社会因“望儿成长”，宁可乞求地主的阎王债，也要送儿子去进学堂的家史，来诱使这个爱玩小火车的孩子——“淘气”，“晓得没文化开车也开不上”，服服帖帖地当“智育第一”方针的俘虏！请同志们想一想，象陶利的祖父那种行径，不也颇有点武训那种“穷人若是能识字，就不会受人欺负”的味道吗？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时代，不去触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一根毫毛，反而做着“望儿成长”实即“望子成龙”的迷梦，请问，这是哪个阶级的“家史”教育？剥去这个戏所谓“教改新篇”的包装，原来还是武训那个“念书好！念书好！”的腐烂货色，是宣扬“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反动的孔孟之道。

“没文化怎能担当革命重担”，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它完全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担当革命重担、推动历史前进的，难道不是创造文化却不能占有文化的奴隶、农民和工人，反而是那些奴隶主、地主阶级的“圣贤”和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吗？在我国人民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史上，不是也有成千上万从未进过校门的工农，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勇挑革命重担，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吗？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虽然一切剥削阶级都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剥夺广大劳动人民学习文化的权利，但是为推翻那些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而担当革命重担的，恰恰就是被剥夺了文化权利的广大劳动人民。今天，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劳动人民掌握文化创造了条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普及教育和工农兵上大学开辟了广阔的途径。文化，只有掌握在革命人民的手中，才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所以，决不是没有文化就不能



干革命，而是掌握了文化更好地干革命。《园丁之歌》鼓吹这种“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担当”的谬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公然挑战，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污蔑中伤，也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

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为哪个阶级服务，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的问题。对《园丁之歌》中陶利这样的学生持什么态度，反映着究竟按照哪个阶级的面貌来教育青少年一代的斗争。陶利本来不错，朝气蓬勃，热爱劳动，立志要当工人。他的行为本身，实际上就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种抵制和反抗。但剧本却硬说他“错”。他究竟“错”在哪里呢？无非是触犯了“师道尊严”之“礼”，越出了“智育第一”的轨道。把陶利这样的学生视为“糊不上壁”的“稀泥”、“不成材”的“锈铁”，却把小玲那样“五分加绵羊”的学生，树为“桃李”的标本，这就清楚地表明《园丁之歌》所鼓吹的培养目标究竟是什么了。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时而贩卖“读书做官”论，时而又散布“读书无用”论，就是为了破坏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问题从来就不在于读书是否有用，而在于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所用。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的必要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应当了解，废除以前死读书、实行强迫纪律、死记硬背的方式时，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为着把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校学生必须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必须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并使这种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书本知识，同阶级斗争的实际，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如果依着《园丁之歌》宣扬的那一套修正主义教育方针，只讲脱离实际的文化知识，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又红又专，那就是依了地主资产阶级，即使培育出有“高度的文化知识”的“桃李”，也不可能担当无产阶级的革命重担，而只能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栋梁”和“精神贵族”，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由他们去驾驶“时代的列车”，就会象苏修出现的那种情景，大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

《园丁之歌》所唱的，就是这种“克己复礼”的调子。它要复“师道尊严”、“智育第一”之“礼”，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之“礼”，复修正主义教育

路线之“礼”。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是长期的，象这样的调子，现在有人在唱，今后也还会有人要唱的。便是，教育革命的小闯将黄帅说得好：“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肃清其影响，这是教育战线极其重要的战斗任务。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师生，必将在这场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中，夺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

（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风庆”轮党支部的文章《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海里》

《红旗》杂志编者按：这篇振奋革命精神的文章，很值得一读。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指出：“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这种精神面貌在“风庆”号船员们身上又一次表现出来。“风庆”号首次远洋试航成功，是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凯歌，它长了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志气，对于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它的意义决不限于造船业和海洋运输业。“风庆”号的革命精神，我们应当加以发扬。

\* \* \*

正当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前夕，我们“风庆”轮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祖国人民和上海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关怀下，完成了历时一百五十天，往返三万二千海里，运载货物二万二千吨的远航任务，胜利地返回了上海港。

“风庆”号是我国自己设计制造，全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万吨级远洋货轮。它出厂后首次航行就跑地中海，途经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穿越七个海峡，先后两次绕过好望角，四次通过赤道，全程等于绕地球赤道一圈半。象这样国产的万吨轮远航欧洲，在我国航运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风庆”轮全体同志，肩负党和阶级的嘱托，行驶这第一次，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这不是一次寻常的远航，而是一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战斗，是对我国人民自力

更生能力的一次检阅。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但又充满信心。我们出航的船员虽然只有六十一个人，而“护航”的却是包括广大造船工人在内的亿万祖国人民。万吨轮载着万颗心，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一路上，任凭风浪高，暗礁险，飘扬着五星红旗的“风庆”号始终英姿飒爽，昂首向前。三万二千海里航行，是不平凡的三万二千海里。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海里，是大长无产阶级志气的三万二千海里。它鼓舞着一切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给了那一小撮反华小丑一次沉重的打击！它对于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风庆”轮的胜利远航，为我国造船工业和远洋运输事业增添了光辉的一页。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丰硕成果。

我们国家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起，就有了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制造这种远洋货轮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单单上海就造了二十余艘。为什么国产船直到今天才远航地中海？是因为以前的船质量都不好吗？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造船工人狠批刘少奇、林彪推行的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修正主义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船越造越多，而且越造越好。许多船是完全具备远航条件的。那末，是不是我们的海员不想驾驶自己的国产船去远航呢？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许多老海员尝过帝国主义压迫欺侮的味道，受过外国轮船资本家的气，日夜都盼望迅速发展自己的造船工业，那有一个爱国的船员不愿意驾驶国产的船跨洋过海！国产的万吨轮所以没有及早远航，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存在着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种种阻力。有那么一些人，满脑子崇洋迷外，他们迷信外国的船，而对于国产的船总是百般挑剔，说这也不行，那也不灵。他们散布种种怪论调，说“国产船只能跑近海，不好跑远洋”，说“国产的万匹机不可靠”。有些人甚至作出荒谬的结论：外国机的质量有毛病是偶然的，国产机的质量出毛病是必然的。因此，明明可以航行到世界各个港口的国产万吨轮，却一艘艘被卡住不能去远航。今年年初，人们对于这种状况再也忍耐不下去了，终于爆发了一场大争论。这艘万吨轮经过三百个小时的试航，证明主机、船体、导航仪器、水密装置以及舵机的性能都可靠。可是，有些人却偏偏扭住某些问题进行多方刁难，致使交船的日期一再拖延。江南造船厂的工人首

先对这个问题贴出大字报，尖锐地指出：不是船有问题，而是某些人的脑子有问题；表面上是技术问题上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炮轰得好，轰得大快人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广大海员工人和造船工人并肩作战，批判了林彪投降卖国、复辟倒退的罪行和崇洋媚外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船的船员同“国产船不能远航”的怪论进行了斗争，贴出了一张题为《我们要革命，“风庆”要远航》的大字报。许多船员说：路是人走出来的，第一条航线也是人开辟出来的，国产船远航我们一定要实现。有些人议论讥笑我们，说我们要驾驶“风庆”号去远航是想出风头，“风庆”号要改名为“风头”号。船员们针锋相对地回答：我们不出个人的风头，我们是为自己的阶级争气！万吨轮、万匹机的制造成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我们争国产船的远航权，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那怕前面有千层恶浪，我们驾驶“风庆”轮远航的决心是下定了的。

“风庆”轮的远航，正象广大造船工人和船员说的，是批出来的，是斗出来的。没有批林批孔的革命群众运动，就没有这一次远航。这件事，使我们又一次体会到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的重要性。不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形形色色的崇洋迷外思想就会抬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得不到很好贯彻；抓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把资产阶级歪风压下去，无产阶级正气得到发扬，革命精神大振，好多本来认为办不到的事情也就办到了，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加快前进了。“风庆”轮远航的胜利，正是批林批孔这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中出现的必然结果。

有些人总是瞧不起国产的东西。这次“风庆”轮远航，有人就曾经散布说，“风庆”轮可以远航，不过要把船上的雷达、电罗经等五件国产的仪器设备换成进口的。革命的海员工人和上海产业工人一起，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说换吗？可以，船上还有测向仪、超高频无线电话和尼龙缆绳这三件是进口货，要换上国产的。我们要全部用上自己国产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我们主张排外吗？当然不是。我们并不是一概拒绝外国的东西。船上用一点外国的东西也不是不可以。外国的经验，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都要加以研究，作为借鉴。问题是立足点放在什么地方。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

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这里显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换”，一个要把国产的东西换掉，一个要把国产的东西换上，这不单纯是技术业务问题，而是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感情、世界观，是要不要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里，对自己国产的东西没有感情，这也不称心，那也不放心，那就连爱国主义也丢了，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了。一艘万吨级的货轮，好比一个流动工业展览会，反映着国家工业发展的水平。世界上能造万吨轮的国家，一艘船里全部用国产装备的也不多。有的只造一只船壳，舵机、主机、辅机、导航设备等，往往是用几个国家的产品装配起来的。我们的“风庆”轮，从机器设备到船员的生活设施，全部是国产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我们国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二十五年的艰苦奋斗，工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次“风庆”轮航行三万二千海里，停靠八个国家的港口，每到一处，人们问起我们船的一切，我们总是扬眉吐气地回答：都是中国造的，都是我们国产的东西！当我们向外国朋友和海外侨胞这样回答的时候，我们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取得的胜利而喜悦，为祖国的日益富强而自豪！

有的人也许会说，他不是不喜欢国产的东西，而是担心它的质量不可靠。一艘远洋轮，跨重洋，过大海，要经过无数惊涛骇浪，航行设备的质量当然不能忽视。但是，对质量问题，不同的立场也会有不同的回答。产品不使用，就实现不了使用价值，质量是高是低也无从考核。在使用中提高，在使用中完善，生产的发展过程从来就是如此。不是十全十美就拒绝使用，那就会把一种产品扼杀。产品质量的完善总是有一个过程的。翻开世界造船和船用柴油机的历史，从制造二十五匹马力的船用柴油机到比较稳定可靠的万匹机，资本主义国家就花了整整七十年。难道现在他们的产品就那么十全十美了吗？我们船的一位船长就有过亲身的经历。一九七二年，他先后驾驶过两艘从国外买来的远洋轮，都出过重大事故，分别在海上漂了八个小时之多，而损坏的主机正是所谓信得过的“名牌货”。我们的远洋轮的质量这样？事实是最好的见证。这一次的三万二千海里航程，从北半球到南半球，又从南半球到北半球，珊瑚礁密集的地区，波涛汹涌的海峡，狭窄的港湾，都经历过了。好望角，人们称之为“天无三日晴，海无三日宁，好望不好过”的地方，我们的船两次安全通过。一次风达八级，浪高四米，有条外国船高挂黑球两只，表示已经失去控制能力，而我们“风庆”轮却笑迎狂风黑浪，

胜似闲庭信步。整个航程，主机运转了二千三百小时，在南非两岸先后两次连续运转十六天以上，性能很好。一路上，经受了春夏秋冬四季，大风、巨浪、迷雾、暴雨、低气压等各种气候条件的考验。有人不是信不过我们国产的雷达、电罗经、发报机等五大件吗？事实上，正是这些国产的设备，保证了我们的万吨轮安全航行。我们年轻的造船工业和船用设备配套工业，尽管还有这样那样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远洋轮已经具备远航条件，这是毫无疑问的了。提高远洋轮的质量，不光是造船工人的事，我们海员工人也要负起自己的责任。经过一次远航，我们积累了一些资料，为建设海上铁路取得了一些经验；不断地远航，就可以不断地积累资料，我们的远洋轮也就可以不断地完善。造船工人和海员共同努力，我们的造船工业和航海事业必将更加迅猛地发展。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群众振奋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象大洋的水，载得起千条万条船，力量大无边。“风庆”轮这次远航，是在批林批孔的革命高潮中开始的。通过批林批孔，提高了海员们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激发了大家的革命责任感。出航前，大家一边搞革命大批判，一边紧张地开展学习掌握新船性能的活动，做到技术上精益求精。船员说：造船工人为祖国造出这样好的争气机、争气船，我们一定要做争气人，开好争气船。全程三万二千海里，无论到那个港口，我们的船外面漂漂亮亮，里面清清爽爽，外国朋友称赞我们，海外侨胞夸奖我们，都说我们的船不仅质量好，而且保养得也好。有的外国人到机舱参观，看到那么整洁，惊讶地说：“啊，这里简直可以供我们跳舞。”若问我们船员的责任心究竟怎样，只要举一举货物保养这件事就够了。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运往罗马尼亚的是一万一千吨大米。大米，是货物中比较“娇”的东西。放在货舱里两个月，经历了春夏秋冬四季的气候变化。两次经过赤道，大舱气温高达四十度。海上遇大风，巨浪淹没甲板，冲刷着整个舱盖。为了使大米不受损失，大副带领护粮小组的船员，不管是寒冷的冬天还是闷热的夏日，始终每天三五次地检查货舱，使舱温、米温和空气的湿度保持适当。从上海到康斯坦萨港的近两个月时间，米温始终没有超过三十度。到了罗马尼亚，一万一千吨大米，无霉无蛀，完好无损，受到罗马尼亚人民的好评。从上海到罗马尼亚，又从罗马尼亚回上海，历时一百五十天，举船上下，团结战斗。全体船员一路上写诗写文，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风庆”轮远航三万二千海里，扬眉吐气地回来了。有的同志说，这次是光荣地开出去，胜利地开回来。我们说，正是这样。不过，还得加上几个字：是斗争中光荣地开出去，斗争中胜利地开回来，斗争并没有结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既然是长期的方针，坚持这个方针，反对崇洋迷外，也是长期的斗争任务。崇洋迷外的思想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留下来的破烂货，只要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思想总会一再冒出来。彻底地扫除这些垃圾是需要时间的，不能指望经过几个回的战斗就完全解决问题。

不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终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在“风庆”轮远航的前前后后，种种扣人心弦的事迹，使我们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这一点。这艘船和船上的设备是经过上海和全国五百多个协作单位造出来的。这些单位的工人用的是怎样的精神呢？造船体和主机的是江南造船厂。他们造的第一台主机，是在船体车间旁边的一个空地上，搭起芦席棚安装的。为了保证主机的质量，下雨时，工人用自己的衣服盖在机器上，免受损坏；天热时，工人整天在机器旁观察阳光直射带来的影响。他们艰苦奋斗，用自己的汗水浇出高质量的争气机。船上的尼龙缆绳是一家二百五十人的弄堂小厂——红卫绳带厂造的。厂房低矮，场地狭小，工人们挖地六尺，装起自己设计的机器，造出高质量的争气绳。在我们准备远航的期间，也不知道有多少协作厂的工人上船来，帮助我们熟悉各种新设备的性能，为我们提供必要的备品备件，千叮咛万嘱咐，祝我们远航胜利。所有这一切，说明我们中国的工人有着坚定的信念，能够依靠自己的双手，把祖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海外，我们遇到过不少侨胞，他们以热切的目光望着我们的“风庆”轮，有的把上一次甲板比作踏上一次自己的国土而感到高兴。毛里求斯有一位老华侨，有子女九人，“风庆”轮一靠岸，就扶老携幼上船来参观。老人从船头到船尾，从驾驶台到机舱，细细看，轻轻摸，看到样样是国产品，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华侨的报纸以最醒目的标题发表文章和消息，介绍这艘国产的万吨轮。我们离港时，侨胞们赶来不断地招手，含着热泪高声地喊着：“祖国的船，不断地来啊！”这种动人的场面说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不仅是国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共同意志，也是海外千千万万爱国侨胞的

共同愿望。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都热烈地希望我们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取得更大成就，以更好地完成我们担负的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

“风庆”轮的第一次远航结束了。但是，革命在发展，斗争在继续。我们要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长风，破万里浪，不断奔向胜利的前方！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第十一期；  
转载《人民日报》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一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等文件的通知

1974. 12. 31；中发[1974]32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现将上海市《关于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及河北省《关于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转发给你们。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各地的计划生育工作有了较大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二十八点五，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二十一，预计一九七四年将下降到千分之十九左右。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河北等五个省、市，提前完成了“四五”人口规划指标。今年可能还有三、四个省达到规划要求。但是，发展很不平衡，到一九七三年底，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外，仍有十三个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还在千分之二十以上。这些地区要实现“四五”人口规划指标，还需要作很大的努力。

上海等先进地区的经验说明，搞好计划生育，关键在于各级党委要把这项工作列入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经常抓，抓得紧。要充分发挥妇联、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的作用，做到各级有人抓，层层有人管。实行计划生育，是一场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深刻的思想革命。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要抓好计划生育工作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认真地反复地宣传毛主席有关计划生育的指示和党的政策，批判刘少奇、林彪、孔孟在家庭、婚姻、生育问题上的反动谬论，肃清其流毒，提高群众实行晚婚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要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把生育计划落实到人，不要强迫命令。要普及节育科学知识，把避孕药具送上门，方便群众。医疗卫生部门要提高节育手术质量，加强妇幼卫生工作。各地要认真总结和推广先进单位的经验，把计划生育工作搞得更有成效。

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此件发至县、团级，口头传达到群众。)

关于上海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

中共中央、国务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的教导，发动和依靠群众，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认真抓了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使全市的人口出生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十七，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十点二五(市区为千分之六点九五)；人口自然增长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十一点三，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四点七八(市区为千分之一点四八)。今年上半年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都低于去年同期。

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中，各单位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积极组织群众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开展革命大批判，使毛主席有关计划生育的指示更加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虹口区新港街道党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召开批判会、声讨会，组织小分队演出，狠批刘少奇和林彪一伙在家庭、婚姻问题上宣扬的修正主义谬论以及孔孟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尊女卑”等反动观点，提高了广大居民为革命实行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的自觉性。有些同志说：现在新社会，男女都一样，男孩、女孩都可以培养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我们工人阶级应该带头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目前，全街道生了两个女儿的育龄夫妇有二百零一对，其中一百八十五对已表示不再生第三胎。

在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中，各级党组织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坚持做过细的政治思想工作。许多地区和单位，按照“晚、稀、少”的要求，采取自下而上、上下结合、自报互评的方法，制订生育规划。川沙县金桥公社张浜大队，在制订

一九七五年生育规划时，通过调查摸底了解到，打算生育的对象有三十八名，这样出生率就要高达千分之十八。大队党支部先召开干部会议，统一思想，然后组织贫下中农进行回忆对比，干部上门促膝谈心，做细致工作。在分清路线、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发动群众讨论规划，讨论中出现了“二胎让新婚，新婚提倡晚胎”的动人景象，许多育龄妇女主动推迟生育时间，全大队预计明年的出生率为千分之九。

为了真正实现生育规划，各单位还反复做工作，把工作做得更扎实。许多区、县、街道和人民公社普遍建立了生育规划“半年一修订，每月一检查”的制度，及时分析群众思想动态和晚婚、生育规划的落实情况，交流经验，提出改进措施。同时，发动计划生育工作的骨干，根据群众需要，挨户送避孕药具上门，把工作做到家。如上海县辛庄公社莘联大队助产员顾美玲同志，积极主动送药上门，发现服药后有反应的，及时处理，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坚定服药者的信心，消除不必要的顾虑，数年如一日，热情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她的先进事迹在全市宣传推广后，许多单位都涌现出一大批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分子。由于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现在全市一百二十八万余对已婚育龄夫妇中，已有一百零六万余对落实了各种节育措施，节育率达百分之八十三。

在开展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工作中，少数单位一度出现过强迫命令和违反政策的现象。对此我们反复强调了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认真执行党的政策，纠正了这种现象。如上海县有的公社采取不给婴儿报户口等办法去限制出生率，但出生率却是全县最高的。县委注意了这些情况，要求各社、队加强思想教育，狠抓政策落实。这样做的结果，全县人口出生率从一九七二年的千分之十三点零五，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十点九八。

几年来，我们还注意不断提高节育手术的质量，积极组织避孕药的科研和生产，现已鉴定推广的有口服避孕药一号、二号，薄型口服避孕片，避孕针一号，探亲避孕片一号、五十三号，以及中药引产天花粉针剂等，看来都有不同程度的效果。

实践证明：计划生育工作，抓与不抓，大不一样。一九六七年，有些单位放松了计划生育工作，一九六八年全市的人口出生率，从上年的千分之十二点三上升到千分之十五，这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要求各级党组织把计划生育和提倡

晚婚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积极抓好。一九六九年就稳定下来，以后逐年下降。在工作中，注意了抓两头，特别是抓住郊区农村这个薄弱环节。经过几年时间的努力，郊区各县的人口出生率，从一九六五年的千分之二十六点五下降到一九七三年的千分之十三点九五，初步扭转了农村人口出生率较高的状况。现在各级党组织普遍加强了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建立和健全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同时，注意发挥妇女、工会、共青团等各个群众组织的作用。从公社到生产队，从街道到里弄，从工厂到车间、班组，基本上做到层层有人抓，块块有人管，从组织上保证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顺利开展。但还有些单位的计划生育工作搞得不够好，出生率较高。有的单位工作做得不细，有强迫命令的现象。

最近，有关部门对上海人口发展的趋势作了一些调查研究，从初步了解的情况来看，由于解放初期上海人口出生率高达千分之四十左右，这批青年将陆续进入婚期。因而一九七五年以后人口出生率可能有上升的趋势。为了使市区的人口出生率保持稳定，郊区的人口出生率进一步下降，我们准备再作些调查研究，依靠群众把这项工作认真抓好。我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以批林批孔为强大政治动力，积极加强领导，认真贯彻落实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的精神，抓紧、抓细，进一步搞好计划生育和提倡晚婚的工作。以上报告，如有不当，请指示。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日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原题为：中共中央通知)

2010年2月21日初稿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十册（5）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十章 批林批孔

##### 第五节 各大军区负责人到北京检查文革中的错误

###### 研究资料

《1974 年，韩先楚被打成“林彪死党”》

摘自张正隆《战将》解放军出版社 2000 版

1973 年 12 月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韩先楚从福州对调到兰州军区任司令员。

1974 年 3 月 6 日，中共办公厅给福州军区打电话，说中央有一架大飞机给你们送文件，要派可靠的人去机场接文件。

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4]9 号文件：“……三、福州地区批林整风运动长期深入不下去，在批林批孔运动刚刚起来又开什么纠正错误大会，把群众镇压下去，这同有些领导人长期捂盖子是分不开的。你们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自己的错误，在批林批孔斗争中把福州地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彻底揭开。”

这两个“长期”和“有些领导人”，不分明是没点名的点名吗？皮定钧任兰州军区司令员还不到四年，这兰州与福州对调，不就是调的他韩先楚吗？有的大区也是人刚走，那边大字报就铺天盖地了，中央却不表态，唯独给福州来了个 9 号文件，这不就是冲着他来的吗？不把人调走，那“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还能“彻底揭开”吗？

福州的情况一无所知，真想知道，又真不敢“拖人下水”。1958 炮击金门时，他患急性黄疸肝炎，医生把他隔离起来，除了医护人员不准与任何接触。如今他是“政治肝炎”了，和谁接触、联系，那可就是害了人家。

也不用再问了，那大字报从办公楼贴到家门口了，看看那大字报就知道福州那边进展到哪一步了。“炮轰”、“打倒”、“砸烂狗头”、“罪该万死”之类大标语不看，就看自己的“罪行”，差不多赶上《刘少奇反毛泽东思想一百例》了。不

过最多的，也是最重要的，还是说他是“林彪死党”。

上下齐攻，南北夹攻！

兰州的自来水黄糊糊的，军区首长家都是喝井水。有了中央 9 号文件，军区一号首长家就没了井水。之前每月按时供应的粮油肉补助，这回也没有了。想买点白糖冲奶喝，也说没有。没有井水就喝自来水，少了粮油肉补助也饿不死人，买不到白糖就更算不上什么了。最让他难以容忍的，是电话也有人监控，谁来看他，何时来的，何时走的，车型、车号、车子颜色，马上就有报告上去了。这家里会不会被人安了窃听器呀？

自然也就难以正常工作了。

就研究战区作战方案。可地形没看完，战区情况还不熟悉，怎么研究呀？就看地图，一张一张地翻呀看呀。纸上谈兵也谈不下去了，就看《红楼梦》。毛泽东让许世友看《红楼梦》，还说看五遍才有发言权，那就看它五遍，看看能有什么“发言权”，反正现在有的是时间，结果没看上五页就烦了。小儿子小平回来了，爷俩下棋。这回没像在西山和爱平那样掀桌子，儿子变着法儿让老子赢，那也烦。那就出去转转，散散心。狱中犯人每天不也有个放风时间吗？

门口墙上贴张大字报：《韩先楚，看你下步棋怎么走》。

韩先楚是长征到陕北后，才知道、并见到林彪这个黄冈老乡的。他是抗大二期学员，林彪是校长。林彪那口浓重的乡音，让他感到亲切，更费思量。有的当即明白，有的就费点劲儿，有的要好一阵子才能恍然大悟，有的直到去世都破译不了，甚至可能永远是谜。

之前，他就听红一军团的人讲，在江西反“围剿”和长征途中，林彪如何如何了得，就不能不以一种钦佩的目光，打量这个瘦小的、比许多下级都年轻的红军将领。但真正使他了解林彪，并从心头涌流出敬佩之情的，还是平型关战斗。这一仗他没打上，688 团当了预备队，战后 688 团副团长韩先楚去看了战场。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山第一仗，也是中国军队抗战开始后的第一场胜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使“中国共产党不抗战”的论调没了市场，起码也使中外持这种论调的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闭上了嘴巴。这一仗坚定了中国人民敢打必胜的信心，极大地提高了八路军的声望和共产党的地位，以及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包括许多有志青年投奔延安等等的政治意义，也就越来越

显现出来，但韩先楚当时想不到，也不会去想这些。有些人跑去战场，不仅是打了胜仗高兴，还因为从未见过“日本鬼子”、大洋马，想去看看“东洋景”。而韩先楚想的是，688 团这预备队是留着关键时刻打硬仗、打恶仗的，怎么扔在这儿窝都没动仗就打完了？这仗是怎么打的，林彪是怎么指挥的？

仲秋的平型关，视野中一片黄黄漠漠。公路上，被打坏的、被掀翻到路边沟里的汽车、大车，有的还在冒烟，日军尸体横七竖八倒卧在车上、路边、山野间。我军伤员、烈士遗体已经处理完了，部队正打扫战场，搬运战利品。这些当然都在韩先楚的视野之内，但他更关注的是地形。山势、制高点、沟谷、公路、敌我来路、去向、企图、双方装备、士气、心态，还有时间、时机。枪炮声中，敌与我，时间与空间，这么一交叉、碰撞，一个绝妙的“打点”立刻就显见出来了。

“林彪那眼睛真‘毒’啊！”后来他常说这句话。

还有，就是对付强大的敌人，更要用谋略，用智慧，打巧仗。

而这些，本来就是他的强项和一贯的风格。

鞍海战役后，林彪来电询问取胜经验，等于向部下取经。之后，韩先楚连战连捷，直至辽沈战役关键一役攻取锦州，林彪把主攻方向的担子压在了韩先楚肩上。而此前在那些“方案之争”的“官司”中，“按先楚案实施战斗”，“按先楚意见办”，在林彪貌似冷冰冰的“判决”中，掩饰不住的是对这位比自己少七岁的小老乡的赞许。而战争年代的韩先楚，对林彪印象最深的，就是那种随机应变的制敌、驭敌的谋略、智慧和大将风度。

从红军到八路军，除了在抗大 2 期学习九个月外，韩先楚在林彪麾下只有平型关这一仗，还未打上。自到东北后，他就受林彪指挥了，一直打海南岛。可开头一个在南满，一个在北满，后来根据地连成一片，进关了，南下，也难得见面。只是那还用见面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随后的夏、秋、冬三季攻势，那些战役、战斗的“打点”，时间越久越显清晰、夺目。别说他曾亲历其中，就是那没打上的平型关战斗，他从中悟得的东西就比亲历者少吗？还有在我军刚进东北后关于和战前景的大战略上，林彪那种一针见血的目光。25 年后他在福建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林彪不但是个军事家，而且是个政治家，是无根无据的望风扑影吗？

生活中有“手把手教”一说，其实，这是只有对刚刚举步学步的幼儿才用得

着的。高明的老师是从来不手把手教的，如此教出来的学生又有几多成器的？真正成才，而又有杰出贡献的人，首先离不开勤奋、认真，还需要悟性、灵性，即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天才，之前就讲天才，讲“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韩先楚是承认、并相信有天才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如果差距很大，大不一样，在某种意义上就可以称之为天才了。毛泽东是大天才，林彪是军事天才。自己与自己比，起码比起干别的什么行当来，在打仗上他就是个天才。他嘴上从未这样讲过，但他自信，非常自信。

只是天才从来都是立足于大地上的。当毛泽东“万寿无疆”地成了神，林彪也“永远健康”地成了半仙，韩先楚这位老部下就云里雾里找不到老首长“林总”的北了。

1971年9月13日凌晨，韩先楚刚睡着，周恩来打来电话，劈头一句“‘老病号’跑了”。

韩先楚莫名其妙。在他的心目中，“老病号”从来都是徐海东。他经常往北京给老军长捎东西，连身边工作人员都知道是给“老病号”的。这回才明白，不同的层次、圈子，是有各自的“老病号”的。可直觉告诉他，即便徐海东不是去年去世了，这个“老病号”也不会是徐大将，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又会是谁呢？

周恩来的回答妙极了：“就是第二个张国焘嘛。”

他还是不大明白。而当他终于明白了，就站在那儿愣了、蒙了、傻了。

这怎么可能啊？！

他首先想到的是毛泽东，是毛泽东的威望，然后就是人民——我是被主席打过招呼的，多少有点知觉了，尚且震惊如此，又该怎样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呀？！

其实，他早就对林彪感到迷惑不解了。

最让他迷惑不解的，是在公开场合，林彪高举语录本，紧跟毛主席，讲了那么多颂扬“文化大革命”的话，可向他请示汇报福建的问题，却从来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第一次好像是 1966 年底，记不得什么事了。肯定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他打电话请示林彪怎么办，秘书接的电话。他以为很快会有回答，却一直没有。不久，有人说林彪病了。他认为这回肯定病得不轻，打电话询问，秘书说还是老样子。就问上次请示“林总”的问题有什么指示，秘书说已经汇报首长了。汇报了怎么没有回话呀？他觉得挺奇怪的。

福州“四联会”（即福州军区、福建省军区、福建省委、省革委会联席会议）揭发的材料，说他给林彪打电话、写信，去林彪家 160 多次，却未说从什么时间起止。建国后林彪长期休息养病，那时候他就常常打电话问候一下，有机会还去看看老首长。1959 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请示汇报就更多了。1962 年紧急战备期间打的电话，差不多就有这个数，1969 年战备又打了多少电话？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打多少电话又有什么用？就像九一三事件后，从林彪家搜出的他打给林彪的电话记录说的那样，中央、军委一再强调要请示报告，可下边请示报告多少次了，上边答复什么了？他指责的仅仅是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吗？不也包括林彪吗？

气愤之中，始终萦绕韩先楚心头的就是：林彪怎么了？这还是战争年代的那个“林总”吗？

战争年代，每次战役、战斗的企图、方案、思路、步骤，你的任务，林彪都是那么清晰、明确而又具体。你有什么不懂的或是战场情况变化，需要改变打法。请示报告，有问必复，一是一，二是二，从不含糊，而且总是在第一时间回复你。还唯恐你搞不懂他的思想或是给弄歪了扭了，“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等，把一些战术原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士兵都能懂得，在实战中运用。哪像“文化大革命”中，净是些玄而又玄的空话、大话、绝话呀？

西藏军区副司令员、老部下郑需凡来看他，说现在的事情不好办哪。韩先楚说好办，有事就写报告，爱批不批，反正我请示你了。这也是跟林彪学的。口头的，书面的，什么事到了毛家湾就石沉大海了。你林彪闭上眼睛装没事，那我也请示报告完了就完了，闭上眼睛没事了。跟郑需凡讲得颇有心得，就像个行家里手，行动起来却一窍不通，他哪能是这种人哪。

“文化大革命”前，林彪也不是这个样子呀？1960 年底有人要把他坚决打成“彭黄漏网分子”，国防部长林彪发话了：“韩先楚有错误要坚决地批，同时又



要坚决地保护、使用。”这是典型的林彪语言。开头人家只传达了上半句，把他气的呀。我韩先楚有什么错误要坚决地批，别人不了解，你林彪还不了解吗？后来见面问了，林彪说只听别人说，你不跟我说，我知道怎么回事呀？瞧，这不是怪他请示、汇报少了吗？

就想去看看林彪到底怎么了，问问到底怎么回事儿。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住地清理出一份电话记录。1967年5月6日18时，韩先楚打给林彪：我昨日到家，今天开会研究江西问题，明天研究军管会问题。有几件事我们很为难。

一、中央、军委开会特别强调请示报告，但是我们下边不知报告了多少次，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都没有答复，我们很不好办，建议中央文革、全军文革派人到各地看看，我们大力协助。

二、中央内部还没有传达的事情，很快红卫兵就知道了，这里边究竟有什么问题，很值得警惕……

韩先楚给林彪、徐向前、叶剑英打电话，他都说过“朝里有坏人”。还跟林彪讲过：就这么搞下去，我就上山打游击，跟他们干到底！给林彪打电话，都是秘书接电话，难得有回音。

彭德怀横刀立马，黄名盖世，没想到风景秀丽的庐山成了他的滑铁卢。也是林彪的滑铁卢。

1970年8月23日下午，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曾让韩先楚振奋不已。林彪毕竟还是个敢说话的、务实的人。仿佛阳光驱散云雾，他又看到了当年的那个“林总”，甚至有了3年前搞《福建前线部队公告》时的感觉，这回这“文化大革命”该结束了。毛泽东要收拾张春桥这帮人了，这“文化大革命”不就快差不多了吗？

没人想到林彪会出逃，还要谋害毛泽东。毛泽东能想到吗？但韩先楚想到了林彪与毛泽东之间，就会什么事情都没有歧见吗？他越来越看不懂林彪，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看不懂林彪与毛泽东的关系。从井冈山到长征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林彪都有与毛泽东意见相左的时候。可自不赞同出兵朝鲜之后，林彪就亦步亦趋，调门越来越高，甚至比毛泽东还高。

1962年7000人大会上，他不明白林彪怎么会来那样一篇与众不同的讲话。

还有什么“文化大革命”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他不信浓眉下的那对目光，就只“毒”在打仗上。后来，他发现两次庐山会议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除少数人外，都未能揣摸到毛泽东的心思。但在当时，无论如何，韩先楚都不可能想象林彪与毛泽东会有什么原则性分歧。像绝大多数人一样，他认为毛泽东与林彪是不可分的。就是九届二中全会公报不也仍在一如既往地号召，“在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吗？

8月26日下午，福建组传达、讨论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要点名、揪人的指示后，韩先楚去江苏组看许世友，见许世友正在看什么东西。

“许老板”革命干劲冲云天哪。韩先楚笑微微地道，心情自然很好。

那个“鱧鱼眼”的寿数到了，我再给他补一枪！许世友也跟着韩先楚称张春桥为“鱧鱼眼”。

许世友是在审阅、签发江苏组的一封表态信。韩先楚看了一眼，道：我也给他补一枪。

福建组的表态信，与江苏组的差不多。一是拥护林彪的讲话，二是拥护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不点名、不揪人的指示，三是建议犯错误的人要检讨，对错误要进行批判，要调离中央，下放到基层做实际工作，接受工农兵再教育。

这就是后来被“四联会”揪住不放的给林彪的所谓“表态信”，又称“效忠信”，说“韩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是买了船票的，可以说是到了码头，或者已经上了贼船”。

表态信的抬头写的是“毛主席”，然后是“林副主席”，信封上写着“汪东兴同志转呈毛主席亲启”，交给了中办副主任王良恩。九一三事件后，却在林彪家中搜了出来，让他莫名其妙。可在那些人眼里，那抬头和信封都是表面文章，信在林彪手里才是本质，这不正好说明你们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搞阴谋诡计吗？我们是按照组织程序来的，你们上边搞错了，把水搅浑了，让我们下边跟着倒霉呀！

林彪讲话后，张春桥在庐山几成千夫所指。可这个长得细瘦的“鱧鱼眼”，就像练就了一身上乘的“金钟罩”、“铁布衫”，枪林弹雨未伤毫毛，那子弹反倒

弹了回来击中射手。

攻击张春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炮打中央文革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就“罪该万死”、“死也有罪”了。庐山上的这场斗争，又一次提醒了韩先楚，但他已经别无选择了。因为他知道，如果党和国家的权力被张春桥这帮人篡夺了，中国就完了，他们这些人自然也都完蛋了。

“坚决打倒林彪死党韩先楚！”韩先楚搞不懂林彪，一些人却能“搞懂”他。

1970 年底要召开全省工作会议，总结一年工作，研究、安排明年工作。韩先楚早早告诉秘书，这回要大造舆论，好好宣传一下林总。“四联会”上，一些人抓住韩先楚 12 月 4 日在全省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大做文章，说他“非常系统地吹捧林彪”，“40 多处吹捧林彪”，“比周赤萍的小册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八个样板戏，每个一公演，报纸、电台就要欢呼、庆贺一番，自然也就要把“旗手”江青赞美一番。韩先楚说她算老几，一边去！秘书和报社领导说，从中央到地方都这么搞，咱们就是例行公事表个态。他说那也不行，还是要宣传毛主席。其实，他觉得对毛泽东的宣传也过分了。秘书给他写文章、讲话稿，毛主席语录引用多了，他就说“净抄书”。对林彪也是一样。可眼见着在庐山不但没有扳倒张春桥，这个“鳊鱼眼”反倒身价日隆，无计可施中，就想用宣扬提高林彪声望的战法，来打击、压制一下这个“鳊鱼眼”。1959 年庐山会议他去晚了，没见到彭德怀讲话后的场面，1970 年林彪讲话后分组讨论时的场面、气氛，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片掌声”和“全票通过”，可当时那种场面、情绪却是非同寻常的。人心不可欺，党心不可欺，张春桥这伙人是太不得人心了。他知道这种战法作用有限，但仗总是要一仗一仗去打的，战争年代他从未因哪一仗微不足道而按兵不动。只要大家齐努力，蚂蚁也能搬倒山。

1974 年第 4 期《红旗》杂志，发表郑磊的文章《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说：“林彪反党集团被揭露以后，在抛出这个小册子的地方，这株毒草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揭发批判。1972 年，我们也看到了一点轻描淡写的批判。这种批判，与其说是批判小册子，倒不如说是为了表白小册子的出笼是‘背着’组织，没有人批准，仅仅是由作者亲自下令搞的。事情真的是那样吗？这么大的一件事，没有人支持，没有人批准，办得到吗？由于这本书大量发行，流毒全国，

关于这本小册子出笼的阴谋，现在到了彻底清算的时候了。”郑磊的文章一出笼，有人就像奉得御旨，立即签发一封电报：“现已查明，小册子是韩先楚同意出版的。”

九一三事件几天后，福州空军司令杨思禄唠起周赤萍的小册子，韩先楚才知道还有这码事。周赤萍是福州军区政委，省委第二书记，这等人物写本小书出版，有什么难的？而那时林彪是副统帅，党章上写着的接班人，给副统帅、接班人写本小书，还算个问题？谁在台上就捧谁，这不是挺“正常”的事情吗？这福建的事情，他韩先楚就得什么都知道，什么屎盆子都得扣到他头上吗？

小册子出笼是个阴谋，“封锁毛主席南巡讲话精神”。九一三事件后继续吹捧林彪，自然就更是阴谋了。

毛泽东巡视南方同韩先楚谈话打招呼时，汪东兴特别强调要绝对保密，哪些内容只能自己掌握，哪些是可以传达的。临走时毛泽东又讲不忙传达，待中央确定个范围再说，林彪还是要保的。从南昌回到福州后，他是原原本本照旨行事的，如今却把这样一顶吓人的帽子安到他头上，毛泽东和汪东兴不是心知肚明最清楚吗？

中央3月6日下达9号文件后，他3月22日看地形回到兰州，24日开始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写信，再三说明，陈述事实，结果一封封信都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九一三”凌晨，周恩来讲“老病号”跑了，韩先楚首先想到毛泽东的威望，如何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交代，然后就想到这一次又要倒一批人了。

他没想到他自己。

但是，在11月14日中央74号文件附发的《“571工程”纪要》中，看到把福州军区列为“借用力量”时，他这位军区司令、党委书记的心头，就不免打了几下鼓，但他很快就释然了，平静了。林彪出逃，要谋害毛泽东，搞反革命政变等等，他一无所知。他与林彪都是正常的工作和组织关系，没有任何不正当的东西。

1961年林彪来福建视察，老首长、老部下，见面都很高兴。林彪不会寒暄，他也不会客套，谈的都是工作、战备。一次，林彪问起抗美援朝战争来，韩先楚就从与美军的第一个照面，也就是入朝不久即遭美军轰炸谈起。林彪对美国的空

军优势和我军的坑道战，问得特别仔细，那是和平年代韩先楚与林彪一次难得的高质量谈话，是一种军人与军人的对话。

……除了那次意在打击“鱗鱼眼”的讲话外，他在正式场合很少颂扬毛泽东和林彪，他觉得好话讲得已经够多了，不想凑这个热闹了。平时唠起毛泽东和林彪来，话倒挺多，一种敬仰、敬爱之情溢于言表。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对统帅和副统帅越来越找不到北了，那距离也就觉得越来越大了。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让他感到那距离一下子拉近了许多。可毛泽东巡视南方在南昌跟他打招呼的谈话，就不仅是让他找不到北了，而是令他毛骨悚然了。天哪，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心目中都是亲密如一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呀？！他觉得内凡深处有种非常重要而且牢固的东西，噼哩喀嚓地爆响着要碎裂了。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提心吊胆，不知道中国要发生什么样可怕的事情，就不时冒出一种解甲归田、退隐山林的念头。

林彪折戟沉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旧部，都跟着完蛋了。福州军区揪出个写了本小册子的政委周赤萍，还有个副政委、江西党政军一把手程世清，也都是四野的。当年兵强马壮，纵横天下的四野，如今真有点树倒猢猻也倒的味道了。当年出了个张国焘，红四方面军的许多人，后来不是也被另眼相看吗？他知道自己不会被重用了，可林彪在台上也没重用他，还不是一码事吗？

却没想到两年半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就轮到收拾他了。

“四联会”上，有人揭发林彪在北戴河仓皇出逃前，给韩先楚打电话，说“福州方面就交给你了”。韩先楚当即表忠心，“请林总放心”，并再三让林总保重，两个人足足通话了 17 分钟。

9 月 13 日凌晨，周恩来通知各大军区司令，林彪出逃后，即下达战备命令，全军进入战备状态。韩先楚根据周恩来的命令和叶剑英的指示，调动有关部队，架设战备通信线路，控制一些要害部位。同时指示情报部长孙如奎加强情报工作，对于苏联军队及当时蒋军有何动向，要随时向他报告。9 号文件后，都被视为“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历时半年多的“四联会”，还揭发出韩先楚经常给林彪送海鲜、藕粉、橘子、桂圆，说是“积极投靠林贼”。

1961 年林彪来福建视察，吃了闽江口的海鲜，感觉出汗少了，问能不能给

他搞点带回去。一年后，叶群又打来电话，说林彪要吃藕粉，北京买不到纯藕粉，让他在福建给搞点。给林彪的主要就是这两样东西，而且量很少，林彪“吃猫食”，还不吃水果，送的也少。多与少是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比较而言的。除藕粉外，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都比林彪多。周恩来还打电话问他橘子如何保鲜，说一过春节，那橘子就得像棉花似的了。而这些东西也不是他说送就送了，是经过军区党委研究过的。记的好像是 1963 年左右，中央办公厅发个通知，对全国各地给中央首长送东西提出批评、制止。他说给他们进贡还吃批评，今后都自己吃了。话是这么说，东西照样送，都是土特产，就是一种心情，算个什么问题？觉得不合适，你们付钱嘛。给陈云、徐向前、叶剑英等人也常送些水果，特别是在这些人落难、不得志时。

但是，给谁送的也没有给徐海东的多，而且时间最长。……可那些人对这些却视而不见，能看到的只是他“积极制造林彪”的“罪行”。

林彪依然是那么沉默寡言。永远那么沉默寡言，这世界上话语如此金贵的，除了林彪就没见第二人。那面色依然是那么苍白，甚至是惨白，陌生人冷丁一见会以为是个死人幌子。在延安初识抗大校长时，一眼望去就是个小白脸。纤秀的得像个女人样的林彪，却不显纤弱。平型关战斗前爬山下沟，很有劲道的。白净的脸上，随着汗水泛出些红晕，显得健康而有活力。“八一五”后闯关东，在铁岭再见时，那面色就挺苍白了。后来就听说他怕光，衡宝战役后风呀水的全怕了。若不是平型关战斗后晋军的那一枪，林彪肯定不会是这个样子。

面色难看，那头脑、思维却依然敏捷，甚至好像不减当年。就想直奔主题，问个究竟，几欲开口，又都闭住了。战争年代，无论身边工作人员，还是下边纵队的，叫你来，问什么，讲完了，你就走人。林彪喜欢清静，不允许任何人打扰他，因为他要思考问题。老部下想他了，看得出来他也挺想大家的，决无拒人千里之意，却没几句话，那场面就不免尴尬。而今一切照旧，韩先楚却觉得那脸上和这屋子的墙面、地面上，仿佛都写着“莫谈国事”。

他知道，林彪脑子里那个思想的轮子，只要醒着，就一刻不停地飞转。只是当年的“林总”思想的永远是战争，如今的“林副主席”转动的又是什么呢？

刚进抗大时，林彪那口浓重的乡音传递的信息，有时让他搞不懂，那是因为他还不了解林彪。而今搞不懂林彪，则是因为他太了解林彪了。

60年代初，从军委到全军各大单位都成立了“防敌突然袭击办公室”。韩先楚认为，防敌突然袭击当然是大事，但司令部有作战、情报部门，这就是他们份内的工作，“防空办”属于重复机构，也在这次精简机关中把它减掉了。一位副总长听说此事，向林彪报告，说韩先楚把“防突办”撤了，这还了得？韩先楚如实禀报，林彪没回音，那我就这么办了。

直到临时去世前，韩先楚都觉得《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16条”）中的一段话，实在是太对了：“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对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

报纸上评《海瑞罢官》，他没当回事，那不就是一出戏吗？他觉得那是文人秀才的事儿，与他无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他看了，也没怎么往心里去。自1957年“反右”后，这运动，那运动的，搞多少了？他是准备打仗的，不是搞运动的。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搞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他觉得有点不对劲了。8月中旬，连毛泽东也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接着又发表了“16条”，才终于嗅出点“史无前例”的味道了。10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学生先是在学校内“踢开党委闹革命”，接着又杀向社会“破四旧、立四新”，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省委、市委陆续瘫痪。

这是怎么啦？！

老蒋没来，我们自己打起来了！

从来都是共产党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旧世界，打倒国民党，哪有共产党号召人民群众“踢开”、“炮轰”自己的党委的呀？这不是共产党打共产党吗？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看街道、广场和省委、市委门前如痴如醉的人群。听着“炮轰”、“火烧”、“油炸”、“打倒”、“揭盖子”的吼声，他觉得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连梦境都不是。这是那些被推翻、打倒的势力，被赶去台湾的国民党，才日思夜想，连做梦都想看到的情景呀！

他痛苦地摇着头：我们这个党啊，刚过上几天好日子，为什么有些人要瞎折腾呢？

韩先楚指示一位副司令员，赶紧把省委的机要档案秘密转移到军区的战备坑

道。同时决定让省委机要队都穿上军装，交由军区司令部通信兵代管，以便保持省委与中央的联系。并指示各顷刻领导和有关部门，要尽量保护那些受到冲击的老干部，起码要尽量保护好他们的人身安全。地方党政机关已经瘫痪了，通信联络再断了，那就成了聋了瞎了要命了。当时打下一座城池，首先想到搞钱财、粮草接济自己，这是非常实际的。那时还想不到档案之类，后来逐渐就重视起来了。攻占一座城市，电台、银行和通信、交通枢纽，还有敌伪档案，都是必须尽快抓到手里的。

5月中旬，军区就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办公室。一来运动就要成立办公室，这是老规矩了，“文化大革命”当然也不能例外。开头，韩先楚根本就没有理睬这个“文革办”，有段时间甚至记不得有这么个办公室。他关注的依然是台澎金马。打下海南岛就想到台湾的韩先楚，可是枕戈待旦准备动真格的。

可他很快就不得不把目光移注到“文化大革命”头上了。

对于这场运动，他自始至终都不理解，可他一旦动作起来就是认真的。他把“文革办”出的简报一期期翻看，又找来“文革办”的人汇报情况，并指示要加强“文革办”的力量。有时他还亲自去街头看大字报，混在对立的两派中听辩论，到工厂、农村了解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特别是听那些本分、实在的老工人、老农民怎么说。他认为无论上下左右的什么东南西北风，这种来自基层的人民群众的声音，才是最真实、最可靠、最具有真理性的，也是最恒久的。

像战争年代一样，战役打响前，他必须了解各种情况，然后才能下决心，定方案。

他早预感到：省委、市委被冲垮后，下一个目标就是军区了。

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这仗不好打，可他必须打。

因为他知道这江山是怎么打下来的，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就这么乱下去。不怕外患，就怕内乱！

果然，省委被冲垮后，造反派就对着军区来了。

1967年1月16日，正是上海“一月风暴”期间，福建省委、省政府被造反派夺权的当天，一群造反派来到军区，要韩先楚表态。韩先楚接见了代表，明确答复：“我和军区党委一致认为，中共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夺。只有经过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才能夺权，不经批准夺权是错误的，是



绝对不能允许的！我和军区党委、全省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也是根本不承认的！”

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

1月26日，是福州军区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军内外一些造反派冲击会场，抢占主席台，夺去话筒，说军区“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战备压革命”，要“砸烂这个大会”。

时称“一·二六”事件。

27日、28日、29日，人越聚越多，一些人冲击了军区司令部。

韩先楚怒不可遏，却也只有竭力遏着。

开头是政治部领导与造反派谈判，谈不拢，造反派就要往里冲，再三说明军区机关属军事重地，是福建前线首脑机关，宣讲1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精神，嗓子喊哑了没人听，硬往里冲。警卫连官兵在大门口手挽着手排成人墙，造反派人多势众，冲倒人墙就冲进来了。旗帜招展，喇叭吼叫，“打倒”、“炮轰”的口号伴着《造反有理》的语录歌。马鞍山下一向严整、肃穆的军区大院，一时间竟成了福州最热闹、最乱的地方，往日晚饭后龙腾虎跃的灯光球场，则成了辩论场、谈判场。球场中央摆几张办公桌，韩先楚披件军大衣坐在桌前，对面是几个造反派的代表，后面是闹哄哄的造反派。看到军区机关乱成这个样子，韩先楚是强压火气坐在这里的，他说：有人说军区是“以战备压革命”，我说这话不能这么说。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那么我们福建军民的共同敌人是谁呢？我说首要的、第一位的，就是国民党和蒋介石。同学们，我们福建不同于其他省市，福建面对台澎金马，是前线。大家知道，现在每逢单日不是还打炮吗？全国哪个地区是这样子？1962年国民党“反攻大陆”，叫嚣那么凶，没来，不是不想来，而是不敢来。可如果我们的党政军机关都瘫痪了，还不敢来吗？同学们，你们不知道，国民党飞机从台湾起飞到福州上空，战斗机是7分钟，轰炸机是15分钟。如果敌人现在来了，就现在这样子，我这个司令员别说是指挥应战，就是指挥大家都有来不及……

人群中有人喊：韩司令说得对，福建是前线，不能冲击军区机关！一位代表站起来大声说：不对，“16条”中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点全国都是一样的，福建也没什么特殊的。毛主席说“抓

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可韩先楚眼中只有战备，好像我们福建只要抓战备就行了，连“文化大革命”都不用搞了，这不是公然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如今却倒过来了。

天快黑了，谈判好歹结束。韩先楚是被担架抬回去的。

韩先楚认为，无论如何，军队不能乱。1月27日他一夜未眠，他认为福建应该而且必须打“前线”这张牌。

1月28日，毛泽东批发《军委八条》，而当夜几个军级干部被造反派抓走了。

1月30日晚，福州军区常委扩大会。韩先楚开门见山：我知道这些天来，大家都在想着这样两句话，军队不能乱，前线更不能乱！我和几位常委研究过了，我们要出一个公告，以福建前线的名义公告社会各界，如果谁敢动武，军队就要坚决反击！

近20名常委扩大会议成员，一致赞同。

韩先楚要求《公告》文字简练、精确、强硬，又要滴水不漏，不能让人抓住把柄。几个秀才连夜写了三稿，才最终通过。连夜印刷，第二天早晨在福州街头张贴，同时上报中央军委。

《福州前线部队公告》最后声明：为着维护最高统帅命令的尊严，对军队内部极少数违抗中央军委命令的违纪分子，实行纪律处分；外部如有煽动群众，继续冲击军事机关，丑化中国人民解放军者，我们一定要按着最高统帅的命令，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

2月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签发《福州前线部队公告》。有的军区领导说：福州军区放了一颗“原子弹”。

毛泽东批准了《公告》，这样的批示（大意）：造反派冲军区，抢你们大楼，你们不要让，坚持在上头。他们在东头，你们在西头，把他们包围起来，开展政治攻势，抓坏头头。

林彪批示：完全同意。

6、7月间，江西造反派劫持福州军区政委和江西省军区司令员，大规模抢夺解放军和民兵的武器，进行大规模武斗。并冲进福州军区，占领了司令部大楼，甚至占领了作战值班室。皮定钧带前指住进坑道，一号坑道被造反派砸开四道门。

皮定钧急了，最后一道铁门一旦砸开，就开枪！

这时韩先楚到北京参加解决江西问题的会议。张春桥在会上说：江西两大派组织，省军区支持了保皇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不要以为你们省军区有枪，路线错了，有枪也不行，照样垮台。当然我不是发动夺枪，你们不要站出来，但未尝不可以这样想，如果一个军队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什么不可以夺枪？枪发给谁，就是谁的，我在那里，我就赞成夺枪！

韩先楚勃然变色，起身离去。

看着这个“鱗鱼眼”，韩先楚想，这世上莫非有人生来就是搞“文化大革命”的吗？

九一三事件后的 57 号文件中，有句话说林彪过去也为革命做了些有益的工作。传达、学习时，韩先楚说林彪虽然死了，对他的评价还是要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学习 9 号文件了，有人就说这是“公然为林贼翻案”。

林彪若不是为革命做出过贡献，怎么会 24 岁就当是红军的军团长，接着又是八路军主力师师长、四野司令员和共和国元帅？可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报纸上不是还说他不会打仗吗？指挥了平型关大捷，率军从长白山打到海南岛的人不会打仗，那么谁会打仗呢？是那个戏子江青，“鱗鱼眼”张春桥，还有那个瞅个老实、厚道却专会用笔杆子杀人的姚文元？

在历史上，林彪与毛泽东有过分歧、争论，有时对了，有时错了，这原本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能把人放到完全相同的时空中，让其不受拘束地重新走一遭，他敢断言全世界没有一个人的轨迹会是重叠的。上午那么想的，下午就这么做了，自己和自己都在打架，两个人的思想、观点，又怎么可能时时处处事事如出一辙？可林彪“永远健康”时，就说他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九一三”后又说他一贯反对毛主席，从来都不是个好东西。

活了 50 多岁，韩先楚最难以容忍的，也最让他痛心疾首的，就是大跃进年代的“亩产万斤粮”，和“九一三”后的“林彪不会打仗”。我们是共产党啊，共产党、解放军怎么能这样子说话呀？！

战争年代，血与火中的胜负是最实际的。三座大山不是用嘴巴子吹翻的，笔杆子写错一个字，战场上就可能付出代价。战争把虚妄、迎合、瞎话赶得远远的，那时的共产党人是多么的实事求是、朝气蓬勃呀。建国了，和平了，没有那种生

与死、胜与负的威胁了，难免会滋生一些虚假、浮夸的东西，可无论如何也不该到这份上呀！

好时屁眼都没疤，拉屎都不臭，坏时就头顶生疮，脚底流脓，这是批判林彪，还是丑化我们自己？而今又如此揭批他，被伤害的又仅仅是他韩先楚吗？依靠人民的支持，凭着一种精神和信仰的力量，我们得人心而得天下。可如此折腾下去，我们将如何取信于民，面对后人？

8年后，中央决定撤销9号文件，老战友、老部下向他祝贺，他说：有朝一日去见马克思时，希望党组织在对我一生的评价中，能把我的错误也写上一笔。1974年3月24日，韩先楚在写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的第一封信中，即提出：希望中央将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在贯彻中央9号文件中，对我揭发的问题转给我。群众的揭发会帮助我回忆自己的错误，以便进一步检讨自己。

翌年10月20日，在给“毛主席、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的信中，又写道：我再次向中央建议，把福州军区党委、福建省委或更大一些范围的同志调到北京开会，我也参加，检讨自己的错误，澄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把问题搞清楚。今年1月29日，我给中央写了报告，请求把整我的材料转给我，以便我对自己的错误进行检查。

没人能说得清韩先楚为此写了多少申诉信。据他1976年12月23日在武汉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中央、军委”的信中说，在写了第一封信后不到一个月里，仅电报就给毛主席、党中央发过四封。而在从“毛主席”到“华主席”的所有信件、电报中，他都“希望”、“建议”、“恳求”能将揭批他的材料转给他，将有关人员召集一起，大家当面锣、对面鼓地把事实搞清楚。

没人理睬他的要求。

我还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还有说话的权利和自由，还是党员，还有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凭什么允许他们胡说八道，却不许我澄清事实？

“七二〇事件”后，“逃难”到西山，韩先楚曾愤愤地对叶剑英说：说我是“三反分子”，拿出真凭实据呀，能让我心服口服，我自己背着行李去坐班房！

叶剑英叹口气：如果需要真凭实据，还用搞“文化大革命”吗？

叶帅仰天长叹，连呼三声：莫须有，莫须有，莫须有啊！

一向喜欢听到部下说“不”的韩先楚，在这些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日子里，益发感到了人的权利的珍贵，也就益发坚定了一种信念：如果有朝一日还能有职有权的话，在他那方天地里，一定要尽力维护每个人的正当权利，首先是说话的权利，决不允许只有一种声音呼天喝地！

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前，毛泽东对他说你去沈阳吧。他说我是个大老粗，没文化，只会打仗。这话答非所问，文不对题，好像原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是“大老细”似的。

毛泽东说你去广州吧。他说那是南大门呀？其实，能坐镇福州，面对台澎金马的人，东西南北哪个大门不能守呀？还是不想去。

毛泽东说那去兰州吧，你是个好同志呀。他说我去，我去，我服从主席命令。事不过三，他已经两次说“不”了，再不遵命就不是好同志了。

半年前，毛泽东曾对他说“你不动”的，为什么又要动他了？

自“全国山河一片红”后，各大区司令员就不仅是拥兵一方，而是集一方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了。这是和平年代从未有过的现象，是不正常的，却是由不正常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种必然的后果。大权在握，又经营多年，根深蒂固，换个地方，人地生疏，又不再担任地方职务，好像就放心了。他知道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是会产生一些弊端的。只是各路诸侯又有哪个会拥兵自重反对毛泽东呀？陈再道到福州后，谈到“七二〇事件”时说：老韩呀，咱们这些人，生是毛主席的人，死也是毛主席的鬼呀！说到这里，那泪水都要下来了。

韩先楚倒是觉得毛泽东是在为身后考虑的。果真要把党和国家的权力交给那几个“文革”新贵，那确是没几个人服气的，他韩先楚就不干。可调动后不再担任地方职务，却是他求之不得的。而他不想离开福州，是因为他舍不得，丢不下那个台湾。

在福州 16 年，除了这几年，他的时间、精力基本都用在琢磨那个美丽的宝岛台湾了。他来福州是干什么的？他有几套方案，1961 年曾跟林彪讲过，那时还不大成形，林彪挺感兴趣。打海南岛只能立足当时装备，这台湾就不行，党和国家必须好好过日子，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大力加强空军、海军建设。但有一条是相同的，那就是夜长梦多，不能拖。这个世界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什么样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出现，久拖不决就可能难以解决，起码付出的代价会不会越来越

越大？文打武斗，他都认为台湾问题应该在他们这代人手里解决，而他应该是指挥登岛作战的最合适的人选。可眼下“最大的政治”仍然是搞好“文化大革命”，他能向中央，向毛主席提出这个问题，算是不想离开福州的理由吗？

9号文件一下来，他就明白了。先说“你不动”，稳住你，再突然调开你。你在福州经营16年，“结党营私”，“招降纳叛”，不调开你，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盖子”能揭开砸烂吗？他不认为这就是毛泽东的心思，但他敢说肯定有人就是这么谋划算计的。

在此之前，他始终认为毛泽东对他关怀的、爱护的、宽容的、谅解的。

1960年“反右倾”，福建把他反成那个模样，到头来却由省委常委进了书记处。毛泽东当然不一定了解这个，可后来让他当省军管会主任、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还能不知道吗？更让他念念不忘的，是彭德怀在庐山出事后，唯有他和黄克诚去看了彭老总，这事毛泽东还能不清楚吗？

“九一三”前毛泽东巡视南方，在南昌召见他和许世友时，对他说：“我就是批准了你的那个《公告》嘛，有人就说我右倾。”“我说你那个《公告》发得好”，“你也是受害的一个”。《公告》是你同意转发的，如今又说它好，那当时怎么说变就变了？

批陈整风时，因为许世友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带头写了“表态信”，毛泽东让他这个也写了“表态信”的人和李德生去南京做许世友的工作，曾两次对他讲到“路线出感情”，挺亲切的，就更让他摸不清头脑了。没说的，他忠于毛泽东，这是一种深厚的感情。可提到“路线”，他肯定和江青、张春桥等人不是一条路线。那么，二者之间，毛泽东站在哪一边，是哪条“路线”？如今，中央9号文件明明白白是要取他的政治首级，这又是什么“路线”？

李先念和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李先念这位红安老乡，瞅准机会，抓紧时间，讲了几句9号文件和韩先楚的情况，说韩先楚对主席可是忠心耿耿的呀！毛泽东好像对这个9号文件一无所知：有这种事情呀？

韩先楚也像李先念这样干过几次。像毛泽东讲“路线出感情”那次，见老人家挺高兴的，他就说：萧华跟主席几十年了，不会反对你的，是不是把他解放出来？毛泽东听了，就转过脸去望着张春桥，一脸的不高兴：萧华的事情我讲过两三次了，怎么还没办哪？

江青、张春桥这帮人，肯定背着毛泽东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对他韩先楚也是恨之入骨。中央下发 9 号文件时，毛泽东也不在北京。有人说 9 号文件是江青假借毛泽东的名义圈发的，毛泽东没看到，不知道。没看到是可能的，可江青竟敢擅发中央文件吗？又不是大清帝国那时候，打个电话，不是举手之劳吗？

但他始终相信毛泽东对他是有感情的。

“文化大革命”前，他胃病犯了，治疗后在武汉东湖宾馆休养。毛泽东也正好住在那儿。中间隔着一道花墙。一天早起他打鸟，咣咣几枪，响动了毛泽东，也把他吓了一跳，觉得自己太鲁莽了。事后听说毛泽东确实不高兴了，可听说是“韩司令在打鸟”，就什么也没说，那不悦之色也没了。那天晚上，他想去看望毛泽东，解释一下，赔礼道歉。没想到毛泽东先来看他了，带了那么多芒果，还有一大碗娃娃鱼。中办一位同志告诉他，主席休息，有时连院子里的麻雀都要轰走，敢在主席身边打鸟，除你韩司令没有第二人了。

当时他很感动，却不明白毛泽东对他何以如此宽宏大量。9 号文件后就想，是不是还记着他东征时“救驾有功”呢？

八大司令对调前那次谈话，毛泽东还提过这码事，说救我一命，欠你的情。那次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指挥部，几十个人被压在路边沟里，当时确是很危急的。而这时候，韩先楚已把这码事忘到脑后去了。

他是穿着草鞋参加革命的，又穿着草鞋从大别山走到陕北。四野南下时，从未见过草鞋的东北官兵也学会了打草鞋。草鞋曾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是天赐给共产党人的宝贝。如今那些“文革”新贵成了宝贝，他们这些穿草鞋打江山的人都成了没有用的破草鞋，他则被一脚踢到这大西北来了。

就不断地给毛泽东写信，除了以往那些话外，有时就提出去看望“您老人家”。到了北京再提出这个问题，就更理直气壮些。绝口不提“救驾有功”，就是“想您”，“非常想念”。这个“想您”，“非常想念”绝对是画龙点睛，意味深长的。

事实上，他也确实非常想念毛泽东，9 号文件后更是有一肚子话要向老人家倾吐。而今，无论毛泽东有无回音，甚至这信能不能送到毛泽东手里，他都持怀疑态度。

但他还是要写。他把它们当作一个个探空气球放出去，为的是摸底，试探一

下老人家到底是什么态度。

寄走一封信，就像向前线派出一支部队，然后就绷紧神经等待消息。政治斗争也像战争一样，危险、疲惫、瞬息万变，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只是那种仗让他激动、兴奋，总觉得天地小，视野大，满怀自信，浑身有使不完的劲，这种仗却是心也不足，力也不足，实在让他打不起精神。因为它无章可循，几乎全凭个人意志，甚至有时就是依喜怒哀乐而定。当年千钧一发之际，有时也会觉得神经快绷断了，胜利随之就向招手了，甚至就到手了。而今却是每次都觉得挺不住了，熬不下去了，精神已经崩溃了。

原以为到了兰州，不在地方兼职了，就可以甩开膀子违心干他倾心热爱着的，也是轻车熟路的军事工作了，谁想到竟会是这个样子。不过，逐渐地也就熬出来了，平静多了。

他慢慢恢复了常态。以前也见不出他有多么烦躁，那种表面的平静掩盖的却是内心的风暴雷霆。现在每天依然是吸烟、踱步，老人家是照样想念，那信隔上一段时间还是要写上一封的，写完了也就完了。踱步踱累了，就和警卫员下盘棋，或是练练毛笔字、看看书，还竟然把上下两册砖头似的《红楼梦》看完了。

人家折磨你，你再自己折磨自己，那不正中人家下怀吗？

不能成仙，那就修道，起码也算修炼出几分道行来了。

只是党和国家就这么熬下去，可怎么得了呀！

1974年8月，各大军区负责人被中央召至北京，检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王洪文传达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发言时别人不要插话，讲完了就完了，大家鼓掌。

韩先楚不干。

第一次参加战斗后，他就不能不检查自己，都说大家都往后跑，连大队长都撒丫子了，你怎么就冲上去了？第一次战斗没检查出个子午卯酉，以后那收获可就越来越丰硕了，特别是在当了团长、师长、军长之后。可现在这是什么检查？他有什么错误？就算有天大的错误，那根子又在哪里？拿我们这些大区司令小虾米开什么涮？

1974年9月5日晚，在中央召集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韩先楚同意检查在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路线错误。



但他坚决不念别人写好的稿子。那上边写着：我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写了一封支持林彪反革命政变动员令的表态信，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我错怀疑过春桥同志，在这里我向中央检讨，向春桥同志赔礼道歉。

他的心在淌血！

这个“鱗鱼眼”算个什么东西？不就是历史上那种屡见不鲜的狐假虎威、弄权作奸的丑类吗？却成了“春桥同志”，还要“道歉”？

先有两个人来找他谈话，他还是那话：让我检查，可以检查，我也愿意认真检查我的错误。但我不能按照会议发给的《检查提纲》检查，因为我不能瞪着眼睛胡说八道。

9 号文件后整理出《韩先楚十大罪行》，几十条罪状除“林彪死党”外，证据确凿的，几乎全是反对江青的、张春桥等人。

自“四人帮”垮台后，韩先楚就开始给中央写信，力陈 9 号文件的错误，力主撤销，为 9 号文件制造的大量的、系列的冤假错案平反。从兰州军区司令员，写到军委常委、人大副委员长。

1982 年 7 月，中央决定撤 9 号文件，韩先楚和四儿子卫平有一段对话。韩先楚说：江青说我和“许老板”是“党内两霸”，这是胡说！（完）

自杀的王良恩

(2011-03-21 19:35:58)

知道王良恩这个名字，还是看毛毛的《我的父亲邓小平》，其中，提到王这个人非常势利，邓小平到江西去，晚上失眠，习惯了北京居所的窗帘，希望带走，王良恩坚决不允许；邓小平要带点书到江西，需要一些纸箱子，但是王良恩百般推脱，进行刁难，就是拖着不办，让邓家很是心寒，据说邓小平还向汪东兴说了此事，足见此人类似《红楼梦》中的一些有奶便是娘的奴才嘴脸。但这些看似是琐屑小事，却也说明人不厚道，而在中办工作的王最终却自杀身亡，令人唏嘘。他自杀不久，邓重回北京，站到权力中心。这篇文章，介绍了王被冤屈的来由，令人感叹。中办多人，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田家英是自杀。据说，第一个向华国锋建议隔离四人帮的李鑫也是自杀；从上海调到总政治部保卫部的徐海涛也是自杀。这些人物也许并不显赫，但他们往往在一定历史阶段所处的位

置，却相当关键。王良恩（1918-1973）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1964 年晋升少将军衔

1973 年 1 月 9 日，江青在中办《批林整风简报》上批示：“王良恩危害党中央毛主席！”在中办临时党委扩大会议上，江青说：“我要控诉，王良恩迫害我！”“王良恩是野心家、阴谋家、大反革命、定时炸弹！”“你们（中央专案组）必须在三天内写出揭发王良恩的材料，否则按党纪国法论处！”《揭发王良恩反革命罪行》的材料很快整理出来了。周恩来指示王良恩，边检查边工作。王良恩先后写了四次检查，都过不了关。在最后一次批判会前，王良恩又写了一篇检查。

1 月 26 日，王良恩在连续五次检查仍过不了关的情况下，在家中卫生间自杀，还不到 55 岁。他在写给毛泽东的遗书中说：我负责地向党申明，九届二中全会我是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对党对人民有罪。但属于受骗上当范围，决没有和他们死党有串通。

王良恩死后，家被抄，家属被扫地出门。

江青说王良恩搞她的“黑材料”。什么“”黑材料？在继续清查林彪罪证中，中央专案组从毛家湾查出一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等人起草的《揪军内一小撮》社论清样上附的一封信：“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以便尽快发表！”之后《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在最后一次批判会上，有人揭发王良恩曾给我们讲，江青同志作风霸道，经常干扰中央工作。还讲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恶毒攻击中央领导。……

1966 年 8 月，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调任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这是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意思，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打倒了一大批高级干部，他从各大军区选调一批德才兼备，又无政治背景的军级干部充实中央要害部门，包括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公安部部长李震等。

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是汪东兴（他也上任不久，顶替杨尚昆），副主任是张耀祠，主要为毛泽东服务。“外来户”王良恩和杨德中负责周恩来交办的事情。

1969 年 4 月，王良恩任中共九大主席团副秘书长，负责会务和文件。

1969 年 11 月 15 日，王良恩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

1970 年 8 月，九届二中全会，仍然负责大会秘书处。之后成立陈伯达专案组，王良恩出任组长。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还没有王良恩什么事，他还到毛家湾向“林办”工作人员传达关于林彪的中央 57 号文件。据张宁回忆：王良恩握着她的手，说我认识她，年纪还轻，还有前途，不要背思想包袱。王良恩念中央 57 号文件时，开始有一个较长的“过门”，他盯着文件，沉默着，没有读出声音。张宁看出来他是在克制自己的情绪。全场都在静静等待。终于王良恩慢慢念出 57 号文件，又停顿下来，再次清清嗓子，才又慢慢念下去：野心家、阴谋家、叛徒……

而到了 1972 年，王良恩也开始“倒霉”了。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给他扣上几顶大帽子：一、庐山会议上追随林彪搞阴谋、给林彪传阅效忠信、私自批准，抢先印发华北组第六号简报。二、对汪东兴落井下石，干扰破坏毛主席党中央安全服务工作、妄图篡夺中办领导权。三、恶毒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首长等。一直到 1973 年 1 月，王良恩临死前，江青、康生等指使中办临时党委仍在连续批判揭发，不让王良恩的检查过关。甚至江青等亲自到会，逼迫王良恩交代罪行和后台（周恩来）。

试想，如果不是如此残酷，王良恩，这位久经考验的老干部，怎么可能以死抗争？

也幸亏王良恩不是四野出身，否则，他也难以平反。

但是，因为他得罪了汪东兴（庐山会议后汪东兴靠边一段，由王良恩负责中办），他的平反之路更艰难曲折。

1977 年 6 月，中央办公厅临时党委给华国锋写报告，关于反党分子王良恩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决定，做出王良恩是反党分子，自绝于人民，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的政治结论。

1979 年 11 月 1 日，王良恩冤案经中央办公厅党委复查，报请中央批准，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1981 年 5 月 5 日，中央办公厅为王良恩举行了追悼会。

王良恩：山东潍县（今潍坊市奎文区）马少野村人。1937 年毕业于青岛市立中学，1938 年参加八路军鲁东抗日游击队第八支队，同年 9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先后任班长、排长、连长、指导员、教导员、营长、团政委、团长、师政治部主任、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1960 年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王良恩作战勇敢，屡立战功。1947 年 7 月泰安战役，率 23 团主攻嵩里山(今英雄山)，配合兄弟部队歼灭国民党整编第 72 师；1948 年 3 月洛阳战役中，他虽身负重伤，仍坚持苦战两昼夜，配合兄弟部队全歼敌第 206 师，俘敌 2 万人；9 月，参加济南战役，他指挥部队直捣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俘敌 600 人；在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率部一举歼灭黄维兵团“老虎团”。1949 年 1 月，王良恩调任师政治部主任。4 月参加渡江战役，8 月任师副政委，奉命进军浙江，完成了解放浙东沿海的战斗任务。1952 年 7 月，调任军政治部主任，1955 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57 年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60 年 7 月调任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2012 年 6 月 6 日初稿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十册（6）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十章 批林批孔

#### 第六节 筹备四届人大

##### 本节资料

##### 一、文献资料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

毛泽东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

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毛两次讲：“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94 页）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对陈丕显来信的批语

洪文同志：

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

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404 页）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七日，毛泽东对陈丕显来信的批语

洪文同志：

此人如何处理，请在政治局一议，为盼！

似可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404 页）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1974.09.29；中发〔1974〕25 号

毛主席已圈阅。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野战军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

贺龙同志原任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林彪要整贺龙同志蓄意已久，早在一九六六年就向中央提出，贺龙同志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收编”、和“阴谋篡军反党”等问题，要进行审查。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以前，对贺龙同志问题的审查，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相，以欺骗和封锁中央，诬陷贺龙同志历史上“通敌”和“篡夺军权”。“九·一三”以后，中央直接对贺龙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审查。毛主席多次指示，要抓紧给贺龙同志作出结论，平反，恢复名誉。经中央查证甄别：

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

二、所谓“阴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

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

贺龙同志已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病故。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因此，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中央的这个通知，印发到县团级，并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问题的报告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问题的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贺龙同志原任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时参加革命，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因病逝世。

林彪要整贺龙同志蓄意已久，早在一九六六年就向中央提出，贺龙同志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收编”、和“阴谋篡军反党”等问题，要进行审查。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以前，对贺龙同志问题的审查，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相，以欺骗和封锁中央，诬陷贺龙同志历史上“通敌”和“篡夺军权”。“九·一三”以后，遵照中央的指示。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查证甄别：

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贺龙同志自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一直坚持武装斗争。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派人“游说”、“策反”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又名熊瑞龄）“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贡卿先派梁素佛（又名梁天闻）来到湘鄂西红三军。贺龙同志首先发觉来人之阴谋，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允许熊贡卿来到湘鄂西，在熊供述情况后，即“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予以处决。事后，湘鄂西中央分局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所谓“通敌”，本无此事（见附件一、二）。但林彪和黄、吴、叶、李等反革命分子，不将查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报告呈报中央，反而大搞逼供信，捏造假材料，甚至还把敌伪报纸上刊载的造谣诬蔑贺龙同志的一些消息。报道，作为证据，诬陷贺龙同志“通敌”，和向国民党反动派“乞和”，“投诚”。

二、所谓“篡夺军权”问题，是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贺龙同志对林彪提出的以“四好为纲”，“向空军学习”等口号，提出过不同意见。林彪等人怀恨在心，采取特务手段，有计划地编造黑材料，胡说贺龙同志“阴谋篡夺军权”，并支持一

些人在总参、海军、空军和北京、成都军区等单位“篡夺军权”。

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并无此事。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使用阴谋手段，颠倒历史，捏造事实，欺骗党和人民，陷害贺龙同志，罪恶至极。

我们建议，对贺龙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三日

附：

一、湘鄂西中央分局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二、蒋介石为优恤熊瑞龄所颁发的命令（节录）

附件一：

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件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写 四月十八日到

中央：

……

八、去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二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军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作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

此致布礼

夏曦、贺龙、关向应三月十七日

（注：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附件二：

训令

训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据本行营第一厅第二处处长晏勋甫呈称熊瑞龄奉派招降贺匪惨被诱杀拟恳特加优恤令仰该部长从优议恤抚字第五〇六号

二十三年三月三日。



案据本行营第一厅第二处处长晏勋甫呈称，窃查熊瑞龄于上年十一月奉派赴鄂西招降贺龙一案，兹接湖北何主任来电，谓被贺匪诱杀等语，查熊瑞龄……因与贺匪昔年友善，……恐该匪入川与徐匪会合，遂愿深入虎穴，招安投诚，迨行抵施南后，与该匪见面，一切办法，均已议妥，不料该匪阳为归顺，阴实叵测，竟将熊瑞龄惨杀。……查该故员招降贺匪，致遭惨杀，殊堪惋惜，除指令外，合行令仰该部长照少将阵亡例，从优议恤，为要！此令。

委员长 蒋中正

（注：原文载一九三四年蒋匪南昌行营《军政旬刊》第十八期）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翻印）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准备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

通知中转述了一九七四年八月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402 页）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一点意见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405 页）

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江青信上的批示

江青十月十九日给毛泽东写信。

毛泽东在信上批示：

已阅。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

毛泽东

十月二十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74 页）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在江青的信上批示：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

“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94 页）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毛泽东给江青的信

江青：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

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

毛泽东

七四，十一月二十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74-375 页）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毛泽东同李先念、汪东兴谈话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410 页）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间，毛泽东指示

江青托人向毛泽东提出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之后。

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395 页）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对反映刘景范情况来信的批语

此案审查已久，不必再拖了，建议宣布释放，免于追究。

送汪主任酌办。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412 页）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要点：

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下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中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413-414 页）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传达的毛泽东谈话要点（节录）

（一九七四年末至一九七五年初）

传达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日四次谈话要点：  
一、留三天谈谈。二十四日又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二十五日说，你们还可再留两天。二十七日见面时说，现在没有什么要谈的了。  
二、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在二十四日谈话中，主席又说在批刘批林运动中立了功，但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并举党内斗争历史为例。（洪文同志有回答，我与洪文同志谈了话）

[原稿不含三、四两点]

五、在二十三日谈到小平同志时，主席写了“人材难”三字和“强”一字，并指指脑袋，说小平是难得人材，政治思想强。在报告剑英以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小平以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主席说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讲到副总理名单时，主席在听到我念邓、张、李对，又加了一个陈（锡联）字，念为邓、张、李、陈，并说张有才干，李较软弱。

六、主席说他自己也在做江青同志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江青同志说，没有工作做，主席说看资料，研究国际国内问题，然后提意见，主席自己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做的。对江青同志，主席说，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批林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这一条，我们报告主席，只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一谈，在政治局就不提了。）

七、主席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搞乱了，也不告诉我。我们说，在一、二月份，下达那些指示，开了那样大会，我们也有责任，政治局也没有认真讨论。所以七月十七日主席离京前约政治局同志谈话时，我曾说过，有些事是我们“怂”起来的。

主席说，说批林容易批孔难。世界上事，说起来难，做起来并不难，现在五经四书也批了，孔夫子是文圣打倒了，关云长是武圣也打倒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

八，谈到国际形势，主席认为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各国人民对此要有所准备。主席认为要弄清苏修对我试探的真正意图。主席问，如果勃列日涅夫要来谈，应该怎样？我说，如他真想来谈，可考虑，但我们不能去请他。主席点头。

（注：此件是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提供的周恩来手稿。）

## 二、研究资料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下卷

孙中范《不寻常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

从 1973 年 9 月至 1975 年初，我作为中央组织工作小组值班室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秘书组的工作人员，参加了四届人大后两次的部分筹备工作，亲历了四届人大两次筹备工作和一次会议的全过程，这在我一生中是非同寻常的经历。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吴庆彤、朱雨滋、脱若男同志的支持和帮助。

根据 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为四年（1975 年宪法将任期改为五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是 1964 年 12 月 21 日至 1965 年 1 月 4 日召开的。按照当时《宪法》的规定，四届人大本应在 1968 年底或 1969 年初召开。但是，由于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动乱期间，造反派全面夺权席卷全国，严重打乱了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秩序，当时不可能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1969 年 4 月，中共九大召开。会后，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央从 1970 年 3 月开始，着手进行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成立由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事宜；成立由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工作小组，负责修改宪法；由周恩来、姚文元主持起草政府工作报告。

按照中央工作的预定日程：1970 年 3 月 17 日至 20 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通过有关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方案，四届人大的各项筹备工作全面展开。当时曾预计于 1970 年 9 月召开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四届人大会议多次推迟，筹备工作也时断时续。

#### ◇ 筹备工作再次提上日程

1973 年 8 月中共十大闭幕不久，周总理和王洪文向毛主席汇报了有关四届人大的筹备事项。9 月 12 日，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在近期内发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并开始进行修改宪法草案的工作。同时，在政治局内设立组织工作小组、宪法修改小组和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周总理担任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长，张春桥担任宪法修改小组组长，纪登奎担任组织工作小组组长。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973 年 9 月 15 日，纪登奎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开了中央组织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他说，根据主席的指示，中央政治局决定今年召开四届人大，从现在开始各项筹备工作立即着手进行，中央要求 10 月 5 日前完成筹备工作，预计 11 月份开会。他接着强调，整个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负责。中央政治局确定由纪登奎、华国锋、乌兰夫、陈锡联、吴德等同志组成中央组织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选举和人大常委的推荐等相关工作。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中央决定由中央党政军有

关部门的负责人参与组织工作小组的具体工作，他们是：中央组织部业务组组长郭玉峰、国务院办公厅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吴庆彤、总政治部副主任田维新、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中央统战部军代表刘友法及童小鹏、李金德、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周启才等同志。纪登奎说，组织工作小组的任务是负责代表名额的分配和代表选举工作，组织有关部门推荐四届人大常委的建议名单。讲到这里，他非常严肃地说，组织工作小组只管代表和人大常委，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要对组织工作小组和中组部定个规矩：“不准议论和提名中央和国家领导人的人事安排问题（包括副委员长、副总理等）”。纪登奎 1984 年 6 月在《关于我分管中组部工作期间的情况及问题》的报告中说，他之所以定这个规矩，是“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文革’期间中央内部复杂的情况”而提出的。“这项规定，对抵制‘四人帮’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和在中组部搞鬼，起了一定的作用。”

这次会议还商定了组织工作小组内部的分工：中央组织部负责联系各省、市、自治区（包括台湾省）代表的选举工作；中央办公厅负责中直机关代表的选举工作；国务院政工组负责国家机关代表的选举工作；总政负责军队代表的选举工作；中央统战部负责民主党派代表的提名推荐工作。

会议还确定由参加组织工作小组工作的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推荐工作人员，组成组织工作小组值班室，负责组织工作小组交办的具体工作事宜。组织工作小组值班室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紫光阁，由吴庆彤负责安排，文件运转由周启才安排中办秘书局负责。

纪登奎最后说，这次人大的筹备工作时间紧，中央给我们的时间总共不到 1 个月，任务非常繁重，希望大家集中精力，抓紧工作，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他特别强调，组织工作小组的工作是十分严肃的工作，大家一定要遵守纪律，所有议论的问题都在紫光阁内进行，离开紫光阁不准透露出任何消息，包括原单位和亲属。一定要严格保密，谁在这方面犯了错误，谁就要离开紫光阁。

组织工作小组会议的第二天，各单位推荐的值班室工作人员到紫光阁报到，立即开展工作。值班室的工作人员有：国务院值班室范民新（曾任习仲勋秘书）、朱雨滋（曾任齐燕铭秘书），人大常委办公厅脱若男（长期在人大负责会务工作，后任人大常委办公厅秘书局局长），总政干部部安培里、总政组织部青年处处长赵荣璧，中央统战部沙里、李济生，中央组织部孙中范、李麟章等 9 人。由于值

班室主要是承办人事方面的工作，中组部对这方面的工作比较熟悉，纪登奎同郭玉峰、吴庆彤等同志商量，指定孙中范为值班室负责人。

从此，紫光阁就成了组织工作小组和值班室开会和办公的地方。紫光阁大厅的面积非常大，大厅西侧是值班室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大厅东侧放了一圈沙发，是值班室工作人员开会或商量事情的地方。在紫光阁大厅外西侧布置了一个大会议室，组织工作小组开会办公就在这个会议室。

值班室的工作一般都是由纪登奎等中央领导同志到紫光阁开会办公安排。值班室的工作人员来自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工作非常自觉主动、认真负责，而且大家相处得十分融洽。这里的工作都是由中央领导同志布置下来，我们分工去办理，遇到问题值班室的同志集体商量提出意见之后，请示报告纪登奎或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确定。由于纪登奎经常到紫光阁办公或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所以处理事情都非常及时。经过中央领导同志或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议定的事情，则由值班室写成书面报告，请示周总理后报告中央政治局，在得到中央批准之后才能办理。

根据郭玉峰、吴庆彤等同志的意见，值班室人员作如下分工：孙中范、脱若男、朱雨滋负责拟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及选举的综合工作；范民新负责值班室的文字工作；李麟章负责联系中组部、各省市；朱雨滋负责联系国务院政工组和国家机关；沙里、李济生负责联系中央统战部、各民主党派、归国华侨等；安培里、赵荣璧负责联系总政及军队选举工作；脱若男、朱雨滋、安培里负责代表名册汇总；脱若男、李麟章、沙里负责三届人大常委情况汇总。

组织工作小组成立后的第一件工作，是代中央起草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方案。1970年第一次筹备时，中央政治局曾经讨论通过了周总理亲自审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的决定》。纪登奎传达周总理指示：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可以1970年的《决定》为基础，作适当调整，既要考虑各地人口分布，又要照顾经济发达的省、市增加一些代表名额。同时，周总理还提出要多留一点机动名额，以解决代表选举中可能出现的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后来增加的一些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代表，都是用机动名额解决的。

值班室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各地的代表名额在测算的基础上作了调整，代中央草拟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稿）》。纪登奎召集

组织工作小组会议对方案草稿进行了讨论，又对草稿说明作了一些修改后，将方案报送周总理审批。

1973年9月23日，周总理同王洪文一起向毛主席汇报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等相关问题。毛主席在听取汇报后作了指示。当天，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由王洪文在会上传达毛主席的指示。

王洪文说：刚才，我同总理一起到主席那儿请示四届人大代表的问题。

一、代表名额要增加一些，要到2650名或多一些。

总理说：可能达到2700名左右。

主席说：可以。

二、知识分子代表要增加一些。

在保证工农兵代表占优势的前提下，为了团结各方面的人，有利于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可以增加一些知识分子代表。

三、特邀代表的一部分或大部分转入正式代表，很少一部分放特邀代表，资本家可以做特邀。

主席还说：胡厥文也可以做正式代表。增加知识分子代表，要照顾到北京、中央国家机关，上海也有。

主席说：周谷城、谭其骧、苏步青、刘大杰、陈望道都可以做代表。

总理说：除北京、上海外，还有广州、武汉、天津等地也要增加知识分子代表。

王洪文还说：另外，我同意登奎同志的意见，目前在实际工作岗位上起骨干作用的知识分子应多安排一些，其他方面的，这次考虑名额有限，将来可在政协安排。总之，老朋友要照顾，同时要多交一些新朋友。

根据传达的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值班室对《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稿）》再次作了重要的修改。经过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后，纪登奎报给周总理审批。周总理对《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逐字逐句地作了修改，并批准以中央名义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总政治部、中央国家机关发了电报通知。各地、各单位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开始进行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的酝酿协商工作。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为3040人，而1970年第一次筹备四届人大时



确定的代表名额人数较少，具体数字记不起来了。特别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大多数老干部还没有“解放”，干部代表中多数是“三支两军”的军队干部，代表中大多数是工农兵代表，知识分子代表也很少，而且把民主党派作为特邀代表，这样的代表结构是很不合理的。因此，在这次筹备工作一开始，中央就提出了用增加代表名额的办法来弥补。中央确定增加代表名额的指导思想比较明确：一是增加知识分子代表的比例；二是增加老干部代表；三是将民主党派的特邀代表改作正式代表。经过这样的调整，当时确定代表名额增加到 2 7 0 0 名，实际最后选出的四届人大代表是 2 8 8 5 名。其中，工农兵代表占 7 2 %，妇女占 2 2 %，各少数民族都有代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全国人大代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鉴于“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当时不仅不可能按照法律进行普选，也没有条件召开省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央确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协商会议选举出席四届人大代表。这种选举代表的方法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根据周总理的建议，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和毛主席批准，四届人大首次设立台湾省代表团。按照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纪登奎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了台湾省代表的产生办法。会议确定由在内地居住的台湾省籍同胞中推举代表，在北京召开协商选举会议选出台湾省四届人大代表。会议还确定由林丽韞负责，中组部派人协助做具体工作。会后，值班室拟定了《台湾省四届人大代表产生办法》的文件，经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通过，纪登奎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对文件逐字逐句地作了修改，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以中央文件下发。中央组织部会同中央有关部门及相关省市协商，提出了台湾省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经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同意，并报周总理审定后，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召开了四届人大台湾省代表协商选举会议，正式选出 1 2 名台湾省籍同胞为四届人大代表，第一次组成台湾省代表团参加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代表选举的文件下发后，组织工作小组立即召开会议，布置推荐四届人大常委会人选的工作。

1 9 7 3 年 9 月 2 9 日，王洪文参加了中央组织工作小组会议。他在会上讲

话说：“人大常委，考虑大体三三制，三分之一工农兵，三分之一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三分之一民主党派代表。请组织部、统战部考虑个名单。”

根据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的精神，值班室草拟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名额分配方案（草稿）》，将人大常委委员名额按地方、军队、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四大块分配。并确定：由中央组织部负责联系各省、市、自治区推荐人大常委委员人选的工作；总政负责推荐军队方面的人大常委委员人选；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政工组负责推荐中央和国家机关的人大常委委员人选；中央统战部负责推荐民主党派的人大常委委员人选；中央组织部还负责推荐了一部分老同志。

纪登奎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对这个方案草稿进行了讨论。会后，他将修改后的方案草稿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名额分配方案》。会后各有关单位立即开始组织四届人大常委委员人选的推荐工作。

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纪登奎布置值班室把三届人大常委委员的情况逐个摸清楚，给中央写个报告。值班室分工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所在单位联系，了解他们的有关情况。经过了解后汇总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当时已定性为敌我矛盾的；二是犯有错误尚未下结论的；三是已经工作的；四是已故的。纪登奎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详细听取了值班室的汇报，并找有关部门进行核对。他提出：三届人大常委除了已定性为敌我矛盾和已故的之外，其他原则上都可作为四届人大常委委员候选人的人选。组织工作小组经过讨论，同意纪登奎的意见。会后，值班室按会议讨论的精神起草了《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有关情况的报告》，经纪登奎审阅后报送给周总理，周总理批示印发政治局。在后来中央确定的四届人大常委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有 32 名三届人大常委委员被列为四届人大常委委员候选人。但是，由于当时许多老干部尚未解放，未列入四届人大常委委员候选人名单，致使四届人大常委委员中老干部的比例过低。

根据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名额分配方案》，各有关单位抓紧工作，很快就提出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人选的推荐名单，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但是，民主党派的人选迟迟定不下来。当时中央统战部各单位尚未恢复业务，统战部还是军代表领导，他们对民主党派的情况很不熟悉，研

究来研究去只提了十几位科学家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而且那时民主党派人士大部分人挨批的挨批，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定这个名单的确很复杂。

由于这个名单涉及面很广，迟迟定不下来，影响了筹备工作的进度。中央政治局曾委托王洪文、张春桥主持召开会议进行讨论。由于他们对民主党派的情况知之甚少，认识很不一致，很难统一起来，讨论多次，名单还是定不下来。张春桥只得说：“我们都不了解情况，还是请总理来搞吧！”

纪登奎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个情况。周总理带病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约统战部及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从早开到晚，周总理一边吃饭，一边讨论，一个一个把名单定下来，连名单的说明都是周总理逐字逐句推敲审定的。最后经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在周总理直接领导讨论确定的这个名单中，包括后来当选为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还有荣毅仁、史良、王淦昌、贝时璋、白寿彝、华罗庚、严济慈、沙千里、陈望道、罗叔章、胡子昂等一批知名的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代表。

最后，在四届人大代表中，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的代表共有 2 3 7 人，占代表总数的 8. 8 %，比三届人大少了近 1 5 0 名，这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已十分不容易了。到 1 9 7 3 年 1 0 月中旬，各地、各单位的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已经确定，并陆续上报中央。这时值班室的同志按分工审查各地代表候选人的各项比例是否符合中央的要求，并开始汇编《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册》。

之后，纪登奎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他传达说，毛主席提出他不做四届人大代表，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会议。政治局讨论了毛主席的提议，一致拥护。总理考虑中央领导同志只有毛主席一人不做人大代表不好，还要有人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我（纪登奎）在政治局会议上首先提出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后来又提出汪东兴同志也陪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政治局讨论已经同意，请值班室将我们三个人的名字从代表名册中去掉。

关于毛主席不做人大代表一事，王洪文在 1 9 7 5 年 1 月 8 日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作了通报，并得到全会的认可。

王洪文说：在 1 9 7 3 年筹备四届人大时，毛主席提出不做四届人大代表，也不出席四届人大会议。政治局讨论了毛主席的提议，一致拥护。

但是，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筹备工作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关怀下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期间所有的文件、人事安排，都向主席请示，都有批示。

◇ 筹备工作因故再推迟

10月中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纪登奎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的组成原则和拟定名单的办法。会后，中央各有关单位开始提名，由值班室汇总各单位提出的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其间，组织工作小组开了两次会议讨论这个建议名单，对有些人选拿不准，纪登奎还当面请示了周总理。

10月21日下午，组织工作小组再次召开会议，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对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又一次进行讨论。会议结束前，纪登奎让值班室根据会议讨论的意见修改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第二天上午正式印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前面要加一个详细的说明，准备报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讨论。会后，值班室按分工很快修改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我负责草拟了说明（内容包括确定主席团人选的原则、提名的办法以及各类人员的比例）。文件搞好后当晚送国务院印厂排清样，准备第二天上午核对后报纪登奎。

可是由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再一次被推延。

我们值班室成立时，由国务院值班室为我们每个人办了出入中南海的证件。由于紫光阁在中南海北院，中央警卫局批准我们进出中南海北门或西北门。中南海警卫制度非常严格，刚开始进门时警卫要检验证件核对姓名后方可进入，后来警卫对我们都熟悉了，每次进出都放行。

10月22日一早上班时，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我像往常一样到中南海西北门准备进院，发现门岗警卫增加了许多人，而且都换上了新人。我正在犹豫时，有一位警卫上前敬礼后拦住我检查证件，之后又进去同国务院值班室核对后才放行。一进西北门就发现中南海内增设了许多流动岗哨，紫光阁门前也增加了警卫。这时，值班室同志们集中在紫光阁会议室开始议论起来，感觉肯定出了大事，否则中南海的气氛不会这么紧张。大家相互提醒，这几天的行动一定要特别谨慎，不要添乱。

这天上午我们仍按纪登奎的布置，仔细校对了《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人选建议名单》，并讨论修改了说明，将修订后的清样送印厂付印，准备报纪登奎。按往常惯例，当天下午，纪登奎、郭玉峰、吴庆彤、周启才等一定会来紫光阁办

公，审定印好的文件。可是他们没有来，一连等了几天都没有开会。10月21日下午的组织工作小组会议，成为四届人大第二次筹备工作的最后一次会议。

后来，从国务院值班室听说，10月21日，发生了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公安部部长不明原因身亡，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一起要案，北京的气氛比较紧张。在当时条件下，李震身亡的原因一时难以查清。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中央决定采取若干特殊措施加以防范。这时才弄清楚，中央责成纪登奎、郭玉峰等参与处理李震事件，顾不上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值班室的工作全部是完成组织工作小组领导交办的事项，领导不来开会布置任务我们就没有事情可干。由于前段工作任务十分紧张，大家天天加班，几乎是每天吃住在紫光阁，这样可以稍事休息一下了。

大约在11月初，吴庆彤来紫光阁召集值班室工作人员开会。他说：中央最近有些紧急事务需要处理，一时顾不上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值班室也就没有事情做，还不知道需要等待多长时间。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是，值班室可以派人轮流值班，平时可以回原单位上班，但不要出差，随时等候通知，继续完成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

会后，我们集中了几天时间，清理了这段工作期间的文件，封存在紫光阁的档案柜中。值班室的工作就这样告一段落。

#### ◇ 筹备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1974年1月25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四届人大的第二次筹备工作因“批林批孔”运动而被迫中止，一拖又是一年，直到1974年国庆节后才又重新开始筹备。

1974年“一·二五”大会之火很快席卷全国，“四人帮”借“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全国形势一片混乱。由于受到“反潮流”之风的冲击，各级党委不能正常工作，一些重点大企业处于瘫痪状态。周总理一边住院治疗，一边关注形势的发展，他责成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老大难”问题。中央领导同志从中央国家机关抽调一些同志组成联络组，协助做具体工作，我也被调到中央联络组。9月下旬，纪登奎派国务院值班室王书明和我以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到内蒙古检查落实中央解决内蒙古

的问题情况。

10月5日，我接到国务院值班室打来的电话，说中央领导同志让我速回北京，到紫光阁报到。我估计到可能是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又要开始了。而我和王书明按原计划在内蒙古的工作还要一星期才结束。于是我又给国务院值班室回话，请他们请示中央领导同志，内蒙古工作尚未结束是否可以晚回京几天。国务院值班室很快回复说：登奎同志让你迅速结束内蒙的工作，两三天内返京。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我同王书明一起向内蒙区党委领导报告，抓紧在两天内把工作结束。我于10月8日返京后直接赶到紫光阁报到。

我到紫光阁后看到值班室的其他同志早已报到，正在按分工紧张地工作着。这时纪登奎也在紫光阁办公，他见我回来了，就在紫光阁的会议室找我单独谈了一次话。他首先询问了内蒙古贯彻中央学习班的情况，阻力大不大。他特别关心内蒙古目前的局势能不能稳定下来，造反派还会不会闹事，重点企业生产恢复得怎样。我把检查了解的情况向他作了简要汇报。我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那些造反派不敢再闹了（在北京学习班期间，经中央批准宣布逮捕了几个煽动停产的造反派头头，威慑力很大——笔者注），形势会稳定下来。尤太忠同志（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让我转告，请中央放心。

接着，他很严肃地对我说：主席已经决定在今年内开四届人大，中央准备发个通知，待主席批准后很快就会下发，这次人大的筹备工作到了关键时刻。总理虽然有病住院，中央决定筹备工作仍由总理和王洪文负责。当前全国的形势还不很稳定，情况比较复杂，给这次筹备工作增加了许多难度。你们值班室的工作一定要认真负责，精心细致，想问题办事情要周到，绝不能出纰漏，不要给筹备工作添乱。我当时对纪登奎这次谈话的深层含意并没有理解透，只想到是对值班室工作的严格要求。后来从筹备工作中围绕“组阁”的复杂斗争，才逐渐明白了他这次谈话的真正含意。同时，纪登奎还交代了这段筹备工作的任务。他说：这次筹备工作主要是讨论人事问题，最后确定四届人大代表名单、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名单和大会主席团名单，中央还要最后确定人大和国务院的领导人选。这期间要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进行讨论，你们值班室要随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当晚，我们开了值班室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传达了纪登奎谈话的精神，安排

了值班室近期的工作。

我在中央联络组期间曾经了解到，毛主席对“批林批孔”运动出现的混乱局面很忧虑，对江青的一些做法不满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毛主席批评“四人帮”以后，全国形势开始逐步稳定。1974年下半年毛主席开始考虑何时召开四届人大。1974年国庆节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10月4日向毛主席报告说：“十月三日晚，政治局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问题，主要是讨论了是否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如主席同意年内（或春节前）召开四届人大，政治局最近一段时间的工作拟以此为中心全力准备。”毛主席圈阅了这个报告，同意年内召开四届人大。当天下午，他要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

毛主席似乎已预感到在四届人大将发生一场风波。他在离开武汉前夕，圈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1974年10月11日以中共中央[1974]26号文件的形式发出。从此，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全面展开。

我当时看到这个中央文件就觉得很寻常。文件的题目是《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但对人大只在开头讲了一句话：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文件突出了毛主席在武汉期间所作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并对落实政策、抓革命促生产提出了要求，强调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加强团结，发展当前大好形势。从后来筹备工作的实践证明，经毛主席圈阅的中央26号文件很有预见性和针对性，它对搞好筹备和开好四届人大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973年协商推举的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经过一年多来“批林批孔”运动有些变化，中央决定在1973年代表名额的基础上按比例减少代表名额。我回京前值班室对各省、市、自治区代表名额按比例减少做出了调整方案，并经中央批准给各省、市、自治区发出了电报通知，要求各地按调整后的名额调整代表候选人，报中央审批后正式协商选举四届人大代表。

我回京后处理的第一件事就发生了失误，教训十分深刻。中央电报通知刚发

出，就接到湖北省给中央发来请示电报，说他们协商调整代表有困难，要求增加一个代表名额。值班室接到湖北省电报后经过商量一致认为，中央总的精神是减少代表名额，他们刚接到电报还不可能酝酿具体代表人选就要求增加代表名额，理由不充分，不同意增加代表名额。根据值班室讨论的意见，我草拟了中央给湖北省的复电草稿，强调中央总的精神是减少代表名额，不再给湖北增加代表名额，请他们在现有代表名额内调整人选。复电草稿经纪登奎审阅后送周总理审批。

两天后，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调整四届人大常委会人选方案。会议开始前，周总理一进福建厅就问起湖北省增加代表名额的电报和复电稿的事。他说：张体学同志（时任湖北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湖北省原省长）向来是顾全大局的，如果没有特殊原因他们决不会无故向中央要求增加代表名额。我算了一下，按减少名额的比例计算，给湖北省的代表名额可能少算了一个。因为中央电报通知是在我回京前发出的，我没有直接算过比例，听了周总理的话心情十分紧张，纪登奎刚刚作了交代就出了纰漏。这时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提醒，不知其他省是否也有类似湖北的情况。于是，周启才和我一起对各省的代表名额重新核对了一遍，结果发现有六个省少算了名额。我把复核的结果报告周总理和在场的中央领导同志。周总理立即表态说：在中央处理问题一定要认真细致，实事求是，要给少算的六个省发个电报，并且说明因中央计算名额有误，分别给他们增加一个代表名额。按照周总理的指示，我当场起草了给湖北等六个省增加代表名额的电报稿，周总理当场签发后，周启才立即派中办秘书局同志当晚发出了电报。

发生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散会后我从人民大会堂回到紫光阁，心情很不平静。一方面因为值班室对代表名额计算上的失误，牵扯了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精力，心里十分内疚。另一方面，对周总理那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十分感动。他不仅带重病坚持领导繁重而复杂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就是对一个省的一个代表名额这么具体的事情都那么认真细致。这件事，使我从周总理身上学到了很多平时学不到的东西，实在受益匪浅，终身难忘。于是我连夜写了一份给纪登奎并周总理的检讨报告。

第二天一上班，值班室全体工作人员开了会，我传达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及周总理处理这件事的全过程，并宣读了我的检讨报告。大家经过讨论，对周总



理处理事情的态度都很受感动，并一致表示今后在工作中一定要认真负责，决不能再出纰漏。为此值班室作出决定，今后所有上报的材料都要经过三个人仔细核对后才能发出。从此以后，经过大家的努力，值班室的工作再也没有发生失误，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

当天下午，纪登奎在紫光阁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落实周总理前一天会议确定的四届人大常委会人选的调整方案。会前我将检讨报告送他审批，并报告了值班室上午开会讨论的情况。他严肃地说：“我们这里的工作没有小事，一定要汲取教训，把工作做得再细一些。”这时吴庆彤插话说：“昨晚的事不怨孙中范同志，代表名额的电报是在他回京前发出了，我们都没看出来，他替我们承担了责任，这种精神值得值班室的同志们学习。”纪登奎听后的在我的检讨报告上批示：请总理阅。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从10月中旬开始，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国家机关、军队都在调整四届人大代表候选人。从11月开始，组织工作小组的领导同志逐一听取各省、市、自治区有关协商调整代表候选人情况的汇报。中央领导同志在听取汇报的过程中主要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代表候选人的各项比例必须符合中央的规定，特别强调妇女、少数民族、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代表要占一定比例，凡达不到中央要求的都要进行调整。

第二，中央在八一建军节和国庆节登报解放了一批“文化大革命”以来从未工作的老干部，这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经过艰苦努力实现的。纪登奎直接参与了解放这批老干部的工作，他据此要求各省也要按照中央的精神，尽可能把能够解放的有代表性的老干部选为四届人大代表。

第三，“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周总理委托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吴德等中央领导同志解决“老大难”问题，他们都很有感触，各地出现的混乱局面都是那些“反潮流”的造反派头头闹起来的。为此纪登奎提出，对那些煽动停产闹革命、造成很坏影响的造反派头头不要选他们做人大代表，已经安排做代表候选人的要进行调整。

根据组织工作小组的上述精神，各地又对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进行了个别调整。但是，在“四人帮”的干扰下，受“批林批孔”运动的影响，仍有一批

造反派头头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

各地代表候选人名单经中央审批后，从 1 1 月下旬至 1 2 月上旬，将陆续召开协商代表会议，正式选举出席四届全国人大代表。

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是按照省、市、自治区和军队为选举单位组成代表团，因此，中央领导人、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推荐的代表候选人都要经过省、市、自治区和军队协商选举会议正式选为代表。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值班室草拟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代表选区分配方案》，经组织工作小组和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后，中央给各地发了电报通知。这些代表不占本地的代表名额，由中央从机动名额中分配。选区分配一般是考虑代表的籍贯、曾经工作的地区或联系较多的地方，同时还要考虑各地的平衡。

这时纪登奎提出，请值班室注意了解各地选举代表的动态，发现有什么情况，随时报告中央。他还提出，在大会召开前，人事名单还没有最后确定，有可能会有变动，各省的协商选举会议不能都开完，要留几个省待中央人事安排名单确定下来后再开协商选举会议。经组织工作小组会议讨论，确定留北京、天津等省、市晚些时候开协商选举会议最后选举代表，并给相关省、市发了通知。

经过中央和各地的努力，到 1 2 月上旬，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军队都顺利地召开了协商选举会议，选出了出席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值班室汇总编印了《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名册》（包括尚未开会选举的代表候选人名册），并且按照纪登奎的意见将名册印发中央政治局委员。

周总理在审阅四届人大代表名册时发现，刚解放的一些老干部有的应当安排做人大代表；另外，文艺界的代表较多，相对外事和体育界代表过少。为此，周总理于 1 2 月 1 4 日致信王洪文和中央政治局，建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的代表名额。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周总理的建议，组织工作小组按照周总理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立即开会研究，同有关部门协商，迅速增加了相关的人大代表。

与此同时，从 1 0 月下旬开始，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工作小组召开了十多次会议讨论四届人大常委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候选人建议名单。主席团候选人建议名单，是在周总理主持下审定的，中央政治局在讨论

时没有多少争议，就比较顺利地通过了。

◇ 周总理缜密谋划人事安排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四届人大常委候选人名单时，争议非常激烈，讨论多次定不下来。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四人帮”坚持提各省造反派头头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代表人物进人大常委会；而组织工作小组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前一段解决“老大难”问题时发现，各地出现的混乱局面都是由“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头头煽动起来的。因此中央领导同志多次研究，想尽办法找理由反对把一些造反派头头安排做人大常委，有的人选是几上几下通不过。争议的另一个焦点，是周总理、纪登奎和组织工作小组的中央领导同志主张安排一些老干部进人大常委会。经过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努力，一些在八一建军节和国庆节刚刚见报的老干部和知识界的代表人物被安排做人大常委候选人，我记得有吕正操、梁必业、傅秋涛、武新宇，以及王淦昌、白寿彝、陈望道等人。最后，周总理抱病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

在毛主席已经明确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以及主要的副委员长、副总理名单的基础上，按照毛主席关于“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商定”的指示，从1974年11月中下旬开始，周总理在动了大手术之后，不顾自己极其衰弱的身体状况，在三〇五医院的病房里连续同中央政治局同志分别谈话，酝酿协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

到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阶段。12月18日，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20日，周总理又审阅修订了《政府工作报告（草稿）》。

12月20日夜，周总理亲笔拟定了《拟提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方案》。

12月20日晚，纪登奎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检查四届人大各项组织工作的最后落实情况，会议开到21日凌晨。散会后我留在紫光阁整理会议讨论的有关文件。21日凌晨2时，周总理办公室秘书纪东同志拿着一个文件袋来到紫光阁，问吴庆彤在吗？我告诉他，庆彤同志刚散会回家休息了。这时他把周总理亲笔写给吴庆彤亲启的“特急绝密”文件袋交给我，并说你同他联系，总理交代让速办，中午起床后总理要看。这时我虽然不知道文件的内容，

但已感觉得到是一份非常重要又非常急的文件。因为从值班室成立以来就规定，有关四届人大的所有文件都由中办秘书局机要交通处传递，总理办公室直接送交文件这还是第一次。

吴庆彤在国务院值班室工作压力特别大，长期睡眠不足，神经衰弱很严重，每天回家不管多晚都要服安眠药才能入睡。我们都知道他这个习惯，这时一般不再打扰他。但这件事非常特殊，我只好给他打电话，把他从睡梦中叫醒。他一接电话就问有什么急事，我告诉他纪东送来了一封总理给他的亲启件，让印好后中午交给总理。吴庆彤让我拆开看是什么文件。我拆开文件袋后看到一封周总理给吴庆彤的亲笔信，我马上在电话里念给他听。周总理写道：庆彤同志：请派专人速将此件送印厂特密件印两份清样，中午前送我。又及：清样印好后，请将我写的原稿烧掉。信后是周总理亲笔拟定的《拟提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方案》。我问他是否要立即把文件送给他，看怎么办？

吴庆彤听我电话后说：时间太紧，我刚吃了药，文件就不要送给我了，以免耽误时间。你现在就直接到国务院印厂，找李文林厂长亲自排印，不要让别人知道，嘱咐他一定要保密。你在印厂监督，排完版仔细校对准确后印出清样。他想了想又在电话里强调说：清样印好后，你将排印的铅版和校对稿一起带回紫光阁，锁在保密柜里，片纸都不要留在印厂，等早上一上班我就去处理这件事。

放下电话我已感觉到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任务，绝不能出半点纰漏。为了防止发生意外，我按周总理亲笔拟定的名单方案的原件手抄了一份，将原件锁在值班室的保密柜里。办完后我立即给李文林打电话，通知他马上到印厂等我，有一个急件庆彤主任让他亲自排印。放下电话，我从国务院值班室要了车，带上名单方案的手抄件前往国务院印厂。当我到国务院印厂时，李文林已经在等我，我们直接就进入排版车间立即开始工作。我对李文林说：今天排的是一件极其重要的文件，你排起来就知道了，庆彤主任嘱咐就由你一个人排印，并且要绝对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这是一条铁的纪律，若传出去后果不堪设想，我们都负不起这个责任。李文林立即表态说：请领导放心，我一定保密。

说好后李文林立即按手抄稿排版印出了小样，我当场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了

两遍，准确无误后请他正式印出两份清样。我又把清样同原件仔细校对了一次，之后将手抄的原件、两份清样和校对的小样一并装入文件袋。这时我对李文林说：今天我们俩完成了一项光荣的任务。我告诉他，为了保密，庆彤主任让我把刚才排的铅版带走。李文林帮我把铅版装好放到汽车上，我带着印好的清样和铅版回到紫光阁，立即放到了值班室的保密柜里。这下我可算松了口气，此时已是 12 月 21 日早晨 6 时。趁大家还没上班，我在值班室抓紧时间睡了一觉。

21 日早晨一上班，吴庆彤就来到紫光阁。我立即将周总理的亲笔信和印出的清样交给他看，同时把夜里工作的全过程向他作了详细汇报，他表示满意。接着，他又把印好的清样同周总理亲笔草拟的原件仔细核对了一遍，确认准确无误后，将两份清样装入文件袋密封好，并亲笔在信封上写周总理亲启。一切办妥后，他让我把文件直接送给总理办公室纪东。

当天上午 10 时，我把印好的文件准时送到总理办公室交给纪东。我一进总理办公室，纪东就开玩笑地对我说：辛苦了！看样子又是一夜没睡，还挺准时。我也开玩笑似的回答他：首长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们，这是对我们的信任，哪敢怠慢。他说：等总理起床后我立即交给他看，有什么事再找你。

21 日下午，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部分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国务院各部委人事安排问题。当天晚上，纪东又来到紫光阁，送来了周总理对名单方案清样的修改稿，让立即印好两份清样，说总理等着要看；并嘱：修改稿原件也一并销毁。吴庆彤立即让我带上铅版和修改稿到国务院印厂，找李文林改版后又重新印好两份清样带回。这时吴庆彤等在值班室，他把清样对照原稿仔细校对后密封，让我立即将重新印好的两份清样再送总理办公室纪东。周总理就是带着这份印好的清样，于 12 月 23 日飞往长沙，向毛主席作了汇报。

22 日下午，纪登奎在紫光阁召开组织工作小组会议，检查四届人大组织工作的落实情况，讨论研究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机构设置、人员调配、工作任务等方案，参加会议的有华国锋、乌兰夫、吴德，还有郭玉峰、吴庆彤、周启才等同志。开会前吴庆彤让我把前一天周总理交办的付印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方案的工作情况详细地作了汇报，纪登奎听了汇报后说，你们办得很周到。这时我说，总理两次亲笔原件就锁在值班室的保密柜里，首长是否要看一下再销毁。纪登奎当即表示：你们按总理的指示办，立即把它销毁，我们都不看了。我当即从

值班室保密柜中拿出周总理的两次亲笔手稿、一份手抄稿和两次印厂的校对小样，在紫光阁的会议室当着在场的领导同志的面烧掉。完事之后，吴庆彤半开玩笑地说：将来如果有人要查这件事，请首长出来作证。

12月21日凌晨，周总理亲笔拟定的《拟提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方案》，是在毛主席已经确定“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副总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董必武、宋庆龄为副委员长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征求并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提出了其他副总理、副委员长人选的初步名单。

方案中副委员长有：康生、刘伯承、吴德、赛福鼎·艾则孜、郭沫若、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或荣毅仁、李素文、谢静宜；

副总理有：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乔冠华、方毅。

另外，对陈云、徐向前、聂荣臻、韦国清、谭震林、李井泉等老革命如何安排，周总理设想国务院设顾问，他们是作国务院顾问还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需请示毛主席决定。

方案还列有：叶剑英兼国防部长，余秋里兼计委主任，谷牧兼建委主任，华国锋兼公安部长，乔冠华兼外交部长，方毅兼外经部长等。

12月21日夜，周总理第二次对名单方案修改的主要内容是，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名单中增加陈云、韦国清二人。

经过周总理煞费苦心精心拟定的人事安排名单，提出了两个方案供毛主席决策。其中大方案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数多一些，包括一批老革命和各方面知名的代表人物，国务院安排的是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小方案是如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数不宜过多（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是18人——笔者注），则将几位老革命安排作国务院顾问。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应当说是一个比较周到、各方面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案，一方面周总理想通过四届人大尽可能地使一批老革命在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得到妥善安排，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老中青相结合的原则，尽量体现毛主席当时对人事安排的意图。

## ◇ “四人帮”插手人事安排

关于国务院各部委的人事安排，“四人帮”与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也是有争议的，江青、张春桥等竭力想把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

据吴德（当时吴德兼国务院文化组组长）回忆，在周总理与张春桥、江青谈话时，他们提出要建立文化部，并让吴德任部长。吴德提出负责北京市的工作已很繁重，又不懂文化工作，前一段负责文化组时很多工作也没有做好，他向周总理提出不当文化部长。后来，张春桥又提出让吴德任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长，吴德还是想离开国务院文化组。周总理考虑总得有一位政治局委员做人大常务副委员长，经再三衡量还是吴德比较合适。周总理找吴德谈话说，王洪文自己提出他不去人大，他不干；让华国锋去，华国锋也不干；总要有一位政治局的同志去，因为朱老总和董老岁数大了，彭真就是副委员长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还是你去做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合适。周总理这个建议得到毛主席批准。

酝酿由谁当文化部部长争议很大。“四人帮”提出让于会泳当文化部部长，吴德提出文化部部长要由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担任，于会泳、刘庆棠等在文化界不一定能领导得起来，他曾提名上海的著名教授刘大杰当部长。江青他们坚决反对，坚持让于会泳任部长，刘庆棠、浩亮任副部长。最后，由于“四人帮”的坚持，于会泳还是当了文化部部长。

对教育部部长的争议也很大。“四人帮”始终坚持让迟群作教育部部长，周总理同李先念、纪登奎多次交换意见，一致认为决不能让迟群作教育部部长。周总理在听取政治局同志的意见时，曾有人提议让上海陈望道作教育部部长，最后周总理反复考虑还是坚持让周荣鑫作教育部部长，李先念、纪登奎都拥护。李先念提出铁道部让万里任部长，周总理赞成。最后他们议定：对教育部和铁道部的人选一定要坚持，对文化部和体委可作些让步。李先念曾同纪登奎开玩笑说：“文化部也不让他们干，他们就失业了。”

关于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的人选，经过激烈的争议，“四人帮”只争得了文化部和体委两个席位。在周总理拟定的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的名单中，主要是考虑了两部分人：一是启用了一批有丰富领导经验的老干部，如外贸部部长李强、二机部部长刘西尧、煤炭部部长徐今强、石化部部长康世恩、水电部部长钱正英、轻工部部长钱之光、交通部部长叶飞、邮电部部长钟夫翔、

财政部部长张劲夫等；另一部分是为了保持国家机关工作的连续性，留任了一批军代表作部长，如农林部部长沙风、冶金部部长陈绍昆、一机部部长李水清、三机部部长李际泰、五机部部长李成芳、七机部部长汪洋、商业部部长范子瑜等。

关于提名李素文和谢静宜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问题，与中央筹备工、青、妇三个组织的人选有关。

王洪文到中央工作不久，在 1974 年他就伸手抓工、青、妇三个组织的筹备工作。他提出由北京、上海、山东三省市各推荐一名负责人。上海推荐金祖敏担任全国总工会筹备组组长，北京推荐谢静宜担任共青团中央筹备组组长，山东推荐杨坡兰担任全国妇联筹备组组长。在审定四届人大常委候选人名单时，周总理提出为了便于人大常委会议事方便，在京的人大常委要占多数。为此要调一批工农中委到工、青、妇工作，并兼人大常委，这批人大部分担任了工、青、妇筹备组副组长。后来，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提出了对工、青、妇领导班子的调整意见，他要求增加一些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派性严重的人不要。按照邓小平的指示，中组部对工、青、妇领导班子名单作了调整，拿下了唐岐山、梁锦棠、鹿田计、董明会、张洪池等一批造反派头头，增加了王崇伦、韩荣华、马恒昌等一些劳动模范和老干部代表人物。

在酝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周总理和纪登奎商量同时考虑工、青、妇主要领导人的问题。周总理曾问纪登奎，工会金祖敏的情况如何？纪登奎说，金祖敏在上海是王洪文的得力干将，他到工会就是王洪文点的名，来京后同王洪文联系频繁。因此，周总理考虑只安排金祖敏做人大常委候选人，没有考虑安排他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

谢静宜是毛主席指定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又兼任了共青团中央筹备组组长。江青坚持要谢静宜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并且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信，周总理只好把谢静宜列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人选。

全国妇联筹备组组长是杨坡兰。她到妇联工作不久，有人以“妇联机关部分党员”的名义给中央写信，反映她“特殊化”问题。纪登奎批示：请中组部派人调查，并把调查结果报告中央。郭玉峰派我和中组部干部组魏焕章、李竹林去调查。我找了全国妇联机关的老领导康（克清）大姐、李宝光等谈话了解情况，魏焕章、李竹林分别找全国妇联筹备组的领导和部分机关干部谈话。经过调查我们



一致认为，来信反映杨坡兰“特殊化”的问题情况不实。多数同志认为她是劳动模范，为人还比较朴实，对自己的要求还比较严格。中央安排工、青、妇筹备组的领导住在京西宾馆，她爱人出差来京，她不让爱人同住京西宾馆，而是住在附近的招待所。但是，大家普遍反映，杨坡兰是劳动模范，长期在基层工作，组织领导能力较差，打不开工作局面，很难胜任全国妇联一把手的工作。我们将调查的情况向郭玉峰作了汇报，他同意我们的看法，让我们以中组部调查组的名义给纪登奎并中央写了调查报告。纪登奎听了郭玉峰和我的汇报后说：看来要考虑调整全国妇联的主要领导人。郭玉峰当场建议请邓（颖超）大姐担任全国妇联主席，纪登奎当即表示同意，但他说这要同总理商量后再作决定。后来纪登奎传达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坚决不同意邓大姐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全国妇联主席的人选要再考虑。纪登奎也曾向中央建议由蔡畅、邓颖超担任名誉主席，康克清任主席，周总理还是不同意。王洪文、吴桂贤曾提议杨坡兰任主席，康克清、李宝光等任副主席。郭玉峰坚持杨坡兰水平太低，当不了妇联第一把手。这样，全国妇联的领导班子始终定不下来。

在一次纪登奎同李先念交换意见时，李先念提议李素文当全国妇联主席。经了解，李素文是沈阳一个副食商店的售货员，先后当选为沈阳市劳模、辽宁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全国妇女“三八”红旗手；1963年当选为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在大会上作了《为革命卖菜》的发言，周总理带头多次鼓掌；1965年被商业部授予全国财贸系统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还在北京举办了“李素文学习毛主席著作展览”，李先念为展览剪彩并讲了话。当时她担任辽宁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团省委书记、十届中央委员。李先念对李素文比较了解，他的建议纪登奎完全同意，并让中组部给中央写了请示报告：建议蔡畅、邓颖超担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李素文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李宝光等任副主席。中央政治局讨论已经同意，后来全国妇代会因故未开成，此议没有成文。在周总理同中央政治局同志酝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时，李先念再次提议李素文列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纪登奎赞成并说，李素文当副委员长比他们（指“四人帮”——笔者注）提的人选更可靠。周总理同意这个建议，将李素文列为副委员长人选，报毛主席批准。

关于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人选，周总理曾经考虑由常务副委员长吴德兼任，吴德坚持说他的事情太多，照顾不过来，建议找一位能够处理外事活动的同志任秘书长。吴德提议让姬鹏飞任秘书长，他曾任外交部长，有外事工作的经验。周总理同意吴德的建议，最后经毛主席批准，由姬鹏飞任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周总理还提出了人大常委会的副秘书长人选，他们是罗青长、武新宇、李金德、沙千里。

◇ “长沙决策”，四届人大顺利召开

1974年12月下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刻。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已完成，进入了最高决策的关键阶段。

12月23日，周总理强撑着重病之身，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

从12月23日至27日，毛主席在长沙听取了周总理、王洪文有关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同他们进行了四次重要的谈话，并且确定了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最终形成了“长沙决策”。

毛主席在12月24日听取了周总理和王洪文关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的汇报，并作了重要的指示，最后确定了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候选人和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人选建议名单。

周总理在京拟定的四届人大副委员长人选名单是两个方案。毛主席听了汇报后表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赞成大方案，即副委员长人数可以多一些。这样原方案列为国务院顾问或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几位老同志均明确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

在讲到人大常务副委员长人选时，毛主席赞成吴德主持人大常务工作。

毛主席不同意谢静宜列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他说：“副委员长，小谢不能放，人家对她不了解，提得太早了，不好。”又说：“小谢，官越作越大，搞共青团书记可以，当副委员长就不适当了。”

在讲到邓颖超、蔡畅的安排时，毛主席同意邓颖超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周总理坚持邓颖超不要当副委员长时，毛主席没有再坚持。因此只安排蔡畅做副委员长。

毛主席提出：（人大）朱（德）、董（必武）、宋（庆龄）。以下排个次序。

在讲到民主人士时，周总理提出：是胡厥文还是荣毅仁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毛主席同意在民主人士中放宋庆龄、胡厥文、许德珩三人做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在讲到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方案时，毛主席赞成小方案，不设顾问。

在讲到乔冠华、方毅作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说：“要保护乔（冠华）、方（毅）、谢（静宜），但不要放。”

在讲副总理人选时，毛主席还曾问：“吴桂贤多大年纪？”

关于总政治部主任人选，在周总理去长沙时尚未有定论，毛主席也在思考中。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时提出了三个方案——肖华、苏振华、廖汉生，还提出可否调洗恒汉？毛主席都没有表态。最后，毛主席再三考虑决定让张春桥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并说，张春桥有才干。由此可以看出，毛主席一方面批评“四人帮”，另一方面在人事安排上还要搞平衡。

在谈到郭老（沫若）时，毛主席说：“回去代我问好。”

另外，在向毛主席汇报纪登奎提出要减少兼职的请求时，毛主席没有表态。

毛主席还提出在开四届人大之前开二中全会，并说：邓（小平）换李（德生）常委、副主席。李要他自己提出来，辞去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职务。

毛主席同意修改宪法报告。

至此，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长沙最后做出了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决策，这对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起了决定性作用，为建立以周恩来和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2月27日，周总理带着“长沙决策”返回北京，亲自整理出毛主席长沙谈话要点。12月28日，周总理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贯彻毛主席在长沙几次谈话的问题。12月29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在长沙的几次谈话内容，并且将经过毛主席调整同意后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印发中央政治局。

周总理从长沙回京后对纪登奎说：“上海、北京、东北都有人选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南方、西北也应有个年青人。”他们商量江苏董加耕是个人选。纪登奎通知郭玉峰，让中组部派人到南京把董加耕接到北京，纪登奎、吴德、郭玉峰等同董加耕谈了话。董加耕是全国知名的返乡务农典型，事迹感人，受到毛主

席和周总理的接见，本来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但在谈话中了解到他是反许世友一派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就成为一个问题。纪登奎把谈话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周总理为慎重起见，就没有安排董加耕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让他作了人大常委。

周总理还提出西北也要有一位年青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并确定由陕西省委推荐，纪登奎直接给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打电话。李瑞山同省委其他领导商量（据说李瑞山还征求了吴桂贤的意见），推荐了姚连蔚。姚连蔚是西安 8 4 7 厂工人，有工农兵的经历，是生产突击手、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是西安东郊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当过厂革委会副主任，当时是十届候补中委、陕西省总工会主任。纪登奎等中央领导看了他的简历并同本人谈了话，最后经周总理审定，将姚连蔚列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

孙健当国务院副总理是在十届二中全会期间决定的。二中全会前夕，周总理考虑中央政治局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都有年青干部，国务院副总理中也应增加一名年青干部。他对纪登奎说，上海有王洪文，北京有倪志福，西北有吴桂贤，又增加了姚连蔚，东北有李素文，天津还没有人选，请天津推荐一名有一定领导经验的年青干部作副总理人选。1975年1月7日上午十届二中全会报到，纪登奎派郭玉峰到京西宾馆找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说明中央让天津市委推荐一名有一定领导经验的年青干部作国务院副总理人选。解学恭当即召集天津的中央委员开会，并且电话同天津市委的主要领导交换意见，市委一致同意推荐孙健，并且当天就把他的档案材料送给郭玉峰转报纪登奎并周总理。孙健是天津内燃机厂工人，从学徒工干起，当过班组长、车间主任、厂团委副书记、武装部副部长、厂党委书记、厂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以后任天津一机局革委会副主任、天津市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市委常委，当时任天津市委主管工业的副书记、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周总理看了简历，同意将孙健作为副总理人选。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经毛主席批准，直接列入提交十届二中全会讨论的国务院副总理人选建议名单。

1975年1月3日，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1月4日，周总理和王洪文联名向毛主席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并报去调整后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这个名单经毛主席批准后，提交

十届二中全会讨论。

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主席圈阅的1975年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月8日至10日，在周总理主持下，召开了十届二中全会。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讨论通过了提请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提请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任命的四个名单，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候选人建议名单》、《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秘书长候选人建议名单》、《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人选建议名单》、《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建议名单》；讨论通过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候选人建议名单》，提请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全会还追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公报》。周总理在1月10日二中全会闭幕式上，传达了毛主席再次强调“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

1月11日，十届二中全会一结束，纪登奎在紫光阁召开了最后一次组织工作小组会议，对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做总结，对值班室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他风趣地说：今天的会议是我和吴德同志的交接，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在吴德同志的领导下进入四届人大秘书处的工作了。我不是四届人大代表，就没有资格参加大会了。大会开起来你们的工作会更紧张，希望你们保持和发扬在值班室工作的精神面貌，做好大会的各项组织工作，圆满完成中央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大会结束后你们再回到紫光阁，由吴庆彤和周启才同志安排，把四届人大筹备过程的档案完整地整理好，移交给中办秘书局存档。按照纪登奎的要求，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结束后，我们用约半个多月的时间整理了四届人大筹备工作过程的全部材料，用周启才的话说叫“片纸不G”，移交中办秘书局存档（我在这里说到的值班室工作情况，在档案中均有记载）。接着，吴德对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秘书处的工作进行了部署。散会后，值班室全体人员从紫光阁搬到京西宾馆，投入到大会秘书组的紧张工作中去。

距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十年之后，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终于在1975

年 1 月 1 3 日开幕。

□ 《百年潮》2 0 0 8 年第 6 — 7 期

2010 年 3 月 1 日初稿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第三卷第十册（7）

### 第三篇 文化大革命第二战役的伟大胜利

#### 第十章 批林批孔

#### 第六节 毛泽东论三个世界

##### 文献资料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内容的通报

一、

毛对卡翁达说，希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第三世界人口多啊。

又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较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对布迈丁也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

二、

当布迈丁问到美苏是否达成某种协议和进一步问到战争问题时，

毛说，

协议可能有，但是我看不那么巩固。一是暂时的，同时是骗人的。骨子里头还是争夺为主。我看会打仗。总而言之，将来总有一天会要打的。争夺的结果最后可能会武力解决，暂时还不会。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

这个世界上是有帝国主义存在。俄国也叫社会帝国主义，这种制度也就酝酿着战争。不是你们要打世界战争，我们要打，第三世界要打世界战争，也不是

这些富国的人民想要打世界大战，这种东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想到希特勒几乎统一了欧洲，又失败了。谁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间又产生了十月革命。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尾把日本、后来又把蒋介石赶走了。

至于打不打原子武器，可能打，也可能不打。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对日本打过，但是后头在朝鲜战争，就没有打。在越南战争，也没有打。在中东、以色列也好，埃及也好，美国人跟俄国人也没有援助他们原子武器。

布迈丁说，我们国家太小了，没有办法对付大国。

毛说，你们不小，你们把法国人赶走了，越南人也把美国问题解决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把美国军队赶到南边去了。现在美国到处霸了地方，它要保护这些地方，力量就分散。苏联要对付的地方也多，欧洲、地中海、阿拉伯世界、中东、南亚、中国、日本、美国，太平洋的美国。它的事情也不好办呢。

布迈丁问，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态度如何？

毛说：准备打仗！准备它们（美苏）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

三、

毛对卡翁达说，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你呢，我们希望也是要帮助人民。我劝你对人民要好啊！没有人民就会垮台。

当卡翁达谈到赞支持世界的反帝反殖斗争和在国内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时，

毛说，你现在不能当共产党，你当共产党，人家就都反对你，但是你可以看一点马克思的书。

四、

当谈到中国的成就和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时，

毛对布迈丁说，中国成就有一点，但是不大。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有时候工作方法比较好，有时候不大好。如果片面地介绍中国，说怎么好，那是不妥的。当然，说中国是一片黑暗，也是不对的。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时候有黑暗这一面。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就爱吹他的成绩，而不爱把自己的错误讲出来，所以你们要注意。别国大体也是如此，总是有光明的一面，也有



缺点。

当卡翁达赞扬我援赞工程人员时，

毛说，我们是共产党啊，应该好一点！我们的人也犯了一些错误呢。要教育。共产党内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有一些人看不起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人民，所以应该教育。我委托你教育中国的工程人员，还有尼雷尔总统，也应该这样做。在你们那里工作的，世界上的人作了坏事，不管哪个国家的都应该教育、处分或者把他们赶回来。不然那些人就把尾巴翘到天上。帮助你们修了铁路，了不起呀。

五、

在同布迈丁谈话时，

毛指出，地中海是密切关系欧洲的。欧洲安全，阿拉伯世界不安全，地中海问题不解决，那怎么行呢？几十个国家怎么能取得一致？单是欧洲就有三十几个国家。如果是听两个大国——美国跟苏联，这也不行吧。

六、

毛还对卡翁达说，非洲最好统一起来。南部非洲难啊！中间和北方的慢慢地统一起来。

并且说，你们应该发展人口。中国人口太多。非洲人还不够。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尼雷尔谈话主要内容的通报

一、

当尼雷尔提到美苏不是为和平而努力时，

毛说：和平是暂时的，将来就难说了。并说：总而言之，所谓裁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就说要裁军，结果谈出了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大战后又说要裁军，又是几年了，没有一个裁的。但是他们双方都说他们要搞和平，而且是长久的和平，或者是一代人的和平。一代人嘛，大概是半个世纪，五十年吧。何不讲两代人呢？因为这一讲，他的武器就没有销路了。大国都靠出卖武器赚钱。总而言之，我们对“持久和平”这样的口号要看一看呢。大概一段时间可以，太长了不行，因为社会制度没改变。总而言之，这个全世界是不安定的。他们之所以需要讲和平，就是因为这样讲对他们比较有利。他们又利用各国人民怕打核战争的心理状况，所以有许多人接受和平的口号。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大家都讲和平，结果讲出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了。现在又讲和平，可能也讲出一个什么战争来吧。

二、

毛说，他们（两个超级大国）现在有点怕第三世界。

尼说，如果第三世界没有中国，他们就不会怕。

毛说，也怕呢。

尼又说，第三世界没有中国，就成了纸老虎。

毛说，那不能这么讲！第三世界团结起来，使得工业国家，比如日本、欧洲和两个超级大国，都得要注意一点。

毛问到：整个非洲的事情怎么样了？

尼雷尔回答的过程中，

毛插话说：比过去都要好些。就是讲北部和中部非洲。

当尼雷尔谈及他们在南部非洲正在努力赢得独立时，

毛说，我跟你们意见一致，就是不喜欢南非白人政权控制非洲人民。并说，（南部非洲）将来总是要起变化的。非洲的变化已经够快的了。

尼雷尔说，中国现在对非洲的帮助是很多的。

毛说，帮助很小。

当尼称赞中国医疗队时，

毛说，应该主要是帮忙教会你们的医生。搞铁路的也应该主要是教会你们勘察、各种建设、修路、桥梁。各种技术人员都这样，我们将来一走，你们就完全可以自己管理了。如果不教，那就不好哩。

毛说，听说我们的人在你们那里做了一些坏事。并问：给了赔偿没有啊？有些犯错误的也撤回了吧。人多了，我们教育又不严，势必将来也还要出一些问题。你们发现有什么错误，就告诉我们的大使。

尼称赞中国人员在坦桑人对他们不好时和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工作从不发牢骚。

毛说，不能怪你们。这个不能发牢骚，发牢骚是错误的。

尼谈及他的母亲向我人员送活羊和鸡蛋时，  
毛说，收人家礼物不大好吧。以后成为风气不大好。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电：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四月十日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发言全文如下。〕

主席先生：

联合国大会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在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布迈丁主席的倡议下，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下，顺利召开了。联合国成立二十九年来，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还是第一次。这反映了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政府热烈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国政府希望会议将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维护民族经济权益，为促进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作出积极的贡献。

当前国际形势对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非常有利。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遭到了日益深刻的破坏和冲击。国际关系激烈变化。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这种状况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天下大乱”。这个“乱”是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表现。它加剧了腐朽的反动势力的瓦解和没落，促进了新生的人民力量的觉醒和壮大。

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

达国家。

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它出兵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它说了话不算，毫无信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关系；象葡萄牙这样的国家，甚至还在继续野蛮的殖民统治。这种情况应当结束。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其中有些国家在所谓“大家庭”的幌子下，实际上被超级大国置于附庸的地位。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两个超级大国既然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它们之间的妥协和勾结，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什么“均衡裁军”，什么“限制战略核武器”，到头来都是一句空话，实际上，既没有“均衡”，也不可能“限制”。它们可能达成某些协议，但是这种协议只不过是表面的和骗人的东西，骨子里是为了进行更大、更剧烈的争夺。超级大国的争夺遍及全球。欧洲是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处在长期紧张对峙之中。它们在中东、地中海、波斯湾、印度

洋、太平洋地区的角逐正在加剧。它们天天讲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它们天天讲“缓和”，实际上天天在搞紧张。它们争夺到那里，那里就出现动乱。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决不会安宁，就决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不是它们相互之间打起来，就是人民起来革命。正如毛泽东主席所阐明的那样，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设置了对立面。它们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激起了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亚非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继续前进。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冲破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和“不战不和”的局面，取得了反对以色列侵略者的巨大胜利。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斗争深入发展。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在武装斗争的烈火中光荣诞生。莫桑比克、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和南非、南罗白人种族主义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拉丁美洲国家带头兴起的维护海洋权的斗争，已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反对两个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第十届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和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一次又一次地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相互支援、同仇敌忾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前赴后继的斗争，戳穿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沉重地打击了它们妄图统治世界的野心。

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激起了第二世界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这些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干涉、威胁、剥削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日益发展。它们的斗争，也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无数事实说明，一切过高估计两霸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

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主席先生：

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大家知道，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亚非拉人民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奴役和掠夺。它们利用当地人民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推行畸形的单一经济，攫取廉价的农矿产品，倾销自己的工业产品，扼杀民族工业，进行不等价交换，榨取超额利润。发达国家的富和发展中国家的穷，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掠夺政策造成的结果。

许多亚非拉国家在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依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旧的经济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采用了新殖民主义形式，变本加厉地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它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通过“跨国公司”这样的国际垄断组织，建立“国中之国”，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在政治上进行干涉。它们利用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提高它们自己的产品的出口价格，压低发展中国家原料价格，牟取暴利。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它们相互间竞争的激化，它们还用转嫁经济、货币危机的办法，加剧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

应该指出的是，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超级大国在进行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掠夺方面，并不逊色。它在自己那个“大家庭”中以所谓“经济合作”和“国际分工”的名义，采用高压手段，榨取超额利润，其损人利己的程度，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中也不常见。它打着“援助”、“支持”的旗号，在一些国家中搞的联合企业，实质上就是“跨国公司”的翻版。它惯于利用陈旧设备和报废武器，标高价格，换取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原料和农产品。它大做军火买卖，成了世界军火商。它经常乘人之危，进行逼债。在这次中东战争中，它用贩卖军火赚取大量外汇，用低价买进阿拉伯石油，再用高价出售，转瞬之间大发横财。它还鼓吹什么“有限主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是国际财产，它竟然说，“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工业对这些资源的利用能力”。这是赤裸裸的帝

国主义理论。它比另一个超级大国所标榜的名为“相互依存”，实则维持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论调，更加露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真诚地支援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帮助人家发展民族经济，而这个超级大国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更加证明它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剥削，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帝国主义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发展中国家打破它们在经济上的垄断和掠夺，扫除这些障碍，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国家的经济资源和其他权益，这是完全正当的。

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阻止不了发展中国家在争取经济解放的道路上胜利前进。最近在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用石油作为武器，狠狠地打击了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这件事做得好，做得对。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反帝斗争中的一个创举。它大长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它冲破了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垄断国际经济的局面，也充分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进行战斗的巨大威力。既然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可以勾结在一起，任意操纵市场，严重地危害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那么发展中国家又为什么不可以团结起来，冲破帝国主义的垄断，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呢？石油斗争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在石油斗争上已经做到的事情，在其他原料问题上也应该、而且能够做到。

还应当指出：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意义，绝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超级大国为了扩军备战、争霸世界，必然要疯狂地掠夺第三世界的资源。发展中国家掌握和保护自己的资源，不仅对于巩固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反对超级大国扩军备战、制止它们发动侵略战争，也是必要的。

主席先生：

我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政治独立，还只是走了第一步，还必须巩固这个独立，因为在国内还存在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还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危险。巩固政治独立必须经历一个反复斗争的过程。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

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发展经济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只要各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完全有可能在工农业现代化方面逐步地达到我们的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生产水平。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所散布的一切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论调，都是毫无根据的，别有用心。

我们说的自力更生，就是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努力增加粮食生产，有计划地、逐步地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决不是脱离本国实际，而是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区别不同情况，确定各国自己的自力更生的途径。在现阶段，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民族经济，首先必须掌握自己的自然资源，并且逐步地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原料生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较大的比重。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把原料的生产、使用、销售、储存、运输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通过平等的贸易关系，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原料，换取较多的为它们发展工农业生产所必需的产品，它们就有可能逐步解决面临的困难，为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状态，铺平道路。

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我们一向认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三世界国家过去有着共同的遭遇，今天都面临着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发展民族经济，建设各自国家的共同任务。我们有一切理由进一步团结起来，而没有任何理由互相疏远。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正在利用我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某些暂时分歧，进行挑拨文化，破坏团结，以达到它们继续操纵、控制和掠夺的目的。我们应当保持充分警惕。我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某些分歧，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在有关发展中国家内部，通过协商，求得解决。在石油问题上，有关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做出积极努力，寻求适当途径，谋求问题的合理解决，对此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应该互相支持，在经济上也应该互相帮助。我们之间的合作是真正平等的合作，是具有广阔的前景的。

主席先生：

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目前这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并且提出



了许多合理的改革建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

我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

我们主张，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对一切外国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进行控制和管理，直到把它们收归国有。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各别地或集体地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

我们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当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我们支持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享有参与有关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一切决定的充分权利。

我们主张，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它们的原料、初级产品、半制成品和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扩大销售市场，确定公正有利的价格等迫切要求。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各种原料输出国组织，进行反殖、反帝、反霸的联合斗争。

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当是无息或低息的，必要时可以延期还本付息，甚至减免债务负担。我们反对假借援助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高利盘剥和敲诈勒索。

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派往受援国的专家和人员有责任向受援国人民认真传授技术，尊重受援国的法令和民族习惯，而不应当要求特殊待遇，更不得进行非法活动。

主席先生：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

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会变成超级大国。过去几年内，在中国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保证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主席先生：

历史在斗争中发展，世界在动荡中前进。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困难重重，日益衰败没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相信，只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且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就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来源：《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下册）》（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10月），以及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材料

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希思谈话内容的通报

一、

毛问希思，尼克松水门事件能过关吗？

希思认为尼可以幸存下来。

毛说，那个水门事件我们不懂，为什么闹得这么大。何必呢？没意思。借题发挥。

希思问水门事件是否使中国建立同美的关系及执行对美、对尼克松的政策更困难？

毛说，倒不。

希思问中美关系今后如何发展，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似乎停滞了。

毛说，那不要紧，还是比较好的。你可不可以劝一下尼克松，帮他一个忙，

叫他渡过水门难关？

在谈到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时，毛又说，美国人呢，就是手伸得太长了。你看，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台湾、东南亚、南亚、伊朗、土耳其、中东、地中海、欧洲。美国人骂了我们多少年，二十多年。

希思开玩笑地说，中国对美国帝国主义要当心！

毛说，但是我们比较对美国人放心。

二、

毛问希思，你们欧洲那个安全会议哪一年搞成功啊？

当希说如果问这个会议什么时候完蛋倒更容易回答些时，

毛说，对，我们的意见一致，这个欧安会完蛋了，他们（美苏）两家真正的和解也就搞不成了。

当希思谈到苏联下了很大决心并有强大的组织来增强其实力时，

毛反问，难道苏联就没有困难吗？并说，我看他们自顾不暇。它不能对付欧洲、中东、南亚、中国、太平洋。我看它会输的。

当希思再次强调苏军实力并问及中国是否认为苏联对中国不构成威胁时，

毛说，我们准备它来。但是它来了，它就垮台了呢！它只有那么几个兵，你们欧洲人那么怕！西方有一部分舆论，每天都想把俄国这一股祸水流向中国。你们的老前辈张伯伦，包括达拉第，就是推德国向东。

希思问中、苏分歧主要是在思想方面，还是苏联的强权政治所致？

毛说，由意识形态引起的边界问题。中苏争吵要从五四年开始算起，因为五五年赫鲁晓夫就找阿登纳说，中国不得了了。

希说，阿登纳总认为苏联会企图接管欧洲。

毛说，欧洲、亚洲、非洲，但是它力不从心。丢了埃及。在我们这里影响更小呢。也有些影响，林彪就是他们的人呢。

希思说，虽然苏联同甘地夫人订了一个条约，但他们在印度也没有多大影响。

毛说，我也这么看。你们的外交部长霍姆先生劝我们要跟印度搞好，他的意思是要把印度从苏联那边挖过来。

当希思说一个强大的欧洲很重要，可以使俄国发愁时，

毛说，你们欧洲强大起来，我们高兴啊。并且说，我们看欧洲、亚洲，包括日本，都不要吵架。要吵呢，可以，不要大吵。

希问中国对日本比较放心吗？

毛点头并说对。

希又问中国是否相信日本人的和平意图。

毛说，在可以估计到的一段时间内。将来很难说。但是我们不怕你们欧洲。

三、

毛说，英国能够跟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还是希思办的呢，所以我称你为首相先生。

当谈到因为希思不是现任首相所以未安排他在机场检阅仪仗队时，

毛说，我看要。不怕得罪威尔逊。（对希）我是投你的票的！

当希思谈到可能英国在技术方面能向中国提供所需的帮助时，

毛说，你们帮助我们，我们高兴。

希表示始终乐于帮助，

毛说，好，很好。

毛对希思说，你们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香港是割让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二十四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是他们（指在座的年青人）的事情了。

一九七五年一月三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的要点  
1975.01.03；中共中央讨论文件 [1974] 3 号

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几次谈话的要点

一九七四年

毛主席在几次会见外宾时说，我看这个世界不安宁，比较过去很不安宁，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包括中国在内。前不久出了林彪的事。林彪是我们党内的一霸。

现在到处讲和平，我看危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头几年，不讲和平，不要说要缓和紧张，而现在大讲特讲！没有病，就不要看医生。有病，他就要看医生。现在地球害病，所以要讲缓和紧张，缓和国际紧张，要讲和平。现在给地

球治病。我是持怀疑态度。国际会议这么多，美国这个国务卿到处跑，相当怪！黄昏的时候，燕子忙，飞得低，雨要下了！

我是不赞成所谓永久和平的。对欧洲来的朋友，我总是劝他们要准备打仗。如果不做准备，将来要吃亏。现在讲和平，我听得一些人讲，是要争取时间。美国人就跟我讲，争取时间。我也觉得这是个严肃问题，现在全世界人民考虑的问题。

当外宾谈到发生战争是世界性大灾难时，毛主席说，灾难是要来的，但是也是不那么可怕。现在设想，可怕得很。我看，真要打起来，没有什么大的可怕。因为战争的目的是要占领别人的土地和人民，如果把人民都打死了，那也就没有人民了。会打一些军事目标或者小城市。美国对日本打了两个，一个广岛，一个长崎。它决不打大城市。比如：东京就不打，大阪也不打。

毛主席说，未来总是光明的。要经过斗争。不斗啊，人家不听你的话！

毛主席说，我们是第三世界，我赞成第三世界的国家要互相帮助。第三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人怕蚊子，大国怕小国呢。

2010年3月8日初稿